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上)

水陆洲 编辑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二〇一二年九月制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 第三篇(上) 目 录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一章 搞好斗、批、改-----	4
第一节 九大以后的新形势新任务-----	4
第二节 解决一些省的遗留问题-----	74
第三节 清理阶级队伍-----	243
第四节 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	297
第五节 继续清查五·一六-----	381
第六节 整党建党-----	610
第七节 毕业生分配、上山下乡-----	673

第八节 教育卫生文化等领域的革命-----	743
第九节 改革旧的规章制度-----	833
第二章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	941
第一节 一九七〇年的新形势新任务-----	941
第二节 林彪集团逐渐形成-----	1037
第三节 围绕修改宪法的斗争-----	1103
第四节 林彪搞突袭 毛泽东反潮流-----	1155
第三章 批陈整风-----	1293
第一节 一九七一年的新形势新任务-----	1293
第二节 几员大将的检讨-----	1354
第三节 陈伯达反党问题-----	1371
第四节 召开华北会议-----	1410
第五节 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中央工作会议）-----	1427
第四章 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活动-----	1465
第一节 制定反革命计划-----	1465
第二节 实施反革命政变-----	1481
第五章 毛泽东外地巡视-----	1489
第一节 毛泽东巡视武昌-----	1489
第二节 毛泽东巡视长沙-----	1501
第三节 毛泽东巡视南昌-----	1534
第四节 毛泽东巡视杭州-----	1540
第五节 毛泽东巡视上海-----	1551
第六节 毛泽东回到北京-----	1558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一册（1）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一章 搞好斗、批、改

第一节 九大以后的新形势新任务

本节资料

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高举“九大”的团结旗帜,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浩荡东风吹遍了祖国大地。全国人民学习“九大”文献,贯彻“九大”精神,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政策和各项战斗任务的热潮,推动着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事业,更加蓬勃地向前发展。

从“九大”开幕到九届一中全会,毛主席一直发出了这样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号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号召,概括了“九大”的基本精神,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说:“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巩固胜利,发展胜利,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全国各地区、各单位都要坚决贯彻执行。

经过三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空前统一,我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更加巩固、更加发展。这个大团结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七亿人民中空前普及的基础上形成的。广大革命群众在摧毁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中,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结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人民解放军参加“三支”“两军”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军民团结。广大革命干部经受了锻炼,密切了同群众的联系。革命委员会的普遍建立,把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和解放军的代表结合在一起,把各方面的力量

统一起来，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元化领导。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种团结的、朝气蓬勃的革命形势下召开的。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有了充分准备的条件下召开的。“九大”圆满地实现了毛主席的号召，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选出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新的中央委员会，新的党章重新明确规定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明确规定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九大”团结的新胜利，是全党团结的新胜利。

在“九大”团结、胜利精神的鼓舞和推动下，全国革命的大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各级革命委员会，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都围绕着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总结经验，寻找差距，制订措施，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正在调动起来，斗、批、改运动开展得更加深入，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有些“老大难”单位正在改变面貌。“九大”在我党历史上的深远影响，已经开始并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

我们虽然已经得到很大的胜利和成绩，但是国内外敌人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和灭亡。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我们必须随时提高警惕。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向我们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前进。巩固和发展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把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在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认真细致地做好，还要作很大的努力。

我们还要遵循毛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教导，认真对付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侵略阴谋，准备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争，打核大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团结，是我们完成各项战斗任务，战胜共同敌人的可靠保证。

我们的团结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革命大团结，是在毛泽东思想原则指导下的革命大团结。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是人类

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工人阶级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加强自己队伍的团结，巩固地团结同盟军，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于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们，对于那些犯了严重错误而不是不可救药的人，对于那些犯了走资派错误而不是死不改悔的人，都应该按照党的政策团结他们。

在革命道路上的一切同志，都要团结起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最早起来造走资派的反，起了带头作用，是好的。但必须懂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广大的群众运动，认识有迟有早，革命有先有后，对后跟上的同志要热情欢迎。有的同志在运动初期一度站错了队，改了就好。不承认人家的进步，把犯过错误又已改正的人还总叫“老保”，是完全不对的。

有些最早造走资派的反的人，在革命运动的曲折过程中，也会犯某些错误，也要认真改正。那种“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思想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革命的。干革命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还是少团结一点人好？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

在团结的问题上，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同志要坚决贯彻“九大”的团结方针，做好工作。首先是要加强领导核心的团结，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体领导。要巩固革命的三结合。对参加三结合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要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相互学习，相互支持。对已经解放了的干部，要大胆使用，不要一犯错误就算老账，重新打倒。对革命群众组织要“一碗水端平”，不要亲一派，疏一派，你支一派，他支一派。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引导他们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进一步联合起来，不要重拉队伍，另立山头。广大革命群众要爱护和支持革命委员会，要促进、加强革命委员会内部新老干部的团结，要正确对待革命委员会在前进中可能出现的缺点或错误，允许革命委员会新老干部改正自己的缺点或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纠缠不休。

毛主席教导说：“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

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在这方面，伟大领袖毛主席正是我们的光辉典范。毛主席把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而又认真改正的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个条件。“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也规定共产党员必须做到这一条。每一个共产党员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都应当用这一条来要求自己。

我们的革命事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中前进的。我们要用毛主席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去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要善于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凡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都要用毛主席倡导的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唯一正确的公式去处理，都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谈心的办法，特别是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使矛盾得到解决，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提倡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应当是唯物的，辩证的。所谓唯物，就是要实事求是，如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所谓辩证，就是要一分为二，对事、对人、对己都要采取分析态度，全面地看问题，不要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不克服思想上的片面性，就不可能达到巩固团结的目的。

毛主席很早告诉我们，最近又再三提醒我们，一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但它又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反对右倾时候，就可能出“左”；在反对“左”倾时候，就可能出右。因此，我们对待工作的态度，不应该粗枝大叶，马马虎虎；不应该心血来潮，忘乎所以。我们务必随时随地遵守毛主席的教导：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总之，我们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对各地方、各单位的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谨慎细心，注意克服片面性。

坚持团结和坚持原则是一致的。我们讲的团结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我们讲的原则，就包括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

林副主席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号召我们：“全党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让我们高举“九大”团结的旗帜，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同全国革命人民团结在一起，搞好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争取更大的胜利！

（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社论）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毛主席批示：照办

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宣传毛主席形像、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上，有些时候，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为此，特提出如下改进意见：一、各级领导要积极引导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搞好思想革命化，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二、重申中央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今后，塑造毛主席像，必须严格按此指示执行。三、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四、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五、各种物品及包装等，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引用毛主席语录也要得当；禁止在瓷器上印制毛主席像。六、“忠”字是有阶级内容的，不要乱贴滥用；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如有，应作适当处理。七、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活动。

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四十八年光辉的战斗历程。

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党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领导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经历了武装夺取政权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斗争。二十年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年来，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胜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有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时候，我们党又领导了亿万群众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我们党的一切成就，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对我党四十八年的革命斗争经验，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作了全面的、系统的总结，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战斗任务。毛主席在“九大”期间所作的极其重要讲话，大会一致通过的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鼓舞着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照耀着我们继续前进的道路。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我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动各项工作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加强全党和全国革命人民大团结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进一步建设无产阶级革命党的根本指导思想。

四十八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陈独秀、王明、刘少奇三个叛徒集团为代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坚持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建立农村根据地，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不停顿地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坚持在进行经济战线上

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出了一整套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胜利地粉碎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摧毁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历史的经验证明，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革命就胜利，党就发展和壮大；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就受到挫折，党就遭到损失。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的。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工人阶级的领导，是经过共产党来实现的。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委员会，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唯一的领导中心。全党必须服从统一的纪律。全党必须服从中央。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权力机关，人民解放军，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都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这个问题上，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要继续批判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都要注意，绝不能把自己和党的关系摆错了。

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譬如讲斗、批、改。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继续总结经验，落实政策，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按系统、按单位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继续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在那些大体已完成清理阶级队伍的单位，就要抓紧整党建党和其他的斗、批、改的工作。

毛主席教导我们：“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是我们党几十年来建党经验的总结，是我们整党建党的伟大纲领。

整党建党，首先是思想上的整顿和建设。我们要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建思想，彻底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批判他的黑《修养》，批判他的黑“六

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进一步肃清其余毒。要用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武装我们的党，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伟大，更加光荣，更加正确。

我们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有强大的力量粉碎帝、修、反的一切反革命阴谋。但是，我们决不能麻痹。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要警惕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和翻案活动。那种认为“大权在握、大功告成”、可以“歇一歇”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是极其有害的。

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都要继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好好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发扬毛主席关于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的精神，坚持干部参加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不断革命，不断前进。老党员、新党员都要努力改造自己，把自己锻炼成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对那种不搞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热衷于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人，对那种居功自傲，停滞不前，图享受，争地位的人，对那种沾染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极端民主化而还不愿改正的人，对那种玩两面派、搞“小动作”而不去认真、刻苦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人，我们要向他们问一声：同志，你是继续革命，还是革命到头了呢？如果坚持继续革命，就要响应毛主席关于“要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继续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斗倒头脑中的种种资产阶级“私”字，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全心全意为人民，为革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英勇奋斗。

在整党建党工作中，抓好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是极其重要的。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都必须按照自己的具体条件，逐步形成一个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元化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才能按照毛主席的建党路线，搞好整党建党工作，才能更好地继续完成斗、批、改的各项任务。

毛主席关于“吐故纳新”的指示，反映了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必然规律。整党，首先是思想上的整顿。组织整顿的工作一定要做，也一定要采取谨慎的方法。对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应当清出除党，并不准重新入党。对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应该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教导，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多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同时，要认真地把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经过考验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增加党的新鲜血液。在这项工作上，要采取积极的、严肃的态度。

毛主席谈到整党工作时指示我们：“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充分相信群众，实行开门整党。要把毛主席的建党思想真正交给党员和群众。党员要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群众要热情帮助党员，通过整党，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要一个支部、一个支部地进行整顿，要做过细的工作，不能粗枝大叶。整团的工作，也要着手进行。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中国共产党，正在进一步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武装起来，团结起来，以更加朝气蓬勃的革命的战斗姿态，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广大革命人民一起，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为彻底埋葬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而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党的“九大”庄严宣布：毛主席培育下的中国共产党，永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革命人民共同战斗，直到“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

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周围，抓革命，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团结起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更大的胜利！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
社论）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新华社驻清华大学联合报道组《工人阶级向上层建筑领域进军的一周年 欢呼我国第一支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一周年》

工人阶级向上层建筑领域进军的光辉节日——“七·二七”一周年来到了。一年前的七月二十七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斗号令建立起来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国第一支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肩负着“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的伟大历史使命，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知识分子成堆的清华大学。这一伟大的革命行动，揭开了产业工人大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登上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政治舞台的新纪元。

我国第一支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的一年，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一年，是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学说指引下团结战斗的一年，是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和改造文化教育阵地的一年，是在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召下，团结、教育、改造广大知识分子，带领他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年！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一九六八年夏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进道路上又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

当时，经过两年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形势一片大好，亿万工农兵群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迈着雄伟的步伐胜利前进。在大好的革命形势下，怎样把上层建筑领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

底，这样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摆在人们的面前，也摆在清华大学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员工面前。

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员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清华大学的代理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使这个学校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随后不久，一些知识分子却由于他们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受了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的影响，陷进了资产阶级派性的泥坑，使得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这个学校和其他一些单位的情况表明，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和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单靠知识分子是不能完成的，必须有工人、解放军战士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进道路上这一重要历史关头，对工人阶级发出了向上层建筑领域进军的伟大战斗号令。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我国第一支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个伟大的新生事物诞生了！

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个伟大事件！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阶段高潮到来的一个标志！

这是毛主席的又一伟大战略部署！

毛主席的伟大战斗号令传来，日夜赶印毛主席著作的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命工人，立即学习讨论，准备行动。他们说：“毛主席的指示说出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心里话，我们一定全面落实，坚决执行！”

北京针织总厂的工人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战斗号令！”

北京特殊钢厂的工人表示：“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北京市第一建筑公司的工人表示：“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工人阶级一条心，心心向着毛主席。首都六十一个工厂、企业的工人代表，迅速地聚集到北京新华印刷厂，连夜研究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战斗号令。

一个不平常的夜晚过去了。毛主席的伟大战斗号令在短短十几个小时内变成了工人阶级惊天动地的伟大的革命行动。七月二十七日上午，首都产业工人和解

解放军战士，高举毛主席的画像，手捧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昂首阔步地向清华大学进军。他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把文化教育阵地占领下来，改造过来！

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清华大学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热烈欢迎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奔走相告，连连高呼：“向工人阶级致敬！向解放军致敬！”“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公然进行破坏活动，妄图把宣传队赶出学校。一些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竭力维护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工人只管工厂就行了，不要管学校的事。”宣传队员们回答说：“我们工人阶级不但要管好工厂，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工人阶级管好学校，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这是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权力！”

“大老粗没有本事领导知识分子。”宣传队员们回答说：“我们工人阶级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就是最大的本事！”

“你们是来挖我们墙脚的。”宣传队员们回答：“我们就是要打破你们独霸的一统天下，就是要挖你们‘独立王国’的墙脚，山头主义的墙脚。我们挖定了，而且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挖！”

斗争是复杂的。进驻清华大学的宣传队面临着“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的复杂情况，一小撮阶级敌人藏在暗处，有些师生暂时还处于受蒙蔽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宣传队遵照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伟大教导，胸怀大局，不畏艰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他们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扑，坚决予以反击；对于广大师生员工，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组成数百支小分队，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帮助受蒙蔽的群众提高觉悟，分清是非。

他们的行动教育了师生员工，挫败了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在最初的斗争中，赢得了胜利，站住了脚跟。

在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胜利前进的时刻，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宣传队赠送了珍贵礼物——芒果；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接见了宣传队的代表；

接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一系列最新指示：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和巨大关怀，极大地鼓舞了宣传队员，深刻地教育了师生员工，沉重地打击了阶级敌人。我国第一支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把清华大学这个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打破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把他们赶走的阴谋破产了！

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的最初几天，由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煽动，一部分师生离开了学校。这件事情使宣传队又一次认识到：工人阶级进入文化教育阵地，有一个同一小撮阶级敌人争夺知识分子的斗争任务。在这场斗争中，工人阶级必须做到象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争取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于我们党的影响之下”，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工人阶级及其伟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为了促使两派群众实现革命大联合，多少个清晨，老工人和师生们一起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老三篇”，耐心地启发他们斗私批修。多少个夜晚，老工人和师生们一起批判大叛徒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引导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宣传队员把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倾注在师生们身上，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使他们一个个醒悟过来。阶级敌人的阴谋破产了，势不两立的“一对崩”变成了互帮互学的“一对红”，长期分裂的两派革命群众终于联合起来了！

遵照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的教导，宣传队坚决团结和信用知识分子的大多数。

遵照毛主席关于“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的教导，宣传队在师生员工中普遍建立了积极分子队伍，作为自己在领导学校斗、批、改群众运动中的依靠力量。

遵照毛主席关于“团结广大人民，团结得越多越好”的教导，宣传队对于犯有各种错误的干部和群众，抓紧进行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工作。

遵照毛主席关于“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的教导，宣传队对属于敌我矛盾但能够低头认罪、决心改悔的人，坚持给予重新做人、立功自赎的机会。

有的教师，一度情绪消沉。针对这种情况，宣传队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为武器，通过革命大批判，揭露敌人的阴谋，帮助他们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正确认识到自己的前途，从此精神振奋，积极投入热火朝天的斗、批、改群众运动。

就这样，我国第一支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胸怀，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尽可能地把消极因素转变成为积极因素，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他们同一小撮阶级敌人争夺知识分子的战果，雄辩地证明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论断：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

教育知识分子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

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一小撮阶级敌人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但他们又从阴沟里放出风来：“你们能占领清华园，但改造不了清华园！”

这种鬼话，反映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复辟的梦想，也从反面使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一步认识到，象清华大学这样的文化教育阵地，十几年来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是那样深，几千年来形成的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

者治于人”之类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是那样重，要用毛泽东思想把它改造过来，教育大多数知识分子走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任务是艰巨的。但是千难万难，有了毛泽东思想就不难。

毛主席指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宣传队决心把清华大学改造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把大多数知识分子教育成工农兵所欢迎的人。

有一个讲师，是大叛徒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个典型的受害者。长期以来，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搞业务金饭碗，搞政治太危险”的所谓座右铭，发誓要吃一辈子“技术饭”。因此当宣传队提出要做他的工作时，许多师生认为他是一个难以教育、改造的人。宣传队坚信毛泽东思想能够改造一切。他们帮助他学习毛主席著作，对他进行阶级教育，引导他自觉地斗私批修，针对他的问题和活思想几十次地找他谈心。这个讲师终于觉悟过来。他说：“过去我以为埋头业务，不问政治，是一条最‘保险’的道路；现在我才看清，原来这恰恰是大叛徒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拖着我走的一条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危险的道路！”从此，他把“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冲杀在斗、批、改第一线上，不久前被群众评为“五好”战士。

这个讲师的变化，是我国第一支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改造文化教育阵地，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许许多多动人事例之一。

过去在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被资产阶级的“私”字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一些知识分子，现在精神振奋，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公为荣，以资本主义的私为耻，努力用“老三篇”指导自己的行动。

过去在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科技书”的一些知识分子，现在积极参加斗、批、改运动，决心要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过去在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从书本到书本、一事无成的一些知识分子，现在到工厂、农村才几个月的时间，就和工人、贫下中农一起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的技术革新和生产任务。

过去在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亲爹娘”的一些知识分子，现在改变了思想感情，争相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去锻炼，被工农兵称为“我们欢迎的人”。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根本，工人阶级的领导是保证！”这是正在江西波阳湖畔创办教育革命试验农场的广大革命教职员的深切体会。

他们中间的不少教师，过去在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下，有肩不能挑，有手不能干。今天在我们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领导下，他们变了，在荒芜的湖地上，脚踏污泥，头顶青天，办起了教育革命的试验农场。在这里，他们既是先生又是学生，既是脑力劳动者又是体力劳动者。他们生平第一次用自己的双手盖起了一排排房屋，开垦了一片片农田。他们在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进一步体会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关键问题就是要改造人，就是要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只有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派性。最近，当大家怀着革命生产双丰收的兴奋心情，开镰收割他们生平第一次亲手种植的早稻时，许多教师感慨地说：“过去，路线错了一切皆错，思想歪了一事无成。今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我们知识分子指明了无限光明的前程，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给我们知识分子开拓了广阔天地！”

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清华大学在前进，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在前进，我国第一支在党中央领导下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全体战士在前进。

一年来，清华大学的阶级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但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这一伟大教导的指引下，工人、解放军战士互相学习，并肩战斗，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在思想革命化的道路上阔步前进。他们没有被敌人吓倒，

没有被困难压垮，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没有被糖衣炮弹击中，而是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了！

宣传队“四好”标兵连一连，是一个先进的战斗集体。一年来他们牢记毛主席的巨大关怀和殷切期望，牢记毛主席关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教导，坚持用毛主席一分为二的观点指导自己队伍内部的革命化建设。他们打了胜仗找差距，赞扬声中更谦虚，全连一直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这个连队的同志在斗争实践中总结了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的五个“必须”：第一个，工人阶级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通过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够领导一切；第二个，由工人变成领导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宣传队员，地位变了，要领导得好，就必须保持工人阶级本色；第三个，在知识分子成堆的环境中进行工作，要保持工人阶级本色，用毛泽东思想把文化教育阵地改造过来，就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第四个，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和新的任务，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就必须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第五个，宣传队要保证自己的领导符合毛泽东思想，保证毛主席的各项指示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各项号令能够坚决贯彻执行，就必须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断用毛泽东思想统帅自己的一切。

宣传队十二连副连长、“五好”标兵宣传员刘清爽，是北京市第一建筑公司的老工人。他面对着知识分子中一些不健康的思想和作风，念念不忘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的伟大教导，坚持用毛泽东思想不断武装自己的头脑。他始终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做到了四个“不变”：工作变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变；职务变了，斗修批修的精神不变；地位变了，联系群众的作风不变；环境变了，艰苦朴素的传统不变。

刘清爽说：“只有自己的工人阶级本色不变，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站稳脚跟不迷航，才能完成毛主席给我们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我国第一支在党中央领导下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从斗争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一年来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

路线的胜利，都应该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决心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永远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譬如讲斗、批、改。”

毛主席的指示鼓舞了宣传队的全体同志，他们决心进一步提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在党的领导下，带领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用自己的双手建立起一个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新型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来。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全军组织性纪律性的指示

毛主席批示：用军委名义发。

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六日送毛泽东等审阅的《关于加强我军组织纪律性的指示》稿指出，目前全军形势大好，但“有少数单位、少数人员，甚至个别中高级干部，仍然严重地存在着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派性和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为此，提出如下要求：一、全军必须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反对“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反对破坏集中统一、破坏组织纪律、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行为。二、要在全军普遍进行组织纪律和法纪教育，提高全体人员对纪律的重要意义的认识，澄清各种错误思想和胡涂观念。三、对个别严重违法乱纪、屡教不改的人，必须给以必要的纪律制裁。四、各级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

要加强领导，带头遵守纪律，维护纪律。认真贯彻严格管理与耐心说服相结合的原则。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五、要把加强组织纪律性问题，作为部队革命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经常抓紧，反复落实。

毛泽东审阅时，将这个指示的署名由“军委办事组”改为“中央军委”，并写了这个批语。八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发出这个指示。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抓紧革命大批判》

“大批判搞得差不多了。”这种看法对吗？不对。它完全不符合思想战线上的实际情况。这种论调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表现，它只能帮助一小撮阶级敌人麻痹革命的人民，阻挠和破坏无产阶级率领广大革命群众去完成斗、批、改的任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当中，贯穿着革命的大批判。我们批判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反革命两面派，批判了反动的“多中心论无中心论”，批判了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右的或极“左”的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促进了各个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进。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在继续，我们进入了在各个单位认真搞好斗、批、改的阶段，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在各个方面更深刻地展开了。当形势正需要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有力地批判各种阻碍斗、批、改的反动思想的时候，怎么能够说“大批判搞得差不多”了呢？事实上，尽管一小撮阶级敌人经常变换口号和形式，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也决不应当停止。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在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过程当中发展起来的。不破不立，这是革命的真理。不用毛泽东思想去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想，不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无产阶

级就不能真正占领思想文化领域的各个阵地；已经占领了，如果不继续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这些阵地就有被资产阶级重新夺过去的危险。毛主席号召我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为了真正实现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必须抓紧大批判的工作。

革命大批判的锋芒应当指向那里？

第一，要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要进一步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政治、经济以及各个文化领域中的流毒，肃清它的影响。三年以来，我们对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广泛的大批判，成绩很大，但是，这个批判还需要继续向纵深发展。只有把革命大批判搞好了，我们的斗、批、改才有明确的政治方向，才能坚定地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以文学艺术而论，各个方面都还有一批毒草，需要选择其典型者进行更深刻的批判。在哲学、历史、教育、新闻、卫生、文艺理论、经济理论、自然科学研究等等方面，过去党内外的修正主义者曾经散布过大量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去批判这些修正主义的谬论，用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为这些领域的斗、批、改扫清道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客观存在的，你不批判它，它就会放毒，就会毒害青少年和人民群众。我们的方针就是把毒草化为肥料，通过革命大批判，使人们在各个领域中都能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深刻地认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危害性，提高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以便在对这些毒草或者对类似的毒草用化了装的另一种形式出现时，广大的革命群众能够及时地识别它们，自觉地批判它们，揭露它们。

这里所说的批判修正主义，包括了对苏修叛徒集团的批判。对于过去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在我国文化界、思想界、科学界所散布的毒素，必须进一步加以肃清。对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最近一个时期所散布的种种疯狂的侵略言论，必须继续加以揭露，使人们进一步认识作为美帝国主义帮凶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法西斯主义面目，进一步看清苏修纸老虎的本质，使人们充分提高革命的警惕性，做好粉碎美帝、苏修侵略的精神准备。

第二，要批判党内、革命队伍内部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加强无产阶级党性，肃清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继续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基础的革命大团结。

必须指出：在少数同志和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倾向，是危害革命事业的，是破坏革命团结的，是腐蚀人们革命意志的，要坚决加以克服。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会引向混淆敌我，认敌为友，认友为敌，使自己鬼迷心窍；无政府主义会引向一切“以我为核心”，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闹独立王国。我们必须反对这些东西。一切共产党员、革命的人们，都要顾大局，应当坚定地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决不许可把宗派主义即资产阶级派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新老干部都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当然，这些错误的倾向是不会自行消失的。只有在我们用毛泽东思想进行坚决的、恰如其分的批判之后，它们才会被克服。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毛主席在这里明确地指出了：要用思想斗争的武器克服错误倾向，达到党内团结和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目的。就是说：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使矛盾得到解决，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里需要指出：决不允许从宗派主义观点歪曲党的政策，阳奉阴违，各取所需。不论从右的方面或者从“左”的方面歪曲党的政策，都是错误的，要坚决批判。不论任何时候，我们都应当全面地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不折不扣地执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每个战斗号令，做到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的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第三，要批判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一切资本主义势力特别是对党内刘少奇为代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以沉重的打击。但是，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总有一些人，即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

以及一小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失败了，不死心，总想钻空子，煽阴风，点阴火，在他们认为比较薄弱的环节，向无产阶级进攻。他们或者破坏社会主义所有制；或者用种种方法来腐蚀我们的新老干部和青少年；或者用煽动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妖风来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破坏斗、批、改；或者进行投机倒把，破坏国家的经济计划；或者利用封建宗教迷信，妄图破坏各民族的团结。所有这些，总的都是搞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在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时候，可以而且应当批判这些资本主义的倾向，使广大革命群众擦亮眼睛，口诛笔伐，使资本主义倾向受到坚决的抵制和揭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以不断地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我们坚决实行这一条。证据确凿的坏人闹翻案怎么办？林副主席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告诉我们：“坏人又嚣张起来怎么办？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阶级敌人如果再兴风作浪，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我们要照此办事，什么地方有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企图翻案，我们就发动广大群众用革命大批判的武器又一次把它斗倒。

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批判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这就是我们当前革命大批判的任务。总的说来，就是毛主席提出的斗私、批修的伟大的任务。为了搞好革命大批判，必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注意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群众要进行深入的细致的思想工作，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要注意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包括各项经济政策。要发动广大群众，开展群众性的大批判，也要组织少数人占有充分的材料，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有分析的、击中要害的、质量比较高的文章，以推动群众性的大批判的发展。只要各级领导抓紧了革命的大批判，就能够不断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发现、锻炼和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并且在革命大批判中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继续推向前进。

(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社论)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

1969. 08. 28; 中发 [69] 55 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边疆各省、市、自治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各族革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
边疆部队全体指战员：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党的“九大”精神的指引下，在我国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鼓舞下，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更加欣欣向
荣，各族革命人民紧密团结，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国内外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
们的失败。美帝、苏修正加紧勾结，阴谋侵犯我们伟大祖国。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越来越疯狂地不断在我边境进行武装挑衅。印度反动派也在伺机妄图扰犯我国边
境。

我们伟大祖国的边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保卫祖国是全国人民的神圣义务。
边疆军民，尤其是担负着直接的责任。为了保卫祖国，保卫边疆，保卫我国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
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党中央命令你们：

一、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
高度地树立敌情观念，克服和平麻痹和轻敌思想，充份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加强军民联防，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二、大敌当前，全体军民要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共同对敌。加强军队内部
的团结，加强军民、军政的团结，加强各族革命人民的团结。巩固各级革命委员
会的领导。坚决反对一切分裂活动，反对一切破坏团结的行为，反对资产阶级派
性。

对挑拨和破坏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阶级敌人，必须坚决打击，为首的要依
法惩办。

三、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挥，严守
纪律，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密切注视敌人动向，作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

军队人员“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不准擅离职守，不准外出串连。经教育不改者，一律严加惩处。

四、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的革命大联合。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要立即解散。任何另立山头，重拉队伍，都是非法的，要强令解散。

五、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七·二三”布告，立即无条件停止派性武斗，解散各种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

凡武斗队强占据点，负隅顽抗者，人民解放军要实行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

六、绝对不准任何人冲击人民解放军，不准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和车辆，不准妨碍军队的战备行动，不准泄露和盗窃军事情报。如有违反，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坚决保护军事要地和战备设施，严守国防机密，支援人民解放军搞好战备。

七、要保护交通运输，保证通讯联络畅通。凡破坏铁路、公路、水路运输，破坏通讯联络，切断电线，都是反革命行为，必须追查惩办。

八、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遵守劳动纪律，坚守生产岗位，努力搞好工、农业生产。

一切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人，必须立即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如有不按期返回的，工人、职员停发工资，农民停记工分。并视情节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对煽动威胁职工或农民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坏人，必须依法惩办。

九、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里通外国、策划外逃、破坏社会治安、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生产、杀人放火放毒、利用宗教迷信制造叛乱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必须由革命群众严加管制，劳动改造。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英明领导和直接指挥下，如果美帝、苏修胆敢侵略我们伟大祖国的边疆，我们就把它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中央相信：具有对敌斗争光荣传统的边疆军民，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把祖国边疆建设成为埋藏帝、修、反的阵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日，中央首长对各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员的讲话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等接见中央办的各省在京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员及贵州、西藏、内蒙古有关代表时的讲话全文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日晚 20 点 50 分至 23 点 55 分 • 人民大会堂

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李先念、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等中央首长，于一九六九年九月二日二十时五十分至二十三时五十五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贵州、西藏汇报团、内蒙古党的核心小组的全体同志。

周恩来同志讲话

同志们：

现在开会，今天是在“九大”以后，遵照毛主席亲自批准发布的几个文件，向大家传达一些意见，到会的各个学习班，有山西的，内蒙的、新疆的、西藏的、四川的、山东的、连云港的，还有山东青岛的。另外还有贵州汇报团、西藏汇报团和内蒙古核心小组，都参加了会议。今天，江青同志、叶群同志有别的工作，没来，要我们向同志们问好。

今天，这个所有学习班大会，是“九大”以后新的气象，“九大”，选出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新的党中央，新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布了一些新的文件。“九大”，有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新的党章，四个公报，以后为着解决地方问题，对于山东问题、武汉问题、内蒙问题、贵州问题批发了指示，中央对山西问题，发布了“七·二三”布告，接着苏修叛徒集团指使武装部队对新疆武装挑衅后，对边疆各省、市、自治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各族革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全体指战员，发布了“八·二八”命令，这两个文件是对全国的。同时又发布了对河北防汛的“七·二八”批准的一

个公告，也是带全国性的。今年雨水多，汛期还没有过，气候变化不正常，全国各地都要加强防汛工作，正如毛主席在一九六五年说的，要“备战、备荒、为人民”，既备战又备荒。经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八月二十一日发出了“关于加强我军组织纪律性的指示”，这都是新的文件。连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的四篇文章：《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七·一”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八·一”社论《人民军队所向无敌》和《抓紧革命大批判》，这些文件、社论，很够我们在学习班学习的了。学好这些文件，对学习班解决问题，有很大的推动力量。比如，最近学习“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新疆两派全体成员联合写公开信，打紧急电报回去，表示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命令和布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西藏、内蒙、连云港也都有表示，这对学习班有很大推动。“七·二三”布告是直接对山西的，山西的负责人回去就地解决问题，现在山西的形势正在接着中央的要求一步一步前进。武器上交了，武装据点拆除了，革委会的权威有的恢复，有的建立起来了。学习班的成员一部分一部分地回去了。这说明“九大”以后，五、六、七、八四个月，有了一个新的变化。正象林副主席讲的，形势更好，更好，更好，将要更好。

今天我们邀集大家来一起直接听，免得传达走样。我们的话如果不符合作风精神的，以文件为准。经常讲话，不可能每句都准，声明一下，这次讲，我们有个分工。我先讲一讲形势和任务。

我们认为“九大”以后，有了一个新形势，我们很多革委会，革命群众组织，各省的领导同志也好，年轻的同志也好，对“九大”以后的新形势，对取得的伟大胜利，有的不是那么重视，好象“九大”前后没有什么区别似的，造成了许多错误的想法和作法。“九大”以后的新形势不是突然来的，而是逐步发展的，总是由量变到质变。我们想一想，三年多文化大革命，我们动员亿万群众起来，向着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组织广大革命群众大串连运动，尔后经过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工作的推动，把走资派打下去了，把他们的权夺过来了。从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风暴起，到去年九月五日，除台湾处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我们可以看出形势的发展变化。当然，每个省运动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不管怎样，我们摧毁了以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黑司令部。建立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

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红司令部，如旭日当空。大家都听毛主席的号召。凡是革命的群众、革命的干部，特别是解放军，都是照林副主席说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是主流。这样才能按毛主席的指示，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好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各地、县、社、大队、石矿、街道、学校、机关都纷纷成立了革委会，建立了新的红色权力机构。这些权力机构接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命令、号召。

这就是说，形势在变，这是主流方面，是三年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和伟大胜利。“九大”以后，进入了更深入的斗、批、改阶段，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的搞落实。所以“九大”以后提出要经验，落实政策。现在搞斗、批、改，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们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新的党中央威信更加提高，使解放军更加得到锻炼。因为许多地方解放军参加了革委会领导，“三支两军”工作都有解放军参加。同时也锻炼了广大的革命群众代表、红卫兵和革命干部。形成了革命的三结合的机构。既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就要接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召，就要实施党的决定，实行党政群一元化的集体领导。党通过它，使党的决定付诸实施。经过“九大”以后，新的党章通过了，更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威信，这和“九大”以前有所不同。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以后，我们做了几个草案，作了一些初步准备工作，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极左和右的错误倾向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把是非搞清楚了。更重要的是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揪出来了，永远开除出党，撤销他一切职务，把他公布于众，公诸世界。这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广大革命群众中更加深入人心，世界革命人民更加仰望，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更加提高了。

形势起了变化，我们怎样对待这个新形势？就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九大”精神，“九大”决定的各项战斗任务去行动，特别重要的是落实各项政策。这些，林副主席在政治报告中都说了。毛主席号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说明“九大”要开成团结胜利的大会，会后在全国争取更大的胜利”，说明“九大”要开成团结胜利的大会，会后在全国争取更大的胜利。象“七大”那样，打倒了国民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要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取得更大的胜利。必须使广大的革命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革命的

知识分子、革命的干部、人民解放军团结起来，争取新的更大胜利。主席又说，我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我们的政策落实到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公社，每一个单位，抓紧革命大批判，更好地落实政策，不破不立嘛，旧的破了，新的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建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阶段，就是要认真落实政策，而不是象一部分同志的错误想法，还是三年来的一些错误做法，建立了革命的政权，随便把他搞掉，这就不对了嘛！

我们党几十年在党内外进行两个阶段、两条道路斗争，就是为了夺取政权。首先是争夺领导权。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又推翻了蒋介石反动政权，解放以后的二十年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直和我们争夺领导权。刘少奇黑司令部干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条红线。再学习过去毛主席的文章，就能清楚地看出两条路线斗争，无论在国际、国内、工业、农业、建党、文教、军事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两条路线斗争。夺权嘛，他们就要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把它搞垮了，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九大”我们选出了新的党中央，我们要拥护新的党中央，拥护党的领导。我们新的权力机构，有缺点，或者代表性不够，自己参加这个机构，自己有资产阶级派性，想把它搞掉，这不符合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我们有新的党中央，有问题就通过领导解决嘛！我们过去说过，新的权力机构，是经过广大群众斗争得来的，如果有缺点只能补台，不能拆台，有的可以改组，但不能推翻，朝三暮四，一派代表一派，好象一九五七年批判的资产阶级反革命集团“章罗联盟”，要“轮流坐庄”，那怎么能行啦。各种观点不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我们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做标准，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会把我们的观点，经过辩论，统一起来，大的的统一了，小的是必要的，可以保留嘛！就会达到毛主席所说的五个统一嘛！你不这样，新的权力机构，稍微不合适就认为是走资派，把它推翻，那就成走马灯似的了，这是发展派性，发展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我们是不允许的。

自从全国山河一片红，二十九个省、市成立了新的权力机构。我们一九六七年在解决安徽问题时，康老、江青同志都讲了，我们夺的是走资派的权，新的权力机构，要想破坏它不行。代表性不够，可以协商补充代表，有错误可以改正嘛！

革命群众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和解放军结合在一起。任何事物一开始不会完备，不会尽善尽美，新生事物在前进中总是有缺点、错误，与走资派性质不同。那是走资派窃取的职权，现在是无产阶级政权。特别是今天在座的，有些地方的问题是自己造成的，如山东的“反复旧”，贵州一派压一派，都是上面自己挑起的，是错误的。就是这样，还是完善它，不能推翻另来，因为性质不同了，我们还是要更好的联合。一派代替一派是资产阶级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无产阶级的政策，就是要把一切力量团结起来，把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红卫兵、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都团结在一起。这个问题在群众组织中，干部中，甚至在军队一部分干部中，认识不到这是社会上一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有的脱离了毛主席的教导和毛主席指引的航向。我们要把他们引回来。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权力机构是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的，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九大”选出的新的党中央，是为我们所拥护的，是经过全党代表选出来的。全党代表都是经过各级革委会讨论过的。“九大”胜利的开了以后，全世界革命人民欢欣鼓舞，反动阶级、反动集团惊慌万状。这个形势我们可以从世界舆论中看到，而我们自己某些地方，某些组织搞宗派主义，陷到资产阶级派性中去了，不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就错了。尤其是有些群众组织头头忘了自己是党员，宁愿做个派性头头。如康老在徐海班一个会上讲，有两个同志都是党员，本来是“一对红”嘛！但他们忘了是党员，忘了“一对红”，吵架，简直是“一对崩”。现在到了清理阶级队伍、整党阶段，为什么把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不要了，就是派性作祟，迷了心窍。觉得一派头头比党员还光荣，这就错了。我们号召广大群众团结起来搞文化大革命，传播毛泽东思想，传播无产阶级号令，全国动员以后，把走资派的权夺过来了。就是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办事，不能再搞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现在要按新党章办事。新党章组织原则有四条。学习班经过这样搞比较好，纪律性好了。过去象旅馆一样，回去打一仗再回来成了风气。当然，我们对学习班抓得不紧，不象“九大”后抓的那么紧。“九大”以后四个月好多了，现在的纪律就是按新党章办事，那就严格了。应该这样，有的说学习班党员少，非党员也是革命战士嘛！将来也会发现个别不符合革命战士，极个别坏头头，但多数是认识问题，思想上的错误改了就好了，

经过学习就推动了。拿党性来衡量，克服资产阶级派性，才能逐步减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增强党性，这样才能实行民主集中制，响应党的号召。过不一些党员受黑《修养》影响，运动初期保了走资派是有的，经过三年文化大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就改了嘛。现在搞整党建设，要把三年的表现和过去的表现结合在一起，历史地全面地来看。

第三点，解放军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三支两军”工作，可以说从开始到现在，他根据“五不”规定办事，绝大多数指战员可以说是艰苦卓绝的，为制止群众武斗，有的被打伤，甚至于死去，毛主席语录还拿在手中，他们就这样子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感动了群众组织上交了武器，停止了武斗。经过三年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使百战百胜的解放军更加坚强了。二十年的和平环境，虽然有抗美援朝、中印边境反击战、金门打炮，都是局部战争，文化大革命是全面政治动员，这样多解放军参加了全国性的运动，总有一些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不能完全避免。当然，首先要求解放军严格要求自己，改正错误，但他也是社会上的一分子，社会思潮不会不影响，也沾染了资产阶级派性，亲一派，疏一派，这是应该教育的，不应该看成就是象过去说的走资派一样，他们受群众的影响，思想情绪有点偏，不是一碗水端平，不按三个原则办事，我们要教育、帮助。中央军委经常以加强组织纪律性，也就是林副主席提出的“三性”：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来教育我们支左部队，教育干部战士，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的红色权力机构是三年建立起来的，靠谁来保护？还是靠人民解放军。没有解放军，我们就不能进行这样在规模的动员，也不可能持续这样长时间，进行文化大革命。尽管进行中有各种思潮，群众组织对立，以致发展到武斗，但是国外敌人不敢轻举妄动，国内敌人只能钻到群众组织里破坏，公开破坏是极少数，就是因为有强大的专政机构，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解放军作强大的后盾。今天我们在座的群众组织中的同志、革命干部，你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我们对人民解放军应该教育大家，钦佩他，支持他。现在红色政权建立了，更不应该筑工事，搞武斗，打解放军，对解放军抢枪，殴打战士，这不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小将分不清是非的时候了，那时走资派掌权，打起来就分不清；现在很清楚了，现在不允许，再这样做是反革命行为，要由解放军做政治动员，坚持不改的总是少数。山西、新疆都是证明，广大群众是不高兴这样搞的，搞武斗被解放军

包围后，结果只有坏头头负隅顽抗，广大人民群众是受蒙蔽的，经过宣传“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都纷纷离开武斗地点，上交了武器。

第四，现在群众觉悟程度大大提高了。去年就证明了，清华大学武斗的时候，许多学生和教职员都成了逍遥派，不参加，广大城市居民、革命群众最厌恶武斗，舆论不断，广大群众是不赞成武斗的，真正搞武斗的就那几百人，大学的负责人没有办法说服了，北京市革委也劝不下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派革命工人、解放军组成的工宣队、军宣队进入清华大学，很快就解决了问题，武斗停了下来，付出了代价，死了五人，伤了几百人。这些头头派性十足，分不清是非，对他们进行教育。清华在北京的大学中，改变是快的，是好的，它能够把武斗停下来，把派性逐步克服，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学生按分配地点去劳动，留下来的进行大批判，斗、批、改，落实政策，进行教学改革。毛主席要求工厂要搞大联合、三结合、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同样在大学里也要这样办，现在许多教职员办起“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可见广大群众水平大大提高了。问题是我们怎样领他。不管那个地方有问题，只要一揭发，群众就不会跟着坏头头走。某某、某某地区一小撮坏头头煽动一部分人夺取武器向某某跑，一宣传坏头头孤立了，坏头头被人民解放军抓住了××个人，×个跑散了，以后又抓住了。斗批改工作要做细，粗的话做不好，不要怕困难，落实政策要一个一个单位地来解决。

如山东问题，青岛单独办学习班也好，把青岛问题解决好。徐海班回去后形势发展很好，连云港还有点尾子，单独解决一下。山西机关和各地区分开搞，一个一个搞。内蒙古和东北也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搞。我们相信群众的觉悟，绝不是白过了三年，是不平凡的三年，三年胜过了三十年。问题是我们工作要做细，各级领导要抓住时机，做认真细致的工作，不要失掉这一时机。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把工作做好。现在对权力机构、党的领导、人民解放军要有新的估计，要把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同时，我们处在新形势面前，毛主席指示“要准备打仗”，“备战、备荒、为人民”。事实说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它总要以战争手段解决危机，苏联修正主义投降了帝国主义，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发动对我国的武装挑衅，来转移本国人民的不满和东欧的离心倾向，转移目标，敌视中国，和美帝勾结，讨价还

价，出卖中东，出卖越南，缓和东欧的压力，以反华的军事挑衅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做两种估计，军事挑衅不等于他们敢大打和打核战争，玩火者有其自己的规律。我们发展核武器是为保卫世界和平的，是为了消灭核武器，是为了打破两个大国的核垄断。我们有了核武器，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苏修拿这个威胁不了我们。但是为世界人民反对的孤立起来的反动集团和阶级，它不甘心失败。是疯子，就要冒险。所以必须准备它来冒险，我们准备好了，它来冒险就要它碰得头破血流。如果它们大规模来侵犯，就将它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我们要有备无患，有决心，有行动，苏修就要考虑，印度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要考虑。所以我们“九大”作了新的动员，国内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被摧垮了，他们在群众中亮了相，见不得人，它们是不会死心的。这是极少数，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公社，每一个机关，每一个厂矿的少数坏人孤立起来了，这是最大的成功。我们团结起来，更有力量对付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所以对毛主席在“九大”的号召，“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不能是一句口号，而要有实际行动。

“八·二八”命令，要求边疆一切为了战争，“八·二八”命令有很多特点，是为了巩固边疆的，象新疆的形势，西藏的形势，内蒙的形势要改变，我们已经在改变中，在东北好一些。我们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沿海有山东、辽宁、河北、天津、连云港、江苏、浙江、广东、广西、云南也是边疆。“八·二八”命令不仅是对边疆的，对全国都适用，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座的学习班同志很快地学习好，把政策弄清楚，把问题解决，区别两类矛盾，人民矛盾多作自我批评，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极少数敌人可以清查出来，人家眼睛是亮的，是能看出来的。不能混战一场，不区别两类矛盾是错误的，把犯错误的同志当作敌人看那是错误。“八·二八”命令，所有学习班都要好好学习。你们来的是少数，家里还有很多群众，要回去宣传，有的打电报，在中央说的很好，家里还在闹资产阶级派上，说你们修了、保了、变了。你们要理直气壮的到群众中去，积极进行宣读，那些人是会改变的。还有解放军、革命干部过去的对立情绪应该消除。毛主席在“九大”前说：“地方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工作”。如何工作要按照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办事。从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开始，要重新认识，再教育，把错误的东西去掉，保持解放军的本色，以毛泽东

思想为武器，把革命的精神、战斗的精神、朝气蓬勃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恢复起来，这样才能一声令下，立即行动，奔赴前线，问题在于学好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和“九大”精神。在这里还有一段时间，但时间不能太长，要很快回去，拖拖拉拉象徐海班搞了一年，现在不能给你们这个时间，你们不能松松垮垮，要一天的解决问题。有些革命干部在这里学习，大概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些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年的经验教训已经积累的够多了，只要错误承认的好，群众是会谅解的。不管你犯了什么错误，例如当时的“百万雄师”。毛主席对武汉的批示中说：就连你们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只要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毛主席说：人家诚心诚意要革命，不让人家革命不行。这样才能团结更多的人。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以后，主席叫一些犯错误的老同志到工厂蹲点，结果受到很大推动，让群众去教育，比在屋子里去斗好得多。文化大革命的反修斗争非搞不可。

“九大”以后，我们把各省靠边站的干部，没有最后定性的，也让他到工厂学习，也有好处。许多干部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是受了上级的影响，譬如在新疆，王恩茂要负责嘛！下面认为他对，跟着犯了错误，就允许改正，经过批判，到群众中去锻炼，给他信任，在对敌斗争中，到群众中去考验嘛！这个地方工作不行，换一个地方工作。要给出路。给出路的政策，去年《红旗》杂志发表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中传达了主席这个指示，你们都学罗！举个例子，新疆，还有西藏，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原来就在一起，分工不同，犯了错误，要给个改正的机会，首先他自己端正了立场，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组织上才有可能给出路。内蒙、贵州也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拿中央这几个布告、命令来动员，这些文件都是主席亲自批准的，你们要很好学习，不要把机会错过。现在离国庆二十周年还有二十多天，绝大多数都要回去过国庆，不要赖在北京过国庆节，在备战岗位上心安理得。当然我们给你们耽误时间太多了。我们要理解备战的任务，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在这里群众组织负责同志很多，原来比较好，联合起来夺权，以后受社会思潮的影响，分两派，生产停顿，内蒙有这个情况，现在应该急起直追，不能再等待，今年还有四个月，要跟上，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一切为了战备，就要把生产搞好，不能一般的

好，要搞的更好。上海的同志昨天通了一个电话，上海生产很好，老大难单位少，大多数单位认为“七·二三”布告是对老大难单位的，“八·二八”命令一到，有了新的认识，他们认为上海也不例外，不仅把老大难单位搞好，而且要把工作好、生产好的单位搞得更好，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上海来了一个全面动员，在这方面比过去更有力量了。上海生产好，可为全国服务。要把中央的布告、命令当武器，任务重大，不能再等了。

说得太长了，请别的同志讲。

陈伯达同志讲话

总理的讲话，我完全赞成、拥护。我没有说什么说的，简单表个态。我们今天的大会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指引下，召开的伟大团结的大会，革命大联合的大会，是各民族革命大团结的大会，是按照“九大”精神，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大会，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的大会，是完全的、无保留的、不折不扣的执行毛主席批准的“八·二八”命令的一次动员大会，是保卫祖国边疆、彻底粉碎美帝、苏修对我国武装挑衅的一个动员大会，是对各学习班促进更大的一个动员大会。中央的命令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表达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里我想提醒同志们特别注意，命令中所以的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毛主席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毛主席说：“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毛主席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主席说：“如果他们胆敢侵略我们伟大祖国的边疆，我们就把他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毛主席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希望同志们坚决执行毛主席这些伟大指示。不管有什么困难，不论有什么分歧意见，都应当迅速克服。不论有什么国内外敌人，不论苏修、美帝、各国反动派胆敢侵略我国，我们一定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它。

希望同志们对中央的命令，要一个字一个字学习，我相信对毛主席的思想，在你们学习领会以后，一定会变成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继续搞好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中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取得保卫祖国、保卫边疆的新胜利。下面我喊几个口号：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胜利前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各民族人民革命大团结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康生同志讲话

对不住，我有点感冒，不能多讲了。
开会前看了各个学习班的简报，看了新疆、山东、成都、山西、青岛的。同志们一致拥护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央“八·二八”命令，你们讨论得很好。

你们每个同志是不是都读了这个命令？（众答：读了）

看样子你们每人都有一份，是不是啊？（众答：是）

这说明学习班比过去一个时期有了很大进步。毛主席的思想，在学习班中有提高。相信通过“八·二八”命令的深刻学习，一定会促进你们的工作。同时我又看了各地区的反映，上海、山东、内蒙这些地方，大家认为毛主席批示的这个命令，是有很大战略意义的，是保卫祖国，保卫边疆，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命令，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命令，是粉碎美帝、苏修和印度反动派侵略我们祖国的命令。一致认为，这个命令，是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的命令。同时，学习班的同志讲，这个命令对同志们是一个很大的警惕，对派性是个警告，促进大家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在毛主席的号召、命令下，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刚才，恩来、伯达同志对形势、任务、保卫祖国讲了很好的话，我完全同意。今天开会的绝大多数是学习班的同志，我想在学习班方面讲一讲。有几个省来汇报工作的，也可作参考。

恩来同志讲，认识形势，分析形势，要用新的观点去认识、分析。就是说要用“九大”精神，用毛主席号召、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新党章的精神来统一同志们的.思想、工作、学习，用新的观点看问题，这一点很重要。有些人环境变了，接受新的任务，思想还在前一个阶段，跟不上形势，跟不上“九大”精神。这一点学习班的同志、领导同志要注意。我举个例子，我们跟学习班讲，这个学习班是党校性质的学习班，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办的学习班。在“九

大”以前，我们虽然有时候讲过，但没有普遍在学习班讲，在“九大”以后，向各个学习班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要求各学习班组织临时党委、支部。这是什么意思？有的说党员多还可以，有的人认为党员少，有的认为不是党员，对他们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不对的。大家可以看党章第三章，不管你是国家权力机构，解放军，共青团、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以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毛主席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能不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赞成不赞成社会主义，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如果你是革命的，你就要服从党的领导。如果你不服从党的领导、不服从毛主席的领导，你就不是革命的，不是革命的组织，是假革命，口头上革命，实际上阻碍革命，是反革命。不管那个班，即使是党员少，也要接受党的领导，仍是党性质的学习班，希望同志们深刻了解这一点。恩来同志讲，形势变了思想要提高。

你们来京学习，不是来打官司、争长短的。如果按派性打官司，那你就都要输。也不能争长短，长短是有尺寸的，这个尺寸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有了毛泽东思想，你们就长一些。离开毛泽东思想，离开“九大”精神，离开“八·二八”命令，离开《红旗》杂志的文章和两报一刊的社论，不管战争到什么程度，就越争越短。新来的同志，象青岛班，到北京来，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是学习“九大”精神的，不是来打官司的，争长短的，要很好注意。如果学习班闹派性，不团结，那就不是党校性质学习班了，而是派性的学习班了。通过学习“七·二三”布告之后，学习党章之后，学习“八·二八”命令之后，逐渐了解中央的精神，学习班有的同志讲，命令是彻底消灭派性、增强党性的命令，我看这个认识是对的。

学习“八·二八”命令，要同革命大批判联系起来，要同清理阶级队伍联系起来，同整党建党联系起来，同改造世界观联系起来。“命令”九条，能不能贯彻，不仅表现在简报上，会议讲话上，要表现在实践中。消灭派性，增强党性，然后才能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要高度树立敌情观念，不仅树立，而且要高度。

由于我们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九大”的胜利召开，使敌人感到他们的末日来临，但他们不甘心灭亡的，必然千方百计破坏文化大革命，妄图扰乱我国边

疆。命令虽然是对边疆讲的，但有普遍意义。命令不仅在边疆对付美帝、苏修、反动派，同样也是对付国内阶级敌人的。

同志们经常讲刘少奇是什么人物？刘少奇有三个头衔，实际上不只三个。一个叫叛徒，一个叫内奸，一个叫工贼。什么叫叛徒？就是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共产党，在国内投降了国民党，蒋匪帮，投降阎锡山和其他反动派。国外投降美帝、苏修和其它的反动派，这就叫叛徒，叛徒就是敌人。他就是国外敌人的第五纵队。我们要反对刘少奇，批判刘少奇。我们没有树立高度的敌情观念，怎么能批判刘少奇呢？刘少奇是叛徒，是投降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解决问题首先要看到敌人。譬如内蒙学习班总是不讲面临着蒙修、苏修。新疆、西藏学习班，总是一开口就是这一派怎样，那一派怎样，对美帝、苏修、印度反动派，看不到这是个严重问题。现在应该有所进步了。我再三告诉同志们，在这样大敌面前，不谈敌人，不谈美帝、苏修，印度反动派，不谈国内敌人，这怎么算命令的，这怎么算共产党员！这怎么能批判刘少奇！要认真学习“命令”这一条，深刻检查自己的敌情观念如何？树立了没有？是高度的还是低度的。

第二，刘少奇是内奸。什么叫内奸？内奸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表面上装着象个共产党，混入共产党内部，而且长期隐藏在革命阵营里面，在内部进行破坏，进行反革命活动。其特点就是两面派手法，说的是一套，实际做的是一套。这是一切特务、内奸的共同特点、必须的一点不这样它就不能在内部存在。我们反对奸细，反对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党内的奸细。因此要认清他们的两面手法，是反革命手法，是资产阶级政客手法。不是绝大多数，有一部分群众头头很糊涂。甚至一部分干部，一小部分军队的同志很糊涂。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社会上坏思潮的影响，反映到党内来，反映来革命群众组织中来，个别的也反映到解放军中来。因此少数人用两面手法对待党，对待文化大革命，有没有？你们自己研究研究。有的人还认为，两面手法自以为蛮高明、蛮能干的。如果一个人自己实行两面手法，怎么去反对刘少奇这个内奸呢？他这种资产阶级两面手法与刘少奇一样。“九大”后，我们看到个别领导干部对中央讲假话。个别军队的师长、政委向中央说说话。明明是他写的信，他却讲信不是他写的，是别人写的。对中央讲假话，欺骗中央，这是什么共产党员。讲假话的人是要自己毁灭自己的！你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起码不是把自己摆在共产党的地位，起码是摆在不是共产党员

的地位，起码是摆在与中央对立的地方。有人耽心怕在这里讲了，回去人家不信任怎么办？如果你违反毛泽东思想，违犯了毛主席的政策，讲假话，睁着眼说瞎话，怎么叫毛主席相信你，怎么叫中央相信你呢？是我最近一个时期看到的。

“八·二八”命令第二条讲，要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一个人可能有错误，但也总不会对自己说假话，要团结得象一个人，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就要彻底肃清资产阶级两面派手法。彻底地按党章、按毛主席教导、林副主席指示办事。应该是对党无限忠心，忠心耿耿。如果向党要两面手法，怎么去反对敌人，反对刘少奇啊！自己那就口软手软喽！“命令”的第二条就办不到了。有的同志犯了错误不敢承认。有的人长期的、系统的、一贯的说假话，搞两面派，弄到和我们对立的地位。怎么办呢？要求很简单，不高，就是讲实话，实事求是，错了就改，这才算一个起码的共产党员，才是起码的党性，才能贯彻“八·二八”命令。

刘少奇还有一顶帽子叫工贼，什么叫工贼？就是钻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假充工人，或原来是工人变质了，打着工人的旗号，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破坏革命的大团结。刘少奇不是讲他是工连的老手吗？实际上二七年他勾结汪精卫，缴了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械，所以说叫做一个大工贼。我们学习班中工人同志不少，还有工人新选上的中央委员，有的是工代会，或者是工人团体的头头，你们想想怎么去反对刘少奇这个工贼？在共产党的领导，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要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如果工人团体离开共产党就会变成工联主义，就会变成反动的团体。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就是接受毛泽东思想。少数个别人利用工人团体进行他的派性活动，为个人谋利益。在坐的韩金海就是这样。你是“山工总”的头头，你看你搞成什么样子了！贵州工代会“七·二九”有个电报，说知识分子钻进工代会，当了核心组的第一副组长。不是工人阶级教育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篡夺工人团体的领导权，他怎么去执行“八·二八”命令啊！

恩来同志讲了，我们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培育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军队。也有些缺点错误，这么大的运动嘛。

“八·二八”命令中讲，“九大”后还有人冲击解放军，围攻殴打解放军，抢解放军的武器，妨碍解放军搞战备，甚至盗窃军事机密，这个问题要引起学习的注意。少数人对解放军搞反革命情报，象王、关、戚那样，有人跟反革命学的，搞单线的秘密情报工作，泄露军事机密，盗窃军事情报，有的秘密在军队内部搞情

报组织，这就是反革命，是要杀头的。这样干就以反革命论处。因为我们解放军要打仗，军事秘密不允许泄露，更不能在军队搞情报。当然，起先可能是为派性利益服务，你用反革命手法对副军队，就必然走向反革命道路了。大家要对照命令第六条，好好检查一下。

文化大革命三年了，情况变了，开始有人犯错误，但以后在毛主席教导下觉悟过来了，成了革命的了。但也有个别少数人，开始是革命的，但后来也成了革命，甚至反革命的了。为什么对我们军队那样仇恨，不管你主观上怎么想，实际上起了美帝、苏修里应外合的作用。这个命令是消灭派性、增强党性的命令，离开党性，不把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领导一切，那就是只能口头上讲讲。看到简报上有的人说，命令给了我们武器，对我们是敲起了警钟，是挽救了我们。这个认识是好的，这样讲我是很高兴的。好好学习毛主席教导，好好检查一下自己，如果还没联合的赶快联合起来。要努力彻底消灭派性，增强党性，大敌当前，时间不多了。如果不按这个办事，那是什么革命派。不要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连爱国主义也没有了。今天到会的多少人啊？八千子弟嘛！在毛泽东思想武装下，任何敌人的进攻我们将把他打得丢盔卸甲，屁滚尿流。

黄永胜同志讲话

刚才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向我们到会的同志，作了很重要的讲话，我完全拥护。我今天没有什么话说。我是个当兵的，在坐的军队同志不少，三句话不离本行，讲一讲打仗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准备打仗”。这是向我们军队、全国人民所发出的一个战斗号召。

要准备打仗，我看首先一条，就是要团结。也就是说，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不仅仅我们军队本身要团结，而且全国各族人民要团结。“八·二八”命令第二条说，要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就是力量，不团结就分散了我们的力量，不团结就可能被敌人利用了，不团结会被敌人各个击破。现在我们全国人民经过三年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领导之下，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可以说我们的军队是团结的，全国人民也是团结的，而且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团结。但我们军队也有那么少数单位，处于不团结的状态，少数省、区处于不团结状态。我们军队今天在坐的，有些单位存在着互相之间、上下之间不团结的现象，而且同这个地区

的人民也团结不好。这个团结问题是个重大问题。我们毛主席亲自批准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根据“九大”团结胜利的精神提出来的，是按照主席的思想提出来的，都是为了促进军队和人民之间团结的。毛主席很形象地打了一个比喻：打人是伸着个巴掌，还是捏成一个拳头，五个指头不团结就没有力量，用拳头厉害，就有力量。不团结搞分裂，不管主观动机怎样，客观上是帮助了敌人，帮助了苏修，帮助了美帝，帮助了各国反动派，也是帮助了我们内部的敌人。所以团结问题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在“九大”，毛主席就提出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千条理万条理，不团结就没有道理。团结是最大的原则，最大的道理。破坏团结，制造分裂，就是客观上帮助了敌人。军队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全国人民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过去我们妨碍团结的东西，都应该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来促进团结。有些地方不团结，不客气的说，云南的部队是不团结的。部队不多，搞得很乱。毛主席说：“地方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工作”。我们军队不团结，影响到地方的团结。我们军队同志应该觉悟，应该按照“八·二八”命令，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九大”以后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来克服不团结、妨碍团结的消极因素，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要是没有团结，要准备打仗，一切都是空谈。部队不团结的情况，到了觉悟的时候了，不应继续分裂对立下去，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对毛主席的，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因此，是决不能允许的。我希望军队同志充分认识团结的重要，在团结问题上，军队要带头，做模范。要自己团结好，和人民团结好，和革委会团结好。

第二点，就是做好思想上的准备。我们要准备苏修、美帝、印度反动派和各国反动派，采取大规模的侵略行动。他们不仅仅在边疆挑衅，要准备他们大规模的进攻。我们在思想上不能有任何的麻痹，认为苏修不会来，认为美帝不会来，认为各国反动派不会来，可以高枕无忧睡大觉。自己麻痹自己，那是最危险的。打仗的准备工作，最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准备工作。思想上的准备不仅是要准备敌人来，而且要敢打。苏修、美帝、各国反动派我们都敢打，敢于胜利，而且一定能够胜利。我们对苏修要仇视，揭露帝俄时代和新沙皇的侵略罪行，进行仇修教育，使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要进行蔑修教育。要使全国人民和军队认识清楚，美

帝、苏修都是纸老虎，要蔑视它。还要进行鄙修的教育，要鄙视它。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立足点要放在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来打我们。

第三，要做好组织上的准备。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加强我军的组织纪律性。我们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大风大浪中经受了锻炼，毛泽东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更加热爱，对美帝、苏修，对刘少奇一小撮走资派更加仇恨。但我们军队也有一股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就是不服从命令，不听从指挥，闹宗派主义，腐蚀我军战斗力。为此，军委发了一个加强我军组织纪律性的指示，希望军队的同志好好检查一下。指示中指出了八条不守纪律的行为，在坐的不一定八条都有，这里面你们总有一些，一条没有我不相信，有的地方八条都有，应很好地检查，很好地纠正。当然，我们主要是加强正面教育。特别是在坐的同志，你们在毛主席身边，在林副主席身边，在党中央身边，在北京学习，你们应该成为团结的模范，执行“八·二八”命令的模范，宣传“八·二八”命令的模范，捍卫“八·二八”命令的模范。执行不执行中央批准的一系列措施，是对待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忠不忠的问题，也是我们革命不革命的最高标准。所以，我们应该用“八·二八”命令检查，那些地方违犯了，那些地方破坏了纪律。对屡教不改的要坚决采取组织纪律措施。空军有五个人不执行命令，在外不归队，发了指示，他说没有见过文件，提出了四条，说我是革命群众组织，对我无效。我们开除了他们的军籍、党籍、团籍、公职。希望各单位检查一下，对长期流窜地方不归队的，屡教不改的，要坚决执行组织措施，是军人的要开除党籍，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此风不能长。不能让少数人破坏我们军队的声誉，不能叫他们给我们脸上抹灰，不能叫他们破坏我们军队的战斗力，破坏我们军队的光荣称号。我们军队是毛主席亲自缔造、亲自领导，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在井冈山就有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变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井冈山毛主席就很强调这个问题。

第四，要做好物质上的准备。要抓准备、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现在有些地方生产不大好，有些工人不上班不生产。四川就是这样，那么多军事工厂不搞生产，而且还拿钱、拿工资，因此，我们要很好地执行“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到期不归要停发工资，不上班不发工资，直至开除公职。要准备打仗，就必须搞好生产。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但有少数工厂的工人忘

掉了自己是工人阶级。自己在那个地方吵架，不生产，搞经济主义，这不是玷污了我们工人阶级的称号吗！如果我们全国人民、广大工人、贫下中农都能按毛主席的思想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又经过三年文化大革命，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再加上物质上的准备，美帝、苏修胆敢进攻，我们在伟大统帅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自领导、指挥下，就一定能取得彻底的胜利，就一定能把美帝、苏修坚决、彻底、干净、全面地消灭之。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我看军队有些同志和有些群众组织的头头，三年文化大革命，把老本吃的差不多了，有的吃过头了，欠债了。希望部队的同志，特别是在坐的同志们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不仅在文化大革命中新功，而且在保卫我们祖国中立新功。

姚文元同志讲话

刚才周总理、伯达同志、康老、永胜同志做了很好的讲话，从各个方面谈了我们执行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八·二八”命令所应采取的措施和注意的问题，我完全同意。

“八·二八”命令才发表五天，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党中央的号召、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迅速传播到全国，动员了我们全党、全军、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去争取更大的胜利。它成为我们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强大动力，成为我们继续搞好斗批改的强大动力，大大促进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这个文件以及“九大”的文件一样，都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是我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文件。这不仅是对副美帝、苏修，也是当前继续革命，进一步搞好斗批改的强大动力。每个文件我们就应看到这样两个方面，在国际方面，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帝、修反；国内是扫除错误的东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一切破坏活动。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党校性质的，是在毛主席直接号召下办起来的，林副主席是学习班主任，是这样一个庄严的学习班。这样的学习班，不但应该坚决执行“八·二八”命令，而且应该成为执行毛主席亲自指示的“八·二八”命令的模范，这样才能与党校性质相适应。为了坚决执行毛主席批准的“八·二八”命令，我们必须正确对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首先是对敌人，命令第一条号召我们，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

备打仗，高度地树立敌情观念，克服和平麻痹和轻敌思想，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锋芒指向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指向国内一小撮走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我们必须树立敌情观念。在战略上要藐视别人，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是纸老虎，苏修有几个乌龟壳没有什么了不起，它在国内是孤立的，在国际上也是孤立的，内外矛盾重重，如果他们胆敢侵略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一定用人民战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他们消灭掉。我们在进行战备教育的时候，要仇视它，藐视它、鄙视它。我们要把苏修叛徒集团同苏联广大人民区别开来，苏联人民、全世界人民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苏修是纸老虎，是一定要灭亡的，它胆敢发动侵略战争，必将加速它的灭亡。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敌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物质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克服轻敌思想，和平麻痹是不行的。准备好了它不来怎么办？有备无患。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提高敌情观念，就可以粉碎美帝、苏修的侵略。国内也有一小撮坏人，命令中第二条、五条、六条、七条、九条都讲到了。二条是讲的破坏军民团结五条是讲的搞武斗，六条是讲抢解放军的武器等，九条是专门讲的镇压反革命分子。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失败的敌人总是要挣扎，他们听说我们准备打仗，有的害怕，有的幸灾乐祸，敌人和一切反动派都是蠢包，他们总是搞一些这样、那样的破坏活动。对这些敌人我们应该这样设想，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它们是要派各式各样特务分子来破坏，二十年从来没有断过。所以，第九条讲到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是根据当前形势发出的。

人民内部矛盾，“八·二八”命令中也讲到了，第四条是讲的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要立即解放；第二条讲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自我批评，在毛泽东思想思想基础上，紧密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最近，两报一刊批判了许多错误倾向，在当前阶级斗争的形势下，不坚决克服这些错误倾向，不但妨碍团结，而且会为国内外敌人所利用，要提高警惕，不要认为反正是人民内部矛盾，美帝、苏修瞪着眼睛看着你，是跟毛主席革命到底，还是向那方面滑下去。凡有这种错误倾向的人，要自觉斗私批修。同时，也要做好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在贯彻“八·二八”命令中，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

最后说几句鼓励的话：在纪念伟大祖国成立二十周年的時候，中央邀请各地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来京观礼。是有条件的，来的单位必须是大联合、三结合好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好的。来的个人也有条件，无产阶级党性强的，消灭了资产阶级派性的。如果没有，宁缺勿滥。我们希望同志们不失时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借“八·二八”命令的东风，踏踏实实地所问题解决好，不要搞两面派。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中，做出成績，选出自己的代表参加国庆二十周年。希望你们发扬积极因素，尽力克服消极因素，争取派出代表，参加伟大祖国二十周年观礼。祝同志们努力！

大会结束时，周总理讲：“‘八·二八’命令不要张贴，不要登报，不要广播，是作为内部战备动员的。“九大”以后，我们要更强调组织纪律性。各学习班领导小组要很好掌握，对“八·二八”命令和军委加强组织纪律性的指示都要登记编号，不要丢失。这件事本身就是考验我们的党性和组织纪律性。

接着，康生同志讲：也不要抄一份寄回去！

（注：周总理讲话中，记录时未能分出第一、第二点）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东班、青岛班整理

来源：有关一九六九年清算批判王效禹运动的二十五件史料[根据未注明原编者及印制时间的手刻油印版历史文献重新刊印]。

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林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在全国人民欢庆这个光辉节日的时候，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全国各族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红卫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致敬！向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向一切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们和海外侨胞致敬！向来自世界各国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你们问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一诞生，就如太阳

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我国的历史，从此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二十年来，全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把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改造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二十年的斗争中，我们巩固了无产阶级政权，胜利地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颠覆阴谋和破坏活动，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在进行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我们还进行了政治战线、思想战线和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空前大普及，为亿万人民所掌握，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我国各族人民空前团结。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象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成为反帝反修的一个强大政治力量。

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证明，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极其重要的新贡献，开拓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光辉道路。全国人民从长期的斗争中得出一个真理：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胜利。

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主席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战斗意志。

现在，我们要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全面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落实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进一步搞好思想革命化。要抓紧革命大批判，认真搞好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抓革命，

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掀起革命和生产的新高潮。

同志们！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继续发扬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光荣革命传统，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把我们的国防力量建设得更加强大。

二十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空前高涨，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空前孤立。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他们互相勾结，互相争夺，实行扩军备战，并且妄图策划对我国的侵略战争，公然对我国进行核讹诈。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我国历来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我们的立场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全国人民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警告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不可战胜的。如果你们硬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我们就坚决奉陪到底！我国辽阔的土地，到处都将是你们的坟墓！

我们永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支持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坚决支持英雄的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坚决支持老挝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泰国反动派入侵老挝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五大洲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原载《人民日报》1969 年 10 月 2 日

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奋勇前进，已经二十年了。今天，在党的“九大”以后出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中，全国各族人民满怀革命的胜利豪情，热烈欢庆这个伟大的光辉节日，共同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毛主席就指出：“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主席这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预见。

毛主席曾经强调地说过：“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二十年，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斗争的二十年。这二十年的斗争过程中，在以毛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紧紧依靠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人民解放军，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派的侵略、颠覆和阴谋破坏，粉碎了蒋匪帮的骚扰活动，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使我们祖国的面貌发生了空前巨大的变化。

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运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一步一步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开展了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断地巩固和扩大了社会主义阵地。

在毛主席教导下，我们发扬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传统，找到了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农业、国防建设和科学文化的道路。社会主义生产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劳动人民生活的提高。我们的祖国，经

过几亿劳动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已经建设成为具有初步繁荣昌盛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曾经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统治的黑暗、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有亿万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阴谋，清除了混入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批判了修正主义，使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深入人心，有力地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今天，社会主义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可靠的朋友，成为当代反帝、反修的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我们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感到无比的自豪！我们热烈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二十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就是领导权的问题，就是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手里的问题。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保证。毛主席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指出：“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这是毛主席深刻地总结了二十年的历史经验而提出的伟大号召。我们的任务是要继续落实毛主席这个号召，从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为了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认真注意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三结合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各级革命委员会和一切干部都要密切联系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革命创造精神。一切革命干部要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抓好典型，克服官僚主义和其他脱离群众的现象。要对群众进行深入的、经常的思想政治工作，对那些错误倾向，进行说理的、恰如其分的批评，加以纠正，加强团结。至于对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和混在群众中的一小撮坏人，则必须充分提高警惕。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全面地执行党的政策，过细地做工作，就一定能在党的领导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绝大多数人团结起来，大大加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对一小撮阶级敌人的专政，大大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为了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在斗、批、改的工作中，必须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抓紧革命大批判，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各级领导同志，要认真学习和执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总结和牢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关于处理两类矛盾的丰富经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应当看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于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期。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时时刻刻都在利用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变换各种手法，继续散布毒素，腐蚀干部，同无产阶级争夺群众。一小撮阶级敌人在政治上遭到失败之后，还会从经济上挖社会主义墙脚。这个斗争是长期的。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群众，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认真抓好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和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智慧，推动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更加迅猛地向前发展。

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实现的。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群众都要紧紧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我们一定要认真抓好整党建党工作。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党性的立场上，站在党的政策的立场上，彻底抛弃那些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相违背的错误思想和作风，否则就不能符合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一切革命群众，都要增强党的观念，接受党的领导，爱护和支持革命委员会，拥护人民解放军，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毛主席在论述无产阶级专政时指出：“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

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做过无数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迷梦。他们武装侵略同“和平演变”的反革命的两手，统统被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拳所粉碎了。当前，走投无路的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国内外的困境，正在加紧互相勾结，妄图策划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甚至放出种种空气，对我国进行核讹诈。老实告诉你们：你们的那一套，我们早已看穿了，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妄想煽动反革命残余势力复辟资本主义，妄想

刘少奇一伙反革命分子再上台，这是白日做梦，头脑发昏。你们妄想在我国边疆地区组织叛乱，只不过使我国各族革命人民可以进一步擦亮眼睛，肃清特务，彻底消灭叛匪。你们妄图发动武装侵略，就是自投于伟大的、正义的、反侵略的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之中。你们搞的核讹诈，丝毫吓不倒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民，只不过吓坏了你们自己那已经相当衰弱的神经，激起你们国内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起来声讨和反对你们，把你们烧焚在革命人民的怒火之中。你们的一切倒行逆施，即便全部使出来，也只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大大加速自己的灭亡，决无第二条出路。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所向无敌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我们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我们历来主张各国的事务由各国人民自己去解决。我们主张用谈判的方法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冲突。但如果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硬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我们一定奉陪到底，把一切来犯的侵略者，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时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坚守岗位，做好准备，坚决保卫伟大祖国的神圣边疆，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我们一定要解放祖国的领土台湾！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一日，社论）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中央首长对各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员的讲话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二十三时二十分至十八日凌晨一时十分，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谢富治、吴法宪、李作鹏、李先念、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中央首长，在首都体育馆接见了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思想学习班山东班、青岛班、内蒙班、成都班、贵州班、西藏班、山西机关班的全体学员。在接见时作了重要指示。

周总理讲话

今天，召开这个大会，在北京所有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山东学习班，青岛学习班、内蒙学习班、成都学习班、贵州学习班、西藏学习班，还有山西的机关班，共七个班都来参加了。谈一点共同有关的问题。中央政治局主持日常工作的同志除叶群同志请假除外，都到了，来看你们大家。江青同志、姚文元同志、汪东兴同志因为有事，他们三位同志先走。（江青同志：希望你们跟毛主席干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同志们，再见。）

同志们，我们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省来学习的同志都邀请来，讲一点共同性的东西，也提一点各地区特殊性的问题。但时间不能太长，我们有别的工作，你们明天还要学习。我们学习班的一个主要方针，就是到中央来很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锻炼无产阶级党性，认真学习“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使你们更好地回去参加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不管你来自何方，山东来的也好，青岛来的也好，从内蒙来的也好，从山西工作岗位上来的也好，从成都军事岗位上来的也好，从贵州来的也好，从西藏来的也好，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到毛主席身边，到林副主席身边。这是最大的光荣，在国庆节接见观礼代表同时也接见你们，是不是最大的光荣啊！那么，就要很好的学习。国庆你们参加了观礼，主席在天安门上接见了嘛！这是最大的光荣，你们应该加紧学习。

主席接见以后，听说你们很兴奋！你们有的学习班订了学习计划，有的学习班很快就要结束这个学习，既然如此，我们提前接见你们，讲一些问题。不管来的时间长短，总是在“九大”以后，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新党，中央领导下的学习班，总应该得到了新的学习，新的锻炼，带着新的精

神学习。不应该象过去的学习班，在这个地方不是认真地学习，来来去去，象泡蘑菇一样，不大讲纪律，搞资产阶级派性。这种作法，在“九大”以前，最典型的是徐海班，搞了一年，“九大”以后，他们认真学习了一个多月，现在徐海地区、连云港都改了样了，赶上来了。说明只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增加无产阶级党性，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很快就会表现出无产阶级的党性，表现出绝大多数同志都会团结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之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徐海一年的学习赶上了嘛！

现在的学习班是“九大”以后来的，按“九大”精神办事，不要再磨那么长时间了，应该短，要很好接受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群众组织的头头，犯过这种或那种错误，现在就是要团结起来，搞好革命的大联合，搞斗私批修，好好学习，做好样子给群众看看嘛！看到你们不愧是在毛主席身边学习的好学生。干部也是一样，象山西的和别处的，你们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一个单位是犯错误的当权派，甚至严重的是走资派，得到群众解放，经过学习，把错误抛弃了嘛！按“九大”精神，按“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好好学习。不管在地方上怎样对立，现在可以团结在一起了。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按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接受党中央的领导。各地都有了革命委员会，只有极少数地方、单位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正在推动，应该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很快联合起来，消除这些对立。有些对立的，认识不一致，有些观点一下子讲不清，回去在实践中才能求得一致，而且总是要求不同嘛！大的方向、大的政策，看法一致啦，作法一致啦小的认识不同。看法不同，可以保留，但行动上必须一致。首先把主席思想学好，把主席政策学好，达到五个统一的要求。

党章规定的组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个人的意见不同，但行动要一致。要以无产阶级党性来衡量，是不是够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无论是参加“三支两军”的解放军同志，还是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总是经过三年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嘛！做对了的总还有些错误，做错的也总还有对的，要互相学习，各自都作自我批评，使大家结合在一起，群策群力。工厂是这样，公社是这样，学校是这样，机关也是这样。你们中还有专门从军队来学习的，象成都班，学了以后，

认识到过去支左就是支了一派压了一派，不符合毛主席思想。认识到错了嘛，就要改。应该按照林副主席一碗水端平的指示，按照八三四一部队的“三条原则”九个一样办事，凡是符合主席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的就帮助，违反了的就批评。要拿这个作标准，不能认为是熟人就是好的，生疏就对立。这都是内部问题，对立久了，就会被敌人钻空子，不仅地富反坏右利用，还有暗藏在党内的。现在一小撮敌人被我们揪出来了，但总不能说揪干净了，还有新生的嘛，还有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嘛，这些人总会兴风作浪，不能因为我们胜利了就放松警惕。不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正如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所说的，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国内外敌人都想来钻空子破坏。甚至打着革命旗帜，挑动群众对立，使革命、生产受影响。

现在离开过“九大”已经半年了，不能继续过去的形势，而是面临新的形势。“九大”的胜利，全世界革命人民向往中国，向往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把我国修正主义的根子挖掉了，防止了资本主义复辟。给全世界革命人民、给社会主义国家作出了一个范例。社会主义国家的群众要反修正主义，首先要反自己队伍中的修正主义。不但要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中国也要警惕。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醒，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发了通知，开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挖出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一小撮人，地方上也有一些。但不能说太平无事了，他们一有机会就要动。

我们任何一个政策，都要认真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你们再学习，再总结经验，看看过去，想到未来。如内蒙犯了些扩大化的错误，但纠正扩大化，要防止另一种形势，防止对苏修、蒙修挑衅不管，对坏人不管，如果一味纠正扩大化，不注意这些，“左”的倾向就要走到右的方面去了，以错纠错就不好了。总是要按毛主席的政策办事，要把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这是目前急迫的任务。同样，山东过去犯了“反复旧”的错误，应该纠正。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把各级革委会真正巩固起来，领导广大群众，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一派掌权的如何补台，而不是重新搞两派斗争，这样就不对了。再如，贵州是犯了错误，但不能否定贵州夺权的成绩，总是把李井泉、贾启允打倒了嘛。他们后来所以犯错误，是因为不承认有对立面。任何事物的发展总

是有对立面的，人民内部矛盾，就要在大的前提下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贵州是大三线，更应该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四川、云南、广西、湖南也应该做好，把三结合、大联合搞好。那一派有坏人，你这一派也有坏人，要把两派绝大多数革命群众联合起来，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实行真正的革命大联合、三结合，这样才能把西南春雷的形势发展起来，总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不干就不行了。不共同对敌，三线任务就不能实现。我们在学习中要联系共同任务，联系本省实际。

现在全世界革命人民都看到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四方，都努力学习毛主席的革命理论、方针和政策，联系本国的革命实践。许多地方革命运动都起来了，不仅亚、非、拉、美洲、欧洲、大洋洲、日本革命都有新的发展。革命力量一天天增加，向往北京，向往毛泽东思想。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革命群众，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红卫兵、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直接参加了革命的浪潮，更应该提高，如果我们不看到这个形势，停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凡是对自己不满意的，都看成是走资派、资反路线，那怎么行啊！山东不是犯了“反复旧”的错误吗？还有武汉也犯了。老造反派不能批评吗？好象错了也不要紧，如果错了也不能批评，还有比老革命、老红军老的吗？他们在民主革命中功劳很大，他们有错误还批评呢！你们知道，去年我们曾经批评过“二月逆流”嘛！为什么不能批啊？他们承认错误，有改的表现，“九大”还团结他们嘛！有的选了中央委员，有的还选了政治局委员。批评和打倒是两回事。共产党员必须有批评自我批评的精神，党章也有规定。我们应该身体力行，犯了错误就要改，从团结的愿望，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但自己治好，也使别人少犯这样的病。凡是老造反派就不能批评，三年半就不能批评，那三十几年不就更不能批评了吗？没有这样的事！

我们知道，军队来了一些同志，老同志，都是团职以上干部，来学习，接见，他们有赶上国庆观礼，一个时候不能接见这么多人，叫他们先回去，以后再说。他们一听说毛主席、林副主席已经接见了两批，现在要停一个时期，不能忙于接见，有更大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一打招呼马上就走，没有一点埋怨情绪，只要毛主席指示，林副主席指示，一听就执行。我这次碰到过去一个给我警卫的同志，五十多岁了，他是一块长征的，十几年不见了，看见我打电话，很忙，握了一下

手就走了。这种精神值得学习。不但你们，就是我们也要向他学习。为什么现在老造反派批评不得？这也是一种迷信，这种迷信没有好处，阻止我们前进。我们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时时刻刻不能忘了林副主席教导的，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时时刻刻地前进，不进则退。这是辩证法，不前进就要后退，你再后退那就更糟了。因此要求我们学习班，就是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在这里比在家里学得好一些，党性增强一些，思想政治水平提高一些，担负起“九大”交给我们的任务，宣传好毛泽东思想。尤其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更应如此。

现在国际形势那么好。说好，是世界形势大大有利于革命人民，不利于帝、修、反。帝、修、反不满意好的形势，要压下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支持世界人民革命，他们就是阻挡毛泽东思想光辉的发展。我们不去干涉人家的内政，是讲行动靠那个国家的人民；任何一个地方的革命别人是不能代替的，他有了觉悟才能促使革命成功，没有到那个程度可能失败。我们中国的革命就有过失败。几十年了，台湾还没有收复，不但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还有反帝、反修的任务。但思想没有国限，到处可以传播。尤其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无产阶级走向胜利的形势下，广泛传播毛泽东思想就使帝、修、反吓的发抖，他们仇视我们，封锁传播的道路，这是不可能的，思想是没国界的。

林副主席在政治报告中说，现在的形势或者是革命制止战争，或者是战争引起革命。现在许多地方正进行着局部战争、地区性的战争，如果发展到世界大战，大战就会引起革命，地区战争就会引起地区革命。现在中东已经搞了两年，尽管帝、修、反想出卖革命利益，但那个地区革命斗争在发展着。巴基斯坦虽然小，但武装斗争搞起来，取得了经验。东南亚打到现在，差不多八、九年了，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搞了五、六年了。战争的发展起了促进周围国家革命的作用，他们纷纷起来反对侵略战争。我们国庆节口号二十二条：“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我们号召全世界作准备，而我们自己倒不准备，还在学习班搞派性斗争，不团结，或以错误对错误，算老帐，不是惩前毖后，而纠缠鸡毛蒜

皮、个人得失的事情。我们要支持世界革命的高潮，制止帝、修、反动战争。如果战争起来，帝、修、反要挑起战争，那好嘛，我们就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不仅在东南亚，不仅在中东，而且在祖国的大地上，消灭侵略战争。迎接革命，消灭战争，这样大的任务，都要求我们很好地动员力量，学习班就是动员的一部分。现在六、七个省、市的学习班在学习，造成很好的学习风气，全国都可以传播，就会有好影响，带动一大片。现在就是要认真进行战备动员，在学习中看到局势的发展，你们学习回去都有战备动员的任务。“备战、备荒、为人民”。

局势发展到今天，比五、六年前动荡的更大了，帝国主义接近死亡，修正主义站不住脚，它们国内有危机，革命压不下去，就要从战争中找出路，当然走的是条死路，但它也一定要找美、帝、修、反要冒险，就要扩军备战，军火摆久了，这些东西既不能吃，又不能穿，只是为了垄断资本家的利润。当革命威胁它们，到不能再扩张了，就要冒险，所以列宁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社会帝国主义也是这样。现在美帝、苏修两个头子正在争夺，他们可能自己打，也可以打革命的人民，他们的主要对象就是对中国。全世界人民向往中国，我们必须按毛泽东思想要有两手准备，我们要继续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国家建得更加强大，使帝国主义不敢冒险。但同时又要有所准备，从坏的方面想一想。中苏边界问题，从三月以来，苏修仍在不断挑衅，现在虽然达成一个协议，十月二十日在北京谈判，还有三天了。但拿我们的历史经验想一想，上一次，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同我们谈了半年，没有谈成，破裂了，边界冲突更加厉害。这一次也可能象上一次一样，也可能比上一次更加厉害，出乱子更大一些。来谈判找借口，搞突然袭击。我们要这样设想，要从坏的方面做准备，我们全国人民要认真进行战备动员，我们学习班也要很好动员，我们学习班参加什么宣传工作或转移一个地方，要象革命战士一样，象民兵组织一样，一召就来，一来就能动，能动就能行，象解放军战士一样，执行命令很坚决，战备工作搞的好，不能松松垮垮。有的犯了大错误，如果在战备动员中表现好，就要与人为善，只要他不是敌人，不是两面派，只要他承认错误，要给他改正的机会，将功补过，将功折罪。我们要给他这个机会，给他一个考验。好好学习，增强党性是考验，这次战备教育也是考虑。我不是耸人听闻，大家不必过分紧张，但总要有备无患。要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增强党性。另一方面一切行动听指挥，回去搞好团结，搞好动员。成都、贵州都是三

线，山西有一半是小三线，现在工作比较落实，现在赶上了，山西的情况有好转，山西班的同志要好好学习。贵州、四川要很快学好，把资产阶级派性消除，回去把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我们动员的口号，就是从现在起要有所准备。

刚才说了，在天安门上、天安门南部观礼区都算接见，我们从电影上电视上还可以看到，毛主席身体非常非常健康，不管从远处看，近处看，伟大形象都是一样的。我们要认真学习，认真准备，搞好革命大团结，提高警惕，加强战备，既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如果敌人敢于来犯，我们就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决、干净、全部、彻底消灭它。这是今天我们向大家说的，提出学习班的任务，一是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搞好批评自我批评；一是搞好战备动员。两个共同性的任务。你们的事，自己讨论。总之，在毛主席身边，在天安门看到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伟大形象，很高兴，你们回去要好好学习好好准备，很快地回到本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陈伯达同志讲话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希望大家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搞好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象林副主席经常教导的我们那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有一个建议，总理向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重要报告，同志们充分讨论，领会这个报告，并要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来。康生同志讲话 同志们，今天的会，是个盛大的会，到会的有一万四千一百一十二人，是个万人大会。这是我们革命干部、解放军同志，我们的红红卫兵，过去所谓革命造反派头头及成员，这样一起将近一万五千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会。我们的学习班是党校性质的学习班。过去我们办党校办了多少年，但一万五千人的党校，这还是第一次。

学习班有的结束，有的刚开始，有的学一半，不管那种情况，到北京来学习，都有进步，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这证明，只要同志们直接接触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直接了解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政策和声音，总会得到进步。过去有的同志犯错误，总的原因就是没有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不按中央指示办事。你们研究一下，象山东班也好，内蒙、成都、西藏也好，山西的机关干部班，共同的经验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事情就办好，离开毛泽东思想办事，就要犯错误。大家都有亲身经验。初到学习班，有争论，有分歧，有

各种各样的思想，带来各种材料，要打官司，争输赢、告状。内蒙应有经验了，开始你们打了一次，我们接见两派头头，带到人民大会堂的材料，我们统统没收了。这一次两派又带来了很多材料。内蒙同志在这里，你们送来的材料，我们都没看，因为那种思想不对头。到毛主席身边来学习，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是来打官司，搞派性的时候了，象恩来同志说的，首先学毛泽东思想，学“九大”方针，学“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所以现在结业的，你们就懂得了，没有结业的你们应当得个经验。把派性、打官司、争长短那一套。统统丢开。

为什么同志们一来有那种思想，刚才恩来同志所说的思想落后于形势，思想落后于实际，在这方面有点复旧气味。现在形势大变了，你们还按文化大革命初期形势那样看问题，做事情。形势怎么变了呢？第一，全国除了台湾省以外，实现了一片红，各地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各地革委会都是经过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准的。你们怎么能把他们统统看成是过去刘少奇和跟刘少奇走的走资派，那样的政府干部、党的干部一样看待。可是派性一发作，你们又当作走资派一样看待。如果这么看，那就说明你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就完全失败了，那不是自己否定自己了吗？可是派性发作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按老办法办事，打官司、争输赢。这里面有犯错误的人，个别的可以调整嘛！那是人民内部矛盾嘛。这里面有犯错误的人，个别的可以调整嘛！那是人民内部矛盾嘛！有些人犯错误有轻有重，有大有小，同时你们也自己检查一下，是不是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点错误没有，是不是百分之百正确，我看不见得。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有时说错话，办错事，你们就那么高明？！很自然，要不犯错误，就不工作。列宁讲：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能干的人是犯了错误就改，这才是好干部。如果有了错误，就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就让人家改正，如果人家愿意改正的话。你们不是要读毛主席的书吗？你们读了接班人五条吗？第三条再读一读，现在没有走的。除学习新党章外，建议你们要把接班人的五条读一读，特别是三、四、五条，当然，每条都重要。头一条是活学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第二条为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不是为你那个小宗派利益。毛主席不是讲：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全学习班不解放，你自己也解放不了。有些干部怕错误，可以解放的，你不解放，你自己也解放不了。第三条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不同意见的人，直到反对过你的人，甚至反对你反对错了的人，只要他愿意

改正错误，那就要团结。当然象赫鲁晓夫那样的阶级敌人不能团结。这一条，学习班常常忘了。内蒙群众是好的，你们头头我们过去也接触过，是听中央话的，现在为什么分成两派不能好好？有不同意见，要求同存异嘛！第四条，要讲民主，你总要让人家讲放，不同意见要很好听。第五条，批评和自我批评。刚才，总理讲了，好象“老造反派”就不能批评，那老革命就更不能批评了。这是个原则问题，很有点功劳，就不能批评，那是很危险的。你那些功劳不能算什么大功劳。就是功劳，就批评不得吗？那样就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统统放弃了。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人在政治上就要死亡，党就会死亡，社会就会停止发展，所以要把接班人五条学一下。

现在，贵州刚来，恐怕你们学习班中也有，据说到中央来，有的什么工厂不来，为什么不来呢？象山东班刚来时说的，怕“挖空”、“悬空”，我那次说，就是要“挖空”，把资产阶级派必“挖空”就是要消灭派性，才能使毛泽东思想扎根。

还有的说，我已经当了常委、委员，你不要让我下去劳动。好象革命就不能劳动，就要脱离群众，象鱼离开水一样。这方面已经结业的，好好把经验总结一下，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切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一切按新党章办事，一切听中央“九大”的精神，一切要听毛主席的话。我们说话也好，做事也好，要想一想，到底违反毛泽东思想没有？违反新党章没有？违反“九大”精神没有？这样，就可以少犯错误，不犯错误。

中央分工叫我管山东班，我对你们帮助很少，但开始的时候，就跟你们领导讲了，要你们抓整党教育，党章学习。没有共产党的思想，做党员不行，做革命群众也不行。党员和非党的革命群众，离开了党就会犯错误。希望同志们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按照新党章办事，按照“九大”精神办事，按照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办事！一切听毛主席的话，一切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还有点不大放心咧！什么问题？例如山东班有什么问题？你们学习得很好，成绩很大。举个例子，韩金海是山工总头头，一来就帮助他，那时很困难。对韩金海我有点粗暴，在人民大会堂点了你的名，我是讲韩金海，另外我讲贵州工代会叫知识分子篡夺了，搞工联主义，实际上讲的是贵州的某某某、

某某某。某某某知道我讲的是他。对韩金海刺激了一下，也有好处。据说韩金海检查了十几个小时，两派群众都赞成这就很好嘛。但我还有一点担心，担心理论和实践到底能不能一致？在北京讲的，回到当地能不能一致？学了的能不能用？言行能不能一致？这个问题回去的也好，在这里的也好，要特别注意。今天我也讲了一下我的想法，讲错了，你们批评。我讲象青岛的杨葆华，过去在北京解决山东问题时，杨葆华检查得比较好，把他的检讨在学习班大会上发了。但是，杨葆华回去后，据说没有完全贯彻那一次的精神。一见到群众，就不那么容易了。在北京讲了，学习班讲了，大会讲了，回到当地，群众批评了两句能否坚持，就不在容易，这是经验。杨葆华要检查这一点，不要以为那次检查得好，群众不是看你的讲话，是看你的实践，看你的行动。因此，要学习和使用一致，只有在“用”中检查你学得到如何？理论只有在实践中检验，否则，理论就成了教条；言论和运动必须一致，不然就要成了两面派。不客气地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些群众组织头头，受社会上资产阶级腐蚀，玩弄两面派手法，我们常常遇到。这是害人害己，实际上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说假话骗人，到头来弄到自己头上。这一点，我希望贵州四百多人觉悟，不要纠缠在承认不承认“四·一·一”问题上，而是蒙蔽了群众，欺骗了中央。贵州同志应懂得这一点，不管多少问题，态度是欺骗中央，甚至当面撒谎，发展下去要成为敌我问题。党员、解放军、革命干部，以此为戒，要言行一致，坚决反对两面派。那怕错了，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也不要紧，改了就好，但不要耍两面派，一切阶级敌人钻到内部，都是耍两面派，刘少奇以隐蔽那么久，就是用两面手法骗人。我们千万要警惕，思想上要警惕，怎么警惕，要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现在仔细看一看，中央下指示，有的坚决执行，有的打折扣，这是不行的！

同志们到学习班，思想有进步，有很大成绩，希望你们在进步的基础上，更加进步，更加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的政策、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的一切指示，紧紧掌握起来，随时检查自己到底符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党的政策、九大精神、新的党章。如果继续保持这个精神学习，相信同志们就有更大进步，那时，你们逐渐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但现在不能轻易自封，有的青年人，自封革命小将。什么小将，我就不赞成！我说就是革命小兵，弄不好成为逃兵。

我真正希望你们打下基础，在实践中活学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现在，我希望同志们要有更大的进步，使文化大革命取得更大成绩，使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更进一步发展，祝同志们成功！

我还要补充说一点，对这一排（指在主席台上就坐的各学习班党委领导同志）我还有意见。特别青岛班，领导班子不团结，群众都说某某军和某某部队不团结，某某某和某某某先要搞好团结。（某某某和某某某起立表态）你们当着一万多人大表态，要实现诺言，要看你们言行一致不一致！

黄永胜同志讲话

同志们：

今天晚上到会的同志一万多人，总理、伯达、康生同志向学习班的同志们做了语重心长的诚恳的指示，也是希望。我没有什幺话讲了。我拥护总理、伯达、康生同志的讲话。

有些同志学习时间很长了，学习班是党校性质的，党校么，总要结业的，党校性质的学习班，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不能老在这里，学了去实践，在实践中再学习。最近，有的班要回去，今天晚上的大会是中央的同志来见见同志们，欢送同志们回么！还有在北京学习的，还有才来的贵州班，到毛主席身边、林副主席身边，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身边学习，中央表示欢迎。同志们在这里学习不分时间长短都有进步，有的进步大一些，有的进步小一些，有的问题解决的好一点，有的问题解决的不那么理想。

文化大革命到了今天，我们总结好的经验，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要很好地斗私批修。有的人革走资派的命，革刘少奇的命、革人家的命，同志们是冲锋陷阵的，很勇敢，但有的人在革自己命时不一定是好的，有的不那么勇敢。革命有双重任务，既要革客观世界的命，又要革主观世界的命，只改造客观世界，不改造主观世界是不行的。我们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在学习班，有些同志学的不怎么好，只革人家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思想不好。我们希望同志们回去后，把自己在北京学到的、看到的毛主席亲自培育的典型经验很好地带回去，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回到自己那个地方，成为促进地个地方文化大革命、巩固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作革命的

促进派，不要作促退派。促进促退一字之差，反映了两条路线。如果搞分裂、搞促退，就违背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要起很好的带头作用，把各地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康老：插一句，你们回去不要怕你那一派的人说你修了、右了，我告诉你们，他们这样说，你就说他那个说法是反革命的，反毛泽东思想，在毛主席身边学习怎么修了呢！）

刚才总理讲了形势，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任何时候都要用革命的两手，对副反革命的两手，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积极备战，有两个可能存在，仗可能打，也可能不打，一切立足于行，要作准备，有备无患，立于不败之地。部队的同志要搞好政治思想教育，搞好四好运动，搞好军事训练，加强组织纪律性，要听指挥。地方的同志，要搞好文化大革命，搞好地区的工作。斗批改搞得好的地方，整党建党搞了，清理阶级队伍搞了，民兵要进一步搞好，但是文化大革命搞得不好的地方不能搞。更重要的是把工作岗位上搞好各自的本职工作。工人要把工业生产抓好，贫下中农要把农业生产搞好，多生产，就多增加一分物质力量。我们有些军工厂生产是不好的，不上班，还拿工资，群众叫做“七上八下”，就是七点上班，八点下班，领着工资就走了，根本不生产，这种行为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抓革命，要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嘛！光革命，不生产，七亿人民都这样能行吗？每一个地方的同志要作好自己的工作，象林副主席讲的：立足本职，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解放全人类，要有革命的气魄，要有革命的雄心壮志。那种光拿着钱不上班是可耻的，是寄生虫，要受到广大人民谴责的。希望各个地方的同志要注意这个问题，回到工作岗位上把本职的工作作好。我们一万多人，要成为一万多个火车头，带着很多车厢，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把社会主义建设推向前进！把战备推向前进！如果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胆敢侵略我们，我们在伟大统帅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副主席的天才指挥下，在我们的土地上一定把它们全部埋葬掉！中同同志们不送你们了，在这里祝回去的同志们一路平安！

总理：现在结束这个会，呼几个口号：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东班、青岛班整理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

来源：有关一九六九年清算批判王效禹运动的二十五件史料[根据未注明原编者及印制时间的手刻油印版历史文献重新刊印]。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注意工作方法》

党的“九大”以后，全国形势发展很好，很快。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下，全国各族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为了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斗、批、改的群众运动正在深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正在蓬勃兴起。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出现了！

形势的发展，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革命委员会更加注意工作方法。

毛主席教导我们：“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毛主席从来十分重视工作方法问题。在革命发展的每一个历史时期，毛主席向全党提出新的战斗任务的时候，都要求我们注意工作方法。在党的“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向全党发出了新的战斗号召，也提醒我们要注意工作方法。毛主席说：“要过细地做工作。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

当前，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工作方法呢？

一、抓好带头人的思想工作。一个省，要抓好几千万人的思想工作，首先要抓几千万人的带头人的思想工作，抓领导班子的革命化。要认真地、坚持地抓好领导班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落实毛主席提出的一系列政策，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一个县，一个工厂，一个公社，也是如此。

二、抓点。领导要通过抓点取得第一手材料，指导运动。抓点要抓好，面不要太宽，集中精力打歼灭战。下去的同志，要弄清楚政策。政策要交代清楚。领导同志要点面结合，把面上的问题带到点上去研究，把点上的经验拿到面上去推广。

三、抓三分之一。由点到面也不能一下子铺开，要全面规划，先抓好三分之一，再及其余。有了三分之一，就会有三分之二，乃至更多。

四、要考虑到全局。一切工作都要从“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战略思想出发，用这个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这就是全局观念。各行各业都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注意研究形势，注意思想动向，把全局观念和本单位的工作结合起来。没有全局观念的工作，就是单纯业务观点。

五、要考虑到群众。我们决定问题，处理问题，关系到广大群众。要同群众商量，听取各种意见，重大问题要经过群众讨论，得到群众的同意和支持。

六、领导和群众直接见面。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普遍采用的革命的工作方法。不要圈子搞得那么小，不要仅仅满足于层层听汇报。要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向群众学习，同群众一起，把毛主席、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贯彻到底。

七、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有的放矢，带着问题办。办就要办好，切切实实解决问题。

八、开讲用会。群众中有很多用毛泽东思想解决问题的好经验，组织他们自己讲，既具体，又生动，最有说服力。

九、少而精。会议、文件、表报要大大精简。不要整天泡在会里，埋在文件堆里。要提倡开短会、写短文章，新闻报道也要简明扼要。

十、留有余地。打仗要有预备队，过日子要有储备，一切工作都要留有必要的余地。不留一点回旋余地，容易使自己被动。

十一、劳逸结合。既要紧张，又要从容。群众干劲越大，越要关心群众生活。

十二、讲究实效。要埋头苦干，扎实实地工作。忙要忙在点子上，要解决实际问题。不要做表面文章，不要搞烦琐哲学。

工作方法问题，也是思想方法问题，世界观的问题。只要你做工作，总要采用某种方法，不是正确的方法，就是错误的方法。毛主席倡导的工作方法，是群

众路线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唯物辩证的方法。这种工作方法是同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工作方法相对立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历来倡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方法，被越来越多的新老干部所掌握，大大地提高了广大革命干部的领导水平。但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工作方法，在我们某些同志的身上，还是经常地表现出来。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讲究工作方法，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的许多指示，把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水平提高一步，更好地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更好地实现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社论）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年前发出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一年多来，全国各地、各条战线、各级领导机关，成千成万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扛起锄头，拿起铁锤，积极参加工农业的集体生产劳动。数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批城镇居民参加农业生产。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斗、批、改阶段的极其壮丽的新篇章。

在组织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伟大实践中，各地创造了许多好的形式。

举例如下：

各种类型的“五·七”干校。

插队落户。有的还把干部和教师、医务人员、知识青年等等组织起来集体插队。

领导机关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的人下放劳动，三分之一的人下去作调查研究，三分之一的人搞日常工作，定期轮换。

有的实行“两班轮换制”，一部分人下去劳动，一部分人主持日常工作。有的实行半日劳动制。有的由革委会领导干部带领工作人员分批到生产队当社员，到车间当工人。

工厂车间、农村生产队的基层干部，实行跟班劳动，不脱离生产。

参加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回本单位参加劳动，不脱离生产，这是很重要的，也是一种形式。

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干部参加劳动，都应该根据各具体单位的不同情况，商议出具体的、有效的、必须坚持的、能够考察的一些办法。有些单位提出：干部参加劳动，要定工、定时、定量、定质。这个办法可行，群众是赞成的。

上述所有形式，都是落实毛主席关于“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的伟大指示极其可贵的创举，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朝气蓬勃的新生事物。这些形式正在不断发展、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干部参加劳动后，深切体会到“刀不磨要锈，水不流要臭，干部不参加劳动要变修。”他们说：“现在衣服脏了，思想干净了；脸晒黑了，心炼红了；鞋磨破了，路走对了。”有些人“在机关里有娇气，和工人、贫下中农一比就服了气，经过锻炼有了朝气。”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称赞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干部是“五·七干部”，他们说：“有这样的干部，我们就放心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把干部，特别是在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坚持下去。

干部参加劳动，是毛主席培育的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毛主席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为什么有些干部会犯走资派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脱离劳动，从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经不起资产阶级种种糖衣炮弹的腐蚀，跌进了修正主义的泥坑。这个历史教训，是一切新老干部，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内都要永远记取的。从革命委员会诞生的时候起，毛主席就反复强调干部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主席在谈到新选进中央委员会的一些

基层同志时，谆谆教导说：“要注意，要他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这是毛主席对广大干部最大的关怀，最大的爱护。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毛主席这个教导的深远意义，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勤务员，才能代表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

干部参加劳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要坚持下去是不容易的，还要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斗争。几千年来剥削阶级轻视劳动的旧思想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流毒，也还没有肃清。认为下放劳动“低人一等”，认为参加劳动只是下放干部的事情，认为工作中的骨干分子，或者从工人、农民中新选上来的干部，可以不参加劳动，都是刘少奇“劳动惩罚论”、“劳动镀金论”和剥削阶级旧思想在我们头脑里的反映。如果我们不抓紧革命的大批判，首先在思想上打胜这一仗，要坚持参加劳动是不可能的。

每一个同志都要增强劳动的自觉性。不论新干部老干部，下放干部在职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比较好的干部、犯过严重错误的干部，都要把参加劳动看作本份。这是当一名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士最起码的要求。要抱着“重新学习”的态度，老老实实同工人、贫下中农一起劳动，虚心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彻底改造世界观。

坚持干部参加劳动，还必须对机关工作来一个变革。要注意工作方法，坚决减少层次，减少兼职，精简会议，精简文件，把干部从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保证他们有必要的时间深入群众，参加劳动。同时，正确处理参加劳动和做好工作的关系。对下放干部的学习和家庭生活，也要关心，给予适当的安排。

让我们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永远坚持下去，造就一支更加密切联系群众、永远朝气蓬勃、革命化的干部队伍。有了这样革命化的干部队伍同广大革命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就能够粉碎阶级敌人的复辟企图，粉碎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阴谋。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社论）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革命青年的榜样》

向青年同志们推荐本期发表的金训华同志的日记。这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成长起来，坚决实践毛主席的教导，决心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革命青年一代的心声。

一九六八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为《红旗》杂志写的编者按语中指出：对于教育革命的情况，知识分子的情况，“希望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查，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毛主席还指出：对于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一年多来，全国有几百万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工农兵中去，接受再教育，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金训华，就是在这个伟大的革命洪流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之一。我们发表他的日记，希望它能鼓励已经或正在实行同工农兵相结合的广大青年同志们。

金训华同志是上海市吴淞第二中学一九六八届高中毕业生，出身于工人家庭，原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常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投入了摧毁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激烈战斗。今年五月间，他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带头到黑龙江省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插队落户。今年八月十五日，双河两岸山洪倾泻，金训华为了抢救国家物资，奋战山洪，不幸光荣牺牲。根据金训华同志生前的多次申请，有关党组织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金训华同志到黑龙江省农村插队落户后，坚持天天读毛主席著作，天天收听广播。这里发表的，是他最后一本日记的摘抄。通过阶级斗争大风大浪的实践和锻炼，他深刻地领会了“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忠于毛主席就有力量”这一伟大真理。他的日记，充满了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无限热爱。他第一页日记所记，就是决心用“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逝世前一天的日记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誓死保卫毛主席！”正是在这个伟大真理照耀下，他的简单明白的语言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在这里，处处可以看到金训华和同志们在一起，认真刻苦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造自己世界观，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对自己进行严格的要求和艰苦的锻炼。

在煤油灯下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想到的是“灯芯再小，学习毛主席著作，心里总觉得亮堂堂的，而且越学越觉得亮堂。因为，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们前进的方向。”

捆谷草，手上出了血，他想到的是“我的手会出血，而贫下中农的手为什么就不出血呢？这说明我的手、我的思想长期脱离工农，脱离劳动，染上修正主义毒素，必须长期在工农群众中进行磨练。”

面对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阴谋和挑衅，他想到的是“我反正下定决心”，如果敌人胆敢侵犯我国神圣领土，枪声一响，就准备“在战场上接受党的考验”。

在生死关头的考验面前，他想到的是“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在为保卫祖国财产而与洪水搏斗的过程中，狂暴的巨浪三次把他卷进险恶的旋涡里，他三次顽强地把头抬出水面，斩风劈浪，继续向前猛冲，去抢救国家物资。金训华不愧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他三次面临死亡的威胁，三次战胜死亡的威胁，一次比一次更高地攀上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无产阶级的思想高峰。

本期还登了一幅画，目的是提倡一下创作刻划工农兵英雄形象的美术作品。这幅画是画人物的。它选择了金训华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在激流中抢救国家财产这样一个片断，生动地反映了他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赤胆忠心和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塑造了革命的青年一代的英雄形象。毛主席很早就说过：“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下乡去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人们也是看得多写得少。”我们希望在认真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深入工农兵的基础上，有更多更好的刻划工农兵英雄形象的优秀作品出现。

毛主席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金训华同志是在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青年。他坚决实行了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是革命青年的榜样。广大革命的知识分子要学习这个榜样，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在劳动中，在阶级斗争中，自觉地磨练自己，改造自己，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献出自己革命的青春。要象金训华同志那样，天天读毛主席的书，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用阶级斗争、阶级

分析的观点去观察一切；要象金训华同志那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把青春贡献给伟大的反帝反修事业；要象金训华同志那样，坚决保护祖国的财产，热爱劳动人民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在抓革命、促生产中做出更大的贡献；要象金训华同志那样，认真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在三大革命运动的风口浪尖上挺身而出，为人民的利益奋不顾身，经受得住任何严峻的考验。金训华同志虽然光荣牺牲了，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和鼓舞着年青的一代。让我们一起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更加朝气蓬勃地奋勇前进吧！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十二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四日）

2009 年 5 月 11 日初稿

2011 年 12 月 21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一册（2）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一章 搞好斗、批、改

第二节 解决一些省的遗留问题

本节资料

壹、山东省

一九六九年五月廿四日，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三同志给中央的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最新指示鼓舞
 下，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和济南军区在京的二十七个同志，在“九大”闭幕以后，
 集中时间进行了学习。学习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九大”文献，学习了
 中央其他同志的讲话，分析了山东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检查了存在的问题，总结
 了经验教训，进行了批评自我批评，增强了团结，研究了改进的措施。

在学习中，大家一致认为，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对山东文化大革命，
 一向是极其关怀的，在“九大”期间和我们这次学习过程中，毛主席、林副主席
 亲切接见，并做了极为重要的指示，中央负责同志多次和我们座谈。这是以毛主
 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们的最大爱护，最大关怀，最大教
 育，最大鞭策，我们决不辜负中央对我们的期望，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
 大红旗，认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贯彻“九
 大”精神，以大局为重，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山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的形势是大好的，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
 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下，取得了伟大胜利。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无
 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在山东驻军的大力支持下，夺取了山东党内一小撮走资
 派的权，逐步建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省一片红。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的群众运动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地开展起来，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有了很大提高。抓革命、促生产和“三支两军”工作，都取得了显着成就。但由于省革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思想指导，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特别从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来，暴露的更加突出，一种不相信不依靠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怀疑一切的错误思想进一步发展起来，在全省错误地发动了“反复旧”运动，实质上是干扰清理阶级队伍，把矛头指向了解放军，指向了革委会，指向了革命干部，指向了广大群众，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背离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带方向性的错误。这一错误，不仅对山东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而且波及到一些兄弟省，直接影响了“九大”精神的贯彻，后果是不好的。必须认真加以纠正，接受这一经验教训。

为了贯彻“九大”精神，妥善解决存在的问题，经大家反复研究，拟采取以下措施：

(一) 进一步在全省掀起一个持久的学习、宣传、落实“九大”精神的高潮。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动员全省军民坚决影响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加强团结，实现“九大”提出的战斗任务。在组织这一高潮中，既要勤勤恳恳，又要扎实。要发扬毛主席提倡的革命好学风，说到做到。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惟一标准，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对于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言行，要坚决抵制，要提倡言行一致，表里一致的革命作风，反对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的两面派坏作风。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公，一切为革命的共产主义风格，坚决反对“私”字当头，一切从“我”出发的坏思想。在学习中，各级领导班子，要作出好样子。

(二) 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紧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切指示，必须原原本本地传达，认真贯彻执行。坚决反对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适合自己口味的就执行，不适合自己口味的就抵制，封锁甚至歪曲的实用主义态度，加强组织纪律性，工作情况要经常地。如实地向中央请示报告，特别是重大问题，必须报请中央批准后再执行。反对自以为是，另搞一套。彻底批判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坚决反对搞独立王国的倾向。

(三) 切实落实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认真搞好斗、批、改。遵照毛主席关于“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

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的教导，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地抓紧抓好，凡是是没有联合好的，首先耐心细致地进行群众工作，真正实现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清理阶级队伍一定要抓紧。在清队过程中，一定要严格掌握政策，狠抓一个“准”字，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谨慎小心，防止和克服扩大化的倾向。严禁随便抓人，除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都应当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凡是不应该抓而抓了的，立即释放。不准随便戴政治帽子，属于政治陷害的恢复名誉，错打成反革命的要予以平反。整党建党要严格按照新党章的要求搞好。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全面地正确地掌握“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原则。

(四)要加强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一元化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一定要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在革命委员会内部，要把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提得高高的，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斗争。要加强集体领导，重大问题一定要集体讨论决定，反对个人说了算，个人不能推翻集体制定的决议。有不同意见，要当面讲，允许保留，可以向上反映，但不准搞“小动作”。在集体领导下，领导成员要有适当分工，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每个成员都要勇于负责，大胆工作。

(五)要充实加强省革委的领导机构。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要迅速建立起来。根据精简原则，机关各部门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在“反复旧”运动以前的基础上，适当充实和调整。进驻省革委的工宣队，要做好思想工作，迅速撤出，吸收新的工作人员，要严格审查，并经过组织批准。反对宗派主义，反对任人唯亲。

(六)要相信和依靠解放军。经常向广大群众进行拥军教育，在全省范围内，更大规模的开展热烈的拥军活动，学习解放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狠抓“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等光荣传统，对“三支两军”工作要积极支持，热诚帮助。不准以任何借口，把矛头指向解放军。解放军要经常进行拥政爱民教育，大力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军队和地方要适时召开谈心会，如果有分歧，要在内部，通过民主协商来解决，不要把矛盾暴露到社会上去。严格

遵照中央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通知中规定，军队开展“四大”的单位，不要干涉和插手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地方群众组织也不要干涉和插手军队的文化大革命。

(七)要相信和依靠群众。严格掌握政策，耐心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要认真学习八三四一部队的“三条原则”、“九个一样”的先进经验，克服资产阶级派性，不要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决不允许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这一部分群众压那一部分群众。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现阶段，不能再在群众中划“革”与“保”。革命不革命，要以对待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为标准，不能以拥护或者反对某一个人来“站队”。要继续批判“以我为核心”、“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错误思想。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联合起来。不准重拉队伍，另立山头，进驻公、检、法的“文攻武卫”，要迅速撤出，继续加强军事管制。做好思想工作，撤消“文攻武卫”组织，公、检、法原有的敌伪档案、文书档案、干部档案等文件，“文攻武卫”必须全部交军管人员接收和管理，不准隐藏、抽出和销毁，个人私自取去的必须勒令如数交回。要建立和健全“三代会”，置于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之下，与下面不发生垂直领导关系，不准插手外单位外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要促进徐海地区革命大联合，不要插手和干扰。

(八)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对已经解放了的干部，要大胆使用。对参加三结合的干部，要信任，支持，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允许他们犯错误，允许他们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

(九)巩固和发展各级革命委员会。毛主席说：“革命委员会好。”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全体军民，必须坚决支持、信任、帮助、尊重和捍卫。革命委员会不健全的要逐步使其完善。对革命委员会只能补台，不能拆台。解放军要坚决走拥政的道路，进一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积极参加革命的三结合，经常检查工作中的缺点，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作用。

(十)切实改进领导作风。要发扬党的三大作风，继续贯彻省革委一九六七年六月“关于转变作风的若干规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深入群众，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狠抓典型。在职干部要轮流下放劳动，群众代表不脱离基层，不脱离生产。坚决反对骄傲自满，脱离群众，听不得不同意见的不良作风。坚决反对主观臆断，随便表态、胡乱指挥的不良作风。坚决反对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喜欢吹吹拍拍、阿谀奉承的不良作风。坚决反对口是心非、玩弄权术的资产阶级政客作风。

山东问题，事关大局，我们坚决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一定要向前看，顾大局，以“九大”为一条线，对过去的问题，做为经验教训接受下来，大家团结一致，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争取更大的胜利。为了既解决问题，又不致引起反复，对这次学习情况，控制传达范围，绝对不允许传到社会上去。学习的基本情况，目前只在省革委常委和济南军区党委中传达。

对“反复旧”运动遗留的问题，通过贯彻“九大”精神，总结经验的办法，逐步加以解决。同时建议中央举办解决山东问题的学习班，学员从各级革委会、群众组织和参加三结合的军队干部中抽调。第一期主要解决省革委和济南市的问题。

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问题，回去再研究具体措施。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王效禹 杨得志 袁升平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徐海班时的讲话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接见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徐海班和徐州铁路、煤
炭、电业班全体人员时的会议全文记录

时间：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夜 23 时 32 分至二十七日凌晨 2 时 36 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

参加接见的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李先念、温玉成。陪同接见的首长：杨得志、王效禹、袁升平、李水清、余秋里以及其他有关负责同志。

当总理、伯达、康生等中央首长登上主席台时，全体同志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周总理：

同志们，现在开会。

徐海学习班，是我们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最早的一个学习班。不但包括徐州，连云港的各方面的同志，还有铁路上的，煤炭方面的，电业方面的同志。我们在“九大”以后，正在谈山东问题。当然也就联系到徐海问题。现在山东问题谈的已经结束了。所以，今天也请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同志、济南军区的同志，还有“九大”的一部分山东的代表来参加这个会。现在，我们先请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公室主任聂济峰同志，把这个学习班的情况简单地说明一下。

聂济峰：今天到会的两千零一十人，徐海班的到了一千二百二十一人，铁路班的到了二百三十八人，煤炭班到了四百零九人，电业班到了一百四十二人。最近学习班不请假跑回徐州去一些同志，截止今天，一共还有三十几位同志没有回来，回来了七十九位。另外这一次连云港没有来，他们主要是“反到底”的同志。原来一些老学员四十五个人回去没有来，另外新学员三十五名没有来，就是八十几名没有来。加上跑回去的一百一十九位同志没有到。

总理：刚才聂济峰同志说，我们这个学习班办的时间很长，是从去年开始，现在已经是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六号了，快到二十七号了，差一刻钟。这样长时间的学习班，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当然首先我们要自我批评喽，中央抓的不紧。但这个学习班情况也确实复杂。举一个例子来说，“九大”开完了，胜利闭幕以后，在九届一中全会没有开会的前一天，忽然徐海班刮了阵歪风，是逃跑风吧。逃风。有一些头头不想在这里呆了，说非要去较量去了。“九大”以后还要较量，两派都有。一直连续跑到五月十八号。二十天，逃回去一百多人，十九号，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接见，你们都参加了。（其他首长插话：回徐汇报团的部分同志没有参加。）这样一个好消息传回去，我们相信回去的人应该知道，我们要解决这个学习班的问题喽。所以就托山东省革命委员

会王效禹同志、杨得志同志和六十八军军长张铚秀同志他们三位同志打电报回去, 请回去的同志, 就是跑回去的同志回来。因为跑回去的同志有一百六十五位同志。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全部回来, 还是有人说他们三位代表中央发的电报都不能信。那还有什么可信的呢? 这就说明问题复杂啊。因为这样子, 我们就现在先由徐州的、山东的、然后再由中央的几个负责同志讲一点话, 然后我们再提出解决徐海班的问题。

我们首先请张铚秀同志讲话。

张铚秀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

中央首长在百忙之中, 今天接见我们徐海地区学习班全体革命同志, 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徐海地区七百万军民的特殊关怀。让我们千遍万遍地高呼: 毛主席万岁! 万岁! 万万岁!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 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永远健康!

中央首长接见我们向我们传达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声音, 并给我们作极为重要的指示, 这是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我们最大教育, 最大爱护、最大鼓舞、最大鞭策。我们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 听林副主席的话, 听党中央的话, 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 以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实际行动, 心往联合上想, 话往联合上讲, 劲往联合上使, 步往联合上走, 迅速搞好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 改变徐海地区的落后面貌, 来报答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首长的殷切关怀。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和济南军区负责同志陪同中央首长来看我们, 要给我们作指示, 这是对我们的关心。

徐海地区文化大革命, 搞成这个样子是我在“三支、两军”工作中, 由于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不理解, 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没有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 长期陷于资产阶级派性, 支左态度不端正, 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严重错误, 犯了三个过。一上阵就没有很好的遵照毛主席关于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的指示支左, 因此介入文化大革命不久, 就错误地取缔了一些革命群众组织, 压制了一部分革命群众。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成立革委会后, 由于对革委会等认识的分歧, 徐州市形成了踢、支两派,

我们又没有正确对待，而倾向了支派，打跑了踢派；七月以后又在检查纠正前段错误中，又倒向踢派一边，打跑了支派。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三大区的重要指示发表后，我们军的领导没有认真学习贯彻，对照检查，而继续坚持错误。去年七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特许我们来到毛主席身边办学习班，十个月来，中央首长多次耐心帮助教育等待我们，特别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操劳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百忙之中，给我们很多极为重要的指示。所有这些，本来是我们统一思想，改正错误的最好机会，但由于我们领导上资产阶级派性作怪，存有打官司，争输赢思想情绪，所以在今年一月十一日总理接见军队干部前很长一段时间觉悟很慢，支左态度没有端正，部队思想没有统一，致使中央解决徐海地区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指示没有能够很好的落实，还曾发生过一些错误。我们对军队领导不够信任，不够尊重，一段时间请示报告不够，有些指示没有认真执行，还曾出现一些公开“打倒王效禹”同志的错误口号，所有这些，都是很错误的。我再诚恳地向中央首长作检查，请首长给与批评。由于我们的错误，直接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给徐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损失。铁路交通一再中断，煤炭生产长期上不去，影响了生产，影响了战备，使徐海地区的革命和生产都处于落后状态，成了全国一个“老大难”单位。我们这些错误不但造成革命群众组织之间长期对立，部队之间思想不统一，影响“三支，两军”工作，也影响了部队建设，特别是群众组织的联合，问题在我们军的领导，责任主要在我，不怪济南军区领导，不怪兄弟部队，也不怪我们部队的广大干部、战士，更不怪广大的革命群众。

我们犯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但最根本的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活字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好，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不足，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吃老本，缺乏自我革命精神。我们的私心杂念重，怕字当头，怕担风险，怕犯错误，犯了错误又不能及时的勇敢的改正错误。正确的没坚决支持，错误的没有坚决斗争。归根结底是我们世界观改造得不好，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忠，辜负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培养和教导，也辜负了徐海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期望和信任。

我决心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和中央解决徐海问题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把今

天中央首长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所作的极其重要的指示贯彻下去，把部队和两派广大革命群众的思想统一到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上来，坚决同各种“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徐州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大联合”的教导，以支左红旗八三四一部队为榜样，认真学习首都六厂两样的先进经验，正确对待两派广大群众，真正做到“三条原则”，“九个一样”，把一碗水端平。前一时期，有些革命群众要打倒我和那统一同志，在这里我向同志们表示，正确对待反对自己的同志。要打倒我的同志你们没事。我们有缺点、错误，一定要改，并欢迎同志们批评监督。我们大家都好要按照毛主席教导办事，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以迅速搞好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实际行动报答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首长的亲切关怀。

现在新沂、睢宁、东海、邳县，在中央首长接见后，很快要回去成立革命委员会。徐州地专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见后，步子迈得很大，决心最近几天把徐州地区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我们希望其他县、市都要向他们学习，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认真学习“九大”文献，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争取胜利。徐州市要按照总理改组革委会指示的原则，很快把革命委员会问题解决好，最近有些地方形势很不好，抢枪、搞武斗，我们希望各市、县革命群众组织，把抢夺部队的武器装备，迅速集中封存，立即无条件交还部队，其他武斗凶器也必须上交，在采取紧急措施，坚决停止武斗。

同志们：我们要以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亲切接见和这次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为巨大动力，在“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下，只争朝夕，急赶直追，改变徐海地区的落后面貌，赶上全面大好形势。

(口号略)

总理：请王效禹同志讲话。

王效禹同志的讲话

徐海学习班的全体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同志们，今天我是来向全体同志作检讨的。刚才张铚秀同志讲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首先由我负责，是我犯错误造成的。我在处理徐海地区的问题上犯了严重

的错误，给徐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使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直到现在还没有联合好。也给部队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我的错误就是支了一派，压了一派，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了大江南北对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指示之后，仍然错误的支持一派。

现在我通过学习，在毛主席身边斗了私，看到了这个错误的严重性、最根本问题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忠。现在我在全体同志面前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并再一次向同志们作检讨。

不久之前我们党召开了一次划时代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毛主席在这次大会上作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指示，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作了政治报告，这个报告，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文献，还通过了新党章。我在这次大会上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会后，林副主席又找我们谈了话，作了重要指示，中央其他首长也多次找我们谈了话，给予我们许多教育。留京的济南军区和省、市、地革委的同志也给我许多帮助，使我提高了政治觉悟，提高了认识水平。因而，也端正了我对徐海地区问题的看法。

徐海地区两派过去没有联合好，我负有很大责任。从今天起，希望两派迅速联合起来，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伟大号召下，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精神鼓舞下、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深入进行斗、批、改，搞好拥军工作，密切军民关系、抓好革命、促好生产，特别一定要搞好拥军工作、没有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没有一切。没有解放军我们就不能进行文化大革命。过去部队工作我没做好，相反给部队工作增加了困难，这里，我要向部队的同志检讨与道歉，我们山东今后绝不插手徐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如果中央要我们协助做些工作，我们坚决按照毛主席教导办事，象八三四一部队那样，一碗水要端平，改正过去的错误，坚持“三条原则”、“九个一样”，认真克服派性，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不支持，凡是有利于军民团结的，有利于大联合的，有利于三结合的就支持，否则我们都不能支持。

徐海地区和山东的临沂，枣庄等地区是唇齿相连，无论战备，无论工农业生产，无论交通运输等方面，关系十分密切。希望会后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我们加强团结，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可以争取各项工作的更大胜利。

在这里现在说明一个问题，刚才张铚秀同志讲话的时候，说在徐海学习班上提打倒我的口号，我今天向同志们表示：我犯了错误，同志们打倒应该，我和同志们站在一边，打倒我的错误以后，和同志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因此我感谢同志们。

（口号略）

总理：请杨得志同志讲话。

杨得志同志讲话

徐海班的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祝愿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同志们来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学习、已经十个月出头了，你们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在学习中，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对徐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对徐海学习班极为关怀。毛主席亲自过问过十几次，做了极为重要的指示。中央首长多次接见、不断进行启发教育。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学习班，也深为感动，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今天中央负责同志又在百忙之中和我们见面，做指示。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话，把徐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把问题解决得更好。

我今天到这里来，是借这个机会向同志们做检讨，接受同志们的批评。由于我们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不理解，对徐海地区部队“三支、两军”工作的领导上，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犯了很多错误，给徐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以至中央直接出面解决问题。我们感到非常惭愧，非常痛心。检查起来，我们在运动初期，解散了“红总”总部，在部队的两个学校，一个医院中抓了二十六个人，打击、压制了群众的革命运动。以后对待踢派和支派这两个革命群众组织，又没有掌握端平的原则，特别在毛主席视察六省市发表最新指示以后，批准了对连云港问题的七条错误的决定，错误就更严重了。

我们六·六三部队在“三支”、“两军”第一线，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与军区工作没做好有些问题处理不当，有直接关系，我们应该负主要责任。

我们对过去的错误，虽然做了检讨，但从徐海地区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来看，我们所犯的错误还有影响。我们一定进一步检查，认真接受经验教训，加强

以六·六三部队“三支”、“两军”工作的领导，和同志们一道，把徐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一定学习八三四一部队的经验，切实掌握“三条原则”、“九个一样”。对踢派和支派这两个革命群众组织、不管哪一派，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批评教育。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我们也希望同志们，在全国空前大好的形势下，乘党的“九大”强劲东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战略部署，坚决贯彻“九大”提高的战斗任务，搞好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把徐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迅速推向前进。（口号略）

总理：请山东省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葆华同志讲话。

杨葆华同志的讲话

中央政治局首长，徐海班解放军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徐海地区两个革命群众组织长期对立，“内战”不休。主要责任是我们山东插手徐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违背了干扰了毛主席一系列关于大联合的指示贯彻执行，犯有支一派，压一派的严重错误。招致了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长期不能联合的分裂局面。因此使徐海的革命和生产，尤其是交通运输以至影响全国一些城乡的革命和生产，都受到严重损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教训是惨痛的，在此，我受山东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委托，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做深刻检查，向徐海班全体同志并通过你们向徐海地区解放军同志们、两派广大革命群众作深刻检查，并坚决表示：保证我们山东再不插手徐海地区文化大革命，同样要求你们这样做，从此一刀两断。保证一定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坚持支派和踢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观点，支持你们两个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搞好革命的三结合。我们在这里这么讲，回去还要公开这么讲，保证表里如一，言行一致。

徐海地区必须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坚定地走革命大联合的道路、这是历史发展必然趋势，革命的需要，阶级斗争的需要人民利益诚恳。谁要是死抱小山头不放，资产阶级派性膨胀，就要脱离广大群众，背弃正确方向，那就必然会陷入资产阶级泥坑，而不能自拔，背叛革命，最后落得一个孤家寡人的可悲下场。我本人是有深刻教训的。

我在 1968 年 11 月 17 日“青岛市各级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发动了全市所谓“反复旧运动”，是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

当时全国军民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极为重要讲话鼓舞指引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轰轰烈烈地扎实实地斗批改运动，革命、生产出现一片日新月异蓬勃向前发展的大好景象。我市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但在此时刻，我却抛出了这篇错误讲话，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背离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精神，迎合了社会上一股对抗清理阶级队伍的反动思潮，在一段时间，背离了大方向，破坏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使斗批改运动受到极大干扰，破坏了革命三结合和革命大联合矛头指向了伟大的解放军，破坏了军民，军政关系，使山东青岛以及其他一些省、市、地区的革命队伍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使无政府主义思潮，对抗清理阶级队伍思潮大为泛滥起来，把运动引向邪路，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

资产阶级“私”字，是我所犯严重错误的祸根，以上错误是严重的，教训是惨痛的。

我再次向中央表示，向同志们公开表示，收回我这篇错误讲话。并诚恳要求你们，以我这篇讲话为反面教材，以我犯的严重错误为借鉴，接受经验教训，痛加批判，肃清其影响。

同志们：

当前，党的“九大”精神强劲东风，吹遍了全国城乡，举国上下，万众一心，认真学习毛主席极为重要指示，林副主席政治报告和党章，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展开了波澜壮阔地落实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群众运动，掀起斗、批、改的新高潮，革命生产无限好。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岂能安然空对视等闲。我们应当在毛主席“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最新指示鼓舞下，开展活字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斗私，批修”，迎头赶上去，努力提高贯彻毛主席

指示的革命自觉性，相信和依靠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军帮助下，清除派性增强党性，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迅速实现徐海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打好斗、批、改这一仗，争取更大胜利。以实际行动，作出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泽东思想路线的好样子，成为宣传、执行、捍卫毛主席指示的坚强战士，给帝修反和刘贼及在徐海地区一小撮阶级敌人以沉重打击。

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你们，全国军民也一定会热情期待着你们，相信你们一定会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亲切关怀下，尽快地实现革命大联合，搞好革命三结合。

让我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

总理：好，现在请我们黄永胜同志讲话。

黄总长：

同志们，我们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领导小组一个工作人员向同志们说几句话。徐海班，是在中央办的各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间最长的一个学习班。当然，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领导小组，特别是我，对徐海班的工作做的不够，负有很大责任。我们除了同六十八军的同志有些接触，做了一些工作之外，对两派群众组织的同志，直接接触的不多。但我们从间接接触中，我们感到徐海班问题比较多，情况也比较复杂，我们也感到工作难做。徐海班发生的问题也较多，从我们办的这么多省的学习班来说，我可以很坦白地告诉同志们，你们徐海班是表现最差的一个学习班。

徐海地区是一个交通枢纽，是一个战略要地。搞好徐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对物资交流，促进生产，巩固国防，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有很大的意义。但是，这个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你们已经搞了三年多了。从五·一六”通知算起，已经三年多了。但是到今天，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从徐海地区的形势来看，同全国的大好形势比较来说，你们是落后了的。你们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直到现在还没有联合起来，还在抢枪，还在搞武斗，还在争资产阶级派性的权。你们完全不顾大局，干了不少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你们长期打内战，阶级敌人在那里坐山观虎斗，混水摸鱼。你们徐海班的同志？我们查，你们看到这么一个情况，应该感到自己惭愧。同时，你们这些做法。应该看到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不忠

的问题。我希望你们应该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九大”提出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现在应该到了觉悟的时候了。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一直非常关心徐海的问题。徐海班来北京学习，是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批准的。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经常地了解你们徐海班的情况的。并且对徐海班做了多次的重要指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曾经几次讲到徐海地区的问题。毛主席在去年九、十月间要军委办事组首先做实际的工作。军委办事组织曾经找上六十八军的同志开过好几次会。并且把那时军队的情况和徐海班的情况，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不断地汇报过。当时，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听了汇报后很高兴的。今年五月十九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又接见了徐海班的同志们。从这一系列的情况来说，说明一个什么呢？说明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对徐海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是非常关心的，对在徐海班学习的同志们也是很关心的。这是对同志们最大的关怀和爱护。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关怀你们，林副主席和党中央这样关怀你们，可是你们在学习班搞的怎样呢？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你们怎么样贯彻执行的呢？你们到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已经十个多月了，你们觉悟是很慢的。你们没有点真正地认真地按着毛主席教导去办事。你们中间有些人对中央解决徐海地区的问题，对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采取了极端错误的态度。首先你们对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审定批准的学习班八条注意事项，你们学习班有些同志是置若罔闻。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冲、打、跑、大搞资产阶级派性活动。学习班开学以来，你们徐州两派先后跑回去两百多人次。仅踢派就跑回去一百六十多人次。有的人先后跑回去了八次。连云港“反到底”跑走了四十五人。

今天在这里我是有点不大客气呀，我是当军人的，有话讲在当面啊。他这个连云港“反到底”代表团，在头头王长发的带领下，跑回连云港达半年之久，经中央多次督促，至今不回来。这个，心目中那里有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呢？特别是在“九大”闭幕以后，中央正在处理徐海地区的问题，你们在学习班又刮起了一股叫做“逃跑风”也好，叫做“逃走风”也好，反

正刮起一股往回跑的风喽。踢派头头徐锋带头跑，跑了六十八人。支派的孟宪臣带头跑，跑了三十人。徐锋在学习班先后跑回去四次。每当学习班形势好转，你们就跑，你们这样做，你们为了什么呢？为什么学习班形势一好，你们就跑呢？你们要跑回去干什么呢？五月十九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见徐海班全体学员后，广大群众都欢欣鼓舞，正当热烈庆祝这一亲切接见的时候，你踢派的什么陆继坤，这个同志现在在不在我们不知道，就不参加庆祝会，跑到前门外去喝酒，搞非法串联，最后也跑了。你们这样做，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什么感情呢？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三”“七·四”布告，已经十个多月了。但是徐海地区抢枪武斗的歪风一直没有停止。特别严重的是大规模地抢枪、武斗都发生在关键的时刻。比如去年十一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你们大抢枪。有的头头带头抢，中央下命令要把武器交上来，你们迟迟不交，交又不彻底。这次“九大”以后，连云港两派都大抢枪，甚至于把戒备仓库的枪你们都抢了，四月二十九日，也是我们九届一中全会刚刚闭幕，二十八日闭幕，二十九日，徐州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你们为什么不去庆祝“九大”这样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会？你们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去抢枪，去搞武斗？毛主席在“九大”期间发出了号召，“准备打仗”。你们连云港和徐州都是战略要地，你们不仅仅在那个地方没有把文化大革命按照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的思想搞好。而且，你们在那个地方抢枪，搞武斗。你们想一想，这个究竟帮了谁的忙？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但是你们踢派的头头顾炳华、栾昌善却公开散布说：“对解放军相信是前提，警惕是关键，斗争是根本”。你们究竟还是相信还是不相信解放军？你们这些人讲话，说相信解放军那还不是假的？“相信是前提，警惕是关键，斗争是根本”，那就是说，你们根本来说就要和解放军斗争就是了。你们这样不是明目张胆地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相对抗吗？中央是信任六十八军，也是支持六十八军的。但是六十八军在“三支”、“两军”工作当中有缺点，有错误，中央要求他们改正错误，也相信他们能够改正错误的，并且正在改正。但是你们不是热情地帮助，而总是把矛头指向六十八军。

当我们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我国领土珍宝岛的时候，提出了“打到新沙皇”的口号，你们却把矛头指向六十八军，胡说张铚秀就是徐州的“新沙皇”。你们这不是人身攻击吗？这样，你们不是帮苏修的忙吗？骂我们自己的解放军，这是你们敌我不分。你们歪曲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派派出所谓“工人宣传队”，进驻已经实行军管的徐州报社、电台、夺军管的权。连云港“反到底”甚至派“工人宣传队”进驻解放军“三支”、“两军”办公室，不让解放军支左，毛主席叫派工人宣传队，也没有叫派到解放军里头去呀，全国那里有派宣传队到解放军里头去呀，这个点是你们徐州第一吧。也没有叫你们派到军管那里去的呀，你们派的“工人宣传队”到那里去搞了什么斗、批、改？你们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实际上你们就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忠。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你们这个队伍中，我看有一部分人目无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有什么指示，你们就搞个什么错误的决定、采取错误的行为，公开贴大字报，说只有毛主席说了算，什么某某人算老几。去年十一月十九日，张铚秀同志传达了康生同志提出来的叫你们《徐州工人报》不要登“擒鬼录”的那些反动的东西，要你们停刊。但是你们不听，拒不执行，而且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了一个关于帮助群众组织更好地办好报纸、广播的决定。《徐州工人报》、《红色火车头报》、《徐州红卫兵报》还分别地发表“战斗书”。“战斗书”里头说：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给了一小撮穷途末日的阶级敌人毁灭性的打击。你们这个矛头究竟指向谁？这个“穷途末日”是在骂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徐州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大联合”。学院给你们说过要两派联合灵，一派不灵。可是你们就是不联合。或者联合一下就破坏了。你们两派光打内战，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斗、批、改的伟大任务不能落实，“九大”的路线，根本不能贯彻下去。在去年九月下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教育下，两派达成了大联合的协议。但是，到了十一月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以后，你们中间有些人借口“反二月逆流”，在徐州大搞什么“反复旧”、“反复辟”，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指向军队，使徐海班出现的大联合形势又遭到破坏。今年二月，在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徐州两大派大联合气氛又比较好。并且达成上交武器，停止武斗三条

协议。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回徐工作团”，返徐落实协议。但是你们有些人却极力抵制“回徐工作团”的工作。并诬蔑“回徐工作团”向群众的汇报提纲是彭真在徐州的二月提纲。你们这是什么话？你们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你们把中央摆在什么地位？并且提出要彻底批臭，使回徐工作团的工作很难进行，两派在北京达成的协议不能落实。今年三月，新沂等四伙在北京达成了三结合的协议，等中央首长接见后就回县建立革命委员会，但是你们中间有些人大肆破坏，胡说“各县搞大联合，三结合是为了孤立徐州，办不到。”你们在干于县召开两市七县踢派的串联会，反对各县两派在北京达成的革命大联合、三结合协议，胡说在北京的代表“右了”，“修了”，你们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把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把我们的红色首都，摆在一个什么位置？他们在北京学习就“修了”，难道你们就是革命的？这次会议对各县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严重地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五月中旬，钢山县踢派又借口什么“抓革命，促生产”，要搞八县的串联会，在地方机关开了一千多人的大会，说在学习班达成的协议吹了。还造谣说毛主席根本不可能接见徐海班。可是，五月十九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接见徐海班的特大喜讯传到徐州后，群众知道受了骗，就纷纷离去了。

目前徐海班、徐州两派还在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争核心，争资产阶级派性的权。中央明确地指示，徐州革命委员会要以现有革委会为基础，按着平等的原则，充分协商，进行改组。你们各取所需，歪曲中央的精神，支派抓“改组”，踢派抓“承认”。你们这样完全是采取各取所需的态度，而有些东西完全和中央唱对台戏。踢派在那里强调“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双方争执不下，互相扯皮。

你们中间有些人是大路不走走小路。在徐州有一种很反常的现象，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经常遭到歪曲和抵制，而资产阶级派性的东西、谣言、小道消息却畅行无阻，到处传播。你们这样做不感到很危险吗？你们这些做法不感到把自己的位置摆错了吗？你们就是不跟、不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按着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们对毛主席的指示，对林副主席的指示，对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你们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合你们口味的，你们就抓住不放，不合你们口味的，你们就抵制。使徐海地区的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如果你们要真正成为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话，那你们就要言行一致，应该很好地接受以前的教训。你们就要真正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九大”期间提出的加强团结，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坚决按着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认真学习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迅速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改变徐海地区的落后状态，紧紧地赶上全国的形势。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视察三大区的时候曾经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主席在“九大”会议上指示：我们“前生无冤，今世无仇。”我们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呢？毛主席号召我们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胜利。在“九大”闭幕以后，林副主席接见了各大军区的军队和革命委员会的同志，根据毛主席最近几次报道重要讲话的精神，着重的讲了团结的问题。林副主席指出、无产阶级要团结起来，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不团结起来，就等于不革命。一个要革命，一个要团结，两者缺一不可。无产阶级内部要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

当然，我们这个团结，是有原则的，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林副主席还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前面讲的是阶级斗争，后面讲的是无产阶级团结。要团结就是要从大局出发，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局部要服从整体、要顾全大局。大局，我们共同对敌，这是大局。我们内部搞好团结，搞好军民的团结，军政的团结，群众之间的团结，这都是大局。搞好文化大革命这也是大局。我们只有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才能落实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才能完成斗批改的伟大任务，才能将“九大”毛主席树为重要的指示和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九大”提出来的各项战斗任务贯彻下去。没有我们军队内之间的团结，军政之间的团结，军民之间的团结，没有人民内部的团结，要完成这些任务都是空话，因为不团结嘛！不团结就是空谈革命，就是口头革命，而且是不利于革命，破坏革命。

林副主席最近指出，我们希望我们国家兴旺，我们要依靠无产阶级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世界。林副主席指示，我们对敌人要狠，对同志要热爱。我们一定要按着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教导，我们要联合起来，要团结起来，完成“九大”赋

予我们的伟大战斗任务。全面的搞好斗、批、改，把徐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为人民立新功。我们相信，徐海地区虽然现在文化大革命情况比全国形势落后了一些，同志们只要真正按照毛主席的辅导，按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按着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去办事，后来的也可变为先进。我们希望徐海地区的军队，这里在座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要迎头赶上，把徐海地区文化大革命搞好。

今天我这个讲话，也可能有错误。有错误请同志们批评，错了就改。最后，我们喊几句口号：

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总理：现在，请李作鹏同志讲话。

李作鹏同志：

同志们，我没有准备讲话，主要是来参加接见同志们。

大家知道，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是非常好的，但是，在我们徐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了一个“老大难”地区。一直到现在，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也没有很好联合起来，没有实现革命三结合，没有很好的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没有进行整党建党，也就是说徐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是落后了，比起全国其他地区来讲，落后的很多，落后的很远。当然，应该讲清楚，徐海地区的广大群众是好的，徐海地区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但是由于徐海地区革命群众组织中间确实有少数人，由于没有很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没有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没有按着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资产阶级派性发展到极为严重的程度，发展到大大地干扰、破坏了徐海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再加上徐海地区我们人民解放军在支左工作中间，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缺点、错误。这样，造成了徐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处于很落后的局面。徐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落后，影响很大。不但影响了徐海地区本身，而且影响附近几个省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前进。广大的群众对徐海地区现在这个状态是不满意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徐海地区是维持目前这个状态，两派继续对立，继续搞武斗，继续既不搞大联合，不搞三结合，也不搞清理阶级

队伍，继续落后下去，还是应该猛醒，应该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党的“九大”精神的指引下面，迅速地团结起来，迅速地联合起来，迅速地把目前徐海地区的这个局势扭转过来，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急赶直追，争取同全国其他地区一起并肩前进。我想，我们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愿意维持目前这个状态的，广大的群众是愿意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按照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迅速地前进，迅速地改变这个落后状态。

大家知道，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号召我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相信绝大多数革命群众是会响应毛主席这个号召的，我们有一千条一万条的理由，大家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我们没有任何一条理由可以不团结，不联合，继续分裂？继续对立。所以经过同志们十个月的学习，在毛主席身边，在我们首都，在学习中间，大多数同志是有很大进步的。我们应该迅速地通过你们去把徐海地区文化大革命落后形势扭转过来，迅速地搞好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进行革命大联合，迅速地把徐海地区的革命三结合搞好，争取徐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其他地区一样搞好，争取更大的胜利。要迅速地纠正我们缺点、错误，克服资产阶级派性，认真地总结经验，认真地落实毛主席无产阶级政策。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按着毛主席思想，按着毛主席革命路线，按着“九大”精神办事，我们完全可以把徐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还在指挥你们两派大多数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并不排除极少数坏人，有些极少数不好的人，你们两派基本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到了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时候了。我们拥护你们都回去好好地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搞好革命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

刚才康老讲的对，徐海两派你们打来打去，跑来跑去，在全国的名声并不算好。可以说名声是很不好的。现在两派都应该脚踏实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各自多做自我批评，迅速地联合起来。今后，任何一派都不要翘尾巴，不要利用对方的缺点和错误采取报复主义。我们都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不要心血来潮，忘乎所以”。大家都为徐海革命群众在全国人民面前争取革命的光彩。（全场热烈鼓掌）应该很好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做好工作，补救过去的过错。

应该用事实来证明你们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模范的战士。未来的时间是允许你们能够取得这个荣誉的，你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争取后来居上。（全场热烈鼓掌）

庆祝徐海的同志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轨道上前进！（全场热烈鼓掌）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响应毛主席在“九大”提出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并且在行动上迅速地表现出来。（全场热烈鼓掌）

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徐海地区胜利万岁！（全场热烈鼓掌）

总理：

同志们，今天请你们来上一课。我想你们会同意这句话吧？（众答：同意！）首先这一课是出乎你们的意外，你们以为徐海两派这么斗，可以斗下去，为什么呀，军队里有两派嘛，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支持一派嘛，从青岛发出要“反复旧”的斗争嘛，这都是你们的资本，这都是你们押的宝。当然喽，这些思想都不是毛泽东思想，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可是你们硬是这么想的呀，不然怎么从去年七月到今年五月，没有解决问题。就拿我所接触的铁路上说吧，煤炭、电业上说吧，跟你们见过多次面，谈过心，达成过协议，亲眼看过你们签过字，并且组织了汇报团回去，也确实有些同志表现得很好，可是闹到最后呢，你们多数人还是跟着那些坏头头跑，把协议破坏了，铁路还是上不去，煤炭反而是下降，电力网经常受到干扰。整个淮海地区不是更加联合了，反而是闹得更凶了。连云港现在又闹起来了。徐州还准备大打。要说你们在北京不起作用吧，可是你们来来去去，来去自由。

这个时期还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时期。你们在北京经过了我们党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经过“九大”，经过九届一中全会。最后又得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接见。你们总算知道了一些情况了吧，这么多的喜事，不仅中国的人民欢欣鼓舞，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在那里庆祝。难道说你们到北京来一点感受没有？这是我们直接听到看到的嘛，报纸谈的最快，学习班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许多最新指示也经常给你们传达。“九大”文献、公报，我们伟大领袖极其重要讲话。林副主席政治报告、新党章都是在那里讨论过学习过，你说一点都不受影响吗？不能说，唉！可是呢，过去就算

了，你们的思想还是受着徐海地区那个地方的派性的影响。你首先不要说别的吧，就是这一次非常奇特的现象，“九大”刚开过了以后，四月十四号闭幕，当天晚上就报喜了。可是，你们没等四月廿八日的九届一中全会开会的消息，就从四月廿六日起，就有这么一股歪风，说是“九大”开了以后，各省都要回去较量一番。因此，两派的头头都整理行装，不告而走。逃的逃，跑的跑。

还有一个怪现象。本来打破头的，不在一起开会的，可是跑的时候互相支援，甚至互相送车票。这是怎么回事呀，这不是等于说，你们演的这出戏是反对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呢？反对我们伟大领袖吗？所以不怪刚才康老那样的严厉严词来责备你们，这是有道理的。黄永胜同志那样地苦口婆心、义正词严地说服你们，是有道理的。当然另一方面，我们陈伯达同志也很鼓励你们，这也是有根据的。情况是复杂的，但是我们首先想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全国广大革命人民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下一天天的迈步前进了，跟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滚滚向前，而你们呢，不是向前，而是后退的。全世界称赞我们这个划时代的“九大”开过，全世界的革命人民欢欣鼓舞。可是你们呢，要回去打架。要较量一番给中央看。这是什么心情，什么思想、什么动机？

同志们，深刻地想一想，冷静地想一想，在北京住了十个多月，最后演了这么一出戏，对得起我们伟大领袖吗？还算得起我们伟大领袖的学生吗？配称得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吗？这种行动如果严格地说，意味着以我们伟大领袖的背叛！！当然，这个背叛并不一定就是那些头头他个人起的作用，后头总有些人在牵连，在挑拨玩弄你们。但是你们不明白，现在该明白了吧。你们依靠，说山东是一派掌权，你们就可以得到山东的支援。无论如何不肯承认对方是革命的群众组织，要么就过去支派掌权，要么后来踢派掌权。现在劝你们联合，口头上是同意了，文字上达成协议了，可心里头，思想上没有通，还是想一派掌权。现在你的话没有了吧，山东的声音你们这次听到了，你们要见的几位同志都在场，这总不是假的吧。不是中央造谣吧，电报不是假的吧！

这次请王效禹同志、杨得志同志、张铚秀同志给跑回去的同志打电报，有一部分回来了，还有一部分说什么话，说这次电报等级太差了，不来。要中央直接发电报。那么，中央委托两个中央委员，一位军长传达中央的声音还不行呀？这

是借口！就是后头有人扯腿，不让他来。总之，造成一些幻想，造出一些奇怪的消息。

你们现在看，王效禹同志检讨了嘛，支持一派不对嘛，杨葆华同志说得很沉痛，而且很诚恳，“反复旧”是错了的，他要把这个版权收回。他承认了错误，要拿他那篇文章做反面教材，你们亲自听说了。这是一位山东的产业、工人，造反派，说这样的话是很光明磊落的，错了就错了，承认起来改了就好。

徐海的工人同志，革命同志，如果你们也犯了这样的错误，或类似这样的错误，应不应该向杨葆华同志学习呀？（众答：应该）是呀，这样了就会觉悟嘛，他们现在并不再去再坚持那个错误的“反复旧”运动了嘛。当然，个别的单位，有些复旧的现象，是会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前进中，总是不平衡的，是个别的现象，部分的现象。但是把整个说成是复旧了，那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前进呀，是后退呀，根本形势就估计错了，希望一派掌权，现在看来山东也不是如此。不过，掌权的造反派人数多一点，还有部分没有照顾到，还在外边。适宜现在还要补台呀，还要吸收进来呀，老讲保守，这个时代早过去了嘛，因为走资派早就打倒了嘛。

象山东就是很好的例子，就是山东第一号走资派谭启龙同志，他现在也改悔了，重新站起来做人，得到了群众的谅解，这也证明嘛。就是说过去保了的，现在头子都承认犯了走资派错误，跟刘少奇走，实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严重。可是，一旦沉痛地改悔，接受群众的批斗。重新爬起来，重新做人，我们伟大领袖还宽恕他，给他机会站到中央队伍里头来。这样的人都允许他改正错误，为什么两派对有些群众站错了队，并且早就不站了，早就回来了，老讲人家老保哪？现在不是革与保的两派，是两个革命组织，或者革的先一点，或者后一点，只是这个差别嘛，有什么理由可以把对方打成老保呢？走资派都打倒了嘛。

现在的问题是两派革命群众组织，怎么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争取胜利。你们能够设想徐州一派能掌权吗？徐州的运动过程就证明不可能。首先，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风暴以后，徐州的革命群众起来响应，夺走资派的权，三月十八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开始还不是有两派的造反派都在一起嘛。山东的就是济南军区的批准了你们，南京军区也批准了，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后来因为你们自己闹分裂，一部分人被排斥在外，变成踢派了。这就形成三

月十八日的革命委员会不完全了。这样的革命委员会就不容易坚持下去。那么，到了一九六七年七月，王效禹同志到你们徐州市，他那时候还是对的呀，说你们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你们联合起来。你们不听，后来。就发生了踢派起来把支派又赶走，先是支派把踢派赶出去的。到了八月卅一日，踢派又把支派赶走。这个时候，王效禹同志犯了这个错误。六十八军也犯了这个错误，但不是全部，一部分，因为军队也分成两派嘛。所以，这样子一九六七年地方上的两派也受军队两派影响；反过来又影响群众。所以八月卅一日那次武斗是错误的。那么这样子支派被赶出去了。后来，有那么一小股采取了土匪的行动，来破坏铁路，断路，断桥，把铁路桥都破坏。那个时候中央采取了断然措施。变成了六十八军，还有安徽的部队，合起来在一九六八年，大概是一、二月份的时候吧，只给那一小股一点打击，捉了一点人。那个时候的名字也叫“淮海八·三一”。因为他“八·三一”被赶出来，他就用了这个名字。但是，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八·三一”都参加了。不能把那一小股破坏铁路、抢劫车辆、抢劫物资，算在大家头上。

所以后来的踢派就单独地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喽，这就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那个时候就得到济南这方面批准了，南京就没有批准了，这就是第二个革命委员会了。那支派就更不服了，几次斗争，更影响军队，那么这里又搞了差不多半年，然后才劝支派回来，接他们回来。本来希望把支派接回来以后。踢派是掌权的了，应采取团结的态度，大家都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联合起来，那么徐海形势就改观了嘛。这是去年的事情嘛。跟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这么说过的嘛，是你们也同意的。但是始终搞不起来，军队开始的确也是轻一派，踢一派，都是济南军区指挥的部队包含守备部队。但是呢，也分成两派，搞得不团结，影响了你们。因此你们就发生了很多的幻想喽，就造成了答应了，签字了又不算数，又破坏。

一直到这一次“九大”以后，还发生这次错觉，错误地估计形势。你们就在北京不晓得我们在“九大”以后，中央解决山东问题，徐海问题。我想你们应该想得到嘛，因为里头有个张军长嘛，是学习班的组长嘛，你们看一直没有回到你们那里去嘛，今天才出面嘛，如果你们头脑冷静一点想一想，大概总是中央在开会解决问题吧，不然张铚秀为什么不见了。大概会有人说张铚秀撤职了，一定会有这个谣言。

不错，他有错误，他是比较偏“支派”的，虽然后来也参加了“八·三一”的那个镇压，但是他还是有偏向的，但是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他就检讨了嘛，多次检讨嘛。我都听过嘛。在铁路会议上、在煤炭会议上都讲了嘛，就是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揪住不放，非打倒不可。甚至把我们整个人民解放军，在徐海地区，就是刚才我们康老讲的，伟大的淮海战役产生那个地方，二十年前，光荣的历史都不想，就是把我们现在解放军在徐海地区造成什么样子？你们想一想，我都不愿意说，是敌人的话。大标语、口号，成什么样子？你们说这是个革命派吗？革命派把矛头对着人民解放军？把矛头对准革命领导干部？把矛头对准广大革命群众及对方？这称得上革命造反派吗？那是不够格的。不符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提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要求。

所以，这些事情你们都得很好地想一想。不要说，这个话本来是一年多前，两年前不到一点，毛主席巡察三大区的时候发表的一九六七年七、八、九三个月的讲话里讲了的嘛，刚才许多同志念了的。这些话我们背的很熟嘛，可是就是不听！所以难怪乎黄永胜同志、康老那样子愤怒。

你们还口口声声说听毛主席的话，那里听呀！就是听那小道消息，歪风邪气，错误地估计形势，要资产阶级那套作风。不是认真的埋头学习，把毛主席的书读好，把形势研究好，真正地跟毛主席干革命一辈子，不是这样下定的决心。不然，一哄走了一批，一哄又走了一批。我看这一次该是你们明白的时候了，给你们上了一课吗，跟你们估计的相反嘛！现在山东造反派头头，革命领导干部，解放军的领导同志，都起来自己做检讨，劝你们两派好好的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联合起来，实现真正的革命大联合，实现真正的革命三结合。

现在看起来，我去年跟铁道、煤炭、电业上所说的那些话，现在我们谈的那些要求，是最低限度。那时我们是这样承认的嘛！在革命委员会现有基础上，就指的“三·一”革委会嘛，采取平等的原则，通过充分的协商，实行改组嘛！大家都记得这四句话，记得不记得？当场都赞成呀，回去就翻了，说根本不能一道一起来参加革命委员会。“唯我独左”，革命委员会要领导一切。不错，革命委员会是一元化的，领导一切。但是上边要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准呀！承认呀！如果犯了错误，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有权力改组它呀！你们如果不信，你们看一看“二七”工厂。

我刚才问了聂济峰同志，我们学习班这件事没做好，带你们参观了“六厂两校”，就是没有参观“二七”工厂。“二七”对你们最合适了。“二七”也是开始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被推翻了，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现在又不行了，这一次才真正的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实现了真正大联合的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是三次革命委员会。你们才两次，所以还得搞一次。我现在看，我提的那个办法还低了，你们不要以为那个时候没有实现，现在还要中央给你们让步哇。你们想一想，你们不信，从明天起，或者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这幺多，你们还考虑考虑，酝酿酝酿，过两天到“二七”厂去住他一天、两天，好好地认真地学一学，就会懂得了，为什么一派掌权搞不好的。因为毛主席说过，你们读过语录嘛，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这样。人的思想总是左中右嘛，那有那么一致的呀！一派里也有左中右嘛！没有清一色。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要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学，要有这个气概。要与同我们不同意见的人，不同观点的人合作。当然前提是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伟大领袖领导下的革命委员会。我们在这里面合作，不仅两派，如果两派以外，还有逍遥派也要与他合作，联合起来嘛，才有力量嘛！

林彪同志说了嘛，要革命最后就是要达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共产党宣言》最后的口号。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的口号嘛！怎么能够分裂呢？一派为中心呢？一派唯我“独左”，唯我“独尊”呢？这不可能嘛！明知道不可能。给你们单独谈话，分别谈话，冷静的给你们谈，你们一口同意。一到起哄的时候，就要闹，那是一股什么力量指使你们？不是毛泽东思想。你们如果真正接受毛泽东思想，好好地想一想，你们这些行动都是违背的。是什么力量在后头影响你们，你们自己好好想一想，总是有坏人说坏话，歪风邪气，总有造谣生事的人。从那里来的，你们自己去检查，我们不乱扣帽子，但一定有，也许在北京，也许在你们本地，也许在别处。

一九六七年是“三·一八”，那么一九六八年是三月一日，头一个是两边都批准的，后一个一边批准喽！所以，难怪你们就偏了。你们想一想，当然我们去年下半年给你们谈的时候，还是承认这个“三一”的基础上，是不是？你们有了个“基础”因此就回去贴大字报。就说“一切权力归三月一日的革命委员会”。

还是一派的委员会，一派的革委，派性的革委，我现在给你们起个名字。我现在可以说这句话了，经过半年多的考验嘛！原来承认在三月一日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上，根据平等的原则，并不用对等两个字，我们用的是平等嘛，并不一定对等人数，通过充分协商，实行改组。

我现在看起来呀，我这个人虽然生活了七十多了，但他还太老实了，不晓得你们花样太多，当场签了字，不算数，那我现在要严一点了，我现在学康老和黄永胜同志，因为你们“三一”革委会是个派性的革委会，我加上这个头衔。那是不是三月十八日的那个，一九六七年的那个，就不是派性呢？也是派性。我不偏到那一边，我超脱一点，两个都是派性。派性革命委员会是站不住的，非改组不可。不信你们去看看“二七”工厂，最后现在改组的很好了嘛！这个问题呀，你们应该在思想上得到解决，解放开来。所以我刚才说了同意伯达同志给你们的鼓励。

你们这么多群众在场，一千多人嘛！当然其中也有军队的同志喽，还有部分干部，但是，毕竟造反派的同志占多数，你们只想一解放，想通了，绝大多数同志还是好的嘛！还会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难过一看就是喽！青年人犯错误是允许的嘛！错了改了就好嘛！我们年青的错了还允许改嘛！毛主席的伟大的政策嘛！无产阶级改革嘛！所以，责备你们也是为的爱护你们，鼓励你们也是为了爱护你们，目的就是一个，就是要你们改正错误，端正态度，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

但是，我们说了这番话不是逃避责任，就拿中央来说，我们抓这个徐海工作抓的不紧，有时过问，有时又丢了，你们闭得不可开交嘛！过问了，搞别的事情了嘛！以前也派过工作组到连云港去调查尽管调查的时候是超脱的，不管“公社”派还是“反到底”派，我们都接触的，都承认是革命群众组织。但是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撤回去了，不然要陷进去，要犯错误。这是抓的不得情，有时抓得不紧，有时抓得不得情不能解决问题。

对军队来说，军队也是分成两派。调到北京来学习，我们伟大领袖委托军委办事组黄永胜总参谋长为首的召集他们开过多次会，批评他，他们已承认错误。但到了学习班还有一部分人不通，但张铚秀同志开始通了，通了也不行呀！通了他带着郑统一两人一道回去，踢派还是要打倒，管你通不通。你反正张、郑两位

统统打倒。那你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吗？怎么法子能团结合作呀！就象着了魔似的。这是这方面。

但是另一面，如果支派比较能够早一点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你动手我不动手，就是吃点亏，我还是坚持原则，那也可以不致于两派闹的这样对立嘛！现在不是因为部队总有一部分过去跟支派熟的呀！因为从一月风暴以后就接近的嘛！好，有机会总可以搞到一点枪，用来打几下子。好，你支派一打，踢派伤人，更闹的凶了，说现在徐州就要被包围，又要打起来了。（黄总长：布票问题现在闹得哇哇叫，发不下去）布票发到了徐州，一派要掌握起来不下去，简直是国家什么权力你们也要拿了去，报馆拿了去，公安学院不能行使职权。这不是派性革委还是什么革委？反正你这个革委呀，为什么我们不要你们都管，要军管呢？因为你们做事不公道嘛！所以要六十八军来管嘛！你们不听，你们要三月一号的革委会，要管一切，连军队也要管，这行吗？这个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专政工具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支柱嘛！保护者嘛，你们都要反，那我不能不替解放军说九句话。我们解放军实行“五不”的呀！如果不实行“五不”，早就解决了问题嘛！因为你们都是群众，我们不采取这个办法。“五不”政策，是我们伟大领袖批准的，我们人民解放军，包括六十八军在内，可以说完全遵守的。打伤了，遵守政策。你们这样欺负，晓得解放军不敢动气、动手、动抢、你们就抢武器，双方抢。

但是，这个事情总是要有个底的呀！“七·三”、“七·二四”布告难道在你们那里就没法实施呀！如果这一课你们还不觉醒，那“七·三”，“七·二四”布告总有办法在徐海地区实施。因为在广西情况改变了嘛！在陕西情况改变了嘛！在全国情况都改变了嘛！才实现去年九月初的全国山河一片红（除台湾省外），那为什么单单的在徐海地区我们就不能实施“七·三”、“七·二四”布告呢？我们说广大的群众会听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新的党中央的声音的，你们只要不听，总有一天会把你们孤立起来的。

我们相信在场的接近一千位的革命群众，绝大多数总是会说得通的，所以我们把今天作为一课给你们上的，不是打算今天马上解决问题，就是使你们认识过去那种设想是错误了的，跑到山东去拿点抢来，现在拿不来抢了，到山东搞点粮食，不会给你们，专人到山东还劝你们回去。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地闹革

命，归口闹革命嘛！按系统、按学校、按阶级、按机关嘛！组织起来嘛！使路要脱钩嘛！过去铁路，因为济南铁路也是插手徐州的事情，所以铁路局就受影响。现在检讨了嘛！济南铁路局他要改嘛！他不能插手徐州铁路局的事了，煤炭也是一样，电力也是一样，这些问题都要解决。

所以在解决以前先趁着山东省革委会，济南军区，山东“九大”代表没有回去以前和大家见一次面，把真象都告诉你们，我们采取毛主席说理政策，老老实实告诉你们，我们决不欺骗你们。我们说这个时候，是解决徐海问题的时候了，应该开步走了，不管那一派。

批评踢派今天说得多一点，但是，支派也不要翘尾巴，如果现在踢派认识了错误的话，支派不懂得自己也是一样有错误，开始你们先赶的踢派嘛！反过来他们又赶你们嘛！破坏铁路是一小撮人，那件事情总是不光彩的。当然我们不会牵连你们的，所以支派同样有缺点错误，要好好一样反省，多作自我批评，这样做才能联合起来。谁也不要翘尾巴，谁翘尾巴错误就要犯得快，矛盾就要转化到你那面去了。

尤其是部队，今天张铚秀同志又一次作了检讨，杨得志同志也说了些大军区应该负责的话，我也代表我们在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的中央工作的同志，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也给你们承担起来，时间拖得这么长，刚才伯达同志也作了自我批评嘛！凡是应该负的责我们负起来，不能推到你们身上，但是现在是解决问题的时候了，整个徐海班、铁路班、煤炭班、水电班都应该急起直追了。山东代表团他们就要回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形势要大好转了，本来就是好的，现在更好了，把徐海就孤立起来了，还不解决呀！徐海能够就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的中国版图上，就这么一个独立王国，独立下去，独立得了吗？！不会的，广大革命群众不会跟你们走的，如果那么想，这样想的，只是极少数头头，多数会相信，听明白了这个道理，会感觉要改正更新了。所以今天各位同志讲的话，从山东的三位同志，王效禹同志，杨得志同志，杨葆华同志，六十八军张铚秀同志讲话，还有我们在中央工作的黄永胜同志、李作鹏同志、康老、伯达同志讲的话，我都同意，我补充这么一点，提醒大家。

我们现在解决徐海的问题了，希望你们好好想一想，我们大家一道来解决，我们应当负的责任，担负了，我们来补偿。你们呢？大家都在“九大”以后新的

形势面前，根据毛主席在“九大”的号召，我们本着团结的愿望，多做自我批评，以及相互的实行批评，这样在“九大”的精神和毛泽东思想原则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团结好不好？（众答：好）那么我们下定决心，应该下定决心的时候了。我们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困难，去争取胜利”这段最高指示来结束我的话。（全场长时间热烈鼓掌）还有那位要讲呀！没有。我们唱个歌好不好啊！团结起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都应该最后达到团结嘛！还有反对的呀？（众答：还没有包含那位女同志啊！我们教育你，还是团结你，方杰同志。）

（周总理亲自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长时间热烈鼓掌），（周总理宣布散会。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首长审阅）

来源：有关一九六九年清算批判王效禹运动的二十五件史料·根据“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徐海班整理”原件刊印。

一九六九年六月五日，王效禹传达的中央首长与他谈话的要点

首长开始问了王效禹山东的形势，

张春桥指出：1、根本上的问题是群众的组织缺乏阶级分析。这个问题前段有些察觉，最近看得清楚了。群众组织总是有左、中、右，初期是统一战线的形势，你（指王）缺乏阶级分析，都看成是左派，这是错误的根子。2、毛主席六七年对你（指王）有句话，你想不想的？（六七年张春桥、姚文元到济南时亲自向王讲：毛主席说：相信王效禹不做蠢事。）王效禹答：想的，但行动时忘了。

张春桥讲：看来你忘了。第一、你是军区第一政委，第一书记，即使军队工作有问题，你是什么态度？有问题你应首先承担责任，你对部队的态度是错误的。第二、从“九大”会议看，你没有自我批评，你讲的话，公正人的评论：前段，中段还好，后段又做了解释，看来你没有自我批评。

康生同志：同意张春桥同志的意见，从你（指王）对杨恩华的批评就看出你的错误是严重的，缺乏阶级的分析。

在问了王“反复旧”的情况后指出：复旧 15-20% 是正常的。又指出：前年部队犯了错误，作了检讨，毛主席有个批示：“早检查比晚检查好……。”你想到没有想到，今天轮到你身上了，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

王效禹答：我脑子很乱，回去考虑。

周总理插话：你的骄傲更加突出，私字很多，旧东西很多，在主席跟前有什么要讲清楚。

康生同志：我们查了一下你（指王）的历史情况，你就是缺乏阶级分析。如：不是党员可以做检查员的观点是错误的，对某人不同意是右派也是错误的，今天你有了权就更容易反复。这是阶级立场、阶级观点问题。

伯达：两年来破除了两个迷信：一个是孔老二，一个是破除了资产阶级政客的迷信，听小道消息。

来源：有关一九六九年清算批判王效禹运动的二十五件史料 • 根据未注明原编者及编印时间的原版印刷件重新刊印。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四日，杨得志在济南军区会议上的讲话

杨得志在济南军区南郊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杨得志：济南军区司令员〕

最高指示

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

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

我全军将士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同志们：

上面袁政委、穆林同志发了言，我表示支持。我们这次会议通过传达学习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首长的重要指示。通过学习主席批示的山东问题十条，小组讨论，大会发言。大会到会的有军队师以上的军政干部，地方地、市军委负责人。今天会议要结束了，现在我讲三个问题：

一、这次大会的基本评价：

我们这次大会是在全省军民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大旗，认真学习、贯彻“九大”精神下召开的，是在毛主席身边、在中央举办山东问题学习班之后召开的，是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是紧跟中央的。通过对毛主席和中央批示的山东问题十条措施的学习和贯彻，我们遵循“团结一批语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下召开了这次大会，取得了成绩，会议开得好。

1、认真传达学习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首长的指示和山东问题十条的批示，大家受到了极大的教育，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一致认为：“九大”以后解决山东问题，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全省军民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首长的指示和中央的批示是非常及时的、英明的，打中了山东问题的要害，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对彻底改正错误，落实政策都有很现实的意义，一致表示坚决拥护、贯彻。

2、本着毛主席“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教导，大会采取了摆事实，讲道理，着重揭发批判了省革委会负责人的错误，大大增强了以毛主席为中心的团结。在十二中全会以后有很多人提出：

为什么十二中全会精神在山东不落实？

为什么山东广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团结不起来？

为什么有些地区长期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

为什么山东局势老不稳定，反复多？

为什么斗、批、改搞不起来？

为什么工农业生产上不去？

通过学习，大量揭发，认识到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严重错误，破除了他的迷信，认清了事实的真象。过去受蒙蔽的同志，大胆揭发，并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检查。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在大家的帮助下，对其错误有所提高，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山东问题是非常了解的，是看得很清楚的，分清了是非，加强了团结。

3、对以后落实十条打好了基础。为了纠正错误，军队、各地回去要很好研究措施，进一步加强团结。对于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都是错误的。到会的人觉悟

有高有低，认识有深有浅，省革委主要负责同志检查一次比一次提高，但由于和到会的同志要求有距离，要有一个过程，要通过学习斗私批修来解决。

二、关于山东文化大革命的形势问题。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首长对王、杨、袁三同志报告的批示，是为山东文化大革命指出了方向。这个批示告诉我们，首先肯定了山东文化大革命形势是大好的，是广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取得的结果。同时指出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扩要负责人自八届十二中全会以来，进行了“反复旧”，犯了严重错误。山东形势大大落后于全国形势。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大好形势，把山东形势看成一团漆黑这是错误的，防止光看大好形势，不看到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错误的严重性。

我们要迎头赶上，我们必须按照中央批复的十条，即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是从斗争中求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团结。

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在青岛和山东夺权关键时刻起了很大作用，应该肯定。但是由于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在前进道路上犯了错误，特别在十二中全会后，在全省搞了“反复旧”运动，大搞独立王国，大树个人威信，大耍两面派手法，挑动群众斗群众，把矛头对准人民解放军，包庇重用坏人，破坏斗、批、改的进行，破坏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大耍资产阶级政客作风。

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的严重错误，不只是他一个人，其他同志也有，我也有错误的。我几次看到他的错误后，总是肯定他的成绩，对他的错误帮助不够。有一次我和袁升平同志同他谈心，三个人谈了五个小时。对他的缺点有所察觉，有过斗争，但对他的帮助还是不够的，这次中央对山东问题作了多次指示，认识到省革委主要负责人错误的严重性，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作为军区的第二政委把矛头指向自己的军队，是我当兵以来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过去我对他有些问题有察觉，有些问题没有察觉，这是党性不强，私字作怪，怕字当头。

例如谭启龙同志的问题。省革委在传达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的时候，就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当时我想提出来，但又怕人家讲我和袁升平同志过去是保谭启龙的，现在又为谭启龙说话，因此没有坚持这个原则。我和袁升平同志在文

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思想保守，造反精神不强，对谭启龙犯有走资派错误认识不清，犯了错误。以后，对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的错误坚持原则不够，有些问题上我说了一些捧场话，在这个问题上讲，是对毛主席的不忠，对山东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损失，我是有责任的。又如王新阳同志是省革委常委，在“反复旧”时关进了监狱，一关关了半年。作为我是一个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把一个常委关起来我还不知道，第一次我和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谈起王信阳同志问题是时，他说：王新阳在济南插手，第二次我又问他，什么理由关起来，他说王新阳有问题，但什么问题避而不谈。这样我就不好讲话了，这次王新阳同志对我的批评，我完全接受。

三、关于全面落实毛主席党中央对山东十条批示的几点意见：

有一个说明，这十条不要大家说什么“红十条”，因为我们三个人打的报告中央有批复，若干没有毛主席和中央的批示，人家又要说“后十条”、“黑十条”。

1、传达范围：地方传达到公社革委一级。分一步走，还是分两步走，你们自己研究决定。杨葆华同志提出青岛分两走，你们自己考虑。地革委是否分两步走，你们自己考虑。如果分两步走，第一步的时间不要太长。军队文件发到营党委。十条文件不是什么机密文件，连一个秘密也没有。文件扩大一下可以传达到排级干部，军区机关已传达到全体干部。

2、传达内容：经请示中央负责同志，传达毛主席的批示，中央的批示，十条措施可以传达。对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的错误事实不要扩散，可以向师级党委把主要内容大体说一下，但十条措施一定要贯彻下去，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的错误事实不要全部端出来。

3、全省“反复旧”所造成的严重错误，由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负责。他把矛头指向我们，我们不好说话。河南刘建勋、纪登奎、王新三位同志的意见我同他讲了，我说他们提的和我们不一样，王效禹说上海和浙江都搞了，反复旧还是对的。山东“反复旧”是从上而下，不象河南的“反复旧”是从下而上。在“反复旧”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斗争了的，但是抵制不力。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层层过关，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上面一犯错误，下面跟着倒霉。

4、凡是由于“反复旧”引起革委会成员的变动，原则上以“反复旧”以前为基础，适当充实、调整，还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但是正常的调整不在此例。

5、这次纠正错误主要是“反复旧”以来的错误，对于历史的错误，原则上不要提。历史上的问题是次要的，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要在落实政策、搞好斗、批、改过程中解决，要以“九大”为一条线，对过去的问题作为教训来接受。

6、不准串连、不准搞什幺联合行动，不准重拉队伍另立山头，不准张贴互相攻击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不准以任何借口，擅自脱离生产岗位，农村不误农时，抓好革命，促好生产。林副主席说：“不懂得一个时期该抓什幺，非犯错误不可”。

下面是落实措施的几点意见：

(一) “三支两军”人员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要提高革命警惕，防止一小撮阶级敌人捣乱破坏，保证社会治安。

(二) 深入学习主席和中央的批示，提高认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切实落实政策，这是是否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对主席忠不忠的考验。当前团结不好主要是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所造成的，我们必须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照顾大局，稳定局势。今天我们批判了他，希望他能改正错误，妥善解决山东问题。

(三) 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落实无产阶级政策，要政治挂帅，要教育部队“五下一宣传”，作好思想工作，不要支一派压一派，要巩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

(四)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不要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在一个时期总有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对人对事对自己要以毛泽东思想来分析，对省革委主要负责人要一分为二。不要否定山东大好形势，应该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准。对跟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犯错误的同志也要一分为二，希望他们同他的错误划清界线，犯错误是难免的改了就好。

(五) 决心排除干扰，保证中央批示和十条的落实。对革命队伍内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要进行帮助教育，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轨道。

(六) 要作好落实毛主席批示和十条的模范。对部队要做好思想工作，稳住部队，要坚决支持各级革委会，对他们的错误，不要揪住不放，协助地方同志

把下一步工作做好。严格按照八三四一部队“三个原则”，“九个一样”做好“三支两军”工作。一定要吸取教训，不要轻易表态，重大问题要请示报告，处理问题不要轻易，一定要谦虚、谨慎，发生问题要敢于承担责任。要遵照中央的指示，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要防止阶级敌人捣乱，做好地方工作。我们是毛主席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要防止帝、修、反侵略我们，我们要做好准备，有了准备我们就不怕。

（口号略）

来源：有关一九六九年清算批判王效禹运动的二十五件史料·根据未注明原编者及印制时间的手刻油印版历史文献重新刊印。

一九六九年七月五日、七日，中央首长接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东班时的讲话

七月五日晚九时零十分至六日早一时零十分，中央首长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文元、永胜、法宪、叶群、作鹏、登奎接见山东学习班李水清、何志远、李遂英、郑洪五、韩金海、彭士杰、杨恩华的讲话：

康老：到北京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中央办的，思想认识要清楚，是根据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办的，领导小组的组长是林副主席，学习班是党校性质的学习班，不是派性学习班，不是群众组织学习班，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九大”之后召办的第一个学习班，是在新的形势下办的，虽然有个别同志不是党团员，绝大多数是党、团员，要加强党性教育，把山东具体问题先抛开。

江青：要学党章，明天就要学。

康老，你们组织参观先慢一点，先从党性开始，以共产党员的角度来想问题，都要鉴定一下，每个人都要写一个简历，家庭怎样，什么出身，干过什么，什么时候入党，刘崇玉要写自传，看看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刘老师”。开头一课把党章学好，先承认党章，有些人对党认识很差，要补上这一课，入党没有正确认识，这怎么行。党章要逐条逐句学习，有的要背熟对照检查，党纲是最大的毛泽东思想概括，共有几条，三、四、五条都要好好看看。党章是很多人鲜血的结晶。你们考虑一下，是否按党章办事，新党员很多，连党的基本知识都不知道怎么行。

江青：要改造我们的学习，好好的学。

康老：五十字建党方针，要很好学。

江青：你们要很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总理：主要学毛泽东思想，你们学好了，把整个学习班空气可以变过来。你韩金海、彭士杰、杨恩华说是代表群众组织讲话，你们不以党性为荣，以派性为荣，这是错误，加强党的领导，建立党的组织。

中央首长说：学习班要建立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学习班建立临时党委，各连建立支委会。学习班领导小组是行政领导，经过一段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好了，可以吸收几个人到领导小组。

至于党委成员，康老说：韩金海、彭士杰，杨恩华不能参加，把党的组织建立起来，提高党的威信，一切事都要按高的标准来办事。

中央首长严肃批评：什么对（省革委会党的）领导核心小组也要搞“三结合”，这有什么三结合？这是糊涂思想。山东笑话多，出怪事，孔夫子思想很有市场，讨论“九大”代表时，杨葆华也提出三结合。韩金海、王竹泉提省核心小组也要三结合，还要经过省革委讨论批准。你的根本不知什么是共产党。杨得志同志给你们解释不听，还反对，过去王效禹一个人说了算，现在几个人说了算，有什么不好，这是党的原则，同王有根本区别。核心小组要三结合，把三结合带到党内来，党内搞什么三结合，还要经过省革委常委讨论。这是错误的。党的核心小组是对中央负责的。

现在有人叫我们是“军政权”，这是要抓住好好批判。

有人说军区夺了我们的权，学习就是要架空我们，这是王效禹的思想流毒没肃清。军队夺了权，否定了你们夺权，这是苏修的论调。

调查一下，学习班 500 多人中有多少党、团员和非党、团员。要抓党的工作不突出党的领导，很可能说是军政权，你们听起来不顺耳，不符合你们山东观点，你们代表群众组织吗？对我们有意见可以驳，党章不能驳只能学。

江青：你们的一些作法，我有不同看法，和你们的观点不同，我是山东人，可以开除我。共产党是与阶级敌人作斗争的，党性是很重要的问题，有些党员降低到群众水平。

康生：你韩金海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党章第五条是什么内容，你是九大代表吗？（韩说：我忘了。）党章第五条是民主集中制……。五条是针对资产阶级派性的，这是最重要的，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要按党章办事。第四条是党的纪律，三条是接班人的条件，有的没审查就入了党，这是组织不纯，思想上大部分都没入党，必须要端正，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把党性降低到群众，甚至落后于群众，说你们是群众组织的头头就高兴，说是党员就无所谓。

杨恩华，韩金海反对你，王效禹把你抓起来，愿意改就好嘛。要团结，共产党员起码有党的知识。为了革命，才找一个党，我们和你们走的路不是一样，我们是在白色恐怖下入党，把生命都交出来了，你们入党是为了坐官。

总理问彭世杰：住几间房子，合多少房租？

江青：有卫生间没有？

伯达：省革委一宿舍是糖衣炮弹，最危险，要搬出来，否则成了个官僚机构，“九大”回去后，回工厂参加劳动了吗？不劳动就没有代表性，你那时不是党员，要有工人本色，否则很容易变成“工人贵族”，比方英国的工党完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当彭世杰说还有群众在里住时）

黄总长说：真是笑话，上海学生都到黑龙江去劳动。

（总理问：）韩金海你脸上无精打彩，精神不对头。你在去年的济南政工会讲话很生动，什么“刘老师”，真是雷霆万钧之势呀。结果搞错了。刘志师、孟庆芝是什么玩艺儿？孟庆芝一会把你吊在天上，一会把你摔在地上。孟庆芝是干什么的，是济南文攻武卫总指挥。

康老说：是恶霸，是国民党。

江青：她骗了我（指刘崇玉），和她一起照了像，我让王（效禹）把她抓起来。

当某某说把王效禹比做山东的毛主席，把刘崇玉比做山东的江青时，

江青很生气地说：造谣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头上来了。建立青年班子，搞青年班子的实质是什么？怪事，把老干部都赶走了，只有青年人才革命，你们这次来京学习，就是要和王效禹划清界限，韩金海说没出路，什么是出路，向党靠拢

就是出路，搬出一宿舍就光彩，不搬就不光彩。（向杨恩华：）脱离几年劳动了？（杨：做三年工，两年文化大革命中没劳动。）

你韩金海来这里检查，揭发错误，有什么包袱，你遇到问题总是为自己辩解，你的检查看到了，有微小进步，欢迎，思想不能一下通。你是原则抽象检查，具体否定，没有触及灵魂你党性很少，资产阶级派性很多。

说彭士杰，你把家都搬来了，住在一宿舍失掉工人阶级本色。

说韩金海，你六六年睡地铺，现在住七间房子，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不要都是为官、权。最主要的是不要忘记是共产党员。那些官、权是王效禹的糖衣，要注意。

总理：你们错误很严重，来了要好好学习，青年人缺乏经验，改了就好。你在南郊会议上发言了吗？（问韩）你发言两次，检查不深刻，群众不满意，上纲高了怕丢官，低了群众不满意，这是自然的。

工宣队进驻省革委生产指挥部，你（韩金海）把穆林搞下去是错误的。（韩：我只管几天）

康老：把生产系统搞乱了。你思想不对头，管一天也不对，是革命政权，张美智是谁推荐的？是王效禹提的，还是你提的？问你三次你都抛开不谈，张美智是两次判刑，你总是躲躲闪闪的。

问郑洪五，你们文革有多少人？干什么？

江青：比我们中央文革的人还多！你们省革委会是干什么的，厅、局存在吗？

谈到刘长茂、朱文至今不来。

总理说：下个命令马上来。

有的人说学习八小时，时间长。

中央首长说：我们一天工作十六小时，十八小时也不止。

叶群：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星期天，根本就不过星期。

康老：总理都七十多岁了，还日夜工作。

七月七日晚九时，康老、李作鹏在山东学习班领导小组呆了五个多小时。主要是亲自处理打人事件（七月二日，红旗区文攻武卫的头头打了一个揭发问题的民警傅存贵）。

开始问了生活情况，问的都很详细。学习班有多少文攻武卫？有多少是反复旧上来的？有多少受压的？有多少人挨打……

有多少党员、团员，非党、团员各有多少，都是什么时候加入的，是否填表了，填表了批准了没有？主席在延安时讲：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入党。反复旧后入党的人有的组织上也没入，还是通过私人关系拉进来的。

学习班临时党委要小点，有些人去年 12 月才入党的，连党的起码知识都不知道，在研究山东核心小组时，这些人把党的性质都没搞清。党、团员和非党、团员都要把他们的历史写出来，要增加这样一个任务，增加整党建党，吐故纳新。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必须注意事项，是毛主席批准的。汪永康（打人的）是什么人？是党员吗？在红旗区干什么？……不但自己看，还叫别人去看，这样的人群众对他们不会有威信。今天看到你们的打人的打告。五日去汇报时你们忘掉讲了。我今天批了，已去传阅，我批了四条意见。那个笔记本都记的什么问题？不管什么问题，何必偷看呢？印出来大家看，偷看的动机、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打人？还弄一帮人去偷看。把文攻武卫这一套搬到学习班，是流氓、恶霸，是党纪国法不容的。偷看笔记不对，打人更是不对，打人胡金杯在扬吗？（红卫区副主任）？不允许把孟庆芝文攻武卫带这里来，严重性在这里。孟庆芝文攻武卫像个什么样子，就是国民党，和国民党没有区别。

问汪永康家庭一些情况，在山工总什么职务（他含糊其词）说是服务员。韩金海说是小头头。问他几年没劳动了？汪说，我礼拜天回去。康老说，那不行，回去是活动。你怎么认识孟庆芝的，和他什么关系，谁叫你到红旗区去的，有枪没有？“反复旧”抓多少人？打死多少人？他结婚时你送礼没有，参加婚礼了吗？孟庆芝是什么人，是坏蛋，很坏。为什么让你当头头？你们拿文攻武卫在中央面前示威，你们干坏事，还不让人揭发，是杀鸡给猴子看，把你们反革命暴露了，打错了主意。本应痛改前非，还孟庆芝的威望，在中央面前镇压群众，把十条看成一条空文。要检查，批判错误行为。两个星期就露原形了。

孟庆芝、张美智在济南干了多少坏事，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不划清界限，到中央来继续干，破坏纪律。写自传写清楚，你们是干革命吗？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过去这种影响，王效禹有责任，山工总有责任，韩金海有责任，造成什么后

果，孟庆芝是坏蛋，你们跟他胡闹，是反革命，把档案弄走了，是包庇自己，是包庇反革命。

在学习班，有些人对王效禹的反动思想没肃清，什么被“和平夺权”，“被架空”。王效禹反军，不相信解放军，不是今天，已很久了。学习班就是解决山东问题，就是架空，因为有资产阶级派性。

（不完全，供参考）

来源：有关一九六九年清算批判王效禹运动的二十五件史料[根据未注明原编者及印制时间的手刻油印版历史文献重新刊印]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九日，康生姚文元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东班负责人的谈话

康生姚文元等对山东在京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负责人的谈话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九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参加接见的中央首长：康生、姚文元、李作鹏，陪同接见的有聂济峰、贺盛柱同志。

中央首长讲：召集你们来谈谈学习班的情况。有些什么问题？哪位同志谈一下？听说还跑了个红卫兵？是中学生还是大学生？毕业了没有？家在那里？是否回了家？真有病还是借口？学生为什么要跑？对家庭为什么那么关心？（李水清、李遂英、何志远三同志先后汇报了学习班的情况，李汇报到：已对汪家康、陈英打人事情作出处理决定时，你们的决定经全体学员讨论过没有？（李汇报到在各连已成立党支部时）啊，你们支部已成立了。有些问题支部开会，一种是党员开会，一种是党员开会还可以吸收群众参加。（李汇报到山东发展党员有些问题时）这里面可能有的人不够资格，也有的够资格手续不完备，不是简单的组织手续问题，而是关系到建立一个什么党的问题，不是填个名就行了。

不管哪个同志，应用毛泽东思想来看这个问题。要联系到世界上修正主义的党的问题。好多修正主义的党是这个问题，如日共，宫本显治那个党，宣传在东京议会选举中觉得到了很大胜利，过去有九个议员，现在有十八个，增加一倍。日修大肆宣传、包括某某的报刊也大肆宣传，实际怎样？宫本党的方针，把一些人拉到党内来，写上党的名字，干什么？就是选举投票。用通讯的方法也可以成为共产党员。另一方面，有一个地方好象个站一样，谁签一个名字，也就是一个

党员。如拉美修正主义的党就是这样子，他宣布支部不开会，根本不过组织生活。法国青年团在某个晚上开个音乐会，在某个地方开个舞会，这就算开了会。苏修召集七十五党开了个黑会，根本不叫共产党，这些党也不是工入党，也不是共产党，连个社会民主党都不如。宫本显治的党连社会民主党都不如。这个问题是涉及到建设一个什么党的问题。国际上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国内有刘少奇的建党路线，这个问题的确又要严肃，又要谨慎。我看到你们一期简报，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讲过：讲有些人在组织上入了党，在思想上没有入党，现在山东有的组织上也没有入党，这个问题应当严肃，按党章办事，不是马虎。

(当汇报到张景才入党没有批准手续时)现在你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呀？韩金海你怎么看这个问题？(韩答：在大会上杨恩华宣布过……)什么大会？张景才还不能算入了党，按党章应如此，在“九大”刚刚通过的党章，我们不能破坏，在开会时可以叫他到席，但不能算是党员。韩金海等八个人已经入了小组了，但必须认识是不符合手续的。进驻省革委的工宣队怎么能批准？你们不要振振有词，你们这样马虎下去再遇到整风、审干要吃大亏，后患是无穷的，对你们政治生命是个大问题。虽然支部把你们编到里面去了，但是不合法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叫工宣队批准呢？那不是孟什维克党了吗？怎么能把党降到工人组织？你们不觉得羞耻吗？自己也存在着问题，你怎么不觉得？你在哪里看到工宣队可以批准？那不是变成了工会了吗？实际上你们那个山工总超过党之上，不是共产党思想，更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样马虎下去，将来是很大问题，在政治上要担很大的责任。

(姚文元读党章第二条。韩说是不是工宣队批准的我不知道)你这样辩护就成问题，你连谁批准的都不知道。符合党章的是共产党员，不符合党章的是不是共产党员，打个问号，现在马马虎虎，将来还是不行，手续不完备要研究一下，如果合乎党员条件，将来手续还要补的，这是个组织原则。

(当汇报到朱国华入党是刘崇玉拉进来的时。)刘崇玉建的是王效禹的党，是从个人意见入党，这算什么党？“火线”入党，党章上没有这一条。(聂济峰同志插话：打仗时火线入党也要支部批准，就是黄继光英勇牺牲后追认他入党还要支部批准呢！)打了几十年仗，哪里有这样的火线入党？这完全是歪曲嘛！

(指韩金海)你自己还不清楚，不是工宣队批准的是谁批准的？你不知道？你将

来填表就会遇到困难。那就下次再整。你说不知道那就更复杂了，下次整风就有后遗症，每个同志都有这样的机会把问题弄清楚，有好处，关系到政治生命嘛。

错误的理论不要轻看，这个理论是原则性的，这点王效禹是错误的，我看到去年十一月十七日杨葆华的一个讲话，讲到于景瑞入党问题，我看到很惊异，怎么这样子呢？王效禹说：“我介绍他入党的”，而后又拍拍胸脯向鞠维信说：“你敢不敢介绍”？这个文件还是从兰州寄来的，我当时就批了，“九大”时给了杨得志、王效禹、袁升平看到的，还可以找出这个文件叫学习班的同志们看看。

(当彭士杰又谈到王效禹建党思想有个“三同时”个人说了算时)但是不符合他的口味就取消。杨恩华原来报了是“九大”代表，以后又发来了电报，说是马上撤消，没有说任何理由。

好，你(指李水清同志)继续谈学习班的情况。

(当汇报张景才入党问题时)这个问题学习班可以采取临时办法，要坚持原则，可以临时列席。有些同志手续不全，他们自己要知道，党的组织要把问题弄清楚，不然影响他们的政治生命。

(当汇报到准备进行大批判时)联系到大批判，刘少奇的“六论”以前讲了，有的入党做官论，有的先做官后入党，(韩说：是这样。)毒害党员，瓦解组织，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变成社会民主党了。

(当汇报到许洪云同志向济南军宣队的报告引起了一些议论时)，抓了四千多人，是最大的错误。(汇报到许洪云同志在报告中点了三个济南“文攻武卫”副指挥的名字时)不要怕人家点名，首先讲自己的错误，如果包住自己的错误，怎么叫人家不说。

(当汇报到学员请假、电报、书信逐渐增多时)学生跑回去还是要查清楚。凡是不经山东省革委和核心领导小组批准，一切告假，学习班办公室、领导等，根本不予处理，相反还是告诉家里，这种无组织无纪律是扰乱学习班，那能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呢？山东省革委你还承认不承认？来信也好，来电报也好，根本不处理，但是，有时也要看一看家里是否真有病。确实有病无人照顾的，要考虑。但是有些情况，我们这里搞不大清楚，我们这里就很难批嘛。

(当汇报到刘崇玉写了一份自传，把自己打扮成“英雄”时)既然那样“革命”就要找革命的人来证明她嘛！有证明人吗？每段历史都要有证明人，没有证明人怎么行？哪谁相信哪？

(当汇报到山东各地区当前落实《十条》情况，谈到下丁家有个坏分子投手榴弹炸伤解放军时)那是反革命！

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你们领导同志知道一些情况，但不要企图在学习班解决。这些情况没有电报，我们都看了。(李水清同志说：学习班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家里要我们向中央首长反映一下)，另一方面，在学习班听到或了解这些情况，学习班要借此进行教育，从这些事实中看出“反复旧”的危害性。在“九大”之后，还拉队伍，抢枪，不管多少理由，不管哪一派都是错误的，是违背毛主席指示和林副主席报告精神的，是违背“九大”方针的，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学习班的领导同志，听到、看到这些情况，要教育他们正确对待，不能以派性观点看这些问题，特别是与自己有关的，应该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韩金海你必须认识到你这个山工总到处直接插手，罪恶多大，你根本不认识。

聊城有个电报讲到彭世杰(作鹏同志插话，还有穆悦奎，搞的不对头，有错误，自己想一想，要好好检讨，对照党章检查自己，要以身作则，保存错误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当谈到贯彻十条有阻力很大时)落实十条有斗争的。

中央《十条》，学习班知道不知道？无论部队也好，地方也好，做一个革命家，做一个共产党员，不是那么随便的。

(当汇报到学习班发现个别人员散布反动言论时)这是反革命现行活动。要提高警惕，个别反革命总是有的。把事情核实一下，各班的领导同志，总是要核实一下，要弄清楚，很难说那么全面，可能有扩大，片面，领导要注意，进行群众工作，领导学习要细微，要有分寸，绝大多数的人是好的，坏人，反革命是有的，要提高警惕。他的话确实是反动的，但也有个好处，他自己讲出来比不讲好，所以讲出来还是好嘛！

(当汇报到有人看黄色小说和外国书籍时)，看《今古奇观》)不要看了，有一个整个的问题，现在不作决定，家里乱七八糟寄一些东西来，是不是要检查？现在不定。如果反革命寄来东西怎么办？要先学党章，先学毛主席著作。那个“列宁传”是谁着的？我记得列宁的爱人克鲁普斯卡娅编写了一本回忆录，还有一本

不要看。（当汇报到有人说水平高的可从看时）韩金海你是有不同看法？（韩答：我看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当汇报到支部建立和党员情况后）你们（指韩、彭、杨）学习有什么感觉？

（当彭世杰谈到自己学习和山东建党问题时）奇闻啊！这是个奇闻啊！刘少奇有一条工运路线上的修正主义，只讲工人福利，全民工会，不要党，要批判透。

（当汇报学习班有几种错误论点时）山东有什么“二月逆流”，我很糊涂。把部队犯错误硬要套上“二月逆流”，本身就是错误的，他不是反“二月逆流”而是宣传“二月逆流”。说陈毅、谭震林的力量大得不得了，是帮陈、谭的忙。你问问那些同志，什么叫“二月逆流”，实际上他不懂得什么叫“二月逆流”。

（当汇报到有人回去参加劳动思想还有些想不通时）还是要劳动，不要脱离群众，脱离劳动，有些中央委员还在下面劳动嘛！

杨恩华，你来学习班有些什么心得？（杨谈到他担任的“山工总支部书记”时），山工总怎么能成立一个支部呢？支部是山工总机关的人吧！你在哪里入的党？你入党多久就当了支部书记？（答：一个月以后。）你这支部有多少人？（答：两个半）怎么两个半？（答：两个正式党员一个预备党员）真笑话！这就说明了这个支部的问题。你的介绍人是谁？（答：王效禹、傅健吾。）你在本厂入党的，他们又不是你们厂的，怎么能介绍你？为什么你们本厂没有介绍你的？山工总成立后发展过多少党员？刘崇玉在哪里入的党？

至少把党变成群众组织了。党的原则，组织原则很重要，个别要服从组织，树立牢固的概念，尤其接班人五条，作起来可不那么容易的。

（当谈到王效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济南提出号召“奋战一百天，建立公字城”时，中央首长都笑起来了。当汇报到有人说地方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工作，王效禹犯错误，军队为什么不顶时）这个问题要有分析，“九大”后在这里开会时杨得志、袁升平，还有其他同志都讲过，山东问题你们也有责任，抵制的不够，但这主要是王效禹的责任。

这样理解是对的。如果转移王效禹的错误，为王解围，或者用这个东西反对解放军，是错误的。

（当汇报到有人说“反复旧”上边有错误了，我们那个单位是对的时）这个问题也要分析，个别地方是否有复旧，总之不要简单地肯定，也不要简单地否定。

要具体分析。（当汇报到有人抹杀当前这场斗争的实质，提出什么“团结起来，渡过难关”时）你们今天起来和平过渡，当然是错误的，没有是非了，是同中央路线相反的。（李遂英同志插话：“反复旧”初期孟庆芝说过“团结起来共同对敌”。（韩金海插话：不是孟说的，是王效禹说的，“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这个“敌”就是解放军。）团结起来反对解放军，这当然是错误的，韩金海你学习得怎么样？有进步就好。人的进步要有个过程。要不断地进步，韩金海，我个人向你建议一下，我的建议不一定对，供你参考。第一点把“怕”字改变了。过去怕丢官、怕丢面子，现在怕跟着王效禹走很危险，因中央批评了王效禹同志，群众也批评了他，所以不能说一定不改，不是没有改，这是个变。没有变在什么地方呢？正因为你跟着王效禹走，做了不少不好的事情，还是把怕把最痛的地方揭露出来，这一点不晓得你觉得怎样？直到现在觉得你的精神状态不好，但又怕在群众面前、中央面前彻底揭露出来。你精神状态是这样，实际你也讲了王效禹啦，他是领导，在群众揭发中间，揭发了你同孟庆芝作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支持了孟庆芝作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支持孟庆芝作了大量不好的事，这是你最痛的地方，还是不敢彻底揭露出来，不敢和群众见面，还在压着你。从这里看，你还没有变。上次江青同志讲，你对我们戴了一个面具，你还是想掩盖过去，是不好的。今天你想想，问题怎么办？只有一条，彻底进行自我批评，把自己最痛的地方，灵魂深处当作一个客观事物，当成敌人，共同对敌。敌人是谁，敌人就是自己的错误，到底敌人是谁？你还没有弄清楚。第二点，可能有一点进步，基本上你的检查是抽象的，笼统的，我提一个办法，你试一下好不好，你以后检查也不要说那些大话，先把具体事一条一条记下来，从具体到抽象好不好？不要用大帽子盖住，如“反复旧”问题、反军问题、临沂问题等。我们不好给你出什么主意。总之，是把你灵魂深处最痛，最怕见人的揭出来，你的问题不是按照五条（接班人）的问题，你应该从具体问题去进攻好啦。这样精神状态就会振作起来。不然还是在那里压着。

来源：有关一九六九年清算批判王效禹运动的二十五件史料[根据未注明原编者及印制时间的手刻油印版历史文献重新刊印]。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周恩来康生在听取杨得志等赴京汇报山东批判王效禹运动情况时的谈话要点

(杨得志司令员传达记录稿·1969年7月29日)

首先让我们共同祝我们党的缔造者，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副统帅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最近，我和穆林同志，赵修德同志，到中央汇报了全省军民贯彻落实毛主席、党中央解决山东问题的《批示》和《十条》措施的情况。我们于七月廿三日上午到达北京，当天晚上总理、康老、黄总长、李作鹏副总长、纪登奎同志等中央首长就接见了我们，第二天晚上又再一次接见。中央负责同志为解决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问题而日夜操劳，我们在北京三天，就连续两次亲自接见，听取了我们的汇报，详细询问的贯彻《批示》和《十条》措施的情况，以及工、农业生产、黄河防汛等方面的情况，并作了重要指示。这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山东的文化大革命，对山东广大军民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中央负责同志对山东情况很关心，很重视，了解得非常清楚。我们这次亲自听取了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教育，现在，我将中央负责同志接见我们时的指示和我们知道的对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东班的指示，综合成几个问题，向同志传达。

第一、要坚决贯彻“九大”精神，增强党性，消灭派性。

中央负责同志在指示中反复强调，要活学活用“九大”文献，提高党的威信，坚决按党章办事，增强党性，消灭派性。

中央负责同志指示我们：要提高学习“九大”文献，主席讲话，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还有林副主席接见你们时的讲话（指林副主席接见南京、济南军区许世友、杜平、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同志时所作的指示）都应当很好的学习，“九大”文献不但要学，而且要活学活用。办学习班，教育干部，首先要把这一点讲清楚，要以“九大”精神作为解决问题的方针。掌握“九大”精神，按党的原则办事，才能消灭派性，你们把“九大”文献，《批示》和《十条》学通了，就有了资本。《十条》和“九大”精神是分不开的，贯彻《十条》就必须贯彻“九

大”精神，领导小组要抓住这个东西，说服大家，引导大家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指示中反复讲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中央负责同志说：要提高党的威信，加强党的领导，群众组织凌驾于党之上那怎么能行？一切要按党的标准来办。共产党是与敌人作阶级斗争的，党性是个重要问题，要克服派性，增强党性。有些党员把自己降低到群众的水平，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入党，或思想上大部没有入党，必须端正。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不能降低到群众水平甚至落后群众的水平。

中央特别强调党性教育。中央负责同志说：党章是多少人心血的结晶，是全国人民讨论的，要把党章学好，先承认这个党章。有些人对党的认识很差，入党没有正确的认识，要补上这一课，党章总纲是毛泽东思想的最高概括，党章共有十二条，要逐字逐句地学，甚至有的地方要背熟，要对照。山东班要增加一个任务，整党建党。我们感觉要增加这一任务，你们学习班的绝大多数的党、团员，而且是“九大”以后第一个学习班，情况又那么复杂，有些人的资产阶级派性，宗派主义没有肃清。因此，要增加一项党性教育。中央办的学习班，就是强调提高党性消灭派性。要严格遵守党的政策，党的纪律。

第二、要正确认识山东形势：

正确的方针、政策、部署、来源于政治形势的正确分析和阶级力量的正确估量，如果对形势的估计不正确，就不能正确理解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方针、政策和部署，就会出现系列的错误做法，甚至迷失方向，走到邪路上去。

这一次接见，中央负责同志对当前山东形势作了重要指示，教育我们要从大的方向想问题，对山东形势要有正确的分析。中央负责同志说：我对山东形势总的看法是乐观的，在“九大”文献、毛主席党中央的《批示》和《十条》下达后，情况大体是这样：一部分人是坚决拥护“九大”方针和《十条》的，一部分人有些思想问题，经过教育后，可以接受，真正抗拒的是少数，对各个地区的情况也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估计，如济宁地区问题比较大一些，也就是三个县，什么人表示反抗呢？一部分是“反复旧”中上台的，思想还没有想通。另一部分是“反复旧”的积极骨干。不管怎样，在全省是少数。还有一种是隐藏的阶级敌人，他们用各种反动手段，用“左”的，右的两面派手法，来造谣破坏，这部分

是见不得太阳的，只要“九大”精神和《十条》真正传达到群众中去，受他们蒙蔽的群众就会觉悟起来，就会拥护中央方针的。

另外，从中央回去以后，山东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的工作比较稳，有步骤，你们先开了省革委和军区党委会议，又开了师和地区的干部会议，然后再展开，这是合乎中央要求的，山东没有大乱和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的领导不是没有关系，领导是有进步的。应当看到形势是好的，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地区有些乱，为什么乱？这是必然的，这没有办法，你搞了“反复旧”，就必然有反应。问题在于领导思想要明确，要很好掌握。中央解决一些省的问题，有四个样板，这就是山东、湖北、贵州、内蒙，看来比较好的是湖北，他们那里的造反派比较讲道理，你们那里的情况也还是好的。

中央负责同志说：上次我们讲过，解决山东问题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搞乱了，另一种可能是通过逐步做工作，既纠正了错误，又稳定了局势。你们从北京开会回去快两个月了，从近两个月的形势看，争取好的可能性更大了，更乱的可能性小了，但还没有排除，要既能纠正错误，又能稳定局势，关键不在于一个单位，一个工厂，关键在于领导小组，在于领导小组的领导思想。

中央负责同志在指示中，热忱地鼓励我们，一定要提高信心。中央负责同志说：“过去有些同志在‘反复旧’中犯了错误，纠正这种错误是有有利条件的，你们纠正错误是在‘九大’以后，有主席的讲话，‘九大’方针，有经过主席、党中央批准的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三同志的报告，你们又开会进行了传达布置；还有部队情况基本上是好的，思想基本上一致的，是稳定的，因此，同志们应有信心去解决问题，问题是不可以解决的。问题和麻烦是少不了的，但是可以逐步克服，不能设想《十条》一下来，大家就整整齐齐地拥护，没有反抗的，这样不合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中央负责同志还讲到纠正错误和稳定局势的关系。中央负责同志说，据我们了解，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在“反复旧”中受了打击的，就是强调纠正错误，不注意稳定大局；一种是在“反复旧”中犯了错误，不愿检讨错误，就只强调稳定局势。山东学习班也有这些反应，中央在对《十条》的批语中说：既要彻底纠正错误，又要照顾大局，努力稳定山东局势。不能只强调一面，忽视另一面，要辩证地看，落实在稳定大局上。

同志们，中央负责同志肯定了山东形势是好的，给了我们很大鼓励和支持，这对我们增强信心做好工作，是一个很大的鞭策。但我们应该看到，我们在工作领导上还存在不少问题，我们活学活用“九大”文献还很不够，有些地区的一些地方出现了不稳定，出现了一些违犯“九大”精神和《十条》的思想和行动，我们对这些问题调查研究不够，纠正也不够有力。中央负责同志已经明确告诉我们，把局势搞乱的可能性是小了，但还没有排除，我们如果不很好学习毛泽东思想、“九大”文献，用毛泽东思想及时观察分析形势，提高全局观念，正确掌握政策，我们就有可能把局势搞乱，就要犯错误。

第三、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我们汇报过程中，中央负责同志对参加三结合的军队代表情况询问得非常详细。当了解到“反复旧”中地、县级革委会的主任没有撤换，又多数是军队干部时，中央负责同志说：这很重要，是有利条件，挨了斗不要紧，当然在军队代表中也有支持“反复旧”的。

中央负责同志说：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主席有两句话“地方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工作。”关键在解放军，解放军首先要团结起来，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军队，建军已经 42 年了，还不好团结吗？当然，军队也受社会影响，应当很好进行教育，有缺点就帮助改正，但究竟底子不同，解放军的底子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有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比地方党政干部底子好，为什么部队涌现出那么多英雄模范人物？就是因为老一辈的解放军干部打下了好底子，他们觉悟高。山东的好处，就是军队大多数思想一致，山东有那么多解放军，地区革委会主任又绝大多数是解放军干部，军队责任重大。

中央负责同志谈到一九六七年四、五月间军队支左中的错误时说：当时军队在工厂里支左，犯了一些错误，但很快就纠正了，毛主席曾批示过你们在全国闻名的三条，这就是“早改好，彻底改好，主动改好。”你们改正错误是模范，主席很欣赏你们的三条。

当中央负责同志在山东班了解到有人说“二月逆流”来自军区时，对这种极端严重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中央负责同志说：把部队犯错误硬套上个“二月逆流”本身就是错误的，他不是反“二月逆流”而是宣传“二月逆流”，说陈毅、谭震林的力量大得不得了，是帮陈、谭的忙，你问问那些同志，什么叫“二

月逆流”？山东知道不知道“二月逆流”是什么？你晓得不晓得？那样好像山东的解放军都成了陈毅、谭震林的了。

中央负责同志在谈到山东六七年“反逆流”的问题时指示说：据我们了解，在群众中有三种意见，一是意见说反逆流完全错了；另一种意见说反逆流基本上是对的，但有缺点，有错误；还一种意见说，反逆流是完全对的。你们不要和他们扯“二月逆流”的事，就按“九大”精神办事。

毛主席教导我们，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这次中央负责同志接见时又强调指出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向部队同志提出了更高要求，部队今后的“三支”、“两军”任务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部队的同志一定要了解到，过去在支左工作中取得的成绩，首先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也是和革委会，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帮助分不开的。绝不可以骄傲自满，应当认清自己的责任，对自己的要求更高更严，同时，应当认识到，过去在支左工作中是有缺点错误的，在所谓“反复旧”中也有少数同志跟着犯了错误，我们一定要记取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把军队代表的工作和“三支”、“两军”工作做得更好。

第四、要教育广大革命群众，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反对重拉队伍，另立山头。

中央首长在接见时，详细了解了各地群众组织的活动情况，并作了重要指示。

中央负责同志说：归口闹革命，归口抓生产，这是大前提，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就讲了归口闹革命的问题。“九大”以后，情况变了，即使是造反的，也不能把山头拉起来。“九大”以后再拉队伍，是违犯革命的。“九大”以后再拉队伍、抢枪，不管有多少理由，不管哪一派，都是错误的，是违反毛主席指示和林副主席报告精神的，是违反“九大”方针的，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自己说是革命的，中央方针不执行，还能真革命吗？从外地回来的，要欢迎他们，保证他们的安全，要他们参加生产。你不回来就不承认你，回来是抓革命，促生产，再研究补台，如果回来搞打、砸、抢，就不能说是受压的了，就不能同情他们。

中央负责同志说：在纠正错误期间，不要算老账，这样就超脱了，解决群众组织的问题，不能走回头路，不能按老办法办，不要向后看，要想出新办法来，过去那个账要一算，他们仍然会拉队伍的。拉起队伍来就要进革委会，就要求对等，这没个完。“九大”以后不能再算老账。有的群众组织垮掉了又起来怎么行？

垮了就算了，不能再起来，你不承认人家，人家可能攻击你们，现在已经攻你们了，说解放军“复旧”了，又“镇压”群众了，这些你们都要想到，想到了思想就解放了，什么攻击都不在话下。

有的地方没有联合好，打了一些不应该打的，压了一些不应该压的，怎么办？是要立山头搞分裂，还是按九二三厂和济南的办法去解决，按“九大”精神去解决？应该按后一种方法，大联合，三结合不好的要补台。中央负责同志说：山东、贵州等委员会负责人和办事机构中的群众代表太多，看来还是由站出来的干部，解放军代表当第一把手好。那些所谓“老保”中有代表性的，也要吸收到革委会做委员、常委和副主任，这样，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这就是不摘帽的摘帽。这些问题要根据每个工厂的具体情况加以解决。一个工厂一个工厂归口闹革命，促生产。浙江“红暴”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们合法了，就想要把全浙江变成“红暴”，他们就是要求对等。

中央负责同志指示：不要在群众中划分“革”与“保”，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就讲：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怎么还分革与保呢？

“七一”社论讲的很清楚，不要叫“老保”了，要向群众做工作，向他们讲明没有“老保”，走资派打倒了，还有什么“老保”？对那些称人家老保的人，你可以问他“老保”谁呀？

中央负责同志去多次强调指出，要把山头削平，山工总是跨行业的，跨地区的，在全省搞串连，搞不好在全国搞串连。要取消山工总。在各城市搞工代会，把那些未参加革委会的一派群众吸收进来，工代会不能搞全省性的，各市搞各市的。济南可以先搞个工代会筹委会。工代会要吸收两派革命群众代表参加，引导大家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样解决，合乎毛泽东思想。郊区，农村搞贫代会，省贫代会派性少一点，他们插手少，这就好办，贫代会还是以县为单位。红代会也不能搞全省性的，只有革委会是权力机构。在政治运动中，群众组织一出来，就要权力，这不行

第五、要加强组织纪律性。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最后中央负责同志一

再强调加强组织纪律性的问题。下面，我传达一下中央负责同志这次接见我们和其他会议上有关这一问题的指示。

中央负责同志说：“九大”以后有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指示，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绝不能再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办法。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对于搞无政府主义的，绝不能对他们采取自由主义，要坚持党的方针，要坚决反对武斗，维护革命秩序。必须执行党的政策，严守党的纪律，绝不能用打人，武斗甚至采取流氓行为，用错误的办法对待错误。

中央负责同志对加强部队组织纪律性的问题特别强调。中央负责同志说，部队一定要加强组织纪律性，毛主席的五·二〇指示是很有针对性的，军队要很好执行毛主席在“九大”的号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军队团结了，才能带动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军队几百万要团结，靠自觉，顾大局，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团结要有纪律保证，团结没有纪律不行，要有组织纪律性，军队没纪律，不成为军队，现在有的人动不动就造反，造反是对的，要看造什么人的反？我们军队造了几十年反，过去造地主的反，造国民党的反，造日本帝国主义的反，造美帝国主义的反，现在造苏修的反，文化大革命大造刘少奇的反，摧毁了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完全对的。现在情况不同了，“九大”召开了各省、市成立了革委会，选出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还造反，造谁的反？再造反，就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毛主席说“造反有理”是对反动派的造反有理。现在少数人破坏军队纪律，腐蚀战斗力，分裂人民解放军，这是不允许的，军队没有纪律怎么指挥千军万马，你下令冲锋，他说不去怎么行？有不同意见是可以的，但要听指挥，要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

中央首长的指示极为重要，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坚决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如果不按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办，这就是最大的违反纪律，是党的纪律所不容许的。我们每个同志都要自觉的加强组织纪律性，做执行党指示，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

第六、群众代表不脱离基层，不脱离生产劳动。

毛主席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就教导我们：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干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革命的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在“九大”期间，毛主席又教导我们说：这一次提名为中央委员的同志，大多数是第一次进中央，尤其是工人、农民增加的多（还有其他的）工人，农民同志提名到中央委员会里来工作，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能脱离生产，脱离生产就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又要工作，又不脱离生产，脱离本单位生产就要变，就要变成机关工作人员，就没有代表性了，坐机关久了，就失去劳动本色。

毛主席这里讲的是提名做中央委员的工农代表。这些代表都到下边生产劳动。参加各级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就没有理由不去参加劳动生产，张富贵在“九大”回来以后，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回生产大队劳动，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十条》中也明确指出：在职干部要轮流下放劳动，群众代表不脱离基层，不脱离生产。

中央负责同志在接见我们时，再次强调提出这个问题。中央负责同志说：刘少奇有“入党作官论”，现在有“造反作官论”，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了群众组织的头头，就一心想做官，念念不忘一个“权”字，在学习班就有人说：“文化大革命闹了几年，还得去劳动，心里不舒服。”这是一种反动思想。要动员他们下去参加劳动。蒯大富不比他们出名吗？是蒯司令，是北京有名的所谓“五大领袖”之一，他都下去劳动了。

中央负责同志对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东班作指示时，也强调群众代表要回去参加生产劳动。中央负责同志说：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共产党员，不要做什么官。问一个同志：“你‘九大’以后参加劳动没有？还是回去参加劳动好，脱离劳动很危险。”

同志们，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很重要，是传达毛主席的声音，对各级革命委员会和解放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真正落实了，就既能彻底纠正错误，又照顾大局，稳定山东局势。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要坚决执行。上面讲的几个问题，是根据我们当时的记录整理的，没有经过中央负责同志审查，如果有错误，由我负责，这些问题在开会期间，是传达到会人员，不准以任何方式向外传，这是一条纪律，希望同志们遵守。至于会后如何传达，再作规定。

最后让我们高呼：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有关一九六九年清算批判王效禹运动的二十五件史料[根据未注明原编者及印制时间的手刻油印版历史文献重新刊印]。

一九六九年八月八日，杨得志在山东省县团以上干部联席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和济南军区党委召开的这次是县团以上干部联席会议，今天要结束了，我代表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和济南军区党委常委谈几点意见。

这次会议开得比较好。与会全体同志深入学习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有关重要指示，“九大”文献和《批示》、《十条》，认真学习了最近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指示和“七·二三”布告，普遍受到了一次“九大”精神的再教育。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和毛主席为首、大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一致表示热烈拥护，坚决照办。会议过程中，听取了袁升平同志《二个月来传达毛主席、党中央《批示》和《十条》的基本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报告。九二三厂，济南市革命委员会介绍了落实“九大”精神和《批示》、《十条》的先进经验，张富贵同志介绍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三不脱离”的号召，参加生产劳动的体会，对大家教育启发很大，会议还研究了进一步落实“九大”精神《批示》、《十条》、《七·二三》布告和中央负责同志重要指示的具体措施。这次会议，使大家进一步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坚决贯彻“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彻底纠正“反复旧”错误，努力稳定局势，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信心。我们相信，这次会议，对于全省军民进一步落

实“九大”精神，对于继续贯彻执行《批示》和《十条》，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将产生重大促进作用。

今天我想着重讲一讲各级革委会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掌好权，用好权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我们当前纠正省革委主要负责同志发动的所谓“反复旧”运动的错误，稳定局势，落实《批示》和《十条》及“九大”提出各项战斗任务的关键，而且是政权建设的根本。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林副主席指示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为了夺取政权，全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军，才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毛主席又领导全国亿万军民，摧毁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即一部分权力，建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回顾几十年的战斗历程，使我们深深体会到政权来之不易，巩固政权更加艰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很多同志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成为红色新政权的领导成员，这是人民群众给予我们的重视。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自己责任的重大，一定不能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一定要把这个权掌好，用好。那么，怎样才能把这个权掌好，用好呢？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就是要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掌好权，用好权的问题，涉及的范围推广，现在着重讲以下几个问题。

（一）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紧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

林副主席指示我们：“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的党就前进，就胜利。”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经验。能不能坚定不移地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这是我们能不能用毛泽东思想掌好权，用好权的根本。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首先要认真地、刻苦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自觉地破私立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树立“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在当前要着重学好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九大”期间所做的极其重要的讲话，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章程，学好《批示》、《十条》、《七·二三》布告和中央负责同志对解决山东问题的指示。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概括了“九大”的基本精神，是我们处理一切问题的总方针，《十条》是根据“九大”精神，针对山东的情况制定的，落实《十条》并不等于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必须把学习贯彻“九大”精神和《批示》《十条》紧密结合起来，绝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或者割裂开来。在学习中，要彻底批判违犯毛泽东思想的各种谬论。“山东特殊论”、“军队支保论”、“干部篡权论”、“我为核心论”、“造反派受压论”等等错误论调，在全省广为流传，影响很坏，还没有批深批透，至今在少数人中间还有市场。“不破不立”，如果对各种谬论不彻底批判，“九大”精神和《批示》、《十条》就不能落实毛泽东思想就不能牢牢在群众中扎根。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要不折不扣的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认真标办斗、批、改。凡是革命大联合搞得不够好的单位，要帮助广大革命群众在革命的原则下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凡是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搞的比较好的单位，要抓紧搞好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和斗、批、改其他各项工作。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斗批改的群众运动中，要充分发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作用。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必须坚决反对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省革委主要负责同志所以犯错误教训固然很多，最根本一条，就是没有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违背了十二中全会的精神，在全省搞了所谓“反复旧”运动。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信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折不扣地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谁如果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背着中央另搞一套，就必然犯大错误，《十条》是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对待《批示》《十条》的态度，就是对待毛主席、党中央的态度问题。两个月来贯彻《批示》《十条》的情况总起来是好的，但还存在着不少阻力。其中有些阻力来自在“反复旧”运动中犯了错误而又没有很好认识和改正错误的少数领导同志，这些同志如不坚决改正，认真贯彻《批示》和《十条》就会继续犯错误。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还必须加强请示报告制度。经常向中央请示报告，就能及时得到指示就可以做好工作，不犯或少犯错误。要加强组织纪律性，重大问

题一定要请示报告。不要自己认为是小事，就不请示报告，不要自以为聪明，就不请示。

（二）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建立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是用毛泽东思想掌好权，用好权的组织保证。

要建立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凡是在“反复旧”中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的单位，原则上的“反复旧”以前的革委会为基础，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作好充实调整工作。在“反复旧”中领导班子没有调整但革委会不健全的，也要加以充实完善。在充实调整工作中，要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和林副主席提出的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即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优秀代表人物，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各级领导班子的充实调整，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充分走群众路线，做过细的政治思想工作。要有领导有步骤，有准备的进行。生产大队领导班子的充实调整工作，不宜在农忙季节进行，以免影响生产。

要建立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必须坚定不移地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每个革委会成员，都要经常地、自觉的斗私批修，工作有了缺点、错误要坚决改正，不断的促进自力的思想革命化。要认真学习最近报纸宣传的杨水才、毕英兰同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踏踏实实的做人民的勤务员，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要发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反对讲排场，摆阔气，追求享受，贪图安逸的坏习气，反对特殊化。对于争地位，热衷于搞资产阶级派性，要两面派，搞小动作的人，要严肃批判，不能姑息、迁就。

要建立一个革命化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还必须不断改进领导作风，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要发扬党的三大作风，经常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真正做到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斗批改的各项任务。要自觉的接受群众的监督，虚心地接受群众的批评和建议。要把广大群众

的善意批评和阶级敌人的恶意攻击，严格的区别开来，不能一听到不同意见就认为是反对革命委员会，要“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坚决执行在职干部要轮流下放劳动，群众代表不脱离基层，不脱离生产的规定。所有参加三结合的人员，要明确认识参加生产劳动，不脱离基层，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最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要以劳动为荣，自觉地执行这一规定。各级革命委员会除研究重大问题外，要适当减少群众代表参加上层的活动，以保证他们大部分时间能在基层参加劳动。对于执行这一好的要表扬、鼓励。张富贵、李春生、张延成同志“九大”以后一直在基层劳动，鹿田计同志和其他许多群众代表坚守生产岗位，这是很好的，我们应和他们学习。

要建立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还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要真正做到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一切号令，必须无条件执行。要充分发扬民主，一切重大问题，必须集体讨论决定，坚决反对“一言堂”，坚决反对个人说了算。对集体讨论决定的问题如有不同意见允许保留，但必须做到“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作到不同心也要协力。”决不能各行其是，另搞一套，决不能耍两面派作风。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是革命的大局，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各级革命委员会自建立以来，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广大军民一定要信任、尊重、支持、帮助、保卫革命委员会，部队要做革命委员会的坚强后盾，参加三结合的军代表，要把我军着重政治建军的一整套方针，原则带进革委会，运用到政权中去，处处做好标兵。广大人民群众要帮助革命委员会树立革命的权威。对革委会有意见，可按正常建议提出。革命委员会不健全的，要坚持补台的方针，不准拆台。决不能冲击革命委员会，随意揪斗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向把破坏革委会作为他们的重要目标，我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随时准备粉碎他们颠覆革委会的一切阴谋诡计。

（三）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消灭资产阶级派性。加强组织纪律性，反对无政府主义。

中央负责同志对解决山东问题的指示，突出的强调了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消灭资产阶级派性，加强组织纪律性，反对无政府主义。这一指示，非常重要，抓住了根本，打中了要害，这不仅是落实“九大”精神，《批示》、《十条》和《七·二三》布告的关键，而且是用毛泽东思想掌好权，用好权的根本保证。

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就是要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坚决贯彻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一切按党性原则办事，全心全意为党的纲领和路线而奋斗。各级革委会和部队各级党委，要经常进行党性教育，认真学好中国共产党章程。革委会一定要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坚持用无产阶级党性掌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革委会的成员，要摆对个人和党的位置。要绝对服从党，不要背着党另搞一套，要大公无私，踏踏实实，不要沽名钓誉，要两面派；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自满；要勇于接受批评教育向一切倾向错误作斗争，不要拒绝批评坚持错误；处理问题，要为广大人民群众着想，对党负责，决不能用权力为资产阶级派性服务。

要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必须坚决地把资产阶级派性彻底搞臭。资产阶级派性是贯彻“九大”精神，落实《批示》、《十条》和《七·二三》布告的大敌，是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大敌，是搞好斗、批改的大敌，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的大敌。各级革委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除了经常进行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消灭资产阶级派性教育以外，要在适当时机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围剿资产阶级派性的活动，大揭派性的表现，大批派性的危害，大挖派性的根源，把资产阶级派性这条大毒蛇从革命内部彻底消灭掉。

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要无条件的贯彻执行。广大人民群众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严守劳动纪律，坚守生产工作岗位。一切擅离职守的人员，必须立即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对于利用无政府主义，煽动停工停产，破坏生产设备，中断交通邮电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必须依法严惩，要坚决煞住传布“小道消息”这股歪风。应当看到这股歪风在某些人中间还是有市场的。在聊城地区有的人为了对抗《批示》、《十条》，一方面炮制了一份所谓《赴京上访纪要》，大造舆论；一方面大肆攻击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同意的、内容正确的聊城地革委贯彻《批示》和《十条》的七条措施。还有些人传布谣言，混淆视听，企图把局势

搞乱。在上次南郊会议上我们反复强调要注意保密，今后又专门发了电报，有些就是目无纪律，把有些会议发言稿捅到社会上去，这是很错误的。各级革委会、部队各级党委要充分重视这股歪风的破坏作用。对于违犯纪律的人员，要严肃处理，情节轻微的要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屡教不改的要，严格执行组织纪律。

（四）要正确对待群众

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和态度，始终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焦点，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相信和依靠群众的革命路线；一条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对和镇压群众的资反路线。这两条路线是针锋相对的，水火不容的。用毛泽东思想掌好权、用好权，就必须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对待群众。

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对待群众，首先要相信群众，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这是最基本的一条。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要革命的，是拥护毛主席的，是热爱党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广大工农群众，革命干部，红卫兵小将，最热爱毛主席，最听毛主席的话，他们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大造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无论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等各个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次中央负责同志指示中再次重申：“不要再在群众中划分‘革’与‘保’。”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相信各级革委会的同志，一定能够深刻领会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精神，坚定地相信群众大多数，对于过去对待群众方面遗留下来的问题，能够按照“九大”精神，在斗、批、改落实政策的过程中，主动地予以解决。

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地对待群众，就要时时处处依靠群众。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我们落实“九大”精神，《批示》《十条》《七·二三》布告，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冷冷清清地搞落实。在工作中，要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去武装群众，发动群众，坚持革命、坚持团结、坚持斗争，既不要强迫命令，硬要群众做这样，做那样，也不要尾巴主义，错误地强调所谓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

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待群众，就要坚决地保护群众。“反复旧”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把矛头指向了群众。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一教训，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革命群众。有些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是难免的，也是与领导上的错误和对他们帮助教育不够分不开的，要耐心细致地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不要歧视打击他们。对于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和两派观点的群众，要真正坚持“三条原则”，做到“九个一样”，把“一碗水端平”，不能亲一派，疏一派，更不能支一派，压一派。在贯彻《七·二三》布告的过程中，决不允许从资产阶级派性出发，打击压制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众。在处理混入群众中的极少数坏人时，要把他们和广大群众严格地区别开来，要特别注意保护群众。

（五）经常分析研究形势，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林副主席指示我们：“要时时刻刻关心和注意政治形势……站稳立场，分清是非，避免在大是大非面前摇摆不定，迷失方向。”如果对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就不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就必然会犯错误。省革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以后，所以在全省发出“反复旧”运动，犯了严重错误，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对当时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

正确分析形势，必须把着眼点放在群众身上。毛主席在视察大江南北时指出：“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我们看形势，首先要看用毛泽东思想发动群众的广度和深度，看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这次会议遵照毛主席这一教导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对山东形势做出分析。一致认为，总的看来形势是好的。广大人民群众无限热爱毛主席，在全省军民共同努力下，“九大”精神《批示》和《十条》越来越深入人心，正在逐步落实，“反复旧”的错误正在纠正。决不能因为少数人资产阶级派性发作，搞无政府主义，搞打、砸、抢、抓、抵制“九大”精神和《批示》《十条》的落实而对整个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

正确分析形势，还必须看本质，看主流。在分析形势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同志都能看到本质和主流是好的，但也有个别同志把当前山东形势看成一团漆黑。

有的说：“‘反复旧’是四个指向，纠正‘反复’比‘四个指向’还厉害”。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反复旧”违背了十二中全会精神，是大方向性错误，现在我们贯彻“九大”精神，《批示》和《十条》，纠正“反复旧”错误，大方向是正确的，尽管工作中有某些缺点、错误，这是支流。决不能把支流看成主流。纠正“反复旧”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反复旧”的错误，有质的区别，决不能相提并论。还有些同志认为，当前有些地区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是由于贯彻《批示》《十条》，纠正“反复旧”错误造成的。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当前有些地区局势有些乱，是“反复旧”错误的必然反应。在纠正“反复旧”错误中，由于某些领导“反复旧”的负责同志，“反复旧”中上台和“反复旧”的积极骨干，思想不通，情绪抵触，抵制和干扰《批示》《十条》的落实，由于某些群众组织的头头资产阶级派性发作，搞无政府主义。由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加剧了形势的不稳定。当前某些地区的局势不稳定，这是暂时现象。

局势能不能迅速稳定，关键在于领导。有些单位的实践经验证明，只要领导思想统一，态度明确，有错误就坚决改正，对思想不通的群众组织头头能靠上去做工作，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狠狠打击，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我们分析形势，一定要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首先要抓住本质方面，主流方面的东西，但也不能忽略非本质、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如果忽略非本质、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就可能使某些地区的局势更加不稳定，就可能犯大错误。中央负责同志指出：当前山东形势发展有两种可能，争取好的可能性更大了，更乱的可能性小了，但还没有排除。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满怀信心地按照不同情况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

（六）高举“九大”的旗帜，进一步加强革命的大团结。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与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通过深入学习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对于加强团结的伟大战略意义有了新的认识。深深体会到，进一步实现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革命大团结，是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的需要，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部队革命化建设的需要，是共同对敌，准备打仗的需要。是否真正团结了百分

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这是衡量各级革命委员会用毛泽东思想掌权好与不好的重要标志之一。

要加强团结，首先要广泛地学习“九大”精神，宣传加强团结的伟大战略意义发动大家都来做团结的工作，使广大军民真正懂得“为了胜利……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要革命就要团结，不团结等于不革命”的道理。彻底批判“唯我独左”、“唯我正确”以及你支一派我支一派等种种破坏革命团结、分裂革命队伍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言行，为广泛的革命大团结打下思想基础。

要加强团结，必须认真落实“九大”精神，顾大局，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不要算老账。领导之间、军队之间、军民之间、上下之间、群众之间要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互相谅解。对于过去发生的问题，要以“九大”为一条线，作为经验教训接受下来。特别是军队干部要作团结的模范，首先要搞好军内的团结通过军队的团结带动全省人民的团结。不算老账，就是要严格要求自己有错误就改，不要以“一贯正确”自居，不要老揪着对方的问题不放，不算老账向前看，就是要有什么问题就按“九大”精神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在历史问题上纠缠不休。不算老账，不是不讲原则。我们讲的原则，就包括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对敌狠，对己和，这就是我们的最高原则。不算老账，也不是不讲是非，这个是非应当通过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的办法来解决。

要加强团结，还必须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真正实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红卫兵小将，不管是哪一个观点和哪一派的，都要削平山头，归口大联合。坚决反对重拉队伍，另立山头，破坏革命团结，分裂革命队伍。对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这样或那样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决他们。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好好抓一抓这项工作，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五七”干校，完成斗、批、改的各项战斗任务，把那些能解放而尚未解放的干部尽快解放出来，能够结合而又需要结合的干部要尽快结合，并充分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在“反复旧”中犯

了错误的同志，要以党的利益为重，遵照毛主席“犯了错误，改了就好”的教导，认错早改，只要他们认识改正了错误，我们就应当支持他们，不能抓住不放。

要加强团结，还必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遵守党的纪律。团结不是绝对的，团结不是掩盖错误，不是回避矛盾，团结要经过斗争。有了问题，要当面谈、会上谈，要遵照毛主席“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针来解决。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有利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就不做。不要记账，不要呕气，不要搞小动作，更不允许对同志搞突然袭击，支持一部分群众去整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

在这里，我还要着重讲一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问题。林副主席指示我们：“生产是不能放松的，生产放松了会发生非常大的危险，会转过来破坏革命。”“应该以革命来带头，来挂帅，来促生产。”我们一定要在抓好革命的同时，抓好生产。农业生产要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战胜各种自然灾害，夺取今年秋季的农业大丰收。要善始善终地完成夏粮征购任务。抓紧做好秋种的准备工作，为明年农业大丰收准备条件。周总理最近指示：必须从思想上提高警惕，对堤防工程要认真检查，要接受教训，保证不出问题，各级革命委员会要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把防汛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一定要确保黄河安全，内河不决口，水库不倒坝，内涝不成灾。同时做好抗旱的准备工作。还要把群众生活安排好，在工业战线上，要重点抓好煤炭生产，争取在今年九月份完全国家规定的日产指标。在当前煤炭、电力和某些原材料暂时不足的情况下，要充分发挥现有物资的效能，保证国家计划内重点产品的产生。在抓好工农业生产的同时，要根据毛主席“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指示，开展一个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准备打仗”的最新指示，加强战备工作。要向广大群众经常进行战备教育，认清美帝苏修的侵略本质，认清我省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抓紧抓好小三线建设，人民防空，做好民兵工作，管好民兵武器。特别是军队的同志，更要做好一切准备，对付准备来犯的一切敌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让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紧紧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高举“九大”团结胜利

的旗帜，认真落实“九大”精神和《批示》《十条》以新的优异成就国庆二十周年献礼。

最后让我们高呼：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贰、湖北省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遵照中央指示，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部份常委和“九大”代表在京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在“九大”所作的多次极其重要的讲话和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五月十九日又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中央负责同志多次接见并提了很多重要意见。这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我们的最大教育，最大鞭策。在中央负责同志亲切教育下，开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湖北省、武汉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英明领导下，形势一片大好。斗、批、改运动不断出现新的高潮，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很大胜利。运动的发展和主流是好的，但是省、市革委会在具体工作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问题是：对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没有很好抓典型，总结经验，因而落实得不够好。“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准字上狠下功夫不够，个别单位甚至有逼、供、信和扩大化现象。在工作态度和作风上不够深入、细致和谨慎。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关心、爱护、帮助和培养不够，致使他们常常受社会上错误思潮的影响。

在“九大”开幕以后，全省广大革命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的最新指示鼓舞下，进一步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向“九大”献礼的高潮。正当这时，武汉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和省市革委会的个别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武汉市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他们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歪曲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和“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委会，指向革命干部。这在实际上就背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利于贯彻执行“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这一错误已经波及到一些专、县，对革命和生产有了一些不良后果。但这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了认真接受教训，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按照中央负责同志的提议，反复进行了研究，拟采取以下措施：

(一) 在全省迅速掀起一个持久的学习、落实“九大”精神的群众运动。各级革委会要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一步在全省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新高潮，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用毛泽东思想批判刘少奇和他在湖北、武汉的代理人王任重、宋侃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各种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右的或极“左”的错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进一步提高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实现“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二) 搞好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加强革委会一元化领导。各级革委会成员，都要用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严格要求自己，“既要把自己做为一份革命的力量，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做为革命的对象”，联系实际，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斗私，批修”，认真改造世界观。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公，一切为革命的共产主义精神。

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各级革委会成员，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自己置身于革委会之中，不能置身于革委会之上，也不能置身于革委会之外，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加强集体领导，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革委会内部有不同意见，应摆在桌面上来当面讲，允许保留，也可以向上

级报告，但不要搞“小动作”；要提倡言行一致，表里一致，坚决反对口是心非的两面派作风。

(三)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对大联合和三结合不够巩固的单位，上级革委会和支左部队、工人宣传队，要帮助广大革命群众在革命的原则下，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彻底解决跨行业的组织，不许重拉队伍，另立山头；本单位的人员不要到外边去串连、插手、干涉其他单位。广大群众要尊重、信任、帮助、支持、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自觉地维护革委会的革命权威，不要以任何借口冲击、进驻和夺革委会的权，已经非法夺权的，一律无效。“三代会”是群众组织，必须在革委会领导之下，不得凌驾于革委会之上，与下边的“三代会”不发生垂直领导关系，不要插手外单位、外地区的文化大革命。

(四) 切实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认真搞好斗、批、改。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的指示，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这些任务。要抓典型，推广试点，不断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当前要继续抓紧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谨慎细心，不要粗枝大叶。“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要严格防止和克服扩大化的倾向。对于查出的坏人或可疑分子，除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依法处理外，都应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要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

(五) 要正确对待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要允许他们犯错误，允许他们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对参加三结合的干部要信任、支持，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

(六) 要正确对待群众。要坚信广大革命群众是忠于毛主席的。参加这次“反复旧”的群众是属于认识问题，要历史地看，全面地看，要肯定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成绩和贡献。要说服，不要压服，耐心地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不要

歧视他们、排斥他们。对参加“反复旧”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也不要歧视他们，认识了错误，接受教训，改了就好。要加强广大群众的革命团结，严防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不团结不得了，团结了就了不得。要革命就得要团结，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夺取更大的胜利。

(七) 要拥军爱民，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解放军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认真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认真学习八三四一部队的“三条原则”和“九个一样”的先进经验，不要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

广大革命群众，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学习解放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等光荣传统，积极支持、热情帮助解放军做好“三支”“两军”工作。百倍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挑拨军民关系，破坏军民团结。

(八) 坚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要以革命带生产，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新飞跃。遵照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教导，从各方面做好打仗的准备。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继续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返回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必须说服他们，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返回农村。

在贯彻“九大”精神的过程中，我们一定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中央负责同志的建议，以“九大”精神为红线，按照团结的方针和政策，正确处理“反复旧”这一问题。引导广大群众顾大局，向前看。坚决做到在纠正极“左”思潮的同时，防止出现右的倾向。努力做好广大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夺取更大胜利。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

1969.05.27；中发〔69〕28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湖北省、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地区三代会和广大革命群众：

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望你们根据“九大”精神，认真讨论，坚决执行。

湖北省、武汉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自从批评刘少奇和他在湖北、武汉的代理人王任重、宋侃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来，特别从一九六七年“七·二〇”事件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在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武汉市、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八年一、二月相继成立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对斗、批、改说，也有一定成绩。这是运动的主流。但由于缺乏经验，他们没有很好地试点，抓典型，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以点带面，在工作作风上又不够细致谨慎。这些缺点、错误应该纠正，但不能因此并在社会上错误思潮和无政府倾向的影响下，提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这样做，是不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

在“九大”开幕以后，武汉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和省市革委会的个别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武汉市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他们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歪曲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和“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委会，指向革命干部。这在实际上就背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利于贯彻执行“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这一错误已经波及到一些专、县，对革命和生产有了一些不良后果。但这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中央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广泛宣传和学习“九大”文献，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特别是省、市革委会的主要成员要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做加强革命团结的模范。你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搞好斗、批、改，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争取各条线路上的更大胜利。

中共中央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叁、安徽省

一九六九年六月，李德生在安徽省三代会常委扩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这次省“三代会”常委扩大会议开得是及时的，必要的。我们在传达学习“九大”精神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基础上，为更好地贯彻落实，促进形势的发展，很需要进一步根据我们当前情况，联系实际地来很好地对形势加以分析，统一对形势的看法。在这次会上，同志们谈了形势，交流了经验，认真学习了继续革命的理论，大谈了团结问题，会议开得很好。今天在这个会议结束的时候，讲几点意见。

（一）关于形势问题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对形势的认识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任何时候，我们对形势都要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不要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有的同志有的时候就听小道消息，不按照中央对形势的结论，不按照中央对形势的指示去看形势。只从个别局部的问题，阴暗的东西看得多，这样就容易否定全局的大好形势。我们现在对形势究竟应该怎幺个看法，究竟是大好？还是小好？还是不好？我觉得，不仅我们参加“三代会”常委扩大会议的同志要有个统一的看法，我们还有责任说服全省广大革命群众，都能有一个统一的看法。这个看法就是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在第九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所指示的：“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这就是说，“九大”是在取得了伟大胜利的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开的。这样说，是不是没有内容呢？这是有根据的，是有丰富内容的。林副主席说：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风暴，这个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长

期以来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这样的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摧毁了，还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同志们都非常清楚。刘少奇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他在抗战的初期就有计划地安插了一批叛徒、特务到我们党的队伍里面来，窃取了党内的一些重要职位，阴谋复辟资本主义。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才把他们揭发出来，彻底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权力被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回来了。我们建立了新生的红色政权，这就大大地加强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为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好了准备。

这就是对当前形势的结论，对形势的看法。每个同志都要很好地来学习中央对形势看法所作的结论。对这个问题，我们要紧跟中央，紧跟伟大的统帅毛主席，紧跟他老人家对形势的看法和指示。我们对形势的看法能不能跟中央一致，也是对中央的态度问题，也是我们能不能掌握好大方向的问题。这里，关于分析形势问题，讲几个具体的意见：

第一点是形势大好，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好。安徽的形势和全国一样是大好。我们看现在形势，应该与去年这个时候比较一下。去年这个时候，全国是个什么形势？安徽是个什么形势？去年这个时候，全国还有广西、云南、福建、新疆、西藏等好几个省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安徽是个什么形势，我们都是最好的见证人嘛，那个时候，阜阳专区没有一个县成立革命委员会，阜阳两派正在这里办学习班，互相吵架，阜阳地区有人甚至提出口号要“打过江南去，解放全中国”。芜湖、安庆呢，要走徐州的道路。芜湖虽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还不甘心，要走徐州的道路。安庆那个时候，没有一个成立革委会。全省还有一半的县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那个时候成立一个县的革委会，很不容易，前进速度是逆水推舟。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幌幌荡荡，摇摇摆摆，没有现在巩固。接着一个安庆事件后，就出现了芜湖的六·二六事件。芜湖事件刚刚要解决？合肥又出现了七·一六事件。安庆、芜湖、合肥发生的事情不是孤立的，计划是一致的。在安庆造舆论，在芜湖突破嘛！那时的形势是阶级敌人向大联合、三结合反扑的形势。

我们来看看现在的革命形势？现在已经实现了全国一片红，全省一片红。革命的形势比去年好得多。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更巩固，更发展了。从去年到今年，一直在向好的方面发展，是愈来愈好。但是在大好形势之下，出现一点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前进中的问题。从主观上说，我们自己工作做得还有缺点，毛主席的政策还不够落实，也就是说，一种倾向还可能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这是我们工作上可能出现的。但是，问题不在这里，更主要的是，一小撮将要灭亡的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是要作垂死挣扎的，是要想反扑，想把我们搞垮，想把大好形势搞垮。因此，愈接近胜利，反映出来的矛盾往往就愈多。例如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关键时刻，阶级敌人到处煽阴风、点鬼火，挑拨革命群众。制造分裂，破坏当时的大好形势，破坏一月革命风暴，搞反革命经济主义。在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深入发展阶段，在接近全面胜利的时候，也就是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尖锐的时候，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矛盾往往就出现得比较多。矛盾出现多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看起来是坏事，但又是好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革命群众运动总是有规律性的，运动愈深入，阶级敌人总是企图把水搅浑，蒙蔽一部分群众，欺骗一部分群众，来破坏大好形势。当前我们看到，这里反复旧，那里也是反复旧，这里反映一派掌权，那里也反映一派掌权。贵池县乌沙公社就成立了一个叫做什么“反复旧”的司令部，把牌子都挂起来了。一个外调的人，到武汉去外调，看到武汉那里反复旧，说现在中央正在支持全国反复旧，谁要是不站在反复旧的这个大方向上，谁就是否认革命，谁就是对毛主席最大的不忠，牌子都挂出来了嘛！有人看到武汉有反复旧的思潮，就往那里跑！我们安庆也是在幌幌动动的，是不是呀？这就成了一种思潮，这里也是复旧，那里也是复旧，到处都是复旧。

有的临时工也在闹事，有个别的把我们基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也都拉去游街了。社会上出现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对形势究竟应该怎么看？到底当前是一个复旧的形势、反复旧的形势呢？还是按照中央“九大”所指出的我们已取得伟大的胜利这样一个大好形势呢？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的人，思想是摇摆的，他看形势往往就是忽左忽右，对大好形势往往要摇摆，把一些局部的现象看成是本质，把支流看成主流，本末倒置。这样，就容易出问题，对中央指示就不能做到坚信不疑，坚定不移，对那些小道消息就非常相信。

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在座的同志们，都有很深刻的教训。听了小道的消息多了，就没有好结果，就会把我们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看大了。我们政策不落实，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有些扩大化，毛主席在“九大”上指出：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我们说在某些地方有扩大的现象，但这个是前进中的缺点，有些由于我们调查研究不够，有些不够揪的也揪了，不该斗的也斗了，在一些单位有这么些现象。但是，这些都不难纠正，很快就可以得到纠正。现在还继续在纠正。

现在的形势是大好的，而且是越来越好，特别是党的“九大”精神和广大群众结合以后，出现了更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正在进一步调动起来，整个形势是一个团结胜利的新形势，是一个赛革命、赛团结、赛进步的新形势，这是当前形势的特点。

第二点就是在新的形势下，出现一些“左”的或右的干扰，这种干扰是来自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还来自我们的队伍内部，也就是由于我们还跟不上“九大”的思想。所以，就产生了“左”的或右的情绪。

我们看形势，要用二分法。团结、胜利的大好形势，这是主流。如果我们看不到团结、胜利的大好形势，看阴暗面多了，就会把现象当本质，把支流当主流，就会颠倒形势，迷失政治方向，就要犯错误。

第三点就是保持清醒头脑，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我们一定要牢牢地掌握这个运动的大方向，要高举起“九大”的团结的胜利的旗帜，坚定不移地前进，不要被各种“左”的或右的思潮和阶级敌人捣乱，迷惑了我们的眼睛，来干扰这个大方向。阶级敌人正在希望我们背离这个大方向，妄图利用我们造反派的同志来干扰这个大方向，来搞一些“左”的思潮、右的思潮，使我们资产阶级派性回潮，看不清大好形势。什么“你那一派的干部解放多了，我这一派干部解放少了；在下放的时候，我这一派干部下放多了，他那一派干部下放少了；结合到办事机构时，你这一派的结合多了，我这一派结合少了”。我们说这些问题，缺点还是有的，但它毕竟是现象，是前进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还只是在少数单位，少数的地区。而且这些问题并不是难克服的，是容易纠正的。现在还有个别人想再拉山头，这样子搞，对谁有利呀？对阶级敌人有利！阶级敌人最希望我们这样搞。这

是不符合当前大方向的。所以，对当前的形势我们要用清醒头脑来看，脑子不要发热。

（二）要加强团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一点是：我们当前大讲团结，加强革命的团结，是“九大”的基本思想，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强大武器，是我们当前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九大”开幕式上首先就号召：“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那我们是不是不团结的呢？是团结的。但是从全国来看，不团结的因素还是存在的，由于过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挑动。我们受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形成了内部的分裂，形成不同的观点，有一些不团结的因素。我们这次大会要以毛主席提出的团结作为大会的指导思想。“九大”开得怎么样呢？完全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个指导思想去落实的，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个大会出现了很好的形势，通过文件，协商名单，选举都是很顺利的。毛主席号召：“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们要把“九大”的精神贯彻下去，要贯彻到各个战线上去。“九大”不久，我们正在进行深入传达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最新指示。坚持不坚持革命的团结，是能不能完成“九大”战斗任务的关键，也是检验我们忠不忠于毛主席的重要标志。所以团结的问题，是当前的一个大方向，是“九大”的基本思想，也是毛主席在新形势下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都要为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为搞好团结，造成团结的气氛，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现在不要搞分裂，不要再重拉山头。再拉山头是违背毛主席的指示的。如果把现在的形势看成是一个复旧的形势，要起来“反复旧”，这是方向性的错误。中央在批示山东王效禹等三同志的报告中就指出，我们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完全体现了革命的三结合的，至少不应该说县以上的革命委员会是旧班底，原班人马。我看今天在座的没几个是原班人马。革委会里那是什么原班人马，不是有几个方面的代表吗？有革命干部代表，革命群众代表，军队代表，至少可以说三结合有两班人不是原班人马吧！就是革命领导干部，他们的思想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群众的教育，世界现有了很大的改造，各方面都变了，是结合到革命委员会中的革命干部。因此，我们不能说当前是个复旧和反复旧的形势，我们不能把群众引导到邪路上去。这个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我

们当前要搞好团结，搞好团结不是空话，这要实实在在地落实。有没有不团结的呀？我看有。我们大家现在有少数的资产阶级思想就不利于团结，要很好地解决。要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学习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来解决好这个问题。对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做到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不能摇摆，要跟紧。我们要来赛团结，赛进步，赛革命。

第二点就是要坚决落实“九条”、“五条”。坚持“一碗水端平”的原则，这是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的基础，也是加强革命团结的基础。对中央关于安徽“九条”、“五条”批示的落实，坚决做到“一碗水端平”。有些地区有些问题，做的还不够，还要继续努力，继续落实。这里要注意两个倾向，一种是在有的单位没有或基本没有按“九条”、“五条”办事，或多或少的、程度不同的存在着一派掌权。在组织变化、人员下放、调整革委会办事机构等问题上，掌握不够好就出现这种倾向，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一种是片面的反对所谓一派掌权，有片面性就不完全符合事实。要求完全对等，事物总是不能那么绝对的，都是相对的，多一个，少一个，这种现象总是要出现的。这也是当前值得注意的又一个倾向。

第三点就是要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坚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当前资产阶级派性在有些地区和单位有些回潮，这是值得严重注意的。要本着各自多作自我批评的原则来克服，要在发展团结、胜利的新形势下，做出新贡献。资产阶级派性是破坏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破坏革命团结的一条大毒蛇，必须坚决反对。要善于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轨道上来。

在出现不团结的地方和单位，要坚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的原则，要高姿态，要坚持唯物辩证的观点，对己、对事都要坚持一分为二。

（三）坚持“三不脱离”，加强思想革命化，当好群众代表。

这个问题在你们这个会议上我已经讲过了一次，对这个问题还是要经常讲、经常强调的。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在思想上都接受了，对毛主席提出的群众代表“三不脱离”的指示，我们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很好的认识，要看到这是毛主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关系到我

们国家不变颜色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亡党不亡党、亡国不亡国的问题，这绝不是小事。

革命的群众代表参加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新生的红色政权最大的特点，最大优点之一，它使革命委员会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我们“三代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革命委员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助手，我们一定要重视、贯彻毛主席的这个指示，要做到参加生产，不要脱离生产。我们听说有个别的同志，从造反以来，就没有回到本单位工作过，没有回厂参加生产。我们“三代会”的同志们，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做好，起到桥梁助手作用，充分发挥我们“三代会”群众代表的作用。这是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和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新的更大胜利的重要因素。

群众代表坚持“三不脱离”的原则，是充分发挥群众代表作用的关键。我们在座的有参加“九大”的代表好几个，你们都是在毛主席身边听了毛主席的指示的。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听到这个指示，就赶快打电话回来，原来我们各级革命委员会值班占的群众代表很不少，值班就使群众代表回不了本单位。参加本单位的生产比在革委会值班更重要，值班无非是处理些日常事情，接待群众来访等等，这些事情，各级办事人员处理处理就可以了，办事机构人员，就是办办事嘛！我们代表要很快地下去，回到单位去。我们只有“三不脱离”，才能够代表群众，才能反映群众的事情和要求，才能带领群众掌好权，用好权，群众也才能对我们代表放心，才能信得过。时间短一些，回去比较容易，时间长了，回去就不好意思了。越不好意思回去顾虑就越多，群众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因此，我们经常回去参加生产，和群众的关系就会好了。

坚持“三不脱离”，是实现思想革命化的必由之路，是群众代表锻炼成长的必由之路。

希望同志们更好地举起“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努力地学习“九大”光辉文献，加强思想革命化，加强革命的团结，夺取新的胜利，在夺取新的胜利中，为人民立新功。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来源：安徽省工人代表大会委员会首届常委（扩大）会文件汇编》 安徽省工人代表大会委员会 一九六九年六月三十日

一九六九年六月三十日，李德生在安徽省三代会常委扩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同志们：

在全国人民认真学习“九大”文献，贯彻“九大”精神，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政策和各项战斗任务的热潮中，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下，省“三代会”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谈。我代表省革命委员会向这次会议表示热烈的祝贺！

全国亿万军民在“九大”团结、胜利精神的鼓舞和推动下，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事业，更加蓬勃地向前发展。革命出现了新的形势。各级革命委员会，大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都围绕着手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总结经验。寻找差距，制定措施，正在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单位的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正在充分调动起来。各条战线的斗、批、改开展得更加深入，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一些“老大难”单位正在改变面貌。全国各族人民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形成了空前的革命大团结。这个大团结，是在毛泽东思想大普及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个革命的大团结，是我们完成“九大”战斗任务，战胜共同敌人的可靠保证。这个革命大团结是当前大好形势的显着特点。

我省的形势和全国一样，也是空前大好的形势。省党员代表会议以后，各专（区）、市、县也召开了党员代表会议。目前各专、市、县党员代表会议都已基本结束了。党的“九大”精神同全省广大革命人民见面，已经化为革命的强大动力，极大地推动了全省各条战线的斗、批、改。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同志克服一般化的领导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培养典型，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总结落实毛主席政策的经验。全省的基层单位已经或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全省革命人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高举“九大”的团结旗帜，大讲团结的意义，大找团结的差距，大订团结的措施，出现了一个个人讲团结，处处是团结的大好局面。

最近，中央两报一刊重要社论《高举“九大”的团结旗帜，争取更大的胜利》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团结起

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巩固胜利，发展胜利，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全省范围内掀起了一个赛团结、赛进步、赛革命，夺取更大胜利的高潮。

在这样一个大好形势下，省“三代会”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这个会议的召开，是很必要的，也是很及时的。把这个会议开好，对于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对于团结全省革命人民，去巩固胜利，发展胜利，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省“三代会”成立三个多月以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推动我省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譬如讲斗、批、改运动。根据毛主席的教导，革命还要继续前进。我们千万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可忘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九大”精神为红线，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认清形势，统一思想，总结工作，高举“九大”的团结旗帜，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毛主席的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号召，高度概括了“九大”的基本精神，是党的“九大”的一条光辉路线，是照耀我们今后一切工作的灯塔。这一伟大号召，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团结起来，是夺取更大的胜利的保证。林副主席最近教导我们：“我们自己要团结起来，不能给敌人团结起来把我们孤立了，我们要自己团结起来，把敌人孤立起来。今天闹不团结，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我们自己。”这些问题“九大”精神，要很好领会，很好贯彻。林副主席的这些教导，指出了当前团结的伟大意义。在阶级阵线清楚的今天，我们就是要大讲团结。这是当前搞好斗、批、改运动的需要，是继续革命的需要，是反帝反修的需要。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里头有具体内容的。干啥事，什么具体的胜利，怎么个团结法，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我们解决团结问题指明了方向。毛主席最近指出：“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

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这就是说，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革命要团结的人越多越好。不管你是那个山头的，不管你是 G 派还是 P 派，总是要多团结一些人好。搞孤家寡人政策，是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同时，我们“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还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这就是说，我们讲团结，要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 党的周围，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而不是搞“多中心”的小集团主义，更不准重拉队伍，另立山头。这里还要明白团结的目的。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也就是说，我们讲团结，要有利于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而不是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有利于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而不是削弱革命委员会。这就需要我们认真领会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克服我们的错误思想，统一我们的认识，达到革命的团结，达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这也是我们开这次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譬如讲“反复旧”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大家都认识清楚了呢？“复旧”问题究竟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是主流问题还是支流问题？“反复旧”是不是当前我们斗争的大方向？这些问题大家应当讨论清楚，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这样才能谈到团结。我们认为“复旧”问题是支流问题，是小问题。“反复旧”是背离了当前我们斗争的大方向。可能有人不同意这个看法，可以讨论。再比如说领导关系问题，权的问题，都应当有个统一的认识。最近不是有人说“群众组织没有权”呀，“群众代表是陪衬”呀，等等议论吗？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上次，我们和“三代会”的同志一道学习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最新指示的时候，我提出要“三代会”的同志认真讨论一下，不知“三代会”的同志讨论没有。我们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现在在谁手里，向谁争权，什么才叫有权，这些问题，我们都要有个统一的认识。只有统一了认识，才能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才能讲到团结。要讲团结，对于我们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自觉革命的问题。没有自觉革命，自我革命的精神，不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那还讲什么团结。老虎屁股摸不得，一谈就崩，那怎么团结呢？我们都要有团结的愿望，自我革命的精神，这样才能搞好团结。

同志们，你们都是群众代表，你们怎么自我革命、继续革命呀？群众代表就要代表群众。代表群众就必须联系群众。如果脱离了群众，就会失去代表性。今天到会的“三代会”同志，都是群众组织的头头。但是，不能搞“三脱离”。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离实际，不要脱离劳动。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你们当中不少是“九大”代表，这次在北京，中央首长又多次传过了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所以说这个问题极为重要。可能有的人说，他们是中央委员会的，我们是革命委员会的。那么，我们就看看这个问题对我们有没有指导意义呀？假如我们常期蹲在革命委员会里面，搞事务，我看那就不能保证“三不脱离”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值得大家认真讨论、深思。

这次在北京开“九大”，康老讲到山东有个老模范张富贵，他现在就在搞接见了嘛！一年只参加了几天劳动，这样下去就要变成机关人员，就要脱离群众了。

有人说，我们还不如一个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力大，机关人员还可以开个条子，我们连开个条子的权都没有。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们是主要抓思想建设呢，还是管事务性的事呢？如果我们革命委员会一百五十多个委员都管事务，那么，一天到晚不出大门都搞不了。我说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研究一些重大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也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我们这次会议就要通过学习讨论，明确这些问题，得到一个统一的认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也是我们这次会议所要达到的目的。最近，我们发现有的地区在传达、落实“九大”精神的时候受到了干扰，生产也受到了影响。譬如什么：“反复旧”喽。当然，有的地方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是有的，这些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落实政策来解决嘛！但是，有的地方有的人就借这个机会搞“翻案风”，什么一派掌权喽！下放时你少我多喽！这一派那一派喽！这样搞的不好，又可能出现“一风吹”哩！“九大”的时候就讲过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的整个形势，是不是一个复旧的形势呢？参加“九大”的同志都知道，“九大”结束后，山东的、湖北的，还有贵州的同志都留下了，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地方的形势并不是复旧的形势，但就是非要搞什么“反复旧”。

现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十二中全会和这次“九大”，就是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粉碎了，把刘少奇的一小撮揪了出来，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又被我们夺回来了。这是个主

流，是大好形势。但是我们有的人，不学习中央对总的形势的指示，就是要搞什么“反复旧”。我们说，至少我们的革命委员会是“三结合”的吧？县以上的革命委员会不是都有军队代表，革命干部代表，群众代表吗？当然，有的个别单位，基层单位有复旧现象。但是，这不是主流，不是大局。所以我说，我们看形势，就是要紧跟毛主席的指示，紧跟中央的指示。

总的来讲，我们这次会议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九大”精神。要在传达的基础上，很好的领会，很好的落实。

要落实“九大”精神，首先就是要解决团结问题。要狠抓团结，团结起来就有力量就统一。这是胜利的保证。

当前这个团结问题，是毛主席的一个伟大战略部署，是在新的形势下的一个战略部署。正如毛主席在视察三大区以后，提出的大联合，那是毛主席的一个伟大战略部署，现在呢？讲团结问题，也是毛主席的一个战略部署。

我们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么几个问题：团结问题，领导班子问题，发挥“三代会”作用问题，当好群众代表问题：“反复旧”问题，以及“三代会”和革委会的关系问题。当然，要有个重点喽！这中间重点问题是团结问题。一定要明确团结的意义，对团结问题认识的深度还要提高。

“三代会”有没有影响团结的因素呀？我看，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必须落实“九条”“五条”。“九条”“五条”这是两个重要的历史文献。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是执行“九条”“五条”好的地方，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就巩固，就发展，领导班子就团结；凡是执行“九条”“五条”差的地方，就会出现有反复。现在安徽的形势比较好。好在什么地方呢？好在大家对落实“九条”“五条”比较重视，落实的比较好。但有的说：“我们这里已经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了，不需要落实‘九条’‘五条’了。”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当然，“九条”“五条”的落实，总的情况是比较好的，但是有些基层单位，落实还不够好，还需要继续落实，很好的落实。“九条”落实有个障碍。当时曾经撒下一个不好的“种子”，说“九条”是偏听偏信的东西。说当时在北京汇报时一派的人多，材料多，另一派的材料少，中央没有很好的深入了解情况，“是压出来的”等等，这是煽动对“九条”不满的语调。这个问题要很好的认识。“九

条”是不是就没有经过深入地了解情况呢？当时各方面的代表不是都在吗？有的小道消息说“九条”是康老一个人搞的，所以安徽就出现有人反康老嘛！

“九条”是发到全国的。对全国都有指导意义。后来一落实，安徽的形势很快就好了嘛！所以，我们现在要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巩固革命的大联合，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指导，搞好团结。以“九条”“五条”为基础，把这次会议开好。你们“三代会”要来个比赛，赛团结，赛进步，赛革命。看谁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九大”精神学得好，用得好，看谁的会议开得最团结，看谁的“九条”“五条”落实得好。“三代会”要互相学习，共同提高。会议以后，也要看哪个群众组织在革委会的领导下作用发挥得好，助手当得好，看哪个组织的工作朝气蓬勃。

同志们，你们都是群众的代表，群众组织的头头，你们应当把这个头带好。带头斗私批修，带头搞好团结。要继续革命，“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团结全省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夺取更大的胜利！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来源：《安徽省工人代表大会委员会首届常委（扩大）会文件汇编》

安徽省工人代表大会委员会 一九六九年六月三十日

肆、浙江省

伍、山西省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鼓舞下，全国形势大好。山西省同全国一样，形势也是好的，但是，在太原市、晋中、晋南的部份地区，混在各派组织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利用资产阶级派性，蒙蔽一部份群众，抗拒执行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犯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一、组织专业武斗队，搞打、砸、抢、抓、抄，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革命秩序。

二、抗拒实行中央决定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方针，破坏已经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另立山头，制造分裂，提出“武装夺取政权”的反革命口号，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

三、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殴打、绑架、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四、破坏铁路、公路、桥梁，武装袭击列车，抢夺交通工具，抢劫旅客财物、危害旅客生命安全。

五、抢占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私设银行、抢劫国家大量资财。

六、用武力强占地盘，构筑武斗据点，实行反革命割据，残害人民群众，向群众敲诈勒索，派粮派款。

七、煽动、威胁工人停工停产，煽动农民进城武斗，破坏工农业生产和国家计划。

中央认为，这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破坏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的罪行，是违反广大人民利益的，山西广大人民极为痛恨。为此，中央决定：

一、中央重申过去发布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和其他通令、命令、通知、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坚决、彻底、全部地执行，不许违抗。

二、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各种形式，各种名称的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装备。凡放下武器的，或回原单位，或由解放军进行集中训练。

武力强占地盘，拒不执行本布告、负隅顽抗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逃跑流窜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追捕，归案法办。

隐藏、转移武器，利用国家的工厂和物资私造武器的行为，都是严重的犯罪，必须依法论处。

三、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车辆和其他战备物资，一律不许侵犯。抢夺解放军的一切装备，必须无条件地全部退回。对挑拨军民关系的阶级敌人，要给予坚决打击。

四、立即无条件恢复铁路、公路交通运输。撤销同蒲路南段非法的“三·一八次”列车。冲击车站，袭击列车，破坏铁路、公路运输，抢劫车站物资、车辆，搜查、抢夺旅客财物都是土匪行为。对极少数坏头头和反革命分子，要逮捕法办。

五、银行、仓库、商店等国家财产，任何人不得霸占、抢掠。要严办抢劫国家财产的主犯追回抢劫国家的一切物资和资金。

六、对杀人放火和其他罪大恶极的现行犯罪分子，应当发动群众检举；对确有证据者，要列出他们的罪行，交给当地群众家家户户讨论，并依法惩处。

七、对煽动、威胁职工离开生产岗位和工作岗位的坏人，必须依法惩办。至于一般受欺骗而离开生产岗位和工作岗位的群众，应进行教育，动员他们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自本布告公布之日起，逾期一月不回工厂生产、不回机关工作者，工人、职员停发工资。如继续对抗，长期不回者，责成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视情况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

对回本单位的人应当欢迎，保证其人身安全，不许歧视和打击报复。如加迫害，必须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八、凡分裂革命大联合、破坏革命三结合的行动，另立的山头，一律都是非法的，中央概不承认。重新拉起的队伍，都要立即解散，实行归口大联合。

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两派中的坏人，由两派群众各自清理。要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一小撮阶级敌人要坚决打击，同时也要执行毛主席的“给出路”的无产阶级政策。

中央相信，山西两派群众都是要革命的。中央号召山西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认真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发展、巩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大胜利！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陆、贵州省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九日，贵州在京开会代表的意见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耐心教育下，在“九大”精神鼓舞下，我们贵州省全体党代表、省革委、省军区以及四十一师、独立师的领导干部，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批发的极为重要的对贵州文化大革命的两个“红五条”，和中央负责同志的建议，起草了一个贯彻“九大”和两个“红五条”的意见。是否妥当，请中央批示。

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贵州省“九大”代表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贵州省军区陆军第四十一师贵州省独立师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关于落实“九大”提出的战斗任务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发的指导贵州文化大革命的两个“红五条”的意见

（一）关于认真贯彻“九大”精神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我们：“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全国人民的这一伟大号召，给我们指明了继续革命的方向和道路。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继续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的总方针。是核心，是灵魂。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九大”会议上极其重要的讲话，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创造性地、深刻地阐明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科学地总结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明确地提出了今后的战斗任务，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纲领。

我们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表示，完全拥护，坚决照办。

为此，我们要坚决做到：

一、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一个空前规模的深入持久的学习、宣传、执行、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极其重要的指示、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的群众运动。开动一切宣传机器，报纸、广播都要集中地长期宣传这个唯一的政治中心内容；广泛组织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广泛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级革命委员会、部队各级党委、各级三代会，都要对照自己的工作，找出差距，落实措施。总之，全省军民动员起来，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最大的政治上来。

二、“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约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没有革命的团结，就没有革命。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就一定胜利。各级革命委员会、各级三代会和全省革命群众，都要本着这个极其重要的精神办事。不讲不利于团结的话，不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在工作中犯了错误的时候，闹无原则纠纷的时候，都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务必执行“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务必做到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小局服从大局。加强党内生活，有话当面讲、及时讲。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开展谈心互助活动，互相帮助，互相安慰，风雨同舟。认真地、反复地学习“古田会议决议”这一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光辉文献，每个同志都要自觉做到不搞小宗派、小山头、小团体主义。一切革命的同志，务必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和粉碎敌人的挑拨离间，破坏我们革命团结的阴谋。

三、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党、政、军各级领导要搞好调查研究，抓好典型。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完成斗、批、改的各项任务。“要认真总结经验”，“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幺搞的，领导是怎幺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要认真执行毛主席规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根据贵州省的情况，尤其要注意对待群众的政策和对敌斗争的政策，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为此，各级革命委员会、部队各级党委，都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真正做到胸中有全局，手上有典型。

（二）关于落实两个“红五条”

一、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指导贵州文化大革命的两个“红五条”，以及中央负责同志最近多次给我们的亲切指示，是对贵州全省军民的最大关怀，最大教育，最大支持，最大鞭策，我们坚决拥护，坚决照办。

二、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我们也确实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中央及时纠正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诚恳接受中央的批评教育，坚决检查，坚决改正。

三、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我们，大敌当前，一切革命的同志要团结起来，要共同对敌，要准备打仗，要争取更大的胜利，用革命和生产的新成绩，回击苏修叛徒集团和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为此，全省各级革命委员会、部队各级党委、全省革命群众，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动员起来，务必以大局为重。准备打仗，团结对敌是大局，实现“九大”提出的战斗任务是大局，完成工业生产和三线建设任务是大局，搞好抗旱斗争和农业生产是大局。不顾大局，是忠不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现实的考验。我们要和一切不顾大局的思想作斗争，将贵州的局势迅速稳定下来。

四、“红五条”指出：“要继续巩固和发展已有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任何另拉起‘山头’的一切分裂行动都是错误的，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都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认真搞好斗、批、改。’”为此，全省革命群众，要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要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一切另拉起“山头”的群众组织，应说服他们，迅速撤消，广大群众应迅速回到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工厂、机关、学校、事业单位，各公社、大队、生产队，一定要正确对待他们，欢迎他们，团结他们。

五、“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革命委员会是新生的红色政权，人民解放军是政权的支柱。全省军民要坚决走“拥军爱民”、“拥政爱民”的道路，要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人民解放军要坚决尊重、信任、支持、帮助、保卫革命委员会，做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坚强后盾；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广大群众要坚决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学习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坚决粉碎阶级敌人破坏军政、军民团结的一切阴谋诡计。

以上意见当否，请中央指示。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贵州省军区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九日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日，贵州省军区在京常委对解决贵州问题提出五条措施的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关怀下，我们来到北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在“九大”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重新学习了两个“红五条”。我们和两师领导同志受到了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教育。对我们前一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看的更清了，方向明确了，信心更足了。

由于我们没有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正确方针，指导思想有错误，把贵州存在的某些问题看重了，要求太急了。省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没有很好贯彻毛主席“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的教导和坚持“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在毛主席亲自批发的“红五条”下达后，我们仍没有深刻领会中央精神，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落实“红五条”。当革命委员会工作处境困难时，我们没有积极支持帮助革命委员会，反而对革命委员会的同志有埋怨情绪，影响了军政、军民的团结。

产生这些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头脑中的私字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作怪。我们的错误影响了贵州局势的稳定和三线建设，影响了“九大”精神的贯彻，干扰了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的落实。回想起来，我们的心情非常沉痛。我们诚恳地接受中央首长对我们的批评教育。我们一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党的“九大”精神为纲，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全面落实中央的两个“红五条”，把贵州问题解决好，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

我们的决心是：

一、一定要顾全大局，搞好军队内部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离开了毛泽东思想， 只见局部，不看全局；强调小道理，不管大原则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一定从中吸取教训，坚决搞好省军区党委内部在毛泽东

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认真组织部队学习毛主席在“九大”，所作的极其重要的指示和“古田会议决议”，认真学习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新党章和“九大”重要文献，认真学习两个“红五条”。加强部队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教育、组织纪律性的教育，促进部队思想革命化，保持部队的绝对稳定，团结一致共同对敌，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和蒋匪帮的战争挑衅。

二、坚决稳定贵州局势，坚决拥护、支持、帮助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这是贵州的大局。提出“打倒李再含”的口号是错误的。我们坚决尊重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组织部队大张旗鼓、深入持久地向群众宣传“九大”精神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对贵州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大力向群众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坚决维护革命委员会的威信，大力帮助革命委员会工作的正常进行。

三、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认真向八三四一部队学习。部队分别找同自己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开谈心会，主动作自我批评，增强团结。引导群众组织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认真搞好斗、批、改。”坚决反对任何另立山头的分裂行为。为此，我们将相应调整部队的“三支”、“两军”任务，由驻贵州各部队按系统，按地区，分别担负起“三支”、“两军”任务，尽快把贵州局势稳定下来。落实“九大”所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四、积极作好复员退伍军人工作，省军区、军分区，各县人民武装部要认真作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并同有关部队联系共同抓好他们的教育。要正确对待持有不同观点的复员退伍军人。加强民兵教育，使复员退伍军人和民兵都成为执行“红五条”的模范，坚决支持革命委员会，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

我们坚决响应中央负责同志的号召，发动部队和民兵积极投入抗旱斗争，夺取今年农业大丰收。

我们的决心是：

一、一定要顾全大局，搞好军队内部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二、坚决稳定贵州局势，坚决拥护、支持、帮助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这是贵州的大局。提出“打倒李再含”的口号是错误的。三、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认

真向八三四一部队学习。四、积极作好复员退伍军人工作，五、为了有效地解决好贵州问题，我们建议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举办贵州学习班。

当否？请中央给予指示。

最衷心地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中共贵州省军区委员会在京常委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贵州省军区处理贵州问题的两个报告

1969.05.23；中发 [69] 25 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贵州省各级革命委员会，贵州省军区、各军分区、各县、市人武部，各地驻军，贵州省“九大”代表，各地革命群众：

中央同意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贵州省军区关于落实“九大”提出的战斗任务和毛主席批发的两个“红五条”的意见和贵州省军区对解决贵州问题提出五条措施的报告。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根据“九大”精神，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学习林彪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加强部队内部、群众之间和军政、军民的团结，广泛宣传中央两个“红五条”的指示，纠正各方面所犯的缺点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稳定贵州局势，搞好抗旱斗争，加快三线建设，实现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部署，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内部文件，不许登报）

柒、河南省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王新在信阳地区革命委员会第三次全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同志们：

我们这次出来，主要是到各地学习同志们的先进经验。走了几个县，看了十几个大队，听了贫下中农同志、基层干部、下放干部和县革委同志介绍的经验，对我们很有教育，很有启发。到这里来，也是想先到县里和基层学习，后来听说同志们正在开会，这也是学习的好机会。听了地革委同志的汇报，感到你们的会议开的很好，特别是有的县、社在会上介绍了一些好经验，讲的很好。我在这里表示祝贺。我讲几个意思，供同志们参考。

一、我们学习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我们作好各项工作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指导方针，也是我们更加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一项最根本的任务。只有很好地领会毛主席的这个指导思想，用毛主席这一伟大理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分析我们的形势，才能认清现阶段的政治方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我们学习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要搞革命，要同阶级敌人作斗争。我们面前的阶级敌人，一是国际的，一是国内的。国际上的阶级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这是武装的敌人。这些敌人存在，战争就存在。他们是要用武力来镇压革命的，是企图用战争的办法来搞垮我们政权的。所以我们要遵照毛主席教导，社会主义革命过程还要革这个命，“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在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历史时期，假如我们看不到这些阶级敌人，没有准备打仗的思想，放松了警惕，武装敌人打来了，我们的革命就会受挫折，受损失。我们经过几十年的武装斗争，推翻了敌人的反动统治，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完成了民主革命时期的任务。今天，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要准备打仗，要对付来自国外的武装侵略，巩固我们的政权。在这个时期，忘记了国际上的武装敌人，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有觉悟的革命战士，我们的政权就有被敌人推翻的危险。同志们要以战备的姿态抓好我们的革命工作，以战备的姿态搞好斗、批、改，以战备的姿态搞好生产，以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把一切工作和准备打仗联系起来，把一切工作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过去在老根据地，都知道抬担架，送粮食，送鞋子，送儿参军。那时候一切为了打垮蒋介石，夺取全国的胜利，一切工作都与总的任务联系起来。现在，学习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就必须树立这样一个思想，防止敌人以武装搞垮我们的政权，无论那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用这种继续革命的思想指导我们的工作，就会有不同的劲头。没有准备打仗这样一个觉悟，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就会忘掉斗争的大方向，就会忘掉革命的大目标。

在国内，就是要同不拿枪的敌人作斗争。要按照毛主席的号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搞好斗、批、改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地、市、县，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都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搞好斗、批、改”，使各级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列主义者手里，掌握在忠于毛主席的人的手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教导我们：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仅要把敌人的反动政权摧垮，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不仅在经济上把个体所有制改变为集体的、全民的所有制，还要进行政治思想革命。我国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政治大革命，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大革命。在这场大革命中，把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挖出来，把钻到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的敌人挖出来。同时，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人们的世界观，大立毛泽东思想。不继续抓上层建筑里的阶级斗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的政权就有被资产阶级用“和平演变”的方式篡夺的危险。列宁的故乡苏联，就是只搞了经济上的革命，没有搞政治思想上的革命。列宁主义没有在苏联人民中广泛地传播，结果被修正主义篡夺了领导权。所以，我们要按照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完成经济上的革命以后，必须继续把政治思想上的革命进行到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教导我们：“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我们要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时候，要同批判人们头脑中的“私”字联系起来。政治上的斗争，经济上的斗争，思想上的斗争，三者是联系着的。修正主义路线

就是利用人们头脑中的“私”字，使你不知不觉的演变为资本主义。在农村，就是利用人们头脑中的“私”字，搞自发势力、副业单干、资本主义倾向。大叛徒刘少奇搞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是适合“私”字要求的，是把农民引到复辟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的。他在工厂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那一套，在教育战线上散布的“三脱离”、“读书做官论”，在文艺战线上，搞“三名三高”，等等，都是利用人们头脑中的“私”字，叫你只顾个人利益、眼前利益，不顾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忘记无产阶级的利益，忘记无产阶级政权。这样就必然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机会主义，都是片面强调工人中的眼前利益、个人利益、经济利益，不是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斗争。我们时时刻刻不要忘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中，我们站在那一边，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这是对每一个领导班子的重大考验。假如一个领导班子，让群众只顾个人利益，只顾眼前利益，忘记了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就会导致资本主义泛滥，集体经济就要遭到破坏。这个无产阶级政权机构中，就可能出现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政权就会变颜色。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谁战胜谁。如果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就必然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共产党员，就是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同志们都要用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思想，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来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对待一切。

目前在城乡开展的整建党运动，要特别注意具体落实毛主席“五十字”的建党纲领，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武装党员，提高党员社会主义革命的觉悟，提高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使我们党的各级组织都能按照新党章的要求进行建设。我们看过的那些大队中，有些大队文化大革命中经过激烈的斗争，特别是经过整党，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掌了权；有的大队还没有决战到底，一部分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同坚持错误路线的人还在那里斗争着；有的单位，整党走了过场，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员、干部并没有掌握领导权，支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却把持着领导权。每个大队里边都有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只要通过整党，党支部的领导权掌握在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人的手里，那里的局面很快就起了变化。新蔡县刘小庄大队，支部书记是比较好的，几年来一直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抵制资本主义倾向。经

过整党，进一步提高了党员和群众的路线觉悟，又充实了新鲜血液，去年还吃统销粮，今年就完成征购十七万斤。也有的大队至今还没有解决问题，没有触动。项城县有一个大队，单干风严重，走资本主义道路，吃统销粮，救济款，支部领导是支持资本主义倾向的。有一个党员，和一个贫协代表，一直和他们作斗争，他们用了很多办法虐待贫协代表，把这个党员也弄到林场去了，整党以后还是原班人马。这个大队整党，是走了过场的。新蔡县有一个党支部，大队几个干部互相认干亲，群众说他是“契家网”。以支部书记为首结成一伙子，在农村搞投机倒把，支持资本主义倾向。在整党的时候，他们把一个投机倒把分子指定为参加整党的“群众代表”。整党以后，大忙季节，这个支书要盖六间房子，占用生产队林场一亩土地，叫生产队给他兑草盖房，叫地主富农给他种小片荒、抱孩子，简直是法西斯专政。这里也有人和他斗争，问题是公社有的同志，没有支持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我们有些党员，确实不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是很大的问题。毛主席早就讲过，有一些人挂着共产党的招牌，但是并不是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有的人就是这样。他参加党组织会议的时候，是个党员，回到家里就积极搞单干，到了集市上又成了小商人、经纪人、投机倒把分子，搞资本主义那一套。我们的干部、共产党员，党对你的要求是什么呢？是让你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让你代表无产阶级去专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你在那里不是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不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而去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支持资本主义倾向，支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下去就成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伟大发展。

有些同志社会主义觉悟很低，不从路线上看问题，有许多糊涂认识。说：某某人虽然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可是他和地富界限划的很清。我们应该认识，被打倒的敌人，向往的是复辟资本主义，你同敌人走的是一条路嘛，怎么划清界限了呢？他说的划清界限，就是没有接受地、富、反、坏、右的贿赂，没有和他家庭勾勾扯扯，这是从个人来讲的。从阶级上看，从阶级的利益、阶级的要求来看，你和地富完全站到一块了，并没有划清界限。还有的同志衡量人的标准是“三老”，老贫农、老干部、老党员。贫下中农，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是农村中革命的依靠力量。但是“三老”支持走资产主义道路也是错误的，不能光讲成份，光讲历史，不讲路线斗争。过去，搞民主革命，你不去狠斗地主、老财这些封建势力的代表，要是包庇地主，就是丧失立场；今天搞社会主义革命，你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去支持资本主义势力，就是丧失阶级立场。还有一种叫做“老好好”，据说这种人在某些人面前还很吃香。其实他是只顾自己，不顾集体，什么损害国家集体的事，在他面前都能过去，不批评，不斗争，这种“老好好”说穿了是“老不好”。还有的同志看人不讲政治，把那些专搞挣钱，不择手段挖社会主义墙脚的人，夸奖为“能干”。能干不能干要有个标准，要看他是干社会主义还是干资本主义。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的能干者，绝不能要那种资本主义能干者。这些糊涂认识，说明我们有些干部，就是不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观点来分析问题，这是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界限认识不清的表现。毛主席说：“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我们要努力提高这个识别能力。要狠抓新党章的学习，用新党章教育我们的党员、干部，提高社会主义革命的觉悟。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革命最伟大的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就是在历史上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制度，而且还要消灭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思想，包括我们自己头脑中的“私”字，所以“要斗私，批修”。不懂得这一条，就不懂得继续革命，就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不革这个命，社会主义这一关你就过不去。有的同志出身成份都好，为什么代表资产阶级、支持搞资本主义呢？祸根就是一个“私”字。

两条路线的斗争，很多是从经济上表现出来的。在经济部门中，有的人搞贪污盗窃。有一个很小的供销社里就贪污三万五千元。这些人完全是在革命队伍里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在农村是搞资本主义倾向，搞副业单干，瞒产私分，损害集体经济。这个问题很明显，一接触群众就可以看出来。到先进大队，不管问那个群众，收多少，分多少，交公粮多少，储备多少，都能理直气壮地说出来。一到落后大队，就吞吞吐吐说不上来，一问三不知，叫去问会计，干部也是你看我我看你，说不到一块，这里边就有问题。有的队是打光分光，粮、棉、油分了以后上自由市场，反过来又向国家要粮食。这是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关系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决不能看成是小事情。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我

们要把所做的一切工作，都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顾全党的大局，全国的大局，无产阶级利益的大局，这就是政治挂帅。不讲国家，光讲小集体，就是本位主义。不讲国家、集体，光讲自己的私利，方向就错了。我们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我们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必须摆正。片面的照顾个人，不顾整体，不顾国家，就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表现。建勋同志在十月份省革委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反复地强调了这个问题。同志们对这个问题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要树立为革命种田的思想。先进的队要为国家多贡献，这就叫革命精神。如果种田单纯是为了吃饱就算完了，只顾个人利益，眼前利益，不关心国家，这就把群众引导到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邪路上了，这就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巩固工农联盟。在安排种植、分配、积累上，要服从整体和国家利益，正确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社、队以上干部应该十分注意的问题。

总之，我们学习和执行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革命历史的转折关头和每一阶段，总是有一些人要垮台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也是一样，每个阶段都有一些人停顿下来，不继续革命。所以，我们在同武装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中，要经得起战争的考验，在国内要经得起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考验。

二、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狠抓领导班子革命化。林副主席讲，领导班子就是政权。领导班子革命化的问题，不要看成是几个人的问题，要看成是这一级政权，一级党的领导，究竟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所以，我们整党建党中，要在切实搞好思想吐故纳新的基础上，按照党的阶级路线认真组织好各级党组织的领导班子，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领导班子革命化的程度，标志着这个班子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的程度。决定一个政权的性质，就看执行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如果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权。如果是执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那一套，就可能由无产阶级的政权变成资产阶级的政权，由革命的变成不革命的，好人也可能变成坏人。阶级斗争是任何人回避不了的，不站在这边，就要站在那边。所以政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领导班子革命化的程度，从他那个地方的形势也可以观察出来。我看过的那些地方，有的形势很好，为什么好？就是人的思想革命化好，领导班子革命化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能够贯彻执行，形势就好。一切先进单位最根本的经验，一切差的单位最根本的教训，找来找去，最基本的好就好在领导班子是坚决革命的，差就差在领导班子革命精神不振，革命劲头不足，不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过去打仗的时候，你这个连的领导人能够冲锋陷阵，不怕苦，不怕死，这个连的战斗力就强。你这个大队支部、公社党委的成员，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革命化好，坚决地抵制坏人坏事，这个单位社会主义革命空气就浓厚。所以，形势问题实际上是个领导班子问题，只有这样看才能看到问题的本质。有些单位不是这样看，形势不好，就是不知道从领导班子中找原因。我们在一个县，摸了三个大队的情况，一个变好了，另两个里面的阶级斗争很尖锐，长期得不到解决，什么原因呢？就是公社不支持坚持正确路线的人。我们的公社干部，有个别人土改时是积极分子，在那里时间长了，拉一派旧势力，搞吃吃喝喝，拉拉扯扯，完全成了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还有的人，有一些错误的认识，一说就是“不团结”，就是“宗派斗争”，把两条路线斗争掩盖了。什么不团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能讲团结吗？宗派斗争是有的，但已经不单纯是宗派斗争了。有的利用拉宗派，走资本主义道路。有的人不参加他那个宗派，就说他是闹不团结，总是不从两条路线斗争上看问题。所以，那个大队的问题长期解决不了。落后的大队，问题长期解决不了，根子就在公社。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公社领导人头脑不清醒，看问题的标准不对头；另一种他本身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不把领导班子里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揭开，问题就解决不了。

我们要做好千百万人的工作，首先要抓好千百万人的带头人，就是要抓好领导班子。这是非常重要的。只要领导班子清醒，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什么单干风，投机倒把，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关系，都可以解决得好。不抓班子的思想革命化，就抓不住两条路线的斗争。有的同志只满足于对地、富、反、坏、右的斗争，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就是要斗。但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下，仅限于对这类敌人的斗争是不够的。在一个大队，选一个明显的地富分子当革委会主任不可能，阶级敌人是通过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找代理人的办法来篡夺领导权的。所以，还要抓对党内走资本主义

道路当权派这种最危险敌人的斗争。在一个村子，东邻西舍，谁是什么人，群众是清楚的，为什么还有漏网的地富？就是我们革命队伍内部的人把他庇起来了。只有抓领导班子革命化，才能抓从根本上，抓在点子上，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一个县就是三百来个大队，支书、副支书就是五、六百人，到底那个大队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你搞不清楚？一个公社就是二十来个大队，加上一、二、三把手还不到一百人，你就搞不清楚？搞了多少年，到底谁在干什么你就不了解，政权的实质你就没有去抓，不是最大的失职是什么？尽管你天天忙得要死，不抓领导班子革命化，我看这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各种现象，各种工作，对领导班子都是考验，一个公社、大队干部那几十个人就抓不住，这就是个考验。

要有革命精神，要有斗争的精神。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就要斗争，谁有错误思想，就向谁斗争，谁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向谁斗争。敢不敢在党内、在革命队伍内部抓两条路线斗争，这是对领导班子敢不敢革命的重要考验。干革命就得要搞斗争。现在有些“老好好”，其实不好，他不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又不支持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好在那里呢？有些人说他糊涂，为什么搞社会主义他糊涂，搞资本主义就精打细算呢？他一点也不糊涂，我看是世界观的反映。建勋同志在批判“二百五”那种人的时候说过，他为什么光向资本主义“二百五”，不向社会主义“百五”呢？他就是不斗争、不革命，不敢领导两条路线斗争。

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是长期的，艰苦的，所以实现思想革命化，也是长期的。比如，资产阶级派性这个怪物，我们根据中央的指示已经批判很久了，可是有的革委会成员还在搞资产阶级派性，甚至有的老干部，部队中有的同志，把自己降低到一般群众的水平。我们共产党员的称号所以光荣，就是因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某些人就非要代表某一派的利益不可。有些县闹派性，工作搞的不好，有些厂搞的不好，生产上赔钱，在全省是最落后的，还在那里搞派性。这些人不讲世界革命，不讲帝、修、反，不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搞派性。在整党中，一定要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这是非常重要的思想建设，要切实抓好。对于坚持资产阶级派性的人，如果是党员，党籍就不能恢复，还要清算他这一段不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给革命造成的损失。干革命不是同你开玩笑。

的。这里面，广大群众是好的，是要革命的，问题就是有那么一伙子人，少数人，把领导和群众隔离了。他在这个权力机构，不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是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畅通无阻地贯彻执行，而是起了梗塞作用，起了传播资产阶级思想，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坏作用。他还觉得有多少道理，你有什么道理？不讲大局，不讲无产阶级利益，光讲资产阶级派性，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凡是坚持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都没有好下场。希望同志们通过这一次会议，很好的斗私批修，加强党的观念，增强无产阶级党性。也就是要切实以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和林副主席讲的“三性”即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来要求自己。同志们一定要提高党的观念，服从党的领导，绝不能搞无政府主义，不能把个人和群众组织摆在党组织之上。有些单位不能马上开始整党的，可成立临时党支部，把可以参加组织生活的党员，组织起来过党的生活，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新党章，在抓革命、促生产中起模范带头作用。

三、机关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实现革命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政权机关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大叛徒刘少奇搞的一套，是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我们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机构要精简，这是个大问题。人少办事要多。精简机构，请同志们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想问题。上层机构的人多了好还是少了好，我看“少”才符合“精简”的方向，应当是人少了好。少一点没有多大危险性。人少办事要多，这是主席指示的方向。我们看了几个县，有的只三十多个人，面对面的领导，搞的很活跃。（二）要从实际出发。有些县本来搞的很好，后来上边一动，他就要套，要对口。说：不对口上面不给东西，不好办事；还说：人家都是这样搞的。我要从实际需要出发，不要生搬硬套。他说你和他对不上口，你为什么叫他跟你对口呢？你可以给他提意见嘛。这是新的问题，也是一个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上边没有给你发编制表，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毛主席指示的方向搞点创造，（三）领导要亲自动手。不要搞那么多机构，主要的事情都要领导亲自抓，你搞那么多部门，不亲自抓，工作还是落实不了。你那个大队领导班子好了，革命、生产、植树、养猪、管学校等都搞好了。领导班子不行，机构再多也不顶事。领导亲自动手，亲自抓典型，使我们的机构确实能联系群众，生动活泼。郸城在这

方面创造了好的经验，叫做“学习班、讲用会、抓典型、面对面”十二个字的方法。一件工作下去以后，谁搞的最好，就推广谁的经验。（四）干部要下放锻炼，主要是插队。这是个很大的革命。不要怕，你只要有个革命的思想，就什么都不怕。下去的同志，在政治思想上、党性锻炼上，不一定就是差的，留在机关的不一定都是好的。下到生产队，一方面参加生产受锻炼，体会群众的要求，改造自己的思想，一方面帮助大队宣传毛泽东思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作一个毛主席的好党员，好战士。这是对党的很大贡献。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第一线能够更好地锻炼干部，将来会出现很多的优秀干部，搞上一年、二年，或者再长些，有些优秀的干部还可以回到机关，机关的同志还可以下去。下去的本身就是很好的党性锻炼。天天坐在屋子里，你说你是党性，实际上党性没有多少，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就机关干部来说，对下放抱什么态度，就是考验，是革命，还是想作官，这是最具体的考验。有些县，机关干部下去的很早，大队的面貌改变的很好。西平县三个下放干部讲的很好，我讲的这些都是向他们学习的。机关的同志下放后确实会作出很出色的成绩。

四、要抓典型，抓中心，抓政策，抓方法。领导上通过抓典型，来抓中心任务，明确大方向。抓典型的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当前整党工作中，也一定要抓典型，作调查研究，从个性中找出普遍性的东西。两条路线的斗争，共性是基本的，但各个队的实际都有不同。不联系实际，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再就是交政策界限，什么事情都有政策界限。在农村，方向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倾向，但也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有错误轻的有错误重的，有个政策界限的问题。应该分清那些属于要打击的，那些属于一般教育的，那些是投机倒把，那些是一般资本主义倾向，要划清界限。在反对资本主义倾向时，只能是打击严重违法的分子，对一般群众的问题就是要教育。要先在党内搞，在支部搞，过去错了，认识错误也欢迎。只要党员干部带头斗私批修，团员、基干民兵都起带头作用，歪风一下子就下去了。你不抓带头的，不抓骨干力量，光在群众中“拔尖子”，同题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整党也是有政策界限，要按照“五十字”的建党纲领，要体现“吐故纳新”的指导思想。那些人应该吐故，那些人应该纳新，那些人应该挂起来，没有政策还是体现

不了。再就是要交方法，基本方法就是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人民日报》的社论中，根据毛主席思想，总结了十二条方法，应当认真贯彻执行。

上边讲了四个问题。总的是希望同志们鼓足干劲，为人民立新功。你们的会议开的很好，今冬明春的革命、生产会出现新形势，斗、批、改会出现新局面，领导班子革命化会有新的气象。希望同志们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要经得起战争的考验，经得起艰苦环境的考验，经得起阶级斗争、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考验。同志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完成今冬明春以战备为动力，以整党为中心的光荣任务中，做出新的贡献，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做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刘建勋王新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四日记录稿，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工作会议秘书组〕

刘建勋讲话

王政委给会议作了总结，讲得很好。我再简单讲几句。

我们这次会议，根据元旦社论精神，就是要坚决落实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以战备为动力检查斗、批、改，推动斗、批、改。我们一定要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联系起来，把斗、批、改和战备联系起来，把本职工作和全局联系起来。共产党员不能光看到自己鼻子底下的事情，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我们中国是世界革命的红色堡垒，我们不要辜负世界人民的希望，我们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同全世界人民一道，彻底埋葬帝、修、反。加强战备，不是临时的措施，而是长期的任务，这是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一定要革这个命。要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树立世界革命的观点。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我们要用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武装头脑，做好反侵略战争的一切准备。

王政委讲话中，总结了我省一年多来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总结过去，是为了提高认识，今后不重复那些错误。有的同志运动初期支持了造反派，这是正确的，但革命发展了，到现在还支持一派，甚至笼统地说：“支持造反派就能站住脚”，这是错误的。林副主席早就教导我们，对于两派革命群众要在毛泽东思想

基础上，一碗水端平。一些同志为什么幺老支一派，不从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而是按“老皇历”办事，把某一历史阶段的经验固定起来。我劝同志们都要学一点理论，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头脑，提高继续革命的觉悟。这样，才能紧跟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再一个问题，就是要注意政策，要有政策观念。农村整党搞得比较早，成绩是很大的。但是按照毛主席的“五十字”大纲来衡量，还需要进一步整顿。过去没有看到的问题，蹲点以后看到了，但头脑不要太热，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需要划走资派的人，只是极少数，多数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把犯有资本主义倾向错误的人和走资派区别开来。对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人，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讲清道理，提高觉悟，改了就好。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多作教育工作。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用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的办法。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要过细地做工作，不要大轰大嗡，光开大会，喊口号，哄一哄不解决问题。可以先支部揭发，再吸收贫下中农参加揭发，有步骤地进行。总之，既不要放过真正的敌人，也不要把犯错误的好人扩大为敌人。

机关革命化是个大问题，也提请同志们注意，要逐步加以整顿和改造。首先把现在没有工作的干部下放到农村去，经过下放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将是一批积极的力量。现在在机关工作的同志，要实行“三三制”。群众代表不要脱离生产。有些工作人员原来是各派推荐的，当时是有代表性的人物，现在看来，这些人中有的派性很大，要加强教育。

这个会开的很好，对推动全省的工作，大有好处。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新的一年里，夺取更大的胜利。

王新讲话

这次工作会议，开得很好。同志们通过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林副主席政治报告和元旦社论，进一步提高了对总形势和总任务的认识，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明确了斗争的大方向。同时，发扬了自我批评的精神，增强了党性。同志们发言很好，给我很大启发和教育。

今天会议要结束了，我讲几点意见，不正确的地方，请刘政委纠正。

一、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继续革命的大方向

林副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就讲过：“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这是对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作的精辟的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老老实实地照毛主席指示办事，这是夺取一切胜利的根本保证。这一点，同志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体会是很深刻的。不管那个地区，那个部门，或是个人，凡是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大方向肯定是正确的，成绩肯定是主流，错误只是支流；谁稍微跟得不紧，工作就受损失；谁违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就要犯方向性的错误，甚至造成犯罪。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加深理解。对林副主席的指示也应当是这样。

我们理解毛主席的指示，有一个反复学习、反复实践的过程。我们经过这段实践，重新学习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和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感到更为亲切。

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是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根据整个革命历史发展的进程提出来的。他不但给我们提出了总的战略任务，同时还提出了每一个革命发展阶段的战略部署，指明了继续革命的方向。整个革命历史的过程是如此，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也是如此。从十二中全会到“九大”，从“九大”到现在，多数同志跟毛主席战略部署是比较紧的，工作成绩就大，形势就好；有的同志在一个阶段跟得紧，在另一个阶段跟得不紧，甚至背离了毛主席指示的方向，结果就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说，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继续革命的大方向。

怎样理解和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这是考验我们忠不忠于毛主席的大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根本态度问题，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刘建勋同志：对待毛主席的指示，一种人站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立场上，对最高指示，各取所需，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另一种人脱离实际，不用毛主席

指示指导自己的实践，整天忙忙碌碌，抓不住本质，这也不可能正确理解毛主席的指示。）

紧跟，就是要雷厉风行。毛主席的战斗号令发出以后，要拚命落实。这一点，县里多数同志是做的好的，有的却不怎么好。有些地方直到现在干部下放还是原封不动，你紧跟什么！（刘建勋同志：有些人是“入党做官”。抵制下放，你不敢动他一根毫毛。毛主席最高指示，为什么不执行，你在那里干什么，这就是不敢革命嘛！）斗争肯定是有，问题是你要究竟坚决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呢，还是屈服于某种压力？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对毛主席、对毛主席战略部署的态度问题。

我们对人、对事，都要用毛主席思想，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衡量什么是革命的，什么是不革命的，什么是反革命的。这是唯一的标准。有的人光听小道消息，就是不听毛主席的。有些入学习，不去学真正的经验，而是学些歪经。（刘建勋同志：要看真理，不要只看势力；要看方向，不要只看风向。）

元旦社论指出：“新的一年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用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推动斗、批、改，检查斗、批、改，戒骄戒躁，更好更快地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在新的一年中，我们要更好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明确斗争的大方向，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

要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就要下苦功夫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林副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下苦功学习研究才能获得，不是凭聪明才智或者单凭经验可以获得的。”“要勤学多练。多练，就是反复地学，学深学透，联系实际运用，不要学一下就过去。”就是说，毛主席怎么样的，我们就怎么样做，我们要反复学习，反复实践。我们一定要抓住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个法宝，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更好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二、必须狠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排除“左”右干扰

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激烈的阶级斗争过程，是排除右的和极“左”的错误思潮干扰的过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解决阶级矛盾、进行阶级斗争的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就是解决阶级矛盾、体现党的路线的政策。在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和落实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阶级敌人的破坏，也必然会遇到革命队伍内部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所以每当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革命每深入一步。总是出现一些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工人阶级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就遇到了错误思潮的干扰；后来贯彻十二中全会精神，也有错误思潮的干扰；党的“九大”以后，也有错误思潮的干扰；进入整党后，从去年十月到现在，又遇到了右的和极“左”的思潮的干扰。（刘建勋同志：整党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有右的干扰，也有极“左”的干扰。不开门整党，不相信群众，想马马虎虎地整党，是右的表现，对错误的东西不敢抵制，也是一种右的表现。也有极“左”的干扰，这就是把党和群众团体等同起来，甚至把群众组织凌驾于党组织之上，他们把自己说成是百分之百的革命派，必须吸收入党，否则就说“压造反派”了，这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的，实质也是右的。）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就可看到，每当重要关头，都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而在这些重要关头，我们有些同志又往往对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足。（刘建勋同志：毛主席发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召以后，工宣队、军宣队刚刚进驻上层建筑领域，触动了一下资产阶级派性，有人就说是“压了造反派”。什么压了造反派？只是把他那个小山头碰了一下，就叫起来了。十二中全会指出，文化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又出现了“多中心”的干扰。可是，有些同志对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搞斗批改，不那么理解，抓住某些缺点，无限上纲，说“压造反派了”，“复旧”了。你的资产阶级派性那么大，把你的派性搞掉就算复旧？所谓“反复旧”这个口号，很适合一些有资产阶级派性的人的口味。贯彻“九大”精神时，我们遇到的问题，实际还是那时所谓“反复旧”的继续。省直机关有些造反派头头，资产阶级派性发作，还要我们支持。我们怎么能够支持？我们不仅不支持，还进行批评教育。现在整党中间有些同志不敢抵制错误思潮，不看够不够入党条件，就吸收入党，这是很错误的。

这种不坚持党性原则，拿“党票”送人的情况，是不能允许，不能容忍的。当然，积极要求入党是好事情，但是不能用威胁的办法入党，认为造反派是当然的党员。这种倾向，我们要坚决抵制。）

我们对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认识不足，不是新动向一露出来就能抓住的，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我也是这样。我们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传达贯彻十二中全会精神时，当时到底思潮有什么变化，开始也闹不太清楚，现在看来，还是对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认识不够。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我们革命队伍内部来。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革命队伍内部的各个阶层、各个集团，他们的政治观点，政治态度，政治情绪，必然有不同的反映。不能光看前一段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跟得紧，但是有些人到了另一个阶段，他的政治观点、政治态度、政治情绪就可能有很大变化，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刘建勋同志：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人，有的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掉队了。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有的搞生产资料所有制革命能够跟得上，可是搞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就不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也不很理解。问题的关键是，只要紧跟毛主席，没有私心，一心一意为革命，不为个人，不为保自己，总是比较容易接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闹私字，就容易走到邪路上去了。有个工厂，一些搞资产阶级派性的人，最近写了一些文章，表面上引用了好多毛主席语录，还讲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但他们玩的是两面手法，打着红旗反红旗，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企图以一台机器不生产来压军队，叫中央点军队的名。这能算是革命派吗？这是两面派手法。当然，多数是好的，少数人确实变坏了，或在向坏处发展。）

从实践斗争中看，右的和极“左”的错误思潮的干扰，突出的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歪曲革命口号，歪曲毛主席的指示。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你说搞政治建厂，他们也抓政治建厂，但却是在这个幌子下干些不可告人的坏事。（刘建勋同志：还是刚才说的那个厂，有的人提出“打一场政治建厂的硬仗”，“重振造反派的军威”，实际上，他打硬仗，就是打所谓“反反复旧”的硬仗，重振军威，就是重新打旗。）另一方面，是错误地估计形势。所谓形势，就是阶级斗争的形势。对形势作出错误估计，把本来是大好的革命形势，

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形势，他们歪曲为形势不好，“复旧”了。因为对形势估计错了，所以提出的一系列方针、任务、政策都是错误的。（刘建勋同志：他们提出一些错误的口号，什么“‘反反复旧’是革命口号，要年年提，月月提，天天提。”真正的复旧我们要反，但是他反的是什么复旧？他反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怎么能够支持，不仅不能支持，而且要坚决反对！）本来大方向是正确的，工作中的缺点是支流，但是，他们却抓住百分之一的问题，反对百分之九十九的成绩。抓住支流，否定主流，抓住个别问题，全盘否定。这样，自己就走向错误的道路。

排除错误思潮的干扰，就要坚持革命，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回避矛盾。阶级斗争就是这样，你不斗它，它就斗你。如果不坚决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资本主义就必然复辟。整党中也有这个问题。如果回避矛盾，资产阶级派性就泛滥，他们就混淆是非，把错误的说成正确的，所以不能回避。政治上的坚定就是要对不正确的东西进行斗争，对不正确的东西不起来斗争，就等于发现了敌人自己则临阵脱逃，放弃阵地。这是考验一个人对革命是否负责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所以，我们在整党中一定要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坚持革命原则，敢于揭露矛盾，用毛泽东思想战胜各种错误思想。

要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首先要解决各级领导班子问题。同志们讨论中讲的很多，在领导班子本身，如果有“左”右错误思潮的干扰，首先要敢于革命，解决领导班子中的问题。这次有几个县的同志检查的很好，有的同志表示回去把盖子揭开，解决自己的问题，这种态度是对的，不然就不能率领广大人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我们党的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应当是忠于毛主席，相信和依靠群众，自己能够进行革命化的领导班子。不要有问题掩盖起来，而应当自己能革自己的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才是朝气蓬勃的表现。特别是军队支左的同志、人武部的同志更要带头搞好思想革命化，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好团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其所以朝气蓬勃，就是因为我们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否则，我们的党就有可能成为腐朽的萎靡不振的机会主义的党。我们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县以上领导班子，首先要在自己内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深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自觉地搞好思想革命化。

我们有些单位落后了，落后在那里？集中到一点，就是没有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在贯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中，抓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排除“左”右干扰做的差。所以就落后了，拖拉机厂就是这样。（刘建勋同志：我们办了五百人的学习班，问题一揭开，就是那么几个人在那里干扰，你一批评他，他就说你“压造反派了”，“老保翻案了”。这样，站错队的群众不敢动了，干部也不敢动了，结果生产上不去。现在把问题一揭开，团结教育了广大群众，人的积极性起来了，生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看来，只要方针政策对头，敢于揭露矛盾，敢于同“左”右错误思潮作斗争，问题不难解决。）要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领导上就要狠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敢于和善于向“左”右错误思潮干扰斗争，这个工作做得好，形势就好；不抓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不敢于和不善于向“左”右错误思潮斗争，你那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错误思潮就要泛滥，阶级敌人就会破坏，形势肯定不会好。

三、要正确对待群众

毛主席还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要巩固我们的政权，必须遵照毛主席这一伟大的教导，依靠工人阶级，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采取四大的方式，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起来揭露坏人，挖出隐藏在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起来革命，当时有的同志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能正确对待群众的革命行动，犯了错误。至于一部分群众一度站错了队，大都是受了蒙蔽，是认识问题。毛主席视察三大区，发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最新指示发出以后，有的干部不是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而是支一派，压一派，亲一派，疏一派，因而破坏了革命大联合，干扰斗、批、改。有的同志只当革命的动力，不当革命的对象，群众起来造他的反，他很反感，死拉一派群众保自己，压制对方，这是很错误的。对于来自群众的批评，要求百分之百的正确是不可能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的意见就检查改正，不对的也不能同群众闹对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群众分了派，必然有拥护你的，有

反对你的。对反对你的群众不要有反感，而要找出原因，适当的解决，对支持你的群众，你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要不分是非，一概支持。对待群众的态度，就是对待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关就过不去。有的同志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能正确地对待群众。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我们共产党要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不能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你不进行阶级分析，而是以我划线，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对另一部分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就必然犯错误。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衡量是非，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片面的、静止的去看问题。文化大革命初期支持造反派，因为他们代表着革命的大方向，他们是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的。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造反派也是不断变化的，大多数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有少数头头就是一直在犯错误。如果不加分析地仍然什么都支持，实际是支持错误。有些人这样做的时候还美其名曰“关心群众”。实际上他是害了群众，把群众引向错误的道路上去。

有的干部不坚持党的原则，带头搞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只要拥护自己，好坏人不分，好坏事不分，什么都支持，不是用毛泽东思想衡量是非，这就是结党营私。有一个单位，提出叫一个开除党籍的坏人当整党领导小组组长，明明白白知道是坏人，也要支持，我看这样的人就要打倒，这不是认识问题，是立场问题。（刘建勋同志：不要团结拥护自己的坏人，也不要排斥反对过自己的好人。要团结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对反对过自己的人不能耿耿于怀，象我们这样的人，反对一下有什么了不得！）在干部队伍的建设中，一定要严格按照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林副主席提出的“三条标准”办事。在领导班子中安插坏人，招降纳叛，这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条件。这决不能允许。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有少数人确实是这样。有些人还认为这是群众观点，这是什么群众观点？实际是资产阶级的观点。群众观点，是有阶级性的。有些同志不敢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的领导，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对资产阶级思想和错误的倾

向，不敢争，就是不敢革命的表现。八三四一部队的经验是“三条原则”、“九个一样”。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批评教育，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揪出来，斗倒、斗臭。八三四一部队的经验体现了我们党和群众关系的基本原则。我们要好好地学习、运用。

要加强党的领导，就要提高政策观念，要教育群众，照毛主席的政策办事。政策是路线的具体体现，我们搞两条路线斗争，总是要通过具体政策来体现的。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党的各项政策，总的题目就是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我们党各项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管整党也好，反资本主义倾向也好，排除右的和“左”的干扰也好，都要按照无产阶级的政策办事。在整党中要突出党的教育，在我们党内斗争中，要按照毛主席历来的教导，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这里面有很多具体政策界限，要分清整党和清队的政策界限，分清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一般群众的界限。（刘建勋同志：要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区别开来。）在农村中，不要把政策允许范围内的小自由统统看成两条路线斗争，不能把有一般资本主义倾向错误的人统统都当成走资派。走资派是有的，这是极少数。

总而言之，要有区别，有区别才有政策，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同时，要和风细雨，不要简单粗暴。（刘建勋同志：不能打人，不要“坐飞机”，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在整党中更应该注意这个问题，要使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条条落实。

四、进一步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组织，思想和作风革命化

组织革命化，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精兵简政”。从全省来说，这项工作做得是好的，但有的地方并没有真正把干部放下去。我们要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把干部放下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下放的干部，要加强管理教育，尤其对下放到农村的干部，各县革委会要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去抓，这是党的一大笔财富。对已经下放的干部，不要轻易调他们出去工作。（刘建勋同志：不要轻易启用，锻炼二、三年，表现好，群众欢迎的，我们可以调上来工作，把在职干部放下去锻炼，进行轮换。

在精简下放工作中，发现有的地方“开后门”，通过熟人安插工作。广大干部下放锻炼，是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极好机会，你却随随便便把人家调上来，这正好符合一部分同志“入党做官论”的思想，是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各级革命委员会，要进一步加强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前一个时期，不少办事机构中，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很大。如果革命委员会内部有资产阶级派性的反映，就要直接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的落实。那里存在这个问题不坚决纠正，将来就可能犯大错误。这样的政权就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就不是无产阶级政权机构，而是资产阶级派性机构。（刘建勋同志：我们有的领导同志官僚主义，不亲自动手，重大事情也托别人办，实际把自己架空了！有的单位叫那些派性严重的办事组指挥运动。指挥什么运动？无非是压一派。有的单位叫那些派性严重的政工组掌握人事大权，把自己一派的人安插得到处都是。除了他们有派性，自己负责以外，你作为领导干部在那里干什么呢？无非你是死官僚主义，或者你就是资产阶级派性的头。）

在各级领导干部中，要反对手劲不足，反对骄傲自满情绪。林副主席提出的选拔干部的三个条件中，就有一条是革命干劲。没有革命干劲的人，就不可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该斗争的不敢斗争，该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的不去做，该革命的不敢革命，还谈什么继续革命。所以，有没有革命干劲，是衡量一个人继续革命觉悟高不高的重要标志。你没有革命干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高在那里？毛主席的“五十字”建党大纲，规定了我们党的生活应该是朝气蓬勃的。朝气蓬勃就是要有革命的精神，战斗的精神，为党为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我们有些同志，革命干劲不足，无所作为，认为“中游保险”，这不是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思想。拖拖拉拉，困难重重，什么事情也办不了，这是懦夫、懒汉的思想。还有一些同志，工作上取得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骄傲自满，对自己不是一分为二，而是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威信，爱听奉承话。我们要很好的警惕这一点。每个同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应该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不闹名誉，不闹地位，不向党伸手。有的人有私心，向党伸手要官做，争当书记、副书记，还鼓动一部分群众给自己争官。（刘建勋同志：这种人没有好下场。）新老干部都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正确地对待自己。不要把自己估计过高，夸大个人作

用，以为你那个单位离开你就不行，头脑发胀，有这个错误不改，就会走向反面，我们千万要警惕。要加强党的团结，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解放军要虚心向革命的老干部和革命群众学习，坚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要谦虚谨慎，主动搞好革委会的团结，主动团结好新老干部。个别团结状况不好的县，要迅速加以改变。我们发现郑州有的工厂在建立新党委过程中斗争很激烈。

（刘建勋同志：国棉六厂建立新党委的过程中，斗争非常激烈，“左”的右的都联合起来，反对新党委，企图搞垮新党委。六厂党委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发动群众进行斗争，这是很好的。我们就是要迎着矛盾走。要敢于斗争。不能退却，不能绕着矛盾走。整党结束了，阶级斗争还存在，不能有松口气的思想。）我们要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尤其是老干部更应该以身作则，要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办事，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要加强请示报告，有的单位，对重大问题，不向上级请示报告，这就是大错误。

在新的一年中，解放军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同志要作出新的贡献，现在工作很多，任务很重，要安下心来，抓战备，搞好斗批改，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战场准备，就是要建立好巩固的农村根据地。以战备为动力，搞好斗批改，民兵工作也就搞好了。（刘建勋同志：不能孤立地去抓民兵工作，一个地方的领导班子被坏人篡了权，民兵工作就不会搞好，民兵工作一定要抓根本，不能离开当地的斗批改。）不要作表面文章，不要搞花架子，要扎扎实实、深入细致地去做工作。

潢川县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翻印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七日，王新在河南省通许县的指示

〔王新：河南省军区政委、河南省委负责人〕

听了县直的“一打三反”运动，是否可采取集中办学习班的办法解决。又听了先进队东赵亭大队的汇报，那里的革命、生产形势不错。又听了后进单位关于四清翻案问题的汇报，这个问题确实突出。

一、对通许形势的看法问题。

广大群众和干部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在斗批改的运动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有些单位的工作是出色的，昨天参观的东赵亭大队就是一个比较先进的大队，

孙营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也是比较好的。但是发展是不平衡的，要一分为二，有好的、中间的、差的，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许县与全国全省比，看来速度是慢了一些。十二中全会和“九大”以后，你们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跟得不紧，从前进的方向看，是落后了。落后到什么程度？不承认落后本身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对一些问题认识的分歧，说明了你们对问题的看法不一致。

障碍毛主席指示落实的还是对通许形势的看法问题。今天上午揭露出来的矛盾，说明对形势看法的不一致。通许县确实有严重问题：（一）“反复旧”问题。十二中全会后，我们省有些人搞“反复旧”。你们县革委作出决议搞“反复旧”。作为县革命委员会作出决议搞“反复旧”，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你们是全省独一无二的一家。（二）争党权。整党中违犯毛主席建党路线，放弃党对整党工作的领导，让一些头脑发胀的非党群众领导整党，批支部，批党员，采取突击的办法搞整党。争党权，“吐疏纳亲”，干扰毛主席“五十字”建党纲领的落实。实际上是反复旧的继续，只是变了一个形式。有些县，有这些现象，是抵制不力，你们县是有某些领导支持，所以搞起来了。（三）四不清翻案，你们比较普遍，没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以四清划线，反四清的是好的，不反四清的就是不好的，这是什么党的原则？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有规定，保卫四清伟大成果，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在你们县搞的乌烟瘴气。四不清干部反攻倒算，四清积极分子受打击报复。四清运动中处理个别有出入的，可以在整党后期来处理。但是，你们支持翻四清的案，这是不允许的。（四）对青年干部不是关心培养，帮助他们克服错误思潮，执行毛主席“三不脱离”的指示，而是搞糖衣炮弹，毁坏了他们。你们还搞私招乱雇。这些现象反映你们有些领导成员不能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不能代表革命群众利益，你们是心血来潮，胆大妄为。你们违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还说你们胆小怕事，求稳怕乱。你们怕的是资产阶级利益受损失，怕毛主席指示落实，怕丢官。你们“勇敢”的很！你们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冲锋陷阵。中央不说招收工人，我们省革委一个也不敢招收，而你们敢。你们叫群众领导整党，我们不敢，你们胆大的很。我就想不通你们胆小在那里，你们是拿胆小作借口，掩盖胆大，你们胆很大怎么说是胆小。再胆大大到什么程度！你们的胆不小，你们革委会胆不小了。你们这里违法乱纪的、腐化的、搞女人的可以入党做官。还好象压得你们喘不过气。太不公平

啦。所以说落后了，最根本，最关键的是有些老干部、军代表不能很好的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能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抵制错误的思潮。你们给下层干部和党委制造了很多困难。真是象你们反复旧“文件”中说的“形势大好，问题不小，发展下去，危险很大”。不过各有所指。我们一个老干部、军代表应该站在党的立场上。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对违反党的政策的错误，抱什么态度？为什么毛主席指示不能执行！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可以执行？你们要在适当的时候彻底清算，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很好的提高。希望同志们很好的学习，对自己要一分为二，要从实践中看自己那些作对了，那些作错了。空话是没用的，实践是最无情的。希望同志们很好的学习，敢于革自己的命，领导班子达到“五统一”。

二、关于“一打三反”运动问题。

贯彻中央三个文件，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大宣传、大揭发、大批判，特别是县直机关，一定要搞彻底，政治上、经济上都要搞透。人员要适当集中，彻底揭。揭出的案件，属于敌我矛盾的要认真批斗，老的分子有新的罪恶要批斗，新的反革命分子批斗更有教育意义。不管你是那一派，有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有什么罪就算什么罪。要完全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把敌人批倒批臭。证据要确凿、要准、要稳、要狠。经济问题一样。“一打三反”运动，要搞彻底，你们县的运动和整党，地革委要把关。这里派性严重，阶级敌人插手，混水摸鱼。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落实。这个仗一定要打好，要放手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出现四个情况。

（一）涌现出一批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这是好的。（二）由于世界观改造的不好，犯了这样那样做错误，要教育。（三）有的中了糖衣炮弹，腐化了，严重的违法乱纪，但够不上敌人，不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这些人要在适当的场合进行揭露和批判。犯有一般资产阶级派性的人要教育，不要脱离开当前阶级斗争的现实，单独处理，但他们包庇了阶级敌人，那是另外一回事。（四）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揪出来就是了。他们根本不是群众的代表，要把他的造反的假面具摘掉。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要把混进的坏人和严重违法乱纪的区别开来，狠狠打击阶级敌人。要很好的揭发批判。你们县革委给一个群众代表的父亲、关押

释放犯送棺材，把县革委的名誉丢光了。还有什么威信？社直力量来不及，可以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分期分批搞，一次搞他三分之一也可以嘛。

三、关于整党建党问题。

抓整党建党，抓领导班子，抓战斗堡垒。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基层，这是根本任务。这个基层就是基层党组织。抓领导班子，不要与抓整党脱离开，不要与抓阶级斗争脱离开。通过抓整党，抓阶级斗争，深入完成斗批改，要很好地搞，先作调查研究。你们的整党单位，不够整党条件，必须很好复查才行。有的支部不能算，要把整党和一切工作结合起来。通过抓领导班子革命化，抓整党建党，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带起来。

组织上的吐故纳新，要进行复查。当前主要是学习好党章，不要孤立的抓生产，要通过革命化来促生产，不要“言不及意”。

四、领导同志要深入实际搞好调查研究。不调查研究下边情况不了解，上边精神吃不透，吊在空中是不会长的。要脚踏实地认真作好调查研究，大体上作到心中有数。特别是军队同志更重要。不调查，中央的方针政策就落实不了。你们通许条件很好，只要矛盾揭开，很快得到解决，立即就上去了，广大群众是好的，希望同志们很好地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就站住脚了，对人对事要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干扰往往集中在对人的看法上。人与人是阶级关系，没有个人恩怨。你老康咱并不认识，没有什么恩怨，搞个人势力，宗派势力的，没有一个不垮台的。

今天批评了你老康（康允周），如果你能改正，把通许搞好，我们是欢迎的。

（×××讲到我们虽然认识有分歧，但大家的心愿还是想把工作做好的）。

我们的工作都是革命事业，阶级事业，不能说不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心愿是好的，还是想把工作做好的。表态是空话，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那有群众。讲话办事都不能抽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七日，王新在河南省通许县核心组会议上的插话

（当汇报县革委曾作出“决议”反复旧时）

王新：我是很注意反复旧的。当时见到一个文件，或者是一张小报，你们县一位姓康的搞反复旧，当时我叫他靠边站。不知是不是你？（指康允周）

(当汇报到粮食局非党员抓整党时)

王新：你们的整党得重新审查。

(当汇报到马百顺入党时)

王新：你们批准坏人入党，你们建立的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为什么这样的坏人不敢斗他？要揭露他，批臭他，支持坏人还搞什么革命。

(当汇报到县革委五十四人中，群众代表有十三人时)

王新：谁在这里不执行中央的指示？省革委讲了多少遍了，在你们这里就行不通，你们这里是独立王国，谁在这搞独立王国？要狠狠批判他。你在这搞糖衣炮弹，毁坏青年。你搞反复旧代表谁？谁在党内拉势力保自己的官，首先要打倒谁。

当康允周同志解释县革委反复旧问题时：

王新：你讲那么多过程干什么？具体问题可能有出入，搞女人也会有很多情况。总的是你搞了反复旧，你不要搞那么多诡辩，对我们还搞这一套干啥？枝节上可能有这样那样出入，但是有个基本的思想，基本的立场。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很多，但一看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的东西里边可能有拥护的，这里边有个倾向性的立场。一篇文章一万字，七千是反对的，三千是赞成的，反对可能是前提，实际是赞成，你跟我们搞这一套干什么？很简单，实践证明你这一段方向不对。那里还听你那么多具体的东西，你和王甲军一样，他也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批评反复旧的，他的批评是为了更好的反复旧，屁股蹲在他那一边了，一切都错了。不从立场上转变就转变不过来，你灵魂深处私心太重了，有私心总想拉一派势力保你作官，搞私心的总是没有好下场。革命是靠毛泽东思想。张国涛比你势力大得多，最后还是垮了台，你掌了权，再加上你那一伙子，通许县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你建立的党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有些老干部开始并不是支持造反派的，中央表态后，好象他最革命，每个重大问题他都要支持错误思潮，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些人比站错队的品德还坏。叫你掌权就是最大的复辟。历史是无情的。你想改造党，改变政权。反复旧全省你是拔尖的。

当汇报到通许县不乱时：

王新：乱，比你这不乱好。印度不乱就好？我们中国搞革命乱了几十年，就不好？主要看你是无产阶级乱了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乱了无产阶级？你们光兴资产阶级乱无产阶级，和平演变得更厉害。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一日，王新在河南省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

刘政委要我来讲一下，遗憾的是没有亲自听到同志们的发言，只是看了一些材料，就没有直接听讲用感受深刻。

省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鼓舞下，经过全体代表同志们的努力，今天就要胜利结束了。让我们热烈地祝贺大会胜利成功！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两天，大家认真学习了九届二中全会公报、这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全面总结了党的“九大”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经验，指出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伟大战斗号召，我们坚决拥护，坚决照办。我们要立即在全省范围内掀起大宣传、大学习、大落实的热潮。全会号召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继续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这是全会给我们指出的总的奋斗方向、总的奋斗目标。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响应全会的号召，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在这次大会上，来自全省各条战线的五千多名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先进集体的代表，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总结交流了党的“九大”以来我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经验，热烈赞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热烈赞颂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热烈赞颂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通过典型讲用和全体代表的热烈讨论，充分反映了我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新水平、新成就；集中表达了全省军民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努力攀登思想革命化高峰的强烈愿望。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河南部队的一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应邀出席了这次大会，传经送宝，互相学习，为大会增加了

新的光彩。这次大会，使每个同志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思想境界有了新的提高。这次大会的先进经验传播出去，推广开来，必将把我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必将对我省各项工作发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同志们，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清算了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破坏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滔天罪行，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了亿万革命人民直接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新纪元。正如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的：“毛泽东思想在一个七亿人口的大国中，得到这样广泛的普及，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获。”

党的“九大”以来，在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指引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活学活用的自觉性越来越高。各级党组织、革命委员会，狠抓根本，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带头用。工厂班组、家庭院户学习班普遍兴起，这种组织形式很好，便于更好地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便于抓活思想。今后要继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工厂班组学习班的经验。城乡大多数单位，天天读、讲用会、批判会开始形成制度。广大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毛主席语录》随身带，随时随地学起来。毛主席最新指示一发表，立即学习，立即行动。紧密结合现实阶级斗争，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以“老三篇”为座右铭，斗私批修，改造世界观，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了紧跟毛主席、坚决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自觉性。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斗、批、改。一年多来，全省军民以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为武器，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同一小撮阶级敌人斗，同资产阶级反动思潮斗，排除来自右的和形“左”实右的干扰，在斗争中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落实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紧密结合现实阶级斗争，认真开展整党建党工作，加强了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

特别是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狠狠打击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激发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广大革命群众，自觉地把做好本职工作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同支援世界革命、消灭帝、修、反联系起来，为革命做工。为革命种田，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从思想上、物质上、组织上加强了战备。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一批又一批社队粮棉上了“纲要”。今年小麦产量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大多数地区秋季收成也比去年要好。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很快，技术革新层出不穷，为农业服务的小而全的地方工业取得很大成就。我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兴起，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林副主席指示我们：“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大量的铁一般的事实证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取得一切工作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继续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的根本保证。我们的工作千头万绪必须狠抓根本，必须继续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现在，根据九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和我们的情况，就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讲几点意见。

（一）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方向，就是胜利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林副主席在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指示我们：“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哲学等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

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的党就前进，就胜利。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经验。”
我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经验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忠于毛主席，紧跟毛主席，坚决照毛泽东思想办事。

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毛主席的指示，拥护不拥护，紧跟不紧跟，照办不照办，这是区分革命和不革命。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分水岭、试金石。紧跟、照办，对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来说，是最根本的立场，最根本的态度，是革命的大节。在现实斗争中，每个人都经受着紧跟不紧跟的考验，都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回答。不跟毛主席，必然是跟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然是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是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站在那一边的问题。（刘建勋同志插话：这一段话非常重要。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以毛泽东思想为准则来对照、检查。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必然要犯右的和形“左”实右的错误。有些单位的领导人，至今还不是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而是同少数搞派性的人站在一起，支持一部分人压制另一部分人。他们搞整党建党，也是搞派党，搞宗派主义的党，搞资产阶级专政。他们完全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这种人是肯定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应当向人民解放军学习，一切照毛泽东思想办事。）

每个同志都要好好地想一想：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紧跟了没有，照办了没有。是自觉地紧跟、照办，还是迷迷糊糊、懵懵懂懂。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感情不一样，态度不一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就不一样，紧跟、照办的劲头就不一样，革命和生产的形势也不一样。不论哪个地区，哪个单位，哪个部门，凡是对毛主席的感情深，跟得紧，对毛泽东思想肯学肯用，对毛主席的指示坚决照办，那里的形势就好，胜利就大。水泉大队、岳师大队、井李大队、“五四”采煤队、郾城机械厂等单位为什么先进？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忠于毛主席，紧跟毛主席，坚决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率领广大群众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凡是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跟得不紧，或者一个时期跟了，另一个时期跟得不紧，那里的工作就没有起色，面貌总是改变不大。有些人，口头喊紧跟、照办，实际上却不落实，不兑现。还有的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代表小团体、小山头的利益，搞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使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损失。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工作要比别的地

方落后一年，人家那里一年生产就翻了一番，他还在那里压制群众，搞派性。（刘建勋同志插话：大家都在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率领广大群众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有些人却在那里搞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有些小单位是如此，有的大单位也是如此，不紧跟、照办，总是要落后就是了。所有先进单位都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好，紧跟、照办的好。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广大群众，就能创造奇迹，推动历史前进。）这些人如果不改，肯定要垮台。历史的结论是无情的。我们每个革命同志，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党性立场上，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学一点用一点，用，就是要革命，要落实，做到理解的要坚决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在执行中不断加深理解。

（二）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头脑，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深深体会到，要紧跟毛主席继续革命，不仅要有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愿望，还要认真学习和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懂得无产阶级专政下为什么要继续革命，革谁的命和怎样革命。这样，才能掌握阶级斗争的规律，在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认清方向，分清敌我，不断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有些人为什么在文化革命初期自觉不自觉地犯了错误呢？就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四个存在”不理解，对群众起来造走资派的反不理解，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怎么个革法。有些人还是用民主革命的观点看问题，因此就看不到当前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跟不上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新形势。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伟大发展。新党章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我们要深刻认识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国际上帝、修、反的存在，它们总是妄图对我国进行武装侵略和颠覆，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教导我们：“社会主义革命过程还要革这个命。”国内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它们总是千方百

计在政治上伺机反扑，在经济上向社会主义进攻，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特别是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地采取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的办法，篡夺领导权，在党内寻找代理人。这是我们应当特别警惕的。在农村和工厂，都有这样大量的事实，正如同志们所说的：“阶级敌人用形形色色的糖衣炮弹打我们的核心力量。”结果，有的单位人没有变，政权的性质变了。（刘建勋同志插话：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敌人明火执仗地拿武器和我们干不行了，地主直接掌握政权不可能了，他们新的反革命策略，就是搞“和平演变”，在我们党内寻找代理人。他们施放糖衣炮弹的办法多得很，今天给你送点菜，明天给你拉车煤，吃喝拉拢，你哪里痒他就往那里挠。还有的干部认干亲，拜把子，包庇坏人坏事。这样，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渐渐的就被演变过去了。虽然人没有变，政权的性质变了，代表资产阶级了。）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狠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流毒，狠抓战备落实，狠抓对敌斗争。要根据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精神，把“一打三反”运动抓紧，严格掌握对敌斗争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继续有力地打击一小撮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刘建勋同志插话：区分两类矛盾很重要。反革命分子同我们是敌我矛盾，要批判，要斗争；贫下中农之间、工人之间的意见分歧，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动武。领导机关和广大群众的矛盾也有两类，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广大群众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对这种走资派要批判，要斗争；我们各级革命委员会同群众也有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对革命委员会有意见要提出批评，但不能采取对待走资派的办法。）

我们要深刻认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大量的表现在政治思想领域里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条重要规律，就是在政治思想领域、意识形态领域中开展长期的坚持不懈的阶级斗争。一小撮阶级敌人，总是利用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动能量，腐蚀人们的灵魂，向无产阶级进攻。我们必须牢牢掌握革命大批判的武器，用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的各种错误倾向，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各种表现，批判“四旧”，以革命的精神力量彻底摧毁反革命的精神力量。我们一定要继续“认真搞好斗、批、改”，把政治思想战线，文化教育战线，经

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三）用毛泽东思想加强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领导班子就是政权。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是个决定一切的大问题，是劳动人民得到一切或丧失一切的大问题。有了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有革命干劲的领导班子，就能够保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就能够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能够朝气蓬勃地率领群众向阶级敌人战斗，不断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新胜利。教导权掌握在埋头生产、不问政治的人手里，掌握在害怕矛盾、不敢斗争的老好人手里，或者掌握在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人手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得不到很好地贯彻执行。领导权如果被那些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人掌握，就会把我们党的政权、阶级的政权，变成个人的、宗派的、资产阶级的政权，变为镇压无产阶级的政权。

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带头人首先要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搞好思想革命化的带头人。当前，有的领导班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很差，不肯学，不肯用。带头人不带这个头，就没有资格当带头人。我们要善于辨别什么是党的领导，什么不是党的领导。有些人把自己个人主义的领导，资产阶级思想的领导，错误路线的领导，说成是党的领导，把自己打扮成党的化身，在那里违法乱纪，胡作非为。对于这样的人，我就赞成群众起来抵制他的错误领导，大鸣、大放、大字报。不然的话，那里的政权就可能变成修正主义。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必须在斗争中化。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领导班子中来。社会上的坏人坏事，资本主义倾向解决不了，总是同领导班子内有人同情有人支持或有人参与分不开的。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党内矛盾的理论，在领导班子内开展积极的斗争。领导班子对自己的工作要一分为二，对存在的各种矛盾，必须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不能混淆是非。有矛盾就要揭露，就要斗争，不能掩盖，不能回避。掩盖矛盾，回避矛盾，就是害怕斗争，不敢革命。矛盾是客观事物固有的东西。有矛盾，有斗争，才有事物的发

展。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就是要观察、分析事物的矛盾，并根据这种分析，提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我们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就是要按照唯物辩证法办事。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我们党的路线、政策都是为了回答和解决各种矛盾的。不敢揭露矛盾，不敢搞阶级斗争，党的路线和政策又有什幺用处呢？各级领导班子，要经常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开门整风，揭露矛盾，坚持用毛泽东思想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这样，才能在革命化道路上不断前进。

“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必须在群众中化。各级领导成员要做到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劳动，不脱离实际，必须从思想上真正解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问题。要牢记毛主席关于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这一条教导，树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真正成为人民的勤务员，不能做官当老爷。各级领导成员要经常深入三大革命第一线，同广大群众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一同参加劳动，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遇事同群众商量，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接受群众监督；关心群众利益，执行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反对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违法乱纪。辉县革命委员会、沈丘莲池公社张文祥同志深入群众、联系实际的作风，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确实有少数单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横行霸道。有个公社革委会的领导同志，那里本来收成不好，他却规定三条：留够自己的口粮；完成上交任务；不许逃荒。这不是要把群众置于死地吗？

党权是政权的核心，是权中之权。整党建党，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领导权的问题。要认真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并且把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放在第一位。经过整党，按照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和林副主席关于选拔干部的三项标准，本着军、干、群，老、中、青两个三结合的原则，把那些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选拔到领导班子中来，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三忠于”的人手里。

（四）以“老三篇”化灵魂，在改造世界观上狠下功夫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毛主席又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

题。”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彻底改造世界观的任务越来越突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一个“公”字。改造世界观，就要不断斗私批修，破私立公。做到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完全、彻底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

我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中，涌现出许多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的事迹，无不闪耀着“公”字光辉，都是用毛泽东思想化灵魂、自觉改造世界观的结果。

我们这次大会上讲用的周牛套、王英洲、刘克让、朱德才、纠桂云等同志都是这样的英雄人物。他们为抢救阶级弟兄，抢救国家财产，出生入死，不怕牺牲。有些同志病、伤致残以后，还能够刻苦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朝气蓬勃地进行战斗，为革命做出新贡献。他们无限忠于毛主席，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牢记阶级苦、民族恨，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把毛泽东思想看成是命根子。他们胸怀全世界，时刻想着地球上还有三分之二的阶级兄弟没解放。他们为革命不畏艰难，为人民乐于吃苦，把个人的生死病痛置之度外。“宁为公字战分秒，不为私字混到老”。他们把“老三篇”看作“公”字篇，作为座右铭，经常学，反复学，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刻苦磨练，铸造灵魂。他们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待自己，成绩面前找差距，赞扬声中更谦虚，不断革命，不断前进。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每个革命同志，都要一分为二，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批评，正确对待表扬和不同意见。要密切结合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用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要活到老，学到老，干一辈子革命，改造一辈子世界观，永远紧跟毛主席。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做一辈子好事，青年同志要把个人一生的历史写得很红，年老的同志要保持革命晚节。

(五) 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夺取工农业生产的新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我们要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理论，全面地贯彻执行“抓革

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支援世界革命创造强大的物质财富。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关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一系列教导，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道路，经常注意摆正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坚持用革命统帅生产，带动生产，促进生产。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干部和群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自觉性大大增强了。大家从斗争实践中体会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办事，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军队打仗，最好的武器不是飞机、大炮、坦克，而是毛泽东思想。最大的战斗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搞生产也是一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才是最大的生产力。（刘建勋同志插话：同样的自然条件，人的精神面貌不同，积极性不同，生产面貌也就大不相同。）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有些同志说起来清楚，做起来又糊涂了。特别是在生产忙、任务紧、困难大的情况下，往往容易转向。他们不懂得，两个阶级的斗争，人们头脑中公与私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并不因为生产忙、任务紧就消失了。相反，越是生产忙、任务紧的时候，越是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越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扬人的革命精神，不怕苦，不怕死，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我们要针对干部和群众中的活思想，经常批判那种不问政治的危险倾向，做到在任何情况下突出政治不转向，狠抓革命不动摇。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深入开展经济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以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等方针，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执行。要发动群众大揭经济领域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深入批判刘少奇的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专家治厂、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肃清其余毒。“农业学大寨”，工业要执行“鞍钢宪法”，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群众运动。

这次大会的许多先进集体，所以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优异的成绩和出色的贡献，都是由于他们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狠抓人的思想革命化，大搞群众运动的结果。目前，我省开始出现了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各级领导要站在群众运动的前面，积极领导群众前进，满腔热情地支持新生事物。要把革命精神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要执行党在现阶段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如：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劳逸结合。要深入基层，抓好典型，一切经过试验，使工农业生产新高潮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向前发展。

同志们，目前国际形势一派大好，越来越好。在毛主席五月二十日庄严声明的鼓舞下，全世界人民进一步团结起来，反对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革命斗争空前高涨。美帝、苏修这两个“超级大国”已经陷入全世界人民的重重包围之中，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毛主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要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从思想上、物质上、组织上继续抓紧和加强战备工作，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同志们，我们要坚决响应九届二中全会号召，继续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首要的是深入学习贯彻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继续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认真学习两个“决议”，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我们希望到会同志把这次会议上交流的先进经验带回去，在全省开花结果。省革委希望到会的代表一律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带领群众老老实实学、扎扎实实地用，不搞形式主义的东西。

我们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搞好斗、批、改，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纲，严格按照新党章的要求，继续搞好整党建党工作，坚决把“一打三反”运动进行到底。

我们要狠抓经济领域里的两条路线斗争，推动工农业生产新跃进，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〇年国民经济计划。当前农业主产要以革

命的精神，因地制宜的采取有效措施，打好小麦播种这一仗，为明年夏季丰收打下基础，实现省革委五次全会提出的工农业生产发展规划，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同志们，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捌、四川省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对四川省革委及成都军区学习班成员的讲话

时间：1969 年 12 月 27 日 20 时 25 分至 28 日 0 时 10 分

地点：京西宾馆会议室

出席接见的中央首长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黄永胜、姚文元、李先念、谢富治、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

周恩来讲话：

同志们，今天是你们在北京全体同志的最后一次会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留在京的，凡能到的同志都请来了。江青同志、富治、文元同志，他们有别的安排了，还是把他们请来见见你们。这是最后一次会议了嘛。但他们还有别的事，好不好？欢迎他们退场！（热烈鼓掌，欢送江青、谢富治、姚文元退场。）

你们的报告，就是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党委《关于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你们经过多次讨论了，由核心领导小组负责同志起草，你们各小组讨论了两三次，一直到前天还讨论，最近又根据你们要修改的意见，又采纳一些，最后定稿，凡是你们提出的意见都吸收了。根据你们的报告，我们政治局讨论了多次，又修改了两次。最后请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批准了，是 12 月 25 日 23 时批准的：“照办”。

我现没有带本子讲，你们不要记录，免得你们回去各取所需，各记所传。所以你们也不需要记录，一定要记，记几个字就够了。我反正照本本解释。免得你们回去各取所需，各执一词。最大的就是这两年，这三四个月的经验教训。就是这一条。你们这次也真正吃苦了。

反正你们这派讲的，他必然攻你。他讲以后，你又攻他。攻来攻去，攻得大家都有派性。好啊，现在需要回到党性上来了，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了。按照毛主席的思想、指示办事了。所以，我们现在也不想离开本本，照本宣科好一点。我先读批示，批示并不长，很短，一段一段地讲。

（读批示第一段）

第一个报告，我们打算随同批示一直发到你们四川省的县、团级，与县相当的机关，然后再由你们口头传达到下层，基层。第二个报告，《关于加速四川地区三线建设的请示报告》，因为机密性比较多，只发到地、师一级，因为这个任务只传达给地，不需要普遍传，所以这两个报告，中央表示同意。

最重要的还是这句话：是你们“坚决贯彻执行”。你们自己写的报告，通过的报告，你们要负责执行。你们总不能说是中央强加给你们的嘛，是不是强加你们的？（热烈鼓掌）啊，没有嘛，那就希望你们贯彻执行。这是第一段。

第二段，“为了迅速解决四川的问题，加强三线建设和落实战备，中央决定……”这是一个帽子。你们要迅速解决四川问题，不能再缓了。我们要迎接七十年代了——还有四天。三线建设也已经耽误两年多了。现在要赶上去，还要落实战备。全国都在搞动员备战。九大以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要准备打仗”，开会谈了的，一直到现在，已经九个月了。无论如何不能再推迟了。一个三线建设，一个备战工作，非常紧迫。首先解决四川问题。你革命抓不好，那三线建设、备战工作就说不上了。首先还是解决你们四川的革命问题，所以中央决定先从组织上解决，组织上就是表示我们要加强领导。第一个就是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一元化领导，统一党、政、军的工作。所以要把核心小组明确规定，就是要把党在四川省的权力机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里头，成立一个核心领导小组，就是党的领导，领导全川党、政、军、群的工作。这回扩大了。过去人比较少，现在扩大到十五名。这里头军队同志占很大数目，有十一位，当然罗，把刘结挺同志也算在解放军里头，他自己说犯有错误，但还是解放军。

应该要求自己严嘛。那么，不是解放军有四位了：李大章同志、徐驰同志、张西挺同志，还有鲁大东同志。因为党的领导必须加强。也必须要久经考验的，即使有的犯了严重错误的，但还允许他在集体里面改嘛。毛主席说了嘛，九大政治局里也有犯有严重错误的嘛。他们愿意改，还是吸收在里头嘛。这个比例当然占少了，紧跟毛主席走的占多数了。那么同样的，四川省应该把解放军成份增加，这个问题我们在军队同志会上讲了。现在也对你们讲。四川今后的工作，要迅速得到解决。主要的是依靠解放军，这是桥梁。就是把毛主席思想，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九大的新中央的指示，传达到广大群众中去，使群众更好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使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起来，把四川工作，从革命到生产、到战备、到工作都促上来。都需要通过解放军的努力。所以在成份上有调整，解放军的比例要扩大，增加。当然也要依靠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在常委会的内部，就包含得广了。包含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贡献而又犯了错误的青年人，也要吸收他们，教育他们。青年人犯了错误又愿意改，当然要依靠，不仅在工作中，还要在劳动中，锻炼、改造自己。但是担任核心领导不行。这样的组织才更合乎要求。

（读批示第二条）

“中央决定……”这一段是增补或免掉的。增补的就是谢家祥同志，大家都知道的。谢正荣同志是大军区副司令员、省军区司令员。补他们两位为革委副主任。增补胡炳云（大军区副司令员）、胡继成（大军区副司令员）、余潜（省军区政委）、何云峰（十三军政委）四人为省革委常委，然后再补邓经伟（省军区副政委）、顾永武（十三军军长）为省革委委员。

另外，免掉的两位，王阴均【女，成都军区总医院司药，“八二六”派军区总医院红色造反者总团负责人，四川省革委会常委】已确定复员了，免去常委。梁善计犯有严重错误，也不适合作委员了。免去他们的常委和委员。蓝亦农【原五十四军政委】同志已经转到昆明军区去了，担任副政委，做了昆明市革委会主任，现又转到贵州省，代理核心小组长，处理贵州工作。贵州工作有很大进步，新的领导去了，做了大量的工作。又增加了新的部队。我们这样做，“春雷”又响了。“西南的春雷”嘛。开始响了，后来打闷了。现在春雷又响了。韦统泰同志，五十四军军长，现在已调外省去了。

(读批示第三条)

“由梁兴初、张国华、谢家祥、王诚汉、胡继成、王东保、谢正荣、段思英、茹夫一等九人组成成都军区支左领导小组……”原来军区【支左领导小组】是有的。以后，成立省革筹小组以后，就把支左小组取消了。转到政工组、办事组底下来管了。经验证明这是把部队“三支”、“两军”工作削弱了。刘结挺把军区“红总”、“千钧棒”拿出来支左，其他的就成为“老保”了。并在这个带有派性机构的领导下，使军队也陷入派性。现在纠正了。“三支”、“两军”工作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还是要回到由军区来管。这个支左领导小组，要加强“三支”、“两军”工作。军队本来是一个整体，不能分裂。从井冈山以来，毛主席一声号令下，就奔赴前线。我们的传统就是这样。现在回到军区来管。因为分工关系，由梁兴初同志负主要责任。

(读批示第四条)

“由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徐驰【文革前为冶金部副部长、渡口市委第一书记，1968年后为渡口市革委会主任】、胡炳云、胡继成、茹夫一【成都军区参谋长】、唐兴盛（省军区副司令员）、何辉燕【1969年6月成立的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司令员】、李安华【应为李华安，成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蒋崇璟【文革前为西南局国防工办主任兼四川省委第二工业部部长，时为四川省革委会常委、生产指挥组副组长】、鲁大东、顾秀【1969年8月前为铁道兵第五师副师长，时为铁五师师长，渡口市革委会副主任】、钱敏【文革前为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丁钊【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政委】、丁先国【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主任】、冀绍凯（五机部政治部主任）等17人，组成四川省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四川三线建设刚才说了，耽搁很大了。当然不是什么工作都耽搁了。有些进展还是好的。但受干扰较大。请十七位同志管这个事，张国华同志负责。李大章同志刚才讲了，我们把顾秀同志请来，哪位是顾秀同志？见见面！（顾秀站起来）现在这样称赞你们，你们不要翘尾巴。你参加这次会议，要把成昆铁路修好。何辉燕同志，你们明年七一以前能通车吗？（何辉燕：能。）明年七一通车，这是最紧迫的了。因为要通车，我们就要统一指挥。要把凉山、西昌、雅安统一起来，成立领导小组。把那个地方划为一片。由铁道兵指挥部统一指挥。当然铁工局的同志也参加，统一领导。

以下就是中央的希望了，（读批示最后部分）“中央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一段是中央的希望。因为你们的报告中十一条措施里都有了。所以中央批示不再重复。我们在这里不再多说了。但是集中起来，就是你们过去对主席伟大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对毛主席在九大前和九大会上提出的“准备打仗”，“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响应不力。甚至于丢在脑后。你们打内战了，结果没有准备打仗，而是武斗。因此也就不能团结起来，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站在一起，“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九大以后半年多了，已过去很久了，我们中心的意见就是要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狠抓对敌斗争。从你们的报告也好，你们发言也好，直到最后检讨也好，在对敌方面都不够强调。这次分组讨论才认识到这个问题。就是要狠抓阶级斗争嘛！四川地势远离国外，但内地敌情复杂，内部的敌人，九种坏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这些坏人多得很。特别是你们说的脑子里毛主席思想少，眼睛里没有敌人，这里所以我们提出首先要狠抓对敌斗争，狠抓斗、批、改。你们批得不好嘛！你们没有狠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四川的代理人李【李井泉，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廖【廖志高，前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任【任白戈，前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重庆市市长】之流，批他们嘛！要把仇恨集中在他们身上嘛！只能在这个基础上清理阶级队伍，然后整党。当然首先搞好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狠抓斗、批、改。按主席提出的程序来进行。一直搞到下放。要狠抓战备动员，虽然四川离外国远，但是现在战争是立体的。无论前方后方都会遭到敌人袭击的。不能因为远，就可以松懈。正因为如此，就要狠抓三线建设，建成真正的祖国的战备基地之一。具体工作很多，要按九大政治报告要求，你们把三线建设搞得更好，把四川报告的落实无产阶级政策和战备工作，迅速把大三线、工农农业生产促上去，这是你们第二个报告中都有了的。由你们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回去研究贯彻，好好认真讨论体会。分别动员群众进行。说到而且要做到。特别要改变四川农业落后的面貌。集中地说就是这个问题。

（读批示的结束语）

伟大领袖毛主席讲过：“四川很有希望。”但是你们辜负了这个希望。时间又过去这么久，现在我们又把主席这个话拿出来说，而且得到毛主席批示“照办”。你们总要达到毛主席这个希望吧？

众：要！（热烈鼓掌）

周恩来：回去要行动了。重复地来说，相信四川广大军民，人民解放军，广大群众，首先是无产阶级工人、农民、解放军和真正向工农兵学习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愿意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照耀下，要把四川建设成祖国可靠的战备基地。

（对陈伯达）伯达同志，鼓励他们几句！

陈伯达：过去我讲过一些话，大家又听不懂。不用再讲了。祝大家胜利地团结起来，取得新的胜利。经过这次解决，毛主席的口号可能在四川得到很好的实现。听得懂吧？

众：懂！（热烈鼓掌）

周恩来：你们的报告比较长了。我只是打算回答几个问题。因为你们对自己的报告有点争论。你们的报告，首先是讲了这次开会，这次开会应该是说确切点，比以前好多了，比别的省在九大到中央来开会，比起来说，你们这次会是好的。另外你们从绝大多数，从领导同志起，正像你们所说的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党性，揭发了错误，各自作了自我批评，既弄清了思想，又增强了团结。我们认为，这个估价，是合乎这次开会的事实的。不应把这个估价掉了。发展的过程嘛，这是你们估价对的。当然，揭发错误，自己揭和别人揭，有深有浅。这个不要紧，开了端，总会要前进吧。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他们几个领导同志，大多数的检讨，又坦率又深刻。但总是开了端，开了头。除了极少数人还没有通，前进了一步。有的还有抵触情绪。这个是少数。绝大多数都作了自我批评。这个精神比别次会议不同。你们估计过去工作是有成绩的。比如说夺走资派的权，这总是伟大的成绩呀！这总是广大军民和群众搞起来的。特别是在革委会成立以后，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特别是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工作是有成绩的，这个估价还应该是一分为二，不要觉得四川是漆黑一团了，那是不好的。灰溜溜的，那个不对。应该是朝气蓬勃的，错了就改嘛。你总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把走资派在四川最大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这一小撮打倒了嘛！夺了他们的权嘛！各单位也有。其中执行什 准斗炊 废叩模 姑挥懈幕诘淖咦逝桑 阖 强勘？站了。然

后等他们承认了错误，改正了错误，然后再结合，解放他们。那你算是作了这件事，总是有成绩嘛！以后还搞了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嘛！但是搞这个成绩，跟九大全国形势的发展，和当前的工作要求来看，四川是落后了。在这样说来是落后了。而落后的责任，原因不在于群众，在于省革委的领导，把这个问题颠倒过来，不责备下面，责备上面。

我这里还要说，我们也检查一下中央是不是对你们过问得太少了？是少了点。这件事情，我们看经过，我们有错误，要承认这个责任。没有抓紧就是了。但是在革筹小组成立前后，我们还是抓了一段时间，造反派来北京，反对李井泉一小撮走资派的革命群众上北京请愿，我们还是不断接见的，也平反了。刘、张他们过去，李井泉压他们，是错误的，也把这个案子推翻了【1967年4月1日至3日，周恩来和康生主持召开了中央解决宜宾问题的会议。4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四川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平反的通知》（中发〔67〕154号文件），称“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委刘结挺等同志的案件，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十分关心，并指示周恩来同志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找双方有关人员来京，加以处理。”认定刘结挺、张西挺等是“坚持党的原则的好同志”，他们的案件是“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冤案，完全颠倒了黑白……”】。解决了四川问题，成立了革筹小组，革筹小组回去，你们不请示报告，也不按中央规定的重庆问题的五条、四川问题十条办事，开始有个报告，我们没有批。那么后头呢，就是武斗继续发展了。情况不明了，你们的报告来得少了。当然还是找你们来谈罗。可四川本身呢？给中央的报告实在是数目太少了。这三四个月，一直到你们来了前后那一次，十一月十九日，我们停止一些地方报纸以后的电报，总共的报告一共有五十二份。这些报告中央看几次，这是有根据的。但是我们大的环节我们还是抓一下，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承担责任。不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四川省革委的领导身上。那么中央承担了责任，替省革委承担责任，以后省革委的责任就大了。所以他们作了五条检讨。在检讨中间，对五条检讨有自觉的，有还不够的。我们觉得这样子是可以的了。

五条检讨第一条，我们把问题集中了，把头绪搞清楚，最主要的，是说我们犯了以下严重错误，什么严重错误呢？以下分五个问题了。

第一个是我们主要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是一个总题目，总的一句是最重要的，是省革委主要领导没有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没有认真学习，传达执行。还有时忘记了，例如“红十条”，双方都争，真正“红十条”核心的东西就没有去执行。

第二条是没有正确对待群众，违反了一九六七年十月发布的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最新指示。这是在一九六七年夏不久就发布了的，而且是在九月《红旗》杂志上，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的。姚文元的文章，当时就论述了工人阶级内部不应该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没有必要嘛！应该联合起来嘛！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嘛！这话是毛主席在六七月间说的，在九月就把它用毛主席指示发下来了。在社论上就讲了。可是那个时候，你们成立革筹小组不久，如果说七月王力到重庆、成都，特别是在成都讲了八次话，所有出来时间有八天，干扰了你们，现在他们是不好的人，但是那时候有谢富治讲的话，也讲得对嘛！他是传达中央的声音，并且很快《人民日报》社论就提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讲话。为什么不注意这个呢？为什么不把两派看成是革命群众呢？这一点在“红十条”上说得清清楚楚的，都是革命群众嘛！为什么不把他们很好地联合起来呢？所以这个不能说中央没有指示。但是这里头，我们特别说了一条，就是省革委自始至终个别领导人，就是他们自己写的，错误的以拥护或反对自己为标准。划分“革”与“保”，划分“‘红十条’派”，“反‘红十条’派”。这个当然指的刘、张了。其他人也有的同意他们这个意见。但是，他们是拿这个作标准的。这个不仅他，王茂聚【宜宾地区革委会主任，宜宾军分区政委，四川省革委会常委。于这次会议期间 11 月 21 日在京西宾馆住处自杀】在“武装支泸”的那个时候说的，“武装支泸”还早一点嘛。所以他们这个是最大的错误。把群众搞成两派长期对立。有人说“二月镇反”时有“保”的，那个时候过去了嘛！“二月镇反”到我们五月“红十条”中央批示的时候，问题已经解决了嘛。如果不是王茂聚在那个地方“武装支泸”闹得那么凶，形势也不会那么紧张嘛！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看得清楚。现在我们查出来，王茂聚同郭林川【宜宾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曾与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一起于 1967 年 4 月由中共中央平反，时称“刘、张、王、郭”】在“武装支泸”的前线打给省革筹小组的那个电报，坏透了，那完全是诬蔑，乱说。郭林川，是不是那样？

郭林川：是。

周恩来：你讲的还记得记不得？

郭林川：记得。

周恩来：你说了这个事情没有？

郭林川：说了。

邱会作：今天晚上是郭林川最干脆的一次。

周恩来：是啊，我是专门查了的。你要不说，我就把全部文件都带到这个地方，我今天是下了功夫的。五十四军作了一件好事，就是把王茂聚、郭林川这个事告诉中央。就这幺“武装支泸”，他们打的那个电报是坏透了！这不是讲韦杰【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因 1967 年“二月镇反”问题被中央以“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批判】，特别是甘渭汉【成都军区第四政委，因 1967 年“二月镇反”问题被中央以“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批判】镇压革命群众那个事情也解决了吗？是讲的革筹小组以后的事。这个当然要承担责任嘛！这个报告是革委会写的，革委会也只能管革筹小组以后的事，革筹小组以前的东西，甘渭汉以前的事他不管，不负这个责任。所以他这个检讨是对的。这个时候，再分“革”与“保”，那就错了，是不对的。应该争取产业军广大群众嘛！这是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那个讲话中有嘛！

第三，检讨的是违背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发动了全省性的所谓“反反复旧”。这个事情不用解释了，四个文件都在一起了。你们把整党座谈纪要提在前面来了，他们提了许多错误作法。因为整党是应该的，整党方针是中央的，就是他们的作法是错误的。那幺，既然这四个文件都批判了，那当然都不能承认的了。有的同志还担心，你说他是个错误做法，他说他那个方针还是对的。整党方针是对的，错的是他“反反复旧”是错的。这四个文件当然站不住脚，如果哪个还争辩，错的嘛，还争什么？这一点要说清楚。

第四，是革委个别领导人，这个当然是指刘、张，没有点名。我们觉得这个决议上不要点名，你们看山东文件也没有点王效禹的名，贵州没有点李再含的名，山西没有点刘格平、张日清的名，他们犯了错误，还是让他们改正嘛！所以他这回有了检讨。还给他改正的机会。我们主张不点名。但是性质很严重了。头一个

是头脑膨胀，居功骄傲，争权夺位。这是不是个人野心家？就是个人野心家嘛！

不必写上个名字，那个等一等再写。何必急呢？如果改了，这个就不写了。有人说还要加个“飞扬跋扈”，那个是形容词。要争权夺位，这不是个人野心家吗？第二个是利用职权，搞宗派主义，拉拢一些人，排斥一些人，还不是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以我为核心，操纵办事机构，安插亲信，这不是“独立王国”吗？突出个人，独断专横，突出个人，利用一切文化工具，为个人树碑立传。这还不是给自己树碑立传？这不是为个人造舆论吗？所以这个性质够了。我们现在希望他们二位，他们自己承认要改，还有“四看”嘛！这都是毛主席的话，批呀，保呀，帮呀，看呀，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了。这些都是主席的话。而且还有些领导同志，从张国华同志起，没有帮助他们，帮助不够，跟他们斗争不力，例如刚才说的，王茂聚的那个电报坏透了，没有对他们进行帮助，批判不够，郭林川又偏向他，支持他，站在他们一起嘛！一直到九大以后，感觉到“反复旧”不行了，他才纠正，但纠正得不力，所以还有嘛，冯德华【前成都空字 028 部队（解放军第十三航空学校，1967 年 5 月改称第四航空机务学校，此时已由军委决定撤销）红色造反总团负责人】这些人，他就可以不听指示了嘛，为什么呢？在四川就是刘、张说话算数，别人说话不听，连张国华说话也不行。张国华同志也无可奈何。首先你们革委会要负责任，首先是张国华同志，别的同志对他们不注意，没有批判，所以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所以集体要负责任，所以倡导集体生活，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一元化领导，各地都应该如此。这里也要说王茂聚这个人至死不改了，并以死来威胁，这种人自绝于党，自绝于群众，这种人不能当党员，要开除党籍。特别是刚才说的那封电报，王茂聚、郭林川两年多就那么个态度，所以他挑动、武装群众斗群众，那次省革筹小组也没有把“红联站”估计对，说他们都是保守的，上层不能承认，群众可以承认。这样就给王茂聚一个借口。就是他那武装打死群众的借口。我说这是犯罪的。省革筹小组制止他，他不听？找他来也不承认错误，你们对他无可奈何，这就放纵他了。这个放纵，首先是刘、张袒护了他。那么这个张国华、梁兴初同志，首先张国华同志。以后还有很多了。三次“武装支泸”，是三次嘛！所以这样情形，这样的班子，以前是革筹小组，以后是革委，再缩小就是核心领导小组。

就像王茂聚的死，那他就“自作孽，不可活”了。但是他为什么放纵到这个程度？就是领导对他的事不负责任，放纵了他，从今以后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

可是要抓紧。全党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这样的组织原则。

第五是强调领导核心不团结。这个是说的很清楚了。这五条检讨说的很清楚了。不一定写什么性质了，不一定要写什么了。

以后的十一条措施，本来是十条，现在我们把办学习班改成第十一条，单独成一条。不然你们又来个“前红十条”、“后红十条”，是吧？又要混淆，又要吵架。横顺吵架。总之我们连数字都给斟酌了，才改成十一条。这个十一条需要解释的就解释。不每条都解释。

第一条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毛主席指示，认真学习中央指示，领导班子带头学，带头用，自觉斗私、批修。这是最主要的。这次会议要逐步传达到群众中去，统一步调，要斗私批修。这回去要传达，首先在内部由小到大，逐步扩大范围，传达到县，然后由县往下传。要有一个统一口径嘛！如不带头活学活用，带头斗私批修，那怎么能搞得好呢？各传其所传，各取所需就不行。所以第一条还是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就拿这一条来考验。四川的党，四川的人民解放军，四川的革命干部、群众组织头头，拿这个来考验，拿毛泽东思想尺度来衡量，特别是头头要带头活学活用。

第二条就是加强党的领导。“五统一”【指当时中央提出的“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加强组织纪律性，比较重要。都说了，不多说了。要反对“多中心即无中心论”。

第三条，关于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解释几句。有人问四川两派群众组织到底是哪两派？报告说得很清楚：“各地区有广大群众参加的现有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不讲老远的，老远的不存在，产业军已垮了，你不能再复活起来。但对产业军群众要尊重，不能说过去站错过队的就不能改了。他们不论参加兵团、八二六或红成哪一派革命群众组织都要欢迎。这两派组织都要承认他参加革命群众组织。你们一来，我们就批判“老保只能守寡不能改嫁”是个反动透顶的话罗！在革命队伍中听到这个话都要恶心！怎么能说这个话？说这样的话，好像那个抗日战争时期在四川，封建家庭女儿讲恋爱，父母发觉了就把她逼死一样。这在行动上是犯罪，革命队伍中有这个思想就是和老地主说的一样！（这时康生讲司马相如的故事，批判“老保只能守寡不能改嫁”的思想。）而且女同志

也有说这个话的。江海云【女，四川大学学生，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负责人，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你有没有说这个话？

江海云：没有。

周恩来：咳，你没有说过。刚才康老讲的你知道吗？

江海云：知道，讲的司马相如。

周恩来：这是讲的两千多年的事。四川封建得很，两千多年后还出这种事，现在还在说“只能守寡不能改嫁”。改嫁，那时都承认了，是好事嘛！产业军的群众不管参加哪一派，都要欢迎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领导还允许改嘛，改正错误还结合嘛！你看山东谭启龙同志还选入候补中委，现在改得更好了，何况年青人。现在派性很多，也不外乎两派，不管是哪一派，不是甲方就是乙方，要造成这个形势，现在有两大派就联合起来，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现在还有什么不承认呢？但是以后就不能再搞了。今后重拉山头就错了。从今以后再拉山头就不对了。不许拉队伍，不许另立山头。（传达人说：中央一九七〇年10号文件规定，凡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成立的组织一律不予承认。）讲重一点，今后一律不准用派性名义发表讲话、文件，进行一切活动。应该消除掉。应不应该？

众：应该！

（周恩来问蔡文彬【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生，红卫兵成都部队负责人，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江海云还搞不搞派性。蔡、江答：不搞了。）

周恩来：你们当着中央说的，不搞了。你们两个答应不搞了，就有希望了。不要怕骂你们“修”了、“右”了，从毛主席身边回来还“修”了、“右”了？有批示为证。但是彭家治【四川石油局32111英雄钻井队副队长，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保刘、张一派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同志你那个派性就未丢掉。

彭家治：改了。

周恩来：我们提议你还要迟回去几天。不一定改了。你那个石油搞乱了。大庆投资××亿元，石油基本自给，生产了××万吨，四川花了××亿元，投资大呀！现在仅仅搞了点煤气【注：应为天然气。】那么少，起劲地花钱，浪费那么多，霸占汽车运枪搞武斗，两派都是如此。王存友【四川石油局32111英雄钻井

队成员，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反刘、张一派四川石油工人革命筹备委员会负责人】解决没有？

王存友：解决了。

周恩来：解决了？我很担心你们两个败家子的。××亿，听一听吧！我刚才说花在勘察上，浪费了很大数字。你们不感到痛心吗？精神能变物质，你们变到哪儿去了呢？你们搞武斗，搞资产阶级派性，这个派性要消灭干干净净！今后不准重拉队伍，用各自的牌子发表讲话。要彻底消除派性。四川要后来居上，要痛下决心。有人问三代会了，三代会，成立革委会的不要搞，已成立革委会搞了的，还能不要吗？未搞大联合的暂不成立。没有成立三代会的也暂不成立。已成立的不能搞垂直领导。让他开一开会还是许可的。三代会不能凌驾于革委会之上。不允许了。还有什么“文攻武卫指挥部”，、“群众专政指挥部”……山东这个问题搞得很严重。贵州都改了。你们这个地方就不能允许了。

第四条，你们讲了革委会只能补台，不能拆台，更不能推倒重来。两个革委会的联合起来。革委会要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搞好组织革命化。不要再笼统地说依靠造反派。那个造反派，有的初期是革命造反派，后来弄得有派性了，不是革命造反派了，变成了资产阶级派性，怎么还能依靠呢？依靠那个怎么能行呢？那就成了依靠一派压一派。这是要彻底改正的。依靠造反派是个别“以我为核心”的人提出的。

第五条，关于武斗问题。现在武斗尚未完全停止，你们的措施中提到要坚决执行中央“七二三”、“八二八”布告、命令，要反对一切武斗，在解放军支持下，彻底收缴一切武器，统统上交解放军。解放军首先要保证统一，武器散在个人手里，有的坏人掌握了，不知哪一天捅你一枪，抢汽车，把零件拿去补他的汽车，进行破坏。四川运输很紧张，盐巴也吃不上，就是运输工具嘛！四川省承认，六九年给四川汽车零件是最多的，但用于配件的最少。都走私了，走了后门，吞掉了。不能再允许！必须把武斗停止，古蔺还在武斗，还有些地方在准备武斗。你们开会的同志要把武斗停下来。认真执行“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

第六条，讲干部政策。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主要落实干部政策。认真作好解放干部的工作很重要。你们所提的，很重要的。四川那么大的一个省，工作这么多，范围这么广，你们解放军应当要负责任。“三支”、“两军”，群

众联合起来。但总得要有一定数量的干部来做组织工作，军队一下子作领导工作，总会有困难，经验不够，所以主席指出了三结合，要有革命干部，要有解放军，革命群众的代表，首先要依靠解放军，但革命干部也要有一些，才好把工作推动起来。光靠老的不行，必须老、中、青结合起来，两个三结合嘛！

第七条，要坚决相信和依靠解放军。实际上在这次报告中强调了。要认清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文化大革命的支柱，要积极地帮助解放军作好战备和“三支”、“两军”工作，很好地学习解放军。这个问题，现在在四川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所以，这次开会请了大军区后勤部、参谋部、政治部，省军区、军分区，还有人武部同志参加，还有铁道兵师、特种兵师也参加了。152位同志参加这个会，是半数以上。我们给他们单独开了会。也开了小组会。首先要求解放军团结一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不能再有二心，有隔阂。要严于责己，宽以待人。大家团结起来，还分什么你我呢？都是一个解放军，一个统帅。在毛主席的统率下的人民解放军，其实是一个，不能分家。首先解放军要先搞好。所以这次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去要起骨干作用。公开地说把四川问题解决好，首先要依靠解放军从上到下，一级一级地传达，要说服教育指战员团结一致，做到一条心。这样四川就有希望了。要坚决三条原则，做到“一碗水端平”。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你拥护毛主席的就支持，违背毛主席思想的就帮助，反对的就斗争他。不管哪个方面。

第八条，关于斗、批、改，特别是清理阶级队伍，在这上头大家觉得一定把九种人都列举出来，我们觉得上面已经说清楚了，“不要包庇相同观点的坏人”。特务、内奸、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还有国民党残渣余孽……“坏人”就代表了。有人说，不一定九种，还有十种，反正都包括了。还有反革命，都应清理出来。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办事。在这个基础上整党建党，吐故纳新。各吐对方的“故”，各纳各的“新”，都是派性，那不行。

(第九条)宣传工作上要统一，这回要彻底的统一，不能像过去了。《四川日报》要彻底改组，派得力干部进去，再不能各唱各的歌，各吹各的号了。就是要在中央报告、批示、方针指导下，首先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按毛泽东思想办事。

(第十条) 战备工作，大军区已到北京开会，三线建设有报告，军工生产在报告中也有了，不多说了。

最后一条，要办学习班。四川要办，到中央来办。办学习班的目的，就是给你们工作上加强，不是减弱。有些同志现在表现得还不那么好，留下来继续学习一下，学好了，再回去。给你们创造学习的机会。

因为大小会还不可能作细致的教育工作，有的同志一时思想不通，不通就学一学再回去嘛！总是相信在毛主席身边绝大多数可以教育好，我们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办事，所以这条应该成为独立的一条。成为四川省革委报告的最后一條。要重视这个工作，把这个任务担当起来。帮助四川促进。

这是关于报告的问题。

关于三线建设的报告不多说了。这是你们范围内的工作了。三线建设就搞了两三年，当然也不是所有都落后，还要一分为二，有好的，但不好的多，要快马加鞭赶上去，迎接七十年代。四川三线建设艰巨，要首先把四川的革命搞好。

五项检讨，十一条措施，中央批准了。按照这个执行，四川会改观的。在军队的会上，我曾说，万象更新嘛！新年快到了，七十年代开始了，你们要万象更新。贵州春雷再响了嘛！你们四川可以万象更新，一定会万象更新。真正按批示、报告、文件好好学习，传达执行，通过实践证明你们是真正了解了错误，改正了错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这样四川一定会后来居上，万象更新。祝你们胜利！

(热烈鼓掌)

请康老鼓励他们几句。万象更新嘛，你们讲的嘛！

康生：文化革命初期，我们接触四川同志比较少。最近接触得比较多。但不是都认识了，总是熟悉了一些面孔，熟了一些，思想又熟了一些。你们革命的思想，好的思想也熟悉了。坏的思想，不好的思想也熟悉了。你们要回去了，咱们要离别了，离别总要讲几句好话嘛！这次离别相当长，一离别就是七十年代了。六十年代不再见面了。再见面就是七十年代了。我和部队同志讲了，你们回去迎接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是伟大的七十年代，毛泽东思想将在全中国、全世界得到更大的胜利，祝同志们回去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过去说过万象更新这句话，有些想象嘛！好像一万件事情都要更新，没头没脑的，谁晓得从哪里搞起呢？万象有个基本的

一象，特别要更新的？ 镜囊惶？，就是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一切一切的关键。过去有的同志学习得不好，犯错误。经过这次会议，在毛主席、林副主席身边，听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声音，应当有所进步吧？应该有个更新的条件吧？这不是复旧了吧？因为“反复旧”嘛，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讲的，什么叫“反复旧”：“反复旧必复旧。反复旧就是复旧。”那么，你们既然批判了这个“反复旧”，现在不是要去复旧了，而是要去更新了。还是首先在思想上的更新。在这方面，我利用这个机会讲一讲，我是相信毛主席的这句话：“四川很有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更新，开始了一个很好的开端，那的的确确证明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四川很有希望”，当然这个希望是要依靠你们二百五十多个同志，你们每个同志要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要真正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办事，真正按十一条中央批示办事。真正做到，就可以消除落后，就可以使四川有希望，就可以把毛主席的希望变成现实了。祝同志们工作胜利，借此机会，给同志们拜年！拜个早年嘛！（热烈鼓掌）总理叫我讲话，没有什么讲了，重复几句老话。

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不知哪个省已成立革委会，毛主席批示“照办”（记得是批云南的六条时）。我当时曾经就“照办”二字发挥了一下。也许在座同志有的听到了。这是初期的事嘛。因为你们大家反落后，现在我觉得四川还可以用一下。你们看这个文件有一行红字，不要轻视这一行红字，要好好想一想，毛主席讲了：“照办”，在毛主席批的两个红字面前，你们怎么想的呢？一个是照，照什么东西呢？就是照毛泽东思想，照中央的指示，照你们省革委、成都军区报告的十一条，应当用这个去照。那么单照不行？还要去照一个办。这个办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想想你们过去啦，主席已批示了“照办”的那个“五二八”批示【指 1968 年中央批准成立四川省革委会的批示】，你们照的怎么样呢？办的怎么样呢？你们想一想，现在又批了一个“照办”了，你们采取什么办法呢？是不是还是过去那个办法去“照办”呢？还是按现在毛主席批的这个“照办”真正去“照办”呢？

三年实践中，执行毛主席批示“照办”两个字中间，我们体会到有这么一种情况，也包括四川在内，有的地区，有的同志，有的群众组织，是既照又办了，就是根据毛主席的批示，中央的批示，集体的报告，既照又办了。根据毛主席的

教导，林副主席的指示，根据中央的方针，真正地把毛主席的思想，把中央的指示、方针、政策，落实到各个方面去。这样的情况，在全国就更多了。我想，四川在这方面也不是没有的。我们不是完全否定四川，你们也有照办的，你们报告中也讲了，夺了走资派的权，你们的工作上也有成绩嘛！既照也办了。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一个时期没有照，或者没有完全照，办是办了，没有办好。但是在领导，在群众帮助下，改正了错误，批评了自己的缺点，听毛主席的话，听林副主席的话，按主席思想办事了。四川是有的。首先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在甘渭汉、韦杰、叶剑英错误下面，开始犯了错误，如五十四军，以后经过中央纠正了。就很快改了。文件上也讲了，四川省革委会成立后，广大的指战员作了不少的工作。中央批了：在各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绩。虽然人民解放军初期犯了错误，以后很快改了。在中央处理四川问题批示后，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的指示、方针、政策，人民解放军既照又办了。当然在办的中间也有错误的。不大平衡嘛！但是，应当肯定他们的成绩。不能说四川的群众、革命干部、特别是军队没有照，也没有办，这就是说，在照办中，有的是一个时期没有照办，以后经过自我批评，改正据点错误，基本上又照了，又办了，全国这样情况就很多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照是照了，讲也讲了，讲得很多了，在会议上、文件上也讲了，报纸上也讲了，但是照而不办，办也没办好。那是讲空话了，中央的指示就不能落实，成为一纸空文了。没有研究，也没有照办。你们自己也说照，照也是各有各的照法，有真照的，也有假照的。你们那里不是有个“红十条派”吗？自称“红十条派”，他也照了，就是照对自己有利的那一点，并没有全照。只讲别人来照，我是呱呱叫。有的照了，但是办是相反的办，是照而不办。这是第三种情况。

第四种是办而不照。他相当努力挑动武斗，辛辛苦苦地相当努力地在那里办呀，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了许多工作，可是照的什么呢？办的什么呢？照他的思想，照他的宗派主义，个人主义，照他的想法，照他的那个东西办事。我们遇到四川很多事情都是这个样子。不请示，也不报告，中央文件他不研究，办事就按你的那个想法去办事。这个办事当然是错误的，与毛主席的“照办”完全相反的。

下面还有一种，更坏了，是少数，也不照，也不办了。所以我们希望这件事，同志们要慎重，很严肃对待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示，看起来是两个字，这包含着

思想、政策，也包含着各种工作的落实。照就是要照毛泽东思想挂帅，办就是要各项政策落实。所以，这一点希望同志们仔细地研究一下，把这个过去对待中央文件，你们说了“红十条”、“五二八”仔细研究，对照对照，不要忘记过去那些错误。

还有哪，同志们，你们要回去了，可能今天晚上走，也可能明天走。希望同志们想一想，回去怎幺办？提出这个题目，对每个同志都是个考验。是什么考验呢？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考验，是党性的考验，是真正拥护、忠于毛主席，还是假的。是真对四川七千万人民负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负责，对人民负责，是为人民服务，还是假的。到底是不是革命的，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这里一个多月了，那还好办就是了。有错误时中央可以马上帮助，回去后就要真正地办事啊！要协助千百万人民办事，要认真工作了。尤其从中央开会回去，一举一动对下面影响很大。你们要想想，我们与军队同志讲了，要有信心，四川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搞好。要相信四川落后这个情况一定会改变。一定会赶上去，后来居上嘛！

这次会议开始是稀稀拉拉的，那个自我批评是敷衍了事的，后来大家觉悟的时候，就有不同程度的自我批评，总理讲了，比其他来北京开会的地方好，比过去好。这也算是居上了，应该有这个信心。这个信心不是空的，而是建筑在党的基础上，建筑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有了一个解决四川问题的武器嘛！有的同志几个月的学习，自我批评，阶级觉悟提高了嘛！四川广大人民群众是好的，领导上有了自我批评，只要有这个核心，就能改变四川的落后面貌。

第二个方面，你们要设想到会遇到很多困难，多设想一些好，想得过头一点也没有关系，这只有好处的。毛主席在七大时讲，党要遇到困难，十几种困难。讲什幺呢？抗日战争一定要胜利，但有困难，有可能敌人来一架飞机，一下把中央同志统统炸死，一个特务用一个炸弹来，一下子把中央同志炸光了。当然这个困难现在不会有。主席还设想过三年灾害，赤地千里，根本一点粮都没有。这样的困难都想到了。所以在有信心的基础上，要看到困难这方面，就需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中央批示文件。什幺样的困难你要分析一下。

这个会我参加一下，绝大部分同志是好的。包括犯错误的同志在内，尤其是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你们知道了，根据总理提议，我们专门找军队干部开了一个

会，把问题说清楚了。四川之所以有希望，最主要的是依靠人民解放军。赞成也好，不赞成也好，这是中央既定的方针。当然，依靠人民解放军，也不是说不依靠群众和革命干部，但是人民解放军是经过考验的，各地方都是这样的。绝大多数同志，军队也好，革命干部也好，群众也好，群众组织头头也好，我们接触过四川青年同志，他们很多可爱的，很可以教育的，很可以培养的，可惜的是有个时期在刘、张同志错误的影响下，省革委个别同志未很好帮助，把一些同志带到邪路上去了。但是真正经过帮助能改的，我想到这些同志很可爱的。

这个会议反映了一些情况，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一点苗头了，回到四川会感到……（不清）还是有个别的同志思想没有通。基本上思想感情与刘、张的错误（不是刘、张个人），没有完全分开。所以不管他主观上如何，客观上对刘、张错误加以解释的，加以袒护的，讨论报告时，个别同志这种观点有流露，就是讲彭家治同志。你那个讲话，我们注意，记录可能不完全，但这种思想一定会有，回去后还会遇到的。不止一个人带有这种思想的，彭家治同志是一个。

我认识康致中【建工部第一工程局革委会副主任】同志。（康致中站起来）你的思想未通。虽然是同姓，你也姓康，我也姓康，五百年前是一家。你顶着一个工人阶级的招牌，完全用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思想来腐蚀工人。你是这幺的，你是一个工人，你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这不是我才讲的，我是开始接触你就讲了。思想上还通罗！你是一个教员，国民党师范学校毕业，作过小学教员，我们也是同行了。我也作过小学教员。

还有一个袁正蓉【女，四川医学院学生，红卫兵成都部队“新总部”负责人，四川省革委会常委】同志，一个医生，毕业了吗？

袁正蓉：没有。

康生：是内科的，外科的？

袁正蓉：综合。

康生：会开刀吗？

袁正蓉：不会。

康生：我很注意医生，我是有病的。请你给我看一下，我是不怕死的。你是六〇年毕业生吗？也有好处。我原来也想作个医生，幸好未作，不然就会分到医院去了。有的同志思想并未完全通，一定会有的。觉悟有快点的，有慢点的，要

耐心做工作。回去会遇到有人，有一小部分人，还会保刘、张，会保刘、张的错误，与你们不对头。遇到怎幺办？耐心做工作。因此不要给人家戴大帽子。实际上他不是真正保刘、张，他是保自己就是了。所以刘、张同志你自己要觉悟。我看一个简报上说，彭家治说，刘、张错误已在这里检查了嘛，为什么还写在文件上呢？还写上“革”与“保”、“红十条派”与“反红十条派”呢？那些问题是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嘛！怎么能说这些呢？是毛主席平反的，是“红十条”肯定的嘛。彭家治说的就是要保刘、张。他是要保的。那好，保一个时候也好嘛！实际上上是保自己就是了。

周恩来：说这话时刘结挺在座，听到这话一声不吭。这就不对了。刘结挺同志呀，你们听到这样的话要立即表态，对不符合实际的要立即站起来反对，马上顶回去。你是三十多年的党员了。

康生：刘结挺、张西挺同志，总理这个讲话很重要。你们要时刻注意的。这是表现共产党一个党性问题。讲的时候应该立即站起来反驳。这些东西，也不能心口不一。那也不行。彭家治讲这个话并不是保你们两个人，人家是保他自己。他是帮你们的倒忙。是害你们。要这样认识这个问题。遇到这个东西，这个人就要打我刘结挺了，是打倒你们两个人的方法。当然主观上不一定是这样。客观上是这样回事。同志们，尤其是解放军要准备。有少数人不理解，会遇到干扰。不赞成不要生气，不要着急，不要戴大帽子。要耐心做工作，帮助他认识，刚才总理讲了，有几个同志留在这里，思想不通的留这儿，有人会这样想：丢了官了，丢了人了，见不到老婆孩子了。好像奇耻大辱。这样想，完全错了。留下是爱护他，不使他走到绝路，是要教育他，挽救他，帮助他改正错误，按毛主席教导，犯了错误一看二帮，允许犯错误，但犯了一定要改。允许改正嘛！

对待错误，尤其是反对毛主席的错误，反对中央的错误，离开中央的方针、九大的方针的错误，必须从思想上严肃地对待，严肃地斗争，前个时期，中央对你的错误是相当严肃的，张国华同志，你在四川遇到这个错误，你不是没有看到，你是看到的。你就不是严肃的态度，不是无产阶级共产党员的态度，总是有点个人打算，怕得罪人，怕斗争，怕字当头，怕人家斗你，怕丢官。不要怕嘛！怕得罪人。遇到错误一定不能调和嘛！还有另外的同志，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但是一条，还有另一条，犯错误的同志，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

误，帮助人家改正错误，绝不一棒子打死。所以这一方面会遇到个别地方少数的这样问题，江海云同志，你是川大的，你们要改变那个情况就有相当困难，最近我看了新华社报道，有个记者没有署名啊，姚希林、×××、×××，从成都写来一个报告，讲川大这个老大难单位。这个记者很挖苦就是了。

周恩来：江海云，你是否听过迟群同志的报告？

江海云：听过。

康生：蒯大富不见得比你不好，响当当的司令，都到内蒙劳动锻炼去了。青年人改了就好。那人报告川大有个“32111 部队”……

吴法宪：讲讲那个“32111”：每天三顿饭，两顿觉，一场球，一盘棋，一本书——看坏小说，看黄色小说。你们四川还下象棋呀！

康生：这就是“32111”。这个事，记者是比较清楚的。你听了清华大学的介绍，还认为不行，蒯大富不比你差，比你江海云响当当的呀！现在人家还愿意改，你们学校要改变这种情况，真正用毛泽东思想解决不难，要有信心。碰到这样的单位也不要说“老大难”了，只要领导上面明确了，这些事是可以解决的。这种老大难单位也要信心足，每个地区也会遇到这种情。另外一种情况，周家喻【重庆大学学生，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及红卫兵重庆警备区负责人。四川省革委会常委】同志，八一五工作有什么困难吧？

周家喻：有困难，我们要很好承认，改正错误。

康生：这个会，你八一五重庆的问题讲得少，红成的问题讲得少，总之要一分为二。重庆市革委会办公室与刘、张办公室差不多，你们人多些了。省革委办公室要整顿，你们那里也要整顿。你承认就好了。成都市偏向兵团、八二六多一点。重庆、成都办事机构一千五百多人，起不到作用。承认重庆好，总之要一分为二看问题。并要首先看到自己的缺点、问题。成都的办事机构要彻底改组，事情就是这样了。总之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按毛主席教导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总要首先看到自己的错误问题，这是一方面，就是保刘、张，实际上就是保自己。要看到这方面，会遇到一些困难罗。那么还要看到另一方面，从我们会议中看到，也有另一方面，就是觉得对刘、张的批评不够味道。这一方面，下去也会遇到的。我们真正是受过错误害处的地方，个别同志讲得更尖锐的，尤其是刚才看到总理念到核心小组还有刘、张，那就不满意了。实际上这种思想也是不符合主席思想。

这种思想实际上也是这样子，他们不是真正说刘、张，不是真正对刘、张问题讲的，他是表示他的正确，也是响当当的，呱呱叫的，他就忘掉了主席讲的，对犯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棍子打死，总是要教育，要帮助，要看喽！这样，这两方面，比如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它就会妨碍团结，影响团结，妨碍十一条往下贯彻。当然，不会不遇到问题，遇到问题要耐心地做工作，拿主席思想，拿中央方针做工作，不要怕困难，不要怕引起攻击。我不是讲了，贵州省有个工厂经常打起来，你是“陈独秀”，“康老三”，而且另立山头。贵州那个徐永章是犯错误的，回去检查了，改了。他到贵阳铁厂去，一个××不但骂了，而且打了。

周恩来：打了还签了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康生：那个“二不”还是需要。地方同志也是需要。要学解放军。不管怎样，只要姿态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毛主席的批示“照办”和你们的报告十一条，一切困难都可以解决的。而且我觉得，只要我们坚持这个方针，并不是抽象的那么困难，也并不是还要过个七十年代。绝不是那样子。所以，我看，革命，生产，工作，战备也好，在这个七十年代的第一季度中间，一定会有大的起色。四川会出现一个新的面貌。总理不是讲了吗？一个红彤彤的大后方，改为红彤彤的战略基地，实现毛主席的希望，一定会落实，林副主席讲，四川问题不解决，他不放心。我相信同志们的工作作下去，一定能让毛主席、林副主席放心，这方面我要预祝你们新年胜利，祝同志们身体健康！

周恩来：请黄永胜同志讲几句。

黄永胜：同志们，我没有什么话说。刚才总理、伯达、康老给同志们作了指示。六十年代剩下几天了，七十年代将要到了。今天中央同志欢迎你们过元旦。中国有句古话叫“送旧迎新”，你们回去过后要有一个新的思想，要把旧思想抛掉。要把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那些东西统统抛掉，要有一个新的思想，一切按毛主席思想去办，去指导我们的行动。四川之所以搞得比较落后，就是因为没有按照毛主席思想办事。而是按你们的思想办事。所以我们在迎接七十年代到来，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思想，就要有一个新的姿态，就是一个革命的姿态，一个战斗的姿态，一个团结的姿态，一个严于律己的姿态，去搞好四川的工作。也要有一个新的作风，这就是要有一个战斗的作风，要有一个紧张的新作风，一切应该从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准备打仗”的

要求，又要从林副主席指示“要用战备的观点去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就是要有一个战斗的作风，去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总之我们伟大的七十年代的到来，在各方面都应该出现一个新的气象，出现一个新的面貌，我祝同志们在新的一年，一九七〇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现无产阶级政治，按照主席思想，主席的革命路线，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的更大胜利，在新的岗位上，新的工作中立新功！

（热烈鼓掌）

周恩来：吴法宪同志他还有几件事，他还要讲几点，开始还有邱会作同志、纪登奎同志、李德生同志，他们过问得勤，一开始他们就过问了。他们最清楚，每天都在过问四川的情况。我补充一下。

大家对报告上有这一段话，就是干部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所有群众代表都不能脱离生产，其中青年知识分子要下放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就是说参加革委会的群众组织头头的。他本来未脱产，但是现在参加省、地、县和送到工厂当了革委会成员后，就离开他的业务，脱离生产了，，就做官当老爷，不劳动了，这怎么行呢？我们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倒走资派，挖修正主义根子，同时去掉官僚主义。脱离劳动是修正主义温床，高高在上就脱离了群众，不要脱离生产劳动，不要脱离实际，要经常下去。过去在下面生产是好好的嘛！有群众代表性嘛！当委员就能把群众的思想动态反映到革委会来。这就是生动的局面。这是一种朝气蓬勃的气氛。如果蹲在机关里开会，那不是死气沉沉了吗？所以革委会要有群众代表参加，一定要有新鲜空气进来，一定要有基层代表委员，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改造我们的领导机构。革委会是新的机构，为什么都跑到上面来了？就不下去了？要能上能下嘛！你们看到中央推荐的一个典型，就是上海市的王秀珍同志嘛！是个工人群众代表，上海市革委会的领导成员，九大后她是中央委员。回到上海，回到工厂里劳动，那就很好嘛！她给中央一封信，也反映了活思想，三年很少劳动了，开始劳动不习惯，腰痛，腿酸，搞一会儿就习惯了。回到劳动中去很不容易呀！群众看到是他们的人，才说知心话，意见就反映到革委会来了。你们讨论好像有这样一个活思想，好像是“造反一场空”，这完全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思想，是“造反做官论”，“劳动镀金论”，劳动了就要当官，不对，这就是“修”了嘛！你们要斗私批修。所以从工厂、公社基层单位来的，

应该一边当委员，一边还要劳动，要像王秀珍、吕玉兰那样才好。按主席思想办事，培养新的无产阶级作风，小将们应该回去劳动，青年人更应该劳动锻炼，一边劳动，一边当代表，总是在下面时间多，开会时间少，才合理。

康生：就是聂元梓也参加五七干校去了，她还是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谭厚兰也下去劳动去了。

周恩来：北京那个中学红卫兵的头头，下去劳动一年多了。但是还是北京市革委委员嘛，到北京来还是要参加会议，但不一定每次都参加了。不要总在上面蹲着。到下面去蹲一蹲也好啊！

康生：希望你们把四川搞得红彤彤的。

周恩来：战备搞好，三线建设搞好，我们希望去看你们，是你们来见我们哪，还是我们去看你们好？我们希望去看你们，最好每个地方都像一些兄弟省份搞得那么好，革命、生产都搞得好。七十年代应该如此，元旦有个社论，主要是鼓动大家往前进，我们有七亿人口，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我们搞好了是一个大震动。有个资产阶级作家，韩素英，她是一个女的，到中国来参观了一些地方，就说劳动在毛泽东的中国是光荣的，不是惩罚。

康生：苏修就是把劳动看成是惩罚。

周恩来：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认识到劳动是光荣的了。

康生：张国华、梁兴初同志，你们核心小组也好，常委也好，都要注意啊！我们的经验，不管哪个省，凡是有这个问题的，就是学生根本不下放，蹲在机关里。四川也好，新疆也好，内蒙也好。这点你们革委会没有坚持中央的指示，你说人家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你们自己就自由主义嘛！所以就出了一个“32111部队”，这是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的大事。

周恩来：十一条措施中明确规定了办事机构主要是解放军，和原来的革命干部来抓。这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是否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大事。

吴法宪：我们四川这个会，从十一月五日到十二月二十七日，前前后后除省军区领导同志外，到现在已经是五十二天了。这个会议是逐步扩大的，由各军分区、师的同志参加，后来又增加了一些军队、地方的同志。开了这么长，今晚这个会议就结束了，闭幕了。中央常委，政治局的同志，只有叶群、汪东兴同志有事外，其他同志都来了。总理、伯达、康生同志都作了很重要的指示，我个人完

全拥护。希望你们按主席指示办事。会议开得这么长。刚才总理、康生讲了，这个会开得比较好，我们按照毛主席思想、指示、方针、路线、方法进行的。特别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主持下进行的。你们原来写的报告，中央首长作了很多很重要的指示，总理看了改后，提了许多重要意见，也的确向你们提了很多意见。也是因为大家努力，觉悟了，所以开得比较好。这次会议，总理、康老下的功夫很大，大小会都参加了。伯达同志写文章、写书很忙，刚才的指示非常重要。

康生：你们需要学习吴法宪、纪登奎同志，我们不是评功摆好。特别是纪登奎同志作了大量工作，对革委会个别同志作了大量工作。还有邱会作同志。

吴法宪：中央首长作了很多指示，都是毛主席的声音。这个会开得好，是在毛主席指示、林副主席指示，中央直接领导下开好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林副主席在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讲：中国革命几十年来，实践证明，凡是执行毛主席指示，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我们革命事业就胜利，就发展，就前进。但是毛主席思想受到干扰时，我们的革命事业就受挫折，受损失，碰钉子。这次会议开得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回去怎么办：是个大问题。能按中央指示、报告办事，按总理、伯达、康生、永胜同志的指示去做，真正能够胜利。如果违背这些指示，还要受挫折，碰钉子，犯错误的。关键就在这里。

周恩来：主要靠你们照毛主席的批示“照办”就是胜利。这两个字有两个关键问题，照，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才能照；要办，必须彻底把宗派主义、派性去掉才行。不然怎么办？越办越坏。这是要高举伟大红旗。

吴法宪：我向同志们作两条检讨。一条是，这个会在总理领导下，我作点具体工作，但作得不够，另一条是，我们有个学校在成都，十三航校，代号叫 028，现在叫第四机校，初期对四川文化大革命作了点工作，以后错误越来越大，给四川帮了倒忙，干了许多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做了很多错事，陷在派性里拔不出来。这次揭开了盖子，批评了他们了。我向同志们检讨，希望转达给四川同志，希望 028 同志，再不要插手地方文化大革命，没有给你们支左任务。你们要按毛主席教导，搞好本单位斗、批、改。要向本校同志作检讨，向驻军作检讨，承认错误。

对这次会议的传达，提几点意见：

一、按照文件精神传达，完全按中央规定办事，传达步子稳点，方法要细，不要一下子铺到社会上去，那样可能搞乱，可能出现反复。对四川文化大革命不利。按省革委、成都军区的安排办。到会同志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个人回去一下子铺出来了。引起群众混乱。敌人知道乘机煽风点火，乘机破坏。执行这个报告、批示，敌人藏不住，揪出来，不然他们会乘机破坏。一定要提高觉悟，不能私人传达。我请示总理，除了今晚上讲话以外，以前首长的讲话都收回来。按党性办事。收不收起来，是个考验。带走传出去各取所需，一搞出来，搞到小报上去，油印，石印，铅印也有，将来很不好。各取所需，派性利用，敌人也要利用。很危险，要收回来。同志们顾全大局，再发生这种事情，要追查责任。按党的纪律，军队纪律，追查责任。为使会议顺利传达，不发生反复，动荡，不被动，更有利于团结，搞好传达，搞好四川文化大革命要注意的。

二、就是八一五、红成同志，或倾向八一五、红成的革命干部、军队干部，无论如何不能翘尾巴，受批评少一点，翘尾巴一定会犯错误。八一五不要翘尾巴。我给××同志提了很多意见，不是你一个的问题，不能利用刘、张错误压兵团、八二六的群众，刘、张自己检讨应承担责任，错误在刘、张身上，不在群众。如不注意这一点，下一次犯错误就要轮到你们八一五、红成了。那么反过来，兵团观点的同志，不要再袒护刘、张的错误，过去帮了倒忙，现在再帮就不行了。康老讲是袒护自己，自己垮台。也为刘、张垮台制造条件。要按总理、伯达、康老的讲话，积极帮助刘、张纠正错误，才真正是从政治上爱护他们。真正按毛泽东思想办事。

三、对省革委领导同志，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犯错误就了不起，一犯错误就大搞特搞，这不好。要帮助纠正错误，只能按文件、大会讲的，不能超过这个以外去添油加醋，那就脱离批示、报告的轨道了。一切宣传工作，按报告、批示、首长讲话为准则，不要自己再搞提纲，夹杂很多东西，那样要犯错误。离开这个以外是不允许的。回答群众的问题，只能按文件、报告，许多问题要按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以九大文件、党章回答问题。才能真正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迅速改变四川落后面貌。有的提出要发动群众批判他们的错误，我们认为是不适宜的。不妥当的。只能由他们自己作自我批评，自我批评到一定的线，不能超出范围，搞得太早，面太宽，不好。不能发动群众来批判揭发。大

量的材料够多了，好几十条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要让他们继续工作，他们表态了，围绕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周围，我们要支持他们，维护他们的威信，使他们好工作。

四、回去以后，一定要言行一致，一定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能再搞两面派了，群众组织名字不用了。规定了坚决照办。回去以后不要不统一口径，找到你们各人说各人的，五花八门那不好，要统一口径，坚定不移地贯彻批示、报告，贯彻今晚中央常委同志的讲话。一定要注意，要以无产阶级精神、党性保证，军队要保证。

五、就是要一些同志留下来，继续让你们学习一个短时间，提高一下，把思想搞通，这是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另一方面，是保护你们，回去搞不好，群众要发生问题。要揪要闹，那就不好办了。你们自己的话，群众的话，对主席忠不忠，要看行动，回去要搞好，四川问题要使毛主席放心，林副主席放心，党中央放心。要使全国人民对大后方放心。要使解放军放心。一定要实现你们的诺言。

这次会，二百五十多个同志，落实这个会的关键在你们，会开完了，空军派飞机送你们回去，乘毛泽东思想东风，把四川工作搞上去！

陈伯达：……

康生：×××同志要求回单位，你也暂时不回去，我们帮助你一下，坦率告诉你，你怕把你留下来，赶快声明。你总是有点滑头。

周恩来：我们不说假话，是要把你留下来，可没有坏处。是要回去的，留下来的，不要那么紧张。刘、张回去，犯错误也算代表人物嘛！领导小组都回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们跟着犯错误，怎么不叫你们回去？你们在小范围内影响大，希望你们万象更新。我在帮助你，自己开了小差，那就更要犯错误。反正王茂聚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真是不知耻，我们把他开除了。再不能走他们那条路，拿他们作反面镜子，“自作孽，不可活”，不能学。

康生：×××同志，你听中央的话没有错，我们不会害你的。

周恩来：这是主席思想，新的九大政治局，就证明了嘛！犯了错误改正的都选上了，也不是都选上，你现在还是革委会副主任嘛！现在二十七日了，绝大多数六九年送你们回去过新年，留下好好学习，过年再回去。

（大家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说明：根据两份当时传达原件（一为手抄件，一为油印件）综合整理。圆括号中的文字是原件上有的。为便于局外人理解，略加了一点注释在方括号中。

玖、湖南省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革委会擅自传达毛主席指示检查报告”的通知

毛主席批示：照办。

周恩来等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送审的这个通知稿指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未经请示，擅自印发毛主席对湖南工作所作的重要指示，是错误的，是违背中央历次的通知和决定的。中央再次重申：严禁私编、私印和散发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讲话、视察谈话和中央其他同志的传记、抄件、文件、书籍、诗词、画册、图片，等等。凡属以上谈话纪录和文书、图片、画册，各地都应采取措施，立即收回，予以销毁。以后如再有违犯这一通知的规定的，即应执行纪律，严予处分。对于那些为达到反革命目的的造谣惑众、招摇撞骗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分别予以判刑。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都必须严格控制各地区、各单位所属的印刷厂，严格控制纸张的分配、使用。

附件一，黎原、华国锋、杨大易关于擅自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检查报告
(1969. 12. 18)。

附件二，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清查和处理非法印刷品情况的报告。
(1969. 12. 3)

研究资料

雷运河：《运河惊蛰——山东省运河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回顾》
第四部分 曲折历程的壮歌
二、王效禹问题

奇怪的是，王效禹出问题，在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效禹以一名革命造反干部，原青岛市副市长，轰动了全国，成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山东省军区第一政委，在“九大”上又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可谓红报一时。但从一九六九年五月下旬开始，逐渐成了批判对象，到一九七零年底，短短一年多，就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

究其原因，也不奇怪。

姑且不说王效禹本人的不足，只说当时的情势，有两股政治力量在夹攻他。

一股是林彪的军队势力。象王效禹这样一个资历不深，只靠革命造反而上升的政治明星，现在凌驾于济南军区、山东军区之上，权力欲极强的林彪手下，早就心怀不满，蠢蠢欲动，伺机向王效禹进攻，不把王效禹拉下马誓不罢休。“九大”开过，全国加强战备，无疑提高了以林彪集团为主的军队势力的地位，这就造成了济南军区以袁升平为首的个别人反王效禹的有利形势。

另一股是山东反文化大革命的右倾保守势力，他们对所有的革命造反派都看不惯，对站出来造反的革命干部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看到王效禹跳得这么高升得这么快，早就恨得牙都痒痒。只是苦于被批判被打倒的地位，无力进行公开反扑，但地下活动，互相串连，造谣生事，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机会终于等到了，代表人物终于跳出来了。

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是林彪线上的人。本想通过支持山东的“二·三”夺权，能被赏识，重用，可是中央文革小组却支持王效禹，让他压在自己上面，老是无法高升。于是袁升平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向林彪集团的核心人物诉苦，向林彪表达忠心，说了王效禹不少坏话。并到处散布“济南军区受压”，“王效禹是太上皇，一切都是他说了算”，“一切都以王效禹为核心，这样下去会出大乱子”，等等。林彪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决定大力支持袁升平。所以，反王效禹的代表人物就披挂上阵了。

山东的“反复旧”运动，给袁升平所代表的林彪势力和反文化大革命的右倾保守势力制造了机会。

在反复旧运动中，一是一些革命造反派人物不恰当的歌颂王效禹，成了可抓的辫子；二是山东的“反复旧”运动又影响了徐海地区的大联合，引起江苏等省

的强烈不满；三是“反复旧”采用运动的形式，既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又不符合毛主席当时的战略部署。这下，给袁升平等人的反击，制造了良好的机会。

当时的中央形势也有利于袁升平的反击。

应该说，打倒以刘少奇为头子的党内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彻底批判解放十七年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让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林彪是有功劳的。但林彪决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学说，知之甚少，更不愿身体力行地去做，他满脑子是“权”，他向往的社会是官僚特权阶级掌权的假社会主义。所以“九大”前后，他的目标就是由他们的人马掌权，一切恢复旧秩序，一心一意去巩固和建设“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自从反“二月逆流”胜利之后，刘少奇的问题解决了，军队内的刘邓路线也受到批判，毛主席认为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应该进入“斗、批、改”阶段，一切应该走上革命的新秩序。在“秩序”二字上，毛主席跟林彪是一致的。所以这时王效禹再搞什么运动，去解决复旧问题，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复旧问题只能依靠已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逐级加以解决。

对袁升平更为有利的是，林彪正着手抓自己的班底，准备篡党夺权工作。林彪既与原先的右倾保守势力合不来，又对新起的革命左派看不惯，二者权衡，他认为，以江青、张春桥等人为首的革命左派对他今后的夺权掌权，威胁更大。所以林彪不惜与右倾保守派勾结，把反文化大革命的势力收罗在自己帐下，以建立自己的亲信班子。这些反文化大革命的右倾保守势力，在对待文化大革命，对待革命造反派上，真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可是后来，林彪集团一垮台，他们摇身一变，又成了反林彪的英雄，继续进行着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勾当，继续制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悲剧。连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也对他们是心有余力而力不足。当然这是后话。在当时，在山东、在济南军区，袁升平就是林彪集团物色的对象，最理想的人选，所以袁升平也就成了林彪的死党。

袁升平是个权欲熏心，一贯好耍阴谋鬼计的林彪集团的死硬分子。早在一九六八年底，他就秉承林彪集团的旨意，在山东大肆活动，替林彪树碑立传。在“九大”上，袁升平被林彪集团选中，进了中共中央委员会。林彪集团利用“九大”成立新的中央领导班子之机，安插了不少自己的死党，暴露了他们反革命两面派

的面目。他们除了阻止党内右倾保守势力进入中央委员会，最恨的还是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新生革命力量。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当林彪一伙需要借助毛主席的威信，整倒右倾保守势力的时候，他们是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的；当右倾保守势力被暂时打倒之后，他们又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他们夺权的最大障碍，拼命打击排挤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完全是代表右倾保守势力说话。所以毛主席说林彪集团是形“左”实右，是极右。

袁升平身上非常鲜明地具备了以上特点。“九大”会议还没有结束，他配合林彪一伙反江青、张春桥等人的行动，在山东酝酿反王效禹。除了提出王效禹擅自发动“反复旧”运动的问题，又利用毛主席建议让还没有“解放”的原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当中央委员一事，向王效禹发难。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没有让袁升平的阴谋得逞，不光让王效禹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还进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但事情并没有完结。袁升平立即通过多种渠道，向林彪他们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于是中央决定“九大”结束后，让在北京的山东省革委会和济南军区的 27 人集中进行学习。在学习中，袁升平一伙上窜下跳，发起一轮又一轮向省革委中革命造反派干群的攻击，指责他们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不相信群众，不相信解放军，不认真解放干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搞“唯我独尊”，“唯我独左”，一切以个人为中心，甚至编造了“全国有红太阳，山东有个月亮”，影射王效禹把自己比作山东的月亮，诬蔑山东的革命造反派“不围绕红太阳转。”

事情愈演愈烈。袁升平在上面坐阵，党内走资派在底下大肆活动。济南市五月初连续发生了冲击省革委的暴行，运河地区也发生了“4·10”保地革委和砸地革委的群众性武斗。山东问题闹得严重，袁升平一伙与王效禹势不两立，林彪集团充分利用了这种形势，一心要把山东控制在自己的死党袁升平手里，所以从一九六九年六月份，王效禹一步步走下坡路，全省的革命造反派也跟着遭殃。虽然，毛主席批示“照办”的 1969 年 5 月 25 日中共中央文件上，明确指出“反复旧”运动是“前进中的错误”，文件“不许登报”，以免造成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但袁升平依仗着有林彪撑腰，又获得山东省党内走资派的支持，所以根本不管这一套，在山东全省，利用军队支左人员左右运动的优势，开展了大张旗鼓地纠正“反复旧”的错误。首先把各级革命委员会中革命造反派群众代表一律清除出去，罪名是“跟着王效禹跑，犯了反复旧的错误”，同时加强了各地军队支左人

员的领导，地方的事情必须经过部队党委通过才能施行。随后又把犯了走资派错误和严重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根本不需要检查认错，一律解放出来，重新担任了领导职务。运河地区搞得最厉害的是滕县，因为滕县驻军六一八九部队政委周克玉，原来是袁升平的秘书，当然执行袁升平的指示最坚决最积极，他在滕县作威作福，简直是滕县革委会的太上皇。

《脚印——宜宾文革造反派领袖谢英富回忆录》

转眼就快到一九七〇年春节了。整个城区公社系统的生产形势都比较好，看来可以过一个较舒心的春节了。就在此时，宜宾地革委和宜宾市革委主要领导突然被召进京，一下子气氛又紧张了起来。炮轰派（是经过某军方策反从我们造反派分裂出去的）活动掀起了高潮，红色派（对立派）也在复活，又把平静的宜宾搅得乱哄哄的。主要攻击“武装支泸”，红色派甚至反咬一口，说宜宾五一三是王茂聚挑起的武斗事件。其实宜宾五一三大规模武斗期间，刘、张、王、郭、李等人均在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宜宾的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还不了解这些。因那时党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红十条”还没下达，详情前第四章《祸胎》部分已述，这里不再重复。

红卫兵外地赴宜联络站的学生头李锦凡，从四川大学毕业后要求来宜工作，不知怎么搞的将他安排到宜宾造纸厂。按说李对宜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起了相当大作用的，随便都应安排到宜宾的地市级机关工作才是。其实，早在建宜宾地市革命委员会时，就有不少人提出对杨泽彬、李锦凡等有功劳的学生应进入两级革委的问题。（据说）王茂聚、郭林川、李良是按省革委意见，这些外地学校来宜的学生不进入宜宾两级革委会，故未安排，为此不少群众还有意见。他们毕业了来宜，是应该安排好点才是，但当时领导是怎样考虑的我就不清楚了。为此，李锦凡都向我谈过几次（可能是想我传话到地市革委吧）。我想领导上也许是考虑让他到工厂里去锻炼锻炼后再提到机关工作，又因我们的关系本来就比较好，故只好多加劝慰。

突然一天李锦凡同李某某两人一路来找我，说是有重要事情商量。因为公社机关繁忙闹杂，他们又要求在清静点的地方，我就安排到社革委人保组（大明伦

堂内）去谈。他不愧是个说客，从全国形势谈到地方形势，从文革造反谈到革委会建立和炮轰派之所以形成，又是拉关系，又是谈感情，我们几乎谈了一整夜。书归正传，二李找我谈这番话主要是动员说服我“反戈”。可是，我有什么“戈”可反？宜宾的武斗，泸州的武斗是谁挑动的，宜宾七百万人民最清楚。要说支持刘、张他们，那也是党的中央叫作的呀。我参加过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中央的态度是我耳闻目睹的，怎么能叫受蒙蔽呢？这俩人真是瞎子点灯——白费油，整得我熬了一晚上干夜。最后李锦凡就说我认死理，中毒太深，顽固不化，只有跟着刘、张他们一伙倒霉了，然后就气冲冲地同某某某走了。真想不通，原来那么卖力为刘、张等人翻案的大学生，一下子又变成了反刘张的说客。我以前本来不认识刘张，也无交往，更非亲非故，中央叫支持我就支持，我倒什么霉？！后来才知道，他和炮轰派都是经过军方叫到重庆密商，并透露王茂聚都“畏罪自杀”了的消息来恐吓他们，逼其转向，并让他们回宜宾展开全面攻势，策反分化瓦解造反派的有生力量，达到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效果。

眼看就要过年了，突然接到进京参加学习班的通知。爱人又要临产了，一摊子事都得要我做呀！但为要顾全“革命”这个大局，我也只好召集城区公社革委全会，安排布置工作。当时就有人提出，近来谣言四起、人心浮动，是否中央又有什幺变动？我对大家讲：不管中央有什么变动，首先我们自己心中应有数，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紧跟党中央的部署干革命，心中无愧也没有鬼，就什幺也不用怕了，要坚定相信组织、相信党的意念。正准备动身进京学习，幸得又通知延期半月，故在我小儿子出世后的第十天，才向家人告别，赴京“学习”去也。

北京学习班四川班的学员特别多，故分住在政治学院和总后勤学院两处，四川班部就设在总后勤学院内。所有学员未经批准不得外出（大门都有警卫连的解放军站岗），不准串联，不与外界通消息，简直是要与世隔绝。宜宾地区去的人被编成一个连队，班、排、连长均由解放军干部担任。宜宾连很特殊，专门从政治学院调个理论教员来当连长（该人后期竟调任宜宾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其余全是十三军的干部。我们班长都是十三军的一个连长担任。更加上听到王茂聚“自杀”身亡的确切消息，所有我们的人（除极个别外）都感觉觉得不正常（因为王茂聚性格虽然很内向，三天难说两句话，但文革前与李井泉等人的斗争，条件

环境那么恶劣他都不想死，何以进京不久，又没为他定性，他为什么要自杀？很不符合他山东汉子的性格，人们只好用一个“迷”字来解释了）。

尽管大家都有不妙的感觉，但开始时均认为大方向没错、没什么可怕的，照样活蹦乱跳的生活，甚至学儿时打蛇抱蛋、跳拱、翻墙外出去买酒和零食吃等。因院内只有个军人服务社，不卖酒和小食类食品、大门不让出就只好翻墙喽。那时我们真像一群小学生，可干部们却都忙坏了，一会儿找这个谈话，一会儿找那个谈心，硬是在分秒必争。

慢慢的气氛开始紧张了，学习班大凡小事好像都是黄、吴、李、邱说了算，即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司令李作明；总后勤部长邱作会作。那时学习班干部们口中的“首长”，基本都是这几人。

一九七〇年的“五一”节，中央特准学习班的学员到天安门广场，同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度节日，参观焰火，大家欢喜若狂。那天吃过午饭就忙碌起，因指定我们是下午四时进场，学习班特别给我们准备了鸡蛋等食品和水果，到时无数的军车开进学院，由各连依此上车向天安门进发，我们很有秩序地进入指定地点，席地而坐静等那一刻的到来。可以说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没参加过这么庞大的庆祝活动，几十百把万人在天安门广场，秩序井然，歌声嘹亮，全然是一种幸福的感觉。

当伟大领袖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整个广场欢声雷动、红旗翻飞，“毛主席万岁”的呼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毛主席满面笑容，到城楼两端频频向人们招手致意，人们狂热的劲头，久久平息不下来，让外国来宾西哈努克亲王都大开了眼界，毛泽东的声望决不是个人崇拜和迷信搞到顶峰的，完全是七亿中国人发自肺腑的拥戴，正应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中国古话。炮竹声声与火树银花交相辉映，多么壮观而伟大的场面啊！回到住地，我们的心潮都还在澎湃，毫无睡意，灭灯号都过了很久，在班长甚至连长的再三招呼下，人们才慢慢入寝休息。

说实话，按党中央（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话说，我们是中央请去的客人，学习完后回去还要工作的，故我们的生活安排得很不错。但后面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节一过完，就掀起公开批判刘张的旋风。但是大家心里都不服。比如：在省革委工作的洪运珊在大会上“声泪俱下”地揭发批判刘张，表现得有些过头，不少人都反感，说她是十足的投机分子，原来死保李井泉，后又自称死保刘张，所以被人瞧不起。晚上散步都没人同她一路。有次她散步被人看见她手里拿着一个盘桃（因花园道路两旁都种的盘桃树，学习班也宣布过不准随便采摘），她走的又是最背静、少人走的地段，故有人就大声喊“洪运珊在偷桃子了！”一时间学习班就传遍了。她急辩是在地上捡的，不是偷。但大家硬是要说她偷桃子。这明摆着就是要贬她，实际“偷桃子”是寓意为政治扒手，我想她洪运珊也不至于去偷一个桃子吧。

由于政治空气的紧张，有些人开始“转向”，顺着上面意图批判刘张。也有个别想不通的人消沉（或有轻生念头）。古蔺县（原宜宾的属县）造反派头窦某有段时间老是单独到屋顶平台或凉台幽静的地方徘徊，大家都怕他想不开，问陈思英她也说不清楚，反正思想包袱背得有点重。有人建议我去做老窦的工作（因为我跟县区的头头都比较熟），不让他干傻事（轻生），我还真的找过他谈。他说真的想不通，为啥又错了？是啊，怎么又错了呢？结合党史来看，政治斗争真是错综复杂、千变万花，一会儿正确得不得了，一会儿又错登了（错到极致的意思）。可这次是毛主席发动、中央全会一致通过的运动，现在仍然是毛泽东的党中央主席，全中国仍在他老人家的领导之下，何以出现今天的局面？真是费解啊。我也只好劝他相信党中央，更要相信自己，扪心自问有没有偏离斗争大方向是首要的，没有就不用怕。要讲名声，我比他大得多，但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问心无愧，我就没什么好怕的了。也许正因为此，没想到时隔不久，厄运就降到了我的头上，那时后话了。在北京学习班里，当时大家最想不通的是毛主席、党中央都说刘张他们是坚持党的原则的好干部（有 1967 年中共中央的两个红头文件可证），时隔三年情况就有那么大的变化？难道又是一个“王、关、戚”（即原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问题再现？不可能因为刘、张、王、郭、李等是中央“平反通知”和解决四川问题“红十条”文件肯定了的干部，更何况刘张不是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大家都深感迷惑。

在宜宾，在市革委，我对王学明（宜宾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印象都不怎么样（不止是我），可在学习班的一件事，改变了不少人对他的看法，觉得他还有点道理。那是：

学习班批判刘张在升温，学习班领导为分化（刘张）和树榜样，连部出面指明要王学明去揭发批判刘张，因为他原是张西挺在宜宾市当市委书记时的警卫员，平反通知下达后，他是刘、张、王、郭、李等中的一员，故进入市革委任副主任的。稿子是连部找“秀才”些写的，他没有文化怕念不好，就叫人教他，当教念到“死猪不怕开水烫”一词时（是比喻他紧跟死保刘张的顽固劲），他不干了，不愿去揭发批判了。连部领导再三给他作工作他就是不干。连领导拿他没办法，只好问他要怎样才去揭发批判？他说有些词要改过，比如“死猪不怕开水烫”就比喻不对，他不是猪，要比喻只能把他比作老黄牛，故他只能念成“老牛不怕鞭子抽”。连部拿着这个“大老粗”真没办法，只好同意改（这也是连里的刀笔吏将此事当笑话摆出来，大家才知道内幕的）。由此，大家对他有了些好感，都说这个大老粗其实不“粗”嘛。

反之，曾在宜宾赫赫有名的学生领袖李锦凡，在宜宾人们心目中是很受尊重的大学生，到了北京学习班却成了连部的红人。其实从在宜宾他对我策反时起，我就知道了他的转变，因为他与我关系较好，故我没外传他搞策反事，大家就不了解他的转变。在学习班，李锦凡到处当说客，尽说些违心的话，故很多人都对他产生反感（当然也有听他的），有人就给他取了个外号——李麻烦（其实他和杨泽彬以前在宜宾，人们对他俩的印象相当不错，他毕业回宜进了造纸厂，还有不少人为他打抱不平呢。他的转变并没给他带来好运，学习回宜后照样被囚禁反省，终于魂消魄散的厄运降临到他头上了）。

话又说回来，“功夫不费苦心人”。经过连部大做“分化瓦解”工作，是有一些人“反戈”了，跟着违心地写所谓揭发检举材料，甚至不顾事实，捕风捉影地编造事实来窝里斗。丁绍云（省轮船公司工人，造反派头）和我就成了挨整的重点。于是，学习班将我俩“隔离”，并由所谓有“转变”、表现好的人组成互助组来“帮助”我们认识“错误”。这样一来，气氛更加紧张了，人人自危的空气笼罩在整个后勤学院。但我没有违背中央指示，没有做过违条犯法的事，心不虚，无所顾忌（特别是他们将宜宾谣传的，又是属于我在追究的什么“盗卖军筏”

这些事来攻我，就知道他们是在欲加之罪，是在懵着整，我能怕？怕得了吗？）。这时，我们有相当一些人就在猜测，中央可能出了什么变故，即像“二月逆流”的情况再现。当时大家估计问题就会出在“黄、吴、李、邱”身上，造反派可能要受压一两年的时间，短期内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看来，问题严重性的时限估计比较正确，但根子就不是黄吴李邱那么简单。不管怎么说，根本没想到林彪、陈伯达身上。因为林彪是被确立了为毛主席的接班人的，做梦都没想到是他为了抢班夺权的问题上。黄吴李邱只不过是他前台的干将（四大金刚嘛），真正幕后是林彪、叶群，故没两年“九一三”事件爆发，人们才认识到了根子的所在，这是后话了。

由于相当一部分人的“顽固不化”和抵触情绪的加深，四川班就搞了个“公捕”大会，将某某某和丁绍云宣布“逮捕”，押回地方判处，以此来打击不受“感召”人们的嚣张气焰。这是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丁绍云在宜宾没有很大的名气，除他本单位省轮船公司外，就是在宜宾市区知道他丁绍云的人也不多，更不要说全地区了。此人不多言不多语，一副朴实忠厚的样子，谁会想到学习班要拿他开刀呢？说他是解放前长江河下的双枪土匪，有名的“丁罗汉”，人们听后都吃惊不已。我也升级为“隔离反省”（没有任何上级指示和批示，只在连里宣布的，想必是宜宾的别出心裁了），单独住一间屋，由多人轮流值班，昼夜有人守候，拉屎拉尿都有跟班。后来才知道报捕人中还有我，可能是中央发觉报捕我的材料不实，姑不予批准。丁绍云是因泸州沿江曾有一个叫丁绍云的双枪土匪头，年龄、身段、体形与他较符，故说他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才批准逮捕，押解回宜查实后处理。由此，学习班内气氛极度紧张，人心惶惶，一些人在高压下“转向”，如余某（宜宾三江机械厂造反派头）等，不得不按连部指示和编造的事由来“揭发批判”，只要自己能过关，谁还能管违心不违心了。事后余某不止一次向人表白，他是逼不得已才按某些人的意图（指使）来“揭发批判”我的，真有点对不起我，很感内疚。

可能党中央有所察觉，因为即使在连我被隔离反省起，都在不断秘密向中央反映学习班内不正常之情况，通过某种渠道发至中央，其他未被隔离的人就可想而知了，总会有些材料传到党中央的，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对学习班作了专门（重要）指示，大意是：两派武斗，你抓我的人，我杀你的人都是派性在作

怪，只要不是阶级敌人杀我们的人，就不要再追究个人责任了，这些人（指学习班的）学习结束后，回去还要工作的。这是周总理在学习班领导会议上宣布并令在全学习班开大会传达的。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于八月十三日发出的中发〔1978〕48号文件，基本就是周总理七〇年在中央学习班四川班代表党中央作的重要指示的内容来制定的这个文件（有据可查）。这样学习班内的压力才稍减缓了一些。可我的问题在下面并未解脱，一切照旧，只不过没像从前那样逼我和进行公开批判了。为此，中央还特意安排我们学习班首批参观刚竣工的北京地铁工程。这是我国第一条地铁修好后接待的第一批参观人群，这在当时是相当荣耀的大事，可见当时党中央对我们这批人还是很重视和关心、寄有希望的。

在北京妄图抓捕我的图谋虽然未遂，可宜宾的有心人并不甘心，仍然严令要互助组的积极分子们（特别是班长，即解放军那个连长）跟随监视我，我的的一举一动，他们都得随时报告。我想我借写检查给中央写材料报告学习班情况的事，多少也会被告密了一些，反正我不反党，我怕什么？告就让他告去好了。

一九七〇年九月学习班学习结束，放假三天外出购物和观光。

其实，我有要挨整的思想准备，但估计不足，大错特错了。原以为在中央他们都抓不了我，回宜宾大不了弄我来批斗一下，撤职了事。仍然回去当工人还好点。当工人单纯，少动脑筋还能照顾家庭。当干部钱没多拿，相反增（加）大开支，得不偿失，一天到黑地忙这忙那，很不容易回趟家，有时板凳还没坐热又有事、找来了，弄得一家老小都不得安逸。想着回去当工人，以免老是要与一些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人争斗，这想法未免显得太幼稚、太简单了。政治斗争要有那么简单，无数革命先驱就不用抛头颅、洒热血了。

在京休假都有两三个（暗中）跟班“保卫”着我，我进商店他们也进商店，我入厕所他们就在门外站起了“岗”，我吃涮羊肉，他们就得守候一两个小时，看着他们怪辛苦的，我真不忍心了，只好少去要点，早早返回后勤学院。

返川是专列，坐位由解放军安排（美其名曰“军事化”）。不少人肚皮头都憋着一股气回家，碰巧被列车员撞上了。由于是京列，大部分列车员都是北京人，说的都是京腔。他们打扫卫生习惯叫过道上的人“靠边”，四川人听到就不顺耳，回敬一句“老子晓得要靠边了”（川人理解的靠边就是靠边站，寓意为下台之意）。由此还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争执。过了秦岭列车进入广元车站，不

知是回家心急还是另外的什么原因，有人跳车了。这一下把我们班长吓坏了，赶紧跑到我坐的那排座位来换位子。他是红军的一个副连长，云南人，宜宾连的班长。他到我对面位置上就坐，生怕我飞了似的，好不紧张。相反我还觉得好笑，眼看就要回到家里见久别的妻室儿女了，我干吗要飞（跳车跑）？

美梦毕竟是“梦”，严酷的事实才是最现实的。回宜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愿望，随着火车进站拉响的汽笛“呜”——“呼”了。人们极度高兴地争相清理行包准备下车，坐我对面的班长却拉起我直奔车厢出口，这时人们正在忙乱中，根本没人注意到此举。他将我带到站台上停的一辆吉普车旁，推我上车，门一关就启动冲出了车站。警笛呼鸣着一溜烟开进了宜宾市公安局，军管会的叫冯占云搜我的身后，将我关进了公安局里的黑屋子，没有出示过任何证件，更没（手续）宣布理由，不明不白地被关进了牢中牢（就是牢房中的牢房）。因为该黑囚房是公安局修来关押临时被抓来的犯罪分子的，一进三间，外面是大间，里面还有两个小间是关案情重大的人的，我就被关在最里面那间小号，等于是双重铁锁把我“锁”住了，故叫牢中牢。里面臭气熏天不说，臭虫多得来起串串，晚上一沾铺就会被咬得你根本无法睡觉，随便用手一抓就是拾来个臭虫跑不掉。吃的是公安人员卖剩下来的饭菜，随便赏点给你算一顿（餐）。其他被关的人可以家人送饭来吃，惟我不行，因为我特殊呀。

自打被关进这个笼笼，没有任何人来问过我一句，只是叫那些小偷扒手把里间小号盯紧点（即我这个人关的那个小号）。我想，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这不是黑整又是什么？！党中央明确指示：（我们）这些人学习结束后回去还要工作的。我就这样工作吗？看来，在天子脚下他们不得不收敛着点（因为北京是首都，在党中央领导的眼皮子底下，不得不有所顾忌），但回到宜宾就是他们的天下了。正如古人云：天高皇帝远了。中国有一句最形象的话比喻这种情况：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如今只有看他们是把我炒来吃还是煮着吃了，听天由命好喽。因为，这是明摆着的，我要是真的有罪，他们上报的逮捕材料早就批准了，何苦要煞费苦心地等回宜才动手？中央不批捕，说明他们没有真凭实据证明我有罪。我不是坏人，为啥宜宾还要这样对待我？不难解释了吧？！

2009 年 5 月 18 日初稿

2011 年 12 月 23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一册（3）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一章 搞好斗、批、改

第三节 清理阶级队伍

一、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徐景贤对宣传界文艺界谈清理阶级队伍
清理阶级队伍，实际上包括两方面：首先是对敌斗争问题，然后是树立无产
阶级阶级队伍。

一、要抓对敌斗争

宣传界、文艺界是长期以来被叛徒、特务、反革命伙同地、富、反、坏、右
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地方。情况非常严重，而我们原来对严重性认识不足，在文
艺系统，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从绝对数字来看，是很大的。

二、树立无产阶级队伍，把坏人揪出来

就是把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统统整了，也不能说我们队伍都是
无产阶级的队伍。

两大派里都有坏人。

因为阶级斗争复杂，总有坏人会钻进来。现在谁不想用造反派称号？

现在有保守势力在讲话了，说：“你看，我老早就讲了，造反派里有坏人，
队伍不纯，现在不是实现了我的预言了吗？”

保守势力乘机向造反派进攻办不到！我们把队伍树立，坏人揪出，我们队伍
更坚强了。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一日，王洪文谈清理阶级队伍
对清理阶级队伍要有组织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不可放任自流。
(1) 对清理阶级队伍的意见。

对阶级敌人我们是要坚决地清理，我们的决心早已下了，根据主席一六三个字的指示，是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我们清理阶级队伍也就是向阶级敌人打主动仗。但是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防止右倾保守思想，右倾翻案风，这是我们当前的主要危险，如长宁区有个坏家伙公开为赤卫队翻案，还有反革命的案件，他们的矛头直接的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纺织系统有一小撮坏蛋，贴反动标语，还把什么×头杀下来等，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我们希望查一查，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要防止“左”思潮出现，梦想把造反派搞垮，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如交通运输公司×××事件，我们说有错误可以检查，但不准作为敌人来搞，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还有赤卫队翻案，向造反派脸上抹黑，说什么造反派过去里头有走资派在背后策划。我看要揪出来斗。

（2）右倾分裂主义。

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来揪坏头头，抓了一点错误缺点无限上纲，梦想分裂我们的队伍，右倾翻案风，右倾投降主义是我们当前的敌人，我们不能轻视这些人，还有一些人过去是赤卫队，后来也参加了造反派，而有一部分人的立场没有真正转过来，在当前右倾思潮中，也动摇起来了，这本来就是投机分子。我们要提高警惕，但多数是内部矛盾，要正确对待。

（3）清理阶级队伍。

指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1、按中央规定的公安六条；2、走资派、叛徒、特务、里通外国；3、有严重的重大历史问题还没有弄清，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干了不少坏事，要清理的；4、犯大量的贪污盗窃和打砸抢抓的人要清理。但是犯有男女关系和贪污几百元钱的人一般不清理，但要交代好的。

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与一般错误的人要严格区别开来，历史上有重大问题的人已经交待与隐瞒的人要严格区别开来，一贯反党反人民与一时说过错话的人要严格区别开来，犯有严重贪污盗窃行为的与有严重投机倒把分子，一贯流氓腐化的人与一般小偷小摸和一般男女关系的人要严格区分开来，把走资派和犯有错误的干部区别开来把钻进造反派组织的坏人而一贯煽动武斗的私立公堂的与老造反派犯一般错误的人区别开来。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但不属于坏头头而不绝任领导职务的今后要适当调整，如不能担任领导，但不属于坏头头范围内的要很好地区别对待。

清理阶级队伍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千万不要粗心大意，严禁借清理阶级队伍搞分裂活动。如果说有的话，各级组织要严肃处理。但我们不要派工作组下去包办代替。我们说，清理阶级队伍要靠本组织造反派处理，不能由一派来搞，这会引起派性。加强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来搞，最好有三结合的班子，革命领导干部，军代表，最好有上级领导部门批准。凡是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暂不清理。

凡属于内部问题的人要办学习班来解决，要严格区别两类矛盾，对于有民愤的人，而问题不十分严重，一般不能批斗，严禁逼供信，即使是坏人，打死了也要处理。我们一定要掌握党的政策。

我们在处理任何问题时，要慎重了解、核实，切不可粗心大意。同时不要轻信口供，如上海锅炉厂，说什么××人是新工总司参加者，其实不是。对于需要抄家的对象，不要轻意妄动，要经过批准、手续。对坏头头材料上报，要有实证，否则不批准，我们还要注意一些问题，对于个人性质没有定的，不要随便抛材料，更不要乱扣帽子。

一九六八年五月某日，高增贵关于呼和浩特市当前阶级斗争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我市当前“挖肃”斗争情况，大体上可以这样估计：明的揪得多，暗的揪得少，敌人还没有完全揪出来。我们呼市当前运动的情况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一部分单位的运动已向纵深发展；一部分单位现在还处于揪表面敌人阶段；一部分单位现在连表面的敌人也还没有都揪出来。虽然这一段运动发展很快，揪出了不少坏人，成绩很大。但是，还没有把潜藏最深，伪装的最巧妙的敌人统统揪出来，运动发展还不平衡，对于揪出的坏人，还没有从政治上、思想上批倒批臭。

我们的初步意见，就是从五月十六号起，在全市组织“挖肃”运动的第二次大战役。第一次战役是从四月十三号或者再前一点时间算起，叫做全面发动群众，全线出击，掀起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高潮阶段。第一阶段，我们取得了显著成绩。第二个阶段也就是第二个战役，就是以五·一六《通知》和《划时代的文献》为动力，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人

民战争推向纵深发展。这一次战役要以大批判为中心，把隐藏得更深的，伪装得更巧妙的敌人揪出来，挖出来，把已经揭发出来的大量问题，通过大辩论，大批判澄清。是敌人，就把他批倒，批臭；不是敌人，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按什么性质去对待。因此，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这一战役我们大体上考虑搞到六月中旬。在这次战役中，我们要组织几次小战役，目前的小战役就是按照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的部署，以揭发批判“联社”为中心，击退右倾翻案妖风，即为二月逆流翻案，为乌兰夫翻案的妖风，掀起挖黑线，肃流毒群众运动的新高潮，把隐藏最深伪装最巧妙的敌人统统揪出来。把运动推向纵深发展。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经市革命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新指示指引下，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坚定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更加深入的开展革命大批判，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揪出一批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反革命分子，进一步清理了阶级队伍，给了阶级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了更充份的发动群众，乘胜前进，夺取更大的胜利，现作如下通知：

一、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各单位的军管会，必须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认真组织群众反复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和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充份认识清理阶级队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思想上深入发动群众，克服一切阻力。要继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同时也要警惕阶级敌人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扩大打击面，制造混乱。要通过清理阶级队伍，树立一支以无产阶级左翼为骨干的无产阶级队伍，为政权建设，党的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清理阶级队伍，必须同革命的大批判紧密结合，通过清理阶级队伍，揪斗坏人，进一步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和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揭露走资派包庇坏人、坏人勾结走资派的罪恶勾当。进一步提高群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提高斗争水平，更有力、

更准确地把深藏的阶级敌人挖出来，并与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代理人的罪恶联系起来进行批判，从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彻底肃清其流毒。

三、必须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掌握准、狠、稳的原则。要严格区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别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要把广大群众和混入群众组织中的极少数坏人区别开来，把有一般历史问题的人跟叛徒、特务区别开来，把一般性的错误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绝不允许借清理阶级队伍之名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问题，要坚持说服教育的方法加以解决。要团结和争取多数，把矛头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对于那些作恶较轻，主动认罪，接受改造的次要分子，对于历史上有过变节行为的一般群众也要根据其情节轻重，是否向党交代清楚，是否同党内走资派一起干过坏事，以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加以区别对待，以利分化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最坏的分子。

四、要注重调查研究，只许文斗，不许武斗，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六·六”通令。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私自抓人，都不准私设公堂。严禁打人和其它形式的体罚，打死人是犯法的。严禁逼、供、信。要反复地交代政策，给予出路，防止发生自杀。要采取严肃慎重的态度，掌握确凿的证据和材料，不要轻信口供，谨防阶级敌人陷害好人，搞阶级报复。要把群众揭发同专案调查紧密结合起来，一般定案处理要放在运动后期。

五、在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单位，揪斗混入群众组织中的坏人，“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两派组织不要借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相互揪斗，进行宗派斗争。有些群众组织自己清查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别的群众组织不要借此打击这些群众组织。要进一步清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粉碎阶级敌人分裂革命群众队伍的阴谋。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谢富治吴德谈清理阶级队伍

在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北京市革委会上谢副总理、吴德同志谈清理阶级队伍问题

谢副总理：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是一场很严肃、很复杂、很重要的工作，必须要很好地掌握。目前，全市各单位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系列指示和最新指示精神，按照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都在进行这一项工作。中央文革的同志去年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和北京工人座谈会上对此就作了明确的指示，要很好地学习，按照这些指示精神进行工作。这一工作开展以来，全市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主流，必须肯定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这样就需要定出几条来作为这一工作的指导意见。有同志说文件应该写得具体，政策界限分明，我看这个意见也是有道理的。以后可以将一些单位清理阶级队伍的经验转发下去，这样，就会使这些具体政策更符合毛主席的思想，更符合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符合群众路线。市革委会现在发这一个通知是很必要的。这个通知上有些话看起来是说过多次了，但是真正做到并不容易，还有距离。如果大家认为这几条正确，就应该坚决去执行。下面我讲几点具体意见：

第一条：关于组织广大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中央、中央文革的一系列指示，这是首要的，必须狠抓、抓好。当前，要反右防“左”，以反右为中心。要注意防止扩大打击面。

第二条很重要，就是要把清理阶级队伍同大批判结合起来。因为北京有个特点，刘少奇、彭真在北京搞反革命修正主义，在组织上搞招降纳叛，如有的工厂、学校、机关等比较像样子的坏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大部分都是他们包庇下来的。因此清理阶级队伍一定要同大批判结合起来，不要孤立地搞某个单位的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刘、邓的罪恶很大，我们要抓住大方向，就是要把矛头紧紧对准这些主要敌人。清理阶级队伍也是要对准主要敌人，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不要小看这一条，这也是困难的，作起来不容易，有人抓小的把大的忘了。

第三条：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清理工作必须正确执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制定的政策。文件中说：“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要把广大群众和混入群众组织中的极少数坏人区别开来，把有一般历史问题的人同叛徒、特务区别开来，把一般性出错误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这几个区别一定要掌握好，这一条是很重要的一条，特别是对于学

生中的问题的处理要特别谨慎。当然工人、农民、学生中也有个别坏人，都要特别谨慎。要严格区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区别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这一条是很重要的，不能只当成是纸上写的，要照这样做。这一条我今天特别强调一下。

第四条：要注意调查研究，只许文斗，不许武斗。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场肃反运动，这一工作我们党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总结出了丰富的经验。我们一定要有调查研究，分析和掌握材料以及确凿的证据，一定要反对逼、供、信。什么叫逼、供、信呢？就是我们一逼他就供，供了我们就信。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有不足之处的，一定要有可靠的旁证材料，不能轻信口供。另外就是公安机关捉人问题，除了十六条上规定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公安六条上规定的，还有恶毒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攻击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要实行专政。证据确凿的，可以抓起来，不要多捉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这是毛主席在延安时说的，我们一定要贯彻执行。凡是在公安六条中毛主席一再教导，不要多捉人，要少捉人。主要是交待政策。最近自杀情况严重，我要说一下，特别是农村，其它是学校、工厂。我上次对农村讲了一下。结果更严重了，我认为要停一周总结经验，要把自杀风刹住。当然这么大的运动，个别坏人自杀，这是难免的，但是多了对我们开展不利，很多问题就不好查了。自杀的原因一方面是坏人畏罪自杀，另一方面我们革命群众可能交待政策，指明出路不够，即使是反革命，也不杀嘛，只要他愿意接受改造，要给予出路。至于活活把人打死那就更不对了。当然这些事情是由于没有经验所造成的，不要去追究责任，主要的是要总结经验。要提高斗争水平，完全按主席思想，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指示办事，总结经验。只许文斗，不许武斗是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应照办。……

条件不成熟的单位（没很好的联合，没有权力机构，没有很好的领导，没有解放军），要特别注意，不能自由搞。否则慢一些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一仗是严肃的，否则打了敌人也打了我们自己，这个经验太多了。今天是革委会全体委员会，我要说两句，这几条很重要，不能作样子，要坚决照办，特别是第三、四条。刚才也有人提得好，就是我刚才说的办法，转发一些好的典型。当然发这个文件是对的，对的要照办，首先是农村。我看了个报告，通县有个地主兼资本家，有

两个孙子，两个孙女，他把一家孙子、孙女都杀了，他也要自杀，这主要是阶级仇恨要反抗而自杀。也可能是我们没给人家出路，不管是反革命，只要你认罪、悔恨，那就有出路。是否可在第四条中加一句“严禁打死人的现象”，“交待政策、防止自杀，即使是坏人也要给出路”，好不好？另外对某些人要检查他是否有武器等别的反动东西。……把他的反动思想、事实揭露出来，再指给出路，不要以为打一顿，关起来就完事了。而要批深批透，教育群众，不是要把他这个人搞得怎么样。

哪个工厂抓了阶级斗争，抓了大批判，把阻碍生产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坏人抓出来了，生产就好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看要抓阶级斗争。许多单位，如门头沟煤矿等都是抓革命，抓出了坏人把生产促进了。但是有一个特别，全国如此，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不让你抓生产。如铁路上，就搞破坏，破坏徐州、沈阳等几个大车站，就是那些坏人在破坏。这些人就怕联合，一联合坏人就无处藏身。97%联合了，但是有的还没有联合，二万六千人，就是搞不起来，我看有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在捣乱。

一九六八年五月某日，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1220 期刊载《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

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在发动广大革命职工开展对敌斗争中，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教导，引导群众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大多数，狠狠地打击和孤立一小撮阶级敌人，做到了稳，准，狠。

这个厂在北洋军阀时代，是一个印制钞票的工厂，后来又变成日本人手下的印刷厂。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成为国民党伪中宣部的正中书局，当时所有成员都加入了国民党。现在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就是由伪正中书局和由国民党投资的上海华夏书局，东北的几个小印刷厂以及我们的冀中平原日报印刷厂合并而成的，现在已变成有三千多职工的大厂。解放后虽然吸收了大批工农青年入厂，但是由于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尤其是彭真反革命集团的直接把持和控制，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仍然受到重用，其中许多人还篡夺了我们的各级领导权，变成了“三开”干部。据统计，在这个厂的二十六个加入过国民党的工段长一级干部中，有二十二个已经混入了共产党。因此，建国十八年来，这个厂的阶

级斗争一直是极其复杂，尖锐，激烈的。针对这种情况，军管人员今年二月二十一日进厂后，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狠抓阶级斗争。不论是搞革命大联合还是促进革命三结合，不论是开展革命大批判还是进行本厂的斗批改，他们都狠抓阶级斗争不转向。

这个厂的军管人员，在发动群众狠抓阶级斗争中，十分注意掌握党的方针，政策。他们的基本做法是：

放手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的孤立和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对于广大革命群众必须坚决依靠，也要善于引导

这个厂的军管人员在狠抓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始终坚持放手发动群众和紧密依靠群众。他们进厂后，首先引导两派革命群众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接着，他们一方面组织广大革命职工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光辉指示，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本厂的代理人所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不断地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另一方面，又遵照毛主席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伟大教导，对厂内的阶级斗争情况展开广泛深入的群众性的调查研究活动。在这个基础上，四月十一日举行了第一次全厂的对敌斗争大会，对四个隐藏在群众中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揭发，批判。在这个大会上，军管人员历数本厂建国以来出现的一系列反革命事件，发动群众进行揭发和检举，进一步揭开厂内阶级斗争的盖子。根据群众的揭发，检举和军管会的调查核实，接着又在四月十六日全厂的对敌斗争大会上，斗批了六个公然诬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这两次大会，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正象有些工人形容的那样，“大好形势，大快人心，大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阶级敌人的威风”，使这个厂的对敌斗争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两次大会开过之后，全厂革命群众情绪激昂。他们说：“不揭不知道，一揭吓一跳！”一些人就觉得坏人很多，这个也该揪，那个也该斗，想把与这两次大会上被斗的反革命分子有联系的人都揪出来。再加上第二次大会上斗争的反革命分子，大都是革命大联合前原“大联总”这个群众组织中的人，原来另一个群众组织“革联委”中的一些人，就想在各车间，科室中来个“割韭菜”，把原“大

联总”中当过头头的人，一层层地加以揪斗，而原“大联总”内部的一些人也觉得问题严重，自己决心大揪一场。于是在大字报上，学习班上，大小会上就出现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乱点名，乱揪斗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原“大联总”当过头头的人都有些惶惶不安，一般群众也觉得抬不起头来，好像参加了“反革命”组织似的。

是跟在群众后面，看着群众这样乱揪斗下去，当群众的尾巴呢？还是站在群众前头，引导群众，指导运动，把群众运动纳入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呢？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到了军管会的面前。他们觉得，这时正是需要他们在爱护群众革命热情的同时，用党的政策武装群众，以便做到对敌斗争稳，准，狠的时候了。因此，他们便及时召开各种会议，反复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把党的方针政策“一竿子插到底”。同时，他们又下到各工段，车间，学习班，在群众中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他们反复宣传毛主席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伟大教导和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出的英明指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并且一再强调指出，必须把原“大联总”中的坏人与广大群众区分开，广大革命群众是热爱毛主席的。

军管人员这样做，开始有一些人认为是手软，右倾，但实践教育了他们，使他们认识到这样做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些群众就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厂的解放军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看到我们有一点拐弯的地方，就把我们扭过来，引上正道。”

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从严要求，也要注意团结

从北京新华印刷厂的情况来看，所谓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主要是指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原来占全厂总人数三分之二的“大联总”一派的一些骨干成员，跟着坏头头艾善泉，冯学志（已被专政机关逮捕）干过许多坏事，但还不是反革命分子；一种是有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但还不是叛徒，特务。按群众的说法，这是一些“推一推就可以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站过来”的人，在全厂少说也有百人以上，数量相当大。特别是第一种人，他们的问题同原来本组织中的一般群众大都有联系，处理好坏对全厂的运动影响极大。军管人员认为，对敌斗争，能

不能掌握好党的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的也就是看能不能正确地处理好这些人的问题。

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军管人员首先是从严要求。这些人必须坦白交待自己干过的坏事和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必须同一小撮阶级敌人划清界限，革命群众也可以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否则，他们本人不能得到应有的审查和受到深刻的教育，广大群众也不会谅解他们。但同时，也要根据党的政策，一方面教育群众正确对待他们的问题，尽量争取他们，而不是把他们推到敌人一边去；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本人交待政策，教育他们主动地对待自己的问题，或者启发他们的自觉革命精神，让他们争取主动，通过斗私，批修会的形式，向群众检查，争取群众的谅解。对个别问题极为严重的人，他们采取小会追，个别谈（交待政策）的办法，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彻底交待，争取宽大处理。

由于他们采取了这样的做法，结果一些原来准备“破罐子破摔”的人，也消除了抵触情绪，主动积极向革命群众交待自己的问题，在群众会上做触及灵魂的检查或写书面检查。一个时期，干过坏事和政治历史问题没有交待清楚的人，争先恐后地纷纷向军管人员交待问题。这样，就扩大了教育面，团结了大多数，有力地孤立和打击了一小撮真正的阶级敌人。

凹印车间有五个青年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不少坏事。群众很气愤，要求揪斗。军管人员经过认真研究，注意到这几个工人是因为觉悟不高和缺乏经验受了坏人的蒙蔽和利用，真正的阶级敌人不是他们，而是蒙蔽，利用他们的人。因此他们说服群众不要揪斗这五个人，同时反复向这五个人宣传党的政策，鼓励他们检查交待自己的错误和对阶级敌人进行大胆的揭发。经过了这样一番工作之后，有一次在召开全厂对敌斗争大会的时候，五个工人中的三个主动地跑到台上检查了自己的严重错误，沉痛地向毛主席承认错误；与此同时，他们又当场向广大革命群众揭发了指使他们干坏事的黑后台，现行反革命分子于冬海。这时，五个工人中的另外两个，已经守候在这个反革命分子身后，等台上的三个工人一声招呼，他俩就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坏家伙揪到台上，交给群众批斗。

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必须狠狠打击，也要分化瓦解，指明出路

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军管人员，在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中，是很坚决的，不论是对特务，叛徒，还是对一小撮走资派，他们都带领群众，狠揭狠批。特别是

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地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

但是，在斗争中对阶级敌人是不是就不用体现党的区别对待的政策了呢？这个厂军管会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认为，一小撮阶级敌人（特别是其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常常是合谋的，互有牵连的。向他们交待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展开攻心战，指明出路，有利于分化瓦解他们，可以把极少数顽固不化的首恶分子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同时，这样做，可以把阶级敌人揭露得更彻底，使广大群众更加认清他们的反动嘴脸，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使反面教员的作用发挥得更加充份。

根据这样的认识，军管人员在对敌斗争中，总是把发动群众狠揭狠批，同政策攻心战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具体做法上，他们有时拿到大会批斗，有时放到小会深追，有时展开个别攻心战，交待党的政策，必要时打出几发“炮弹”，施加些压力。对个别坦白交代好，确实服罪的人，加以适当肯定，使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发挥强大威力。

他们这样做了以后，已经收到了一些效果。现行反革命分子尹铭召，一九六七年曾经写了一条恶毒的反动标语。但由于这个家伙很狡猾，在字迹上耍花样，因此当时虽然有人怀疑他，经过公安机关检验却被否定了。军管人员进厂后，群众又一次揭发，开始的时候他矢口否认。这时，他们就从各个方面进行调查，分析，越来越感到尹做案的可能性最大。于是，他们就对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斗争，一方面摆事实，讲道理，说明负隅顽抗，拒不认罪是危险的，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又指出，只要彻底坦白，老实认罪和悔改，还是可以宽大处理，还是有出路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曾经被公安机关否定了的反革命分子，不得不低头认罪，并且当场交代了他当时改变笔迹写反动标语的罪行。还有个反革命分子常国良，原来只知道他有妄图杀人行凶，进行阶级报复的罪行。后来他主动交代出许多其他的严重罪行，也是在革命群众充份发动起来的情况下，对他交代政策，进行攻心战的结果。

在这个厂已经揪出来的阶级敌人中，现在既有坦白自首，表示悔罪的典型，又有抗拒交代，死不服罪的典型。根据前一段的经验，军管会打算在最近开一次大会，把这两方面的典型有选择地同时拿出来，体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

政策，争取扩大坦白面，把那些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更好地揭露和孤立起来，更加深入地开展对敌斗争。

这个厂军管人员说，“坦白从宽”并不是“宽大无边”，不是说反革命分子只要坦白得好就可以没事了。该判死刑的判无期徒刑，该捉的不捉交给群众专政，都可以算做从宽处理。坦白后处理到底如何掌握，要服从对敌斗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体利益的需要，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他们认为，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目前，他们还准备进一步挖掘埋藏得更深的特务分子。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六九年六月一日，新华社报道：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宣传队总结落实干部政策的经验 坚决地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及时解放犯错误而有了觉悟的好人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最近在贯彻党的“九大”精神，落实党的政策的活动中，回顾和总结了贯彻执行毛主席干部政策的情况和经验，推动了全校解放干部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半年多来，这个宣传队在领导革命师生员工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方面取得了成绩和经验。最近他们帮助犯走资派错误的清华大学原党委第一副书记提高觉悟，获得解放的过程，就体现了这方面的经验。

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对犯错误的好人多做教育工作

在解放犯走资派错误的清华大学原党委第一副书记的工作中，宣传队首先领导师生员工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帮助大家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

第一，这个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是不是坏人？他们对这个干部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进行了阶级的、历史的、全面的分析，认识到他虽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但不是叛徒、特务或其他反革命分子，参加革命后为党为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对于他在全国解放后，尤其是在一九五六年到清华大学以来所犯的错误，大家调查研究的结果是：他和领导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过密切来

往，但属于工作关系，没有参与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他在工作中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但还不是出于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进行罪恶活动；他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而散布过右倾言论，但并非坚持反动立场，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恶毒攻击；他因为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搞业务第一，重用了少数坏人，但还不是出于反革命的目的招降纳叛，网罗重用坏人。大家经过认真分析，认为这个原党委第一副书记，属于好人犯错误。

第二，这个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是不是死不改悔的？师生员工们在宣传队的教育下认识到，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中死不改悔的是有的，但是必须相信，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能够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能只根据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一个时期的态度和表现就做出“死不改悔”的结论。大家对这个原党委第一副书记过去态度不好的原因做了具体分析，更加提高了责任感，表示决心要用毛泽东思想批判他的错误，“多做教育工作”，促使他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翻然改进，弃旧图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坚持破字当头 严肃批判错误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宣传队和革命师生员工认为，要帮助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提高觉悟，必须按照毛主席这一指示办事。要促使他们接受教育改正错误，和资本主义道路完全决裂，就必须对他们的错误进行彻底的揭发，严肃的批判。对他们的错误揭得越深，使他们受到的教育就越大。对他们的错误越是批得透，越是能促使他们猛醒回头。揭得深，批得透，正是为解放他们创造条件。否则，不揭不批，或者揭发批判得不深不透，“和平解放”，既不能使他们自己真正从错误中解放出来，广大群众也不能从中受到教育。

根据这样的认识，宣传队发动广大革命师生员工通过各种机会，利用各种场合，采取各种形式，对清华大学原党委第一副书记的走资派错误进行广泛、深入的揭发和批判。大家以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武器，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以大叛徒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靶子，摆事实，讲道理，集中揭发、批判他的错误，使他大为震动。过去他不认识自己的错误，甚至对革命群众运动有一种抵触情绪；现在他认识到，自己过去由于对

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被大叛徒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拉上了一条复辟资本主义的邪路！他激动地说：“群众越是批我，我越是痛恨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我越是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害我的是刘少奇，救我的是毛主席！群众批我一次，就是往正路上拉我一次。我要跟广大革命群众站在一个立场上，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我自己的错误，彻底批判大叛徒刘少奇及其代理人的反革命罪行！”

及时肯定进步 调动积极因素

肯定进步，是为了调动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积极性。这和严肃批判，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开始的时候，有些师生员工对原党委第一副书记在群众批判、教育下的进步，表现出一种不愿正视、不敢肯定的情绪，以为正视、肯定了这些进步就是立场不稳、界限不清；还有的人把的某些进步和积极因素，也笼而统之地批评为是“假的”，是“不老实”。宣传队教育大家纠正了这种想法和做法。他们遵照毛主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的伟大教导，对他的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表示欢迎，加以肯定，鼓励他不断努力，彻底改悔。不论是他交代自己的问题，还是揭发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行，不论是他主动向群众暴露活思想争取批判、监督，还是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检查、批判自己的错误，宣传队都是及时肯定，予以鼓励。不久前，他在学习林副主席在“九大”的政治报告时，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谈了过去在延安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教育的幸福情景，回忆了后来在大叛徒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犯错误的沉痛教训，很感动地说：“两条路线斗争的活生生的历史擦亮了我的眼睛，我今后要走的路只有一条，这就是：彻底改正错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思想指引下不断革命，永远革命！”宣传队当即肯定了他的进步，指出他“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广大革命群众又靠近了一步”。他听了后，觉得很受教育，说：“我有一点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进步，革命群众就肯定我一点，使我从这一点看到了自己应该努力的方向。我一定不辜负同志们的关怀和鼓励，我要站起来彻底革命！”类似的事例使师生员工们体会到，肯定进步的做法，能够使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增强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信心，这样做正是坚持而不是模糊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立场。

依靠广大群众 让犯错误的干部到群众中接受教育

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同志们认为，促使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接受教育改正错误，最根本的是要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因此，在解放原党委第一副书记的过程中，他们坚决反对少数人包办代替的做法，而是把他放到群众之中，发动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对他进行批判、教育和监督，给他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和本校、全国的大好形势，并且让他和师生员工们一起参加各种群众性的活动，如参加学习讨论，集会游行，革命大批判，等等。这样做，有利于改造他，能够针对他的活思想，及时地、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工作。同时，他在火热的斗争中，可以直接感受到广大革命群众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和决心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指引下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这样就可以帮助他更深刻地认识“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促使他更快地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在革命大批判中，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奋起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热情感染着他，教育着他，把他也带到了斗争的第一线，站起来和大叛徒刘少奇在清华大学的代理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在整党中，他从广大党员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斗私批修的发言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更加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当场要群众和他一起对自己错误进行批判。在反对苏修新沙皇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的示威游行中，他学习广大群众同仇敌忾、誓死保卫祖国的革命战斗精神，声讨苏修的滔天罪行，批判自己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他在熟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当中，在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时候，逐渐提高了觉悟，深深感到毛主席的伟大，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他深有感触地说：“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没有按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办事，没有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我深深认识到，我要是不改变自己的错误立场，就要被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时代所唾弃。我只有继续革命，彻底革命，才能重新做人！”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九年六月一日）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七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报告《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

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积极投入战斗，写了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奋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了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权，进行革命的大串连，开展革命大批判，立下了功勋。但是，在运动的中、后期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北大成为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内战”不休的“老大难”单位。

一九六八年八月，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北京大学，热情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做了大量工作，制止了武斗，促进两派在组织上实现了按班、系的革命大联合，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等，取得了不少成绩，学校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对待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一碗水没端平”，特别是在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造成扩大化，客观上起了支一派压一派的作用，致使两派群众在思想上的对立，长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今年三月，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为了加快北大斗、批、改步伐，又增加了一支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乘“九大”的浩荡东风，遵照毛主席“要认真总结经验”的教导，宣传队放手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加强团结，落实政策。全校很快出现了一个赛革命、赛团结、赛进步的新局面，掀起了斗、批、改的新高潮。

这一段工作不仅教育了广大群众，也教育了宣传队自己。它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错了就改，才能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宣传队在斗争中能不能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是能不能把文化教育阵地牢固地占领下来，并且用毛泽东思想把它改造过来的关键问题。

宣传队对前一段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正视它、改正它，还是回避和掩盖起来？原来宣传队中有的同志对前一种做法有顾虑，在走与留的问题上考虑较多：走了，怕回去不好交代；留下，怕没有威信，不好领导。还怕内部互相埋怨，不好工作；怕走回头路，使北大运动更加落后。针对这些活思想，宣传队认真学习

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的教导，从思想上提高觉悟，统一认识。

事实证明，“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问题发生在群众中，根子在领导。因此，必须首先统一军宣队的认识，做好领导的工作。

当时，进驻北大的八三四一部队遵照毛主席“谦虚，谨慎”、“做群众的小学生”的教导，和原驻校四五六七部队宣传队拧成一股绳，不分你我，尊重兄弟部队，学习兄弟部队的长处，共同宣传毛泽东思想，落实政策；既积极参加领导，又不是包办代替；对四五六七部队在前一段工作中的成绩充分肯定，并虚心学习，对缺点错误，经过调查研究，也开诚布公、实事求是地提出，热情进行帮助；有不同看法在领导内部谈心，统一认识，并且完全相信兄弟部队能够改正前进中的错误，按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四五六七部队对八三四一部队热情欢迎，并看作是对自己的支援；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重视缺点错误，勇于作自我批评。

在组织领导下，两支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共同组成领导小组。四五六七部队的同志继续担任第一把手。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实现一元化的领导。

由于两支部队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相互学习，相互支持，团结一致，因此，对统一整个宣传队的认识，起了重要作用。最后大家认识到：矛盾必须揭露，“夹生饭”要重做。这样看来好象是慢了，但只要搞好自身思想革命化，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抓紧工作，依靠群众，调查研究，抓住主要矛盾，“摸着石头过河”，扎扎实实地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就可以加快步伐，变消极为积极，变后进为先进。

宣传队统一了认识，遵照毛主席“要认真总结经验”的教导，很快掀起了一个“发动群众，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的新高潮。群众一经发动，就提了很多意见，其中也有个别意见带有资产阶级派性。这时，宣传队有的同志又产生了活思想：怕知识分子翘尾巴，动摇了工人阶级的领导，特别是怕资产阶级派性大发作，再出现大反复、大混乱的局面。因此，对发动群众，总结经验产生动摇。这时，宣传队带着问题共同学习毛主席关于“要坚决相信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和“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的教导，端正对群众的态度，正确对待群众

的批评。大家一起深入群众，听取意见。群众诚恳地指出：“宣传队的错误是上跟毛泽东思想不紧，下靠广大革命群众不牢。”这使宣传队受到很大教育。

宣传队通过调查研究，集中了群众的意见，认真分析了错误和产生错误的原因，深深感到：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犯了错误，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实行工人阶级的领导；知错不改，违反毛泽东思想，就是破坏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错了就改，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才能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改正错误就是忠于毛主席，就是继续革命。

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他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不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宣传队的同志在学习班里，在大、小讲用会上，谈心得体会，主动作自我批评，承担责任。最后，宣传队负责人在全校大会上作了总结，高姿态地检查了前一段工作中的错误。这样做，使群众受到很大教育。他们说：“宣传队最忠于毛主席，最听毛主席的话。改正错误本身就是对我们一次最好的再教育。”许多群众主动要求在讲用会上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找宣传队的同志谈心、交心。宣传队和革命师生员工的关系更密切了。

实践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英明教导：“凡犯了错误的必须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以前更高。”宣传队公开承认错误，结果威信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说话不是不灵了，而是更有人听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原来宣传队的同志深有感触地说：“按照过去我们那种做法，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脱离了群众，结果按下葫芦起来瓢。现在是有了错误就改，压力变成了动力，包袱变成了财富，被动变成了主动。”

二、团结起来，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北京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立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后来围绕着校文革问题，在一九六七年先后分成两大派：“新北大公社”和“新北大井冈山兵团”。

校文革是一九六六年九月，根据“十六条”精神成立的。在运动初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权，组织革命大串连等，曾起过很好的作用。但是，运动的中、后期站在“公社”一边，形成了一派掌权。

他们“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实行所谓“亲我则亲，冷我则冷，打我则打，反我则反”的原则，实际上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对立面革命群众组织采取了从政治上搞臭，从组织上摧垮的方针，把对立面组织说成是“反革命小集团操纵的保守组织”。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校文革对人民内部既无真正的民主，对反动派又无有效的专政。其结果进一步加剧了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造成继续分裂的局面，以致发生武斗，搞逼、供、信，严重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校文革在运动中、后期实际上变成了“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后来，虽然在组织上联合了，并且在基层成立了有两派群众参加的革命委员会，但是由于没有纠正原来一派掌权的错误，使两派群众仍然没有消除对立情绪。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还是不能落实，斗、批、改不能顺利进行。

为了纠正原先一派掌权的错误，解决两派的对立情绪，宣传队坚决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贯彻“九大”团结的精神，响应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广大群众能够本着坚持革命，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精神，结合北大运动“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的全过程，“认真总结经验”。通过“三忠于”讲用会的方法，强调“各自多做自我批评”。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问题刚刚揭开，就遇到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有的说：“北大情况特殊”，“校文革是红色政权，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你们要慎重”，有的就翘尾巴，说自己是“一贯正确”，有的则采取消极态度：等宣传队表态，等头头检查，等对方认错，等等。

不论资产阶级派性怎样干扰，宣传队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始终坚持了三条原则：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耐心帮助，提高认识，改正错误；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就和革命群众一起把它揪出来斗倒斗臭，按照党的政策，区别对待，给予出路。

根据北大的实践，为保证“三条原则”的落实，做到“一碗水端平”，我们按照“四不”的要求去做，即：（一）不带框框。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用毛泽东思想鉴别是非，不受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和干扰。（二）不回避矛盾。放手发动群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揭露矛盾、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不怕反复，不怕乱。（三）不搞平衡。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一切，符合多少就肯定多少，违背多少就否定和纠正多少，不是各打五十大板。不怕压也不受捧。（四）不当裁判员。坚持用毛泽东思想引导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上资产阶级派性的当，不轻易表态。

由于这些原则是建立在坚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和相信群众革命自觉性的基础上，是从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导思想出发的，所以最终是能够达到团结群众的大多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从这一个原则出发，我们狠抓了群众和头头的工作，但关键是做好群众的工作，一个一个地帮助，一个一个地落实，不怕麻烦，不怕反复。有的人谈话达二、三十次。实践证明，青年人有了错误，一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改正得也快。原先所谓“跳得很高”的“铁杆”、同宣传队和群众顶牛的人，后来有不少成了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的积极分子。全校很快形成了三分之一的积极分子队伍。有了第一个三分之一，就团结了第二个三分之一，逐步争取了第三个三分之一。于是形势就大不相同了。

原两派群众在“三忠于”讲用会上争先“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历史地、全面地分析了两大派的功与过。过去“公社”派“铁了心保校文革”和“井岗山”派“砍头也不下山”的人，在讲用会上都首先肯定了对方的成绩，然后批判了本组织的错误。原“公社”派的群众在肯定校文革和“井岗山”成绩的同时，以大量的事实揭露和批判了校文革一派掌权的严重错误。他们说：“一派掌权就是为山头利益掌权，为私字掌权，为个人掌权，是搞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最后，既团结不了群众，更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原“井岗山”派的群众，在充分肯定了校文革在运动初期的功劳和本组织成绩的同时，也严肃地批判了“井岗山”中的少数人受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影响所犯的严重错误。

两派群众起来了，群众觉悟在先，继续前进了，有的头头还迟迟不觉悟。这时，是甩开不管，还是耐心地一帮到底？我们坚持了后一种做法。既对他们的错误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斗争，又及时肯定他们的进步和过去的成绩，鼓励他们继续革命，带好头。后来在基层单位和全校的“三忠于”讲用会上，原两派头头作了自我批评。校文革的负责人承认了错误，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因此，又促进了群众的革命大团结。

一派掌权的历史教训深深地教育了广大群众：一派掌权的实质是由一部分群众去压迫另一部分群众，完全违背毛主席关于“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的教导，其结果必定分裂革命队伍，保护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一派掌权的错误必须承认，必须纠正，否则，永远也过不了关；纠正一派掌权的错误必须采取坚决的态度，改良的办法，凑合的办法是绝然行不通的。纠正一派掌权的错误，是为了团结群众的大多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从资产阶级派性出发，借纠正一派掌权的错误，而另立山头搞分裂，也是错误的，它不仅不能纠正错误，团结对敌，反而只会继续加剧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给一小撮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

三、落实政策，才能团结群众的大多数

一派掌权的严重后果，主要表现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对立面群众组织里的许多人打成“反革命”或“反革命小集团”。

去年宣传队进校后，从十月至今年二月的清队工作中，继续了这个错误，造成了扩大化。搞了许多群众，特别是搞了学生。先后立了大量的专案，打了一批“反革命小集团”，批斗了许多人。有的戴了反革命分子帽子，还有一部分人根本没有问题也被牵连进去，被说成是“反革命小集团”的“外围”和“外围的外围”，有的被当成“同伙”和“知情人”打击了，有的毕业后还给转去了所谓“反革命”材料。所以有的同志说：“打击了一批，牵扯了一串，压制了一片”，使很多人背上了包袱。如原“井岗山”派的一个骨干支队，原来对立面组织就想搞他们，宣传队进校后，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点了这个支队的名，又搞了逼、供、信，把个别人的问题上纲，逐个进行审查，最后在这个六十多人的支队中搞了一个所谓“反革命小集团”，冲击了二十多人。在干部中揪所谓“黑班底”时，干部参加了一派有的就被说成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没参加的有的就被

说成是“第三势力”，搞得干部无所适从。有的人有历史问题已经搞清并有了正确结论，也要老账新算。这样做的结果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政策，加剧了原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

造成扩大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缺乏阶级斗争经验，对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领会不够，主观上想抓反革命，但打击面宽了；有的是受了社会上极“左”思潮的影响，“宁左勿右”、“宁严勿宽”，正象有的同志说的：“过去唯恐放过一个坏人，从不考虑冤枉一个好人”；有的是资产阶级派性作怪，硬把对方的一些群众说成是“反革命”或“反革命小集团”。

怎样解决扩大化问题呢？宣传队不是采取开个大会宣布平反的简单办法，而是把毛主席关于团结群众的大多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指导思想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交给群众，让群众自己解决问题。具体做法是：

1. 宣传队不包办代替，充分发动群众，通过“认真总结经验”，按照事物的原来面貌，实事求是地解决扩大化问题。各单位办起了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光辉著作和毛主席的有关教导，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在这个基础上，问题让群众自己去分析，专案材料的水分让群众自己除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让群众自己去区别，疙瘩让群众自己去解开。事实上扩大化的问题主要是在原两派群众中搞的，采取群众路线的办法才能解决问题，团结同志。正象有的同志说的：“犯错误是中了大叛徒刘少奇的毒，不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肃清流毒把他拉过来，就是中了大叛徒刘少奇的计。用群众路线的办法解决扩大化问题，才能纠错纠得好，斗私斗得深，消毒消得净，对敌搞得准。”

2. 宣传队主动承担错误，不在群众中追查个人责任。纠正扩大化问题时，原来搞专案的同志有的怕整到自己头上。但宣传队的同志主动承担责任，没有把一部分群众的包袱放到另一部分群众身上，这样双方都很高兴。他们说：“宣传队勇于承担责任，不追查我们的责任，反倒觉得自己有责任。”因此主动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过去给一部分毕业生带走的或寄给工作单位和原籍的所谓“反革命”材料，逐个追回，予以澄清。

3. 强调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里特别注意做好搞专案和被整的人的思想工作。通过开讲用会和谈心的办法，使双方认识各自的问题，同群众共同来落实党的政策。在讲用会上大家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争着作自我批评，当众烧毁所谓“反革命”材料，当场结成“一对红”。在解决一个曾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的青年助教问题的讲用会上，专案人员首先批判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派性，检查了在扩大化问题上的错误。这个助教听了很受感动，也在会上“斗私、批修”，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并当场和原来几个搞专案的同志结成了“一串红”。宣传队根据群众的要求，宣布将这个助教的全部专案材料当场烧毁，全场热烈鼓掌，许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高呼“毛主席万岁！”过去被说成这个助教的“同伙”和受到牵连的共二十四人也卸下了“千斤包袱”。

4. 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也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在纠正扩大化的时候，防止“一风吹”。在给误伤的群众平反时，防止真正的阶级敌人乘机滑过去。不要把一说成万，也不能把一说成零，有错误还要检查。注意将那些青年学生由于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犯了错误，受了批评，消极不满，说了些有损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话，同那些一贯坚持反动立场进行恶毒攻击的坏人区别开来；把那些历史上有罪行，但已经有了正确结论并有改悔表现的人，同那些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坏人区别开来。对犯思想错误的人要重在教育；对于那些历史上有了正确结论，没有新的罪行的人不再“老账新算”。

由于解决了扩大化问题，群众受到了教育，个个心情舒畅。大家说：政策不落实，就没有团结；落实了政策，就团结了群众的大多数，孤立了一小撮阶级敌人。

四、狠抓根本，才能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工人阶级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砂子”，就是狠抓根本，用毛泽东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因此，在发动群众总结经验的过程中，宣传队因势利导，组织师生员工活学活用“老五篇”，在改造世界观上狠下功夫。

首先，引导群众联系三年来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实践，从分析资产阶级派性的顽固性入手，找出改造世界观的规律性的东西。

革命群众在分析、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时指出：北大长年来在封、资、修教育路线的毒害下，知识分子中间历来存在着文人相轻、争名争利、个人第一、无政府主义和理论脱离实际、言行不一的两面派作风，以及知识分子的摇摆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认真批判和克服，又“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这就是比较集中地反映在资产阶级派性纠纷上。这些人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去分析形势，指导运动，因此，“一会一个想法，一会一个面孔，一会一个行动”。同时又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给资产阶级派性这个放大了的个人主义披上合法的外衣，掩盖了私字的本质。许多群众说：“有了派性不得了。有眼睛看不清革命的大方向，有耳朵听不进毛主席的话，有鼻子嗅不出香和臭，有两腿走不上革命的轨道。”最后，大家认识到：“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资产阶级派性之所以顽固，就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

宣传队从师生员工这个基本分析出发，既看到“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又相信“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但必须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同时，教育师生员工既要看到“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又要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加速世界观的转变。

宣传队紧紧抓住世界观的转变这个根本问题，针对知识分子中间理论脱离实际、言行不一的致命弱点，狠抓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大立理论联系实际、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革命学风。

通过学习，使群众认识到：知识分子理论脱离实际的要害是首先脱离了革自己的命。许多人联系造反派犯错误的原因时，说：由于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夺他们的权的时候，放弃了自我革命，没有吸取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因此，在运动中、后期，自己的地位起了变化以后，在掌权、用权，继续革命的问题上便暴露了世界观的弱点，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违背毛主席的教导，犯了错误。现在，革命，也要革自己的命，经

常听取群众的意见，开展思想斗争，对自己“一分为二”，该肯定的就肯定，该否定的一定要否定，在改造世界观上下功夫，这样才能把三年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变成继续革命的宝贵财富。认识提高了，尝到了甜头，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在群众中便成为一种风尚。广大群众以自我批评为荣，并把它看作是为革命做了一件好事。有的说：过去作自我批评感到痛苦，现在感到痛快；过去感到是压力，现在感到是动力。

宣传队在狠抓学风的同时，还加强对师生员工的阶级教育、唯物辩证法和革命纪律的教育，大大加速了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转变。

当前，在全校出现一个赛革命、赛团结、赛进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理论联系实际的新高潮。大家共同的决心是：“一言一行让毛主席高兴，一举一动让毛主席放心。”过去那些想着走，等着走，急着走的人，现在是坚决与私字斗，继续革命，跟毛主席走；过去那些“听赞扬的话，讲派性的话，行动起来不象话”的人，现在是“听毛主席的话，讲团结的话，行动起来革命化”；过去那些认为自己是“旧教育制度的牺牲品，新教育制度的试验品，社会上的处理品”的知识分子，现在决心要做“旧教育制度的批判者，新教育制度的探索者，社会主义社会的普通劳动者”。革命师生员工在大批判和对敌斗争中，在教育革命的实践和夏收劳动中，表现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广大群众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从来没有这样深，理论联系实际从来没有这样好，自我批评的姿态从来没有这样高，团结的气氛从来没有这样浓，革命的斗志从来没有这样旺，心情从来没有这样舒畅。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七日

一九六九年九月四日，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关于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情况报告

北大两大派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革命大团结以后，于七月上旬转入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截止九月二日，告一段落。初步查清北大前身（旧北大、燕大）中统、军统、国民党、三青团等五十一个反动组织；在现有四千七百一十一名教职员中，清出叛徒三人，特务五十五人（其中潜伏特务十七人），历史反革命分子二十一人，现行反革命分子九人（内含学生一人），地、富、坏分子十四人，共一百零二人，其中大部分人已定案处理；给十三个右派分子摘掉了“帽

子”；还清理了一些人的非敌我矛盾性质的重大历史问题；同时，澄清三个人的问题。从而使北大的阶级阵线基本明朗。

师生员工反映，这次清队真正体现了毛主席关于把“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把敌人驱逐到狭小的孤立的阵地上去”的伟大教导。一位老教授说：“清出的这些人的反动立场，不可谓不顽固，手法不可谓不狡猾，隐藏得不可谓不深，但毛主席的政策这颗精神原子弹一经发生威力，敌人的营垒就土崩瓦解了。”一个曾经在“监改大院”当“看守”的学生说：“那时揪出近千人，关起来好几百，又打，又骂，搞逼、供、信，搞了半年多，最后一个也没有落实。这次清队，虽然做的是上次的‘夹生饭’，却用党的政策把敌人震出来了。”

这次清队，我们就是遵照毛主席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是我们历来的方针”的教导，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对敌斗争的一系列指示，在清队中加强了对清理对象的教育和改造。

一、讲明历史的总趋向，在政治上使敌人对反动派绝望。

解放二十年，阶级敌人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巨大变化，多数人对蒋匪帮的幻想已经破灭，但仍有少数人对蒋匪和帝、修、反抱有幻想，妄图等待时机，以求一逞。多数人虽然幻想破灭，但不肯交代自己的问题，他们一遇到气候，就要兴风作浪。

我们深入分析了他们的思想，发动群众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大讲历史的潮流，“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必须规律。大讲大好革命形势，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科学和军事力量上，将新旧中国进行历史的对比，让他们“睁开眼睛看一看中国和世界，看一看国内和国外，看一看现在是什么样子”，使其认识到“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从政治上、理论上制服他们，压倒他们，使他们真正感到大势已去，不变也得变，对反动派绝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间的多数人才会逐渐老实起来，向人民靠拢。

实践证明：这样做的结果，就从根本上分化瓦解了敌人的营垒。清队以来有十七个潜伏特务就是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坦白交代了自己的罪行。法律系教授赵理海在解放前夕亲自接受匪行政院副院长张厉生的指示潜伏下来，准备蒋匪反攻时，从内部应变。解放后长期搜集我国的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这次

清队他主动坦白了自己的罪行。他说：“过去我对美蒋反动派有幻想，我等了二十年，但历史已经给我作了回答，现在我决不做违反历史潮流的事，我心悦诚服地向无产阶级投降，走历史必由之路。”

二、讲明无产阶级“给出路”的政策，给他们指明一条出路。

给阶级敌人堵死一条反动之路，而更重要的是还要给他指明一条光明的出路。“给出路”的政策是我们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处理革命与反革命关系的一个基本政策。有的人对反动派虽然绝望了，但还没有决心交代自己的问题，他们不相信党的政策。宣传队遵照毛主席“把已经缴械了和投降了的地主阶级分子、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成员及其帮凶们给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并尽可能地把他们变成好人”的教导，反复向他们讲明，我们的政策是改造他们，而不是把他们统统消灭；是要他们向反动思想决裂，“把废物变为有用之物”，而不是单纯从组织上一清了之，还要经过一清二批和改造之后，尽可能地运用他们的一技之长为社会主义服务，给以立功自赎的机会。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立足于“拉”字，最大限度地扩大坦白面，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之后，不揪不点，而是充分利用材料去开展政策攻心战，有效地宣传党的政策，促使他们自己坦白交代，为扩大教育面和扩大改造面打下基础。事实上，敌人动摇之时，就是头脑里革命与反革命思想激烈斗争的时候，政策攻心战，就是要使他们象林副主席所说的“两军对战，消灭隐蔽的反革命思想”。有的群众为了促使一个反革命分子坦白交代，曾找他谈了六十余次话，批判他的顽固态度，耐心地宣传党的政策，最后使他坦白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他激动地说：“国民党是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共产党、毛主席胸怀博大，明知是坏人，还要拉一把，这一点就使我认清了人心背向的根本原因。”一位老教授说：“我活了快八十岁，从未见过这么耐心地向有问题的人讲政策，劝他们交代问题，这只有以解放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才能做到这一点。”

一边大力宣传政策，一边具体落实政策。敌人坦白交代了之后，及时进行定案处理。在定案处理中，对于主动坦白交代了的人，大都不戴“帽子”，这些人都有家属，还有一批沾亲带故的人。一戴“帽子”，一家人也就成了反革命家属了，跟他有联系的人、亲戚朋友脸上也无光彩。即是要戴“帽子”，也是极个别的顽固分子。从这样一个认识出发，在一个多月之内，连续召开了四次落实政策

大会，从宽处理了三十六人，从严处理了四人。就是从严的几个人，也向他们讲明：“帽子”能戴也能摘，但关键要认罪服罪，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使他们也有个奔头。由于不失时机地兑现了党的“给出路”的政策，对敌人和有各种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触动很大。有一个从台湾派遣来的特务分子，主动投案，交代了罪行，并检举了十几名同伙。

实践证明：这些人的问题搞清了，这本身就是严。群众认识了他们，并将其放在群众当中，“帽子”拿在群众手里，这样有利于教育和改造这些人。

三、宣传唯物论辩证法，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揭露和批判阶级敌人。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清理对象绝大多数是旧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反动立场所决定，在思想方法是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是根深蒂固的。他们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特别是解放二十年隐瞒下来，这次清队还想蒙混过关。其中的一些知识分子，解放后虽然隐瞒了自己的历史罪行，但多数已停止了反革命活动。二十年后，一经揭露，便感到“人格”、“面子”过不去，见不得人。

针对这一特点，宣传队反复宣传毛主席历来关于唯物论辩证法的教导，和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以揭露和批判阶级敌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观点。使他们认识到：（一）罪行是客观存在的，“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企图掩盖是自欺欺人，到头来还得清，迟清不如早清。（二）罪恶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竹筒倒豆子”，向人民靠拢，就会受到欢迎，顽抗下去罪上加罪，就要受到无产阶级的严厉制裁。（三）罪行是在历史上产生的，也可以在历史上消灭，这就是将功赎罪，重新做人。对有历史罪行的人，我党始终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其问题总是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分析它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重在现实表现。但时至今日，仍不悔改，不坦白交代，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四）清的根本目的是同反动阶级的思想决裂，将破坏因素转变为有利因素，这个转变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这就必须靠自己一清二批。（五）辩证法就是革命的、批判的、斗争的哲学，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回避斗争是不

行的。清理对象或者经过七斗八斗，把问题斗出来，变好了，或者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由于深入宣传了毛主席关于唯物论辩证法的教导，有力地武装了群众，深刻揭露和批判了阶级敌人，使他们逐步抛弃侥幸过关的心理，加速了向好的方面转化。有一个反革命分子直至六八年还与同伙订立攻守同盟，自以为得计，但在革命群众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并检举了同案人。他说：“砍的总没有旋的圆，过去层层设防，掩盖罪恶，但有一个不可掩盖的疮疤：罪行是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西语系讲师赵琏过去生怕丢了“面子”，不肯交代解放前参加中统的罪行，这次交代了之后，深有感触地说：“剥去伪装，揭露真相，重新做人，把自己的名字跟‘同志’这个光荣的称号连在一起，不仅是最大的面子，而且是最大的荣誉。”

四、在实践中不断加强对清理对象的改造。

遵照毛主席关于“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的教导，在一些清理对象定案处理之后，一方面继续深挖隐藏得更深的阶级敌人；另一方面大力改造已经作过处理的人。

对于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的阶级敌人，除了极个别的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依法逮捕以外，都把他们放在群众当中，进行监督改造，继续清算批判他们的罪行，并且根据他们的活思想，不断指明出路。同时，经过群众路线，给接受群众监督、表现好的十三名右派分子和四名地富分子摘掉了“帽子”，这就使那些专政的对象看到了具体的出路，“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对于从宽处理、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的人（这是大多数），一方面看到他们的坦白交代表明了同反动派的决裂；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坦白交代了，并不等于阶级意识也变过来了，他们只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的长距离路程中开动了第一步”。因此，必须抓紧对他们的改造，“不然他们还是有可能走回头路，走自己的老路”，又变回去了。

事实上，那些人被从宽处理、不戴“帽子”以后，有的或者觉得“无冠一身轻”，“一块石头落了地”，放弃了自我改造，或者感到“自愧形秽，与众不同，

低人一等”，想“用一技之长混日子”，他们大都还处在消极状态，没有转化为积极因素。

针对这种情况，宣传队一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加强改造，对自己的问题继续进行批判，二是发动群众继续进行帮助教育。除了组织一些忆苦会，参观阶级教育展览等活动外，还专门办学习班（包括家庭学习班），组织他们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老三篇”等光辉著作。通过学习，使他们认识到：从宽处理之后摆在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加速改造，抬起头来干革命；一是消沉下去，低着头混日子。坚持走前一条路，路子越走越宽，顽固走后一条路，就有重新跌入反革命泥坑的危险。他们说：阻碍自己继续改造、轻装前进的种种包袱，是“旧我的影子”，是“反动立场和反动世界观在新形势下的反映”。因此，普遍订了改造计划，并一致表示：要加速改造，加速革命，加速前进，三步并作一步走，奋起直追，迅速赶上革命群众的前进步伐。不少人还提出要求到劳动实践中改造自己。

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明白，敌人还有力量，我们自己也还有弱点，斗争的性质依然是长期的，残酷的。但是我们一定能够胜利。此项认识和信心，必须在全党巩固地建立起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将进一步发动师生员工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随时警惕，密切注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把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工作进行到底。

一九六九年九月四日

二、研究资料

《脚印——宜宾文革造反派领袖谢英富回忆录》摘录

党中央号召“清理阶级队伍”一展开，迅速在全国雷厉风行，我城区公社也不例外，按市革委的部署，我们也成立了“社革委清阶领导小组”，由第一副主任（结合干部）李云福任组长，社革委办事组负责人卢兴隆兼“清阶”办公室负责人，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成立会上，我只强调了一定要按党中央的政策

办事，做认真仔细的调查了解工作，全面清理，不能只清一派，不能将派性带入“清阶”工作，清理的对象主要是混入革命队伍里的阶级敌人，已明确身份的（无隐瞒事实的）就不再纠缠。我想，有李云福把关，加之办公室有卢兴隆（他是个老公安，很注重原则性）负责，我就放心交给他们了。本身我也没那么多精力、时间亲自抓，除重大问题须向我报告外，其余问题都由他们处理。在此期间，除谢可双料特务案为城区公社系统大案一类，“清阶办”向我汇报，我过问过外，基本未染手其它案件。就是对谢可这样重大的案子，我也交代他们，这是个历史问题，早就定了性的，只要他进一步将自身问题交代清楚，积极配合外调人员，如实证明事实就行了，不能苛求他。运动最高潮时（因外调来的人多）也只是早晨谢可到公社一间空办公室写交代或证词，接受讯问，晚上照旧回家休息。尽管我主观愿望是按政策搞好“清阶”，但事与愿违的情况还是要发生的。

有天上午我刚从市里开碰头会回来，在东街，张德建（社革委人保组的副组长）慌慌张张地找到我说“出事了”。我赶紧回到公社革委我办公室，卢兴隆他们也来了。我问张出了什么事那么慌里慌张的？他说是小五金厂的董永昌上吊自杀了。当时我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哪个董永昌，干什么的，为何自杀，在哪里上的吊？这时张德建才说：

“董永昌是小五金厂的职工，漏划地主和暗地设赌被清出来的，在八八团留守处的楼梯间上吊自杀的。”

我问：“漏划地主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怎么会跑到八八团留守处自杀？”

张说具体情况他不清楚，据说是董永昌很不老实，威胁厂清阶人员才被弄到八八团隔离的。一听我就火起，骂他们胡闹，我都不去八八团了为何要弄人到八八团去？张说不关他的事，是“清阶领导小组”李云福她们叫送去的。事情紧急，我赶紧向市革委作了汇报并立即给市公安局（即市革委人保组）打电话，叫他们派员到现场勘察验尸。经文国元（公安）拍照，毛玉峰（也是老公安）勘验，结论纯系自杀（全身无任何伤痕）。

从现场回来我就叫“清阶”办通知董永昌的家属来公社讲明情况，看家属是什么态度后再作处理。后李云福向我汇报说，董的家属不服气，要抬尸游街。我问她是什么意见？她说这是党中央部署的清阶运动，小五金厂清出他很多问题，

他还抵赖耍横耍泼，死不认帐，群众意见极大才批判他，他要以死威胁是畏罪自杀，他家属要抬尸游街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当然不行，他们硬要这样做，我们就要写张“畏罪自杀”贴在尸体上，让他抬着尸体游遍全城好了。为了不扩大事态，我亲自找董永昌的大儿子，劝他心平气和地处理此事。他俩个儿子说他们不服，就是要抬尸游街。我耐心地说明这是“运动”，不是个人恩怨的事，更主要的是自尽身亡，不能产生抵触情绪，妥善安葬好死者算了，何必非要闹得二家不愿呢。我叫他们冷静下来，好好考虑一下。他非要闹着要抬尸游街，我才不得不说“清阶办”要写“畏罪自杀”纸条放在尸体上随他们游的情况，我们的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我也很生气地说：“我是好心好意劝你们（因董的大儿子是我小学的同学，但那时谁敢说明这种关系），你们不听，硬要把事情闹大，我也就管不着了，造成后果该谁负责就由谁负责。”

孙维申著；《挖地三尺，一个不漏——记无锡市长达三年多的‘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的调查报告》摘录

春天里的“十二级红色台风”

一九六八年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不久，很快就在全市城乡刮起了一场“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十二级红色台风”（其正式名称为“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并建立各级“群众专政”机构。市里有“群专办”，区局或党委级大单位也有“群专办”以领导“红色台风”。而中小单位和村、居民委员会则建立“群专队”、“群专组”。另外“旧公检法”尚未完成“斗、批、改”没有“彻底砸烂”，所以只能“配合运动”，而另外成立一个“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后改名为无锡市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下面有十个建制连队的“工人纠察队”，下属各连分别以数字序列授番号，如“工纠一连”“工纠二连”……分驻全市各处要津。总指挥部设在市工人文化宫内。另外在“工宣队”里也抽调一批“政治上可靠”的队员“结合斗、批、改，投入清队运动”。由于在建立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时的特殊历史背景，原两大派群众组织中，和无锡驻军中主要的“支左部队”关系密切的“九二革命串联会”一派在各级革命委员会及各级

“工人宣传队”和各级“工纠队”，特别是各级“群众专政”和“清理阶级队伍”机构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清队”运动一开始就明显地成了是以“清派”为主体的全社会大混乱、大恐怖运动。

这场“清队”历时半年。一开始就以市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红无锡报》的一篇长长的评论员文章《掀起一场横扫一切阶级敌人的十二级红色台风》为信号，同时在全市城乡全面铺开。迄今五十岁以上的无锡人，一提到那场“红色台风”往往心有余悸。

一开始是把原市委书记韦永义为首的四名原市委常委，即所谓“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无锡的代理人，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韦（永义）、江（坚）、吴（镇）、杨（增），”，挂着牌子，涂黑了双手，由用长矛等冷兵器全副武装的“工纠队”押上卡车，在全市大街小巷巡游示众。然后各级各单位一齐动手，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和“各式各样暗藏的阶级敌人”也被“群众专政”揪出来斗批游街和关押刑讯。一时间市中心的人民路和中山路，天天都被挂着大牌子的“老牛队”（即所谓“牛鬼蛇神”），和手持棍棒或细竹鞭押解他们的“群专队”充斥街衢。斥骂声和呻吟声不绝于耳。接着，运动就把矛头对准了“革派联总”（即原“主力军”一派）方面的成员。以“坏分子”、“假造反真保皇”、“打着红旗反红旗”、“暗藏的阶级异己分子”、“潜伏特务”、“阴谋复辟”等等莫须有罪名揪斗关押。到了高潮时每天都有人死于“十二级红色台风”。

原蓬帆厂厂长丁国荣，是小皮匠出身，在五十年代被提拔为干部。“文革”前夕调任蓬帆厂厂长。因其为人宽厚清正，勤於职守。且经审查政治经济生活均无任何问题。两派群众一致同意其参加筹建中的厂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并经上级革命委员会正式批准。正待厂革会成立即上任时。突然被原单位揪了回去。原来几年前，丁国荣在家中杀了一只鸡招待老同事。此事被打成了“杀鸡滴血为盟成立小集团案”。丁国荣被揪回去第二天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畏罪自杀”。死人无法斗批，就做个稻草人穿上死者的衣裳匆匆开了个斗批大会了事。笔者作为蓬帆厂被派去该厂参加斗批大会的代表之一。只见现场是一个挂在门上的细草绳圈，其高度仅到我的颈下，一个成年人根本不可用以自杀，且隔着薄薄透隙的板壁就是日夜不断有起码有三个以上人值班的“群专”办公室。我们被告知“群专

队员们正在吃早饭，早饭前曾有队员送进早餐给丁国荣。再过了不到半小时，另一群专队员推门进去，丁已畏罪自杀。”在当时的高压政治态势下，非但没有向我们出示任何有关丁国荣系“自杀身亡”的司法鉴定，而且被威胁道“要严防别有用心的人制造谣言为丁国荣搞翻案……”。事后证明这个“杀鸡滴血为盟成立小集团案”纯系子虚乌有。

除了种种捕风捉影制造冤案的全面政治大迫害外。挂牌当街示众也成了无锡市的一大景观。笔者曾见到在众多被示众者中有年及七旬的原市委委员，在抗战初期毁家纾难率众投奔陈毅元帅的季恺老人。他被挂着“暗藏的阶级异己分子、三反分子”的大牌子，站在市中心手工业大楼（现商业大厦）前广场上示众。时值春末夏初，正午骄阳当空，老人已被这样成天“枷号示众”多日。过往群众只能投以怜惜的目光，敢怒而不敢言。我只见到一位过路的板车工人，乘看守者不备，给他送上一玻璃瓶凉茶……。

工商业者沈渊如先生，是我国著名兰花专家，号称“兰王”。酷爱兰花的朱德元帅每次来无锡视察，百忙中往往抽空和沈渊如切磋兰花，互赠兰花和兰艺书籍。六八年刮起一阵“揪朱德”风潮时，沈渊如被从省里来的专案人员和无锡地方当局抓起来，要这个七旬老者交代朱德元帅来无锡时和他一起搞了什么“阴谋活动”。可是两个痴爱兰花的人碰在一道，除了互赠兰花切磋兰艺外哪有什么“阴谋活动”可交待？结果沈渊如先生被“群众专政组”吊起来一顿死打。当即老人就完全瘫痪，不能说话了……

“台风”越刮越盛，部分市革会委员和一些群众提出质疑，反被斥为“阶级立场有问题”、“资产阶级派性掩护敌人”、“干扰破坏运动”。有部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原“革派联总”人员，只能采用“非组织手段”在郊区一条小河的船上秘密商谈抵制“红色台风”措施。商量了一夜还是一筹莫展，只得草草散去。可是这个幼稚的举动竟被当局打成了“企图颠覆市革会红色政权，全面为死不悔改走资派韦（永义）江（坚）吴（镇）杨（增）复辟的反革命暴动阴谋”。并由市支左办公室的一位参谋强迫“红无锡报”美术编辑陆廷栋等人绘制所谓《暴动方案示意地图》。陆廷栋等人明知是捏造，在淫威之下不得不画，因此他们不肯认真绘制，只是含糊应付草草画就。那位参谋大为不满，就自行按军事地图规格炮制了一张《暴动方案地图》，作为“罪证”刊登在《无锡九二报》上。与此同

时，全市召开万人大会，掀起一场“彻底粉碎反革命暴动阴谋的人民战争！”。全市数以千计的干部群众被关押拷打。其实绝大多数人对那次所谓“小船会议事件”的前前后后一无所知。眼见被罗织罪名迫害者越来越多。有上千名干部工人农民被迫逃亡他乡。笔者本人那次未及逃脱，被揪斗后打入“老牛队”长达数月。这个所谓的“五月暴动”案，在两年后又被当局捡起来作为“无锡五一六十大阴谋罪案”之一，更大规模、更残酷地进行政治迫害。

南京大学的“清队”运动 看“文革”主要矛盾的转化及其后 果

董国强从 1966 年夏至 1967

年秋，尽管校内外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例如针对学校当局的“倒匡”运动、针对江苏省委的“一·二六夺权”和针对南京军区领导人的“倒许风潮”——都对南大的师生们产生过影响，但总的来说当时群众运动的斗争矛头是指向当权派的，普通群众不是“革命的动力”就是“造反”、“夺权”闹剧的“看客”，自然不会受到运动的冲击。其次，在 1967 年夏天南京武斗高潮期间，南大派性组织的头头们主要在社会上活动，其争夺的焦点是省市一级的领导权，南大校园内部尽管也存在着派性斗争，但相对来说要温和得多，“文斗”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但多数南大师生处于一种“逍遥”状态，就连运动初期被打倒的少数“黑帮份子”也感到这段时间“日子比较好过”。（1）所以对于绝大多数亲历“文革”的南大人而言，关于“文革”的苦涩记忆不是始于 1966 年夏天的“造反”，也不是始于 1967 年夏天的（武斗）高潮，而是始于 1968 年夏天的“清队”。那么“清队”期间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哪些人在“清队”运动中受到冲击和迫害？“清队”运动的大背景是什么？“清队”运动的政治后果又是甚么？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得不对“夺权”以后的“文革”运动态势进行一些分析。一、南大“清队”运动的政治背景

大量史料显示，“清队”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既是毛泽东“文革”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有机构成，又是各地区、各单位矛盾发展和激化的产物。以下我将分三个方面来探讨南大“清队”运动发生的政治背景。1、“清队”是毛泽东收缩群众运动的重要举措 我曾在相关论著中多次指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群众运动有着自己特定的政治目的，因而他决不会容忍群众运动在所谓“大民主”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 1966 年 8 月出台的《十六条》的内容，就不难发现毛泽东为日后收拾群众运动埋下的伏笔。1967 年“一月风暴”以后，原有的各级党政领导机构纷纷垮台，毛泽东认为群众运动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便立即着手收缩群众运动。1967 年 1 至 3 月间的毛泽东谈话、“两报一刊”社论和中央文件都毫无疑义地表明了毛泽东的上述意向。而收缩群众运动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包括：第一，发出“革命派按系统、按部门、按单位实行大联合”的号召——质言之是要瓦解造反派群众的跨行业联合，将他们从社会上赶回到各自的单位内部去；第二，要求各造反派组织自己“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质言之是要造反派群众搞“窝里斗”，同时在群众中树立“绝对服从”的信念，打击任何形式的“异端”思想和行为；第三，在全国各地普遍实行“三支两军”——质言之是以“军管”的方式渐次实现符合毛泽东个人意志的各级政权重组。由此可见，“一月风暴”以后，“文革”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矛盾转变为“无产阶级司令部”与“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矛盾。不过由于所谓“二月逆流”和“赵永夫事件”一度引发了毛泽东对军方的猜忌，因而在 1967 年 4 至 8 月间，他暂时中止了收缩群众运动的努力，希望利用造反派来与具有保守倾向的“军内一小撮”抗衡。这个决策不但使得造反派的势力日益坐大，而且迫使各种政治势力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纷纷对造反派组织实施渗透与控制，导致各地的群众派性武斗不断升级。面对全国政治局势的严重恶化，毛泽东不是追根溯源，反躬自责，而是归咎于造反派群众，遂于 8 月中旬作出了依靠军方镇压造反派的决策。这样经过一轮反覆，“文革”才又回到 1967 年初的态势，当初制定的各项收缩群众运动的政策得到大力推行。尽管毛泽东也曾设想通过“斗私”、“批修”的办法消除造反派群众的自发倾向，迅速恢复各级政权和社会秩序，但是事态的发展显然与他的设想不相吻合。造反派们对毛泽东的指示阳奉阴违，致使各省和

各单位内部的“大联合”迟迟无法实现。在简单的“说服教育”很难奏效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转而采取其他办法。“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毛泽东使出的一个杀手锏。从北京“六厂二校”的经验总结看，“清队”运动的实质，就是运用所谓“阶级分析”的观点，将各单位内部的干部群众按照“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政治表现”等标准化分为三六九等，同时故意混淆所谓“两类矛盾”的界限，将绝大多数人定位在两可之间，造成一种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的氛围，然后通过对少数“阶级异己份子”、“黑后台”、“群众组织坏头头”实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威慑，从而达到分化广大干部群众、瓦解造反派组织和收缩群众运动的目的。

2、“清队”为许世友清除各种异己势力提供了便利

如果“清队”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意图，得不到有关各方的积极呼应，就很难由一种主观意图变成为客观现实。然而事态的发展表明，由于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具有同构性，所以“夺权”以后，从中央到各省市再到各个单位内部，毛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利益共同体。这些利益共同体一方面作为毛的代理人贯彻执行毛的战略意图，另一方面也利用毛的“清队”号召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

毛泽东在江苏的代理人是南京军区领导人许世友。许世友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具有灵敏的政治嗅觉和简单执着的政治信念，自延安时期归顺毛泽东以后，长期以来一直深得其信任。1967年3月江苏实行“军管”，他是省“军管会”的后台老板。1968年3月江苏省革委会成立，他又被正式任命为省革委会主任。

由于许世友执掌江苏大权是中央强力干预的结果，并不存在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是经过从“三月镇反”到“八月黑风”的反覆，江苏的各种矛盾变得空前尖锐，所以关于他的任命遭遇到种种潜在的阻力。前一阶段“倒许”比较积极的江苏“红总”和军队内部的“反许派”害怕许世友上台以后对他们进行报复，千方百计地对此加以抵制。而原省市一级地方领导干部则担心许世友上台后军队势力会进一步扩张，也在暗中推波助澜。

例如在省市革委会成立前夕，“红总”下属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新工总”的头头们曾经于3月17日在南京城内贴出许多大字报、大标语，提出了“省市革委会必须以工人为主体”、“反对军管会执行愚民政策”等口号。而XX军工厂“新工总”的一个头头则公开扬言：“徐州革委会成立可以继续打王效禹，我们为甚么不继续打许世友？”另外，XX学院也有人公开谩骂许世友，说：“许是土匪！就是土匪！”“许算

甚么，你能保证肯定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吗？”（2）面对这种情况，无论是作为毛泽东的代理人，还是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我们都很难想像许世友对“清队”问题的态度。而事实上许世友也的确借助“清队”运动来巩固其在江苏的统治地位。1968年春夏江苏揭批“江（腾蛟）、王（绍渊）、高（高浩平）”的运动，就是为了清洗以南空领导层为代表的军内“反许派”；而针对所谓“老年串联会”（3）的调查批判，则是为了打击潜在的竞争对手——原省市一级领导干部群体。3、“清队”为南大校内“多数派”打击、排斥“少数派”提供了合法性掩护
南京大学是江苏“文革”的发源地，南大“红色造反队”和“八·二七革命串联会”的头头们后来又分别成为江苏“好派”和“屁派”两大群众组织的领军人物，在群众运动中呼风唤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江苏的政局。所以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南大成为江苏“清队”运动的重点不足为奇。值得特别注意的，倒是南大内部派性斗争如何内在地制约着“清队”运动的走向。或者说，南大的派性斗争是如何在“清队”的名义下延续的。
南大造反派内部的明争暗斗由来已久。尽管“红色造反队”成立得更早，其领袖人物文风来、李太平、耿昌贤等人在社会上的影响更为广泛，不过由于过分强调自身组织的“纯洁性”，所以其组织规模一直很小，鼎盛时期也不过7、80人。而政治倾向比较模糊、社会构成比较复杂的“八·二七”自成立之日起就拥有数千成员。鉴于当时两个组织之间存在着同盟关系，双方头头们起初对此并不十分在意。以至于1966年10月宣布“校内夺权”以后，南大的大权一直由“八·二七”一派把持。在对外交往之中，南大造反派也都打“八·二七”的旗号。到1967年“一二·六”之后，江苏造反派内部发生“好”、“屁”之争，南大校内的派性壁垒也变得阵线分明。为了改变校内力量对比，“红色造反队”便与从“八·二七”中分裂出来的三个小组织共同组成“红四联”，南大“好派”人数规模有所扩大。但“八·二七”把持南大的格局并未改变。考虑到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同时也由于“红四联”的头头们当时将主要精力用于经营“省红总”，因而在此后大半年的时间内，“红四联”干脆主动将大部分成员撤出南大，使南大成为“八·二七”的一统天下。出于上述原因，在江苏、南京政治局势日趋动荡的时候，南大校园内倒显得相对平静。至1967年8月为止，南大校内几乎没有发生过武斗，更没有因此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到1967年秋天以后，随着造反派

在社会上的活动受到限制，“红四联”成员纷纷返回南大校园，校内的派性斗争变得空前激化起来。在 9 月和 10 月间，南大发生过两次武斗。幸亏当地驻军的及时介入才没有造成重大伤亡。但两派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没有停止。 19

1968 年 1 月初，根据中央的指示，南京军区派出“军训团”进驻南大。“军训团”负责人、6483 部队政治部主任方敏成为南大实权人物。鉴于“红四联”和“八·二七”的实力对比，同时也由于两派在“倒许风潮”中的不同表现，“军训团”自进入南大之日起便采取了扶持“八·二七”抑制“红四联”的政策。到酝酿成立南大“革委会”的时候，“红四联”方面为了改变南大现有的权力格局，试图联络校内干部群体与“军训团”和“八·二七”抗衡，于是掀起了一个“解放”干部的浪潮。他们不但要“解放”绝大多数中层干部，而且还要“解放”原校党委负责人陆子敏。为此，他们还炮制了一份《陆子敏大节报告》广为散发，为陆子敏的“解放”和“入阁”大造舆论。这样就在南大内部形成了以“红四联”和原校内中上层干部群体为一方，以“军训团”和“八·二七”为另一方的权力博弈格局。然而到 1968 年 3 月校革委会成立时，“军训团”负责人方敏被任命为校革委会一把手，原校内干部则“结合”了相对超脱的原南大党委常委、组织部长索毅然。这意味着军方和“八·二七”控制南大的格局并没有改变。这当然造成“红四联”头头们的严重不满。因而当中央发出“清队”号召时，南大的“清队”运动就成为军方负责人和“八·二七”方面打击和排挤其政治对手的托词。运动前期对“阶级异己份子”的清查和“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表面看来是一场针对“死老虎”的斗争，其实则是要通过这些批判斗争“揭露”旧党委执行“教育黑线”的罪恶，将校内干部群体与所谓“黑线”挂上钩，从而彻底杜绝他们重新执掌南大实权的可能性。运动高潮期间在南大干部、教师中揪“叛徒”、揪“特务”，直到揪所谓“地下黑司令部”，以及在造反派内部开展揪斗所谓“坏头头”的活动，则更加直白地说明了上述意图。由上述分析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许世友和南大革委会负责人构成一个三位一体的利益共同体。尽管他们在“清队”的具体目标上略有不同，但是在维护既得利益、巩固个人权威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这是“清队”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地开展的根源所在。

二、南大“清队”运动的具体过程

现有资料显示，南大的“清队”运动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 1、校革委会成立与“清队”的发动

鉴于南大的“大联合”是江苏、南京地区“大联合”的关键所在，所以自始至终受到中央和南京军区的高度关注。现有资料显示，在 1967 年 9 月至 1968 年 3 月期间，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负责人公开接见南大两派代表达 10 次以上。许世友也数次与南大师生接触。在中央和南京军区的强力干预下，南京大学革委会的组阁方案于 3 月初基本确定。原“军训团”负责人方敏被内定为革委会主任，索毅然（原党委常委、组织部长）、曾邦元（南大“八·二七”一把手）、文风来（南大“红四联”一把手）被内定为副主任。这个组阁方案表面看来在南大的两派之间实行了“对等原则”，但是实际上大权掌握在“军宣队”（即改组后的“军训团”）和“八·二七”手里。他们是“清队”运动的领导力量。 1

1968 年 3 月 13 日，南京大学革委会先于江苏省革委会成立。许世友携江苏省“军管会”、南京军区各军种兵种和各“支左”部队首长二十多人出席了校革委会成立大会，并发表了主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讲话，其中提到：南京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老巢，南京大学的前身又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高等学府，是牛鬼蛇神、社会渣滓成堆的地方。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邓陶的黑手，早在战争年代就伸进了江苏，并培植了一批大大小小的亲信。他们狼狈为奸，上下勾结，加紧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现在，我们无产阶级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就意味着他们要完蛋了。反动派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同志们必须擦亮眼睛，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同时，我们也要不断地向阶级敌人发起主动的进攻。（4）许世友的这次讲话应该是南大“清队”运动的最初发动。 3 月 14 日，许世友又在华东饭店召见南大革委会全体成员，对革委会的近期工作作出了“四点指示”，其中特别提到“你们那个地方过去是伪中央大学，油水多得很，乌龟王八蛋多着呢！你们要小心！”他还说：“眼睛要擦亮，不要上坏人的当，斗争要心中有数。特别是叛徒、反革命黑手，要发动群众来抓。你们那里不是没有，有风有浪，无风三尺浪，有风无风都有人搞鬼，鬼名堂有多少，你们心中要有数，没有数到时候就乱了。你们要擦亮眼睛，你们搞得不好，人家就要造你们的反……”（5）根据许世友的上述指示，南大校革委会于 15 日和 16 日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提出了革委会的“四大任务”，其中“清队”问题被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会议强调指出：“南大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建立红色政权

之后，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还会有几场拼死的斗争。阶级敌人是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的，他们将会以更狡猾、更隐蔽的手段从事破坏和捣乱，妄图颠覆我们新生的红色政权，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擦亮眼睛，随时粉碎阶级敌人的新阴谋。”会议还决定：“……清理阶级队伍，广泛发动群众，充分依靠群众，把混入革命队伍的特务、叛徒、自首变节份子、反革命份子和牛鬼蛇神统统清除出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6）随后，南大专门成立了一个“清档组”，共清理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大遗留的档案 2 万多卷，计 3，000 多公斤，为“清队”运动做好准备。4月 16 日，经过一个多月的酝酿和准备，有全校师生员工参加的“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誓师大会”在大操场举行。校革委会主任、军宣队负责人方敏首先发表讲话。他按照许世友几次讲话的调子，声称“南京大学历来就是两个阶级激烈搏斗的战场。解放前，南京大学是国民党的文化中心，封建遗老、反动权威、乌龟王八蛋多得很。解放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孙叔平、郭影秋、匡亚明招降纳叛，把南京大学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现在匡亚明之流被揪出来了，……但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无时不在企图翻案，同时校内还有不少叛徒、特务、小爬虫们还没有被揪出来，甚至还有极少数人要为匡亚明翻案，阶级斗争是严重的、尖锐的”，所以“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阶级敌人猛烈开火，迎头痛击为匡亚明翻案的妖风逆流。”（7）随后，外文系老教师柯象峰（罪名是“老特务”）、物理系原党总支书记王承志（罪名是“大叛徒”、“大特务”、“走资派”）、原校总务处长高鲤（罪名是“大叛徒”、“大特务”）和地质系中年教师周国庆（罪名是“漏网右派”、“反动份子”）被红卫兵押上主席台批斗示众，成为南大“清队”运动的第一批牺牲品。在大会的最后，校革委会常委梁玉楼宣读了校革委会的《动员令》，号召“革命的同志们，立即行动起来！擂起战鼓，吹响号角，向阶级敌人猛烈放火开炮！开炮！开炮！”（8）这次大会以后，“清队”运动在全校上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一大批干部、教师和学生受到错误批判。2、批陆子敏和揪“地下黑司令部”事件如果说 3 至 4 月间发生的第一波“清队”斗争浪潮还更多地反映出省、校两级革委会领导层对中央号令的回应，那么 5—8 月间的批陆子敏和揪“地下黑司令部”事件则更多地折射出江苏地方当局内部矛盾和南大校内派性斗争的影响。我们首先来看看江苏地方当

局内部矛盾的影响。当时江苏地方当局内部的矛盾，首先表现为许世友与以南京空军领导层江腾蛟（南空政委）、王绍渊（南空副政委）、高浩平（南空政治部主任）等人为代表的军内“反许派”之间的矛盾。他们之间矛盾的产生和激化，直接源自 1967 年夏天武汉“七二〇事件”引发的南京“倒许风潮”。

(9)但是由于“江、王、高”等人受到中央高层某些人的保护，所以尽管许世友对他们恨之入骨，却也一时拿他们没有甚么办法。1968 年 3 月下旬，中央高层决定清洗“杨、余、傅”。随后，中央军委于 4 月 29 日致电南京军区，宣布江腾蛟、王绍渊、高浩平“停职检查”。这个意外的变故为许世友整肃军内“反许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5 月 2 日，许世友到南大发表讲话，指出：一、批判王绍渊、高浩平时，“毛主席、林副主席所作的英明决策”必须“句句照办，字字照办”；二、王绍渊、高浩平主要罪恶在：1、挑拨军队与地方关系，主要是挑拨军区与南空的关系，是倒许乱军的后台。2、挑动群众组织武斗，支持一方，压制一方。3、对抗中央指示。三、对王绍渊、高浩平“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对王、高的批判要和清理阶级队伍结合起来，使批判深入到工厂、车间、学校、班系和家庭。”(10)5 月 31 日至 6 月 3 日，许世友又召集江苏省、南京市革委会常委联席会议，作出了《充分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展开更加猛烈的进攻》的决议，正式发出了向王绍渊、高浩平等“猛烈开火的战斗号令”，强调坚决批判揭露王、高等人的罪行，彻底肃清其流毒，就是为了彻底摧垮江渭清、陈光之流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其在江苏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就是为了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江、陈之流坚决打倒，就是为了彻底揭开省委的阶级斗争盖子，把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一切反革命份子统统揪出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1)此后，一场全省范围的批判“江、王、高”的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这次运动绝不仅仅是针对南空“江、王、高”的，而且还波及到南京军区领导层中的“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江苏省军区司令员赵俊、南京军区后勤部负责人陈茂辉，以及一些在宁军工企业和在宁军事院校负责人。此外，不少地方领导干部也受到运动冲击，所谓“老年串联会”问题就是其具体表现。由于许世友一再强调，批判“江、王、高”要和各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所以这场运动对南大的“清队”运动产生了强大的刺激。6

月 12 日, 南大校革委会召开会议, 方敏在会上提出了南大“庙小妖风大, 池浅王八多”、“山高林密老虎多, 敌情严重”等看法, 要求全校上下“彻底揭开南京大学阶级斗争的盖子”。6 月 18 日, 校革委会再次开会, 作出了“从陆子敏开刀, 全面揭开旧党委阶级斗争盖子”的决定。6 月 21 日, 南大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 就传达省市革委会联席会议的《决议》和部署对陆子敏的斗争这两个中心内容作了全面动员。此后, 以批陆子敏和揪“地下黑司令部”为主题的“清队”运动新高潮在南大校园内兴起。由以上叙述可以看出, 中央清洗“杨、余、傅”, 江苏批判“江、王、高”和“老串会”, 南大批陆子敏和揪“地下黑司令部”, 这三者之间有着直接的连带关系。此外, 在批陆和揪“地下黑司令部”高潮期间, “八·二七”方面组织的大批判文章曾经浓墨重彩地为人们描绘过以下几个“联络图”: 1、王绍渊、高浩平(南空负责人)——寿志勤(王绍渊夫人、南大保健科负责人)——陆子敏; 2、杜方平(南京军区军工部负责人)——路慧明(南京军区后勤部负责人谢胜坤夫人、南大校部机关干部)——陆子敏; 3、蔡公正(原省机械工业厅副厅长、“老串会”核心成员)——陆子敏; 4、王维良(原省委干部、“老串会”成员)——徐慧征(王维良夫人、南大中文系总支书记)——陆子敏, 其中前两项旨在强调陆子敏与军内“反许派”之间的关系, 后两项旨在强调陆子敏与“老串会”之间的瓜葛。这就更进一步证实了南大“批陆”与江苏地方高层内部矛盾的紧密关联。那么南大校方为甚么会选择“从陆子敏开刀”? 又怎样搞出了一个“地下黑司令部”? 要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就不得不对陆子敏的个人情况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同时对南大内部的派性斗争作一个简单的回顾。有关资料显示, 陆子敏出生于南京一个手工业者家庭, 上中学时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遭到学校开除。随后他于 1934 年前往上海参加陶行知等人创办的“上海工学团”, 不久加入中共地下党。1938 年, 他受地下党派遣参加国民党举办的战地干部训练团第三团, 担任干事、秘书等职, 为中共方面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得到周恩来的高度赞扬。1942 年, 他因身份暴露离开“战干团”前往苏北根据地。解放后曾担任过徐州地委行署秘书长等职。1956 年调任南大党委副书记, 长期分管学校后勤工作。

“文革”爆发后, 陆子敏和旧党委其他领导人一样受到过学生运动的冲击。但是由于他长期担任学校第三把手, 对学校以往的工作不负主要责任, 另外按照当时

的判断标准，他政治上也没有其他严重问题，所以省委工作队进驻南大以后，他成为主要依靠对象。在工作队撤离前，省委还曾考虑任命他为半官方性质的“校文革领导小组”负责人。到 1966 年 10 月造反派宣布“校内夺权”以后，陆子敏才逐渐失去影响。不过此后南大造反派忙于争夺省市一级领导权，南大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所以像陆子敏这样的人也没有受到进一步冲击。直到 1967 年秋天造反派纷纷回到校园，校内派性斗争日趋激烈，陆子敏的境遇才逐渐恶化。在 1967 年底至 1968 年初，属于“八·二七”派的“南大后勤工人战斗队”曾经 18 次批斗陆子敏。到酝酿成立校革委会的时候，是否“解放”、“结合”陆子敏，成为南大“红四联”和“八·二七”争斗的一大焦点。“红四联”和以原南大各级干部为主体的“三·三一串联会”共同为陆子敏的“解放”到处奔走，还炮制了一份《陆子敏大节报告》广为散发，宣称陆子敏在反对匡亚明的斗争中是积极的，在“文革”期间的表现也是比较好的，等等。陆子敏本人也曾亲自给周恩来写信，控告“八·二七”方面对他的打击、迫害和诬蔑。而“八·二七”方面为了阻挠陆子敏的“解放”，不但将陆子敏抓起来关进“牛棚”，而且还组织了一批大批判文章，罗列了陆子敏的种种“罪行”，主要包括：一、在“文革”前长期追随陈毅人、郭影秋、匡亚明执行“资反路线”，重用“反动学术权威”和有各种政治问题的人；二、“文革”初期与省委工作队和保守派组织“红旗战斗队”相互勾结，积极镇压“革命师生”的造反运动；三、省委垮台后与“老串会”秘密来往，组织南大“地下黑司令部”，负隅顽抗；四、1967 年“八月黑风”期间与各种反动势力相勾结，积极从事“反许乱军”活动；五、“八月黑风”平息以后，他与“红四联”头头一起四处奔走，为江渭清、陈光、杜方平和他自己鸣冤叫屈，等等。不管上面引述的两方面材料内容是否属实，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是否“解放”、“结合”陆子敏，将会极大地影响到南大校内的权力格局。假如陆子敏获得“解放”，那么一大批原校内中层干部就没有理由不加以“解放”。这样一来，虽然不至于动摇“军宣队”负责人方敏的一把手地位，但是“八·二七”方面把持校部机关和各系领导权的局面将不复存在。这才是南大校革委会选择“从陆子敏开刀”的真正动因。至于所谓“地下黑司令部”，按照“八·二七”方面的指控，其主要成员名单如下：杨世杰：南大教务长曹沛然：南大副总务长欧 磊：南大党委组织副部长杜闻贞：南大党办副主

任朱跃鑫：南大校办副主任、科研处长王承志：物理系总支书记叶楠薰：数学系主任徐漫华：南大越南留学生班（相当于系）负责人蒋 克：外文系总支书记徐克勤：地质系主任陆夕书：政治系和马列主义教研室（相当于系）负责人徐慧征：中文系总支书记茅家琦：历史系负责人路慧明：校部机关干部洪维邦：后勤系统总支书记卢进阶：后勤负责人陈子华：后勤负责人王荣先：后勤负责人 这份不完全的名单和其他相关资料十分清楚地说明，在揪“地下黑司令部”事件中受到冲击的，主要是原校部机关部处级和各系总支书记一级的干部，而在这个事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除了学生造反派头头以外，还有一批参加造反派的原校部机关科级干部和各系教研室负责人一级干部，如地理系的王钦润、保卫处的陈霖等。正是由于前一批人在“文革”中被打倒，后一批人才得以攫取校内各级组织的实际控制权，并进而成为各级革委会的负责人的。由此可见，所谓“地下黑司令部”问题，完全是校内造反派头头们为了阻止校内中层干部复出而制造的一个冤案。由于上述事件是在“清队”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所以除了陆子敏和所谓“地下黑司令部”的成员之外，还有一些干部、教师、学生受到波及。8月12日，南大召开全校“斗争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份子大会”，宣称揪出“国民党特务、反动教授”任美锷（著名地理学家、曾任地理系主任）、肖楠森（著名地质学家）、李海晨（地理系著名教授）、王气中（中文系著名教授），“大汉奸”杨寿钧（外文系教授），“大叛徒”曹沛然（原总务长），“反动份子”、“乱军篡权的小爬虫”李乾亨（马列室中年教师）、褚家春（身份待查）和“现行反革命份子”韩志坚、崔善龙、卢金池、丁浩（以上四位当时是青年教师或学生）等。（12）此外在8月“清队”高潮期间，高济宇（著名化学家、曾任南大副校长）、莫绍揆（著名数学家）、叶楠薰（著名数学家、曾任数学系主任）等人也未能幸免。

3、“工宣队”进驻与“清队”运动新高潮 就在南大批陆子敏和揪“地下黑司令部”的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毛泽东又于8月中旬发出了“最新指示”： 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份子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13） 根据这个最新指示，中央于8月25日发出了《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9月初，由南京浦镇车

辆厂干部职工组成的“工宣队”进驻南大。这无疑为南大的“清队”运动添加了一把乾柴。不过这个期间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毛泽东派“工宣队”进驻高校的举措，与清华“百日大武斗”有着直接的关联。至于这个举措的战略意图，在 9 月 10 日“两报一刊”上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份子再教育问题》中有所宣示：“工人阶级进入文化教育阵地，工作对象主要是知识份子”，“……今后，在那些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不但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搞好本单位斗、批、改，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而且应该分期分批地组织他们到工农兵中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14）如果说上面这段引文的表述还显得比较晦涩的话，那么江青在 9 月 14 日接见首都“工、军宣队”代表时的讲话则简洁明了地告诉我们：这里所谓“知识份子再教育”问题，其实就是造反派学生的“再教育”问题。而“再教育”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在毛泽东看来，造反派学生们长期以来“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而是一门心思地忙于派性斗争，“脱离了群众”，“也脱离了他们本单位的群众”（15）——质言之，就是“脱离”了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所以“工宣队”进驻南大以后的第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加强了对造反派学生的管束。这理所当然地引发了曾经被誉为“革命先锋”的学生造反派的极大不满。一位当年的造反学生在访谈中说：毛泽东后来派工宣队进驻高校，要对我们大学生进行“再教育”，我们当然不服气啦！工宣队进校以后把我们学生骂得一塌糊涂，我们就把两年前《人民日报》赞扬我们红卫兵的社论抄成大字报贴在校门口上，质问工宣队：为甚么两年前把我们吹得好好多好，现在又把我们骂得一钱不值？另外我们很快就发现这次进驻的工宣队和 1966 年进驻的省委工作队没有甚么不同，他们不都是上面派来领导运动的吗？他们的做法不是都差不多吗？为甚么那个就是“错误”的，这个就是“正确”的呢？这个不能自圆其说呀！所以各种各样的疑问就产生了。工宣队当然没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他们就简单粗暴地斥责我们这些学生是“用资产阶级反动政客的观点来看待‘文化大革命’”。这样我们就更加不满了。（16）此外当时还有的学生公开扬言：南大是江苏“文化大革命”的摇篮和中心；南大造反早、大联合早、成立革委会早；南大头头多、大会多、消息多、大字报多；社会上一直流传着“江苏看南京，南京看南大”的说法……。（17）言下之意，南大造反派还需要别人来领导吗？！为了应

对造反派学生的挑战，树立“工宣队”的绝对权威，“工宣队”和校方当局不得不暂时放下其他工作，发起了一个批判所谓“南大中心论”的运动，并通过组建带有强烈官方色彩的“红代会”来彻底瓦解造反派学生组织。直到 1968 年底前后，随着 66 届和 67 届 2,000 多名学生相继毕业离校，针对造反派学生的“斗、批、改”工作才告一段落。此后在“工宣队”的主导下，南大又掀起了一个“清队”运动的高潮。1968 年 12 月中旬，“工宣队”和校革委会共同做出决定，号召全校师生员工“彻底摧毁陆子敏地下黑司令部”。1969 年 1 月 3 日，南大成立了“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1 月 8 日，校革委会主办的《新南大》全文转载了天津《工大新声》上刊登的《深挖阶级敌人 30 条经验》。（18）1 月 18 日，《新南大》又依样画葫芦，搞出一个带有南大特色的、共有二十二条的《排一排，查一查》，（19）作为深入开展“群众性的大排查、大揭发、大批斗”运动的指导性档。此外，校方和工宣队还根据外地的“先进经验”，多次召开所谓“宽严大会”，树立“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强迫广大师生员工“主动坦白”和“积极揭发”。整个南大沉浸在一派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氛围中。在上述背景之下，又一批中老年教师受到严重迫害，其中包括耿以礼（著名生物学家）、刘毓璜（著名历史学家）、曾远荣（著名数学家）、吕同仑（外文系教授）、王尔康（地质系教授）、孙本文（著名哲学家）、耿伯介（生物系中年学术骨干）等。除此之外，“工宣队”领导的“清队”运动“战果”还包括：在上海路家属区侦破了三起“反革命案件”，在陶园宿舍侦破了一起“反革命案件”，在西桥幼稚园侦破了一起“反革命案件”，在物理系揪出了一个“反动小集团”等等。这个时期“清队”运动的矛头指向及其荒谬性和严酷性，可以在当时作为“先进经验”发表的《上海路家属区是怎样获得新生的》一文中略见一斑。首先，让我们看看“工宣队”对南大家属区情况的基本估计：南大上海路家属区原是一个三不管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长期以来，这里死气沉沉，乌烟瘴气。……于是，一些叛徒、特务就在这里潜伏下来，那些逃避本地贫下中农监督的地、富、反、坏、右份子，也在这里隐藏下来。实际上，这里就成了牛鬼蛇神的庇护所和安乐窝。其次，让我们看看“工宣队”“发动群众”的情况：上海路家属区原来只有一个所谓家属学习班，每星期学习一次，每次学习一个小时，参加的人最多不过一、二十人，学习内容也

只是读读报纸，谈天说地，拉拉家常。……针对这种情况，工宣队员组织广大群众讨论办学习班的伟大意义，提高了大家对办学习班的认识。根据家属区的实际情况，共办起了各种类型的学习班七个，有 215 人参加，每天学习二至四个小时。工宣队同志……带领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宣传党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政策，组织他们听工人、贫下中农的忆苦思甜报告，号召他们向阶级敌人作斗争，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斗批改”人物，使广大群众，特别是大部分青少年，提高了觉悟。第三，让我们看看“工宣队”的“工作成果”：当本院内发生三起现行反革命案件的时候，广大革命群众响应工宣队的号召，从五、六岁的红小兵到七、八十岁的白发苍苍的老人，都参加了学习班，并开展了以这几起案件为中心的大检举、大揭发运动。仅几天时间，就揭发出 130 余条重要线索，其中 46 条击中了作案者的要害。不仅如此，有些同志还自觉地担负起监视敌人的任务，使阶级敌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订立攻守同盟等，都能及时掌握。阶级敌人胆战心惊，完全淹没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20）4、“清队”运动告一段落 到 1968 年底和 1969 年初，毛泽东在全国范围收缩群众运动的战略意图已经基本实现。为了给即将召开的“九大”营造一种团结、和谐的气氛，毛泽东发出了如下“最新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对反革命份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21）后来在 1968 年 3 月份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他又说：政策落实是个大问题，……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几个反动标语算什么？教授、讲师不像军队，他们是手无寸铁。……坏人是极少数，我们把这些人推向国民党方面好吗？不要在学生中去打主意，也不要在多数的教员、干部中打主意。连一点也不让人家讲一点怪话，也不让资产阶级讲一点自由主义行吗？他们因为肚子里面有气。有的今天讲了，明天就不讲了。他还说：叛徒，特务是否都要戴帽子，他们或许有严重历史问题。特务、叛徒无现行活动的，也可以戴，也可以不戴，等他造反的时候再给他戴嘛！（22）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指示，中央先后批转了驻清华大学工宣队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份子“再教育”“给出路”政策》的报告和《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

阶级的各项政策》等档。全国范围的“清队”运动开始降温。南大也作了相应的部署，“清队”运动告一段落。然而此时“清队”运动已经给南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据不完全统计，在 1968 年“清队”运动高潮期间，全校共组织学习班 9 期，组织批斗大会 15 次，批斗 29 人，各系自行组织批斗的对象 85 人，批斗 345 人次。全校成立了 285 个专案组，办专案的队伍达 1,510 人，全校被立案审查的对象 141 人，定案 41 人。在审查中，不幸死者 5 人。（23）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在江苏“文革”社会动乱最剧烈的 1966 年至 1967 年间，南大没有人因遭到群众批斗致死，也没有人在武斗冲突中死亡。三、“清队”运动的政治后果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毛泽东发动“清队”运动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是将造反派对当局的不满逐步转化为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并通过“分化”和“震慑”并用的方法，暂时遏制住了造反派群众的叛逆情绪，瓦解了造反派群众组织，基本实现了收缩群众运动的战略目标。然而这种以“暴力威慑”和“分化群众”为主要特征的处置方式还导致了三个当时不易察觉的政治后果：第一，它促成了部分造反派的觉醒。一位当年的造反派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曾经说过：“我们一开始对毛泽东是视如神明的。但是后来发现，毛泽东先是利用我们去整走资派，后来又利用我们去整我们的老师，再后来又派军宣队和工宣队来整我们学生。我们对毛泽东和‘文革’的看法就慢慢改变了。”（24）大量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表明，这种思想变化决不是个别现象。第二，它虽然有效地恢复了社会秩序，但是中国政治的基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而单位内部的派性斗争并没有消除。相反，随着群众的日益分化和政治争夺空间的日益缩小，单位内部的派性斗争反而有更趋激烈之势。其后发生在江苏和南大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其惨烈程度比“清队”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第三，在“清队”的过程中，毛泽东主要依靠其在各地和各单位的代理人贯彻自己的意志，大力维护中央和其个人的政治权威。但是单纯依赖个人信任和个人效忠维系的利益共同体是很不稳固的。在专制主义政治模式下，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始终是一对潜在的矛盾。从短期效应看，地方实力派权威的加强是实现地方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前提。然而从长期效应看，地方实力派的日益坐大又可能对中央集权构成潜在的威胁。只有理解这一点，我们才可以理解为甚么毛泽东会在 1973 年底作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决策。

上述各点，即反映出“文革”的悖论，也反映出专制主义政治的困境。注释（1）详见董国强与肖信生、茅家琦等人的访谈记录。肖、茅两人原为生物系和历史系的负责人，“文革”爆发时被作为“黑线人物”打倒。（2）《彻底砸烂“倒许保高”联络站》，南京工学院东方红战斗公社主办之《东方红战报》，1968年4月14日。（3）根据拥护许世友的“八·二七”方面撰写的大批判文章指控，所谓“老年串连会”共有成员近200人，其主体是原江苏省委和省人委领导下的部、委、办、厅、局级干部，另外还有一些地市委领导干部和大专院校领导干部，其领袖人物是刘思明（省委干部）、王迫吾（省委干部）、焦康寿（原省劳动局局长）、张志强（原省农林厅副厅长）、槐亚东（原省重工业厅厅长）等。据称他们是江渭清为了抵制“文化大革命”，在“陈（光）、李（士英）、包（厚昌）”等人组成的“第二道防线”之后构建的“第三道防线”。其罪行主要是在1967年的“八月黑风”中积极勾结地方上和军队内部的造反派进行“反许乱军”活动。（4）《在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许司令员的讲话》，1968年3月20日《新南大》。（5）《许司令员接见南京大学革委会全体成员讲话》，1968年3月20日《新南大》。（6）《南大革委会第一次全会纪要》，1968年3月28日《新南大》。（7）《我校举行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誓师大会》，1968年4月20日《新南大》。（8）《动员令》，1968年4月16日《新南大》。（9）详见董国强：《1967年夏天南京“倒许”风潮的台前幕后》，《二十一世纪》网路版2006年11月号。（10）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未刊稿），第115页。（11）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未刊稿），第117页。（12）《认真清理阶级队伍，发展革命大好形势》，1968年8月13日《新南大》。（13）《毛主席最新指示》，1968年8月25日《新南大》。（14）《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1968年9月10日《人民日报》。（15）《中央文革碰头会领导接见首都工宣队军宣队代表时的讲话》（1968年9月14日），见宋永毅主编之《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16）董国强与经盛鸿访谈记录。（17）《“南大中心论”的要害是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1968年9月7日《新南大》。（18）详见

《看一看, 想一想, 查一查——深挖阶级敌人三十条》, 1969年1月8日《新南大》。(19)详见《排一排, 查一查》, 1969年1月18日《新南大》。(20)《上海路家属区是怎样获得新生的》, 1969年1月10日《新南大》。(21)《毛主席最新指示》, 1969年1月4日。(22)《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的讲话》(1969年3月15日), 见《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23)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大事记》, 第130—131页,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9。(24)董国强与经盛鸿访谈记录。

蔡铁根的冤案

/刘梦溪(博讯北京时间 2010 年 5 月 24 日 来稿)

蔡铁根(1911年12月——1970年3月11日), 汉族, 生于河北省蔚县塔头村, 曾就读于厦门大学, 1936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1959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军队反教条主义的受害者, 文革中被诬陷为“蔡铁根反革命集团”“主犯”处死[1], 是中国1949年以后被处决的最高级军官。 早年经历 (博讯 boxun.com)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干事。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宣传部干事, 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冀热察挺进军骑兵大队政治教导员, 冀热察挺进军第九团政治处副主任, 中共桑干河区工委书记兼广灵区大队政治委员。参加了平型关和平西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战役战斗。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任晋察冀军区第一野战军冀察纵队第七旅政治部副主任, 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七旅政治部副主任, 第二纵队第五旅政治部副主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军政大学政治部政治教员, 一总队副总队长。参加了绥远、张家口、古北口、怀来、新保安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部条令处处长, 条令局副局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教范处处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军事学术史教授会副主任, 战史教授会主任。 遭受迫害 1957年2月彭德怀主持的国防部开始部署反教条主义, 矛头直指刘伯承担任院长的军事学院和萧克担任部长的训练总监部。8月刘伯承被迫辞职。 1958年5月, 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进入了决策中枢的林彪以中常委、党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主

持会议，召开了有一千多名高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再次把反对军队工作的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向了高潮。斗争的残酷，可以举两个例子足以说明。一是萧克遭到连续四个多月批斗后，有一天大口吐血。医生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那些人不但没有表示同情，反而指责医生“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二是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战史教授会主任、红军时期干部蔡铁根大校在会上说，共同条令（五十年代军内制定颁布的）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就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关押起来；后来，他被逐出军队，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根本不容许他申辩、讲真话！1959年10月，在全军“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开除党籍、军籍，调离部队的不公正处分，被分配到江苏省常州市机械工业局当巡视员。被贬常州后，蔡铁根境况相当凄惨，老婆与他离婚，一人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艰难度日。

1969年8月，时值文革发生不久，常州市机械局的人保科长偕同常州中学的红卫兵，以破“四旧”名义，到蔡铁根家里抄家，抄出了蔡铁根的40多本日记，因为日记里有对党内政治生活，以及对某些政策措施不满的言论。特别是，他在日记中有批评毛泽东的语言，常州市委于9月上旬成立了“蔡铁根专案办公室”，将蔡铁根和同他往来密切的吴翼、余须涌、屠苏等人拘留。11月，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决定把与蔡铁根案子有牵连的人集中到一起，用所谓办“学习班”的办法来搞。据参加“学习班”的人回忆，当时气氛森严恐怖。关起大门走小门，所有的窗户都用纸密密糊上了，15个对象由15个小组搞，各占一个房间。1970年3月，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根据几次搞的材料，认定“以蔡铁根、吴翼为首纠合反革命活动”判处蔡铁根、李业舫死刑，立即执行。这是许世友决定的。

1970年3月11日凌晨，蔡铁根和他的同案人被叫起来吃饭。饭后他们被带到一个房间里。先是宣读“逮捕证”，接着就向他宣告死刑判决。蔡铁根听了判决愤怒地说：“你们无权判我，我要上诉！”“不准上诉！”有人蛮横地喝道。从听到判决到最后，蔡铁根始终从容镇定。行刑前，蔡铁根同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吴翼道别时说：“你看过古戏《搜孤救孤》没有？”吴说：“看过。”蔡铁根说：“活着的，要把这个官司打到底！”蔡铁根是个宁折不弯的汉子，这样的人在建国后的军队干部中是很少见的。平反昭雪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蔡铁根平反昭雪，恢复中共党籍和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籍。 1980 年 1 月 10 日，在江苏省常州市为蔡铁根举行隆重追悼会。其骨灰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 com)

2009 年 5 月 25 日初稿

2011 年 12 月 27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一册（4）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一章 深入搞好斗批改

第四节 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〇年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及两个附件

1970.02.05；中发 [1970] 6号

附件一：

有些单位存在着严重铺张浪费的现象

最近，有些群众来信反映，有些单位不顾大局，搞铺张浪费，影响很坏。现摘登如下：

西安市在大兴土木搞非生产性建筑

西安市今年以来修建的百货大楼、旅馆、饭店、电影院、住宅、办公大楼等，据不完全统计有六十处，建筑面积约十余万平方米，投资约一千五百多万元。有的建成后已开门营业，有的正在昼夜施工，有的正在拆迁民房，筹备新建。这些建筑，工程浩大，地点集中，仅东大街和西大街即建起三层以上大楼二十余座，钟楼一带盖起大楼五、六座，光修建延安路百货商场即花了近四十万元。

西安市革委会办公驻地内，原旧市委一砖到顶的二十余间平房被拆掉，现已建成新的三层办公大楼， 投资约十万元。

用大少爷作风办“五·七”干校

河北省革委会在宁晋县大曹庄筹建一所“五·七”干校。在建校过程中，负责建校的同志违背毛主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教导，搞铺张浪费。

建校规模庞大。今年已修建了一千一百多间校舍，明年计划再建两千五百间左右。该校用于建房、运输、雇木、瓦工，共花了一百二十多万元。建校舍求大、求好。新建的宿舍全是砖瓦房，白灰墙。有六百多间房屋已打水泥地面。新盖的饭厅兼礼堂浪费极大。

他们把原省直机关的家俱，不管适用的不适用的全部拉来，其中包括沙发、地毯、弹簧床等，共装了五十九节火车皮。学员们认为这样做，实际上是从城市到城市，从机关到机关，严重脱离群众，不利于干部思想革命化。

用钢铁筑成的四个掩蔽部

新疆石油管理局克拉玛依供应处修复总站，职工不到三百人，为了防原子弹，修筑了四个大掩蔽部，用了废旧钢材六十八吨，其中有些是好钢材。这四个掩蔽部，职工利用晚上加班和一部分工作时间，花了一个多月才建成。还集中了十几台电焊、气焊，焊接钢梁骨架。工人们对这种做法很有意见。来信人也认为，这样做是不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节约闹革命”的教导的，是害了一种原子弹恐吓病的表现。

四川有些单位挥霍浪费成风

江北县和荣昌县很多基层单位借成立革命委员会之机，讲阔气，摆排场，大摆筵席，大吃大喝，造成很坏的影响。例如江北县静观区五个商业单位办了一百七十桌酒席，上水镇五个商业单位设宴三天，办酒席二百六十四桌。九龙公社和十个大队联合举办酒席一百二十九桌。该公社的新民大队为庆祝成立革命领导小组还单独办酒席三十九桌。荣昌县多数基层单位成立革委会时，都摆筵席二、三十桌到一百几十桌。如该县搬运公司竟办了酒席二百九十四桌。联升公社一大队办酒席一百七十三桌。宜宾地区东风矿区、宜宾纸厂在成立革委会时，铺张浪费比上述单位更为严重。

乐山地区革委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乐山的七八六一部队与西藏的零零四四部队换防时，大摆筵席迎送，地区革委会一些负责同志还带剧团到各县慰问演出。为了设宴欢送七八六一部队，事先派人选购特产和高级烟茶。宴会当天，各县革委会成员都出席相陪，从下午二时一直吃到晚上七点多。零零四四部队来乐山，也同样大摆筵席欢迎。这次欢迎、欢送活动从九月十二日开始，到十一月底止。地方上大办酒席，招待看戏，共花了一万二千六百元。七八六一部队除各团分别举行告别会外，师部在乐山举行了三次告别会，办酒席几十桌。结果，上行下效，该地区不少有支左人员的基层单位都设宴欢送。如乐山地区运输公司只有一个军代表，就办了五桌酒席欢送。

中央办公厅信访处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一九六九年第六十八期)

附件二：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柳州市搞非生产性建筑的调查报告

中 央：

我们接到中央办公厅“要彻查”柳州新建房屋的电话后，及时召开碰头会进行讨论，除决定派专人去柳州进行全面检查外，还将“要彻查”的电话通报全区，进行普遍检查。

经检查，柳州市近年来确实修建楼房七十多座。这些建筑多是六七年以来历年计划修建的工程。其中百分之九十（包括一小撮阶级敌人挑起武斗对被破坏的房屋）是为恢复生产、安排人民生活需要修建的厂房、商店、校舍和民宅等。但也确有少数单位滥用职权，挪用生产资金，挥霍国家资财，修盖楼、堂、馆、所等非生产性建设。柳州电机厂把自治区拨作该厂恢复生产资金三十一万元的百分之八十八，用于修建礼堂、厨房和宿舍。柳州铁路分局贪大求洋，将原车站站房推倒重建，并扩大建筑面积三倍多，为装饰门面，还派专人到上海购买五个大吊灯。致超过原计划三十余万元。柳州农械厂挪用生产资金七万三千元修建礼堂。市工人俱乐部乘修缮礼堂之机进行扩建，花了八万多元。

问题的发生，是一些领导成员沾染了地主资产阶级作风，摆阔气，讲排场，任意挥霍，违法乱纪。柳州电机厂革委会主任阎洪明，对生产上急需修建的车间、仓库不优先安排施工，却假借修建“厨房”、“食堂”为名上报预算，欺骗领导，兴建礼堂。柳铁分局革委会副主任林乐伦，在负责扩建站房工程中贪大求洋，力主推倒全部站房重建，在施工中，以向二十周年国庆献礼为名，要承建单位停止整党建党，突击施工，加大混凝土标号，增加模板等，多用了水泥五百吨，木材四百立方。局领导上虽事先发现，但不作纠正，迁就默认。柳州农械厂革委会主任束宽昌，对某些领导成员提出挪用生产资金修建礼堂的错误主张，明知不对，也不坚持原则。柳州市革委会缺乏全局观念，在战备形势下，对该市修建工程，不认真审查，从严控制，还支持了市工人俱乐部扩建礼堂的错误。

上述问题虽属少数单位，但性质是严重的。初步了解，其他一些地区一些单位也有类似现象。问题发生在下面，严重的责任在领导。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勤俭建国”，“要节约闹革命”的教导，宣传贯彻落实不够，对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抓得不力，看不清在大好形势下掩盖着的另一倾向。加之工作上官僚主义，对下面教育，督促检查不够，见事迟，抓得不力。

为了进一步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和“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教导，我们拟将柳州市一些单位修盖楼、堂、馆、所的严重错误，通报全区，立即在全区开展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狠抓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狠批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坚决杜绝铺张浪费的资产阶级坏作风。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通告

一、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顾文选，男，三十六岁，浙江省人，系反革命分子，北京市清河农场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周鸿东，男，三十七岁，辽宁省人，资本家出身，系反革命分子，北京市清河农场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

顾、周二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刑满就业后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并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后被引渡回国。

二、现行反革命叛国犯张继瑞，男，三十八岁，江西省人，北京工业学院教师。

张犯思想反动透顶，极端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携带我国重要政治、经济情报一千余份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张犯在国外期间，多次书写反革命信件、电文，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无耻吹捧帝、修、反，后被引渡回国。

三、现行反革命叛国犯田树云，男，三十三岁，北京市通县人，北京市挑补绣花厂医生。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孙秀珍，女，二十九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北京市挑补绣花厂医士，因盗窃被拘留过。

田、孙二犯思想极端反动，长期通奸，经常收听敌台广播，散布反动言论，并多次策划偷越国境，叛国投敌。自一九六七年以来，田、孙二犯合谋书写了大量反革命信，窃取我大量重要情报，先后在国际俱乐部、友谊商店等处，由田犯掩护孙犯将反革命信和情报投入外国驻华使馆汽车内十九次，恶毒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无耻吹捧帝、修、反，并向外国驻华使馆索要手枪、照相机和特务活动经费，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四、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梁志德，男，三十二岁，北京市顺义县人，系反革命分子。

梁犯思想反动透顶，一九六四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判刑，在被管制期间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于一九六五年又勾结反坏分子数人组成“中国民族主义爱国战线党”反革命集团，多次秘密集会，亲自拟定了反革命纲领、行动计划和发展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登记表，策划制造武器，组织反革命暴乱，并阴谋与帝、修、反挂钩联系，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梁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五、现行反革命犯朱章涛，男，四十八岁，江苏省人，资本家出身，曾当过伪县邮局副局长，系国民党员，右派分子，在北京市钢筋混凝土构件总厂水磨石厂监督劳动。

朱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收听敌台广播，大肆散布反动言论，多次书写反革命标语，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朱犯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陷害革命干部，经常向邻居儿童灌输反动思想，于一九六八年三月，采取金钱利诱和威胁等手段，多次唆使两名儿童书写反革命标语，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六、现行反革命犯王文满，男，二十三岁，北京市密云县人，富农出身，因散布反动言论被拘留过。其祖父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监毙，其父系反革命分子被判过刑，其母系富农分子畏罪自杀。

王犯思想反动透顶，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自一九六六年七月以来，王犯多次书写反革命传单，散发到北京火车站、国务院接

待站等公共场所，并多次疯狂地当众呼喊反革命口号，穷凶极恶地诽谤咒骂无产阶级司令部，无耻吹捧人民公敌蒋贼。王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七、现行反革命犯郭昌明，男，三十一岁，四川省人，北京钢铁学院助教。其父、兄均系资本家代理人。

郭犯思想反动透顶，自一九五九年以來，书写十万余字的反动文章、日记、诗词，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郭犯在押期间，借交待罪行之名，继续书写大量反动材料，恶毒攻击污蔑我党，无耻吹捧刘贼，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八、现行反革命犯周存厚，男，六十岁，北京市通县人，曾当过日伪保长、蒋匪自卫队大队长、常备队中队长。

周犯在一九四七年先后两次率领匪徒包围我熬硝营村、应寺村，抓捕杀害我区干部、群众二人。解放后，周犯顽固坚持与人民为敌，隐藏在地道内十四年，长期保存反动证件，书写大量反革命传单，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九、现行反革命杀人犯侯坤，男，五十二岁，北京市通县人，系反动资本家。

现行反革命杀人犯侯建民(侯坤之子)，男，二十三岁，北京市通县人。

反革命杀人犯侯坤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长期在其家埋藏铅二千余斤，并散布反动言论，向其子女灌输反动思想。侯犯为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唆使其子反革命杀人犯侯建民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六日夜，将其家中八口人全部砍杀和威逼跳井、跳水坑致死。

十、现行反革命杀人犯陈诚，男，四十四岁，北京市顺义县人，原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治保主任，曾当过伪军。

现行反革命杀人犯王梦令，男，七十五岁，北京市顺义县人，系地主分子。

陈犯思想极端反动，利用职权欺压群众，偷盗集体财产，投机倒把，瞒产私分，被贫农社员刘贤揭发，即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王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对在其家当过长工的刘贤多次陷害未逞。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陈、王二犯狼狈为奸，陈犯密谋策动王犯捏造假材料，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王犯在陈犯召集的所谓“对敌斗争大会”上猖狂地进行反攻倒算，陈犯指挥王东成(在押)等人，将刘打昏，又指使四类分子将刘贤活活拖死。

十一、现行反革命杀人犯杨明遐，男，二十二岁，浙江省人，北京市六十五中学生。其母系国民党员。

杨犯思想极端反动，一九六六年三月书写、张贴反动文章，受到批判后，蓄谋杀人。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晨，杨犯持菜刀闯入邻居经君健屋内，将经的岳母李瑞范(五十一岁)、女儿经伟(二岁)砍死。

十二、现行反革命杀人犯刘季人，男，三十五岁，河北省人，地主兼资本家出身，原系西城区文化馆联合党支部书记，其母系地主分子被遣送原籍。

刘犯思想极端反动，因受到批判和其母被遣送原籍，怀恨在心，蓄意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将其子刘禹(六岁)、刘文(一岁半)带到朝阳区立水桥西大坝处活活掐死。

十三、现行反革命杀人犯刘树珍，女，四十七岁，河北省人，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其前夫因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刑。

刘犯思想极端反动，经常偷听敌台广播，大肆散布反动言论，并扬言要杀害我国家干部，为其反革命丈夫报仇。刘犯罪行被其女高俊铃(二十四岁，医生)揭发后，即怀恨在心，蓄谋将高杀害。于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刘犯闯入右安门卫生所，乘高给病人看病不备之机，用菜刀向高的头部猛砍数刀，造成重残。

十四、现行反革命放火犯张佩亭，男，六十八岁，河北省人，系反动资本家，曾当过伪保长，住北京市东城区。其三个儿子都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

张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张犯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放火烧东单国药门市部和该部库房及其居住的楼房，在革命群众救火时，张犯疯狂地呼喊反革命口号，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十五、历史反革命杀人犯王林，男，五十二岁，北京市平谷县人，系地主分子，蒋匪还乡团团长。其父因反革命罪被判刑。

王犯于一九四六年土改时随父逃到平谷县蒋匪统治区，充当还乡团团长。自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七年四月，王犯带领匪徒多次到龙家务村、贤王庄、杜辛庄、鹿角村、东古庄、马格庄等地烧杀抢掠，亲手和指挥匪徒杀害我干部、民兵、群众十五人。解放后王犯畏罪潜逃，于一九六五年二月被抓获归案。

十六、历史反革命杀人犯杨贤，男，六十五岁，北京市房山县人，系历史反革命分子，曾先后充当日伪警备队大队长、蒋匪保安团中队长、还乡团中队长。

杨犯于一九四六年带领匪徒先后到米粮屯村、豆各庄村、马家坟村等地烧杀抢掠，亲自指使匪徒杀害我区干部、村干部和革命群众七名。解放后，杨犯畏罪潜逃，于一九六六年被查获归案。

十七、强奸杀人犯殷凤西，男，二十七岁，北京市顺义县人。

殷犯强奸其三嫂张玉华（二十六岁）未逞，怕其罪行被揭露，即蓄意杀人灭口。一九六八年六月九日，殷犯持菜刀将张玉华砍死。

十八、杀人犯韩仲才，男，二十九岁，北京市怀柔县人，原系公社亦工亦农干部。

杀人犯齐桂兰，女，四十六岁，北京市怀柔县人。

韩、齐二犯流氓成性，长期通奸。韩犯为霸占齐犯女儿，齐犯为长期与韩犯姘居，二犯多次密谋杀害齐犯之夫程瑞林。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夜，韩、齐二犯用毒药将程瑞林毒昏后掐死。

十九、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

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装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二十、现行反革命犯金有钟，男，五十二岁，河北省人，资本家出身，旧职员成份，北京市被服厂杂工，因贪污罪被判过刑。

金犯思想极端反动，自一九五四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三面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金犯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猖狂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并网罗牛鬼蛇神进行翻案，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二十一、现行反革命犯佟学瀛，男，三十六岁，北京市人，西四邮局投递员。

佟犯思想极端反动，于一九六七年五月至十二月，先后书写、投寄反革命匿名信六封，穷凶极恶地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无耻

吹捧蒋贼；在给蒋贼的信中要求参加匪党和蒋匪“青年救国团”，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二十二、现行反革命犯傅晓平，男，五十一岁，山东省人，系蒋匪军上尉军官，住北京市东城区，因反革命罪被判刑二次。

傅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猖狂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自一九六七年以来，傅犯纠集赵俊龙（已戴反革命帽子监督劳动）等多人策划组织“抗暴同盟”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宣传，阴谋搞反革命武装暴乱，与蒋匪联系，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

二十三、现行反革命犯马福昌，男，四十三岁，吉林省人，小业主出身，北京钢铁学院图书馆职员，曾当过蒋匪兵。

马犯思想极端反动，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马犯书写、投寄反革命匿名信四十余封，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地、富、反、坏、右鸣冤叫屈，无耻吹捧人民公敌蒋贼，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二十四、现行反革命犯汪寄忠，男，二十六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北京市八达岭林场工人。

汪犯思想极端反动，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自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六七年四月，汪犯书写、投寄反革命匿名信十余封，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无耻吹捧帝、修、反。汪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二十五、现行反革命犯宋金良，男，二十六岁，北京市人，丰台区桥梁厂工人。

宋犯思想极端反动，于一九六七年夏，勾结张俊国（已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组成“中国革命党”反革命组织，书写、油印反革命传单三百余份，散发到反帝医院门前，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宋犯在押期间，继续散布反动言论，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二十六、现行反革命叛国犯于文生，男，二十四岁，北京市通县人，富农出身。

于犯思想反动透顶，极端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曾在一九六二年偷越国境叛国投敌未逞。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于犯又偷越国境，被我抓获。于犯在押期间，公开书写反动诗词，散布反动言论，并煽动在押犯偷盗枪支、叛国投敌。

二十七、现行反革命叛国犯董玉昆，男，二十三岁，北京市昌平县人，富农出身。其父系反动富农分子、伪保长。

董犯思想极端反动，书写反动日记，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董犯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一九六八年六月九日，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后被引渡回国。

二十八、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段鼎，男，二十七岁，辽宁省人，旧职员出身，住北京市东城区。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陈继曾，男，二十六岁，河北省人，旧职员出身，北京市天堂河农场职工，因偷窃被拘留过。

段、陈二犯思想极端反动，经常伙同段犯之弟段铎(现在押)偷听敌台广播，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一九六四年以来，段、陈二犯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在段犯的策划下，段犯与其弟段铎和陈犯偷越国境，叛国投敌。陈犯和段铎越境叛国，后被引渡回国；段犯因不会游泳而返回。段犯返京后继续策划叛国投敌。

二十九、现行反革命叛国犯张郎郎，男，二十六岁，辽宁省人，中央美术学院学生。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周七月，男，二十二岁，河北省人，北京外国语学校学生。

张、周二犯思想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为仇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张、周二犯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并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一九六六年二月，张、周二犯与外国驻华使馆人员取得了联系，出卖了我国大量重要军事、政治、经济情报。

三十、现行反革命集团骨干何锁福，男，四十四岁，江苏省人，系逃亡地主分子，建材部安装公司工人。

现行反革命集团骨干赵钰，男，三十二岁，山东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在北京市天堂河农场强制劳动。

何、赵二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六六年，何、赵二犯伙同首犯刘镇江（已判死刑）组成“国民党党政军警张家口联络总处”、“国民党京绥张家口检查总站”反革命集团。何、赵二犯分别充当“总处副处长”和“总站副站长”，积极发展反革命集团成员，散布大量反动言论，妄图配合帝、修、反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三十一、现行反革命犯胡宗憲，男，四十二岁，北京市人，伪官吏出身，因书写投寄反革命信被劳动教养过。

胡犯思想极端反动，在劳动教养期间书写、投寄反革命信件，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胡犯为达到投靠蒋匪帮之目的，私刻公章，伪造证件，并盗窃了现款和其它财物（价值二百余元）做路费，于一九六九年五月，逃至中缅边界被我抓获。

三十二、现行反革命犯胡天旺，男，三十岁，北京市房山县人，伪官吏出身，因盗窃罪被判刑二次。

胡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刑满释放后，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书写大量反革命标语，穷凶极恶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自一九六五年以来，先后盗窃和骗取粮食六百余斤，现款三百余元。

三十三、现行反革命犯龚福臣，男，七十四岁，北京市顺义县人，系一贯道徒，东城区金生饭馆职工。其弟因反革命罪被我镇压。

龚犯思想反动透顶，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龚犯猖狂地进行反革命破坏，于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间多次穷凶极恶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三十四、现行反革命犯金世珍，男，五十一岁，北京市人，无业，因反革命、赌博罪被判刑和劳动教养。

金犯思想极端反动，自一九六六年以来，纠集流氓小偷十余人，偷听敌台广播，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指挥流氓小偷进行盗窃，坐地吃赃现款八十余元，怀表一块；指使流氓扎伤一人。

三十五、现行反革命、流氓犯刘勇，男，二十八岁，北京市人，旧职员出身，宣武区立新誊印厂临时工，曾因流氓、偷窃被劳动教养。

刘犯思想极端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自一九六六年以來，刘犯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网罗坏人疯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先后强奸妇女二人，采取利诱手段奸污妇女多名。刘犯在押期间，继续散布反动言论，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三十六、现行反革命杀人犯陈荣山，男，五十八岁，北京市海淀区人，系伪警长。

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散布反动言论，书写反革命标语，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陈犯对揭发其罪行的白季龙、傅群二人怀恨在心，于一九六九年一月八日，用铁铣向白、傅二人头部各猛击数下，致二人受重伤。

三十七、现行反革命犯朱琦，男，二十三岁，北京市人，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第四小学教员。其祖父系恶霸地主分子。

朱犯思想极端反动，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经常偷听敌台广播，散布反动言论。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朱犯在学校公开书写长达一千余字的反革命传单，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朱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三十八、现行反革命犯尉呈祥，男，五十二岁，吉林省人，系恶霸地主、历史反革命分子，在北京市东城区帆布制品加工厂监督劳动。

尉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疯狂地当众呼喊反革命口号，无耻吹捧国民党反动派和人民公敌蒋贼。尉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三十九、现行反革命犯闻佳，女，二十岁，四川省人，地主出身，师大女附中学生。其父系恶霸地主被我镇压。

闻犯思想极端反动，自一九六八年以来，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闻犯在押期间，继续散布反动言论，书写反革命标语，疯狂地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无耻吹捧蒋匪、刘贼。

四十、现行反革命、流氓犯刘元，男，五十二岁，北京市宣武区人，伪职员成份，无业。

刘犯思想极端反动，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自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五年，刘犯唆使其两个儿子盗窃大量财物，供其挥霍；多次强奸幼女一名。

四十一、现行反革命犯张金良，男，三十六岁，河北省人，北京人民印刷厂工人。

张犯思想极端反动，一九五八年因散布反动言论，受过批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张犯经常偷听敌台广播，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书写了长达千余字的反革命传单六份，分别投寄给石景山发电厂、北京国棉一厂等四个单位，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四十二、现行反革命、流氓犯周明奎，男，五十二岁，山东省人，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工人。

周犯思想极端反动，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用极其恶毒、下流的语言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自一九六六年以来，周犯多次奸污少女一名。

四十三、现行反革命犯张占林，男，三十二岁，北京市人，新都暖气机械厂劳改就业人员，曾因抢夺枪支、流氓、偷窃被判刑和劳动教养。

张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一九六五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反革命标语，呼喊反革命口号，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并无耻吹捧帝、修、反，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四十四、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马捷声，男，二十四岁，山西省人，伪职员出身，北京市西郊农场工人，因反革命罪被拘留过。其父系军统特务被判刑监毙。

马犯思想极端反动，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马犯于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晚偷越国境时被我抓获。

四十五、现行反革命犯王治富，男，四十一岁，北京市海淀区人，系坏分子。

王犯思想极端反动，从一九六六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王犯在押期间，继续散布反动言论，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四十六、现行反革命，盗窃犯卢书敏，男，二十六岁，河北省人，地主出身，住北京市房山县，因盗窃被拘留过。其父系地主分子。

卢犯思想极端反动，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卢犯从一九六七年以来，猖狂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伙同盗窃和投机倒把分子十余人，先后在北京、天津、沈阳、大连等地盗窃电动机二台，自行车两辆，电线一千余米，铁丝三百余斤，水管、铁棍、铁板一千余斤，紧线器二个，电话机和电缆等大量物资（价值二千余元）。

四十七、现行反革命叛国犯薛新平，男，二十四岁，山东省人，国际关系学院学生。

薛犯思想反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偷听敌台广播，散布反动言论，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并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三日，薛犯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后被引渡回国。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

1970. 05. 29；中发 [1970]34 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斗、批、改的群众运动正在深入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焕发出来的亿万人民的冲天干劲，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推动着生产建设的新高涨。今年以来，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和铁路货运量大幅度的增长，基本建设重点工程进展很快，农业战线上夺取丰收的斗争热火朝天展开。全国范围内，一个加强战备，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农业生产新高潮，正在蓬勃兴起。革命和生产形势一派大好。在新的大好形势下，必须进一步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充分发动群众，坚决地依靠工人阶级，大抓增产，狠抓节约，更好地适应各方面需要的不断增长，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当前，生产建设上增产节约的潜力是很大的。不少企业劳动效率和设备能力还可以大大发挥，生产消耗和产品成本还可以大大降低，库存积压物资还可以充分利用。只要我们坚决克服“生产到顶”，“潜力挖尽”的保守思想，千方百计动脑筋，想办法，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就一定能够把生产建设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是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还是因循守旧，铺张浪费，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关系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必须进一步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各级党组织、革命委员会，军管会和军代表，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切实加强对增产节约工作的领导。

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深入持久的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的具体要求是：

一、努力增加生产。充分发动群众，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挖掘潜力，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生产能力，增产钢铁、煤炭、电力、石油、木材和轻工产品，增产急需的品种。大搞技术革新，推广先进经验，采用和发展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材料。

二、基本建设工程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建成一批，投产一批，尽快形成生产能力。开展设计革命，实行现场设计，坚持工人参加设计，审查设计。坚决同“贪大求洋”，铺张浪费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提倡“干打垒”精神，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降低造价，节约投资。

三、大搞综合利用。“综合利用大有文章可做。”要打破行业界限，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搞好社会主义协作。一切有条件的企业，都要做到一业为主，综合利用，多种经营，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

四、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十分节省地使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坚决同无政府主义和劳动纪律松弛的现象作斗争。坚持业余闹革命。消除窝工浪费现象，提高工时利用率。注意安全生产，爱护国家财产。严格禁止滥用农村劳动力。

五、大力降低消耗定额。一切企业都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降低燃料、电力和主要原料、材料的消耗定额，创造新记录，今年上半年内，必须把炼铁用焦和发电、机车用煤，降到本企业的历史最低定额，进而创造新的先进水平。还要大抓生活用煤节约。

六、提高运输效率。加快车、船装卸速度，提高车、船正点率，缩短周转时间，防止交通事故。开展铁路、水路、公路联合运输。

七、提高产品质量。产品不合格是最大的浪费。要克服那种片面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错误倾向。在生产中要严格遵守合理的工艺操作规程，健全产品质量检验和验收制度。对于造成严重损失的产品质量事故，要进行追查，并分别不同情况，予以严肃处理。

八、改善经营管理。要动员群众，参加管理，实行监督，加强经济核算，降低成本。在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的时候，要通过群众充分酝酿，充分商量，一切经过试验，逐步推广，不要把合理的规章制度也破了。

九、大抓清查仓库，注意修旧利废，加工改制，节约代用。充分挖掘和利用库存材料设备，大力回收废钢铁。清查出来的库存物资，要统一调配，允许地方在计划中优先使用。

十、上述各点，主要是讲的工业战线，其精神同样适用于农业，财贸和其他各条战线。农业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大抓农田基本建设，大抓田间管理，做好防旱，抗涝工作，争取更大丰收。必须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提倡节约用粮，增加积累和粮食储备。财贸战线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方针，促进城乡交流，加速商品流转，提高服务质量，减少损耗，降低费用。必须严格财政金融纪律，抓紧收入，节约支出，堵塞漏洞，反对贪污浪费。

最近中央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今年内发出第三号、第五号、第六号等重要指示。这些指示都是非常及时的和十分必要的。各地区还有不少地方性的工作。任务很多，很繁重。而各地区、各部门具体情况各有不同，斗、批、改的进度不一，工作发展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央所发的指示，要与各自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正确地贯彻执行。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各级领导同志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领导方法的指示，按照各自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加强各级党的领导，多做调查研究，多同群众商量，统筹规划，全面安排，抓住当前最主要的中心环节，带动各项工作，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且坚持贯彻执行下去，

踏踏实实把工作做好。任务越多，越繁重，越艰巨，越要发扬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共产党员越要发扬模范作用，讲求领导艺术，把领导工作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方针，是经常性的长期任务。中央相信，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决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定能够在经济战线上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此件发至县、团级）（根据中央文件原件翻印）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王新刘建勋在河南省各地市领导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王新同志讲话

我们要以批修为纲，狠抓阶级斗争，抓紧“一打三反”运动。

“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当前进展情况不同。“一打三反”，城市工厂多数搞了，有些单位过去领导核心不好，盖子揭得不够；农村是结合整党进行的，有些大队的盖子揭了，有些大队盖子没揭。要进一步抓紧这项工作。当前，在几个城市。结合“一打三反”，进行了深挖隐藏的反革命，深挖特务、间谍和清查“五·一六”的工作。要进行“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罪行的教育，在教育的基础上，要发动群众搞。群众揭发要背靠背，小字报。郑州市有些单位揭得比较深，现在要注意核实材料。要把群众性的揭发和专案调查结合起来。特别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把反党乱军、阴谋搞反革命的分子和有“五·一六”罪行的分子，同极“左”思潮相区别，同一般的打砸抢，同被“五·一六”利用的相区别。不要把后者都当成“五·一六”去清，不然就会造成扩大化。但也要防止“一风吹”，对一些较大的问题，都要进一步查清。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过细，要搞准，要实事求是。比如我们省里，有的地方一下子抢那么多的枪，要搞清是什么人在背后支持，这个阴谋怎么搞起来的。这里面真正的坏人是极少数，他不一定公开出面，多数人是受骗的。所以不能把抢过枪的群众，都按“五·一六”对待。总而言之，要按照中央指示去办，要打得稳、准、狠，要

执行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的方针。凡公开批判的，材料要落实，先批判罪行，领导上暂不要给定性质。千万不要把一般的材料和没有核对的材料当成定性质的依据，领导上要严格把关。

对已经查清的重大案件，目前可以搞革命大批判，关于杀、关、管的处理，省公安会议以后再实施。

机关“一打三反”和整党建党，不能忽视，

当前，在我们省有些地方突出的有两股歪风，一个是说假话，一个是打人骂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作风，而是剥削阶级的恶劣品质，一定要严肃对待，坚决刹住。讲假话，虚报成绩，隐瞒错误，这完全是造谣言，搞欺骗！打人骂人，是国民党的作风，是军阀主义残余，对待我们阶级兄弟，为什么那么恨？自己到底站在何种立场上？！我们有些干部，因为官僚主义，对情况不清楚，或者因为认识水平低，对某一件事物没有能够反映它的客观实际，反映不那么正确，这不是说假话，这是个认识问题。反映客观实际只能是近似的，事物有个发展过程，人的认识也有个发展的过程。但是故意把假说成真，把无说成有，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就是骗子。这种歪风要搞臭，对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要严肃处理。

下面说假话，有的是同领导作风不民主有很大关系。如果我们领导同志，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一听不符合自己的口味，就训人家。他就得出了经验，你不让他讲真话，于是就投你所好，看你眼色行事。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民主作风。有不同的意见允许讲，讲得不对再帮助纠正。别人给你提意见提错了，可以解释，但不准打击报复，不准打人骂人。今后对打人骂人的，打击报复的，要坚决反对，坚决制止，严加处理。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群众有缺点，有错误，只能说服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打骂，打人是犯法行为。

刘建勋同志讲话

关于作风问题。中央三号文件中所举的不正之风的表现，在我们许多同志身上，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我们也有骄傲自满，要认真克服。当前，我们特别要把打人骂人、打击报复和讲假话、搞浮夸的歪风刹住。我们有些人头脑膨胀，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是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不负责任的表现。过去有过这样的教训，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却忘记了这个教训，

这是很不应该的。我们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要讲。讲假话不是革命干劲的表现，而是资产阶级的恶劣品质的反映。再就是一定要有民主的作风，要造成浓厚的民主空气。这个问题，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精辟论述，请同志们认真学习。我们的干部，如果丢掉了民主作风，就丢掉了群众；而离开了群众，将一事无成。党章规定，我们共产党员有事要同群众商量。可是我们有少数同志，却是听不得不同意见，人家给他提了意见，就要同人家记一辈子成见，还要“斗争到底”，甚至搞打击报复，打骂群众，这是不能允许的。今后，对上述两种恶劣行为，都要严格处理。

关于“一打三反”运动中经济退赔问题。省里已经转发了安阳地区的一个文件，目前还不够完善，你们试行中遇到的新问题和解决意见，报来我们研究，经过几次试行修改，逐步就完善了。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政策问题要求太死了不行，不能搞一刀切，有个大体的原则界限，你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研究处理办法。对人的处理，要取慎重态度。定敌我矛盾的，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的，一定要掌握好，把好关。落实好材料。

来源：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一九七一年四月五日印发（共印 2500 份）。

二、研究资料

《脚印——宜宾文革造反派领袖谢英富回忆录》摘录

黑牢里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外面的阳光特别吝啬，总不肯照进这个阴暗的角落，潮湿腐烂的气味，笼罩着这几平方米的石砌牢房。外面关的小偷扒手不是吹嘘“手艺”，就是讲如何享受吃和色，没得吹了就逮虱子混光阴。我一个人在里面听到的、看到的都是恶心事。而且，我自关进去后就无人过问了，好象是人间消失了样。三十来天独守“空房”呀，无聊至极。他们真的把我遗忘了？不可能！别人处心积虑地找我的岔，能轻易放过我么？

经过月余的精心策划（不知他们耗费了多少人力财力），八方收集，编造、罗织罪名，一台精彩绝伦的好戏开场了：

一九七〇年十月底的一天早晨，天气晴朗，早早地公安就给我送饭来了，与往常不同，一个馒头一碗稀饭，外加几片咸菜。我正想今天怎么对我这样好？送饭的公安就发话了，叫我赶紧吃，吃完后将我私人的东西收拾好。我边吃饭边想，既然叫收拾东西，说明这个黑牢我不坐了，但不会放我回家的，他们费了那么大的心血来对付我（从北京学习班开始），决不只是关我个把月了事了的，唯一只有抱定逆来顺受的思想准备，看他们到底要搞啥子名堂。

吃过饭不到十分钟，一队解放军全副武装地进到公安局的坝子里，门外的嘈杂声也越来越大。在一个军官（军管会的）的命令下，公安才将两重门锁打开，叫我只身徒手出来。我走出来一看是“市中队”的解放军，领队的是原市中队的司务长李某某（是在我进京学习期间被提升为中队长的）。我问他是带手铐还是要捆？他露出很难为情的样子，叫我上车坐下就是。公安局大门外停着一部大货车，我向货车走去。

突然听到我最熟悉的声音在喊我，我急忙打量四周，寻找分别近年的妻子，我朋友的妻子李淑芬接着喊：

“谢英富，你爱人和娃儿都来看你来了。”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了泪流满面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差点我的眼泪就要流出来了。但我不能哭，硬着心肠叫她们回去，带好我们的儿女，不要管我。

上街一看，到处都牵有横幅——“打倒反革命分子谢英富”——贴着标语。看来他们太抬举我了，为我一个人兴师动众，召开万人大会来公捕我。捕就捕吗，有什么了不起。趁时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到晴朗的天空，蓝蓝的，真美呀，心中在想，要能自由地飞翔该有多好啊！

“将反革命分子谢英富揪出来！”随着这声吆喝，一个兵抓我一只手，我被弄来站在台下后，听到台子上宣布：由城区公社系统的工农兵医院的徐文都上台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谢英富的滔天罪行。隔了好一会（冷场），才听到徐文都发言。原来他是上台后竟当众在向当时宜宾的当权者作严正声明：稿纸是你们事先写好硬要我上来念的，我是党员，只有组织服从，但不是我对谢英富的揭发控诉，今后概不负责。这可是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奇闻吧？！哪有揭发控诉罪犯的人不仅不愤怒，反而当众声明他是被逼上台扮演揭发控诉人的，也许这场闹剧的编撰和导演做梦都没有想到的负面效果吧？！

徐文都发言后，就宣布对我的“逮捕”。解放军给我带上手铐，押到台子底下坐着。我刚被押进台子底下，外面就开始念“逮捕通告”，即给我编造的“十大罪状”，并发至全川张贴公示。此时，天色突变，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将参加万人大会的人群淋得铺山的跑，我在台子底下差点大哭狂呼“老天有眼啊”！心想，连老天爷都知道我冤枉啊，真是应了“天怒人怨”的老话了。原来听说过《窦娥冤》，老天爷为抱不平发怒，夏日六月竟飞大雪示愤。难道今天能是“巧合”？深秋近冬的天气下雪没什么惊奇，可瓢泼大雨的景象则不多见了，而且，早不落，迟不落，叫把我押下去，进入淋不到雨的台子底下就大雨倾盆，人世间的事就有那么怪，不然为啥这泼大雨把会场冲散后，一会就雨过天晴了呢？过了若干若干年，至今我都没想通“公捕”我时出现的天象（也许冥冥中……）。万人公捕大会“胜利”结束了，在押我进宜宾市看守所的途中，看到满街被雨淋得稀烂的横幅和标语，心里真不是滋味，老天爷也太不给人家的面子了。

一进看守所就见到我的老对头，红色派“政法兵团”的头头王明（对立派的一个头目，看守所所长）。他一见我就阴阳怪气、皮笑肉不笑地说：

“谢司令，没想到吧？我们又见面了啊，可惜在这种地方见面，真是难为你了。”

我深知此人仗势有点文化，做事说话都很刻薄，人到矮檐下了，你能把他怎样？要依我以前的脾气，我肯定会回他一句“龙游浅水”什么的来反唇相讥他的，现在，则只有忍气吞声算了，不搭理他是最好的无声抗议。他见我不理睬他，一下子他的幽默感也没了。

我被关进了“东三仓”。里面先就有七、八个人，一进门就闻到一股屎尿味，我没理睬原来关的人些，对直就走到最里面的角落，倒头就睡。听到有人发音了：这人（指我）咋个不懂规矩，一进来就跑到里面去睡了，喊他出来挨着甑子（即便桶的俗称）睡。另有两人（可能其中一人是仓头）叫发音那人少屁话，叫其他的人不要惹我，说我是造反派的大头头，原来还管过“群专”，对进闷子（这是黑话，泛指关押人的地方）的人比较讲理，不乱打人的。我仍闭眼憨睡，根本不理睬他们。人就是这样，没被定性前心里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加之恶劣环境，再困也睡不着，一旦被定性了，心里反倒平静不少，毕竟知道人家要用什么罪名来整你了，既来之则安之，干脆好好睡一觉再说。

不知睡了多久，正在云里雾里酣睡，突然有人在推我，说叫我出去。我翻身起来，看见牢门大开，任某某（也是红色派的公安人员）横眉恨眼地吼到：“30号出来！”（那时进了监牢的人，不仅失去自由，就连姓氏名谁都失去了，又号码来代替）

一时我还没弄清楚他在喊谁，坐着望着他。他用手指着我吼到：“喊你出来，听不到呀！”

这下我明白了，“30号”就是我，他在喊我出去。于是我穿好鞋，几步就往外跨，突然牢门迎面向我砸来，好在我反应得快，两步避开，不然脸部或脚就要被砸伤或夹住，这可比以前传说中的“杀威棒”还厉害，根本就不把人当人对待，我也没好气地吼到：“做得那么凶干啥子！”

“进出仓门要喊报告你都记不到啊？这是什么地方？不是茶房酒店，你给我弄清楚点，哼，你还那么嚣张，我看你还嚣张得到好久。”他边说边又把门打开，叫我出去。

在看守所办公室对面的一间提讯室里，又遇到一个对头罗由海（也是对立派的）。他一副严酷的面孔怒视着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性别，年龄，民族？”

“谢英富，男，30岁，汉族。”我一一作答，他也逐项在记。

“你知道你犯的是什么罪？”他又问。

“我就是还没搞清楚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逮捕通告上指的那么多罪，你还敢说没搞清楚到底犯了什么罪，看来你是要顽抗到底喽，我现在告诉你，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从前那些派头给我吓倒（收拾的意思），你的罪行严重得很，为啥子要开那么大的会来公捕你？你是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你只有老实交代，低头认罪，可能还保得住命，否则只有死路一条。我是专门办你案子的，是受军管会指派来办案的，你要搞清楚。进了看守所，就得好好反省自己的罪行，办案人员来提讯你，就得如实交代，不能像你刚才那种态度，连犯什么罪都说搞不清楚，你确实嚣张（可能任启富把刚才我与他对吼的情况告诉了他），还以为你是司令、常委？老实告诉你，你是罪犯。你不要认为不交代就定不了你的罪，我明确告诉你，你不交代，没有口供我们照样要重判你，我们可以认定，懂不懂？就是不一定要你承认，我们认

为有就是有。今天看来你的态度还没端正，先要把你的态度整端正再说。下去好好想想，过了此店无好酒，过了此渡无好舟哟。”（看来他的诗性发了）审讯序幕就此拉开。

回到“仓”里不少人问我挨打没有？我说他们敢吗！（其实他们有什么不敢，好戏还在后面呢）有人给我说，刚才来提我那个叫任干事（其实我连他的名字都早知道）恶得很，千万别惹他，其实他是个监内管伙食的，他来提人要特别注意，谨防手脚被铁门夹伤。他们七嘴八舌地说个没完，都表现出一种关心我的样子，俗话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说他们的，听不听由我，反正不伤害别人就是了。

第二天就弄我回城区公社系统去批斗，这次押送我的兵动真格的了，用绳子捆得我像五月间的粽子，痛得我钻心透骨，不一会手就肿起很高。事情到了这一步有啥办法呢？只有咬紧牙关硬撑着。至于批判斗争我些什么，一概不知道，随便人家说去好喽。一声“打倒反革命分子谢英富的嚣张气焰！”把我从恍惚中唤醒，啊！原来是在打我的嚣张气焰，看来他们配合得还可以吗。

最大的一次批斗会是在宜宾市川剧院开的，由于捆得太紧（前次捆破皮的地方再经绳子一勒，就伤上加伤了），痛得我尿都快流出来了，到了川剧院实在憋不住了，只好向押我的兵哥讲，我的尿憋不住了。有个战士向另一个战士说让我去解手好了。可另那位战士都不准我小便，我硬是憋不住了，再向他们说明，再不让我解手，尿就要流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先同意我解手的战士才带我到厕所门外，将两手交叉处的绳子解开让我去小便。由于手被捆得麻木了，行动很不方便，差点尿就真的洒在裤子上了。解完小便那个战士又用绳子捆我，另外那个战士嫌他捆得不紧，他就来捆。他真下得了手，绳子在我手上勒了又勒，交叉好后还用肩顶着我两手往上抬（紧绳子），直将我手提到后颈窝下为止，痛得我钻筋透骨极难忍受，真恨不得地下有条缝让我钻进去。特别是绳子解开后又捆，血液刚流通又阻断是最难受的，那个痛比死还凶，要不考虑到“不明不白”，我真想一头碰死了事，免得受这些活罪。更可恼的是他边捆边骂“老子看你有多嚣张”。解放后从我当儿童团长起，看到的镇反、肃毒杀人不少，就是对执行死刑的犯人，也没有这么狠心对待的，这肯定又是罗某某造的孽，我和这个军人无冤无仇，他真会那样恨我？天才晓得。

所谓批斗，都是些不伦不类的东西，甚至有人将社会上江湖艺人编唱的“百子歌”拿到批斗会上批斗我。该人是我原公社革委的一个办事员，为表示他与我划清了界限，竟搜肠刮肚，无中生有地编造“百子歌”来批判我，尽管他搞笑了会场，由于“反戈”有功，他竟从一个不学无术之人提升为某单位的领导（不少饱学医务工作者骂此人是靠假文凭当官的）。他编的歌词大意是：头戴瓜皮帽子，身穿绸马褂子，架副墨眼镜子，杵根文明棍子，腰上插支盒子（枪）……惹得全场大笑，连我听了都差点笑出声来。这哪是在揭发批判，明摆着是在折磨我的肉体。凡后，只要审讯我不承认或顶撞了他们，第二天肯定挨捆出去批斗或游街。而且每次游街我总是被捆来站在第一辆车的车头方，简直成了游街的领衔人物。

“一打三反”运动一开展，罗由海更加紧了对我的审讯，内容几乎概括了社会谣传的一切，什么盗卖军筏呀，枪杀人命呀，贪污浪费呀，强奸杀胎呀等等等等，“通告”上十大罪状罗织的“罪名”翻来覆去的逼我承认，目的就是要把我造成一个青面獠牙、血盆大口、杀人不眨眼的十恶不赦的魔王，进而需株之的反革命。我就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实事求是”会被某些蛀虫们毁灭掉。

“盗卖军筏”，这本是我在追查的事件，怎么会反扣到我头上了呢？1968年底（或 69 年初），我城区公社水运队承接了涪陵某军工厂木材的水运业务，即将原木扎成筏子从水道放运，由刘某某负责承运。在运途中由于晚上停航打扑克消闲，刘某某与组员李某某结了怨，当木筏快到涪陵时，被“红贸军”（涪陵一派群众组织）劫持，说木筏由他们接收了（因当地武斗，他们都带有枪来劫持）。工人们找他们讲理，说明我方要将木材运交到厂方返回单位才能结算工资，否则脱不了手。结果“红贸军”打了张收条（盖有大红印），发了点路费叫工人返回宜宾。这些交涉均由刘某某出面办理的，对方有枪有炮，又是武斗非常时期，刘当时也只好同意。回宜后，李某某为报复刘某，就造谣说是刘某某盗卖军筏。我知道后即到水运队调查，为慎重起见，我还亲自找李某某调查了解，包括全组放筏到涪陵的工人。调查证实确系李某某因输了钱（打扑克牌）还遭刘的奚落，为报复编造的“故事”。我只说了李某，私人恩怨不能乱造谣言报复。为此，又得罪了李某。在别有用心人的唆使下，他就到市里到处告状，进而说我是刘某某的后台，袒护了刘某某。此时正值市革委人保组有人要找我的岔，竟以人保组的名义直接插手此事，名义是办“学习班”审查此事，实际就是隔离逼供。当时革委

就有人提醒我，这中间有阴谋，有人想加害我。心中没鬼，我根本不怕，有红贸军的收缴证据，事实胜于雄辩，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去挖空心思好了。故我根本不理睬，把人些交给人保组审查了事。没想到现在要变成我的罪行，真是岂有此理。

“枪杀人命”，在《蹉跎》章节已详述，这里不再重复。

“强奸杀胎”更为离奇。重庆有一大学女生，因参加“反到底”（重庆最大的一派群众组织），被对立派抓去关时，遭看守强奸怀孕，眼看要毕业分配了，若校方发现不仅不予分配，还有被学校开除的危险。为此，她在重庆引产不成（因那时引产得单位开介绍信证明原由方可引产），到内江医院同样因无证明遭拒。正在她走投无路准备自杀时，护她同行的妹妹找到重庆反到底的头黄廉求救，老黄了解情况就叫她姐妹俩同他一起到宜宾想办法。因为我与老黄关系很好，听了他的介绍我也同情那个女生，于是我找我下属医院革委设法解决。“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医院革委听我讲明情况后，决定免费为其引产，为某某同学解了大危。哪有我做好事反成罪过之理？咄咄怪事。

“贪污”更为可怕。那时候的人对贪污二字是讳莫如深的，哪怕是贪污几十元都不得了。我在八八团时，曾到市委工人接待站领有六百元钱的活动经费，用来买纸墨笔等文革用品开销，实际开支超出过大，一时没地方报帐，故票据全保存在我家里（因我垫了几百元进去），叫罗干事到我家去取来对质他又不干，这就是贪污罪行？

总之，他们是尽量在搜查旮旯角里对他们有利的东西，置我于死地是他们的宗旨。特别是要借助死刑权力下放到地方（不再经中央部门批准）的有利时机除掉我。后据政法部门内部田某某曾某某等人对我透露，宜宾曾两次向省报批我的死刑，即一九七一年借“一打三反”之势，一九七二年借镇压“五一六”分子之机，皆因省党领导小组组长、省革委主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解放西藏的名将领、十八军军长）不同意而未遂。

那时的犯人被判死刑事先不得告知，要到判处（执行）那天在会场上宣布才知道确切生死命运。不过事先也有迹象，那就是先被叫出去，捆得最凶、大扎加小扎绊锁喉绳的，甚至打倒在地上捆的，基本都是死刑。故到开公判大会那天，全监狱的气氛特别紧张。有两次公判大会前晚才抓进监的人就议论过：明天要枪

毙谢某某了(这是因为全城头天晚上都会嘈动，连我家里听到消息都作好了收尸准备)。

我也深知，他们下那么大的工夫来整我，不外乎是想要我的命(即杀鸡吓猴罢了)。就连罗干事都左一个罪不容诛，右一个想保命都难喔。不是明摆着要把我往死里整吗？特别是自贡市杀王某某的布告在监狱中学习，就是一种开杀戒的讯号。事以至此，怕是怕不了的。古人云：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抱定了“成仁”思想，虽不说要慷慨激昂那样视死如归，但也不能死得窝囊，所以我常准备了一套干净衣服放在枕边，一旦喊到我赴刑场，我就要穿着整洁、精神而干净地上路。

好不容易捱过了七一、二年的镇压高峰，我算逃过了一劫。可是死罪虽免，活罪难逃啊。一天吃过夜饭我在监房内踱步，值勤的武装兵突然叫我到仓口，问我在我监房里闹啥子？我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明明我腔都没开在静静走动，怎么说我是在闹呢？但我还是好言回答，我没开腔，更没有闹。武装兵一反常态，大声吼到：

“你还狡辩，明明我亲自听到你在闹，你不敢承认？”

“我真的连一句话都没说，怎么会闹呢？不信你问仓里的其他人”我说。

“我亲耳听到的，要问哪个，你真嚣张，你等着，看我不收拾你才怪”，武装兵边说边向外走(真是欲加之罪喽)。我以为他要去喊公安来体罚我，心想公安来了会有理说得清。可是，做梦也没想到，一会儿这个武装兵又跑了进来，把冲锋枪(可能是个班长)往背上一背，用手中提的(一串)钥匙把门打开，恶狠狠地叫我出去。我想我没做错什么事，出去就出去怕什么。走到提讯室外的坝子里，没见到一个公安，只有两个空手的武装兵在坝子里站着。我刚走进坝子不远，背后就是一拳打来，伴随着“老子就不信你有多嚣张”的叫骂声。我仍忍气吞声地说我真的没有闹，连话都没说一句。他又从后踢我一脚后，将冲锋枪取下来拿给站着的一个武装，并叫另一个把绳子拿来，二人不管三七二十一硬要捆我，我就大声责问他们：

“我犯了什么？你们讲不讲理？你们凭什么捆我？”

“就凭你这个嚣张劲就要捆你，还要好好收拾你一下，看你今后还敢不敢嚣张。”主罚我的那个武装兵说。

真没想到两个武装兵不分青红皂白，边打边扭我手杆，把我五花大绑起来不说，还把我吊在房檐横担上，拖到我脚尖着地的程度，再将他们练武用的石锁（好几十斤重）穿上绳子吊在我脖子上，最后用从我身上脱下来的棉衣蒙到我头上，再用冲锋枪托把打我头部，边打还边骂“看你给老子还敢不敢打人家的脑震荡了。”

开始我还吼叫抗议，与他们论理，后来竟然话都没气力说出来了，这种上拖下拉的刑罚怕是旷古一绝喽，三魂七魄都跑到天堂去了。

天多两天后我醒了转来，只知头昏痛得要爆了样，满脑袋像浆糊、昏昏然又恶心，全监室没有一人开腔，都用异样的眼光注视着我。可能是仓头（即牢头，每间仓房都由狱方指定有一个）写条子出去报告我醒转来了。看守所头王明，提着一串钥匙，面带让人捉摸不定的特殊微笑，打开监房门叫我出去，我不知所措地昏昏然跟在他走进了办公室。他叫我坐下，然后假惺惺地给我倒了杯水，递给我后坐回藤椅才开腔：

“你是咋个的吗？你谢英富都是顶聪明的人，你咋个要去惹武装啊？那天碰巧我们不在，你何苦吃这种眼前亏呢？我已给狱医说了，拿点跌打损伤的药给你吃。”……

他这一番挖苦带讽刺的拙劣表演，猛然引发了我的深思。王明一定是这场恶毒剧的总导演。其一，我与武装兵无冤无仇（只有对立派政法兵团才视我为死对头），他为什么无缘无故找岔（造岔）来狠毒收拾我，还开口一个嚣张闭口一个嚣张地叫骂，这不摆明了是派性的仇深似海么？！其二，看守所是严禁看守武装拿钥匙提关押之人的，武装兵的钥匙从何而来？其三，看守所是严禁公安善离职守的，必须二十四小时值班监控，何来王明说的“碰巧我们不在”？按规定任何时候都有公安值班，能碰巧吗？其四，即最露骨的武装兵怎么会知道罗由海提讯我时，曾张冠李戴指责我打对立派的“脑震荡”（可能什么叫脑震荡这个武装兵都不知道）？

他们真狠毒，明的判不了我死刑来整死我，就用这种假手武装兵来整死我。要是我命不大死亡了，就连伤形都勘验不出来，他们就可用正常（病）死亡四字结论通知家属，灭了他们心腹之大患。

好在我命大，活过来了，但头顶被打凹下去的一块骨头至今仍在，那是法西斯专政的罪证，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消除不掉的铁证。难怪一九七四年（大约）周恩来总理视察监狱后严正指示：废除一切法西斯专政手段；要把关押的人当人对待。说明了党中央还是能洞察秋毫的。（阎）罗王所造之孽虽然狠毒，但只能说明他们无能，故才想出这种下三滥的方法整人，也是他们在道义上的灭亡！我在看守所关押长达九年多，看到听到的都不少，但他们对真正的反革命也从未像对我这样残忍，这是为什么？？？至今难解！就此，我也落下了经常头昏痛和晚上做恶梦的后遗症（这种刑罚也可能是“空前绝后”吧？！）

王明管看守所确有一套，尽用那些刑事犯罪人员来监督我们这样的人，而且挖空心思来整治人。一会开展监室挖“妨碍改造的绊脚石”；一会发动监室“找大小鬼”（每间监室都要找出一两个人出来批判），反正要弄得被监押的人心神不安，睡卧不宁他才心满意足。当然，他最终的整治目标始终是我们这号人。“9.13”事件在外面传达都公开了，他还在监狱里大搞追“谣言”大学习，明确追查谁在监内造谣说林副主席叛党、叛国投敌？这是严重扰乱监狱秩序的、最严重的反革命行为，必须严肃追究。其矛头同样指向我们这号人。

到一九七四年，他们在看守所大搞法西斯专政，不仅给被监管人员的饭菜质量低劣，而且经常克扣。看守所经常养着些猪，杀后好的猪肉全由他们三、四个公安管监员分走了，剩点头和脚爪子及烂心肝五脏，才杂烩来给囚徒们吃，而且有时还要抵“牙祭”。他们美其名曰：猪本是他们凑钱来买的。那么，人工和喂食又从何而来？那时，我们也无法同他们计较这些，我们要的是人之待遇，要的是看病就医、废除体罚、学习政治等权利。当时看守所有病很难找医生看，大不了给点小伤风感冒的贱品药了事。报纸是想给就给，而且是过期的，凡有重大时事的报纸就休想看到。查仓更是霸道，毛主席语录、诗词乃至毛选，均属没收之列，整个监舍被造（抄）得乱七八糟，比鸡窝不如，他们的皮鞋可在被盖上乱踏一气，加之环境恶劣等等，在周总理视察监狱后严正指出要把犯了罪的人当人看待，严禁采用法西斯手段虐待犯了罪的人之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宜宾的所谓“闹监”。

开始是由罗太安等人要求看病就医，将文革人员与刑事犯罪的分别关押，实际是反对用刑事罪犯监督我们（我是一直被监督的重点，甚至王明专门培训伪

县太爷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反对体罚等非人道待遇。看守所老工人王某某（厨工，三八式的革命者，新四军转业）人尊称为王伯伯，是专门给我们送饭送水的。由于他在社会上看到的和听到的很多，也对看守所一些做法不满，于是他常去买些报刊杂志，趁中午休息拿到监内训话室大声朗读给我们听，使与世隔绝多年的我们这些人，了解了党的新政策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指示和时事政治，加之个别武装兵看报学习和听辩论，了解了党内路线斗争和宜宾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也将一些带政策性的或时事政治的报刊摔进我们监舍来给我看和学习。这时王明早已溜之大吉，让周会祥所长来收拾这个摊子。周是个比较本分，只知执行职责，不懂整人害人的老实公安员。其实，所谓“闹监”我们也从未乱闹，大部分问题都是有理有节地向看守所、公安局反映。后周所长将我们十多人集中到两个监室，允许学习书报和家属送来食品药物及唱革命歌曲，就是不让到医院检查治病。主要是怕我们与外界接触，据说那时外面的战友与当权者斗争非常激烈，主要是为我们长期羁押得不到公正解决的问题，要求当局严格执行党的英明政策，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于是，罗太安和一些人商量用绝食来力争。可能出于尊重或原职务关系，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当时病重（近四年的残酷斗争整得我死去活来，非人待遇将我关 pa 了的），认为只要不影响监所正常秩序，要求合理（因为大部分人都被关了多年，肯定病痛不少、不轻，不到正规医院检查治疗，后患无穷），大家都认为有必要，我随大流好了。

所方为稳定我们的情绪，特意弄很多肉出来（不是对全监，只是对我们），大家就是不吃。后来公安局任逢畅局长出面，说我们要求正当、合理。人们才恢复进食。白天放我们到外面大坝子学习或适量劳动，爬房检漏，帮武装中队整墙添瓦，定时看病或会见家属。这个结果与外面的“战友”同张敏、冯振武、张玉清等地市委书记的谈判有一定的关系。但看守所仍在正常运作，秩序井然（提审犯人照样在进行，从未受我们的干扰）。久押不决，本身就不合法不合理。我爱人曾找到地委冯书记反映我的问题，他当众公开表态：我了解谢英富，就凭那个“逮捕通告”就该给他平反。

由于地市委的介入，宜宾市由公安局卢德铭局长担任组长，再由宜宾两派干警参加成立复查组，全面调查因文革问题关押的人员，并陆续放人。我的问题经过认真仔细复查，到毛主席治丧期间，才由公安局领导深夜到看守所释放我，

当时对我讲我的问题已查清，没事了，因为操办毛主席丧事太忙，来不及办正式通知，让我先回家养病，等候正式通知平反。

因被长时间羁押，身体极度虚弱，回家中后就卧床不起，医生到家里来看病，我自己是四门不出并谢绝来访，算是静养了个把月。可能是我劫数未尽，打倒所谓“四人帮”，又由公安局秦秀中局长带队，半夜三更来家将我从床上又抓进了看守所关押（既不说理由，也不出示任何手续）。

这一关又是三年多（合计九年多了）。奇怪的是我的罪名在九年多的时间里，随着政治气候在变化，开初是“反革命”变成“五一六分子”，又变成“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再变成“四人帮爪牙”。到一九七九年底，所谓涉嫌“四人帮”的人都判完了，眼看新刑法要实施了，罗由海跑到看守所过问了我一下，就急急忙忙以“打砸抢”罪名内判我有期徒刑十五年。罗称他是代表宜宾市法院宣读判决书的。当时我就觉得他这个判决三不像：新刑法要一九八〇年才实施，按新刑法就得公开开庭审理，庭辩质证，何以能内判？为何罪名竟是新刑法新增罪项？当时不懂什么叫法律溯及力规定，只晓得原来打虎无罪，总不能等十年后保护野生动物法颁布了才将以前打虎的人弄来判罪的道理。更主要的是定罪事实莫须有。所谓的三条人命（前面“蹉跎”章节已详叙述，此不重复），仅就判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冤。什么“下令张志荣看守，致田明贵被张枪杀”，叫看守与叫枪杀有天渊之别，况且田根本不是被张杀死的；什么“下令孔庆银非法抓捕……付万全……致使付万全被他人非法审讯后枪杀”，纯属欲加之罪。事发时我远在几百公里远的成都出差，从何下令？既然判决词都载明了“付万全被他人非法审讯后枪杀”，那罪责也在他人而不该罪我；什么“指使钱某某刑讯逼供宜宾市小五金厂董永昌……活活将董逼死”，完全是不实之词。钱某某（实际叫钱兴华，公社革委委员，不管“清阶”事）根本就没审讯过董永昌，何来受我指使？如此等等，通篇判词都在玩文字游戏，何来事实依据？

我是无罪之人，只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参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了个造反派头头，这是党的路线斗争使然，为什么我要受那么大的冤屈和摧残？我当然不服，我要据理上诉。

可是，那个年代，哪里有真理？谁还在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在那两大阶级大搏斗的阴影笼罩之年代，有权就是真理。个月左右，罗由海摇身一变又成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代表，宣布“维持原判”。看守所立即将我解送劳改队。

喊天天不应，喊地地无声。冤枉呀！青天何在？哪有申冤之门！！！

孙维申著；《挖地三尺，一个不漏——记无锡市长达三年多的‘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的调查报告》摘录

一九七〇年春无锡又开展了一阵在十年浩劫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政治运动“一打三反运动”（一打三反包括深挖五一六，其中前一年是一打三反，后三年多是深挖五一六）。来势汹涌的“一打三反”就是“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击无政府主义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的简称。无锡市为“全面领导运动”成立了一个“运动办公室”。这个“运动办”下又按各类职司分设了“一办”“二办”“三办”……。其中“二办”负责处理清查最核心的“暗藏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子”和“要案中的要案”，是由当时任无锡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无锡军分区政委的原 xx 军政治部宣传处长王晏和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张文治等直接掌握。这个“运动办”成了无锡市民头顶上悬着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而“二办”又成了“剑上之剑”。据一九七四年无锡市委专案调查组对已停职审查的王晏和张文治等进行调查时，才发现，这个“运动办”尤其是“二办”的建立，竟然没有经过市委常委会的讨论通过。是王晏等人用非组织手段搞的“黑办”。可是这个“黑办”竟然长达三年半的时间，又是抓人，又是发文件，又是召开大会小会布置运动或听取汇报。“二办”成了无锡最大的阎罗殿。其下各区、局和基层单位的“群众专政办公室（小组）”一律改称“运动办公室（或领导小组）”。“群众专政队”也改称“运动小分队”。当然其成员也从新调整充实。经过一番厉兵秣马，又搜罗整理了一整套“无锡地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后，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就在无锡市揭开大幕了。

于是在无锡市，一张比“红色台风”覆盖面更大的网张开了。首先是动员各单位根据运动的精神来个“大揭大批”。在各级“运动办”、“运动领导小组”

的布置下，用大字报或检举揭发的“群众揭批”形式，把矛头重点对准他们心目中的打击对象。在这基础上办起了大大小小的“学习班”。这各种“学习班”的打击对象也是五花八门的。例如在一次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上，王晏就义正辞严的痛斥过“……有个做散工倒马桶外加捡垃圾的老太婆，靠着拾来的砖头居然把茅草棚翻建成了砖瓦房……这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复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过运动的主要对象当然是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在这期间，几乎是“公判大会三六九，暴死自杀天天有”。公判大会主要是刑事罪和孤立的现行反革命罪，一律从严再从严，以至留下不少冤假错案。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有些那时造成的冤假错案还是司法部门难以善后的头痛事。笔者最近见到一位年过七旬的退休司机，当年他出车途中，路遇一个骑自行车的醉汉。醉汉摇摇晃晃撞到他汽车的后挡泥板上，他急忙下车抢救，但那个农民还是不治身亡。当时目击证人，警方现场勘察，致法院的判决书上对此情节认定都明确无误，死者家属对此也无疑义。但因为那位司机的父亲是工商业者，他本人在文革初期又参加了“红总主力军”一派，该单位“运动办”出于运动的需要和个人嫌隙，经过种种以组织名义的活动后，硬把此事定为“阶级报复”，把他判了刑。如此情况在无锡不在少数。迄今还留下许多难以善后的尾巴。直接死于这个阶段的人，按官方（一九七四年无锡市委政策复查办公室统计）公布为一百四十余人。

特别令人骇然的是在医务界居然挖出了以卫生局原副局长，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著名外科专家朱庆云大夫为首的“国民党地下军”反革命组织。其中多数都是各科专家骨干，包括党员领导干部和民主党派人士。朱庆云等一些名医“畏罪自杀”，其他“地下军”也备受折磨。笔者认识的一位医术精湛的外科大夫，因市里某要人及一些皇亲国戚身患重病，离不开他那一把手术刀，这才从生死关口逃得一条性命。像这样的“地下军”、“反共组织”之类，在无锡煞有介事地“揪出”出了一批又一批。“畏罪自杀”了不少。这些“自杀”者的死亡情节有些都留下明显的漏洞，过了三十多年成了被深埋在积尘下的悬案。当然，什么“地下军”之类都是凭空捏造的间谍故事。

“一打三反”是从七〇年初开始的，历时半年多。当时，无锡市出动了数万名脱产或半脱产的专案工作人员（包括“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和当时

实际行使专政行为的“文攻武卫指挥部工人纠察队”以及各单位的“群众专政办公室”“群众专政组”……），被触及、被用各种形式（诸如“学习班”或拘留、隔离审查等等）审查者起码达两万余人。这短短半年中，在当时仅六十五万人口的无锡市，直接死於运动中就达一百四十余人（按官方即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政策复查办公室一九七四年统计数）。其间无锡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等机构也抽出很大力量配合运动。消耗各种社会资源更是无法统计。

陆渭文：《千秋功罪——无锡文化大革命纪实》摘录

尤太忠宣布陆渭文，殷松勤，金浩良，陆福根四人为反革命
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下属机构有“大联委”，由执行“群众专政”的“工人纠察队”十个连队，驻守在全市的四面八方，这十个连队统一由“工纠总部”指挥，（以后改名“文攻武卫”指挥部，指挥部的“指挥”由军方代表担任，“付指挥”由“九.二”的李鼎铭担任，“工纠队”在革委会建立之后，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也做了一点工作[自欺欺人]，但作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方向是“革委会”“专政群众”的工具，是镇压群众反抗的打手，是一座人间魔窟。

市革会建立之后，曾一度担任“总指挥”“红总”实力派头头[群众称]的陆渭文，在“红总”内部做一些扫尾工作，然后，准备回到自己的原来单位去做一名普通工人。树欲静，而风不止。由江苏省革会的负责人向下传出了“要一派打掉一派”的指示，（根据张宁回忆录记述）无锡开始行动了。

为清洗主力军观点的造反派，首先以查群众组织中的坏头头为由，重新由工纠队把原”红总”的主要负责人，卜岩，江汛，周炳荣，殷虎，王明华，苏锦坤，胡阿二等，以至于后来连支持主力军观点的革命干部何泄也统统被抓了起来。并同时，集中几个单位的“九、二”突然袭击正在上班的主力军，将这个厂的主力军群众赶出厂门，有些单位的主力军实力比较强大，组织反抗，“工人纠察队”马上出面，抓主力军的人，“九、二”方面如此横行霸道，市革委会如此纵容，又激怒了将退未退的陆渭文等人，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由陆渭文，匡建忠（市革会委员）杨锡昌（市革会委员）周志鹏（市革会委员）等人一起商议，鉴于目前

的情况，各基层单位的主力军群众纷纷前来“红总”诉苦，怎么办？总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商量对策，于是召开了“5.8”，“5.9”二次会议。

主力军七兵团下属有一个渔业大队，又一批捕鱼的小船，于是有七兵团头头金浩良去借了一条小渔船，“5.8”会议就在小船上召开，称之为“小船会议”。

一九六八年5月8日夜，静悄悄，在荒野的郊区小河里，停靠的小漁船上，由陆渭文，匡建中，周志鹏，杨锡昌，金浩良，李伏阳，丁可南等10多人进行了秘密会议，会议由陆渭文主持，会上讨论了目前的形势和相应的对策，陆的看法，“目前是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必须组织力量，进行反抗。会议认为“目前又是在进行‘复辟’”。根据大家的建议，建立“反复辟指挥部”，推选陆渭文为“军长”，杨锡昌，丁可南俩为“副军长”，由陆渭文等人着手组建武装队伍，有计划地攻打几个“工纠连”，抢出主力军中的老造反，抗诉市革会对主力军的又一次镇压。会议直至凌晨六点钟左右结束，大家登岸各自散去。

5月9日晚在中山路“牙科门诊所”继续召开扩大会议，参加这次5.9会议的人除“5.8”会议的一部分人员外，还增加了“红总”中心组成员章传贤（市劳模），后勤人员陆鸿，愿“6.20”部队王明华，苏金坤，原警卫班负责人，吴阿二等人。为了造反派的利益，为了捍卫文化大革命

但晚九点多钟，会议刚开始，还未正式安排个人的任务，却已被“九、二”学生发现，并有“九、二”武装冲进会址，会议被冲散，参加会议人员翻窗跳屋突围而去，其中两人腿骨受伤。

根据情况在市内已无法活动的现状，于是在5月10日下午，在硕放机场附近的荒野地里再次召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市革会内的浦湘海派人来向陆渭文传达了市革会主任，27军军长尤太忠带来的口头通知，叫陆渭文等10人进大箕山开办的二派头头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陆渭文对这位从感情上没有多大抵触的全市“父母官”，军队首长的通知，为了造反派的利益，为了捍卫文化大革命陆渭文，冒当时天下之大不韪，断然拒绝参加这个名正言顺的“学习班”，陆的决定可能是起到了干扰革委会建立后需要稳定的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步骤”。但这个年轻的工人只是出于市革会对主力军再一次镇压的本能反抗，对“通知”产生了“反弹”。这次会议还未正式开始，又被硕放当地的民兵查问而未讨论任何内容。种种现实，在革委会成立之后，“权力”已被法定，陆渭文等

人企求组织力量反抗，已经是件不现实的举动，“学习班”不参加，何去何从，唯一的一条路，离开无锡。去南京？等于羊入虎口。北京上访？去告革委会的状，此路不通，最后会被送回无锡。陆渭文想到了徐州。徐州是江苏的地盘，但是有济南军区“支左”，济南军区政委王效禹是支持造反派的，徐州是“踢派”掌权，陆渭文作出了逃往徐州的打算，于是陆渭文就与匡建中等人分手，对匡建中等说明，自己在未去徐州之前，先去常州，苏州等地，向他们通报一下无锡的情况，然后再去上海与匡建中，周志鹏碰头。陆、匡在 5 月 10 日硕放分手，各奔东西。

5 月 12 日，陆渭文返回苏州，在踢派总部碰到李伏扬，由陆渭文指定李伏扬起草红总公告开除金坤泉。

陆渭文先去常州，与梁炳生见面，通报了无锡情况及自己的打算，再去苏州与苏州踢派头头见面，5 月 12 日，陆渭文返回苏州，在踢派总部碰到李伏扬，由陆渭文指定李伏扬起草红总开除金坤泉公告。然后返回上海去周志鹏亲戚家中。

在陆渭文从常州赶回上海，在周志鹏家中碰见匡建中，正好有时任无锡市革委会副主任的浦湘海，派陶念龙（陶在揪“5.16”时自杀身亡）也到上海，在周家碰见陆、匡俩人，小陶说：“他受浦湘海委托从无锡特地赶来。最近几天，无锡主力军中在无锡不见你们几人，情绪比较低落，所以定于今日下午二点，在市体育场室内球场召开全市主力军基层头头会议，叫你们俩人（陆、匡）回锡与大家见见面，鼓鼓气。”陆、匡俩人听完小陶带来的口信，也十分相信，陆渭文心中明白，此去无锡凶多吉少，但为了与基层头头见面，义不容辞，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大不了牺牲自己，于是答应来人与小匡两人即刻动身。陆渭文今天身穿黑色军便装，将风衣扣，扣好和匡建中等人离开周家，准备乘火车赶回无锡，三人走出周家在弄塘口的小便处“方便”一下，走上十几步路，“302”公交车正好开走，在公交车车站上不过等了三、四分钟，乘上 302 公交车赶到火车站，排队买票，在车站售票处排队，还有二、三人时，售票的窗口小门关闭，时间到，停止售票，三人买不到车票，就往火车挤，准备在火车上补票，谁知今天的列车员特别认真，不允许车上补票，硬将陆、匡等人从车厢里推将下来，陆、匡等人出于无奈，只得下车，就在车站上就餐，准备下午乘上还开往南京的快车回锡，估计时间虽赶不上开会，但到锡后，会议还不会结束，陆渭文等人在车站午餐后

等车时，抓紧写好二封家书，托人带回家中。下午 1 点多钟三人乘火车赶奔无锡，抵达无锡车站的时间是下午 3 点多，三人赶乘公交五路车到市体育场，下车，会议刚刚结束，会议主持者都已离开会场，散会出来的群众还在先后慢慢离去，陆渭文走到市体场桥上，见到原纺织兵团的顾×，顾×见到陆渭文神情十分惊讶，开口：“你怎么还来到这里？”“怎么啦？”“今天会上尤太忠已宣布陆渭文，殷松勤，金浩良，陆福根四人为反革命”。陆渭文到这时方知今天的会议原来是个圈套。今天下午的会议由金坤泉主持，无锡市革委会主任尤太忠出席了会议，会议开始尤太忠上台宣布陆等四人为反革命，这时混进会场的“工人纠察队”立即将原先暗藏着的“工纠”袖套套上左臂，在会场的四周围架设好机枪，这是恐怕会场发生骚乱的弹压措施，布置得十分周密，当陆渭文听完了顾×的介绍之后，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匡建中自持自己是学生，又是市革委会委员当然不怕，匡走了一段路，回身追上陆渭文，用借来的自行车，将陆渭文送到硕放火车站，从此陆渭文开始了他为时一年的流浪生涯。

古人有诗云，“一朝脱得金勾去，摇头摆尾再不来”。

强权政治，将主力军中的维护正义死硬派逼出无锡，一烙铁将无锡烫平。在无锡大街小巷到处刷上斗大一个字的大幅标语：“打倒反革命分子陆渭文”，“枪毙反革命分子陆渭文”，“油炸反革命分子陆渭文”这还不解他们的心头之恨，在陆渭文三个字上用红色打上×××。

更为可悲的事，由军方的作战部绘制了一份陆、匡组织武装进攻“市革会”的路线图。登在“红卫兵报”上，这样陆渭文“颠覆红色新政权”的罪名成立了。无锡刮起了“十二级红色台风”。他们的文革口号也增加了，第一句“打倒刘、邓、陶！”第二句“打江（渭清）陈（光）包（厚昌）”第三句“打倒韦（永义）江（坚）吴（镇）扬（增），”，后面再拖上一句“打倒反革命分子陆渭文”。捉拿反革命分子陆渭文的“通缉令”似雪片飞扬，无锡街头巷尾，陆家乡常熟市的每个角落，真个苏南地区……南京刷出了“陆渭文倒台了，你文风来怎么办？”的大标语。文风来是南京“好派”的一把手，在“深挖 5.16”运动中被逼疯去世。

柳英发: 《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节选)

1963 年秋到 1968 年底这五年多的时间, 我是在武昌实验中学度过的。前三年是我的高中生活, 后两年是我文革经历中的一段。武昌实验中学是很有名的学校, 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就是中南地区、湖北省的重点中学, 校名是毛主席亲笔所书。1966 年夏, 文革开始, 改名红旗中学。文革中, 红旗中学在武汉三镇也颇有名气。先是当时中央文革副组长王××的儿子为领袖的老红卫兵, 后是群众组织的“红十月造反公社”, 在江城都很有影响。我自己是红十月发起人之一。1966 年 11 月红十月加入武汉二司 (1966 年 10 月 26 日成立, 后称“武汉钢二司”)。1967 年 2 月起, 我参与武汉二司勤务组的工作, 是其中唯一中学生代表。1968 年 1 月 15 日武汉市红代会成立, 我是副主任。接着 (1 月 20 日) 三结合的武汉市革委会成立, 我以群众代表身份任常委。1968 年 12 月初, 我离开红旗中学, 和战友们一起到湖北省潜江县插队务农。

这五年多的岁月中, 我经历的许多事情一直都难以忘怀。其中就包括发生在 1967 年的“12.5 事件”。下面我就集中说说这方面的事情。

1967 年 12 月 4 日, 我们学校在实现大联合的基础上, 革委会成立了。那段时间, 我活动的重点在校外。作为武汉钢二司的代表之一, 我参入武汉军区新领导曾思玉, 刘丰 (曾、刘在武汉“7.20 事件”之后, 取代了武汉军区前任领导陈再道, 钟汉华) 以及武汉警备区 (1967 年 8 月成立) 首长方铭、张昭剑等主持下的大联合, 三结合工作, 很少回校。学校革委会成立了, 这是大事, 是我们的盛大节日, 我就被通知回学校了。第二天晚上在学校礼堂举行文艺晚会庆祝革委会诞生。当时我在礼堂所有观众后面, 站在一张凳子上看节目, 李乾 (时校革委会委员, 负责保卫工作的 1966 届初中生) 在礼堂找到我, 可能是碍于周围有人, 他具体没说什么事, 只是说有事要我出去商量一下, 并告诉了地点, 我答应了, 但没有立即去, 我以为没什么大事。在演出的节目看完后, 我才到开会的地方, 就是学校原女生宿舍楼一楼的一间寝室, 时为红十月的一间办公室, 当时屋里已是济济一堂了。何儒非 (时校革委会副主任, 红十月一号头头, 66 届高中生)、李乾等均在场。这时我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原来, 学校准备开文艺晚会的消息传开后, 当晚 22 中 (该校与我校仅一墙之隔) 二司学生祁援朝跑过来向李乾报告, 说丁洪宝 (时 22 中学生, 不时骚扰我校的学生之一) 一伙, 还有积

玉桥的流氓头子韩转运等，在黄××（时 22 中一教师）的家里集中，准备过来冲击。于是李乾就通知集合些人商量怎么对付。我到时李乾正在布置去 22 中怎么个打法，说过去把他们抓过来。说谁要反抗就狠狠敲他，打死了也没关系。正在这时，祁援朝跑来，说丁洪宝一伙人都走了。会场顿时乱哄哄。其中不知是谁提出（我至今也记不清是谁）说：他们晚上总是要回家的，到他们家里去打，此法大家都赞成。李乾说，要打，干脆就打死。我说，不要打死，打断他一条腿一只手就行了。钟立民（1966 届高中生）反对打死。说打死不好，顿时遭到激烈反对。大家七嘴八舌，说他们是一伙流氓，偷自行车，抢银行，奸污女生，打伤我红十月战友，纵火烧毁我校办公大楼，几番洗劫我们学校等，是三字兵特动分子，罪大恶极。你不打死他，待他伤一好，流氓的报复性是很强的，那我们学校一千多人的生命财产就不得安宁了，还搞个什么复课闹革命！打死流氓有什么关系？上海就是这样的，打死流氓根本没事。现在警司镇压流氓不力，公检法更是前门抓进后门放出，我们搞群众专政嘛。当时是群情激愤，同仇敌忾，被这样一哄，我就同意了。我说：好，那就打死。接着讨论打谁。大家提出来打丁洪宝、庄洪运（22 中学生）二人，认为他们是老打出手的。何儒非就叫同学去叫符军（22 中二司总部头头，学生，当时在礼堂看节目），是要他作向导的。符军来后听说要打死丁洪宝、庄洪运，他对大家拍着胸说：你们只管打，到时候我们负责抛材料。并说，丁洪宝还不是头头，头头是孔威、傅强，他们俩是流氓头子韩转运的左右手。经他这一说，就决定打死四人，即孔威、傅强、丁洪宝、庄洪运。并决定由李乾带队，由符军、祁援朝引路。夜 12 点行动。散会之前，李乾讲了一番话。主要是说法律是保护我们的。若流氓打死我们，那就要对他们实行专政。他还说，我们现在成立了革委会嘛，完全可以学巴黎公社，可以把他们的罪行张榜公布等等。

会散之后，我和何儒非回到隔壁房间，当时是何儒非的寝室。我们都没有说什么话，两个人的心情都显得沉重，完全没有以前作了什么决定之后显出的那种自信。这里我插说两件事：1966 年 10 月，红十月成立不久，文革正处于批资反路线阶段，红十月下属的几个战斗队在学校三楼会议室开会，要开除叶××老师的党籍，准备把他的入党志愿书烧掉。有同学告诉了我。我立即跑去，一进会场我就大喝一声：停下！这时反对的人也不少。七嘴八舌地说非要烧不可。我慷慨

激昂地说了一番：文化革命是干什么的？16 条是怎么说的？斗党内走资派，批反动权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你们这样做算什么？最终多数人听我的了，志愿书未烧掉。事后有同学告诉我，有人说你这是老保的作为，我没理睬。1967 年初夏，我校的三字兵贺××在学校后操场旁用垒球棒猛击索立平（时 1966 届高中学生，红十月战士）的头部，同学们义愤填膺，要求严惩凶手。我们几个，何儒非，李乾，我等十分冷静，妥善处理了此事。多年之后我的战友们在说及这些事时还说：夫子（我的绰号）平时办事蛮冷静稳重的，怎么在“12.5 事件”上那样冲动？是呀，是太冲动。当时，说实在的，话一出口，就有些后悔了，但没有反悔的决心，内心还有不能当群众尾巴的私念，还有侥幸心理，但愿说说而已，不会成为行动，毕竟是群众组织哪能做到纪律严明，令行禁止？我和何儒非都心神不安，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入睡了。

凌晨时分，我们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李乾，祁援朝等人进来了，李乾脸色嘎白，浑身发抖，平时说话都有点不太一贯的他，现在向我们汇报行动经过时，紧张得话都难以说清。从他的汇报中我们得知孔威，傅强已被打死了。讲完后，我们叫他回去休息，祁援朝留在我们寝室，当时他才十五、六岁，睡在被窝里，浑身都还在发抖。此时的我，我料定还有何儒非，都觉得问题严重了。

天刚刚亮时，肖××（我校 1967 届高中生）推门进来，把我拉到门外，向我要长裤。我问为什么？他说打孔威时，岳中杰，高胜祖（均为 1966 届初中生，红十月战士）大腿负伤了，被送到中医学院。谁知傅强被其家人也送来救治。为防万一，他转回学校了，现需要裤子。我叫他等着，只身来到耿其华（时校革委会主任、原校党总支委员、政治处主任）房间，与耿其华同住一室的还有陈××老师，他们还未起床。我问耿其华有没有长裤，他问我要裤子干什么，我没告诉他，只向他要裤子。他要我自己拿。我就在他床下的一个箱子里拿了出来交给肖××，并和他一起去看了受伤的同学（岳中杰）。

吃早饭时，在食堂里同学们就悄悄议论开了，我没理会他们。怎么办？中午耿其华主持召开了革委会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我记得他先发了一通脾气，说这大的事情（指跑到别人家里打死人），连我这个主任也不告诉一声。会上大家议论了一通，最后决定了几点：不要声张，相关人员主要是李乾要避避风头。要向上级报告，同时要加强学校的保卫工作。

会后我到水运工程学院借枪, 水运在新河街长江边, 去来都要经过孔威的家。我在汽车上看到门口拥着许多人。枪支由水运的车子送回学校, 到校我即将枪支交给肖××等人。随后用车把李乾等人送出学校, 说是暂避几日, 谁知一去就是二十多年, 90 年代初 (1992 年?) 我才又一次见到李乾。他判刑二十年, 青春年华都耗在监狱了。好在他没有自弃, 在里面读了许多书, 还刻苦学技术, 练就了一手好的钳工活。出来后先是开了个汽车修理厂, 后来又搞教育事业, 目前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还不错。

随后我向杨道远 (钢二司一号勤务员), 方保林 (钢二司二号勤务员) 等人汇报了此事。在他们支持下, 在适当场合我也向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和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方铭等领导人报告了此事。当时曾、方等领导没有异样反应。在事后约十多天的日子里, 我几乎天天晚上都在学校值班, 手握一把五四手枪和肖××等人在学校内四处巡逻。我看见武昌区支左办公室的巡逻车接连几个晚上都在学校四周开来开去。我心稍安些了, 但也不敢有丝毫松懈, 担心对方来个鱼死网破。

1967 年 12 月 15 号晚, 几辆吉普车开到学校大门附近, 来了一大帮人, 说要拘捕凶手。有同学赶紧来报告, 我随即赶到校门口, 门口已有许多同学, 堵着不让来者进校。我走上前问他们是哪里的? 此时不知是谁指着我问对方: 你们晓不晓得他是哪个? 估计对方知道我, 口气和缓地告诉我, 说他们是公安联司的, 受警司之命来执行任务。我说毛主席有指示, 你们知道吧。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抓人, 就是一个组织里的坏人, 也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处理。你们回去吧。对方无奈, 撤走了。我是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把他挡走了, 但内心已很是不安, 此时耿其华、何儒非等已来到校门口了。耿见状很着急, 这是拒捕呀! 怎么办? 于是我们几个人商定, 按毛主席说的办, 我们自己先把冯栋 (时 1967 届高中学生, 红十月战士)、俞国新 (时 1966 届初中学生, 红十月战士) 送到警司去, 要从长计议。当晚我们一行数十人, 陪着冯、俞二人, 一路步行, 过长江大桥、汉水桥, 一直走到万松园路, 当时警司所在地, 把冯、俞二人送进去了。从此一别, 冯栋我在 1998 年才见到, 他在牢里关得一身病差点死去, 1973 年保外就医。之后在一家汽车出租公司干, 后来开了个复印店维持生计。俞国新却一直没有消息, 我们一直还在找他。

第二天有同学来报告，说昨天晚上李乾在他的一位同学家里被抓走了。三人被抓，不少战友和同学们一时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学校一下就乱套了，复课闹革命无从搞起。而且，从此红十月内部分裂了。

我们一些人，特别是何儒非和我，受到昔日战友们的指责，说我们背叛、出卖了李乾他们。他们打出了“营救革命闯将李乾”的旗帜，宣布被打死的孔威、傅强是“十恶不赦的流氓，死有余辜”。一时间在武汉三镇造成很大的声势。我们不同意这样干，在校内一时有点孤立。当时在学校我的处境好像比何儒非好一点，对方战友好像还能和我“对话”，我委婉多次向他们表示：救李乾，我们都是一样的，但不能这样大张旗鼓的，这样会适得其反。我们造反派的地位现在同以前不同了，我们能直接见到曾、刘、方、张这些领导人，只要把材料准备好，是会有好的结果的，等等。但收效甚微。

“12.5 事件”后，我找过符军，他不是在会上拍过胸吗？我要他赶紧把材料整出来，但就是拿不出来。会上罗列的那些都难以准确地落实在孔、傅头上。例如焚烧我们学校的办公大楼，这是和“7.20 事件”同时发生的事，这很典型呀，如果能落实，那孔、傅岂不是罪责难逃？但就是落实不到孔、傅二人的头上（后来纵火者也被抓了，但据说不是孔、傅所为，是 22 中另外的学生）。我追符军很紧，后来他干脆躲着我，再后来，他也被抓走了。没有过硬的材料，我见到曾、刘都难以开口。但我没放弃努力，只要有机会，我就向曾、刘以下的一些人如张绪（时警司副司令员）、刘海江（时武汉军区的一个部长，支左人员）“吹风”孔、傅不是好人。我们对他是“罚不当罪”，李乾是革命小将，我们是小将犯错误。等等。他们告诉我：这事不能急，往后处理好，越往后越好。这些话，我向耿其华，何儒非，向我的战友们都说过。

因“12.5 事件”造成的“红十月”内部分裂，我心里很不安，感到压力很大。1968 年 1 月 20 日，武汉市革委会成立，我被武汉军区临时党委批准，任市革委会常委。我窃以为是一个好的信号。为什么？因为在革委会筹建期间，其拟任人员都是填了政审表的，学校的“12.5 事件”早已不是秘密。我是“12.5 事件”的重要当事人，军区领导都是知道的。而我被批准进市革委会了，那事件的相关人员，当然包括李乾等人的处理，可能只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我心安了不少。但我的战友中有的不是这样认为，我已经忘记具体为么事，我和我同班的战友发

生了争执，他最后的话深深地刺激了我，而这话与我们争执的问题毫不相干。他极冷峻地对我说：你以为你面前会再有一个李乾吗？那意思是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我是靠着出卖李乾等人，或者是踏着李乾等人这块垫脚石上去的，我当时惊呆了！我昔日的战友怎么会这样看我？我很难过，后面还有难堪的事。1968 年 3 月，二炮来汉征兵，当时来汉征兵的还有铁道兵，准备去越南的。可能因我们学校是重点中学，二炮到我们学校来招兵了。我当时谁也没打招呼就报了名，经过体检，我被录取了，我真高兴。不知是谁告诉的，李乾的妈妈、姐姐突然到学校来了，就在陈××老师的那间寝室里。他们说了许多，意思是李乾还关在牢里，你们是头头呀，你们有责任。你怎么参军屁股一拍就走了呢？李乾没出来，你不能走，等等。面对泪流满面痛苦不已的李乾的亲人，我真是百感交集，禁不住也哭了起来，真不知道该对李乾的妈妈、姐姐说些什么，怎么说。旁边也围着些人，长时间的静场。最后是陈××老师，他也是眼泪涟涟地安慰李乾的妈妈：柳英发虽然参军了，他说了还是要管李乾的，学校也要管的，他目前只能这样了，问题往后拖拖，只会解决得好些。那场面今天回想起来心里也是酸楚楚的。

后来，“三反一粉碎”开始了。这样，我就没走了。当时方铭，张昭剑他们也不让我走，表面上是热情诚恳的，我内心却有疑虑，是不是因为学校的“12.5 事件”？这个疑虑当时我对谁都没有说，是因为参军要走之前，我向张绪提出要求：想见见李乾。张绪当时答应了，但一直没有安排，就是留下来之后，张绪也不跟我谈这个了，这叫我不安，因为当时我是把他们对我的态度作为“12.5 事件”的晴雨表的。但这个不安，后来还是因几个事的发生而打消了，尽管这个被打消的时间不长。

1968 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在市革委会参与组织领导这个工作。当时在大会小会上我都表态：我带头上山下乡。在一次会上我还对张体学（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原湖北省省长）说：干部子女要带头。我还点了他的子女在华师一附中要带头上山下乡。在省市召开的万人动员大会上，我发言说上山下乡运动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现在我们上山下乡，是红卫兵运动的深入发展，我们只能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并在会上宣布，我本人决心上山下乡，请市革委会方铭主任批准。当时方铭站起来带头鼓掌。在市革委会，方铭特别对我说，我答应过你到我

们 15 军当兵的，你要想去的话，现在还可以去。我当即说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去当兵呢？不过方铭这话，让我认为当初不让我去二炮，与“12.5 事件”没关系。1968 年 12 月 1 日，我们下乡出发时，刘海江（时任市革委会常委，办事组组长）特地到现场送我。下去不到半年，刘海江曾对我说，市革委会准备调你回来，愿不愿意？我说不行，不行，这不成了“下乡镀金”了，后来 1969 年国庆，二十年大庆，我下去的潜江县有两名知青代表去北京观礼，这是个特例，我是单独被通知，只身回汉到洪山宾馆报到的。梁仁魁（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副司令员，湖北省观礼代表团团长）告诉我，你的名额是武汉市给的。但我编在荆洲地区分团，当晚湖北团就离汉赴京了。这些，使我对“12.5 事件”处理的结果看好了，心情十分舒畅。

10 月 16 日，我随湖北代表团从北京回汉，即参加省革委会贯彻中央 9.27 指示扩大会议。会议名义批“北、决、扬”，实际上是批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我被人引导去见曾思玉时，他一反从前，脸色冷冰冰的，连和我握手都十分勉强。这是我到汉后第一次见曾思玉，说实话，心里发凉。接着，在荆州地区小组会议上，张体学也借杨道远的事敲打我。我年轻气盛，不懂政治，在会上同张体学争执起来。我的印象是一个下午的小组会，差不多就是我和张体学在讲。这是怎么回事啊？“北、决、扬”在武汉出现时，我们就不赞成、反对。中央指示要批，你批它好了，怎么批起我们来了呢？我问杨道远，他叫我不要吱声，参加会就是了。会议结束，我没随荆州团回去，自己留下来了。遵照中央指示精神，要去北京办学习班，我找到市革委会政工组长张景禄（军代表），要求参加。他说，学习班不要中学生。结果未去成。通过这个会，在北京观礼产生的那种兴奋喜悦的心情全没有了，我感到：厄运开始了。

在这之前，1969 年春节后，学校工宣队为“12.5 事件”把我们弄到学校办学习班，我、何儒非等相关人员都参加了。学习班主持人向我们介绍了孔威、傅强及其家人的情况，给我们很大的触动。我、何儒非等人都哭了。当时我们认为打死孔威、傅强，的确是错了，错得厉害。后来，交待事情经过。我们没有隐瞒，我们一直认为，事件的经过，在这次学习班就交待清楚了，并诚心诚意地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情还是好的。况且，刚才说了，

在 10 月我还作为知青代表去北京观礼，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了。但现在，贯彻 9.27 指示大会之后，我沮丧了，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了。

的确如此。之后学习班不断，学校工宣队办，下乡所在的区、县办，省、市也办，我不细说了。我粗线条地，主要还是讲与“12.5 事件”有关的，当然有时“北、决、扬”、“5.16”问题也要涉及一下。

1970 年新年伊始，就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12.5 事件”再次被提出，我们又被从农村弄回到学校办学习班了。这次主办学习班的工宣队人员全换了。据说上次工宣队都是造反派人员组成，这是一个变化。再一个变化，就是学习班除弄清“12.5 事件”过程之外，提出要揪“黑手”，好像我们几个学生不可能决定这样的事，这似乎成了规律：一有事就要揪黑手。比如说，1969 年春，朱鸿霞（钢工总一号勤务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李想玉（钢“九一三”一号勤务员、市革委会副主任）、吴炎金（工造一号勤务员、市革委会副主任）等三人写大字报，全市搞“反复旧”，除批他们外，就要大揪幕后黑手。“12.5 事件”黑手是谁？学习班意图很清楚，要我们指认就是耿其华，因为他是支持造反派的干部。他们直接对我说，祁援朝第一次来学校向李乾报信后，耿其华，宁汉文（时革委会副主任，教师），李乾等人开会就商定了，要集合人去 22 中抓人。耿其华对李乾等人说：你们去，打死了人我负责。我说我不知道这一情节，我参加的不是这个会。我在参加会的期间没有见到耿其华在场。决定“翻门坎”是这次会决定的，我表了态说打死。你们讲的情节就是真的吧，与我们这次会也不同。去 22 中抓人，冲突起来，场面肯定混乱，互伤死都有可能。耿说那个话也有可能，他是主任。但我们的会转了向，祁援朝第二次来说，他们走了。去 22 中抓人不可能了，而耿的话是具体对此的。后改为“翻门坎”，不是去 22 中了，耿不是对此表态。“翻门坎”是我们定的，耿不在场，不能负这个责。可能他说的那个话对李乾会有影响，但我们不知道。我还以第二天清晨去耿寝室拿长裤、中午开会耿发脾气为由拒绝指认耿是“黑手”。我反复说，“翻门坎”这事是我们几个人决定的，我表态先是不同意打死，后同意了。当时我虽不是学校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但以我的身份说同意打死，那份量是重的。他们就说，你们不要把担子往自己身上拉，这担子你们挑不起的，承担了对你们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反正我是软硬兼施，要我们指认耿是“黑手”。

往老师头上引，抓“黑手”不成。后来随着“两清”（清查“5.16”和“北、决、扬”）运动的深入，就把“12.5 事件”与任爱生（省革委会副主任、原省委委员、农村政治部主任）挂上。他们先说，任爱生说了“打死几个流氓没关系”，可能觉得这个说法没有份量，不久他们又改说成任爱生说了“打死几个老保没关系”。这个改变就意味深长了。我说不知道，也没听说任爱生说了这话。退一万步说，就是任说了，按语气推论，只能是事件之后，有人向他说了，他表个态而已。事件之前他是不知道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 22 中的符军在 1967 年 5 月营救任爱生之后（当时任爱生被三字兵绑架关押在 22 中，他跳楼把腿摔断，我们参加把任抢了出来），他与任的来往有一些。尽管如此，打死孔、傅的决策会是在我们学校由我们主持的。符军本人是中途被叫到会场的，我们告诉他才知道。当然他拍胸表态的作用不可小看，但完全不可能事先请示了任爱生，顶多是他事后向任提及了此事，怎么能说任爱生是“黑手”呢？还补充一点，省、市革委会成立之前，任爱生的大名我当然知道。之后，我与任爱生有多次见面（开会时或其它场合），但我对任爱生从未说过“12.5 事件”，他也没有向我说过，尽管他清楚知道我是谁。

黑手抓不着，事情的经过交待过去交待过来，就是那些了，后来就不提它了。他们一门心思在我们中间深挖细找“北、决、扬”、“5.16”了。我只说一件事，1972 年 4 月至 1973 年 1 月，我在省里参加学习班，做我的动力有两个人，一个是学校工宣队的工人师傅，一个是我下放的潜江县区银行的干部。学习班名义是“批林整风”，实际上是清查“5.16”骨干分子，具体过程就不说了。后来在 1974 年春季，批林批孔的时候，我被省委组织部通知从潜江回汉。其间我看到关于这次学习班的三个材料，一是这次学习班“268 名‘5.16’重要骨干分子名单”，其中有我；二是在这次学习班中“关于对柳英发的突破方案”，其中说我是“武汉‘5.16’分团核心班子成员、二司‘5.16’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三是在 1972 年 11 月拟定的（当时学习班还未结束）18 名特别‘5.16’重要骨干分子名单，其中也有我，上有曾思玉的批示：“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在适当的时机处极刑。”什么叫“惊心动魄”？什么叫“残酷”？我算是有体会了。

再回头说“12.5 事件”学习班。虽然指认黑手问题被我拒绝了，并且态度坚决，但说实话，一提起这事，我的腰杆子就硬不起来。在前段的学习班，一时

“12.5”，一时“5.16”，翻过去复过来。“两清”说我在哪里开会、哪些人参加了、发填了什么表，时间、地点、人物，说得活灵活现，我硬是顶了起来，因为那是根本莫须有的，自己心中有数，底气十足，但一提起“12.5事件”，腰杆子就软了。打死两人还伤四人（包括我校误伤的两名同学），人命关天啊，所以老老实实写交待材料，主要责任在我，痛哭流涕地说自己是不沾血的凶手、是主谋，表示认错、认罪，愿意接受任何处罚。但要以此为要挟，要我承认是“北、决、扬”、“5.16”是办不到的。说实话，从1969年春开始办学习班，之后几年，连续不断，我们还是很自觉“斗私批修”，老老实实地交待“12.5事件”。尽管“北、决、扬”、“5.16”分子对我们是莫须有的，但对某些错误思想对自己的影响还是认认真真作自我批判的。但越往后来，越是发现他们对我们不是“治病救人”，而是要往死里整。

从1973年8月至1976年8月，我多次找军区“三办”有关人员，多次向省市委领导姜一，韩宁夫，王克文写信，也在一些场合与省市委的赵辛初，姜一，王克文等领导当面谈，要求解决自己的问题。几经反复，对“12.5事件”总算有了个结果。1974年和1976年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人员在中法或在我单位讯问“12.5事件”。最后在1976年8月，未经庭审和宣判的程序就直接给了我一张判决书。其中关于我的一段是：“被告人柳英发参加枪杀孔、傅的策划会议，赞同被告李乾等人的犯罪活动，事后又参加纵容被告李乾逃跑的会议。破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对被告柳英发免于刑事处分。”

1976年10月6日，王、张、江、姚“四人帮”被强力隔离。1977年1月23日至10月19日，经武汉市委批准我在武昌车辆厂被隔离审查，之后在车间边劳动边交待问题，听候处理。1978年3月20日武汉市中级法院到车间以“开枪杀人”案为由逮捕了我。在监狱羁押了18个月又7天后，于1979年9月27日释放，口头要我回原单位。后来又行文，说“关押不当”、“补发工资”云云。

说来也巧，1969年9月27日，有那个指示后，我的厄运开始，1979年9月27日我走出监狱。所以我说过：“始于‘9.27’，了于‘9.27’。”其实也没有全“了”。1987年武汉市工交政治部对我文革作结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所列有三条。第一条，1974年团省委“补台”是参与张立国（时省革委会副主任，原新华工负责人）的“篡党夺权”。第二条就是为杨道远翻案。第三条就是

“12.5 事件”。工厂并行文，说柳英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记行政大过一次。行文前工厂有关部门找我谈话，说你今后入党、提干是不行的，但不会影响你技术职称的评定和工资晋级。对三条我当即都作了申诉。对第一条，1974 年我“补台”团省委书记，是省委的决定，省委组织部找我谈过话，赵辛初，姜一两书记当面对我谈过。张立国只是把我引到团省委去见了毛菊元（团省委书记）等人。第二条，为杨翻案的文字经过写的是对的，但性质完全不同。我们是翻杨道远“5.16”、“北、决、扬”的案。他们说杨道远是“5.16”、“北、决、扬”，但他不是的”。第三条，“12.5 事件”，法院已判，不能又打又罚。

后来我又看了“历史决议”，决议说文革的发动和领导者毛泽东动机是好的，犯了严重错误。而我们响应他老人家的号召，投身文革，动机却是要“篡党夺权”！当然也跟着犯了错误，错误不仅严重，而且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比他老人家犯的还严重，这叫人怎么想！另外，据说 1982 年初，中央下发 9 号文件，其中规定，作结论一般不用“政治错误”和“严重政治错误”的定语。我“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是 1987 年下的。以此对照，我就不属“一般”之列了。我这样的人物就如此特殊？！

风雨如磐的日子：一九七〇年的“一打三反”运动

• 丁 抒 •

文革初期红卫兵杀戮“黑五类”时，国家机器并没有直接参与政治迫害，谢富

治为首的公安部仅仅是配合红卫兵抄家，对红卫兵的杀戮不予制止而已。而一九七

〇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则不同。这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国家机器正式登台

，动用公检法机关，全国几乎同时进行的一次“依法”处置政治犯的运动。在全国

范围内，通过公审程序，正式地将政治犯一一判处徒刑，其中大多判了死刑、无期徒刑和长期徒刑。

“一打三反”与六八至六九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不同，前者的打击重点在“

现行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不是文化革命的产物，自从中共上台清算“历

史反革命”开始，“现行反革命”就应运而生了。以思想言论定为反革命犯，加以

逮捕、关押、屠杀，并非始于文化革命。中共建国前就以言论、思想治罪，处置持

不同政见者了。但是，就杀戮思想犯、言论犯的规模而言，这是毛泽东执政二十多

年间最大的一次。但这个“一打三反”的目标集中于文革以来“新生的”反革命分

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执政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

◇ 周毛联手“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武汉北、决、扬的指示》里反

窥而见：“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丁注：决心把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

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

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

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

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所谓《

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

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

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1）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湖南中学生、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

称“省无联”）成员杨曦光写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提出中共“与广大人民的

关系已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

命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的看法。该文在“省无联”内部传阅时被当局发

现后上报中共中央。一月二十四日，政府总理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康生等公开点

名“省无联”为“反革命组织”后，杨曦光等被关押。六九年十月左右，毛泽东在

湖南对“省无联”问题发出指示：“省无联的群众是好的，其头头思想是反动的。

”于是省人保组正式逮捕已被关押一年半的杨曦光等。（2）

此后，全国各地逐渐将阶级斗争的目标指向有“反革命思想”和“反革

命言论

”的组织和个人。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被折磨死去。周恩来担任组长的“刘少奇专

案组”为其“圆满完成任务”举行了酒宴。但文革本身并不因为刘的死亡而结束，

七〇年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送审

稿送毛泽东审批。指示说“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

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

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场重要的战备工

作。”“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周恩来递交送审稿时附

了一封信，说明“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3）次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后，该指

示下达全国，即所谓“一·三一指示”。

这份文件改变了中国自古以来包括中共执政初期的一贯做法：判处死刑报请朝

廷、中央政府批准，将杀人权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4）文件是这么说的：“杀

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5）这样，判处死刑便无

须最高法院认定，只不过备案存档而已。后来甚至把判处死刑的权力下放到县、

市一级，大迫害浪潮由是遍及全国。

这是当局镇压大规模地以言论、思想治罪的高峰。一九六八至六九年的“清理

阶级队伍”运动，主要是打击共产党执政前为旧政府服务过的所谓“历史反革命”

。而打击“现行反革命”，既能向上邀功，又能清除异己，还能恫吓反对派。各地

文革中的对立派虽已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大致解决，最后的镇压，特别是对思想

犯、政治犯的镇压却是在七〇年完成的。

◇ “一打”与“三反”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次日，周恩来又将《关于

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送毛泽东审批。

(6) 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同时又发出这两份文件，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

众，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指出“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

伺机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向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文件强调要打击“私设

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等搞资本主义的活

动。(7)

三份文件合而为一，成了“一打三反”运动。

“一打三反”那个“三反”，“贪污盗窃”和“铺张浪费”本与老百姓不相干

，反不到小民头上。在一个全部商业都由政府控制的国度，个别人的贩卖活动根本

算不上“投机倒把”。而所谓“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

地下俱乐部”等，极为罕见，无需来一场运动。可是上面说要搞，下面就捕风捉影

，胡斗乱揪。譬如陕西勉县“三反”搞出了“贪污”现金十六万元、粮票五万斤、

布票一点六万米，投机倒把牟利一点四万元。文革后复查，全是冤案。（8）

就全国来说，“三反”未成一个运动，所以“一打三反”其实只有“一打”。

但人们现在还在说“一打三反运动”，本文亦采用“一打三反运动”的说法，恰如

一说到一九六〇年人们就说“三年自然灾害”一样，其实只有“三年困难时期”，

并无“三年自然灾害”。大家都那么说，说顺口了而已。

◇ “一打三反”在北京

一九七〇年二月，北京市所有机关、学校、工厂企业都收到了一份“中国人民

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发布的《通知》。
该通知

首页的上部是两则“最高指示”，即毛泽东的话，时称“毛主席语录”，用的是大

字黑体以显示其庄重严肃：

最 高 指 示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

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

、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份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下半页才是《通知》的内容：

为了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

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审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将顾文选等十五名

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

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一日

在这份北京市军管会的通知里，首犯是顾文选。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通知里

是这样说的：“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顾文选，男，三十六岁，浙江省人，系反革命分

子，北京市清河农场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顽固坚持反动立场，

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刑满就业后多次策划叛国投敌

，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并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后被

引渡回国。”

北京市参加讨论的“革命群众”都相信顾文选“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绝

不会想到其“反革命罪”实属莫须有的冤案。

一九五七年时，顾文选是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的学生。在毛泽东发动的“整风

运动”中，该系开了个“控诉会”，由三名在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受到不同

程度迫害的同学上台控诉。先在系教学楼里开，后又移到学校办公楼召开大会。校

党委闻讯，欲予制止，要求至少去掉“控诉”二字，但遭拒绝。顾文选是上台控诉

的同学之一。会上，他还批评了某些党的干部：“这些名义上为人民服务的，又不

与人民同甘苦、高高在上的人，却自命为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他应该在群众有汽车坐了他才坐；群众有呢料的衣服穿了，他才穿；群众住上

洋房了，他才住……可是事实上那些人却享受着特权，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群众。

”他奉劝某些干部，“如果你感到没有能力做领导工作，就自动下来，回到群众中

来，可以去做工、种田，做不动了人民养你的老，千万别再坐在那里发号施令，贻

误国家。”（9）

这样，反右运动一开始，顾文选就被打成了右派。他觉得在北京无处伸冤，天

真地跑回杭州家里找妈妈。结果被抓回北京，判了五年徒刑。刑满后，他还是不能

离开劳改的茶淀清河农场。当局说是让他们留场“就业”，目的却是永不让这些人

回到社会做个正常人。在绝望中，他去看望也在清河农场“就业”的北京大学原西

语系讲师黄继忠。黄是当年那场控诉会的组织者。顾文选没有告诉黄他准备逃跑，

只是说：“我可能以后不能经常来看你了……”（10）设法逃出清河农场后，顾

文选北上到了苏联。但被引渡给了中国当局。成为北京五十五名现行反革命中的首

犯。

“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中还有一位一九五七年时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沈

元。沈元聪明异常，作为右派分子在北京郊区劳动改造期间，还写了几篇论文，投

给《历史研究》，为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黎澍赏识，设法将他调到该所工作。文革中

，黎澍成“反动学术权威”，无法再保护沈元。沈元被斗得受不了，买了盒黑鞋油

，涂在脸上扮成黑人，进了马里大使馆。他欲申请政治避难，谁知马里使馆转手就

把他交给了中共，他也就“罪该万死”了。

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发布的《通知》是这样说的：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

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

过刑。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

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妆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

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除少数例外，那批人都死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下。

行刑前的宣判大会上，行将被枪毙的人的舌头是被勒住的，因为要防止这些反

革命分子呼喊反动口号。因为写了一篇《出身论》而被处决的遇罗克和别人不同的

。他从没害过眼病，眼角膜可以派用场。所以临刑前，警察从那批应“立即执行”

的人犯中将挑出，塞进一辆警车拉离了现场。他的家人不明所以，直到近十年后才

得知，一份只允许医生阅读的内部资料曾披露：“政治犯遇罗克”的眼角膜被移植

给别人，手术成功……当初警方没有按例向遇家收取子弹费，大约就是因为眼角膜

已抵了子弹费。

在北京市公法军管会的《通知》里，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张郎郎被指“对我党和

社会主义制度极为仇视……出卖了我国大量重要军事、政治、经济情报。”自然应

予处决。但他的父亲张仃是中共老干部，张郎郎就是在延安出生的。总理周恩来与

张仃熟识，以“缓刑，继续调查”为名替张郎郎保了一条命。

◇ “专政是群众的专政”

要“革命群众”学习文件，讨论某反革命分子该不该枪毙，算是执行了毛泽东

的指示：“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由于通知上的“最高指示”已经说明要“坚决地

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已经指明该五十五人是“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

要狠狠打击。要“革命群众”讨论的并非他们是否反革命，而是要他们表态反革命

该不该枪毙。对反革命分子不表示革命义愤是不行的，弄不好“革命群众”也可以

转化成“反革命”，谁都不敢说“不该枪毙。”所以在那种场合下，革命群众讨论

如何处理的时候都异口同声：“枪毙，枪毙。”

中央美术学院讨论张郎郎该不该枪毙的会上，画家黄永玉、刘迅不敢反对，又

不愿表态同意，只好托词逃离会场。有人曾回忆这种“革命群众”的讨论会：

“当

时，有很多案件，有的是所谓‘破坏’甚么的，比如，损坏了毛主席像啊，书写甚

么‘反动词句’啊等等。我记得在那种场合下，一般的革命群众讨论如何处理的时

候都不假思索地说‘枪毙，枪毙’，都是这样讲。那时候叫做‘群众专政’。”

◇ “借斗”现行反革命以“教育群众”

北京市那批“现行反革命”在被枪决前的一个多月里，被分成小组，天天拖著

脚镣和手铐，分别被带到北京市内各处的万人大会上斗争、示众。各单位要把“一

打三反”推向高潮，需借用这批活靶子，连“中越友好人民公社”也把他们“借去

”斗争一通，就像一批就要报废扔掉的东西最后再使用一次似的。

一九六九年七月，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丁学雷”发表批判文章《为刘少奇复辟

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随后三个月内，人民日报每

隔半个月便发一整版的批判文章。上海煤气公司青年技术人员桑伟川写了篇批驳文

章，为周而复的这部小说辩护，结果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此后，全市各单位都

向煤气公司“借斗”桑伟川，以教育在本单位部门的群众。桑伟川前后被各单位游

斗了二百九十多次，方押送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11）

贵州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于一九七〇年一月张贴了一张批评省革委

会主任兰亦农的大字报，被警方拘留。此后成为阶级斗争的样品，被贵阳市各单位

轮番“借”走，接受“革命群众”批斗。二月二十五日，她被“借”到了贵阳市糕

点厂。在该厂的批斗会上，她喊出了“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的口号。当场被击

倒，嘴里堵上浸了油漆的抹布后，她被正式“逮捕”。从即日起她就开始绝食，省

革委会当局指示公安局一定要让她活到枪决的那一天，强行给她鼻饲。五月十日，

当局在贵阳春雷广场组织了二十万人的公审大会，将她拉去宣布“判处死刑，立即

执行”。宣判会结束后，这个女子又被拉上卡车满城游街。直到下午四时才被拉到

郊区野地，按成跪姿，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给她的最后洗礼，死时年仅三十岁。

(1

2)

◇ “一打三反”在各地

有文化的人是运动重点。譬如河南西平县，“五至八月，集中全县中、小学教

师举办‘一打三反学习班’，刑讯逼供，残酷斗争，批斗一百八十人，其中被逼自

尽四人，拷打而死五人，残八人。”山东沂水县，在“一打三反”中将公办学校的

教师集中，搞了四个月，批斗 173 人，处份 84 人，三人自缢身亡。(1
3)

上海市革委会把几年前几个反张春桥的大学红卫兵头头的案子重新翻出，定为

“反革命集团”，六七、六八年间曾参与过炮打张春桥的学生都是“新生”的反革

命分子。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声称“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中共中央委

员徐景贤亲自拼凑该集团的《罪行材料》，亲自写按语，不惜工本印了二十万册。

市委布署各高等院校集中追查曾参与“炮打”的学生。这个案子有近千人受到牵连

，仅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就有一百二十多人被逮捕、监禁，五人被逼自杀，三人被

逼疯。（14）

“一打三反”规模极大。譬如江苏泰兴县，“一千四百余名干部群众被关押、

批斗，严刑逼供，有的被迫害致死。”陕西户县搞出“反革命案件”662起，“

定案”处理483人。（15）河南安阳市郊区揪斗2392人。河北邢台县“挖

出”122名反革命分子。（16）

全国在“一打三反”中受迫害的至少有二百万人。

◇ 山西的“中国共产主义联盟”

三月二十八日，山西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对“现行反革命暴乱

集团”“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简称“共联”）的刑事判决书：

最 高 指 示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

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

……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

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特依法判决如下：

一、首犯徐关增，男，三十二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浙江省新

昌县人……

二、首犯王汝强，男，三十五岁，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人。其父系

留美学生，其母、兄、姐均在美国和新加坡……

三、主犯任大熊，男，三十八岁，旧职员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杭州市

人……

四、主犯刘世广，男，三十六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山东

省昌邑县人……（17）

十三人被定为“首犯”和“主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余十三名“

同案犯”则判处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

此二十六人多为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受害者。一九六六年八月，他们在劳改

农场里分别组织了“中国共产主义联盟”和“科学共产主义”两个组织。他们的人

生经历难以一一追踪，人们仅对任大熊、刘世广二人的身世略知一二：

任大熊：一九五七年时为北大数学系青年助教。整风时，他从图书馆借出刊有

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英国《工人日报》，与两位学生共同翻译后张贴在

校园里供同学们阅读。结果反右时三人均被打成右派。任被判处无期徒刑。
文化革

命开始后一九七〇年三月，山西大同公安机关军管会宣布破获一个名叫“中
国共产

主义联盟”的“现行反革命暴乱集团”，一举枪决十三名“首犯”和“主
犯”，任大熊是“
主犯”之一。

刘世广：五七年反右时为清华大学学生。被打成右派后，于一九五八年
被判处

有期徒刑十三年。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中国共
产主义

联盟”和“科学共产主义”合并的策划人之一。当然也够格做“主犯”了。
(一九

五七年整风时用笔名马崎张贴大字报《还政于民》的马维崎，以及写
《神·鬼·人

》讽刺个人崇拜的孙宝琮，可能均罹难于“一打三反”。)

◇ 宁夏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

一九七〇年二月，宁夏省会银川市“破获了一起重大现行反革命集
团”，一个

以十三名青年学生为成员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除吴述樟（银川二中一
九六八

年毕业生）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
句”的

旁空处写过“放屁”二字，算是“恶毒攻击”外，他们的主要罪名是书写各
种反动

的论政文章。其中鲁志立（北京农业大学一九七〇届毕业生）撰写的《什么
是法西

斯主义》是一篇讨伐当局法西斯暴政的檄文：

“（中共当局）禁止一切为世界公认的民主权利以至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

残酷镇压一切反对或仅仅不同意暴力统治的人民，甚至采用公开的恐怖手段。

“竭力推行种种仇视人类的反动谬论，例如宣传种族优劣论、反动血统论，人

为制造阶级与阶级划分论等来迷惑笼络一部份人以达到镇压人民的目的。此外还竭

力推行愚民政策，实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隶主义的盲目服从精神，宣扬个人迷信和

领袖至上的神话，从意识形态上已堕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义。”

“打倒法西斯！”

八月的一天，人口仅三十万的省会银川市将近十万人挤满体育馆看台和四周的

街道，观看对“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成员的“公开宣判”。因一名女生熊曼宜已在

关押期间触电自杀，“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中的吴述森（宁夏大学毕业生）、吴述

樟兄弟和鲁志立三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余者分别被判无期和有期徒刑。

受他们牵连的东北工学院学生刘唯勇被判处三年徒刑后死于狱中。（18）

◇ 福建的“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

福建省龙岩县适中公社农民谢洪水，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得政权时才十二岁，初

小文化。土地改革中，他们家分了一块土地，全家对共产党感恩戴德。一九六〇年

家家户户断粮，全公社饿死了四百多口人。他外出寻活路，帮人打铁，却当“

盲流”扣押，做苦工。家里妻子离去，孩子饿死。直到“三自一包”政策传下来，

龙岩的农民才有了一条活路。

由此，他和当地很多农民一样，仇恨毛泽东而热爱刘少奇。文革初，看到毛泽

东打倒了刘少奇，更对刘少奇充满了同情。一九六六年十月，他成立了一个“中国

共产党幸福委员会”，声称由刘少奇直接领导，进行秘密串联。读过中学的青年农

民谢永祺一九六〇年几乎饿死，积极响应。他们出版了两期《大众之声》的小报，

拟定了中央委员的名单，其中有刘少奇、彭德怀、彭真、邓小平、周恩来、朱德、

宋庆龄、董必武等，还有早年在闽西领导革命、龙岩老百姓都熟悉的邓子恢、张鼎

丞等，唯独没有毛泽东、林彪、江青，也没有他们自己。在他们编写的《军委密件

》中，强调“要跟刘少奇走”，“要推翻毛泽东”，“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兴起学习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高潮”……

一九六七年五月，他们又专门印发了《口号、呼吁书》：起来争自由争幸福！

坚决打消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反对统购统销！拥护缴公粮，拥护三自一包、四大自

由！中国共产党万岁！幸福委员会万岁！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刘主席万岁！万万岁！

六月，他们编写《党章》，主要内容是：“我们坚持执行三自一包、三合一少

、四大自由，取消阶级，取消集体；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毛林集团，
为人民

争取最大的自由和幸福。”

当局从三月开始立案，成立侦破工作队，“幸福会”却几乎成了半公开的组织

，近三百人参加了该会，农民入会的决心书上写明“拥护刘少奇”，入会相片反面

写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相邻的南靖县的农民闻讯，有的赶去要求入会。莆田、

仙游等县，有农民自行搞起了“幸福会”。

当“侦破工作队”宣传刘少奇的罪行材料时，绝大多数会员公开针锋相对地为

刘少奇辩护。谢洪水、谢永祺被捕后，仍然抗辩说：“大跃进……造成国家困难，

那是毛主席的错，刘少奇提出三自一包才扭转了困难局面。”公安人员问谢永祺为

什么“顽固”，谢回答：“不愿做刘少奇的叛徒。”

结果，谢洪水、谢永祺等十九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谢百添、谢寻兴在劳

改营中继续为刘少奇辩护，被加“罪”而改判成死刑，立即执行。未被逮捕的人中

，有十二人被逼自杀身亡，八人被打伤致死。有的人被枪毙后，妻子、母亲也被逼

自杀身死。（19）

◇ 形形色色的“现行反革命”

一、“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一九六五年底走出秦城监狱的反革命分子胡风，文革一开始即被送四川芦山县

的劳改农场；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再度被捕入狱。一九七〇年一月胡风因在报纸的

空白处写诗，但报纸上有毛主席的画像，胡风又成了“现反”。四川省革委会以“

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的罪名将他判了个无期徒刑。

陕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再

加上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时，他说过“哪里能活一万岁！”县军管会据此认定

是“现行反革命”，判其死刑，于一九七〇年六月枪毙了他。（20）

一九六九年三月，湖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县女社员丁祖晓给州委机关写信

抨击当局强迫农民供“宝书台”，逼得农民卖猪换“红宝书”、甚至把买油盐酱醋

的钱、孩子的书钱都拿去“请毛主席像”：“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还是哪一级干

部为了献媚而做的？”“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毛主席当封建帝王，天天朝拜

。”四月二十一日中共九大闭幕，全县都忙着扎“忠”字牌楼，挂“忠”字旗。丁

祖晓和姐姐丁祖霞连夜写了好几张传单，由丁祖晓进城散发：“这‘忠’字是地道

的个人崇拜。”她们呼吁“一切正直的革命人们”：“不要甘于做奴隶，起来造忠

字的反，革忠字的命！”姐妹俩被捕后。她们的同学、青年女社员李启顺决定声援

她们。她刻钢板、油印了一批《告革命人民书》，由她的妹妹李启才深夜进城散发

。于是这一双姐妹也落了网。一九七〇年五月八日，丁祖晓被拉到该县鹭鸶河边枪

毙。李启顺则被“借”给吉首县，在吉首游街示众后遭枪杀。（21）

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老教授张师亮曾在该系的学术讨论会上批评过毛泽东，认

为毛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

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这算犯了“恶毒攻击”罪。

青海柴达木戈壁滩的32108钻井队一位来自北京的青年人刘延德自办油印

的《中国工人报》，评说国家大事，于三月二十九日被捕。他在《毛泽东选集》书

页空白处加批语、打问号，又偷听“敌台”，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多次拉

到大会斗争。大约因为其父是位高级干部，被轻判五年徒刑。而另一位来自四川出

身平民的青年，仅评论过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位成员，又说过在甘肃见到光着屁股要

饭的人，被判了死刑。他被拉到戈壁滩枪决，无人敢为他收尸，遗体喂了野狼。

七〇年八月被枪决的宁夏银川二十二岁的青年学生吴述樟，最大的罪恶是：曾

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旁空处，写

过“放屁”二字。宁夏综合地质大队物探技术员余渭国在一九七〇年写了一篇文章

，说“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这句话是错误的，是唯心主义的东西。他这

样一搞，实际上把毛主席搞成偶像了。”为此他被判处死刑，惨遭杀害。（2
2）

二、“为刘少奇鸣冤叫屈”：

全国各地都有因不赞成打倒刘少奇而获罪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仅浙江省淳

安县就有二十八人“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被判刑”。（2 3）被枪决的到处都有。

福建，福清县有一位公社党委委员坚持自己的观点“没有理由发动群众批判刘

少奇主席”，于七〇年二月二十五日死在枪口下。

甘肃，宁县某农场职工朱守忠不赞成“断章取义”地批判刘少奇，拒绝表态同

意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于二月二十一日被处死。

湖南：因“现行反革命”被判十年徒刑的原《新湖南报》编辑钟叔河回忆：“

我还曾亲眼看到白发斑斑的老太婆，因为‘为刘少奇翻案’而被判处死刑当场枪毙

示众。”（2 4）

河北，省电信工程队青年电缆工人张坤豪公开已见，认为“刘少奇打不倒”。

被勒令检查，他就在纸上写道：“我热爱刘少奇主席。”“吹捧刘少奇”要付出代

价，他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不通知家属。尸体无人收埋。

湖北，安陆县财税所王竟成坚持认为“处理刘少奇是强权代替公理”，在巨大

压力下拒不改变观点，说“砍头也只矮五寸”，结果于七〇年四月二十三日被枪决。

辽宁，省委机关女干部张志新针对中共中央文件对刘少奇“叛变投敌”的指控

，于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写下《刘少奇是我们党杰出的领袖之一》一文：

“刘

少奇是不是叛徒、内奸、大工贼，我有怀疑。”“对刘少奇问题的决议，我是有疑

问、有保留的，是不信服的。”（25）为此，张志新成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即便在那样的高压恐怖下，全国仍有不少人挺身为刘少奇鸣不平。因此被定为

“反革命”而判刑、枪决的，多达两万八千多人。（另一说是：“据不完全统计，

全国因为为刘少奇鸣不平而被判刑、处死的，约三万人。”（26））

文革后最高法院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称：文革中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的一

万四百〇二人中，许多是“为刘少奇同志冤案鸣不平而被冤杀、错杀的”。

（27）

三、“攻击江青同志”：

许多人因议论江青而惨遭杀身之祸。周信芳之子周少麟因“攻击”罪被定为“

反革命”判处五年徒刑。上海一位舞蹈教员，听了别人议论江青的言论而没有揭发，

也被逮捕下狱。（28）

上海一个作曲家欲歌颂江青，采用越剧的曲调谱了一首歌。但是江青不喜欢越

剧，曾说过越剧是“靡靡之音”，因此该作曲家马屁没拍成，反被打成了反革命。

因为“用江青反对的曲调歌颂江青，就是污辱江青，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29）

中央美术院学生、学生会主席傅小石（名国画家傅抱石之子）是该校曾被许多

人包括院长江丰认为是个“天才”。江被定为右派后，他因对院长表示了一点同情

，也被打成右派。先在劳改农场呆了四年，在任江苏省国画院院长的父亲给中国美

术家协会负责人华君武写信求助后，被放回江苏省国画院当一名勤杂工。文革中又

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成员。在万人大会上被“公审”，判决书说他攻击江青

、反对文革，“罪大恶极，但因能主动坦白认罪，态度较好，从宽处理，判刑十年

。”（30）

二月十七日，江西省会南昌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二十二岁的吴晓飞被枪决。他

的罪名是曾写下两篇论文，说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从

政治上和经济上说来都得不到一丝好处”；抨击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

化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对刘少奇的迫害“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31）

四、“攻击”省市首长：

下放到宁夏贺兰县任四十里店公社书记的原西北局干部田涛揭发批判康生：一

九六七年八月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指示驻宁夏的部队在青铜峡地区镇压“保守派

”，打死、打伤各一百余人的事件，并于二月十二日在银川市街头张贴大字报批评

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康健民，当即被捕。三月十五日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次年死于狱中。

五、要求宗教活动：

在文革中，宁夏回族自治区严厉打击制裁回族的宗教活动，“把回族群

众的风俗习惯当作‘四旧’予以破除，还采取下指标、定任务的办法强迫回族聚居社队和

回民家庭养猪，并把这……当作‘新生事物’宣传推广。同时，宗教机构被砸烂，

宗教团体被解散，广大群众正当的宗教活动被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予以禁止

。”这种对宗教活动的打击，仅在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中一时有效，以后变禁而不

止，从未能杜绝回民的宗教活动。一九六九年前后，海原县回民的宗教活动被当地

政府无端限制，老百姓对此不满而斥责政府，结果被当作“反革命活动”而追究，

牵连两千余人，四十八人被逮捕判刑。（32）

六、莫须有的“反革命”罪：

一位退休了的知识份子在街道与人聊天，曾说过以前夜晚的天比当今

蓝，星星

比当今亮，月亮也比当今明净得多，如今被人揭发说是“公然诬蔑社会主义月亮没

有封建主义月亮好”，于是也成为“现行反革命”。批斗后被罚扫街，一直扫到几

年后文化革命结束，街道为他“平反”为止。

贵州榕江县小学教师莫定钦剪贴、编辑刊登在报章杂志上的各类人文资料、图

片，汇成了一本集子，作为教学资料供该校的教师和学生翻阅。如今那本资料成了

反革命罪证。七〇年九月，他被五花大绑押到县人民广场，在宣判大会上，判了二

十年徒刑。该校两位写抗议书为莫定钦鸣不平的教师也被判处“劳动管制”两年。

(3 3)

◇ 制造各类“反革命集团”案

湖南黔阳县高阳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一心搞出点成绩升官，打死自家的狗后，向

公社报告说狗被人毒死。公社书记正为揪不出反革命而犯愁，马上批评大队支部书

记右倾，并责成副书记主持“专案组”破案。副书记马上在大队部架起一挺机枪，

将社员抓去过堂。他声称揪出了一个十六人的“反革命集团”，枪杀了一人，打残

二人，将二人逼得自缢身亡。受株连者多达一百一十五人。 (3 4)

七〇年三月，山东安丘县弄出一个子虚乌有的“反革命杀人案”，“凭所谓检

举材料，对县运输公司马金城等三十四人非法关押，造成自杀未遂五人，含冤身亡

三人，致残一人。” (3 5)

◇ 越到上级越“左”越疯狂

甘肃静宁县农牧站的女技术员毛应星，一九五七年在兰州农业学校被定为右派

。在夹边沟劳改农场“劳动教养”几年后，回到兰州。当局认为她不配再当教师，

将她送到静宁县。文革中她发了些议论，如“现在就是有一些奉承的小人，将毛主

席包围了”等等。她本被判处五年徒刑，可是七〇年四月三日甘肃省革委会讨论她

的案件时，由于她的哥哥在美国，省委负责人说了一句“杀！很坏，家庭是反动的

。”于是九天之后，她就倒在了城外的一块麦田里。（36）

四川，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重庆分行方运孚经常与人谈论自己的观点：“刘少奇

是对的。他主张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有什么错？”“刘少奇打倒了，但这些主张

打不倒。”“彭老总的万言书字字闪金光……他的行为将与日月同光辉，与天地共

久长，千秋万代受人崇拜。”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公安局曾拒受银行革委

会报捕的要求。可是“一打三反”后，公安局为表示配合运动，改变立场将他收捕

。起初经办者拟判十五年，报到市公安局军管会，加至二十年；送重庆市革委会审

批，改成无期。最后，四川省革委会终审时改成了死刑。连原先经办此案的人都不

明所以：“这样的案件为什么判处死刑啊！”本来犯人可有十天上诉期，可是十天

还没到，方运孚就被拉去枪杀了。时为七〇年三月。（37）

◇ 疯狂的杀戮

一九七〇年三月间，湖南“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

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运动前原判决为“死缓”的政治犯全部从劳改农

场拉出，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包括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而开除学籍的大

学生张九龙。据长沙中学生杨曦光回忆：“我在劳改队，亲眼看到了五十多个从未

有犯罪行为和暴力行动的政治犯被处决。”四月的一天，当局又宣布次日将判处六

十多名反革命分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时，有线广播突然通知，宣判大会取

消了。原来，中央发现地方杀人过多，需有所控制，突然收回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

。这样长沙的一批反革命分子便幸运地由死刑改成了十五年徒刑。（38）

七〇年三月二十二日，兰州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二十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车游

街示众赴刑场处死。

一九七〇年夏天，南京市分两批枪决“现行反革命分子”，每批二十四人（其

中有两三名刑事犯）。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一一宣判后，二十四

名犯人被分别押上十二台卡车，每台押两名，开赴江东门刑场。卡车一路行进时，

每台卡车前方两侧各架一挺机枪，后面是一二十位全副武装的军人，两名犯人立在

后边，面朝车尾，挂牌游街示众。事前，革委会当局已经严密组织沿途各街道委员

会，划分了各自组织群众观看游街的地段。被通知观看游街的群众必须出席，且需

自带板凳，端坐街道两侧等候游街车队，接受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育”。当局的

组织效率奇高，从五台山体育场到江东门的刑场，沿途安排的观众竟有百万之众。

被枪决的包括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马列主义编译局俄文翻译王同竹、南京市第

二中学校长王飞等。

◇ 各种“消声法”大行其道

枪决“反革命分子”前使之发不出声音、无法呼喊“反动口号”的做法，在全

国大行其道：

最简单的是麻绳勒喉管：江苏省常州市某局长蔡铁根原是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

训练部长，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被撤职。文革初被抄家，发现他的日记本里有为彭

德怀鸣不平的话，即被揪出。到此时已被关了三年多。七〇年三月十一日，狱方用

麻绳将他捆绑后宣读“逮捕令”，紧接着便对他宣读判决书：死刑，不准上诉。他

刚要申辩，狱卒便勒紧已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说不出话来。接着就把他拉到

刑场枪毙了。（39）

竹筒塞嘴：广东海南岛白沙县枪决女医士官明华前，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

穿上铁丝，扎在脑后，使她发不出声。

“压舌板”：宁夏银川市枪决“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成员吴述森、鲁志立、吴

述樟前，使用了一种“压舌板”，使其在临行时无法喊叫。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

员马绵珍被处决前已经绝食两个多月，虚弱得站不起来，当局还是怕她呼喊“反动

口号”，在她嘴里塞进了压舌器，外面再扣上一只口罩，以免革命群众见了心存异

议。

割喉管：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

”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甘肃静宁县女技术员毛应星被枪毙前，

也被刽子手割断了喉管。

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等批准对反革命犯前施

行枪决前割喉管这一文革“新生事物”。第一个遭此处置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

青年教师贾承厚。一九七〇年五月，原中共中央东北局女干部张志新因“攻击无产

阶级司令部”被判处死刑，因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说“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

不杀为好”而改判为无期徒刑。所以，到七五年二月毛远新主持省委会议后下达处

死张志新的命令时，辽宁省已有三十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沈阳监狱当局割她喉

管时不施麻药，直接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以致旁边一个女管教员惨叫一声，昏厥

在地，被拖了出去。（40）

当时，青年画家韩美林因“思想反动”被下放到安徽淮南市瓷厂劳动，又因“

里通外国”而被押在安徽淮南市监狱。据他回忆，“十尺零六寸长的牢房里，经常

关上十四、五个人，每个人只有八寸宽的地盘。刑事犯和政治犯乱关在一起，政治

犯脚镣手铐，可以由刑事犯任意欺负。……一杀人，就早上四点拉铃，然后用几个

高音喇叭同时放样板戏。然后，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就进来拉人：

‘你！’ ‘你！’

‘你！！！’ 惊天动地的哭叫，随着是一排慑人魂魄的枪声……。” (4
1)

◇ 各地“支左”部队的首长与军管会负责人主持杀人
主持杀人的几乎都是中共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多半是在文革的血
泊中升

的官，对于人命何价毫无概念。一九七〇年十月，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听说
海南岛

白沙县一名女医士官明华在监狱里还写文章骂林彪，便亲自主持会议，将她
判处死
刑。 (4 2)

原来在军队担任军政委、军长的康建民在宁夏自治区领导人被打倒后调
任自治

区革委会主任兼党委第一书记。他公开发指示：“不服管教的，你们报上来，
毙掉

十个八个的。” (4 3) “不服管教”的反革命中，有一位名叫朱守中的。
他原

是上海一所师范学校的副校长、因反右运动中“动摇退却”被开除出党，作
为上海

“支援宁夏大队”的一员到中卫县中学任教。一九六一年曾被押去劳改。六
四年四

清运动，他被开除教职，下放农场。他一直“不服管教”，反革命言论：江
青“妄

想以‘老佛爷’慈禧自居”；叶群“要不是林彪的老婆，怎么也爬不进中央。
像这

种做法，岂不是成了夫妻党？” “把林彪的名字载进了党章，这还叫什么共
产党党

章？”“陈伯达自诩为中央唯一的理论家，看来也快不行了‘康生是中国的贝利

亚，一直搞‘契卡’的，宁左勿右，不知有多少好人吃了他的大亏……”其言论报

到康建民那里，便在“一打三反”中被“毙掉”了。

早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冼恒汉主持的兰州军区党委会议就决定判处甘肃师范

大学教授张师亮死刑了。七〇年三月十七日，冼恒汉又主持兰州军区党委会议复

议，维持原判。军区党委决定后，甘肃省革委会办公会议只不过复议通过，盖了个

橡皮图章。（4 4）

上海警备区的一个师政委徐海涛担任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组长后，听说上

海图书馆有不利于张春桥的历史资料。于七〇年二月九日到上海图书馆召开“深挖

现行反革命分子全馆动员大会”，他在台上名单点。他念一个名字，下面就揪一个

，马上按成“喷气式”。随后便宣布对他们“隔离审查”，造成一人自杀，一人自

杀未死，一人精神失常。（4 5）徐海涛有功于张春桥，所以张春桥当上了解放军

总政治部主任后，立即提拔他，给了他一个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

陕西安康县副县长雷云祺、县政协常委张开印，属一九四九年起义投诚后留用

的人员。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将他们枪决。该县“一打三反”中拘捕二五四人，

枪决二十七人，另致使二十人自杀身亡。（4 6）

安徽淮北市委书记高心泰等二人一九六七年被中学红卫兵拷打致死,副市长杨

杰等六人被诬为这件“政治谋杀案”的幕后“黑手”,于一九七〇年四月判处死刑

。市革委会主任是“支左”的部队首长。他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得意洋洋地宣告:“

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声就要打响了!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是,

现在有人……说我们头脑发胀,草菅人命。屁话!这是屁话!对于反革命,我们就

是要草菅。他们本身就是草,毒草。我们不但要杀,还要斩草除根……他们的头,

杀定了!我们杀定了……”(47)只因为待杀者中有两名高级干部,省里派人复

查,确证是一起冤案,那几名受迫害的人的头才没有被削掉。

◇ 杀人也有“指标”

陕西铜川煤矿有个“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党治国。他原是清华大学水利工程

系的学生。即便是在劳改,他也不忘宣传马列主义。他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辅导煤矿工人业余学习《共产党宣言》。这样便算犯了“现行反革命”罪。

在被斗争、毒打了一阵之后,铜川市法院将他判处死刑,上报陕西省待覆处决

。恰好那时省法院按指标行事,已作好计划枪毙四名,而各地当时报审的死刑犯共

七名,党治国排第五。竟因此而逃了一命。十多年后,他出狱回到母校,领到了一

张久违了近三十年的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毕业证书。而那四位排名在他前面的“现行

反革命”，虽然也被当局承认是冤杀而平反，却白白成了杀人“指标”的牺牲品（

4 8）。

应当指出，在那乱捕乱杀的当头，也有正直的司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

安徽合肥市一家无线电厂挖出了一个“三民党”反革命集团，全案二十一人，

合肥市中级法院判处其中四人死刑，二人死缓，一人无期徒刑，其余都判了有期徒刑

刑。安徽省高级法院的法官汪崇启接到报审的案卷，没大笔一挥了事，而是仔细核

查案卷，提审被告，查明该“反革命集团”的“张贴反革命标语”等罪名全部是办

案者为了揪出一个反革命集团邀功，通过刑讯逼供、诱供而编造出来的。案情澄清

，被告开释，汪法官一下救了四条人命。（4 9）

◇ 大批国人自杀

又有大批中国人被逼得走上了自杀之路。

青海贵德县，“一打三反”中十四人自杀。上海市南汇县“审查”、斗争了三

千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六十二人”。宝山县的“一打三反”，“有二百五十多

人作为敌我矛盾处理四十一人被迫自杀。”（5 0）

江苏溧水县，一九七〇年初开始“一打三反”，死亡十三人。广西钦州地区，

“发生自杀事件二三八起，其中死亡一八八人。”“河池地区自杀一六九人。”（

5 1）

由于“一打三反”紧接着“清阶”，所以许多地方谈到非正常死亡时，将“清

阶”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谈。譬如云南镇雄县官方记载说“省革委派工作队来镇

雄指导‘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一百〇七人非正常死亡

。”河南安阳市郊区笼统记载“清队”和“一打三反”共死亡二十八人。

(5 2)

◇ 全国逮捕二十八万多“反革命分子”

据历史学家王年一披露：“一九七〇年二月至十一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

、‘特务’、‘反革命分子’一百八十四万多名，捕了二十八点四八万多名，杀了

数以千计的人。”(5 3)其中，逮捕了“反革命分子”二十八万四千八百多名。

(5 4)

一九七〇年是文革十年间当局“依法”枪决“反革命分子”的集中期。
文革结

束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一九七〇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

出。宁夏错杀七十人中，一九七〇年判处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

，一九七〇年判处的有二十二人。”(5 5)

就全国而言，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应在十万以上。

注释：

1 《湖北省志·大事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第695页；宋永毅孙

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

2 杨曦光《牛鬼蛇神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分社, 1994)

第 10

0 页。

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第 7

7 页。

4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第 33

7 页。

5 同上。

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第 8

0 页。

7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第 33

0 页。

8 《勉县志》(一九八九年版) 第 461 页。

9 《右派论点选辑》(北京: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委员会, 1957)

第 32

页。

10 黄继忠与本书作者的谈话。十多年后黄继忠获平反, 回北京大学时才听说顾

文选被枪毙之事。

11 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发言简报, 周而复发言第 1 至 10

页。

12 老鬼《死刑犯有说话权》, 《中国之春》一九九三年八月号。

13 《西平县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0) 第 308 页; 《沂水县志

》(济南:齐鲁书社, 1997) 第 35 页。

1 4 《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1986）第239页；《历史在

这里沉思》第五卷第328页。

1 5 《泰兴县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第31页；《户县志》

（一九八七年版）。

1 6 《安阳市郊区志》（1990）第40页；《邢台县志》第36页。

1 7 《中国之春》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号第63页。

1 8 《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

1 ）第63至71页。

1 9 戴煌《直面人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三一五页。

2 0 《安康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九〇八页。

2 1 《春风化雨集（下）》（群众出版社，1981）第138至145页。

2 2 《当代中国的宁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172页。

2 3 《淳安县志》一九九〇年版第531页。

2 4 《新文学史料》（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第156页。

2 5 《共产党员》一九八〇年第二期，张志新《刘少奇是我们党杰出的领袖之一》。

2 6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第196页；

《党史文汇》一九八六年第四期。

2 7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六四九页。

2 8 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发言简报，吴晓邦发言第11页。

2 9 巴金《随想录》第一集。

3 0 《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人物》编辑部）二〇〇〇年第三期第一一六页。

3 1 《春风化雨集（上）》第四〇六页。

3 2 《当代中国的宁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 166 页。

3 3 《春风化雨集（上）》（群众出版社，1981）第 52 页。

3 4 《春风化雨集（上）》（群众出版社，1981）第 167 页。

3 5 《安丘县志》（1992）大事记。

3 6 《春风化雨集（上）》（群众出版社，1981）第二〇五页。

3 7 《春风化雨集（下）》（群众出版社，1981）第 107、113 至 11

8 页。

3 8 杨曦光《牛鬼蛇神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分社，1994）第 1

48、295 页。

3 9 《炎黄子孙》一九八九年第六期第 43 页。

4 0 朱建国《张志新冤案当初是逐步披露的》，郑兢业《忠烈失骨骸，张志新魂

归何处？》，2002.12.18 《亚洲周刊》

4 1 《十月》一九八〇年第二期第 152 页。

4 2 《春风化雨集（上）》（群众出版社，1981）第一九七页。

4 3 《春风化雨集（上）》（群众出版社，1981）第四一七页。

4 4 《春风化雨集（下）》（群众出版社，1981）第 90 页。

4 5 叶永烈《张春桥浮沉史》第十二至十四页。

4 6 《安康县志》（1989）第 908、909 页。

4 7 《历史在这里沉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五卷第 117

—118 页。

4 8 《人民文学》一九八六年七月号，陈祖芬《理论狂人》。

4 9 朱孝池等《法官轶事》（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第一九七页至二〇六页。

5 0 《贵德县志》（1995）第29页；《南汇县志》（1992）第138页；《宝山县志》（1992）第47页。

5 1 《溧水县志》（1990）第32页；《当代中国的广西》（北京：当代中

国出版社，1992）第132页。

5 2 《镇雄县志》（1987）第325页；《安阳市郊区志》（1990）第

40页。

5 3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337页。

5 4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第3

30页。

5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上）》（人民出版社

，1982）第649至650页。

2009年6月1日初稿

2011年12月27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一册（5）

第三篇 粉碎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

第一章 搞好斗、批、改

第五节 继续清查五·一六

一、文献资料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四日，江青等接见文艺口同志的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

〔江青、周总理、谢副总理等接见文艺口同志，下为部分摘录〕

江青：有一个事我想讲讲。就是“五·一六”匪团问题。“五·一六”是个反革命组织。他们的后台杨、余、傅，还有混进中央文革的坏人王、关、戚。这六个人一方面打着人民解放军的旗号；另一方面打着中央文革的招牌，搞形“左”实右，这就难免有人上他们的当，所以我们对于“五·一六”问题，要认真对待，不许他们翻案，只要交待好的，完全可以从宽处理，可以不扣反革命的帽子，交待得不好的，隐藏起来，那要查出来，可就不客气了。

姚文元：包庇那更是不许可的。

江青：这是很凶恶的敌人。因为他们在各方面破坏。首先破坏样板戏。什么样板团！有的根本不成其样板，乱七八糟，样板戏不等于样板团。北京京剧团清队最不好，你们那儿可能就有“五·一六”分子。你们老老实实哪怕告诉我一个也好，也算向组织有个交待。现在有两个“五·一六”分子没有翻案，我保护他们，将来可能不给他们戴反革命的帽子。他们打那样大的招牌，青年人很难……。当然，他们的口号很恶劣。“五·一六”不仅北京有，别的地方也有骨干分子，一定要搞出来。他们的组织一定要搞掉，因为大凶恶了。这些敌人让他藏起来摇身一变，将来成了秘密组织。你搞民主党派可以，“五·一六”是秘密组织，搞颠覆这是不允许的。

谢副总理：清理阶级队伍不能让敌人漏掉了。“五·一六”少数骨干分子是很凶恶的敌人。不管在哪方面，我们坚决要和他们斗争。在文艺方面他们钻进来

了。工、军宣队责任更大了。不能麻痹，包庇就更坏了。掌握政策把敌人查出来。这是保证样板的巩固，要加强队伍的政治思想工作。在政治上、艺术上江青同志都很严。这个严是思想弄不好就要恢复了。这是我两年学了点。弄不好（样板戏）就要这样。

总理：坚决贯彻江青同志讲话精神，把“五·一六”搞一搞。

谢副总理：把“五·一六”都揪出来，一个也不能漏。宣传队绝不能推拖。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八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全国全军卫生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八月十五日、八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全军卫生工作会议代表以及卫生部和直属单位军管会，革委会负责人时的讲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一九六七年你们大联委在北京体育馆开会，我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发表《六·二六指示》，因为当时你们联合不巩固，我压下来了，就是因为戚本禹插手。“三·一〇”会议戚本禹插手。

还有“五·一六”问题。我们在九月就知道了“五·一六”问题。卫生系统在中医研究院开个头，把叶心清抓起来了，我们事先知道了，要等待，要等待群众觉悟，事情早知道了。吴传启、叶心清、杜南，卫生系统“五·一六”就是叶、杜打头的。我们不愿扩大化。提出四个原则：先要本派搞出来。不要扩大化。联系到批判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保护群众。要谨慎。

开这个会（按：指戚本禹插手的“三·一〇”会议），把矛头对着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是有坏人出主意的，这是与吴传启有关的罗。同叶心清、杜南、“五·一六”有关系。叶心清是个江湖医生、政客，文化大革命中兴风作浪。在卫生口，他是“五·一六”挂帅的，杜南是跟他的，他出谋划策，利用广大群众，群众是受蒙蔽的。孙正同志是党委书记，他不同于群众，他有责任。先念同志向群众代表传达的话比我讲的还轻，结果回去后要打倒李先念，还大贴李先念大字报，说先念同志歪曲我的话。这完全是“五·一六”的话。

“五·一六”问题，你们各单位革委会、大联委自己搞清楚。社会上的“五·一六”，是由公安部专案三办负责查处，他们让你们查就查，要防止扩大化。

在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中，对真正的坏人不应放过。比如“五·一六”分子叶心清、杜南，是极少数的。我不能说卫生系统只有叶、杜两人，也可能有第三第四个，要把人证、物证、旁证拿出来。“五·一六”在每条线都有他们的人，在卫生系统也扰乱了一阵，一九六七年六、七两月吵得很厉害。

我们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反对黑线人物，反对苏修，反对国内反动派。“五·一六”是一小撮，是别动队，是极少数的。他们以革命的面目出现，搞秘密活动，是搞阴谋的。一般人是受蒙蔽的，不知道他们的目的，不算严重问题，但要承认错误，向群众交代清楚。

（以上摘自卫生部联合总部一九六九年九月六日翻印的“周总理《8.15》《8.28》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全军工作会议代表以及卫生部和直属单位军管会、革委会负责人时的讲话）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讲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极“左”（后边的坏人）不能说外交系统一个也不存在。“一外”批极“左”就搞得不深不透。“五·一六”是个阴谋集团，他要为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表面上是搞极“左”，实际上是要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当然，也不能说凡是参加“五·一六”的都是反革命，都不可救药，只要他坦白交代了，自己是受欺骗、受蒙蔽的，坦白了可以不戴帽子。要区别一般受蒙蔽的群众坏头头，更要区别埋在后头的反革命黑手。批极“左”，不仅是外（语学）院没有批深批透，从整个中央机关来看，也还没有搞深搞透。

原来搞“五·一六”、挖“五·一六”的时候，我们提了四条：第一，不要扩大化；第二，不要让老保翻天；第三，要区别对待，第四，要促进大联合。提了这四条，当时是需要的。现在，抓了大批判，区别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当然仍要把一时的极“左”同搞阴谋集团区别开来。但是，不能强调了不扩大化，就不敢动了，就缩手缩脚了。中央各单位还没有搞深搞透嘛！扩大

化，不加区别，不要区别对待，不对，但是，不敢动，不搞深搞透搞彻底，也是不对的。要防止两个极端。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九日，谢富治在教育部文化部学部的讲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谢富治在教育部、文化部、学部讲话，谈了清理阶级队伍，特别是抓“五·一六”反革命小集团问题〕

“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很凶恶的敌人，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和活动是直接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指向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指向毛主席亲自领导、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时，这个反革命集团把矛头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他们是破坏无产阶级文件大革命的。大家知道，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得到亿万人民拥护的，但这些反革命分子到处破坏，当然他们的阴谋未得带。

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正在前进。他们到处执行反革命夺权，抢去国家机密，到处抢档案，这是为了达到他们反革命目的，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搞武斗，用这种方法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们的罪恶很多，我们不能一一列举。只讲主要的。这一反革命集团，是在反革命两面派王、关、戚指挥下，干了一系列破坏活动。我们应当坚决同 5.16 反革命集团作斗争，要深挖细找。把这个集团中的反革命份子，这些坏家伙统统挖出来。

在文化系统方面，今天到会的即文化部所属系统、学部系统来讲，周总理讲过几次。关于与“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作斗争。要把他们统统挖出来。前天和各单位同志讲过一次，江青同志也讲过几次，特别 1969 年 8 月 14 日江青同志讲的很重要，我这些讲话，关于同“五·一六”分子作斗争的讲话，也就是根据总理及江青同志多次讲话精神讲的。学部和文化部系统方面，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据点。当然，还有高教部，这些单位军宣队、工宣队、军管会及广大革命群众在搞“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斗争中，做了很多工作，挖出了一些坏家伙，进行了大批判，但还是很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搞。

我们要知道文化系统的单位是很复杂的，反革命份子周扬、陆定一在刘少奇支持下把持这些单位，抵制毛主席的革命文化路线。他们招降纳叛、结党营私，

后来王、关、戚又在这些地方干了许多坏事，当然，这里要声明，这些单位多数群众还是好的，也包括多数干部，有些也是一个时期受蒙蔽。而且这些单位比较复杂，要承认这一条，也要承认多数群众是好的。在这些单位目前要放手发动群众，把清理阶级队伍搞透，特别是把“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搞深搞透，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让他们起来揭发批判，同时号召“五·一六”分子自己起来坦白。但是要坚决搞，放手搞，发动群众搞，不要只是少数人搞，要群众与专案相结合，发动群众是主要的。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就是在军、工宣队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来搞，依靠广大群众是主要的。要遵照毛主席教导稳、准、狠的打击敌人，如果讲只稳不狠，就会产生右倾，如果只狠不稳，必然就会左倾，稳、准、狠是统一，关键是一个“准”字。

要坚决遵照毛主席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一系列指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批判揭发从严，当敌人向人民、向无产阶级投降缴械后，在处理上就要给出路，正如毛主席教导的不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但敌人还没有搞清楚，还没有向无产阶级投降，就片面讲宽大也不对，也不恰当，这就容易放过敌人。翻过来，敌人已搞清楚了，也投降了，不给出路，也不对。总之，要坚决的搞，挖深搞透，搞彻底。但又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还是敌我矛盾。遵照毛主席教导，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主要的打击“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骨干的重要分子，“五·一六”份子一般成员，只要他承认了，改了，回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来了就成了。条件就是承认错误了，改了、回去了，就是“五·一六”骨干的重要分子。他们彻底投降了，那还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最后，还是要给出路的嘛！条件是彻底向人民、向无产阶级投降。

在彻底搞“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中间，注意事项是：

- 1、在大揭大批中注意摆事实讲道理，不准打人，变相打人，不准坐飞机，这些是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的。
- 2、每个单位都要依靠本单位革命群众，在工、军宣队领导下，依靠他们自己搞自己的单位，有别单位材料，可通过上级及工、军宣队传递，没有这一条就要乱，我们不能回到文化大革命初期、中期，有的单位，那个时候是必要的，当前如果那样一搞，搞的不好少数坏人钻空子。自己单位的“五·一六”分子，靠

本单位广大群众来搞，因为他们最了解，有的与别单位有联系，可把材料经组织关系送到那个单位去，材料要分清，哪些重要，那些是供参考，那些只有一点线索。

3、一个单位有两派革命群众的，应联合起来，在工、军宣队领导下一起搞。联合不好的，就要遵照毛主席教导，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的群众去处理。

4、既要大胆放手揭发批判，深挖细找，又要遵照毛主席教导，不能逼、供、信，重在证据，不轻信口供。

5、下放了的怎么办？是否就是这样：留在北京的在北京搞；下放的下放后在下面搞。下放是一件大事，是备战的重要措施。不能等清理阶级队伍完了再下放，该下放的还是要下放，下放以后在下面继续搞。同样可以搞，当然下放后困难多一些，那是次要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总是要把这件事搞深、搞透、搞彻底，不好我们就不收兵。

6、清队搞“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今天到会各单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必须抓紧搞，还有其他问题如清理叛徒、走资派、特务，若搞的不彻底，也还要结合到一起搞。总之，要用最大努力，放手发动群众，把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把这个凶恶的反革命集团搞深、搞透，不搞好绝不收兵。同时也要结合清队的其他方面的工作，文化系统，这方面的任务是很重的，当然这两方面，都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和政策特别是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来做。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一日，吴德在北京市举办的局县区级学习班上的讲话

关于批判极“左”思潮和清查“五·一六”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现在还存在这一问题，有的单位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还有普遍性，这是大事情，是尖锐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极“左”思潮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潮范畴的，可以说，是一种反革命思潮，实际上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表现形式很多，实际上是怀疑一切、反对一切，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五·一六”是最凶恶的反革命集团，罪行累累。1967年“五·一六”通知一周年发表以后组织起来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把矛头指向林副主席，特别突出的是反对周总理。我们总理几十年对党对人民对我

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无限忠诚。现在 72 岁，每天工作 12 小时，他们反对总理，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五·一六”已伸展到各个方面，不彻底查清是个隐患。过去是极“左”现在是极右，保护“五·一六”，右的方面搞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当前国际上苏修大兵压境，我们坚持肃清“五·一六”，否则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如果无产阶级领导权落在这些人手里，一旦打起仗来是内患。

从北京市来看，极“左”思潮影响大，“五·一六”活动较严重。反革命王关戚他们是极“左”思潮的根子，“五·一六”是他们组织起来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他们派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个周景芳，是叛徒、反革命分子，而且派进 160 到 170 人，周景芳是从学部哲学研究所来的，同反革命吴传启、潘梓年有联系。周本人是叛徒，在抗日初期叛变投敌的，而又接受敌人任务回来的。周调市革会，并调来很多人未经过核心组，有的是戚本禹派来的，来把持市革会的工作。其中许多人是“五·一六”分子，实际是夺领导权的，以极“左”面目出现，打着“造反派”的旗号，利用职权，背着谢副总理和核心组，干了很多坏事。他们反对谢副总理，写一封最后通牒的信，进行攻击。周到上海学习，到山东学习。去上海学习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搞张春桥，一个是拿上海的经验回来搞谢副总理。到山东对王效禹讲，北京市核心组是保守势力。回来一本一本作报告，煽动极“左”思潮，挑动群众斗群众。几乎北京的武斗都是他们组织挑动起来的，然后又把别人派出来处理武斗。处理好、处理坏都是搞你，他自己从未出来一次制止武斗。周在学部专门整理周总理的材料，把国家的机密印出散发，另外，周利用职权把市革会主要几个组都控制起来，政治组周兼组长，自己控制，副组长是学部来的，另一部分是动态组，组长王乃英（现行反革命、林杰的老婆）。他们搞每日动态（收集情报、特务活动）。原来不知道，在一次会议，周出去，刘建勋一看，是每日动态，他们没有人在就看，有人来就压在屁股下，是鬼鬼祟祟的，他是什么“造反派”？管干部的是王乃英，文教组也是他们调来的李贯英当副组长，实权在李的手里，把组长丁国钰架空。市革会办事组长杨袁，从学部调来，是“五·一六”分子，是留苏学生，有反对赫鲁晓夫的，他都要报告。再一个注意的是工交组××，不是个党员，他是工交组政治组组长。王若明是戚本禹派来的，在 1967 年写过文章，反解放军的。周景芳在工交系统派许多的调查组，

王乃英到京棉二厂，矿务局也去过，财贸组支持“财贸尖兵”，西单武斗是周景芳布置的，就是我们傻瓜，去制止武斗。还有火烧英代办，当时我很着急，叫周景芳同我一起去，他不去，英代表要求解放军保护，影响很坏。他们是牛鬼蛇神，他们到市革会前二个月就开黑会，北京市的“五·一六”活动，就是在市革会指挥的。

他们在市革会和在学校安插一帮人。陈伯达同志告诉我，你们被控制了，我们还不了解情况。有一次开会是否叫周去，伯达就不同意。1967 年以后才知道，就逐步处理，先把周调走，把杨袁调到修改入党章程办公室，以后把周、杨逮捕。

王、关、戚一手抓天派，一手抓地派，凡是一派的地方，都要分为两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对王、关、戚，首先是中央发现的，那时市革会忙于大联合、三结合，对于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不够。譬如出现反复旧，是极“左”思潮，山东、武汉搞了一下反复旧，市工代会也有反复旧小组，他们把好人打下去，坏人上来掌权，搞无政府主义，把个人、群众组织凌驾于党之上，革委会之上（刘插：有些老大难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过去是极“左”，现在是极右，这是阶级斗争，思想迟钝抓得慢，是错误的，是跟毛主席不紧，阶级斗争觉悟不高，领导一般化，官僚主义，现在回过头来看，过去认为对的，现在不一定对；过去认为不对，现在也可能是对的，要总结经验提高认识。

大联合的问题，是革命的大联合，那时强调反对资产阶级派性联合起来是对的，但有两个问题要想一想。革命大联合同什么人联合，能不能同反革命“五·一六”联合，能不能跟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联合，那时看不清，认识有个过程，但同什么人联合要弄清。再一个怎么样大联合，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大联合，经过斗争达到团结，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批倒，团结的目的是共同对敌，如果保护“五·一六”不行，要清除“五·一六”才能团结，否则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要犯错误，要按照三条原则搞好团结，做了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情要肯定，不要把他的坏事掩盖。

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些群众组织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对的，现在不紧跟伟大战略部署就不对了。造反精神强，运动初期是对的，但造反精神强，是有阶级性的，开始对的，后来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解放军就不对。原则标准是否拥护毛主席、拥护毛泽东思想、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

二、我们的思想是随着变化的客观情况前进，文化大革命经过三年半，经过斗争，对群众和人民是考验，在新形势下积极分子队伍有变化，在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是进步的，在其他问题上是中立或是阻力。在运动初期没有跟上的，经过教育后，在运动中成为积极分子。事情本质暴露清楚是有过程的，认识一个问题也是要有一个过程，在进行新的斗争，积极分子要重新组合，在反“五·一六”分子时，他本身存在极“左”思潮或“五·一六”分子，就不能是积极分子，有些人有变化不能依靠。

三、要认真总结经验，要总结文化大革命全过程，要研究新问题，从极“左”到极右，是有规律性，提高自觉性。批判极“左”思潮，抓“五·一六”分子，领导决心要大，要注意方法，选好突破口，面上要抓三分之一或少一点。

四、摸清情况，对极“左”思潮严重的单位，要批透，要注意政策，不打人，不逼供信，决心要大，方法要对，要按照 8341 部队的经验，打好这一仗。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二日，谢富治对批判极“左”思潮和清查“五·一六”集团的几点意见

〔吴德传达谢副总理和市革委会领导对批判极“左”思潮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几点意见，记录稿〕

一、态度要坚决，步子要稳，一定要搞好。

从一些单位揭发出来的问题看，过去有“左”思潮严重的人，现在又极右，抵制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反动的极“左”思潮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干了大量坏事，不彻底批判，不把这批反革命分子彻底挖出来，就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对这个问题，毛主席很早就作过重要指示，但是我们没有很好的理解，没有很好的落实，斗争得很不力，这是一个错误，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不忠。现在对这场斗争必须采取坚决的态度，对王、关、戚、周景芳、林杰等一伙等反革命分子煽动和利用的极“左”思潮，必须从思想上批深批透，把“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彻底挖出来，肃清它的影响。

运动中要注意政策，首先把群众发动起来，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挖出来，其次才是按照党的政策，处理，步子要稳，就要加强领导，有步骤的开展。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学习六厂二校的经验，这样才能把这场斗争搞透搞好。

二、要抓重点，面上进行正面教育。在抓重点单位的同时，面上要普遍开展正面教育，搞好调查研究，作好准备工作。一个局选一个重点单位，或者一个系统选一个重点。在一个单位里又要抓重点事、重点人、重点问题，然后重点突破。这样打歼灭战，才能取得经验，指导其他单位。因为这是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全面铺开就可能搞乱搞错。我们的态度一定要坚决，一定要搞好，不能搞乱。

三、以什么标准来划分极“左”思潮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问题。这是以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林副主席的态度，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对周总理的态度。以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和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为标准来划分。他们主要是反对“三红”，但是不能因为冲击、反对哪个革命委员会和市革委，反对本单位解放军和某个人，就做为极“左”思潮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来进行批判和清查，这样就会乱了。

另外，对打、砸、抢，也要使具体分析，它是否带有政治性。同时还要注意他们在思想上与王、关、戚、杨、余、傅、周景芳等有没有特殊的关系。

四、要两依靠。上靠毛泽东思想，下靠广大革命群众。要搞好这场斗争，首先要上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觉悟，这是根本。这里也包括了依靠群众、执行群众路线。我们要积极发动群众，坚决依靠群众，很好地组织积极分子队伍。运动初期的积极分子，其中有的落后了，有的腐化了，有的本来就是坏人。对一些情况要做历史的、阶级的分析。除了坏人之外，总是有些人被替换，这是合乎规律的。但是一般的不要采取大换班的办法，我们的责任是对他们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如果忽视这一点，也要犯错误。

五、思想要批深批透，不要急于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严禁逼、供、信，严禁打人。领导和军宣队不要随便点名，必要点名时也要有把握。选对适当时机，而且不宜太多。主要是把他所在单位的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思想批判要抓住主要问题。

六、不要把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工厂企业和学校不同，要注意方法，还是业余搞。总之，决心要大，步子要稳，要加强领导。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四日，吴德北京市举办的区县局学习班上的总结发言

会议到今天已开三天了，比原计划多开一天，因为来的时候，思想准备不够，因此要多讨论一天，加深认识，提高认识，把批判“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一仗要打好。会议期间谢副总理两次召开座谈会，针对情况，作了明确指示，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决心更大了。

一、要充分认识到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重要意义，跟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通过这几天学习讨论，认识到极“左”思潮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潮，“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林副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为人民勤勤恳恳工作的周总理，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到处搞打、砸、抢、搞破坏、盗窃国家机密，抢档案，这是他们的反革命阴谋，他们打砸抢，搞破坏，他们打砸西单商场，为什么把东西破坏？阴谋破坏手表厂，二型表都是过了关的，他们把模具毁掉，他们搞巨型的表，搞新模具，结果作出来的表一天要差一、两个钟头。去年他们计划生产卅万块，结果只完成五万块手表，我看就是有人搞破坏。抢档案是泄露国家机密，从市革委会抢走，再弄到学部照象。抢化工部档案，有的把尖端图纸抢走，来盗窃国家机密。“五·一六”罪恶很大，是王、关、戚、杨、余、傅、萧华他们搞起来的，他们是野心家。在他们的操纵下，搞了许多阴谋活动，在北京市到处伸手，反革命分子周景芳来市革委会妄图篡夺市革委会领导权的。周景芳是北京市革委会里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头子，王、关、戚、杨、余、傅、萧华是一伙反革命分子，到处伸黑手，以极“左”面目出现，煽动和利用极“左”思潮，干了许多坏事。“五·一六”的问题要好好查一查。周景芳在各方面伸黑手，而且发展“五·一六”。他发展支队，发展司令、副司令。在卫生系统他也干了许多坏事，在财贸系统也派去崔许龙。崔许龙是“财贸尖兵”的后台，和洪振海，王景瑞勾结在一起，西单武斗指挥机关在市革委会。上有周景芳，下有财贸组崔许龙，我们去制止武斗，怎么制止得了呢？他们事先是布置的，我们这些人是傻瓜，不知道。现在才明白，在市革委机关周景芳干了许多坏事，在门头沟都有插手，他们的影响还没有彻底揭露和批判，极“左”思潮在不少单位存在，过去是极“左”，现在是极右，保护坏人，保护“五·一六”。很明显，极“左”思潮的人保护“五·一六”，保护坏人。

我们有错误，见事迟，抓得慢，大批判没有搞起来，坏人没有都挖出来。有些单位清理阶级队伍不彻底。清查“五·一六”是尖锐的阶级斗争，是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场严重斗争，是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场严重斗争。如果对极“左”思潮不批，“五·一六”不抓出来，讲阶级斗争是空的。要下定决心彻底的挖，在这一场斗争中要爱憎分明，要坚决，要果断，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忠诚，要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是反革命，反对周总理也是反革命。要和他们斗争到底。这就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如果思想不明确，斗争不坚决，就要犯方向、路线错误，就是对毛主席不忠，对党对人民不忠，回去以后要敢于领导这一场斗争。没有什么可怕的，无非是过去支持的一派有极“左”思潮，干了些坏事，一反怕涉及自己，怕反到自己头上。当然这事要历史来看，整个说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有些具体事，当时看来是对的，现在看来是错的。有些事是当时看错的，现在看是对的。有些事当时支持他是对的，后来他发展中违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发展到极“左”思潮，就不能再支持。有些事当时支持就是不对的，错了就检讨改正。对意识形态，毛主席讲：这一仗不好打嘛。二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一时看不清楚，我们要和错误划清界线，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肯定，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要批判教育。要批判教育，要作分析，如果你过去支持过的一派有极“左”思潮，更应该起来反对，要好好批判，这样你就没有派性，就主动了。不能因为你过去支持过或支持得对，不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出发，感情用事。不积极、不坚定是不对的。还有的同志过去受一派冲击，这一派有极“左”思潮，怕被人说打击报复，怕再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当然对我们自己冲击也是应该冲击一下，因为我们这些人有这样和那样的错误，是不少的，冲击错误有什么不好呀！不能算个人被冲击的账。但是，对于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总理，反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论他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或是其他反革命分子，都要敢于同他们进行斗争，否则就没有革命性，就没有立场。不能因为自己的私心杂念而不敢斗争，那就犯错误，只要我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什么都不怕，有的顾虑，甚至犯了错误，只要忠于毛主席，

就什么都不怕，有的顾虑是不是会引起资产阶级派性，会不会怕搞不好，搞乱。在进行这场斗争，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警惕阶级敌人钻空子，只要我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按照党的政策办事，认真学习 8341 支左部队经验，按照三条原则处理问题，就能既批判了极“左”思潮，清查了“五·一六”分子，又能促进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8341 部队的经验是必须和极“左”和右的斗争，才能真正实现革命大联合。所以，怕是不对的。当然对问题的认识有过程，问题没有暴露清楚，对本质一时看不清，这个不要紧，要把问题搞清楚。认识问题有过程，处理问题也要有步骤。譬如，在市革委会有的人的问题发现了，发现后，有的动了一下，有的没有动。像市革命委员会有些委员现在不让他参加会议，并没有对他批判，如周景芳的问题，在戚本禹没有打倒前，先送回学部，没有动他，以后才逮捕。杨袁从办事处调到修改党章办公室以后才逮捕。认识有过程，处理有步骤，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处理。但是不管怎样，一定要认真的把问题搞清楚，是坏人要揪出来，是极“左”思潮要批臭。

二、决心要大，要放手发动群众，要注意政策。

主要是把群众发动起来，把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群众运动搞起来，同时在运动中注意掌握政策，首先是要批判，要深挖细找，把“五·一六”挖出来，要彻底肃清。要以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对周总理的态度作标准。是反对还是拥护，这是唯一的标准，不能以其他任何作标准。这样才能区分敌我，分清是非，才能使这一运动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发展，决不能以反对不反对你那个单位革委会、军宣队、工宣队中的某个人作标准。如果以这个作标准，会把运动引向错误，把运动搞乱，很危险。群众向军宣队，革委会提意见，应抱欢迎态度，对改进工作，改进作风有好处，也是他们所需要的，群众中向中央写信反映问题，这是他们的权力，应当保护，决不堵塞这一条路，在运动里头一定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极“左”思潮，“五·一六”干了许多坏事，但是有极“左”思潮的人不一定都是“五·一六”分子，不一定都是坏人。极“左”思潮严重的没有加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组织，也可能有其他坏人，其他反革命分子。他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对造反派要历史分析，一个组织里头出了个“五·一六”分子，出了一个坏人，不等于这个组织是坏的，不等于这个组织的群众是坏人，比

如“师大”井岗山头头里头有坏人，不等于这个组织的群众都坏，但是极“左”思潮的影响必须肃清。在矛盾性质还看不清楚的时候，批极“左”思潮时，不要急于给戴帽子，对“五·一六”的斗争还讲稳、准、狠、稳不是右，狠不是极“左”。要执行给出路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重信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不准打人，搞变相体罚，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要打击“五·一六”革命集团中的骨干分子，重要分子，一般成员只要坦白交待，改邪归正，可以从宽，即使是骨干分子，重要分子，只要彻底，真正投降，也要给出路，但是首先是怎样挖出来，不要手软。什么“一起战斗过”。通县防护厂有一个人是九分站作战部长，姓刘的，是流氓，什么造反派，他造反不是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而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很不地道、会造谣，什么林副主席接见过，在谢副总理家里吃过饭，有时间在家里坐坐，总理给他洋火，张春桥给他打电话，这是造谣，是政治骗子，说什么成立革委会要老谢挂牌子，他搞邮电大楼时，胡说是吴德支持的。

还有的厂整党打板的，有的党员挂起 50%，这行吗？有的“纳新”把他的老婆也纳进来了。这种人是靠不住的，对这种人不要斗争吗？不批判极左思潮，对有些人的问题弄不清嘛！不抓“五·一六”是隐患，影响肃不清，他们是造无产阶级的反……（下缺）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讲话

〔晚八点三十分至二十五日凌晨零点四十分〕

周恩来讲话

（略）

第二个问题，对有关问题要说的就是“五·一六”不单是在六七年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才有的，活动是有根据的，早就存在，通过两年半，逐步认识，得到了一些资料，现在比以前认识清了。但还未公布，必须和群众上下结合、内外结合才能搞清楚。现在还是要继续揭发、批判，既是反革命阴谋集团，阴谋就不是公开的，是秘密的活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使用两手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些人隐藏在最革命的中央文革里，最革命的军队里头，就必须深挖，需要冷静，

运动中掩盖一种极“左”思潮，个别人对现状不满，否定一切，掩盖“五·一六”的反革命阴谋。年轻人容易受蒙蔽，为首的、协从的、受蒙蔽的要区分，既要深挖，又要谨慎。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从文化大革命前就存在社会上，存在于机关，司令部内，但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的暗中活动，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小撮，他们有的人原来就是跟他的，有的是派出的。

下面把“五·一六”著名的头头讲一下。

一个是吴传启，湖北人，是国民党特务，参加过伪国大竞选，是宋洛介绍入党的，宋洛是武汉市宣传部部长，参加了造反派，他联系的人是国民党特务，托派王明分子，还有大资本家，他们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这些人到处“串联”。

“九大”前后，反复旧他们都搞了，根就是吴传启。吴传启解放后跑到中央计委，最后到学部。在六十年代，可能在以前，他和关锋、林聿时三人，他们在学部写文章，用假名字，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叫撒仁兴。

这条线，还有叛徒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哥哥，在国民党反动时期被捕，现在查明，他和国民党勾结，通过国民党 CC 特务，把他放了。因为我们不清楚，他还作了新华日报的编辑，解放后到了学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动摇的态度，关锋亲自去，后是吴传启成为当时学部的头头。四月份在上海修改“五·一六”通知时，他们闻风派吴传启到上海打听消息，回到北京后，在学部写了第一张大字报（江青同志插话说：“军队中还有刘志坚，谢堂忠，陈亚丁，唐平铸。”）在起草通知过程中，他们企图把吴、潘拉进中央文革，由于江青同志的反对，其它同志不同意，而没有得逞，但王、关、戚、王任重、刘志坚、陈亚丁，在邓小平的推荐下，混进了中央文革。但领导是好的嘛，主席在“九大”讲了这个问题，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出了几个坏家伙，陈独秀、张国焘，但这不影响我们，党还是光荣、伟大、正确的。我们党是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的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央文革小组揪出王、关、戚，并不影响中央文革的大方向和伟大功绩，王、关、戚，也是中央文革自己揪出来的，对他们是慢慢的逐步看清的。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同志发现最早，说明不仅是学部这一条线，绝不是学部这一条线，文艺方面更多，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就是一条总根。关锋就说过：“以后党恐怕还

是刘某人的。”实际上他就是黑线人物。陶铸到北京来还和吴传启联系。（康生插话：陶铸还叫吴传启到中南海。）

王力在山东，他本人加入国民党，他妻子是叛徒，王力在大革命时参加革命，康老清楚。（康老插话：一办的同志要注意这个问题。）（江青插话：“三个办公室都来了？答：来了”）（康生插话：这个问题，我当面告诉中央专案组，他们根本不理这个事情。）王力的老婆的妹妹的丈夫在教育部是个司长，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在张家口搞无线电，很活跃，和三军冲派联系；一个在“一外”，也是红卫兵团的，和 616 在一起。（康生：还有一个妹妹在外交系统）（江青同志插话：王力的屋子里有二条电话线，其中占用了国际线。）关锋利用老婆、小舅子在东北搞“831”。王力是支持王稼祥的“三降一灭”、“三和一少”。六二年在莫斯科参加国大，完全代表修正主义的东西，回来他还说是对的……邓小平很称赞他，后来挽救他，他说要和王稼祥划清界线。后来让他写文章，以后到中央，他实际上是暗中有联系。

关锋根子在学部，和军队有联系，原来是萧华的部下。要继续查他的历史，他老婆在红旗杂志社，完全做“五·一六”的联系，和文化、宣传、学部联络，和林杰联系在一起。关锋企图篡军权，“抓军内一小撮”他是和王力大喊大叫的。王力在八月七日要夺外交部大权，八月七日的讲话人们取名叫“王八七讲话”，于是“五·一六”就贴出天安门的两条标语，“热烈要求姚登山代理外交部部长。”、“热烈要求关锋代理总政治部主任”的大标语，小字报也登出来了。王力的野心就更大了（康老插话：想当总理）所以他们野心毕露，从根子上说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根源的。

戚本禹是个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他还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厂也到了，工厂到二七车辆厂、首钢。所以工业单位也要搞，文化方面他和体委的刘长信，卫生系统的孙正有来往。他两个儿子证明也不是好人，他能伸就伸，对样板戏也插手，乱改，特别是对交响音乐《沙家浜》和《白毛女》。杨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满意，大树特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登出，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后来登在第二版上，杨成武还不满意。戚本禹道歉，王力还给送像章慰问。互相勾结，暗地活动，以后才揭发出来。在中央办公厅有彭、陆、杨还有田家英、他完

全是跟着田家英走的。田家英有很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派人搜他们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就田家英的没有收回来。有主席的手稿，丢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杀灭口。戚本禹这个人写东西也是不能写的，过去我们也是受了骗的。《评忠王李秀成》那是根据主席思想，请历史研究所帮他写的，以他的名义发表的。这说明对一个人的认识是要经过相当一个时期考验的。经过考验知道戚本禹是这么一个人，他的根子是很深的。冲机要局，抢档案，他（与叶向真）他们是合谋，后台是杨、余、傅，萧华。在六六年无产阶级造走资派反时，造反派群众在街上搞四旧，（叶向真靠）和他父亲（叶剑英）的关系，首先冲军事科学院，他们采取的是绑架的方法。戏剧学院的叶向真，他说是造反派，年轻人造反好么，造走资派的反。现在查清，搞军队带头的就是他们。（江青同志插话：首先动手打解放军的就是叶向真、刘诗昆。）第二件事比较严重的，六六年底他们搞突然袭击，将彭罗陆杨和文化部的夏衍、林默涵、田汉、阳翰生，还有其他人一下子逮走，然后让他们游街，我们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走的。他说“可能是叶向真，我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他说是叶向真，后来把叶向真叫来。她说她是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这些单位搞的，关在和平里中央乐团一间大屋子里，第二天就要游行。这样全城会轰动，对我们不利，非搞过不可，后经卫戍区把他们接过来。这样一件事，我们不允许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面前绑架，这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行动，这样做超过了武斗，变成了绑架。后来，很多地方也跟着搞起来了，部队冲派也搞这一套，北京军区文工团“星火燎原”他们知道了，抢了先了，首先搞起来了，把北京的运动搞的非常不利。

在“五·一六”通知发表之前，他们就做了很多坏事，而这时，我们逐步发现吴传启这个根子，这个是不得人心的，在中央文革开会时三四月份，更早在六六年底，提醒他们要和吴传启划清界限，他们退了一下，他们知道了中央文革知道了是不允许的，他就准备撤退，让吴传启、林聿时到河北赞皇县农村搞根据地，准备上山打游击，潘梓年，年纪大了打游击不行，就把他送到太湖养起来了，就这样暂时停下来。他们矛头国务院是我，中央文革是康生、江青同志。这些坚持立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们就反对，他们搜集材料，反对康生、江青同志，想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打倒。

六七年 5 月 16 日“通知”正式发表后，他们组织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但根子还在以前。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大的是方面军，军队是冲派，是新三军。“513”砸展览馆演出，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萧华、杨成武插了手，完全演了反革命双簧。

还有学校叫小“五·一六”，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工交以张殿英为主，农林以农业大学，林学院为主，外交以一、二外为主，财贸以商业、财经、商学院为主，体育以体育学院为主，学部是“五·一六”兵团。现以查清“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文件有一个宣言，七月一日通过的，另外“616”跟着发表一个宣言，这两个宣言，矛头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他们的口号是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号，很反动，正好在这时开始有二月逆流，传到社会上，他们把矛头对准中央各部委，对准解放军。武汉事件发生后，他们就变成了什么角色，就是要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依靠的伟大长城，六、七月闹的最凶。

这段事情很复杂，集中到“五·一六”这个问题上，名字叫“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来源是各个方面的，既有国外的帝修反，又有暗藏的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党内叛徒、内奸、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个大杂烩，不仅是中央有而且地方也有，在地方插到了广西、湖南、石家庄、湖北、四川、山西、贵州、武汉等地。总之这个问题摆在面前，当时的政策是割断联系，在北京有少数拘留起来了，吴传启到处乱跑，从西安到武汉，用飞机把他捉回来，潘梓年老了，从太湖把他捉回来，另外告诉他们组织有坏人，自己抓，有的连名字都告诉他们了，是为了把他们和群众隔开。第一是本组织自己抓比较好，第二是不要扩大化，第三是引导到斗、批、改上，第四是不允许二月逆流翻案。过年后，杨余傅的问题出来了，牵涉到更多，要更谨慎，要小心，所以没有广泛的讲，“3.24”、“3.27”讲了，只是一般的讲，要大家警惕就行了，没有今天讲的详细。当时还不知道这么多的内幕，到下半年解决天地派的问题，还有工人进驻上层建筑，工作转到这方面来了，深挖“五·一六”工作冷了一阵，同志们来了后，对“五·一六”不清楚，更不知四条汉子的问题，三十年代的问题，“二流堂”问题更不清楚，象今天这样对宣传队没有讲过，你们来了，我们的责任没有把他们讲清楚，去年八月以后，有的单位动的早，有的晚，有的

人不敢下手搞，有一碗水端平的问题。八三四一部队的经验，坚持三个原则，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不支持，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就斗争，（江青同志插话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无所谓一碗水端平，因为他是秘密组织，是颠覆我们党，颠覆我们的军队，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六九年“九大”以后，新的党中央成立了，在斗、批、改阶段，在清队中，要把这个案子清出来，搞清楚。好的、坏的分不清楚，是非不清，有的是敌我问题，不清楚不行。学部搞了几百人，现在数目很大。（江青同志插话：一定要注意。）必须弄清楚才能定案。不能逼、供、信。要有旁证，但一定要发动群众和群众结合，不给群众讲，就没办法搞清楚。样板团发动群众比较好，有的单位没有发动群众就搞不清楚，今天承认了，明天又翻案，（江青同志插话：要搞政策攻心。）样板团的文艺战士顶住了。“五·一六”是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两面派，他们活动时间不长，有的有证据，有的没有证据。所以要搞清，不搞清对无产阶级专政不利。在北京，有很多人参加，极“左”思潮，烧英（国）代办处，违背了毛主席的外交方针，当时群众受蒙蔽，要把黑手抓出来教育群众。

现在给你们讲清楚，我们耽搁一下子，希望你们认真讨论，要发动群众，宣传要和革委会，大联委互相联系，这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教育干部，教育后代是有利益的。不能用群众中的资产阶级派性，极“左”思潮搞反革命专政，这种人夺了权，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为了小团体、阴谋集团，怎么许可？不揭发清楚总是不利的。

总之，希望其他同志讲了，大家回去很好地讨论，这次会比十月份的动员，江青同志八月份讲话更进一步了。

康生同志讲话

我看讲话也要有的放矢，今天参加会的好多单位，不大清楚，其中有一个单位就是专案单位，我还比较清楚，不想多讲，将来把材料弄准确，详细一点，专门讲一讲，我想简单笼统讲一下，从文化大革命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斗争中，经常想到值得注意三点：

第一个问题：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过：“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舆论准备。”当时中央对周扬这些人的讲的，这种舆论准备，就是抓文艺、教育、宣传，同志们大多数在文、教、学，在支左，必须根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主席这

一教导，来看党内所有叛徒、反党集团，他们也是首先在教育方面特别是造舆论，所以同志们的岗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岗位。

第二件事是反革命要反我们，他们一是抓舆论，另一方面是抓机要，要抓我们的核心机密，刘邓叛徒集团利用杨尚昆、罗瑞卿等人，完全掌握我们的核心机要部门，主要在中央办公厅、公安系统、调查系统。他们叫杨尚昆抓，他们要搞阴谋，就必须把这些掌握在他们手里。

第三件事：从斗争中看，反革命进行阴谋活动，掩盖他们的面目，一定是要抓档案的，他们为了掩盖他们的反革命事实，投降、叛变材料和阴谋活动和反党反毛主席的罪恶行为，首先从各方面抓档案，这件事刘少奇、安子文在全国一解放，首先抓敌伪档案，他们从北京图书馆查出叛变材料、自首启事，他们从报纸上全部挖掉，刘少奇、安子文他们还派人到全国各地去，南京、上海、苏州、武汉查这些单位的敌伪档案，销毁他们的罪证，但他们没有想到，全国的报纸是挖不完的，怎么能够挖掉呢？（江青插话：连报纸都是销毁，报纸是烧不完的。）（总理：全国那么多报纸，他们知道哪个登？哪个不登？）今天讲王、关、戚、杨、余、傅，萧华，他们搞反革命阴谋，也不外乎走这个道路，抓文艺、机要档案。刘少奇、王、关、戚，他们有共同的手段。我们搞专案的同志，要得到这样一个教训。关于“五·一六”问题，不是 5 月 16 日的问题，刚才总理讲“五·一六”这个问题，不仅是 67 年 5 月 16 日通知发表，在这以前，从各方面情况看，说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王、关、戚、杨、余、傅、萧华是怎样阴谋篡夺机要大权，这是“五·一六”专案的主要问题，大概是六六年十一月中旬、末旬开始作准备工作的。大家记得这时正是十月工作会议开完后，刘邓面目一揭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但没有传达，他们的问题是在林付主席讲话后公开的，还有刘邓很不象样的检讨，刘少奇司令部垮台了，王、关、戚想代替这个司令部。他们的口号最集中的就是一个“权”字。“王八七”讲话，王道明可以当外交部长（江青：主席看过的文件，他们可以在上面写三个揪军内一小撮。）六七年一月戚本禹说：现在二十四级的干部可以做部长，意思说，老家伙都不成，就是他们这些人掌权，来上台了，军队也不成了，这是他们的基本纲领，戚本禹这一段完全是同主席、中央方针针锋相对的，他们想把无产阶级的人都赶下去，他们上台。中央办公厅的工作汪东兴同志负责，他们想把汪东兴同志打下去，他们来搞，

还要夺机要部门的权。六六年十月总理有一个讲话，就是机要大权是中央的，党的，毛主席的，这个权不能夺。发电报不能什么人随便都能签发，这些单位最核心的机密，不能夺权串联。第二方面讲这些部门不能串联，要不两串联，不就把机密串掉了吗？这些核心部门和别的单位不同，核心机密是毛主席亲自抓的。可是戚本禹老婆邱良英勾结了一些机要部门的人来冲机要部门，戚本禹在六七年一月十四日讲话时，特别煽动要夺机要权，这是反革命报告，成了全国机要的行动纲领，煽动群众说“为什么机要大权不能夺？”他的报告是攻击总理，实际上是攻击毛主席。在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六七年一月五日，王力有的讲话，特别攻击总理不能到机要部门串联的指示，戚本禹到机要局煽风点火，在戚本禹的煽动下，他们于一月二十七日夺了中央机要局的大权。他们掌了二十八天，夺权以后怎么办？他们一方面联络北京的外交部、联络部、冶金部、交通部、调查部一齐夺权。另一方面，当时全国机要人员大多数都来到北京串联，特别是武汉所谓造反派一千多人，就住在中央机要局，这样的地方我们都不能随便去。（江青：电台已经夺了权。）同志们要记住这个教训，这是有党以来，有机要工作以来第一次。第二方面叫反革命夺了我们的机要权，抵消了总理关于机要人员不许串联的指示，他们夺权后，就向全国、全世界发电报，真是反革命。王、关、戚这家伙，要不是留他们做活口供的话，都应该枪毙。就这件事也要判无期徒刑，他们向全国发电报，对抗总理指示，外交部夺权后向全世界驻外使馆发电报，反对中央，反对总理，反对不准串联的决定。这不就是犯罪吗？他们是造无产阶级的反，对这些家伙我们不是枪毙的话，起码要判他个无期徒刑。调查部夺了权，就可以自己派人到柬埔寨使馆，把蒋匪气象击毁（？）。到处调查我们的核心机要密码，调查后进行扩散，完全帮助了敌人，还有冲军事机要处，他们联合冲机要局，富治算了一下，有几次我算了一下，有 13 次，最大约三、四次，每次 300—400 人。再一个来抢档案，交通部有个头头叫黄辉，砸了保卫处，档案有的到现在还没收回，据说有的弄到外国去了，我有本大事记 1—8 月份都记全了，在六七年一月一日，冶金部反动头子刘金洪，还有马金权和钢院的张建旗联系，共同收集材料，反对总理，反对汪东兴，实际上反对毛主席。五月 26 日冶金部准备成立“五·一六”兵团。总理要机要部门保守机密，他们针对总理的指示，外交部成立“大喊大叫”兵团，甚至讲恩来同志执行主席路线是动摇的。（总理插话：主

席在六七年七月去武汉事件后，我去营救王力是对的，因为他当时是以革命的面目出现的。）与此同时王力抓电台，关锋抓军委三部，搞军内情报（江青同志：他们偷剪了我给陈锡联、黄永胜同志的信。）有的是有教训的，军管会的意见不一致，交通部的军管会支持黄辉抢档案的这一派，在机要局部门也是一分为二的，地质部两个机要人员，为了保卫机要档案，挨了打，打伤了，这样的同志，全国到处都有，坏人是少数的，一部分后台是王、关、戚主要的。

江青同志讲话

总理刚才讲了一个大体的轮廓，康老着重讲了一个问题的面，我就是补充一下点，供同志们了解一下。今天来的我也不熟，比较熟悉的五团、北影等，八一厂也不太熟，八一厂来了没有？不重复，有的需要补充一点。

要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当时我们都不了解，挂不上钩。当时我们分化王、关、分不开，就把戚分开了。但是六七年我差一点叫他们整死，因为我那儿派了一个坐探，我从来不管钥匙，搞走了主席的批件手稿。我那儿成了罗马大会了，摸到了我的生活规律，对这件事有个认识过程，我们都有个认识过程，同志们就更长了。今天总理、康老讲的这些话对同志们有很大的帮助，要好好学习。追其根，还是刘少奇的黑秀才、武将军，“文曲星”、“武曲星”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他们是一案，最早是从七分钟的闪电开始的，当时对他们不了解。

他们一是串通，二是演习，想到中南海陷害毛主席、总理，也到过林副主席家里，还围攻我。他们很早就勾结，又是黑秀才，我们不知道，怎么接见他们的，一九六六年初，对王力这个人我从来不知道，关锋写的文章我从来没看过，戚本禹写了一个“忠王不忠”我看了。我对四条汉子之一的周扬说：“这么大的事，你们不报告主席、党中央。”这样才搞出来。六六年初春，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中央文革文件起草成员，在上海我和他们有两个斗争。第一个是王、关、戚要求把吴传启、潘梓年、林聿时拉进到中央文革小组，作为党的一个工作人员，我说不了解，没经过中央不能来。春桥、文元同志知道，总理也知道。第二个事情，戚本禹有个政治资本，后来知道是狗咬狗，所谓“八司马”。到四月十六日快起草了，北京搞了真包庇，假批判，他到上海去。他说：“八司马”是主席知道了

的，有问题也要留，我就觉得这个人很温情，坏了要保留，我就打电话给汪东兴说：这样的人不能在中南海工作，后来不知道，他已到了西楼。“八司马”坏了，他就坏了，后来发现把他弄到记者站，才发现的。

我对杨成武也是这样，我从来没有讲过他的坏话，但我和他斗了几次。一次是他假借抓大的，搞饶漱石专案，利用合法专案，搞了我那么多所谓黑材料，这个专案组并没有戚本禹，他呈阅时也写上戚本禹，我把戚本禹用黑笔画了。（问吴法宪是不是？）（吴法宪答：是）后来是我要戚本禹到上海取材料，当时只有我和叶群知道，我说没有，你再搞就是香港，就是台湾了，他就说：我不就成反革命了，我说你自己考虑去吧。戚本禹也利用合法手段，搞了我的专案，就是“北图事件”，从图书馆、报纸、杂志什么都搞。中央批了，这是反革命事件，第二封信是法宪送来的，我看又是“北图”，我当时就拍了桌子：“你是什么东西，老子不在乎！”这时已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当时七、八、九三个月主席外出巡视，林副主席八月也出去了，只有总理、康老在，他们一下子要端掉我们三个常委，允许不允许呀？（答：不允许。）他们要破坏军队，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因此就这三条，决定把他们捉起来，你们说对不对？（答：对）报告了主席，先抓了两个，戚本禹没捉，差点把我害死。所以犯错误是难免的，我今天无论如何替同志讲话的，特别是从去年八月份以后，还扭不（过）来就不妥当了。

据我看王力是头头，关锋是第二把手，戚本禹是跑腿的，二月逆流逐渐认识。六七年一、二、三、四月，我就说，你们要和吴传启、潘梓年划清界限，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说了多少次，他们就是不作，同志们有物证，捉戚本禹的时候，身上还有给彭真、翦伯赞、吴晗的信的底稿，总理有一份正式的，这是铁证，他是亲笔。

六六年下半年，我感到他们不对头，他们开始采取的方法是“你们累了，身体不好，不要去了。”举个例子，捉萧华时，戚本禹说不要去了，后来突然来电话，指定要江青来，我当时觉得有预兆，我说非去不可。他们把萧华的党、政、军文件的钥匙，萧华秘书交给一个吹小号的。那里的档案是军队的机密。我说，谁要抢，我就要捉人，你们说对不对？（答：对。）我命令他们把钥匙交出来，后来吹小号的才把钥匙交出来。还有一次抢中央负责同志一类档案，我实在压不

住，告诉了总理。他们抢档案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假借中央文革的名义去封，实际是偷，一种是利用群众抢，这是非常恶劣的。六六年下半年出我们几个人的丑。把我们几个人的象画在一起，出我们和主席的丑，我提了抗议，后来又出了我一个人的画本，这是破坏我们党，出我们的丑。我说你们不销毁，我要立即采取行动。六六年下半年要从工业、农业，到消费等方面调查一下，王力只是哼了哼，就这样没办法。他们大肆整我们，是在六六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他们要夺财政大权，主席说：财政大权可不能叫人家夺。他们是在六六年底，六七年春开始整我们几个人的所谓的黑材料。如果可能的话，我建议把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林副主席讲话和二十七日十万人大会，我们的讲话的录音放给同志们听。六、七、八月他们要下毒手，首先是危害主席，其次是总理，林副主席出去了，主席出去到那巡视，他们就搞，他们想一箭双雕。武汉的问题，陈再道这个人不好，主席回来，给我们说，先作军队的工作，再去做群众的工作，当时我们不知道，他们完全封锁。王力回来时，我还到机场欢迎了他，他负了伤，我说请医生给护理，他说“不用，杨代总长给我找了。”在北京市革委会筹备时，主席和我、中央文革决定让富治同志主持，戚本禹想去当第一把手，他有什么资格去？他还想把富治同志弄掉，他想把中央文革架空，还有什么周景芳，据说也是萧华这条线上的，还有李广文，也是山东这条线上的。我们对他们的问题，一时挂不上钩，对冲派也挂不上钩，他们把邱会作同志的头都打破了，主席、林副主席说不能这样子，邱会作是一个很好的同志，象杨成武这样的人怎么敢怀疑？“红小鬼”、“老红军”，从来没有怀疑。但是作了斗争，大树特树，我和他们斗了两次。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这样搞。后来抢档案时，杨、余、傅给了他们解放军的衣服，他们到中央档案馆去偷查档案。我的有一个批件烧了，我说不能抢中央档案，我的“九·五”讲话讲了，其实七月底就讲了。你们可以读一读我的“九·五”讲话还有个八条十条的关系，我说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他们就不高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支持我，说“你讲的对”。我在九·五讲话中讲了，不能冲英代办（处）。他们还把援越的物资炮弹抢了，在整理文字时他们说这对红卫兵造反不利，不能写。我不同意，说不能去掉，造反在大使馆门前搞，不能冲，这是国际惯例，你搞人家，人家也会搞你，这是完全破坏。

所以说，六七年七、八、九月是我党、我军、全国革命人民的紧要关头，主席到上海时，我接到一个电话，他们要搞多少万人的示威，整许世友同志，要许世友同志陷害主席，我当晚派文元同志到上海，飞机差点触电。文元到上海后，主席派春桥同志用直升飞机去接许世友同志。他有个怪脾气，但是个好同志，许世友同志当时围困退到了三线，已无路可退。许世友见到主席时感动得流泪。另外他们还整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一句话，要搞乱我们的军队，搞乱我们的党，搞乱我们的革委会。当时我是部队的文化顾问，谢镗忠他们不理我，林付主席写信也不灵了。他们要抓肖力，捉了一个和他差不多的戴眼镜的，否则这个孩子就完了。这是一群非常凶恶的敌人，我在十二月发高烧时，他们串联很多人，在我体温低时整我，体温高时就高兴，就是想整死我，好偷文件。我很早就发现了，我报告了主席，后来叫汪东兴同志，给派了个机要秘书，来了就被他们支走了，给他放假。后来我发现丢了一箱主席手稿，我没有钥匙，他们把东西都偷光了。小箱子是用剪刀撬开的，里面什么都光了。我采取突然袭击，带现在的秘书，警卫，坐探阎长贵回家，找他们要钥匙，他说这就是对我不利罗。我说：为什么非要对你有利？他们没有枪的后台，没有萧华、杨成武，他们能搞吗？那天幸亏林付主席去看我，林付主席去看我，林付主席到处找，找不到，急了，一直找到中南海。林付主席问：你怎么样？我说不好了，钥匙不见了，什么都没有了。

六八年三月份，就是在提出杨、余、傅之前，傅崇碧带了四个干部冲中央文革，是要给我们点颜色看看。我们出去挡了挡，他们一直冲进去，后面的车被八三四一部队挡住了，他们要进去捉人，其中一个人用皮包打我，据说皮包里有四支手枪，要打断我的背梁骨啊！文元同志作证（文元：很凶恶），凶恶极了。我说你们干什么来了，知道不知道这是中央的所在地，这时对他们的篡党篡政的阴谋已有察觉。他们的阴谋多了，中学生有个四三派、四四派、四三派我们接见了，四四派我没见到，他们挡驾，说“你身体不好，我们去看”，他们接见了。

傅崇碧还给坏头发枪，韩爱晶到这里开会，手枪上着顶膛子。同志们你们要了解，这个斗争是很激烈的。到六八年林付主席下了决心，把杨、余、傅揪了出来，把他们端出来，就是胜利，首先是端出刘少奇、后端出第二套班子，纯洁了党，是伟大胜利，他们是近视眼，以为天下乱，是他们的了，不知道毛主席有

几十年的斗争经验，什么样的敌人都见过。他们以揪刘为名，把中南海围个水泄不通，糟了，我们上了一个大当。

“五·一六”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单线联系，他们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儿女，他们搞秘密活动，这是不许可的。你们要成立民主党派，可以讲，他们搞秘密活动来颠覆我们的党，颠覆我们的军队，这是不许可的。这中间是有曲折的，同志们不知道这种情况。我们没时间给同志们讲历史，后来赶上“九大”落实党的政策，以为对反动组织也要一碗水端平，但要给出路，毛主席讲过：“不给出路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要给出路。

六七年春，首先是文艺革命战士顶着牛，他们直接干，因为打了他们嘛，戚本禹要搞他的样板，我看了，这是“红毛女”，还搞了“海港”。在五月下旬，我感到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有人说：没有“五·一六”了，“不存在了”。怎么不存在？我们有材料。这就是糊涂。把“五·一六”反革命组织当作群众组织，这就不对了，对不对呀？张光同志，你的错误就在这里，我以前不了解你，没跟你打过交道，在总理、谢副总理讲了以后，还没转过来就不对了，转过来了没有？（张答：转过来了。）转过来就好，请坐下。

六九年八月十四日才挂起勾来了，才知道“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是他们的基层组织，这个是有不少材料的，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应该提起同志们注意。在中央已经提抓“五·一六”时，要防止扩大化，要抓骨干分子，对一般分子，只要交代好的，要给出路，切记不要扩大化，要打击骨干分子，一要分清是非，二是不要扩大化，是抓他几个凶恶重要骨干分子，一般分子交待了，就给各种出路，重要骨干分子交代好的也要给出路。

在文艺战线上，他们的黑干将是金敬迈、李英儒、于秀、陆公达、刘巨成、林杰、郑公盾、李广文、赵易亚、唐平铸、胡痴，在开十万人大会时，给贺龙的信是大红纸，上面写着“光临指导”，给我们的信写的是“勒令到会”。这条线，这些家伙，我给他们划了个线：二十年代是陈独秀，二十年代末是李立三，在党内三十年代是王明在文艺界的“四条汉子”。我们现在搞的材料，可以发给同志们，有备注。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发展的“二流堂”，“二流堂”就是二流子，二流子就是流氓，他们有党徽，党章，从重庆到北京，五七年定了案。王关戚又要搞这个案了，借此搞总理和我。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有个裴多菲俱乐部，六十

年代就叫“五·一六”。他们的背景是国民党的 CC，叫中统特务。文艺“四条汉子”下面有 10 个演剧队，他们的骨干分子是坏的。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以前是王明，这个反面教员还有美帝、苏修、特务，美英法日特务，比方说李敦白和王光美有联系，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特务，“一办”的同志来了没有。李敦白和王光美的关系知道吗？（答：李敦白和王光美在延安就有联系。）他们是一脉相通的，破坏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破坏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林付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解放军，颠覆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他们这些人同流合污了，他们有黑高参。我们傻瓜，慢慢地才认识，我们讲了就要头脑清醒，要认真对待，但不要扩大化，要按政策办事，首先分清是非，然后区别对待，我的话完了。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纪登奎李先念关于卫生部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讲话精神

纪登奎讲话：

最近抓了一下卫生部的工作，前阶段抓“五·一六”运动从三到六月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也有些单位有点扩大化，搞逼、供、信。中央发了 3.27 通知后，有所改变，通知的主要精神是防止扩大化，有的单位犯了一风吹的毛病，最近总理、康老有指示，抓“五·一六”要抓紧，总理讲重罪行，重证据，把问题搞清楚，但最近外交部传出不要组织，组织不组织是次要的，说总理讲的，总理没讲。究竟怎么搞，如何抓“五·一六”提出六点意见：

- 1、我们要搞，要坚决搞。
- 2、要打破专案神秘化。
- 3、要重罪行，重证据，然后清理“五·一六”。“三不”、“四不”不要提啦，受蒙蔽的“五·一六”一般成员交待的好，可以不按敌我矛盾处理。
- 4、不要关了，要放出来，接受群众的批判，让他们自己贴出大字报来，大家评论，批判，让他们见见面比着好。
- 5、如果在抓“五·一六”运动中有人压制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要受纪律处分。

6、有的单位负责人还在讲“坚决支持左派”，讲话时一部分人鼓掌，一部分人不鼓掌，实际上是派性。你批判孙正，反对孙正是对的，但你反对群众也对吗？你批判孙正把一部分群众压的抬不起头来，也对吗？现在卫生部的做的好的（卫生部主要是推广反帝医院的经验，行之有效），现有的部两派顶牛很凶，有的部又“一风吹”，十个单位差点。让他们上卫生部来学习。

先念同志讲话的基本精神：

你们支左人员还有派性没有？派性象抽大烟一样，越抽越有劲，烟瘾越来越大，到头来自己还不知道，支一派压一派，哪个部都有几件大事，这些事件都是有鬼的，要认真对待。现在不是太平无事，敌人在使用各种方法盗窃国家机密，有的人用写条子、写信、写大字报给军代表提意见，军代表老住在招待所，这是没有感情的。还有的倾向了一派，倾向了就代表了骄傲，你们要好好地学习解放军报关于“谦虚谨慎”的社论，这不仅是对军队；对地方也很有意义。无论如何不能骄傲自满，清查“五·一六”，登奎同志在抓。卫生部有了经验，一不神秘化，二是抓到底，尤其是对罪行。我看了看材料，有的部失密现象很严重，原子弹爆炸资料都出去了，不搞清不行。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纪登奎到农林部给核心组成员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江西省给中央一个农业报告写得很好，你们看了没有，我对部调查组、写作组很重视，想听听你们的计划（汇报），你们部星期天没人上班，晚上八点就没有人了，这怎么行呢？头脑里没有毛泽东思想怎样能写出来呢？你们看了各省多少报纸？多少典型？我们国务院办事机构每天十几个小时工作，你们晚上八点就回去了，这怎么行呢？写作组要整风，写作组要到延安去进行拉练，最近毛主席说解放军拉练的方法很好，就是要背包背包长途行军，一边宣传，一边调查，在城里呆久了，就成了老爷兵了。农业学大寨而报纸你们看了多少？这是写作组应做的事情。上次农业学大寨的指示，就是从 20 多个队学大寨写出来的。坐办公室写不出来。林业工作要求开会，但林业报导很少，光开会不行。过去写了一些报告，起了一些作用。

当前农林部有两个问题要很快抓起来，抓“五·一六”问题；机关工作，机关革命化的问题。

一、抓“五·一六”问题。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很凶恶的阶级敌人，不肃清会有后患。农林部关于“五·一六”问题是个没有揭开盖子的单位，罪行是有的，先要搞事实：

- (1) 农大“五·一六”反革命组织首先是从农林口出来的。
- (2) 有没有人去冲中办学习班的？冲中办学习班是整汪东兴同志的材料，抓汪联络站就在水产部大楼办公。
- (3) 农林部有没有人去围困中南海？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吗？
- (4) 有没有人参加秦化龙的八七黑会？回来怎样贯彻的？交代了没有？应不应交代？
- (5) 碰机要室，抢档案有没有？
- (6) 为秦化龙平反，对抗周总理指示，查清了没有？
- (7) 农林口各部与吴传启、潘梓年，农大“五·一六”的联系要查清。
- (8) 有参加砸政治部的活动没有？有一个部和化工部一个组织抢档案要查清。
- (9) 你们部不是在抓“五·一六”时出现反动标语“抓 516 防止为二月逆流翻案”、“516 是造反派”等，对抗毛主席？

例举的几条是农林部存在的事实，要开展大揭发，大检举专案工作要把门打开，材料要让群众知道，关门是不行的，核心组和各组组长要大胆发动群众，不能揭盖子，如捂盖子要犯错误，“五·一六”搞不彻底要出隐患，农林部是没有揭开盖子的单位，要坚决抓起来。

二、机关革命化问题（略）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卫生部领导同志的讲话

【时间：1970 年 12 月 28 日凌晨 1-4 时】

总理：孙正专案组的报告，要罪状定实，不定实就不行，不落实就不行。

（汇报：杜南交代孙正组织“五·一六”是 1967 年 7 月 23 日晚上八点左右……。陆纯祥等三人交代是五月，但情节一样。）

总理：时间不是主要的，主要看情节。“五·一六”主要是性质，反革命性质。“五·一六”、“六·一六”时间是次要的，不然永远跟着孙正、杜南牵着鼻子走。

先念：谈到杜南搞档案资料，收集中央材料……。

总理：这一段要批，到 7.23 才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实际还早，1966 年 8 月就开始了。许多事，历史要联系起来看。传单看过没有？孙正批了报销，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表面上对钱信忠，我们警惕了这件事。

总理：交事实不要打叉叉，不要注解。打叉叉有一个不打，就含糊其意，增加自己捆起手脚来，谈他的原话。

总理：任鸿来何时死的？去年 10 月来，今年二月自杀，搞专案的问题，总是一种麻痹，一种搞神秘化。

总理：……叫嚷“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可以炮打”，抓住这句话就可以斗他。

李震：不在全部，不在多，在于精，不在广而在于准。

总理：定案，要说得准，很清楚。（举了骆宾王斗武则天，话并不多）只要两件清，八件清不要，要稳准狠。刘少奇不过只抓了他三件大事。

第一步突出“五·一六”，杜南说他是顾问，他不需要参加，反革命阴谋集团操纵者可以说，也可以说是幕后的。

说明：这是追记材料，很不完整。我们去卫生部军管会学习清查“五·一六”经验得到大力支持，给我们看了中央首长讲话的精神，但再三叮嘱是记录稿不要抄，因此只是凭看了以后记得的精神追记一些。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王新刘建勋在河南省各地市领导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王新同志讲话

我先讲些意见，同志们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商量，最后由刘政委总结。

第一季度总的形势是好的。通过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批修整风，“一打三反”，搞政策落实等项工作，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的自觉性，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确实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干部的政策思想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随着各级党

委的建立，党的领导的加强，广大干部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进一步加强了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这对我们全年工作，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精神力量肯定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我省革命和生产，一定同全国一样，出现一个新的形势。刘政委下去看的情况，昨天部分县的同志向我们介绍的情况，还有生产指挥组检查的情况，都说明我们今年第一季度形势是大好的。

第二季度，对全年工作关系很大。同志们刚才一致谈到，要进一步抓落实，认真摸摸下面的情况，把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同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集中力量抓一抓基层，这些想法都很好。总的指导思想，还是按照毛主席关于批修整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指示，落实“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精神和省一月工作会议纪要。下面我讲一些具体重见：

一、关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

毛主席最近多次教导我们要认真读书，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这在我党历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两报一刊”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的文章中，总结的主要经验之一，就是要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取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我们全党，特别是中高级干部，认真读马、列的著作，读毛主席的著作，这确实是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需要，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为什么非常强调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呢？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武装的敌人比较容易识破，如果是美帝、苏修来了，蒋介石来了，地富反坏右起来了，我们全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肯定会起来战斗，把他们打败，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不会让他们夺去。而最危险的是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打着“革命”的旗帜，搞资本主义复辟。苏联党的教训就是如此。苏联党的领导权所以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让苏联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上面一变，下面没有精神准备，没有抗毒能力。所以，毛主席指示我们认真读书，让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都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从根本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关系到国家命运前途的大问题。去年，我们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多次指示要认真读书。目前全国掀起

了学习的新高潮，我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性很高，我们领导同志如果不去刻苦读书、认真学习，就不可能在学习运动中起领导作用，这也是前进或者落后的根本环节，如果学习落后了，一切都要落后。我们领导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有高度的自觉性。

要坚持经常学习的制度。中央要求每周不少于两次的学习日，是可以做到的。具体安排，可以从实际出发。比如县里的同志，分散在下面的时候多，除了个人坚持天天读，同下面一起学习以外，每月回来一起学习三天、五天也可以。再就是要办好学习班。有的县办得效果很好，希望同志们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学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同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分清那是对的，那是错的，才能提高辨别能力。要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用毛主席思想指导我们的革命实践。联系实际，才能学懂、学活。毛主席思想的核心，就是要搞阶级斗争，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联系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才能理解得深。当前在学习中，要注意联系解决如何抓好阶级斗争，抓好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问题，还必须注意解决干部作风上存在的问题，注意提高自己的政策水平。中央强调中高级干部要学些马、恩、列的著作，我们县以下的同志，有条件的，也可以读一点马、恩、列的书，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来指导自己的革命实践。比如，当前我们有些干部，思想上存在着绝对化的毛病，就应当通过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加以解决。这种绝对化反映在政策问题上，就是他们总想搞个死的条条，做什么都想一刀切，这是脱离实际的，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省里不能搞一刀切，县里也不能搞一刀切。再比如分配和积累问题，生产条件、基础有很大差别，就不能强求一律，只能是大体有个原则。其实，目前提出的关于农村经济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北方农业会议文件中，原则精神都有了，只要结合实际，很好的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和群众去商量，那些问题都可以解决。问题是我们有些同志，没有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脱开具体时间、地点和条件，如果搞成了死的东西，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只要干部把中央文件中那些原则精神搞通了，根据总的原则去和群众商量出具体处理办法，就不会出大的偏差。

根据县里同志反映，办学习班学路线，学政策，效果很好。还应当学党的传统作风，这很有必要。能够使我们的干部，不要打人，不说假话。

至于省积代会，可以从实际出发，把召开的时间适当推迟。

我们常委学习时曾酝酿，打算在六、七月份，请你们和省委常委一起学习七天到十天，一起讨论中央规定当前学习的马、恩、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座谈学习的心得体会。刘政委说，请你们自己先学，到时候再通知。我们大家都要加把劲。我们全省形势如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贯彻执行得如何，同在座同志是否自觉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很大的关系。

二、关于狠抓阶级斗争

我们要以批修为纲，狠抓阶级斗争，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当前我们要根据毛主席关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指示，在各个领域进一步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批判刘少奇一伙的反动思想，反动理论，在各条战线上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要把批修为纲理解为只是批修整风会议。刘少奇一类的骗子，都是一个思想体系，要在批判修正主义思潮中，把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反动论点，拿出来批判，肃清他们的流毒，这是活的路线教育。有了这个反面的教员和教材，可以鉴别和比较，毛主席革命路线就能在我们思想上更好地扎根。公开批判时，要严格按照中央的口径。

“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当前进展情况不同。“一打三反”，城市工厂多数搞了，有些单位过去领导核心不好，盖子揭得不够；农村是结合整党进行的，有些大队的盖子揭了，有些大队盖子没揭。要进一步抓紧这项工作。当前，在几个城市。结合“一打三反”，进行了深挖隐藏的反革命，深挖特务、间谍和清查“五·一六”的工作。要进行“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罪行的教育，在教育的基础上，要发动群众搞。群众揭发要背靠背，小字报。郑州市有些单位揭得比较深，现在要注意核实材料。要把群众性的揭发和专案调查结合起来。特别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把反党乱军、阴谋搞反革命的分子和有“五·一六”罪行的分子，同极“左”思潮相区别，同一般的打砸抢，同被“五·一六”利用的相区别。不要把后者都当成“五·一六”去清，不然就会造成扩大化。但也要防止“一风吹”，对一些较大的问题，都要进一步查清。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过细，要搞准，要实事求是。比如我们省里，有的地方一下子抢那么多的枪，要搞清是什么人在背后支持，这个阴谋怎么搞起来的。这里面真正的坏人是极少数，他不一定公开出面，多数人是受骗的。所以不能把抢过枪的群众，都

按“五·一六”对待。总而言之，要按照中央指示去办，要打得稳、准、狠，要执行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的方针。凡公开批判的，材料要落实，先批判罪行，领导上暂不要给定性质。千万不要把一般的材料和没有核对的材料当成定性质的依据，领导上要严格把关。

对已经查清的重大案件，目前可以搞革命大批判，关于杀、关、管的处理，省公安会议以后再实施。

三、关于整党建党的工作

总的来说，就是要落实毛主席建党思想、建党路线。建成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不能马虎，不能走过场，要保证质量。建立党委，仍然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条件成熟一个建立一个。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快一点也是可以的，但是质量第一。党的领导，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一定要按照新党章的要求，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思想上组织上来建设我们的党。过去，有的单位搞派性整党，随便把不够先锋队条件的塞进领导班子，这类单位，都要重新整顿。那种搞资产阶级派性的人，不能进领导班子。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是关系到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能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

关于地、县建立党委问题。县里条件成熟的，各方面准备工作已经作好了的，可以按原计划建立，一般的是否四月份暂缓一缓。我倾向同志们的意见，四月份多下去，调查了解情况，帮助下面解决问题，不要再把县、社干部往上集中了。县里班子问题严重的。要首先解决领导班子里的问题，地区、分区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抓。地区一级，四月份做些建立党委的准备工作。有的地区已整过好几次风了，条件基本是成熟的，要认真改正缺点、错误，五月份可以开党代会；有些地、市，还没有很好的开展整风，这一次群众都提了些意见，需要搞些斗私批修。搞过整风的地方，开党代会前，把有关的人召集起来，核心组作个检讨。把代表名额这一套酝酿完之后，向省里写个报告，说明准备情况，具体的事向省政工组联系。党代会可以开短些，主要是检查工作和选举新党委。

机关“一打三反”和整党建党，不能忽视，同志们都要把机关搞好。省、地、县有的机关部门，至今还有派性干扰，有的还可能是坏人当道，请你们认真加以解决。机关建设，是个很大的问题，同志们要警惕，从前一段揭发的情况看，凡是机关里是派性头头掌权。一般说县的工作是搞不好的，需要彻底清理，要根据

“三不脱离”的原则，该下去的，都要叫他们到自己的生产岗位。有的县反映，他们机关里有的人，在三种场合讲三种不同的语言，分“官话”、“私话”、“密话”。说穿了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完全是资产阶级政客的一套。他们对党组织不讲心里话，只是同自己一伙子才讲；他们把照党的原则办事，叫做“官话”，他们对毛泽东思想是只说不办的。如此严重，不整顿不行。县、地、省到年终总结，机关都要搞大鸣大放，搞思想作风革命化。你不整顿好，有的人就搞资产阶级派性，搞干扰。当然，我们也不要怕，超出原则的事不要办，你只要按原则办事，就鸣放不倒。属于工作上的一般错误就检讨，就改正。

要注意抓好基层。县里主要领导同志亲自下去抓点，以点带面，用典型去指导一般。你多跑几个大队，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准，加一比较就清楚了。发现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找工作好的支书现身说法，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千万不要依靠机关写文件、表报那一套来指导工作，要实行面对面的领导，这是活的领导。去春那一批整建党质量所以好，就是因为那个阶段地、县领导同志都下去了。同志们这一段下去，抓一抓基层，这对发展全省的大好形势，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学习辩证唯物主义，都知道“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我们学习了，就要实行，就要搞实践。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有交给工人、贫下中农和广大革命群众去贯彻执行，变成广大革命群众的实际行动，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整党建党中，要坚定地贯彻毛主席的干部路线，一定按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去衡量是非。这是一场斗争，而且这个斗争很激烈，不能低估，建立党的组织以后，斗争并没有结束。依然有各种干扰。我们对“左”右干扰都要抵制，一定要坚持中央规定的原则，实行老、中、青结合。有的人，就是我们批判的那种诡辩论，抹杀问题原则性，不坚持毛主席的干部路线，而是拉势力。搞宗派，不惜歪曲事实。各单位建立党的领导班子，要注意这个问题，把好这个关。

四、关于抓革命促生产

总的就是要按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讲的，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当前，存在着抓生产“危险”论，有的同志吓得不敢讨论生产问题。把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革命同生产的关系，同志们都会讲了，可是有些同志做起来就糊涂了，或者时而清楚，时而糊涂，说明没有真懂。

希望同志们注意总结这方面的典型经验，对这一方面错误认识要进行教育，不要乱扣帽子。开讲用会时，让干部突出的讲如何抓政治思想工作，如何以政治统帅生产。相信广大群众的实践，好的典型肯定是有，同志们要注意抓住典型，突破这个问题。

生产中有些关键性的环节，如基本建设、水利上一些大的工程，工业和农业的安排等，这些县以上要主动考虑计划。到大队一级，农业生产上主要搞好种植安排。农业季节性很强，毛主席教导“要不误农时”，这是个重要问题。大队安排得当，一年就有很大增产。今年春耕到了，避免象去年有的地方那样，到处拔庄稼。要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种植方针。在粮食逐年增加的情况下，可以种些经济作物，这同“重副轻农”或“弃农经商”有原则的区别。要因地制宜，要走群众路线，要让群众有点种植权利。生产上千万不要搞强迫命令，不要搞瞎指挥。

县、社办工业问题，计划会议上再具体研究解决。

五、关于克服不正之风

毛主席指示我们，使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如何转为正规呢？就是要发扬毛主席亲自培育的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毛主席一贯倡导的我们党的三大作风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主席强调从实际出发。就是要我们主观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的规律性，就是要我们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毛主席强调的要我们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要我们走群众路线，就是要我们坚持历史唯物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所以，只有依靠群众，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人们的正确思想，就是正确的反映了客观实际，这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是科学的方法，这是完全建筑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上的。所以，主观主义，命令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都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当前，在我们省有些地方突出的有两股歪风，一个是说假话，一个是打人骂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作风，而是剥削阶级的恶劣品质，一定要严肃对待，坚决刹住。讲假话，虚报成绩，隐瞒错误，这完全是造谣言，搞欺骗！打人骂人，是国民党的作风，是军阀主义残余，对待我们阶级兄弟，为什么那么恨？自己到底站在何种立场

上？！我们有些干部，因为官僚主义，对情况不清楚，或者因为认识水平低，对某一件事物没有能够反映它的客观实际，反映不那么正确，这不是说假话，这是个认识问题。反映客观实际只能是近似的，事物有个发展过程，人的认识也有个发展的过程。但是故意把假说成真，把无说成有，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就是骗子。这种歪风要搞臭，对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要严肃处理。

下面说假话，有的是同领导作风不民主有很大关系。如果我们领导同志，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一听不符合自己的口味，就训人家。他就得出了经验，你不让他讲真话，于是就投你所好，看你眼色行事。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民主作风。有不同的意见允许讲，讲得不对再帮助纠正。别人给你提意见提错了，可以解释，但不准打击报复，不准打人骂人。今后对打人骂人的，打击报复的，要坚决反对，坚决制止，严加处理。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群众有缺点，有错误，只能说服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打骂，打人是犯法行为。

要深入抓点，搞调查研究，抓些典型经验。如果老泡在会议室里，就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会失掉领导能力，还是先下去调查，有了情况、经验再回来开会，才会有好的效果。有了实际情况，批修整风也才能搞好。四月份计划会、公安会占了一批干部，主要领导同志再不下去，就有危险了。千万不要忽视这一点。

在我们干部作风上，要贯彻林副主席指示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革命性、科学性就是科学分析客观形势，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同时充分认识人民群众的创造能力。也就是要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精神。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有革命的朝气，要充分相信人民的作用。最根本的就是要按照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去办，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被群众所掌握，同实际情况相结合。组织纪律性，就是要听毛主席的话，按党的原则办事，遵守党的纪律，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重大问题要及时请示报告，不能乱提口号，不能搞无政府主义。

六、几个具体政策性问题

经济方面的政策问题，大家提的所有制问题、分配问题、以粮为纲多种经营问题、商业问题，这次计划会议上，根据中央指示的原则，进一步研究解决。一时搞不清的问题，生产指挥组认真组织力量，调查研究，领导同志要亲自抓。

干部队伍的“吐故纳新”问题，以及清队、“一打三反”、整党建党的组织处理问题，省政工组搞些典型调查，各县的同志也注意摸一下。文教、财贸战线队伍的整顿，有关部门也要抓紧调查研究，提出具体意见，常委讨论，属于我们权限范围内的，尽快定下来。有些要报告中央。

组织处理中，属于敌我矛盾的，公安军管会研究处理意见。属于内部矛盾性质，组织处理要把好开除公职、开除党籍两个关，材料要核实，要严格批准手续。

最后说一点，我们要根据中央三号文件精神，正确对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对我们自己，要一分为二，要为党、为人民立新功。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这样的精神状态，不要怕这、怕那。不要当半截子革命派。当前，有种种的“危险”论，这是革命精神不振的表现。不论在那个岗位上，都要振作精神，积极主动为人民立新功，特别是我们军队的同志，更要注意这一点，不能有临时观点，不然就会给革命工作带来损失。我们每个同志，要有高度的革命事业责任心，党叫干啥就干啥，而且要尽力干好，这样才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是不是有立新功的思想，这是对我们党性强弱的考验。全省、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全世界，正处在革命的高潮，我们的任务很重，一定要把革命干劲鼓足。我们共产党员应当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员，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退却，只能是不断革命，勇挑重担，再立新功。

刘建勋同志讲话

王政委刚才的讲话，我都赞成，请同志们认真研究执行。

原来我们商量，准备最后开个大会，也就是准备明天开，根据同志们提的意见，原则上表个态度，有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回头常委再研究。我看了同志们提的意见，感到主要问题还是上次整风会提的那几条，只是具体事例增加了一些。上次整风会你们都参加了，耿起昌同志已经代表省革委核心组作了检讨，这次我再讲还是那些。正如同志们说的：“上次整风以后，老错误没来得及改，新错误没来得及犯。”请你们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如果需要再作检讨，明天就开大会，（大家表示：不需再检讨了。）如果不需要再作检讨，就不开大会了。明天把王政委的讲话传达一下，安排一下你们的工作。这样，回去以后就不要开会了，四五月份都下去。你们安排工作以后，如果没有什么新的问题就散会。

请大家务必向同志们讲清楚，同志们会上提的意见，我们还要整理研究。

整党建党工作，“九大”前的确抓得不好。从指导思想来说，那时候新党章还没有下来。我们的思想没跟上中央的要求。在获嘉开的整党建党现场会，主要是没有强调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没有强调揭现实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从发展党员来看，我们是十三万，可能占全国第一位，主要问题是有的不够条件，也被发展入党了。所以，“九大”以后，我们基本上又重新整顿。这是一个教训。其他还有一些问题，以后有机会再作检讨。同志们提的，只要我们该解决的，能够解决的，就尽力解决。

我重申几点：

关于作风问题。中央三号文件中所举的不正之风的表现，在我们许多同志身上，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我们也有骄傲自满，要认真克服。当前，我们特别要把打人骂人、打击报复和讲假话、搞浮夸的歪风刹住。我们有些人头脑膨胀，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是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不负责任的表现。过去有过这样的教训，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却忘记了这个教训，这是很不应该的。我们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要讲。讲假话不是革命干劲的表现，而是资产阶级的恶劣品质的反映。再就是一定要有民主的作风，要造成浓厚的民主空气。这个问题，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精辟论述，请同志们认真学习。我们的干部，如果丢掉了民主作风，就丢掉了群众；而离开了群众，将一事无成。党章规定，我们共产党员有事要同群众商量。可是我们有少数同志，却是听不得不同意见，人家给他提了意见，就要同人家记一辈子成见，还要“斗争到底”，甚至搞打击报复，打骂群众，这是不能允许的。今后，对上述两种恶劣行为，都要严格处理。

关于整顿机关问题。要把机关整顿好，机关要精干。我们成立革委会的时候，对机关没有注意抓。后来，发现有的机关工作人员在那里搞资产阶级派性。我们就及时告诉同志们，要查一查，对派性严重的人，要处理，不能让他们在那里任意胡搞。看来有的地方没有落实。如果领导上依靠搞资产阶级派性的人，非要上当不可，非把事情搞坏不可。前一段有的地方出问题，同机关里搞派性的人在那里起作用，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同志们不要轻看这件事。群众开始起来造反，这是对的，但是有的人陷入派性，想达到个人目的，捞点油水，拉小圈子，把派

性带到政权机构里来，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有这个问题的单位，一定要认真解决，不要再拖延，不然就要吃大亏。

关于“一打三反”运动中经济退赔问题。省里已经转发了安阳地区的一个文件，目前还不够完善，你们试行中遇到的新问题和解决意见，报来我们研究，经过几次试行修改，逐步就完善了。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政策问题要求太死了不行，不能搞一刀切，有个大体的原则界限，你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研究处理办法。对人的处理，要取慎重态度。定敌我矛盾的，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的，一定要掌握好，把好关。落实好材料。

关于经济政策问题。北方农业会议纪要，对许多政策问题都明确了，要认真学习、研究、贯彻。我前天到一个公社问干部，他们说只念了一遍，没有很好讨论。象这样，当然就落实不了。

分配问题，要按实际情况去定。现在多数队的粮食分配是四、六分，人六、劳四。有的地方是三、七分，就是人七、劳三，这是较富的队。穷队假如也这样搞，就可能影响一些人的积极性。要根据各队的具体条件而定，不要千篇一律，不要一刀切。总之要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关于农业种植计划，要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只要合乎这个方针，不必管得太细。

关于抓好学习问题。这是大事，我们一定不要辜负毛主席的期望。还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问题，以及整党建党中搞好思想、组织建设等等，这些都是大事，是根本性的工作，一定要认真地抓。这些问题，王政委刚才已经系统的讲了，我不再重复，把王政委的讲话印发给你们回去贯彻执行。

来源：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一九七一年四月五日印发（共印 2500 份）。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日，吴德黄作珍在北京第一机床厂汇报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情况时的讲话

一机床看来搞得还不错，群众发动起来了。通过群众运动提供了许多线索，大批判也没有间断，几个案子都抓住了，有的已经基本查清。抓住了重大案子，抓住了重点人，这就抓住了重点，你们厂里两派是怎么分裂的，他们之间的变化关系搞清楚了，后台也比较清楚，你们和二七厂一样，上线都很清楚。这个问题还可以写一写，把问题写得更清楚些，此外，你们厂里还有几件事情，残杀红卫

兵问题等，也都比较清楚。你们抓住重点，把线索一步步理清楚，这就是经验，其他单位都可以这样做，关于一部联的问题，可以联系起来，认真研究一下。

当前的问题是研究材料搞罪行，现在搞“五·一六”看来搞物证很难，如果你查出来的那个表（北灯沙登挂交出来的“五·一六”分子集体登记表底稿），查一查是真的话是很重要的证据，要注意留证据。火烧英代办处时抢来的东西，像国旗、文件、大印等都应该拍出照片来留作证据。

现在看来“五·一六”两派都有，不是一派有，至于多少不定，对于“五·一六”如何认识，有许多问题要认真研究，原来说加入“五·一六”是秘密的，单个填表参加的，现在看来又有集体发展加入的。原来说这个集团很秘密，现在看来并那么秘密。原来说是少数人参加的，现在看来又是大量的；还是少数骨干是秘密的，一般问题又不大秘密？还是上边严，下边宽？还是开始秘密，后来又放开了？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很好的研究。

现在都讲有表，可是到现在一张表也没有发现，如果不是一个很秘密很秘密的组织，为什么一张表也没有剩？有一个单位说是印了 4000 张表，可是下落一张也不清楚，而好多单位又证实有表，二七厂也证明这个问题，对于表有没有的问题，我们可以不去管它，反正我们是要抓它罪行，不去追那个表。

现在出现了这样几种情况，有组织有罪行，无组织有罪行，有组织无罪行。这些问题到底怎么看，也要做些分析。

对于什么是“五·一六”罪行，和极“左”思潮有什么区别？你们要注意研究这些问题，在一件事情里头，一个重大案子里头，也有各种不同情况，要弄清楚谁是主，谁是从，哪些是受蒙蔽的，什么叫骨干？骨干也有大骨干，小骨干。还有幕后操纵者和后台的问题也得加以分析。幕后操纵者和后台，一般都是和反革命、走资派联合着的，有的是当权派。现在中央各部都有后台。如何构成幕后操纵者和后台，情况很复杂。有的只是当权派表了个态，因为那时也围着你，表了态他就高兴了嘛！有的支持了一派，有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站到了一派；有的是伸了手的，到处伸手，而且伸的很长。他们有野心，野心很大，像戚本禹、姚登山这些人都是手伸得很长的，是有野心的。反正这个问题很复杂情况很复杂，要认真搞清楚。主要是看他们是不是搞阴谋活动，而且是秘密策划搞阴谋活动。有人说罪行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矛头指向“三红”，也有的说话动是阴谋的，

矛头是“三指向”的，也有的说是阴谋活动，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革命路线，有阴谋，有反革命目的等等，究竟怎么个说法？你们再好好研究。

当前在运动中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有的叫“五·一六”名称，有的不叫“五·一六”名称，可实际上是“五·一六”组织，如部队的叫“火种”、“斗罗”等。北京也有这种情况，如“一外”刘令凯那个组织，它就叫“616”。有的名称叫“五·一六”，实际上是他不是真正的“五·一六”组织，是公开的群众组织，这些都要注意区别。

关于落实政策问题，要进一步落实政策。落实政策首先是在搞清楚的基础上才能落实，什么也没有搞清楚，党的政策就没有办法去落实，我们考虑落实政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运动过程中，为了推动运动的发展逐步体现党的政策，搞点标兵，开宽严大会，区别对待等等。当前后一种作法可以搞一搞。但是，只能搞点标兵，不能搞多了，不能搞一批。搞标兵是为了推动运动发展，为了稳定人心。搞标兵也要注意搞清，就是搞错了也不要紧，搞标兵可以试一试，但是不能一风吹，不能搞“三不”。有的单位过去就搞过一风吹，这个是错误的。有的单位搞的标兵，后来也翻了，有的从宽的也翻了，从严的也翻了。政策杠杠也可以做些研究。二七厂过去提出三条，××部也提出过 5 条，但是，他那五条都拖了个很长的尾巴，实际上等于没有，你们也可以做些研究，但是必须要报来经过批准。

“五·一六”和我们的斗争是隐蔽的，要注意几个特点，很多问题他不讲，你只好慢慢对付。有些公开的事情，并不难查清，如火烧英代办、围攻中南海、冲公安局，群众参加的这些，公开干的事情，容易弄清楚，但是阴谋部分查起来就比较困难，查阴谋不容易的，要一层一层的剥皮，越查越深，越深越难查。

现在都在搞“五·一六”，都要注意研究这个问题，但是“五·一六”到底是什么样子，还是糊里糊涂的不太清楚，因此，还要把许多问题都联系起来分析研究，才能逐渐把问题搞清楚，但这还是需要时间。

要搞好这个运动，总的要求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但当前特别需要强调领导亲自动手，首先要认真学习十三号文件，贯彻落实十三号文件的精神，按十三号文件精神去做，十三号文件是周总理亲自写的，是毛主席批准的，要认真的学习

落实。“九条方针”是毛主席亲自写的，总结了我党多年的经验，特别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要好好学一学。

加强对专案人员的领导，搞专案的人容易产生两种思想：一个是搞神秘化，脱离群众，专案如果脱离群众就搞不好，好多事情群众是知道的，通过群众是可以搞清楚的，群众就是不知道内幕也知道现象，也可以给你提供线索。如果脱离群众，专案就搞不好，也不能教育群众，现在我们的数字很大，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接受历史的经验，记得在延安的抢救运动的时候，领导一动员，很多人都跑到台上去交代，甚至痛哭流涕的说自己是特务，那时候我们还年轻，也没有见到过特务，感到很奇怪。事后经过审查，很多人都是假的，那时候就是开始看不到蚂蚁，后来弄得遍地都是蚂蚁，搞得特务多如麻。有的单位说是坦白交代，这些是不是都靠得住，也不一定。现在搞得数字多也不要紧，一般成员不要动，只要我们认真宣传党的政策，落实党的政策，坚持按党的政策办事，就不会发生问题，对于违反党的政策的现象，各级领导要敢于出来制止，不制止是不对的，就是没有原则。专案人员的另一个思想就是像主席曾经批评的捉虱子那样，总想多捉几个虱子，有的专案人员，他搞的那个东西不准人家怀疑，人家一怀疑他那个东西，他就高兴，因此，专案不能没有，但是一定要和群众结合，专案人员一定要提倡唯物，提倡辩证法，提倡阶级分析，提倡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主席所讲的要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首先要分清是非，分清是了是非还要分清轻重，要贯彻主席稳、准、狠的方针，稳、准、狠是主席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做过解释的，稳过了就右了，狠过了太左了，关键是突出一个“准”字，要搞“准”就要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认真做阶级分析，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什么叫实事求是，主席专门有个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搞“五·一六”也有它的规律性，要研究这个规律性，这方面都做得不太好。现在掌握了不少材料，但是却不大研究分析材料，一定要注意研究问题，一方面要加强专案力量，专案人员要加强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以搞群众性的研究，可以多组织些研究，在研究中要注意，不要人家承认就高兴，不承认就噘嘴。有些问题不要怕反复，反复几次没有什么坏处，有时反复还是好事情。现在我们的情况是，既不认真研究材料，又怕人家

推翻，韩信带兵多多益善，有的没有把重点放在抓幕后，抓骨干上，轻信口供，这样就容易上当，因此要提倡研究问题，敢于找出矛盾，使问题深入下去。

清华大学他们就做得好，风格很高，他们对有个人感到他交代自己不合理，多次引导他推翻，告诉他，你讲的不是真话，你交代的问题不符合逻辑，你讲自己的东西是假的，不能叫人相信等等。但是这个人还是不推翻，说是自己亲身参加的，说什么也不推翻，后来他们就又把他所供出来的同案人，从外地都找来，让大家来说这件事情，结果大家都说没有这回事，最后他也就推翻了，像这样的事情，推翻了就好。

搞专案的人一定要反对唯心主义，反对形而上学，一定要历史地、唯物地、全面地、发展地看问题，不能够主观想象。不要搞片面性。要注意搞阶级分析，如果不全面地看清，就可能因为我们抓“五·一六”，揭发一些问题，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混进了坏人，这是一方面的问题，但是不是因为搞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才被揭露出来。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一定要历史地看，不能离开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过程，不能把文化大革命历史翻个。例如“捍卫团”的问题，不能因为你没有参加“五·一六”就一切都是正确的了。

“捍卫团”在那时候还是偏保的，他们在后头是和走资派联着的，在那时候要冲走资派，走资派压造反派，因此要历史地看。“捍卫团”就其成员来说，很大多数都是好人、党员、老工人、干部较多，他们是后革命的。造反派里面，大多数也是好人，但是混进了坏人。有的开始造反还不错，但是后来被坏人利用了，上了王、关、戚的当，犯了错误，像这些问题，要辩证的看，发展地看，有些干部也要注意，不能因为今天抓“五·一六”就把过去执行资反路线也说成是正确的，这是两回事。你执行资反路线这是错误，群众冲过你，批准过你，这是对的，像我们这些人都执行过资反路线，受过批判，做过检讨的。我们那些检讨是算数的，不能不算数。

要提高警惕，敌人会耍许多花招，开始不说，以后又多说，故意把水搅混。还要警惕敌人杀人灭口，搞阶级报复，制造事故，破坏生产。

总之，我们要注意研究问题，一定要抓住重点，要把重大案件搞清楚，把重点事件、重点人抓住了，运动就可以搞稳了，揭出来的人多不要紧，我们不要去

动他，希望你们注意研究问题，认真提出一些问题来，大胆提出问题来，只有提出问题，揭露矛盾，分析矛盾，才能把问题搞清楚。

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陈伟关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讲话

〔中央专案小组联合办公室陈伟同志讲话，根据记录整理，请勿外传〕

一、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

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首长对抓“五·一六”极为重视。一九六七年八月毛主席在读到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中“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

‘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后面指示：

“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

毛主席还指出：“‘五·一六’是个凶恶的敌人。”也是指的组织者和操纵着。

毛主席在接见各国代表和外国来宾时，也经常提到“五·一六”，例如对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

一九六九年毛主席针对有些单位挖“五·一六”不积极，指示：有些单位从极‘左’跑到极右，不挖‘五·一六’。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揪出了“五·一六”的总后台、假马克思主义者。

在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日，毛主席又指出：“‘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

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说：“潜伏在群众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他们不到一定的气候是不暴露的。一九六七年夏季和一九六八年春季，他们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又刮起了一股反动的翻案邪风。他们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这一小

撮坏人，终于同他们的头子刘少奇一样被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的胜利。”这一段指的就是“五·一六”反革分集团的组织者和操纵着。

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日林副主席的批示精神是，“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

周总理一九六九年七月二日对外交部报告批示中说：防止对“五·一六”专案扩大化。严禁逼、供、信。要调查研究，重视人证、物证、旁证，不要轻信口供。这样一个大革命，不能没有坏人、反革命分子从中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必须提高警惕。但要谨慎小心，勿中奸计。

康老也曾做过系列指示。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同志讲话中，把“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点出来了，把它的罪行也点出来了。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四日江青同志在对文艺界讲话的基本精神是：“五·一六”是个反革命组织，是凶恶的敌人，在各方面破坏。不仅北京有，别的地方也有。骨干分子无论如何要搞出，秘密组织要搞掉。若搞不掉，敌人还存在，还要进行破坏活动。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总理、康老、江青同志在接见文教系统工军宣队时，详细指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和挖“五·一六”时应注意的事项。

接着中央在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七日发出二十号文件，指出：“五·一六”是确实有的，认为没有是错误的。要防止扩大化。要区别对待。不要把所有的反革命组织都看成“五·一六”。

周总理在一九七〇年十月至十二月份针对北京挖“五·一六”运动的情况做了重要指示。中发〔71〕13号文件中周总理讲话的基本精神都有了。现在再说一下基本精神。

1. 着重指示，对挖“五·一六”，既不能搞扩大化，也不能搞一风吹。扩大化和一风吹是“左”的和右的方面干扰深挖“五·一六”运动。造成扩大化和一风吹的原因是专案工作神秘化，搞逼、供、信。这种做法使坏人猖狂，好人的积极性受到挫伤。严重地阻碍了运动的发展。“五·一六”是反革命阴谋集团，专

搞阴谋，不听中央的话，只听王、关、戚，萧、杨、余、傅、林聿时、周景芳的话，搞两面派，专门和中央对杭。主席对深挖“五·一六”很重视，一定要搞，但不能扩大化。有的单位明明有“五·一六”，就是不抓。

2. 深挖“五·一六”，首先要搞罪行，着重坏头头、主谋者、幕后策划者，不要先抓组织。每个大单位都有一些大的反革命事件，要通过搞罪行，逐件查清，看谁参加了，谁是头头，这样就可定性。在排重大事件中要分清是非，区分“五·一六”罪行和受极“左”思潮犯的错误，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稳、准、狠，特别着重准。排重大事件，也不是大、小单位都排，要有一定的控制，一定的审查。是不是“五·一六”，主要看罪行，看是不是搞阴谋的。如果是在“五·一六”策划下，即在萧华、王、关、戚、杨、余、傅的策划下，参与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活动，就是“五·一六”性质。上挂萧、王、关、戚、杨、余、傅，下搞三个指向。搞阴谋活动，性质就是“五·一六”，而不在填不填表。像卫生部的孙正、外交部的姚登山、学部的吴传启，就没有填表，但是地地道道的“五·一六”。罪行是本质，只要在萧、王、关、戚、杨、余、傅等操纵下，搞阴谋破坏活动，矛头对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不管是“五·一六”、“六·一六”，都要搞出。不在萧、王、关、戚、杨、余、傅等的操纵下，搞阴谋的是反革命，但不是“五·一六”。知道阴谋目的和跟着干的不一样。例如，烧英国代办处目的就是破坏毛生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群众不知道，打击的是知道阴谋的。“五·一六”的根子可以追到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但这次追查放在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尤其是一九六七年，七、八、九月搞的最凶。

3. 只要打破神秘化，实行专案调查研究和群众运动检举揭发相结合。要发动群众，将经过核实的罪行公布于众（恶毒攻击的言论、未查实的历史问题和未经核实的材料不能公布）。由群众揭发批判，可以引起公愤。要组织协作，有关单位共同配合作战。专案搞神秘化，就要上敌人的当。因为有些罪行是明火执仗的，这次主要搞清阴谋，搞上层策划者。如搞神秘化，群众不了解，敌人专讲假的，就上了敌人的圈套，真假难辨。对隔离对象要逐步放到群众中去，隔离的要有，但隔离的要少。

4. 抓重点，包括重点罪行和重点人，重点人指“五·一六”的骨干和幕后策划者。重点查清就可定性，有利于教育群众，瓦解敌人。谁要是搞派性，或压制群众揭发“五·一六”，就是破坏深挖“五·一六”群众运动，以破坏运动论处，就要受纪律处分。“五·一六”一定要挖干净，骨干一定要搞出。否则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起来，这是个祸害。

5. 要区别对待，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最顽固的“五·一六”骨干分子。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能搞大名单。有些人挂上钩，不管是口头还是书面，要看是不是盲从或胁从，盲从者交代后一般的宽大。胁从指的跟着干坏事的，例如烧英国代办处，连中央的话也不听。但去烧的不一定都了解阴谋，头子要他干，不干就揪出吗。（？）胁从者交代清楚也就行了。北京两大派中都有“五·一六”，不能在一派中搞，哪一派里有都要搞出来。当然罗！要实事求是罗！要看到，不管哪一派，好人还是占多数。哪一派都可能混进坏人来。清查“五·一六”罪行，重点是已遂的，搞了已遂的，再揭未遂的，未遂的也要搞，不是不搞。要分清什么是已遂，什么是未遂。搞了，但未达到目的，也是已遂，不一定要造成恶果才是已遂，未遂罪行也是罪行的一部分，也要搞清楚。

二、北京地区清查“五·一六”情况介绍

北京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开展清查“五·一六”时间最早，成绩很大。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同志讲话和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发表以后，有些单位的革命群众就开始深挖，“五·一六”头面人物相继落网，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由于当时革命大联合、三结合不巩固，群众组织派性严重，加上“五·一六”上层人物还没有挖出来。八月下旬，先端出了王力、关锋，但戚本禹还在台上，搞有组织的退却。他们在有些单位还掌权，不可能挖出幕后人物。这些掌权的“五·一六”，打着挖“五·一六”之名，行保“五·一六”之实，或者有意将运动引入歧途。戚本禹当时钻进中央文革，“五·一六”调查组说后台是潘梓年、吴传启、周景芳，戚本禹就说调查的不对；另外一些人，不知从哪里搞到一些材料，说后台不是潘梓年，戚本禹说，这个材料准。所以当时在群众中搞调查条件不成熟。中央“五·一六”专案组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成立的，当时主要搞审讯。

“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深入发展，大联合、三结合进一步巩固，在林副主席政治报告的指引下，八月十六日江青同志对文艺界做了指示，周总理也做了重要指示。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在九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做了清查“五·一六”的指示和动员，北京地区深挖“五·一六”的群众运动逐步开展起来。当时有一部分单位的领导同志不理解，提出些错误的口号：“对‘五·一六’也要一碗水端平。”也有的单位搞得冷冷清清，不发动群众。这时毛主席指出，不挖“五·一六”就是右倾。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央领导同志做了专门讲话，批评了有些单位的右倾思想和做法，对大家震动很大，掀起了清查“五·一六”的新高潮。但这时候，因为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搞出来。他为了掩盖“五·一六”，要尽阴谋，破坏运动。在他直接控制的单位不让开展。他开始说，“大家都要检查检查，小爬虫有多少？”搞扩大化，后来又说，“过去的事不要提了，今后共同求进步！”搞一风吹。他不准别人到他控制的单位调查和取证，例如《红旗》杂志社就不许去。另一方面他又抛出一个大阴谋“找表”。他说：“找到表就是胜利。”因为他知道，一方面“表”已被烧掉；另一方面，有些幕后策划者没有填表，像孙正、姚登山、吴传启。他不让挖“五·一六”的黑后台，说什么“你不要认为在当权派中有‘五·一六’后台就厉害，那不一定。”有意掩盖黑后台，以掩护他自己。对没交代罪恶的黑后台，他说什么“我给你们泼点冷水，对你们要亲切、爱惜、等待。”他反对毛主席的肃反工作九条方针，散布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破坏运动，以掩盖“五·一六”和他自己的罪行。由于他的阴谋破坏，影响了一些单位。出现了一风吹和扩大化的倾向。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林副主席做了批示和指示，周总理提出抓罪行、抓主谋、抓幕后策划者、抓头头的四抓，提出隔离要逐步放到群众中去。遵照这些指示，中央发出十三号文件，出现了新的高潮。目前运动正向纵深发展。特点是：

1. 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运动正在向纵深发展。通过开展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大清查的“四大”，大力协作，联合作战，专案调研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纠正了一风吹，搞清了许多长期未搞清的问题，老大难单位形势好转，许多单位查清了明火执仗的罪行、事件和敌人。

2. 清查“五·一六”罪行工作有很大进展。大的单位排了重大案件，逐一落实，有些已查清结束，有的接近结案，有的进展很大。

3. 把“五·一六”搞臭了。很多单位开展声讨会、控诉会和举行“五·一六”罪行展览会，进行揭发批判，使广大群众看清了“五·一六”的骨干都是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煽动极“左”思潮，挑动武斗，反军乱军篡政夺权等等都尽他们干的。要继续和他们斗，“五·一六”在群众中孤立了。

4. 促进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形势。是否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要看生产形势。许多后进单位，通过清查“五·一六”，改变了生产面貌。

北京地区个别单位在清查“五·一六”上还有些问题：

1. 有些单位搞组织的思想扭不过弯来，认为“搞不清组织，没法搞罪行”，搞大名单，或轻信口供，有些人还相信假口供。
2. 有些单位运动搞的冷冷清清，前怕狼、后怕虎，或走了过场，或逼、供、信，或者有四怕一等待的思想，即怕别人说右倾，怕说一风吹，怕漏掉，怕犯错误；等待别的单位拿出好经验。

根据北京地区落实十三号文件的情况，有以下几点认识：

怎样认识这次清查“五·一六”的群众运动？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因而既要积极进行，又要落实十三号文件。事实证明，那个单位有“五·一六”，不清除它，就不能落实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总是这样那样干扰，干扰和障碍就排除不了。开始有些单位，往往产生怕字，怕搞乱了形势，怕挑起派性，顾虑重重。事实证明，只要落实十三号文件，按照主席的九条去办。就不会搞乱。即使出现一些问题，只要按十三号文件办事，就可以解决。所以，如果有“五·一六”，有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敢字当头，坚决挖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如果没有。也要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

另一方面要谨慎，要区别是非，区别“五·一六”罪行和受极“左”思潮影响犯的错误，区别“五·一六”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区别不好，就可以犯扩大化和一风吹的错误。不区别是非，也可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

1. 怎样认定“五·一六”组织和“五·一六”分子？怎样区分受极“左”思潮犯错误和“五·一六”罪行？怎样区分“五·一六”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主要是用罪行区分。如果是在萧、王、关、戚、杨、余、傅等的直接、间接

操纵下；搞阴谋破坏活动；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就是“五·一六”。有的单位提出，搞罪行还要注意区别对待。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受极“左”思潮影响，讲了坏话，还是恶毒攻击；反军乱军。对军队的某一个领导同志提了些意见，即使是有些过激，也要和反军乱军区分；对革委会，是对某些成员提了些意见，甚至是过激的言论，也要和颠覆加以区分。

在清查反革命罪行时，对重大案件，也要区分知道阴谋的和不知道阴谋的。例如围困中南海，有 1400 余单位几十万人参加，绝大多数人认为是揪刘少奇，不能说是罪行，主要是搞知道阴谋的，那是为数很少很少的一小撮，他们的目的是给中央施加压力，妄图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周总理、康生、江青同志，这些人是清理的重点。有些单位是这样做了，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2. 怎样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

清查“五·一六”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阶级敌人总要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群众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会干扰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如何排除呢？要狠抓思想和路线方面的教育，并要贯彻始终。有的上挂王明、刘少奇，下联“五·一六”的反革命的罪行，这样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很决提高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矛头对准“五·一六”。对犯极“左”思潮错误的人，不搞点名批判。这样做的，搞的很好。但有的单位不抓路线教育，单纯抓重点人，结果受到干扰，搞不下去。

3. 认真贯彻专案调查研究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发动群众，不定框框，不定调子，主要发动群众掀起揭发、批判高潮。有的单位办学习班，查清罪行，落实政策，有的单位，搞协作，搞互相配合，揭开一些重大案件，凡是这样做的，运动就搞的好。也有的单位不敢发动群众，运动冷冷清清。也有的单位群众揭发后，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核实，使许多材料真假难辨，甚至有的搞逼、供、信，轻信口供，将假材料公布于众，造成混乱。

4. 狠抓重点，即“五·一六”的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策划者。有的单位这样做了，狠抓罪行，抓坏头头。抓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重大案件就搞清了。有的口头讲抓罪行，实际上是搞组织，搞大名单，把极“左”思潮的错误当成

“五·一六”罪行，把其他群众组织当成“五·一六”，出现扩大化。如不警惕，先出现扩大化，后面就会出现一风吹。

5. 认真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才能分化瓦解敌人。运动好的单位注意了三个区别：区别是非；区别因极“左”思潮影响犯了错误和“五·一六”罪行；区别“五·一六”一般成员和骨干分子。对“五·一六”的一般成员，提高觉悟，划清界限，不追不逼；对骨干分子，对骨干分子，分化瓦解，区别对待，打击最顽固的敌人。有的单位有四怕，对被敌人咬上的不敢排除，对搞错了的不敢平反，对坦白交代的不分真假，不加区别地一律停止党的组织生活，不准听报告，不准探亲，有些人产生了“交代吃亏论”。有的对交代的，不认真查实，便轻率地宣布从宽处理，结果他给老婆写信说，我交代的是假的，是被迫的，不得不交代。这些都影响了清查“五·一六”运动。

关于处理的政策问题，正在研究。还没有统一。突出的是如何对待受蒙蔽的，完全把“五·一六”当成左派组织参加的。例如有个单位一个老工人，问人家是什么组织，人家说是左派组织，保卫毛主席的，他就要求参加。人家不吸收他，他追到厕所去，一定要求参加。人家给他一张表，他又不识字，别人替他填的。这样的如何处理？有的说是“五·一六”分子，但不以“五·一六”论处；有的说交代就算了。这种情况究竟如何处理，请大家研究。

三、从北京揭露出来的情况，看“五·一六”的阴谋、罪行和组织

1. “五·一六”的阴谋和罪行。

“五·一六”，是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的反革命手法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口是心非，当面说的好听，背后又在捣鬼。搞阴谋，搞绝密策略。他们有整套的反革命策略，例如二七车辆厂徐凯的《绝密草案十八条》，清华大学蒯大富的《三十六战略》，即三十六计，还有什么《十二条》、《二十二条》，大同小异。这些策略中讲的是什么呢？首先是分析形势。他们认为“左”派，即他们那些人，是少数；中派，“右”派是大多数。怎样搞垮对方？他们提出，只要对立面一动，就把“老保”、“铁杆保皇”等一系罪名加在他们身上，先从舆论上把对方搞倒。要事先抢些对方的袖章，准备些武器，必要时自己可以无伤造伤。决不能承认我们打伤了对方，这种事要找最有经验的人去干，要严格保密。要用麻雀战术扰乱对方。对中央指示和上级文件要灵活运用，不能受约束，对方按章

办事，不敢违犯，就说他们是老保。我们敢冲敢打，不受约束，赚了个造反派。反对我们就是执行资反路线。要发动小学生跟我们一起干。对我们的错误，能推就推，实在推不掉的错误，即使铁证如山，也不能承认。一定要肯定，我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我们每个一件事，都要负责人签字，肯定我们是革命行动。将来即使错误也是他们的事，与我们无关。

干部支持我的，就是革命的；反对我的，即使一点错误也没有，也要说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支持我的，不管有多大问题，也要保下来。谁反对他们，就是打击革命干部。对军代表要缠住不放，使他不能深入下层，对我们有好感。造成对方不满。设法使对立面与军代表对立。对解放军也可以造谣。谣言重复多次，就可以变为真实。

他们的反革命手法很多，是这样说了，也是这样做了。他们的罪行手法，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只举几个例子。

第一，煽动极“左”思潮。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口号，煽动无政府主义。戚本禹提出：“不搞打、砸、抢不是造反派，最多是个温和的保皇派。”还有什么：“机密要掌握在左派手里，对保密要做阶级分析。”他们宣扬“义和团”、“红灯照”精神，戚本禹说：“红灯照就是现在的红卫兵。”到处介绍资料，煽动排外思想，妄图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外交路线。

第二，制造谣言，欺骗蒙蔽群众，大造反革命舆论。例如，说什么“当前矛盾是旧政府与新文革的矛盾”，提出“打倒旧政府”的反动口号，反对敬爱的周总理；说中央常委有分歧，说什么四比三，三比四；还搞政治陷害，湖南有个 007 号密令事件，说什么湖南军队要在六七年元旦搞政变，说是下的命令他们已看到了，字迹象是总理的，跑到北京来第二天假马克思主义者就接见了，说是支持他们，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很好。这些纯系谣言。

第三，以反死人为名，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讨孔”就是一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在戚本禹、林杰指使下，在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下，到山东曲阜去讨孔，这是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干的。她带了 200 多人到山东去，攻击周总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说孔庙是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要造反，还搞什么《致国务院公开抗议信》。假马克思主义者打电报去说，砸碑主要是明清以后的，明

朝以前的不要砸。在他的暗示下，谭厚兰等最先砸了国务院的碑。在《致国务院的公开信》中，公开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狂叫，不管他地位多高，资格多老，都要把他拉下马。还说什么“讨孔”有现实意义，要结合现实，单搞死人就失去意义。

第四，以反××为名，全面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各项政策，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例如，戚本禹让徐凯把财政部的何畏弄到北师大，告诉他什么话都可以讲。何畏就抛出《何许人也？》洋洋七万言，全面地、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将许多毛主席的话说成是刘少奇的话，进行污蔑。

第五，以搞××专案为名，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例如，卫生部搞了黄树则专案。黄树则是搞保健的，他们通过搞专案，泄露中央领导同志的健康机密。将主席一家的材料都搞了。还有借搞李立三专案，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第六，为地、富、反、坏、右翻案，组织“左”派队伍，即反革命队伍。例如将陈里宁打扮成新时代的狂人，舞台上公开搞打、砸、抢，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陈里宁到处做报告，说他在神经病院被吊打，逼着吃屎等，完全是造谣。他们还为外交部疯人院翻案，成立“受迫害大队”，公开提出翻十七年的案。戚本禹派到二七厂去的徐凯，在修理厂把劳改都叫成工人，说他们是“受压者”，造反精神强，要他们赶快起来造反，否则是石沉大海，永无翻身之日。这些犯人被煽动起来造反，矛头首先指向军管会，把军管会主任打的几个月不能起床。他们成立了 20 几个反革命组织，提出几天血洗××的极端反动的口号。

第七，从帝修反的反动报纸、杂志上搜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文章。北京图书馆事件就是戚本禹组织的。他们从那上面找出最恶毒的敌人的语言，用来攻击我们的中央领导人。

第八，召开劳模座谈会，煽动劳模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大庆，他们逼着王进喜同志起来干，王进喜同志坚决反对，他们派往大庆的“学大庆”战斗队就整王进喜。

第九，毛主席在十多年以前指出：“反革命分子攻击少数人，不过是一个策略。自从汉朝吴王刘濞发明了有名的“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策略以后，很多人都采用这种策略。”（参看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按语）“五·一六”就是继承了这种“清君侧”的策略，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矛头

指向周总理、康老和江青同志，最后是为了反对毛主席。为了反对周总理，对几个副总理也同样地采用了这种策略，提出对几个副总理两个打倒，两个炮轰，两个辩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架空毛主席，实现其反革命的野心，恶毒之极。

十、反解放军的手法是针对毛主席每一个最新指示，捣乱军队。

一九六七年初，军队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刚刚投入三支两军时，在一月二十三日他们就提出军内一小撮”，叫嚷“军队支保不支左”。结果到处冲军区，围攻军区领导。

一九六七年三、四月，主席提出“拥军爱民”，他们又发动第二次乱军高潮，提出什么“揪出军内一小撮是最大的拥军”，到处抓“老谭”。

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他们又讲什么“文化大革命进入夺军权阶段”，提出要武装夺取政权，反对黑警司（警备司令部），他要成立什么红警司，抢武器弹药，盗窃军事情报，殴打解放军指战员，在全国各地揪“×再道”。“七·二〇”致武汉地区一封信，毛主席审定后，他们狗胆包天，又加上“军内”二字，把“揪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改成“揪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北京围困中南海，说什么八月五日有重大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还没查清。

第十一，对新生革命委员会，他们首先是妄图夺权；夺权不成，则派人打入，掌握实权，就搞反复旧，搞垮革委会。

对群众，先造成分裂，分成两大派，他们再混水摸鱼。

总之，他们的反革命手法很多。当他们的阴谋被中央识破以后，就销毁罪证，订立攻守同盟，搞什么五大措施，六不交代。他们立即停止一切活动，采用最快的方法，秘密通知，不许交代，烧毁一切罪证，搞什么组织保证，不许个人交代。并约法三章，头头顶，群众顶，剩下一个人也不讲，还搞什么纪律。他们还散布什么我们单位的“五·一六”与××的不一样等等。实在顶不住了，就各说各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隐藏下来，等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再干。他们就这样千方百计地破坏清查“五·一六”运动。

2. 北京地区排的十五件大事件：

第一件，夺中央外交大权，烧英国代办处，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抗缅大会，原准备先到外交部游行，后临时改为到缅甸大使馆。

第二件，围困中南海，连地图都搞了，妄图冲入，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

第三件，揪军内一小撮，派人到各地去，大搞反军乱军。

第四件，推动国家机密档案，如卫生部、化工部等。还搞了一次抢劫二十六个部的政治部的机密档案一千多份。现在查到，好多机密确实落到了特务手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都有，丢失很多。

第五件，冲中央机要局，篡夺中央机要大权。

周总理、康老、江青同志指示，机要部门不要搞串联。中央首长指示后，戚本禹马上接见，胡说“保密也有阶级性”。在的煽动下，机要部门有些人成立什么“大喊大叫”战斗队。

第六件，卫生系统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黑会和盗窃中央负责同志的保健机密。周总理知道后，派李先念同志在会前去阻止。他们不听，会议照样开。总理批评后，他们还说什么“压制”，是“二月逆流”。

第七件，夺中央财政大权。财政大权是中央的，总理几次讲，只能监督，不能夺权。“五·一六”煽动一些人夺了。

第八件，妄图夺北京市革委的权。他们开始想要戚本禹挂帅，未得逞，就派周景芳率领几百名亲信，打入北京市革委，掌了实权。

第九件，利用搞专案为幌子，搜集整理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材料，加以编造，进行攻击。包括北京图书馆事件。

第十件，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冲三军演出，是个政治流血事件。

第十一件，一九六八年六、七月，在北京航空学院等地开会成立全国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不仅在北航开，别的地方也开。简称北航黑会。

第十二件，演黑戏，出黑书，开黑会，做黑报告。包括天津黑会。

第十三件，搞反革命基地。到河北、山西去察看地形，准备失败后，到太行山去打游击。

第十四件，私设电台。北京邮电学院、北京地质学院等地都有，有的还进行广播。

第十五件，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如“五·一六”等。

此外还有盗窃档案馆，七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开枪打工宣队等等。

3. 组织方面的情况。

这方面情况较复杂，有的单位清了，有的单位确实有“五·一六”组织，但因当前重点清罪行，组织情况还未搞清。对此，有的单位做法是实事求是，有“五·一六”组织，就把它挖出。有的单位有些组织，名称虽不一样，但罪行类似，也要搞清。如果确实没有，就不要搞。有“五·一六”的单位情况也不一样，要把具体情况核实，不要带框框，不要搞逼、供、信，不搞指供、逼供、诱供，不轻信口供。

有的单位主要按十三号文件办事，按罪行定案，这个办法可以参考。因为根据一些单位的情况，有些主谋者并没有参加组织，而参加者又没有罪行。重点是打击骨干分子。

从一些单位的情况看，“五·一六”上层成员情况多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两面派，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班底。他们的勾结由来已久。例如学部，“五·一六”的罪行很多，上层勾结在一九五八年就开始了。关锋、吴传启、林杰勾结起来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用撒仁兴（仨，三人行）笔名发表的《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攻击张春桥同志。文化大革命前共抛出二十四篇文章。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在《光明日报》上开辟“灯下漫笔”等两个栏，用何鸣等笔名发表文章，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才停止不出了，共抛出三十六篇。困难时期，他们经常在一起聚餐，策划夺权、经、哲的权。他们还到云南考察，狂言要写出超过恩格斯《国家、家庭、私有制起源》的文章。

一九六四年十月关锋、戚本禹、吴传启、林杰、邓立群等在通县翟里大队搞四清，推广桃园经验，五十三个干部斗了四十四个人，对判过刑的，他们给予平反，搞反革命基地。出村前，一家赠送一本黑《修养》，有个老贫农不识字，不要，他们说，“留给子孙后代”。临走时还学王光美，树碑立传。这时加上了戚本禹。

一九六五年，他们勾结了彭真。

一九六六年，他们勾结陶铸，攻击毛主席，吹捧刘少奇。

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误：应为评海瑞罢官）发表以后，在一九六五年冬，一九六六年春，他们对吴晗搞学术批判。后来他们窥测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图后，想搞政治批判。《二月提纲》出来后，马上又按《二月提纲》的

调子改了稿子。一九六六年四月假马克思主义者、关锋、戚本禹、林杰等成立批判小组，仍然搞学术批判。所以说他们是刘少奇的黑班底。

一九六六年三月关锋支持吴传启写大字报。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吴传启的大字报贴出来以前，请示过关锋。关锋说可心贴出去。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关锋、吴传启、林杰策划让潘梓年站出来。关锋亲自访潘梓年，给他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站出来，中策是出去疗养，下策是不站出来，不动。结果潘梓年取了上策，站出来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经关锋修改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林杰的老婆杨德华的文章：《北京日报》领导上让我写访问记的文章。以后还陆续发表了一些把他们一伙打扮成左派的文章。

一九六六年九月陶铸保他们是革命左派，此后他们在学部稳定了阵脚，王力、关锋、戚本禹指向他们杀向社会，夺国家机关的权。群众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一九六七年四月江青同志点出，对他们不能保。他们乱了阵角，就组织了秘密组织，搞了二套班子。

这是学部的情况，别的单位有的有，有的没有。有的单位有别的名字组织，但与“五·一六”一样。有的单位有叫“五·一六”名字的组织，但不是反革命组织。

参加“五·一六”的也不一样，上层坏，下层受蒙蔽，这部分人占的面比较大，他们不了解阴谋。例如，有的单位“五·一六”，上层知道是反对周总理；中层知道要揪出一个比陶铸大的，保人保的最多的；下层当成左派组织，是保卫中央文革的等等。政策是打击主要成员；一般的交代了可不算，作内部处理；对完全受蒙蔽的，像上面那种老工人，有两种处理意见。这是一些单位的情况，目前还没有统一。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八日，陈伟在国务院各部委清查“五·一六”专案协作会议上的讲话

〔陈伟：中央专案联合小组成员；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今天我没有什么可讲的，主要是向同志们汇报一下情况，根据丁江同志指示，汇报二个总是。一个是关于当前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群众运动情

况，第二个是关于北京市召开清查“五·一六”专案会议，李震同志和吴德同志指示精神。可能有错误的地方，错误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还有丁江同志批评指正。

一、关于当前运动方面的一些情况：

由于我个人接触的面比较窄，了解情况也不多，水平也很低，理解也可能不正确，我讲一下可供同志们参考。

1. 对运动的认识：

当前清查“五·一六”运动，是一场很尖锐很复杂的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任务很艰巨。“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一个很凶恶的阶级敌人，这主要是指他的总后台、组织者、幕后操纵者和重大反革命事件的策划者。这些人是很凶恶的。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以，这次运动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一方面我们必须把“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搞清楚，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另一方面，由于这个“五·一六”是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是隐藏在群众组织中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他的手段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蒙蔽了相当一部分群众，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上当的不少。特别是中央点出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之后，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应变措施，布置退却，销毁罪证，策划怎样对付我们。在今天我们清查他们罪行的时候，他们又采取以假乱真的手法。所以，我们和“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所作的这场斗争，它不同于清队和一般的群众运动，不同于一般的斗争，情况比较复杂的。因为他们钻在群众组织中，又都是暗地里搞阴谋破坏活动，所以，那时也蒙蔽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如果不认真分析、调查研究，就容易犯错误。两类矛盾不一样，要认真分析，不能搞扩大化。现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区别极“左”思潮犯错误和“五·一六”罪行，这是当前运动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是受极“左”思潮影响犯错误的？什么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受极“左”思潮影响犯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敌我矛盾。另外，还有什么是“五·一六”骨干，什么是一般成员，什么是受蒙蔽的群众，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分清楚的。因为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我们主要是清查文化大革命这一段，

尤其是六六年、六七年这一段他们所进行的反革命阴谋破坏活动，着重清查这部分了。所以，分清是非是个很大的问题。例如同样是一个夺权，有的是正确的，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权，像一月风暴。有的就是搞阴谋，如外交大权、财政大权、机要大权，中央不让他们夺，他们还要夺，这就是搞阴谋，当然里边也有受蒙蔽的一些群众，群众不明真相，是跟着做的。广大受蒙蔽的群众无罪。

区分不好就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为面对这种情况，敌人又跟我们有意制造混乱，这就是这次运动的复杂性。看到这些情况，我们考虑有这样几个问题，一个是要坚决把“五·一六”的阴谋罪行搞清楚，不一风吹，又不要犯扩大化的错误。所以我们既要坚决，还要提高警惕性，不要上敌人的当。特别是要认真贯彻中央十三号文件精神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制定的九条方针。

关于运动特点有这么一点认识，不知对不对？请同志们指正。这是第一点。

2. 怎样搞好这场运动？

(1) 根据我们所了解的一些单位情况看，关键问题是认真贯彻落实十三号文件精神，认真贯彻执行主席九条方针。现在有不少单位，运动搞的很好，基本罪行查清楚了，组织问题也查清楚了，如二七厂、化工三厂、新华印刷厂、外交部，还有好多单位运动进展很大。外交部走过一段弯路，贯彻总理指示和十三号文件精神以后，运动加快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外交部活动是极端猖狂的，他们那个姚登山极端猖狂，由于他们领导上认真贯彻十三号文件，狠抓罪行，四大罪行有三件已经查清楚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那一部分正在搞，火烧英国代办处接近查清楚，组织问题也有了眉目。从他们的经验中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当前运动的关键是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十三号文件精神，认真执行毛主席九条方针。他们搞运动的时间并不长，有的也是去年三、四月份开始的。关键是领导问题，主要领导亲自挂帅，放手发动群众，了解情况。首先要抓对这场运动的认识，要抓十三号文件的落实，抓伟大领袖毛主席九条方针的落实，抓整个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领导班子，抓罪行，抓典型。如果主要领导做到这几个方面，运动发展就快，进展快的都是这个经验。

尤其是当前运动进入到一个深挖罪行，查明阶段，这个阶段是关键性的阶段，如果这个阶段突破了，难题就解决了。如果这些阴谋搞不出来，难题就解决

不了。当前大部分单位进到这个阶段，表面的，明目张胆的那些活动基本上查清了。主要是那些幕后策划的，搞阴谋的那些。在这个阶段，关键在于领导亲自动手，放手发动群众，抓典型，抓总结经验，抓罪行，抓班子。这是我们了解和一些基本情况，向同志们做一介绍。

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发动群众。现在来看，哪一个单位如果领导亲自抓。抓了认识，抓班子，抓典型，抓罪行，哪一个单位运动就很有起色。就是过去走过弯路，出现过一些问题的，也能够得到及时解决，也能够跟上来，否则，就容易出现偏差。

还有一种是始终搞得比较稳，按照毛主席九条方针搞，像八三四一部队主管的几个点，就是按照毛主席九条方针搞的，又稳又快。有时表面上看暂时慢一点，但是搞得清楚，扎扎实实，实际上快。

再一种情况，就是走过一段弯路的，由于按照总理指示，按照中央十三号文件和毛主席九条方针搞，进展也很快，搞不起来的搞上来了，进展不快的进展快了。走过弯路，出现过倾向的，不管是扩大化也好，一风吹也好，都迅速得到了纠正和克服。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的话，运动就搞不起来。现在我们了解，有这么一些情况，也可能是过去的情况，好比说对清查“五·一六”斗争怎么认识，这是一场什么运动，还不很清楚。这是敌我性质的问题，不能采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解决，当然这里头也有内部矛盾，但是重点是清查“五·一六”，是解决敌我矛盾的问题。要把它分清楚。可是有些单位不是这个情况。有的单位排重大事件，把两派抢公章也列为重大事件，把内部矛盾排上了，性质就混淆了。

要抓认识，首先就要解决在我这个单位究竟有没有“五·一六”的问题，这个问题要首先解决。要不要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依靠什么人去清查！进展比较快的单位，都是在认识上解决的比较好。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就进展快。

再一个是办学习班，有各种类型的学习班，但是主要靠发动群众，打破专案神秘化。搞神秘化，搞来搞去就不清楚了。越搞越神秘，越搞越不清楚，过去有这个教训。当然有的重点对象也要办学习班，但是，对有问题的人主要靠发动群众来搞。有怀疑，一种可能是敌我矛盾，一种可能是人民内部矛盾，怎么弄清他的问题？靠党的政策，特别是对一些有罪行的人，主要靠斗，七斗八斗，而后靠

党的政策，而不能采取办学习班的办法。搞“五·一六”专案的要在一起多分析，这个问题究竟怎么一回事。你问他答，这个办法不行，阴谋部分搞不出来，搞出来的也是表面现象，而且他们是以少避多。

根据各个单位的问题来看，在搞“五·一六”案件的时候。如果领导班子里有“五·一六”嫌疑的，那你就搞不起来，不少的单位有这样的经验。领导班子如果有问题，当然也可能是怀疑，怀疑可能是真的，也可能假的，要具体分析。领导班子如果不纯洁，让有“五·一六”嫌疑或是有牵连的一些人去搞，打开局面就比较困难。

在对重点人批斗的时候，在发动群众的时候，有的单位做得好，没有划框框。凡是给群众划框框的，就不容易发动起来。好比说，有的单位说第一不准提什么什么问题，第二不准提“五·一六”，本来是清查“五·一六”，你不准提，群众就不好发动。甚至有的说在会上，不准提中央首长关于抓“五·一六”的指示，等等，束缚了群众的手脚，致使运动搞不起来。

在发动群众的时候，对重点人，对“五·一六”对象，尤其是他的罪行，怎么搞清这个问题。看来，主要靠工作，靠狠斗，七斗八斗才能制服，而后领导出面交代政策。斗得他们动摇的时候，交代政策。不靠广大群众斗，光靠领导出面感化他，那是不行的。对有“五·一六”问题的，在他没有彻底缴械以前，没有彻底转变立场以前，对这些人要提高警惕。当然，彻底转变立场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没有发现他有怎么好的表现的时候，轻易相信了他，甚至要他们有两个有问题的人在一起，一个人在讲问题，一个做记录，他在会上发言，他在会下听。这样做都不好，容易把问题搞乱。交代的问题他们知道了。他交代什么，他也交代什么。这样做，都是对运动不利的。

清查“五·一六”，关键问题就是贯彻“三·二七”通知，中央十三号文件和毛主席九条方针、总理的指示。不能按十六条办。十六条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清查“五·一六”按十六条搞，那就错了。清查“五·一六”是清队的一部分，不能想通过清查“五·一六”解决十七年的问题，解决整个漏网的走资派的问题。

清查“五·一六”是挖隐藏的反革命，不是挖漏网的走资派，不按照十三号文件精神搞，就搞不好或搞不起来，甚至把它搞乱。

(2) 在整个运动中要抓罪行，抓典型，抓重点，抓骨干，抓关键，抓案件。

这是十三号文件的精神，也是总理讲话的精神。凡是这样做的。工作就有起色，进展就快，否则运动就容易出问题。罪行、案件是重点，是关键，是本质，要害的东西。如果不是这样抓，而还是一味地去追那个组织，追填了表没有，这容易重犯过去的错误，可能就会出现扩大化或一风吹。有的个别单位追组织，追了一大堆人，现在搞得很被动，开始不理解这个问题，现在理解了。当然运动初期，开始发动群众，揭发了很多问题，也可能揭发了很多人，但领导要很好地掌握，不能动的面太大。不能不去靠群众揭发，要支持群众揭发，不让群众揭发是不恰当的，不让群众揭发也查不出来。但领导上要很好地掌握，按照十三号文件指示精神动。动就要动那些骨干。对没有把握的不能动，特别是对一般成员不能动，这个领导可以掌握，虽然群众揭发的可能面宽，但按照罪行搞，运动还是照常前进。如果群众怎么提就怎么搞，就可能动的面大，就会乱。甚至有的单位动的面三分之二，他怎么能不乱？“五·一六”分子不会那么多。这就大了，一定要动骨干，确实有罪行的人可以动，罪行很严重的人可以动，这样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现在看来，搞组织的，在个别单位还没有完全纠正。现在有个说法，有了组织才是罪行，没有组织就是思潮，“组织定性论”，这是片面的。有组织的好，没有组织的好，思潮是思潮，罪行还是罪行。并不是说有组织就是罪行，没有组织的就是思潮，并不是那样。

有的单位区分“五·一六”的罪行和极“左”思潮就是这样区分的：凡是在王、关、戚、萧、余、傅，甚至“小小老百姓”的直接操纵策划下进行的阴谋破坏活动，这种破坏活动，它又是针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反军乱军，把军队搞乱，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凡属于这一方面的就属于反革命罪行，都是“五·一六”。当然，有些他不是在王、关、戚一伙操纵的，他搞这个，也是反革命，那是另外的反革命。他是什么反革命，就是什么反革命，十三号文件讲的很清楚。如果他不是搞阴谋活动，只是说了一些错话，过头话，甚至对军队机关，军队主要领导同志，说过一些过头的话，要和“五·一六”的罪行区别开。对军管会说过一些过头的话，甚至是偏激的话，你也不能说他是反军乱军，那是极“左”思潮，不能算罪行，有组织，没有组织，罪行和错误都可以分开。在一些单位也发现有的人

参加组织了，可是他什么罪行也没有，人家不让他参加，嫌他没“闯劲”，可是他非要求参加，连到厕所里都要求参加。北京新华印刷厂、化工三厂都有这样一部分人，都是老工人、党员、团员，他听说有个“左”派组织，是保卫中央的，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他非参加不可。给他表他不会填，是让别人帮助他填的，这些人属于受蒙蔽的，不能算“五·一六”分子。这个问题，不管有组织也好，没有组织也好，这是按照罪行。有了组织就可以上纲，那也不行，那也不是实事求是。是思潮就是思潮，是罪行就是罪行，有的单位定“五·一六”主要靠罪行来定，有的按组织来定，参加了就定，这样就会漏掉一些人。像吴传启、姚登山、孙正这些人就没有参加“五·一六”，他没有必要参加“五·一六”，按组织定，他们组织上都没有履行什么手续，履行手续参加“五·一六”的，有的是那些受蒙蔽的。要定要靠罪行来定，不能单纯追组织，单纯追组织容易搞乱，不按罪行来定就弄不清楚，政治上受骗。可能把好人也误认为“五·一六”分子，把真正的“五·一六”分子放过去。这点，过去大家也有过教训。

(3) 关于重罪证、重证据，还是轻信敌人的口供。

一些进展比较快也比较好的单位，关键问题是搞的准。现在来看，有些单位卡壳，就是卡在“准”字上，对交代的问题，究竟准不准，就不大注意。解决问题就要靠证据，靠分析，靠调查研究，特别是搞已遂的罪行，在这方面要过细的工作，扎实实地搞就能使运动进展很快。如果轻信一些人的口供，甚至把一些人交代的问题，没有经过查证就公布于众。这样就容易搞乱，特别是重点人的问题，容易被坏人利用。有的坏人也马上挑动你：“你敢不敢公布？”如果我们不好好地提高警惕，公布了就会上当。结果李某某、张某某、王某某都成了“五·一六”，使你分不清楚。要很好地调查研究，要重证据，搞已遂的，搞准，不要一大堆的口供，真正问题搞不下去。在运动开始的时候，也可能群众揭发了一大堆材料，对群众揭发的就要分清情况，一点一点的查清楚。先查已遂的，在这方面要分清。因为反革命阴谋集团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查清在黑核心里讲黑话究竟讲了多少，平时公开场合露骨的说的不多，一般都是影射。尤其是“小老百姓”、王、关、戚公开提口号，除了在最核心黑核心的可以这样讲以外，一般都是影射。在那里讲一句两句黑话，使下边一些人能明白。所以我们对他们的口供，要认真

分析，不要轻信那此东西，也不要集中力量查那些东西，有些东西也查不清楚，查半天弄得你稀里糊涂。当然对他们的口供可以放在第二步去查。

(4) 关于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问题。

根据一些组织搞清了的单位的情况来看，他们真正的更核心的人，今天坏过去也坏，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才坏的，过去也是坏人，在这次运动中打击重点是这些人，这是一小撮。真正受蒙蔽，不明真相的有一定的群众性。所以我们要把中间的这一部分人争取过来，教育过来，因为不这样搞，就容易漏掉重要的。如果面搞过宽，不利于运动的进展。如果面搞的过宽了，反而可能把最坏的漏掉。现在来看，搞好的那些单位也是这样经验。要分清哪些人是属于打击的，哪些人是属于受蒙蔽的，哪些人是属于跟着干坏事的。三种人，一种人是最核心的，一种是跟着于坏事的，一种是受蒙蔽的。对这些问题要有个基本的分析，要分别不同情况。来体现党的政策，分化瓦解敌人，把一般成员和受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

(5) 狠抓两条路线斗争教育。

搞得好的单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狠抓路线斗争教育，不是为清查而清查，是为了提高广大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从这个角度来搞这个运动，从清查罪行中把“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所干的坏事搞出来，把幕后操纵者、策划者搞出来。如果不狠抓路线斗争教育，就不能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清查“五·一六”是一场过去没有过的阶级斗争，经常有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一个是来自敌人方面的干扰，一个是来自我们非无产阶级思想方面的干扰。排除干扰就必须进行路线斗争教育，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表现为极“左”思潮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同样有两条路线斗争。特别要克服“左”比右好的倾向，要解决这个问题。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提高对清查“五·一六”重大意义的认识，分清是非，激起广大革命群众对“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仇恨，提高路线斗争觉悟。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也会越来越好。不少的单位抓了这一点进展很快。

清查“五·一六”过程中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从各方面来看，要看整个思想情况，要看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情况。如果整个情况轰轰烈烈，士气很高，那必定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果

你在口头上说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搞得人人自危，情绪很低落，怎么能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二、传达北京市清查围困中南海反革命事件的会议精神和李震、吴德同志的指示。

在北京市召开的会议上，李震同志、吴德同志做了一些指示，有可能传达不清楚，有错误的地方请指正。

1. 围困中南海这个反革命事件，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一系列主要反革命事件中的一起重大事件，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反党乱军，阴谋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妄图煽动蒙蔽群众，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反革命事件，它不亚于火烧英国代办处。那天，李震同志讲，中南海都能围困，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央办公的地方都围困，全国哪个地方不能围困？这是重大反革命事件。当前，这些事件清查的重点是：一个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第二就是围困中南海。围困中南海这个案子，由于各单位的努力，现在来看，他们公开组织的活动，已经查清了，而且，这个案子是由“小小老百姓”，王、关、戚，尤其是戚本禹出面策划的，公开出头指挥。人证、物证很多，也查得比较清楚。根据揭发掌握的线索来看，这个反革命活动，是经过周密策划和长期准备的，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活动，我们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这个“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在七、八月份有三起重大的反革命事件，一个是破坏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夺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第二是围困中南海；第三是揪军内一小撮。他们在这三个方面互相呼应，配合得很好。这都是在七八月份搞的，并不是偶然的。同志们可以想想，当时，他们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有策划的，尤其是针对敬爱的周总理、康生和江青同志。他们为制造围困中南海的反革命事件大造舆论，开始首先就搞政治陷害，在湖南有一个反革命分子造了谣言，现在正在查，所谓 007 密令事件，其实是造谣，完全是为了制造舆论。说是哪一天拣了个什么条，条上写着湖南省军区那一天发生政变，说这条上的字迹象总理的。这家伙就跑到北京来告状，“小小老百姓”打电话叫刘志坚接见了他，并通过刘志坚对他说：“你们这样关心国家大事很好，中央正在注意这个问题。”这个物证已经拿到手了。这些反革命分子回去以后，利用这

个就立刻掀起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反总理的妖风。以后就是利用揪陶铸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后来就是利用反“二月逆流”还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一直是升级的。他们配合的很好，策划的很周密，因此，这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单从围困中南海来说，他的起因也不是很简单的。起因是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引起的。“八·一”团开始是极右，是保刘少奇的，后来跑到极“左”，怕人家说他是老保、右倾。

对于他们揪“刘少奇”，总理亲自向他们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可是传达以后，“揪刘”不仅没有降级，反而升级了，这个问题就不简单了，肯定有幕后操纵者，不然为什么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以后，不是降级而是升级呢？这是什么问题呢？他们阴谋目的就在于欺骗蒙蔽群众，戚本禹交出刘贼的认罪书，单独交给“新八·一”，不是在两派“揪刘”的时候。“老八·一”有点孤立，揪了揪不行，它就回去了。刘贼七月九日的认罪书交给了“新八·一”，就是一个大阴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老八·一”马上杀回来了，当时声势不是低了，而是升级了，策划了绝食。戚本禹亲自前往绝食现场慰问，以后又策划了贾建被打一事，送到反帝医院住院，戚本禹又亲自打电话叫医院接受，这个阴谋策划的很周密，但是贾建究竟是谁打的，是他自己还是别人，弄不清楚。事情发生以后，戚本禹直接给他打电话，并派王道明、焦玉山去问候，这样，就把绝食逐步升级了，以后，戚本禹在“老八·一”和“新八·一”之间进行了操纵，他们都参加了“揪刘”，这是他们的策划。当然，这是从整个围困中南海的反革命事件来看的。两派还是对立的。天派和地派几乎要发生武斗。八月四日晚上进行了反革命阴谋活动，现在来看，实际上他们配合的很好，特别是“八·五”行动，开会的时间都差不多，策划人内容也基本上是一致的，看起来，这个反革命事件是联系着的，他的反革命策划手法是很高的。

2. 根据当前清查的进度情况，李震和吴德同志指示，这个事件重点是查清他们阴谋策划的部分，特别是上层阴谋策划部分。按照十三号文件的精神，主要是把他们反革命组织的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清查出来，主要力量是打击这一小撮，对于广大群众，尤其是受蒙蔽的群众，只要他们把情况说清楚就行了。这个事件欺骗性很大。“揪刘”是大方向嘛，谁敢不去！谁愿意当老保？！跟着糊里糊涂的去了。参加的有几千个单位，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与上线没有关系。

只要这个单位与上线没有什么牵连，也没有什么阴谋，与走资派也没有联系，不是在走资派的策划下，就是“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主要是看跟上线是否挂了钩，直接挂钩或间接挂钩。把重点放在这里，这样有利于集中力量，抓住重点。

3. 要明确清查的重点单位、重点案件和重点人。由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所以，每一个时期，都要侧重一、两个重点问题。当然，从当前看，是查他的阴谋策划部分，在这方面，主要抓住两个问题：

(1) “八一团”为什么在总理传达毛主席指示以后，还起来围困中南海，“揪刘”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究竟是谁搞的？把幕后的挖出来。

(2) 关于“八·五”大会的阴谋目的和幕后操纵者。清查时，着重抓住几个黑会，像七月二十九日、七月三十一日在北航召开的形势串联会，到底策划了什么阴谋，幕后是谁？八月四日在地院，召开所谓二十二个院校串联会，它的幕后操纵者是谁？把它的阴谋查清楚。当然，主要查已遂，他们要绑架总理，把军队整乱，先不查，先查他“八·五”会议想搞什么？究竟谁支持？谁指挥？抓住重点。如果把开始是怎么搞起来的，幕后是谁，这两个问题清楚，这个案子就会有很大进展。当时确定清查的重点单位有七个院校、八个单位，“五大领袖”所在院校和建工、体院、国家计委以及北京工交口等。在确定重点人时，主要通过前台查后台，前台是表演的，把后台挖出来，特别是从现在看，清查围困中南海的材料中，笔记本中有不少记录，有这么一句，那么一句，但是究竟说了些什么问题，这也需要认真查清楚。在国家机关来说，主要是“斗批批”，“斗批批”是搞控制的，究竟它的幕后是谁？与“八一”也是有联系的。要抓住它的开始，开始是怎么搞起来的，谁支持他，需要查清楚。

4. 清查围困中南海要认真搞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得出正确的结论，不要割断历史，不要轻信口供，要重视物证。现在交代材料不少，要认真分析，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查清一件落实一件。在每一个单位，自己根据这个精神确定当前要抓的一两个重点或几个重点，但不要重点很多，面铺的很广，主要的是抓和幕后有直接联系的。从现在看，究竟谁参加了，那些单位，怎么组织的。这个已经清楚，不必着重去查。主要是查上线策划，抓重点，我们知道王、关、戚是操纵者，物证也比较多，但是开始下面怎么和“小

小老百姓”、王、关、戚他们连起来的？肯定有联系，究竟怎么取得联系的，需要进一步查清楚。

5. 各单位要主动协作。现在来看，对于围困中南海的事件，如果不组织协作，就查不清。要紧密协作，在协作中，每个单位要主动配合，等待不行，都等待就没有进展了。都要主动起来，哪一方面需要别的单位作证，你自己就主动去找，去完成，这样进展就快。而在查的过程中，着重根据“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特点，他最黑的部分，公开的、明目张胆的罪行有一些。在一般场合，他是讲黑话。

李震同志举了个例子：姚登山交代就到家了。他讲在八月×日戚本禹打电话，叫到大会堂，开会以前，他说：“咱们聊一聊，”他说：“现在形势发展很好，你外交部的领导班子考虑了没有？”外交部原来就有领导班子，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亲自掌握的，要你考虑什么？他影射的就是考虑新班子。后来戚本禹又讲，中央文革有个安排，现在还没有研究，将来看起来，总理就是王力，戚本禹抓外事工作，掌管外交方面。他问：那么总理呢？戚本禹说：“到以后总理当主席嘛！”这个黑话就是属于他的内部最核心的部分，他不能说：“你回去以后夺外交部的权。”他能这样说就算到家了。对于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部分，要很好的分析。因为他们是搞阴谋活动的，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的对待。对群众他不能这么讲：“你围困中南海吧。”围困中南海是最反动的，就是为了夺权，为了把权夺过来，这样，它就不是阴谋集团了。要研究它的特点，他讲一点下面就领会他的意思了。他们把矛头指向总理，说什么“《五·一六通知》发表了，要揪出一个保人保得最多、比陶铸更大的人物来。”这就是影射，这就暴露了他们的罪恶目的。

这是今天介绍的两方面意见，也可能有错误，看的不准，有错误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最后请丁江同志指正。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一日，陈伟关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讲话

〔陈伟：中央专案联合小组成员；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根据领导同志的指示，今天把我了解到的有关清查“五·一六”运动的一些情况和自己对运动的一点认识向同志们做个介绍。可能有的地方不正确，错误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今天主要向首长和同志们汇报三个问题：

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清查“五·一六”的一些指示精神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对清查“五·一六”运动一直十分重视，曾先后做过多次极为重要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审阅姚文元同志准备发表的《评陶铸的两本书》，读到“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这一段的时候，毛主席指出：“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毛主席指的是它的组织者和操纵者，不是一切“五·一六”成员。这一段是毛主席亲自加上去的，这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五·一六”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定性了，是反革命的阴谋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一定要把它揭露出来。

随着运动的进展情况，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深挖“五·一六”的群众运动又不断地及时做了许多重要指示。例如一些单位，它本来有“五·一六”，可是他又不认真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有一些同志从极‘左’跑到极右，它不清查五一六。”在清查“五·一六”过程中，有极少数的单位对“五·一六”出现一风吹这个倾向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又指出：“对‘五·一六’的问题不能一风吹。”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接见外宾的时候，曾多次提到“五·一六”的问题，比如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的时候，就谈到“五·一六”的问题，在接见其它一些国家领导同志的时候也讲到“五·一六”的罪行，尤其是反复讲了“五·一六”火烧英国代办处的罪行。同志们在这方面过去都听过传达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清查“五·一六”非常重视，从运动开始，到运动过程中凡是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出现一些什么倾向的时候，毛主席都非常及时地做了明确的指示。

林副主席对清查“五·一六”也非常重视。在“九大”政治报告中就专门讲了一段。林副主席是这样说的：“潜伏在群众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他们不到一定的气候是不暴露的。一九六七年夏季和一九六八年春季，他们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又刮起了一股反动的翻案邪风。他们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这一小撮坏人，终于同他们的头子刘少奇一样被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的胜利。”林副主席在政治报告中把“五·一六”阴谋集团是由什么人组成的讲清楚了。这些人是他们的核心，也就是“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也指出了他们的罪行，就是“三指向”，“一挑动”。

以后，在深挖“五·一六”的过程中，林副主席又做过好多指示，同志们可能都听过传达了。总理、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以及中央政治局其他领导同志对深挖“五·一六”都非常重视，特别是总理、康老、江青同志经常不断地对深挖“五·一六”做出指示，经常讲这个问题。这些指示同志们过去都听过传达了。今天就不再重复。

中央首长指示的基本精神，在中央十三号文件中都概括了。十三号文件是总理起草的，并经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十三号文件后面附了审查干部的决定，也就是九条方针，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四三年关于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这个文件是非常重要的文件，总理多次讲过，非按九条方针做不行。只有按九条方针来办，才能把“五·一六”的问题搞清楚。

关于十三号文件的精神，有的单位学习以后，他们归纳了“四抓”，“搞好几个区分”。这是一些单位的学习体会和理解，不一定对，供同志们参考。

（一）“四抓”：

一是抓罪行，这是本质。有的单位是这样理解的：“五·一六”为什么是反革命阴谋集团？因为它犯有“三指向”的罪行。这是关键，这样就具体化了。罪行是本质，你有罪行，犯了罪，我就清查你。

去年十月份前后，那时曾经出现过扩大化，后来又出现一风吹。为什么先是出现扩大化，后来又出现一风吹呢？这是因为没有抓住清罪行这一条，而是一开

始就笼统地追查填了表没有，履行了组织手续没有。搞神秘化等，就是因这些造成的。

现在，在清查罪行的过程中，有些单位对“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逐步加深了认识。从这些单位清查出来的情况看，“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大致有三部份人，三种情况。

一种是核心骨干。这一部份人就是林副主席“九大”政治报告所讲到的，都是一些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坏人，有的是历次政治运动的“运动员”，有的是一贯收听敌台广播、搜集帝修反攻击我们的最恶毒的语言，在背后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这第一种人数量很少，在一个单位也超不过十来个。像“二七”机车车辆工厂这样一个大厂，这类人大概是十来个。这是“五·一六”的核心骨干，就是十三号文件所指出的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这些人有个特点。他们不一定要履行参加“五·一六”手续，也不一定填表。

第二种情况，有的人有个人野心，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水摸鱼，捞个一官半职。这部份人是跟着干坏事的。一些单位理解，这就是十三号文件所指出的胁从者、从犯。因为他想升官发财，投靠那些野心家，上了他们的当，跟着干了坏事，这部份人为数也不多。

第三种是受蒙蔽的，在“五保卫”旗帜下受蒙蔽参加的，这是大多数。他们听说有个“左派”组织，是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党中央的，他不了解内幕，不知道阴谋，稀里糊涂参加了。象有些工厂的老工人，他听说有个组织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到处打听，有没有这个组织，非要参加，人家说他保守，他还非要参加不行，最后填了表参加了，他不大识字，表还是别人给填的。新华印刷厂一个老工人，因为人家不让他参加，他还追到人家厕所里去，人家走到哪，他追到哪，非要求参加不行。像这些人完全是受蒙蔽的，其中有好多老工人、党团员，这些人根本不了解阴谋，完全是受了蒙蔽。

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打击那些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阴谋家、野心家，打击那些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这是打击

的重点。当然，对于这些人，只要他们坦白交代得好，也可以从宽外理，有立功表现的也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如果不抓罪行，一开始就抓组织，追查填了表的，结果都是一些老工人，历史上没有问题，什么罪行也没有，这个方向就搞错了。所以，总理指示抓罪行，这是本质。有些人没有填表，象我们知道的孙正、姚登山、吴传启、潘梓年，这些人他们都没有履行参加“五·一六”的手续，如果光追履行手续的话，恰恰是上了他们的当。这些人干了坏事，但是他们没有填表。所以，中央十三号文件指示要抓罪行，这是中央反复指示的政策。一开始就笼统地追组织，结果伤了好入，重点搞了受蒙蔽的，把坏人放过去了。而通过抓罪行就把坏人抓出来了。

有些单位体会到，只要把罪行搞清楚了，组织问题不是那么难搞的。如果一开始就搞组织，就要犯扩大化的错误。现在看，有些单位面搞得那么宽，就是这个问题，敌人乱供乱咬，有可能伤了好入。搞罪行，这是本质。当然，组织问题也要搞，就是那些受蒙蔽的老工人，也要说清楚，但是不作为重点。

二是抓罪行怎么抓？就是抓重大案件，通过清查重大案件清出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重点是通过清查罪行而形成的，通过清查案件形成的。抓罪行主要是抓重大案件：清出谁是幕后策划者，谁是密谋，搞清他们的阴谋。

在北京地区，当前主要是抓三大重点案件，一个是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个是对围困中南海，一个是“揪军用一小撮”。火烧英国代办处，它的阴谋就是为了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把我们与一些国家的关系搞紧张，他们好趁机混水摸鱼，进行反革命夺权。参加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有一万多人，但知道这个阴谋的是极少数的人。所以，清查火烧英国代办处就是要清查知道阴谋的那些人，清出谁是主谋和幕后操纵者。现在很清楚，就是姚登山、周景芳。姚登山的后面就是“小小老百姓”，王、关、戚他们搞的。对于广大群众来说，只要把这件事说清楚就行了。当然，也说明他们当时头脑里毛泽东思想少一些，毛泽东思想多也不会受蒙蔽。不能在清查重大案件中间去清查群众。

这个案件很有进展，基本上可以结案了。看来在“火烧”四周年（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火烧”的），就是到今年八月份可以结案。

围困中南海也是一个大案件。这个案件也有很大进展。要求十月一日结案，现在看，有希望，还可能提前。围困中南海，真正目的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他们表面上打着的旗号是“揪刘少奇”，实际上它的反革命目的是为着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施加压力。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他们的反革命夺权做准备的一个组成部分。真正知道这个阴谋的也是极少数。参加围困中南海的有二十万群众，绝大多数不了解真相，因为说是“揪刘少奇”，谁敢不去？哪个组织要去，就是保守组织，那时谁都怕说是保守组织，就要揪刘少奇，就赶快去，不去人家揪出来了，就没有你的份，这样去参加的也不少，这是受蒙蔽、受欺骗的。那时反革命野心家王、关、戚、“小小老百姓”又钻到了中央文革里，他们又公开支持“围困中南海”，其欺骗性就更大，因此广大群众完全是受蒙蔽的，他们不知道这个阴谋。这些人，基本上是属于好同志，受了蒙蔽。当然，他自己也要接受这个教训，以后不要再受蒙蔽。通过清查这些案件，主要是清出坏头头，清出主谋者，幕后策划者，不是清群众。当然，群众也有个提高路线斗争觉悟的问题，只要把问题说清楚就行了。比方说，他怎么去的？谁让去的等等，说清楚就行了。

三是抓阴谋。阴谋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要害，“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他就是搞阴谋的。真正搞阴谋的人是极少数的。清查搞阴谋的，不会伤害好人，也不会犯扩大化的错误。围困中南海真正知道这个阴谋的那是很少的，过去的所谓五大“领袖”，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蒯大富，这些人是知道阴谋的，这些人是和王、关、戚，“小小老百姓”挂钩的，“小小老百姓”有时候阴一句阳一句在那说，他们就心领神会了。

“揪军内一小撮”同样是这个问题。一九六七年红旗杂志十二期中那篇社论大毒草出来以后，那时跟着叫“揪军内一小撮”的人也不少，也有人到外地去“揪军内一小撮”。“五·一六”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把整个军队搞乱，作为配合他们的反革命夺权的一部份。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发生的三个重大反革命案件，是有机的配合，是很大的阴谋。

一九六七年“八一”建军节，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宴会，陈毅同志走至蒯大富这些人面前向他们敬酒，说向小将们敬酒，向你们学习。戚本禹这家伙随后就走到蒯大富等人面前小声地说：“敬酒就敬酒，别忘了同他们斗争。”戚本禹所说的他们，是指朱德、叶剑英、陈毅等同志。这就是搞阴谋。戚本禹这一句话，蒯大富他们就领会是什么意思了。

所以，阴谋是要害。谁是主谋，谁是幕后策划者，谁是坏头头，谁是“五·一六”骨干？就是他们知道阴谋，就是要找重大事件的阴谋是什么，光去抓表面东西，不去找阴谋，就不能击中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要害。

四是抓重点。所谓重点，就是重点案件、重点单位和重点人。重点人就是那些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策划者。有的单位对抓重点抓得很好，去年十一月后，卫生部搞得很好。就是抓了重点，抓孙正，斗孙正，批孙正，分化瓦解其他一些人，面没有搞的过宽。如果搞的过宽，就搞不深。

上面讲的是一些单位他们对十三号文件的一些理解，不一定对，供同志们参考。

（二）搞好几个区分

第一，区分是非。对一件事要区分是非，这件事，究竟是是还是非，要区分。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就是清罪行，也可能出现扩大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是复杂的，必须首先弄清楚，每个时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什么，凡是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就对，凡是违背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就是错的。区分是非，不能离开当时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区分是非，要根

据中央当时的指示来区分。凡是按照中央指示做的，就是对的，违背中央指示的就是错的。如六七年“一月风暴”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毛主席的号召，那么在那时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联合起

来向党内走资派夺权，就应该肯定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一方面。但有些单位，中央几次指示，有些单位的权不能夺，但有些人他就非夺不可，这就是错的，有的就是反革命夺权。要认真搞好研究分析，才能把是非搞清楚。

第二，要区分极“左”思潮犯错误与“五·一六”的罪行。一个是错误，一个罪行。把错误搞成罪行，那是扩大化；把罪行搞成错误，那也是不对的。极“左”思潮犯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五·一六”罪行，是敌我矛盾的问题，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怎样区分？中央领导同志在多次讲话中，都讲得很清楚。有些单位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理解的：

第一条，是看他是不是在“小小老百姓”、萧华、杨、余、傅、王、关、戚他们的操纵下或者和他们勾结在一起，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也就是说挂不挂黑线，这是一条。

第二条，要看他是不是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五·一六”是搞阴谋的，要看他是不是搞阴谋，是不是将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有一些坏家伙，他也搞“三指向”、搞阴谋，但他没有跟王、关、戚挂钩。这类反革命，他是什么反革命，就是什么反革命。“三·二七”通知中讲的很清楚，不要以为只有一个“五·一六”，别的反革命就没有了。还有一种情况，有的也搞了一些阴谋，可是他的罪行不是“三指向”，他是为了搞垮那个组织，搞派性，他虽然也是搞阴谋，但那不能说成是“五·一六”。要根据具体情况去具体分析。再一个是，清查他们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有的因为受极“左”思潮影响，对军管会、军宣队，甚至军事机关，也可能是领导同意，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提过意见，这些意见也可能是错误的，但不能笼统地把这些都说成是反军乱军。要把这些同反军敌军、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区别开来。要看他们的意见是什么意见。如果是因为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说过错话，做了错事，就不能说是反军乱军，不能说是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要把两者区别开来，不能把极“左”思潮说成是“五·一六”的罪行。

第三，再一个区分，就是要正确区分正当的工作关系，还是反革命的勾结。比方说和王、关、戚，有的是属于正当的工作关系，有的是反革命的阴谋勾结，两者要很好地区别。既不能把正当的工作关系说成是反革命的阴谋勾结；也不能把反革命阴谋勾结，说成正当的工作关系。

第四，还有，要很好地区分“五·一六”骨干、一般成员和受蒙蔽的群众三者之间的关系。既不能把骨干说成是一般成员，更不能把骨干说成是受蒙蔽的。当然，也不能把受蒙蔽的，说成是骨干。

关于这些关系怎么区分？有些单位是这样领会中央精神的：区分哪些是骨干、哪些是一般成员、哪些是受蒙蔽的，主要是根据罪行，而不以是不是履行了参加“五·一六”的手续为依据。如果你是“五一六”反革命事件的组织者和操

纵者，不管你参加没有参加，履行没有履行参加“五·一六”的手续，都是属于骨干。相反，有些老工人，他完全是受了蒙蔽，并且可能还填了表，你能说他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吗？不能把这些没有罪行、受蒙蔽参加的人，定成“五·一六”分子，那样就是扩大化了。

以上这些问题要很好地加以区别，十三号文件已经讲得很清楚。但是，搞得好不好，领导很重要。九条方针的第一条讲的就是叫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看来，领导亲自动手和不亲自动手效果大不一样。哪个地方如果领导亲自动手，那个地方的运动就能够健康地发展；如

果不能亲自动手，而是空头指挥，那么运动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些单位在这方面有很多很好的经验，也有的单位是有教训的。

二、对清查“五·一六”群众运动的几点认识。

有的单位在这个问题上是这样认识的，他们认为运动搞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领导在认识。我感到这个提法很好，有一定的道理。你对这场清查运动认识正确不正确，对“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怎么认识，这是能不能把这个运动搞好的关键问题。对这个问题，有些单位的同意们提出了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要搞好这个运动，首先要坚决，就是说要树立把这个运动搞好的信心。如果这个单位有“五·一六”，就要坚决把他们搞出来。当然不是每个单位都有“五·一六”。一部分单位有，一部分单位就没有。这个问题要很好地加以分析，如果有就要坚决清查。在开始搞的时候，有些单位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感到现在形势大好，大联合，三结合，都搞好了，如再搞“五·一六”，耽心引起波动，耽心破坏了大好形势。实际上这些耽心是不必要的。因为有些单位有“五·一六”，你不把他挖出来，是一大祸害。他们专门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如果不把这些家伙搞出来，大联合，三结合，整党建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都搞不好，因为他们在里边搞破坏嘛。只有把这些人清查出来，革命、生产才会越来越好。这些单位过去一直是“老大难”单位，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但是把“五·一六”挖出来以后，“老大难”的问题就解决了。总之，有坏人在里边，搞什么也搞不好，清查“五·一六”只要真正按照毛主席的九条方针来搞，真正贯彻十三号文件精神，不会引起波动，也不会搞乱，只会越搞越好。敌人就是这样，你打打他，他打你。特别是“五·一六”这些家伙，他们是搞阴

谋的，如果使他们隐藏下来，过几年以后，一遇时机，他们还是要搞鬼的。所以，要坚决把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挖出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第二，要正确认识这个运动的目的，以及这次运动的复杂性。

清查“五·一六”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场斗争它不同于一般的斗争，不同于一般的清队，不同于一般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比较复杂。

为什么比较复杂呢？一个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一时难以区别，特别是极“左”思潮犯错误和“五·一六”问题交织在一起，这是不大好区别的。而且这个问题还须正确区分，区分不好，不是扩大化，就是一风吹。再一方面就是敌人的破坏。特别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组织者和操纵者，他们设下了很多圈套，给你搞的真真假假，真一套，假一套。有的“五·一六”分子就是这样，完全是给你讲假的，把你引入歧途，叫你犯错误，更增加了这个运动的复杂性。

根据一些单位情况来看，只要认真按照十三号文件精神去搞，按照九条方针去搞，也不是十分困难的。从北京地区的情况来看，有些单位从去年十一月份开始清查“五·一六”的群众运动，到现在，一直搞得比较好，比较稳，坚决按九条方针，十三号文件办事，现在罪行和组织问题已经基本上查清楚了。经验证明：只要真正贯彻执行十三号文件、九条方针，也不是那么困难。当然这个运动还是比较复杂的，这个运动所以复杂，就复杂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这个问题上面。

对“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逐步把它端出来的。一九六七年八月底九月初，把王力端了出来，那时戚本禹还在台上，他还搞了很多破坏活动。把戚本禹搞出来后，还有“小小老百姓”在台上，他仍然搞了很多破坏活动。过去在清查“五·一六”过程中，“小小老百姓”总是要人们找表、找组织，有意识把运动引入歧途。为什么他要这样搞？就是为了掩盖他自己，掩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有意不让你去搞。一些单位清查“五·一六”，他不让去挖后台，他胡说，你们不要以为“五·一六”有什么后台，走资派就是他们的后台。那就是说，不让人们去挖“五·一六”的后台，有意把运动搞乱。

前一段曾经出现过扩大化和一风吹的倾向，总根子就是“小小老百姓”的干扰，在红旗杂志在清查“五·一六”的时候，他说，你们都检查查看，你们让小爬虫爬了多少，他使你去搞群众，把运动引入歧途。最后搞不下去了，他又说，过去的事情不说了，今后共同求进步。有些“五·一六”骨干暴露出来了，他不让人们搞他的罪行，而要人们搞他的历史，因为一搞罪行就搞到他头上去了。在这方面也增加了运动的复杂性。但是，如果真正按照十三号文件，按照九条方针搞，是完全可以搞好的。

第三，怎样认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他是专门搞阴谋的。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他的手法主要是搞阴谋。阴一套，阳一套，从他们的下层骨干，一直到上层“小小老百姓”、王、关、戚、萧华、杨、余、傅都是这么一个手法，从我们清查出来的他们搞阴谋的秘密文件看，更可以看出这个问题。

（陈伟同志谈蒯大富的三十六条“权经”，和徐凯的“绝密草案十八条”中的内容）

从以上这些秘密文件中可以看出他们完全是搞阴谋的，是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从他们的罪行，也可以看出，他们的骨干分子完全是搞阴谋的。

1. 他们为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首先一条就是煽动极“左”思潮，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口号，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破坏运动的发展和秩序。他们为了抢劫国家机密档案，他们就煽动机密要掌握在“左派手里”，还把抢档案改成是“保护档案”。他们叫嚷“对保密要进行阶级分析”，“对造反派无密可保”，他们就是采取这些手段来抢档案的。

他们为了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他们大力宣扬“义和团”、“红灯照”。以前的“义和团”、“红灯照”是排外主义，见洋人就杀，这是毛主席已经批判过的，对外国人要进行阶级分析，不能一概排斥。他们为了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就大力宣扬“义和团”、“红灯照”，还说“今天的红卫兵就是过去的‘红灯照’”，煽动极“左”思潮，他们还讲“红卫兵要管外交”，“二十几岁的人可以当部长”等等，煽动极“左”思潮。

2. 第二个阴谋就是用制造谣言的办法来欺骗人民群众。

他们制造所谓“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还造谣说“中央常委有分歧”，什么“三比四”、“四比三”等等。这些谣言是他们造出来的，是为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他们还制造了所谓湖南“007号密令文件”。湖南一个“五·一六”分子赵××六六年十二月份造谣说，他在湖南省军区门前看见一辆摩托车过去了，车过去后，他拾了个纸条，这纸条上写着：命令你部在六七年元旦进行政变。说笔迹像是总理的笔迹。完全是造谣陷害。这些家伙来到北京找“小小老百姓”，“小小老百姓”派刘志坚接见了他们，“小小老百姓”让刘志坚告诉广州军区注意一下湖南军区。刘志坚还对那些家伙说：“伯达同志说，你们关心国家大事这很好”，“你们反映的问题中央注意了”。就这样煽动起来了。“小小老百姓”到处传播谣言，完全是胡说八道。

3. 围困中南海时，“小小老百姓”带着蒯大富、韩爱晶“视察”揪刘帐蓬，到帐蓬第一句先说你们该回去了，可是第二句就说“你们也真辛苦，你们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你们还有揪谭震林的任务呀！”这些家伙心领神会，知道这不是叫回去，于是马上把“揪刘少奇”变成了“揪谭震林”、“揪王光美”。“小小老百姓”还用自己的汽车送韩爱晶、蒯大富到清华园。韩爱晶在汽车上问他：“现在形势怎么样。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象辛亥革命时期一样，人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而革命果实却被反革命两面派抢去？”“小小老百姓”听了不回答。汽车到清华大学西门时，他两手作揖给他们说：“无限希望，无限前途，无限光明，行百里半九十，你们才走了半里路。”他们心领神会。“小小老百姓”就是这样在背后耍阴谋，阴一句，阳一句。

4. 他们通过反死人来反活人，如“讨孔”就是搞这些阴谋。他们是为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而煽动“讨伐孔老二”。山东曲阜有个孔庙，是国务院规定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们污蔑说“国务院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要把孔庙砸掉，还开了大会，给国务院写抗议信，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相当反动。当时那些家伙还不敢砸国务院立的保护文物的碑，就回来问“小小老百姓”怎么办？

“小小老百姓”回答他们说：明朝以前的可以保护，清朝以后的谁都可以砸。就这样一句话，他们就首先砸了国务院的那块碑。污蔑国务院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

他们反死人不是目的，反死人是为了反活人。他们公开说：“讨孔要结合现实，单搞死人就失去了意义。”

5. 再一个他们表面上是反对哪一个同志，大字报上也说要打倒那一个同志，如国家机关工交口表面上是对准先念、陈毅、秋里等这些同志，实际上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在来看这些家伙，他公开反对毛主席、林副去席，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不敢。如果他要那样做，马上就会把他抓起来。他的手段很狡猾。他们还采取借口整哪一个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为名，而整某一个领导同志的材料。他们还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些指示列入刘少奇的罪行，通过这种手段搞阴谋。有一些很清楚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而他们硬说是刘邓的，这是他们的一个反革命手段。当然刘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应该反对，但是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列入刘邓的罪行，这就是阴谋。

6. 再一个手法是，表面上打着搞某某的专案的名义，实际上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材料。在卫生部，他们以黄树则专案为幌子，实际上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在粮食部有个陈国栋专案，实际上也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陈国栋还说这个办法不错，他还支持他们这样搞。在交通部他们以孙大光专案搞无产阶级司令部。

7. 为坏人翻案，这也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阴谋的一部份。最清楚的是为陈里宁翻案，陈里宁这家伙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但是过去刘少奇、罗瑞卿这些家伙们搞陈里宁，他不是为了搞他反对毛主席的那一部分。陈里宁对社会主义对整个共产党那是怀恨在心的，那些坏家伙他们不搞他攻击毛主席的那一部份，专门搞他攻击刘少奇的。戚本禹他们明明知道陈里宁攻击毛主席，但他们硬替他翻案，把他打扮成“新时代的狂人”，到处演黑戏，做黑报告，放他出来，污蔑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搞打砸抢，还把打砸抢搬上了舞台。他们这样搞，完全是为了造反革命舆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外交部的“五·一六”给冯×翻案，在反革命分子×××操纵下，成立了“反迫害大队”，这些人都是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他们闹着翻案，说“过去都是受迫害的。”戚本禹还派徐凯跑到北京一个劳改农场去煽动造反，公开地称这些劳改犯为“同志”，说现在你们不快起来造反，今后就翻不了，

就石沉大海，永无翻身之日了。那些家伙一听就跳起来围攻军管的同志，军管的同志有的被打伤，好几个月不能上班。

8. 再一手法，他们还从国民党、帝、修、反的反动书刊杂志上收集国民党攻击共产党的材料，从黄色书刊、杂志上收集敌人攻击我们领导同志的材料，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北图（北京图书馆）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反革命事件。

9. 他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采取的一个反革命策略是“清君侧”，就是把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同志一个一个地反掉，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架空起来。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攻击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他们为了反总理，搞了好多阴谋。他们首先企图把几个副总理一个一个地反掉、搞垮，一直把矛头指向几个副总理。把副总理一个一个反掉了，到机会就反总理，进而架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10. 关于反军问题，就是他们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一个部份。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提出一个战略部署，他们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反动口号。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中央要起草一个文件不准把矛会瞄准军队，他们一面起草，而

一面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最早是六七年一月十一日提出来的，是关锋他们提出来的。毛主席说，军队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他们马上把矛头指向军队，说：“军队支左支错了，支持了保守派”，到处冲军区，完全是唱反调。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在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发出了要“拥军爱民”的伟大指示，他们又马上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就是最大的拥军”“军队支持造反派是最大的爱民”这里的“造反派”是指他们自己说的。

11. 七、八月份从后，那是两个司令部生死搏斗的时候，中央领导同志讲，是我们党的紧急关头。在这个紧急关头，他们搞了些什么东西？那时发生了三个大的事件。发生的背景，一个是在国际上，他们想办法故意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破坏我国和周围国家的关系。伟大

领袖毛主席曾经提出：对于缅甸的问题我们不怕断交。因为当时缅甸反华。他们却硬迫着和缅甸断交，完全是为了破坏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对港英

的斗争毛主席提出不动武，他们就采取谎报军情的办法，说港英当局打死了我们二百多人，实际上以后查大概是一个也

没有打死，他们为了策划出兵香港，就设置了“四十八小时”的圈套。那时，今天砸了这个大使馆，明天砸那个大使馆，最后把英国代办处烧了，就是为了制造我国与一些国家的紧张局势。

在北京，把中南海围了三个月，围的水泄不通。在全国各地“揪军内一个撮”，妄图把军队搞乱。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非常阴险，非常狡猾。中南海他们都围起来，围的水泄不通，党中央、毛主席办公的地方他都可以围，全国各地那个地方他不可以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些家伙非常凶恶，当然，这主要是指“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不是指一般成员。

12.“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也是采取各种反革命手法，首先是想办法夺，把权力夺到手，夺不到手就打入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里边去，把革命的领导同志架空起来，如果这个办法再不行，就用“反复旧”这种手法把你反掉、搞乱。

13. 对群众组织的手法，就是想办法制造两派。毛主席说：要搞大联会，他们就对抗说：“不能陶醉于那个”，“《共产党宣言》不是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到现在一百多年了，还没有联合起来。”没有两派他们就想办法制造两派，特别是在接见的时候，王、关、戚这些家伙，就别有用心地问：你们那里有没有两派？人家说没有，他们就说“没有两派的地方运动不深入”。

14. 还有一个手法，他们就是阴一句，阳一句。五月二十七日，“小小老百姓”到计委去看大字报，戚本禹也去了，实际上是去搞反革命活动去了。计委两派群众，一派要打倒余秋里同志，一派要执行中央对余秋里“一批二保”的指示，搞的不可开交。有的家伙就问“小小老百姓”：可以不可以提“打倒余秋里”的口号？他不正面回答，他说：“炮轰余秋里不等于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戚本禹又加了一句：“炮轰余秋里不等于反总理。”这些家伙没有得到明确的指示。所以等他们上了汽车又问他，到底能不能这样提？他说：“可以打倒陈伯达。”。戚本禹马上煽动说：“他们连余秋里都不敢打倒，他们还敢打倒你？”用这些话来进行煽动。这一下他们就明白了。

现在来看，在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火烧英国代办处等问题上，真正前台的这些人不是主谋。火烧英国代办处在前台的不是这些人，“反帝反修联络站”，“揪刘”东站和“揪刘”西站第一、二把手都不出来，都在幕后指挥，“五大领袖”也在幕后指挥。“揪军内一小撮”也是这个情况。派到各地的联络站、调查组也是这样。清查大事件重点是搞他的阴谋部份，一些明目张胆的罪行，表面上的东西要搞清，更主要的是谁操纵着干的，主要是把幕后的挖出来。要掌握好政策。

三、当前北京地区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情况

北京地区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形势，在中央首长指示，十三号文件下达以后，大家方向更加明确，信心更足，不少单位的领导亲自动手，排出了大的事件，纠正了过去一风吹的错误倾向，放手发动群众，进行路线教育，开展了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大清查，对重大案件联合作战，一点一点地查清、落实，掀起了清查的新高潮。在群众运动的强大声势面前，“五·一六”分子感到不交代混不下去了，不少人交代了罪行，许多受蒙蔽的和一些知情人纷纷起来反戈一击。总的来看，这段运动声势很大，发展很快。重大案件的清查工作，都有很大进展，有他已经结案。联合小组排出来的十五件大事，都有很大进展，有的已经结案了。比较大的三起，“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反革命事件，上层策划已经基本查清，“小小老百姓”他怎么策划的，有好多文件已经查清。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上层策划，现在也基本上查清楚了。围困中南海已快查清结案了。通过清查重大案件，也清查出了一小撮坏头头、骨干和幕后操纵者、主谋。

现在来看，运动进展比较快的单位，组织问题和罪行问题已基本上查清，准备结案处理了，有一批这样的单位。

另外，也有不少单位，把“五·一六”分子那些明火执仗的罪行基本查清了。现在正在深挖幕后阴谋部份，深挖他的幕后策划部分，运动正在健康深入地发展。

一些过去曾经出现过偏差的单位，扩大化也好，一风吹也好，这些单位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十三号文件精神，现在进展也很快。

整个运动形势看来是好的，发展的也很快，实际上通过清查“五·一六”群众运动，对广大群众进行了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增强了团结，清除了派性，清出了“五·一六”的罪行和他的反革命

组织。凡是这样做的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越来越好，生产任务都是超额完成，群众的精神面貌都很好。有些单位体会到，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中，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能光靠你说，要看你这个单位的政治情绪，要通过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表现出来。二七厂、化工三厂等其它一些单位，由于清查“五·一六”群众运动搞的比较好，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政治形势，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都很好，这就是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果你这一单位在清查中搞得人人自危，再怎么说也不是很好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不是认真贯彻执行九条方针，要从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方面表现出来。

现在来看，北京市和中央国家及时清查“五·一六”的群众运动搞得是好的，这些单位有几条经验、体会：

1. 是先搞组织，还是先搞罪行；是从搞罪行入手，还是追填没填表？这是保证运动能不能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凡是一开始就追组织，追填了表没有，面铺得大，运动就受挫折；凡是注意抓罪行，又按照十三号文件，注意了几个区分，这样搞，运动就健康，发展就快，就能既轰轰烈烈，又扎实。

2. 是认真调查研究，还是轻信口供？凡是认真搞调查研究，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运动搞得就好，搞的就准。清查“五·一六”关键要搞准，要重证据。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不注意搞调查研究，不重证据，不在“准”字上狠下功夫，轻信口供，在运动中就要上当，走弯路。也有的个别单位走过弯路，搞了一大堆口供，一大堆材料，有的搞了一大堆名单，哪是真的，哪是假的，不晓得。这样案子就难搞。特别是一些坏家伙混不摸鱼，开始不交代，你硬逼他，他交代一大堆。你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把你搞得糊里糊涂。

有的是轻信口供，谁交代的越多越好，问题越大越好，他如果不交代或交代的问题小，你就说：“你干什么不好好交代！”就说他态度不好。说是不逼、供、信，实际上还是逼、供、信。态度好坏要区别他是真交代还是假交代，如果谁交代的问题越多越好，越大越好，

不分真假，那还不把问题搞乱？

面前的不要过大。对有把握的，人证、物证，旁证确凿的可以动，没有这些，就不要动。

敌人是很狡猾的，有时他故意挑动，说你敢不敢公布材料，还有的说你跟“五·一六”斗争不坚决，没有勇气，说你右倾。我们有些同志被敌人愚弄，结果公布了名单，就李××、张××、王××都是“五·一六”分子，但是谁真谁假分不清，搞得人人自危，这是很不对的，这样非搞乱不可，这是上了敌人的当，敌人愚弄了我们。没有分析，只凭口供就动，这是不对的。要搞罪行，通过排案件，把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这三部份人清出来。这些人为数很少，能量很大。

有些坏家伙就是采取以假乱真的办法，交代一大堆都是假的，把真的掩盖起来，不要上这个当。要认真调查研究，要认真分析。有些东西有记录或物证我们可以分清，物证有些能找到，有些也可能找不到，只要认真分析也可以分清楚是真是假。我们一开始经验不多，也上过当，那是在一九六七年六八年，在审犯人的时候，有的坏家伙乱供，乱交代，我们光是听。后来向谢副总理汇报时，谢副总理指出：“你们瞎听，他就瞎说！”可不是嘛，他瞎说，你坐着听，不表态，不批他，他就一个劲儿瞎说。有的交代说，有几百人在一个礼堂里参加“五·一六”宣誓大会，墙上挂着蒋贼的象。显然是瞎说。你听了不批，他还瞎说，越说越假。

要按照“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特点来分析，因为它是搞阴谋、说黑话的，但只要通过查时间、地点，也可以查出来。首先查在那个时间，这些人干什么去了，在这个地点有没有这些人，在这些时间里有没有这回事。我们查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问题，周景芳交代，六月二十七日戚本禹把他叫到钓鱼台，给他布置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我们就查有没有这件事，经过查证有这件事，因为钓鱼台进门登记簿上证明他是那个时间去的，而且是戚本禹叫他去的。第二查了那时的报纸，从他回去后第二天，北京日报就改变了调子，得到了证明，证实有这回事。所以，有些没有人证、物证的口供，要很好地分析。有一种说法，说判断口供可靠不可靠，要有三个人的口供不能对到一块，只要对到一块就是真的。对不到一块，就不是真的。这种说法要分析，要看你的材料公布没有，如果材料没有公布，又没有搞逼、供、诱供、指供，对到一块了，就可能是真的，如果材料公布了，搞了逼供、诱供、指供，那十几个人的口供也能对到一块儿。

还是要靠调查研究，好好分析。至于公布名单的做法是错误的。“五·一六”分子的名单不要公布。现在就是要搞他的罪行。把骨干搞出来，只要人证、物证、旁证俱在，哪怕只有一条、两条重大罪行，就可以做结论。搞了一大堆，一个也没有查清，也做不了结论。一点一点地搞，搞清一件是一件。要先搞已遂的。未遂的要不要搞？也要搞，可以放到第二位。先把已遂的搞清楚。关键是要搞准，特别要执行政策，落实政策。

区别对待的政策要落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搞不好的话，也可能打击面过宽。这次清查“五·一六”要重点打击那些最坏最顽固的骨干分子，主要是打击这些人。对一般成员，要多做教育工作，争取失足者，多做这方面的工作。

对于受蒙蔽的群众，大部分是好同志，他们就是不明真相，上了当。对他们更是靠正面教育。主要是打击最坏最顽固的那一小撮，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以极“左”反极“左”，加果有的话，那不是真正的左，表现上是左，实际上是右，形“左”实右。要很好地落实毛主席的政策，不要怕人家说你右，真正落实毛主席的政策怎么是右？要实事求是，不能形而上学，该肯定的就肯定，该否定的就否定。本来不存在这个问题，你给定上这个问题，不是搞错了吗？

现在有个实际问题，就是对“五·一六”分子怎么处理的问题，尤其是搞得比较好的单位，他要处理，如何处理，还是要按照中央的政策。有些单位他们是这样做的，向同志介绍一下情况。

对骨干分子态度坏的，要从严处理，态度好的也可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般的胁从，跟着干坏事的，按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表现坏的，罪行严重的也可以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对于受蒙蔽的不能按“五·一六”处理，只要认真交代就算了，一般也不影响他原来的工作，也不影响他的党籍问题。这样做怎么样？请同志们考虑。

3. 领导问题。这是关键的问题，一个单位的运动搞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在领导的责任心。有一些单位运动搞得很好，就是领导负责，亲自动手，领导总结经验、抓典型。也有的单位运动搞得被动，出现了不少问题，归根到底还是领导问题。甚至有的单位运动也了问题，领导还不知道。当然运动比较复杂，不同于清队、不同于搞历史问题，这里真真假假、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但是只要领

导认真抓就可以搞好。外交部的运动现在搞得很好，基本上查清了。关键在领导，他那儿的情况复杂得很，姚登山直接和王、关、戚挂钩的，火烧英国代办处那个事件也是比较大的。据我们了解，燃化部专案会议开得不错，认真做了总结，交流了经验，交流了做法，促进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4. 搞好路线教育。通过这次清查“五·一六”，使广大群众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认清了那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是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路线教育是根本，要敢于拿出时间，对广大群众进行路线教育。凡是这样做的，运动搞的就出色。即便是有的单位极有“五·一六”，搞一次路线斗争教育，提高群众路线斗争觉悟，认清“五·一六”的罪行，也是很必要的。搞路线斗争教育很有必要，如果不搞路线斗争教育，就成了就事论事，就成了为抓“五·一六”而抓“五·一六”。

当前整个运动是健康的，是很好的。就是有个别的单位掌握的不好，有扩大的趋势。要考虑一下，出现了的要纠正。当然也有个别单位，明明他有“五·一六”，他不搞，他按照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搞“五·一六”，那也搞不好，有“五·一六”就要搞。也有的不发动群众，靠领导同志谈话感化他，不发动群众去批斗，光靠领导谈几次话感化这是不行的。敌人，你不打他就不倒，首先要斗，七斗八斗，要发动群众。也有的给群众划框框，不抓重点对象，这不要提，那不要提，甚至不叫提中央对清查“五·一六”的指示，你清查“五·一六”不提“五·一六”怎么搞？这种做法是不好的，结果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当然绝大部分运动搞得很好，很有生气，很有成绩，这对“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广大群众是一个很大的教育，有力地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轻工业部专案办公室)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一日，陈伟在燃料化学工业部专案座谈会上的讲话

〔陈伟：中央专案联合小组成员；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今天将我们了解到的有关清查“五·一六”运动的一些情况和个人一点认识向同志们做个介绍。由于了解情况不全面，再加上个人水平很低，可能有错误，不对的地方请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今天向同志们主要讲三个问题，一是一些单位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是如何贯彻中央十三号文件的；二是在清查“五·一六”过程中对“五·一六”的阴谋怎么认识；三是当前了解到的北京地区的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情况。提出这三个问题和同志们共同商量、讨论。

(一) 一些单位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是如何贯彻中央十三号文件的。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清查“五·一六”运动非常关心。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地对清查

“五·一六”做了非常重要的指示。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毛主席在读姚文元同志《评陶铸两本节》的文章时，就加上：“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文元同志在这本书上是这样写的：“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当毛主席读到这里的时候指出：“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份就给“五·一六”定了性。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主要指它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毛主席指示非常深刻，非常清楚。有些单位就按毛主席这个指示搞的。主要指组织者，操纵者是这样一个阴谋集团，而不是说受蒙蔽的人也是阴谋集团。林副主席在九大报告中也指出：“潜伏在群众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他们不到一定的气候是不暴露的。一九六七年夏季和一九六八年春季，他们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又刮起了一股反动的翻案邪风。他们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这一小撮坏人，终于同他们的头子刘少奇一样被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的胜利。”这段就把“五·一六”的上层是由什么人组成的讲清了。指出了“五·一六”组织者，操纵者是什么人，就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就是这么些人，是“五·一六”的核心。它的组织者，操纵者就是这些人。同时林副主席在报告

中把“五·一六”的罪行也指出来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进行反革命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敬爱的总理、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也都对清查“五·一六”做过多次重要指示，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运动的发展，针对清查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指出既不要搞扩大化，也不要一风吹，一定要把“五·一六”搞清楚。总理、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都及时做了非常重要的指示。尤其是总理，从去年十一月分以来，做了许多非常具体、明确的指示，所有这些指示的精神在中央十三号文件中间都反映出来了。中央十三号文件是总理亲自起草的，毛主席批示照办的。执行好中央十三号文件关键是领导问题，领导的关键又是认识问题。有的单位在贯彻十三号文件中，有一个概括的说法，概括为“四抓”：

抓罪行，抓骨干（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这些人是打击的重点，这些人也要区别对待，打击最坏的。抓罪行是本质，为什么要清查他，就是因为他犯了罪，不犯罪清查他什么？问题在这儿摆着，是不是反革命分子，主要看犯没犯罪。有罪行就清查。抓罪行怎么抓，就是中央十三号文件中讲的抓重大案件。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生的大案一个个排出来，一个个进行清查。清查案件的目的，从清查案件过程中清出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这是这次运动打击的重点。

有些单位在贯彻中央十三号文件中间提出抓要害，要害就是阴谋策划部分，不抓这个就抓不出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就可能抓了一般。

再一个就是抓重点，重点包括重点事件，在清查重点事件中要抓住重点人（即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当然还有重点单位。

所以有些单位在清查过程中总结为“四抓”。抓罪行是问题的本质，通过清罪行清出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第三是抓出阴谋部分，这是要害，第四抓重点。这样对不对？同志们可以商量，不能一开始就笼统的抓组织，是否填了表格，这样就容易上敌人的当。

根据现在清查的情况来看，要清查的重点是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这些人中有的他恰恰没有填表参加“五·一六”，如有名的姚登山、孙正都是“五·一六”的主谋和幕后操纵者，这些人都没有履行填表手续。还有特务吴传启、叛徒潘梓年等他们都没有履行参加“五·一六”的手续。如果去抓填表，就

恰恰上了敌人的当。从有些单位来看，有些人交代参加了组织，填了资，其中有一部分人没有罪行。如新华印刷厂、二七车辆厂，有些老工人、党团员、二七烈士后代，他们听说有个保卫中央文革的左派组织，非要参加不可。人家说他保守，不让参加，他追到厕所里还要求参加，给了他表格，有的自己不识字，别人代他填表，这些人就是受蒙蔽的。所以，中央十三号文件指出不要一开始就追填表，追组织。

搞组织，有的一个人就供出三百人的名单，甚至把车间花名册都交出来了。这个问题向吴德同志汇报时，吴德同志说这个不可信，他能一下记住三百人，记性这么好，不可信。敌人搞诡密手法，和诡密活动，退却时烧毁了罪证。开始搞组织就会把主要的漏掉，这是敌人在搞真真假假，搞出一堆名单，搞乱了套，容易搞得真假难辩。

当然组织不是不搞，把罪行搞清以后再搞。搞罪行搞到一定程度，组织问题就不是那么难搞了。组织不是不搞，是放后一步搞。二七厂搞罪行，组织问题也搞清了，主要是把罪行查清。有的同志有个“组织定性论”的思想，认为“清出罪行不过是极左，清出组织才能分敌我”。我们不能因为他参加了组织，就把错误说成是罪行，也不能因为他没有参加组织就把罪行说成是错误。是罪行就是罪行，是错误就是错误，要实事求是。

有的单位提出组织问题他老不承认怎么办，定“五·一六”就是按罪行定，主要是靠罪行来定。按组织定“五·一六”，有些没有履行手续，怎么定法？他就不是“五·一六”？容易把坏人放掉，按罪行定比较科学。

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五·一六”罪行？区分“五·一六”罪行根据有两条：一，是不是有上线，上线指的是“小小老百姓”、萧华、杨、余、傅、王、关、戚和他的同伙，是不是在这一伙直接或间接操纵下搞阴谋破坏活动的，阴谋是要害。二，是阴谋破坏活动是否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用这些来区分是不是“五·一六”。有些罪行也是三指向，可是没有上线，那么是什么反革命就是什么反革命，如去年中央二十号文件讲的那样。不要认为现在只有“五·一六”，就没有什么其他反革命了。不能把什么坏事都说是“五·一六”干的。比如有的说，什么“五·一六”杀人犯，“五·一六”强奸犯等等。不能

扩大“五·一六”的作用，要区分是否“五·一六”罪行，关键是挂线。没有“三指向”的，也可能搞阴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也搞了些背后活动，不是“三指向”，是搞了派性，犯了错误，这就不能算罪行。要这样来看问题和认识问题。

搞罪行也要防止扩大化，注意严加区分。“三指向”，第一指向好区分。反对毛主席，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管是谁都是反革命。比较难办的是反军乱军，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具体对待。有些人对军管会、军宣队提了些过头意见，说了些错话，做了些错事，这个要与反军乱军严格区别开来，不能混到一起。有些人对革命委员会领导说过错话，做了错事要和颠覆革命委员会区别开来，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区分。

“五·一六”反军不是反那一个人，而是想把军队搞乱，乱军是目的。反革委会目的是为了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关键在这里。

要把上线划清，要把正常的工作关系与阴谋勾结区别开来，要把犯错误的造反派和“五·一六”犯罪区别开来，要根据自己单位的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第二点，在贯彻中央十三号文件中，必须搞好几个区分。

1、正确地区分是非。我们与“五·一六”这场斗争，是很尖锐、很复杂的阶级斗争，因为“五·一六”是搞阴谋的，所以这场斗争不同于一般的阶级斗争，也不同于一般的清队。复杂的原因就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交叉在一起，一时难以区分，不通过认真的分析研究不好区分。另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一时不易排除，若不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就不大容易排除。我们这次清查的目的是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特别要搞清是非，把非搞成是，就会一风吹，把正确的说成是罪行，就是政治上的错误。在区分是非的过程中，每个单位都有其不同情况，要对照当时毛主席是怎么指示的，他们是怎么做的，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起了什么作用。同一件事，在这个单位做的是对的，在另一个单位就可能做错了。如上海一月风暴以后，各单位向本单位一小撮走资派夺权，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可是，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明确了，有些权不能夺，这个权是中央的，只能监督，不能夺。他们非夺不可，这就是反

革命夺权。无产阶级司令部讲了，你不照办就是错的。重大事件一定要把是非闹清楚。这是一个区分。

2、区分极“左”思潮和“五·一六”罪行。

3、区分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从犯、胁从和受蒙蔽。这要很好区别，区分这个问题，要看罪行大小，有无罪行和阴谋。在清查重大案件时，这个问题很重要，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是打击重点，他们是具体策划搞阴谋的。这些人一般是过去就坏，现在也坏，也有新生的反革命分子，过去不是他们不坏，而是没暴露，这次彻底暴露了。他们数量很少，但能量大。第二种是从犯、胁从，跟着干坏事的，这些人了解部分阴谋，但不完全了解，对这些人主要是教育争取。第三种完全是受蒙蔽，根本不了解阴谋，受他们打着红旗的影响。如围困中南海，真正了解阴谋的是少数，目的是给中央施加压力，他提出“谁不让揪，就揪谁”。谁敢不揪？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要背靠背地批，周总理传达了主席的指示。这说明他们不是搞对少奇，而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把中南海围的水泄不通，中央所在地，一天二十四小时广播，中央没法办公，没法休息。中南海都能围困，全国还有哪个地方不能围困？真正了解这个阴谋的很少，这次就主要清查这些人。跟着干坏事的不完全知道阴谋，是从犯、胁从。第三种是受打着红旗反红旗蒙蔽的，认为“揪刘是大方向”，不去是怕当“老保”，这些同志是受蒙蔽的。区别这三种情况就是看有没有罪行，知不知道阴谋。

有些单位对这三种人如何处理，只是有个设想，还没有处理。这些设想中央还没有最后批准，中央联合专案小组，准备向中央上报，如何处理，按中央指示去办。

有的单位有些设想，也跟大家谈谈。

1、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是敌我矛盾，态度不好的，罪行大的要严加惩处。其中态度好的，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处理，也可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2、从犯、胁从，跟着干了一些坏事的人的处理，一般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争取过来。个别现不好的，问题严重的也可按敌我矛盾处理。

3、对受蒙蔽的人，把问题说清楚就算了，不影响工作、党籍、团籍，不给处分，但必须把问题说清楚，不能把这些同志说成“五·一六”。材料要不要入

档案，有的说要入档案，有的说不要入了，登记一下就行了。这些问题还都在议论阶段。

（二）如何认识“五·一六”是阴谋集团。

这个问题认识不清，容易上敌人的当。究竟“五·一六”是如何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即使有些口供找不到物证，也要研究如何分析辨别真假。

比较典型的有两个材料：一个是蒯大富搞的三十六条权经，一个是徐凯搞的十八条，如蒯大富搞的三十六条中

第二条是这样讲的：必须改造世界观，我们有两种可能：一是被别人搞掉；二是自己垮掉，这太可惜，大痛心。

第四条：学会在权力机构中设置反对派，保护反对派，因为垄断为垮台创造条件。

第五条：最高当权派必须学会保护干部和群众，尤其是犯过错误的，不随便踢，要拼命多保，对战友有功的更要保，有代表性的人物要重点保。多保一个问题不大，少保一个不得了。

第九条：在人民内部切不可树敌太多，以防别人联合起来将你打倒。

第十五条：胸怀远大目标，坚定不移向前走，在命运的道路上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

第十七条：“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必须长时间的积蓄力量，不要由于不慎，而被人搞垮。

第二十四条：准备走曲折的道路，善于用间接的手段，达到直接的目的，迂回是建立在明确的目标上。

第二十七条：与其自己花很长时间去学一样本领，还不如去交一个精通这种本领的朋友。

第三十一条：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必须选择适当时间给以毁灭性打击，能现在消灭的就不要等将来，在政治上只有头脑而没有良心，菩萨心肠在阶级斗争中站不住脚。

第三十四条：一个单位的当权者，必须使本单位大多数群众放心，多层次，多团体的利益都必须在权力机构显得到反映，按其功过大小，在权力机构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和荣誉，多得其所。

第三十六条：得到政权后就得运用，而且不容稍稍犹豫，正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从这三十六条中可以看出蒯大富等人的反革命野心。

再看看徐凯的十八条。比如：

一、北京地区铁路七万多人和我们观点一致的只有两万人左右，对立的三万多，还有中立的。只要一致对准他们，说他们是“保皇派”、“大方向错了”，“是官办的”、“铁杆保皇派”、“武斗急先锋”、“打人凶手”等罪名。要千方百计从舆论上把他们搞臭，从政治上抬不起头来，分化瓦解他们。

二、要经常给他们制造磨擦。如果他们开批判会就说他们是“假批判，真保皇”，我们来突然把当权派抢走，要是他们不放，就说他们是保皇。闹出事来武斗，就说他们是当权派操纵的，可以无伤制伤，绝不能承认我们打伤了他们。在武斗时，要尽可能抢一些袖章等东西作证据，事后准备一些凶器，作为对方行凶的罪证。这些都要由有经验可靠的人去干，必须保密。如果被人抓住，也不能承认错误，要抓紧时间大量宣传。

五、我们尖兵排力量强，目前二百多人，但还很不够，必须发展，化整为零，要吸取“财尖”飞虎队的经验，用麻雀战术，使对方感到更大的压力，闹出问题来与“工铁筹”无关。如果遇到他们发言，一定要和他们辩论，再加围攻。对不同的大字报、大标语就去撕掉。

六、对立面只要一露头，就想尽一切办法压下去，特别是他们没有基础以前，群众不明真相，就对他们不满，失去领导权，迫使他们下台。

七、对上级所发的各种文件，要灵活运用，千万不要受文件的限制，对立面怕违反就受到文件的约束，就不敢斗争。我们就落得个“敢”字当头。这样他们自己就成了保字号组织，干错了也不要紧，可以说干革命我们不懂，要不然把责任推到当权派身上。可以说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难免不犯错误，但是我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以此来统一内部思想。对外坚决不承认具体错误、缺点，不要被别人抓住小辫子不放，谁要追究一个问题时，我们就必须把矛头对准他。

九、对我们自己和朋友的单位要大量宣传，多造舆论。对立面的单位一律做为造谣。大多数不明真象，因此真假也分不出来，如果他们要辩论，在辩论时就说他们完全造谣，污蔑，再加上一条罪名，说他们是挑动武斗的罪魁祸首。

十、我们要做到顺我者存，反我者亡。如有反对我们的。只要他一露头，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打下去，要他们抬不起头来，使其附近的小学生都骂他们是保皇派。

十一、我们公社所属的分社，每干一件事就必须让党的负责人肯定是革命行动，要他们签字以后他们就不好改口，也有我们的余地。如不肯签字搞他个晕头转向，糊里糊涂，逼他签字，错了与我无关，由当权派负责。

十三、不论大小干部，只要他们承认我们是坚强的革命左派，站到我们这边来，不管有多大的错误，我们也要保起来，不让对立面斗他，这样大部分干部都要向着我们说话的。否则我们就要施加各种压力。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对付他，软硬夹攻，无限上纲，就是一点问题没有的干部，也说他们是顽固坚持走刘邓路线的三反分子，如对立面搞三结合时，一定不能轻易放过，放过对我们不利。

十四、我们要利用三结合的名义，把支持我们的干部，不管他有多大问题，也不要怕，要大胆结合起来。如果对立面揪斗，我们就说：“打击革命干部”，是刘邓反动路线，我们就把干部藏起来，就说：“要揪斗当权派必须经过我们批准”，否则以后发生一切后果和武斗都由对方负责，……。

十七、……要多向解放军和军代表汇报，把军代表缠住不放，不要叫他下基层。他们和群众见不到面。让军代表对我们有好感，各组织对本单位大量宣传，就说军代表根本不支持他们，这使对方与军代表对立起来，我们就可以大造舆论，说他们把矛头对准解放军，罪责难逃。

徐凯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两个东西是“五·一六”的反动纲领。“五·一大”的特点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他所以能蒙蔽欺骗群众就是因为有打着红旗的一面。他们活动的手法是很诡秘的。

1、煽动极左思潮，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如他要抢机密档案，但是他不说抢，而是说“对机密要监督，要掌握在造反派手中”，“对造反派无密可保”。如制造打砸抢，就说“不搞打砸抢就不是造反派”，最多是个温和的保守派，这些都是戚本禹讲的。

2、造谣言，欺骗蒙蔽群众大造反革命舆论，说什么当前矛盾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中央常委三比四、四比三”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甚至还采取政治陷害的手法。如制造 00 七号密令事件，说什么湖南军队要在一九六七年元旦搞政变，说是下的命令他们已看见了，字迹象是总理的，跑到北京来找“小小老百姓”，“小小老百姓”就派刘志坚接见他们，他们讲了许多攻击总理的话，刘志坚单独向“小小老百姓”汇报，“小小老百姓”一面说不会吧！一面又说你们关心国家大事，很好。这就是两面派的手法。他们在一起就说黑话，但对下就打着红旗反红旗。如围困中南海事件中，谢副总理传达中央指示要他们彻，“小小老百姓”带着蒯大富、韩爱晶在八月九日晚上到揪刘火线的帐篷说：“你们该回去了。”然后又说：“你们辛苦了，吃的怎么样，睡的怎么样，哦！你们还揪谭震林哪！我都不知道！”这些反革命心领神会，马上改了旗号就揪谭，揪陶、揪王光美、谷牧。他完全搞的是两面派。就在这一天“小小老百姓”还用自己的小汽车送蒯大富，韩爱晶回校，就在回去的路上，蒯大富问军队这么乱，怎么搞？我们这么搞，将来能不能站住脚。他一路哈哈大笑一句话也没有讲，下车时说：“无限光明，无限希望，无限前途；行百里者半九十，你们才走了半里路。”鼓励他们接着干。这都是黑话。

一九六七年“八一”建军节“揪军内一小撮”最厉害时，陈毅同志在宴会上向小将们敬酒时，戚本禹说：“今天喝酒不要忘记斗争啊！”进行煽动。

3、以反死人为名，大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舆论。所谓“讨孔”就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他们到了山东孔庙后要砸碑，首先砸国务院立的保护文物的碑，在碑前开了几万人的大会，向国务院抗议，给国务院写了抗议信，攻击国务院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还跑到几百里外把周公庙也砸了。

4、公开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尤其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这样就很快暴露了。他采取另外的办法，就把毛主席的指示说成是刘少奇的拿来批判，以此来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5、以搞专案为名搞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如搞什么李立三专案、陈国栋专案、孙大光专案，实际上他并不搞这些人的专案，而是打着搞专案的幌子，搜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

6、公开的为地富反坏右翻案，煽动坏人起来造反，他们有个理论叫做：过去受压的人现在最革命，造反精神最强，把一贯反毛主席的陈里宁打扮成为新时代的狂人，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文化大革命。外交部还有个“反迫害大队”，清华（大学）还有一个“红教工”，都是牛鬼蛇神和他们的子弟，其实是黑教工。清华现在已将其定为反动组织。造反派司令部的反最突出的就是徐凯，受戚本禹的指示到劳改农场煽动劳改犯起来造反。说什么“同志们，你们现在不利用这个机会起来造反，将来再无翻身之日。”一下子就把坏人煽动起来了，结果把军管会主任打得几个月起不来。

7、从国民党、帝、修、反的反动书刊、杂志中收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如“北（京）图（书馆）事件”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8、他们采取“清君侧”的策略，就是要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首先是反毛主席周围的人架空主席。他们集中力量反对总理，就是为架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这是很恶毒的。

9、他们专门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每当无产阶级司令部提出一个部署，他们就干扰破坏。如反军问题，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央指示他们起草一个文件，不得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他们一方面起草文件，同时起草一个宣传提纲，要“揪军内走资派”。毛主席提出要“三支两军”他们接着攻击解放军“支保不支左，支左方向支错了”；毛主席提出要“拥军爱民”，他们马上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是最大的拥军”，专门干扰主席的战略部署。

10、在每一个重大反革命事件中，真正出头露面的都不是有名的人物，最坏的人在幕后操纵。如火烧英代办处，出头露面的人都不出名。围困中南海，表面上连“五大领袖”都没有去。“揪军内一小撮”，派到各地去的人也都不出名。最坏的是幕后操纵者。这次清查一定要把幕后的查出来，清查表面人物不是目的，而是通过这些人把幕后的搞出来。在清罪行问题上不能轻信口供，要加以分析，打着红旗反红旗，阴一句、阳一句的特点，很好的分析。如轻信口供，有的对象交代问题真真假假。什么叫态度好，态度坏，有的认为谁交代的多，问题大，就是态度好。这个不对，我们过去也上过当，一个家伙把问题讲的很大，一天比一天讲的大，我们向谢副总理汇报说他净瞎说，谢副总理说你们瞎听，他就瞎说。要研究，不能说他交代的多态度就好，而是看他交代问题是否真实来看态度好坏。

否则就是变相逼供信。我们都是与敌人做斗争的，“五·一六”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我们要很好的研究这个敌人，要把它制服，研究这个敌人用的是什么阴谋，搞的是什么手法。

（三）当前北京清查“五·一六”的情况

当前北京市清查大体有四种情况：一种是认真贯彻毛主席的九条方针和中央十三号文件。主要是领导负责，亲自动手，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不搞逼供信，充分发动群众，专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凡是这样搞的运动发展的就健康，就快。搞得快的单位罪行查清了，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都搞清了，有的组织问题也基本查清了。有的单位过去走了一段弯路，一度出现过扩大化和一风吹，但认真按中央十三号文件和九条方针办事，领导重视，亲自挂帅就抓上去了。外交部相当复杂，敌情多，姚登山与王力直接挂钩，“五·一六”活动猖狂。由于认真贯彻中央十三号文件，罪行就基本查清了。只要认真接九条方针、中央十三号文件去抓并不难。还有化工三厂从去年十二月开始到今年七月份罪行、组织基本搞清了，运动基本正常，既没有扩大化，也没有一风吹。只要按中央的精神办搞清不是十分困难的，当然也不是很容易的。

再有一些单位问题比较复杂，可是由于基本上按中央十三号文件搞了，多数进行了深挖幕后、深挖阴谋阶段，没走什么弯路。运动开始发动群众揭发的面大一些不等于扩大化，关键在领导掌握动的面大不大，动就是让他交代，关键是动的准不准。在准字上下功夫，表面上看来慢，实际快。有些大专院校很复杂，全国都插了手，有些搞的很稳，没走弯路，稳准狠就不容易出现扩大化，一风吹。

另外少数单位出现偏差。由于三个原因：

1、追组织，搞出了一堆名单，真假难辨，上了敌人的当。有的甚至公布了名单就要被动。有个说法说有三个人交代一致的就可以定，这也不一定，要具体分析，要看在什么情况下交代一致的。如果你把未经查实的材料公布出去，十个、八个交代一致的都有可能，那就是串供，搞逼、供、信了。不能只从数字上看，当然不是在逼、供的情况下搞的，几个人交代了就不可不信。

有的单位开始搞罪行，搞着搞着就搞组织了。有的人认为不搞组织漏掉怎么办？不从罪行上搞，就可能漏掉最大的，搞乱了套真假难辨，就更可能把敌人漏掉。单纯搞组织就容易搞得人心惶惶，不利于打击最顽固的，不利于分化瓦解。

在没讲围困中南海是反革命事件前，这个讲我去了，那个讲我去了，一提是反革命事件就怕部沾边了。主要是没讲清政策，要打击最顽固的那三种人，不要搞得知情人紧张，怕沾边。要让他们放下包袱讲真话，要按党的政策区别对待。

2、搞罪行，几个区分搞得不好，区分得不对或搞出的罪行没有认真调查研究，搞出一堆口供，真假难辨。结果就想等，等上边有什么好的办法，别的单位有好的经验。这主要是调查研究做的不够。要在认识“五·一六”反革命特点上很好的下功夫。口供是假的就应该排除，有的同志有顾虑怕人家说右倾，结果就宁“左”勿右。以极“左”反极“左”，就容易搞乱。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该肯定都肯定，该否定就否定，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要受派性的干扰。只要认真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落实党的政策，就可以解决。

3、政策上区分不清。罪行和错误，没有很好区分，群众组织中混进了坏人如群众组织没有区分。广大群众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大方向是对的。把坏人抓出来不能否定群众组织的大方向，否定了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在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中有很大功劳，不能因为清查“五·一六”否定了造反派的成绩。

所以要把几个区别对待搞好。现在有的出现面搞得大了，有扩大化的苗头，主要是三个原因：一是搞了组织；二是搞罪行没搞调查研究，轻信了口供；三是搞不好几个区分。再加上敌人搞真真假假，有意破坏，派性干扰也是一方面的原因。

当前要集中力量在准字上狠下功夫，要千方百计的搞物证、旁证。这些东西只要认真分析，是可以搞清的。

如周景芳交代他参与了火烧英代办处反革命事件，周景芳六月二十七日去钓鱼台，关、戚接待他说：“现在外交方面问题严重，外交部是卖国部，北京市以后要过问外交活动。”周说人民日报怎么登我北京日报就怎么登。戚说“不对，北京日报应走在人民日报前头”。当时也没有记录，也没有物证。结果一查钓鱼台的来客登记果然六月二十七日周景芳去了。又查北京日报，六月二十七日前与人民日报的调子一样，六月三十日以后调子高了，如提出打倒奈温等……。这就给他定下来了。

再一个是抓重点的问题，即使反革命分子犯了好多罪行，只要抓一两个关键性的定性的问题落实下来就行了。就是重大案件也是这样，如火烧英国代办处，查问题要抓几个关键，就抓姚登山怎么参与的，周景芳怎么参与的，有没有人证、物证、旁证，参与有好多线索，只要查清其中一两件和上线挂上就行了。

最近召开夺财权的协作会，夺权查清了，抗交权没查清，主要是查上线，王、关、戚是怎么插手了，先抓住能定性的几件事，主犯、从犯、胁从、受蒙蔽的就可查清，只要认真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就不难查清。有的说他参加“五·一六”，一九六七年一月在学部有六、七百人在蒋介石像下宣誓参加的，这个口供就不可信，这样他就不是“五·一六”了，而是国民党。还有人交代，他在有多少多少人面前布置整毛主席的材料，这个不可信。他要公开说一句有损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像的话，就会有群众揭发，也不会隐藏到今天。这个口供不符合“五·一六”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如他把主席的指示当刘少奇的批判这到可能。

有张大字报（“何许人也！”）攻击先念同志，把毛主席、林副主席、总理的指示都说成是刘少奇的。有些口供要好好分析，不轻易否定，否定要有根据，不要对那些玄乎的口供感兴趣。

对那些搞两面派的要查清，在谁都知道的事件中少数坏家伙搞阴谋，调过查明火执仗的把幕后阴谋策划的搞清楚。查的时候把已遂放在第一步，第二步查未遂。

现在有的单位还没有搞开，为什么搞不开，就是右倾。当前左的也有，形左实右搞扩大化；右的也有；明明有他不搞，这两种情况实际上都是右倾，都不利于把“五·一六”查清。

北京有些单位形势好，大事件查的快，十五件反革命案件查的进度很快，关键是认真落实九条方针如中央十三号文件，关键是领导，领导又在于认识。

今天就讲这些，和同志们讨论，错误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吴德关于“批清”运动部分的讲话

“批清”运动我们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了，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运动中某些单位也有些问题，但总的来说运动是健康的，这么大的运动，有一百多万人参加，经过群众议，摆、查，揭发出有“五·一六”嫌疑有五万七八千人，触动

的有一万四五千人，办各种学习班的包括留宿的，走读的三四千人，根据大家报的重点人七百多人。现在查清了一批重大案件，这是根据中央指示，大家跟“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做了坚决斗争的结果。“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很凶恶的阶级敌人，不清出来有很大的危险性，“批清”运动的过程，也就是不断排除右的“左”的干扰的过程与破坏“批清”运动的干扰进行斗争。

我们碰到的破坏很多，首先是阶级敌人的破坏，或顽抗或是乱供，或是企图重新挑起资产阶级派性，总之，想使运动难以进行下去，这方面大家经验很多，总之，他要把你引到错误方面去。再者，由于我们思想发生了一些偏差，有些单位也发生了右的，不发动群众，同“五·一六”斗争不坚决，以后也发生过某些单位的扩大化现象，也同时存在一些单位有一风吹的现象。使我们的“批清”运动继续健康的深入发展。总的讲成绩是很大的，但是现在又发现一些单位是不是面宽了一点，因此，我曾经讲过一次，战线太长，要集中力量找重点的问题，我可能讲的不清楚，就是要抓住重点，甩开那些受蒙蔽的，把那些没有罪行的先放一放，不是“五·一六”不要抓，是要把重点案件抓一抓。我们的条件很好，现在全国都在抓“五·一六”，搞协同作战，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不断得到中央的帮助。全国抓“五·一六”的形势很好，北京地区又是重点。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把“小小老百姓”揪出来斗，运动就发展更深入了。这个人又是叛徒，又是特务，又是托派，又是反共分子，又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五·一六”黑后台就是他，他干扰抓“五·一六”，过去弄不清楚，现在清楚了。他是“五·一六”怎么能不干扰抓“五·一六”呢？过去他说：抓到表就算抓到了“五·一六”。我看不见得，他搞这个表有两种因素，一是叫你抓不到，因为有些大的“五·一六”不一定填表，许多东西又毁了，二是引你只追组织，搞大名单，这样就搞乱了，而且他们是有计划退却，你找不到表，弄得真假难辨，搞扩大化，最后一风吹。他用这个办法来干扰破坏“批清”运动，保护“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这个大干扰去掉了。因为那时他是清查“五·一六”的专案组长，现在把他排除了，以后总理讲不能光看表，要看罪行，这才发动了群众，群众起来了，揭发了大量的材料和线索。

我们经过一年多的“批清”运动，取得了一些经验，各单位都有自己的经验，有的报来了。一机床厂经过几次反复才弄清楚，经过群众大量揭发，分类排队，到抓重点，现在进展快的已经核实定案了。有好的经验，也有坏的教训。如有搞逼供信的，违犯政策的，也有打死人的，“五·一六”也不应该打死嘛！有的说白天不出活，晚上出活，夜间熬夜搞体罚，搞逼供信，指供、诱供，第六建筑公司四营共有职工 1052 人，在一段时间里 20 几天，搞出“五·一六”嫌疑 283 人，占职工总数 27%，占在职干部 43%，占党员 28%，占老工人 26%，不少人都“揪斗”了。好一点的“督促”，搞过揪斗、“督促”的占 60%。据说在那里开了一个发展“五·一六”的会，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七八种说法，这样搞，面就大一些了。还有的搞了一个什么“落实政策宣传队”，“督促接待站”，搞得很多人惶惶不安，特别是有极“左”思潮的人。有问题的人说：“你要鼻子我给你画鼻子，你要耳朵，我给你画个耳朵，”“你不是要顺藤摸瓜吗？我就顺杆抓。”这样搞就乱了，所以我们不慎重，就要受骗上当。有的单位提出“围点打援”，扫清外围，恐怕这个方法不行，放松重点人去搞一般人，这就是容易出问题的。还有一些搞逼供信的，造成自杀现象，有好经验，也有坏的教训，不详细说了。

面宽的有的到了 30%、40%、60%，有个单位把一派群众组织都说成是“五·一六”，这不对嘛！审查重点人，重点人说不清楚了，就把职工名单交给他看，他就在上边画圈，一画一二百，这是不行的。“五·一六”是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不是什么普遍的群众组织。

北京的重大案件，有中央各部门与北京市协同作战。经过发动群众，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形成专案，一件一件的查。这样既纠正了一风吹，也打破了神秘化。专案与群众相结合，统一了思想，确实抓出了一些“五·一六”分子，受蒙蔽的纷纷起来，反戈一击，使一小撮顽固分子陷于孤立，有些重大案件，可以说，基本查清了。如夺外交部大权，围困中南海，火烧英代办处，揪军内一小撮，夺中央的权，财政部闹得最厉害。为陈里宁翻案。

这些问题，基本弄清楚了，火烧英代办处是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大量事实证明“小老百姓”，王关戚、杨余傅、姚登山、周景芳这些王八蛋们搞的，他们污蔑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说要大干一场，搞了四十八小时的最后通牒，现在查

实了，他们操纵了“反帝反修联络站”的坏头头任佩衡。“红联站”这些头头历史很复杂，是周景芳插手管的。拿周景芳来说，他是叛徒、特务，认日本翻译的母亲为干娘，他是带着任务混进革命队伍来的。都是“小小老百姓”、王关戚、杨余傅这伙乌龟王八蛋搞的。还有一个“批陈联络站”，蒙蔽了不少群众，冲砸英代办处，搞打、砸、抢，点了第一把火，但谁派点的，现在还没搞清。我们工代会徐凯、王景瑞这些人也做了些具体希望，这些人都是戚本禹、周景芳安插的。

“围困中南海”是以揪刘为名，向中央施加压力，也是“小小老百姓”王关戚这些人干的。他们提出“谁不让揪刘少奇就揪谁”，大家可以想一想，谁能决定不让刘少奇出来，不单是总理能决定的，这就不难看出，他们把矛头对准谁了。当然围困中南海的不一定都是“五·一六”，有 20 万人，四千多个组织参加，但阴谋策划的是一小撮，多数是受蒙蔽的，是不明真象的。

“揪军内一小撮”实际上也是“小小老百姓”他们搞的，现在查得很清楚了，连“小小老百姓”的手稿也搞到手了。这个问题不是从“七·二〇”才开始的，而是从一月就着手了。一到八月他们通过报刊发表了一百多篇反军文章，说在八月间要掀起总攻击，进入夺军权的阶段，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搞乱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妄图达到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毛主席非常英明，江青同志一下子就看出了他们的野心，以前这些情况是分散的，现在查清了，是不容易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那些人是托派、叛徒、特务、资产阶级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对无产阶级有刻骨的仇恨，像“小小老百姓”一贯反对社会主义，过去我们不清楚，现在清楚了。我们学习时，可以结合起来批判。过去我们没有读过“小小老百姓”历史上写的书，很多都是托派观点，如说：“中国没有奴隶社会”，这是陈独秀的观点，公开和毛主席唱台戏。有人说：他那么高的地位还搞这个？正是因为他地位高了才干，因为他是反革命。他们这些人，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勾结了，文化大革命中又进一步勾结起来，打着建立无产阶级“左派”的旗号进行反革命勾当，吴传启、关锋这些人早有勾结，以“仨仁兴”为名写文章，吴传启是国民党大刚报主编，是陶希圣的高门弟子。他们的阴谋被揭发后，就有计划的组织退却，企图隐藏起来，将来再干，

现在把他们清查出来了，批倒、批臭，这就清除了隐患，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很重要的。

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这个阴谋集团，不像我们现在说的那么多，有五六万人，可编一个军。所以，我们要把这件工作，按毛主席九条方针，继续进行下去，头一条就是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今天在坐的都是首长，抓得好的地方都有这条经验，不好的地方就是没有贯彻这一条。其次要提高群众觉悟，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提高识别好人，坏人的能力。我们是不是好好检查一下，是不是按主席九条方针，中央十三号文件办了？现在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的面搞大了些，有乱咬乱供的现象，也有逼、供、信，以假乱真，真真假假，真假难辨。我们有的同志对这个问题还没有重视起来，这就不能很好地把“批清”运动深入下去，或者上当搞乱。有的工厂把二分之一的职工都搞成了“五·一六”嫌疑对象，还有的把一派组织 90% 列为嫌疑对象，有个人一供就二、三百，所以我们要强调加强调查研究，落实罪行材料，强调人证、物证、旁证，严禁逼供信。凡打人、变相体罚等现象，要坚决制止。“五·一六”跑不了，就是“五·一六”也不能打死。现在还很少看到有哪个单位把“五·一六”的罪行材料有根有据的写成报告送来。当然也没有都动，大家还是有控制的。有的确是“五·一六”，也有罪证，但没有去取证，而是忙于在那里天天斗，很少研究材料。有些人材料很多，但什么是要害，什么是一般，那些是有的，那些是假的，不清楚。要像清华大学那样，研究材料，清华有个人某年某月，有一天他坐什么车，带什么手枪，去钓鱼台捉谢副总理，进的哪幢楼，谁接待的，怎么进去的，怎么出来的，说得很玄乎，经过研究，认为是假的。给他说“不对”要他推翻。他说是真的。后来问他进去见到了什么，他说进去那里有“钓鱼台”三个字。进门地方恰恰没有。经过很多工作后，他才说交代的是假的。人家研究材料非常细，而我们很多单位，不研究材料，倒比人家省心，结果是定不下来，不是的不敢否定。主席讲不漏掉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我们定不下来，就是因为没有研究材料，最近我看了外交部的一个材料，有根有据，时间、地点、人证、物证、旁证，而且照了像，清清楚楚，一看就明白。

我们搞不出这样的材料，还是重组织，轻罪行的思想作怪。定不下来，就产生两种情况，“五·一六”这么多，或者是到底有没有“五·一六”。学部有一

个人，在日记本上写着×月×日召开“五·一六”兵团会议，这说明有嘛！这主要是重视组织，轻视罪行材料。总理讲，单纯追组织，人家说想不起来，就把全厂职工名册交给他在上边画圈，好像画选票一样，一下子圈了好几百。不调查研究就会出问题。

要注意乱咬乱供。“五·一六”阴谋集团很狡猾，开始顽抗，后来乱咬乱供，把水搅混，让你搞一堆材料，分不清是非，如果不调查研究，轻信口供，就真假难辨，搞不清楚。

政策界限啊、敌我界限总分不清，一机床厂提出划分三个界限，我看还是对的，发动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分清敌我，分清是非。要分清革命的造反派精神和极“左”思潮错误的界限；极“左”思潮错误和“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界限。这样才能把矛头对准“五·一六”，保证运动健康发展，现在有的单位界限不清，派性干扰，界限很重要，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有的同志怕扩大化和一风吹，怕犯错误那就要调查材料，就要发动群众，只要群众起来了，就会揭发出很多材料和证据，一机床厂伍佩衡说：“是自发的组织了‘反修联络站’”，总是说没有关系。后来一想，也很明白，一机床厂是“小小老百姓”的点，派进去很多记者、联络员，群众揭发很多材料，说“小小老百姓”在那里蹲点，整了谢副总理的十条罪状，就是“小小老百姓”的秘书打电话联系的。“反帝反修联络站”，开始时是由姚登山接见，火烧英代处后，向姚登山作了汇报，送给了他主席诗词。一查结果与外交部有关系，伍佩衡是火烧英代办处的总指挥。说自发的，没有联系，怎么可能呢？是地地道道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有罪行嘛。

就是要划清界限。不要怕犯错误，只要认真抓“五·一六”，有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不要紧，不要给群众泼冷水，要用党的政策教育群众，领导头脑要清醒。其他界限，主犯、从犯、被胁从、受蒙蔽的都要划清界限。一开始看不出来，但运动深入了，群众就分清了。当然也要追组织，有的说是三层发展的，上边一层是核心，中层也有核心，是外围的一层是以“五保卫”、“中央文革支持”的名义发展的。有的说是中央批准的一层是以“五保卫”、“中央文革支持”的名义发展的，有的说是中央批准的“左”派组织，所以有的人就这样参加了，现在哭鼻子，说参加了革命组织怎么成了反革命了？

总之，要把主席九条方针，十三号文件，好好学习，认真贯彻落实。

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深入了解情况，具体解决问题，不要像什么厂打死人了，去查时，领导还不知道。人都打死了，还说“好像打了几下”。打人是王、关、戚的办法，我们不能用，我们用主席思想，先把问题搞清。

认真实行专案调查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我们是群众肃反路线，要自始至终发动群众，要对群众进行路线教育和政策教育，依靠群众，防止少数人办专案的神秘主义，群众讲清楚，不要乱点名。与依靠群众并不矛盾，群众可以写小字报嘛，还有的张贴“五·一六”的供词，这也不对，他的供词到底实不实，不清楚，这样搞容易引起“恐慌”，因为这个“批清运动”主要是清查“五·一六”，批判“五·一六”罪行，这是敌我矛盾。极“左”思潮，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两者不能混淆，所以要划清界限。你公布了一大批名单，将来要一个一个给人家做结论，这样打击面就太宽了。

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这一条不多说了，十二中全会上主席讲要稳、准、狠，关键在于准字，要按主席说的，要突出“准”字，不准就狠不了。不要漏掉一个坏人，也不要冤枉一个好人，这是这个精神。

要注意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十三号文件是总理根据前一段经验与的，主席批准的，就是要抓坏头头和幕后操纵者，其实胁从者，也可以划在受蒙蔽一栏里，胁从过去与从犯划到一起严了。因为党的政策是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嘛。要争取多数，从北京看，“五·一六”有的单位有，有的单位没有；有的单位多一点，有的单位少一点。现在开展“批清”的四千多个单位，有百分之三、四十的没有，比如学部就可能比别的单位多一点，红旗杂志社、大学就可能多一点。两派里也可以说都有“五·一六”，什么天派、地派，也可能这个派多一点，那个派少一点，可千万不要陷到派性里面去，这一派捉那一派。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是一少撮，从犯也不太多，大多数是受蒙蔽的群众。拿二七厂来说，真正搞阴谋的只有十几个人，一机床厂罪行严重的，只有四个，将来怎么定可以考虑。总之，要抓住重点人，重点单位，重点案件。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落实党的政策。要下功夫研究材料。

要区分“五·一六”罪行和极“左”思潮的错误，有的就是不明真象受蒙蔽去的，“五·一六”罪行还是过去讲的那几条：

①直接和小小老百姓，王、关、戚等挂勾的或间接挂勾的。

②搞阴谋破坏的。

③矛头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颠覆红色政权的。

这里要注意不要把对军宣队，革委会某些同志有意见，反对过你的，甚至说了几句错误的，都当成“五·一六”罪行。

“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成员，有的履行了手续，有的没有履行手续，有的填了表，有的没有填表，现在也拿到了几张表，有的说是集体填，有的说是个别填的，不要在这个问题兜圈子，越是上头越不一定填表，有的人追他的表，他不承认，结合给他定了幕后操纵者，他说这还可以。有的人罪行查实了，组织也就出来了。定“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要慎重，比如有的极“左”思潮错误严重，有的开始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后来犯了错误，都要区别开。幕后操纵者，有的是出谋划策，有的是被迫支持了，当时群众组织的活动，犯了严重错误要区别开，还有的被迫投降的嘛。要把主犯、从犯和被胁从受蒙蔽者区别开来。根据中央 13 号文件精神，区别主犯、从犯和被胁从，受蒙蔽者主要是根据罪行大小和有无罪行。一是主犯，主要是指坏头头和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二、从犯是参与反革命阴谋破坏活动的；三、是被胁从者，是指被迫参加而未作坏事，四、受蒙蔽者是不明真象的。

定案处理问题，在定案处理工作中，应贯彻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

对坏头头和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应根据他们的罪恶轻重和态度好坏，给予不同处理，罪行严重，态度恶劣拒不交待的，应从严惩处，坦白交待表现好的，可以从宽处理。

被胁从受蒙蔽者，其性质不属于敌我矛盾，不视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他们交待后，被胁从者，一般不给处分，个别情节严重，态度不好的，可给党的或行政的处分，受蒙蔽的一律不给党和行政的处分。

办学习班多了也不好，现在是三多，用那个方法能搞出来？还是要调查研究，有的人可能说我右了，可以批评，这次黄政委到卧佛寺检查政治环境，发现那里也办了学习班，怎么跑到那里去了？那里倒是人少，只有卧佛。主要还是要落实罪行，搞罪证，有的单位应该搞，没有搞的还要发动群众搞嘛！将来查证落实，也要继续发动群众搞嘛，但现在不注意这个问题有危险性。我发现一个问题，要

落实罪证，材料拿不出来，可以找到证据，哪能销毁得那样干净，三个供一个那不行，没有证据，我可以让十个人供一个人。过去那样搞面宽了，现在捏起来就行了，要罪行、人证、物证、旁证，没有罪行怎么能定案？怎么能构成“五·一六”分子？当然群众刚起来，面大一些，现在还用这种办法就要搞乱了，不敢发动群众是右的，群众起来了，不注意这个问题，就容易上当搞乱。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日，陈伟在燃料化学部谈清查“五·一六”

现在的中心是深挖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中央给陈伯达戴的头衔是“五·一六”黑后台；给林彪戴的头衔是反党乱军的罪魁祸首。林彪的自我爆炸，对清查“五·一六”的工作是有利的，有利于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

清查“五·一六”的斗争一定要搞，要坚决搞，搞到底。“五·一六”是毛主席定的性，在清查过程中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抓，作指示。毛主席亲自作指示，总理也有很多指示。外交部的同志深有体会地说：如果按总理的指示搞，进展就快。他们的四大案件基本上查清了。通过查重大事件，把各种人员、幕后操纵者、主犯、从犯、被胁从、受蒙蔽的，都区别出来了。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

一是研究组织问题，把罪行基本查清了，组织问题还是要查。说组织问题不要查了不一定完全对。组织问题不查不行。当然要实事求是，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是一种什么手续就是什么手续，不一定按别单位的套。别的单位填了表，你的单位就不一定。很好的加以分析，但首先把罪行查清。

外交部现在确定的主犯，在组织问题上也是在幕后搞秘密串联的主要人物，罪行和组织是一致的。林陈反党集团被揭露出来，对搞清“五·一六”问题更有利了。要搞到底。

现在还是按照十三号文件的精神办事。林彪的那个“一个也不能漏掉”肯定是有阴谋的。他的这一条与毛主席的指示，与总理的指示不是一回事，不一样。他的这一条肯定有阴谋，我们过去不认识，路线斗争觉悟低。

人证也是重要的证据。说人证没有用也不一定完全对。毛主席讲要保存活证据，就是人证。最近一个家伙死了，还挨了批评。

阴谋部分可能没有物证。当然物证是最科学的，最可靠的。但有的物证确实毁掉了。可能到最后结案也找不到物证。我们是唯物主义者，物证不存在了，靠人证也可以定案。面对“五·一六”的特点，他搞真真假假，不要上他的当。人证肯定可以作证明的。但要慎重，要很好研究，不要上当。过去我们说有三个五个人证明，就可以定。不能受这个限制。要分析研究，如果是假的，串了供的，再多也要上当。

案例问题，主要靠本单位自己搞，别的单位在没有把握时是不愿拿出来的。我们那个报告，报上去后正好出了林彪问题，中央没时间批了。登奎、先念同志都看了，提了意见，送上了。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吴德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讲话精神

〔×××同志传达吴德同志 12 月 20 日讲话精神〕

(二)

路线教育与要斗批改结合起来。专加上这一条，来推动社会主义大发展。任务很重，工作很多，许多工作没作完，发展也不平衡，还存在薄弱环节，薄弱单位。项目很多怎么办？

一打三反，批清这项工作量很大，政策都有了，就是我们的工作了。一是抓出来，二是核实定案。要分析一下情况，总结一下经验，落实政策，再安排一下能否在上半年搞出个头绪来，或者做完。大多数解脱，把大头子挖出来了嘛——（指林、陈）。这里有一个问题，对市里是否执行了十三号文件，过去有人说抓“三重”没有执行林的“一个不漏”，现在又批评过去按林的办了。现在是“左”的右的都有，值得注意的是面大了一些，谢静宜同志向主席汇报时，主席说：“没那么多吧？有的是打击报复打成的吧？”我们主要是抓落实罪行材料，还是抓“三重”。抓三指向，有阴谋，直接间接与头子有联系的。但对于各级革委会，军宣队提了些意见，不要都说成是“五·一六”，这样面就大了。我们要注意组织，另一面不要在组织上搞扩大化。这个问题很复杂，有的有组织又办“五·一六”的事，也有人不是“五·一六”组织的办“五·一六”的事，就是“五·一六”。所以很复杂，所以不要在组织上打转转，还是要抓罪行。要作调

查研究，要分清轻重，九条首先是搞重点，搞骨干。目前很有利，现在清楚了，揪军内一小撮就是林、陈。但也复杂化了，他们搞的有打有立，搞山头。要抓核实定案，落实罪行，要搞些典型，面上推动一下，新华印刷厂的面也不小。总之，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

这项工作怎样安排一下，任务要很好研究一下。一是时间，二是典型。三是领导分工。这样规划一下，上半年能不能解脱，弄清重点，解脱大多数，研究一下。

一九七二年四月，吴德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讲话

〔北京市一轻局葛政委传达万里吴德讲话〕

根据当前情况，要在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运动中继续深入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要认真执行毛主席的肃反路线、方针、政策，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既要防止扩大化，又要防止一风吹。

一、定“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应主要根据罪行。

“五·一六”罪行是指 1967 年 5 月公开发表中共中央 1966 年 5 月 16 日通知前后的一个时期内，在国际上帝修反猖狂反华、恶毒攻击我国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在国内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建立革命的新生政权，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时刻，一小撮暗里的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秘密搞了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煽动和利用极“左”思潮，进行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的目的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是在林陈一伙指使下干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不一定履行什么手续，填什么表，但他们与林陈一伙有黑线关系，在政治上互相勾结，他们为了实现其反革命目的，秘密串连，互相配合，有组织的进行阴谋活动。

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主要是抓罪行。就是抓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有的单位有，有的单位没有。要把其

它现行反革命分子与“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区别开来，是什么定什么，不要一律都叫“五·一六”。

三、要严格区分因受极“左”思潮影响而犯错误的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区别开来；要把说了有损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话同攻击和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区别开来；要把针对军管会、军宣队、军事机关和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员的错话、做的错事甚至反对其中的某一个人同篡军、篡政、有目的的反军、乱军、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区别开来；特别是要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因受极“左”思潮影响而犯了严重错误的群众组织头头同犯“五·一六”反革命罪行的坏头头区别开来。对犯了严重错误的群众组织头头，要看主流，不要一犯错误从此就不信任他们，要把犯了极“左”思潮错误的干部，同“五·一六”的幕后操纵者区别开来。

四、要把主犯、从犯、受蒙蔽者区别开来。

1、主犯（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他们是搞阴谋的，是重大反革命事件的策划者，指挥者，这些人只是一小撮，如围困中南海，参加有的有四千多个组织 20 多万人，现在拟列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重点审查的不过 30 几个人。又如火烧英代办处，参加的一万七千人，现在拟列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审查的不过十几个人。

2、从犯。即参与“五·一六”反革命活动的，这些人为数也不多。

3、受蒙蔽，不明真相的人还是大多数。

五、在定案时，要严肃认真，实事求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材料要认真核实。要实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既不要漏掉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有意见允许申诉，对查无实据的应予以否定，搞错了的应予平反。要警惕阶级敌人乱咬乱供和乘机翻案把水搅混。在定案处理工作中应贯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对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应根据他们罪行轻重和态度好坏，给予不同的处理。罪行严重、态度恶劣，拒不交待和乘机翻案，应从严惩处，坦白交待表现好的，可以从宽处理，从犯只要坦白交待，就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个别情节严重，态度不好的，也可从严处理。受蒙蔽无罪，他们是受害的，要教育他们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揭发控诉“五·一六”罪行，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不给党的和行政的处分，材料也不入档案。

六、农村不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个别单位发现有问题的，经市委批准调离审查。

二、研究资料

范正美：《秋梦追思》摘录

第五章 苦胆血泪

所谓“五·一六”，见于历史材料，前前后后，大体有这样一些情况：

1967年3月24日，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师大、石油部、国家计委等群众组织联名召开“彻底粉碎余秋里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并成立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余秋里联络站”，与此同时，国务院所属财贸系统部分干部群众成立组织，提出“炮轰李先念，彻底粉碎财贸口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这一天，北师大苏东海等人贴出了一张《给周总理贴大字报》的大字报，公开反对周恩来。这张大字报一贴出，立即遭到北师大师生的激烈抨击。

1967年3月下旬，北京钢铁学院群众揭露了炮打总理的学生张建旗，然而，他公然声称自己“没有错”，表示“三个月以后见”，并在3月31日，发表公开声明，扬言要进行到底，但在群众压力下，被迫暂停活动。

然而，从1967年5月初开始，北京几个高校出现了新的反周活动：北京农大成立“五·一六兵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出现了张光武为首的小团体，发表反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北京商学院成立了反周的“火线纵队”。

5月1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个署名“五·一六兵团”的组织贴出了《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诬称周恩来为“反革命两面派”。

五月底，以张建旗为首，在北京钢铁学院成立“五·一六兵团”，相继抛出《给周恩来的一封公开信》和《二十三个为什么》两张大字报。

到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五·一六兵团”头头刘令凯与钢院张建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北京外国语学院在这一期间，策划了批斗陈毅事件。

所谓“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多次在夜深人静之时，四处张贴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传单和大标语，如《周恩来要干什么》、《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等。此外，北京二外、北京商学院院内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这些反周活动，立即遭到首都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猛烈反击。北京许多红卫兵组织义愤地表示，必须迎头痛击“反周逆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适时发表声明，愤怒地指出：“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

六月初，中央文革陈伯达发表讲话：“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6月3日，陈伯达、江青向北京外国语学院“五·一六兵团”指出：“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

在这种情况下，张建旗等人在6月4日，发表《严正声明》，以守为攻，转入地下活动。

6月30日至7月2日，所谓“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五楼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搞“两忆三查”（忆“受压迫”、“受迫害”，查动摇性、工作、斗志）活动，作出新决议、提出口号，企图重新打开反周新局面，并于七月上、中旬，发动了两次“战役”，以农口为中心，散发了大量的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其内容有：《告农口革命战友书》、《二十三个为什么》等。在八机部，这时也出现了反周标语“打倒六月黑风总后台”。

1967年8月11日、12日，中央文革在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上，对于反击“大揪军内一小撮”和“五·一六兵团”作出安排。从八月中旬开始，北京钢院、北京地质学院、北师大、北京农大等76个单位红卫兵组织发表同“五·一六兵团”斗争到底的声明，各院校“五·一六兵团”先后被查抄。

8月26日，首都和全国在京群众一千多个单位，在钢院召开了“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兵团’”大会，批斗了张建旗等五人，同时，解放军报社也揪出了肖力等人。

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在会上讲话。江青说：

“还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请同志们要提高警惕。”

陈伯达说：

“江青同志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极右或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对准军队，对准革命委员会，企图使我们乱套，‘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康生说：“要警惕，‘五·一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要从右的和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到处打倒周总理，就是从内部捣毁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自觉上了当，帮助这个有阴谋的、反动的反革命组织的忙。对于这一小撮头头，要坚决镇压。”

9月4日，外交部揪出陈家康，被定为“五·一六兵团”在外交部的头头。

9月5日，江青在接见安徽来京群众组织代表讲话时，进一步说：

“目前，拿北京来说，就有这么一个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他们人數不多，在表面上也是青年人，这些青年个人我看是上当的；少数是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对我们有刻骨仇恨的，但这是个别的，多数是青年，青年人思想不稳定，被利用了，真正的幕后人都是坏人”，“‘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跑的。”

江青的这个“9·5讲话”，我们在西苑旅社时不知听了多少遍。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的长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批判“五·一六”：

“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1970年1月24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指示“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清楚。”

1970年2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清查五·一六的决定，同年3月27日又发出通知，并成立了“联合专案组”，对清查五·一六问题进一步作出规定。

4月3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召开电话会议，传达中共中央3月27日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借清查“五·一六”之机，对炮轰派下手，妄图彻底摧毁炮轰派，是潘复生的一大战略举措。对我进行“五·一六”审查，应该说早在去年潘复生就下过大力，对我进行了像蓖子梳头一样地清扫了一回，根本没有一点搭边的事，因为我在北京期间不参加北京的任何活动。但是潘复生这时仍不死心，以为我似乎还有油水可捞，也许想借此离间我和群众的关系。于是接过这些规定，再一次布置对我就“五·一六问题”进行清查。

1970 年 4 月下旬的一天，八一厂举行了一次空前的清查“五·一六”的动员大会，要求全厂职工一个也不能缺席。当时绥化县革委会主任、军代表、武装部政委 C 亲自到八一厂作清查五·一六动员报告，煞有介事地要求全厂广大革命职工要认清敌情，擦亮眼睛，打一场人民战争，坚决把隐藏在我们队伍里的五·一六分子清查出来。每一个到会的人都知道，八一厂虽然在省里农机口享有一定的名气，但在政治风云中，他却是个毛孩子，阅历短浅，知识不多，行为能力有限，人们对于“五·一六”的问题一无所知，这个动员大会是专门针对范正美召开的。人们屏住呼吸，睁大眼睛，竖耳恭听，唯恐遗漏报告人的一个字、一句话。我坐在指定的第一车间的位置上，正好是会场的中心。联想到这两年挨整的日日夜夜，感到会场里的空气窒息，胸闷憋气，手脚冰凉，浑身麻木，脑子一片空白。我眼前的 C 政委身高声大，似乎渐渐地变成了潘复生，进而成为一只张开血盆大口的怪兽在咆哮：

“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隐藏在我们身边的五·一六分子清查出来，把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不过，写到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这位 C 政委是奉命行事，后来批潘时一再向我说明并诚心诚意表示道歉。

我回家跟玉梅讲述这天动员大会的感受时，心犹有余悸，义愤填膺。因为这突如其来的运动，犹如泰山压顶之势，谁知要怎么进行下去，联想到这两年省里运动的桩桩怪事，深感“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的心如落冷海，一片寒颤。玉梅知道我对周总理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也跟她讲过我们在北京，没有参加过北京的任何活动，但她还是对运动不托底，因为这来自省城而不在县里。

不过，星轮转换，时令已变。经过长期的派性清查，加上全国贯彻“六厂二校”的经验，这时的潘复生在省里已经不得人心了，也就是那么一、二十天的时

光，哈尔滨就传来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增补沈阳军区副政委、黑龙江省军区第二政委刘光涛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党的核心组副组长，专抓落实政策，推动两派联合掌权。社会上广泛流传潘复生地位不保了。于是对我的清查也就有头没尾，不终而止了。

戴维堤著：《逝者如斯》摘录

中部 文革风云

关于“批清运动”

1970 年的中国，红卫兵学生们早已被赶下了文革历史的舞台，但文革并未停止。我所在的 738 厂又派来了新的军管会，奉上级指示，展开了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批清运动”。

关于批清运动，历时数年，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运动，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大张旗鼓地搞了数年，被整的干部群众何止成千上万。光一个小小的 738 厂就抓出了一千多个“5.16”分子。据资料载，江苏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就抓出了 27 万、一个六千人的工厂就抓出了二千多个“5.16”分子。许多地方和单位抓“5.16”中关“牛棚”的人数近乎天文数字，施行的刑讯逼供手段令人发指。据有人粗略估算，“批清运动”中，全国起码抓出了一千多万个“5.16”分子，被关押、致死、致残、“发配充军”、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这么大一个运动，整了这么多人，最后不了了之。如果说文革中最大的冤假错案，这绝对是其中之一。可是，某些党史、文革史“权威”和“御用文人”们至今对此事连“屁”也没有放一个，甚至有人至今认为抓“5.16”整的是“造反派”，好得很。据说只有和抓“5.16”毫无关系的伟大的邓小平说过，抓“5.16”是错误的，应当平反。

笔者有感而发。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人不是皇帝佬儿和文官武将，而是正派有骨气的文人，如屈原、杜甫、文天祥、鲁迅等人；同样，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家伙不是小偷、流氓、土匪、强盗，而是历代的某些御用文人。中国的某些文人要么是权势者的哈巴狗，要么专吃同类，且不吐骨头，比豺狼过之。单从这一点上，

笔者很赞同秦始皇和毛泽东的作法，把许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丧尽天良的秀才们全杀掉，免得他们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

多少年来，在抓“5.16”运动中被伤害的干部群众忍气吞声，忍辱负重，没有说三道四，更没有闹事。为了国家的大局，为了安定团结的大局，他们忍了，他们认了。他们没有搞报复，没有把整过他们的人置于死地，更没有挖他们的祖坟。中国人多好呀！这些可敬的我的同类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我向他们三鞠躬。

或许我没有同类们那么大的气量。不，这不是气量大小的问题，也不是个人恩怨问题，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血写的历史。不是要“全盘否定和控诉文革”吗？笔者也来助助阵。为了披露历史真相，揭露丑恶，吸取历史教训，我有义务重温历史，来讲讲抓“5.16”的故事。

蒯大富在挨整时，曾发牢骚哀叹：红卫兵是一年香，二年臭。我追加两句是：三年就挨斗，四年、五年成了“5.16”。

“批清”运动一开始，就来势汹猛。伟大领袖又发了最高指示：“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5.16’。”林彪老贼不甘示弱，杀气腾腾地跳了出来，象疯狗一样狂吠：“军队是专政的工具，一定要把‘5.16’分子查清，一个也不能漏掉。”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也锦上添花，火上加油：“查‘5.16’，不但查组织，也要查罪行，罪行够了，就是‘5.16’。”

看来，“5.16”这个宝贝儿确实存在，不但存在，还很了不起，惹得领袖们如临大敌，草木皆兵。

30 多年过去了，人们要问：“5.16”啊“5.16”，你这个宝贝在哪里？

30 多年来，对莫须有的“5.16 反革命阴谋集团”，没有人站出来说明白。那些制造了“5.16”大骗局的政客们上欺领袖，下压庶民。然而，在他们（当然是林彪、四人帮之流）受审的时候，竟然没有一条“利用抓‘5.16’运动迫害干部群众”的罪名。（注：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那个所谓的“历史的审判”是多么“偷工减料”、派性十足。）那么，只能解释，抓“5.16”运动好得很，不是问题。那么请问苍天：错误地整了上千万人，牵连了家属、亲友数亿人的大运动谁来负责呢？

(注：文革中全国各种造反派组织、保守派组织和逍遥派成员按各占三分之一计算约 3 亿人。造反派组织中起码有 50% 的人被怀疑、审查和关押，起码有 10% 的人即一千五百万人被打成“516”分子。这个计算绝对是偏保守的，当时连农村生产队里也抓了许多“516”分子。)

对于“5.16”这只冷冻了 30 多年的“螃蟹”，既然某些人怕吃坏肚子至今不想动筷子，那笔者就不客气了。现在，且听听笔者一家之言。

笔者认为，1967 年武汉“7.20”事件之后，在手握军权的林彪和“中央文革”之流的煽动下，全国到处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军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毛泽东看事不好，怒斥“毁我长城”。(注：有文革研究者认为有“还我军权”之意，另论。) 中央文革看事不好，急忙把王力等人抛出来当了“替罪羊”。但军界的的老帅们和各大军区的将军们不买帐，继续指责中央文革，并对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怨声载道。这时（1967 年春、夏季），正巧有一些极左思潮严重的学生（北京钢铁学院张建奇和外语学院刘令楷等人）以“5.16 兵团”的名义贴出了给周总理提意见的大字报，刮起了一股反总理的“妖风”。这些人数不多能量很大的家伙们很快被谢富治抓了起来，周总理知道后让把他们放了。这件事很快就平息了。

这就是说，“516 兵团”确实存在，但仅局限于北京几所大专院校的几十至上百人，大部分被抓过，且事情早已平息。

面对当时全国纷乱的局势，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十分着急。武汉“7.20”事件军队“造反”和有人反周总理这两件事对毛泽东震动很大。(注：有人说这时周恩来同毛泽东多次密谈，并以辞职向毛泽东施加压力，要毛泽东抓‘5.16’云云。笔者没有证据，不敢妄谈。) 没有军队的支持，没有周恩来的支撑，共和国的大厦将倾覆，文化大革命将以失败告终。毛泽东权衡利弊，考虑再三，认为保住枪杆子、保住周恩来是头等大事，其他都是次要的，于是决定“安抚”周总理和军界（用军管会抓反总理的“5.16”就是铁证）。这样必须忍痛割爱，继续“丢卒保车”。“卒”者，“王、关、戚”和红卫兵、造反派也！“车”者，中央文革也！中央文革的政客们也认为，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的利用价值已不大了，何不把自己干的许多坏事都推到他们身上，以平息一下“老家伙”们的怨气，取得“老家伙”们的谅解，保住自己已经到手的权力和地位呢？但这样干，

必须有一个合适的借口，而反周总理的“5.16”兵团正是一个好“宝贝”，尽管事情很简单且早已经平息了，但中央文革的政客们仿佛拣到了救命的“稻草”。于是，他们无中生有，小题大做，把只有几十个人且早已被抓起来了的“5.16”兵团“招兵买马”，“增员扩军”，然后煞有介事地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谎报军情，把“5.16”兵团说成是以肖华、“杨、余、傅”和“王、关、戚”为后台的（后来又加上陈伯达）、遍布全国的、文武结合的、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政客们知道毛泽东一辈子最讨厌别人搞阴谋），如不清查和打击，十分危险。可悲的是，领袖们和中央文革的“政客”们“英雄所见略同”。于是，上演并制造了文革史甚至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惨剧”和“冤狱”。

“中央文革”经过一番秘谋，由姚文元出面，先造舆论，抛出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亲自加上了一段话：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5·16’组织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

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席卷全国的“批清”运动从天而降，全国范围全面开花。结果是，几乎一夜之间，全国抓出了一千多万个“5.16”分子，为毛泽东充当了一年多“炮灰”且倍受其宠爱的“革命小将”、“革命造反派”们一下子变成了“过街老鼠”，成了“罪大恶极”的“5.16 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子。

伟大、英明领袖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秀才们万万没有料到，这场抓“5.16”运动的结果丢的不仅仅是“卒子”，连“马、炮、士、象”也丢了，“四人帮”这些“车”们最后也没有保住。丢了“车、马、炮、士、象”，文革这盘棋还下个屁？光杆司令纵有天大本事，也无回天之力。想当年，“西楚霸王”项羽大势已去，众叛亲离，成了光杆司令，面对四面楚歌，只好挥泪别姬。伟大、英明领袖毛泽东一生运筹帷幄，百战百胜，“笑傲江湖”，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蒋介石之辈为“小把戏”，然而晚年却“败走麦城”，“挥泪别姬”，

何故也？盖因“文革”这盘棋走错了“步”也！而单从战术来说，由于人老了犯糊涂，抓“5.16”一步棋走错，步步皆错：如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三落三起邓小平，最后导致全军覆没，不能不说这是势在必然也！看来毛泽东的确是人不是神。

隔离审查进“牛棚”

不到三年，历史重演，真是何其相似乃尔！正如 1966 年红卫兵、造反派们响应伟大领袖“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积极造反，把许多老干部们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一样，1970 年，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按照正、副统帅的命令，派出一个个军管会，积极展开了大规模的“批清运动”，矛头直指向文革中为毛泽东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红卫兵、造反派们，并把他们一个个打成了“5.16”分子和坏人。

1970 年 12 月 26 日伟大领袖生日这天，我和 738 厂的造反派头头们一个个地被关了起来。当然，“私设监狱”名称不雅，美其名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没过几天，尹聚平也被作为所谓王力的“黑秘书”和“7.20”事件的参加者被隔离审查。那天正好是我儿子的一周岁。在这一点上，军管会还真是有政策水平，因为据说世界各国在母亲被关押时，孩子不能小于 365 天。

与尹聚平同时被隔离审查的一个从部队转业来 738 厂的男子汉钱直平，不几天便被军管会逼得上了吊，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抛下了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以上这些，我当时是不知道的。

一千多个“五一六”分子

我被隔离审查后不久，就被拉到厂里陪斗一次。这天是 1971 年的 3 月 17 日，738 厂的军管会组织了本地区的批斗“5.16”分子大会。也不知军管会用什么神通广大的魔术，几天之间，便撬开了 738 厂许多人的嘴。他们一个个被押上台去，低头弯腰三鞠躬，痛苦流涕而又口苦悬河。不但一个个承认了自己是填了反革命登记表的“5.16”分子，而且交待出了几十、几百个发展对象。我想起那天的场景，真是滑稽。文革中我几乎什么场面都见过，可唯独未见这种场面。

在军管会的安排下，已经缴械投降的头头们一个个走上台去交代问题。站在台上的交待人在交待他发展的“5.16”分子时，显然是按军管会的要求，用×××（念某某某）代替姓名。这样坦白交待者只好说：“我发展了 XXX, XXX, XX, XXX, XX, XXX……”。会场的高音喇叭有放大功能，这种绕口令的美妙声音响彻了 738 厂的上空，陶醉了坐在主席台上的军管会首长们，但却吓坏了台下的数千名职工，也惊呆了周围马路上的一切行人和车辆。于是，一切都凝固了，人们侧耳静听，不知道 738 厂大院里上演什么好戏。我站在台下看着手表，洗耳恭听着这一连串的迟迟不停的“某某某”。我的天哪！有一个头头竟然连续说了十分钟的“某某某”。按两秒钟说一个计算，他一口气交待出了 300 多个“5.16”分子。

此后不久，在军管会的强大攻势下，那些“某某某”们也一个个乖乖地“缴械投降”了。不几天，738 厂就抓出了一千多个“5.16”分子。军管会主任“王大刀”在全厂大会上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伸出四个手指大喊：“同志们，谁说 738 厂没有‘5.16’分子？现在已经四位数了！四位数了！同志们！”

我的好友张君，是厂革委会人事组织负责人，与我在北航的身份差不多，不过他不管保卫工作。张君为人忠厚老实，甚至有些谨小慎微、胆小怕事。他无造反派的气魄，但有造反派的观点，如此而已。他为人正派，被委以重任。抓“5.16”一开始，我曾对他说过不要怕，更不要胡说八道。

张君患有慢性心脏病，被军管会关起来后，身心压力都很大。他是个孝子，家有多病的老母。军管会抓住他急于想回家的心理拿他开刀，对他进行逼供。开始几天，张君尚能顶得住，拒不承认“5.16”问题。随着逼供的加剧和压力的增大，他顶不住了，终于痛哭流涕地向军管会承认自己参加了“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他幻想着承认了就能放他回家。

军管会很高兴，因为除我和尹聚平等外来户外，张君是 738 厂内抓出的第一个“5.16”分子。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个就不愁第二个，第三个……打过仗的军管会负责人知道突破口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张君可能是一条大鱼。他是管人事组织工作的，他既是“5.16”分子，一定发展了不少人。738 厂的“5.16”之鱼一定少不了。于是，军管会负责人在全厂大会上洋洋得意地说：“庙小神通大，池浅王八多。738 厂这座庙不小，水也很多很深，‘5.16’这些王八、

游鱼少不了。林副统帅要求我们‘一个不漏’，我们的办法就是‘网大眼小’。

‘5.16’分子这次一个也跑不了。不把738厂的‘5.16’分子抓干净，我们决不收兵。我们还是那句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张君既然开了口，下面的事就由不得他了。这正如长江、黄河大堤一样，只要开了一个小口子，就很难堵上了。

“要想早点回家，就要竹筒倒豆子。说吧，是谁发展你参加‘5.16’反革命集团的？”军管会的人边问边记录。

“67年我去北航串连时，认识了戴维堤，是他发展我参加‘5.16’的。他让我在工厂里发展‘5.16’成员，并交代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张君此时的嘴已经象决口的黄河大堤。

军管会的人又惊又喜，立即紧追不舍。

“你发展谁参加了‘5.16’？”

“我是管人事组织工作的，认识的人多，发展的人也多，让我好好想一想。不过，你们要替我保密。”

“这点你放心，我们会替你保密的。你一边想，一边写出来，记错了也不要紧，但不要漏掉，一个都不要漏掉。我们不搞蒋介石那一套，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我们是一个不杀，但一个也不放过。你老实交代吧！交代的好，可以从宽处理。”

于是，张君把厂里300多个干部、工人的名字写了出来，其中包括文革初期挨过批斗的原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等一批老干部都成了‘5.16’分子。

于是，一批批干部、工人被谈话、审查。不承认怎么办？很好办，关押，逼供。“发展你的人都交代了，被你发展的人也交代了，你还等什么？”这是军管会的诱供秘决。

于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许多人便承认了自己是‘5.16’分子。对于某些交代问题不太痛快象挤牙膏一样的人，军管会便让某些工人看守们练练拳脚，并长期关着不放。

一年多后我被放出来见到张君时，他的心脏病已很厉害。他含着泪向我说明了一切，并表示对不起我。他说他当时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甚至不想活了，天天思念老母亲和妻女，以泪洗面，心脏病常犯，差点死在“学习班”里。我谅

解老张，劝他不要难过，好好养病。我调侃说：“老张你真有两下子。你这叫曲线救国，故意引导军管会犯错误。承认‘5.16’的人越多越好，法不治众。你事实上帮了大家的忙，军管会搞了扩大化，才草草收了场，否则把我们整得还厉害。你干得漂亮。”

漂亮归漂亮，张君此后却高兴不起来。他是老实人，心胸不宽，总感到有愧于人，内心十分痛苦。他的心脏病越来越厉害，不久，他就突发心脏病去世了，死时刚 40 多岁。我至今十分怀念张君，我敢说，如果没有抓‘5.16’运动，如果没有军管会的法西斯逼供、迫害，张君不至于死得这样早。

逃出“牛棚”看娇儿

我被关后，军管会的专案组只让我交待问题，没有逼我交待是不是“5.16”分子。大概他们认为我是条大鱼，不必操之过急。我自己当时也不太在乎。“学习班”嘛！学几天就完了。文化革命中干了那么多事，审查审查也是应该的，反正我文革中也没干什么坏事，经得起审查。至于“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去他妈的！我从一开始就认定这是“莫须有”。我是北京市文革的见证人，不算活字典，也算万事通。这么大一个反革命组织，以前闻所未闻，如今突然冒了出来，必定事出有因。

在 738 厂这么多人承认了自己是“5.16”分子后，我心里更加明白，这完全是军管会逼供信的结果。工厂里的工人同志大多没见过世面，被军管会一压、一吓就害怕了。他们有妻子老小，承认了可以回家。好汉不吃眼前亏，何乐而不为呢？

但厂里的造反派头头们，也一个个承认了自己是“5.16”分子，并揭发了许多人，这使我十分不解。既当头头，就应有当头头的风度，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一挨整就举手投降，乱咬乱供，这要是落到毛人凤、戴笠等人手里，怎么办呢？

当时我感到困惑的是，抓“5.16”是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亲自下的“圣旨”。究竟是谁欺骗了他们，挟天予以令诸侯呢？他老人家为什么这么好骗呢？

我把自己文革中的一年多的全部所作所为写成了材料，请军管会过目。我要求回家看看儿子。但是，我的材料被退了回来，军管会说那是宣言书和请功

表，不是交待材料，要我态度放端正一点，脑袋放聪明一点。至于回家，那就看你自己交待的如何了，一切取决于你自己。

我真的非常想儿子。他是我戴家先烈的后代。当时，我还不知道尹聚平也被关了起来。

一天晚上，我趁着看守们在外面打扑克，偷偷打开了窗子（当时关在平房，窗子还未加固），跑回了家——那间厂子附近农村的小屋。

一进门，我惊呆了。70多岁的姥姥（尹聚平的外祖母）正在喂我的儿子。儿子站在潮湿的土地上，一边吃东西，一边用两只小手拿着垂到地面的亮着的电灯泡玩。儿子见我回来了，立即哭着让我抱，并喊“妈妈，妈妈！”姥姥哭着告诉我，尹聚平前几天被厂里的人叫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我的热血一下子顶到了脑门上。军管会这几个法西斯军人，真他妈的歹毒，简直不是人。我们犯了什么罪，如此对待我们？我把电灯线弄高，安慰了姥姥几句，亲了儿子一下，立即头也不回的赶回了“学习班”。从我逃跑到返回，前后不到一小时。

这时军管会正在组织人马抓我，见我自己回来了，松了一口气。不知为什么，他们没有太责难我，只宣布以后不准再跑。

而我当时正在气头上，怒火难消。我冲着管专案组的军代表，破口大骂道：“我操你妈的姓×的，蒋介石害得我家破人亡，你们害得我妻离子散。老子一家都是当兵的，没有一个象你们这么混蛋的。你们别放我出去，否则我同你一块见阎王。”

我的嚣张气焰惹火了军管会。第二天，我被押到厂里批斗了一场。批斗完后，军管会副主任周胡砍来到我的牢房训话。“周胡砍”是738厂工人给他起的外号，主任叫“王大刀”。

“戴维堤，我告诉你，你给我放老实点。老子管过监狱，像你这样的，老子在监狱里见的多了。你的问题很严重，我们有充足的材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不化，死路一条。你不要认为你出身好，我们就不敢怎么着你，你的出身我们也要调查，烈士当中也有叛徒。我们现在是挽救你，要是换一个人，这样骂军管会，我们决不轻饶！”

“我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拿出来，我自己认为我什么问题也没有。我骂军管会不对。可我家里确实有困难，一老一小没人管，出了人命怎么办？就是我和尹聚平有罪，那老人孩子无罪。我儿子绝对是烈士的后代。烈士也有叛徒，这话可是你说的，你是共产党员，不能这样胡说。我要求军管会派人给我看孩子，扣我的工资也可。”

“你孩子的问题，我们会考虑的。你老实交待问题吧！告诉你，你们学校来了许多材料，你是‘5.16’的头头，问题严重，有许多人检举你。我们给你时间，让你主动交待问题，争取从宽处理。否则就不算你主动交待的了。”周胡砍说完就走了。

他妈的，活见鬼了！谁检举我是“5.16”？不可能！周胡砍有审犯人的经验，他一定是在诈我，我不会上当的。

过了几天，军管会派人买了火车票（当然扣了我的工资），把一老一小送到了北京站，打发回了郑州我岳母家。当军代表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已经不再生气，但心里在流血。

据后来得知，军管会中有人很同情我，认为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但此人很快就被军管会调走了。

度日如年

自从被隔离关押后，我同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窗户被钉死了，还糊上了报纸。屋里有四张床，晚上有三位工人看守陪我睡觉。我身上除了一支笔，没有任何硬物可以“行凶”。白天，我被锁在屋里，看守们在外面打扑克。他们轮流回家。写交待材料发纸，发一张收一张。连一张报纸也不让看，只有一本毛选四卷本，已经快背熟了。我向军管会要书看，要纸写东西，不允许。真正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

我实在没有什么问题可交待了。在北航我除了反过工作组，当头头管组织保卫工作，未干其它任何坏事。我没打过一个人，没参与整过任何一个老干部。北航批斗彭德怀，打死李井泉之子李明清算大事，但与我无关，我还有什么问题可交待呢？我一天到晚没事干，实在无聊，书报不给看，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我开始体会到坐牢滋味不很好受，特别是单人牢房。怪不得监狱里惩罚犯人时关“小号”，有道理！

无聊之极，闲得难受，人不能让尿憋死。“谢天公给我手一双，写写画画磨时光，自古天无绝人路，东方不亮西方亮。”我从小喜欢诗书绘画，且多少有点这方面的“歪才”，今天派上了用场。没有纸，我让“看守”师傅给我买了一些卷烟纸（吸烟他们不禁止）。这种纸二指宽，白而薄，有韧性，同宣纸差不多。我用圆珠笔在上面画人物头象，从样板戏中的人物，到《水浒》、《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好汉，画了一本又一本。

画画帮我消磨了许多无聊的日子，后来被一位“看守”发现告了密，军代表带人抄了我的“家”，除了一本《毛泽东选集》四卷本外，其它东西全抄走了，并宣布只有写交代材料时才发纸张和笔。幸亏我把画好的“作品”早藏在鞋子里，才“幸免于难”。

又回到了度日如年的日子。

失去自由——尤其是关在屋里失去人身自由的日子真难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阳光、蓝天、白云、春风，多好啊！但都不属于我，只有利用上厕所的机会出房门吸收一下新鲜空气，但两个看守始终左右不离。每天，我象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野狼，在屋子里不停地走来走去。历史的巧合是，正如当年捷克革命作家伏契克在法西斯的牢房里得出的结论一样，“从门口到窗子是七步，从窗子到门口也是七步，这点，我很熟悉。”有词《牢房》为证：

脚下“生烟”，
背门面窗七步远。
头上青天，
长方八快水泥板。
度日如年，
四卷宝书伴我眠。
欲穷远目，
“报告”要去大小便。

无聊的时候，我常常盯着天花板发呆。天花板由八块水泥板组成，中间缝隙很大，有几只蜘蛛在上面结了网，网上缠住了几只苍蝇。那几只可怜的苍蝇还没有死，正在垂死挣扎。蜘蛛正在一个一个地把它们吞食。我想，我现在就如同这几只苍蝇，任人宰割，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没有办法。此时，我不由得想

起了“四郎探母”中杨延辉（杨家败类、民族叛徒）唱的那几句“西皮原板”，变一下主人公，我在屋子里哼哼了起来：

戴某人坐“牛棚”自思自叹，
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
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
我好比离水鱼任人熬煎，
我好比离山虎受了孤单，
我好比出水蛟龙被围在沙滩……

小伙子看守的故事

一天，一个刚进厂不久的 17 岁的徒工被派来看守我。几个老看守们陪我时间长了，早就烦了。白天总让这个小伙子值班看着我，他们好出去玩。不几天，这个小伙子也烦了，在屋里坐立不安，活象关在笼子里的一只小老虎。

军管会规定，看守人员须同被看守人员划清界限，不准随便说话。可小伙子实在忍不住了。一天，他又单独陪我时，问我：“你是不是‘5.16’？”

我一听，十分好笑。但为了不连累他，我没好气地对他说：“你不要同我说话。我是‘5.16’分子，大‘5.16’分子，别连累了你。”

他神秘地笑着说，“我看你不象‘5.16’分子。厂里的‘5.16’们都承认了，就你一个人还没承认。”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5.16’。你年轻，有些事你不懂。厂里那些人都是群众，承认了就没有大事了，可我不行，我承认了他们也不会放我出去的。”我想试探一下他了解多少情况。

“对！他们说你是大‘5.16’分子，是高校伸向 738 厂的黑手，不会放你出去的。”他的回答在我意料之中。

“厂里抓出多少‘5.16’了？”我问。

“一千多了，还在抓，办学习班都没有地方了，有些人承认了就放了。”

“现在还关着多少人？”

“一百多人，大部分是头头。”

“知道我老婆的情况吗？”

“不太了解，只说她是王力的秘书。”

我不再多问。我沉思起来，心里百感交集。

小伙子见我不高兴的样子，便说：“不谈这些了，你会下棋吗？咱俩下棋怎么样？”

“不，不行，别连累你。”我心里一阵热，小伙子真是不错，但我决不能连累他。我说我不会下棋。文革中，忙于革命，我确实不会下棋。

“没事，他们进城玩去了，晚上才回来，没人知道。不会下我教你。你陪我玩玩吧，我快闷死了。”他一脸稚气地看着我。

这真是天上掉馅饼，世上还是好人多。我顿时感到鼻子发酸，眼睛发湿，喉咙发干。

小伙子象变魔术似地，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一付小象棋，教我下了起来。

就这样，我学会了下象棋。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小伙子陪我下棋的事，就被一个姓刁的看守报告了。第二天，小伙子一边整理铺盖卷，一边难过地对我说：“戴师傅，我不能陪你了，你保重吧，我走了。”

他走了，一个多好的小伙子走了。是我连累了他，我太自私，我恨自己，他才 17 岁，是我连累了他，我用拳头使劲捶着自己的脑袋。

后来得知，他回厂后被军管会整了好几天，逼他交待与我说过些什么。后来，让他下车间劳动去了。

姓刁的看守对我看得很严，我不理他。万没想到的是，不几天，出卖小伙子的刁看守也被人“咬”了，他也成了“5.16”分子，卷起铺盖进了“牛棚”。

真是好人有好报。多年以后，小伙子已从工人提为干部，入了党，当了处长，如今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我永远忘不了他，他的名字叫张建国。

与军管会的较量

我又陷入了孤独寂寞之中。一本毛选四卷被我翻了一遍又一遍，许多重要文章我都快背熟了。“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写的多好呀！这是军管会要求每个被审查人员必读的。我联想到军管会已抓出了一千多个“5.16”分子，绝对已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军管会打击一大片的错误是犯定了。他们现在骑虎难下，不得人心，进退两难，已同杜聿明差不多。我心血来潮，想说点什么。于是，我给军管会写了一封信，劝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军管会的首长、同志们，你们好！你们都是好人，老革命，有许多功劳。你们打过淮海战役吧？一定认识杜聿明。但是，功劳归功劳，错误归错误，你们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干革命，打蒋介石、国民党，功劳大大的，你们不愧是解放军的代表。但是，今天你们似乎又老革命又遇到了新问题。今天，你们打击的是革命群众，你们已经犯了很大的错误，而错误的责任应由你们个人来负，不能代表解放军。

你们现在的处境是骑虎难下，进退两难，同当年的杜聿明差不多。

听说 738 厂已经抓出了一千多个‘5.16’分子，这是你们的伟大胜利。但我相信这绝对是逼、供、信的结果。因为据我所知，所谓的‘5.16 反革命阴谋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就象秦桧整岳飞的罪名一样，叫作“莫须有”。我向你们保证，738 厂也好，北京航空学院也好，只要我不是‘5.16’，那任何人不可能是‘5.16’。738 厂的这些‘5.16’，是你们生产出来的。怎样生产的，你们自己知道。

据我所知，文革中，以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个叫张建棋的学生为首的几个学生——最多 100 个——给周总理贴过大字报，用的是‘5.16 兵团’的名字。后来，谢富治抓了他们。

转移“牛棚”

我又开始了闭门思过，度日如年的日子。

1971 年清明节前后，大雪纷飞，好一个银白世界。屈指一算，我和厂里的头头们关在这片平房里已半年了。厂里的头头们常去厂里开批斗会，这与他们承认了自己是“5.16”分子有关。他们被军管会当成“鸡”，去惊吓厂里的那些“猴”们。而我什么也没承认，反倒乐得轻松，逍遥自在。军管会同我谈话后，也不把我拉到厂里斗了，只让我闭门思过。

事后我才知道，当时军管会对我的话根本听不进去。我骂军管会和发牢骚的话军管会反复地研究了。军管会内部有人主张给我点颜色瞧瞧，但有人认为我的家庭出身太好了，家里一大堆烈士，不能不考虑影响问题。目前还没有抓到我过硬的问题，把我逼急了万一出人命怎么办？尹聚平也早已关起来了，钱植平已自杀了，再死了人影响不好。北航转来的材料水份很大，需要核实，需要时间。戴维堤这个人又臭又硬，一是因为他出身太好，二是可能最后查不出大问题。为

了妥善起见，先关着他再说。直到后来，运动搞了一年多了，军管会中有些人才逐渐认识到我当初的某些话有道理，并初步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加上厂里已有人开始闹翻案，军管会中的有识之士也认为运动搞扩大化了，有没有“5.16”他们中有人也开始怀疑起来。我是唯一一个否定有“5.16”存在的人，我的意见看来不能不考虑一下了。这时，军管会负责人的头脑才开始冷静起来。在厂里，“王大刀”和“周胡砍”讲话也收敛多了，“牛棚”里的待遇和看守们的表情也好了起来。实事求是地说，军管会应该感谢我。

一天晚上，我在一直亮着灯的平房里睡得正香，忽然被外面一阵阵喝斥声、跑步声吵醒了。同房间的看守们全爬起来跑了出去。我躲在被窝里倾听外边的动静。一会儿，看守们进来了，脸色都很难看。我从被窝里坐了起来，外面发生的事情我已经听清，我悲愤至极，大声地说：“逼死人了吧？！”

“你怎么知道的？不准胡说！”看守们大吃一惊，急忙掩饰。

“我早听清了，蒋某某自杀了，你们逼死人命，该当何罪？”我气愤地说。

“可惜他没死成，畏罪自杀，死了活该！你想向他学吗？随便。”这个看守一直很坏，常动手打人，但没敢打过我，仅用肩膀撞过我，可能军管会对他们有交待，不准打我。

“姓张的，你少来这一套。想让我死，没门！有本事你打死我。现在我就写遗书，我死了，就是你小子打死的，你敢签字吗？”我同他大吵起来。

吵闹声惊动了附近的军代表和看守们，他们进来劝了一顿，我钻进被窝蒙上了头。

事后知道，头头蒋某某因受不了长期关押和逼供，一时想不开，趁看守不注意，触电自杀未遂，被救活了。

第二天，突然通知我换地方，从平房搬到楼房去。我分析可能因为这里关着头头们，怕我闹事，扰乱“军心”。

新“牛棚”在福利区二楼二层。从看守们嘴里，我才知道尹聚平原来关在这里，现在让我俩交换了地方。

我面对新“牛棚”，百感交集，心血来潮，诗兴大发。我找到几张旧报纸，珍藏了起来，趁看守不在时，记下了一首《浪淘沙—转移》：

辛亥清明天，
命令突颁，
转移来到新房间。
我来尹往相互换，
却为哪般？
新“牢”似黑棺，
天日不见，
两个窗子一对关。
门对厕所阴风灌，
臭气冲天。

（注：1971 年是农历辛亥年。）

“换防”后，我一开始十分高兴。这是二层楼一套三室的套房，是建厂初期按苏联人的图纸盖的，专供厂领导住的。该杀的“老毛子”，把窗户搞得小小的，尽管在我的抗议下，撕掉了窗子上的报纸，但仍进不了多少光线和阳光。万幸的是，站在窗前，能看到楼下马路上的行人和风景。

这套房子里有一个一平方米左右的厕所和一个长一米六八、宽一米二的小水房，可以洗冷水澡。谢天谢地，因祸得福，分到 738 厂后一直没有房住，这次住上了高级房子。

这次“鸟枪换了炮”，军代表让我单独睡在最里面一间足有 15 平方米的大屋子里，我可以在里面翻跟斗。看守们住在外面屋里，时间长了，他们百无聊赖，又不读书不看报，白天常常打扑克消磨时间。军管会也不指望我交代什么问题了，就这样关着我。单元门常锁着，我仍然象笼子里的动物，度日如年。

夫妻双双在“牛棚”

我后来才知道，在我被关起来不几天，尹聚平也被军管会隔离审查了。

尽管我后来早已同军管会的同志握手言欢，但我当时骂他们是“法西斯”，实在是事出有因。军管会当时并不知道我们有什么问题，怀疑、审查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在还没有查出问题之前，就把审查对象当敌人对待，采取极不人道的手段对待一个正在吃奶的孩子的妈妈，用对付监狱里犯人的办法进行逼供，这种做法不是法西斯又是什么？

据说尹聚平的主要罪状是参与了“7.20”事件、反军乱军、王力的黑秘书等等。这真是抬举了尹聚平。给王力当秘书，本人还差不多，她是不够格的。这个该死的王力，害人不浅，据说他是“5.16”反革命集团的黑后台，据说他是个国民党，据说他反周总理，据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他发明的。因此，在“武汉事件”后不久，他就被打倒了。我早就预感到尹聚平等要受牵连，果然如此。

按说军管会的某些人是见过世面的。对于一个小小的尹聚平，一个跟着中央代表团出了几天差的青年学生，若怀疑有什么问题，让她交待一下完全可以。要知道，当时王力已被打倒，但谢富治还未打倒。中央至今也没把以谢富治、王力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定为反革命代表团。毛泽东、周恩来、林彪、江青等人当时都活着，武汉“7.20”事件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清楚。一个小小的学生在中央代表团里又能干什么大事呢？稍有常识的人都不能从这里抓到什么“大鱼”。后来得知，同在一面五星旗下，其余几个一块赴武汉的北航学生也受过审查，但不过是把事情经过写成材料，上交组织就完了。有的同志很快就解脱了，并入了党，提了干。井岗山、吴介之、胡惠娟三人皆未因“7.20”事件而“获罪”，可是738厂军管会却如临大敌，认为抓大鱼、立大功的时候到了。

738厂军管会把尹聚平从吃奶的孩子身边押走，召开了全厂批斗大会，宣布抓出了大“5.16”分子，混进中央代表团一级的，王力的黑秘书，反军乱军的反革命分子，立即隔离审查，关进了“牛棚”。同时宣布隔离审查的是一位刚从部队转业来738厂工作的男子汉钱植平——为了纪念他，此处用真名，请他的家属理解。

尹聚平的“牛棚”就是我后来的“别墅”。后来我才知道，尹住在这里时远没有我幸运。军代表和女看守们让她住在那间长一米六八、宽一米二、面积一算就知道的阴暗潮湿的小水房里，用木板搭了一个小床，这就是尹聚平的新家。万幸的是，尹聚平身高一米六六，小房的长度还多出两公分，谢谢军管会的长官们！

军管会专案组长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白面书生，此人姓梁，外号“凉半截”。在他的指挥下，年轻的、立场坚定的女看守们对尹聚平采取了非常“革命”但极不友好的行动。

“老实交待，你是怎样混进中央代表团的？”“你跟王力干了些什
么？”“王力什么时候发展你参加‘5.16’反革命集团的？”“老实交待！你
是怎么反军乱军的？”“你的黑手是怎么伸进 738 厂的？”“戴维堤是坏头头，
你老实交待他的罪行！”……

文革中，中国大陆的“牛棚”多如牛毛，被关的“牛”们也五花八门，
各有千秋。否定文革后，制造“牛棚”的人大都下了“地狱”。可是，惟独抓“5.
16”时制造“牛棚”和虐待“牛”的人们却立了大功，官运亨通，心安理得。这，
就是后文革时代的中国历史。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书不愿再追述军管会专案人员和女看守们的
“革命行动”。我敢保证，他（她）们百分之百是好人。在那个人人发昏的年代
里，最最革命的行动就是整人，就是把同类打成反革命，甚至把人咬死后连骨头
吃掉。

感谢那个阴阳怪气、皮笑肉不笑的“凉半截”前来暂停了对尹聚平的
“革命行动”。他说：“尹聚平，听说你父母是老革命，你生父是革命烈士。我
们不管那一套。现在老革命和烈士中叛徒、特务多得很，谁知道你老子是不是叛
徒、特务？这很难说，我们不管这些。王力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你给他当秘书，
知道的情况一定不少，你要老实交待。看你的态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
到底，死路一条！交待好了，可以从宽处理。我们讲人道主义，今后不会再有人
打你，也不会不让你喝水，你累了可以坐一会儿，但问题交代不清不能睡觉。革
命嘛，需要付出点代价。”

斗室，小小的斗室，从此成了尹聚平的“家”。其实根本不是家，家可
以关上门来睡觉，这个小小的“家”没有门，里面装上了二百度的电灯泡，“光
芒万丈”，“主人”没法睡觉。738 厂有的是女工，积极分子们很好找。车轮战
术开始了，整天整夜不准尹聚平坐下，更不准睡觉。连续几天轮番逼供，只有到
天亮时才让坐下打一会儿盹。接班的看守又来了，立即站起来，又开始了一天的
逼供……

尹聚平头几天加起来一共让睡了三个小时的觉。就算她是个动物，也需
要打个盹儿。可是，只要她的头一垂，立即传来女看守们的拍桌子声和喝斥声。
由于挂记家中的老人、儿子，她整天以泪洗面，“废寝忘食”，悲愤欲绝。父辈

们都是共产党人的烈士后代，一个年轻的孩子妈妈，蒙受如此摧残和奇耻大辱，要不是想到儿子，她真不想活了，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也免得受罪了。

经过几天的连续折磨，尹聚平已经面目皆非。她欲哭无泪，呆若木鸡，身心受到了极大地摧残。她的内分秘已严重失调，脸上、身上长满了水泡，眼球突出，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迅速地消瘦，几天下来，仿佛换了一个人，“苗条”得几乎皮包骨头。当年不兴减肥，否则军管会的逼供专家们发明的这种减肥秘方足可申请国际专利。

尹聚平不明白，生父是 1946 年牺牲的革命烈士，母亲是 38 年的老党员，继父是 1929 年入党的老资格共产党人，丈夫戴维堤的亲人中有四位烈士。如今夫妇双双成了“5.16”，反革命，而大打出手的人从军管会到看守有好多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不知道联合国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委员会的洋鬼子们死到哪里去了。这些该死的帝修反分子，整天游山玩水，不干正事，也不愿到 1971 年的中国北京 738 厂来看一看。

天要绝人，没有办法。身居中南海游泳池游泳的毛泽东以及忙忙碌碌的周恩来不可能想到，那个在武汉东湖宾馆“百花一号”扎着两条小辫跑来跑去的女学生尹聚平今天不想活了。让她的儿子、丈夫、父母、兄弟姐妹们见鬼去吧！来世再见吧！尹聚平的情绪已经反常，随时可能出事。

还要感谢军管会“凉半截”，一天，他突然交待女看守们，千万提高警惕，一秒钟也不准离开人，不准她手里有硬物和绳子之类，千万不能让她自杀了。

当时尹聚平不知道，同时被关的钱植平同志，这位当过兵的男子汉在附近的“牛棚”里经受了数天的折磨之后，一时想不开，在牛棚的厕所里自杀了，抛下了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

钱植平是从海军转业到 738 厂的，据说他文革中参加过“冲派”，如此而已。

钱植平自杀，救了尹聚平一命。军管会似乎感到人死了倒无所谓，弄不出多少口供和材料，如何论功请赏？如何升官？不行，不能让尹聚平也自杀了。那样传出去，军管会逼死了二条人命，听起来不太好听，人家要骂我军管会是笨蛋，是法西斯。

于是，“凉半截”来到尹聚平面前，皮笑肉不笑地说：“尹聚平，前几天对你的革命行动，你要正确对待。我们共产党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看在你是烈士后代的面子上，今后允许你每天睡一会儿觉。她们不会打你，但你也不要惹她们。你要老实交待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态度好可以从宽处理。”

从此以后，尹聚平的待遇稍好了一点。

钱植平呀钱植平，你用你年轻宝贵的生命，救了尹聚平一条命，我代表全家谢谢你了。愿你的冤魂安息吧！你不该死，你应该活下来，顽强地活下来，你怎么那么狠心呢？连老婆孩子也不要了？

从此以后，小屋里的小床才真正成了尹聚平的“家”，尹聚平可以坐在上面，晚上可以在上面睡几个小时。保持革命警惕性的女看守们一怕尹聚平逃跑，二怕尹聚平行凶，逼供完后就把她赶到小屋里。二百度的电灯泡始终“光芒万丈”，七、八只年轻漂亮而又凶狠残暴的大眼睛 24 小时轮流盯着她。旁边就是一平方米的厕所，大小便必须开着门，漂亮的大眼睛们继续盯着。

尹聚平这时是什么？是人吗？不是，尹聚平现在象只母猴。诸位（包括尹的女看守们）到动物园去过，那些漂亮的孩子妈妈领着孩子在观赏铁笼子里的母猴，多好玩呀！那母猴的儿子被人家枪走了，既不可望又不可及。母猴在笼子里撞来撞去，想见自己的儿子一面，谈何容易？老老实实呆着吧，谁让你不是人呢？

见“故人”——尹聚平还活着

一天，“我正在楼上观风景，忽听见楼下乱纷纷。”透过玻璃窗，只见尹聚平被四个女看守押着从楼下马路上走过，可能是进厂批斗刚回来。尹已瘦得皮包骨头，四个女看守前后左右簇拥着她，许多路人围观。

我自命为男子汉大丈夫，从不婆婆妈妈，但如此面对近一年渺无音讯的妻子，我肝肠欲断，心如刀绞，百感交集，两行热泪流了下来。谢谢苍天，尹聚平还活着。我含着泪水，一气呵成一首七律《见故人》：

黄河岸边苦藤瓜，
烈士遗孤弃黄沙。
只缘伟人挥巨手，
红旗阵中一小丫。

身陷囹圄两分离，
妻离子散在天涯。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当年不回家。

尹聚平的老家是河南省清丰县，在黄河北岸，是黄泛区。生父曹从之1938年入党，1946年任延津县委组织部长时牺牲，当时她才五个月。母亲也是38年入党的，当时才23岁，抱着她到了冀鲁豫解放区根据地，认识了继父蒋中岳。继父1929年入党，是河南省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当时同万里、吴德、赵紫阳等人同在冀鲁豫工作。尹完全是在革命队伍里长大的，从小靠供给制生活。六六年文革时，她刚20岁，为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参加了“北航红旗”。因随谢富治、王力去了趟武汉，被军管会隔离审查。

当时738厂夫妇俩同时被关起来审查的，只有我和尹聚平。我是男子汉，虽不算铁石心肠，尽管思念妻儿，但能挺得住。尹聚平作为母亲，孩子刚一岁，就被迫母子分离了。我不知她心里有多难受和痛苦，但她最后也挺过来了，她没有自杀，也没有得神经病，但关了一年半后放出来时，已是皮包骨头，脑子受到了伤害，一直健忘得很，脾气也变坏了。

唐朝李商隐的“夜雨寄北”诗，我从小喜欢，但没有切身体会。尽管有人认为作者当时已经丧妻，但我仍认为，那是描述长期在外的丈夫思念妻子的绝句：秋天的晚上，巴山地区下着大雨，池塘里涨满了水，秋风潇潇，蛙声一片，使人烦燥不安。由于很久未回家了，不知新婚的妻子现在如何，思念之情油然而生。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家中，见到久别的妻子？那时两人依偎在西窗前烛光下，剪着灯花，述说着当时巴山夜雨的晚上互相思念的心情，那该多好啊！于是，诗人写道：

君问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

每当想起了这首诗，我就思念起尹聚平及我们的儿子。我敢说，我们的思念之情远远超过了巴山诗人，因为我们还有一岁多的儿子远在千里之外，不得相见，其内心的苦楚谁人能知？

见儿子——欲哭无泪

被关押以来，自从刚开始偷跑回家见过儿子一面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儿子，我无时无刻不想念和挂记他。他是我的骨肉，是我们戴家先烈留下的一条根。军管会说老人孩子已经送到郑州，让我安心交代问题。近一年过去了，不知儿子现在什么样了，我实在想他。至于儿子的母亲尹聚平如何想儿子，我就顾不得了。

“学习班”遥遥无期，不知何时才能恢复自由。整天关在屋里闭门思过，连一张带字的纸也没有，无聊之极，度日如年，我强烈地思念所有的亲人。除老婆孩子外，山东老家年迈的双目失明的老祖母和亲人也令我挂念之极。

想起自己两岁丧父，从小成了孤儿，那是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我的“照顾”。可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仅仅因为听伟大领袖的话造了几天反，一没杀人放火，二没丧尽天良干坏事，却落得夫妻双双关“牛棚”，“妻离子散”，远在千里的儿子不得相见，不知这是为什么？

自古监狱可以探监，军管会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却连老人孩子也不准见。古人尚且讲点人性和人权，可是，不知哪个祖宗发明的“学习班”和“隔离审查”却不管把人关多少时间，也不准亲人探望，哪怕是吃奶的孩子。

1971 年秋的一天，我正在屋里“熬钟点”，忽听窗外楼下有哭叫声和喝斥声。我推开窗子往下一看，只见不知何时从河南回来的姥姥和我的儿子坐在地上，对着我的窗子哭喊着。有几个工人看守正在轰老太太走，周围有许多看热闹的人。

我大吃一惊，想从房门冲下去，可房门反锁着。我只好从窗子探出身子喊着“姥姥”，呼唤着儿子的名字。我心里难过之极，悲愤欲绝。已快两岁的儿子抬头呆呆地望着陌生的我，突然大声的哭喊起来。从儿子的哭叫声中，我分辩出了一声声“爸—爸—”的声音。我悲喜交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见有人叫我爸爸，这是我的儿子。谢天谢地，总算见到姥姥和儿子了，尽管这种见法有点残忍。

70 多岁的姥姥哭闹着一定要同孩子上楼来看我。看守们和几个军管会的人如临大敌，喝斥着让老人带孩子赶快离开。围观的人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有人指责看守人员，有人擦着眼泪离开了。我一狠心，关上了窗子，一屁股坐在屋内的水泥地上，长叹一声，呆若木鸡。

后来才知道，尹聚平的姥姥和儿子在河南郑州我岳母家住了快一年了，仍不见我和尹聚平的影子和消息，一家人都焦急万分，度日如年。岳父知道我儿子是烈士后代的后代，气得天天破口大骂 738 厂军管会是法西斯。岳母让弟弟、妹妹们又把姥姥和我儿子送来了北京，希望能见我和尹聚平一面，并幻想能感动军管会尽快释放我们。

近一年来，军管会的所作所为已引起了全厂干部、群众的公愤。一千多个‘5.16’分子们纷纷翻案，指责军管会的逼、供、信行为。但军管会顽固不化，拒不向被整的干部群众认错并赔理道歉。为了保住他们的运动成绩，为了守住最后一道防线，他们把早已查清问题的几十个头头继续关着不放。这期间，被关的头头们有的家中亲人去世，有的老人卧病在床没人照料，有的家属带着孩子天天在“牛棚”周围转来转去，希望能见到亲人一面。有一天，我从窗子看见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我一个车间的沈师傅在楼下哭。沈师傅要给关在我旁边房间里的丈夫杭某某（也是厂里的造反派头头）送点吃的，看守们不让。趁沈师傅同看守们争吵的时候，小女孩飞快地跑上了楼，见了她爸爸杭某某一面。这个聪明的小女孩后来成了有名的歌星，她就是杭天琪。

各家有各家难念的经。我家的经最难念，因为我是“夫妻双双在牛棚”，不知道何日“夫妻双双把家还。”

我强烈要求军管会允许我和尹聚平分别见老人和孩子一面，如不答应，我将绝食，以死抗争。

看来还是我错了，军管会的“长官”们不是法西斯，不是冷血动物。他们经过研究，认为没有必要为这点儿小事儿让我死，他们同意我见儿子一面。

“戴维堤，你岳母家纵恿老人孩子回来大闹‘学习班’，这是破坏运动的行为，是错误的，这对你和尹聚平没有好处。好在不是你指使的，就算了。我们军管会还是讲政策、讲人道主义的。看在你是烈士子女面上，我们同意你看看儿子。这是军管会对你的关怀和照顾，是党的温暖，是军管会讲政策的体现。我

们不是法西斯，我门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你再骂军管会，我们就不客气了，你要为你的骂人承担一切后果。”

“谢谢军管会，只要让我见见儿子，我就不骂军管会是法西斯了。否则我就是法西斯。”

于是，经过一番周密的安排，只允许我见姥姥和孩子一面，尹聚平仍不让见。会见安排在厂五层大楼招待所一间屋里，军管会早已派人把老人和孩子接来。两个看守领着我来到到了会见房间，并告知我会见时间不能超过半小时，并不准哭。

我一进屋，只见又苍老了许多的姥姥坐在床边流泪，不懂事的儿子坐在床上吃花生。我一把抱起了儿子，用力亲了一下。谁知儿子可能被我的胡子扎痛了，哭喊着挣扎下来不让我抱。儿子根本不认我，我心里一阵难受。去年底被关时，儿子不到一岁，现在快两岁了，他当然不认得老子。房间里站着几个军代表和工人看守，戒备森严。我强忍着眼泪，拉着姥姥的手，安慰着老人，给她擦去脸上的泪水。儿子不停地吃着花生，傻乎乎地望着我，却始终不肯叫“爸爸”。我急了，不由自主地给了儿子一巴掌，儿子“哇”地一声哭了。姥姥指着我的鼻子骂起来。我双手抱着头，蹲在了地上，偷偷擦去了流出的泪水。

“戴维堤，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打儿子还是打我们？你要冷静一下。你看到了吧，你老人孩子都很好，这下你该放心了吧？今天希望你做做老人的工作，动员老人带孩子再回河南。在北京不方便，‘学习班’还没完，希望你能配合我们。”

我站了起来，突然看见一位年轻一点的军代表在擦眼泪。

我只好劝姥姥再同孩子回河南，不要着急。北京这里没人照顾，我和尹聚平也不放心，我们很快就会出去的。我安慰了姥姥一顿，又抚摸了儿子几下，然后一咬牙，转身出了房间，头也不回地向“牛棚”走去。整个会见大约 20 分钟，给军管会节约了 10 分钟。

这次老人孩子千里探亲却未能见到尹聚平一面。举目无亲的姥姥和儿子只好又哭着返回了河南郑州我岳母家。又过了半年多，当我走出“牛棚”奔赴河南再见到姥姥时，受到严重刺激的老人家已经疯疯癫癫，不久就去世了。我对不住老人家，面对老人家的遗像，我热泪盈眶……

林彪完蛋了

转眼到了 1971 年 9 月。一天，又来了一位新看守，人称小李子。这是位复员军人，山东沂蒙山地区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一来就对我非常同情和友好，说话很随便，直来直去，标准山东人的脾气。我劝他注意，不要对我太友好，以免受牵连。谁知他满不在乎地说：“管他娘的，都什么时候了。厂里现在闹得很凶，全翻案了。军管会顾不得你们了。文化大革命，我们也参加过，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在哪儿当过兵？”我问他。

“福建。”

“福州军区吗？什么部队？”我有目的地询问。因为 68 年我去过厦门处理周国怀叛逃事件，到过福建。

“某某军的，我们是野战军。我们几个老乡都在某某军，驻在樟树。68 年大武斗，可热闹了。我们司令支持一派，政委支持一派，后来部队和部队也打了起来。有一天，首长让我们追赶逃敌，是对立派的群众。我们端着刺刀把几个家伙追到稻田里，咱们一个老乡跑在前面，上去一刺刀一个，一刺刀一个，连捅了三个，真过瘾！”山东老乡很随便地说。

我的天哪？这就是解放军支左？我以前听说过类似的事。外地武斗死人可多了，但听了老乡的话，仍令人吃惊不小。

“你们随便捅死人，不受处分？”我问。

“处分？还立了功呢？我们也有战士被他们打死了。当时都红了眼了，大炮隔着山打。我们的司令部差点被对方击中。你不知道，台湾还打过传单来，表扬我们打得好呢？后来我们首长挨了中央批评，给撤了职。”老乡越讲越来劲。

这就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吗？

突然，老乡把门插了上来，神秘地说：“你知道吗？林彪完蛋了，坐飞机摔死了，现在外面都传遍了。”

“是吗？”我惊呆了。我每天关在屋里，报纸广播皆没有，与世隔绝，什么也不知道。

“详细情况不清楚，咱一个老乡在中南海当兵，听说是前天晚上出的事，好象是坐飞机叛逃，被打下来了。”老乡说。

这真是爆炸新闻，实在没有想到。

实事求是地说，对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林彪，我们是拥护的。林彪战功赫赫，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三大战役林彪指挥了两个，没人能比。尽管对他文革中整天举着红宝书的作法有看法，但在那个非常的年代，人人如此，也算不了什么，谁让毛主席喜欢这一套呢？从 1968 年退出文革历史舞台后，对中央和上面的事知之甚少，尤其是一年多来关在“牛棚”里，断绝了同外界的一切联系，更是孤陋寡闻。所以，听到林彪出事的消息，确实是没料到，大吃一惊。我对林彪叛逃摔死一事大为不解。

我请老乡多打听点外边的消息告诉我。

过了几天，军管会奉命向全厂“革命职工”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事件的文件，据说会场戒备森严。但是，我等被剥夺了听文件的权利和知情权。由于军管会和工人看守们没有任何人告知我关于林彪事件的一个字，连《人民日报》也不准看，我向军管会提出了严重抗议。军代表说：“现在你不能听中央文件，对你不利，将来会让你知道的。”

“岂有此理！林彪完蛋对你们军管会不利！林彪是你们军管会的老祖宗，你们做贼心虚！”我心里愤愤地想。

感谢山东老乡“看守”，他随时把外面的情况偷偷地告诉我。

林彪事件对我震动很大，我预感到中国的局势将会出现重大的动荡。

林彪完蛋，有一点值得我高兴。738 厂军管会按照林彪“一个不漏”的指示，发明了“网大眼小”的战术，搞扩大化，打击一大片，搞逼供信，搞非法关押，私设监狱，剥夺人权，这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行为。林彪倒台了，军管会该收敛点了吧？

关于“反军、乱军”问题

从一开始，军管会就拿“反对解放军”的大帽子来吓唬我。文革以来，我从未干过反军乱军的勾当，不料如今却成了“反军”者。由于我的阶级本性和出身，我永远不可能反对解放军。文革中，伟大领袖号召解放军“支左”，事实上军队不同程度地介入了派性斗争。解放军内部也分派，什么“老三军”派、“新三军派”；“空军派、陆军派”；“5.13 演出派”、“冲 5.13 派”；还有“司令派”、“政委派”等等，一应俱全。军管会也观点对立，且一批一批地换。738

厂的军管会就换了三批，先是空军军管会，后是通信兵军管会和北京卫戍区军管会，各个军管会皆支一派压一派，彼此互相否定。对群众来说，支持张三就等于反对李四，支持这个军管会就等于反那个军管会，你说让群众怎么办？听谁的？怎么才算反军？

如今林彪完蛋了，反林彪是不是反军？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对上要谋害毛主席，对下残酷地迫害包括老师们在内的大批党政军老干部和反对他们的人民群众，其手段之残忍，罄竹难书，古今中外罕见。文革中林彪及其死党们的所作所为完全不能代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于忠实地执行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指示，把上到胡耀邦等老干部、下到我辈年轻学生打成“三反分子”、“5.16 分子”的军管会某些人，对他们提提意见甚至骂他们几句，难道这就叫反军？

写到这里，笔者认为应当是澄清某些历史事实的时候了。文革中和文革后，“反军乱军”的大帽子满天飞，许多人被戴上了这个帽子而敢怒不敢言，这是很悲哀的。这是中国特色的发明，也是天大的笑话。

什么叫“反军乱军”？文革中究竟是谁反军乱军？有良心的历史学家应当“拨乱反正”，说句实话了。

笔者认为，古今中外，“反军”者历来有之，因为历史上的反动军队都是镇压老百姓的。老百姓要活命，要造反，只有同反动军队对着干。而“乱军”者却不是平民百姓望而可及的，只有管着军队的人或军中的高官们才能把军队搞乱，这是小儿的常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抢险救灾，为国为民损躯是他们神圣的职责。这样的军队无人敢反，无人能乱，除非台湾当局和美国、北约之流的政客。

文化大革命中，最高统帅号召解放军支左，要“支持左派而不是保守派甚至右派”，而毛泽东眼里的左派，当然指的是造反派也。由于许多将军们对文革不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所以许多军区不支持造反派，甚至把造反派当成反革命镇压。文革中许多军区事实上介入了派性斗争，有的甚至介入了武斗。有的部队同部队之间也打了起来（如福州军区、昆明军区、大连的陆军和海军等）。当时，中央军委一会儿“八条命令”，一会儿“十条命令”，朝秦暮楚，令军区和群众组织无所适从。一会儿宣布许多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镇压了群众，一

会儿又骂造反派们反军乱军，这必然导致造反派和解放军的对立。一些地方的造反派干出了冲击军区机关，静坐、示威、绝食之类的蠢事，最后成了“反军乱军”的罪人。现代法律讲究“作案动机”，现在回想起来，有几个红卫兵学生和造反派是真正的坏人，希望把解放军搞跨、搞乱的呢？“反军乱军”这个词，正象“黑帮”、“走资派”一样，是中国特色的发明，在国外的法典里是找不到的。多年以来，在“反军乱军”这个问题上有许多误区，许多人戴上了“反军乱军”的帽子敢怒不敢言，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这是很悲哀的。

参加过文革的人都清楚，文革中，真正鼓吹“揪军内一小撮”、“带枪的刘、邓路线”等“反军乱军”口号的是林彪、江青之流，而伟大领袖毛泽东一开始对“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也是同意了的，后来他老人家看事不好，便出尔反尔，大呼“毁我长城”、“大、大、大毒草”，那只能解释为“放火”和“点灯”的故事。铁的历史事实是，“揪军内一小撮”的始作俑者，正是毛泽东本人也！早在“5.16”通知中，毛泽东就白纸黑字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种“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必然产生重大的作用和后果。因此，事到如今，应当是实话实说的时候了。文革中真正搞乱了军队的是林彪、“四人帮”之流，而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这个问题上也绝对是负责任的。既然军队里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且还“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那中央文革也好，红卫兵造反派也好，积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去揪这“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中的“一小撮”，岂不是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吗？结果不但不给记功，反而翻过手来把他们打成“反军乱军”的反革命，这不是千古奇冤吗？多年以来，某些人挥舞着“反军乱军”的大棒子和大帽子，把那么多的同胞致于死地，让人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难道今天不应该忏悔一下吗？难道他们的良心被狗吃了？

某些人不是说毛泽东文革中犯了严重的错误甚至有罪吗？我看最大的错误就是“揪军内一小撮”和“反军乱军”（还有“516”）。全国真正的“走资派”才整了几个人？而抓“516”整了多少人？有良心的人自有正确的结论。

文革中我虽然没干任何“反军乱军”的勾当，甚至我还支持解放军镇压过造反派，但我始终认为不应当把解放军和老百姓（包括红卫兵和造反派）人为

地对立起来，更不要以“反军乱军”的罪名随便整人。军民本是一家人，万事以和为贵，我就不信有那么多反军乱军的坏人。“反军乱军”不好听，因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反民乱民”更难听，因为失民心者失天下。随便给青年学生们扣上“反军乱军”的大帽子，正与随便给整过群众的老干部们（包括军队干部）扣上“反民乱民”的大帽子一样，荒唐可笑。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文革中因为对军队某某领导人（包括老帅、将军们）和当地驻军“支左”有意见或受到驻军压制、打击而对驻军采取过一些过火行为——包括对个别军界领导人写过“炮轰”、“火烧”大字报，在军区门口静坐、示威、喊过口号（例如“打倒陈再道”）等行为的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只要没有公开抢劫解放军的武器、弹药（军方明里暗里送的不算——如中央军委送北航红旗数千支枪，武汉军区送“百万雄师”轻重机关枪、炮，大连陆、海军分别送两派武器甚至鱼雷等等），没有攻打甚至占领军事基地、要塞、机场、舰艇甚至导弹、卫星发射场……没有用武器（包括木头棒子）同解放军打架，就不算反军乱军。对他们的错误可以批评教育，甚至处分，但不能随便定罪为“反军乱军”。如果这种看法不对，那么对文革中造过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反的“联动”和“7.20”事件的平反如何解释？难道真理真的有双重标准吗？难道政治真的就是无理可讲的“强权政治”吗？

今天，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指挥下，从来没有这样强大过，这绝对是中国人民的福音。多少年来，我中华民族受尽了强盗们的欺侮，我父辈的头颅被人砍着玩儿，心肝被人家当酒菜，就是因为没有强大的国力和军队。面对如今东西南北不太平安的局面和远的、近的反共反华噪音，勒紧裤腰带也要强军，应当成为我们的国策。所谓称霸不称霸，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没有强大的军队，想称霸也称不了。西方国家的军队是政府的工具，绝对不准干预政治，否则就是政变和叛乱行为。中国的军队是老百姓的子弟兵，也是共产党政权的支柱，目前的国情暂时决定了中国的“中央军委”不能不参政，这无可厚非，但任何时候，解放军的枪口和刺刀不能对付老百姓，否则就不叫人民的子弟兵，而叫“法西斯”。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国防”。抵御外国入侵，平息武装叛乱，收复属于自己的领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抢险救灾，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圣使命。这样的军队，谁能反？谁敢反？

抓“五一六”运动中的故事

二、“五一六”登记表的故事

故事之二：“5.16”登记表的故事

动力科一个头头唐某某，成了“5.16”分子。此人胆小怕事，态度很好，交待问题很痛快。

“老实交待，你们的‘5.16’登记表什么样子？”

“是铅印的，第一行是‘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成员登记表，还有编号。下面是纲领和组织纪律。”

“什么纲领？什么纪律？”

“纲领是三忠于，四无限，五保卫。就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纪律是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

“还有什么？”

“记不清了。”

“表在哪里？”

“烧了。”

“老实交待！”

“噢，想起来了，运动一开始，让我埋了，全科的‘5.16’登记表都让我埋了。”

“埋在哪儿了？”

“埋在东直门桥底下了。”

于是，军管会调动人马，带着工具，由唐某某带路，连夜赶到了现场。

当时正是冬季，西北风呼呼地吹，东直门桥下臭水河已结了薄冰，这可苦了那些积极分子们。他们按照唐某某指定的地点，开始了艰苦的挖河泥工作，挖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要找的宝贝。军管会的人火了，拉过唐某某来，追问：“说老实话，到底埋在哪儿了？”

不知唐某某当时是狗胆包天拿军管会开涮, 还是被吓得神经错乱, 他摸着脑袋, 装腔作势地想了一会儿, 恍然大悟似地说: “该死, 我该死, 我记错了, 不在这儿, 在前面拐弯的地方。我用尼龙包包着, 装上石头, 扔在水里了。”

天哪, 前面是一片开阔的臭水河面, 半冰半水, 那污水估计齐腰深。

当时那个年代, 为了革命, 人人不惜一切。为了拿到“5. 16”反革命集团的罪证, 那真是上刀山下火海,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点臭水怕什么? 于是, 军代表一声令下, 工人们一个个走进了冰凉的污水里, 弯着腰摸起来。他们不停地同污水接着吻, 来

抓“五一六”运动中的故事:

三、“反革命秘密电台”事件

故事之三, “反革命秘密电台”事件

文革之初, 厂里两派总部头头的电话分机都由厂通讯室总机控制。由于通讯室也分两派, 于是双方头头的电话常被窃听。“东方红”一派的头头感到这样不安全, 便从一墙之隔的兄弟厂总机拉了电话线使用。通讯室反“东方红”的工人怀疑“东方红”的头头们安装了单独的电台。清查“5. 16”运动开始后, 有人便揭发了这个问题。

军管会如获至宝, 列为“反革命秘密电台”大案进行追查, 随后, 一些有关人员被关了起来。

由于逼、供、信的“功劳”, 一些人承认了有秘密电台存在过, 并且据说有人同当时已调到贵州的一个头头通过话。于是, 莫须有的东西变成了有声有色的客观存在。看来逼、供、信确是个好办法。

军管会的宗旨是, 你不承认我就逼, 你供了我就信, 信了就关人。一时间, 受反革命秘密电台案牵连受审查和关押的好几十人。可笑的是, 被定为“黑电台”台长的竟是一位广播站的老工人。此人仅小学文化程度, 但会修收音机, 扩音机之类。该老工人同我很熟, 我一直称他叫张师傅。

有一天, 我在看守们陪同下去食堂打饭, 突然发现张师傅也来打饭, 身后跟着看守。我万没想到他也被关起来, 趁看守们不注意, 我偷偷地问他: “什么问题?”

“电台台长。”张师傅悄声地说。

第二天吃饭时又碰到他。他偷偷地向我手里塞了一团纸。回“牛棚”打开一看，上面写道：“根本没有电台，有人揭发我，就把我关起来了。我老母有病，我回不了家。天天逼我，我受不了了。我想承认了好回家，你看如何？”

我看了张师傅的条子，心里十分同情，感慨万千。军管会呀军管会，按说你们绝对不是坏蛋，但为什么对好人这样仇恨？象张师付这样老老实实的老工人，你们整起来也毫不手软。你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革命（后来知道军管会的人没有几个人打过仗），为什么这样敌我不分，草木皆兵，残酷无情？难道这么多人都是你们的敌人吗？你们这样整人，难道自己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有人提醒军管会，电台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功率，可以从北京直接同贵州通话，要小心上当受骗。可军管会不听，继续逼、供、信。军管会的人说：“738 厂这个厂子很厉害，臭老九很多，什么有本事的人都有。咱们国家控制原子弹爆炸、卫星发射用的电子计算机他们都能造，造个电台还不容易？一定要一查到底，决不手软。”

可怜那些被关押、被审查的干部、工人倒了霉。他们有苦难言，家中老人孩子病了不能回家。有的人为了过关，军管会需要什么就交待什么，什么都敢承认，什么材料都敢写。政治斗争中有一条策略，叫做引导对方犯错误。738 厂的这些干部、工人可怜而又可悲地引导着军管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可是，怪谁呢？

我在“牢房”里对军管会的这种作法又提出了强烈地抗议，并劝他们放下屠刀，积点阴德。军管会又把我斗了一场。有的好心的看守说：“不关你的事，别人的事你少自找麻烦！”但我认为，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世上有良心的人是多数。

后来，北京市公安局知道了这件事，哭笑不得。他们告知 738 厂军管会，别查了，再查就查到我们头上了。

原来，除了广播电台，所有的其它电台全归市公安局管理、备案、侦查。若 738 厂有秘密电台而公安局又不知道，将是公安局的失职和重大事件，公安局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这场闹剧，终于收了场，可是，受害者的眼泪知多少？

738 厂的清查“5.16”反革命集团运动，在军管会的领导下，搞了两年多，被打成“5.16”分子的职工一千多人，被关押一百多人，关押一年以上 30 多人，被逼自杀一人，被逼成精神病死亡一人，直接间接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这笔帐不知应算到谁头上。

在我被关押、审查期间，军管会对我展开了大规模地内查外调，除了同北航“联合作战”外，据说还派人去西安、四川、武汉、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贵州、山东等地反复外调。最可笑的是到我老家调查我父亲是不是烈士时是我四叔接待的，我四叔认为要发展我入党或升官，滔滔不绝地讲了半天家史，并要热情招待外调人员，外调人员不好意思，灰溜溜地走了。

据我后来估算，为审查我一个人，738 厂十多年来化费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惊人，全厂、全国加起来更是天文数字，看来文化大革命的确是“祸国殃民”。

与我一块分配到 738 厂的几位北航老同学，几乎全部受到了审查、逼供和批判，有的被开除团籍，受到处分。有位老同学在北航时只不过是北航红旗一名普通群众，没干任何坏事，但军管会不知从哪儿得到信息，说该同学是我发展的“5.16”分子，在北航干了许多坏事，几次逼我交待该同学的问题，并准备对他实行隔离审查。我实事求是地告诉军管会，不要听信某些人的胡说八道，该同学在北航时什么坏事也没干过。若连他这样的人也关起来，军管会将被动、后悔的。后来由于厂里有人闹翻案，该同学才幸免于难，但仍受到了怀疑和审查，连女朋友也弃他而去。后来，该同学飞黄腾达，成了权力很大的领导干部。

据有人粗略调查，在历时数年（当然是文革十年期间）的抓“5.16”运动中，全国大约抓出了一千多万个“5.16”分子（据说这个数字是中央权威部门的人说的），受审查和牵连者不计其数，许多地方在农村的老农民中也大抓特抓“5.16”分子，被整死、自杀、致伤致残、精神失常、家破人亡者数不胜数。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以及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都被说成是“5.16”的黑后台。而据我后来见到肖华、王力等人询问此事时，他们说被关押时从没有人向他们提过“5.16”问题。

据我所知，全国抓“5.16”的总指挥当然是“四人帮”之流。总后台当然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们，这件事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

历史证明了我被审查时的预言，所谓“5.16 反革命集团”，不过是“四人帮”之流凭空发明的怪物，正象秦桧陷害岳飞的罪状一样，叫作“莫须有”。

全国轰轰烈烈搞了几年的大运动，整了那么多人，最后不了了之。738 厂的军管会撤走时连个屁也没放一下。当初发了那么多中央文件、指示、首长讲话，后来竟然不给全国人民一个明确地交待，更没有向被害者正式赔礼道歉。如果说文革中最大的冤假错案，这绝对是其中之一。后来全盘否定文革时，作为文革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残酷迫害干部、群众的抓“5.16”运动，某些人也缄口不提，而且至今“金口难开”。当时就连以平反冤假错案而著名的胡耀邦在这个问题上也“大意失荆洲”。这其中的奥妙，只能苍天知道。

走出“牛棚”

1972 年 5 月 13 日，军代表带几个人来到了我的“思过斋”（这是我为自己的“牛棚”起的雅号）向我宣布，从今天起，改变审查方式，回车间劳动，但审查未完，要继续检查交待问题。最后，军代表拿出了一份材料。

“戴维堤，你自己看一下，这是揭发你的材料，本来不应该给你看，但已经无所谓了。当初让你交待‘5.16’问题，我们是事出有因的，你不要埋怨我们。”军代表把材料让我看完了交回去。

我一看，是老同学张海写的“关于戴维堤问题的揭发材料”。他的字写得非常漂亮，工工整整，象印刷的一样。

张海用了几十张纸，揭发我在北航发展他参加了“5.16 兵团”反革命组织。有时间、地点、情节，样样俱全，十分逼真，一般人看了必信无疑。怪不得军管会始终逼我交待“5.16”问题，把我关了这么长时间。

我看了张海写的材料，心里立刻想到张海同学可能吃的苦头太大了。不知道他的单位是怎么整的他，逼、供、信到什么程度。外地天高皇帝远，整起人来无法无天。张海肯定是被折磨得没有办法了，才不得不这样做。否则，一条 7 尺的汉子，怎么能这样胡说八道呢？

实事求是地说，我当时对张海并无多大的怨恨，我恨那些整他的人。我甚至怀疑，张海可能被整死了，或者被逼疯了。738 厂不是也有被整得自杀或疯了的吗？

我对军代表说：“现在你们怎么看这份材料？”

军代表笑了笑，说：“给你看材料，就说明我们的态度。‘5.16’组织登记表问题，谁也说不清楚，我们现在也没见到一份。不过，我们重在罪行，罪行够了，也是‘5.16’，这是周总理说的。”

“周总理是这么说的吗？什么时候，在哪儿说的？”我问。

“你出去后自己打听去吧！”军代表说。

当天下午，我恢复了人身自由。从 1970 年 12 月 206 日被关，到 1972 年 5 月 13 日释放，我失去人身自由五百多天。尹聚平仍未释放，但我知道也快了。

我回车间报了到。车间书记十分友好，他开始时相信军管会的话，认为我是“5.16”分子，带领工人们批斗过我。但后来，他似乎明白了过来，对我十分同情和客气。他让我休息几天，并借给了我路费，让我回河南接孩子。

回厂一打听，光受我牵连被审查、批判的人就有好几十人，其中有的被关了好几个月，有的被“发配”到车间去劳动改造。我向他们一一道了歉，表示了感谢和安慰。

生活中往往有许多无巧不成书的时候。当天晚上，在卫戍区工作的表弟约我去工人体育场看足球。从表弟处得知，厂军管会周主任一直是他的老上级，很熟。我直埋怨表弟为什么不早说。

到了体育场刚坐下，身边过来了几位军人也来看球。我一看，正是“周胡砍”他们。我表弟作了介绍，不料周主任一反常态，握着我的手哈哈大笑说：“戴维堤，老朋友，不打不相识，不要见怪。哈哈哈哈！”

当着表弟的面，我只好顺水推舟，“周主任，你关了我一年半，我骂了你一年半，请你也不要见怪。”

“你表哥真行，骂得我们好苦。全厂一千多人都承认了是‘5.16’，就他一个人没承认，好样的。”周主任向我表弟说。我一听，哑然失笑，亏他说得出口。

又过了些日子，在一位老干部儿子的婚礼上，我遇见了军代表“凉半截”，他有些不好意思。我端起酒杯，敬了他几杯酒，他很高兴，我们握手言和。

我这人，一般不爱记仇，何况周主任他们也算老革命，与我无冤无仇。事情已经过去了，文化革命中你整我，我整你，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算了。

可是我算了，738 厂挨过整的许多工人不算。有好几次，军管会的人在北京大街上被工人们啐了一身唾沫。

雷运河：《运河惊蛰——山东省运河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回顾》

第四部分 曲折历程的壮歌

三、真假 5·16

林彪集团在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开幕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拙劣表演，赢得了中央反文化大革命右倾保守势力的喝彩，使得党内走资派蠢蠢欲动，认为秋后算账的时机快要到了，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则表示了极大义愤。对此，毛主席早有警觉。

以“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为焦点的党内斗争，是林彪认为羽翼已丰，进行突然袭击、采取“清君侧”的策略、企图恢复资产阶级旧秩序、建立官僚特权阶级统治的阴谋大暴露。他利令智昏，把矛头指向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毛主席运筹帷幄，力挽狂澜，扭转了庐山会议上的风向，写出了《我的一点意见》，耐心地、循循善诱地对林彪进行规劝，也给了趁机反文化大革命的势力以敲山震虎。所以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全党全国人民开展了“批陈（伯达）整风”运动。

袁升平，这个祸害山东文化大革命的林彪死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就紧跟林彪、陈伯达，摇旗呐喊，兴风作浪，当时华东大组出现的乌烟瘴气，就有他的不少功劳。他伙同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陈励耘，在华东大组讨论会上，一唱一和，恶毒攻击毛主席信任和依重的革命左派张春桥，说什么“你有多大能耐，竟敢和林付主席比高低，……以左派自居，反对老干部，整军队，比王（力），关（锋），戚（本禹）还坏，是我们党内军内最大的不安定因素。”“应该揪出来示众，批倒斗臭。”同时对林彪大唱赞歌，说林彪是“伟大的天才”，“应该担任国家主

席”，说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认为讲话“语重心长，非常重要，对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袁升平参加完九届二中全会，在山东、在济南军区拒不贯彻执行毛主席“批陈整风”的战略部署，一方面继续大肆吹捧林彪，一九七〇年十一月，让《大众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林彪视察海岛的题词，让济南军区上上下下搞庆祝活动，纪念林彪为《前卫报》题词。另一方面，除散布张春桥、江青、康生的谣言外，又进一步向山东的革命造反派开刀。其卑鄙阴险毒辣的手法，就是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部署全省的“清查 5·16”运动。

“5·16”分子有没有？该不该清查？

一九六七年，北京确实存在着一个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五·一六”组织。它是从极“左”的方面反对、破坏、干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势力，它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专门破坏和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战略部署。这个“五·一六”组织或明或暗，时大时小，总是变幻着策略，在关键时刻，向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开火，配合右倾保守势力，起到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案的作用。这个“五·一六”组织经常受到党内走资派的利用，挑唆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水搅浑，以利于那些顽固不化的走资派脱身，达到逃过批判和斗争，潜伏下来，准备东山再起，秋后算账的罪恶企图。实际上，整个文革十年，“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成员，都在以极右和极左两种形式，干着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勾当。

毛主席党中央早就注意到“五·一六”这股反革命势力，对清查“五·一六”有过明确指示。1967 年 9 月 5 日江青接见安徽赴京代表团的讲话，姚文元 9 月 8 日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都代表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意见，都指出：“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陶铸的反革命两面派的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

在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一年有三个中央文件专门谈清查 5·16 问题，界定了“5·16 是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清查范围“重点在北京”，“有关地方和部门”。同时，这些毛主席亲自批示审阅的中央文件，一再强调：“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 5·16”，“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并且进一步点明：“有的单位任用了一些坏人或者上了坏人的当，这些坏人就故意制造混乱，破坏革命斗争，保护反革命，同志们切记不要上当。”要求清查 5·16 活动在中央专案联合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实行“调查研究和群众运动检举相结合”。

毛主席早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就明确指出：“反革命 5·16 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

而山东的清查 5·16，在袁升平的一手操纵下，完全背离了毛主席党中央的精神，策划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迫害革命造反派的阴谋活动。

首先，山东根本不存在，或者说极少存在中央所确定的 5·16 分子。这已被历史事实所证明。要说有 5·16 分子，那么大量的应该是后来发展起来的林彪集团在山东的余孽。而袁升平把济南的“5·7”事件作为清查 5·16 的重点，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是向山东的革命造反派，向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疯狂进攻。运河地区以“4·10”武斗为由，迫害革命造反派，是袁升平阴谋的翻版。

其次，山东清查 5·16 完全是林彪死党和走卒来清查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的需要。当时，窃居济南军区政委的袁升平，是个不折不扣的林彪死党。由他来具体领导山东的清查 5·16，他又网络了如张致秀（当时任军长，又提升为军区付司令员），周克玉（当时任团政委，又提升到军区政治部）等党羽，成为清查的主要负责人。他们把清查的对象定为“反军分子”，凡是反对军队的都是 5·16 分子，袁升平还特别规定：反黄永胜、吴法宪、邱令作、李作鹏，反杨 XX 的都是 5·16。

第三，山东的清查 5·16，完全是与中央文件精神对着干。中央不让大搞群众运动来清楚 5·16，袁升平他们偏偏在全省发动了大规模的，长达四、五年之久的群众运动；中央不让在公开组织中抓 5·16，他们偏偏在山东省四大组织（山工指、山贫指、山红指，山东文艺造反司令部）及相关群众组织中抓 5·16，

并且专抓这些组织的头头；中央强调专案联合小组的排查工作，而袁升平则要求各单位排查文化大革命中的大事件，把斗走资派，冲杀资反路线，反对军队支持保守派，反击“二月逆流”，两派群众之间的武斗等等，都作为清查内容，把矛头指向了所有革命造反派；中央明确要求各地只能配合中央专案联合小组的行动，袁升平胆大妄为，另搞一套，规定清查工作由军队、军代表直接领导，地方党委不得过问，把各级革委会完全抛在一边，甚至成为清查的重点范围，袁升平还片面地开展“四大”，实行“一言堂”，强行要求把清查 5·16 与“一打三反”结合起来，任意扩大打击面；中央明确指出，5·16 是个秘密组织，范围不大，人数不多，只不过能量很大。但袁升平却在山东大讲敌情，大讲“5·16 是明火执仗”的，并制定在山东文革中公开发生的十四个大事件作为实施方案。

第四，山东的清查 5·16 是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是蓄意翻文化大革命案的。在袁升平亲自主持制定的“实施方案”中，把一九六七年山东的“二·三”夺权，“5·7”事件，“五点声明”、“公开信”，中央负责同志来济南的讲话，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关山东的光辉批示，都进行了否定，把相关的革命行动、革命事件都作为清查 5·16 的内容。

第五，山东清查 5·16，是林彪形“左”实右路线与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相结合的产物。这两股势力相当强大，所以山东清查工作搞得十分惨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迫害之重，残害之深，殃及之广，时间之长，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并且在 1971 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变本加厉，林彪死党袁升平继续得到山东党内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支持和拥戴，继续高举清查 5·16 的屠刀，砍向全省的革命干群和部队官兵。这是山东清查 5·16 的怪胎。

直到一九七四年，中共中央 12 号文件和党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重要指示下达后，这场使山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重大反复，让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蒙受严重损失，给山东无产阶级革命派带来沉重灾难的袁氏阴谋活动——山东清查 5·16 运动——才宣告破产，袁升平这个罪恶累累的林彪死党，以及其他走卒才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第六，山东清查 5·16 运动，用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白如冰的话说：“山东问题，责任在省委，根子在袁升平”。“清查 5·16 这样的大事竟一次也没有向中央报告过。”袁升平是报告过的，只不过报告的是林彪集团。所以中共中央

(1973) 4 号文件中指出：“林彪反党集团的黑手伸向了山东”。难怪乎，袁升平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一日的省委和军区党委常委联席会上，听到林彪摔死的消息后痛伤万分，公然痛哭流涕，泣不成声，竟为之散会。但豺狼本性是难改的，只要不死，它总要咬人、吃人，并且愈到临死的关头，愈加显示出兽性的疯狂。袁升平这条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把对主子命丧黄沙的哀痛，化为仇恨，化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仇恨，化为对革命造反派的仇恨，歇斯底里的大开杀戒，更加疯狂地把山东清查 5·16 运动引向火坑。直到一九七三年底，毛主席党中央已对山东问题有了明确指示，袁升平还公然叫喊对中央“要顶住”、“中央首长受了骗”，并派自己的私党张致秀，曹某某四方游说，上窜下跳，耍花枪、放暗箭，诬蔑群众上访是干扰清查工作的大方向。

山东清查 5·16 的问题，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英明指示下，顺利地解决了。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黑线并没有完全根除，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正未有穷期。

五、真 5·16 清查假 5·16

运河地区清查 5·16，从一九七一年八月开始，到一九七三年毛主席发觉山东清查 5·16 出现了问题，并着手纠正解决，到给被清查的对象平反昭雪，前后将近两年时间。受清查，受牵连，受迫害的人，数以万计。大批大批的革命干部，各级革委会成员，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一般革命造反派的群众，被非法绑架，秘密关押，不准家人探视，不准和熟人、亲朋接触，不准看报纸，比一般囚徒还不如，完全采用法西斯的审查手段。这一切是在美其名曰“办学习班”的招牌下进行，是在日夜轮战、大搞疲劳战术、百般精神摧残的酷刑下进行的，是在拳打脚踢、揪头发、撕耳朵、180 度大弯腰，皮带棍棒一起上的暴刑下进行的，是在“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的恐怖气氛中进行的。

女作家韦君宜在《洗礼》一文中，对清查 5·16 情节的描写，完全符合运河地区的情况：“不让被审人吃饭睡觉。一熬就是三天三夜。”“审讯日夜进行，记录最高的达七天七夜不许睡觉。而审判的人则轮流去睡。”“一会儿开一个五·一六坦白大会。六六年横眼立眉的造反派，一个个忽然变成了五·一六，登台坦白交待自己的组织关系和三反罪行。”“时常半夜……就听又哭又喊的，想必是在刑讯。”“一位很会训人的女造反派，不知为什么也变成了五·一六，被

送到卫戍区去‘监护’。监护了一阵，人家又不管了，把她退回本单位的干校。可是被关押了半年多，她出来以后竟疯了。老是站在干校食堂门口看人家吃饭，而且经常伸手去拿别人吃剩的东西，嘴里流出涎水来。脸上颜色也真奇怪，不知怎么会变得象染了颜色一样的，红一块、灰一块成了小花脸。”

是谁对革命造反派有这么大的深仇大恨，对他（她）们这么残忍、残酷、毫无人性，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从深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毒害的韦君宜奚落、嘲弄、幸灾乐祸的笔下，不难找到答案。那就是党内走资派，那就是从左右两个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刘少奇、邓小平、林彪之流！那就是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反对分子！

除了有象韦君宜描写的被逼疯的典型，运河地区还有被逼自杀的，被逼越狱逃跑到遥远的东北西北当“盲流”的，被逼妻离子散的，被逼落下各种残疾的。

在高音喇叭反复播放“你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这类刺激人们神经的最后通牒的威胁下，在各种形式的“攻心会”“批斗会”的摧残下，在保守派骨干“掺沙子”的监视之下，运河地区的革命造反派经受着最残忍的法西斯待遇。他们或者宁死不屈，“顽抗到底”，或者虚与周旋，打“消耗战”，或者故意编造谎言，“诱敌上勾”，把“逼、供、信”人员调动得团团转。不论用什么方法，这些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革命造反派心里都坦坦荡荡，问心无愧，认为：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斗走资派是“十六条”规定的运动大方向。只要毛主席在，只要毛泽东思想在，革命造反派就会有平反昭雪的一天。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解救我们的。别看他们气势汹汹，他们手中没真理，理不直气不壮，心虚得很，真理在我们一边，这个冤案一定会翻过来，这场真 5·16 清查假 5·16 的冤屈一定会大白于天下！

一个红卫兵在清查所谓 5.16 运动中的遭遇

卫东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原是学校团组织和学生会干部，后来成了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校革委会副主任，1970 年回家乡学校当民办教师。

一九七一年十月底的一天上午，卫东刚下第一节课，就被校长叫到办公室，说是公社有人找，了解一点情况，说得简单而轻松。卫东要求把教科书收拾一下，另两个人（一个认识，一个不认识）说，不用了，很快就回来。

卫东随这两个人出了校门，离开村庄，向公社所在地走去。刚踏上公路，就改变了方向，两个人一前一后跟紧卫东，并威胁卫东老实点。卫东这才意识到被绑架了，大声问：“你们要带我带到哪里去？”一个恶狠狠地说：“到地方就知道了！”卫东无意再争辩，心里很坦然，不相信光天化日之下，他们会对自己怎么样。路上，卫东要上厕所，两个很紧张了一番，生怕跑掉，最后选择一个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让卫东解了手，卫东心里感到十分可笑。接着来到汽车站，坐上去县城的公共汽车。下车后步行三里，到达位于县城东郊的县师范学校，进了戒备深严的校门，两个押解的人才松了一口气。

卫东一看，接待他的是高中毕业学校的负责人和对立派——保守派——的头头。那目光、那脸色、那架式，象来了一个重要的敌人，什么没说，命令卫东先到宿舍去。

宿舍是原来的教室，两边靠墙铺着木板，中间是走道。卫东在木板上没坐多大会，他的铺盖行李就被送来了。这下，卫东心酸了，想象着年已五十岁的老父母，刚刚生了小孩的妻子，他们被勒令准备行李，送给不能见面的亲人，会多么难过，多么担惊害怕啊！

卫东已没多少时间自己心酸，立刻接受了残无人道的审查。

一上来就给了个下马威。卫东被带进审讯室时，口号就喊了起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必须老老实实交待自己的罪行！”“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一看满屋的人，大都是自己高中的老师、同学、学校领导，只有一两个生面孔。个个满脸肃杀之气，有两三个还气愤得涨红了脸。卫东这下傻了眼，原以为不过是办个学习班，审查一下，看来已把自己当成了敌我矛盾。审讯一开始还让坐在屋中间的板凳上，由于交待不满意，态度不好，立刻被喝令站起来，低下头。一个保守派的头头，还和卫东一块当过团支部干部，十分粗鲁野蛮，尽管口吃得厉害，但审讯问话最多，也不知卫东哪点触犯了他，上来就给了卫东两个嘴巴，还猛踢了一脚。一位逍遥派的老师可能看不惯，把他拉开了，卫东少挨了点打。

第一天的审讯批斗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卫东脑子里一片空白，真不知道他们要自己交待什么，所以所答非所问，显得前言不搭后语。主持人感到没能达到目的，气得拍桌子，命令卫东回去写出书面交待。于是，卫东被一位负责看守的教师带回宿舍。

卫东长得孱弱。虽然经过两三年红卫兵革命造反生活的摔打，有过斗争走资派、冲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锻炼，意志坚强了许多，但体格仍不够健康。躺在硬棒棒的床板上，全身象散了架一样，脸上的红肿火辣辣的，被踢的地方，还隐隐作痛。不一会，审讯批斗卫东的人，兴高采烈谈笑风生地回来。他们把饭菜打完，剩下一点，喝斥卫东起来吃。卫东两眼噙泪，也不知是由于疼痛，也不知是由于屈辱，勉强爬起来，把饭菜盛在自己碗里，手拿筷子，两眼模糊，却怎么也吃不下去。这是长到 20 多岁，第一次该吃饭时不觉得饿。

以后的日子，就是在时而写检查，时而被审讯批斗中熬过。一开始，卫东的检查写得很认真，也比较真实，尽量回忆，把参加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桩桩件件，按时间顺序写出来。这时，卫东还感到一丝快意，因为可以静下心来，好好总结一下，把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把革命造反过程中经验教训找出来，从思想上得到提高。所以独自一人伏在床板上书写时，心里感到很坦然，甚至有几分自信。但这样的检查，不是被骂得狗血喷头，就是成了下一轮批斗的罪证。

卫东真的迷茫了，自己怎么写他们才能满意呢？反反复复就是那些事啊！虽然他们凶神恶煞，把自己看成十恶不赦的敌人，可我自己绝不是敌人啊！自从初中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一直是学生干部，学校的任何一次活动都是积极分子，都是学生骨干，为什么唯独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成了有罪了？自己信仰没有改变呀！为什么真心实意、执着认真地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这么难！为什么一造反，一批判走资派，那么多原先夸奖自己，赞成自己，拥护自己的老师和同学，都不理解自己，在批斗会上也跟着咒骂！难道造反错了？不该批判学校和社会上的资反路线和走资派？卫东辗转反思、一会儿肯定，一会儿否定，心中充满了苦恼、矛盾、徬徨。

在连续审讯批斗两个多月之后，卫东的身体垮了，精神陷入了极度的苦闷烦恼之中。一天三次批斗会，上午、下午、晚上，他们可以轮番上阵，可“敌人”就卫东一个啊！再交待还是不行，再上纲上线还是不够，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呢？

在卫东去医院草草看了一次病，又拖着病体连续审讯批斗三昼夜之后，认为卫东实在愚蠢，实在顽固不化，不点点他永远不会开窍。于是通过监管卫东的一位数学教师，对卫东进行个别启发，让卫东承认参加了反革命组织。卫东说：“我们的《东方红》红卫兵没定为反革命组织呀？”这位老师说：“你真糊涂，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死抱着你们的《东方红》是革命造反组织？那就是反革命组织，不过得换个名称，这样才能交待过去”为了这名称，卫东又被斗了几场，因为老是不能使主持者满意，最后看到卫东实在病得厉害，才同意他胡乱说个名称（因为卫东压根就不知道 5·16 组织），算是有了思想转变，可以再去医院看病。

有一段时间，卫东只想死去。这也许是一个红卫兵没经过革命风雨的锤炼，而暴露的软弱，当然，更有他身体老是闹病，折磨得意志消沉。每天夜里，卫东都因为生病要几次小便，每次还必须有人跟着，所以看守他的人十分烦，不停地辱骂，甚至把卫东小便速度慢，小便时放屁，等等，作为奚落的话柄，让卫东除了批斗之外，在日常生活中也抬不起头来。

卫东真正的悲愤绝望发生在与一位亲戚见面之后。这位亲戚瞒过了与卫东的亲戚关系，借口找批斗卫东最积极的保守派头头，来到了卫东所在的宿舍。但只谈了几句话，这位亲戚就被撵走了。就是这几句话，犹如晴天霹雳，使卫东崩溃了，绝望了！原来，最疼爱自己的爷爷病重，出生几个月的儿子也得了肺炎，卫东的父母、妻子几次来清查 5·16 学习班，要求卫东回家看看。但是，清查负责人不光一口回绝，还封锁消息，不让卫东知道。卫东的这位亲戚带来了噩耗：爷爷、儿子相继死了！这巨大的悲痛，把卫东压垮了！两眼发直，欲哭无泪，两天没吃没喝。审讯批斗卫东的人慌了，派他读高中时的班主任做工作，好言相劝，细心开导。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之后，卫东丢掉了烦恼，心中充满了仇恨。他看穿了，这帮家伙的审讯批斗是别有用心，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打击报复，自己根本没有错，根本不应该写什么检查。他们没有点好心，完全是坏心、黑心、是狼心狗肺。他们对自己的批斗是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自己应该挺起腰杆和他们斗。于是，卫东接二连三写了申诉、控诉，用纸和笔向清查所谓 5·16 的混蛋们开火。说来也怪，卫东的态度强硬起来之后，挨的批斗反而少了，那些横眉竖眼的清查积极分子，也收敛了不少。其实，卫东不知道，这时毛主席党中央已发

现了山东清查 5·16 的问题，对全国各地下达纠正清查 5·16 运动扩大化错误的指示，只不过山东的袁升平他们拒不执行罢了。

从一九七一年十月到一九七二年六月，卫东整整被监禁了八个月。

一九七二年七月初，卫东被遣送回家。只有失去自由的人，才知道自由的可贵。卫东终于又看到了蓝天白云，看到了自己生产队的白茬茬的麦茬地，看到了葱绿一片的玉米苗，生活是美好的，这比牢房还牢房的清查 5·16 学习班，使卫东成熟起来。如果光有革命造反的顺利，和与资反路线明刀明枪的厮杀，不经受这法西斯一般的审查，自己对文化大革命还理解得没有这么深刻。自己从一个逃荒要饭的苦孩子，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翻身得解放，上了小学上中学，在文化大革命中还被推选当了校革委会的副主任，生活得值，路走得对。卫东一路想着，觉悟又提高了不少，虽然迎接他的是个破碎的、悲痛的、苦难的家庭，但此时，他心中有一股豪气在上升。

正是有了这股豪情，卫东度过了生活的难关，继续迎接新的挑战，回家后的第二天，大队民兵就送来了纸条，让自己在家好好劳动，定期写出书面检查，卫东心里不屑一顾地笑了；在生产队劳动，队长奉上级指示，要对自己进行监视，并不准分配轻活干，卫东鄙视地忍受着。

到一九七三年春天，卫东实在忍耐不住，开始了他的上访和“盲流”生活。他到省城济南，首都北京，所有接待他的人都很友好，而济南只有同情，北京却给了他希望。他来到东北大森林，参加伐木队，挖树坑栽树，在农场割草、干杂活。几次由于劳累和疾病，晕倒在树丛里，昏死在小河中，差点夺去了生命，是工人同志帮助和挽救了他。他熬煎着，等待着。

终于，一九七三年十月，毛主席党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指示开始落实，卫东被叫到生产大队办公室，县里来的人当面向他承认，清查 5·16 中对他迫害是错误的，补发了他民办教师的生活补助，烧毁了所有的黑材料，恢复了他民办教师身份。

陆渭文：《千秋功罪——无锡文化大革命纪实》摘录

公元一九七〇年的冬天，天空阴云密布，北风呼啸，寒流侵袭大地，天寒地冻，人心更冷。在无锡市东门看守所中漆着黑色的铁门，铁窗，更显得阴森恐怖。

监狱中的午夜，一片肃静，唯有在昏黄色的灯光下，在铁丝网的上面，荷枪实弹的值班部队“咯、咯、咯……”来回走动的脚步声。突然思晴空霹雳的一声“狱—警—传，似—狼—嚎—……”悲壮激烈的京剧样板戏的唱段。在狱中小监房内响起，震碎了狱中宁静的空气，铁丝网上的值班武警的脚步声乱了，监房走廊中传来了值班看守匆匆的脚步声，“哐啷”一声响，小监房的铁门被打开，这个高唱《红灯记》革命烈士李玉和唱段的“犯人”，被推出了监房，不一会监房外面的水泥地上发出了“嚓啷—嚓啷—”有节奏的铁链拖地的脚步声，一步一步回进监房，铁链拖过“013”监房门口，“013”监房内的“文革犯”陆渭文静心地在倾听，他已经从刚才唱腔的口音，及镣铐拖地的走向判断知道有一个难友的入狱在遭受磨难。

今年 33 岁的陆渭文以“颠覆革命委员会”，“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罪名，被“群众专政”关押在“工人纠察队”一年之后，被关进了监狱，在这个“013”大约四平方米的小监房内接受审查。东门看守所座落在“亭子桥”边羊腰弯的路口，里面有 18 只大监房，16 只小监房，在文化大革命中，在这个共产党的监狱里多了一个任何法律中找不到的名称——“文革犯”，现今已有不少“文革犯”与一般的刑事犯关押在一起，主力军方面的要员，陆渭文、匡建中、卜岩、何泄等人都关押在小监房内单身囚禁，其他的殷送勤、戴国荣、王明华、苏金坤等数十人关在和刑事犯一起的大监房内，“九、二”方面也有不少占有血案的犯人。监狱内虽然没有像敌伪时期，对待共产党，革命人民用上“老虎凳”，“灌冷水”等酷刑，但也有一套比较“文明”的手段，在折磨着每一个“犯人”，首先是饥饿，每人每天八两，二粥一饭，一碗青菜汤，以维持不死不活的生命，其次，每天要犯人坐在监房的中央，不准靠墙，屁股下面不准垫任何物件，甚至一张薄薄的草纸，稍有违反，拳打脚踢，上铐，带镣，任意“惩罚”。陆渭文熬过了一天的折磨之后，此时正蜷缩在草垫上进入梦乡，现在却被狱中的震动而惊醒，睁眼望见头上昏暗的灯光，想起此时此刻同在受难的同伴，有多少个青年工人，学生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淫威下，倒在血泊之中，由于完全与外界隔绝

的监禁，陆渭文还不能知道他自己年轻的妻子张毓珍，也已被打成“5.16”反革命分子而受迫害致死，留下两个孤儿在人间受苦的消息。陆渭文身处逆境，把思绪拉回来，思考着如何来应付当前的危局。监房的粉墙上刷着毛主席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尽管目前共产党内的某些人，正在举起屠刀砍杀无数无辜群众，“相信群众”对！人民是历史的见证人，人口是堵不住的，相信迟早有那么一天，历史的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狱内经过了一番骚动，随着“铿锵”的铁链声停息之后，狱中又渐渐地恢复了宁静。陆渭文在迷迷糊糊中度过了一个寒冬的长夜。

淡淡的阳光，从天窗上照射在监房的墙上。看守俞天杰，似猴子般消瘦的脸盘，竹竿似的身材，学着人样，手中拿着一大串象征权力的监房钥匙，在走廊里高声嚎叫：“各监房听着，从现在起，要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著作，《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督促杜律明投降书》要背出来，突然间房内有个病号在开口，“报告俞干部，我身上有病，请求给我一点药。”俞天杰面无表情，迅速将监房门打开，举起他擦得锃亮的黑皮鞋，对着“病号”一阵脚踢。口中还骂道：“你这个娘子养的，有什么病？不老实，站好！”这个“病号”只能服从命令，站在监房中间的地板上。这种治疗方法，在押的“犯人”称他为“踢打疗法”。陆渭文听着邻监房内发出的嚎叫，轻轻地叹息一声，大监房内服从命令使勁力地在朗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文章。岂不知这篇文章的本意矛头是针对南京国民党政府，文革期间，“南京政府”也可以说是以许世友为首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文章的内容可以对“张三”，也可以对“李四”，“犯人”高声朗读这篇文章，有何乐而不为呢？正是愚昧的时代，造就了愚昧的人才，也干出了愚昧的事情。

深挖“5.16”反革命

上午九点过后，吃官饭的人上班了。照例铁门上的“将军锁”一响，小监房的门被拉开。看守俞天杰，尖削的头脸，狼嚎般的一声：“‘013’出来。”陆渭文凝视一下对方，默不作声地跟着走出监房，走进审讯室，在靠墙的提审桌上坐着三个提审员，桌上摊着记录用的材料纸，旁边放着“宗卷”袋。为首的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的“陆、匡级革命集团”专案组负责人徐世忠及张×，另一个是手中拿笔的记录员。徐世忠中短身材、是个老公安人员，他在当时几乎所有“公、检、法”干部在深受迫害时，却表现得异常活跃的整群众的得力干将，他

坐在用群众血肉堆垫起来的官位上。徐、张两人靠办“陆、匡反革命集团”及“余党”的案整整混了十年。在这场“浩劫”中发挥了他们特有的才干。徐世忠面对着坐在小木凳上的“阶下囚”皮笑肉不笑地开口：“陆渭文，前几天向你宣读了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70年20号文件，你怎样来交代自己的问题？这个‘5.16’反革命，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真是罪大恶极，他们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难道你还不交代吗？”

陆：“揪‘5.16’反革命是应该的，可是我不是‘5.16’，有什么好交代呢？”

徐：“你不要抱任何幻想，难道说你们‘红总’的其他人都是‘5.16’就你一个人不是吗？”

“我从未发现有什么‘5.16’在我身边。”

“你这个人不要抱任何幻想，可以老实告诉你，你不是吃不吃官司的问题，而是杀不杀头的问题”徐世忠的脸上收起了“笑容”用一个“死”字来胁迫对方交代问题。

陆渭文默默地静听他说话的分量，看着他一忽儿轻，一忽儿重的说话腔调，没有回答。有什么好回答的呢？在“死”的威胁下，心中正在默读新中国建立后出版的小说《不死的王孝和》中的词句，：“我对着死亡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再笑声中动摇，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心想文革以来，已经有多少群众被你们的“群众专政”而死于非命，难道别人可以去死，我陆某人就不能去死吗？顶多了不起被你们“五花大绑”“嗡”的一下结束自己的生命，有什么了不起。陆伟文依然默不作声，两眼凝视着对方。

徐世忠的言语中继续加重份量：“你挑动武斗，你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你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你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指骂过张春桥），你最后是要被处决的。”

陆渭文性格倔强，听到这里再也沉不住气了，不冷不热的回答：“我不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听毛主席的话，参加了‘文革’，别人打过来，我抵挡一下就是挑动‘武斗’，我为了避免流血事件扩大，逃了出去，我就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我反正都是错的。”回答到此。但身处囚室的陆渭文此时此刻毕竟还没有胆量正面抗诉“革委会”做了许多坏事。张春桥眼前还是“红人”，虽然

陆渭文在文革中对张春桥在上海以“左派”自居，血腥镇压无辜群众的罪行，曾含沙射影地骂过他，但眼前对此只能把仇恨埋在心中。

审讯陷入僵局，磨了两个多小时，毫无结果。上午结束，下午两点再来，不过提审还是没有结果，晚上再来，一日三次“穷追猛打”。

“陆、匡反革命集团”的二号人物匡建中，此时也被关押在监狱的 06 号小监房内。一日三次，日夜审讯，逼他承认和交代“5.16”组织及“罪行”。此时才 20 岁出头的匡建中，身材瘦削、却有一种勇敢不屈的性格。他也没有承认参加“5.16”组织，更没有交代所谓“5.16”的罪行。他蔑视这些专案人员，心中明白，目前此地已无理可讲，有机会话，一定逃跑，去北京告状。有一天下午提审结束后，提审员拎着黑色的提包，扬长而去，叫匡建中独自一人回进监房。夕阳西下，四面由电网包围的看守所大院内正好空寂无人。匡建中一看机会来了，于是机灵地爬上矮屋，登上高墙，翻过带电的铁丝网……；在岗楼上的哨兵还没有来得及扣动自动步枪的扳机，这个瘦削的身材，已经跳出了十几米高的狱墙。这是从看守所建立以来从未发生过的越狱事件。监内警铃大作。荷枪实弹的部队紧急集合，立即出动，追捕这个年轻的“逃犯”。匡建中跳出狱墙后，因逃跑路线选择不当，很快被抓了回来，被钉上了一付脚镣。狱内的难友戏称匡建中“挑了一个月的铜匠担”。据说当时驻防看守所的武警的领导审问了匡建中，问他为什么越狱。匡建中说：“我是无锡市革委会委员、共青团员，我不是‘5.16’分子，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现在既没有撤消我市革会委员的职务，又没有开除我共青团团籍，怎么可以用对待处理敌我矛盾的手段把我关进看守所呢？”一席话，说得那个武警的领导哑口无言，只能说：“我们不管你们的案情，我们只管看住你们。如果你造谣的话，一定加重惩罚。”事后，他大概向他的领导问了情况，估计他的领导也说不出个所以然。结果，从此以后，站岗的武警就对匡建中另眼相看，匡建中在狱中的处境反而比以前好了。

一九七〇年初冬的一天，身为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带了他的警卫班来到无锡，在大箕山召开了“市革会”由两派群众代表参加的会议，传达了关于“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的 70 年 20 号文件——揪“5.16”反革命集团，会议紧张而严肃，坐在前一、二排的是进入革委会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每一位“代表”，的两旁隔坐着腰别短枪的警卫战士，许世友登上主席台，咬牙切齿振臂跳

脚地呼喊，“深挖‘5.16’反革命，要挖地三尺，一个不留，你们（指无锡六派）当初（指 67 年夏天）去抄我的家。（南京‘好派’和无锡‘六派’中的部分学生的擅自行动，‘六派’头头根本不知此事）现在我欢迎你们再去……”传达中央文件中非常明朗地夹带了个人恩怨的报复心理。许世友身为军区司令员，党政军财文大权一手在握，一声令下，在江苏全省范围内 64 万人受审查，血肉飞扬，尸横遍地，有多少人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人民血，孤子泪“撒向人间都是怨”，

孙维申著；《挖地三尺，一个不漏——记无锡市长达三年多的‘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的调查报告》摘录

七 0 年秋天，面上的“一打三反”似乎停顿了。可是社会上的紧张空气丝毫没有松弛下来。人们纷纷传说有更大的抓反革命运动就要来了。那可不是什么“潜伏特务组织”、“地下军”之类的小玩意儿，是利用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机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阴谋份子”。听说在北京已经把那个当年挺身而出、痛斥《血统论》的遇罗克枪毙了。再后来又有传言说中央要查清一个什么“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这是由功勋卓著的杨成武将军“操纵”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人们似乎还记得前两年在什么红卫兵小报上看到过，在那些抄来抄去的《动态》栏中曾有，公安部长谢富治下令取缔“联动”、“特动”、“五一六兵团”等首都的“保字号”红卫兵的简短消息。据说那是由一些北京的高干子女搞的秘密组织。怎么现在又要大查特查这个“五一六”了？

就在七 0 年秋冬之际，“狠批形左实右”，“狠批极左思潮，深挖现行反革命”的舆论又热起来了。在干部群众中互相传递着一个“半官方”消息，

“听说有一个中央《二十号文件》已经到省里了，马上就要大规模抓五一六反革命份子了！”

“听说参加五一六的人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干部、有工人、有学生、有解放军……秘密得很，人数多得吓死人……”

“听说这个五一六非常秘密。参加的人都规定了纪律，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都是单线联系……”

“听说我们无锡的五一六就多得吓杀人！各单位都有一批五一六……听说参加五一六的人要填一张表格……”

“听说还有不填表格的五一六。还有被别人发展进去了，自己还不知道的什么五一六呐……”

笔者当时和多数市民一样疑惑不解，既然是“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单线联系的秘密组织。”怎么各单位都有“一批”？不是“一小撮”而是“一批”啊！而且竟然还有自己都不知道就被发展进去的反革命组织……笔者回想起数月前在街头碰见那位“老运动员”族兄的话，

“这回可是无边无际了！……”

萧杀的寒风，惶惶不安的社会心态，这一年的冬天分外寒冷。只听到说，

“某某人进去了，还有某某人和某某人……”

“浦相海前天也进去了！”。

浦相海是无锡轻工业学院学生，轻院“六二六兵团”主要负责人、无锡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三个月前，在无锡市的一次公判大会上，他还代表市委和市革会作了一个照本宣科式的关于“一打三反”运动宽严政策的报告。而在无锡全面清剿所谓“五一六份子”的信号弹，恰恰就是从浦相海等人“落网”打响的。刹那间无锡全市铺天盖地刷上又一波新的标语：

“宁可瘦掉一身肉，决不放过一个五一六！”

“宁可少活十年，决不放过一个五一六！”

更有甚者是杀气十足的标语这样写着“挖地三尺一个不漏！”。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为了“政策攻心”，从车间、办公室、走道、食堂甚至厕所里都张贴了标语。走进食堂买饭，在写着“红烧肉一角五分、萝卜肉丸汤一角二分、青菜五分……”等价码的菜单的上方是一条温情脉脉的标语，

“早点交代问题，吃饭也香，睡觉也安心啊！”。

当你走到厕所小便的时候，一抬头，只见小便池上方赫然一行大字在逼问你，

“喂！你的问题交代了没有？”。

无论是谁从早到晚都生活在“政策攻心”的海洋中，除了少数“依靠对象”外，人人都变得谨言慎语、忐忑不安。

在这一片“深挖”声中，各单位都宣布正式成立“清查(深挖)办公室”或“深挖领导小组”。这些机构下面还有专案小分队。小分队队员都是从“依靠对象”中精选出来的“斗争意识最强、立场最坚定、政治上最可靠”的人。许多臭名昭著的打手都成了小分队里的骨干队员。因为他们平日里仗势欺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人往死里打，是“斗争意识最强”的典范。另外，许多在文革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专门搞材料、整理材料的人，也是各小分队的理想骨干成员，因为他们“立场坚定、经验丰富”。这文武两类人，是“挖地三尺一个不漏”、“政治上最可靠”的行动班底。

为了“联系无锡实际，引导运动深入开展”，有关当局抛出了一个《无锡五一六十大案件》。在笔者的记忆中，这个“十大案件”大概如下，

(1) 二一六、二一七反革命大游行

笔者按：一九六七年春，在无锡主要驻军单位开始介入地方时，以“反动组织”的罪名连续取缔了“毛泽东思想红艺兵”、“无线电厂 1022 兵团”等等工人和文艺界群众组织。还有更多的基层组织被勒令停止活动听候处理。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轻工业学院“六二六兵团”、二中“七五兵团”等等学生组织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举行了一场请愿大游行。次日，有十万人之众的工人组织“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及一些其他的工人组织，举行了一场更大规模但又更温和的请愿大游行，参加人数约五万余人。其中最“刺激”的口号，无非是摘自报刊文件上毛泽东主席关于军队“支左”的指示，如“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解放军要支持真正的左派”等等。二月底，这二次和平请愿游行被定性为“反革命大游行”。“红色造反总司令部”（以下简称“红总”）也作为反动组织被取缔。主要负人金坤泉（共产党员）、殷松勤（共产党员）、周炳荣等以“反革命份子”罪被逮捕。（到同年五月“红总”平反，三人被释放）。

(2) 《红无锡报》社绝食静坐事件

笔者按：同年五月，“六二六兵团”、“七五兵团”等学生组织，为抗议《红无锡报》的诋毁之词，举行静坐绝食抗议。也有工人和干部参加。约有三千人。（一说五千余人，又一说最多时达七千人）。

(3) 冲击十三个系统，矛头对准军管会

笔者按：以“二月革命总部”（由原四清工作队成员和文革工作队成员组成）和部份单位中层干部为主体的一部份人，在“红总”被取缔后，在军管会的支持下，匆匆组建了“十三个系统归口大联合”，把以原“红总”为代表的广大群众排斥在外。有些单位还迫不急待地打出“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招牌，企图造成夺权的事实。“红总”平反后，就和“六二六”、“七五”、“八一八”等学生组织，还有“机关兵团”、“红艺兵”等其他群众组织，对此提出抗议，并喊出了口号“冲垮十三个系统大杂烩！”。

（4）“假批判真保皇”制造事端挑起全市大武斗

笔者按：一九六七年五月，“红总”等组织获得正式平反，声势大振。“红总”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红代会）、“机关兵团”、“红教兵”、“红艺兵”、“卫生兵团”、以及由公安局系统的群众组织“红色公安战士”等，联合组建了“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指挥部”（革派联总）。在此同时，原来的“十三个系统大联合”，为了摆脱政治上的被动，改组更名为“无锡市九二革命串联会”。“九二”在无锡军管会当局的支持下，单方面垄断了对以原市委书记韦永义为首的十二位常委的批斗审查权。“革派联总”向军管会”当局多次交涉，当局才同意，将十二名常委从“九二”手中“借来”交“革派联总”方面斗批审查一星期。可是不到两天，“九二串联会”的“红联合会”（学生组织）即扬言革派联总是“假批判真保皇”，并冲击批判会场，企图收回十二名常委，在全市引发了一系列摩擦殴斗。军管会当局未采取有效行动平息骚乱。骚乱越演越烈。“九二”方面遂抢先备战，选择全市要害地区的工厂、校舍大楼为据点，在无锡机床厂等单位内暗中制造大批长矛等冷兵器。六月初，“九二”忽然集中各单位骨干成员到据点内，以复员军人为主体组成战斗队列编制，并发给事先早已大量制造好的长矛等冷兵器。在“九二”大集中的过程中，顺势横扫了数十家工厂企业，抢走“主力军”的旗帜、印章，打伤了许多正在上班的“主力军”工人，甚至“九二”方面还在上班的工人也多有被“误伤”。

“革派联总”方面仓促应对，也集中人员，以随手取得的铁管、木棍，和从红星刀剪厂仓库中抢得的数百把出口甘蔗刀和咖啡刀（俗称“古巴刀”）武装起来。于是爆发了全市大规模武斗。

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中，也被说成了是在“五一六”策划下的，由“革派联总”挑起的以保“旧市委走资派”、反解放军为目的的“反革命武装暴乱”。

（五）火烧装甲汽车案

笔者按：六月中、下旬，两派武斗更激烈。“九二”方面派出用钢板焊接外壳的土制“装甲汽车”，向“革派联总”人员集中的市一中至轻工业学院地区冲击，一路上向人群作 S 形挤压冲撞，并用弹皮弓、砖块石子向人群射击，击伤多人。土装甲车横冲直闯至轻工业学院门前弯曲路段，驾驶失控后撞上一棵树，倒翻在地，土装甲车起火，司机逃出，车内三人烧死。

（六）七月三日大撤退

笔者按：无锡武斗开始后，由于“革派联总”方面事前毫无准备、仓促应战，且军管会当局又明显倾向“九二”一方；为避免造成更大的被动，避免更大的流血，“革派联总”於七月三日主动撤出无锡，分两路向南京、上海退去。同时，“革派联总”派人向江苏省军管会和中央告急，欲请中央和省里来和平解决无锡问题。这次为避免更大流血而主动撤出的行动，当时被定性为“在五一六阴谋操纵下，故意撤出以嫁祸解放军，趁机反军乱军陷害解放军。”

（七）洛社武斗

笔者按：一九六七年武汉七二二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的两派纷纷抢枪进行“文攻武卫”。“革派联总”方面有三百余名武装人员进驻当时属无锡县境内的洛社镇。“九二”方面集中几个武器精良的“基干团”，以十多倍的优势兵力，按正规的作战方案，分几路急行军二十多公里对洛社发动突然袭击。这次大武斗死伤多人，沪宁铁路曾被迫中断。最后，“革派联总”退出洛社。有关当局把这次事件定性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为了乱军篡权的全国阴谋部署中的重点，血洗无锡进而夺取全苏南，以洛社为攻击出发点。九二被迫还击自卫。”。

（八）夏季阴谋

笔者按：此事是在“深挖五一六”中期追加的一个荒诞的神话。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无锡当局用种种惨无人道的逼供诱供手段制造出来的故事。大意如下，……一九六七年夏某日，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和军长左平忽然秘密召见“革派联总”当时正在上海的一位分部负责人，并出示林彪亲笔手令，命其

组织可靠人员，在毛泽东主席专用列车途经硕放车站附近时，用爆炸射击等手段谋害毛泽东主席。空四军以无后座力炮，飞机等支援行动……。由于这个神话是“发生”在一九六七年，是时林彪集团“大、小联合舰队”远没有形成。虽然王晏等人兴高采烈地把这个案卷上报邀功请赏，但因实在太荒唐，被当时的上级专案组退了回来。此“大案”搞了上千人，有人被迫“畏罪自杀”。

（九）五月暴动

笔者按：前文已讲过，一九六八年五月，为抵制无锡当局搞的“十二级红色台风”，原“革派联总”方面部份成员曾在郊区小船上商议对策。此事被定为“企图暴动颠覆革命委员会”，是“五一六企图破坏大联合、三结合和对敌斗争的全国性反革命阴谋的重要步骤。”

（十）流亡政府

笔者按：六八年初刮“十二级红色台风”时，无锡有上千名干部群众出逃躲避。其中有一部份人集聚在徐州和鲁南等地，一面避难，一面搜集整理无锡当局在“十二级台风”中的劣迹，上报中央。此事被定为“五一六集团组织流亡政府，破坏革命新秩序，企图让旧市委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韦（永义）江（坚）吴（镇）杨（增）从新上台复辟资本主义。”

靠着用这些罗织出来的“十大要案”，以及其他“要案”，如：“破坏革命的三结合，企图把走资派塞进革命委员会”。该“要案”即指六七年底至六八年初，“革派联总”方面曾经提出，按中央指示“大胆解放一把手”精神，让原市委书记韦永义参加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这也成了“企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新扶上马以复辟资本主义”的“五一六罪恶阴谋”。凡此种种“五一六罪行”多得不胜枚举。其中多有像“夏季阴谋”那样天方夜谈式的离奇神话。

总之，当时主持无锡市以及下属各级单位“深挖五一六”的人们，凭他们的如科幻作家或侦探间谍小说作家的想象力，杯弓蛇影的“对敌斗争敏锐性”，以及各式各样的逼供、诱供刑讯手段，炮制出了各色各样五花八门的“五一六案件”。特别是当时省里还有话传下来说，“（深挖五一六）网口要大，网眼要密，下网要沉，一网打尽，雷厉风行！”这又进一步促使这些人在“深挖五一六”过程中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在这样的形势下，“深挖五一六”一开始就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大面积下网了。一种由“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被推向了极端化的情绪，一种追求权力的无限满足感的心态，派性，和“案件越大越好，五一六抓得越多越好”的变态性成就感和趁机泄私忿心理，加上“火线入党，火线提干”的种种诱惑混合在一起，形成无锡市“深挖五一六”的“巨大精神动力”。无锡市当局向各级专案机构和数万脱产、半脱产以及“业余”的小分队员公开喊出了血腥味十足的动员令，

“挖地三尺，一个不漏！”

“宁可少活十年，决不放过一个五一六！”

“宁可瘦掉一身肉，决不放过一个五一六！”

“深挖、深挖、再深挖，彻底扫清五一六！”

“解放思想，深挖细找，认真排查，决不让一个五一六份子逃过去！”

“对五一六的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与此同时，还用各种“专案工作会议”、“专案工作经验交流会”等等名目来传授刑讯逼供的“好经验”。当有人提出“审查对象实在顽固，我们应该掌握什么原则？”

市革会一位主要领导人是这样回答说，

“以不打死为原则！”

而主持大局的权要人物的说法就更“通俗易懂”且更具“理论性”了。他说，

“必要时触及皮肉，是为了更好地触及灵魂嘛。”

当然在大棒的外面还是要包上一薄层温情脉脉的胡萝卜皮。他们在用刑之前总是对被审查者念上一段“大悲经”，诸如，

“你在泥坑里陷得太深不能自拔了！我们怀着火热的阶级感情来帮助你一下。”

“我们来替你加加温，让你能战胜错误的思想。”

“加温”、“帮助”成了专案小分队搞刑讯逼供的专用术语。

至于“学习班”的“校址”放在什么地方，那更是不拘一格了。诸如，旧仓库、废弃的厂房、报废的炼焦窑都能作为审查“五一六”分子的“校址”，满是积水的防空洞成了不折不扣的水牢，甚至停止使用的旧厕所都用

来关押“重犯”（指隔离审查者）。有时“全日制”班（所谓半隔离者，比隔离审查稍自由些，可在小范围内走动走动），也享受这种待遇。至于那些“班组帮助”、“车间帮助”以及“集体帮助”，则就在大食堂、办公室、车间里“加温”。总之一句话，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空间，因为要挖的人实在太多了！

用来关押隔离审查的囚室可谓周到严密，门上终日一把大锁，只有提审（术语叫“启发帮助”或“加温促进”）时、或一日三餐时才开启一次。窗上加了铁栏栅再钉上木板，再在板上裱糊上几层纸。这可能是防止蚊蝇蚂蚁之类钻进来通风报信搞“黑串联”吧。

在这样昏沉沉又空气不流通的房间里，一个人守着个没有盖子的粪桶，甚至于三九严冬、寒冷刺骨的日子，也就是在冰冷的水泥地上铺薄薄一层稻草就算卧榻。笔者就是一个人在这样的隔离室里度过了两年的“学习”生活。其他的审查对象，“学习”时间短的几个月或年把，时间长的达三年多。“学习”期的长短是根据“态度好坏”或“罪行大小”来“机动灵活”处置的。据有被“升级”到公安局拘留所的人，平反放回后对笔者说：“比起学习班来，拘留所的日子要好过多了！”

把一个人单独囚禁在暗无天日的“学习班”里长达数月，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以上，这还算不得什么。那花样百出的“加温”、“帮助”，才真正显示出“深挖”运动的取供方法的残忍性和随意性的本质。为此，有关当局还用工业生产统计的形式来及时掌握“深挖”进度和“产量”。笔者在运动进行了三年之后解脱隔离时。曾在一堆没有烧尽的字纸堆里看到一张八开大的统计表，至今还有印象。现凭记忆复制如下，

清查五一六运动进度日报表 年 月 日

突破案件数：

突破组织人数：

业余学习班审查人数：

半脱产学习班审查人数：

脱产学习班审查人数：

住单位学习班审查人数：

隔离审查人数：

发现重要线索及重点排查人数：

解脱人数：

拟报批升级审查人数：

其他情况：

这就是当时有关当局给各级“深挖”执行者们发下来，要求逐级上报“五一六”产量的一张“生产日报表”。不知当年在奥斯维辛或是在达豪的集中营是不是也用过类似的“工业文明”成果。统计学居然被用到“挖地三尺”上来了，可见其“一个不漏”决心之大和雷厉风行之气魄了！据事后原“深挖”专案工作人员说，在运动最高潮时还有特定大要案的《日报表》、《周报表》。其内容主要都是按图索骥，在各单位照所谓“无锡五一六十大案件”这个框子去统计“触动”、“学习班帮助”、“审查”等人数，以及“阶级斗争新动向”等等。在他们心目中，一个空前规模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行动的秘密团体似乎是可以用大工业方式成批生产出来的。

另外在专案组和专案小分队内部，居然也用起他们一再批判的所谓“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的那个“五一六反动纪律”，来约束控制他们自己人。如发现有人泄露内部情况，哪怕是泄露如何对被审查者施刑，或者泄露被审查者在虐待下受伤、患病等情况，也要受到轻则呵斥、重则立案审查的处理。当然这种“不锈钢加锰钢的纪律”（某工业局“深挖办”主任语），并不能完全泯灭良知；有些有道德、有勇气、而又有独立人格的小分队员和专案办人员，在他们不得不参与深挖“五一六”时，仍然会尽可能地从肉体上保护这些被审查对象。这些有良知的人们，以后笔者会讲到的。

这场声势浩大而且必须斩获“五一六”众多的“深挖”运动，既然是打着彻底肃清一个有名有姓的组织的旗号来开展的，总得要抓出有模有样的、有组织的“五一六”来才行。而且这些大大小小的“五一六”们，还必须有在公开活动之外的隐蔽罪行，才像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模样。要凭空在各单位都弄出这些“组织”、“阴谋”，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运动刚开始，的确“阻力”很大，谁肯平白无辜承认自己是什么“五一六反革命”呢？虽然各种“政策教育”唾沫飞溅，小分队员个个吼得口干舌燥，也收效甚微。有些单位主持“深挖”的领导干部，因“对敌斗争右倾，单位运动进展滞后”而遭训斥甚至被“夺去顶戴花

翎”。轻工业局革委会主任、军代表李明（还是当时市革会主任王晏同一部队的战友），就因为“对敌斗争右倾，单位运动进展滞后”而被撤职。对此，无锡有关当局也大伤脑筋。于是又召开各级专案工作会议，布置新的战术，即“重点突破，撕开裂口，扩大战果”，“加大力度，突破重点与面上展开相结合，查组织与查阴谋相结合，查动向与追线索相结合，政策教育与无情打击双管齐下……”。这些满口政治军事术语其实很容易解读，那就是一句话“狠很来点硬的！”当时有人问“加大力度要掌握什么原则？”一位市委副书记干干脆脆地回答说“以不打死为原则！”（据说这位市委副书记因和一把手王晏之间有什么矛盾，也被暗中上了“五一六”的大名单。如若“深挖”再延长个一年半载，说不定他本人也会领教这个“以不打死为原则”是个啥滋味了。）。这次各级专案工作会议迅速得到认真贯彻。在一九七一年的夏天，“深挖”运动最残忍的一幕上演了。运动中不幸死难者大多数就是在此时含恨身亡的。这时候的“加温帮助”方法也更见水平了。就事后笔者和沈静园教授等死难者家属了解到的就有二十五种样式的“加温帮助”方法。现凭记忆简述如下，

（1）触及灵魂法 A

数人或十数人将审查对象围在当中，命其不停旋转身体，由小分队员轮流凑近其耳旁高声吼叫，并辅以铁丝鞭或竹稍拨打“纠正姿势”。

（2）触及灵魂法 B

此法是上法的“改进型”，因上法全用人工“土法上马”，往往令小分队员们个个口干舌燥喉管充血声音嘶哑。故加以改进“土洋结合”，用一个或数个高音啦叭悬于被审查者头上方近处，不停地播放“样板戏”或革命歌曲中高亢的唱段。以上两法虽基本上没有触及皮肉筋骨，但其“轰炸灵魂”之杀伤力颇大，有为之休克甚至神经失常，也有人听力严重受损，引发高血压心脏病者很多。

（3）烟熏法 此法多用在盛暑时节，将被审查者手足捆绑置于门窗紧闭之室内，用湿柴草、蚊烟条加干辣椒甚至六六六药粉点燃薰烤之。

（4）“电疗”法 此法比较罕见，即将被审查者捆在椅上，用调压器联通电源和人体，忽高忽低变化电压。此法对人伤害极大。

（5）老虎凳

此法为传统古典式刑法。虽无专用刑具，但各种长椅凳或钳工台均可供“就地取材”。此法对人伤害极大，尤其是双足。有人被伤害终生不愈。

(6) 马拉松立正

这是最普遍的“加温帮助”方法，笔者就领教过几次。即让受刑者面壁直立，但不准用手触及墙壁。少则半天多则可达数十甚至上百个小时。姿势稍有不“规范”，即遭拳脚“纠正态度”。如因长时站立疲劳昏沉，即被揪住头发往墙上撞击，“让你清醒清醒头脑！”笔者本人就因马拉松立正而小腿肿胀和大腿一般粗细，而脚面肿胀得溢出布鞋园口近寸。在马拉松立正期间不许稍事休息。

(7) 三点一直线

此法大约是马拉松立正的改进型。即让被审查者背墙立正，后脑、臀部、脚后跟必须紧贴墙壁，在膝关节后弯塞进木块或砖块。如姿式稍有松懈砖块或木块掉下来，即遭痛殴并重新再来。

(8) 跑步段练

此法多施于女性，令其脚穿半高跟硬底皮鞋，在浇了水的广漆地板或磨光水泥地坪上原地跑步。地滑鞋底又硬，时时摔倒，倒地即令爬起再跑。一般都被“段练”得鼻青脸肿。脑震荡、骨折者多有之。

(9) 挂黑线

令受审查者高举手臂系于电灯开关拉线上。时间一长手臂疲劳不支，稍一松懈引动拉线电灯熄灭，即被狂斥为“你到现在还挂在黑线上顽固不化！”。一顿痛打后再重新来过。此法显系轻工系统某厂所独创，故不多见。

(10) 清醒认识

三九严寒滴水成冰、冷风刺骨时，令被审查者身穿单衣站立于室外，少则数小时多则连日夤夜。谓“帮你清醒一下认识！”。无锡汽车厂厂长，已下放苏北农村的市革会委员杨菊森（共产党员），被“深挖”回无锡。该厂专案小分队就用此法对他“加温帮助”。

(11) 站得高看得远

叠起两三张方凳令受审查者长时间站立于上。稍一失去平衡，即连人带凳摔在地上，免不了受伤。谓之“让你站得高看得远，认清自己的前途。”。

(12) 抓梦话

此为精神战法之一。即在夜睡正酣时，突然把受审查者拉起来，谓“你刚才说梦话已讲出某某事，干脆认真交待这个问题吧。”此法实在拙劣，笔者也曾领教过，虽然曾一时普遍采用。但因效果实在太差，很快就被废止不用了。

(13) 伪造串供法

此法实为诱供法之一，笔者也曾领教过。在七二年春节后某夜，笔者正被囚于隔离室中，突然隔离室的窗户被猛击出一碗口大洞，扔进一纸团，我展开一看，是另一“同案犯”“统一口径”的内容。字迹七歪八扭，显系伪造。此法虽有一些单位用过，但此法非独无效且都令专案小分队自己下不了台。后也废止不用。

(14) 踩杠子

此法亦为“国粹”古典刑法。即将人双手用一长木棍捆成十字状，令其跪下，在小腿后侧近膝弯处横放一粗长方木。先两旁各站一人，同时用手下压受刑者双手上的木棍。如若没达到要求则两边再各加一人如法实施。受刑者疼痛无法用语言描述。几经昏厥，冷水浇头醒来后重复施刑。有一女青年因之“畏罪自杀”。

(15) 阿莫尼亞醒脑法 将受刑者揪住头发脸部凑近尿桶，将火红之炭火淬於尿液上强令受刑者嗅闻。如郊区农民邵 xx 被恶臭薰得狂吐不止至喷血。

(16) 鞭鞑法

此为最常规之“加温帮助”法。唯其“教具”五花八门。有钢丝鞭，此物一抽一道血痕。后改进为橡皮包裹之钢丝，此物虽令受刑者表皮不太难看但内伤更甚。另有用机械传送带、金属链条或皮带等“就便器材”者，亦有用湿水之棕绳电线者。

(17) 拷打法

此法亦为普遍采用者。笔者就不止一次被施此法。所用刑具多种多样，诸如木棍、竹杠、椅腿、钢管、铁元等等。亦有在钢管铁元外包一层橡胶或数层布料，以免受刑者表皮伤痕太触目，显得“太不讲政策了。”其实躯体所受内伤更甚。

(18) 滚水泼面 此法不多见，受刑者满面燎泡混身烫伤发炎经久，甚至终生留下疤痕。

(19) 清醒头脑 此法十分普遍。即揪住受刑者头发连续撞击墙壁卓面，少则十数次多则上百次。谓之“帮助你清醒一下头脑。”。

(20) 巴掌雨

此法更为普及且简便易行。据悉亦用来“考验”小分队员是否“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笔者多次领教此法。有一次受“教育”后，头肿如斗，脸部淤血肿胀，全呈清紫色伴以多处发炎麻木无丝毫感觉，久久不得痊愈。

(21) 饥饿疗法

此法几乎每个受审查者长期领教。每日仅给一两粥二两饭，副食几乎断绝。更有连续两三天断绝饮食者。小分队员谓之“饥饿疗法，用来治你的思想毛病”。

(22) 电化教育

七十年代无锡只有少量钢丝录音机，当局悉数征用。将已被“突破”者的所谓“坦白交待》录下，然后在各“学习班”内播放，并辅以各种“加温”手段，强迫被审查者按录音内容写供状或揭发别人。此法在“夏季阴谋案”等案中用得最充分。

(23) 车轮鏖战（简称“车轮大战”）

此法最“文明”。即由被审查者坐在小木凳上，由两三人一组之小分队员轮流在耳边大声“教育”。每隔几小时换一组小分队员，昼夜持续不得稍缓。每当被审查者昏沉欲睡时，或是捶桌子、或是揪头发、或是踢翻其坐的木凳使之重重跌倒在地。此法用得极其广泛，笔者曾多次经历，长者达百多小时。原“拱北楼”餐馆职工、“星火战斗队”负责人、“红总”发起人曹桂宝先生（笔名卜岩），有一次曾被此法连续“鏖战”十三昼夜！此法对人的伤害绝不比那些血淋淋的肉刑稍轻分毫。

.....

由于当时所记录资料散失，且又时过三十年，原记录之二十五种“突破”用刑法中有几种已无法回忆起来了。其实，当时小分队用来“突破”之法又何止二十五种啊！

另外还有一种更恶毒的“突破”法，那就是把一些全市重点审查对象中已被“突破”者的讲话，用钢丝录音机录下，而后到各学习班播放，迫使被审查

对象按录音机播放的内容和口径来交待。这样一来，互相佐证咬得死死的，假案就成了铁案……

无锡市有关当局，一方面抓紧再抓紧各级专案班子的“内部纪律”，一方面又有意无意地把各式各样“突破”、“加温帮助”的残酷方法透出风来，甚至顾不得“严格掌握政策”这块遮羞布了。有的单位甚至在大会上公然吓唬群众说，“讲政策要看是对什么人？对那些死不承认，死不交待的顽固份子，首先是要讲斗争，讲打击。你要抗拒，我就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得！不怕撬不开你的嘴……”。以此造成笼罩整个社会的恐怖气氛，即他们自己津津乐道的所谓“高压态势”。个别单位为了达到这个“高压态势”，疯狂到公然行凶的地步，某厂年仅二十四岁的工人孙金生，就是在光天化日下被活活打死的。

多年后一位专案小分队员很沉痛地告诉笔者说，

“……（七一年）五月底六月初，因为面上突破进度缓慢，市里抓得紧，上面传下精神说，讲政策是为了斗争的需要，不能为了讲政策而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对敌斗争是第一位的，决不能心慈手软……要雷厉风行打开新局面……小分队人人都要批右倾思想，个个都要表决心。所以学习班内外都打得更凶了……”

这个以“高压态势”来“打开新局面”果然让有关当局喜出望外。“五一六份子”以几何级数暴增。学校、科研院所和某些机关单位中的“五一六”往往是高达全员人数中的百分之八、九十，东门外的一所“职工子弟小学”，从校长以下全体教职员，甚至连门卫和烧开水的老校工百分之一百都成了“五一六”。

这个“面上突破”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在文艺单位尤显突出。如无锡市歌舞团的舞蹈演员项国良正在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担任男一号角色洪常青，当他在台上完成了这个英雄形像来到后台，还没来得及卸装，甚至观众席上掌声还没断，就被专案小分队用种种精神折磨的手段进行“加温帮助”。人们说他是“台上是革命英雄，台下是反革命”的“阴阳人”。

工厂企业的“五一六”百分比虽然较之上述“上层建筑”稍低，但总人数却位居第一。农村的“五一六”也十分可观。因“教室”奇缺，有些集体牛栏猪舍也被充作“学习班”用。

另外，部队也决非世外桃源。驻无锡的各个兵种、各个单位也都揪出一批“五一六”。其中尤以军事科研单位（如总字三〇八部队，海军一〇一舰艇实验基地）等为甚。关于部队的“深挖”详情，由于军队的特殊性，加上消息严密封锁，地方上很少有人知道。只是在专案组或小分队员在得意忘形之际和恫吓人之时透出一点风来。总之在无锡地界上，有关当局是决心要“不论文武官员军民人等”来一个兜底翻。许多“运动骨干”也趁机发泄派性，打击报复。江苏省荣军休养院内的从抗日战争到朝鲜战场中负伤的残废军人，有的战功屡屡，有的还有相当高的级别，也无法幸免。

（续五）

运动刚开始的近一年光景，在“抓言论”上，是本着“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彪）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条为标准的。有的人就因为谈论间不小心议及林彪的秃头，就被作为“五一六”揪了出来。在学习班内，也把“疯狂反对林副统帅的言论和行动”列为重点进行刑讯逼供。因此，当“九一三”事件突然爆发时，无锡当局一时手足无措。他们一面面对被“隔离审查”的人严密封锁消息，一面匆忙“调整”案由方向，把一切作为“五一六”的所谓“案情”都从“刘、邓、陶”改挂到林名下。而后再按这个新的方向“深挖”，以至弄出了“夏季阴谋”那样荒唐的大案。“九一三”事件爆发后，专案组和小分队内部的思想混乱。为了要继续深挖“五一六”，有关当局首先是要稳住这些人。他们用诸如“同志们不要感到奇怪，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手法既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也有故意假装反林彪来迷惑人心的。我们不要受表面现象干扰。前阶段的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显著的……应该结合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来进一步推动深挖五一六运动……”。为此他们还编造了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理由，来解释这场“深挖运动”中在林彪问题上的前后矛盾。例如“这正是运动的策略之处，先把下面的大小小爬虫爪牙和社会基础挖干净，再动到林彪，所以先要迷惑林彪一下。”可是人们私底下不免要议论，“林彪远在北京，要你在无锡花了吃奶的力气去迷惑吗？”“口口声声说是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部署指示执行的，究竟是毛主席还是什么人部署要这样做的？有什么文件指示说明这是中央精神吗？”莫说是许许多多市民了，就是一些当初对运动意义深信不疑的专案

工作人员和小分队员也开始动摇了。据一位某局“深挖”办公室材料组负责人后来对我说，

“……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我们参加办案的工作人员思想上引起了很大动荡。运动没法开展下去了。有人向上头要毛主席关于运动的相关指示。有人问我们无锡这种搞法是不是符合中央精神？还有人问运动要不要搞下去，怎么搞……后来上头拼命强调内部纪律，硬是把深挖五一六运动结合揭发林彪集团这个调子给定下来。为此，有一些对这些做法提出质疑的专案工作人员还倒霉……”

的确，王晏等权要不知为什么原因就是拿不出理直气壮的“合法依据”。虽然靠着手握的生杀大权及所谓“纪律”，用“结合揭发林彪罪行”这一移花接木的把戏渡过了这场不大不小的危机，得以让庞大的“深挖”机器继续运转。但其底气大为虚弱，而且为他们日后埋下了更大的政治危机。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在法纪废弃的年头里，往往只要能抓住毛泽东主席的一句或是中央某个人一句话或是一个批示，就能用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及合法性。可是王晏等权要为什么连这点都那么难办呢？这里面究竟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或是难以启齿的隐情？笔者和绝大多数过来人（包括一般专案工作人员和小分队员），迄今没能见底。在当时“深挖”稍微迟滞了那么个把两个月，又按王晏等人重新定的调子，继续“向纵深发展”。虽然底气不足，而且手忙脚乱，又要重新“挂后台，挂背景”，弄得更加不三不四。这些权要们硬着头皮还要往下搞。因为运动一旦停顿下来，他们自己的麻烦就来了。

到了一九七二年春末，“深挖”已面临新的问题。一是这场前所未有的大挖掘一上来是“目标清楚方向明确”，也就是用所谓的“无锡‘五一六’十大案件”为主线，带动“其他各式各样大小案件”，并在挖“案件”的同时大挖“组织”。可是随你怎么“突破”，用尽了刑讯逼供之能事，搞了长时间的所谓“政策攻心”，而且公开宣布了什么“只要有两个以上的旁证，哪怕你死不承认照样定你的案！”之类的“定案法则”，就这样用暴力加恐怖搞了两年，却定了一个案。其中尤以面最广量最大的“五一六组织问题”，更是令当局倍感头痛。因为原来当局不知依据什么规定宣布过，凡参加“五一六”组织的人，“有填写表格者，有口头发展者，有被别人发展进去自己还不知道者。”。可是就凭这么

无边无际的定案条件，还是定不了一个“案”！多年后一位参加过市“专案办”工作的军官告诉我，

“……那时候上头要求抓紧定案，为这事王政委（王晏）急得很！搞了两年还定不了一个案那还怎么交待？说是有两个以上旁证就能定案，可是弄上来的材料五花八门。光说五一六的表格弄来几万份交代材料，没有两张一模一样。有的说是油印的，有的说是铅印的，还有红黑双色套印的呢！有的是大八开张，比入党志愿书还详细，有十六开，有三十二开，最小的只有一张发票那么大。表格的名称更是各不一样。有的叫《中国五一六兵团登记表》，有的叫《革命五一六战士登记表》，还有叫《某某厂五一六战斗队 登记表》，还有更干脆的叫《五一六秘密地下战士登记表》，反正什么花样都有……再怎么深挖细找也弄不到一张标准的五一六表格，更不用说是表格的原件了……”

深挖“五一六”运动一开始，有关当局就毫不遮掩的采用依靠一派（九二）打一派（革派联总）方针。可是现在别说是“挖地三尺”，就是挖地三丈也弄不出什么新花样来了。为了摆脱贫长期定不了一个案的被动局面，也是为了堵住社会舆论，显示自己“没有派性”、“公正无私”，王晏等权要又开始寻找新的“矿脉”以持续其“深挖”事业。因为一旦停止这个“深挖”大工程，他们自己就岌岌可危了！于是他们又放出风来，什么“五一六不仅是在一派里，另一派里也有的”，“红色政权（市革会）领导班子里还有埋得更深的定时炸弹！”云云。首先是市委副书记、市革会副主任马健（是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市革会成立时第一个被“解放结合”的原市委领导干部）奉命带领一个工作队到远离市区的川埠煤矿去“抓革命促生产”。白天是马副书记领导工作队从事各项工作，天一黑工作队员一个个都成了小分队员，而马副书记就成了被“加温帮助”的审查对象；次日天一亮，惊恐疲惫不堪的马副书记又要一本正经地领导那些从小分队员变回来的工作队员，从事各项日常工作。周而复始，当上了个“阴阳人”。

王晏等人为了继续“深挖”的需要，也因为一些权力分配上难以抹平的矛盾，开始对和他们数年来“生死与共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也下起手来了。首先是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密捕了一个原在“九二”总部的女工作人员。紧接着又以各种借口抓捕了原“九二”方面的几名成员，并开始在暗中搜集整理一些“九

二”主要成员及其“高参”们的材料。如市革会副主任周锡林（机床厂工人“九二”总部负责人）。邹海根（市革会副主任，无线电技校教师）等等。

其中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王晏在部队里的老战友、转业干部、市委副书记、市革会副主任、将近两年以来也曾参与全市“挖地三尺”领导工作的董万华先生，也因他是“九二高参团”成员之嫌被列入了待查的黑名单。

这场“窝里斗”的闹剧，也波及到一些中层和基层。或是权力分配上的矛盾、或是为了“出新成绩”、或是为了免于被动挨打来个“先下手为强”，那些原先一同起劲“深挖”的人们，也互相间下起了手。笔者就遇到过这种怪事。笔者被隔离审查一年有余之后，有一天，领着小分队全程对我“加温”的厂革会副主任有事外出。难得见到的厂革会一把手忽然来到囚禁我的小屋，先讲了一番“运动要向更纵深发展”的大道理，然后就露骨地要我提供那位副主任的材料。一把手走后没多久，那位副主任回来，得知此事，一面告诉我“千万不要胡说啊！”，一面大发泄对一把手的不满。也许是因为我没有说什么不利于他的话，当天晚饭居然吃到了一小碗久违了的红烧肉……，如是情况，事后知道不少单位都发生过。

由于全国和江苏省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王晏等权要人物这个“纵深更纵深”的“深挖”还没展开来就陷于停顿。否则无锡市六十五万人，不论男女老少军民文武，百分之九十九都要“一个不漏”地“深挖”殆尽了。！

少数权要人物拼命“深挖再深挖”的后果，一方面是残害了广大市民，引起了无法遏制的公愤，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各级“专案办”“小分队”不少人的质疑。特别是王晏等人的手开始触及本是作为“深挖运动”基本力量的原“九二”一派人员时，那些把持上上下下“党、政、财、文”大权的人，或是恍悟到这场“挖地三尺”大闹剧的荒谬，或是深深的危机感所致，也对王晏等人切齿痛恨起来。这实际上动摇了王晏等人不可一世“坚如磐石”的权势基础，等于王晏等人在自己屁股下埋了一颗颗定时炸弹。

在这场大浩劫中各级专案工作人员中，有一些人出自一个公正直的良心，站起来进行不同方式的抵制。他们有的暗中给受刑致伤致病的“五一六”送来药品；有的偷偷地给被罚挨饿的审查对象塞上几个馒头烧饼；有的被派搞定案

工作的总以“不合规范，不合标准”等原因拒绝按权要们的尺寸来“定案”；有的给审查对象家属暗通消息。更有人冒着极大的风险通过极其曲折的渠道向中央反映实情。这些人有干部、有工人也有现役军人。其中最勇敢也最令人惋惜的是崇安区一家小小区属企业“振华染厂”的一位姓顾的青年工人（可惜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他原是驻青岛某部的战士，在“一打三反”时复员回无锡。因政治条件好，当然被当作骨干。因为他公开斥责学习班中严重的行刑逼供手段，遭到了残酷的迫害，最后把这个正直善良的青年逼疯了，断送了他一生的幸福。类似发生在专案组和小分队里的法西斯式的“内部整顿”并非只此一桩。

七三年底到七四年初。当时“深挖”虽已是强弩之末，但少数权要人物还要强自镇定加强控制。他们为“眷出牢房换新囚”，把先前关押多时的一批审查对象以各种名目放出了“学习班”，改为“边劳动边审查”；把那些从苏北等地揪回来的下放干部，插队知青，已毕业分配的大中专学生放回原地。这些措施名曰“降级审查”。虽然“降级”了，仍派专人严密监视，并会同其家庭所在地监督，随时互通“阶级斗争新动向”。可是权要们越怕这个“新动向”，“新动向”就越来越多。随你在车站码头要津明岗暗哨严密盘查，但一个又一个“五一六”逃出了天罗地网，通过不同渠道向中央送状子。其中尤以残废军人、前志愿军某部参谋、某中学英语教师周海泉的出逃，更具传奇色彩。这个连走路都很困难的老汉居然化了装，在细雨霏霏的日子里，靠着友人的帮助，从乡间小道潜出，甩脱重重追捕，成功地演出了一场《胜利大逃亡》。这事令王晏气极败坏七窍生烟！他在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上拍案狂吼道，

“……五一六翻案风嚣张到极点了！一个老跷脚居然大白天就在眼皮子底下楞是给溜出去了。这还了得……”。

除了本市的市民，外地人也有向中央或各自所在部门反映无锡市“挖地三尺”无法无天倒行逆施的种种恶行。例如外省某部的一位军官，出差到无锡，正好看见青年工人孙金生已被殴打得奄奄一息了，小分队员们还不肯住手。这位军官好言劝阻，反遭到围攻和非法扣押，这位军官毫无惧色义正严辞继续指责他们的行为，终因其是军人身份，又系外省驻军，只能放走了事。这位军官回去后立即通过军队系统上报此事，并在两年后政策复查时为此事作证。他维护了军人

的荣誉和尊严。他的事迹在百姓中普遍传颂。可惜事过三十年了，他的姓名已记不起来了。

到了一九七四年初，这个笼罩在无锡上空的大铁盖再也捂不住了。小小的钢球厂工人们首先发难。他们勇敢地贴出大标语质问当局，“深挖五一六究竟镇压了谁？”这下子不啻是在无锡上空响起了一声炸雷！权要们慌了手脚，王晏等人急忙召开各级会议统一口径。诸如什么“深挖五一六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有文件有批示，深挖的大方向不容怀疑。谁要是抓住一点点细枝末节不放，就是为阶级敌人翻案……”。而且要各级组织“……认真观察阶级敌人新动向，五一六翻案风在哪里一露头，就在哪里狠狠地把它打下去……”。可是这股怒火万丈的“翻案风”再也压不下去了……

（四）一风吹去是是非

叶剑英元帅怒斥道，“……搞清查（五一六）逼死那么多人，搞了那么多干部群众，还讲什么大方向？，……无锡有个支左的干部，搞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乌龟壳壳，你搞这个壳壳是用来对付谁的？”

正当权要人物拚命东堵西补为已陷入绝地的“挖地三尺”打强心针的时候，一向被王晏视为得力可靠的市革会报导组和《无锡日报》编辑部一批年青人冲出来了，而且还带动了一部份机关人员和共青团组织，矛头直指王晏等权要人物。主要内容是揭发王晏等人与林彪的关系，并且把“挖地三尺”着重提出来列为王晏等人一大恶行。他们指出王晏等人搞的“深挖”那一套根本没有政策法律依据，并指出这是蓄意残害人民。接着又有许多政宣理论界人士也纷纷站出来揭露这些权要的言行。这是王晏等人始料不及的“奇兵突袭”。因为这些政工宣传一条线的秀才们，既不是受尽折磨的审查对像，也不是那些为了权力分配上的矛盾如今已反目成仇的昔日“亲密战友”，而是为了公民的良心站起来公开向王晏等人叫板的“半腰里杀出来的程咬金”。权要们心里的惊恐仓惶已不可名状。他们一方面密商对策，派人到邻近城市去打探形势；一方面竭力上下统一口径，还想修理已分崩离析的“心理防线”。可是如今整个城市都站起来向他宣战了。就是一些原本死心塌地跟着他们起劲“深挖”的人，眼见大势已去，当然不肯当他们的政治陪葬品。陷入“孤家寡人”境地的少数权要情急之下又干出了一件大

蠢事一一偷偷涂改市委常委会议记录，这可是破坏重要档案的大事啊！这事很快被市委档案保管人员揭发。王晏、张文治被停职审查。全市一片欢呼声起。

几乎就在同时，“挖地三尺”的受害者们在越来越大的声讨揭发的基础上，自发地在城中公园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控诉大会。会后群众涌入市委并提出了几项要求，

(一) 市委必须明确态度，彻底查清“深挖五一六”的问题并向全市人民作出交代。

(二) 市委必须给所有被屈打成“五一六”的干部群众平反，及时落实政策、赔偿损失、医疗伤病。

(三) 对那些在“深挖”中行凶打人、致死致残、民愤极大者交付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四) 现尚因被“五一六”罪名尚被关押的人应予立即释放。对前此在“红色台风”“一打三反”中被拘压的市革会委员匡建中，原“红总”中心组成员陆渭文二人应按“有罪定罪，无罪释放，错了平反”的原则立即解决。

当时市委常委们的答复大体如下：

“……王晏、张文治破坏清查（此刻不叫深挖叫清查显得文绉绉了），搞了扩大化，打击了很多干部群众。市委支持同志们结合“批林批孔”狠批“克己复礼”，揭发批判王晏、张文治的问题。关于平反的问题要慎重，不能搞一风吹，要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漏掉一个坏人。关于在清查中违反政策打人的事，同志们应从大局观念出发，按毛主席“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一原则出发，不要纠缠在这些事情上，搞好团结共同对敌……”

关于陆渭文、匡建中等尚在押人员的事，常委和请愿群众间是以一种“个别人对个别人”的非正式交谈方式许诺释放，并约定次日下午释放陆、匡二人。虽然尚有许多问题令群众困惑不满，但群众还是接受了这个并不太满意的答复。谁知这是一个缓兵之计。仍在市委掌握大权的一些人，因为过去和王晏、张文治等人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在“挖地三尺”中更有摆脱不了的干系。如果对“挖地三尺”问题进一步清算下去，全部真象一旦水落石出，他们自己在政治上和道义上也要垮台。为此，必须压下群众这股势头。他们匆忙召开常委紧急

扩大会议，也没有任何可资作为依据的定案材料，“讨论”了半个小时就“决定”了陆、匡二人的性质为“现行反革命”。

笔者按：陆、匡二人早在一九六九年底就以所谓“分裂市革会、阴谋暴动”的罪名被关押迄今。在“深挖五一六”时又是“夏季阴谋”的顶尖“要犯”。在“深挖”中以与陆、匡有染而被株连的人数以万计。在市委和市革会内的某些“王晏后时期”的新权要人物，以为只要把陆、匡二人揪在手中，就等于在市民头上重新祭起了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群众对此提出质问，市委一名常委连哄带吓地“解释”，以下就是当时对话的内容：

群众：“为什么王晏花了几年的功夫都定不了他们的案，而你们上午只用了一支烟的功夫就定了案？”

某常委：“同志们应该相信市委，现在不是王晏那个时候了，我们定案是很慎重的。这关系到人的政治生命嘛。”

群众：“既然是慎重，你们又怎么能一下子就忽然定下案了？”

某常委：“这个问题正说明王晏的问题，他是有意拖延混淆敌我界线。”

群众：“你们定性定案是依据什么材料？是王晏、张文治搞的《无锡五一六十大事件》里的那个《夏季阴谋》的旧案卷吧？”

某常委：“怎么，你们莫非是怀疑市委吗？怀疑一切是不对的，那可是极左思潮，是刘邓，陶铸和林彪的那一套啊！小心上当犯错误啊……”

群众要求他公布材料，他却含糊其词说“以后会公布的，大家不要纠缠在这个问题上让阶级敌人和一小撮别有用心者乘机兴风作浪！”云云，借口有事扬长而去。

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行为，让群众清醒地认识到这个“王晏后时期”的市委里，还游荡着王晏“挖地三尺”的影子，要靠恩赐得到平反只是一场春梦，只能靠自己来解放自己。新一波揭露“挖地三尺”种种罪行的高潮又兴起了。这些血泪控诉更激发了市民的愤慨，

……工人孙金生被公开毒打致死的惨状……

……中学音乐女教师张 xx，和丈夫沈静园都被各自单位抓到“学习班”里。家中只撇下年幼无人照料的五个儿女，他们眼巴巴地望着父母回来，却得到慈母惨死的噩耗……

……工人高兴大被用铁管猛击后吐血身亡，撇下了七旬老母和结婚不久的妻子……

……已毕业分配的女学生 xxx 被“深挖”回来，由几名彪形大汉轮翻“踩杠子”，实在不堪忍受，自杀身亡……

……工人沈 xx 被酷刑折磨得死去活来，半夜里撬窗出逃，力竭倒在农民的菜园地吐血不止身亡……

……工人孙汝济（笔者哥哥），自七一年一月先我两个月被关进“学习班”，经常被小分队“加温”刑讯。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四日高温闷热难忍，却故意关在一个密不通风的地下室内“清醒头脑”。他被折磨得口吐白沫语言困难，几次要求出来透透气都遭恶声叱骂，终于喷血身亡。后来连骨灰也被有关当局扔到不知何处。此事令我母亲终生痛苦至死不能释然。尸骨不知去向者远非这一桩……

…陆渭文的妻子张 xx 因实在不堪毒刑，撇下孤苦零仃的一双小儿女，投身古运河……

无锡钢铁厂厂长张养生，他的妻子张荣沁已在“红色台风”中被活活打死。他本人又惨死在这次“深挖”中……

……工人高 xx（复员军人）从“学习班”放回家中一月有余即伤势恶化不治而亡……

……老工人、共产党员刘金根夫妇二人都惨死在“学习班”……

……会计陈 xx 什么组织也没参加，是个标准的“逍遥派”。只因不肯违规替某些掌权者胡乱报销，硬被抓进“学习班”当作“五一六”毒打，最后饮恨身亡……

农民蒋 xx 被小分队长时间吊打，大小便失禁，放下来不多时气绝身亡……

笔者当年和沈静园教授等死难者家属曾调查过数十位死难者的情况。由于种种原因，笔者原记录的一包资料已不知去向，这是我终生大憾！

除了死难者的种种惨状外，生还者伤痕累累病痛缠身的不堪遭遇，更是不胜枚举！有而因儿女亲人身陷“学习班”气竭而死的老人，有因配偶被“深

挖”本人又被强迫“划清界线”不得不离异者，诸类家破人亡的事更是如恒河沙数……

例如原市委常委田洪，多年倍受折磨。笔者七四年底去看他时，只见老人双臂疤痕遍布，那是被施刑者用办公用的钉书机钉的……

……原市委常委吴镇，他的妻子常铃医生已惨死在“红色台风”中，本人多年被关押折磨。在刑讯中，他说了句“我所说的都是实事求是的”为自己辩护，就遭小分队痛斥：“你有什么资格实事求是？只有我们才有资格实事求是！”为此，吴镇先生遭到了这伙连“实事求是”都要垄断的好汉们更残酷的“加温帮助”。良知被颠倒错位的事太多太多了……

原市悉委常委张再生被残酷“加温帮助”实在不堪忍受跳窗逃跑，腿骨折断终生残疾。

当群众的揭发越来越旺的时候，市委和市革会掌实权的人，也在那里层层设防。他们一方面在大小会议上公开宣称什么“当前的重点是狠批克己复礼，联系本市阶级斗争的实际，揭发批判王晏、张文治忠实地执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警惕有人用清查（五一六）的问题冲击干扰当前的大方向……”。另一方面，他们对全市广大群众强烈要求落实政策认真平反的呼声，则推诿说“清查（五一六）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央发了文件，二十号文件是有批示的，由于王晏、张文治推行林彪极左路线，搞了扩大化伤害了一些干部群众。我们市委常委抵制不力也该深刻认识引以为诫。不过落实政策不能搞一风吹，那样是会漏掉一小撮阶级敌人……”

社会上也放出一股阴风，说什么“……为什么陆、匡二人不放？说明被搞到的人还是有反革命，不是五一六也是个五一七……别看有的人现在闹平反起劲得很，哭的日子在后面呢！现在是为了运动需要，让他们再跳跳，再暴露暴露……”

当然他们也在基层装模作样搞了一些“试点落实政策”。找人个别谈话，将以前几年搞的几尺高的案卷一张张“核对事实”。然后给一张盖了大印的纸头，上面写着，

“……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经人揭发对 xxx 同志进行审查，现已核查清楚 xxx 同志没有参加五一六兵团，现根据政策予以排除……”。有的还加上什么

“……该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行。希该同志认真汲取教训，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和组织的审查……”

这样的“落实政策”，分明就是说，“你虽然不是五一六，也是个五一七、五一八。搞了你还是不错的！”正当无锡市有关当局以“大方向正确”“不能一风吹”等等强词夺理的“道理”来坚守“挖地三尺”的生命线时，市民们也以更深入的调查揭露并上书中央，来争取得到一个公正的裁决。在此期间我和沈静园教授又知道了一些尤其令人发指的禽兽恶行，那就是利用“深挖”之便强奸女的被审查对象。如一位女工在被“加温”两天两夜精疲力竭之后，被看守她的小分队员趁她昏沉之际强奸。又如一个女护士也是在类似情况下，被工宣队小队长和两名队员轮奸……如此兽行，一般受害者都羞於启齿。我们核实到的三件都是其丈夫或父母口述。鉴于对社会习俗压力的惧怕，基本上都不敢公开揭露。故而那些禽兽都能逃脱法网。其中只有一个工宣队长，是驻在某单位领导“深挖”的“专案办公室主任”。他邻居一对夫妻都被“深挖”进了学习班，家中只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那个禽兽不如的队长竟在半夜里翻过房顶穿窗而入强奸了可怜的女孩。兽行过程中惊动四邻，被邻居发现扭送居委和派出所，一直被有关当局包庇。直到此刻，由于民愤太大，市委才拿出了一幅“比王晏公正无私”的面孔，给这家伙判了六年徒刑。（笔者按：当时强奸幼女是要判死刑或死缓，起码也是个无期徒刑。）这个六年徒刑还是用“内判”代替公判。显然是“三娘教子”式的“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在儿身痛在娘心”般的处分。

沈静园教授和我曾为要求惩办凶手的事去找一位市委副书记，那次谈话我在近三十年后记忆犹新。下面就是那次谈话的情况，

问：“x 书记，那些在运动中行凶致人死亡的凶手，难道不应该依法惩办吗？

答：“这个问题嘛……要从路线的高度来看，要知道那些打你打得最凶的同志，其实心里最热爱毛

主席……这个你们这个这个要有认识。”

问：“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只有林彪才说什么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x 书记，现在批林批孔，你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啊？”

答：“同志们，你们怎么还不能站在路线高度看问题啊？这样很容易迷失方向上当受骗，到时候犯了大错误后悔可就晚了！像王晏就是个活教材嘛。”

问：“x 书记，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个路线问题吗？”

答：“这个……这个你们想想，这个二十号文件可是中央文件啊，上面还有批示。所以我们市前几年搞的这个清查，大方向是不错的，出了一些偏差嘛。总不能搞翻烧饼。”

问：“x 书记，你说的这个中央二十号文件的完整文号是什么？是中发（中共中央颁发）还是什么中央部门发的？”

答：“这个……这个好像不是中发。文件是发到省军级，我也是听传达……”

问：“谁批示的，是毛主席批示的吗？批示内容是什么？”

答：“不是主席批示的……反正中央领导好像有一个批示……我现在记不清，不能随口乱说……”

这句话令我和沈教授不胜惊讶。按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如果有毛泽东主席的批示，那是最过硬的合法依据，x 书记尽可理直气壮讲出来的。看到他一副窘迫之状，我们又提出另一个问题，

“x 书记，那二十号文件上有没有说可以打人，可以把人打死打伤了不负责任？”

这句话可能是触到 x 书记的痛处，他悖然大怒道，

“你们还是要死死揪住这个什么打人啊，什么凶手啊的问题不放！照这样搞下去，今后再有运动，谁还肯出来当积极份子运动骨干了？”

说毕他抛下一头雾水的我俩，拎起公文包悻悻而去。原来 x 书记是怕打手杀人犯绝了种，以后再搞什么“挖地四尺”、“挖地五尺”就缺少了“积极份子”、“运动骨干”了。可是他还是没说出《二十号文件》的子丑寅卯来龙去脉啊……

当时市委为了避开在“挖地三尺”这个头痛又被动的局面，就以当时正在全国自上而下的“狠批克己复礼，批判林彪、孔老二反革命复辟”（批林批孔）为由，要大家“紧紧抓住大方向不动摇”、“更深入地揭发批判王晏、张文治等人贯彻林彪修正主义的问题”。一大批按照当时所谓“权威写作组”口径的“大

批判文章”冒出来了。群众对官方组织的言之无物的“高射炮”（即空对空）的“运动八股”十分反感。尤其是有些所谓的“揭批”大字报津津乐道一些“隐私”、“绯闻”，更引起普遍反感。不过有一些揭发权要人物们奢靡生活和损公肥私丑行的大字报倒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例如

一九七二年初正值“深挖”进一步引向高潮时，农历小年夜下午在市人民大会堂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会上，权要们在声嘶力竭要全市进一步“深挖”再“深挖”决不动摇云云之后，号召全体与会干部说，

“祝同志们过一个简朴又快乐的，革命化的春节！”

会议一散，权要们跳上小轿车直奔太湖饭店去过灯红酒绿、山珍海味的“革命化春节”。又如，他们每次去太湖饭店等涉外宾馆“革命化”时，往往总要开上几瓶名酒“提提精神”，尤其爱喝特供外宾华侨的“茅台”。为此，竟想出了“偷梁换柱”的绝招。把茅台瓶中之酒倒出来享用，再用别的酒注入空瓶去应付外宾华侨。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叫“外宾头上刮点点，内宾肚子里补点点”。这种“鼓上蚤时迁”的把戏偶而被一老华侨撞见，影响十分恶劣。他们却不以为然，照样时不时去涉外宾馆“革命化”。三十年后为举国上下痛诟的“几十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歪风，他们早已“超前化”身体力行了。

又如，当时无锡无线电五厂开发出了一种“小六管”袖珍半导体收音机。这种可以放在衣袋里的灵巧玩意儿，如今在地摊上多得数不清。可在七十年代初就像现在的什么 GPS 卫星定位仪一样稀罕！权要们居然以“试用”之名成箱成箱私分了。

又如，当时无锡纺织业开发出了多种棉毛化纤混纺面料。在那个每人一年凭票供应几尺布的年头里，这东西穿在身上，那感觉更胜如今的什么国际名牌服装。权要们居然也以所谓“出厂优惠价”甚至干脆一文不付，就成捆成捆地“试穿”。

此外，机关干部们还揭发出了少数权要们严重违反规定擅用高档药品的行为。如当时严格控制使用的进口“白蛋白”针剂，权要们动不动就当成“滋补品”使用。须知在外汇奇缺的年代，这种进口药的价值超过现在的什么“美国伟哥”“印度神油”等等“壮阳神药”的几十倍！

再如在什么都要凭票供应的商品奇缺的年头里，一般人结婚都以“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加一台木壳闹钟）及“三十二条腿”（一堂家俱的木腿总数）为最高标准。权要们却能以各种名义时不时弄到十几立方米的上等木料，四时八节鲜鱼活虾肥蟹不断，自己吃还不算，还用来巴结上司或分赠亲友收买亲信……

这些丑行被曝光，也使市民进一步认清了，这些道貌岸然权倾一时的大人物，一方面是对老百姓的“挖地三尺”血腥手段，另一方面是穷奢极欲地侵吞国家财物。

但是“王晏后”市委中某些权要人物搞起的这个“紧抓大方向”把戏，却又开始越出了他们的既定方针。许多揭发“王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大字报，已开始触及到他们自身。而对“深挖五一六”问题的控诉声讨依然一浪高过一浪。虽然他们还竭力用“大方向正确”“不能一风吹”等来拖延，拒绝为广大受害者平反。但是已没有多少人再听他们这一套了。就在这时终于经过层层传达，人们听到了时任军委常务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代表中央的重要讲话。叶剑英元帅愤怒斥责道，

“……搞清查（五一六）逼死那么多人，搞了那么多干部和群众，还讲什么大方向？……无锡有个支左干部（应是指王晏），搞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鸟龟壳壳（意为独立王国）！你搞这个壳壳是对付谁的？……”

叶剑英元帅在讲话中虽然只点了王晏，但是也给那些起劲地用“不能一风吹”、“大方向正确”以拖延时日保住“挖地三尺”这块通灵宝玉的人当头一棒。特别是搞了那么多年，关押刑讯了那么多人，死难病残那么多人，株连者就学、求职、参军，提干升职受到影响乃至社会生活中严重被歧视者不可胜数。民愤实在太大了！如今叶剑英元帅的讲话，又完全剥夺了其“有文件、有批示，大方向正确”的所谓“合法性”。特别是无锡当时曾宣称搞出了那么多“五一六”，可是实际上一个货真价实的“五一六”也没有（据悉江苏省搞了百来万人，最后也是一个“五一六”都没有）。这和当时刚刚颁发的，虽然有严重错误的《文革宪法》也严重抵触。他们深知再拖延下去，眼看就要陷入没顶之灾，手下的打手杀手们更是难逃法网，必需搞个“金蝉脱壳”法术逃脱难关。

于是一夜间这些坚决“反对一风吹”的人忽然改了调，自己大搞起真正的一风吹来。各级单位都搞起什么“座谈会”“茶话会”甚至摆起酒宴，把昔日的阶下囚奉为上宾以示“诚意”。一方面又大肆宣扬“千仇万恨都集中到林彪反革命集团”、“审查人的和被审查的都是阶级兄弟，不能再搞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了。”“紧紧抓住当前大方向狠批克己复礼。”。甚至有“在平反过程中只能批判刘少奇和林彪反党集团，不能提到参加清查工作的同志”的正式规定。然后一阵风飘下来数以万计的《平反决定》。其基本文字内容如下，

“xxx 同志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由於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受到错误审查。今查明该同志没有参与五一六兵团的组织和任何活动。党委依照有关政策决定为该同志正式平反恢复名誉……”

对于死难者则含乎其词加上一句，

“……审查期间，该同志於 x 年 x 月 x 日在错误路线下非正常死亡……”

谁要是对这种“一风吹大平反”提出质疑，谁要是要求进一步查清死因依法惩办凶手，就被冠以“干扰大方向，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的铁帽子。笔者就多次受到这种恫吓。由于“文革”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旷日持久的“挖地三尺”，就此一夜间匆匆谢幕！

至于作为“五一六”特大要犯，又被“王晏后”市委再次宣布为“反革命”的陆、匡二人，在“一风吹大平反”后继续被关押。匡建中在一九七五年，在广大群众的强烈呼吁下、在当时江苏省级领导的干预下才被平反，恢复其共青团组织生活和无锡市革委会委员的职务。而陆渭文则在“四人帮”垮台后才被稀里糊涂的放出来，回到残破的家中，迎接他的是孤苦零丁的幼儿稚女和长年担惊受怕的姐姐……这大概就是“挖地三尺”的最后余响了……

八十年代初，我在电视中又看见了多年消声匿迹的杨成武将军，这位令日本名将、国民党名将、美国“二战名帅”麦克阿瑟五星上将都异常头痛的人，虽然雄风犹在，毕竟“将军老矣”。想必是这么多年来，将军和我们这些被人莫明其妙硬编排到他“麾下”的人一样受尽煎熬！这许许多多的是非恩怨，大概都被一阵风吹个云消雾散了吧。在“批林批孔”中不能解开的种种迷团，如《二十号文件》的来龙去脉和文件具体内容。如“有批示”既然不是毛泽东主席所批，

那又是谁批了什么话？江苏省尤其是无锡市这场历经数年惨绝人寰的“挖地三尺”又是根据谁的“敌情分析”搞起来的？难道仅仅是王晏等一伙“五品郡守”一时兴起的发明创造？人们曾希望在公审林彪集团成员和四人帮时得以弄清楚。可是历史的脚步又是那样匆匆忙忙……

深挖“5.16”：来自苏北滨海县的报告

（摘自原是一中学生王协昌的回忆录）

1971年1月3日，马金山（原无锡市一中“红代会”负责人，无锡市“革委会”委员）被无锡市清查“5.16”专案组来汽车在一通翻箱倒柜后，卷着生活必需品，替换衣服，铺盖等押回无锡审查。

同一天，被押回无锡审查的还有耳朵被拉到萎缩，去上海几次整容也不能恢复的高级干部张履冰。

1月4日，滨海棉织厂革委会主任闻怀龙，找我谈话，宣布撤去我厂革会政工组政治干事职务，下放织造车间劳动。春节前夕，厂革会宣布取消我探亲假，不得回锡探亲，不得擅离工厂。（王协昌在“深挖‘5.16’”运动中被“审查”四年零四个月）

1971年3月，由浙江调来的独立师进驻滨海县城，全力以赴开展了清查“5.16”行动。顷刻之间，滨海县象翻烧饼一样，凡与南京“好派”同观点的那派头头，不管原先担任什么职务，统统被“学习班”隔离审查，当时所谓“学习班”，就是大搞“逼、供、信”，逼迫承认自己是“5.16”反革命，逼迫承认同一派的都是“5.16”，棉织厂被列为清查“5.16”的重点单位，阵容强大的军宣队进驻，每天深夜，从滨海棉织厂传出的撕心裂肺的叫喊声，可以复盖隆隆的布机声。

穷山恶水的滨海县，称得上是“庙小阴风大，水浅王八多”光“5.16”由六大系列，

一是北京蒯大富，蒯氏滨海振东公社人，从滨海县中学考入北京清华大学，文革中成了全国出名的学生造反司令。

二是上海的顾正红，顾正红烈士是我国工人运动的先驱，早在 20 年代的“五、三十”惨案中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英勇牺牲，滨海正红公社就是烈士的故乡。顾正红烈士的侄儿是滨海糖果厂的造反派头头，在清查“5.16”时被迫害致死。

三是南京“好派”头头文风来的所谓的滨海“爪牙”，是清查的重点。

四是盐城的董加耕，他高中毕业放弃考大学，毅然回乡务农，成为“革命的傻子”，由毛主席请他吃过饭的，全国下乡知青的楷模。

五是进口“5.16”，专指下放滨海务农的无锡，苏州，两市的学生，干部，城镇居民中的“5.16”。

六是土生土长的“5.16”，即所谓与北京，上海，南京，盐城没有任何联系，完全是滨海自己出产的“5.16”分子。

滨海县的清查“5.16”真可谓是“史无前例”，一些丧失了理智的“野兽”，从法西斯的阴魂那里搬来了残酷迫害革命者的刑罚，不知羞耻地称为“棍棒底下的材料”，为了达到“半夜三更出成果”创造了假枪毙。半夜三更突然将“顽固不化”的“5.16”分子从隔离审讯室提出来，五花大绑，押往阴森的乱坟堆，在坟墓的空间，强迫“5.16”分子蹲下，用步枪顶着脑壳，“最后一次给你‘五分钟的’坦白从宽的机会”。指挥者在数着：“五、四、三、二、一预备……”将人折磨到精神失常。

在滨海县城东饮镇，最热闹的新建桥堍，人们看到这样一幕：十八寡妇披麻戴孝，扶老携幼，拿着死去丈夫血渍斑斑的血衣，等遗物，排成长队，求助社会各界募捐。十八寡妇凑到了路费后，去北京向毛主席告状，这字字血，声声泪震惊了中南海。

顾正红烈士的侄儿被打死，一时间，滨海县城东饮镇传出了“上海工人阶级愤怒了”顾正红烈士的战友将率领数万工人来滨海等马路消息，年迈的顾正红烈士的母亲亲率子子孙孙大闹滨海县革会，随同来的有党的干部，人民解放军的师长，人民教师等等，迫于强大的压力，促使省革会的二把手吴大胜副主任赶来处理此事。

一天夜里，滨海剧场放映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电影。棉织厂有位女工想等齐人后一同进场看电影，欲靠在树下停放的自行车上“借借力”，是谁知

自行车的书架上竟然放着二具尸体，吓得她失声尖叫，引起一片恐慌，原来自行车刚从一百华里外的公社运去二具死去的“5.16”去火葬场，途经剧场门口，运尸者停了车，自己混进剧场去看电影了……。

柳英发：《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节选）

1963 年秋到 1968 年底这五年多的时间，我是在武昌实验中学度过的。前三年是我的高中生活，后两年是我文革经历中的一段。武昌实验中学是很有名的学校，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就是中南地区、湖北省的重点中学，校名是毛主席亲笔所书。1966 年夏，文革开始，改名红旗中学。文革中，红旗中学在武汉三镇也颇有名气。先是当时中央文革副组长王××的儿子为领袖的老红卫兵，后是群众组织的“红十月造反公社”，在江城都很有影响。我自己是红十月发起人之一。1966 年 11 月红十月加入武汉二司（1966 年 10 月 26 日成立，后称“武汉钢二司”）。1967 年 2 月起，我参与武汉二司勤务组的工作，是其中唯一中学生代表。1968 年 1 月 15 日武汉市红代会成立，我是副主任。接着（1 月 20 日）三结合的武汉市革委会成立，我以群众代表身份任常委。1968 年 12 月初，我离开红旗中学，和战友们一起到湖北省潜江县插队务农。

这五年多的岁月中，我经历的许多事情一直都难以忘怀。其中就包括发生在 1967 年的“12.5 事件”。下面我就集中说说这方面的事情。

1967 年 12 月 4 日，我们学校在实现大联合的基础上，革委会成立了。那段时间，我活动的重点在校外。作为武汉钢二司的代表之一，我参入武汉军区新领导曾思玉，刘丰（曾、刘在武汉“7.20 事件”之后，取代了武汉军区前任领导陈再道，钟汉华）以及武汉警备区（1967 年 8 月成立）首长方铭、张昭剑等主持下的大联合，三结合工作，很少回校。学校革委会成立了，这是大事，是我们的盛大节日，我就被通知回学校了。第二天晚上在学校礼堂举行文艺晚会庆祝革委会诞生。当时我在礼堂所有观众后面，站在一张凳子上看节目，李乾（时校革委会委员，负责保卫工作的 1966 届初中生）在礼堂找到我，可能是碍于周围有人，他具体没说什么事，只是说有事要我出去商量一下，并告诉了地点，我答应

了，但没有立即去，我以为没什么大事。在演出的节目看完后，我才到开会的地方，就是学校原女生宿舍楼一楼的一间寝室，时为红十月的一间办公室，当时屋里已是济济一堂了。何儒非（时校革委会副主任，红十月一号头头，66 届高中生）、李乾等均在场。这时我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学校准备开文艺晚会的消息传开后，当晚 22 中（该校与我校仅一墙之隔）二司学生祁援朝跑过来向李乾报告，说丁洪宝（时 22 中学生，不时骚扰我校的学生之一）一伙，还有积玉桥的流氓头子韩转运等，在黄××（时 22 中一教师）的家里集中，准备过来冲击。于是李乾就通知集合些人商量怎么对付。我到时李乾正在布置去 22 中怎么个打法，说过去把他们抓过来。说谁要反抗就狠狠敲他，打死了也没关系。正在这时，祁援朝跑来，说丁洪宝一伙人都走了。会场顿时乱哄哄。其中不知是谁提出（我至今也记不清是谁）说：他们晚上总是要回家的，到他们家里去打，此法大家都赞成。李乾说，要打，干脆就打死。我说，不要打死，打断他一条腿一只手就行了。钟立民（1966 届高中生）反对打死。说打死不好，顿时遭到激烈反对。大家七嘴八舌，说他们是一伙流氓，偷自行车，抢银行，奸污女生，打伤我红十月战友，纵火烧毁我校办公大楼，几番洗劫我们学校等，是三字兵特动分子，罪大恶极。你不打死他，待他伤一好，流氓的报复性是很强的，那我们学校一千多人的生命财产就不得安宁了，还搞个什么复课闹革命！打死流氓有什么关系？上海就是这样的，打死流氓根本没事。现在警司镇压流氓不力，公检法更是前门抓进后门放出，我们搞群众专政嘛。当时是群情激愤，同仇敌忾，被这样一哄，我就同意了。我说：好，那就打死。接着讨论打谁。大家提出来打丁洪宝、庄洪运（22 中学生）二人，认为他们是老打出手的。何儒非就叫同学去叫符军（22 中二司总部头头，学生，当时在礼堂看节目），是要他作向导的。符军来后听说要打死丁洪宝、庄洪运，他对大家拍着胸说：你们只管打，到时候我们负责抛材料。并说，丁洪宝还不是头头，头头是孔威、傅强，他们俩是流氓头子韩转运的左右手。经他这一说，就决定打死四人，即孔威、傅强、丁洪宝、庄洪运。并决定由李乾带队，由符军、祁援朝引路。夜 12 点行动。散会之前，李乾讲了一番话。主要是说法律是保护我们的。若流氓打死我们，那就要对他们实行专政。他还说，我们现在成立了革委会嘛，完全可以学巴黎公社，可以把他们的罪行张榜公布等等。

会散之后，我和何儒非回到隔壁房间，当时是何儒非的寝室。我们都没有说什么话，两个人的心情都显得沉重，完全没有以前作了什么决定之后显出的那种自信。这里我插说两件事：1966 年 10 月，红十月成立不久，文革正处于批资反路线阶段，红十月下属的几个战斗队在学校三楼会议室开会，要开除叶××老师的党籍，准备把他的入党志愿书烧掉。有同学告诉了我。我立即跑去，一进会场我就大喝一声：停下！这时反对的人也不少。七嘴八舌地说非要烧不可。我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文化革命是干什么的？16 条是怎么说的？斗党内走资派，批反动权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你们这样做算什么？最终多数人听我的了，志愿书未烧掉。事后有同学告诉我，有人说你这是老保的作为，我没理睬。1967 年初夏，我校的三字兵贺××在学校后操场旁用垒球棒猛击索立平（时 1966 届高中学生，红十月战士）的头部，同学们义愤填膺，要求严惩凶手。我们几个，何儒非，李乾，我等十分冷静，妥善处理了此事。多年之后我的战友们在说及这些事时还说：夫子（我的绰号）平时办事蛮冷静稳重的，怎么在“12.5 事件”上那样冲动？是呀，是太冲动。当时，说实在的，话一出口，就有些后悔了，但没有反悔的决心，内心还有不能当群众尾巴的私念，还有侥幸心理，但愿说说而已，不会成为行动，毕竟是群众组织哪能做到纪律严明，令行禁止？我和何儒非都心神不安，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入睡了。

凌晨时分，我们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李乾，祁援朝等人进来了，李乾脸色嘎白，浑身发抖，平时说话都有点不太联贯的他，现在向我们汇报行动经过时，紧张得话都难以说清。从他的汇报中我们得知孔威，傅强已被打死了。讲完后，我们叫他回去休息，祁援朝留在我们寝室，当时他才十五、六岁，睡在被窝里，浑身都还在发抖。此时的我，我料定还有何儒非，都觉得问题严重了。

天刚刚亮时，肖××（我校 1967 届高中生）推门进来，把我拉到门外，向我要长裤。我问为什么？他说打孔威时，岳中杰，高胜祖（均为 1966 届初中生，红十月战士）大腿负伤了，被送到中医学院。谁知傅强被其家人也送来救治。为防万一，他转回学校了，现需要裤子。我叫他等着，只身来到耿其华（时校革委会主任、原校党总支委员、政治处主任）房间，与耿其华同住一室的还有陈××老师，他们还未起床。我问耿其华有没有长裤，他问我要裤子干什么，我没告诉

他，只向他要裤子。他要我自己拿。我就在他床下的一个箱子里拿了出来交给肖××，并和他一起去看了受伤的同学（岳中杰）。

吃早饭时，在食堂里同学们就悄悄议论开了，我没理会他们。怎么办？中午耿其华主持召开了革委会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我记得他先发了一通脾气，说这大的事情（指跑到别人家里打死人），连我这个主任也不告诉一声。会上大家议论了一通，最后决定了几点：不要声张，相关人员主要是李乾要避避风头。要向上级报告，同时要加强学校的保卫工作。

会后我到水运工程学院借枪，水运在新河街长江边，去来都要经过孔威的家。我在汽车上看到门口拥着许多人。枪支由水运的车子送回学校，到校我即将枪支交给肖××等人。随后用车把李乾等人送出学校，说是暂避几日，谁知一去就是二十多年，90年代初（1992年？）我才又一次见到李乾。他判刑二十年，青春年华都耗在监狱了。好在他没有自弃，在里面读了许多书，还刻苦学技术，练就了一手好的钳工活。出来后先是开了个汽车修理厂，后来又搞教育事业，目前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还不错。

随后我向杨道远（钢二司一号勤务员），方保林（钢二司二号勤务员）等人汇报了此事。在他们支持下，在适当场合我也向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和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方铭等领导人报告了此事。当时曾、方等领导没有异样反应。在事后约十多天的日子里，我几乎天天晚上都在学校值班，手握一把五四手枪和肖××等人在学校内四处巡逻。我看见武昌区支左办公室的巡逻车接连几个晚上都在学校四周开来开去。我心稍安些了，但也不敢有丝毫松懈，担心对方来个鱼死网破。

1967年12月15号晚，几辆吉普车开到学校大门附近，来了一大帮人，说要拘捕凶手。有同学赶紧来报告，我随即赶到校门口，门口已有许多同学，堵着不让来者进校。我走上前问他们是哪里的？此时不知是谁指着我问对方：你们晓不晓得他是哪个？估计对方知道我，口气和缓地告诉我，说他们是公安联司的，受警司之命来执行任务。我说毛主席有指示，你们知道吧。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抓人，就是一个组织里的坏人，也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处理。你们回去吧。对方无奈，撒走了。我是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把他挡走了，但内心已很是不安，此时耿其华、何儒非等已来到校门口了。耿见状很着急，这是拒捕呀！怎么办？于是我们几个人商定，按毛主席说的办，我们自己先把冯栋（时1967届高中学生，红十月战

士)、俞国新(时 1966 届初中学生, 红十月战士)送到警司去, 要从长计议。当晚我们一行数十人, 陪着冯、俞二人, 一路步行, 过长江大桥、汉水桥, 一直走到万松园路, 当时警司所在地, 把冯、俞二人送进去了。从此一别, 冯栋我在 1998 年才见到, 他在牢里关得一身病差点死去, 1973 年保外就医。之后在一家汽车出租公司干, 后来开了个复印店维持生计。俞国新却一直没有消息, 我们一直还在找他。

第二天有同学来报告, 说昨天晚上李乾在他的一位同学家里被抓走了。三人被抓, 不少战友和同学们一时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学校一下就乱套了, 复课闹革命无从搞起。而且, 从此红十月内部分裂了。

我们一些人, 特别是何儒非和我, 受到昔日战友情的指责, 说我们背叛、出卖了李乾他们。他们打出了“营救革命闯将李乾”的旗帜, 宣布被打死的孔威、傅强是“十恶不赦的流氓, 死有余辜”。一时间在武汉三镇造成很大的声势。我们不同意这样干, 在校内一时有点孤立。当时在学校我的处境好像比何儒非好一点, 对方战友好像还能和我“对话”, 我委婉多次向他们表示: 救李乾, 我们都是一样的, 但不能这样大张旗鼓的, 这样会适得其反。我们造反派的地位现在同以前不同了, 我们能直接见到曾、刘、方、张这些领导人, 只要把材料准备好, 是会有好的结果的, 等等。但收效甚微。

“12.5 事件”后, 我找过符军, 他不是在会上拍过胸吗? 我要他赶紧把材料整出来, 但就是拿不出来。会上罗列的那些都难以准确地落实在孔、傅头上。例如焚烧我们学校的办公大楼, 这是和“7.20 事件”同时发生的事, 这很典型呀, 如果能落实, 那孔、傅岂不是罪责难逃? 但就是落实不到孔、傅二人的头上(后来纵火者也被抓了, 但据说是孔、傅所为, 是 22 中另外的学生)。我追符军很紧, 后来他干脆躲着我, 再后来, 他也被抓走了。没有过硬的材料, 我见到曾、刘都难以开口。但我没放弃努力, 只要有机会, 我就向曾、刘以下的一些人如张绪(时警司副司令员)、刘海江(时武汉军区的一个部长, 支左人员)“吹风”孔、傅不是好人。我们对他是“罚不当罪”, 李乾是革命小将, 我们是小将犯错误。等等。他们告诉我: 这事不能急, 往后处理好, 越往后越好。这些话, 我向耿其华, 何儒非, 向我的战友们都说过。

因“12.5事件”造成的“红十月”内部分裂，我心里很不安，感到压力很大。1968年1月20日，武汉市革委会成立，我被武汉军区临时党委批准，任市革委会常委。我窃以为是一个好的信号。为什么？因为在革委会筹建期间，其拟任人员都是填了政审表的，学校的“12.5事件”早已不是秘密。我是“12.5事件”的重要当事人，军区领导都是知道的。而我被批准进市革委会了，那事件的相关人员，当然包括李乾等人的处理，可能只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我心安了不少。但我的战友中有的不是这样认为，我已经忘记具体为么事，我和我同班的战友发生了争执，他最后的话深深地刺激了我，而这话与我们争执的问题毫不相干。他极冷峻地对我说：你以为你面前会再有一个李乾吗？那意思是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我是靠着出卖李乾等人，或者是踏着李乾等人这块垫脚石上去的，我当时惊呆了！我昔日的战友怎么会这样看我？我很难过，后面还有难堪的事。1968年3月，二炮来汉征兵，当时来汉征兵的还有铁道兵，准备去越南的。可能因我们学校是重点中学，二炮到我们学校来招兵了。我当时谁也没打招呼就报了名，经过体检，我被录取了，我真高兴。不知是谁告诉的，李乾的妈妈、姐姐突然到学校来了，就在陈××老师的那间寝室里。他们说了许多，意思是李乾还关在牢里，你们是头头呀，你们有责任。你怎么参军屁股一拍就走了呢？李乾没出来，你不能走，等等。面对泪流满面痛苦不已的李乾的亲人，我真是百感交集，禁不住也哭了起来，真不知道该对李乾的妈妈、姐姐说些什么，怎么说。旁边也围着些人，长时间的静场。最后是陈××老师，他也是眼泪涟涟地安慰李乾的妈妈：柳英发虽然参军了，他说了还是要管李乾的，学校也要管的，他目前只能这样了，问题往后拖拖，只会解决得好些。那场面今天回想起来心里也是酸楚楚的。

后来，“三反一粉碎”开始了。这样，我就没走了。当时方铭，张昭剑他们也不让我走，表面上是热情诚恳的，我内心却有疑虑，是不是因为学校的“12.5事件”？这个疑虑当时我对谁都没有说，是因为参军要走之前，我向张绪提出要求：想见见李乾。张绪当时答应了，但一直没有安排，就是留下来之后，张绪也不跟我谈这个了，这叫我不安，因为当时我是把他们对我的态度作为“12.5事件”的晴雨表的。但这个不安，后来还是因几个事的发生而打消了，尽管这个被打消的时间不长。

1968 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在市革委会参与组织领导这个工作。当时在大会小会上我都表态：我带头上山下乡。在一次会上我还对张体学（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原湖北省省长）说：干部子女要带头。我还点了他的子女在华师一附中要带头上山下乡。在省市召开的万人动员大会上，我发言说上山下乡运动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现在我们上山下乡，是红卫兵运动的深入发展，我们只能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并在会上宣布，我本人决心上山下乡，请市革委会方铭主任批准。当时方铭站起来带头鼓掌。在市革委会，方铭特别对我说，我答应过你到我们 15 军当兵的，你要想去的话，现在还可以去。我当即说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去当兵呢？不过方铭这话，让我认为当初不让我去二炮，与“12.5 事件”没关系。1968 年 12 月 1 日，我们下乡出发时，刘海江（时任市革委会常委，办事组组长）特地到现场送我。下去不到半年，刘海江曾对我说，市革委会准备调你回来，愿不愿意？我说不行，不行，这不成了“下乡镀金”了，后来 1969 年国庆，二十年大庆，我下去的潜江有两名知青代表去北京观礼，这是个特例，我是单独被通知，只身回汉到洪山宾馆报到的。梁仁魁（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副司令员，湖北省观礼代表团团长）告诉我，你的名额是武汉市给的。但我编在荆洲地区分团，当晚湖北团就离汉赴京了。这些，使我对“12.5 事件”处理的结果看好了，心情十分舒畅。

10 月 16 日，我随湖北代表团从北京回汉，即参加省革委会贯彻中央 9.27 指示扩大会议。会议名义批“北、决、扬”，实际上是批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我被人引导去见曾思玉时，他一反从前，脸色冷冰冰的，连和我握手都十分勉强。这是我到汉后第一次见曾思玉，说实话，心里发凉。接着，在荆州地区小组会议上，张体学也借杨道远的事敲打我。我年轻气盛，不懂政治，在会上同张体学争执起来。我的印象是一个下午的小组会，差不多就是我和张体学在讲。这是怎么回事啊？“北、决、扬”在武汉出现时，我们就不赞成、反对。中央指示要批，你批它好了，怎么批起我们来了呢？我问杨道远，他叫我不要吱声，参加会就是了。会议结束，我没随荆州团回去，自己留下来了。遵照中央指示精神，要去北京办学习班，我找到市革委会政工组长张景禄（军代表），要求参加。他说，学

习班不要中学生。结果未去成。通过这个会，在北京观礼产生的那种兴奋喜悦的心情全没有了，我感到：厄运开始了。

在这之前，1969 年春节后，学校工宣队为“12.5 事件”把我们弄到学校办学习班，我、何儒非等相关人员都参加了。学习班主持人向我们介绍了孔威、傅强及其家人的情况，给我们很大的触动。我、何儒非等人都哭了。当时我们认为打死孔威、傅强，的确是错了，错得厉害。后来，交待事情经过。我们没有隐瞒，我们一直认为，事件的经过，在这次学习班就交待清楚了，并诚心诚意地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情还是好的。况且，刚才说了，在 10 月我还作为知青代表去北京观礼，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了。但现在，贯彻 9.27 指示大会之后，我沮丧了，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了。

的确如此。之后学习班不断，学校工宣队办，下乡所在的区、县办，省、市也办，我不细说了。我粗线条地，主要还是讲与“12.5 事件”有关的，当然有时“北、决、扬”、“5.16”问题也要涉及一下。

1970 年新年伊始，就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12.5 事件”再次被提出，我们又被从农村弄回到学校办学习班了。这次主办学习班的工宣队人员全换了。据说上次工宣队都是造反派人员组成，这是一个变化。再一个变化，就是学习班除弄清“12.5 事件”过程之外，提出要揪“黑手”，好像我们几个学生不可能决定这样的事，这似乎成了规律：一有事就要揪黑手。比如说，1969 年春，朱鸿霞（钢工总一号勤务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李想玉（钢“九一三”一号勤务员、市革委会副主任）、吴炎金（工造一号勤务员、市革委会副主任）等三人写大字报，全市搞“反复旧”，除批他们外，就要大揪幕后黑手。“12.5 事件”黑手是谁？学习班意图很清楚，要我们指认就是耿其华，因为他是支持造反派的干部。他们直接对我说，祁援朝第一次来学校向李乾报信后，耿其华，宁汉文（时革委会副主任，教师），李乾等人开会就商定了，要集合人去 22 中抓人。耿其华对李乾等人说：你们去，打死了人我负责。我说我不知道这一情节，我参加的不是这个会。我在参加会的期间没有见到耿其华在场。决定“翻门坎”是这次会决定的，我表了态说打死。你们讲的情节就是真的吧，与我们这次会也不同。去 22 中抓人，冲突起来，场面肯定混乱，互伤死都有可能。耿说那个话也有可能，他是主任。但我们的会转了向，祁援朝第二次来说，他们走了。去 22 中抓人不

可能了，而耿的话是具体对此的。后改为“翻门坎”，不是去 22 中了，耿不是对此表态。“翻门坎”是我们定的，耿不在场，不能负这个责。可能他说的那个话对李乾会有影响，但我们不知道。我还以第二天清晨去耿寝室拿长裤、中午开会耿发脾气为由拒绝指认耿是“黑手”。我反复说，“翻门坎”这事是我们几个人决定的，我表态先是不同意打死，后同意了。当时我虽不是学校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但以我的身份说同意打死，那份量是重的。他们就说，你们不要把担子往自己身上拉，这担子你们挑不起的，承担了对你们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反正是软硬兼施，要我们指认耿是“黑手”。

往老师头上引，抓“黑手”不成。后来随着“两清”（清查“5.16”和“北、决、扬”）运动的深入，就把“12.5 事件”与任爱生（省革委会副主任、原省委委员、农村政治部主任）挂上。他们先说，任爱生说了“打死几个流氓没关系”，可能觉得这个说法没有份量，不久他们又改说成任爱生说了“打死几个老保没关系”。这个改变就意味深长了。我说不知道，也没听说任爱生说了这话。退一万步说，就是任说了，按语气推论，只能是事件之后，有人向他说了，他表个态而已。事件之前他是不知道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 22 中的符军在 1967 年 5 月营救任爱生之后（当时任爱生被三字兵绑架关押在 22 中，他跳楼把腿摔断，我们参加把任抢了出来），他与任的来往有一些。尽管如此，打死孔、傅的决策会是在我们学校由我们主持的。符军本人是中途被叫到会场的，我们告诉他才知道。当然他拍胸表态的作用不可小看，但完全不可能事先请示了任爱生，顶多是他事后向任提及了此事，怎么能说任爱生是“黑手”呢？还补充一点，省、市革委会成立之前，任爱生的大名我当然知道。之后，我与任爱生有多次见面（开会时或其它场合），但我对任爱生从未说过“12.5 事件”，他也没有向我说过，尽管他清楚知道我是谁。

黑手抓不着，事情的经过交待过去交待过来，就是那些了，后来就不提它了。他们一门心思在我们中间深挖细找“北、决、扬”、“5.16”了。我只说一件事，1972 年 4 月至 1973 年 1 月，我在省里参加学习班，做我的动力有两个人，一个是学校工宣队的工人师傅，一个是我下放的潜江县区银行的干部。学习班名义是“批林整风”，实际上是清查“5.16”骨干分子，具体过程就不说了。后来在 1974 年春季，批林批孔的时候，我被省委组织部通知从潜江回汉。其间我看到

关于这次学习班的三个材料，一是这次学习班“268 名 ‘5.16’ 重要骨干分子名单”，其中有我；二是在这次学习班中“关于对柳英发的突破方案”，其中说我是“武汉 ‘5.16’ 分团核心班子成员、二司 ‘5.16’ 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三是在 1972 年 11 月拟定的（当时学习班还未结束）18 名特别 ‘5.16’ 重要骨干分子名单，其中也有我，上有曾思玉的批示：“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在适当的时机处极刑。”什么叫“惊心动魄”？什么叫“残酷”？我算是有体会了。

再回头说“12.5 事件”学习班。虽然指认黑手问题被我拒绝了，并且态度坚决，但说实话，一提起这事，我的腰杆子就硬不起来。在前段的学习班，一时“12.5”，一时“5.16”，翻过去复过来。“两清”说我在哪里开会、哪些人参加了、发填了什么表，时间、地点、人物，说得活灵活现，我硬是顶了起来，因为那是根本莫须有的，自己心中有数，底气十足，但一提起“12.5 事件”，腰杆子就软了。打死两人还伤四人（包括我校误伤的两名同学），人命关天啊，所以老老实实写交待材料，主要责任在我，痛哭流涕地说自己是不沾血的凶手、是主谋，表示认错、认罪，愿意接受任何处罚。但要以此为要挟，要我承认是“北、决、扬”、“5.16”是办不到的。说实话，从 1969 年春开始办学习班，之后几年，连续不断，我们还是很自觉“斗私批修”，老老实实地交待“12.5 事件”。尽管“北、决、扬”、“5.16”分子对我们是莫须有的，但对某些错误思想对自己的影响还是认认真真作自我批判的。但越往后来，越是发现他们对我们不是“治病救人”，而是要往死里整。

从 1973 年 8 月至 1976 年 8 月，我多次找军区“三办”有关人员，多次向省市委领导姜一，韩宁夫，王克文写信，也在一些场合与省市委的赵辛初，姜一，王克文等领导当面谈，要求解决自己的问题。几经反复，对“12.5 事件”总算有了个结果。1974 年和 1976 年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人员在中法或在我单位讯问“12.5 事件”。最后在 1976 年 8 月，未经庭审和宣判的程序就直接给了我一张判决书。其中关于我的一段是：“被告人柳英发参加枪杀孔、傅的策划会议，赞同被告李乾等人的犯罪活动，事后又参加纵容被告李乾逃跑的会议。破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对被告柳英发免于刑事处分。”

1976 年 10 月 6 日，王、张、江、姚“四人帮”被强力隔离。1977 年 1 月 23 日至 10 月 19 日，经武汉市委批准我在武昌车辆厂被隔离审查，之后在车间

边劳动边交待问题，听候处理。1978年3月20日武汉市中级法院到车间以“开枪杀人”案为由逮捕了我。在监狱羁押了18个月又7天后，于1979年9月27日释放，口头要我回原单位。后来又行文，说“关押不当”、“补发工资”云云。

说来也巧，1969年9月27日，有那个指示后，我的厄运开始，1979年9月27日我走出监狱。所以我说过：“始于‘9.27’，了于‘9.27’。”其实也没有全“了”。1987年武汉市工交政治部对我文革作结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所列有三条。第一条，1974年团省委“补台”是参与张立国（时省革委会副主任，原新华工负责人）的“篡党夺权”。第二条就是为杨道远翻案。第三条就是“12.5事件”。工厂并行文，说柳英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记行政大过一次。行文前工厂有关部门找我谈话，说你今后入党、提干是不行的，但不会影响你技术职称的评定和工资晋级。对三条我当即都作了申诉。对第一条，1974年我“补台”团省委书记，是省委的决定，省委组织部找我谈过话，赵辛初，姜一两书记当面对我谈过。张立国只是把我引到团省委去见了毛菊元（团省委书记）等人。第二条，为杨翻案的文字经过写的是对的，但性质完全不同。我们是翻杨道远“5.16”、“北、决、扬”的案。他们说杨道远是“5.16”、“北、决、扬”，但他不是的”。第三条，“12.5事件”，法院已判，不能又打又罚。

后来我又看了“历史决议”，决议说文革的发动和领导者毛泽东动机是好的，犯了严重错误。而我们响应他老人家的号召，投身文革，动机却是要“篡党夺权”！当然也跟着犯了错误，错误不仅严重，而且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比他老人家犯的还严重，这叫人怎么想！另外，据说1982年初，中央下发9号文件，其中规定，作结论一般不用“政治错误”和“严重政治错误”的定语。我“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是1987年下的。以此对照，我就不属“一般”之列了。我这样的人物就如此特殊？！

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

• 潘祝

平 • “文化大革命”期间，说是北京出现了一个“5·16”组织，被认定为反革命阴谋集团。北京的“5·16”组织，究竟是怎么回事？该不该在全国

搞清查？笔者不明真情，不便评论。就江苏来说，并不存在“5·16”组织。然而自 1970 年 4 月起，江苏却掀起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清查“5·16”运动，1971 年形成高潮，历时三年多，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前所未有。酿成了建国以来江苏涉及人数最多的一起冤假错案。 ◇ 十三万人被打成“5·16” 当时江苏主要领导人认为，“5·16”组织在江苏已遍布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具有群众性、隐蔽性、顽固性、欺骗性，十分反动，十分危险。根据这一判断，全省作出了“破口、围点、扫面、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了一场全歼“5·16”的人民战争。很快在省地市县各级，设立了由军队“支左”人员组成的权力很大的第二专案办公室（南京称“320”办公室），简称“二办”，统管清查工作，有权拘留、逮捕、关押、审讯“5·16”涉案人员。省“二办”还设立了关押“5·16”要犯的看守所，并从部队调来一个连负责看押警戒。各级“二办”皆由党的一、二名主要领导人，避开党委集体单线领导。受兼任江苏省党政“一把手”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委托，省“二办”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支左”大员吴大胜独管。这起冤假错案，“二办”虽非罪魁祸首，但充当了冷酷无情的打手。 江苏清查“5·16”涉及范围很广，造成打击面严重失控。“文革”中的群众组织，被视为“5·16”极易进入的黑窝，其成员大都成了清查对象。这些群众组织在“文革”中都犯有各种不同程度的错误，有些还犯有打砸抢和参与派性武斗的严重错误，但其成员的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却当成敌我矛盾从中打出了成批“5·16”。少数坏头头有罪行应依法惩处，但与“5·16”并非一回事。此外，原地方党政机关及其它机构，在“文革”中被称为“旧机关”，其工作人员被视为“旧人员”。认为这些“旧人员”中有不少人对“文革”、军队“支左”、军管等，有抵触不满甚至反对情绪，易与“5·16”气味相投，也成了清查对象。这些“旧人员”中的原各级地方领导干部，成了清查重点，尤其是被打成“走资派”、“三反分子”、“叛徒”、“特务”、“假党员”的领导干部，往往被当作“5·16”的黑后台、黑顾问深挖。有不少领导干部已经“三结合”进入各级革委会也不能幸免。省“二办”为了深挖全歼“5·16”，还列出 31 个问题，不管有未填表参加“5·16”组织，只要沾上其中一条，都要戴上“5·16”帽子。

1970 年 4 月清查开始后，省“二办”就曾扬言，江苏不挖出十几万“5·1

6”说不过去。1975年彭冲主持省委工作后，当年5月3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透露，江苏在三年多清查中，果然有13万多人被打成“5·16”分子，其中南京市就有2万多。据当时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从各地市县法院收集的信息，在清查“5·16”中全省共死亡2000多人，伤残人数更多。仅以溧水县和滨海县为例便可说明。溧水县死亡36人，被严刑拷打重伤100多人；滨海县死亡18人，伤残60多人。 ◇ 南京大学成为清查“5·16”的突破口 南大被认为是“5·16”敌情最严重的单位。1970年4月开始清查时，首先将南大作为突破口，吴大胜亲自直管，派省党的核心小组（当时省委尚未恢复）成员迟明堂蹲点，要求造出声势，搞出经验，推动全省。 南大经过四个多月的清查深挖，关押“5·16”分子108人，点名“5·16”248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1154人，共有1560人卷入了“5·16”漩涡。其中有21人跳楼、自缢、卧轨自杀身亡。 南大为何能在较短时间内打出成批“5·16”？虽然也搞“政策攻心”，但主要靠所谓“军事压力”，大搞逼供信。连续战斗几昼夜（最多13个昼夜）攻下“顽固堡垒”，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宽严大会上戴手铐，小分队滥用十几种体罚等等，主要靠这些手段逼出“5·16”，也逼出了人命。一位吃尽苦头的受害者事后谈及当时的处境是，“站不完的队，受不完的罪，写不完的交待，流不完的泪”。南大大搞逼供信经验，在全省流毒很广。 南大作为突破口，不仅在教职员学生中打出了成批“5·16”，而且揭出了地方领导干部和军队领导干部的“5·16”问题。这两点突破非同寻常。 在南大蹲点的迟明堂，是一位“三八式”的地方领导干部。南大被打成“5·16”的一位中层干部对其泄愤检举后，迟明堂也被打成了“5·16”。1971年2月靠边审查，1971年10月隔离审查，不久被武装押解投进监狱。这一突破为日后成批地方领导干部打成“5·16”开了先例。省“二办”奉命抓紧对全省地市厅局级以上地方领导干部进行排队摸底，排出了一批涉嫌“5·16”问题的对象。在省级领导干部中占7.2%，厅局级领导干部中占3.8%，十五个地市领导干部中占4.1%，地市一把手中占6.9%。以此为依据加紧了对各级地方领导干部的迫害。在江苏“支左”的军级要员吴大胜等三人，也被南大一位“5·16”骨干泄愤检举。虽未能触动吴大胜，但另两位“支左”要员，一位被无端怀疑，一位被蒙

冤审查。此后省“二办”奉命大整军内涉嫌“5·16”问题的干部材料。据 1975 年 5 月 3 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在查获的省“二办”秘密档案中发现，被整理材料的军内干部有 298 名，其中军级以上干部 84 名，仅南京军区机关的军级领导干部就有 11 名。此举大大超越了江苏的范围，也大大超越了吴大胜的职权范围，经何权威授命？想必大有来头。 ◇ 省五七干校变成集中审查关押“5·16”的营地 江苏清查“5·16”，在南大突破后，省级机关首当其冲。当时省级机关连同省五·七干校共 5000 人左右。清查“5·16”在两部分人员中进行。一部分是省革委会机关及所属各部门各单位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留守人员”，另一部分是进入省五·七干校的“脱产人员”。1971 年干校的人数占省级机关干部的 60% 以上，因此干校承担了省级机关清查“5·16”的重任。 在省级机关“留守人员”中清查“5·16”的高潮在 1971 年。经过“春季攻势”，到 1971 年 6 月，被打成“5·16”的占 33.4%。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占 55.5%，处级干部占 42%，一般干部占 30%。为了扩大战果，不久又发动“秋季攻势”，到 1971 年 11 月，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多达 2400 余人，连同已经打成“5·16”的，竟占省级机关干部总数的 70% 以上。 省革委会常委成了清查的重中之重，45 人中有 25 人打成“5·16”，其中有 8 名军队“支左”干部。其余除吴大胜、杨广立、蒋科三位“支左”领导人外，都挂上了大名单，作为“5·16”嫌疑分子“背靠背”审查。省革委会领导人之一的彭冲竟也挂上了“大名单”。 “二办”认为省农业局的班子是“5·16”搭起来的，把所有“留守人员”关在机关内 43 天搞深挖。有一位同志爱人难产、岳父生病，不但拒绝其请假，还要狠批“资产阶级人性论”。外面来人联系工作，除派人监视一楼值班室，还在三楼放了望哨监视传达室。宜兴一位同志来联系毛竹问题，疑为“5·16”同伙关了半天。水科所一位下放干部来找局领导，也疑为“5·16”同伙关了两天，勒令交待问题，最后要当地派人领了回去。消息传开后，好几个月谁也不敢来省农业局。 省农业局 64 名“留守人员”，有 39 人打成“5·16”。打成“5·16”的局领导占 60%，处室负责人占 62%，党支部委员占 80%，党员占 64%，党支部几乎成了“5·16”支部。 省科技局被视为“5·16”的黑据点，“二办”

认为科研单位是“5·16”的重点。1000多人的直属科研单位，打成“5·16”关押100多人，逼死5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400多人。有的科研单位100%的科以上干部和80%的一般人员都打成了“5·16”。省科技局在清查“5·16”最紧张时，直属科研单位的工作几乎全部停顿。1972年的一个重大科研项目大面积集成电路新工艺，组织了研究所、高校和工厂的科技人员三结合试制队伍，经过一年多努力，就在科技成果快拿到手的关键时刻，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参加科研的师生，奉命回校参加深挖“5·16”，科研课题中途而废，使200多人辛勤劳动，投资500多万元试制出来的设备束之高阁。省五七干校，1971年有3000多人，除原在干校搞“斗批改”未分配的1000多人外，其余是在清查“5·16”开始后陆续进来的。1971年4月，已在省革委工作的100多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为“5·16”后首批送进干校审查，到1971年底已增加至200多。首批进干校的省革委会常委、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老红军朱辉等10多位老同志，都是从办公室被“请”走的，回家取衣物也不允许。其他涉嫌“5·16”问题的干部，也一批批被点名送进干校，有些是半夜破门从床上拉走的。已经下放在南京钢铁厂的60多名干部也被装上卡车押进干校，下放在外地的也一批批揪回干校。到1971年底，干校3000多人中，点名为“5·16”审查的有1600多人，挂上“大名单”的还有400多人。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审查的占80%以上。干校已变成集中审查关押“5·16”的营地。在干校各处墙头和宣传栏上，仇视“5·16”、批臭“5·16”、深挖“5·16”、全歼“5·16”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到处呈现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在干校被审查的对象一律与他人隔离。按南大“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的经验，不分昼夜的车轮战成了惯用手段，罚站10多小时（最长19小时）更是常见。不少受害者实在吃不消，被迫承认参加了“5·16”，却又遭来更大祸端，继续穷追猛打逼交“联络图”同伙，使清查形成了滚雪球。一时间干校出现了一种景象，干校内的“5·16”口供一批批送出去，干校外的“5·16”审查对象一批批送进来，清查的雪球越滚越大，“5·16”越滚越多。为了做到“一个不漏、一网打尽”，干校还发动“以毒攻毒”，要被审查者检举揭发专案人员和小分队成员中的“5·16”。这就

给被审查者泄愤检举的机会。以干校一大队为例，一名小分队长今天斗人，第二天进了密封室；一名大队核心小组成员，今天要“5·16”缴械投降，第二天办了他的学习班，要他缴械投降；大队的一名主要负责人也挂上了“大名单”，成了“5·16”嫌疑分子。“以毒攻毒”的结果，在干校引起了一场混战。

1971年下半年，干校多次召开宽严大会。9月份的一次宽严大会要宣布对几名“5·16”顽固分子从严处理。为大造声势，动员干校周边农村的部分干部群众参加。一些农民见会场周围有荷枪武装警戒，误以为干校要杀人。干校虽未杀人，但超越司法机关的职权，给从严处理者戴上手铐宣布法办。 ◇ 清查

“5·16”成为南京市头等大事 南京市被认定为“5·16”大本营，将清查“5·16”作为头等大事，与“一打三反”结合，全力以赴。三年多时间内，全市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从上到下先后组织了2万多人的清查“5·16”专案和小分队队伍，举办了各类揭批斗学习班3900多个、2万多期次，进入学习班的多达20多万人次，全市上下共召开坦白会、批斗会、宽严会等1200多场，收到举报材料2万多件。在1971年6月至10月，4个多月内就有5000多人打成“5·16”，其中骨干600多人。到1972年底，2万多人打成“5·16”，逼死300多人，仅市商业系统就有33人自杀身亡。原市委市人委领导成员，除岳维藩、郑康二人外，都视为“5·16”黑后台，遭到批斗审查。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在“文革”初期即因历史问题冤案被关押批斗开除党籍，清查“5·16”时又挂上钩。此时刘中身患癌症要求查病，却要刘中“先查思想后查病”，结果因延误治疗而早逝。原副市长房震戴上

“5·16”黑后台帽子逼供未屈服，竟用酒灌醉，妄图房震“酒后吐真情”套取口供。原市级领导成员中一位女同志在学习班承受不了逼供信的折磨，被迫承认了“5·16”黑后台，仍不放过，直至逼交出300多名“5·16”组织网络后才罢休。 市级机关清查“5·16”，以最先清查的市公检法机关为例，便可知其激烈程度。一位在此主管清查工作的军队“支左”人员，事先即预言，市公检法机关的“5·16”有一个加强营。强攻的结果，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长、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副院长，全部打成“5·16”。处级干部除一名副处长外，无一幸免。600多干警，159人打成“5·16”，逼死4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400多人。市公检法机关几乎全军覆

没。其它市级机关清查“5·16”也相当激烈。市革委会机关 450 余人，至 1971 年底已有 107 人打成“5·16”，加上挂上“大名单”的 200 余人，也占 70% 左右。南京市各系统的基层单位，清查“5·16”也搞得“轰轰烈烈”。如华东电子管厂在一个动员会上，就有几百人上台坦白交待“5·16”问题，并检举揭发别人，有的竟能一下子开出几十个“5·16”干部名单。结果全厂近半数的干部和职工都成了“5·16”。又如江南光学仪器厂，要求所有干部职工都要坦白交待和检举揭发“5·16”问题，人人都要过“5·16”关，搞得人人自危。很多干部职工稀里糊涂地成了“5·16”。江苏其它地市清查“5·16”也不甘落后。以盐城地区为例。原地委常委 13 人，打成“5·16”的 6 人，挂上“大名单”的 4 人；中层干部 84 人，打成“5·16”的 43 人，占 51%。地区公检法机关 500 余干警，打成“5·16”的 327 人，占 65%。江苏清查“5·16”的冤假错案，是十年浩劫的一部分，不应被遗忘。因史料不全，本文虽未能作全面回顾，但也可使读者从片断情况中得知江苏这场浩劫的部分真相。□ 《炎黄春秋》2007 年第 1 期

尹慧珉：《清查五一六运动》

吹得这么神的反革命大组织、大罪行，却原来净是泡沫。挖出来的人和罪行一个也不成立。

文革”是一出悲剧兼闹剧。它还是多幕剧，一幕戏接着一幕戏。曲终奏雅，“清查五一六”可算是最后一幕，其惨酷诡奇尤甚。全国皆如此，我所在的那个报社也一样。

我从进报社不久就是老运动员，历次政治运动都沾边，常常陷入交代不出、检讨不深的窘境，直到文革初期，仍是最先揪出来的少数“牛鬼蛇神”之一。这次清查中我却比较轻松，列不上主角。为什么呢？据排长邢某告诉我：“你不是五一六，因为五一六要的是根正苗红的人，你还不够格。”

虽然不够格当上主要挨整的人，可也不能忝列真正的人民群众之中。因为此次牵涉到了我的老伴老胡。他在历次运动中虽然常常“右倾”，一般还是处于审

查别人的地位，此次却成为运动的中心之中心，不但被指为参加了五一六反革命组织，还是报社中这个反革命组织的“黑后台”，地位显著。于是，我有根据“蛛丝马迹”揭发他的责任。后来因五一六罪行的不断扩大，我也沾了边，又必须“交代”自己在老胡的推荐和包庇下也曾为五一六效过力的罪行。不过总的说来，我所受的压力不算太大。

我处在这么一种边缘地位，既不能整人，也没有被整得死去活来，所以对这个运动并不能有深入核心的了解，耳闻目睹的只是些表面场景，但就是我这些零零碎碎的见闻，也有不少是超出常人想象所及的，记录下来，也免得湮没了这段辉煌的历史。

◇ 挖出了一个庞大的反革命组织

“五一六”当时是个新名词，据说是极秘密极精干的反革命组织。想必在一个报社里最多也就是少数几个出类拔萃的坏人，谁知不然，揭发出来竟是铺天盖地，成员如蚁。记得开始挖掘出来的是些工人同志，有以宋某为首的四大将，后来就多了，每天都有人被揪出来或自愿坦白。最后这个反革命组织的成员竟占了报社全体职工人数的一半以上。人数虽多，据说组织仍不失其严密，参加者都是个别履行手续，要填表，各有介绍人。

揪出五一六的办法除了惯用的大会轰，小会斗，大字报敦促，高音喇叭尖叫，扩音器上门喊话外，对每个个别人主要是开小组会“画像”，组里的人你一言我一语，虽不指名，闪闪烁烁，却让被指的人心里明白说的正是自己。“黄泥巴涂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虽然明知是假，仍不免恍恍惚惚，心神不安，手足无措。以后开会便怀着鬼胎。度日如年。不过这尴尬状态也容易摆脱，出路是有的，自己赶紧承认了便可了事。马上就又成了“好同志”了。有位李姓工人曾告诉我，那两天他正在苦苦难捱的时候，忽在路上碰见小郑，小郑问他：“这几天挨着你难受了吧？”“是呀！怎么办呢？”“你承认了不就得了吗？”“承认就承认，可我没介绍人呀。”“你就说我是你的介绍人。”（小郑已经“坦白”过了）“不知道加入五一六的表格是怎样填的呀。”“随便说说不就得了吗。”后来，仗着小郑义气，这位李姓工人果然过了关。

出来“坦白”的人形形色色。有的是坦白了就坦然照样劳动生活，反正是无奈说谎，大家都明白，能谅解。有的还挺得意，像我们排有两个人，本非重点，

整人者似乎也还不曾向他们动手，自己跳出来坦白，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以典型自居，喜孜孜地，两人常在一起商商量量，思有突出表现。在当时那种紧张的气氛中，人们也无暇顾及，只不过觉得滑稽而已。

但是另一些人对于说假话就不那么轻松了。例如小苏，他是我们排的党支部委员，按他的地位，“坦白”以后须在排里亮相“讲用”。那天会上我看他简直像变了一个人，神情呆滞，言语无序。排长邢某在会上说：“小苏不知怎么回事，本来是个很精干活泼的小伙子，在这件事上却呆若木鸡，可见这五一六真是个害人的东西。”“呆若木鸡”这一评语，对当时的小苏的确非常恰当。“害人的五一六”把人弄成这样，简直像今日所谓的“邪教”一样。

后来，时间过去，小苏也慢慢随大流恢复了常态。有次，我偶然和他单独走在一起，忍不住说（他虽是个排领导，对人态度却比较温和，还曾鼓励我“立新功”，所以对他我尚敢暴露真思想）：“说老实话，对五一六这个事我就是想不通。”“我也想不通。”我惊奇了：“你不是交代了是五一六吗？”（那时我还相信真有这个组织，想不通的只是人们不该咬老胡）他不再做声，只苦笑了一下。显然，他对我这样的人还不能完全敞开心扉，刚才那一句话只是不经意间漏出来的。

坦白交代中最热闹离奇的一幕是揪出了一个“心里美”。大会是在木工房里开的，揪出的是一个姓王的记者，可能小组画像和个别劝降不能解决这个人的顽固态度，必须在大会上斗一斗让他尝尝利害。会前王似乎并不知道自己今天要唱主角，也和大家一样的在会场上坐着。大会上也照样是画像，敦促，画着画着就把王簇拥到房子中间站着了。主要的揭发者是孟，也是记者，自说是王参加五一六的“介绍人”。据孟的揭发和其他人补充，我们知道了一个故事：

一天，孟到王家串门。两人本来有相当深的交谊，都是文革初期报社成立的造反派组织的成员，且同一小组。孟那次到他家的目的就是要动员并介绍王参加一个“更加革命的”“由中央文革亲自掌握的”五一六组织。孟见王的孩子们都在房中，觉得不便，暗示有重要话说。王领会其意，便对孩子们说：“你们到厨房去削一个心里美萝卜给孟叔叔吃。”孩子们离开后孟才把来意说明。王初听时不解，说是已经有了原来的造反组织不就可以组织群众革命活动了吗，再搞一个

组织干啥？孟给他解释了这个组织的重要，见王还在犹豫，就说：“我先把表格放在这里，你再想想，同意就把表填好交给我，不同意就算了。”几天后，王把填好的表送到孟处。

孟现在认识到自己是犯了错误，已经坦白交代，他希望王也好好交代，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这个故事讲得合情合理，孟的态度也好，不但全场人都觉得真实无疑，就是王本人也目瞪口呆。但是他仍是一言不发，拒不认账。这只能归之于他的“顽固反动立场”了。

此后王就不断被批斗。大会小会，他没有别的话说，只咬定一句：“没有参加”。每次开会，他都郑重其事，把胡子刮得光光的，穿上干净的衬衫（这在干校环境就算礼服了），站在挨斗的位置上。人们对他的反应不一，有人说他装腔作势，有人怀着尊敬的心情。

这个“心里美故事”在全报社脍炙人口，谁知这么言之凿凿，竟全属子虚乌有呢？编这个故事陷害同志的人，当时竟能泰然自若，脸不红心不跳，也算了得。王本人后来也自笑：当时明知是假，只顾“顽固否认”，怎么就没想到辩驳呢？他编的那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根本不是吃心里美的季节呀。

像孟这样的人并非绝无仅有。例如还有一次开个什么揭发“黄包袱”的大会，中心人物也是两个：姓刘和姓王的两个工人。刘是原来造反组织的核心领导之一，给人以大胆豪爽的印象，工人中佩服他的人还不少，王也是造反派，声誉可不怎么样，是个吊儿郎当的浑人形象。这次斗的“黄包袱”罪行，到现在我也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可能也是假的吧，斗争形式当然也是勒令他们交代。奇怪的是，总是先问王：“某事如何？”王答没有，然后叫刘说，刘说：有的。接着交代出一串情节来，于是，就有“群众”上来打王一顿嘴巴。如此循环多次，王挨的嘴巴不计其数。批斗和交代的具体内容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一个问题：“你和刘是怎么定攻守同盟的？”“没有。”“有的，在水井边……”又打一顿。这个会刘算是安然度过，却在人们心目中大跌份量，王呢，人们倒觉得这个浑人还不说瞎话。

从“心里美”、“黄包袱”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在平时，风平浪静的时候，

一个人是善良还是卑劣往往看不大出来，到关键时刻可就表现出来了。下面的故事也是一个例子。

这是在批斗女刘的时候。女刘是位编辑。平时工作还好，稍爱提点意见，并不显山显水，不知为什么在文革中两口子都被特别重视，把他们看作大奸巨滑的人物。五一六犯下的“罪行”似乎许多都与他们有关。因此被斗得特别惨。一次在斗争会上叫她读毛主席语录：“你不能一手遮天……”，读到“遮”字时她说看不见，几遍读不下去（她是深度近视，可能后来几遍也有抗拒心），就把饭桌、椅子、凳子架起来，叫她爬上去凑着汽灯认字（也如阿 Q 晚上春米时赵太爷家允许点灯一样，干校晚上斗人时可点汽灯）。那种摇摇欲坠的样子，观之惨然。还有一次挖塘泥，一部分人在下边抽净水的塘里挖，把车拍得满满的，一部分人拉车往田里送，车往上坡走，路上有一条用木板搭成的小桥，突然卡嗒一声，车没过好桥，连车带驾车的人都摔下坡来。下边挖呢的人都本能地惊叫：“谁？摔坏了没有？”一看是女刘，就谁也不吱声了，任她自己收拾好再上路，所幸并没有摔伤。我不知道她是否会为人情的冷漠而感伤，或许不会，因为她这段时间受到的冷漠凌辱已经够多而麻木了吧。她也时常受到推搡殴打，一位江记者，四十来岁，精力充沛正当年，平时文质彬彬，批斗这个疲累的女同志时竟用脚踢踩。

这里我还想提一个小张。这是个十九岁的青年工人，在干校时是个班长。他看到江的表现，起了怀疑，曾向排长反映这样打人不大好，提出：“江和刘是同派，为什么阶级仇恨竟这么深，其中恐怕有假，是不是江本身也有问题？”小张和五一六们不同派，从他的话可知他是绝对相信有五一六这桩事的，他也有“阶级仇恨”，但他在运动中从不打人，坚持“文斗”，并能提出对江的怀疑，这使我对他的刮目相看。（江后来果然也被批斗并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当然也是假的）

“文革”为害重重，但也有好处，其中之一就是让人都现出本质。平时差不多的人，此时善恶毕现，平时觉得他是模范人物，此时却作出丑恶表演，看来很平常甚至不怎么样的人，反而显出人性的善良和羞于说谎。

◇ 上访的悲剧

前已谈到，有很多被迫说谎和咬人的人并不是都那么轻松泰然的，特别是咬过人以后，眼见别人因自己咬了他而受苦受逼，也揣度得到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即使有同情也是鄙视的，心中的滋味可想而知。但是，你既然“坦白”了就必须得

咬人不可。你本人既是五一六，难道就连一个同组织的“同志”也不知道吗？连介绍人也不知道吗？

有一次我在田边路上走，下边田里正有一人在轰麻雀。那时轰麻雀常是手拿一面锣哐哐敲，口里还嗷嗷叫，这人一面叫着，突然高唱起来，用他的河南口音大声喊：“说假话，说假话！真难办，真难办！”反复不断。我触耳惊心，立刻知道这是有意唱给我听的，不由得感慨系之。此人正是“坦白”了而又咬出了老胡的人之一啊。

还有一次，排里开批斗胡的会（那时他在各排轮回游斗），在露天，大家散坐，我坐在一个干粪坑边上，旁边坐的人中有一个是养牛班的班长刘。这人是当年造反组织的第一号“服务员”，过去当记者时给人的印象是勤奋老实，文革中却成了一派头头。他当然必是五一六不可，也“坦白”了，首先咬出胡的就是他，因“态度好”现已官复养牛班班长原职。我当时很恨他。在大家散坐着等待把老胡押到的时候，他正无聊奈地拨弄着一根小树枝玩，无意中弹了些灰到我裤子上，我当即厌恶地避开，说：“别把自己的脏洒到别人身上。”在干校，谁还会在意身上落点灰呀，他当然听出了这话的弦外之音，脸上出现了畏缩的表情，悄悄地换了个地方坐。这件事，我当时觉得解恨，后来却懊悔了。我不该给已经满是创伤的心灵再加一道创伤。

这刘，后来我听说，在“坦白”之前是受了许多折磨的，程度远在前面所说的女刘之上。大会斗，小会斗，二十四时车轮战，白天的劳动照旧。还传说有一个姓马的主持斗人的“马王庙”（一个离本部较远的独立小屋），人们曾听见传出惨酷的批斗声。我没听见这声音，不敢证实，但传闻亦非空穴来风，正如运动中一句常说的话：“事出有因”。而且早在去干校之前，一位副总编辑就曾在一派“审查”中被那姓马的毒打，我也曾挨他一巴掌，脸上留下几根手指的青印，老胡一次被揪去时被人皮带抽打得猛一下坐下来，折断了木椅上的两只木脚，这些都可作为旁证。

刘是在经过九十多天这样的斗争后才不堪身体上精神上的折磨终于被“突破”的。在听到人们告诉我这情况时，我眼前突然闪过了“黄包袱”大会上的一幕。会上两个主要人物，虽然处境有“荣辱”的不同，从身体状况看，毕竟还都是长得结结实实的两条汉子，正斗时，突然又从场外押进一个人来被勒令交代和

作证。此人就是这个刘。好久不见，不知扣押在何处，现在那样子令我吃惊得几乎不认识他了，那真是“揪”，揪着后领如提鸡鸭一般脚不点地地掷向会场中央，身躯瘦弱，脸色灰败，就像《抓壮丁》里那个被抓拎出来的鸦片烟鬼一样。这样的对人态度，还能说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央一级的新闻机关里吗。

对刘的突破是清查五一六运动的一个大胜利，运动的主持者当时一定高兴非常。因为刘是原来占报社人数最多的群众组织的总头头，掌握全部组织成员的名单，这些人正是清查运动主持者心目中的五一六们。果然，刘交代之后，咬人便必然随之而至。不多日子，就咬出一大片。下至普通成员，上至骨干、高参、后台，一切齐备。

这时，清查运动走上高峰，刘也因态度好而被视为“好同志”，官复班长原职，可是他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安祥度日，见人不敢看，低头而过。

后来，可能是实在忍不住内心的痛苦了，他开始“翻案”。那阵子，“翻案”是常见的事，五一六们一会儿承认了，一会儿又翻案，翻不过来又再承认。记得有一个人在“讲用”时还自我批评式地总结过，说是当过五一六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爱翻案。其实，套用孟子的一句话：“余岂爱翻案哉，余不得已也。”

但刘的案是绝对翻不过来的，这么个关键人物，让他翻了案那整个运动的成绩不都泡汤了吗。他于是暗地里串连，他向许多人道过歉，对老胡是再不敢接触了，也托人带过口信来道歉。串连的目的是想找到个把心思一致的人一起逃往北京上访告状。终于找到了一个，就是在轰麻雀时唱“说假话真难办！”的田。

刘和田在干校消失了，这件事领导们当然会觉察到的，一般人却并未觉得。可突然有一天，记得是 6 月 1 日，麦收正忙的时节，开大会宣布，刘死了，在干校附近的小清河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刘是怎么死的？自杀？他杀？失足落水？被人陷害？没作调查，会上没宣布。只记得那天会上的气氛很严厉。总之，“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

他是用芦席卷了草草掩埋的。埋得很浅，埋人的薄薄一层土很快就被猪狗拱开，尸骨暴露。

刘在清查五一六之前当养牛班班长的那段时期工作勤谨，常利用放牛的时间教老乡的孩子们读书识字，送给他们一些纸笔，因此和四乡的老百姓颇有人缘，不少人认识他。现在刘落到这个下场，老百姓也有耳闻，小清河的尸首就是农民

发现的，他们惊诧：“这不是刘老师吗？”赶紧到干校来报信。后来尸骨抛露的也有人看见了。农村的人是重死的，谁看见这情况都不忍，说“干校人的心真狠！”

又过了些时，又有轰动，原来田回来了。走的时候他和刘本来约定夜间在小清河会合，到约定地点不见刘，想必有什么意外，就独自去北京了。上访告状，当然是无结果，北京和干校原是一脉相承，不过那时我们普通人不懂得，总认为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下面执行有偏差，刘、田也是这样想。

于是运动的中心转向批斗田。那天开大会时，田开始还是一副理直气壮舍得一身剐的样子，如实地谈了自己的情况，说这次清查运动中揪出一大片五一六是违背事实的，其中有假，说他和刘在这方面认识相同，所以相约去京上访，途中未见到刘只得独自去了。说话中当然有人吆喝有人质问，毕竟还是侃侃把话说完了。后来告知他刘已死了，问他刘现在何处？他才有点慌了神，意识到这事显然会牵扯到他身上。这时，突然走出一人（可能是那个伶牙俐齿的姓范的军代表，记不清了），啪的一声，把一张纸掷在他面前，田一吓，本是站着的，看一眼后突然就跌坐在身后一个倒立着的竹篓上，几乎要把那竹篓压塌。于是全场轰然。这戏剧性的一幕真是惊心动魄，我这不明真相的人当时简直觉得是田谋杀了刘，那张纸就是铁证。

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张擦大便的纸，从上面的字迹可看出纸是田所有。可能是田在小清河边等刘时肚急，在那儿拉了一次大便，回来却没有“交代”。那张纸摔出来的声势真如山崩海啸，珍藏这一证据的人居然也不嫌脏。这张“铁证如山”的大便纸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能嫁祸于田么？能证明田是谋杀犯么？但是毕竟实现了它的戏剧效果，把田和观众都吓了一跳。

斗田告一段落，把他弄成跳梁小丑形象以后，接着还有好戏。由于刘、田准备上访时曾进行过一些串连，于是这些被串连者便得纷纷坦白交代，有些扮演得好的还要深刻分析自己被他们选中为串连对象的思想根源。其中最精彩的一个情节便是后来传颂一时的“黄鼠狼专咬病鸭子”的隽语。那是曾被田串连过的周在检查交代时说的一句话，周说：“黄鼠狼是要咬鸡咬鸭的，健康的鸡鸭它不敢咬，

专咬没抵抗力的病鸭子。田这个黄鼠狼为什么找到我呢？就因为我本身不健康，有翻案思想，是只病鸭子！”检讨得又生动，又深刻。

事隔多日，这事情已经过去。有一天，发生了一个事故，周从拖拉机上摔下来跌伤了，可能伤得还不轻，他们班的人用担架把他抬到医务室，大夫忙着，一堆人在围观。我去食堂烧火时恰好经过，知道了原委，一看，抬担架的一位是田，穿着一件破旧的黄雨衣，原来他俩是同一个班的。我突然生出灵感：“这不是黄鼠狼抬着病鸭子吗？”想笑，极力忍住，跑了开去。我这人确实有伤忠厚，人家受伤了，我怎么还闪出这么个刁钻念头呢？可是“念头”要闪，有时候本人是管不住的，奈何？

◇ 一件大罪行：整周总理黑材料

挖出这么一个大规模的反革命组织，揪出那么多的五一六反革命，这成绩算是够大的了。但是这些人都在干些什么？如果单是每人填了表格并有少数人参加了社会上抢“黄包袱”的事件，那这个组织就未免大而无当、白费气力了。必须有一项大罪行才能与此相称。这罪行果然就挖掘出来了，原来这帮五一六竟整了周总理的黑材料。这可是事涉党中央的大罪。

具体事实是：这伙人先在报社甲楼宿舍三层某个房间里开黑会，密谋搞这个材料来打倒总理。材料分三部分，按周总理参加革命后的经历分三阶段写，由黑后台指定三个黑秀才（都有名有姓）执笔。初稿写成后，由胡先看后修改，然后再交另一姓赵的黑后台审查定稿（文革前胡是编委，赵是副总编辑，官高一级，当年干革命新闻时就是按这程序审稿，现在干反革命也一仍旧制）。此后，他们还利用报社原有的排字房设备设立黑排字房，胡并根据他当年“搞地下工作的经验”，设定了暗号，谁要进入黑排字房，必须按此暗号执行，里面的人才能辨识是自己人。至此，经过排印，黑材料大功告成。

批斗这件事的大会，也如“心里美”事件一样，是在木工房里开的，但内容却丰富得多了。揪“心里美”像说相声，主要是两人对说。此次却有更大的群众场面，揭发者分布于房子的四方，发言此起彼落，揭出的事实也环环相扣。被斗的人除了胡这个第一号对象外，还凑上其他被点名者。真是热闹非凡。

因为这次会前胡早已被揪去隔离，所以我对此的内容毫无所知。按说我应是“知情人”，却是直到会上经过层层剥笋似的揭发才知道他们竟进行了这么一件

反革命的大工程。此会的戏剧性极强，先是揭黑会，从会场一角跳出一个人来质问：“那天你在甲三楼那个房间坐在什么地方？”胡茫然不知。“你就坐在我的对面，还想赖吗？”另一角又跳出一人补充：“我就坐在你旁边。”纷纷揭发补充以后，那天每个人所坐的位置就如《红楼梦》里“开夜宴”一样都明确排定了。其他情节也都如此由多人细细说清。例如对写材料的黑秀才的人选时如何斟酌，三段文章的内容如何安排，进入排字房敲门时如何敲法，敲几下等等。最有趣的，是连胡改稿时所用的墨水颜色也说到了，是紫色。确实，往日做编辑工作时我们大都爱用毛笔蘸红墨水改稿，胡却有他自己的习惯，爱用一种紫色染料兑成的紫墨水，干反革命勾当时还用老办法，积习难改，忘了地下工作时改变笔迹的“经验”，被揭出来，真是活该。

总之，事实合情合理，发言错落有致，叫人无可怀疑。胡被问得目瞪口呆，我听得惊心动魄。

但胡很顽固，斗了半天，毫无效果，一概说不知道，不承认。于是引起众怒，一个个撸拳扎袖，一拥而上，要打。有一个女的，文革前对胡是很歌功颂德过的，这时也奋勇挤上前去，她虽然也体格健壮，毕竟是女人，被一个大汉挤到一边，那人两个胳膊横架着，为了抢得最佳的打人位置，左右摆动排开他人，一胳膊拐撞到那女人的胸部，痛得她皱眉皱眼。当时我已吓得退到外围角落里，这件事没有亲眼看见，是另一个女同志因鄙其为人告诉我的。我当时正又惊又怕，也没心思去幸灾乐祸了，

这“黑材料”事件当然又是假的。但我始终没弄明白这场戏到底是怎么编导出来的。情节是那么周密，严丝合缝，戏又演得那么前后有序，既有中心，又烘托以横枝密叶，演员也是那么进入角色，表情毫不虚假，叫人不得不信。当时连我也将信将疑，认为虽必有夸大，但也一定是事出有因。我竟全无所知，大约是胡对我这个“牛鬼蛇神”划清界限保了密吧。

这么精彩的玩艺儿是怎么弄出来的呢？“心里美”是一个人说谎，还好办。这回却是一大群人“理直气壮”地说谎，怎么组织呢？若说是主事者事先都编好再逼供信所致，我想那些领导人还不至于此（希望我不是以笨人之心，度智者之腹），若说是“五一六”们“串供”，主事者们再“顺藤摸瓜”凑成的，这些“五

一六”制造这么大的罪行对自己又有啥好处？总之，百思不解。恐怕只有当时那些主事人才能说清楚。他们当然决不会说，

此后运动的中心就是斗胡。胡这个黑后台的地位和作用到了这个阶段才突出出来。大会斗，小会斗，各排游斗，内部秘密斗，车轮战，日夜连轴转。一天就是被人领来领去，在会上直直地矗着。斗的内容，除了五一六的组织和罪行问题外，还涉及他其他的问题，什么当年参加了反苏游行啊，写小说骂共产党啊，一贯污蔑党和党员啊，甚至是不是个真共产党人也是个问题。不过凭良心说，对他比对死去的刘待遇还是要好些，除了一次内部斗争时挨了一个泼妇的一巴掌外，主要的还是文斗。有一次大会斗争，主题是“一贯污蔑党”，老胡本来有突然晕厥的毛病（一会儿就好），这时又发作了，他有预感，就把背紧紧顶着身子后面的桌子，幸好没有跌倒下来，但已是满头冷汗。主持者高兴地说：“看他满头大汗，这次真正触及了他的灵魂。”

胡在文革初期确实有过些派性倾向。由于报社运动中第一个打出的“政治扒手”是冤案，他说了几句公道话，因此为首先出来“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的一派所喜，为与其对立的一派所恶。他也未能免俗，对亲我者亲，疏我者疏。造反派头头刘对他尊敬，常来“请教”，他也出过一些派性斗争的主意。这些，作为当权派之一，当然都不妥，他后来也多次检查过。但是现在这些检查都不行了，现在说的不是派性问题，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反革命组织和罪行问题。这些不存在的问题，他当然一概否认。

起先是硬顶：“没有这事。”后来七斗八斗，众怒难犯，只得改了词儿，从“没有”改为“我不记得了”。问这也不记得，问那也不记得，口气倒是缓和些，听多了也有些滑稽。当时有位刚解放的走资派副总编辑，人是善良的，过去对胡也有好感。这位走资派不是五一六，运动不涉及他，只列席旁听，他当然也相信是有这个反革命组织的。听了反复多次的“不记得”以后，竟笑起来了。他说：“胡，你平时虽然不是特别敏锐，多少也是个编委，怎么现在跟白痴一样了。”

胡说的任何话都“不老实”。每次人们都这样骂他，他总是不吱声。有次忽然接了一句：“不老实的人决没有好下场！”我那时坐在会场群众堆里“受教育”。因为次数多了，我已减少了初时惴惴不安的心情，有时可以胡思乱想，突然听到胡这句话，心想，“他平时是不大会说俏皮话的，这句话倒别有意味。骂

自己还是骂别人？谁不老实，谁没好下场啊？”真想笑，赶紧忍住。幸亏没笑，否则“妖婆陪斗”，不是自讨苦吃吗。

胡这种过于老实坚决否认虚假的态度，不仅在报社绝无仅有，就是在整个全总（应是指“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中的报社可能是指其所属的《工人日报》社——编注）也极少见。后来果然“没有好下场”，成为军代表在全总大会点名的两个顽抗份子之一，罪名也从“黑后台”升级为“现行反革命”。那时大字报多如黑海洋，高音喇叭里天天都嚷着对他的“敦促投降书”。胡此前曾被干校派往附近村里工作，那个村的农民老是在吃饭时端着碗听干校的大喇叭广播，惊奇“那样好的人怎么会是现行反革命？”后来情势缓和时他们还来过干校探望安慰。

在此我还想提一位姓邹的同志，即前文所说女刘的丈夫。他也是那段时间的一个中心人物，挨斗的次数大约仅次于胡。每次领他到各排游斗的时候，总是首先由领他来的人发问：“邹，这是你第几次挨斗了？”“第四十五次。”“那你为什么还不老实交代？”“……”因为这是每次斗他必有的开幕词，所以他把次数记得很清楚，只要每次加一个数就行了，每问必答，又快又准确。

邹其实是可以不受这种待遇的。他在造反派里并不算重要角色，后来七斗八斗，斗出来的也无非是说他看了抄家抄出来的社长笔记本，掌握了许多“党国机密材料”。但这些材料后来也未见泄密出去，不过是作为当时在社内批判“走资派”社长之用罢了。和这件所谓整周总理黑材料的大案，他也没什么关系。他的问题何以搞得那么严重呢？后来才知道，主事者本来是叫他揭发胡的，一再动员启发他都无所贡献，最后只落得把自己推向审判台前，在开大会斗胡的前夕，军代表对他说：“你失去了时机。你本来是可以处于揭发者的地位的。”

当我了解了这些情况对他流露出感谢之情时，他说：“其实我并不是想保护胡，只是我没有材料，要揭发也揭发不出。”

是的，没有材料不能胡编，这本是平常的事，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高尚品质，可是在当时，却是那么难能可贵。

◇ 三个“后台”

这次运动中出场的共有三个“后台”。两个黑后台：胡和赵，前文已经提及。

第三个虽也是“后台”，颜色却好，是“红”的，文革前也是一位副总编辑，由于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现任连长之职，和军代表们一起，主持整五一六的工作。

“黑后台”是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由“组织上”定性加的帽子，“红后台”却未经组织加冕，是由五一六们私下称呼的，五一六人多，所以他这个光荣称号也流传得很广。

赵和胡都曾支持同一派，但支持的情况不完全相同。胡是在文革初起时同情造反派，从而置身漩涡之中，而赵则是在那一派“夺权”以后才“站过队来”的。当时他比胡更激烈，曾说过“革命不革命应以是否站在造反派一边划线”的话。所以人们特别是有些被打倒的当权派们和对立一派的人都觉得他有投机之嫌。但是这个“机”他却投错了，本来好好地闲置在那儿可以逍遥的一个当权派，后来却以“假党员”的名目被揪，进入牛鬼蛇神一伙，受到种种不良待遇，直到清查五一六时还脱不了身。

但是投机比顽固总还是好些。如果事事采取“顺竿爬”的态度，至少可以做到“好汉不吃眼前亏”。例如在清查五一六时他对所有的揭发出来的事都基本承认，过关就比较顺利。当然这对胡就不利了，不但有群众揭发，上面还有不论在革命时还是“反革命”时都比他职务高的人的证明和补充，处境更糟糕，百口莫辩。

关于赵，还有一个较为有趣的故事，是赵的妻子王告诉我的。王是赵在农村时娶的妻，贫农女儿，是报社电话员。她文化水平虽不高，但工作认真负责，为人正直，对赵是恩爱甚至崇拜的。但对赵在文革中的表现却有些失望。清查过程中，赵也和胡一样被隔离。主事者认为他妻子阶级觉悟高，就动员她去说服赵，要他“听党的话”。多时不得见面，王也同意了，还带去些衣服食物。见面时，主事者抱着很大希望，谁知王却朗朗地说出一番话来：“赵，你是老党员了，要对党忠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要说真话，上次你瞎承认自己是假党员，害得组织上到处外调，费钱费人力，你这回要好好接受教训。”一番话说得赵无言以对，主事者也奈何不得。

王告诉我这件事时，我感到深深敬佩。

至于“红后台”郭，现在虽是红黑不同，他和胡文革前的关系却是不错的，胡曾是他领导记者部时的副手。郭从来都是一副立场坚定、作风朴实的工农干部

形象。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从未挨过整，只有一次因一事弄巧成拙，在编委以上的小范围内被批判，胡也参加了批他的会。胡对这批判并不以为然，只随便敷衍了几句，会后郭还提醒胡说：“你不要太轻描淡写了，对你自己不好。”可见两人的关系。

这次情况就不同了，一为阶下囚，一为座上“主”。胡自从被揪出以后，一再请求这位主宰全连之事的连长接谈一次，话传上去了，一直不理。直到有一个关键时刻，突然表示可以接见了。

这态度的变化在于胡的一次小小动摇。人们都知道胡从来没有违心承认过什么“罪行”，因为事实上这一切并不存在，胡自己心里明白，揪出以后，心中坦荡，能吃能睡。所以监视的人批评他说：“我们为了解救你，吃不好睡不着，你倒好，睡得呼呼的，吃馒头还要蘸糖。”终于有一天他们忍不住发话了：“这样死顽固，明天带你到少年班门口斗去，看胡友平的脸往哪儿搁！”少年班，是随父母前往干校的孩子们的集体宿舍，我们的儿子也住在那里。

这一发话，使胡破例地一晚上没睡着觉，辗转反侧。确实，十一二岁的孩子，本该是最天真幸福的日子，可是有了这么两个“与人民为敌”的父母，心中隐痛可知，早已和父母没多少话说了，现在还要带到他面前去，当面斗给他看，他怎么受得了。

第二天一早，胡“交代”了：“我参加了五一六。”这真是一个大突破。不一会儿，监视“小组”就带来了“红后台”的话：“大进步大欢迎，小进步小欢迎！可以约谈一次。”

“小组”于是接着做工作：“参加五一六，是谁介绍的？”“刘。”（这不必费思索）“还知道哪些五一六成员？”“……，不清楚。”“××，××，……是不是？”（话都递到嘴边上了，对于点出的这几个××，××，只要点点头就可以了，可是，承认自己，不过是拼着丢了脸，咬人，可是另一回事。）“……，不清楚。”“那么，还了解哪些情况？”“……。”“你不能到此为止，再继续好好想想，向郭交代也行。”

终于得到了和红后台一见的机会。但还是老一套的谈话。胡向郭说了专案组逼他承认的情况，最后只得摊牌：“我本来不是五一六。”

这下子一切告吹。突破的“成绩”告吹了，对“小进步”的“小欢迎”也告吹了。好在到少年班批斗的事他们竟忘了再提起。

因为事涉自己的亲人，我在这里的叙述就不免噜唆。过去的友情付之东流，利用人家的父子之情逼人说谎，从当事人来看，是够残酷的了，但若站在另一“正确”立场，作为“红后台”，这怕也是顺理成章的吧。所以事后思量，我也不太怨恨。真使我耿耿于怀的倒是前面所说的刘之死。连里死了人，听说红后台不但毫无畏惧不安，反而理直气壮。但老乡们的话：“干校人的心真狠！”却始终烙在我心头。

赵和郭都是文革前作为年轻有为的干部刚被提上副总编辑岗位的，那时领导和群众对他们都较有好评。记得整风反右时曾有一人鸣放，说是整个报社那么多党员只有两个半是够格的，其中有一个半就是郭和赵，至于谁是一个谁是半个我就记不清了。鸣放者后来被打成右派。可见即使是“对党不满”的右派，当时对他俩印象也还是好的。由此我们可以懂得，看人论事，只看平时的言行还是不够，在非常时期，人的本性往往更易显露出来。如从这次运动中看，这“一个半真够格的党员”并不够格。因为我认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起码要具备两条：一是求真，不为私利而说谎话，更不逼迫别人说谎话；二是求善（不是伪善），对人要有同情心，要有人性（我赞成人性论，赞成周扬文革后说的“人性总比兽性好”。）。

◇ 最后胜利在“排除”

清查运动终于结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吹得这么神的反革命大组织、大罪行，却原来净是泡沫。挖出来的人和罪行一个也不成立。

我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也很有意思，每次总要创造些新名词出来。例如被错挖错打的人，到最后证明罪状并不存在的时候，历来叫做“平反”，文革中却不存在平反，叫“解放”。对“右派”也不存在平反，叫“改正”，此前还有“摘帽子”一词。清查五一六的最后也不叫平反，叫“排除”，意思是排除了对某人的不信任，还算他一个“好同志”。按说，全部“反革命分子”都挖错了，这次运动该算失败了吧？不，据那位伶牙俐齿的范代表说“这次运动最大的胜利在排除。”因为这使党更了解了每个同志，也使这么多同志都甩掉了包袱，更使大家增强了团结。我听了这话不免又失笑（爱失笑是我一个严重的毛病），暗暗地写

下了一首“黑诗”，其中运用了这位军代表爱用的许多词句，什么“板上钉钉”、“网开一面”等等（这位军代表很文雅，爱在讲话中用四六句），小标题“最后胜利在排除”就是我黑诗中的最后一句。

“排除”虽是胜利，做起来想必不像抓人和铸案时那么痛快。内情我当然不知，但这一个一个人的个别谈话就很别扭。事隔许久，曾听一位做此工作的同志抱怨，当他找一个人谈话，说“你的问题不存在，组织上已经排除了对你的怀疑，”并把那人的检查材料退还时，他自己觉得态度非常温和，那人却并不感谢，一言不发，只当面把材料撕得粉碎，扬长而去。

这位审查人的同志很委屈，我理解他的委屈。事实上并不是每个参加清查工作的人都曾参与罗织构陷罪状之事的，他也是辛辛苦苦“为党工作”一场，凭什么来受这种“噎”呢？但如果把对方所受的罪一比，我想他也就会心平气和了。

胡当然也被排除了，不过他的地位不同，不能草草谈一次话就了事，还得做一次检讨。按说这个被军代表在整个全总“唯二”点名的人物应当到整个全总干校范围检讨才是，不，不但不在干校，也不在连里，只需在他所在的排里检讨一次就可以了。这为什么，是对他宽大？是觉得不在话下，只须几十个人对付一下？还是为了少扩散影响。不得而知。那晚上，胡在排里念了检讨稿，无非又是过去说过的“亲我者亲，疏我者疏”那一套，念完，拿起笔准备记群众发言，但全场无声，人们知道这只是一个过场，不感兴趣。排领导正准备说几句“检讨还可以，较前深刻。可以解放”便准备散场，突然有一个人叫了声：“我不同意解放胡！”大家诧异，一看，是孙大夫。孙大夫说：“按长时期的揭发，胡的罪行很大，这次检讨全没涉及。如果那些事是真的，这检讨就通不过，如果没有那些事，就得说明白。”有人笑起来，接着就七嘴八舌，闹嗡嗡了。胡拿着笔没法记，排领导也紧张了。当然此事嗡一阵也就罢了，人们不过是开个玩笑，发泄发泄而已，谁也不指望能说清楚。

前已说过，由于我处于边缘地位，不了解内情，只能记一些自己耳闻目睹的公开场面。这个小小范围的运动是这样的波澜起伏，如果让真正策划此事的人写来，一定会比小说还好看吧。但那些人是决不会写的，所以我不得不越俎代庖写一写，目的也不过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医一医一些人的健忘症罢了。

（作者说明：此文全部纪实，绝无一人一事之虚构。）

2009 年 6 月 8 日初稿

2011 年 12 月 28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一册（6）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一章 搞好斗、批、改

第六节 整党建党

本节资料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一日，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关于整党建党的情况报告

北京大学广大革命师生员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教导，在大联合、清队的基础上，进行了整党建党。通过整党建党，纯洁了党的队伍，提高了党员和群众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增强了继续革命的自觉性，进一步发扬了党的“三大作风”，密切了党群关系。二十四个新建立的基层党支部，充分显示了新的领导班子朝气蓬勃的战斗堡垒作用。全校出现了团结战斗、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正以临战姿态深入开展斗、批、改，掀起了教育革命的新高潮。

一、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大学习、大批判，实行开门整党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的教导，整党一开始，宣传队就放手发动党内外群众，以革命的方法实行开门整党。

由于过去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毒害，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党员严重脱离群众，甚至党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因此，在一些党员中存在着害怕开门整党，在一些党外群众中存在着“与己无关”的错误认识。宣传队及时组织师生员工反复学习毛主席“五十字”大纲和“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的伟大教导，学习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学习林副主席在“九大”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使党员

和群众认识到：开门整党还是关门整党，是毛主席的建党路线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根本区别。要继续革命，就要开门整党，而且要彻底敞开大门，一开到底，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保证国家不变颜色的重大革命措施。大家把整党建党同进行世界革命联系起来；同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联系起来；同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和改造文化教育阵地联系起来；同人人需要改造，彻底摧毁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联系起来。广大群众说：“关心整党，就是关心革命，关心政权。毛主席给了我们权力，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

通过大学习，大大焕发了党内外群众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除了敌对分子以外，人人都参加了整党建党工作。全校立即掀起了一个大学习、大批判的高潮。

广大党员和群众愤怒控诉和声讨了大叛徒刘少奇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刘仁及其在北大的代理人陆平、彭佩云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北京大学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罪行。他们在“要发展业务上起作用的党员”、

“‘名人’‘专家’‘权威’入党，可以先接受后审查”的口号下，把特务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拉入党内；他们在“先专后红”、“越专越红”的口号下，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使不少师生走上了白专道路，有的蜕化变质，甚至投敌叛国，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有一个系就出了一百多个右派分子；他们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业务水平低”为借口，排挤调干生、复员转业军人和工农出身的学生。由于极力推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致使党员队伍在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严重不纯。有的党员在“阶级斗争熄灭论”、“业务党”、“读书做官论”的毒害下，追求所谓“政治上过得去，业务上过得硬，生活上过得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有一个系的党支部，党员忙于埋头搞业务，不问政治，不愿意搞党的工作，致使这个党支部完全瘫痪，等等。

北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深深地教育了师生员工。广大党员和群众遵循毛主席“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的教导，以高昂的政治热情投入革命的大批判。在大批判中，密切联系北大的实际，联系自己所中的毒，掀起了“火线”整党的新高潮。党员和党员干部在大批判中狠抓要害，猛触灵魂，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有的当时就被群众通过过组织生活，有的党员干部“两步并成一步走”，既获得解放，同时又被通过过了组织生活。

化学系有个讲师，愤怒地控诉和批判刘少奇鼓吹的黑“六论”，检查自己被“阶级斗争熄灭论”蒙住了眼睛，被“读书做官论”牵着鼻子，为了研究论文中的一条“曲线”，不愿参加国防科研的错误。当场把留苏时得的副博士证撕得粉碎，决心同修正主义思想决裂，一心一意地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在大批判中，党内外群众紧密联系运动的后期在一部分党员和群众中出现的所谓“政治危险论”、“读书无用论”、“文科危险论”的反动思潮，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东语系原总支副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有消极情绪，经群众帮助，解放后结合到系革委会，但是工作不大胆，有三怕：怕管严了，说自己要官腔；怕管宽了，说自己争权；怕管错了，说自己复旧。因此，给自己“约法三章”：出头露面的事不干；“得罪”群众的事不干；单独表态的事不干。他在群众性大学习、大批判的高潮中，狠批了“入党做官论”。他说：“过去当官做老爷，运动中受了冲击，就走向了‘当干部危险’的另一个极端。这‘三怕’、‘三章’背后潜伏着黑‘六论’的阴魂，隐藏着一个万恶的‘私’字”。现在被选进新的支部委员会，担任支部副书记，在教育革命中，积极出主意，大胆抓支部的思想工作，受到群众的好评。

在大学习、大批判中，党外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群众用毛泽东思想对本单位的党员逐个加以分析，针对不同问题赠送毛主席语录。有的为了帮助党员斗私批修，连续谈话达几十次。有的还同党员结成“一对红”、“一串红”，开展“一帮一”的活动。许多群众在大学习、大批判中，一方面对党员进行继续革命的再教育，另一方面又主动把自己摆进去，在“参加评论”中受教育，用新党章作标准，自觉地用无产阶级党性要求自己，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们说：少参加一回整党，对自己都是很大损失。”

实践正如毛主席所深刻指出的：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党外群众参加整党，不仅帮助教育了党员，也深深地教育了自己，大家从一些党员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同党员共同学习，共同批判，共同提高，共同受到了一次毛主席建党路线的再教育。

二、提倡斗争哲学，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

器。”过去北大在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毒害下，党内生活存在着严重的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和宗派主义，丧失了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这种风气反映在这次整党建党中，则是“你好我也好，大家通过就拉倒”。对此，宣传队发动群众进行了充分地揭露和批判，把那种“睁只眼，闭只眼，免得冒风险；不说好，不说坏，谁也不见怪”的好人主义批臭。使大家认识到：“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没有斗争的哲学，不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就不能“清除废料”，在思想上实现“吐故纳新”，就不能焕发党内外群众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

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首先要求党员要有积极的自我革命精神。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如果党员没有自我革命精神，不能象林副主席所指出的“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不能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结果还是不能搞好在思想上的整顿。开始有的党员在斗私批修时出现“认罪式”的检查，或者罗列一大堆现象，不分主次，“算豆腐帐”的现象，有的群众提出什么意见，就检查什么，因此，群众总是通不过。特别是少数错误严重、态度又比较消极的党员，群众有些气，有的说：“对照‘五十字’和新党章，这些人都不够条件，干脆吐故算了。”在这种情况下，宣传队一方面帮助教育党员提高革命的自觉性，正确对待群众，抓住要害，触及灵魂；另一方面引导群众对党员要作全面地、历史地分析，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即使是对那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也要一分为二，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教导，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内、革命队伍内部同志间的辩证关系。既要看到这些人犯有严重错误，又要看到他们绝大多数在本质上是热爱毛主席的，热爱社会主义的；既要看到这些人长年来受修正主义毒害比较深，又要看到在三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的锻炼，特别是工人阶级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以后的现实表现；既要看到他们离“五十字”和新党章的要求有差距，又要相信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经过帮助教育，用“五十字”武装头脑，是能够继续发挥党员的先锋作用的。因此，既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轻易“吐故”，又不能降低标准，放弃原则，敷衍了事。

生物系有一个讲师，在“业务党”的毒害下，一心想成名成家，不问政治，埋头钻研业务，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革命群众的批判。但是白天批判他，晚

上在家里继续研究写论文。在整党中，有的人主张把他挂起来，或吐故算了。大家遵照毛主席“分清是非关系，可以教育人，可以团结全党。党内有争论，有批评，有斗争，这是必要的。……甚至采取一点斗争，这是为了帮助他改正错误，是为了帮助人家”的教导，对他的问题一方面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另一方面又热情地帮助他认识和改正错误。这个讲师在大、小会上检查了五次，宣传队和党内外群众先后找他谈了八次话，使他在思想上展开激烈的斗争，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最后，他亮出了“有本事可以出人头地”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判，认识到“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不久，被通过过了组织生活。

还有的党员有资产阶级派性，在斗私批修时，检查得“好”，一旦被通过过了组织生活，马上“老病复发”，依然如故。在这种情况下，宣传队和革命群众再次对他进行批评教育，让他回到学习班斗私批修，直到真正触及灵魂，改正了错误，才重新过组织生活。

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中，我们首先引导群众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那些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坚决清除出党，从组织上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同时对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非党群众加以区别，一方面对那些死气沉沉经教育仍无转变，不够条件，不起作用的党员，劝其退党；另一方面耐心地帮助犯了错误的党员（其中包括少数犯了严重错误必须给予处分的党员）提高觉悟，改正错误，以从思想上保证党组织的先进性。

坚持思想教育为主，组织处理为辅，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

由于党内外群众掌握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了积极的思想斗争，坚持原则，注意政策，“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使党员和群众受到深刻的教育。有的同志说：“这次整党，批评是尖锐的，态度是诚恳的，帮助是热情的，心情是舒畅的。多少年来没有过这么深刻的党内思想斗争。”

三、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

整党建党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把社会主义革命持续不断地推向前进的伟大战略措施。通过整党建党，要提高每一个共产党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的自觉性。在整党中，不仅使那些有错误的党员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更重要的是从中总结经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变成继续革命的宝贵财富。那种认为“检查了，通过了，没事了”的思想，是决不会把错误和挫折变为继续革命的动力的。实践证明：认真总结经验，是对党员更加深刻的路线斗争的再教育。

在总结经验中，大家还指出：知识分子党员中，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人多，绝大部分是解放后入党的，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比较深，其要害问题是爱谁、恨谁、跟谁走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

数力系有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被称为“四副”的人，即留苏副博士、副教授、副总支书记、副系主任。由于她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冲击，她还认为自己辛辛苦苦十七年，“反正否定不了”。这次整党中，她联系自己入党前后的历史，认识到：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却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觉悟。因此，在两个阶级争夺青年的关键时刻，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为资产阶级培养了接班人。她在谈到自己的教训时说：“自己入了党就认为政治方向完全解决了，就已经无产阶级化了。忘记了自己身上的剥削阶级的烙印；忘记了知识分子身上革命不彻底的弱点；忘记了十几年来所中的毒。虽然组织上入了党，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今后要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就要从世界观上解决恨谁、爱谁、跟谁走的问题。”

在总结经验时，宣传队还遵照毛主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导，引导党员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联系我们党内四十八年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联系解放后二十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联系三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历史，联系今后还要继续革命的历史任务。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提高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提高继续革命的自觉性。并且经常以五个方面考验和检查自己：（1）在两个阶级的斗争中，看自己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2）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看自己坚持的是社会主义的方向，还是资本主义的方向；（3）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看自己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4）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看仅仅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动力，还是同时又把自己经常当作革命的对象；（5）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看只是把自己管好，还是坚持起到“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

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作用。广大党员说：“这次整党，真正整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觉悟，整出了继续革命的自觉性，是新的政治生命的开始，继续革命的起点。”

在整党建党中，按照新党章的规定，经过群众路线，正确地做好“吐故纳新”的工作，采取积极、慎重的方针，吸收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同时，按照新党章规定，在基层建立了新的党支部。实行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同学校中的革命领导干部和师生员工中的优秀党员相结合，老、中、青相结合。领导班子中，宣传队占百分之三十九，新成份包括纳新的党员占百分之四十三。以老带新，以新促老，使支部领导既富有领导工作经验，又具有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形成一个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支部建立后，继续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狠抓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不断组织党员学习毛主席的建党学说，学习新党章，经常召开有党外群众参加评论的讲用会和生活会；到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去锻炼和考验新的领导班子和党员的作用。结合形势、任务，采取小整风的方法，集中解决领导班子和党员中存在的问题，使其经常听取群众的批评，接受群众的监督，从而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使党组织能够成为“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二日，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整党建党情况报告

从去年七月至十一月进行了整党建党。

一、加强党的领导，狠抓两条路线的斗争

二、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开门整党

三、认真贯彻党的政策，搞好吐故纳新

四、建立坚强的党支部，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

附件：

关于党员组织处理的一些例子

一、对党员叛变自首的处理

武嘉澍，原副厂长，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二年初入党，任青岛市委宣传委员，同年六月被捕。被捕后，两次写自首书，出卖了同志。一九

五七年审干时，在刘少奇“叛徒哲学”影响下，曾以“念其事情发生时入党不久，事后也曾作过交代，事情已隔很长时间，现在工作表现还好，出狱后也没有其他问题”为理由，做了一般历史问题的结论，留在党内。这次整党中，重新审查，发现他在过去的交代中隐瞒了写自首书的重大情节，并认为一九五七年所作的结论是错误的。定为叛徒，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清除出党。

范广增，原档案科长，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一九四五年春参加我地下党组织，一九四六年夏叛变自首，供出了地下党员，参加了国民党外围组织情报组和国民党，长期隐瞒。在这次清队中，他作了交代，定为叛徒，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清除出党。

二、对混入党内的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处理

张洪志，原党委组织部长，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均为工人。一九四五年参加一贯道，后充当坛主，一九四七年又参加国民党，一九四八年参加中统特务组织。一九五三年隐瞒了反革命历史，混入党内。清队中作了坦白交代，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不给戴反革命分子帽子。清除出党。

李志广，原基建科长，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一九四〇年参加反动会道门“后天道”，一九四四年当了副盘主，积极捐款，发展道徒，利用封建迷信，进行反动宣传。一九四九年，他隐瞒反动身份，混入党内。一九六三年党员登记时，他回村贿赂其同伙道徒（解放后当了村干部），订了攻守同盟。这次清队中他作了坦白交代，不给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

蔡宝生，工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旧职员。一九三六年参加反动会道门“八方道”，一九四四年曾任伪保长九个月。在此期间，他多次逼收乡丁费，多次为日寇派夫。一九四七年，他仗势霸占民妻，达二年之久。一九五〇年，他隐瞒反动历史，混入党内。这次清队中作了坦白交代，不给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

夏树德，原台车车间副主任，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均为工人。一九五〇年入党。他思想一贯反动，破坏文化大革命，公然对抗“七·二三”布告，连续制造重大事故十二起，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在群众批斗时，夏态度嚣张，拒不认罪，民愤极大。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专政。开除党籍。

三、对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的处理

张鹤田，女，原党委组织部干事，家庭出身旧职员。一九三九年张鹤田的母亲带着她改嫁给一李姓地主，李死后，张母为了占有李的财产，于一九四一年将十五岁的张鹤田嫁给李的儿子。此人曾任日伪区长、稽征局长，有地九十亩，房二十六间，雇长工二个，还雇有专门侍候张鹤田的女佣人。一九四五年冬解放时离婚。张在地主家主持家务，连续从事剥削，超过三年，构成地主成份。一九五四年，她隐瞒两岁，有意将嫁到地主家的时间缩短两年，未被定为地主分子。在这次清队中作了交代，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郭显明，工人，家庭出身贫农。解放前，他在国民党部队当过五年兵。一九四六年他到地主家当女婿，从事剥削，到解放时虽不足三年，但解放后他还出租房屋继续剥削别人。一九五五年他隐瞒历史，混入党内，仍收房租，直到文化大革命，先后共收房租两千五百元。他在这次清队中作了交代，定为阶级异己分子，没有给他戴这个帽子。开除党籍。

四、对死气沉沉的党员的处理

王景泰，原材料科管库员，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工人。一九六〇年入党。他一贯不问政治，觉悟很低，犯过贪污受贿的错误。他上班打瞌睡，学习时睡觉，工作马马虎虎，长期以来却起早贪黑开荒种地，一心为私。因此，他入党时曾被延长预备期一年，一九六三年党员登记时又缓登两年。这次整党中，他开始不斗私，后来经多次教育，勉强做了点敷衍了事的检查，而行动上仍坚持错误，革命意志衰退，完全丧失了党员条件。劝其退党。

肖云明，工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农民。一九六二年入党，过去一贯不问政治，学习不发言，好吃好喝，经常打兔捕鱼，人称“打兔子队长”，群众问他为什么要入党，他说我也不知道。这次整党，经教育，对错误有深刻认识，转变显著，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生产干劲足，几次冒着生命危险抢修机车，当了生产突击队副队长，群众说：通过整党，老肖好象换了一个人。已恢复组织生活。

五、对犯严重错误和犯走资派错误的党员的处理

李江，工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四九年入党。一九六三年党员登记时，受原党委组织部部长刘月岐的欺骗和利诱，将别人检举刘入党后

又参加国民党的材料从档案中取出销毁，并长期向组织隐瞒，严重丧失了阶级立场。这次清队中，李江主动坦白交代，大胆揭发了刘月岐的问题，在整党中又作了深刻检查。已恢复组织生活，免予处分。

孙运来，原副厂长，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均为工人。一九四八年入党。他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积极推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实行“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专家治厂”，对工人实行“管、卡、压”，犯了走资派错误，文化大革命中又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经过群众批判，他作了深刻检查，态度诚恳，得到群众谅解。已恢复组织生活，免予处分。

吴江枫，原车间主任，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五二年入党。他长期推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文化大革命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走资派错误。运动中，群众对他进行几十次帮助，他不但不作触及灵魂的检查，还玩弄两面派手法，对抗群众，态度不好。暂时“挂”起来，继续做耐心细致的工作，如果态度有了转变，可以恢复组织生活，但要给予适当的处分。

六、对有剥削行为的党员的处理

徐承佑，原机车解体车间党支部书记，家庭出身旧职员，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五四年入党。在他母亲死后，一九六二年，他一次领取了三年房租，共一千多元。当时，他曾向旧党委副书记讲过这件事。一九六三年，组织上指出其错误后，他再没有领取房租。这次整党中，他作了深刻检查。恢复其组织生活，免予处分。

七、对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党员的处理

康长，工人，家庭出身贫农。解放前参加国民党、国民党情报组，证据确凿。他一九六〇年隐瞒历史，混入党内。在这次清队中，他的态度极为恶劣，坚持反动立场，先后翻案一百多次，还发誓“宁愿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反革命”，也不交代问题，引起广大革命群众的极大愤慨。开除党籍。

刘志，原材料科主任计划员，出身于工人家庭。一九五四年入党。解放前曾参加国民党、国民党情报组和反动会道门正字普济会、洪道社。他在一九四八年当伪保丁期间，多次伙同他人抓兵、要粮、催款，敲诈勒索。解放后，他隐瞒了当伪保丁时的历史，这次清队中作了坦白交代。给予留党察看处分。

边双泉，工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一九四八年参加国民党，是“挂名党员”，这次清队中作了交代和检查。他平时表现较好。恢复组织生活，免予处分。

八、对隐瞒直系亲属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党员的处理

杨振明，原武装部干事，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六〇年入党。幼年时，他父亲因替日伪搜集我军情报，被我镇压。他入党后，已知道他父亲的情况，仍向组织隐瞒。这次整党中作了坦白交代，检查深刻，免予处分。

九、对犯有其他错误的党员的处理

范春华，原保卫科副科长，家庭出身下中农，本人成份工人。在一九六八年出操时，他由于政治上疏忽大意，喊了反动口号，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经审查，他出身成份好，政治历史清楚，一贯表现较好，事后检查深刻，取得了群众谅解。免予处分。

一九七〇年四月十八日，康生接见出席中央和全军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同志们：

有些问题想和同志们谈一谈，交换交换意见。我觉得这次会议开得还好。之所以好，首先就是纪登奎同志、郭玉峰同志以及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在未开会前做过长期的准备工作，调查工作，研究工作，所以心里有底了，这是第一。

第二，由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指导的八三四一部队在六厂二校做过典型的实践工作，这方面的会议有很大的帮助，纪登奎同志与其他同志亲自到六厂二校去检查过，接触过，此外，也有同志们的努力，各地方交换的经验很多。

所以，这方面应当说，学习了主席著作，学习了林副主席的“九大”报告，学习了六厂二校的经验，交换了各地方的经验，讨论了文件，思想上、理论上有所提高。

有些政策问题大家也交换了意见。政策问题，各地方是平衡的、就是一个单位，这一个部分同那一部分也是平衡的。

所以，任何经验，必须结合具体的单位，具体的地区、具体的环境来运用，不能硬套。有些问题咱们在会议上觉得可以了，但是在实践中间感到还存在着问题。对一个问题，总是象毛主席所讲的，实践，理论，再实践，不断的提高，不断的修正，不断的发展。

你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各地方的负责同志要抓这件事，但是负责同志抓的不够，这个批评完全对。

刚才我在汽车上又回想了一下，在全国解放以后，叛徒刘少奇、安子文领导的组织部，我是没有去过的。人家不大高兴我去，我也不太高兴去。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在取得了全国政权的条件下，党的建设到底应该怎么做？这个问题在世界上所谓已经解决了，实际上在斯大林时代是没有解决的，那个时候赫鲁晓夫还没有上台，矛盾还没有暴露。所谓解决，也就是斯大林时代的联共党史实行的那五条原则，那五条原则当然是对的，但是那五条基本上还是同他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差不多，一般的来讲，没有针对取得了全国政权以后这个党应该怎么做。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做组织工作的人，总是常常不做思想工作，常常把思想工作同组织工作割裂开。这一点，我自己是有经验的。一九二八年我做过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一九二九年我又在中央组织部做工作。我本身就是这样，做组织工作忙于组织事务，不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工作。这件事不只是我，当时很多同志都是这样的，当然不包括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大家昨天晚上已经知道了，毛主席做过党的组织工作。

由于长期形成的这么一种习惯，直到延安整风的时候，毛主席在整风报告中提出两个问题，使我深刻的想了很久很久。

一个问题，有的人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过去我就没有想过思想上入党问题，总是觉得组织上入了党，大概思想上也就入了党，否则他为什么加入共产党呢？这正如林副主席所讲的四个第一，思想工作同政治工作有关系。但是，做政治工作的人有时不把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你们读毛选就可以看到，毛主席在整风报告中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毛主席在整风报告中讲，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这件事对我也有相当大的启发，平常想，谁没有一点主观主义呢，怎么还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从前了解党性不纯就是不服从纪律，不好好工作，说怪话，

消极怠工，贪污腐化等等，这是大家懂得的，但是，说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主要表现，我就没有想过。

所以，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把建党的工作，党的组织工作，提高到思想工作方面去了，提高到政治方面去了，一直提高到哲学世界观方面去了。

主席的整风报告发表了几十年，但是做党的组织工作的人，不注意或者不十分注意思想工作，直到现在还是存在的，没有完全实行的。当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通过过去的整风，毛泽东思想直接为广大群众所学习、所掌握、所运用，那比以前还是大大的提高了，但是并不说已经完全解决了。

拿现在的全国整党工作来看，根据同志们的报告，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事实，这是同志们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大胜利。整个的整党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现在全国整党工作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存在的问题不少，我觉得首先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从思想上了解整党工作抓的还不够。

譬如说，从你们的文件中间来看，全党真正的学习党章，报纸上解释党章，党的刊物上介绍党章的文章，还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从材料中间看，广东抓的比较紧，党章通过一周年的时候，《解放军报》写了一篇文章，现在人民日报转载了，也加以注意了。但是，从文章的本身来看，解释党章本身的很少，主要是讲的体会。

全国积极的拥护毛主席的整党“五十字”方针，在会议上大家都充分的讲了。但是，“五十字”方针到底怎样了解，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也并不是很深入的。我看你们简报上讲“五十字”方针的讨论也是各式各样的意见，这很好嘛！大家交换意见嘛！但是，由此可见，思想方面，解释工作方面，还要做大量的工作。

总而言之，提出一个问题，各地方整党头一条只是说要思想整党，这是大家一致的意见。但是思想工作到底怎样做？并不是那样很具体。

譬如说，毛主席的“五十字”方针，各地方也好，在我们的会议上也好，大家很注意这个问题，很拥护这个问题，很强调这个问题，这是完全对的，因为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嘛！大家知道，一九六七年十月青海省的同志提出来，他们那里是不是可以整顿党的组织，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毛主席在这个电报请示上作了批示，针对文化大革命中间所发生的问题，对整党建党作了高度的概

括。全国全党的同志注意它，学习它，研究它，不是偶然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还得注意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把“五十字”方针孤立起来，把历史方面割断，有时候强调得好象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只是从“五十字”方针开始的，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路线只是从“五十字”方针才开始的，就是从一九六七年十月才开始的。这一点昨天陈伯达同志讲了，事先我们也交换了意见，不能把整个党的历史、把整个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同“五十字”方针截然割裂，同志们学习、理解“五十字”的整党方针，必须同整个的毛泽东思想、整个的毛主席的建党路线联系起来。我们“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总纲的第四段，记载了这样的文字：“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我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无论在民主革命中间、无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间、无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间，也无论在国际斗争中间，都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发展是一样的，是在同阶级敌人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间发展壮大起来的。同志们回顾一下，在民主革命中间、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同形形色色的“左”的右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开始是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以后同瞿秋白的“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同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然后同王明、博古、张闻天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然后又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走集体道路还是走个体道路问题上进行了斗争，将来五卷出版的时候，更可以看的清楚了，然后又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作斗争，在农业问题上同邓子恢作斗争，一九五九年同彭德怀作斗争；文化大革命以后同以刘少奇为首的叛徒集团作斗争，在每一个阶段中都有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每一个阶段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也是整党建党的过程，也是毛泽东思想发扬光大的过程，也是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更加前进，更加巩固，更加团结，更加提高的过程，我们所以能够战胜阶级

敌人，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在国际上取得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胜利，都是由于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我们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包括组织上的建党的思想在内，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同整个的毛泽东思想包括哲学的、经济的、政治的、阶级斗争的思想割裂开，似乎除了毛泽东思想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毛泽东的建党路线。因为党领导一切，毛主席语录的三十三个部分，起码大多数是关于建党的问题，哪里只有“五十字”的方针呢！如果把“五十字”方针同整个党的历史，同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割裂开，那就不会了解到“五十字”的建党方针，如果把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同整个的毛泽东思想割裂开，就不会真正的了解毛主席的建党思想。

你们不是常拿《毛主席语录》吗？你们打开语录看一看，第一部分是讲共产党，第二部分是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第十部分是讲党委领导，第十一部分是讲群众路线，第十二部分是讲政治工作，第十六部分是讲教育和训练，第十七部分是讲为人民服务，第十九部分是讲革命英雄主义，第二十三部分是讲调查研究，第二十四部分是讲纠正错误思想，第二十五部分是讲团结，第二十七部分是讲批评和自我批评，第二十八部分是讲共产党员，第二十九部分是讲干部、第三十三部分是讲学习，这些部分直接讲到党问题，其它部分也涉及到党的问题。

所以不要把“五十字”方针同整个党的历史、毛主席的整党建党思想割裂开，不要把毛主席的整党建党思想同整个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指导整党建党工作的同志，必须全部去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这是一方面。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没有和同志们交换意见，这不怪同志们。

另一方面，大家很重视“五十字”整党方针，但是到底“五十字”包含那些问题，怎样认识、有各式各样的意见。这个问题，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在六厂二校整党建党座谈会上讲过一下。我说不能把“五十字”作为笼统的口号，应当有个具体分析，我也给同志们讲过，一九六七年十月中共青海省党的核心小组向中央关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是不是可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请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的这么五十字：“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叛徒路线讲的：“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这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党员脱离群众的现象讲的；“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这

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讲的，针对刘、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讲的；“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讲的，这都是有当时的针对性的。那就是说，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了一些问题，毛主席又把他的建党路线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作了一个高度的概括，概括成“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但是，这个高度的概括，我刚才讲了，离不开当时的形势，我们学习“五十字”方针，一方面，不应当割断历史；另一方面，要善于分析，到底包括那些内容。

首先，我们研究“五十字”方针，应当看它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章所讲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这是说明党的性质问题。这样一个先锋队的党，它必须具备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呢？首先，它是先进的部队。这一点在“五十字”中间没有明确提出。有的同志说，到底那个为重点，大概他还没有完全看懂。基本的问题，本身就是一句话，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所谓先锋队，就是先进的部队。所谓先进的部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部队。没有这样的东西，有什么阶级斗争呢？没有这样的东西，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呢？很清楚，我们整党首先要从思想上整党，就是这个意思。“五十字”方针虽然没有讲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武装，但是毛主席用先锋队组织表达了这个问题。从字面上看没有写，但是如果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什么先进的问题。所以，我说这一点也反映了我们在党的工作方面不重视思想性的问题，不着重思想第一。大家很清楚，没有毛泽东思想，很多东西都没有嘛！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长期的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战胜一切修正主义以及“左”的右的机会主义，也不可能战胜刘少奇叛徒集团。

一个共产党员，首先的一个问题，是思想入党。我们的党是先进的，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个无产阶级的党。

我们这个党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这是讲的什么呢？这是讲的我们党的阶级基础，讲的我们党的组织不同于一般的群众组织。它是无产阶级的，但不是所有的无产阶级都可以入党；它是革命的，但不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可以入党；

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而且是先进的分子才可以入党。也就是说，赞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拥护毛泽东思想，学习贯彻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一些人才能入党。这种先进分子必须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就是你们讲的“三忠于”、“四无限”，这种先进分子必须为人民服务，进行阶级斗争，敢于英勇的牺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敢于进行自我批评，特别是敢于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我们的阶级基础。

在整党中间，有些地方不是犯了错误吗？在前一个时期，存在着把党的水平降低到革命群众的水平的问题。在座的同志你们都知道，曾经有一个时候发生所谓谁领导整党的问题，是以共产党的党员中间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干部、部队的干部、支左的干部为核心领导整党，还是以红卫兵各式各样的那些所谓造反派领导整党的问题。有些领导同志、老共产党员也一时糊涂，把党的水平降低到群众的水平。

同志们要问，我们整党不是要实行群众路线吗？又说实行群众路线，又说不要把党的水平降低到群众的水平，这如何理解呢？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阶级路线、党的路线，也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群众路线同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右倾机会主义作群众尾巴，极“左”思潮的人可以走到否认党的领导，所有这些思想在整党中间都应该肃清。大家记得文化大革命中间不是产生了一个“二月逆流”吗！“二月逆流”时，谭震林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发谬论，说文化大革命中只讲群众路线不要党的领导，他说这叫作形而上学。可笑得很，他大概也不晓得形而上学是什么东西。总而言之，他把群众路线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实际上“二月逆流”的干将们否定了党的领导，当时我们反驳谭震林你把毛主席摆在那里去了？毛主席是我们党的领袖，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领导的怎么没有党的领导？！我们揭露他说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毛主席的领导。

党组织应当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党和群众的关系，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也是个辩证关系。要领导群众，就要依靠群众。所以，我们的整党是开门整党，放弃党的领导是错误的。不依靠群众也是错误的。这两方面是辩证的。所以，要进一步理解怎样叫作“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不是群众领导党，而是党领导群众。不能脱离群众，要走群众路线。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毛泽东思想，有了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广大群众才能进行阶级斗争，才能同阶级敌人进行战斗，没有先进的队伍，先进的思想、先进的阶级基础和广大群众的拥护，

怎么进行阶级斗争呢？即是进行了也是要失败的。古巴的格瓦拉不是说他在那时进行阶级斗争吗，结果怎样呢？我刚才讲的这一条，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黑《修养》讲的。黑《修养》只是讲“修养”，不进行阶级斗争，党必须在阶级斗争中才能领导革命到胜利，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还有一个“朝气蓬勃”，就是要实行民主集中制，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而不是作“驯服工具”。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毛泽东思想，有了先进分子加入党，有了广大革命群众，一方面领导他们，一方面又要向他们学习，依靠他们去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党就成为一个先锋队组织。这样的党，在苏联来说就是列宁的党，在中国来说就是毛泽东的党。

所以，对“五十字”的理解，一方面不要割断联系，另一方面不要当作笼统的一个口号，要有具体的分析，具体的理解，在理解过程中，就可以看到毛主席的指示是一个整体，伯达同志昨天晚上不是念了毛主席一九三七年给陕北公学的题词吗，毛主席在题词中说：“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里也是讲的“先锋队”，关于“先锋队”的问题，毛主席也不只是一九六七年才提出来的。毛主席接着说：“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你们学习“五十字”方针，可以和它联系起来。

你们学习“五十字”方针，也可以和接班人五条联系起来。接班人头一条，就是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搞修正主义，这就是“五十字”方针所说的先进分子；第二条，要为绝大多数的人服务，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为少数的资产阶级服务，这就是“五十字”方针里面所说的阶级斗争；第三条，要团结绝大多数人，甚至要团结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道工作，这就是讲怎样领导群众团结群众啊！第四条、第五条是民主集中制问题，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这就是生动活泼嘛！

所有这些问题，就是说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学习毛主席的方针、路线，不能不求甚解。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我说，大家重视“五十字”方针是对的，但是，第一，学习毛主席的思想，不要割断历史；第二，不要不求甚解，当作口号，要作具体分析；另外，要下一点工夫，我们的思想才能统一起来。这是我要和同志们讲的第一个问题。

我要和同志们讲的第二个问题，我刚才讲了，由于我们工作做的不够，所以各地方也好，我们这次会议也好，对于党章的学习重视不够。比如，我刚才说了，现在报纸上解释党章的文章，都是一些体会感想等等。对于党章本身的解释，我们没有作，红旗杂志也没有作，你们也没有作，在会议上也没有专门讨论。党章总纲中很多问题需要解释，比如说，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什么说这是毛主席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什么这是马克思列宁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大家学习具体政策是对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不要因为注意具体政策而放松了对于整个党章的学习。

最近，苏联修正主义在《共产党人》第四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有气无力的批判，诬蔑我们的党章，这说明我们的党章打中了他们的要害，使他们胆战心惊。

所以在党章的问题上，我们同党内外隐藏的敌人，在进行着一番激烈的斗争。是拥护党章，还是反对党章，还是对党章表示漠不关心，这都是问题。

一九六七年一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要修改党章，首先指示我们，要动员基层党组织参加修改党章，修改党章过去都是领导机关搞，这一次毛主席说要动员基层的党员参加修改党章，并做了一个示范，把这个任务首先交给上海的同志。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央、中央文革根据上海同志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来修改党章的经验，向全党、全军、全国发出了关于修改党章的通知，发动各个方面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参加这个工作。这个通知发下去以后，在全国范围内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性的修改党章的运动就展开了。全国上下各个地方，凡是有条件的地区、部门、单位都广泛地发动了党内外的革命群众进行了热烈的认真的讨论和修改，并且提出了许许多多的修改草案。中央机关凡是有条件的都起草了一份。据我知道，组织部起草了一份，中央办公厅起草了一份，党校起草了一份，各省市综合了一下下面的意见，送到中央来的一共一百二十六份。从一九六七年毛主席发出指示到一九六八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整整经过了一年的时

间，从下而上来修改党章，这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也证明经过文化大革命，各地的党员和革命群众敢于打破迷信，敢于修改党章，敢于负责，有的还搞的不错。应当说现在的党章，一方面是根据了毛主席的指示原则。另一方面也集中了广大干部和革命群众的集体智慧。总而言之，整个的过程是经过了从下而上，从上而下的几次反复讨论，一九六八年集中到十二中全会各个小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各式的修改意见。中央文革根据十二中全会的意见写成了党章草案，然后再发下去讨论，十二中全会到“九大”以前，又在下面充分的进行了讨论，集中了各方面的意见到中央来，然后中央吸收一些好的意见，经过修改，作为党章（草案）提到“九大”。“九大”各小组又充分地进行了讨论，四月十四日才最后通过。

这样通过修改党章，就实现了广泛的有领导的党内的民主，这种民主生活，可以说在党内以及在外国党中间是没有过的，这实际上是最大的民主。

另一方面，通过修改党章，把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和对党的责任心都调动起来了。大家开动脑筋，反对刘少奇“八大”搞的那个党章，共同拟了新的党章，新党章把“八大”的六十几条变成十二条。这是毛主席的指示，说要通俗易懂。这个党章有毛主席的指示，有广大群众的智慧。在我们修改中间，参照了马克思起草的第一个党章——共产党法规，也参照了列宁一九零三年起草的那一个党章。我们去掉了形式的繁琐的东西，把精华吸收到我们的党章里面来了。那么，我们怎么看这个党章呢？我没有和同志们正式交换意见，但是我觉得“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有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新党章重新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七大”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革命的指针。

这一点我要说明一下。在一个时候，有一种错误说法，说“七大”的党章是叛徒刘少奇搞的，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当时有一个修改党章的委员会，名义上是刘少奇作头子，但是要把毛主席的思想写在党章上，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结果，就是说，是反对王明的修正主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反对彭德怀投降主义，反对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个结果，所以在这个中间反映到党章修改委员会里面，写上了毛主席的思想。刘少奇招摇撞骗，说是他起草的，完全

不是那么回事。不然同志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八大”的时候把毛泽东思想取消了。在当时延安整风那样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情况下，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是全党的要求，叛徒刘少奇不能不在表面上表示同意。但是一到进城以后，经过社会主义革命，他同一些叛徒们，对毛泽东思想就更加抵触了，毛泽东思想是要逐渐地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他们就用许多借口把毛泽东思想取消了。

“九大”的新党章首先一条，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也表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七大”写上了，“八大”取消了，“九大”再写上，不仅写上，而且通过总纲把毛泽东思想作了一个概括。

同志们可以仔细的研究一下，总纲的第一段就是一句话：“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这个党是干什么的呢？第二段说：“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第三段：“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是说的阶级基础。

（注：有的人记的是：这是说的党的组织。）

第四段：“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比“七大”的时候，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大大的提高了。

第五段：“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六段：“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的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顺序是党的性质、党的目的、党的组成部分、党的理论基础、党的领袖，最后讲我们这个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我觉得，“九大”的党章，对于主席的理论、思想的概括是比较好的。第八段是讲“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毛主席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问题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认识是不一致的，拿我本人来讲，过去并不是那么很清楚。社会主义社会在马克思列宁的书上讲，叫做“一个过渡阶段”。大家知道所谓“过渡阶段”在一种意义上讲，它是从一个社会发展到另一个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两个阶段之间，都可以说是一个过渡阶段。比如说，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氏族社会，从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可以说是“过渡阶段”。但是过去人们不了解，所谓“过渡阶段”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一个比较短的时期，一个过渡。不晓得同志们是怎样想的，老同志们你们想想，过去我们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中间总是比较短吧！列宁讲过，就是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你们去翻一翻《国家与革命》，总是觉得阶段比较短，很快可以到共产主义。苏联修正主义现在还是这个看法。一个时候说，他们已经进到共产主义，那是骗人的。修正主义是另一个问题了，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本身总觉得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过渡阶段”，它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范畴。但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他的理论和实践，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是一个“过渡阶段”。所谓“历史阶段”是历史范畴的阶段，就象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的历史发展中间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一个叫“相当长”，一个叫“历史阶段”，这里面起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纠正了一种混乱思想，共产党员总是希望共产主义很快到来，但是主席经常讲，这是很长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不是几十年而是一百年到几百年。所以，这句话值得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下面接着说，“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没有完全解决的、资本主义

国家没有当权的党，现在不是那么迫切，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弄清楚，甚至于不赞成。社会主义社会不但存在着阶级，而且整个的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涉及到一系列的理论问题。你们找一找过去那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及我们过去的“土改大纲”，是怎样划分阶级的，是从经济上、从剥削地位上划分嘛！主要从经济范畴上划分阶级这是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毛主席看阶级问题，他是结合起来看的。不仅从经济范畴来看，而且还从政治范畴，思想范畴来看。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有本质的不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存在，特别突出的表现在经济剥削关系上，社会主义社会中间的阶级，虽然也存在着经济方面的矛盾，但是表现在思想范畴、政治范畴方面、那就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才能懂得苏联为什么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社会法西斯，变成社会帝国主义。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才能懂得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内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那个时候说现代修正主义的威胁，还不那么明显，昨天晚上你们听了总理的讲话就可以知道了。的确存在着这么个危险。换句话说，存在着这个矛盾，怎样解决呢？“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你们开了一个月的会，这句话不一定完全都弄清楚了。你们提出不断革命和继续革命是不是一个意思？这个问题，在“九大”谈过，实际上所谓不断革命就是继续革命。这是翻译名词不同。

什么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呢？这个问题就大了，马克思讲过不断革命论，列宁讲过不断革命论，毛主席讲过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中国的瞿秋白、陈独秀也讲过不断革命论。党章上所讲的“只能靠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这里面包括几个含义，我简单说一下。所谓不断革命论，就是我们讲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大家看到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上的名词运用不同，就发生疑问，不断革命和继续革命是一个名词，两种翻译方法。大家不必在这上面多费时间了。这两个词为什么不统一呢？因为在马列主义史上经常用的是不断革命这个名词，所以主席同意用这个名词。

关于“不断革命论”的问题，我简单说一下。一八五零年，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发布的《告共产主义同盟书》以及马克思在《论法兰西阶级斗争》这篇文章上，第一次提出了不断革命的问题。所谓不断革命它的历史就是这么来的。列宁在一九零五年《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这篇文章中提出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提出的不断革命同毛主席讲的问题，有所不同。马克思、列宁讲的不断革命有个共同特点，都是讲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应该不断的继续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讲的是这个问题。他们没有讲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阶段的问题，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也要继续革命，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展的。历史我就不多讲了。我就讲一下在党章上怎样去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发展。这里包括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就是不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准确的说，应当是“这些矛盾只能靠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毛主席很谦虚，勾掉了“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的”这几个字。要了解为什么说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毛主席不是讲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这个阶段，而是讲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阶段，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这个阶段。所以，这方面是个很重大的发展，这是一条，还有一条，毛主席的不断革命论是有阶段的不断革命论。这个问题文字上没有表达出来，但是同志们要知道，毛主席的继续革命包括两个含义，第一，是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阶段与马克思、列宁所讲的阶段不同；第二，毛主席讲的不断革命论，包括有阶段的不断革命论。

这方面同志们可以看一看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毛主席亲自起草的。文件中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但又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社会阶段，反映了物质变化。不应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意思就是不能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否定不断革命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否定阶段就是“左”倾冒险主义。所以，有阶段的不断革命论，是真正的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毛主席的不断革命论。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间，要继续革命，采取什么形式呢？我们党章上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是毛主席的伟大创举。不但是理论上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不断革命、继续革命，而且找到了革命的形式，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所以，我们说党章首先一个特点，就是明确了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明确规定了毛主席的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党章的第二个特点，明确规定了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党章上讲了。“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新党章明确规定这一条，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这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永远不变颜色，彻底地遵照毛主席的思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永远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航道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这个问题是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现在苏修特别攻击我们这一点，这恰恰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部队的同志在整党中间特别要深刻的理解这样一个问题。

党章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概括的阐述了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从刚才我讲到的那些问题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毛主席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而不是很短的过渡时期。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的问题上，存在着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在社会主义社会继续革命的问题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过去马列主义书籍上都没有或讲的很少，只有毛主席解决了。在苏联，托洛茨基也歪曲过马克思、列宁的不断革命论，他的不断革命的理论是什么呢？他的理论就是不断革农民的命，反对工农联盟，认为无产阶级对农民还要专政，这同马克思、列宁所讲的不断革命是根本对立的，是反革命的。中国托洛茨基陈独秀，曾经一个时期宣传过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也否定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否定中国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农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变节分子瞿秋白，曾经利用“左”的面目，提出他的不断革命论，这也就是历史所讲的“一次革命论”。他否定革命阶段论，毛主席说我们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

阶段论统一论者，“左”倾冒险主义者瞿秋白就主张一次革命不分阶段，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同的阶段混在一起。他企图超越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阶段，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结果搞了“左”倾盲动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到很大的损失，从陈独秀到叛徒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你们熟悉的叛徒刘少奇在天津讲话，就是所谓要大大的发展资本主义，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要搞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这就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停顿在民主革命阶段，这就是马克思、列宁批评的停顿在民主革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叛徒刘少奇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到瞿秋白的“左”倾机会主义，最后到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这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发展马列主义有伟大的功绩，我们党章上规定这一点，是我们党章中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党章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党章的第三特点。

第四特点，新党章根据毛主席建党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明确了我们党最终的和当前的战斗任务。党章明确提出我们的基本纲领、我们的政治目的，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明确的规定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明确的提出了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整党建党，整顿党的组织，党的领导作风，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提出了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对苏修，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任务。这里特别提到，打倒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写在我们的党章上，这一点，在我们觉得是应当写的，苏修觉得是大坏事，戳痛了他。反对苏修写在我们的党章上，这就是说，每一个人要加入共产党就要反修，如果不反修就违犯党章。所以他们现在很恼火，又不敢明确的讲。今年四月十三日苏修《共产党人》杂志第四期，发表了一篇文章，这大概是与叛徒王明有关系，这篇文章首先说，对我们的“九大”他不能熟视无睹，他当然不能熟视无睹，把反对修正主义写在我们党章上，他还能熟视无睹！他攻击我们党章说，中国共产党半世纪以来还没有个党纲。我们历来认为，我们的总纲基本上代替了我们的党纲，但是我们党没有这样一个修正主义党纲，没有象苏修“二十大”那样的党纲。他说，党纲是要规定党的性质，是要明确的有科学根据的阐明党争取什么和为什么而斗争。现在我们才懂得，原来赫鲁晓夫修正

主义党纲规定了他的“全民党”这样的性质，他虽然现在不敢讲，但是从这一篇文章证明，他还是要按照这个性质来指导他的党。他的党纲规定是“全民国家”要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然后说，我们有十三年没有开代表大会了，现在才开“九大”。的确我们十三年没有开代表大会。根据我们的党章规定五年开一次，那么五六年就要开“八大”，六一年就要开“九大”，六六年就要开“十大”，那么我们现在拖了两次，好象这样不符合党章规定。我们同兄弟党的同志说，假如六一年开“九大”，那个时候刘少奇的问题还没有发现，我们就要同叛徒一道开“九大”；六六年要开“十大”，刘少奇的问题，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进行，我们还要继续同叛徒集团一道开，而且可能选出他们作中央委员。我说，同志们，你们想一想，我们到底是把这些叛徒清出去后晚点开好，还是同叛徒一道早点开好？他们说，还是晚开好，开代表大会，要看用什么思想来开代表大会，不是时间的迟早，也不是机械地按照党章来做。

然后他又攻击我们说，我们这个党章是残缺不全的。从篇幅上看，比我们“八大”党章起码短一半，这恰恰是我们党章的好处。毛主席讲，要使工人、农民都看得明白，要通俗易懂。

他们说我们的党章反对苏修。可是这些叛徒也软弱的很，我们的党章，明确的提出来反对以苏修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他不敢引用我们的全文，他只说，我们党章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他把“苏修为首”的几字去掉了。下边他自己又解释说，按照中国的解释，现代修正主义就是说的苏联。我们党章上说，要同一切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他问我们，那么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是谁呢？他们诬蔑这些人都是变节分子。他们认为我们把一些“健康力量”都吐掉了。他们所谓的“健康力量”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些叛徒。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是他们的叛徒。所以，他们再三的讲，我们把他当做了头号敌人，把反对苏修从党章上固定下来。这说明苏修是惧怕我们这个党章的，惧怕我们的党章在党员群众中的影响。而我们党章上写这个东西，就是根据这样一个思想，必须把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与反修搞在一道，就是说反帝必须反修。这是党章的第四个特点，明确了我们当前的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战斗任务。

最后，我们这个党章是吸收了国际国内过去党章中的长处，否定了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党章突出政治思想，内容简明扼要。这是根据毛主席说的，要简明扼要，适合于工农兵劳动群众的要求，要去掉形式主义东西，去掉繁琐的条文，突出政治。所以，新党章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世界上第一个党章就是《共产党法典》突出政治的长处。《共产党法典》是突出政治的，这是一八四七年共产主义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在它的党章上，头一条即明确的提出来要打倒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要消灭资本主义旧社会建设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我们的党章，也吸收了列宁领导制定的第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章的长处。这个党章是一九零五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它第一条就明确规定，党员必须亲自参加到一个组织中去工作，党不是一个俱乐部，党员必须是做工作的。这个党章简明扼要，只有十二条，不是以后那样发展到一百几十条。我们的新党章吸收了外国的马克思、列宁所制定的党章的长处，同时也吸收我们党的历史上有的党章突出无产阶级专政，有的党章比较简明扼要的长处，避免那些繁琐条文。同志们可以看到，包括了“五十字”方针，在总纲上；也包含了接班人五条，写在第二章上。所以，党章基本上概括了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同时，也把我们从党的历史上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整党建党所取得的巨大胜利，通过党章记载下来了。我们现在整党，不是说文化大革命把我们党搞坏了，而是通过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在胜利的基础上把我们的党整得更好，继续前进！使我们的党成为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的党，成了更伟大、更光荣、更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党。这不仅对我们党而且对世界将会起巨大的作用。因此，我赞成伯达同志的提议，要好好的把毛主席的建党思想，“五十字”方针和新党章好好地来一次学习。我觉得这是很必要的。

同志们还提出了青年团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章里已有规定，青年团还是要的。但青年团现在还没有进行工作，个别地开始了。军队原来是有，而且军队青年团的工作起很大的作用。青年团这方面的工作也希望军队的同志提出好的意见来。

发挥青年团的作用还是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咱们这次会议没有办法议论，经验总结得太少了。恐怕你们回到各个地方，要总结一些经验，要交流经验，去摸点典型，调查研究，弄点材料，把材料弄好，把经验搞好了，专门来讨论这个

问题。团章还未改，这个方针定了就容易了。青年人很有积极性，发动每一个青年人来修改团章嘛。

总而言之，总的来说就是一个标准，就是同志们提出来的整党建党工作也要实行毛主席那一条，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因为这是一件大事。从斗、批、改来说，也联系到这个问题，批也联系到这个问题，改也联系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没有共产党，什么事情都办不成。部队也有这个问题。

我有一个汽车司机同志，到了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工作。我还有个警卫员同志到了北大哲学系，平时看这个同志政治也不那么高，有点散漫的样子，他现在告诉我说，他还领导哲学系呢！不但领导哲学系，北京不是有个鼎鼎大名的冯友兰哲学教授、资产阶级权威吗？他还领导冯友兰学习呢！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天翻地覆的一件大事。的确不但把刘少奇叛徒集团清除出去，而且使新的干部得到锻炼，涌现出来。所以，这方面应当感谢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来源：《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 年 10 月）。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发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上海国棉十七厂整党建党情况的两个报告

1970.05.29；中发〔1970〕33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中央和政府各部門的军管会、军代表：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和上海国棉十七厂整党建党情况的两个报告，写得很好。这两个工厂整党建党的经验，很值得各地参考。请你们把这两个报告及其附件，同伟大领袖毛主席三月十五日批示“照发”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的三个报告，印成小册子，发至县团级党的负责同志参考，并望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学习和讨论。

中共中央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报告

毛主席、中央：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整党建党情况报告很好，送上，请阅示。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三日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二日，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整党建党情况报告

我们在党的“九大”胜利召开的新形势下，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针，以毛主席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教导为纲领，从去年七月至十一月进行了整党建党。在整党中始终把思想整顿和建设放在首位。通过整党，普遍提高了党员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自觉性，纯洁了党的队伍，密切了党群关系，使党权真正掌握在忠于毛主席的共产党员手里，党内出现了团结统一、朝气蓬勃的新局面，在全厂进一步掀起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斗批改运动深入发展，革命和生产的形势越来越好。

这次整党建党我们着重抓了以下四个问题：

一、加强党的领导，狠抓两条路线的斗争

二七厂整党建党工作中，自始至终地贯串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和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斗争的实质是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斗争集中表现在要不要党的领导，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上，也就是按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来建设党，还是按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党的问题。

一九六八年初，八三四一支左部队进厂以前，曾进行过整党。当时大叛徒刘少奇在二七厂的代理人，秉承反革命两面派戚本禹的黑指示，推行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搞关门整党，只恢复组织，不进行思想整顿，支部领导成员大都是原班人马，混进了不少坏人，使那次整党失败了。在这次整党中，他们仍不甘心，继续向党和革命群众猖狂反扑。甚至有人公开为其翻案。部分人思想上还没有肃清他们所散布的修正主义影响。说什么：“整党就是党内的事，群众参加就成了全民党了”。“经过三年文化大革命，还搞什么思想整顿。”

一些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人，极力夸大他们个人和群众组织的“功劳”，散布“党员落后论”。他们说：“我们是从白色恐怖里冲杀出来的，是最革命最先进的”。“党员都是火车皮，造反派才是火车头。”“二七厂的党员都‘修’了，整党得由我们来领导”。甚至极端错误地说：“没有党的组织，照样可以干革命”。

针对以上右的和极“左”的两种错误倾向，我们发动广大党内外群众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思想、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狠批大叛徒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以及反革命两面派戚本禹在二七厂散布的极“左”思潮。联系前次整党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彻底清算大叛徒刘少奇在二七厂的代理人推行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罪行。通过批判斗争，使广大党内外群众认识到来自右的方面的反动思潮，是反对整党中实行党的群众路线。来自极“左”方面的反动思潮，是借口“群众路线”，否定党的领导。他们都把群众路线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实质上都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妄图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党。我们紧紧抓住整党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加强思想整顿和建设，划清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界限；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界限；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界限；无产阶级党性和资产阶级派性的界限。使整党建党工作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沿着毛主席的建党路线胜利前进。

二、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开门整党

这次整党，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的教导，自始至终地贯彻了党的群众路线，做到了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

我们采取了由党员、群众直接提名、反复进行民主讨论的方法，产生了厂与车间的整党领导小组，吸收群众代表列席，负责整党领导工作。根据工厂生产紧张、学习时间短的情况，各车间都分期分批的开办了脱产的党员学习班，吸收群众代表参加。为了使学习班和班组整党学习结合起来，在车间群众学习时间，学习班的人回到员班组参加学习。不仅党员之间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互相评论，而且要认真听取群众对党员的评论。党员抱着征求意见要诚心，接受意见要虚心，

改正错误有决心的态度，利用假日、业余时间，登门走访，开展谈心活动，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到群众中接受教育。群众为党员的这种态度所感动，在帮助党员时，也做到了提意见要热心，帮助时要耐心，对党员改正错误有信心。有的群众还主动给党员搜集意见，送“宝”上门，正如一个老工人所说的：“三心换三心，外因促内因，共同干革命，党群一条心。”

经过大学习、大批判和群众帮助，在思想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党员自觉主动地进行斗私。做到了抓要害，触灵魂，从路线上找问题，世界观上挖根源，到毛主席著作中找答案，从行动上看效果。群众帮助党员，注意了看大节，看主流，看发展，做到了原则问题不让步，枝节问题不纠缠，相同观点不迁就，不同观点不刁难。有的老工人说：“我们不当‘检票员’只把住关卡；要当毛泽东思想宣传员，积极促进。”党员先在学习班斗私，再回到本班组斗私，听取群众意见。少数错误严重或影响面比较大的党员，还要在车间范围进行斗私。斗私以后，整党领导小组根据评论情况，决定恢复党的生活或暂缓过党的生活或进行其他组织处理。

党员斗私批修，斗出了觉悟，斗出了干劲，斗出了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斗出了对毛主席的无限忠心。机车车间一个工人党员，过去政治衰退，不务正业，人称“打兔子队长”；现在一心为革命，冒着危险抢修机车，当了生产突击队长。由原来被劝退的对象，成了受人称赞的好党员。

通过开门整党，群众也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有的说：“上次整党关上门，这次整党大开门，党员斗私找上门，这真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信任。”

三、认真贯彻党的政策，搞好吐故纳新

在整党建党开始，我们对全厂一千六百多名党员状况作了基本分析。二七厂政治情况比较复杂。过去国民党在这里有九个区分部，三青团有三个机构，另有八个特务机构。当时参加国民党的，有些是不得不参加，是“挂名党员”；有些是比较负些责任的；也有少数是钻得很深的，做了坏事的。解放前，这个厂我地下党支部的十几名党员，也叛变投敌，参加了国民党等反动组织。解放后，由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招降纳叛，重用坏人，使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等坏人钻进党内，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窃据了领导岗位，造成二七厂党组织严重不纯。但是，尽管如此，二七厂的党员

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有严重错误的有百分之五左右；隐瞒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和其他坏人有百分之十左右。根据这个基本分析，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团结和依靠多数的一贯思想，使绝大多数好的和比较好的党员经过斗私批修、群众评论、党内通过过组织生活，建立新的党支部，然后在党支部领导下，依靠他们和广大革命群众解决少数人的问题。

在组织处理工作中，我们遵照毛主席的“五十字”建党大纲的要求和新党章的规定，对党员组织处理，把它作为对党员和群众继续进行增强党性教育的过程，作为思想整顿和思想建设的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觉悟的先进标准，认真掌握两个区别：第一，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划清敌我界限。属于敌我矛盾性质按敌我矛盾处理的人，一律清除出党。敌我矛盾性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人，一般也要清除出党。第二，区分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一般群众的界限。对于犯错误的党员，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党员，都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团结教育他们。少数问题严重的，酌情给予适当的处分。错误性质严重，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不能留在党内。死气沉沉的党员，经教育仍无转变的，劝其退党。（关于党员组织处理的一些例子附后）

遵照毛主席“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和“要过细地做工作”的教导，我们在对党员进行组织处理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发动党内外群众广泛讨论，充分地走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反复查证落实，然后经过党支部大会讨论，提出处理意见，报上级党组织批准。做到问题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防止了偏宽、偏严两种错误倾向。

对被“吐”对象，我们从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一基本思想出发，只要不是专政对象，都让他们参加整党学习班，党员和群众一样地热心帮助他们，做过细的思想工作，提高他们对“吐故”的认识，使他们深受感动，表示：为了维护党的纯洁，把自己清除出党是完全应该的，决心跟着毛主席继续干革命。这样，他们虽然被吐故了，但并不伤害感情，多数人还能为革命做些工作。

对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尚未交代或尚未交代清楚的党员，也让他们参加整党学习，进一步展开政策攻心，再一次给他们走坦白从宽道路的机会。这样做，使

几十个过去一直拒不交代问题的人，交代了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如原政治部一个副主任交代了他隐瞒二十多年的中统等六种反动身份。发展了清队成果。

对于少数政治历史问题一时搞不清楚以及犯有严重错误、一时得不到群众谅解的党员，则暂时挂起来。然后积极进行工作，有步骤地解决和处理。

在纳新工作中，我们采取了积极、严肃的态度，在深入学习毛主席五十个字建党纲领的基础上，按照新党章的规定，经过个人申请、党员和群众反复讨论，首先把那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经过大风大浪考验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树立样板，成熟一个，发展一个。

在纳新时，有些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人，提出“造反有功，入党有份”，认为“当了革委会成员，就理应入党”，还有的说：“要发展党员就得一派一个”，甚至有的人看到自己入不了党，便组织本派的人连夜赶写入党申请，企图在党内安插代言人。这些人妄想以资产阶级派性来改造党，把党变成派别的联合组织。我们坚决批判了这种“做官入党论”、“造反派当然入党论”和在纳新问题上搞平衡的错误思想。严格按照党员标准，凡是具备党员条件的就吸收入党；条件不够的，就积极培养；严防少数抱有个人或派别目的的投机分子混到党内来。

四、建立坚强的党支部，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

经过四个月的整党建党工作，二七厂的车间党支部已全部建立，厂党委会正在筹建。为了建立一个好的支部领导班子，我们掌握了以下三条：

第一，要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建立党支部，不能操之过急，草率从事。条件是：经过思想整顿党员确实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增强了党性；绝大多数党员已经过组织生活；党群关系有了显著改善；在整党中，已逐步形成了领导核心。

第二，在建立党支部的过程中，狠抓阶级斗争，不断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狠批资产阶级派性。要求广大党员，要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出发，不要为个人或小团体的私利打算；要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着想，不要为资产阶级派性争权；要以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为标准，不要以个人恩怨作尺子。把党权牢牢地掌握在忠于毛主席的共产党员手里。

第三，发动广大党员和群众充分酝酿，反复协商，经过几上几下，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确定候选人名单，在党内选举产生党支部委员会。新的支部领导班

子，一般是军、干、党员群众相结合和新老相结合，新干部占百分之六十左右，他们大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优秀的工人党员，也有这次“纳新”的党员。

新的党支部建立后，我们仍然把思想建设放在第一位，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狠抓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开办了学习班，学习了新党章和有关党的建设问题，进一步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思想武装头脑，认清党权的重要，去掉怕字，换成敢字，当好带头人。有的党员干部检查了过去“宁出几身汗，什么‘长’也不干，少犯错误不得罪人，吃他几天松心饭”的错误思想，积极工作，用于负责，成为群众信得过的好干部。

领导班子把请群众参加评论形成制度，定期同行政干部一起召开有群众参加的民主生活会，运用小整风的方法，听取群众的批评，接受群众的监督。支委会成员一律不脱产，又劳动又工作，坚持做到“三不脱离”。

在领导班子内部提倡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认真遵循三条政治原则：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就坚决支持；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就批评、教育；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就坚决斗争。保证党的集体领导始终掌握正确的政治方向。

在狠抓领导班子革命化的同时，加强对党员进行新党章的教育，有计划地上好党课。不断提高党员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把党组织建设成坚强的战斗堡垒。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革命委员会八三四一部队驻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二日

附件：

关于党员组织处理的一些例子

一、对党员叛变自首的处理

武嘉澍，原副厂长，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二年初入党，任青岛市委宣传委员，同年六月被捕。被捕后，两次写自首书，出卖了同志。一九五七年审干时，在刘少奇“叛徒哲学”影响下，曾以“念其事情发生时入党不久，事后也曾作过交代，事情已隔很长时间，现在工作表现还好，出狱后也没有其他

问题”为理由，做了一般历史问题的结论，留在党内。这次整党中，重新审查，发现他在过去的交代中隐瞒了写自首书的重大情节，并认为一九五七年所作的结论是错误的。定为叛徒，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清除出党。

范广增，原档案科长，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一九四五年春参加我地下党组织，一九四六年夏叛变自首，供出了地下党员，参加了国民党外围组织情报组和国民党，长期隐瞒。在这次清队中，他作了交代，定为叛徒，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清除出党。

二、对混入党内的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处理

张洪志，原党委组织部长，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均为工人。一九四五年参加一贯道，后充当坛主，一九四七年又参加国民党，一九四八年参加中统特务组织。一九五三年隐瞒了反革命历史，混入党内。清队中作了坦白交代，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不给戴反革命分子帽子。清除出党。

李志广，原基建科长，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一九四〇年参加反动会道门“后天道”，一九四四年当了副盘主，积极捐款，发展道徒，利用封建迷信，进行反动宣传。一九四九年，他隐瞒反动身份，混入党内。一九六三年党员登记时，他回村贿赂其同伙道徒（解放后当了村干部），订了攻守同盟。这次清队中他作了坦白交代，不给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

蔡宝生，工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旧职员。一九三六年参加反动会道门“八方道”，一九四四年曾任伪保长九个月。在此期间，他多次逼收乡丁费，多次为日寇派夫。一九四七年，他仗势霸占民妻，达二年之久。一九五〇年，他隐瞒反动历史，混入党内。这次清队中作了坦白交代，不给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

夏树德，原台车车间副主任，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均为工人。一九五〇年入党。他思想一贯反动，破坏文化大革命，公然对抗“七·二三”布告，连续制造重大事故十二起，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在群众批斗时，夏态度嚣张，拒不认罪，民愤极大。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专政。开除党籍。

三、对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的处理

张鹤田，女，原党委组织部干事，家庭出身旧职员。一九三九年张鹤田的母亲带着她改嫁给一李姓地主，李死后，张母为了占有李的财产，于一九四一年将十五岁的张鹤田嫁给李的儿子。此人曾任日伪区长、稽征局长，有地九十亩，房二十六间，雇长工二个，还雇有专门侍候张鹤田的女佣人。一九四五年冬解放时离婚。张在地主家主持家务，连续从事剥削，超过三年，构成地主成份。一九五四年，她隐瞒两岁，有意将嫁到地主家的时间缩短两年，未被定成地主分子。在这次清队中作了交代，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郭显明，工人，家庭出身贫农。解放前，他在国民党部队当过五年兵。一九四六年他到地主家当女婿，从事剥削，到解放时虽不足三年，但解放后他还出租房屋继续剥削别人。一九五五年他隐瞒历史，混入党内，仍收房租，直到文化大革命，先后共收房租两千五百元。他在这次清队中作了交代，定为阶级异己分子，没有给他戴这个帽子。开除党籍。

四、对死气沉沉的党员的处理

王景泰，原材料科管库员，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工人。一九六〇年入党。他一贯不问政治，觉悟很低，犯过贪污受贿的错误。他上班打瞌睡，学习时睡觉，工作马马虎虎，长期以来却起早贪黑开荒种地，一心为私。因此，他入党时曾被延长预备期一年，一九六三年党员登记时又缓登两年。这次整党中，他开始不斗私，后来经多次教育，勉强做了点敷衍了事的检查，而行动上仍坚持错误，革命意志衰退，完全丧失了党员条件。劝其退党。

肖云明，工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农民。一九六二年入党，过去一贯不问政治，学习不发言，好吃好喝，经常打兔捕鱼，人称“打兔子队长”，群众问他为什么要入党，他说我也不知道。这次整党，经教育，对错误有深刻认识，转变显著，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生产干劲足，几次冒着生命危险抢修机车，当了生产突击队副队长，群众说：通过整党，老肖好象换了一个人。已恢复组织生活。

五、对犯严重错误和犯走资派错误的党员的处理

李江，工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四九年入党。一九六三年党员登记时，受原党委组织部部长刘月岐的欺骗和利诱，将别人检举刘入党后又参加国民党的材料从档案中取出销毁，并长期向组织隐瞒，严重丧失了阶级立

场。这次清队中，李江主动坦白交代，大胆揭发了刘月岐的问题，在整党中又作了深刻检查。已恢复组织生活，免予处分。

孙运来，原副厂长，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均为工人。一九四八年入党。他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积极推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实行“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专家治厂”，对工人实行“管、卡、压”，犯了走资派错误，文化大革命中又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经过群众批判，他作了深刻检查，态度诚恳，得到群众谅解。已恢复组织生活，免予处分。

吴江枫，原车间主任，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五二年入党。他长期推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文化大革命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走资派错误。运动中，群众对他进行几十次帮助，他不但不作触及灵魂的检查，还玩弄两面派手法，对抗群众，态度不好。暂时“挂”起来，继续做耐心细致的工作，如果态度有了转变，可以恢复组织生活，但要给予适当的处分。

六、对有剥削行为的党员的处理

徐承佑，原机车解体车间党支部书记，家庭出身旧职员，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五四年入党。在他母亲死后，一九六二年，他一次领取了三年房租，共一千多元。当时，他曾向旧党委副书记讲过这件事。一九六三年，组织上指出其错误后，他再没有领取房租。这次整党中，他作了深刻检查。恢复其组织生活，免予处分。

七、对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党员的处理

康长，工人，家庭出身贫农。解放前参加国民党、国民党情报组，证据确凿。他一九六〇年隐瞒历史，混入党内。在这次清队中，他的态度极为恶劣，坚持反动立场，先后翻案一百多次，还发誓“宁愿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反革命”，也不交代问题，引起广大革命群众的极大愤慨。开除党籍。

刘志，原材料科主任计划员，出身于工人家庭。一九五四年入党。解放前曾参加国民党、国民党情报组和反动会道门正字普济会、洪道社。他在一九四八年当伪保丁期间，多次伙同他人抓兵、要粮、催款，敲诈勒索。解放后，他隐瞒了当伪保丁时的历史，这次清队中作了坦白交代。给予留党察看处分。

边双泉，工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一九四八年参加国民党，是“挂名党员”，这次清队中作了交代和检查。他平时表现较好。恢复组织生活，免予处分。

八、对隐瞒直系亲属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党员的处理

杨振明，原武装部干事，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六〇年入党。幼年时，他父亲因替日伪搜集我军情报，被我镇压。他入党后，已知道他父亲的情况，仍向组织隐瞒。这次整党中作了坦白交代，检查深刻，免予处分。

九、对犯有其他错误的党员的处理

范春华，原保卫科副科长，家庭出身下中农，本人成份工人。在一九六八年出操时，他由于政治上疏忽大意，喊了反动口号，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经审查，他出身成份好，政治历史清楚，一贯表现较好，事后检查深刻，取得了群众谅解。免予处分。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日，上海国棉十七厂关于整党建党情况的报告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光辉建党纲领指引下，上海国棉十七厂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开始进行了整党建党工作。为了加强对整党工作的领导，在一九六八年初建立了党的核心小组。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进行了组织整顿，建立了党的总支和支部，发展了新党员，去年六月建立了厂党委。

我们厂有八千六百三十二名职工，其中党员一千零四十八名。经过整党，广大党员更加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普遍提高了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密切了党群关系，促进了全厂革命职工的思想革命化，推动了革命和生产的发展。

（一）充分发动群众，在斗争中整党建党

按照毛主席的建党路线整党建党，如同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几个阶段一样，是不可能风平浪静的。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有阶级敌人的破坏，有来自右的和极“左”的社会思潮的干扰。我们深刻体会到，必须在两个阶段、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中整党建党。

整党初期，尽管我们通过修改党章的工作，在党内外进行了关于党的建设的教育，但是，正当全厂大办毛泽东思想整党学习班，启发广大党员自觉斗私批修，逐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时，一小撮阶级敌人兴风作浪，煽动一些资产阶级派性严

重的人，到处散布极“左”思潮，说什么国棉十七厂的党员除了少数党员“老造反”以外，都是“老保”，没有一个好的，把党员说得一无是处。还说什么党组织一恢复，“老造反”又要受到压制。我们发动党内外群众，狠批了这些错误论调，粉碎了阶级敌人破坏整党的阴谋。党内外群众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懂得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我们党内占领导地位，我们的党员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样，党员的斗私批修和恢复组织生活，才继续顺利进行。

斗争最激烈的是一九六八年十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转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上海市革委会决定在我们厂进行发展新党员的试点工作。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头伸得很长，拼命想钻到党内来，笼统地提出“老造反都可以入党”。当这种错误思想受到批判以后，又煽起了“反复旧”的歪风，把新建立的党支部说成是“旧机器贴上新标签”，攻击党组织“排挤老造反”。他们还大造舆论，争夺整党建党的领导权。

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新形势下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我们根据市革命委员会的指示，举办了有四百多人参加的建党学习班，大学毛主席的建党路线，狠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具体分析我们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摆事实，讲道理，揭露了阶级敌人破坏建党的阴谋，对一些有错误思想的人开展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通过大学习、大批判，使大家清醒地看到，某些人打着极“左”的旗帜，好象最关心“老造反”，最关心新党员的政治质量了，其实他们是重弹“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成为党员”的老机会主义调子，把党员的标准降低到一般造反派战士的水平，而且挑动某些暂时不能入党或没有入党条件的人的感情，煽动他们闹事。一定要警惕有人借“反复旧”为名，挑拨党群关系，破坏整党建党工作。通过学习和批判，党内外群众受到了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政党、群众、领袖学说的教育，一场极为深刻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党内外广大群众更紧密地团结起来，煞住了这股歪风，排除了干扰，捍卫了毛主席的建党路线。

在整党中，同样也有来自右的思潮的干扰。一九六九年六月，我们在筹建新党委时，党内外广大群众欢欣鼓舞，一小撮阶级敌人恨得要死。有些人企图为旧党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要把旧党委某些错误十分严重的人拉到新党委里来。新党委建立后没有几天，我们接连收到四封匿名信，攻击新党委，攻击

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充分地认识到，新党委的建立，是斗争在新形势下的开始，而不是斗争的结束。我们立即发动党内外群众狠批右倾翻案妖风，揪出了写反动匿名信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通过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党内外同志进一步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党的观念，推动了整党建党工作。

（二）整党中始终狠抓思想整顿

毛主席教导我们：“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通过前几个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使我们深刻地懂得了单纯的“罢官革命”，或者急于从组织上吐故纳新，都是不行的。我们首先集中一段时间进行了思想整顿。以后，在组织整顿和建设时，也把思想教育放在首要地位，使思想整顿贯穿于整党建党的全过程。

整党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一定要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武装党员，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思想彻底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用毛泽东思想批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广大党员在思想上吐故纳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大踏步前进。否则，即使在组织上清除了一小撮坏人，整党仍然没有搞好。

我们针对我们厂的特点，抓住党员思想中比较突出的问题，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教育。

一、对广大党员进行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教育。我们厂是一个老厂，日本人，国民党，封建把头统治这个厂几十年。党员中百分之九十是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绝大多数是四十岁以上的老工人。他们在旧社会都有一本苦大仇深的血泪史，从心底里热爱毛主席和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部分党员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党员由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一度站错了队。“一月革命”以后，一些党员晓得自己错了，但他们不知道自己错在那里；有一些党员受了一些冲击，存在着怨气、泄气、不服气。

针对这一情况，我们普遍举办了整党学习班，组织党员大学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狠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我们运用“四个对照”的办法，对党员进行教育，这就是：看毛主席是怎样教导的，刘少奇是怎样放毒的，本单位走资派是怎样贯彻的，自己是怎样想和怎样做的。我们还启发党员忆旧社会的

苦，比新社会的甜，忆受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毒害的苦，比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明伟大。通过忆苦思甜的教育，激发了广大党员的阶级感情，控诉了旧社会，控诉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对自己的毒害，揭露了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划清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界限，更加认识到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不搞不得了，不搞就要人头落地，就要吃“二遍苦”。这样，广大党员真正提高了觉悟，丢掉了“三气”，把仇恨集中到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上，以实际行动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气。广大党员主动到群众中去斗私批修，改善了党群关系。

二、对广大党员进行“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教育和党的根本任务的教育。有些党员过去在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毒害下，阶级斗争观念淡薄，“生产党”的流毒很深，埋头生产，不问政治，错误地认为“对付国外敌人有解放军，对付国内敌人有公安局，对付厂内敌人有保卫科，自己搞好生产就行了”。有些党员怕这怕那，不敢斗争。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组织党员大学毛主席的“五十字”建党大纲，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以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狠批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党内和平论”，狠批“生产党”的流毒，批判厂内走资派推行的“生产好就是政治好，生产好就可以入党，就是好党员”的谬论。通过学习和批判，许多党员深有体会地说：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搞阶级斗争，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如果只顾“棉花纱头”，不搞阶级斗争，就会“亡党掉头”。他们提高觉悟以后，纷纷丢掉“怕”字，换上“敢”字，纷纷杀向阶级斗争第一线，在对敌斗争中，在反对无政府主义妖风和批判右的和极“左”的反动思潮中，在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三、对广大党员进行毛主席关于党的学说和新党章的教育，使每个党员思想上牢固地树立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特别是“九大”胜利召开以后，我们组织广大党员和积极分子举办学习班，认真学习毛主席在“九大”的重要讲话、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对广大党员更加深入地进行继续革命的教育，进行增强党的观念、加强无产阶级党性的教育，启发每个党员按照新党章的规定要求自己。我们狠狠抓住斗私批修这个重

要环节，要求党员自觉革命，找出阻碍继续革命的绊脚石。同时，我们发动群众对党员进行评论，要求群众对党员热情帮助，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有一个党员女工，入党时比较好，但后来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只想到自己的孩子和小家庭，“上班落在后头，下班走在前头，开会坐在边头”。在党组织和群众的耐心帮助下，她狠斗了私心，终于有了转变，含着眼泪说：“我从小做工，今天怎么忘本了！我一定要为毛主席争气，跟毛主席永远革命到底，做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从此，她革命站在前头，生产积极带头，学习毛主席著作牢记心中。群众说她现在变了一个人，从死气沉沉变得朝气蓬勃，成为全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

通过新党章学习，广大党员把自己的工作与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联系起来，立足工厂，胸怀世界，出现了不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先进事迹。广大党员用新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争取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党员，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新高潮。全厂党员和党小组，开展了争做“六个模范”和“四个队”的运动。每个党员都要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模范、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遵守革命纪律的模范、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和联系群众的模范。每个党小组都要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阶级斗争的先锋队、生产斗争的战斗队和为人民服务的工作队。在毛主席的“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号召下，广大党员带领群众把车间当战场，豪迈地提出了“多织一匹布就是多剥帝修反一层皮，多纺一支纱就是多抽帝修反一根筋”的口号，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去年年终评比，全厂有三百六十多名党员被评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

（三）搞好吐故纳新，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

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搞好组织上的整顿和建设，是十分重要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说明，我们厂绝大多数党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需要进行组织处理的仅是极少数。全厂开除和劝退了四十一名党员，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三点九二。受党纪处分的十名，还有少数党员因问题没有搞清，暂时“挂”着。

在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中，我们根据建党首先是思想上的建党这一认识，首先狠抓大学习、大批判、大辩论，特别是抓紧关于“反复旧”那场大辩论的经验教训，发动党内外群众认真学习新党章，讨论什么样的人可以入党，入党为了什么，以达到明确标准，端正入党动机的目的，使大家都懂得发展新党员必须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我们开头发展的新党员，是经过全厂上上下下多次讨论过的，全厂群众十分认真。经过热烈的争论，一致认为，为了正确掌握党员标准，必须注意几个“正确对待”：

一、正确对待“老造反”。我们厂的“老造反”比较多，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作了不少工作，很多人积极要求入党。但是，“老造反”中有各式各样的人，要进行阶级分析。发展新党员，要坚持共产党员的条件。要积极吸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要看他们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勇于斗争的大节，但对他们的缺点、错误决不能姑息、迁就。要对他们严格要求，耐心帮助。有的“老造反”，夺权以后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群众意见比较大，目前入党还不够条件，就需要教育和考察一个时候再说。有的人虽是“老造反”，但是问题比较复杂或者有严重问题，那就不能入党，或者需要较长期的考察和审查。

二、正确对待“站错队”的同志。要遵循毛主席关于“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的教导，看他们的一贯表现，特别是要看他们站过来以后的表现。只要符合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条件，就不要因为一度站错过队而不吸收入党。

三、正确对待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志。我们认为，要全面贯彻毛主席的阶级路线，“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对这些同志要热情关怀，严格要求，给予更多的锻炼机会，鼓励他们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继续前进，争取达到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标准。

对已经参加厂革委会工作的非党造反派战士，一时还不够入党条件的，不能因为他们是头头，而降低党员标准。要热情地帮助和教育他们用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标准对照自己，改造自己。党委会的成员在工作中遇事要多同他们商量，倾听他们的意见，团结他们一道工作。

新党员入党，是以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继续革命的开始。为了使他们继续革命的脚步不停下来，对这些新入党的同志必须加强教育，加强党的观念的教育，组织他们学习新党章的各项规定，时刻按照党员必须做到的五条对照自己，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

为了适应战备的需要，为了适应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的需要，在整党建党中一定要抓好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对于基层党组织的建立，我们提出了四个条件：一，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比较巩固；二，通过清队，阶级阵线基本清楚；三，整党取得了成就，党员普遍提高了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密切了党群关系；四，在斗争中已经涌现了一些优秀的党员骨干。根据上述条件，成熟一个，建立一个，不成熟的帮助创造条件。

我们发动党内外群众充分酝酿，民主协商，然后由党内选举产生各级党组织。在建立的过程中，我们注意了选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优秀共产党员担任党的各级领导工作。

通过整顿，全厂三十一个支部、七个总支和厂党委，共有委员一百七十二名，其中新的占百分之六十九。在三十八个支部和总支书记中，有二十八名是新干部。经过整顿，大多数支部是有朝气、有战斗力的。

厂党委建立后，我们组织党委和革委会成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关于“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的教导和新党章规定的基层组织的五项主要任务，对照旧党委执行的错误路线、错误作风、错误方法，明确了党委的任务就是要抓根本，抓方向，抓政策，抓党的建设，抓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半年多来，我们主要抓了以下三条：

一、举旗抓纲。领导党员和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和阶级斗争的学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党内外群众，进一步加强战备观点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发动党内外群众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进攻，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二、党要管党。党委建立以后，及时举办了支部书记、委员学习班，首先抓好头头的思想革命化。同时，厂党委还抓了两个比较先进的党支部，在全厂树立样板，开展学先进、赶先进的活动，发挥了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三、抓好党委领导班子自身的革命化。厂党委成立后，规定了三条根本性的措施：第一，关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制度。第二，关于密切联系群众，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第三，党委定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有问题、有分歧摆到桌面上来。

党委成立后，全厂重大问题由党委讨论决定，革委会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委的决定。同时要充分发挥革委会的作用，革委会可以根据党委的决议，对全厂革命、生产作出具体安排，并负责处理党务以外的日常工作。为了更好地在思想上组织上实行一元化领导，我们通过调整，做到了党委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革委会成员，革委会的主要领导成员也都是党委委员。党委成立以后，没有另设办事机构，革委会的办事机构就是党委的办事机构。

中共上海国棉十七厂委员会一九七〇年四月二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国务院关于原煤炭部长张霖之问题的通知

1970 年 7 月 31 日，国务院给煤炭工业部发出关于张霖之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是周恩来起草的。

《通知》说：“国务院业务组于 1970 年 7 月 31 日会议，审查了煤炭部军代表 1970 年 5 月 20 日和 7 月 31 日两次报告，以及首都驻北京矿业学院工、军宣队专案组 1970 年 5 月 17 日的报告，同时，并阅看了反革命分子戚本禹 1966 年 12 月 24 日在矿院的公开演说。大家一致认为：张霖之同志的历史是清楚的。张霖之同志在矿院全校广播中听到戚本禹反革命分子这种威胁和煽动的语言，而身体已受到重伤，自不能不陷入极度紧张状态，因此，致张在武斗和逼供的混乱中死去。根据当时情况，矿院专案组的报告只涉及各项经过的表面现象，还需要依照煤炭工业部所掌握的全面材料，认真地予以澄清。”

《通知》决定：“张霖之同志的死亡，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张霖之同志家属和他的子女不受任何牵连，应按革命干部家属看待。”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一日，周恩来谈清华大学蒋南翔的问题（摘录）

“中央专案组把主犯定了，从犯还没有定。清华的蒋南翔和刘少奇、彭真的案子有关。现在查明，他的历史没有背叛。他的思想很右，个人主义，是个没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这和他的地主出身有关。文化大革命前，他吹捧刘少奇、彭真。

‘一二·九’学生运动刘少奇、彭真根本没有份。当时彭真反领导，被捕以后自首了。彭真就和一些坏分子来往。张洁清的叔叔是个大汉奸，彭真和他们来往。可是，蒋南翔吹捧刘少奇、彭真。一九六五年，中央到上海开会去了，留彭真在这里看家。那时纪念‘一二·九’开大会，蒋南翔吹捧刘少奇、彭真，彭真几次站起来鼓掌，电视上有这些镜头。所以，群众怀疑他在历史上和这两个叛徒有关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正义的呼声。要允许群众怀疑，接受群众的审查。现在专案组还找不到材料，蒋和刘、彭只是工作关系，犯了严重路线错误。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提议要他下去劳动，不要老是关着。刘少奇、彭真常唱不同的调子，看来有矛盾，实际上是互相包庇。野心家，叛徒常常是两面派。天真地看问题，常常受欺骗，就容易犯错误。应该相信群众。要理解群众的正义呼声。领导同志要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否则文化大革命怎么会搞得这样轰轰烈烈。”

“‘内查外调’，我的意思叫‘内检外调’。‘内查’总是由上而下，还是调查，还是专案人员调查，还是不发动群众，自己查。‘内查外调’都是调查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内部群众检举，然后外调。‘内检’，‘检’就是检举，就是群众检举。‘外调’，就是外面专案去调。”

“考验一个干部，要看是否真正承认了错误，不经过群众讨论光书面检查不一定可靠。‘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要经过群众批判。把真实凭据搞到了，他就无话可说，否则一有机会，他就翻案。”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三日，周恩来对贺龙专案组请示报告的批示

“东兴同志，这全部是公开文件，请你考虑是否需全部调阅。我记得在下放邓小平、谭震林时，已将两人从专案组撤消。现专案组既又重新提出查此人，可否先告专案组将邓小平以三反罪行、招降纳叛线索写一报告来，以便拟此查阅。周恩来。”

附一

贺龙专案组的报告

康生、永胜、法宪、叶群同志：

关于邓小平的三反罪行，招降纳叛等问题，经过调查，我们已掌握了不少材料和线索，但其中有些问题的核实和查证，还需要查阅一些档案材料。为此，我们拟到中央档案馆、中办机要室等单位查阅有关材料，并对必要的部分拍照取证。

是否妥当，请批示。

附：申请查档目录表。

贺龙专案组 1970 年 11 月 28 日

附二：

吴法宪对贺龙专案组报告的批示：

可否查这些档案，呈请总理、汪东兴同志批示。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关于整团建团工作的通知及附件

1970.07.12；中发〔1970〕51号

毛主席、林副主席已批阅

中共中央关于整团建团工作的通知

目前全国整党建党运动正在继续深入发展，整团建团工作也要跟上来。各级党组织应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发出的“还有一个一个团支部，整团的问题，也提出来了”的指示，把整团建团工作提到党的议事日程，加强领导，认真地把共青团组织整顿好，建设好。这对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加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强战备，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整团建团是关系到一亿五千万青年的大事，必须引起各级党的领导同志的充分重视。在整团建团工作中，一定要突出思想教育工作，引导团员和青年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对青年工作及团的建设的一系列教导，彻底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团路线，通过三大革命运动把共青团真正建设成为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共青团，建设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在整党工作已经大体搞好的地方，团的

组织应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恢复团的生活，建立一个好的领导班子，搞好“吐故纳新”，做好组织处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批先进青年吸收入团。还要逐步地做好超龄团员的离团工作。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及党的核心小组，对目前整团建团进展情况，应认真进行一次调查研究，对于附件中提到的一些政策性的问题，提出你们的意见。目前应抓紧试点工作，在十一月底前，望各地能向中央提供一至二件典型材料和修改团章的草案，作为中央召开整团建团座谈会的准备。

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共青团和红卫兵的领导，积极开展团和红卫兵的活动，使共青团和红卫兵组织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带领广大团员、红卫兵、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朝气蓬勃地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充分发挥突击作用。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二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可翻印，但不许张贴，不许广播和登报。)

附：一九七〇年七月二日，当前整团建团的情况和问题

全国约有一亿五千万青年，三千万团员，一百五十万个团支部。自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发出“还有一个一个团支部，整团的问题，也提出来了”的指示以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在整党的基础上，陆续开展了整团建团工作。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整团的面，江西、甘肃已达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北京、天津、上海、黑龙江、吉林、广东、湖南、宁夏、陕西已达百分之五十以上。

据一些地方调查分析，经过整顿的团支部，整得比较好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一般的约占百分之五十；不好的甚至走了过场的约占百分之三十。

一、关于应当建设一个什么样团的问题

有些地方对建设一个什么样团的问题认识比较清楚，整团的质量比较好；不少地方由于对这个问题认识不大清楚，影响了整团的质量。一些地方反映，整党建党有毛主席指示的“五十字”大纲，有新党章，而整团建团“一无纲，二无章”，究竟达到什么标准，建设个什么样的团，思想不明确。天津市有个工厂整团整了四十多天，团员越整越没有劲，最后到会的人只有百分之二十。该厂革委

会主任说：“整团我们是在时间上给予保证，可是这个团究竟咋个整法，谁也说不清楚。

二、关于批判修正主义建团路线问题

一些地方在整团中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建团路线，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团路线，使广大团员划清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团路线同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团路线的界限，明确了建团的政治方向。但是，不少地方在整团中没有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团路线。他们认为，整党批判了刘少奇的黑《修养》、黑“六论”，整团没有什么好批的了。有的干部对什么是修正主义建团路线弄不清楚，不敢批，怕批错了把共青团全部否定了。因此，有些基层团组织在整团以后，仍然是方向不明，不敢开展团的活动。

三、关于思想整顿问题

不少单位在整团中重视了突出思想整顿，提高了团员、青年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团的组织朝气蓬勃。但是有些单位，在整团中不突出思想整顿，认为“团员都参加了整党，问题都解决了，整团就是恢复恢复组织生活。”或者认为“整团是小青年的事，整党带一带就行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有些单位对整团马马虎虎，走了过场。北京某学院一个班七天内用了十个半小时就结束了整团，思想整顿只用了一个半小时，一个人一般只谈了几分钟，有的光表了个决心就完了。有些单位即使搞了一些思想整顿，但是只强调正面教育，不搞斗私，说“对团员不要搞得那么紧张”。有的在整团中没有突出共青团组织的先进性，没有对团员进行怎样做一个忠于毛主席的好团员的教育，因此整团后，“风过云散，平平淡淡”，团员仍然是不出头，不带头，不起团员作用。

四、关于“吐故纳新”问题

在“吐故”问题上，有的地区坚持了团的先进性，注意区分了两个界限，即敌我界限和共青团员同一般青年的界限。但是有些地方，对处理团员，只强调要区分敌我界限，忽视团的先进性，对完全丧失团员条件的人，还一味强调“教育教育再教育，帮助帮助再帮助，等待等待再等待”。也有偏严的情况，对出身不好犯了错误的团员，对一些在生活作风上犯有错误的团员，无限上纲，抓住不放，处分过重。

在“纳新”问题上，许多地方坚持了积极慎重的方针，较多地吸收了一批先进青年入团，增加了新鲜血液。有的地方发展团员有偏宽现象，提出“团可以发展到百分之七、八十”；也有的掌握偏严，卡得过紧，用发展党员条件要求入团青年，以致发展团员数量很少。

五、团的领导机构问题

多数地方要求建立人民公社、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基层团委。黑龙江已有六百九十五个公社建立了团委，还建立了三个团县、市委。湖南、宁夏、天津、北京、河南等省市，都有个别单位建立了基层团委。也有少数地方主张不建基层团委，只在政工作组设立团的专职干部。

除基层团委外，各级团的领导机构是否需要建立，湖南省整团建团工作座谈会的同志讨论时，有三种意见：一是主张县以上团委不建，二是主张自下而上各级团委都建，三是主张两头建，即基层团委和团的中央委员会要建，中间不建，认为建立团的中央委员会利于推动国际青年运动的发展。

六、关于超龄团员离团问题

超龄团员比例很大，约占团员总数百分之四十，达一千二百万人。在党、政、机关干部、科研人员和教职员的团员中超龄的比例更大，约占百分之八、九十。

多数地方的意见是，经过整团以后，应当分批地办理超龄团员离团工作，原则上是二十八周岁以上（有的规定三十周岁以上）的超龄团员先离团，不足二十八周岁（或不足三十周岁）的超龄团员如不愿离团，可以继续留在团内。也有少数地方主张，除了个别要求离团的超龄团员可以离团外，其他超龄团员都不离团。

据了解，许多离团的超龄团员要求党组织采用一种什么形式把他们管起来，便于继续学习和进步。

七、关于要求制定新团章问题

许多共青团员和青年不断来信，迫切要求制定新团章。有些地方在整团中还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如各级团的委员会的建立问题，发展新团员的条件问题，团员年龄问题，团员的纪律处分问题，对团员进行团的性质、任务教育问题，团与红卫兵、红小兵的关系问题等，因为没有制定新团章，这些问题感到无所遵循。现在有些基层团组织和团员、青年修改团章的积极性很高，我们已收到他们自动修改的团章草案数十份。

一九七〇年七月二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六日，刘建勋关于整党建党的讲话

会议要发一个“纪要”。这个“纪要”，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讨论过，又发给大家讨论、修改，是集体创作，我完全同意。有些问题王政委还要讲，我只讲点感想。

去年十月，我们开了个四次全会，那时对整党建党的问题，不少同志认识还有一点距离，见解还不大一致。当时，社会上“左”的右的干扰，不少单位的整党建工作，是“皮下注射”，没有“一针见血”，就是说，还没有很好地抓住同现实阶级斗争结合这个要点，或者说抓的还不够。可是，有些同志把整党建工作估计高了，认为搞的差不多了，满足于现状。因为当时大家没有掌握第一手材料，我们说了还不行。后来，王政委到下边摸了一些实际情况，在信阳讲了个话，讲的很好，印发给大家讨论，促进了一下。我们又开了个小会，要求同志们都下去看看，因为光是概念的东西不行，必须经过实践，才能使认识更深刻。当时，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两个生产大队，村连村，地连地，自然条件一样，结果不一样。一个队一年交几十万斤公粮，一个队年年吃统销粮。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是人的因素不同，领导班子不同。春节前，大家都下去摸了一些情况，这时候又开了一次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开的不错，大家都掌握了一些第一手材料，说话有力了，不是从概念到概念。这个会议后，我省整党建党进一步深入了，抓住了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正当我省整党，建党运动深入开展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了中央“三个文件”，来了个“一打三反”运动，大家可高兴了，这个运动真是好得很。我们紧密结合“一打三反”进行整党建党，使整党建党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

我下去找了几个支部座谈了一下，据说这几个支部都属于中等情况，看来整党建党搞的不坏，抓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抓了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看一个支部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要看执行什么路线，不能对“三老”不作阶级分析。有些人土改时是积极分子，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深入的时候，他是代表无产阶级还是代表资产阶级，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执行刘少奇

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这个问题一定要作阶级分析。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经常反映到党内来，社会上的阶级敌人总是要在党内找他的代理人。社会上阶级敌人嚣张，资本主义倾向严重，党内总是有人支持，不是幕前就是幕后。

整党建党中两条路线斗争很激烈。就是我们常说的，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建设党，还是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党的问题。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用毛泽东思想建设的党，就是朝气蓬勃的，密切联系群众的，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先锋队组织，这样才能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这个会议上，偃师水泉大队、项城孔营大队介绍的这方面的经验很好。

我们要抓突出政治，抓阶级斗争。在当前，抓阶级斗争，就是要抓好整党建党，抓好“一打三反”。要放手发动群众，揭开社会上阶级斗争的盖子和它在党内的反映，要搞好斗私批修。抓住这个问题，就是抓住了纲。大家经过文化大革命，觉悟都提高了嘛！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千万不要忘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千万不要忘记高举毛泽东思想像大红旗。“纪要”中写的三件事，头两件都是讲的要抓阶级斗争，要把整党建党和现实阶级斗争相结合，和“一打三反”运动相结合。组织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也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要抓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不可以把政治和业务、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搞颠倒了。有些同志老是弄不清楚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常常一说生产就把统帅忘了，就生产说生产。希望同志们摆正政治与业务统帅被统帅的关系。不是说生产可以不管，而是要以政治统帅生产，只有这样，生产才可以搞得更好。

来源：开封地区革命委员会办事组一九七〇年八月五日翻印。

一九七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毛主席建党路线的胜利》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最近，有一批省、市相继隆重举行了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和市委；其它省、市、自治区也正在积极准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选举新党委。这是党的建设的一件大事。这对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充分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

更好地动员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继续完成“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最广泛、最深刻的整党建党运动，我们的党清除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批判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提高了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我们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富有战斗力。在这样的基础上，按照新党章的规定，召开的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建立的新党委，具有鲜明的新特点。

这些地方的党代表大会，突出地抓了思想建设。召开代表大会的过程，就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过程，就是密切联系实际，认真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自觉性的过程。

这些地方的党代表大会，认真地贯彻了民主集中制。从代表的产生，到新党委的选举，都经过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地充分酝酿，反复协商。出席代表方面之广，特别是来自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工农兵党员代表比例之大，是历次党代表大会所没有过的。

这些地方的党代表大会选举的新党委，体现了老、中、青三结合。特别可喜的是，许多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老干部，更加生气勃勃地为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奋斗；一批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进入党的领导班子。

这些新特点，有力地表明，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指引下，我们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不断有新的发展。毛主席的建党思想，毛主席关于整党建党的一系列指示，正在全党进一步落实。我们的党组织正在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进一步建设成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毛主席教导我们：“除了开好代表大会以外，党的各级委员会把自己的领导工作做好，是极为重要的。”各地新党委要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教导，搞好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把各项工作做好。要根据毛主席关于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伟大指示，在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在代表大会以后，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推动各项工作不断胜利前进。

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问题。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及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那种以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建立了新的领导班子，就没有什么路线斗争的想法，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应该看到，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决定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对路线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深入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余毒。

贯彻执行正确的路线，要有正确的作风。培养好的作风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在新的胜利的形势下，各级党组织要特别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发扬毛主席亲自培育的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我们党的宝贵的革命传统，我们应当坚决实行，并使之代代相传。为了进一步发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风，我们要实行开门整风，开展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把作风问题提到路线的高度来认识。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是一切机会主义的特征。骄傲自满，总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我们一定不要沾染这种资产阶级作风的灰尘。

要解决路线的问题，作风的问题，各级党组织必须切实地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首位。领导干部更要带头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这样，才能识别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作风，什么是资产阶级作风。全党的学习抓紧了，认真学习，并且坚持下去，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水平，我们的党就会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更加团结，我们的步伐就会更加整齐，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会更加兴旺。

让我们进一步响应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号召，认真地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用新的胜利迎接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一年一月三十一日，社论）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上海市委“关于筹建共青团上海市委的请示报告”

1972 年 10 月 14 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上海市委《关于筹建共青团上海市委的请示报告》。中央批语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经过整团建团，在绝大部分基层团组织建立的基础上，可以建立县、地两级共青团委员会，并着手筹备工作，在条件具备的时候，把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团委建立起来。中央批语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共青团工作的领导，中央拟成立一个共青团工作小组，负责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协助中央联系和处理各地共青团的工作。中央批语还指出：全国少年儿童组织统称红小兵，各级共青团组织要加强对红小兵的领导。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生气勃勃地开展共青团工作》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了，并选举产生了共青团上海市第六届委员会。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共青团代表大会，也即将陆续召开。这是广大共青团员、红卫兵和亿万青年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对于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教育广大青年，培养和造就革命的青年一代，具有重要的意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

毛主席还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我国青年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殷切期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青年建立红卫兵组织，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把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这是我国青年运动史上雄伟壮丽的新篇章。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特别是随着批修整风运动的深入，广大团员、红卫兵和青年，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自觉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日益成

为青年一代的革命风尚。数以百万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一批又一批工农兵青年，进入社会主义大学，为建立一支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增添了新的血液。成千上万青年干部参加各级领导班子的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青年一代，朝气蓬勃，斗志昂扬，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

我国这一代青年是大有希望的。我们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正确看待青年，要看他们的本质和主流，不能只看他们的弱点、缺点，甚至任意夸大。好的青年也有缺点，也会犯错误，并不奇怪。我们的责任就在于满腔热情地引导他们，帮助他们，要用说服的方法而不要用压服的方法对待他们。至于极少数青年走上邪路，那也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侵袭的结果，这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青年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是存在的。这丝毫不说明现在的青年不如过去，只是说明我们一定要加强青年的教育工作，引导他们在两个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中，沿着无产阶级的轨道前进。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党的助手，是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在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斗争中，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曾经着重指出，要加强对青年的阶级教育，保证我国五代十代永远革命、永不改变。团的各级组织要在党的领导下，以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为纲，动员广大团员，团结全国各族青年，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作用，经受锻炼，实现毛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号召。

当前，批修整风是全党的头等大事。各级团的组织，要动员和组织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入批修整风的战斗，紧紧抓住刘少奇一类骗子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揭穿他们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的修正主义谬论批深批透，准确地划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在青年工作中，要进一步批判他们散布的反对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同工农相结合，反对又红又专的谬论。共青团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我们要在批修整风运动中，引导和推动广大团员、青年，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马、列和毛主

席关于青年问题的论述，提高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和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努力改造世界观。 ((1)(3))

动员和组织广大团员、青年，坚定地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团组织的重要任务。毛主席早就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几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它猛烈地冲击了轻视劳动，轻视工农的传统观念，对帝、修、反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我们下一代的梦想，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对青年的思想革命化，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作用的深远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但是，我们要看到，是坚持同工农相结合，还是反对同工农相结合，仍然是一场严重的斗争。我们要进一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下乡镀金论”、“变相劳改论”。要热情关心下乡知识青年的成长。对于同工农结合成绩显著的先进青年要给以表扬。对于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极少数坏人要给以严肃处理。

青年处在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共青团在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的同时，必须大力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独立工作，“要充分兼顾青年的工作、学习和娱乐、体育、休息两个方面。”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努力帮助各条战线上的青年做到又红又专。团的组织要向广大青年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把接触面搞宽一些，不仅要做青年积极分子的工作，而且要热情关心中间和后进青年，促进他们向积极方面转化。积极做好团的发展工作，既要反对那种不讲政治，不讲阶级，不讲原则的倾向，也要反对任意提高标准的倾向，以及时地把具备共青团员条件的青年吸收到团内来，壮大团的队伍。要选拔一批年轻的党员和优秀的团员，担任各级团的领导工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中的团员，表现突出的也可以担任团的工作。各级共青团组织，要加强红小兵工作的领导，把帮助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党委要把团的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加强领导，切实抓好。团的干部要增强党的观念，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生气勃勃地开展共青团工作，积极主动地发挥党的助手作用。

共青团员们，红卫兵战士们，各族青年同志们，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正在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我们的将来是无限美好的，而美好理想的实现，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全中国青年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

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我们一定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坚决落实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团结奋斗，作出新的贡献。

“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二日，社论）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一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委、上海市委关于召开工会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的批示

中央同意北京市委、上海市委关于召开北京市和上海市工会代表大会的两个请示报告，现转发给你们参考。

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工人阶级积极投入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充分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他们努力抓革命，促生产，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工人阶级自身也经受了锻炼，提高了觉悟，纯洁和巩固了自己的阶级队伍，为整顿和健全工会组织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广大工人群众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工会工作的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工人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地为党和国家培养和输送工人干部；协助和监督各级干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关心工人生活，搞好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注意工人的文化技术教育，坚持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广大工人群众，树立“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远大理想，为世界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

当前，各地整顿和健全工会的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批林整风这个纲，进一步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要联系工会工作的实际，……准确地划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界限，促进和加强工人阶级的革命大团结。

整顿工会要以基层为重点，同时积极进行筹备，在工人运动基本上实现革命大联合等条件具备的时候，首先召开省、市、自治区和工业集中的大、中城市的工会代表大会，将省，市，自治区和大、中城市的工会组织建设起来。要坚持工会的阶级性，同时坚持它的群众性，除混入工人队伍的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外，工人群众中包括进步的、中间的和落后的，凡是要求参加工会的，应当让他们参加。既要反对关门主义的倾向，又要谨防阶级敌人混入工人阶级的组织。

中央希望，各地召开的工会代表大会，要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形成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动员广大工人群众，为更好地实现党的“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规定的各项战斗任务而奋斗。

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工会工作的领导，首先是加强对产业工人组织的领导，使工人阶级在各项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有关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方面的一些政策问题，如会员问题、文教机关工会组织问题等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继续加强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并及时报告中央。

中央拟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成立一个工会工作小组，协助中央联系和处理各地工会方面的工作。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进一步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北京市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和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了，并选举产生了北京市总工会、上海市总工会新的领导机构。在条件具备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工业集中的大中城市，也将相继召开工会代表大会。这是全国工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向北京、上海和全国的工人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毛主席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我国工人阶级为了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在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进行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斗争，起了主力军

的作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人群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积极投入揭露和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斗争。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和领导下，上海工人阶级联合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掀起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风暴，粉碎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妖风，夺回了被走资派篡夺的那部分权力，推动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首都工人阶级首先派出自己的代表，和人民解放军相配合，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了上层建筑领域，认真地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有步骤地进行斗、批、改，有力地促进那些地方按照工人阶级的面貌进行改造。全国工人坚决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为搞好工业战线的斗、批、改，发展工业交通、科学技术和各项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工人群众在批修整风运动中认真看书学习，积极开展革命大批判，大大增强了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的感情，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大批工人先进分子参加党的行列，许多优秀工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朝气蓬勃地工作。各地厂矿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培养出了一批新型的工人技术人员，并促进了原有工程技术人员的思想改造。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国工人阶级的队伍更加纯洁，更加团结，更富有战斗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我国工人阶级，不愧为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领导阶级。

无产阶级革命和我国工人运动的历史都证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要进一步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就要坚持党的正确路线。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工人运动中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刘少奇一类骗子宣扬工会不用抓阶级斗争，实际上是麻痹工人阶级的斗志，使工会成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工具。工人运动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会工作很多，但是，最根本的是要以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为纲，狠抓阶级斗争，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要抓好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经常注意思想领域里的动向，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阶级队伍的侵蚀。

当前，要继续抓紧抓好批修整风这件头等大事。各级工会要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和组织广大职工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要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批修整风的一系列指示。刘少奇一类

骗子的路线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其实质是极右的。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实质，深入批判他们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和谬论。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始终对准刘少奇一类骗子。在整顿和健全工会组织过程中，要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反对工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批判他们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经济主义”和否定党对工会的领导等谬论，准确地划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界限，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三十多年前，毛主席指出，“团结自己，团结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团结知识分子，团结一切革命的人民。这是极大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这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责任，这是整个工人阶级的责任。”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对于当前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九大”路线，仍然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要促进和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团结，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妄图分裂工人队伍的罪行。要善于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老工人、青年工人、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作用。必须加强对新工人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的教育。新老工人要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既要坚持它的阶级性，又要坚持它的群众性，团结绝大多数的工人群众。工人阶级还必须团结一切革命人民，特别是要进一步加强工农联盟。

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中国工人阶级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成就，是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的支援分不开的。我们要进一步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加强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团结，关心和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努力搞好国内的建设，为世界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面临着国内外形势很好。我国工人阶级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要增强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做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模范，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要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搞好技术革新，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出色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要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努力精通业务，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技术

精益求精。要奋发图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列宁指出：“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过程中，工会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工会的领导。工会要密切联系群众，当好党在工人中进行群众工作的有力助手。要遵照“鞍钢宪法”，动员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协助和监督各级干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深入开展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和科学实验的活动。要真正把工会办成工人群众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认真组织工人学政治、学文化、学业务，开展业余文娱体育活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做好女工和家属的工作。从工人中培养干部，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具有深远的意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这是十分可喜的。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多些，还要经常地注意培养。要加强对工人阶级队伍基本状况的调查研究，使工会工作更有成效。

各条战线上的工人同志们，让我们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加强团结，努力工作，贯彻执行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更好地实现党的“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规定的各项战斗任务，夺取更大的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社论）

2009 年 6 月 15 日初稿

2011 年 12 月 28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一册（7）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一章 搞好斗、批、改

第七节 毕业生分配、上山下乡

一、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首都中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呼吁书——走彻底革命化道路》

红日照环宇，四海涌波涛，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造就着无数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啊，首都又一批中学红兵战士踏上了您指出的革命大道！他们已在按照您的伟大指示，高举“斗私，批修”的伟大旗帜，自觉地投身到工农中去，投身到火热的三大斗争实践中去，决心走一辈子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这是毛主席“斗私，批修”伟大方针的又一曲雄壮铿锵的凯歌！他们这一步迈得很好！迈得过硬，首都中学红代会的广大战士们衷心向他们致敬，坚决向他们学习！

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给我们中国青年指出了一条最最光明的道路。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毛主席最深刻，最概括地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战略措施。我们，毛主席的红小兵就是要走毛主席指引的路，就是要接毛泽东思想的班，就是要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列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将来我们党的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我们能不能继续沿着马列主义的正确轨道继续前进的问题，能不能胜利地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不是消失了，而是更激烈，更复杂、更迫切地摆在我们每个红卫兵，每个革命青年的面前。

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前进！这就是保证！这就是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存谁亡问题的根本措施！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历史性的、方针性的伟大战略部署！

广大红卫兵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首都中学红代会向你们发出呼吁：要高举“斗私，批修”的伟大旗帜，向去农村、草原插队的战友们学习，坚定和工农结合的革命大方向，热情宣传、忠实执行毛主席关于和工农结合的最高批示，继续掀起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走和工农结合的道路的高潮！

红卫兵战友们，祖国的边疆需要我们，祖国的农村需要我们，需要毛主席忠实的革命战士，需要我们去战斗！去建设！去保卫！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革命青年与工农相结合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

亿万革命的红卫兵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剥削阶级利己主义的生意经，什么“吃小亏，占大便宜”、什么“公私溶合”论，统统横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扫清了我们前进的障碍。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的种种缺点，更加强了我们和工农结合，彻底改造自己的愿望，使我们步伐更坚定、行动更自觉。今天，大批革命知识青年投入三大革命运动的行动，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的继续！

首都中学红代会，向广大坚守岗位，忠实执行“抓革命，促生产”最高指示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致以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你们选择并坚持的大方向全然没有错！你们是千万红卫兵战士的好榜样！

首都中学红代会向广大支持并鼓励自己子女走上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支持并鼓励他们和工农相结合的革命家长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战友们、同志们：毛主席号召我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正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国的前途，世界革命的前途属于我们的，历史和世界革命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就是沿着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引的和工农结合的胜利航向，前进！

（原载《兵团战报》1967年11月16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广州各派代表的讲话

上山下乡是毛泽东思想。你们群众内遗留下一些问题未解决，首先是支农青年问题，不尽你们地区有，武汉、上海、南京、长沙也有。有人说上山下乡是黑指示，这一点首先不成立。上山下乡是主席思想，本来我国城乡是畸形发展的，现在要消灭城乡差别，要工农结合，面向农村。我国农村地区辽阔，搞结合在农村的容量比工厂大得多，不能城市的青年都在工厂，农村的青年在农村，这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应该更多的青年走到农村。有一部分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有一部分干部子弟不安心在农村，有些尽管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也不安心在农村，因此想利用这个机会返回城市，特别是广州下乡青年还有一个户口保留这是陶铸搞的。现在毕业生还没有完全安排工作，要工作农村是广阔天地，说上山下乡是黑指示的人，本身就是还留恋城市，是受陶铸毒害的。下乡就应安心于农村。当然有的地方生活安排不够好，应该由各机关安排解决。第二个原因我替你们解释一下，是武斗要帮手时，给这些人一点钱粮，就容易出来，夺枪用了他们，当然我不是指责哪个组织，谁有就自己批评了，你们不要指责某些组织，现在搞复课闹革命，按系统、行业大联合，曾经帮助过你们的朋友成了你们的包袱，你们也不好处理，但是都不要指责对方。

现在有人说上山下乡是黑指示，对中央文件挑三拣四，对中央文件怎么能怀疑呢？对中央文件，指示攻击诽谤的人都是错误的。说黑指示的人是有坏人在煽动，也有立场问题。说这种话的人就是错误的，现在广州支农青年有三万人左右，这个统计可能高了一些“10. 8”文件下达后，回去一些，少了一点，大概还有一万多。

（来源：1967 年 11 月 15 日清华大学井冈山斗批改战团编印《学习资料》
第 43 期）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红中会长沙一中《夺军权》一兵《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

我对知识青年运动还刚刚有一点接触，看了一些材料（能收集到的都看了）开了一些座谈会以及个别交谈，可以说还是个门外汉，知识青年的革命精神使我非常感动。调查中，知青运动的许多道理使每一个决心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

行到底的人看到了希望，找到了力量，得到了巨大的鼓舞，许多惊心动魄的场面则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知识青年暴发出来的革命热情和冲天干劲形成了一股巨大的革命力量，使整个社会为之震动，一些反对知识青年运动或冷眼旁观的人，不得不重新来评价和注意知识青年运动了。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所有的人都将在他们面前受到考验，真正的彻底的革命派无不为之欢呼，为他们的革命精神所鼓舞，为他们推波助澜，擂鼓助威，一切假革命的知识分子都在他们面前撕去了他们的伪装。暴露了他们对这场文化革命的极端不理解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一切反革命眼见知识青年运动触动了他们的根本，他们暴跳如雷了，他们妄图镇压了。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

“任何地方发生革命暴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们强烈的普遍的感觉到，因此还不能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他越来越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

知青运动的兴起，预示着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预示着农民革命的伟大风暴，知识青年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那些新生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老爷们，你们的掘墓人的新的觉醒宣布你们的死期不远了。公开镇压，经济收买和改良主义都不可能阻止你们的死亡！

新的觉醒

湖南的知识青年从自发到自觉有一个发展过程。

文化革命初期知识青年受到的压迫是很大的，他们几乎只有所谓“自我革命”“互相揭发”的权力，他们的反抗也是最强烈的，是他们写出全县的第一张大字报，是他们很早就起来反工作组，湖南知识青年几乎全是造反派，所占总人数的比例比学生和工人都多。

一月革命风暴时，知青运动曾一度兴起，甚至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因为他们批判刘邓安置路线的斗争锋芒触痛了一些窃据中央的老爷，又因知识青年多是造反派，因此二月镇反时他们被反经济主义文件第三条和 2·17 通知打成反革命经济主义而惨遭镇压。当时大多数知识青年虽感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的低下，

看不到自己的前途，觉悟还未提高，不少人还认为这是应该的，因此知青运动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今年八月风暴以前，知识青年和各地造反派并肩战斗，还未显露出知青运动尖锐的斗争锋芒，因此各界对他们也没有什么批评。因为知青作战勇敢、斗争坚决，造反派的头头们还有说几句好话的。九月初知青中的少数勇敢分子开展了造户口反的斗争，同时“砸烂刘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旧教育制度的受害者”等等知青运动的道理在知青中迅速传播，随着这种以奇特速度和空前广泛的传播，知青运动很快进入了高级阶段，正如伯达同志所说，他们“从过去各种矛盾中醒过来了”，顺服的奴隶一旦打碎了套在他们头上的精神枷锁，就如火山暴发出强大的反抗精神。

湖南知识青年运动目前成为全国知青运动的一面旗帜和中南知青运动的中心。湖南关于知青运动的理论是较高和系统的，湖南知青报纸空前的多，他们的强大生命力超过了任何小报，因此湖南知青在社会上的舆论是强大的，许多闻所未闻的道理通过标语、报纸等多种形式在人民中迅速传播，甚至流传到外省，唤起其他地区知青的觉悟，由于有统一思想作指南，湖南的知识青年的观点又是空前的统一，造反精神也最强，几乎所有的知识青年都组织起来，团结在砸烂刘氏“上山下乡”的旗帜下，向旧世界发动了最猛烈的进攻。

知识青年运动的伟大历史使命

知识青年运动集中暴露了我国社会的各种矛盾。

知青运动的兴起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社会的中上层走向了社会的低层，由城市走向了农村，知青运动第一次把农民变革社会的强烈要求反映到政治舞台上来，知识青年从城市到农村，他们处在尖锐的三大差别的矛盾中，他们看到了极不合理的现象：城市剥削农村，脑力劳动者剥削体力劳动者，工农业产品的价格过分悬殊，十七年来中国的修正主义集团和特权阶层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三大差别。农民对此是满腹牢骚的，不少人只想往城市里跑。他们要求在文化革命中对此来个变革，而知识青年反映了这种强烈要求。知青运动的兴起预示着一场农民革命的暴风雨。

知青运动的兴起最明显的暴露出引起文化革命的尖锐的社会问题，最实在的显示出文化革命的理论性质。文化革命的引起正如伯达同志所说：“中国社会出现了阶级变动的新动态”。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中国现存的政权形式基本上是官僚机构，掌握官僚机构的特权阶层是压在中人民头上的一座山。他们通过城市剥削农村来塞满自己的腰包，他们的高薪就是工农和知青的血汗。广大劳动人民与特权阶层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毛主席的引导下形成文化革命的滚滚洪流。刘少奇所代表的特权阶层，十七年就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加剧了阶级分化。知识青年——农奴阶层的出现就是这分化的明证。知识青年被特权阶层压在社会的最低层，他们是特权阶层的廉价劳动力。他们成年劳动都养不活自己，他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劳动并不是不卖力，为什么养不活自己？是特权阶层通过种种巧妙方法，刮走了他们的血汗。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他们刚下去是有雄心壮志的，也作了吃苦的精神准备，但是现实呢？插队的就是变为小私有者的前景，办农场的就是养不活自己的生活。最近揭发出来的惊心动魄的事实中甚至有把知识青年当农奴搞变相贩卖。知青阶层和特权阶层的怪胎——联动的那些少爷小姐是我们社会阶级分化的一个最尖锐最鲜明的对照，知识青年处在这种地位，他们对社会矛盾最了解，他们发现刘少奇正在把我们国家往资本主义拉，这种阶级分化现象不就是复辟的暴露吗？因此知青要求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一座大山：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根基——特权阶层官僚机构的统治，这乃是文化大革命暴发的真正原因和直接目的。知青关于阶级分化的理论给那些散布文化革命是单搞意识形态，妄图否定毛主席在一月风暴中所提出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的家伙当头一棒。知青运动标志着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的思想将真正被群众掌握，预示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进行，任务的真正完成。我们的社会制度有很多地方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有些工厂是为新的资产阶级——走资派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有些农村，农民个人收入大于集体收入，林彪同志说我国没经过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而知识青年运动把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吃人的资本主义东西和本质揭露到了光天化日之下来了。那血泪斑斑的控诉暴露出来的不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十七年来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吗？

为什么插队知识青年养不活自己？从目前的材料来看，这个问题牵涉到目前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阶级状况，农民个人收入大于集体收入，以及出现同工不同酬的剥削现象就是问题的症结。

革命的知识青年们（除开那些想自己一个爬入社会上层或安于被奴役状况的奴才）应当努力学习毛泽东主义（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继续革命的思想，主张）。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找出自己政治经济地位低下的真正原因，你们才能自觉的投入彻底的革命，只有真正的彻底的政治革命才能真正解放你们和贫下中农，工人。单纯的安置路线和单纯的知青问题是不行的，必须把毛泽东主义和知青运动相结合，把知青运动的理论提高一步，发展一步。

革命的知识青年，你们代表着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未来是属于你们和我们的，你们要看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决不仅仅是安置路线而是宣传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思想，完成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而“真正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毛主席语录）

“极左派”和知识青年运动（“极左派”指红中会、高校风雷等）

只因为知青要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大山，因此他们就成了“极左派”的同志和战友。“极左派”的斗争锋芒是直指特权阶层，官僚机构及他们在中央的代理人。“极左派”是要求彻底革命的，知青也只有来一个较彻底的社会变革才能真正解放自己，因此两股革命的潮流汇合了，这就是敌人把知青运动纳入“极左思潮”的原因吧！

然而“极左派”却与知青有很大的差别，每一场革命的暴发都有其经济上的原因，而人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一个人的政治态度（这些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基本原理至今几乎被一切“马列主义者”所遗忘了）说实在的，不少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很多并不是因为自己受到了特权阶层的压迫剥削。不少是旧教育制度的宠儿，他们很大程度是出于政治敏感性，他们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在知青运动面前暴露了他们革命的不彻底性和不坚定性，而知识青年呢？他们优点和工农相似，他们是自己生活不下去了，他们深受特权阶层、官僚机器、旧教育制度的压迫。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只有对旧世界实行叛逆，坚决造反！“不是在沉默中暴发就是在沉默中死亡。”因此就决定了他们比知识分子中的左派还要坚韧不拔和革命彻底。稍举两例就可看出这种差别。

学生中的逍遥派之多，难道是因为没有复课吗？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态度。目前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出现了许多颓废、整天无所事事，逍遥，对文化革命不感兴趣以及机会主义思潮的泛滥，投降，叛卖的行为被当成革命的妥协而得不到惩罚。而只要你迈开你的双腿，到知识青年中走一走，只要你是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你就会感到从来未有的痛快和令人鼓舞。知青的革命热情和冲天干劲是所有知识分子比不上的，八·一九时那种沸腾的场面随时都可以在知青中看到。

另外，人们可以看到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在知青中的传播是惊人的，知识分子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社会改革等问题往往单纯从时髦出发甚至是为了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和他们谈社会改革，文化革命引起的原因、特权阶层，他们要么不感兴趣，要么不能接受，往往把毛泽东主义最激进的内容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而知识青年呢？他们是自己深受压迫剥削，为了求解放他们就要找理论，以明白根本原因。他们有一种真诚强烈的学习毛泽东主义的要求。即使是一个对理论毫不感兴趣的知青，和他谈起社会中的阶级分化，社会改革，他们也是津津乐道。因为毛泽东主义把他们经常接触到的东西提到了理性认识，正如他们所说，象一把钥匙打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从种种社会矛盾中惊醒。一个知青讲出了他们要求理论的朴实性：“你们谈的是从革命的原则出发，玩弄词句术语（指那些知识分子）的造反者，我们是从吃饭问题说起革命，讲哲学。”知青经济最困难，但他们办的报纸最多，每出一种新的能解释说明知青现状的新观点，不要一天可以马上传到每一个知青。因此你去走访知青可以发现一个特点，他们关于知青运动的论点几乎完全一样。在知青中理论变为蓬蓬勃勃的运动，这种飞跃更是屡见不鲜。如桂林知青九月份还在农场安于现状，几张长沙知青的报纸到了那里，讲出了他们切身体会到又没有理解到的东西，他们立刻造反了，掀起了批判安置路线的运动。桂林知青告诉我，长沙知青的报纸在那里传来传去，大家抢着看，磨成了碎片还传着看。这些真正的革命运动的动人情景，是那些住高楼吃白米过着舒适闲散生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永远也不可理解的。伟大的知青运动一定会放出灿烂的理论之花，思想之花。

知识分子中的极“左”派向何处去？是走颓废的道路，还是走象牙塔尖上的“革命”的道路（这是最终也会动摇以至叛卖革命），这是不革命，反革命的道

路。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到社会最底层去，到工农中去，到知识青年中去，而目前知青运动最突出地暴露了工农进行社会革命的要求。因此革命的知识分子与知青运动相结合是当务之急。丢掉你的臭架子，抛弃一切剥削阶级成见，跑到知青中去，握着他们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仇恨些什么？要求些什么？和他们一起研究社会矛盾，真正在调查中掌握毛主席在社会主义社会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的主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找到革命的力量，才能使改革社会，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否则知识分子高谈的“革命”。“造反”将是在一种多么空虚的沙滩上啊！

目前有些知识分子逍遥得太空虚了，想搞点复课闹改良，复课闹复辟。他们应当明白，作为旧教育制度的宠儿的他们，是不可能懂得吃人的旧教育制度的全部罪恶的，是不可能懂得被旧教育制度吃掉的那些人的心情的，知青提出了一个论点，旧教育制度培养了一批特权阶层分子，也逃脱不了历史的辩证法，同时造就了一批奴仆和剥削对象。他们有的被赶入社会的最低层，他们也是旧制度的掘墓人。这难道不是对旧教育制度本质的最深刻的揭露吗？我们的教育革命必须与工农和知青运动结合起来，才不至于走上改良主义甚至复辟的道路。复课不是把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学生扯在一起，搞一个和和气气的大杂烩，而是要把那些愿意革命的人召唤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糟得很和好的很

知识青年回城市造反，搅动了那班资产阶级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的酣梦，从中层以上社会至造反派右翼，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舆论的压迫，他们闭眼一想知青造户口反的“流氓”相，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述，知青运动的锋芒所向，乃是这次文化革命所必须摧毁的特权阶层，官僚机构的统治，乃是十几年刘少奇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而拼命扩大的三大差别，乃是资产阶级旧教育制度，乃是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知青运动把引起文化革命的尖锐的社会矛盾露骨地暴露出来了。许多长期在文化革命实践中积的问题，可以通过分析知青运动暴露出来的社会矛盾找到答案，人民对文化革命的理解将大大飞跃一步。这标志着革命人民掌握毛泽东主义的一个飞跃，预示着一场社会革命农民运动的

暴风骤雨，一切真正献身于文化革命决心搞到底的人，对这样一个群众运动怎能不放声歌颂，虚心学习，和他们相结合，并肩战斗呢？

糟得很明是站在文化革命的对象——新生资产阶级的利益方面，打击革命人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资产阶级老爷企图保存资产阶级的旧秩序，阻碍革命暴发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一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到知青中去走了一遍的，你必定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痛快。千千万万的农奴摆脱了任人宰割，惟命是从的精神状况，他们向压在他们头上的种种吸血鬼，旧制度发动了猛烈的进攻，革命知识青年的举动好得很！好的很是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的同志须知，文化革命需要一个较彻底的社会革命，需要推垮特权阶层，官僚机构的统治，一切改朝换代，改良主义，结构改良都是资本主义道路。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拥护革命的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的立场上去了。

所谓经济主义问题

革命都是有经济上的原因的，恩格斯说经济斗争到处发展为政治斗争。群众在推翻旧制度的初期提出经济要求决不是经济主义，而为了维护旧制度，用金钱来收买知青，妄图使他们停止斗争，这就是经济主义。目前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为了保护资本主义的刘氏上山下乡运动，大讲什么“安排好知识青年的生活”，大搞经济收买，这才是地地道道的经济主义。而广大知识青年呢？他们有明确的政治口号，他们所进行的是惊天动地，泣鬼神，砸烂旧世界的革命斗争。他们的经济条件比任何人都苦！但他们的革命斗争的热情比任何人都大，这是经济主义吗？

知识青年中也确实有败类，有些人对砸烂加剧阶级分化，复辟资本主义的安置路线不感兴趣，急于自己爬入上层社会，脱离知青阶层，他们这些人是想当新生的资产阶级份子，他们将成为知青的贵族。他们决不代表知青阶层的利益，决不代表知青运动的方向。相反知青的利益决定他们决不能妥协，决不能搞经济主义，经济主义将断送他们。

那些动用大批工厂资金的工贼，那些整天逍遥的知识分子，你们花费成十万物数的国家资金却在那里贩卖机会主义，妄图使革命就此止步，你们在知青推动历史的革命运动面前指手划脚地咒骂经济主义不感到可耻吗？

彻底打倒反动的血统论——痞子运动还是革命先锋

血统论为什么被文化革命的仇敌利用成为反动的理论，是当今许多用漂亮的批判血统论的言词继续贩卖血统论的说客文人所不愿回答和不可能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干部子女在文化革命中暴露出的阻止历史前进的反动性比其他非劳动人民子女要厉害得多呢？什么是正确的阶级分析法呢？是不是被某些人所认为的分析阶级出身就是真正正确的阶级分析法呢？不，阶级分析必须看人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对文化革命的政治态度。这场革命的目的 就是推翻十几年来形成的新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在中国的统治。对这场革命反抗最力的是新资产阶级其子女。而知青身受特权阶层扩大三大差别的迫害，他们处在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中，他们最了解社会，他们是拥护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不错，他们有不少人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这就造成了他们革命时身上背了很多包袱。但这并不是事物的本质，本质是他们的“社会存在”，“存在决定意识”这一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基本原理总不该被人遗忘吧！以前学校里所谓贯彻的阶级路线是培养新生资产阶级，使干部子女青云直上，这就是它的本质和总宗旨。所以以前学校并没有真正向工农开门，而是向高干子女开门，有的地方的团支部甚至干部子女夺工农子女的权，反动血统论是压在知青头上的一座山，必须推翻。知识青年决不是什么“狗崽子”，而是革命先锋。

所谓宣扬社会黑暗面

毛主席就是为了党的腐败而担忧才发动了文化革命，看到我国社会的矛盾才能革命，才具有起码的当造反派的资格。保守派保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些社会矛盾，或不愿看到这些矛盾尖锐化必将导致革命暴发。而知青最懂这些社会矛盾，最明白为什么要搞文化革命，这恰恰是他们的优点。恩格斯讲到巴黎公社的意义时说：“1864 在全欧洲，即在群众中间，运动的理论性质还很模糊，德国共产主义还没有为工人党存在……连美国工联的领袖们也认为他们可以按照规章所陈述的纲领加入运动。第一大成就应该是破坏各派的幼稚……，巴黎公社就是这样一个成就。”前一段当文化革命的理论性质还不很明确时，我们和各种机会主义者也有一种幼稚的合作，而知青运动的大成就就是很不明显也是第一个打破了这种幼稚的合作，把各种假革命，反革命的面目暴露无遗，知青运动使文化革命看到了新的希望。

革命的知识青年们，毛主席说：“社会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的认识而定下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时节。历史以从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我们一定要斗争到底，造反到底，我们黄金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拼命向前啊！

（注）补充一点——知青的利益与贫下中农是一致的，农村中走资派的压迫剥削的花样（如在工分上 玩的花招）都是对富裕农民有利而不利于贫下中农和知青的。知青对国内存在的变相剥削异常愤慨，他们的这种情绪也反映了贫下中农在农村中进行文化革命的要求。

知青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成了社会的对立面。”这句话反映了他们彻底革命的政治态度，他们决不满足于湘江风雷翻案这样的变迁（这在庸人眼里可以说是极大的变迁了），他们要求更伟大更彻底的社会变动。

来源：原转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 年）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首都中学志愿去祖国边疆农村牧场插队的红卫兵战士《志愿上山下乡的革命小将给毛主席的致敬信》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您亲手抚养下的一批革命青年，您最忠实的红卫兵，即将踏上您开辟的革命化大道，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当一名普通的劳动者。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情万分激动，有多少话要对您说啊！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并作一句话：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一年多来，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无比辉煌的成就。在这场阶级大搏斗中，我们跟着您在大风大浪中经受了锻炼，在政治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但是，我们离您的期望还差得很远，我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还远远没有毕业。今后走什么样的道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考验。

敬爱的毛主席，您老人家早就教导我们：“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国几十年来的青年运动充分证明了您的教导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走和工农结合的道路是革命

知识青年唯一正确的道路！但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盘踞教育阵地，利用学校的讲坛，大肆散布几千年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剥削阶级思想，疯狂地阻挠知识青年走您指出的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光明大道。他们狡猾地打着“红旗”反红旗，在“公私溶合”论的招牌下，大肆贩卖“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市侩哲学，妄图把青年培养成修正主义的精神贵族和“特权阶层”。然而，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了几千年来的精神桎梏，中国赫鲁晓夫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在您发出的“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下，解放军帮助我们反复地学习了“老三篇”、《青年运动的方向》等光辉著作，狠批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狠斗头脑中的“私”字。您的教导给我们以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您把我们的父兄从黑暗旧社会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您，十几年来无微不至地关怀抚育我们成长；是您，把我们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下解放出来……，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您忠实的红小兵，千言万语倾诉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忠诚，千歌万曲表达不出我们对您的热情歌颂，我们向您庄严宣誓：

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战士。时时刻刻用您的光辉思想来“斗私，批修”，作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海可枯、石可烂，我们与工农群众结合，走您老人家指的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火热红心永不变！

敬爱的毛主席啊，在您的英明领导下，在您的光辉思想照耀下，在您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中国赫鲁晓夫在边疆的代理人已被揪了出来，这给国内外敌人，苏修、蒙修以沉重的打击。旭日东升照长空，锦绣河山展新容，边疆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陆续成立了，祖国边疆的社会面貌，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祖国边疆的新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誓要和那里广大贫下中农、贫苦牧民一起，把边疆建设成一道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就是要遵照您的教导，去滚一身泥巴，炼一副钢筋铁骨，贫下中农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三大革命运动是我们最好的课堂，我们要当一代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新农、牧民，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我们决心献身于边疆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过去，我们的前辈跟着您打江山，

赴汤蹈火，流血牺牲，今天，建设这一穷二白的国家的任务又落到了我们的肩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有这样的气魄，把祖国的边疆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我们有这样的雄心，让将来的环球，成为毛泽东思想的赤旗世界！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啊！您放心吧！千万放心吧！我们，您忠实的儿女永远永远不会忘记您的谆谆教导，永远永远不会忘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火红的革命大旗和他们用艰苦卓绝的斗争打下的红色江山，永远永远不会忘记，劳动人民是我们的亲父母和好老师，我们永远永远要坚定无产阶级的立场，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向着人民的敌人，向一切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作斗争！

敬爱的毛主席啊，您放心吧！千万放心吧！我们心中有了您和您的四卷红书引路、艰难险阻何所惧！刀山火海也敢闯！您的光辉思想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要用这个强大的武器统帅一切，统帅我们同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一切顽敌作斗争！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啊，您放心吧！我们绝不辜负您的期望，革命到底，死不回头，永远永远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毛主席啊，毛主席！铺蓝天，倾东海，书写不完我们对您的无限热爱和革命决心。我们，三千五百多颗沸腾的红心，永远祝您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首都中学志愿去祖国边疆农村牧场插队的红卫兵战士敬上一九六七、十一（原载《兵团战报》1967年11月16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国务院关于社来社去农校学生要求国家统配问题的批复

1968.03.17; [68]国发文 48 号

江苏省军管会：

三月八日电悉，同意你们处理“社来社去”学生的四项措施。中等农校从公社招生，毕业后回原社，队当社员（即“社来社去”），或统一招生，规定毕业后到农村当社员的办法是正确的，是符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主席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全国农村发展纲要》第二十一条中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始，在十二年内，要从具有相当生产经验和一定文化程度的农民中间，为农业合作社培养初级的和中级的技术人员，以适应合作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批示“同意照办”的卫生部党组的报告中指出：“这样的学生，可以从城市来，也可以从公社来，回公社去，拿公社工分，不由国家发薪”。因此“社来社去”的毕业生和统一招生规定毕业后到农村去参加生产劳动的学生，就应该一律按办学部门原来的规定到农村去，回原社，队去，当社员，拿公社工分，国家不发工资。

农业学校毕业生到农村当社员，同贫下中农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关系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和灭资兴无，移风易俗的大事。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各级领导部门和学校，应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对学生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组织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斗私，批修”为纲，破私立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自己，做出贡献。要教育师生提高革命警惕性，防止阶级敌人，走资派和坏份子的借机捣乱。对于那些打，砸，抢，抓和破坏，盗窃变卖国家财产的指使者，组织者及首要分子，应按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处份。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六集）》，北京：1968年5月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

1968.06.15；中发[68]92号

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原定去年十二月进行分配。为了适应教育革命的需要，同时考虑到一九六六年毕业生尚有未离校的实际情况，中央决定，推迟到一九六八年六月开始进行分配。现在通知如下：

一，毕业生分配工作，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指示，彻底改变知识分子脱离劳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状况，彻底打破大专院校毕业生一出校门只能分配当干部，不能当工人，农民的旧制度。

在教育战线上，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各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陆定一等一夥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二，毕业生的分配，必须坚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针。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又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当普通工人，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使“知识分子劳动化”，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逐渐树立起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分配当农民的毕业生，由各地区，各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安排到解放军，地方和中央部门举办的各种国营农场去。根据国家需要，分配去当中小学教员和担任医疗工作的毕业生，也必须一面工作，一面劳动。

三，大专院校毕业生，都必须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彻底批判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彻底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斗私，批修”，大破个人主义，大破无政府主义，加强全局观点，坚决服从国家分配，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工矿去，到内地去。

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要带头当普通农民，当普通工人，带头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做服从国家分配的模范。

四，中央批准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一九六七年由中央在全国分配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计划，并由计委下达。各部门，各地区应当坚决执行，并据此和中央四月四日批转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精神，制定具体分配方案，迅速通知有关院校和所属单位照办。

五，省，市，自治区所属所大专院校的一九六七年毕业生，由省，市，自治区负责分配；国务院各部在其所属院校内为其直属企业，事业单位培养的毕业生，由国务院各部负责分配。由各部门。各地区负责分配的毕业生，必要时，可以互相进行调剂。

六，一九六七年毕业生，不论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位或集体所有制单位，在工资制度未改革之前，其工资暂按原定的标准发给。分配到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其工资除了集体经济分配的劳动收入以外，不足原定毕业生工资标准的部份，由国家予以补贴。

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工资，从今年七月份开始发给。参加工作的时间，也从今年七月份起计算。

毕业生超过规定报到日期两个月不报到的，就不再分配工作，取消其毕业生和原在学校学生的待遇。一九六六年毕业生如尚未分配或尚未报到的，也从今年“七一”算起，同此待遇。

七，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的鉴定，档案和党员的党籍处理，分配毕业生的权力机构，以及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分配问题等，仍按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关于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中有关规定执行，并补充下列几点：

（1）凡已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院校，分配工作由革命委员会负责审定。

（2）已派有军管会（军训团）和实现革命大联合，但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院校，分配工作由军管会（军训团）和大联委共同负责审定。

（3）已派有军管会（军训团）但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院校，分配工作由军管会（军训团）负责审定，并与两派或多派革命群众组织协商。

(4) 没有实现军管（军训团），又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院校，由上级革委员会或军管会负责分配。如两派或本人不服分配，过期两个月，取消毕业生和原在学校学生的待遇。

(5) 上述由各院校和上一级的分配审定，均需经中央各部，或各省，市，区的有关领导小组最后批准。

八，本通知的一切有关规定，适用于一九六六年毕业生。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七集）》，北京：1968年10月)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分配一部份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

1968.06.15；中发〔68〕93号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中规定，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须充当普通农民，当普通工人。为了使毕业生很好地得到锻炼，决定安排一部份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

解放军农场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思想建立起来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大专院校毕业生，在那里可以和解放军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农，学工，学军，学文，批判资产阶级，并接受解放军优良传统的教育。因此，将大专院校毕业生安排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是贯彻毛主席教育革命的伟大思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项重要措施。

现将安排到解放军农场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各大专院校，应当教育毕业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斗私，批修”，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狠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陆定一等一夥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方针的重大革命意义。同时，人民解放军农场各级党委，也要充分认识广大革命的知识青年参加农场锻炼，是对部队思想革命化的有力推动，教育部队指战员应热烈欢迎毕业生，

把农场共同办成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并做好接受毕业生的思想上的，组织上的，物质上的准备工作。

二，中央各部门，将安排到解放军农场的具体计划，送国家计划委员会汇总后送军委总后勤部，再由军委总后勤部确定接受的数量和农场，并通知各部门直接派往农场报到。

各省，市，自治区，提出安排到解放军农场的具体计划后，与所在大军区联系，由大军区负责安排到各该省，市，自治区内的或邻近的解放军农场去。

三，解放军农场，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遵循办抗大的方针原则，做好毕业生的管理教育工作。组织毕业生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培养他们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分配到解放军农场的毕业生一律实行军事管理，过战士生活，按部队组织形式单独编成连队，但非现役军人。

四，毕业生的工资待遇，仍按国家规定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工资标准发给工资。为了便于统一管理，由军委总后勤部编造预算，代领代供，由财政部专拨经费。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七集）》，北京：1968年10月）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一九六七年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

1968.06.15；中发〔68〕94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国务院各部，委：

一，中等专业学校（包括招收高中毕业生的班级），技工学校，半工（农）半读学校一九六七年应届毕业生，一律于一九六八年七月毕业，并开始分配工作。

二，上述学校的毕业生（包括一九六六年应届尚未离校的学生），按各办学部门原来规定的办法进行分配和安排。待遇也按原规定执行（包括省，市，自治区的规定）。原定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位的，也可以分配到集体所有制单位。原定由农村招生，毕业后回社，队的（包括“社来社去”的），仍应回社，队参加农业劳动，评工计分。原定从城市招生，毕业后到农村去劳动的，由各省，市，自治区按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安置办法，进行妥善安置。

需要发给工资的，自报到之日起，由接受单位发给。

毕业生超过规定报到日期两个月不报到的，就不再分配工作，取消其毕业生和原在学校学生的待遇。

三，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对毕业生的分配，必要时，可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补充规定。

四，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在分配和安排毕业生工作中，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毕业生应政治挂帅，“斗私批修”，“公”字当头，服从国家需要，到农村去，到工矿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中立新功！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七集）》，北京：1968年10月）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国务院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工资发放办法的通知

1968.06.27；国发文〔68〕59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革筹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国务院各部：

根据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中有关工资问题的规定，对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工资发放办法规定如下：

（一）毕业生的工资，从七月份起由接受毕业生的单位发给，原所在学校一律不发。

（二）凡在七月份以后分配和报到者，只要不超过规定报到日期二个月，所欠发的工资，由接受单位从七月份起按月补给。如在学校已领取了助学金，应在补发工资内扣除。

（三）毕业生超过报到日期二个月不报到的，接受单位不再接受分配，不再发给工资。

上述三条适用于一九六六年毕业生尚未分配或尚未报到者。

(四) 一九六六年, 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 劳动(工作)一年后, 应继续劳动, 在工资制度改革前, 原有工资一律不予变动。

以上各条, 希望各地区, 各部门, 各单位切实执行。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今年学校放暑假问题的通知

1968. 07. 03; 中发〔68〕104号

毛主席批示: 照办。

一、小学、初中, 按照过去规定时间放暑假。

小学和初中的教职员不放假, 继续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

二、高中、中等专业学校和大学不放假, 要加紧进行高中毕业生的安排和中等专业学校、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分配工作。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

(来源: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第七集)》, 北京: 1968年10月)

一九六八年七月五日, 军委办事组批发总后勤部《关于接受地方大专院校毕业生到军队农场锻炼问题的报告》

1968. 07. 05; 军委〔68〕5号

各军区, 军种, 兵种, 国防科委:

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分配一部份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 军队接收地方大专院校毕业生到军队农场锻炼, 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各单位应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迅速地妥善地加以安排落实, 并立即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现将总后勤部《关于接收地方大专院校毕业生到军队农场锻炼问题的报告》转发给你们, 请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 总后勤部关于接收地方大专院校毕业生到军队农场锻炼问题的报告

军委办事组：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分配一部份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经与有关部门研究，对于军队农场接收地方大专院校毕业生参加锻炼的有关问题报告如下：

(一) 中央各部門直属大专院校到军队农场锻炼的毕业生人数为xxxxx。根据各军区，各军种现有农场的情况和可能接收的人数，我们作了一个分配计划(详见附件)。各省，市，自治区的大专院校毕业生需要到军队农场锻炼的，由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军管会直接同大军区协商办理。

(二) 为了更好地完成接收地方毕业生的任务，各级党委对于接收毕业生的农场应加强领导，并配备较强的领导干部。根据中央通知精神，各农场一定要贯彻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做好毕业生的管理工作，很好地组织毕业生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在学习与劳动的时间比例上，基本上应与参加农场生产的部队一致。对于安排到农场的毕业生，一律按部队组织形式单独编成连队，过战士生活，并由部队派较强的连，排长加强领导，以便使他们更好地接受我军优良传统的教育，更好地得到锻炼。

(三) 毕业生在军队农场锻炼期间的一切开支，均按季单独编造决算。毕业生的工资，由所在部队农场按国家统一规定按月发给。行政事业费按部队战士标准包干使用。毕业生所需住房和铺板应尽力调剂解决，调剂解决不了的，应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加以解决，必需开支的经费由军区审核列入季度决算。各连队的炊事用具按新建连队购置。毕业生的伙食，一般的按战士标准予以安排，伙食费自理。为了减少学生的伙食费及改善生活，应组织毕业生搞好业余生产。粮油供应标准，参照中央粮食部，总后勤部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八日（需字 461 号）关于国防工业高等院校师生来部队学习和实习期间的粮油供应的联合通知执行，差额部份，由部队团以上后勤部门同当地粮食部门协商解决。被服（包括衣服，被褥，蚊帐，防寒用品等），由毕业生自理。

特此报告，如无不妥，请批转全军照此办理。

总后勤部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一九六七年毕业生分配工作情况报告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

北京市大专院校一九六七年毕业生共有二万二千六百余人，除清华、北大、北航、京工、科技大学因国防机要部门减退一千七百余，有待重新分配外，其他院校毕业生，都已离开学校，到工农兵当中接受再教育。

这届毕业生的分配工作，是从六月份接到中央“分配通知”后开始部署的。到七月中旬，在国家计委、中央各部及各省、市、自治区具体分配方案陆续送来后，首先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院校，在院校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建立了有革命学生、革命干部和解放军参加的三结合校系毕业分配领导小组，进行分配工作。但是，少数院校由于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作怪，分配工作进展迟缓，有的院校连分配领导班子都组织不起来，无法进行分配工作。八月中旬，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学校以后，在宣传贯彻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制止了武斗以后，就直接领导了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毕业分配工作大体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和已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院校，在宣传队领导下，有革命干部、学生、革命教师参加建立三结合的校系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另一种是，在两派对立情绪严重的院校，宣传队直接掌握毕业生分配大权，由宣传队的主要负责同志挂帅，组成领导小组，吸收革命干部、学生代表参加工作。大部份院校在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下，经过半个月到二十天时间，就基本上完成了分配任务。主要做法是：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全部过程。毕业生分配工作开始前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对上海机床厂的调查报告，在编者按中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运用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广泛地进行宣传，反复地组织学习，号召毕业生以实际行动来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经过学习讨论，有的毕业生检查了自己过去想当工程师、当干部的错误思想，在学生中造成了坚决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的革命声势，给分配工作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二、大办毕业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加强思想教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读书作官论”、“公私溶化论”、“三经、三重、三脱离的

分配路线”（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上层轻基层，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实践，脱离工农）。请老工人、贫下中农忆苦思甜，进行阶级教育，启发毕业生自觉地斗私批修，改造世界观。在提高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基础上，自觉地服从分配，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工矿去，到基层去，当普通农民、工人。很多班级经过斗私批修会，出现争去边疆、争到艰苦地方去的动人场面，完全改变了过去留恋大城市不愿去边疆、不愿下农村的状况。

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许多院校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落实分配方案的过程中，首先公布分配计划，让毕业生认真填写志愿，放手让群众充分酝酿讨论，提出分配意见。校、系分配领导小组同时深入群众，听取要求和意见，反复分析研究，合理搭配分配方案。初步分配方案公布后，分配小组也注意听取反应，对合理的要求，则予采纳，适当调整；对不合理的要求，耐心进行解释。同时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这样，就克服了过去少数几个干部说了算的错误作法，大多数院校做到了：经过班里讨论，系分配小组平衡搭配，校分配领导小组最后审定，报市革委会履行批准手续。

另外，目前在校的一九六八年的毕业生，经过学习毛主席关于大学毕业生要与工农相结合，接受工农再教育的最新指示，思想觉悟有了提高，也迫切要求尽快分配，迅速走上劳动锻炼的战斗岗位。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一九六八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

1968. 11. 15；中发〔68〕158号

中央决定，一九六八年大专院校毕业生，从今年十一月中旬开始分配。现通知如下：

一、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必须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教育革命的一系

列最新指示，彻底批判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打破旧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并肃清其影响。

二、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的教导，毕业生的分配，应当坚决贯彻执行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方针。一般都必须去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大量的必须去当普通农民。大专院校毕业生，要坚定地走毛主席指出的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要坚决服从党和国家分配，不要强调一定要分配到自己所学的专业部门去。各级革命委员会成员中和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中的毕业生，在分配时要起模范带头作用。

分配当普通农民的毕业生，除了继续安排到解放军农场、国营农场所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可以按照当地实际情况，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参加改造盐碱地、兴修水利等改造大自然的斗争。在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分配一部分毕业生到农村人民公社（队）去，进行插队试点。

三、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教导”，“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要对本地区的毕业生分配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凡已经进驻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院校，一律由宣传队领导毕业生分配工作。其中：已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和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院校，应在宣传队的领导下，建立有工人、解放军战士、革命干部、学生、革命教师参加建立三结合的校系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尚未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委员会或革命大联合不巩固的院校，则由宣传队直接掌握毕业生分配大权，由宣传队的主要负责同志负责，组成领导小组，吸收革命干部、学生代表参加。对于没有进驻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院校，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已经成立革委会的，由革委会负责；没有成立革委会，而派有军管会的，由军管会负责；没有成立革委会，又没有派军管会的，则由上级革委会或军管会负责。

四、各地区、各部门、各学校在毕业生的分配工作中，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接收单位，要热情欢迎毕业生参加生产劳动，认真做好接收工作，不要有所歧视。对有一些缺点或这样那样

错误的，要加以帮助教育，不得打击报复。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和革命干部，要自觉地肩负起用毛泽东思想培养青年一代的光荣任务。

五、一九六八年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工资，从今年十二月开始发给。参加工作的时间，也从今年十二月起计算。具体办法，按照国务院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工资发放办法的通知”执行。

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分配的毕业生（包括研究生）的工资，在工资制度没有改革以前，一律暂按临时工资标准发给，不实行一年以后转正定级的办法。

六、一九六八年全国共有大专院校毕业生约十五万人。由各地方、各部门自己分配的九万八千多人；由中央在全国统一分配的五万五千九百多人。中央批准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一九六八年在全国统一分配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计划，并由国家计委下达。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应当坚决执行，并据此迅速制订出调配方案，通知所属单位和学校进行派遣和接收。按计划派往各单位的毕业生，未经各省、市、自治区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同意，不许拒绝接收，或将毕业生退回原学校。原定一九六九年毕业的学生，一般地不要提前到一九六八年毕业。

七、为了使毕业生更快地到工农群众中去接受再教育，参加生产劳动实践，拜工农为师，做革命群众的小学生，一九六八年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应在十一月份落实接收计划，开始派遣，十二月底以前毕业生应全部到达接收单位。除了个别特殊情况，经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批准的以外，过期不报到的，就不再分配工作。

八、由各地方、各部门自己分配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计划，均按上述各条原则，由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部自行规定，贯彻执行。

九、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中的其他问题，在本通知中未作规定的，仍按中央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中的有关规定执行。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在具体执行中，必要时，可根据本部门、本地区的情况，作出补充规定。附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报告，供参考。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来源：根据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三]》，
武汉：1969 年 3 月)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一
九六八年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农）半读学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

1968. 11. 15；中发〔68〕159 号

一、中等专业学校（包括招收高中毕业生的班级）、技工学校、半工（农）
半读学校一九六八年毕业生，从今年十一月起开始分配。原地一九六九年毕业
的学生，一般地不要提前到一九六八年毕业。

二、上述毕业生的分配、安置办法，以及报到期限等问题，在本通知中未作
规定的，均按中央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关于一九六七年中等专业学校、技工
学校、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上述学校毕业生分配到全民所有
制单位的，在工资制度没有改革以前，暂不转正定级。

毕业生的分配和安置工作，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
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最
新指示，“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突出
无产阶级政治，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毕业生应坚定地走毛
主席指出的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坚决服从革命需要，到农村去，到边疆
去，到工矿去，到基层去，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拜工
农为师，做革命群众的小学生，在三大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各级革委会成员中
和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中的毕业生，要带头到艰苦的地方去，做服从党和国家分
配的模范。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五
日

(来源：根据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三]》，
武汉：1969 年 3 月)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新华社记者报道：《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兰州武汉大批中学毕业生去农村 许多家长坚决支持子女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光明大道》

新华社兰州二十一日电，兰州市一万八千多名初中、高中毕业生怀着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心，最近陆续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批知识青年离校前，在驻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下，举办了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他们在学习班里，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斗私批修为纲，狠批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读书做官”、“升学第一”和“下乡镀金”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他们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措施，是缩小城乡差别的重要途径。他们说，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毛泽东时代青年的最大光荣。他们纷纷聚集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像前表示决心：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干一辈子革命，走一辈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以实际行动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许多学校担任革委会和红卫兵组织负责工作的毕业生，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带头到农村安家落户。在这批毕业生下乡的过程中，兰州市各中等学校还组织了许多有工人宣传队队员和革命师生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广泛进行家庭访问，同毕业生的家长一起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和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并且向学生家长进行了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通过这些活动，大大提高了学生家长的阶级觉悟。许多家长表示坚决支持子女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光明大道。

甘肃省许多县和农村人民公社的革委会都成立了专门机构，把这项工作当作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许多公社、大队、生产队，还举办了以安置知识青年为专题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从政治、思想、生活等方面做好迎接和安置知识青年的准备工作。

新华社武汉二十一日电 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的巨大鼓舞下，武汉市已有两万多名高、初中毕业生陆续奔赴农村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在第一批知识青年奔赴农村时，武汉市八万军民举行了隆重、热烈的欢送大会。武汉市革委会主任方铭同志在会上讲话，热烈赞扬这批知识青年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听毛主席的话，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表现。他勉励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武汉地区广大高、初中毕业生，为了扫除下乡上山的思想障碍，他们以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和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为武器，广泛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散布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读书做官”和“成名成家”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提高了自己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更加激发了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无比仇恨，更加增强了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限忠诚，他们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纷纷要求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许多家长把送子女上山下乡看作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项具体行动，纷纷送子女上山下乡，让他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来源：原载《人民日报》1968 年 12 月 22 日第二版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红旗》杂志评论员《革命青年的榜样》向青年同志们推荐本期发表的金训华同志的日记。这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成长起来，坚决实践毛主席的教导，决心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革命青年一代的心声。

一九六八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为《红旗》杂志写的编者按语中指出：对于教育革命的情况，知识分子的情况，“希望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查，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毛主席还指出：对于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一年多来，全国有几百万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工农兵中去，接受再教育，这是一个

伟大的革命。金训华，就是在这个伟大的革命洪流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之一。我们发表他的日记，希望它能鼓励已经或正在实行同工农兵相结合的广大青年同志们。

金训华同志是上海市吴淞第二中学一九六八届高中毕业生，出身于工人家庭，原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常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投入了摧毁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激烈战斗。今年五月间，他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带头到黑龙江省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插队落户。今年八月十五日，双河两岸山洪倾泻，金训华为了抢救国家物资，奋战山洪，不幸光荣牺牲。根据金训华同志生前的多次申请，有关党组织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金训华同志到黑龙江省农村插队落户后，坚持天天读毛主席著作，天天收听广播。这里发表的，是他最后一本日记的摘抄。通过阶级斗争大风大浪的实践和锻炼，他深刻地领会了“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忠于毛主席就有力量”这一伟大真理。他的日记，充满了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无限热爱。他第一页日记所记，就是决心用“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逝世前一天的日记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誓死保卫毛主席！”正是在这个伟大真理照耀下，他的简单明白的语言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在这里，处处可以看到金训华和同志们在一起，认真刻苦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造自己世界观，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对自己进行严格的要求和艰苦的锻炼。

在煤油灯下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想到的是“灯芯再小，学习毛主席著作，心里总觉得亮堂堂的，而且越学越觉得亮堂。因为，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们前进的方向。”

捆谷草，手上出了血，他想到的是“我的手会出血，而贫下中农的手为什么就不出血呢？这说明我的手、我的思想长期脱离工农，脱离劳动，染上修正主义毒素，必须长期在工农群众中进行磨练。”

面对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阴谋和挑衅，他想到的是“我反正下定决心”，如果敌人胆敢侵犯我国神圣领土，枪声一响，就准备“在战场上接受党的考验”。

在生死关头的考验面前，他想到的是“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在为保卫祖国财产而与洪水搏斗的过程中，狂暴的巨浪三次把他卷进险恶的旋涡里，他三次顽强地把头抬出水面，斩风劈浪，继续向前猛冲，去抢救国家物资。金训华不愧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他三次面临死亡的威胁，三次战胜死亡的威胁，一次比一次更高地攀上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无产阶级的思想高峰。

本期还登了一幅画，目的是提倡一下创作刻划工农兵英雄形象的美术作品。这幅画是画人物的。它选择了金训华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在激流中抢救国家财产这样一个片断，生动地反映了他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赤胆忠心和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塑造了革命的青年一代的英雄形象。毛主席很早就说过：“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下乡去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人们也是看得多写得少。”我们希望在认真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深入工农兵的基础上，有更多更好的刻划工农兵英雄形象的优秀作品出现。

毛主席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金训华同志是在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青年。他坚决实行了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是革命青年的榜样。广大革命的知识分子要学习这个榜样，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在劳动中，在阶级斗争中，自觉地磨练自己，改造自己，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献出自己革命的青春。要象金训华同志那样，天天读毛主席的书，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用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观点去观察一切；要象金训华同志那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把青春贡献给伟大的反帝反修事业；要象金训华同志那样，坚决保护祖国的财产，热爱劳动人民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在抓革命、促生产中做出更大的贡献；要象金训华同志那样，认真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在三大革命运动的风口浪尖上挺身而出，为人民的利益奋不顾身，经受得住任何严峻的考验。金训华同志虽然光荣牺牲了，

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和鼓舞着年青的一代。让我们一起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更加朝气蓬勃地奋勇前进吧！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十二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四日）

一九七〇年七月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抓好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知识青年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纷纷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安家落户，踊跃地走上了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康庄大道。

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新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正在农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大风大浪中，迈步前进，茁壮成长。

前一个时期，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在安置、教育和管理下乡知识青年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总结经验，巩固成绩，全面落实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去农村的各项指示，进一步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领导。

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必须充分认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意义，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主席的这一光辉思想，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途径，培养和造就千百万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同贫下中农相结合，不是单纯安置劳动力的临时措施，而是培养和造就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我们必须抓紧抓好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决不能忽视和放松对这项工作的领导。

要抓紧抓好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最根本的就是要加强政治思想上的领导。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要积极组织和推动下乡知识青年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努

力改造世界观。要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培养和教育下乡知识青年，帮助他们解决立场、观点、感情的问题，把立足点彻底地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要在下乡知识青年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开展“四好”运动。要根据知识青年的特点，把思想工作做深做细。既要发动广大贫下中农言传身教，又要启发知识青年自觉地接受再教育；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善于引导；既要狠抓活思想，又要妥善安排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下乡知识青年的政治思想工作，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必须经常地抓，反复地抓，不能认为已经差不多了，不能只抓一阵子。

毛主席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凡是有知识青年落户的社队、农场、生产部队，都要注意调动下乡知识青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在教育中放手使用，在使用中坚持教育，让这支生力军在彻底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斗争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要支持他们向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作斗争的革命精神。对我们要合理安排劳动，注意劳动安全。劳动分配要贯彻同工同酬的原则。要关心、爱护青年，大力提倡晚婚。要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正确对待“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贫下中农是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的好老师，一切有革命志气的下乡知识青年，都应当下定决心在农村扎根一辈子，革命一辈子，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是很激烈的。在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中，必须狠抓阶级斗争。要坚决地打击一小撮拉拢、腐蚀、迫害下乡知识青年的阶级敌人，要有力地抵制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对下乡知识青年的侵袭和影响，要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读书做官论”、“下乡镀金论”等反革命修正主义余毒。

为了搞好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省、地、县要有专门班子抓，社、队要有专人管。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干部，都应当亲自动手。要认真总结和及时推广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贫下中农教育知识青年、社队领导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等各方面的先进经验。要抓好典型，树立标兵，带动一般。面上的工作，一年要认真地抓几次。城乡之间，有关部门之间，应当密切配合做好下乡知

识青年工作。目前，有些地区采取由干部带领知识青年下乡落户的做法，效果很好。这些干部，一面自己参加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面协助社、队加强对知识青年的领导，既促进了自身的思想革命化，又带动了知识青年的革命化。这个经验，各地可以推广。

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在认真搞好斗、批、改，落实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深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抓紧抓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〇年七月九日，社论）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分是贫农。我的教员生涯已有 20 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一个 1968 年的初中毕业生。1969 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秋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 11 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 37 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 8 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 200 来斤，外加 2、300 斤鲜地瓜和 10 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 200 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 100 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

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 1969 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在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之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面对我们这

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忧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郊城公社下林小学李庆霖 敬上 1972 年 12 月 20

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

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复信，传到了全国。热烈地学习讨论中央 21 号文件，成为城乡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成为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其他工作的强大动力。

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分析了大好形势，检查了当前存在的问题，研究了统筹解决的办法。

一

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全国已有八百多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生气勃勃地活跃在农村和边疆的各条战线上。这股革命洪流，猛烈地冲击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轻视农业劳动、看不起农民的旧思想、旧习惯。规模之大，影响之深，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

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贫下中农的关怀下，广大下乡知识青年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做出积极贡献，涌现出大批先进集体和邢燕子、侯隽式的先进人物。他们中间，有从天津市到山西平陆县毛家山插队的三十名青年和一名教师，同贫下中农一起，艰苦奋斗，粮食总产量三年翻了一番。河南光山县孙铁铺公社郑堂青年生产队，在贫下中农协助下，艰苦创业，一年建队，二年自给，三年有贡献，四年粮食总产从七万斤增加到二十万斤，棉花地拉沙改土，加强管理，使亩产从十斤提高到一百多斤。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部由知识青年组成的担架连三排，在珍宝岛反击战中，配合边防部队，为保卫祖国领土立了功。在云南勐腊县山寨扎根的上海知识青年朱克家，成为爱尼族人民最喜爱的多面手。河北涿鹿县的插队知识青年程有志，在培育优良品种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在陕西延川县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孙立哲，成为能做较大手术的赤脚医生。到黑龙江农村的上海知识青年金训华，为了抢救社会主义财产，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经过实际斗争锻炼，广大下乡知识青年在思想上政治上不断成长，已有五万九千多人入党，八十三万多人入团，十四万多人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更多的人成为各种各样又红又专的人材。

毛主席指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丰硕成果，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二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

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

贫下中农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状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既能经风雨、见世面，得到很好的锻炼，又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增添力量，有利于密切城乡关系，加强工农联盟。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有很重要的意义。

刘少奇和林彪一伙为了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疯狂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散布“读书做官”、“下乡镀金”，“变相劳改”等反动谬论，刮起“走后门”等歪风邪气，妄图毒害和争夺青年一代。

在这样一场激烈的斗争中，我们有些同志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不深，有些同志中了刘少奇和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和旧习惯势力的影响，工作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的有些领导干部，把这项重大战略部署当作临时措施，抓得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不少下乡知识青年生活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培养、教育无人过问。有些领导干部“走后门”，把子女留在城市或者调离农村。一小撮阶级敌人和蜕化变质分子，极力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他们甚至篡夺了个别单位的部分领导权，实行法西斯专政，残害下乡知识青年，而我们有些领导同志对迫害、摧残下乡知识青年的犯罪分子打击不力，有的甚至纵容包庇。

我们必须以批林整风为纲，以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复信和有关教导为武器，发动广大群众，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和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提高路线斗争觉悟，纠正不正之风，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加健康地发展。

三

怎样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存在的问题，会议讨论和议定了六条统筹解决的办法，并起草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和《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〇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

(一) 各级党委要深入学习、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层层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全部情况严格进行检查，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县以上党委，都要建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得力的办事机构，并由一名书记主管，组织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力量，满腔热情地积极地做好这项工作。

(二) 切实解决下乡知识青年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对已经下乡插队生活困难的，国家要给以必要的补助。今后安置经费要适当增加。

(三) 大力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适当安排业余时间，积极组织他们攻读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有关部门和科研

单位要组织一定的力量，辅导他们学习文化和科学技术。充分发挥青年人的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精神和他们的特长。积极培养和吸收具备条件的青年入团、入党、参加各级领导班子。特别要注意对女青年的培养使用。青年有了缺点错误，要耐心说服教育，绝对不能采取简单粗暴态度。认真落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不要歧视他们。下乡青年档案填写混乱和错误的，要进行清理。

(四) 坚决刹住“走后门”的不正之风。毛主席批准的中共中央(1972)19号、40号，44号文件中有关制止和纠正“走后门”的各项规定，必须告诉广大群众都知道，发动群众监督执行。领导干部“走后门”的，要主动检查，坚决纠正。今后要严格制度。违反的，不但要把他们的子女退回去，并且要给予纪律处分。

“走后门”的责任在家长，对于青年本身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鼓励他们上山下乡，不得歧视。

(五) 发动广大群众，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作坚决斗争。对于以法西斯手段残酷迫害知识青年和强奸女青年的犯罪分子，要按其罪行依法惩办。犯罪分子为掩盖罪行对受害人进行威胁、对检举人进行报复的，要从严惩处。对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举行公判，坚决杀掉。杀人要严格控制，不可多杀。坦白认罪好的，可以从宽处理。要保护受害人的名誉和安全。要保护青年之间的正当恋爱和婚姻。严禁逼婚。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警惕阶级敌人扰乱我们的阵线。

(六) 今后每年将有大批的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扎根落户，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要作出长远的全面的规划，同整个经济建设、开发边疆和文教科研的规划衔接起来。

今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采取以下四种形式：1、插队，要适当集中，建立青年点，有条件的也可回老家落户；2、以下乡知识青年为主，由带队干部和部分贫下中农参加，在人民公社里建立集体所有制的青年队；3、在土地比较多的地方，单独建立以下乡知识青年为主，由带队干部和部分贫下中农参加的集体所有制农场；4、到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林、牧，渔场。

各级党委要先抓好三分之一，派出得力干部，把知识青年集中的地方和单位办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农业先进单位，办成亦农、亦工、亦学、亦兵的大学校。

现在，全国已有许多先进单位开创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好局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各级领导要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并且积极推广，充分发挥先进榜样的力量。他们能够做到的，别的单位只要认真学习，努力工作，也一定能够做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五十年内外，一百年内外，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时代。我们国家的面貌，特别是广大农村的面貌，将要发生极大的变化。要鼓舞广大下乡知识青年，树立雄心壮志，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扎根成长，同贫下中农在一起，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做出重大贡献。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指示。

国 务 院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三年八月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在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下，几年来，几百万青年学生满怀革命豪情，奔向祖国的农村、边疆，到人民公社、生产建设部队和国营农场，实行与工农相结合。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涌现出大批先进集体和邢燕子、侯隽式的先进人物。有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有些参加了各级领导班子，有些担任了基层各项工作，不少人并有所发明创造，成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积极活跃的力量。事实充分证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股滚滚的革命洪流，猛烈地冲击了几千年来剥削阶级轻视农民、轻视劳动的旧思想和旧习惯，起了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巨大作用，密切了城乡关系，加强了工农联盟，对我国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等领域，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我国，每年有这么多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生动地体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情况如何，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关系极大。农业要上去，农村要改变面貌，需要大批知识

青年把学到的政治、文化、科学知识，同农村阶级斗争的实际和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实践结合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许多贫下中农说得好：“农村需要知识青年。”下乡知识青年从小生长在城镇，很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他们到农村锻炼成长，这是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农村也是大学。在那里，青年们有学不完的知识，干不完的事业。知识青年通过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逐渐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经受锻炼，就能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许多知识青年也说得好：“我们更需要农村。”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所说的两个“需要”，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需要，是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需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实行毛主席所说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既然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不存在两种思想、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各级领导必须用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认识和对待这场革命。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必须衷心拥护这场革命，把抓好上山下乡的工作，当作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的一件大事来抓。我们广大干部正是这样做的，许多同志还积极送子女务农，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值得提醒的是，有那么一些同志，对这场革命还不理解，也不得力。希望他们快些改过来。抓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要以身作则，坚决抵制不正之风。对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的管理教育，要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青年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他们的主流是好的。要坚决保护和支持知识青年的革命精神，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要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积极地培养他们，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

搞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要以批修整风为纲，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读书做官”、“下乡镀金”和“变相劳改”等反动谬论，揭露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肃清其流毒。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对那些迫害、摧残知识青年的阶级敌人和犯罪分子，一定要狠狠打击，依法惩办，切实保护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

各级干部要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统筹解决下乡知识青年在前进中遇到的问题，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以帮助青年们长期扎根农村。要组织知识青年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学习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努力锻炼培养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下乡知识青年也要关心上层建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关心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学会辨别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同阻碍社会主义事业前进和不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对知识青年中符合党员、团员条件的，要积极而慎重地发展。注意从知识青年中培养干部。对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重在政治表现。要教育青年们艰苦奋斗，积极参加劳动，大力发展生产。要做到下乡知识青年和当地社员同工同酬。要对青年们在生产上耐心指导，关心他们的生活，注意劳逸结合。在农活安排上，要照顾女青年的生理特点。这些方面做好了，就能更好地鼓舞青年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总结几年来的经验，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严格检查，总结经验，作出规划，孜孜不倦地做好工作。共青团和妇联，要把团结教育广大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动员城市和接收地区要紧密配合，派一些思想作风好的得力干部去带领知识青年。革命家长要协助农村的同志，对子女进行思想教育。各地农村的同志要进一步做好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的管理教育工作。文化出版系统，应当多为知识青年出一些读物。各条战线、各个部门都要大力配合，为培养革命接班人贡献力量。知识青年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让我们满怀对党的事业的政治责任感，对无产阶级下一代的高度负责精神，热情关怀他们的成长，进一步做好上山下乡的工作。

广大下乡和回乡的青年同志们，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都在关怀你们，对你们寄予了殷切的期望。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时代。我们国家的面貌，特别是农村的面貌，将要发生极大的变化。青年们一定要树雄心，立壮志，在农村扎根成长，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大力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实现农业现代化，为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历史使命，做出更大的贡献！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三年八月七日，社

二、研究资料

程约汉：《一段艰苦而光荣的历史华章——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分期及特点》

资料来源：乌有之乡网站

引言

研究这段历史，不是要倒退到这段历史里，正像研究唐朝贞观盛世一样，不是倒退回去买卖铜钱，再用水转筒车灌溉田地。

研究这段历史，是探究归纳这段历史蕴藏的价值、精神和经验，在后世得以承传，发扬光大。

研究这段历史，不是修改涂黑这段历史，而是恢复这段历史的原貌，雄峻高山就是雄峻高山，千里草原就是千里草原，滚地乱石就是滚地乱石……

移风易俗、富于良知的伟大壮举

工人农民是世间的大多数，关心他们的兴衰和疾苦，尤其是在贫富轩轾的社会里，能够扶其贫助其弱，改变生存状态，永远是一股波波相续的历史清流。

“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的年轻毛泽东，“邃密群科济世穷”的年轻周恩来，“国事日非，何日难却”的年轻朱德，当年就是上山下乡，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坚持农村武装斗争，经过一、二十年奋斗终于推翻旧中国的反动统治，创建社会主义社稷江山，迈出提升工农民众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可喜的第一步。知识分子和城市学生跟工农相结合是民主革命证明成功的历史经验，这不仅是从革命队伍中知识分子和城市学生的变化和兴衰得到的启迪，也更是三位伟人从他们自己一次次饱历风尘的体验中归纳出来的真知灼见。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希望广大新中国青年学生包括自己的子女也走这一条道路，尽快成为可靠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创业者，年逾五十的三位伟人的眼光看得更远，也更寄于希望和重托。

新中国成立的 1949 年到 1976 年三位伟人的逝世，共 27 年，有近二千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段轰轰烈烈历史充分说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

一辈革命家是这个重大战略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都是着眼于教育、培育和器重、擢升广大知识青年，在提升工农民众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的长征中迈出第二步，第三步；数以百万计中国知青用青春和热血推动农村边疆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伟大行动是老一辈革命家的理想与精神的一种传承，一种延伸，知青身上流淌着的红色血脉。

开国领袖们的决策和行动具有巨大的辐射力，三位伟人所倡导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主张，改变他们的半原始的生存状态和生产水平是实践了一代仁人志士的梦想，是富于良知的大规模实践，具有巨大的道义力量，加上他们的人格魅力，必然在千百万新中国青年人中产生影响和冲击波，在人生观上深受启发而且情感深受感动，这就是中国大地上所以呈现数以百万计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壮观图景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千年历史上，这种上下同欲、万众一心的移风易俗的壮举是前所未有，后来者也不会多的。

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四个历史阶段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历史大致可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是民主革命阶段，“五四”运动后期一派主张并行动的知识青年和奔赴延安红色根据地的蒋管区知识青年为代表；第二是新中国成立到文化革命前的阶段，以杨华、候隽、董加耕、张韧等自愿上山下乡为代表，可称为“志愿知青”，1955年后的 53 万人，1962 年到文革前的 129.28 万人，共计 182.28 万人；第三是文化革命阶段，以北京知青 55、蔡立坚、周秉建、王军等为代表；其时，一部分是自愿上山下乡的，相当部分是“响应号召”上山下乡的，可称为“潮流知青”，计 1402.66 万人；第四是毛泽东、周恩来逝世到 1980 年阶段，计 244.54 万人，上山下乡日渐式微。这四个阶段，尽管面貌和特点不同，具体内容有异，但都是围绕知识青年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条红色主线而呈现波浪起伏的态势。

1、民主革命阶段

第一阶段同后三阶段有质的区别

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当时共产党没有夺取到政权，知识青年主要是投入农村刀剑铿锵的斗争，在遍历危境险境中浴血奋战。

后二、三、四阶段就不同了，共产党夺取了政权，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言，虽然在后三个阶段各有较大的特点和区别，但是发展的形势有一个常态，即新中国第一代领导者形成的共识和决策，将城市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列入《1956—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党中央国务院的 1964 年 11 月下发纲领性文件《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将上山下乡规定为“一项长远方针，至少规划十五年”，并从中央到地方均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制定一套相应的政策措施，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在 1964 年 4 月 14 日撰写《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该文称：“今年，全国将动员几十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村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今后若干年内将一年比一年多。怎样使广大城市青年能够自觉地下乡，怎样使他们同农民群众结合，怎样让他们在建设现代化农业的斗争中发挥作用，这是共青团的一项长期的重大政治任务。”1963 年 7 月 9 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指出：今后 15 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做长远打算，编制 15 年安置计划。10 月 18 日，对《中国青年》杂志和共青团的工作指示：“今后 18 年内又有 3500 万城市青年到农村去，你们的工作要面向农村。”可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成为新中国一项重要的国策，不是可执行而是需要认真执行；也不是三五年执行方可，而是要按中央国务院规划了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执行”；更不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数量多少无所谓，而是要求“大批”、“今后若干年内将一年比一年多”。可见将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分期划得很细、很多阶段是不妥的，已有悖于历史原貌。再说任何国家不可能做到经济直线上升，有的批判说困难年景，下乡是“吃苦果”，发展年景下乡是“狂潮”，这种逻辑显然是可笑的。同时实施这项国策，始终存在三个主题，三个需要，即新中国农村和边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不扩大三差别的需要，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需要，社会主义在发展中不易帜改局的需要。是既解决经济（失业）问题，又解决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可以“一石三鸟”的最佳方案。这同第一阶段有质的区别。

2、新中国成立至文化革命前 1966 年，上山下乡知青 182.28 万

旧中国是畸形发展的烂摊子，国民党逃亡台湾，虏走黄金 277 万两和银元 3526.9 万元。全国人口中 90%以上是文盲半文盲，总人口死亡率在 30%，婴儿和孕妇死亡率分别高达 20% 和 1500/10 万，触目惊心，平均寿命仅为 35 岁。最广大边疆和农村穷年兀兀，民不聊生，少数城市灯红酒绿腐朽糜烂，生产水平和百姓生状态处于半原始状态。每遇天灾人祸，就饥馑遍野，街头横尸。将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变为强大繁荣的国家不可能像“梦里娶媳妇”“黄粱美梦”那档事儿，只要卧床闭双眼就能“实现”“唾手可得了”，必经一个二、三十年艰苦创业的中间阶段，也就是说富之前有一个穷阶段，到裕之前有一个贫阶段，必然要一步一步走的阶段。不可能像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外采取疯狂无耻侵占、掠夺，对内加紧剥削压迫、榨取更多的血汗去实现；而在这个历史阶段是社会主义立国，当然不能走那条路，就得依靠全国劳动群众，尤其是生逢其时青年一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逐步走向繁荣和强大。

毛泽东和党中央当时所作出的战略决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孤立的，是整个国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各行各业各条战线支援农村和边疆大军中一支军队；是当时科技、教育、资金、文化及其载体——人才等，全方位流向农村和边疆、支援农村和边疆中的一个方面，一条支流。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这项战略决策，是从新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也完全符合当时积贫积弱的国情；是从缩小三大差别出发，也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固然有解决失业的重要经济因素，但从根本上是以推进农村和边疆建设改变工农民众半原始的生存状态和生产水平为目的，也是在西方敌对势力下包围下的新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要措施。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看得很清楚，说得也很明白，当时根本没有遮遮盖盖，甚至欺骗的意思。要在落后的农村和边疆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仅仅靠边疆和农村的自身力量是非常不够的，必须要注入新的力量，新的因素。一个匮乏资金、技术、科技、教育、文化及其载体——人才（包括有一定文化知识青年）的农村和边疆，如果没有外来的力量、外来的因素进行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现代化，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一点难道还不清楚吗？第二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尚“一穷二白”。新中国的政府一时拿不出巨额资金建办更多的中学、大学；，又不可能建办更多的工厂，因而相当一部分城乡中

小学生到农村和边疆就成为一种就业的抉择。这是国情的需要，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的抉择。

当然，有些人对这场浑厚磅礴的社会实践不感兴趣，也不相信其有，亦扞格不入，但是新因素、新人、新景象就发生在中国的大地之上。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和边疆相当落后。许多地方饮水，在村头埂下的小塘里挑，知青下去后重新挖掘砌镶石块，不让脏水流入。初夏撒石灰，或打药水。许多村搭个棚子就是厕所，知青坚持新建分出男女。许多村子妇女，包括孩子很少刷牙洗澡，例假来了用一条布包上灶灰使用，在女知青的影响下开始改变。不久跟随到城里第一次买例假带、胸罩，挑花色款式。当时每个知青住所，到了晚上、假日，就成为当地青年活动中心，学文化，跳红色歌舞；头晚上学唱“北京有个金太阳”，第二天田头地角、村前村后和薅秧田坝歌声飘荡。许多村子，小油灯和木水车让位于电灯和电动抽水机。马车、牛车队里，加进拖拉机农用汽车。友谊与爱情不知不觉在热气腾腾的交往中诞生萌芽。就是从这些生活点滴的变化开始，农村和边疆的青少年接受新的文明理念，新的人生观。

这里再谈一谈，上山下乡“耽误剥夺”一代人学业、“文化中断”的话题，我们不苟同这个似是而非的论调。当时的国情是，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畸形旧墟上要百废待兴，但不能不顾轻重缓急；四、五亿人要吃饭穿衣，衣食住行要钱，这是最大的也是最基本的国计民生问题。国家在头二、三十年艰苦创业阶段不可能拿出很多钱办教育，办中学，办大学；所生逢其时的青年，必然不可能人人上中学，人人上大学。正是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耽误”“剥夺”青年文化学业，“决定”那时代青年人中必然有大部分人不能升学深造。因而，当时新中国要求和号召他们上山下乡，实践中深造，读无字大书，怎么能说上山下乡“耽误”那代人文化学业而时加诟谇呢！还应该指明：在中国政坛上真正最关心青年人健康成长、文化进步的是主席毛泽东、总理周恩来，那些年国家再穷再难，千方百计的创造条件。比如（见表一）在新中国成立的 20 多年中，国家财政投资教育事业占国家财政总支出 4%-7%。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教育事业经费约 10 亿左右，到六十年代约 20 亿左右，“文革”时期达 40 亿左右，每隔十年上升一个大台阶；所招大、中学生开始以百万计的大幅增加，不是有力的证明么？！在这些个十年就有一个大进步的事实和现实前，知青及国人真不该人云亦云了。

表一 教育事业费支出及其所占比例情况表

单位: 亿元

年度	国家财政				
	总支出	其中: 文教科学、 卫生事业支出	教育事业支出比重 (%)	说明	
	合计	其中: 教育事业费支出		占国家	
财政支出	占文教育事业费支出				
1950					
年	68.08	5.02	3.76	5.52	74.90
1、各项绝数均系根据国家统计局《建国三十年国经民经费统计提要》及财政部决算支出整理的。其中: 1968 年和 1969 年教育事业费支出是财政部估算的。					
2、财政总支出中包括基本建设拨款, 文教事业费和教育事业费支出中不包括基本建设拨款。					
3、文教事业费支出和教育事业费支出都不包括各业务部门在各自的事业费中开支的中等技术学校、技工学校经费, 也不包括厂矿企业开支的办学经费					
1951					
年	122.49	10.56	7.42	6.06	70.27
1952					
年	175.99	13.47	8.95	5.09	66.44
1953					
年	220.12	19.03	12.80	5.81	67.26
1954					
年	246.32	19.7	13.77	5.59	69.90

1955					
年	269.29	19.82	14.08	5.23	71.04
1956					
年	305.74	23.90	16.47	5.39	68.91
1957					
年	304.21	27.76	19.52	6.42	70.32
1958					
年	409.40	28.64	19.83	4.84	69.24
1959					
年	552.86	36.47	24.09	4.36	66.05
1960					
年	654.14	50.46	31.78	4.86	62.98
1961					
年	367.02	41.23	26.78	7.30	64.95
1962					
年	305.25	36.74	24.07	7.898	65.51
1963					
年	339.63	37.96	24.91	7.334	65.62

1964					
年	399.02	43.34	27.80	6.97	64.14
1965					
年	466.33	45.59	29.12	6.24	63.87
1966					
年	541.56	51.68	34.43	6.36	66.62
1967					
年	441.85	48.56	32.70	7.40	67.34
1968					
年	359.84	40.96	27.50	7.64	37.14
1969					
年	525.86	40.97	27.04	5.14	66.00
1970					
年	649.41	43.65	27.56	4.24	63.14
1971					
年	732.17	52.31	33.00	4.51	63.09
1972					
年	766.36	62.01	38.54	5.03	62.15

1973					
年	809.28	69.88	42.07	5.20	60.20
1974					
年	790.75	76.49	45.98	5.81	60.11
1975					
年	820.88	81.29	48.26	5.88	59.37
1976					
年	806.20	85.49	50.49	6.26	59.06
1977					
年	843.53	90.20	53.04	6.29	58.80
1978					
年	1110.95	112.66	65.60	5.90	58.23
1979					
年	1273.94	132.07	76.96	6.05	58.27
1980					
年	1212.73	156.26	94.18	7.77	60.27

从表一可以清楚地看出，新中国尽管年年投入教育事业的财力在增加，但做不到让全国的青年学生人人升中学，升大学；在除了升学外的中小学生就走向社会工作，到农村，或到机关企事业单位。基于同样的经济原因，尽管年年投入工矿和事业单位的财力增加和企事业单位的单位增加，但仍做不到人

人在工矿和其它事业单位就业。这是旧中国烂摊子决定的，也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强”之前，“富”之前的必然现象，有二、三十年的过渡期。于是，到农村、上山下乡成了很重要的途径和战场。到了六十年代，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苏联在经济上、军事上可与美国匹敌时却出现修正主义上台的石破惊天事件，

“火箭上天，红旗落地”的惨痛现实，而且近在咫尺，中国青年学生和知识青年健康成长必然置放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议事日程上，这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个人、家庭和青年可不以为然，不在乎，党和国家能不在乎涉及全局性的根本大事吗？

数以百万计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什么去呢？是参加农业生产，去抓经济发展，去当科技员、技术员、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同时，他们在实际工作锻炼自己，磨练意志。在乡村社员中逐步有了威信，也有过自豪。当时，广大农村和边疆干部队伍的文化程度，半文盲、初小文化居多，对当地农业生产领导和管理水平有较大制约。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知青到农村和边疆，在经过一、二年劳动和工作锻炼后他们身上的文化知识开始派上用处，他们的城市开阔的文化视野产生效能，开始在乡村显示出骨干作用，领导作用，对推动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贡献是无法估计考量的。总之，他们当中表现差的是少数，而多数在下去后在生产斗争、阶段斗争，科学实验和国防建设中出过力流过汗有贡献，即使 1966 年后的“潮流知青”，无不如此。由郑洸主编的《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对 1966 年前这个阶段知识青年有一段客观、公正的评价，现摘录于下：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 60 年代我国社会主义的一件大事，也是国家一项有计划组织进行的重要工作。从 1962 年秋至 1966 年夏的 4 年里，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下乡的有 129 万人，加上回乡的知识青年和前几年下乡的知识青年，约有 1000 万人。他们当中不仅有普通职工的子女，也有元帅、将军、老红军、省长、市长、省委和市委书记、大学教授、著名民主人士的子孙。他们继承和发扬了我国革命青年在战争年代上井冈、下洪湖、奔延安、赴太行，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荣革命传统，为大办农业，建设社会主义农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确实锻炼成长了一批有为的知识青年。如全国闻名的邢燕子、候隽、董加耕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展农业科学实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涌现了一批人才。广东省有育种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周汉华；吉林有在水稻栽培方面取得良好成果的吕根泽、崔炳润；

陕西有在土化肥研究方面有突出成绩的何文义、植棉能手齐俊杰；江西有在改造低产田方面作出成绩的宋喜明，旱地育秧和水稻杂交良种培育取得成果的何来昌等等。”

我们昆明“六四届”580多知青分布安宁十七大队七十余村子，在第一年多里已开始在兴修水利、平整土地，帮助五保户等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共计办了20多个夜校、26个俱乐部、56个文艺组，组织了70多个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51个读报组，另外还编写了许多黑板报。积极帮助农民提高文化，大力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思想，在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方面，做了积极贡献。

此外，还有200多人积极地参加了科学实验活动，建立了57个三结合科学实验小组，在800多亩中进行科学试验取得良好效果。桃花九队几个知识青年搞了九分地的小麦试验田，亩产达六百五十斤。对发展农业生产，夺取粮食大丰收起了示范作用。二、三年后在3个公社14个大队77个生产队，有1人担任副大队长，17人担任小队政治队长，62人担任小队会计，31人担任保管员，79人担任民兵指导员，30人担任民办教师，3人担任大队文书，15人担任团支书，25人担任团支委，96人担任记分员，33人担任保健员。共392人，占调查总人数的81.2%。

我也是其中一员，在七年多的插队日子里，先后当过记工员、副队长、政治队长，同农民一块，风来雨去，不敢少辍。碰到大的困难也苦闷过，便想到苏联作家高尔基一句话：是我们改造环境，而不是环境改造我们。也曾动摇过，但想想鲁讯的话、红军长征、毛泽东的三湾改编，自己终于坚持下来了。由于自己和干部群众共同努力，生产队从1969年开始连续三年获历史最高产量，年底的工分分红值有大幅增长。县志记载，那三年全县历史也是最高产量，大丰收。省会城市昆明也是如此。

当时也听到诸如“知青是为什么”的议论，回答也有些不同，当感到自己同人数最多的民众真正结合，心里就坦荡荡了——“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耕田，训蒙悬壶。风雨无阻，戮力戮力，夫何故之？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架桥通电，筑坝平畦。风雨无阻，戮力戮力，夫何故之？”（《知青为什么》）

一种成就感驱散疲惫。身心浸润在愉悦甜蜜的暖暖之中，从未有过的自信开始在心中萌生。

在新中国建设时期,上山下乡有一个十分重要特点就是周总理多次强调“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指导思想得到始终遵循,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人性化的操作日渐突出,日益符合知青及其父母的思想实际。如昆明市“老三届”是到千里之外的边疆县插队,后来的小知青却是到昆明市附近县区插队,而且学习“株洲经验”让知青父母所在的单位参加社队管理等,等等,都有许多事例可以证明。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城市学生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几乎就是在同步进行地被调往其它战线,或者返回城市工作。昆明市 1957 年有 181 名城市学生到安宁县插队;第二年大跃进,工业战线急需人时都先后调出乡村了。1964 年 9 月,又有 580 多位知青到安宁插队。到 1971 年国家计委决定调知识青年到其他战线上工作,我们在插队七年多后,也就是在那年被抽调安宁县和昆明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从 1968 年开始又有七千名城市中学生到安宁插队,一般通过二、三年锻炼就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从 1955 年开始,全国城市学生就是这样不断下农村,又不断调出农村到各条战线,已经形成一个一潭活水的动态管理机制;经过农村劳动和基层实践的锻炼,又红又专的人才源源不断培养出来了。

表二 1962-1979 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变化情况

年份 人数	上山下乡人数	调离农村人数	年末实际在乡 人数
1962 年-1981 年累计	1776.5	1499.46	
其中: 196-1966	129.28		
1967-1968	199.68		
1969	267.38		
1970	106.4	合计 401.35	
1971	74.83		
1972	67.39		
1973	89.61	533.22	
1974	172.48	60.35	681.54
1975	236.86	139.79	757.25

1976	188.03	135.25	809.69
1977	171.68	103.01	863.69
1978	48.09	255.32	641.9
1979	24.77	395.39	246.9

注：由于统计中有重漏差错等原因，上山下乡人数减去调离人数不等于年末实际在乡人数。

资料来源：《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

从表二可以清楚地看出，全国 1962—1970 年已从农村抽调出知识青年达 401.3 万人，这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在经过锻炼后第一次“返城”高潮。1971 年—1973 年虽然表中是空白，但 1971 年国家就制定可以从知青招工的重大政策，当年又形成一个小的返城高潮。昆明市过去下乡的知青和“文革”中下乡的“老三届”，也就是在这一年大部分抽调当地和昆明市各条战线上工作。1973 年毛泽东主席在给李庆霖回信中说“容当统筹解决”，周恩来总理在 1973 年全国上山下乡会议上强调全面解决知识青年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他们健康成长的举措一个接一个出台。从 1974 年继续抽调知青有 60.3 万，1975 年有 139.7 万，1976 年有 135.2 万，1977 年有 103 万，年年都有抽调数。就是说 1974—1977 年调出知青已达 438 万。据不完全统计，在云南农场的知青“胜利大逃亡”（云南农垦一位作家不无诙谐之语）之前的 1978 年为止，全国共有 1095.07 万知青到各条战线上工作，占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总数的 60% 以上。事实证明在云南农场知青“胜利大逃亡”之前，从全国广大知青中招工、提干、招生、参军等都在有条不紊的合理运行着，“返城”没有断过线。一个有进有出、有出有进的合理的动态管理机制一直正常地良性地运行。这个基本历史事实却被一些知青，及一些知问题研究者避而不谈，视而不见，不时重复“1700 万知青造反回城”的呓语，只能说历史知识的苍白。

尽管当时有的领导，有的媒体如《中国青年》撰文主张倡导“在农村干一辈子”，但是党中央国务院不有采纳，头脑是清醒的，实事求是的，着眼于多数知青。坚持要求城市学生到农村锻炼，投身当地建设，同时在适当时候抽调他们到其它战线上工作，具有原则性，灵活性和求实性。所以说全国大多数家庭和知识

青年当年是拥护党和政府的，虽然思想也会有波动、有徘徊，但基本上是比较安心的，努力工作的；上山下乡在毛泽东时代较为合理健康地运行着，没有大起大落，没有什么动乱，更没有谁去武力镇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和原因。

3、1966 年至 1976 年毛泽东逝世，上山下乡知青 1402.66 万

历史的的车轮进入 1966 年，第三阶段（文化革命十年），同第二阶段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和区别。1966 年底，北京市的一些红卫兵成立了红卫兵农垦战斗团，要求去海南；北京长辛店中学学生蔡立坚串联经过山西的一个小山村，决定留下落户；1967 年 10 月，北就第 25 中学曲折等 10 人自愿去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落户，在天安门宣誓出征。1967 年 11 月，北京市 1200 名中学生出发前往内蒙古和黑龙江“北大荒”；12 月，青岛市一批初、高生到山东诸城县插队，1968 年 2 月济南市首批 200 多名中学毕业生到沂蒙山区插队落户……文革初期全国各地都有红卫兵自愿奔赴祖国最需要地方去建国立业。10 月，已下去 70.1 万中学生，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号召已经到 1968 年 12 月了。由此而见，所谓“文革十年知青下乡都强迫的”，是不符合当时历史事实的。当然，这一阶段除京津沪坚持毛泽东提出“统筹兼顾”方针，有 30%的老三届知青未下乡之外，一些地方在头二、三年的特殊时期（即老三届）出现一刀切现象，诱发许多问题，不同程度损害群众的利益。不顾各种家庭实际困难，反映许多地方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已经到了严重的地步；也没有坚持历来行之有效的“统筹兼顾”的工作方针——该升学的升学，该进厂矿的进厂矿，该上山下乡的上山下乡。当上山下乡热潮来的时候，一些领导头脑发热，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因而问题较严重；不过仍必须强调指出，上述问题和错误发生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命运到一个关键期，即拐点，是一个特殊阶段所发生的问题，而且仅在较短时间。从 1969 年开始，整个国家走向正轨，特殊时期所呈现的做法和错误开始纠正，“统筹兼顾”的工作方针得到继续贯彻。因二、三年的“变态”，而否定二十多年的“常态”，这不是科学的态度，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应该看到第三阶段文革十年，仍在贯彻 1964 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城市动员和组织知识青年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草案》的精神，是新中国五十年代上山下乡运动延伸和继续。也就是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主客观因素仍然存在，即第二

阶段的经济因素，如国家拿不出大批资金普及初高中，尤其是大学教育；城市就业形势仍然严峻，也拿不出大批资金兴办厂矿企业；农村和边疆仍然亟需资金、人才、科技和教育，以及城市中学生受到剥削阶级思想影响、自身存在弱点等等，所以在第三阶段文革十年中国家鼓励知青上山下乡的目标及国策基本没有变。文革十年实施知青上山下乡的国策，仍在 15 年的规划内，仍是将经济问题（失业）、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综合起来一块解决，那种将第三阶段文革十年知青上山下乡加以否定说成是错误显然违背事理。在第三阶段文革时期，可能因为实施的力度大，范围广，就立即认为“运动”搞错了，这显然站不住脚的。动员和组织的力度大，范围广，有何错呢？

另外，文革中的 1971 年 2 月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正式决定招收 150 万职工具有转折意义的一项举措，又开启了历年大批知青开始选调回城的工作。这已是过去做法“修正”，更加符合知青及家长的思想水平和利益，毫无半点“左”的成份。

从 1966 年到 1976 年，上千万知识青年参与全国的农业生产，社会发展的情况和效果又是如何呢？

青春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闪光，功勋在峥嵘的历史岁月里开创。

有一份耕耘就有一份收获，有一份付出就有一份回报。作为任何一位曾在所插队的山村当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农机员的知识青年，当时也许感受不深，然而读到全国农村在这方面的进步，能不感到振奋和自豪吗？当时，一个一个村的科技和医疗卫生、义务教育的进步和全国农村的科技和医疗卫生、义务教育进步，已实实在在改变中国旧面貌。陈海秋在《建国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提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从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结束，共有两个农业保持较快增长势头的时期。一个是从 1949 年开始到 1958 年的九年中，粮食多年增产。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后，1961 年开始比上年增产 400 万吨。从 1962 年到 1976 年又是农业生产快速发展的第二个历史时期。1976 年比 1965 后粮食产量增长 47.2%。农业产量 1978 年比 1962 年增长 139.2%，翻一番多了，这在新中国历史上，农业产量翻一番的年份不多，这翻一番是第一个光荣记录。或者说农业产量第一次翻一番的记录是在毛当东时代发生的。中国以占全世界耕地 7% 生出产

品, 供养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 当时粮食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 棉花跃居世界第三位。这无论如何是了不起的成就, 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奇迹。(见表三)

表三 新中国粮食产量真实纪录

表三再现新中国粮食产量真实纪录, 我们根据中国统计局, 即毛泽东逝世后所公布的数据自己动手绘制出来。知青朋友从坐标图象上可以十分清楚的看到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村的粮食生产的箭头, 除极个别的年份, 是不断向上攀升的。文革十年粮食产量超过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又超过四、五十年代。

表四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分城乡①

年份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绝对值 (亿元)	其中城镇			
占%	其中农村				
占%	绝对值				
(亿元)	其中城镇				
占%	其中农村				
占%					
1952	276.8	45.4	54.6	262.7	47.
8	52.2				
1953	348.0	48.3	51.7	328.8	51.
2	48.8				
1954	381.4	46.9	53.1	356.1	50.
2	49.8				
1955	392.2	46.7	53.3	364.0	50.
3	49.7				
1956	461.0	49.2	50.8	424.0	53.
5	46.5				

	1957	484.2	50.3	49.7	441.6	54.
0	43.0					
2	1958	548.0	46.7	53.3	481.2	53.
2	46.8					
0	1959	638.0	50.6	49.4	556.5	58.
0	42.0					
2	1960	696.9	53.1	46.9	595.4	62.
2	37.8					
3	1961	607.7	57.8	42.2	537.7	65.
3	34.7					
6	1962	604.0	52.7	47.3	543.7	58.
6	41.4					
0	1963	604.5	50.4	46.6	544.8	56.
0	44.0					
4	1964	638.2	50.6	49.4	572.7	56.
4	43.6					
4	1965	670.3	50.6	49.4	590.1	57.
4	42.6					
3	1966	732.8	49.5	50.5	632.8	57.
3	42.7					
3	1967	770.5	49.6	50.4	679.1	56.
3	43.7					
5	1968	737.3	50.6	49.4	649.2	57.
5	42.5					
4	1969	801.5	49.4	50.9	698.2	56.
4	43.6					
9	1970	858.0	46.6	53.4	728.8	54.
9	451					

1971	929.2	47.0	53.0	776.9	56.
2	43.8				
1972	1,023.3	48.4	51.6	853.5	5
8.0	42.0				
1973	1,106.7	48.0	52.0	917.7	5
7.9	42.1				
1974	1,163.6	48.1	51.9	967.4	5
7.9	42.1				
1975	1,271.1	47.7	52.3	1,046.4	
58.0	42.0				

从表四《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分城乡情况》可以清晰看到又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新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52 年是 276.8 亿元，到 1966 年 732.8 亿元，翻近三倍；到 1978 年，1558.6 亿元，翻近六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新中国五十年代是 300 亿元左右，到六十年代是 600 亿元左右翻二倍，到七十年代“文革”是 1100 亿元左右，翻了近四倍。结论是六十年代，尤其是七十年代，社会商品总量、社会商品种类、社会商品价值的大发展，充分说明当时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和增强。另外，从表四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一栏上，也充分说明城乡群众生活水平跨一个新台阶，城乡群众的生活有了很大提高。

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新中国经济大发展中，还有一显著特点，经济发展速度也是最快的。1949 年人均 GDP 如果是 100，1952 年人均 GDP 就达 119，到 1980 年人均 GDP 高达 460。另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表明，在 1951 年到 1980 年间，中国工农总产值平均增长率 12.5%，农业产值平均增长率 4%，这在世界各国中都是最快的，超过美苏、日德、英法等发达国家。尤其是 1966 年至 1976 年，上山下乡知青最多，知识青年成为农村和边疆建设的生力军，不仅投身国防交通，社队企业，而且在席卷全国农村学大寨运动中，平整土地和兴修水利中流汗流血。与 1965 年相比，全国已实现农业人口均有一亩稳产高产田。如果说“大跃进”期间解决农业生产的第一个关键问题——大兴水利、水库沟渠化，那么“农业学大寨”则解决农业生产第二个关键问题——田地平整，连畦成片。这在中国广阔农村是空前未有的巨大的成就。

引人注目的还有祖国千里边陲的可喜巨变。现在当国人执意品尝香糯的东北大米，穿戴新疆上等棉花纺织的各色衣裙时候，当国人看到穿行城乡的车辆和遨翔蓝天白云的飞机及国产橡胶轮子的时候，还是否记得这些战略物资在过去何等的匮乏，曾是西方各列强卡脖子的致命武器，而现在黑红黄方阵里取之不尽，源源而生了。此时此刻，你能不为当年同复转官兵并肩的数以百万计知识青年，在冰天雪地北国戍边垦荒，在西疆头顶烈日种植棉花，在南国挥汗如雨挖塘栽下胶苗，而所表现出来英雄主义气概和革命浪漫主义的乐观精神，有所触动吗？

另外，农村的民办小学使义务教育得到普及，当时学费很低，很少有孩子不能上学。三级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也普及广大乡村，许多传染病绝迹，人均寿命翻一倍，1977 年达到 66 岁。当时的知识青年，无论当民办教师，还是当赤脚医生毫无从中取利赢利的思想，千方百计普及文教卫生，提高文教卫生质量，奉献精神贯穿始终，也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这些成就在后毛泽东时代都未达到，广大城乡群众干部为之奋斗过，难怪乎他们一直怀念和称赞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968 年，世界银行的一个考察团到中国，他们测量当时中国城市居住收信的基尼系数是 0.16，这个数值在当时全世界几乎是最公平的。从城市农村居住的系数看，贫富差距为 0.31 水平，同全世界比较起来，也是比较低的，这充分证明，毛泽东时代城市乡差别已经缩小了许多，两级分化不合理现象有了改观，工农民众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提升很多，社会主义公平合理的优越性得到了较多的体现。这也是卓著勋绩！

总之，在那个时代同国民党统治的旧社会相比已经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当时，中国农业从肩挑人抬、人拉犁子、用锄挖地的状况到拖拉机田间跑、电动机、柴油机普遍使用；从土地坑洼不平、旱涝灾害频发、靠天吃饭到连畦成片、普遍用水浇灌、每人一亩稳产高产田；从饥荒、挨饿到大多数人温饱，初步建成一个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没有失业的中国，这完全是上了一个经济生活大台阶。同时自力更生研制成功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人造卫星、核潜艇、远程大飞机、人工合成胰岛素、青蒿素、杂交水稻、汉字照排。在毛泽东逝世时，既没留下外债和内债，也无通货膨胀和饱饿，而且还留下了大量外汇储备，截止 1977 年共有黄金储备 1280 万盎司和外汇储备 23.45 亿美元，（七十年

代毛逝世前还引进了几十亿美元的成套工业设备和技术）。从 1952 年—1978 年的 25 年间，国民收入增加 4 倍；从 1952 年的 600 亿元增加到 1978 年的 3000 亿元，而且是世界上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从洋油洋火洋房仰洋人鼻吸到世界第六大经济大国、第三军事强国和第三世界领军国，如此大的翻天覆地式的变化和成就，在中外千百年历史上何时有过！数以百万计知识青年作为那个时代的建设者和创业者，汗水没有白流，应该引以为荣，欣慰平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苍茂大树和累累硕果的关系。

上山下乡这株参天大树涵育出了一个个丰硕的果实。我们认为：正是上山下乡这一就业的形式不是耽误一代青年人，而是锻炼和培养一代青年人，当时就将数以百万城市中学生造就成为一支比较懂农业和乡村的富于基层的工作经验，富有进取精神和意志比较坚强的骨干队伍，尤其涌现各行各业的大批优秀人才。仅以云南省为例，到 1973 年知识青年入党 4000 人，入团 47000 多人，参加县以上领导班子 202 人，担任各种不脱产社会工作的有 36000 多人。据国务院知青办和安置办不完全统计，在这段日子里，全国有 126.4 万知青招生（大部分是工农兵学员）到高一级学校深造，有 8.6 万知青光荣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5.9 万知青推荐到各级领导班子。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批知青代表人物已经进入党和国家领导层的圈子里，开始挑起更重的担子。各省市、自治区也是这样，而且擢升知青的数量更多，发挥作用有用的面更广。

以当时为例，从全国平均数看，100 个知青中已有一人入党，25 人入团，3 人进领导班子，（见表五、六）在广大民众中享有一定的威信，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在我们昆明“六四届”知青中高出这个比例二、三倍。

时间	党员 党员人数	团员 占当年在乡	知青总数%	
			知青总数%	团员人数 占当年在乡
1974	72242	1.1	1484067	21.8
1975	93824	1.2	1991895	26.3
1976	121523	1.5	2348041	29.0
1977	118353	1.4	2604328	30.2

1978	68631	1. 1	1810528	28. 0
------	-------	------	---------	-------

编制说明：（表五）

党员：指中国共产党党员；团员“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

表六 1974-1978 各年度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参加落户的生产队以上领导班子人数统计

单位：人

时间	当年知青总数(人)	占当年在乡知青总数%
1974	193194	4. 3
1975	277310	3. 6
1976	325543	4. 0
1977	247367	2. 9
1978	143317	2. 21

总之，我们强调的是：第二阶段同第三阶段，党中央国务院都按纲领规划实施（15年左右），其间只有数量的变化，规模的大小，态势虽有不同，但没有质的区别。

或者说文化革命十年上山下乡同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的上山下乡，有数量和规模的区别，但决定上山下乡的主客观因素都是相同的，基本动因没有变化、国策没有变化，是在15规划内的一种继续。城市知识青年作为一支富于朝气的生力军，增至上千万人，当然在当时生产斗争、阶段斗争、科学试验和国防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也更大，贡献更明显。事实雄辩证明“知识青年是共和国教育最成功的一代人”。因此，全盘否定这十年的上山下乡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不科学的态度。

4、毛泽东逝世至1980年，上山下乡知青244.54万。

不能因为第四阶段终结而去否定前三阶段的成就，或称“失败”。

也不能因为1978年，一批在中央、省市任职的知青服从组织安排再到基层工作，就认为是“一连降几级犯错误”“文革三种人”。他们大都心地坦然“当官也行，不当官也行都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党的十大代表、知青冯继芬语）

在文章的前面, 我们说, 中国知识青年同工农群众相结合, 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 无论第二、三阶段还是第四阶段, 知青上山下乡都是必须实施的国策和社会发展的规划纲领, 而不是什么短期行为, 朝令夕改的措施, 可执行可不执行的做法, 尽管这些阶段有较大的区别。再者, 不能因为最后一个阶段(毛泽东逝世到 1980 年) 上山下乡划上句号, 就去否定民主革命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文化大革命阶段等中央和各省市委在上山下乡工作中所作的努力, 所取得的成就; 当然更不能全盘否定数以百万计热血青年推动农村和边疆的经济社会进步的事实, 以及他们的一切贡献。

金碗将碎, 银丝渐松

上山下乡到第四阶段完全终止, 究其原因比较复杂, 有上层因素, 有下层因素; 既有外因, 又有内因。假如要加以研究分析, 本文的篇幅已不能承担。但必须明确指出毛泽东、周恩来等逝世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上层条件发生变化, 上山下乡也失去最重要的动力和支持。再说改变农村和边疆的面貌, 本身就是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 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甚至需要作出一、二代人的一些利益牺牲, 作为这个全国艰巨战局的领导者的逝世, 那么整个战局的逆转变化就可想而知了。至于第四阶段起始于云南的许多农场和知青“大返城”, 又因是上级的上级认可的, 得到允许的, 在这里就不去探究了。

我们在研究第四阶段的知青史实时, 有一个新的成果, 请看表七。

表七 全国社会劳动者历年人数①

(年底数)

单位:

万人

年份 100)	社会劳动者人数 社会劳动者	增长数 (以 1952 年为 100)			
		合计	职工	城镇个体劳动者	农村集体和 个体劳动者
1949	18082	809	724	16549	87.2
	33.4				

	1952	20729	1603	883	19243	100
	36. 1					
	1953	21364	1856	898	19610	103.
1	36. 3					
	1954	21832	2002	742	19088	105.
3	36. 2					
	1955	22328	2163	640	19526	107.
7	36. 3					
	1956	23018	2977	16	20025	111. 0
	36. 6					
	1957	23771	3101	104	20566	114.
7	36. 8					
	1958	26600	5194	106	21300	128.
3	40. 3					
	1959	26173	5275	114	20784	126.
3	38. 9					
	1960	25880	5969	150	19761	124.
8	39. 1					
	1961	25590	5171	165	20254	123.
5	39. 8					
	1962	25910	4321	216	21373	125.
0	38. 5					
	1963	26640	4372	231	22037	128.
5	38. 5					
	1964	27736	4601	227	22908	133.
8	39. 3					
	1965	28670	4965	171	23534	138.
3	39. 5					

	1966	29805	5198	156	24451	143.
8	40. 0					
	1967	30814	5305	141	25368	148.
7	40. 3					
	1968	31975	5504	126	26285	154.
0	40. 6					
	1969	33225	5714	111	27400	160.
3	41. 2					
	1970	34432	6216	96	28120	166. 1
	41. 5					
	1971	35620	6787	81	28752	171. 8
	41. 8					
	1972	35854	7134	66	28654	173. 0
	41. 1					
	1973	36652	7337	51	29264	176. 8
	41. 1					
	1974	37369	7651	36	29682	180. 3
	41. 1					
	1975	38168	8198	24	29946	184. 1
	41. 3					
	1976	38834	8673	19	30142	187. 3
	41. 4					
	1977	39377	9112	15	30250	190. 0
	41. 4					
	1978	40152	9199	15	30638	193. 7
	41. 7					
	1979	41024	9967	32	31025	197. 9
	42. 1					

从表七《全国社会劳动者历年人数》可看到鲜为人知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新中国农村劳动者稳定在 3 亿人左右，而城镇职工则大幅度增加。1949 年，809 万人；1966 年到 5198 万人，翻六倍多；1978 年到 9199 万人，翻十倍。五十年代城镇职工 2000 万左右，六十年代到 5000 万左右，七十年代到 8000 万左右。结论是七十年代提供了 3000 万工作岗位，有 3000 万职工上班，当时大中专毕业生，复转退伍军人，知识青年都容纳。正是七十年代经济与社会发展，正是工农兵学商、教科文卫外交的大发展，需要和吸纳 3—4000 万劳动者和人才，解决失业问题成为现实可能性。怪不得在 1978 年 2 月，国家计委在《关于经济计划的要点》提出放宽城镇安排知青的渠道，“可以组织他们参加工业基地，大型水利工程和铁路的建设”。接着，四川、江苏、河北等 6 个省也声称“不再动员知青上山下乡”。这年底，怪不得中央文件也放心地说“对 1972 年底以前下乡的，优先安排，两年内基本解决。今后下乡人数将逐年减少，以至不搞像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 1978 年末，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转变是建立在七十年代经济与社会大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各条战线所能提供的三、四千万工作岗位基础上，所以当然让知识青年不再上山下乡的政策能够落实，如愿以偿。

饶有趣味的是：党中央、周总理早在 1963 年就指出知识青年每年都多动员组织，“编制十五年安置计划”。1963 年后 15 年就是 1978 年——“终结”中国知青上山下乡不正是这一年吗？这难道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准确的“预计”呢？

这里要强调指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按时任党中共国务院 1964 年制定的计划，是实施 15 年，预计到 1979 年农村和边疆经济社会发展了，国家实力强大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就会调整，后继领导者所作的调整，姑且说是一种巧合吧！此话怎讲呢？当我们把眼光投向新中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面貌比一九四九年有很大的变化。正如前面所说的，财政收入平均增长 6.9%，城乡经济总量和物质丰富都上一个新台阶，工农商学兵，科技外交，文化教育卫生等发展都在吸收大批人才。比如，1965 年全民所有制企业达 4.6 万个，集体所有制企业达 11.2 万个，可是到 1979 年全民所有制企业达 8.4 万个，集体所有制企业达 27.1 万个，分别是原来的 1.8 倍和 2.4 倍。当时社队企业更是从无到有十几倍增加。又比如当时已同大部分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 100 多个外国航空公司建立

业务往来，同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贸易往业等，很需要多少岗位和人才。所以在毛泽东时代已有上千万知识青年调往各条战线，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当然也为后来调整上山下乡的政策打下现实的基础，后来“大返城” 800 万知青才有现实的可能性（大部份进入国有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集体企业）。总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何时兴起，何时落潮，开国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心里是心里有数，在整个领导层也是清楚的。——写到这里，可叹可气让位于肃然起敬了！

上山下乡同中国社会任何一个重大决策、重大举措一样，不可能是万全之策，不可能是立竿见影的神药仙丹，当然会有缺陷和不足。作为一个贫穷落后社会的底层，沉淀和交织着更多困难和矛盾，愚昧与龌龊不可避免，一些地方领导工作不力，关心和帮助不到位，这必然带来上山下乡城市学生的许多伤害与牺牲，包括个人升学的、身体的、家庭的、爱情的伤害与牺牲，当然也就决定了既是一段激情昂扬，立功创业的光荣历史，又是一段回肠荡气富于悲壮色彩的岁月。

中国城市学生上山下乡跟工农群众结合，尽管有其艰辛严峻的一面；也尽管在后期被终止，但我们认为毕竟是开国领袖的富于远见倡导，数以百万计城市热血青年参与实践，形成一股大浪汹涌的潮流，浩浩荡荡冲刷几千年的旧中国的风尚，推动农村和边疆的进步。它为何是一段光荣的历史岁月？为何现在新世纪仍热力四射、余力震荡？这有着不可低估的原因和内在价值。这个空前未有的社会富矿的开掘、探究远远不能结束。

与这个时代相关的知青文学

1980 年，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大幕徐徐落下，这场历史性的社会大戏也戛然而止。

近年来，尤其是在编辑《云南知青》杂志和云南知青文集中，我们接触了许多文革十年中下乡的知青，以及他们的父母子女，还接触了许多当代大学生和青年作者，交谈的话题都集中在什么是中国知青形象、什么是中国知青精神、还有上千万知识青年在新中国改变落后面貌中起到什么作用等方面，期间有不少新见解、新观点。

在上世纪中叶，千年中国历史开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的新篇章，上千万知识青年在整个社会除旧布新的进程中、整个社会由积贫积弱向繁荣强大的嬗变中，舍己为民、艰苦奋斗，建功立业，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

概而言之，什么是知青形象？是新中国的建设者、创业者和爱国者的形象。什么是中国知青精神呢？就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同亿万农民同甘共苦，乐于奉献，用自己的青年和热血推动农村边疆进步的实干精神。知识青年在当时起到什么作用呢？他们的心血没有白费，他们的汗水没有白流，正是他们和亿万农民群众的努力，在第一代开国领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领导下，中国发生了令人信服的变化，成为了第三世界的旗帜国家、第六经济大国、第三军事强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这段历史生活不过三十年，却博大精深，流光溢彩，气象万千，精彩纷呈。反映这一代人生活的文学艺术，可以从宏观上展示来龙去脉和历史全貌，也可以在微观叙述一个人或一件事；可以从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切入，也可以描绘性格各异不同追求的人物。可以写真善美，也可以暴露假丑恶，在暴露中激浊扬清，升华境界。可以写坎坷曲折，在坎坷曲折显示不可阻挡的进步与抗争，写出迴肠荡气的慷慨与雄浑。可是这些年，由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真实而深刻反映这段历史的作品很少，而片面歪曲和否定的作品很多。一个是“知青伤痕文学”，开初不失为是从知青历史富矿中采掘出一块矿石，有其独到的意义和价值，后来模仿之作蜂踊而上，祥林嫂和祥林嫂式的艾怨上演了三十年，知青历史涂抹为一部血泪史。另一个是“知青伤痕文学”的新变种，所谓“知青孽债文学”，矛头直指知青当年的“邪行恶德”欠下的罪债，下一步会不会矛头直指政治生活范畴不得而知。尽管仅限于揭露知青家庭生活范畴的问题，影片一播出，上海知青一片哗然。甚而至于，有的上海知青面问作者，“影片中将几个上海知青都写成遗弃孩子在边疆的人，离奇点了吧。”这两类知青文学，不是将个别知青的伤害，夸大为整个知青甚至民族的伤害；就是以偏概全，将局部的问题夸大为全局的问题，没有真实而深刻的反映知青上山下乡在新中国建设史上的历史地位，也没有真实而深刻的表现中国知青的精神和形象。

倘若说，所指的“知青伤痕文学”得到的仅是一鸡窝矿，那么控诉知青劣迹的“孽障”（居然还有ⅡⅢ之乐）则是将氧化铁当金子了。气势恢宏，美不胜收，

波浪壮阔的知青生活，有理由期待更多属于 21 世纪视野开阔、目光深邃的作家涌现，激动人心伟大作品的问世……

对这段艰苦而光荣的历史、万众一心改造中国的峥嵘岁月，有良知的知青应该振身而起，笔之于书，留下时代真相，坦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光荣实践；有文学艺术基础的知青，要风鬓凛然，泼墨纵横，横扫血泪史和罪孽史的迷障，创作出可以同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军民反法西斯的伟大作品相媲美的新作。

知青在呼唤！时代在呼唤！

2009 年 6 月 12 日

2009 年 6 月 22 日初稿

2011 年 12 月 29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一册（8）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一章 搞好斗、批、改

第八节 教育卫生文化等领域的革命

本节资料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文汇报》、新华社记者《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编者按：我们向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向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青年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们推荐这个调查报告。这篇报告生动地描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一个方面即工程技术人员的队伍方面引起的伟大变革，显示了社会主义新事物强大的生命力。这篇报告题名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但它同时也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毛主席最近深刻地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是我们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纲领。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工厂、学校和其它战线上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判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打破旧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要坚决走毛主席指出的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科学研究院部门和领导单位，也应当好好读一读这个报告。这对于进一步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科技路线，是一个锐利的武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它在各个方面产生的有深远意义的影响，现在才刚刚显示出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必然为我国新的工业革命准备条件。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量，将不断创造出为资产阶级庸人和右倾保守主义

者所意想不到的奇迹。奉劝那些患有近视症但还不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人们把眼光放远一些，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迅速赶上亿万革命人民前进的雄伟步伐。

* * *

新华社上海二十一日电，《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

上海机床厂是著名的生产精密磨床的大厂。全厂拥有工程技术人员六百多人。这支技术队伍由三方面的人员组成：从工人中涌现的技术人员约占百分之四十五；解放后大专院校输送进厂的约占百分之五十；其余是解放前留下的老技术人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使这个厂的技术人员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个伟大的革命变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掌握了全厂的领导权，包括技术大权。过去控制工厂技术领导权的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被赶下了台。许多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革命的青年技术人员和革命干部，成了科学的研究和技术设计的主人。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对毛主席、对共产党有深厚的阶级感情。这支过去受压抑的革命的技术队伍，不断显示出他们的创造智慧和技术才能。他们怀着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限忠诚，在技术上不断攀登新的高峰。仅今年上半年，他们就试制成功了十种新型精密磨床，其中四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速度之快，质量之高，是这个工厂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第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技术路线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受到了深刻的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技术“权威”，政治上臭了，技术上的纸老虎的原形，也暴露无遗。过去走资派竭力把反动“权威”捧为青年技术人员的学习“偶像”，要他们“向专家看齐”，“为当工程师而奋斗”。现在，许多青年技术人员思想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认识到名利思想是“修”字的根，资产阶级的头衔不能争。磨床研究所的不少研究人员，过去把技术资料记在本本上，作为个人的“小仓库”；现在都自觉拿出来，汇集成册，分发给大家参考。全厂技术人员纷纷主动下车间，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研究和改进设计。老年技术人员下车间，

也注意放下架子，虚心向工人学习。

第三，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关系变了。过去，这个厂的几个走资派和反动“权威”曾提出所谓“一对一”（即一个工人为一个技术人员服务），他们的所谓“结合”是“工程师动嘴，工人动手”，“工程师出主意，工人照着干”，还是多少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那一套。他们还制造了“工人和技术人员必须互相制约”、“造成对立面”的反动理论，建立了管、卡、压工人的一套规章制度。一本《生产工人手册》，就规定了一百七十多条，要工人背熟牢记，条条照办。凡此种种，进一步加深了工人和技术人员之间的鸿沟。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实行了工人、革命技术人员、革命干部的“三结合”，普通的工人参加了设计，技术人员也在第一线参加了实际操作，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双方的关系有很大改善。((1)(2))

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上海机床厂青年技术员（包括三十五岁左右的人）来源于两方面：大专院校历届毕业生（约三百五十人，其中百分之十是研究生和留学生）和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约二百五十人，其中少数中间曾派往中等专科学校进修几年）。实践证明，后一部分比前一部分强。一般说，前者落后思想较多，实际工作能力较差；后者思想较前进，实际工作能力较强。目前，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绝大多数是工艺方面的技术骨干，约有十分之一的人能独立设计高、精、尖的新产品。在今年上半年试制成功的十种新型精密磨床中，有六种就是由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担任主任设计师的。

从工人中选拔技术人员，这是一条培养无产阶级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从两个年龄相仿而经历不同的技术员身上，可以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

一个是上海某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又专门学了一年外语，再去外国留学四年，得了一个“副博士”的学位，一九六二年开始到磨床研究所试验室担任技术员。象这样一个在学校里读了二十多年书的人，过去由于理论脱离实际，又没有很好地同工人结合，所以长时期在科学研究方面没有作出突出的成就。

一个是工人，他十四岁当学徒，十八岁被保送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学习四年，一九五七年开始在磨床研究所担任技术员。今年四月，由他担任主任设计师，试制成功了一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工业技术的发展所急需的大型平面磨

床，填补了我国精密磨床方面的一个空白点。

文化大革命以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反动技术“权威”，对工人走上设计舞台进行疯狂的压制。一九五八年前后，有一批工人担任了技术员，但是，厂里的反动“权威”以各种借口，陆续地把不少人调离设计部门。尽管如此，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还是冲破层层阻力，表现了自己惊人的创造智慧。据统计：一九五八年以来，这个厂自行设计试制成功的新产品中，由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以及青年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试制成功的，在一九五八年约占百分之六十，一九五九年约占百分之七十，一九六〇年约占百分之八十，一九六〇年以后，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所有新产品都是他们设计试制成功的。其中不少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产品，如镜面磨削万能外圆磨床，高中心外圆磨床等重点产品，都是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设计试制成功的。

有些大专院校毕业的青年技术人员，逐步摆脱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放下架子和工人结合，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在设计和新产品试制上也作出了比较显著的贡献。比如一个一九六四年的大学毕业生，刚进厂时，成天捧着一本外国螺纹磨床的书（不是说不要读外国书），从理论到理论，几年来，在工作上没有什么创造。文化大革命中，他提高了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坚决走和工人结合的道路，今年初，就和两个工人技术人员和一个老师傅一起，试制成功了一种磨床的重要电器设备。

为什么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成长快、贡献大呢？

最重要的一条是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对毛主席、对党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们在向科学技术进军的道路上，不为名，不为利，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时刻想到与帝修反争速度，争质量，并且处处考虑为国家节约，为工人操作方便。可是，有些受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的青年知识分子，长期脱离劳动，脱离工人，追求资产阶级名利，结果一事无成。有一个技术人员，想成名成家，一鸣惊人，十多年来先后提出六十多个课题，搞一个丢一个，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一个也没有搞成。一个一九五六年的大学毕业生，起初为了自己出名，关门搞磨头试验，先后报废了三十多个“磨头”，后来向有经验的老工人请教，在老工人的帮助下终于搞成功了。他深有体会地说：“闭门搞磨头，吃尽了苦头；同工人结合搞磨头，尝到了甜头；磨头磨头，归根

结底，先要磨炼自己的脑头。”

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同名利思想极为严重的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比，就更加鲜明了。有一个资产阶级“专家”设计一台磨床，前后搞了八年，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始终没有搞成功，而他自己却捞到了不少所谓“数据”，作为他争夺名利的资本。工人们说：这种人对我们的新社会那里有一点感情呢？

毛主席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在长期的劳动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经过几年业余学校的学习，或者读了几年业余技术专科学校，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出现了一个飞跃，很快就能胜任科学的研究和独立设计的任务。这是他们能够迅速成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们参加学习，叫作“带着问题读书”，因此学得进，懂得快，用得上。有一位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运用丰富的实践经验，解决了一个产品的复杂的加工工艺问题，他一边实践，一边学习金属切削的原理，很快地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使他在金属切削加工工艺方面，有独到的见解。

从大专院校出来的技术人员，当他们未和工人结合之前，缺乏实践经验，书本知识往往和实际脱节，因此很难作出什么成就来。有一次，有几个从大专院校出来的技术人员，因为缺乏实践经验，设计了一台内螺纹磨床，工人们按照图纸的零件加工，结果根本无法装配。后来还是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把某些零件进行了再加工，才装配了起来。

敢想、敢做、敢闯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是工程技术人员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又是和人的世界观和实践经验息息相关的。许多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由于没有个人名利的精神枷锁的束缚，加上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敢于破除迷信，破除不适用的框框，最少保守思想。以最近试制成功的具有国际水平的一台精密磨床为例，由于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大胆突破了沿袭已久的框框，试制周期从一年半缩短为半年，精度提高四级，零件和重量分别减少三分之一，造价相当于进口的百分之十五点五。而有些学校出来的技术人员，不注意思想改造，往往容易考虑个人得失，怕丢面子，失架子，同时，他们条条框框也比较多，因而不容易破除迷信，创造出新技术来。他们自己也说，“书读得越多，束缚得越紧，结果就没有闯劲了。”

在上海机床厂，如果以大学生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相比较，工人们还比

较地欢迎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因为中专生书本知识虽然少一些，但他们的架子小些，实践经验多些，洋框框少些。不少中专生进步比大学生快得多。比如正在进行的两条高级的自动流水线的设计，就是由两个一九五六年毕业的中专生负责的。

从工厂看教育革命的方向

分析一下上海机床厂不同类型的工程技术人员的状况和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

这个工厂的老工人和许多青年技术人员从实践中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彖，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一教导无比英明正确。他们感到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已经给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现在，是坚定不移地、老老实实地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问题。

这个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根据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工厂的实际情况，对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设想：

第一，学校培养的必须是毛主席所指出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决不能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样，培养那种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践的“三脱离”的“精神贵族”。这是关系到出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上海机床厂的同志认为，过去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工厂、农村，就当干部，是不合理的。青年学生和工农结合，参加生产劳动，是改造世界观和学到实际技术知识的重要途径。因此，他们建议，大学毕业生应当先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在工人、农民那里取得“合格证书”，然后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有些可以参加技术工作，但也还要有一定时间参加劳动。有的则继续当工人、农民。

第二，学校教育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毛主席教导说：“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从上海机床厂有些技术人员的情况看，旧教育制度的一个严重弊病，就是理论脱离实际，大搞烦琐哲学，学生钻到书堆里，越读越蠢。只有接触实践，对于理论才能掌握得快，理解得深，运用得活。这个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提出：学校要由有经验的工人去当教师，让工人登上讲台。有些课程就可以在车间里由工人讲授。有一个青年技术人员，大学一毕业就进了研究

所的门，整天啃书本，钻理论，学外文，脱离实际，自己也感到越来越空虚。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到机床厂拜了一些有丰富经验的工人师傅，自己参加了技术操作实践，情况就变了。最近他和工人一起，在镜面磨削方面，作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创造。他对于必须有工人做自己的教师这一点，感受特别深切。

第三，关于工程技术人员的来源问题。他们认为，除了继续从工人队伍中提拔技术人员外，应该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这样做，现在是完全有条件的。以上海机床厂为例，大部分工人都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挑选这样的青年进入大专院校的好处是：第一，他们政治思想基础比较好。第二，是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有生产劳动的经验。第三，一个初、高中毕业生，经过几年劳动，大约在二十岁左右，再经过几年学习，二十三四岁毕业就能独立工作，而目前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工作岗位后，一般要经过二三年实践，才逐步能独立工作，因此选拔有实践经验的知识青年到大学培养，这是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的。

第四，关于改造和提高工厂现有的技术队伍的问题。他们指出：从学校出来的大量技术人员，长期受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毒害。还有一批过去留下来的的老技术人员，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但他们在世界观和作风上，存在很多问题。工厂应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规定的政策，组织他们积极参加革命大批判，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鼓吹的“专家治厂”、“技术第一”等谬论和“爬行哲学”、“洋奴哲学”，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同时，还应该组织他们分期分批去当工人，或者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到车间去劳动，帮助他们走上和工人相结合的道路，走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调查报告）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张春桥在上海机床厂现场会上的讲话

〔根据纪录整理，未经审阅〕

同志们，上海机床厂这个经验，也不只是上海机床厂有，不仅只是上海地方有，其他省市也有，只不过是上海机床厂的经验及时的写出来了。这个经验的取

得是从五七年毛主席视察这个厂子，那时正是反右，从反右斗争中就看出，如果不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队伍，那末，无产阶级政权就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毛主席作了重要指示，根据我自己的回忆要从工人中间培养技术干部。我们工人中的技术员能成长、发展，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们今天能总结出来的经验是从走资派手里夺了权。

这个调查报告一出来，虽然很粗糙，但是毛主席很重视，在当天就批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是没有争论了，但是怎样培养自己的知识队伍，是用原来的方法？还是用上海机床厂的经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人民日报社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人民日报编者按都出来了。市革委会在这里开会，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发言权，在这里开个头，下面请上机厂革委会负责人发言，主要是介绍一下厂史，及经验如何总结出来的简单经过。（厂革委会负责人介绍结束后，春桥同志接着讲话）

今天的会开得很及时，开得很好，介绍了经验，会内会外都表示了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最热烈的拥护，我负责把会议的情况，把大家的决心在今天的晚上报告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与中央文革（热烈欢呼）。毛主席对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最关怀的，这一点不需要我再说什么了。我们上海的每一个微小的成就，都受到了毛主席的重视，这一次上海机床厂的调查报告，是毛主席发现与肯定的。这个报告，毛主席看过了，林副主席看过了，中央的其他负责同志都看了，都称赞这个报告。这是上海机床厂的光荣，是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荣。我们要把毛主席概括了的道路坚持下去，永远谦虚谨慎，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绝不回头，绝不动摇。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今天只是开了一个头。主席的这个最新指示，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对主席的最新指示，我们往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有一个逐步理解的过程，一开头看到这报告，都感到很好，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但是真正的理解，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解决人类历史上没有解决过的问题，是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没有解决过的问题，比如讲培养工程技术人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有过论述，但是没有经验，没有解决。毛主席根据苏联的教训和中国的经验给我们指出了道路。工业是这样，农业又怎么样呢？靠谁来搞技术革命呢？过去那条路也不通了，要走我们自己的路，走毛泽东思想的路，上海机床厂就答复了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培养我们自己的医生，培养文学家，培养新闻工作者，培养哲学家与文艺工作者，都有一条道路的问题，有哪一个哲学家是从大学里出来的呀？马克思是念过大学的，但是他也是因为与工人结合后才写出了《共产党宣言》的。我们的哲学系就不出哲学家，文学系就不出文学家，还是实践出人才。一定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不管是搞政治的、生产的，都是这样。这是培养人材的道路。

上海机床厂的经验，不只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如何按照毛主席指示培养人才的问题，所以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有着伟大的意义，它要影响到我们的一切部门，其实这个问题早就有过结论。“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个口号是毛主席提出来的，那么我们解放军干部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呢？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从战场上培养出来的。我们的各大军区、省军区的司令员都不是从军事大学里毕业的。（指廖政国同志）廖司令也不是从军事大学也培养出来的，是从战场上培养出来的。教员是蒋介石，他逼我们打仗，在打仗中发展了毛主席的伟大军事理论。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军队能与我们的解放军比，他们在我们那些没有进大学的将领面前就要打败仗。“工业学大庆”这也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可是大庆的领导干部有很多就是工人、复员退伍军人、中等技术人员。他们也没有进过大学。“农业学大寨”。陈永贵是哪里培养出来的呀？是不是中国人民大学培养的呀？不是的。中国人民大学培养不出陈永贵，陈永贵是在大寨培养的，是中国的农业大学培养的，是党培养的，是毛主席培养的。又如学习理论、做理论家，陈伯达同志没有进过大学，江青同志也没有念过大学，姚文元也没有进过大学，中央文革小组有不少小学生。这个对比，说明了上海机床厂经验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毛泽东思想在群众斗争中的发展，成为今天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解决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各方面革命，解决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要走的道路的问题。《人民日报》编者按中指出，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量，将不断创造出为资产阶级庸人和右倾保守主义者的预想不到的奇

迹。中国有七亿多人口，这是世界第一。我们有优良的革命传统，有几十年悠久的科学文化遗产，又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冲击。毛主席早就说过，中国人民应该对世界有较大的贡献。有七亿多人口，这七亿多人口，主要是工人与贫下中农，他们有了毛泽东思想，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再掌握了科学技术，我们一定能使中国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工业、科学，也都应该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什么美国、英国、德国、法国，都应该往后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我们创造了这个条件。我们已经看到了祖国的远景，所以要充分认识主席最新指示的伟大意义，这个最新指示，我们要很好地学习和领会。因为它涉及到各个方面，中学、小学怎么办？中学、小学有没有问题呢？我看有。大学今后要从工人、农民中招收学生，高中毕业升大学的路就堵死了。（口号：这个路堵得好。）应该先到劳动人民当中去，现在一个高中生，就算是一个大老爷了，架子大，谁也看不起，所以如果再走过去这条路，这就会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回到工农中去，否则，学校培养的还是修正主义，祖国还是要变颜色。中学小学的学制要不要进行改革呢？要不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呢？

科研系统的人，大多是从大学进去的。现在我有个经验，哪个地方知识分子成堆，我这不是指一、两个知识分子，那个地方问题也就最多。科研系统就是这样，反正吃了饭不管事，因为他们识字，会写字，写来写去搞内战，这只有知识分子干得出！放着国防急需的科研项目不管，津津有味地打内战，搞武斗，这种事情，我看，也只有知识分子做得出来！他们不知道饭从哪里来，衣从哪里来，你们机床厂要这样就不行了吗。你们说对不对？（对！）所以各个方面都要研究。教育革命不只是学校里的事，光靠学校的人搞教育革命，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是搞不好的，还是要靠党，靠工人，靠贫下中农，靠人民解放军，只有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努力，才能搞好，所以教育革命决不是学校的事，从学校出来以后，就要到工厂，到农村。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教育革命就是国家大事，是政权能否巩固、资本主义是不是会复辟的国家大事。教育革命靠经济基础，很重要，是上层建筑，会影响到经济基础。今天你们机床厂的同志很高兴，不过，昨天你们发生了小小的武斗，不要表扬多了。

我们要清理阶级队伍，要不然他们包送一个工人到大学去读书，包送去的是

一个特务，你们说怎么办？所以问题还是妥善安排的问题。现在各单位对敌斗争也不很平衡，有的开始得早，有的搞得比较晚；有的搞得比较深，有的搞得比较浅；有的单位已经解决了各个方面的问题，有些单位还刚刚着手解决，所以各级革委会要统一安排各个方面的工作，“精兵简政”还是要简，否则就不得了。是谁在反对“精兵简政”啦，我看除了阶级敌人外，就是最不懂得生产的人。那些人脱离生产惯了，不觉得可耻，越脱离被越觉得舒服，什么事情都要很多人去做，我看至少有 70%，自己为自己服务。过去，听说有一部分人不要当干部，我当时就说这个话不要相信，只要气候一变，还要争着当官，成立革委会，不是要争当委员吗？这里至少有一部分人是出于私心，想脱离群众，而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呢？就是讨论培养不脱离劳动、不脱离实践的人。这不是与促进“精兵简政”有关系的吗？所以我们的工作不能单打一，不互相联系。我们的中心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在各方面都会坚持两条路线斗争。

再讲一点生产，离开上海有一个多月了，情况不大清楚。今年上海的生产搞成什么样子，今天讨论一下。现在国内的形势很好，还没有成立革委会的还有五个地区，同志们也都很着急，怎么这样慢啊？不是我们不努力，我们是作出努力的，这五个地区有他们自己的特点。这五个省、自治区，都是祖国的边疆。这五个地区都是和平解决的，有的国民党的架子还没有动。讲了这两点，同志们会明白了。我们想快、想要快，敌人在搞破坏，所以斗争非常激烈。最近中央对广西的布告，我们希望上海要好好学习。我感到上海对这份布告学习不够认真，认为上海没有这个问题。据我所知，其他好多省市对中央布告都经过认真讨论，做到家喻户晓。主席在看到湖南学习中央布告后的一份报告，主席看了后在报告上批了两句话：请考虑可否把此件转发各地，并加上几句督促话。所以各单位都要检查一下宣传情况，因为这不只是对广西而言的，这儿划了一个敌我的界限，过去文件上没有这样写过。另外其他一些矛盾，文件上也作了阐明，可以帮助处理我们自己的问题，有的单位武斗还没有斗够，不把国家财产放在眼里，这样能允许吗？杀人放火的有，搞反革命现象也有。这布告可以帮助我们分清敌我，区别对待，当然也不要照搬。广西难就难在造反派里混进了一些反革命，并且控制着造反派，中央四个方面的联名指示，他们都不执行，那不就是反革命吗？49 年到 50 年，广西没有抓到反革命，现在抓住了，现在也解决了。这样也好，问题暴

露得彻底，过去没有抓出来前国民党现在自己跳了出来。有一个人，过去是××省警备司令，现在在一个工厂里当门房。所以广西问题现在也可以解决了。

铁路形势也好，除柳州以外都畅通了。

煤炭生产也好，只是还有一部分单位还有些问题。煤炭工作会议即将结束。看来这两方面还是有保证的。吃饭问题，解放以来国家仓库的储备量，从来还没有象今年这样多。毛主席提出不吃进口粮，这已经做到了，现在还有些进口，这主要是为了调剂。

毛主席提出的“南粮不北调”，今年也做到了，粮食方面从来没有象今年这样好，当然你们也不能浪费。农业由于天气关系，还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大局已定，现在我们考虑如何把工作搞得更好一些，上海有义务供应全国，应该担任更大的责任，但也不要层层加码，根据可能与需要争取多生产一些。现在的问题还是许多能够做到的事，我们落后群众，认为做不到。现在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接近于全面胜利，但还是很艰巨，还有不平衡，先进单位已解决了，有的单位还没有动。先进单位不要翘尾巴，要谦虚谨慎，看到工作有成绩，也要看到缺点，把工作做得更好。

最后，向同志们报告，毛主席身体非常非常健康，林副主席身体也非常非常健康，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同志们身体也非常健康，精力非常充沛。（热烈鼓掌，完。）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张春桥在上海教育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根本的在于内容而不在于形式。

大学生包括中学生最难了解的是农民，知识分子最难的不是到城市，跟工人转一转还可以，而是到农村跟农民。带了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比如“三忠于”活动，到农村已不能硬要那样搞忠字化环境，要花钱的，刻一个忠字，画一个忠字。孔夫子也搞忠字，忠字有政治性的，搞了个忠字，不一定就说明你忠于毛主席，有的反革命也刻得好，他们忠于谁？忠于蒋介石。因此，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当然同志们热情是很好的，我要说的是不了解农村。

（二）不当普通劳动者，搞的还是修正主义。

在教育革命方面，陆定一也还不讲点马列主义，讲一点毛主席怎么说的，就

不讲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普通劳动者，不讲劳动者，教育革命报告很多，到处讲，就是不讲要当普通劳动者，光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们的大学还不是这样讲的，搞的还是修正主义，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年下去两个月，在实验室也结合，种种理由，不讲当普通劳动者，光两句话不能解决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全国的农村都赶上海郊区的话，至少五年。我国农业现代化可是个大问题，按上海农村，已经很不差了。

（三）社会分工的消除，要相当长的时间。

化工学院的也可以从农村中去招，因为农民中对化肥、化学药品有一定的基础知识，不会招高中生了。

师范大学怎么办？谁来当教员？不能把教员说得一钱不值，不能任何工农都能当教员，同一个问题，很短语言讲清楚，有的噜苏半天讲不清。有的人长处别人看很高，但讲不出来，从这个意义，每个人都有长处，可作我们老师。我看社会的分工在几十年内能否消除，把三大差别都消除，我看要相当长。对书本是这样，不要都否定。（徐景贤：机床厂调查报告原来没有这么一句“书还是要读的。”）不看点书不行，我还看了西洋画史，就是为了研究《毛主席去安源》，可以吸收的西洋各派是个什么东西。要搞交响乐，钢琴伴唱《红灯记》，不懂钢琴怎么行？还要知道一些国外专家的最高水平是什么？问题是不要拜倒在那里，跪到那里，要站在那里就行了，还得搞。我过去不懂京戏，现在还不懂，弄了许多四旧，天天要听。红卫兵破四旧，家里要把唱片搞掉，我说留着有用，各种戏都要听，有牛鬼蛇神唱的，要有点知识。江青同志知识多，海港哪那句唱腔从哪个戏化来的，她很清楚，不是照样搬，而是用了一个唱腔的尾巴。唱片不要砸掉，还有用的，要改造，要批判。（徐景贤：为我们所用，还要进行改造，以后学校要解决这个问题。）

（四）注意调查研究，总结经验。

五·七公社搞了那么久，究竟是什么思想？应给中央写个报告，方案是主席批的，试了个怎么样子，不要那么全面，拿出一个问题报告一下。科大工人班串连了一下，总结教育革命经验，作点调查，说明你们观点，因为这教育革命，大学今后怎么办应提出你们想法。学生来自工农到学校怎么办？应该提出你们想法。我想无非是这几个问题。教育革命非夺权不行，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不

行，前车之辙不可不鉴。不清理阶级队伍不行，要国民党、叛徒、特务、自首变节分子教我们不行。要找一些在学校里的已毕业的同学交谈一下，把各种不同意见集中一下，教（育）卫（生）组把各方面意见，从主席最新指示到主席的教育革命的小册子，主席提出什么问题，那些问题的论点是什么，可不答复，把问题集中一下，总结的有不少题目，从红卫兵到大学生有不少题目，建议《文汇报》调查一下上海工业培养技术人员的状况，看全面究竟如何。

整个工业改造要作调查，还有农村其他方面。报社分几个工作点调查，不要集中在一个地方。还有广泛宣传主席思想，几家报社从现实生活中找些例子，“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用一百个例子为小人物作宣传，长小人物志气、无产阶级志气，要大力宣传，这个迷信不易打破。在座的有大学，在开会时把你校一些例子讲一下，集中一些，可以把材料送报社进行宣传。五八年搞教育革命时，主席要几个机械工业部收集一些什么出身，什么革新发明，都是小人物的发明，做了大人物没什么发明，这样才能把工人、农民思想解放。刚才一位同志谈到下工厂下农村时，就向工农兵学习，思想得到解放，一到学校又拜倒在“权威”脚下，不容易啊！希望你们总结总结经验，要调查研究，写长了走向反面，人家不看，一点儿也不看，搞精炼点倒是可以看的。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红旗》杂志编辑部《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

红旗杂志编者按：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查，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 * *

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就是好

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那篇调查报告中，曾经提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它是现在上海机械学院的前身。它创办于一九五二年，直属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后来，搞“正规化”，变成机械学院。从这个学校的变化过程中，有许多发人深省的东西。

学校创办的时候，为了从劳动人民中培养技术人才，适应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第一届招收的二千一百八十一一个学生，全是从工人农民和一部分农村基层干部中选拔的。这批工农学生经受了“三反”、“五反”和土改等阶级斗争的锻炼，又有一定的生产实践经验。这批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的学生有如下几方面的优点：

第一，工农学生的学习目的性明确。他们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骂我们，‘工农文化低，不懂 A B C，那能学设计’，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劳动人民要成为科学文化的主人。”他们进校后提出了“要为毛主席争气”，“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的战斗口号，自觉地组织“互助组”，提倡“小先生”，三人一组，能者为师，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比如教化学，许多学生记不住元素符号，大家编起了化学元素歌，又唱又背，很快就记牢了。

第二，工农学生阶级觉悟高，敢于藐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学校里有一个留德的电学“博士”，曾被一些迷信洋教条的教师当作偶像来崇拜。一次这位“博士”带了厚厚一叠书来教电学，他照本宣科，严重脱离生产实际，工农学生不要听，就向这位“博士先生”提出了两个有关电动机的生产实际问题，将了“博士先生”一军。他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就用那套别人听不懂的“理论”企图把工人提出的问题搪塞过去。但工农学生不买他的账，继续追问，结果这位“博士先生”只得吞吞吐吐地说：“我已经有十多年没有看技术杂志了！”后来，工农学生把这个“庞然大物”轰下了讲台。

第三，冲击了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当时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及方法还是旧的，教育大权基本上被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操纵着。但是，由于当时工农学生数量多，占全院师生员工百分之九十以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处于工农学生包围之中，所以旧的一套教育制度还是受到了不断冲击。当时，学校

领导设立了班主任制度，企图用这一套把工农学生管起来。工农学生不吃那一套，结果班主任制度等于虚设。而在学校中最有威信的却是学生党团支部和学生会组织。一次全校数学期中考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采用出难题怪题的办法，使全校二千多学生有近半数不及格，工农学生很气愤，各班级都派代表到教导处去说理斗争，迫使校方宣布这次考试作废。

第四，学以致用。这个学校的工农学生到无锡某工厂进行生产实习，一到工厂就穿起油腻的工作服和工人一起劳动，讨论生产技术问题，很快就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生产上去，帮助该厂提出了一百二十多项技术革新建议，其中立即被工厂采纳的就有三十多项。而同时在该厂参加生产实习的上海某大学的一批学生，却整天拿着本本到处抄录一大堆工艺操作规程，无所创造。该厂的工人反映：“工人学生学了就是顶用。”他们回到生产单位后还有许多创造发明。上海机床厂主持设计具有国际水平的大型平面磨床的王德法同志就是该校的毕业生；在上海机床厂对精密磨床的液压操纵箱进行了第四次重大技术革新的工人技师，也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负责试制我国第一台二十万倍电子显微镜工作的，也是该校工农班的毕业生。((1)(2))

一场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但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击中了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要害。十多年来，围绕着如何对待工农学生的问题，在教育阵地上展开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

一九五二年，当第一批工农学生进校时，上海工人阶级一片欢腾。他们说：“我们工人阶级不但要在政治上翻身，而且要成为科学技术的主人，我们要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当时，几乎每一个工人到学校来，工厂都要敲锣打鼓开欢送会，给他们戴了大红花，象参军一样光荣。

可是，学校里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跳了出来，狂叫“糟得很”，“这样做不可思议”，大放厥词，说什么“工农学生脑子笨，入学程度又不一致，难以培养”、“工农学生好提意见，对师长不尊敬”、“培养工农学生得不偿失”，等等。他们利用手中的教育大权，猖狂地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工农学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这些走资派千方百计反对和限制工人、农民入学。这个学校一共只有三次招

收工农学生，一九五二年招收了二千一百八十一人。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它当成“包袱”，在一九五五年三月的一份工作总结中，百般攻击和诬蔑工农学生。于是采取了“大大收缩”的方针，这一年工农学生只招了一百七十三名。一九六〇年，在“以考试成绩入学，一视同仁”的幌子下，实际上对工农子女关门、为资产阶级子女开门，仅招收了十七名工农学生。从此，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要想入学比登天还难。

他们在教学上故意刁难、打击、迫害工农学生。例如制图课，这对于机械工人来说应该是容易掌握的。可是这班资产阶级老爷们硬要工农学生先学习投影几何，用玄妙的相贯体、相贯线来刁难工农学生，在一九五七年的一次考试中，使一百七十多位工农学生有四十多位留了级。有一位来自湖南的劳动模范、五级技工的学生，资产阶级老爷们费尽了心机，给他批了五十九分，硬是以“一分之差”要他留级。工农学生说：“分数线，分数线，是对工农的封锁线，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线。”一九六〇年入学的十七名学生，受资产阶级的考试制度的迫害，先后有十四名学生被迫退学，他们怀着对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的深仇大恨，愤然离校。市印三厂一位优秀工人，入学才一年半，因为体育、外文、物理三门课不及格留了级，后来又被迫退了学。他曾向学校领导提出对升留级制度的意见，可是学校的走资派恶狠狠地说：“升留级制度对任何人一视同仁，工农学生不能例外。”但是，另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有五门课不及格，学校走资派却用种种手法准其升级。

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这个学校的革命师生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发起了猛烈的冲击，学校里出现了许多革命的新事物，如工人上讲台，工人、教师、学生三结合搞教学，学校办工厂等。十一月十二日，康生同志来校视察。他强调指出，工人要上讲台。学校里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是他们；真正有本事的，是他们。有些大学毕业生，只会动口，不会动手。柯庆施同志在这一年对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才也作过重要指示，并指示从工人中抽一批人去搞尖端的科学的研究。这些指示，都大长了工农学生的志气。但是，就在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高潮中，中国赫鲁晓夫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丕显到这个学校大发黑指示，为校内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张目，鼓励他们胆敢拒不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指示。他们不让工人上讲台，仍然让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专我们的政。他们疯狂地对抗柯庆施同志的指示，反对抽调政治业务兼优的工农学生去搞科学研究，从已调去的三十名学生中，强行调回了十名。一九五九年毕业留校的二十一名工人学生，都是党团员，而只有一名当教师，绝大多数到附属工厂当工人。党员学生李复兴入学前已是五级技工，学了四年却分配在工艺实验室当辅助人员，连当实验员都没资格，更谈不上教学工作了。

同时，他们排挤工农干部。一九五六年留校的四十四个工农毕业生，大部分是党员，后来被排挤出去的竟有二十九个，走资派指着毕业后在校当政治指导员的工农干部说：“你们中专毕业的不行啊，大学生指导员要大学毕业的才行。”

在教育制度方面，他们还照搬苏联修正主义那一套，妄图将工农学生推入修正主义泥坑。从一九五四年起，他们请来了不少外国专家，全面学苏联修正主义那一套。他们根据中国赫鲁晓夫“把它统统搬过来再说”的黑指示，从专业设置、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教学方法、教学组织、规章制度，统统照搬苏修那一套，什么“六个环节”，“七种计划”，“二十四种表格”，“升留级制度”等等。最典型的是体育课，学苏联后，大跳其交谊舞，硬把工农学生往修正主义道路上拉。

同时，他们紧跟黑主子陆定一的旨意，提出“学交大，赶哈工大”，学习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所谓“办学传统”，强调“高精尖”、“大洋全”，把学生培养成为“三脱离”的资产阶级工程师和设计师。这些家伙又以“求大、求全、求新”为名，把机构体制搞得庞大、臃肿、官僚化。学生同样是二千多，机构从一九五二年只有二处二室到一九六〇年增加到七个部、处，二个室，二十二个教研室；教职员从原来三百多人，猛增到八百多人；教学设备从价值一百万元骤增到八百多万元；学校的附属工厂，在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中，是为教学、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以后大搞资本主义经营，利润挂帅，成为走资派挥霍浪费的摇钱树。

怎样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

上海机械学院建校以来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是一场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斗争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

最近，部分当年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上海机床厂工程技术人员以及这个学校附属工厂的工人同志和广大革命师生，在总结了建校以来的正反面经验以后，对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设想：

一、毛主席最新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为理工科大学实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指出了根本方向。他们认为，理工科大学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必须解决由那个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首先，是政治上组织上的“权”。毛主席派工人阶级进大学，占领教育阵地，这是保证学校领导大权永远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的关键，是保证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不断进入大学的关键。上海机械学院曾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招收学生，后来为什么向工农关门？就是因为没有解决“权”的问题。这个教训必须吸取。其次，是思想上的“权”。不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教育阵地，资产阶级思想势必会泛滥。上海机械学院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长期以来对工农学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教训说明，必须深入开展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革命大批判，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罪行，批判轻视工农、轻视实践的反无产阶级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要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学校的统治地位。否则，教育阵地会得而复失。

二、理工科大学的学制以二至三年为宜。课程设置要打破过去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与专业课的界限，可以采用实际生产中的典型机械、典型零件作教材，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彻底废除脱离生产实践的空洞理论和烦琐哲学。教学内容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抓住精华，学得精通。广泛开展现场教学，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改革后的理工科大学，既是一个学校，又是一个工厂，也是一个科研单位。学生应当带着生产实践中碰到的各种难题进入学校，生产部门和科研单位也要从教育的角度出发，有计划有目的地向学校提出课题，使学生在边生产、边学习、边研究中着重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教育为生产劳动服务。

三、理工科大学还要担负起办好业余技术教育的任务，方针是厂校合作，厂办校助。这是坚持群众路线，大量培养工人阶级工程技术队伍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根据无产阶级工业革命的需要，从生产实际出发，采取“要什么办什么，做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教学原则，大量地办好各种形式的业余技术学校和短期训练班。

四、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他们认为，现有的教师队伍不能担当起

教育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学生的任务，必须加以整顿、改造、重建。今后的教师队伍应当采取有高度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有实践经验的工人，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三结合的形式。社会上一大批在实践中有发明创造的工人，技术人员，要有计划地定期地深入学校讲课。这一批担任教育任务的工人可以是专职的，也可以是兼职的，但绝大部分是兼职的。专职教师的主要作用应当体现在组织学校和工厂、科研部门的有机结合上，帮助学生把实践上升为理论，再回到实践中去。学生们也都有实践经验，可以走上讲台、互相交流。现有的教师应该分期分批地到工农中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载《红旗》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第三期；转载《人民日报》
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红旗》杂志编辑部《从“赤脚医生”的成长 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

前言

“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

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上海郊区广大贫下中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毛主席《送瘟神》两首诗的发表，极大地激励了他们防病灭病的革命热情。上海医务界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组织万人大军下乡，配合各人民公社卫生院，短期培训和带教了大批不脱产的卫生员。据一九六〇年六月统计，全市十个县二千五百多个生产大队，共有卫生员三千九百多名。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一九六一年八月，中国赫鲁晓夫在上海卫生战线的代理人，肆无忌惮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抛出了一份恶毒污蔑大队卫生员的黑报告，强令卫生员丢下药包。大跃进时代诞生的这支新型的农村卫生队伍被整垮了，三千九百多人只留下了三百多人。

一九六三、六四年，在伟大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上海郊区又逐步重建和恢复保健网。大队卫生员从三百多人增加到二千三百多人。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郊

区各县在巡回医疗队的配合下，全面整顿和培训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总人数发展到四千五百多人，平均每一个大队有一点八人；并由“赤脚医生”带训了二万九千多名生产队卫生员。至此，郊县保健网全面发展起来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涌现了一大批“赤脚医生”。经过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的锤炼，这支队伍得到进一步壮大、巩固和提高。

在斗争中，川沙县江镇公社也成长了一批“赤脚医生”。江镇公社位于东海之滨，全公社二万八千多人。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年代，他们培训了十九名卫生员，各大队建立了卫生站，并且选拔了六个卫生积极分子，送到县卫生学校学习十个月后，又回公社工作。但是，一九六一年前后，他们同样被一刀砍掉了。一九六三年，在中央一定要消灭上海郊区某种传染病的指示下达后，江镇公社重建卫生网，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选拔了业余卫生员。一九六五年开始培训“赤脚医生”。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这支队伍进一步成长起来。

贫下中农需要这样一支新型的医疗卫生队伍

“赤脚医生”平时有一半左右时间参加劳动，生产大队对他们的补贴不多，贫下中农养得起。他们的收入保持农村一般同等劳动力的水平。以去年为例：在富队东浜大队，“赤脚医生”的年收入为三百元，其中劳动收入为一百元，上交大队的出诊费、注射费（每次五分）及助产费（每次三元）为一百二十五元，大队实际补贴为七十五元。在穷队民利大队，“赤脚医生”的年收入为二百余元，其中劳动收入为五十四元，上交大队的出诊费、注射费为九十二元，大队实际补贴为六十一元。两个大队都有一千三百多人，平均每个贫下中农一年补贴“赤脚医生”四、五分钱。

“赤脚医生”是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尖兵，贫下中农需要他们。新龙大队一个贫农的孩子得病，先由一个流窜来的坏人来“看”病，几角钱的一针安乃近就骗走了十多元，而孩子的高烧仍旧没有退。“赤脚医生”主动上门，细心治疗，病家只花了三元多钱，病就好了。这样的例子很多，这就使贫下中农懂得：医疗卫生大权一定要由贫下中农自己掌握。由于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卫生战线的代理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医疗卫生路线，医院都设立在远离农村的城镇，就医不便，真是“救护车一响，家里一只猪白养”。一九六三年，陈湖大队一个贫农的孩子得乙型脑炎，由于附近没有医院，病情恶化，送到上海医疗，住院一个

月，小孩残废了，还花了三百多元钱。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大队又有一个贫农的孩子得乙型脑炎，“赤脚医生”及时发现，迅速施药，控制病变，并且亲自送进县医院治疗，一个星期就好了，只花了二十元钱。“赤脚医生”在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中，也起了巨大的作用。有一个大队的“赤脚医生”，在大队的领导下，与贫下中农一起大搞粪水管理和饮水消毒，使蚊蝇大量减少，有效地预防了流行疾病。仅以流脑、乙脑为例，一九六六年为二百病例，今年几乎没有发生。他们的粪、水管理工作，受到前来公社参观群众卫生状况的人们的赞扬。同时，有了“赤脚医生”，贫下中农在医疗卫生方面更有发言权了。一个贫农病人由“赤脚医生”送到县人民医院就诊，那里的一个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医务人员，把一支体温表放在他嘴里一小时零三分还不来取。这位贫农在“赤脚医生”的支持下，当场严厉批判了这种歧视工农的恶劣的医疗作风。

培养“赤脚医生”的途径

目前，江镇公社的“赤脚医生”共有二十八人，分布在全公社二十一个大队，他们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三岁，绝大部分都是贫下中农子女，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有的只念过二年半书。

这个公社采用两种办法来培养“赤脚医生”：

一种是公社卫生院集训。这里面有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文化大革命前夕，进行了一次完全“三脱离”的训练。当时，把旧医科学校的一套做法搬到了训练班，每天八节课，从书本到书本，大搞“正规化”、“系统化”。关门搞了一番训练，虽然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也侵袭了他们。有人买起了九块钱一本的洋书，在农村中挟进挟出，有的“赤脚医生”不想赤脚了，盼望进城穿起白大衣当“大夫”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贫下中农亲自管理，与公社卫生院结合，由巡回医疗队辅助，举办了抗大式训练班。在为时两个月的训练期间，“赤脚医生”也参加了训练班的领导班子。他们以“老三篇”为基本教材，贫下中农亲自去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并且紧密结合从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业务教学。训练班结束时，人人表示要做一个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赤脚医生”。

另一种是在实践中加以培养。这是培养“赤脚医生”的重要方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赤脚医生”回到生产大队以后，贫下中农为他们提供

了医疗实践的广阔天地。他们说：“我们就是要叫鸡毛飞上天。”在有些大队，小病大病都送给“赤脚医生”治疗。他们每年都有一千五百人次左右的诊治机会。而在这个公社的一个专业医生，在医科学校读了五年，一共只接触了几百个病人。同时，由公社卫生院的“三同医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医生）和“包片医生”（包干二、三个大队医疗工作的医生），或巡回医疗队医务人员的带教，使“赤脚医生”提高得很快。例如有一位“赤脚医生”通过医务人员的带教，已经能够单独对心脏病人进行诊断和施药，有效地控制了病情的发展。

培养“赤脚医生”，同样存在由那个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去掌握这个领导权，“赤脚医生”是培养不出来、成长不起来的。首先，要选拔好培养对象。在大沟大队，有一个前几年从城市下放的护士，一部分社员考虑请他当“赤脚医生”。但是，他一开始就计较工分、报酬，贫下中农没有选他，而是选了另一个贫农的女儿。这个贫农的女儿，只有高小水平，是队里的会计和保管员，平时公私分明，得到贫下中农的称赞。其次，掌握思想教育也很重要。有一个大队放松了对“赤脚医生”的教育，结果她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嫁给了一个富农的儿子，垮掉了。而近邻一个大队的“赤脚医生”，家里经常为她进行忆苦会、讲用会，生产大队吸收她参加大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中心组学习，使她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的统治，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医生百般歧视“赤脚医生”，阻挠他们成长。明明他们早已会用的药物不准用，明明他们早已能开的处方不准开。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回了公社卫生院的领导权，打破了上述种种条条框框，为“赤脚医生”的成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江镇公社二十八名“赤脚医生”的业务培训，只有公社卫生院一个城市来的某医专毕业的医生具体负责。几年来，他和广大贫下中农建立了感情，体会到要贯彻执行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不仅要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要把训练“赤脚医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他自己编写了大量的简易农村医疗卫生教材，介绍了一些优秀的农村通俗医务书籍，组织“赤脚医生”进行广泛的“兵教兵”活动，着重培养他们自学的能力，使他们在实践中迅速入门。事实说明，入门不难。例如有个没有经过集训的“赤脚医生”，通过自学和“兵教兵”活动，业务能力提高很快，曾单独治好过胸膜炎病人。后来，

他参加了一次短训，进步的速度甚至比其他“赤脚医生”还快。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

在贫下中农教育培养下，“赤脚医生”走的是从贫下中农中来、到贫下中农中去，从农村实践中来、到农村实践中去的道路。

经过二年多的实践，“赤脚医生”的医疗技术有了显著的提高，他们普遍能使用近一百种药物，诊治近一百种农村的常见病、多发病，针灸行针一百多个穴位，还能够医治麻疹、肺炎、胸膜炎等农村常见重病。有些“赤脚医生”的实际工作能力，胜过了这个公社卫生院里某些从学校出来又没有实践经验的医生。例如：一个自称读了近二十年书的医生，把阑尾炎诊断成普通肠胃炎，结果耽误了病人，恶化成腹膜炎；后来，请来了“赤脚医生”，由他迅速确诊，才避免了生命危险。

这一点，还能从公社卫生院两位年龄差不多而经历不同的医生的对比中看出：

一个是主要学习外科和内科的某医专毕业生，死读书五年，一副近视眼镜从三百度升到了六百二十五度。参加工作四年了，但能力很差，连脑膜炎、胸膜炎也诊断不出。一次为一个死胎早产病人接生，临床时，死背在学校里记熟了的书本知识，急得手足无措。对这些人应当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获得改造。

另一个医生，贫农出身，只有初二水平，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的除害防病卫生积极分子，由公社送到县卫生学校学习十个月，后到公社卫生院，工作几年后，又经七个月的外科进修。目前，在医疗设备较差的情况下，能够进行疝修补、绝育等手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他已成为公社卫生院革委会的负责人。

这个鲜明的对比，暴露了旧医学教育制度（整个教育制度）严重脱离政治、脱离实践的弊病，显示出“赤脚医生”这支新型医疗卫生队伍发展的巨大生命力。

“赤脚医生”在技术上所以进步快，最根本的是由于他们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新农村，热爱贫下中农。有一个大部分亲属都在上海市区的“赤脚医生”，近两年没有离开过大队。大队里有一位患瘫痪症的七十多岁的贫农老大娘，大小

便常常拉在身上。“赤脚医生”每天都爬到她的床上，帮她打针，换洗衣服。老大娘感动地说：“毛主席他老人家真好！要不然，我老死掉了人家也不知道。这个囡比亲生囡还好！”

从“赤脚医生”的成长来看医学院校的教育革命

从“赤脚医生”的成长道路，可以看到医学院校的教育革命的一些问题。江镇公社的贫下中农体会到：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必须搞好医学院校的教育革命。他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最新指示，认为：

(一) 医学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贫下中农谈起公社里两个同时担任“赤脚医生”的青年：一个后来被保送到嘉定半农半医医专学习（高中毕业才能入学）。这所学校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抓的重点，向学生灌输了大量修正主义毒素。三年下来，这位“赤脚医生”成了白面书生，平时回家跟贫下中农都不大说话了。她不愿回本公社工作，更不愿回本大队当“赤脚医生”了。另一个只念过两年半书，经过三年的斗争锻炼，提高了政治觉悟。她更加热爱贫下中农，热爱农村医务工作，说：“我药箱里药用少了，比家里米缺了还着急。”在医疗技术上，后者也超过了前者。贫下中农感慨地说：“教育不革命，就算是我伲送去的囡，也要出修正主义！”他们认为，医学教育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把“老三篇”和《实践论》、《矛盾论》作为必修课；要贯彻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学生应该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进行学习。

(二) 医学院校的招生对象主要应是“赤脚医生”和卫生员。毛主席最近指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贫下中农认为，“赤脚医生”在农村里滚上二、三年，再进医学院校学习，这个办法好。贫下中农高兴地说：“以后医学院校招生，我伲要把‘赤脚医生’送去，学几年后再回来为我伲服务。”江镇公社在各生产队选拔了一百四十四名不脱产的卫生员，主要由“赤脚医生”带训。带出来以后，“赤脚医生”多了，就可以抽出一部分人去医学院校学习一、二年或二、三年。

(三) 坚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贫下中农认为，当前，医学最主要的是普及，也要提高，但必须沿着工农兵所需要的方向去提高。那些为极少数城市老爷太太服务的所谓“提高”，必须彻底批判。贫下中农还认为：“赤脚医生”中除了

一部分进入学校学习外，绝大部分都应当坚持扎根农村，可以采用卫生院医生和“赤脚医生”上下定期对调的办法，加以提高。这样做，既有利于原来的医疗卫生队伍的改造，又有利于在实践中提高“赤脚医生”。

（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第三期；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新华社报道：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关怀下 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 这是首都工人阶级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巨大成果 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决心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了。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是首都工人阶级贯彻执行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伟大指示，领导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巨大成果！

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在毛主席直接关怀下建立的我国第一支工人宣传队。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他们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解放军战士的配合下，昂首阔步地开进清华大学，一举登上了领导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政治舞台。就在这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伟大事件发生后的第九天，八月五日，敬爱的毛主席把外国朋友赠送的珍贵礼物——芒果，转送给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八月十五日，毛主席又亲切地接见了这个工人宣传队的代表。毛主席的巨大关怀，给了他们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为他们指引了胜利的航向。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就是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毛主席的关怀下，领导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坚决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结果。

一月二十五日，当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宣告诞生时，清华园内红旗飘舞，一片欢腾，到处都是醒目的大字标语：“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阶级能够领导一切！”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回顾半年来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清华大学的巨大变化，畅谈自己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收获和体会，莫不欢欣鼓舞，豪情满怀。他们和工人宣传队员一起，隆重举行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

成立和庆祝大会，纵情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毛主席教导我们：“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斗争实践中深切体会到，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要保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每一项指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每一个战斗号令，都能够迅速地畅通无阻地贯彻执行。因此，他们进驻清华大学以来，带着领导上导建筑领域斗、批、改的新任务、新问题，坚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坚决实行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领导。他们紧紧团结和靠学校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抓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伟大指示，在半年时间内就使清华大学面貌一新。现在，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决心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迅速赶上亿万群众胜利前进的雄伟步伐。实践充分证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阶级能够领导一切！

在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革命师生员工代表先后讲话。他们说，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们表示要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不断革命，彻底革命，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认真搞好斗、批、改，彻底扫除几千年来旧教育制度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负责同志，首都各有关单位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指战员和首都其他院校的革命师生员工代表，参加了大会。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

《通知》的主要内容是：国务院各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半工半读、函授学校），设在北京的仍归各有关部门领导；设在外地的，可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也可交由厂矿革命委员会领导；设在其它地方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函授学校），全部交由所在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高等院校在本校所在省、市、自治区以外设有分校或教改机构的，则实行以总校为主、当地革命委员会为辅的双重领导。下放给地方的高等院校，除了为当地培养人才外，还要为国家培养人材，因此，学校的招生和毕业生的分配，都纳入国家计划。

《通知》实施后到 1971 年止，全国原有高等院校 434 所保留继续办的还有 328 所，其中原中央部署高等院校 176 所，经调整后，保留下 31 所。第二、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所属军事工业院校实行部门与地方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仍由中央有关部门领导的还剩下 6 所。

1971 年 1 月 31 日，国务院科教组、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关于高等院校调整问题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8 月 13 日，中共中央同意《报告》提出的调整方案。根据此《报告》方案，规定高等院校的管理体制是：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实行以“块块为主”（多数院校由地方领导）；部分院校由地方和中央部门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少数院校由中央部门直接领导。并确定，将全国 417 所高校，保留 309 所，合并 43 所，撤销 45 所，改为中专 17 所，改为工厂 3 所，增设 7 所。

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的通知

1970.01.31；中发〔1970〕2 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并其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现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转发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个报告。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十分关怀和重

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曾作过一系列重要指示。为了加强领导，中央同意会议拟定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由张春桥同志担任组长，卫生部军管会副主任谢华同志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徐景贤同志任副组长，重新建立中共中央南方十三省、市、区血防领导小组。

会议制定的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消灭血吸虫病工作规划（草案）”，中央认为基本上是可行的，希望南方十三省、市、区积极行动，付之实现，并应将防治丝虫病、钩端螺旋体病也列入这一工作规划（草案）中去。血吸虫病危害和威胁广大人民健康，直接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从战备观点出发，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并且要放手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要抓紧时机，一鼓作气，连续打它几仗，力争在较短时间内消灭血吸虫病，实现毛主席“送瘟神”的光辉思想。

北方地区的省、市、自治区，可参照南方十三省、市、区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精神，加强对克山病、大骨节病、布氏杆菌病等地方性疾病的防治工作，要从战备观点出发，抓紧时间，尽快做出成绩。

中共中央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一日

附：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

遵照中央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关于召开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的通知”，我们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三十日在上海召开了会议。南方十三省、市、区及国务院有关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张春桥同志主持。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这次会开得很及时，很重要，充分体现了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广大人民健康和血防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

会议期间，遵照中央的通知，讨论了重建中共中央南方十三省、市、区血防领导小组的问题。大家一致赞成中央的决定。领导小组的成员，除了中央规定的各省、市、区革委会负责人外，建议增加中央农业、水电、化工、商业、卫生各部的负责人。经到会同志与本单位领导协商，拟定了一个名单。小组组长，按中共通知由张春桥担任。会议建议由卫生部军管会副主任谢华同志和上海市革命委

员会领导成员徐景贤同志任副组长。下设一个精干的办公室，设在上海，负责日常工作。现将领导小组成员名单送上请中央审批。

会议讨论拟出了“南方十三省、市、区消灭血吸虫病工作规划（草案）”。为制定规划，会议认真地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分析了解放以来血防工作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研究了当前存在的问题。经过共同努力拟定的规划草案，大家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文件。但是，由于有些地区最近才开始抓紧血防工作，我们对情况摸的还不透，因此，建议中央对这个规划草案进行审查，如认为可行，请批转各省、市、自治区试行。我们准备在今冬明春打它几仗之后，在一九七〇年五月和十一月再开两次会议，根据实践经验加以修订。

在会议期间，我们将原中共中央血防九人小组书记、大叛徒魏文伯带到会场，进行了面对面的揭发批判，对刘少奇在血防战线上的这个代理人的滔天罪行，大家十分愤慨。为了肃清血防战线上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更好地推动革命的大批判，各省、市、区同志一致要求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魏文伯，请中央批准。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中共中央南方十三省、市、区血防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	张春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
副组长	谢 华	卫生部军管会副主任
副组长	徐景贤	中共中央委员 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成员
成 员	李大章	中共中央委员 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
彭 冲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	
赖可可	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	
杨效椿	安徽省革委会副主任	
杨栋梁	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	
刘明辉	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	
张 明	贵州省革委会副主任	
姜 一	湖北省革委会常委	

万 达 湖南省革委会常委
寇庆延 广东省革委会常委
刘永生 福建省革委会常委
陈开路 广西自治区革委会常委
张 彬 水电部副部长
王 磊 商业部副部長
沈昌荣 化工部军管会副主任
陈凌风 农业部军代表生产组副组长
共十九人

南方十三省、市、区消灭血吸虫病工作规划（草案）

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遵照毛主席亲自批准发布的中共中央转发“关于上海开展夏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报告”的通知、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南方十三省、市、区血防工作会议的通知”的规定，由上海市革委会主持，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在上海市召开了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区革委会和中央农业、化工、水电、卫生、商业各部的负责同志。

与会同志重温毛主席的光辉诗篇“送瘟神”，认真学习毛主席对消灭血吸虫病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受到深刻的教育。大新认为：在全国落实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加强战备的大好形势下，召开这次会议，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血吸虫病是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一种疾病，不仅损害劳动力，而且损害了战斗力。这个病的流行，直接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要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从“战备、备荒、为人民”出发，力争在较短时间内把血吸虫病消灭，为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发动的侵略战争，作出贡献。

与会同志，经过学习、讨论，开展革命大批判，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分析形势，总结经验，研究制订了消灭血吸虫病工作规划。

一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十分关怀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广大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蓬勃兴起。

毛主席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指出：“许多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明确提出了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任务。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毛主席看到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报道，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写下了光辉诗篇“送瘟神”。这是对疫区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年代，亿万军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掀起了送瘟神的热潮。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了城市老爷卫生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夺得了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权。毛泽东思想空前大普及，疫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对消灭血吸虫病的重要指示，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大提高了广大群众、医药卫生人员和领导骨干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带领广大群众和工业、农业、水利、卫生等有关部门，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围歼血吸虫病，一个更大规模的送瘟神的群众运动新高潮正在形成。上海、江西、江苏、广东、浙江等省、市的一些地区，仅奋战一年，灭螺面积、治病人数已超过以往几年、十几年。合作医疗的普及，“赤脚医生”、革命医药卫生人员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改进了防治药物，治疗一大批病人，还治好一些有夹杂症的和晚期病人，变“不治之症”为可治之症。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消灭血吸虫病群众运动的形势，越来越好。全国已治愈病人三百多万，消灭钉螺三十多亿平方米，江西余江、德兴、福建仙游、广东增城、湖北襄阳、上海宝山等三十八个县消灭了血吸虫病。广大疫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口由少变多，体质由弱变强，工农业产量由低变高，生活逐步改善。广大贫下中农，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决心早日送走瘟神。

血防战线上所取得的成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

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二

解放以来，血防战线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激烈、十分复杂。送瘟神的群众运动，从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到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二年的低潮，再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后更大规模的兴起，呈现一个相当大的马鞍形。这就是血防战线上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反映。

血吸虫病是旧中国历代反动统治加在广大人民身上的严重灾害。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发现血吸虫病以后，毛主席和党中央极为关怀和重视，立即开展了防治工作。一九五五年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毛主席亲自决定由中共中央上海局、柯庆施同志负责组成中共中央血防九人小组，狠抓了血防工作。一九五八年出现的送瘟神群众运动的高潮，是毛泽东思想和群众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大叛徒刘少奇一伙，当时跳出来大肆诬蔑血防工作搞群众运动是“大呼隆”、“劳民伤财”，大刮阴风，大泼冷水。但是他们的阴谋被大跃进的洪流冲破了。

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空前激烈。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活动更为猖狂。大叛徒魏文伯公然出来破坏血防工作，他叫嚣说：“情况好的多搞一些，情况差的少搞一些，没有饭吃的地方不搞，回升就让它回升。”“多搞一些”是假，“回升就让它回升”是真。由于遭到刘少奇一伙的破坏，送瘟神的群众运动高潮被打下去，疫情回升，急性感染病人剧增，广大贫下中农的健康重新受到严重威胁。

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根据毛主席指示，柯庆施同志于一九六三年主持召开全国血防会议，把血防工作提到阶级观点、群众观点、生产观点的高度，提出要“思想通、情况明、方法对、决心大”。给刘少奇一伙以坚决回击，扭转了血防工作的停顿状态。但是，不久大叛徒魏文伯篡夺了领导权，公开鼓吹“有土必有螺”、“血吸虫病消灭不了”等谬论。使一些地区的局势又有反复，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摧毁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建立了红色政权，送瘟神的群众运动才又出现了新高潮。

血防战线上的胜利，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通过与刘少奇一伙反复搏斗取得的。但是，由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全

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消灭血吸虫病的任务，已逾期两年没有完成。目前还有流行县（市）二百九十五个，病人约五百万，钉螺面积约六十亿平方米；有些地区，疫情有所回升，个别地区回升的比较严重。影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特别是直接影响到战备。江苏省有一个生产大队，适龄应征青年一百多人，百分之七十以上患血吸虫病，最近四年只有一人参军。疫区广大贫下中农无比愤怒地指出：“刘少奇一伙是一批政治上的瘟神，保护了血吸虫病这个自然界的瘟神。”

回顾这一段历史的经验，可以看出：血防战线的斗争是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紧密联系的，是和党内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休戚相关的。当前，认真抓好血防工作，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阶段的重要任务之一。

三

消灭血吸虫病，是“要准备打仗”的迫切需要，是疫区广大贫下中农的强烈愿望，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消灭血吸虫病，并继续坚持反复斗争，做好扫尾、巩固工作。

在会议上，各省、市、区提出的消灭血吸虫病的初步规划如下：

广东、广西、福建、云南、上海二、三年消灭；

湖北、安徽、湖南三、四年消灭；

江西、江苏、浙江、四川五年消灭；

贵州一、二年查清疫情，治好全部病人。

会议认为：各省、市、区的初步规划，是积极的，是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同时又是留有余地的，基本上可行。在一些地区基本上消灭血吸虫病以后，仍然不能麻痹松懈，需要在较长时期内抓紧复查，抓紧巩固。

由于目前血吸虫病流行情况仍然比较严重，要从一九七〇年起，在五年内加以消灭，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是，完成任务的有利条件很多。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掌握了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大权，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广大群众，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与血吸虫病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论在山丘地区、水网地区或是湖沼地区，都有了消灭血吸虫病的典型县、社。所以，只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从备战的观点出发，以阶级斗争和

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就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任务。

（一）狠抓根本，用毛泽东思想统帅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搞好血防工作，一定要狠抓根本，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首位。要认真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好讲用会。要搞好思想革命化，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要抓紧革命的大批判。狠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狠批“钉螺灭不光，病人治不尽”、“生产是硬任务，灭病是软任务”等谬论，肃清其余毒。要把搞不搞血防工作，提到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度，提到两条路线斗争观点、备战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的高度来认识。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二）加强领导，全面规划，密切配合，协同作战。

血吸虫病流行的地区，各级党委、各级革命委员会都要把血吸虫病当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大事，当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阶段的一项大事抓紧。要建立血防领导小组，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挂帅，切实加强领导。县以上设精干的办事机构。农业、水利、宣传、卫生、化工、商业等部门，都要把消灭血吸虫病当做一项政治任务，列入议事日程，协同作战。人民解放军要在血防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各地应迅速摸清疫情，订出全面规划。对战略要地、三线建设地区，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力争提前消灭。各省、市、区、县互相接壤或同一水系的毗邻地区（如洞庭湖周围，杭、嘉、沪地区等），要发扬共产主义的协作精神，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力争共同完成任务。

在防治血吸虫病的同时，要继续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每年抓几次，抓好疟疾、钩虫、丝虫等寄生虫病和危害人民健康严重的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采取有效措施，作出成效。

有关部门要做好药品、器械的生产供应工作。

（三）大搞群众运动，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要大力做好宣传工作，大造舆论，大造声势，使毛主席“送瘟神”

的光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做到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更自觉地投入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斗争。要抓紧兴修水利等有利时机，大搞突击运动。把突击运动与经常巩固工作结合起来，把群众运动与脱产、不脱产的防治队伍结合起来。坚持反复斗争，连续作战，歼灭灭战。

要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勤俭办事业的方针，实行土洋结合，以土为主，提倡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向群众要办法，防止贪大求洋，单纯依赖上级调拨物资等偏向。

要贯彻积极防治的方针，采取综合措施。对于治病、灭螺、粪管、水管和防护等每个环节，都要因时因地制宜，抓紧落实。对耕牛等家畜的防治也要抓紧落实。

（四）普及合作医疗，充分发挥“赤脚医生”的作用。

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是贫下中农依靠集体力量同疾病作斗争的伟大创举，在消灭血吸虫病斗争已经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疫区要迅速普及合作医疗，大力培训“赤脚医生”。充分发挥“赤脚医生”、兽医和生产队卫生员、血防员的作用，组成一支群众性不脱产的骨干队伍，既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又是送瘟神战斗队。要加强对医药卫生人员和血防队伍的领导，县、社卫生单位都要把血防工作作为重要任务之一。集体医疗机构查治血吸虫病人所需经费，应由国家给予补助，以利于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而不要把大批病人推到城市医院。血防专业队伍要精干，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城市医药卫生人员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到疫区第一线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贫下中农服务，为消灭血吸虫病立新功。

（五）加强科学的研究工作。

科研人员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疫区，实行领导、技术人员与群众相结合，大搞群众性科研运动，发扬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不断总结群众创造的经验，改进防治措施。要努力改进防治药品和试制新药。要大力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遗产，特别要注意广泛地发掘、推广、整理、提高有效的单方、验方和中草药。要创制更加安全、有效、方便群众的防治药物。

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领导与关怀下，在全面落实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的大好形势鼓舞下，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

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为在较短时期内消灭血吸虫病而努力奋斗。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对天烧。”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血防领导小组和卫生部军管会“关于丝虫病和钩端螺旋体病的调查报告”的通知

1970. 05. 19；中发〔1970〕31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总后勤部：

现将中共中央南方十三省、市、区血防领导小组和卫生部军管会“关于丝虫病和钩端螺旋体病的调查报告”转发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个报告中提出的各项防治措施。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二十五年前就教导我们：“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丝虫病和钩端螺旋体病，严重危害广大贫下中农的健康，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应当积极进行防治。希望有这两种病的各省、市、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加强党的领导，全面规划，充分发动群众，加强调查研究，总结和推广行之有效的防治经验，以期尽快地控制和消灭这些疾病。

中共中央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九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附：

关于丝虫病和钩端螺旋体病的调查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七〇)二号文件的批语，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卫生部军管会业务组，组织了两个关于丝虫病和钩端螺旋体病的调查小组，于二月二日至三月八日，分赴云南、广东、湖北和福建四省这两种病流行较为严重的县、社，对流行情况、发展趋势、危害程度、防治经验和存在问题，进行了调查，现报告如后。

(一)

丝虫病是以蚊子为传染媒介的疾病，在我国广泛流行，分布在黄河以南的十四个省、市、自治区（台湾省未计算在内），约有七百五十多个县、市。据一九五八年的不完全统计，丝虫病人共有一千八百万左右。患者多数是贫下中农青壮年，因丝虫病引起大粗腿、阴囊肿大、流火等，造成极大痛苦，有的甚至死亡。

在大跃进的年代，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丝虫病的普查普治群众运动，成绩巨大。两年内普查一亿多人、治疗四百四十五万九千多病人，使丝虫病血检阳性大幅度下降。有些地方已基本消灭，如武汉市郊区经过四、五次复查复治，丝虫病感染率由百分之二十以上，下降到百分之一以下。

一九六〇年以后，由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丝虫病防治工作陷于停顿。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五年，虽有福建、山东、河南等省的一些地区开展过群众性防治运动，但大多数省、县处于停滞状态。这次调查，除武汉市郊区少数地区防治成果比较巩固外，福建、湖北、广东省的绝大部分地区有不同程度的回升，有的地区回升的幅度很大。如在南平市郊区芹西公社长建大队抽查二百一十六人，阳性五十七人，感染率百分之二十六点四。估计全国丝虫病流行的省、区都有回升的趋势，直接影响备战和农副业生产的发展，严重危害贫下中农的健康。

防治丝虫病目前存在的问题：一是查血诊断需要在夜晚进行，很不方便群众，也容易遗漏。二是治疗药物海群生过敏反应很大，群众不易接受。三是晚期的和有淋巴管发炎的丝虫病患者，尚没有彻底的治疗方法。四是消灭蚊子的工作做得很差。

各地的先进经验证明：只要领导重视，全面规划，充分发动群众，实行领导、专业防治人员与群众相结合，大力消灭蚊子及其孳生场所；在较大的范围内经过三年左右的反复查治，力争尽早地把阳性率降低到人口的百分之一以下，有效地控制和消灭丝虫病的传染源，就能够在几年内达到基本消灭丝虫病的目的。以后每隔五年再普查一次，就可以巩固防治成果。例如，武汉市郊区经过三、四年，四、五次的复查普治，一九五九年的阳性率降至百分之一以下，十一年未再进行查治，这次抽查了一个大队和另几个小队，在一千四百二十人的血检中，阳性的只有六人，也没有发生新的病人。

（二）

钩端螺旋体病是自然疫源性急性传染病。通过水传染给病人。流行几乎遍及世界各地，东南亚一带最为严重。解放前除北京和广州有少数病例报告外，尚不知我国有本病存在。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和广大革命卫生工作人员，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线，对本病做了大量调查和防治工作，摸清了一些情况。现已证实我国有二十三、四个省、市、自治区都有程度不同的流行。这次调查的四省都有本病流行，对备战、生产建设和人民健康危害很大，如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五年驻景洪部队在泅渡澜沧江后，发病五百余人，发病率达百分之八。部分战士患本病后因有神经系统和视力障碍等后遗症，不得不离开部队。云南省景洪农场曼青分场在一九六九年八月一次洪水后，全场一千二百七十名职工，发病七百九十四人，占百分之六十二。湖北省黄岗县长江公社等一九六六年双抢时期发病二百八十三人，死亡十一名。

防治钩端螺旋体病目前存在的问题：它的病原的菌型很多，国内已有一百多型，我国已发现三十九型。仅云南一省就已经发现了三十四型，广东已发现二十多型。福建已证实有十个型。这种复杂情况，对制造和利用疫苗进行预防，极为不便。目前我国生产的五个菌型多价疫苗，只能对疫苗的菌型相符的才有效，否则无效。保存本病病菌的鼠类等野生动物，种类多，分布广，自然疫源地遍及沼泽、山区、河流两岸和农田四周，在流行区内的多种家畜，也是本病的带菌和传播者，这对改造疫源地，通过消灭疫源达到控制与消灭本病带来不少困难。本病的症状因有黄胆出血型、肺出血型、脑型、肾型、流感伤寒型等多种，广大农村基层医务人员还不很熟悉各型的病程规律，临床早期诊断的简便方法尚未解决，容易误诊为感冒、疟疾、伤寒、肝炎等疾病，往往因此而造成不必要的死亡。

这次调查的四省，特别是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在掌握本病的流行规律，总结有效的防治措施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现已基本掌握的有：对人民健康发生直接威胁的保菌和带菌动物，最主要是野鼠和猪；自然疫源地最主要的是沼泽地带和山垄田；流行因素最主要的是水，主要流行方式有稻田型和洪水型；流行高峰季节一般在夏秋季，春耕大忙时也有感染的可能；最主要的感染机会是开发湖沼地和在常年蓄水的澜泥田里劳动，以及在被猪尿染的水中活动和抢防山洪等；外地来的人比本地人更易感染。

各地创造了一些结合生产、行之有效的防治措施。如加强领导，采取综合措

施，积极防治，因地制宜对易感染人群进行预防注射；结合农田水利建设开垦沼泽地，修筑排灌渠，改造疫源地，这是控制与消灭传染源的关键措施；结合提高产量，改造山垄田、澜泥田，开展灭鼠保粮运动；结合积肥，圈猪积肥，加强粪管，改善环境卫生，减少和消灭猪尿引起的传染机会；结合施农药和施肥，用石灰、草木灰、土农药等改变水质，消灭病原体等。此外，建立卫生制度，加强个人防护，避免接触疫水等办法，也有一定效果。在治疗方面，实践证明：普及诊断治疗知识，做到早期确诊，适当治疗，就可以提高疗效，避免死亡。黄连解毒汤等中草药和青霉素对本病的疗效较好。

这些经验说明，钩端螺旋体病是完全可以加以控制并达到基本消灭的。

(三)

目前，广大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情很高，抓革命促生产形势大好。卫生战线的斗、批、改日益深入，广大农村基层卫生人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空前提高；“赤脚医生”队伍在茁壮成长；合作医疗制度逐渐巩固和发展；新医疗法和草医草药的推广，西医学中医，中西结合，出现了不少新苗头；城市卫生人员大批到农村安家落户，加强了防治工作第一线，等等。大好的革命形势，对这两种疾病的防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为了胜利的开展丝虫病和钩端螺旋体病的防治工作，建议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加强领导，全面规划，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

一、狠抓根本，促进防治战线的思想革命化。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办好学习班、讲用会，牢固地树立毛主席所教导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狠批大叛徒刘少奇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肃清其“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专家路线”、“重治轻防”等流毒。加强思想教育，克服有些干部对钩端螺旋体病和丝虫病的危害认识不足，因而对防治工作不重视的倾向。

二、由各级血防领导小组，加强领导。在那些没有血防任务的省、专区、县，而有丝虫病和钩端螺旋体病的流行的地区，建议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建议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加强对北方有关钩端螺旋体病流行省、市、区的防治工作的领导。各地防疫队伍建议在斗、批、改的基础上整顿或重建，要形成一支精干的非常无产阶级化的防疫队伍。

三、组织力量进一步摸清规律。有这两种疾病的省、市、自治区，建议组织

本省的力量，摸清情况，进行研究，创造消灭的经验。钩端螺旋体病的防治工作，建议军委后字二三六部队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寄生虫病研究所、药物研究所等，应组织协作，深入到重点流行地区，结合地方力量，深入基层，配合防治工作，抓好典型，进行调查研究，摸清各种规律，创造更好的防治方法，为消灭这两种疾病作出更大贡献。

四、总结经验，制订防治规划。建议各省、市、自治区在抓好典型摸清情况的基础上，拟定长远规划。并大力开展中草药的研究工作，打好这场人民战争。

以上报告，是否有当，要否批转有关部门，均请指示。

中共中央南方十三省、市、区血防领导小组卫生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七〇年五月一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请示报告的批示

1970.06.27；中发〔1970〕46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军委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各大军区、省军区，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军管会，军代表：

中央同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请示报告，现发给你们，供参考，各地在安排招生工作时，可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办理。

中共中央（此件发至省、军级）

一九七〇年三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斗、批、改中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清理了阶级队伍；进行了整党建党工作；开展教育革命，贯彻执行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创办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

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经过三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特别是“七·二七”以后，在宣传队的带领下，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活学活用毛泽东

思想，深入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与工农兵相结合，接受再教育，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年来，通过教育革命的实践，初步积累了有关招生、课程设置、教材改革、教学方法以及建立“三结合”教师队伍等方面的经验，建立了部分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基地。目前已具备了招生条件。

为了进一步贯彻无产阶级教育路线，遵照毛主席关于“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习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伟大教导，我们计划于今年上半年开始招生，两校共招生四千一百名。

具体意见附后。

当否，请批示。

首都工人、解放军驻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委员会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七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

一、培养目标

遵照毛主席“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道德的劳动者”的教导，培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有文化和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

二、学制

根据各专业具体要求分别二至三年。

另有一年左右的进修班。

三、学习内容

遵照毛主席“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教导，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

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文、理、工各科都要参加生产劳动。

四、招生时间和名额

北京大学上半年二十六个专业招收两千名学生，清华大学上半年三十七个专业，招收两千一百名学生。

五、学生条件

(1) 政治思想好。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特别是在近四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密切联系群众，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既反对忽视成分，又要反对唯成分论，要重在表现。

(2) 有实践经验。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一般只招收未婚者）。还要招收一些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他们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理工科学员原则上专业对口。

从农村中招生，应注意招收那些有三年以上劳动锻炼，表现较好，受贫下中农欢迎并为群众所推荐的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

(3) 身体健康。

六、招生的办法和地区。

招生的办法：废除修正主义的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招生地区：北京、上海、天津、东北、广东、江西等地区和中央有关所属厂矿、解放军部队。

七、学生待遇

学校要发扬无产阶级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来自工厂的学生，学习期间每月由学校发给十九点五元的伙食费和津贴费。其中十年以上工龄的老工人工资由原单位照发，但要扣除学校发的十九点五元。

来自农村的学生每月由学校发给十九点五元的伙食费和津贴费。

解放军学生由部队负责供给，供给关系由部队转到总后勤部，由学校统一领取。

学生家庭生活困难者，仍由原单位根据具体情况适当予以解决。

八、分配原则：

学生学习期满后，原则上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也要有一部分根据国家需要统一分配。

附：一、北大、清华招生各系名额分类表。

二、修改招生（试点）具体意见的说明。

北大招生各系名额分类表

系别 人数

中文 250

哲学 240

历史 220

政治经济 160

国际政治 130

物理 150

化学 190

地球物理 100

生物 320

无线电 70

数学力学 170

清华招生各系名额分类表

系别 人数

冶金 360

工程物理 200

工程化学 130

数学力学 110

水力 110

土建 220

无线电 240
 自动控制 130
 电机 220
 机械 150
 动力机械 230

关于修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的说明

根据国务院指示精神，我们对理工科大学招生的一些具体问题请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和驻清华大学宣传队，到北京市的几个工厂分别作了一些调查，召开了工人座谈会，对招生条件、待遇、学制等，征求了工人的意见。

工人在座谈讨论时极为热烈，他们对招生工人入大学高兴了，有的激动得流下了热泪，表示了强烈要求入大学的欲望。北京冶金试验厂老工人吴师傅说：“工人进大学没有不高兴的，工资减一些也可以，生活困难一些没有什么了不起。”北京化工五厂工人张金年说：“上大学一定让我去，什么都不给，我也愿意。”北京新华印刷厂一九六四年进厂的三百多人，一九六五年进厂一百多人，一九六九年进厂的三百多人，他们中多数都很愿意上大学。

一、对招生条件和待遇问题。他们认为招收青年工人和下乡知识青年（包括回乡知识青年）的条件和待遇，不要规定两样，以免加深城乡差距，都应该是工厂或农村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和劳动锻炼的，在待遇上都一律每月发给十九点五元生活费。如北京无线电仪器厂的同志反映说：“从工厂、农村招来的学生，一律发给生活费是合理的”。“入厂五年的青年工人，上学发给生活费完全可以，多数没有结婚，家庭负担并不重。”新华印刷厂老工人反映说：“六四年、六五年进厂的青年工人，现在生活很富裕，工资自己用不完，上学给十九点五元问题不大。”认为这样有利于工农联盟。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

二、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教导，我们拟招收一部分老工人带工资入大学学习。五年前后入厂的工人，现在是生产上的骨干力量，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文化水平大体上相当中初中程度，年龄在三十岁左右，通过学习提高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但是他（她）们都已经结婚，家庭负担较重，带工资学习，群众不会有什幺意见。

对这样的老工人，有的可以上普通班，有的可以上进修班。老工人和工厂干部对进修班特别欢迎，他们认为进修班应当着重提高老工人的设计能力（画图，绘图等）和技术理论水平。要专业对口，针对性强，紧密结合技术革新和科研进行，围绕着所搞的专业或专题，学习有关的基本理论。学的东西要比普通班窄一些，专一些，采取缺什么就补什么的办法。在进修班时间上一般不要太长，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

三、调查了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和北京起重机厂，有五年左右工龄的工人青年的年龄和结婚情况。

(一) 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共招收青年工人二百二十七人（男一百二十人，女一百零七人）其中二十五岁以下的一百九十二人，二十五岁以上的三十五人，未结婚的一百八十二人，已结婚的四十五人)。

(二) 北京起重机厂，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共招收青年工人一百五十六人，(男六十七人，女八十九人) 其中二十五岁以下的一百零四人，二十五岁以上的五十二人，未结婚的一百四十六人，已结婚的十人。

从这个调查情况来看，如果十六、七岁入工厂，做七、八年工，还超不过二十五岁，而且结婚的是少数。因而在城市工厂招生规定有实践经验三年以上和一般只招收未婚青年，是不会影响招生的。

根据以上的调查情况，我们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作了一些修改：

(一) 将第二条学制中“一年之内的短期训练班”改为“一年左右的进修班”。

(二) 将第五条学生条件第二项“有实践经验二年以上”改为“三年以上”并加上了“一般只招未婚者”。

(三) 将第七条学生待遇中“来自工厂的学生学习期间工资由原单位发”改为“来自工厂的学生学习期间每月由学校发给十九点五元的伙食费和津贴费。其中十年以上工龄的工人工资由原单位照发，但需扣除学校发给的十九点五元。”

关于学生毕业后的待遇问题，我们倾向不再实行现行的统一工资标准的办法，工厂、农村、老工人，青年工人可以有所不同，因为还不成熟，没有写入。

对医科、农科、外语招生条件拟另作考虑。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日

发共印一八二七份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〇年五月，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蓬勃开展。一年多来，工人阶级领导全校革命师生员工，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遵循毛主席光辉的教育革命思想，以《五·七指示》为纲，“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正在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

毛主席教导我们：“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创建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根本保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在文化教育领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一场深刻的政治革命。从“七·二七”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改造谁、谁战胜谁的斗争一直激烈地进行着。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正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不断加强和巩固起来的。

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工人阶级在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进入教育阵地，就是要落实毛主席关于“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伟大指示，用毛泽东思想把学校占领下来，改造过来。

工人阶级占领学校，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实现对知识分子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领导，否则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就不可能巩固，甚至有得而复失的危险。遵照毛主席关于“不破不立”的伟大教导，我们深入持久地开展了革命大批判，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右的和极“左”的资产阶级反动思

潮，批判封、资、修的教育制度和各个学术领域中的修正主义思想，批判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总是经常利用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影响，利用知识分子世界观上的弱点，散布毒素，妄图夺回他们丧失了的“世袭领地”，同无产阶级争夺知识分子。他们有的公开叫嚣：“工人阶级领导不了尖端科学”，有的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歪曲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散布什么“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就是让知识分子靠边站”，妄图把知识分子推到工人阶级的对立面，进行反夺权。我们放手发动群众，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坚决揭露和批判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和动摇工人阶级领导的罪行，粉碎了他们的复辟阴谋。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经常地、大量地表现为同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斗争。随着教育革命的深入，一些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断地以新的形式暴露出来；有的说什么“政治上你把关，业务上我领导”；也有的认为接受再教育差不多了，让自己在业务上发挥作用，就是工人阶级“让权”了；搞教改、讲业务自己是“内行”，工人阶级可以“让位”了；还有的认为，发挥原有教师的作用就是恢复旧制度。所有这些右的和形“左”实右的错误思想，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顽强表现，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如果不彻底批判，陈旧的东西就会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就会大权旁落，教育革命就会走上改良主义的邪路。实践说明：击破旧的习惯势力，比粉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还要困难得多。

反动的精神堡垒只能靠革命的精神武器去摧毁。只有把一小撮阶级敌人和旧的习惯势力彻底批臭，肃清流毒，才能真正把它们打倒，从根本上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因此，革命大批判是创办社会主义大学的战略任务，是教育革命的一门主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长期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武器。

工人阶级要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地实行群众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充分发扬无产阶级民主，造成人们敢于批评、敢于争论的空气。必须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大胆信用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样才能确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否则，就是自己孤立自己，使工人阶级的领导架空。教育革命同其他一切革命工作一样，“如果没有

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是包办一切，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压倒一切，使知识分子处于“推一推，动一动”的地位。依靠广大革命的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不是削弱工人阶级的领导，恰恰是加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

工人阶级要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做思想革命化的带头人。这就要求我们切实做到：对毛主席的指示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坚决照办，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宣传队员要向再教育对象学习，虚心做群众的小学生，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掌握文化教育领域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规律；要艰苦奋斗，经常参加劳动，联系群众，拒腐蚀，永不沾；要深入实际，搞好调查研究，抓好典型，面上的工作先抓好三分之一，认真总结经验；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错了就改，改正错误，就是忠于毛主席，就是继续革命。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能担负起领导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保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沿着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道路胜利前进。

对原有教师坚持边改造、边使用，建立三结合的教师队伍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是彻底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创建社会主义大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工农兵教员是教师队伍中一支最有生气的革命力量。他们敢于创新，破除迷信，富有批判能力。同时把社会生产的先进经验和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也带进学校中来，密切了厂校挂钩。他们讲的课，学员反映：学了就能懂，懂了就能用。一年来，我们在三大革命第一线选拔了一批工农兵做专职、兼职教员，使他们在斗争中成长，在实践中提高。他们参加教学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有力地保证了教学的正确的政治方向，促进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推动了教学改革。工农兵登上大学讲台，是在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中出现的新事物。极少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采取“走着瞧”、“看笑话”的态度，有的企图把封、资、修的一套塞给工农兵教员，搞什么“我装药，你放炮”。对此，我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事实上，工农兵最懂无产阶级教育，过去，旧大学

把工农兵排斥在外，是历史的颠倒。今天，工农兵登上社会主义大学讲台，是历史的必然。

原有教师是三结合教师队伍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毛主席指出：“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又指出，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教师队伍也是这样，混入教师队伍的坏人，反革命分子，带着花岗岩头脑的人，只是极少数。因此，对于广大教师，既要看到他们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艰巨的，又要看到他们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广大教师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特别是“七·二七”以来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有了提高，要充分估计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对他们的专业知识也要“一分为二”，既要看到旧体系必须破除，又要看到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同生产实践相结合，有些自然科学的专业知识和过去积累的经验是能够发挥作用的。而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充分发挥一切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知识分子的才智，开辟了最广阔的天地。要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只要抓紧政治上的再教育，业务上的再学习，原有教师的大多数就能继续任教，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事业作出贡献。对极少数实在不行的，也要给予出路，进行教育，安排适当工作，继续考察。

为了帮助教师尽快适应社会主义大学的需要，必须坚持在使用中对他们团结、教育、改造。那种“改造好了再用”的说法，实际上既没有看到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也没有看到知识分子改造的长期性。我们遵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光辉著作中，关于“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的教导，着重解决教师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针对他们过去长期“三脱离”的弱点，组织广大教师到三大革命实践中去经受锻炼，参加创办试验农场，对口下厂，轮换劳动，进行教改实践，在条件比较艰苦的环境下改造思想。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往往在对业务知识的看法上反映出来，必须彻底改造各个业务领域。教师参加三大革命斗争实践，必然深刻地触及他们中间一些人灵魂深处根深蒂固的知识私有、理论至上、洋奴爬行、个人名利等旧思想，这有利于加速他们的思想改造。

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彻底转变是不能自发完成的。环境的变化只是为他们的改造创造了条件，还必须本着抓紧、抓严、抓细的原则，针对活思想，进行再教育，用他们中的先进典型教育他们自己，启发他们自觉革命。对他们思想上的动摇和反复，因势利导，做耐心的认真的思想政治工作，狠抓世界观的改造。对他们的错误思想，进行说理的、恰如其分的批评，加以纠正。

“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为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有效地调动广大教师的革命积极性，鼓励他们发扬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敢想、敢说、敢做、敢闯的革命精神，勇于进行教育革命实践，我们在工作中注意掌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把积极参加教育革命，但思想还有旧框框，暴露出一些“三脱离”的问题，与坚持走老路区别开来。

二、把真心实意与工农兵结合，但在教改的某些具体问题上和工人同志有不同意见，与拒绝接受再教育，抵制工人阶级领导区别开来。结合，但在教改的某些具体问题上和工人同志有不同意见，与拒绝接受再教育，抵制工人阶级领导区别开来。

三、把带着教育革命和技术革新问题，积极钻研业务，查阅有关国内外的书本、资料，与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理论至上，崇洋复旧区别开来。

四、把为了改变落后面貌和填补空白，有分析有鉴别地向国内外学习我们所不懂的和没有的东西，同洋奴、爬行思想区别开来。

即使有少数人拒绝接受再教育、坚持走老路，也不用着急，阶级斗争是长期的，这样的人总会有的，对他们那些旧思想，在教育革命中进一步深入批判，抓紧教育、改造就是了。

五、对那些政治历史问题审查清了的人，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和现实表现，吸收他们参加教育革命，在使用中进行教育和改造。

六、对于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人，就要严格按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经过群众批判后，有所转变，就要不断引导他们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封、资、修的学术思想，促使他们自觉革命。同时，还要注意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七、在教学改革中，对于自然科学上某些具体问题是“非”，“应当保持慎重

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要尊重客观规律，通过实践去解决。

通过教育革命实践，广大教师的精神面貌进一步发生了变化：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已经成为许多人的自觉要求，他们满腔热情地为工农兵服务，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工农兵反映：“这些知识分子，过去与我们心隔心，谈不拢，现在是心贴心，谈得亲。”广大教师深刻体会到，再教育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关怀，决心一辈子做工农兵的小学生，永远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

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老教师也有很大进步，不少人在教育革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一个教授，对他过去编的一套在国内传播很广的教材，认为无需改革，“从货架子上拿下来掸掸土就能用”。我们让他参加教育革命分队，针对他在给工人讲课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引导他和群众一起批判封、资、修教育体系，对他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他逐步认识到：“我那套理论至上、故弄玄虚的旧教材不符合工农兵的需要，掸掸土不行，即使改头换面也不行，必须彻底改革。”后来，他与其他革命师生同工人结合，在解决工厂一项重要技术问题的过程中，向工人学习，提高了觉悟，做出了成绩，受到工人的表扬。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革命知识分子是重要的革命力量。现在，一支按照无产阶级面貌建立起来的三结合教师队伍正在成长。

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

建立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新体制，决不是简单的组织变动，而是全面贯彻执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一场革命。

学校要不要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开门办学，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方向的原则问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公开反对学生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鼓吹“清华园是工程师的摇篮”，“实验室里就可以培养三大革命运动的战士”，使得许多师生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田，身体也搞坏了。学校越办越修，学生越学越蠢。宣传队引导广大师生深刻批判这条修正主义办学路线，带领他们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指示》的道路，创办试验农场，到工厂、工地、农村、部队去，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广泛接触社会实际。通过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采取脱产、半脱产或业余形式，举办工人

大学班、短期培训班，进行技术革新、科学研究、社会调查等多种途径，开展教育革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它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没有广大群众参加，没有各单位各级领导的支持是决然搞不好的。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把大学办到整个社会上去，使文化的普及与提高有力地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学校与世隔绝，闭目塞听的“三脱离”状况，使学校与社会声息相通，使知识分子更广泛地接触工农兵群众，身临目睹，接受再教育，加速了世界观的改造。师生们深有感触地说：“过去闭门读书，工程师的摇篮，摇得我们晕头转向；现在开门办学，三大革命的熔炉，炼得我们心红眼亮。”社会生产中的新技术、新创造，不断充实、更新教学内容，使学校教育获得了强大生命力；而学校的教学、科研成果又直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推动社会生产向前发展。厂校挂钩为教育革命开拓了广阔的新天地，一定要长期坚持下去。

“学校办工厂”是毛主席的伟大英明决策。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一切高等工业学校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的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这是学校办工厂的指导思想。在办厂的过程中，充满着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我们批判了贪大求洋、向国家伸手的资产阶级大少爷作风，批判了把生产与教学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就是一切”的错误思想。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方针，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以学为主”，把培养人放在首位。我们根据社会主义建设和教学需要，考虑各专业相互促进和发展，充分利用现有设备条件，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先后办起能带动多种专业的中小型工厂：精密机床厂、电子综合试验厂、汽车制造厂等，承担国家一些科研、生产任务。如电子综合试验厂就是在原有实验室设备的基础上，利旧创新办起来的，它带动了自动控制、无线电技术、电子计算机等专业，生产多种电子工业产品。校办厂在订生产计划时要考虑教学需要，留有充分余地。选择的产品，具有先进性、多样性、典型性，既是工业、国防急需的，又要能满足专业教学要求；既有一定的批量生产，又大力进行研究试制，不断采用新技术。

根据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以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我们从校办工厂，厂校挂钩着手，改造旧的学校体制，打破过去系的界限，或者合并，或者增设，都按科研生产实践的联系，把有关专业纳入校办工厂、科研单位和厂校挂

钩系统，实行厂带专业。同时，建设一支新型的基础理论队伍。新体制的基层单位是由工人、学员、教师组成的专业队。校办工厂实行一元化领导，统筹安排教学、科研、生产。这样就把过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三脱离”的单纯教学单位，变成了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教学基地。如压力加工专业的师生，在汽车厂锻压车间参加劳动，结合生产汽车上的各种锻件，学习“锻造工艺”等课程，既掌握了生产技能，又学到了科学理论。这样做的好处是：工人参加到各个教学环节，加强了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教师既进行教学，又参加生产，有利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学员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保证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科学实验是理工科大学必须担负起的重要任务。在办工厂的同时，我们加强了实验室的改造和建设。校办工厂与实验室同社会紧密结合起来，使学校成为培养学员科学实验能力，大力开展科学研究，突破尖端技术，创造新工艺、新产品，探讨新理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基地。

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我校多数专业以校办工厂为主要基地；部分专业以厂校挂钩为主；有的专业主要利用实验室，结合科研进行教学。校办工厂和实验室并不能代替厂校挂钩，所有专业，都要把这三种形式紧密结合起来，尤其要面向社会，实行厂校挂钩。

一年多来，通过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培养了一批工人阶级的技术人材，完成了一批技术革新和科研项目，还为国家试制和生产了一些工业、国防急需的产品。

培养工农兵学员，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培养造就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任务。遵照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教导，从去年三月起，我们先后招收了近六百名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举办了各种专业的试点班，对选拔和培养工农兵学员进行了初步实践。今年计划招收二千五百名学员，目前已招八百多名。

工农兵学员一走进学校，就提出了“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响亮口号，积极投入教育革命大会战，同学校的教职员一起创建教学、

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基地，还同教师一起制定教学方案，编写新教材，大大促进了教育革命。对于这样一支崭新的革命力量，怎样把他们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我们遇到的一个新课题。

对工农兵学员是否坚持把政治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中心，是执行不执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问题。试点班开始，有人认为：“工农兵学员政治觉悟高，学校用不着再转变学员的思想”；有的教师觉得“自己是再教育对象，没资格转变学员的思想”，因此，个别人想“只讲数理化，不管革命化”。有的学员由于“自来红”的思想也有“进校学业务，政治回去补”的错误观点。我们组织大家深入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伟大教导，结合文化教育阵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狠抓世界观的改造，使大家认识到：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是绝不会停止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工农兵的队伍中来。“读书做官”、“理论至上”、单纯业务观点等资产阶级思想余毒，随时在侵袭工农兵学员，这个问题对于青年学员更为突出。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放松了政治思想教育，工农兵学员也有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危险。学校的每一项工作，每一堂课，不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学生，就是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学生，“教书不教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教业务，不管政治，必然引导学员走向资产阶级道路。原有教师不仅要努力改造思想，转变自己的立场、感情，同时还要努力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教学工作，大胆承担起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任务。他们说：“我们参加转变学生思想的工作，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对自己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提出的更高、更严的要求。”

我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用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个条件要求学员，向他们灌输毛泽东思想，把不断提高学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作为学校的首要任务。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指示，坚持学习解放军，经常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斗私批修，批判资产阶级。这样，工农兵学员虽然大部分时间参加业务教学活动，却始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继续革命的觉悟不断提高，“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做到环境变了，普通

劳动者的本色不变；理论水平提高了，联系实际的作风不变；工作能力提高了，谦虚谨慎的精神不变。

为了培养有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劳动者，理工科大学在业务上必须使工农兵学员能够解决当前生产实际问题，能够担任设计、科研任务，适应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倾向，坚持理论和实践统一，培养学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工农兵学员在学校应该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这是因为“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实践论》）。否定理论学习的观点是错误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实践论》）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要为实践服务。因此，学校的教学不能脱离实践。工农兵学员的实践经验并不能完全代替教学的实践基础，还必须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在一些试点班里，我们纠正了那种认为“工农兵学员有实践经验，就可以单纯学理论”的错误思想，使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始终紧密结合实践，并在实践中运用理论，使教学效果直接受到实践的检验，使学员不仅能够认识世界，而且能够“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实践论》）。如一个专题短期培训班，学员结合某种先进通讯机的研制，学习“电子技术”和“通讯技术”课程。仅用了半年，就使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学员，初步掌握了基本理论，并和原有师生一起运用所学知识，制造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通讯设备。这是过去“出中学门，进大学门”的学生远远不能比拟的。实践证明，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教学方针，要反对“左”的和右的倾向，才能真正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从三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一般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文化程度相当于初、高中水平的工人、农民（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是理工科大学主要招生对象。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和贫下中农入学，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理工科大学除去在校内外办学制为二至三年的普通班和一年左右的进修班外，还采取多种形式开办校内外的科学实验班、业余大学班以及专题短期培训班，担负从工人中培养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研究人员的任务和一些普及工作，把高等教育从原有的大学里解放出来。

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

教材改革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它是关系到培养一代新人的重大问题。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是理工科教材旧体系的要害，它浸透在教材的字里行间，至今仍然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是彻底改革教材的关键。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民主主义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理工科教科书，虽然讲的是自然科学内容，但都是为了适应它们的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科学技术发展所作的总结，打着深刻的剥削阶级烙印。刘少奇一伙狂热鼓吹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把这一套照搬到中国来，让外国资产阶级通过这样的旧教材继续专中国人民的政。例如，一套电子学旧教材，它所标榜的“严密”的学科体系，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电子技术发展过程的缩影。但这本书却把它说成是万古不变的绝对真理，谁要发展电子工业，掌握电子技术，就只能按这条老路一步一步地爬行，这充分暴露了旧教材的奴役性和落后性。旧教材颠倒历史，窃取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鼓吹“专家至上”，为资产阶级垄断科学技术服务；它宣扬“理论至上”，把教育当营业，故弄玄虚，抬高价格，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服务；它宣扬“物质技术条件决定论”，否定人的因素第一，压制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这样的旧教材，严重毒害了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与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教材一定要彻底改革，决不能走修修补补、改良主义的道路。

教材改革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必须狠抓教师立场、感情的转变，使他们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解决“为谁写书”和“怎样写书”的问题。宣传队带领广大师生到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去，组成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教师相结合的教材编写组，开展革命大批判，把编写教材的过程，作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对知识分子深入进行再教育的过程。大家认识到：原封不动地维护理工科教材的旧体系就是洋奴思想的表现，脱离劳动人民就必然要崇洋媚外，不改造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就一定会跟在洋人后面爬行。毛主席早就指出：“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在科学技术上，我国也已经创造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望

尘莫及的奇迹。自觉认识和充分发挥这些优越性，就使我们的教材改革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打开了新局面。

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编写新教材最根本的思想武器。工农兵的需要，是我们编写新教材的出发点。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是我们编写新教材的源泉。

“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这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要求我们既要有革命精神，又要以科学态度，努力做到政治统帅业务，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析、深刻地阐明自然科学规律，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和少而精的原则，使教材具有革命性、实践性和先进性。

对现有旧教材和外国的科学技术成就，我们坚持了批判地继承的原则，执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对旧教材总的体系，着重批判它在什么路线指导下，为哪个阶级服务，贯穿着什么样的世界观，而不是简单地否定自然科学的具体内容。有用的部分，也不是简单地拿来就用，而是用批判的态度进行审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继承其科学内容。被资产阶级专家吹嘘为“千锤百炼，天衣无缝”的《高等数学》，我们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批判它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公理化”体系，吸收那些有用的定理和公式。例如，我们从生产实践出发，以微分和积分这对矛盾的斗争、发展和转化为线索，组成新体系，编出《微积分》新教材。过去，微积分概念是从一大堆公理、定理中推导出来的，玄而又玄，深奥莫测。现在则从生产中常见的实例引出概念。例如，钳工用锉刀锉圆形工件，每锉一下是一小段直线，最后整体锉成了曲线，这种化整为零、又积零为整的过程，就包含了生动的微积分概念。工人学员学了说：“微积分并不神秘，一把大锉捅破了窗户纸，高等数学又回到了我们劳动人民的手里。”

改革教材还必须立足我国实际，满腔热忱地用心总结工农兵的发明创造，提出新课题，进行新概括。过去，中外的农田水利教材，都把山洪说成有百害而无一利。张家口地区贫下中农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战天斗地，对山洪一分为二，创造了引山洪淤灌农田，变洪害为洪利的宝贵经验。教育革命分队的革命师生亲身参加这一斗争实践，和贫下中农一起编出《引洪淤灌》新教材。贫下中农说：“从这本书学到了征服洪水的办法，学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辩证法。长劳动

人民的志气，灭资产阶级的威风。”

教材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能一劳永逸，必须在实践中边教边改，不断总结，不断充实，不断提高，不断更新，紧紧跟上和积极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飞跃发展。

结合生产、科研任务，坚持群众路线，实行新的教学方法

毛主席教导我们：“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教学方法绝不只是具体的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按照哪个阶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组织教学过程的原则问题。资产阶级的教学方法，以书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理论脱离实际，“上课满堂灌，学生跟着转”，完全颠倒了人们认识真理的规律，只能培养出“三脱离”的书呆子。教改试点刚开始，由于没有破除旧教学方法，有的教师上课“本本不离手，公式不离口，理论一大套，实际不对号”，尽管他们备课很用心，讲课很热心，辅导很耐心，工人学员仍然不称心。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不彻底改革旧的教学方法，学校要完成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任务，还是一句空话。

遵循毛主席关于“理论和实际统一”、“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教导，根据工农兵学员的特点，我们实行了结合生产、科研任务中的典型工程、典型产品、典型工艺、技术革新等，进行有步骤的由浅入深的教学方法，正确处理突出重点、急用先学、边干边学与系统教学的关系，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

边干边学与系统教学结合起来，就打破了过去从理论到理论、烦琐庞杂的教学体系，同时又适应了自然科学的系统性和连贯性的特点。我们把整个教学过程按照完成不同类型的几个典型任务划分阶段，本着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原则，把理论课程有计划地安排在各个阶段内，进行系统学习。根据不同情况，采用“穿插学”和“集中学”等灵活机动的方式。某一时期以完成生产、科研任务为主，有计划地边学边干，典型深入，举一反三；某一时期以理论教学为主，在丰富的感性认识基础上，提高理论水平，密切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必要的考核。注意加强自学和培养科学研究的能力，重视在理论指导下的再实践。

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的目的，是通过解剖麻雀，掌握一般规律。事实上每

一个典型任务，总是既有其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因此，我们一方面注意使典型选得恰当，另一方面注意在解剖麻雀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提高，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从实践提高到理论。根据教改实践经验，我们认为应当力求按照以下原则选择典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面向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体现当前我国科研生产中的关键和技术发展方向；能带动专业教学的主要内容，能够说明一般规律；符合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通过完成由简单到复杂的几个典型任务，达到专业的培养要求。

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打破了过去把基础课与专业课截然分开的界限。基础课要紧密结合实际，加强针对性。有的可以和专业课一起，按照需要组成新的课程。对那些后续课程用得较多，前面不学后面就不懂的基础课，还要单独设课。

实行这种有步骤地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的方法，是解决生产的综合性与教学的分科性、典型任务的局限性与教学要求的全面性之间的矛盾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它把读书和使用结合起来，把实践和创造结合起来，把点和面结合起来，把学文和学工结合起来，做到了少而精，大大精减了课程，缩短了学制。

实行新的教学方法，必须坚持教学上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他的作用在于启发学生自己去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和实践的能力，因此，教员必须向学生进行学习和调查。工农兵学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高，有敏锐的批判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一经同教学实践接触，便一眼看出封、资、修的余毒和右倾保守、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他们对学校同社会有着深刻的比较。在比较和鉴别中有力地批判了长期盘踞在文化教育阵地上的洋奴爬行思想。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大力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活动，能者为师，互教互学。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讲课方法，充分发挥了工农兵学员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建立了新型的师生关系。一个试点班在结合某项设备的设计讲“公差配合”课时，教师讲了基本原理后，工人学员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课堂顿时活跃起来，当过车工的学员分析了材料和加工条件对公差的影响；当过钳工的学员提出了装配条件对公差的要求，讨论得十分热烈。课堂上不仅讨论清楚了原理，而且对设计方案提出许多改进意见，充分显示了新教学方法的优越性。

*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创造人类历史上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伟大任务，已经光荣地落在中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肩上。教育革命是一场硬仗。“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我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加强党的领导，坚决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附件二：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上海召开了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各单位同志，有同济大学“五·七”公社、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机械学院、上海工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华东化工学院、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有关负责人和教师、学生，共十九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马天水以及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朱永嘉等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 * *

姚文元：我们今天开一个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的座谈会，谈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问题是，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了一份关于教育革命的总结，这份材料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他们实践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思想的一些经验，提出了若干政策性的问题，它的中心是如何“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办好社会主义的理工科大学。现在这份材料还没有最后定稿，请大家看一看，提一些意见。大家看了有什么感想？有些什么意见？还有些什么要修改的地方？这是今天主要要谈的一个内容。

另外一个问题，请今天到会的理工科大学从事教育革命的同志，以及上海机床厂的同志，谈谈你们如何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毛主席提出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以后，在自己的教育革命实践中，有些什么经验、体会和需要提出来讨论研究的问题。

大家看得很清楚，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斗、批、改（这方面的工

作还没有完成，要继续做），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正在气势磅礴地兴起。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调动了广大工农群众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又反过来推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特别是推动文化领域的革命，包括教育方面的革命。这方面很重要的就是理工科大学的革命。现在已经可以看出这种趋势的苗头。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就特别总结了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对办理工科大学作了专门的指示，快两年了，这个问题，现在实践得究竟怎么样？希望大家联系这份材料，发表自己的意见。

参加今天会的，有同济大学“五·七”公社的同志，也有复旦、交大等大学的同志，上海机床厂的同志也来了，王曾荣同志原是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六届毕业生，六八年到机床厂的。好，谁先谈？

郑世谊（同济“五·七”公社党总支书记）：看了清华大学这份材料，感到总结得很全面，对我们教育很大，许多方面对我们有启发。现在把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我们做的一些工作，来谈一谈。

关于教师队伍改造的问题，清华大学的材料提出边改造边使用。这个问题，我们也有些体会。我们感到教师在使用中改造较好，这样容易发现他们的问题，容易提高他们。譬如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办了一个房屋建筑专业的工农班，配了一个副教授，开始觉得对他的思想批判得差不多了，让他同我们一道到建筑工地去，表现也不错。但是一讲课，又把旧的一套拿出来了，上课走老路，讲设计还是从怎么削铅笔、用橡皮讲起，我们就批判他这一套。他说这些内容我已经删掉了好多。大家批评他该讲的地方没有讲，不该讲的地方讲了，搞繁琐哲学，浪费时间。经过几次帮助，这个副教授有了很大的提高，譬如在那个工地上，造房子缺少砖头，他和群众一道，想出了很多的办法，就地取材，用卵砾石砌成围墙。只要再用一点木材，加些水泥，就可以做成屋梁了。

张春桥：你们那里现在有多少教师？你们最初不是不大想用老教师吗？

郭培昌（同济“五·七”公社教师、党总支委员）：现在我们那里去了一批教师，连政治教师在内共四十五人。我们最近办了一个教师学习班，研究今后的教学规划问题，一讨论问题，教师的旧思想就反映出来了。

郑世谊：只要讨论具体问题，讨论教材，讨论教学规划，他们就会暴露问题。工农班同志认为接触实际才能学得进，有些老教师虽然也倾向于理论联系实际，但他们一订教学规划，就提出第一年学基础知识，第二年才能搞设计，说先学理论知识才能设计。我们把学生请来了，他们一致认为第一年就必须联系实际，才能真正学到东西。有的学生已经在搞设计了，有一个老教师不信，他个别测验工农班的学生，要一个学生画规模图，断定学生画不出，结果学生真的画出来了，他却说画反了。但几个教师讨论下来，规模图画得是对的。通过这件事，对这个老教师教育很大。因此，我们感到，教师不在实际中使用改造，光参加劳动，不接触教学业务是不行的。

我们搞了一个项目——大车间，一边教设计，一边教理论，这样学员愿意学，学得进，说少而精。教师当场讲课，这样教，也能抓住要害。因此只有接触实际，才能打破过去那套老框框。

有些教师开始认为，工人只有实践经验，没有理论，说在课堂上工人讲不过我们，其实一到现场，好多理论问题，教师回答不出，工人一讲就清楚了。如有的学员向教师提问，这个钢柱为什么这样放，那个钢柱为什么那样放，教师就讲不出来了，工人师傅一讲，大家都很佩服。教师说，要联系实际，我就讲不过工人。因此学员到了现场问工人多，到了课堂问教师多。所以我们感到，教师的改造要结合实际，才能发现我们思想上的和教学上的问题。

另外，有个问题，谈一下。我们是教建筑工业的，这次招生，有些工人学员原来不是搞建筑的，没有建筑方面的实际知识，所以他们开始学基础理论还可以，学到高等数学，感到学不进去了，力学也难懂。后来就组织他们接触实际，增加感性知识。但教师担心这样搞法，只能培养艺徒，连中专的要求也达不到。通过实践，教师有了信心，说一年半可以达到学习要求。事实上，只用了十个月就超过了。我们认为理论要学，但是一定要接触实际，使学员有学习的主动性，这样才能学得快，学了有用。

在教学实践方面，我们想最好选典型工厂，有一个包建厂就好了，既有先进性，又典型性，选这样一个理想的工程，但有时没有。

姚文元：你的意思是选不到怎么办？

郑世谊：对，有时受工程的限制选不到。

关于办学的体制，清华这份材料上的经验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除了工农班以外，最近想搞工人的短期训练班。

姚文元：招了工农学员进来，还有没有阶级斗争？是不是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你们这个问题碰到没有？

郑世谊：碰到的。在我们办学到七个月的时候，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才懂得抓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刚开学时，工人学员说，我们是来夺权的，要填补科学空白，要为毛主席争光，为无产阶级争光。但进来以后，却忽视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认为我是工人阶级，从劳动中来的，有实践经验，你们教师要接受我的再教育，有“自来红”的思想，认为自己没有改造思想的必要。有一个学员说：“你（指教师）的思想和我的思想问题不一样。”后来，我们抓思想政治工作，他们思想还不通，说知识学得少了。通过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才把这个思想扭转过来，现在学员的精神面貌很好。

张春桥：你们什么时候才认识这个问题的？

郑世谊：工农班开学四个月以后，才认识到再不很好地抓，就不能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我们的任务，后来我们抓了。

张春桥：究竟怎么招生比较好，将来各个大学招生，和旧的教育制度有什么区别？究竟招什么人？怎么招？带着什么观点去招？教育革命，不单是学校的事，是社会革命。招生中间，学校，工厂、公社，工农群众三方，会碰到什么问题？进来以后怎么办？

徐景贤：招生问题很重要，同济“五·七”公社工农班招生的时候，碰到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对办工农班的目的，没有在广大群众中讨论，就分配招生名额，结果有的人不愿意去，有个单位的头头不去，他的小兄弟讲义气，说我代你去。另一种情况是，招生工作做得较好，他们先把大学招生的事告诉广大群众，发动群众讨论，造成舆论，然后群众评论，推荐优秀同志，出来的时候又再三叮嘱要他们代表自己的阶级好好学习，不要忘本，这样进大学的同志，革命热情比较高。招生也有一个路线问题，要发动群众来搞。

郑世谊：我们这方面工作已总结。这次我们到其他地方跑了一下，他们也都碰到这个问题。从城市里招的学生，思想比较复杂。

张春桥：我们有失败的教训。一九五八年，上海科技大学办过工人班，两年

一期，有些原来很优秀的工人，学下来，思想变坏了。要把这个经验好好总结一下，作为现在办大学的财富。

姚文元：工农学员招来，用什么世界观进行教育，这点很容易忽视。

郑世谊：最后一点，关于体制问题，我们认为房屋建筑专业，和建筑工程单位一起办学校较好。

姚文元：去年这个时候开会，建工局的同志就是不愿意干，说局里的任务已经吃不消了，还要办什么学校。实际上是可以办的。

郑世谊：但我们跟建筑二公司商量，他们很高兴，现在正在落实。

徐景贤：同济“五·七”公社现在和建筑公司结合在一起，这样，教学选择典型工程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了，工人教师问题也好解决了。

戴妙仙（同济“五·七”公社教师，地下建筑专业）：关于编写教材问题，今天看了清华经验很有启发。写教材一定要结合工业生产的需要，教材不能一劳永逸，要经常地不断地充实内容。拿隧道工程来说，过去有一点资料，是外国的，也不适用。但外国人讲，江南地区要造隧道，就等于豆腐里插铁条。事实证明，江南地区完全可以造。

姚文元：现在编教材怎么样？是编一次改一次吗？

戴妙仙：我们通过两年多来的实践，准备以这个隧道工程作为解剖麻雀，同地下建筑方面联系起来，这个初稿已写出来了。我们还准备派一些同志，去搞一个地下发电站。这些是过去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根本不敢想的，我们把这些教材都写出来了。在实践中，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写新教材，要跟上工业生产的形势，不然要落在后面。

教师也好，学生也好，都要向工人学习，首先要有第一手资料，有了第一手资料我们就自由了。不然我们就陷在旧的框框里面。

姚文元：这点很重要。

戴妙仙：我们是六八年四月下去的，六九年初上来的。经过十个月的劳动锻炼，我们就准备写教材，但是还写不起来。再到实践中去锻炼，和工人在一起，到六九年下半年才基本上写出来了。

总结我们的体会，新教材的编写过程应当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首先向实践学习，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改造世界观，取得第一手资料；再向书本学

习，经过批判，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还要向社会学习，把当前工业生产上的新发明新创造总结起来，这样的教材才能创新。

张春桥：还要有一个再实践的考验，看究竟经得住经不住。

郑世谊：过去我们有个教材编写组，有十来个人，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根本不能用。

张炎明（同济“五·七”公社学生，地下建筑专业）：我举一个例子，地基承载力原来规定每平方米八吨，现在已经大大超过，这些都是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同过去书本上写的差别很大。所以编教材还是要到实践中去编。

戴妙仙：编写教材的斗争很复杂，学生也好，教师也好，头脑里的两种思想的斗争是很尖锐的，这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中心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还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这个斗争的过程，也是改

造世界观的过程。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问题，往往从业务当中表现出来，突出的是把政治和业务分家。无产阶级政治怎么去统帅业务？毛泽东思想怎么去占领阵地？这个问题，我们遇到这样一件事：上钢三厂改建二转炉，我们是跟华东建筑工程设计院一起搞的。有一个青年设计人员，贪大求洋，他主张把屋盖拆掉。他上去检查，把烟囱外墙烧掉的一层粉末拿下来，证明这个屋盖一定要拆掉，一些教师和学生也同意。我们当时都很相信。后来，工人同志来了，说不能这样干，要按照“勤俭建国”的方针办事，经过检查，这个青年设计员拿下来的粉末，都是墙的外层的一些东西，上面里面全部是好的，屋盖不但不要拆，还可以用十五年。这点在课堂里是学不到的。

王四弟（上海工学院学生、射流工场实践队成员）：我们也有这方面的体会。有一次，我们召开教育革命座谈会，上钢一厂一个车间的革委会委员，他在会上讲，工人生产好就是突出政治，农民种好田就是突出政治。一个工宣队的排长当场批判了这种思想。那个委员还不大服贴。后来，去调查了，原来这个人是专门搞业务的，对政治不大关心。我们选了一些学生在学校里搞尖端产品，有人就散布说：“我们这些人都是选拔来的，筛子筛下来的，可以埋头抓业务。”我们狠抓了阶级斗争，把运动一搞，就在这些人当中揭出了反革命分子。事实教育了我们，在教育革命中，阶级斗争是始终存在的，不抓不行。最近我们帮一个机械工业部

门搞了一个技训班。

张春桥：有多少人？

王四弟：四十五人，训练十二天，白天干，晚上也干。

姚文元：十二天学什么？

王四弟：这是短期训练班。

张春桥：十二天能行吗？

王四弟：能行，就是拼命干，突击业务。

张春桥：为什么不办一个月呢？

王四弟：最近，我们抽了六十几个人，办两个月的训练班，白天学习，晚上回厂干。

张春桥：你们总结一下，究竟是半个月好，还是一个月，两个月好。哪一种人一个月就够了，哪一种人要两个月才行，还有哪一种人看一下就会了。

王四弟：外地的同志也来我们学校，看懂了就走。

关于招生方面，有这么一点意见：我们那个技训班招来的同志水平不同，大学、高中、初中文化程度都有，因此教师在上面上课，有的很满意，但有大学程度的学生，要求讲高级的东西，水平不一样，教师上课很难。

李军毅（交通大学六九届学生、赴沪东造船厂实践队成员）：思想政治工作很重要，不抓是很危险的。我们帮助沪东造船厂办了一个工人大学，开头我们认为工人学员是推派来的，政治上可靠，学员中有些人也有“自来红”的思想，认为自己到大学主要学业务，说学政治，还不如到车间里去学。这些问题，教员不敢批评，以为自己只是接受再教育的，工人学员不少是头头，又是老工人。所以，不管对不对，有些工人学员讲什么，一些教师就听什么，连学习班领导小组的第二把手也不敢批评，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出身，认为自己只是接受再教育的。有些工人学员认为自己有二十多年的工龄，自己主要是来学习文化的，说大批判嘛，你们去搞搞，我小学还没有毕业，在这二年中要把十几年的文化课学好，哪来时间搞大批判。厂党委领导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找我们开了座谈会，讲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孤儿，解放后翻了身，国家送他上大学，后来看不起工人了，专心搞业务，变掉了。还有一个工人，他父亲也是工人，他是学文艺的，结果听黄色唱片，被坏人拉下了水。这样教育，对工人学员震动比较大。这说明工农学员

进学校，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要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张春桥：旧交大的体制，你们批判过没有？

李军毅：批判了。

张春桥：旧交大搞的那些，经过批判你们究竟得出什么结论？

郑振基（交通大学教师、校革委会常委、校教育革命组负责人）：过去旧交大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旧交大“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大跃进时招了一批工农学生，有的没有几天就被赶出了校门。去年，我们着重批判旧交大的封、资、修的制度，但这方面到今天还有流毒。我们认为这方面的批判要普及到工厂里去。理工科大学是和工厂密切结合的，工人是很支持教育革命的，但现在有些工厂领导不支持教育革命。比如有个机床厂办了工人大学，领导不重视，事情很难办。另一个造船厂办了一个工人大学，厂领导抓得紧，因此工作就比较顺利。这说明教育革命具有社会性，单单靠学校抓是不行的，要依靠社会上，特别是工厂一起来抓好教育革命，不然，教育革命不能很好地开展起来。

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教师要实行三三制，这样我们那里教师的力量还是比较紧张的，科研、生产任务很忙，教学任务很忙，再加上三三制，就显得紧张了。

张春桥：你们教师有多少人？

郑振基：一千三百人。

姚文元：你们那里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搞得怎么样了？

郑振基：下面群众反映是温吞水。

张春桥：我有同感。

郑振基：搞教育革命的同志很有意见，领导有点求稳怕乱，弹钢琴没有弹好。希望市革委会领导去点一点，这种局面怎么改变。

张春桥：你们自己不能改变？

郑振基：大字报贴得很多了，但是没有什么改变。

张春桥：自己解放自己嘛！

郑振基：也需要领导上的支持。

姚文元：交大的科研设备在全市大学中是最好的。

郑振基：我们学校和附属工厂的关系还没有很好解决。

王家霖（华东化工学院干部、抗菌素实践队成员）：我们感到理工科大学要

厂校挂钩，也要社校挂钩，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是很需要的。五八年我们也搞过“九二〇”农药，但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说没有价值。现在我们批判了这种思想，坚持为农业服务，为贫下中农服务，把基点放到农村去。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贫下中农是科学实验的主力军。比如“九二〇”的试制，我们就把贫下中农请进来，让他们上讲台。还办了短期训练班，根据贫下中农的要求，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现在已经投入了生产，“九二〇”农药全国是很需要的。

姚文元：县一级有没有可能搞？

王家霖：可能的，象小化肥一样。江苏、江西、辽宁都派人来学习。已开始在全国推广。

张春桥：困难还是很多的，全上海推广也不容易。

王家霖：县、社办“九二〇”药厂，贫下中农很欢迎。以贫下中农为主力军，在普及的基础上办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学习班，从贫下中农中招收学生，这样就有了一个基本条件，可以从这个厂的设计到设备制造和安装，到产品出来，编写一个新的教材，进行教学实践。

姚文元：从实践中来形成新的教材和新的专业。这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个很大的创造。

王家霖：这样搞，贫下中农对我们思想上的教育也是很大的，本来有些同志有点灰，感到读了几年大学倒霉，要是我不进大学的话，也可以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了。贫下中农对我们进行了再教育，现在不灰了，因为贫下中农十分希望掌握科学实验。

姚文元：你们这支抗菌素实践队有多少人？

王家霖：四十二人。

张春桥：你们跟化工局关系怎么样？

王家霖：他们不感兴趣，认为是两个系统。

校办工厂同社会生产结合起来，作为国家生产的一个部分，但是要有一定的余地，现在我们是求他们的。产品是有人要的，原料嘛，很抱歉，不给。

张春桥：化工局下面的医药工业公司怎么样？

王家霖：它也不管。希望这个渠道要沟通。

姚文元：为了搞好教育革命，学校同各有关方面的关系要有一定的制度作保

证。没有一定的制度是不行的。

陈训亮（复旦大学物理系教师、“四·一”电子工厂负责人之一）：我们校办工厂生产是纳入国家计划的，专搞电子元件，有学生二百五十名，教职工一百五十名。我们那里主要是承担一些重要工程所需要的产品。

姚文元：完成没有？

陈训亮：过去搞了一年，进展不大，后来抓了阶级斗争，搞了大批判，虽然劳动的时间短了，但还是完成了。

姚文元：还是要抓阶级斗争。

陈训亮：原来有一些教师的情绪比较消沉，认为在学校里没什么好等了，准备斗批走。后来学校办了工厂，明确了为谁服务，教师、学生的精神面貌就起了很大的变化。

姚文元：有一点革命实践，才能把消极的情绪打掉。

陈训亮：现在的精神面貌比较好。每一项工程的任务来了，我们先交思想、交政治，上政治课，大家的精神状态很振奋。

现在校办工厂所担负的科研任务也纳入国家计划，把物理系的好几个专业也带 上去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对半导体究竟怎么研究搞不清楚，花了很多的钱，买了很多的洋设备，但是做不出。现在，校办工厂以后，社会上的新技术、新工艺能够直接反映到我们学校里来，又同许多工厂发生了关系，不象以前那样闭塞，现在每天接触工人，这对我们编好新的教材是一个推动。去年十二月搞了两个编教材的小组，一方面以校办工厂为基础进行调查研究，另外在外厂也进行调查研究，促进了教材的革新。这样，学校的教学、科研、生产，和社会的生产结合了。

朱惠民（复旦大学物理系工宣队员）：刚才陈训亮同志谈到校办工厂的问题，早在一九五八年，复旦的革命师生就曾经搞过几个校办工厂，物理系也搞了个电子工厂。上海的第一只两极管、三极管，就是复旦物理系搞出来的。但那时，由于路线问题没有解决，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冷风一刮，复旦当时的走资派杨西光就叫嚷大学要“正规”，一下子把校办工厂砍得干干净净。文化大革命前，半导体专业的学生读到五年级，竟连一只两极管也还没有见过。去年还有人吹冷风，说：大学办工厂好比野牛闯进了庙堂，象什么话。我们坚决抵制了这种思想，办起了“四·一”工厂。

徐学义（复旦大学微电子专业工农兵试点班学员）：文科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理工科也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根据我们学校的情况，大家认识到，不搞大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不能肃清。前个时期，报纸上批判桑伟川，我们理工科的师生都不大重视，因此我感觉到，不搞大批判就会重复修正主义一套。前个时期，有些教师到工厂调查，回来说向工人老师傅没有什么好学的。我们对这种错误思想狠狠进行了批判。知识分子到工厂调查研究，不解决立场问题，是写不出好的教材来的。所以，我们认为，理工科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

陈训亮：前个时期，我们招了手工业系统工厂的工人来培养。

朱永嘉：请手工业工厂的工人来学，他们学了回去搞生产，学校再派一些学生去帮助他们改建工厂，从这个实践中来检验学习质量。

陈训亮：六九届、七〇届的学生跟工人学员到厂里去，干劲很大，日夜干，等到产品出来以后，学生再回来，同工人建立了感情，因此老师傅也经常来，碰到什么问题，我们也及时派同志帮助他们解决。

朱永嘉：这些实践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革命师生，政治觉悟比较高，又能够掌握比较全面的生产工艺。

姚文元：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拚命造谣，说我们这几年大学没有招生，中国工业技术的力量薄弱。实际上，由于我们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在广阔的范围内执行了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一系列指示，实行了教育革命，我们不但尖端产品上去了，整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技术力量也增加了。这是一场意义很深远的革命。他们说我们人材不足，实际上，我们只有多啊！

上海机床厂的同志，你们还没有谈。

张春桥：大家要走你们的道路，你们自己走得怎么样？

王绍庭（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党支部书记、厂党委委员、工人技术员）：看了清华的经验，对我们的启发很大，眼界更开阔了，有好多地方总结得很全面。

对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这个问题，我们有点体会。我们是六八年办的学校，学员平均工龄都在十二年以上，开始学员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怎么办？市

革委会负责同志到我们厂里讲过这个问题，指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会反映到机床厂来，反映到“七·二一”工人大学里来。我们办了五天学习班，讨论这个问题，抓了阶级斗争。

在工人学员中“自来红”思想较普遍。他们认为自己是工人，是推选来学习的，说主要任务是来学设计的。不仅如此，他们也有旧思想，也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我们抓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斗争的实践使我们感到，工厂办学校，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一定要抓思想政治工作，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的思想。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后，认识到要边实践边教学，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有的人开始认为，你搞实践的话，我可以回车间去搞，不要在你这里搞了。抓住这个思想，组织大家讨论，弄清楚究竟为谁学习，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思想提高了，干劲很大，把机床也设计出来了。

最近，我们抓了两忆三查，激发了广大学员的阶级感情，这样也有利于对教师的再教育。因为有些原有教师，他们那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不批判，会影响工人学员。我们抓了思想政治工作以后，有利于他们接受再教育。同时，我们还组织工人学员到部队去学军，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学习解放军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使学员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

姚文元：你们有多少学员？

王绍庭：五十二个。我们的体会是，不抓政治思想教育，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指示很难落实下去。对原有教师要边使用边改造。

张春桥：你们教师哪里来的？

王绍庭：机电工专的。有些教师以前对教材可以背得很熟，现在要讲毛主席的辩证法，他们就没有办法了。清华的经验很好，在使用中改造教师。不少教师是有一技之长的，和工人技术人员一起备课，就可以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

在编写教材方面，清华的经验，对我们教育很大。教材要具有革命性、批判性、针对性、地方性。开始，有些教师在编写教材时束手无策，感到没有办法。我们做了好多工作，鼓励他们。教材写好了，我们通过学习班，明确方向，提出要求，有问题帮助他们纠正，向他们说清楚，出了问题，要批评就批评我们，但是提高要你们提高。他们劲头就来了，初步的教材写出来了，但是离开高标准还

差得很远。

姚文元：不能一下子“高级”。

张春桥：从“初级”到“高级”。

王绍庭：另外，办好理工科大学，领导班子也很重要，领导班子要在斗争中形成。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就能照毛主席思想办事。只要敢于实践，善于总结经验，没有路也会走出来的。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路子再对，方向再明确，也落实不下去。实践证明，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每走一步都有斗争。我们厂的学校领导班子开始不得力，在斗争中经过调整，就比较好。

学制问题，单项科的可以一年，理工科大学至少二年。本来我们定二年，考虑到第一期要走一点弯路，准备两年半。现在看来，招的工人学员还是要有一点文化，否则学起来有困难。文化低，年龄大，教学也有矛盾，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年纪轻一点，即使文化低，采取“一帮一”的办法，也补得上去。

张春桥：你们能不能附带办业余学校？

王绍庭：业余学校已招生了，现在招了六十五名学员。

张春桥：即使所有的大学都招工人学员，但绝大多数的工人还是在工厂里，还有一个提高的问题。

王绍庭：但是，现在厂里有些车间不肯把好的骨干放出来，有本位主义。

张春桥：上个月我跟张梅华同志商量过，要他带个头，因为他是厂党委、厂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又是工人工程师，他也想学习，但是没有地方。张梅华一报名，到业余学校当学员，就可以带一批优秀的工人一起学习，学政治、学军、学农、学文化、学技术。在业余学校学了以后，还可以选最优秀的送到大学。不然工人想学习，又没地方去，怎么办？至于有的文化低，可以给他补一定的文化，甚至专门学文化，学政治。你们“七·二一”大学人太少了。有人搞本位主义就贴他大字报。因为他们不理解工人迫切要求学习的愿望，只看眼前利益，不看长远利益。当然，也有一些工人，不想继续学习。我们要鼓励他们继续学习，继续革命。

王曾荣（上海机床厂二车间装配工，原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六四届毕业生，又当了四年研究生，六八年到机床厂）：看了清华的经验，感到很好，新旧对比，感慨也很深。我在清华呆了十年，六八年四月到机床厂。我过去在学校里学的时

间太长了，尤其是基础课学的时间太长了，到了机床厂，还是从头学起的。过去在学校里，蒋南翔鼓吹一个观点，叫“猎枪与干粮”，学校给你“猎枪”是吃不光的，给你“干粮”是可以吃光的。

张春桥：带“猎枪”到上海也没有饭吃，马路上不是汽车就是人，有什么猎可以打？

王曾荣：很多问题在学校学，很难搞清，到了厂里劳动以后，才恍然大悟，一下子明确了。

怎么为工人阶级服务，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自己也有一些体会。毛主席提出要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但旧清华提出在实验室里也可以培养三大革命运动的战士，这怎么能同工人阶级有共同的感情呢？到了工厂以后，放下架子，向工人学习，拜工人为师。开始的时候自己也很紧张，自己想读了十年大学，连装配机器也不会，怕人说，后来老师傅就手把手地教，每装一步，工人老师傅都跟我讲清楚，我很感动。在劳动过程中发现有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为什么工人不敢讲？工人同志说早提了，技术人员说他们不懂得什么，不理。现在劳动以后，使我感到不向工人阶级学习，不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也不会接受工人同志的意见的。

通过这段劳动，跟工人交朋友，感到很高兴。我有几个师傅都是党员，有一个师傅虽然到工宣队去了，但他也经常来看看我，很关心我。同工人交上朋友，思想境界有了变化，对自己世界观改造很有帮助，工人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积极去做，我解决的问题，工人也满意。因此我感到，只要放下架子，向工人学习，过去学的知识还能发挥作用。

张春桥：清华已经写出来一个总结，我们上海各学校也需要总结一下。总结以后，市里要开讲用会。

清华经验发表以后，对全国大学教育革命会有一个很大的推动，我们上海应该赶上去。

姚文元：今天大家的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讨论清华经验时，各单位都讲了搞教育革命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要抓阶级斗争，抓革命大批判，抓思想政治工作，抓落实政策。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从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整顿领导班

子，一直到招生、教学、教材、教师队伍改造，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指导我们的实践，总结我们的实践，提高我们的实践，这点在办理工科大学时是决不能忽视的。工农兵学员进大学以后，还是要加强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注意世界观的改造，使他们掌握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了解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和自己的任务，积极地投入教育革命。这样，才能使毛主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真正落实，才能培养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理论同实际一致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济大学、上海机床厂的同志都谈到这方面问题。

今天听下来，同一年前相比较，我们的经验更丰富一些了。在同志们努力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有很大的进展。希望大家把教育革命的工作抓紧，认真总结经验，题目大一点小一点都可以，比如招生问题、政治思想教育问题、学校办工厂问题、编写新教材问题、教师问题、领导问题等。哪一个问题上有体会的，集中在哪个问题上总结一下。有的刚刚在实践，经验还不多，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不要紧，我们的经验会随着实践的进展逐步增加起来的。革命的道路是由革命的人们走出来的。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坚持走下去，我们就一定能把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办好，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最大胜利。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来源：根据文件的群众组织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〇年六月三日，中共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进展情况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

遵照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发〔七〇〕二号文件的精神，我们于五月二十六日到五月三十一日，在上海召开了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第二次血防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血防领导小组成员、各地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以及选进地区的代表共六十余人。张春桥同志主持了会议。

会议重新学习了毛主席对血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

的中发〔七〇〕二号文件。还学习了中央五月十九日转发血防领导小组和卫生部军管会“关于丝虫病和钩端螺旋体病的调查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人民健康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到会同志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会议总结了前阶段工作，交流了经验，揭露了矛盾，部署了下步工作。会上，广东省提出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消灭血吸虫病的打算；湖北省黄岗专区的六个流行县，经过反复斗争，已基本上消灭了钉螺。一个省、一个专区、若干县的先进经验和革命干劲，给到会同志极大的鼓舞，一些单位提出“学余江，比黄岗，赶广东”的口号，大家决心争取在本地区早日消灭血吸虫病。会议期间，同志们又参观了上海县华漕公社的血防工作，看了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汇报演出，对这里的贫下中农男女老少普遍会背会唱毛主席“送瘟神”的光辉诗篇，普遍会讲用血防经验的动人情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了半年多的实践，大家认为：只要各级领导对毛主席的指示坚决照办，狠下决心，放手发动群众，一鼓作气，连续打几仗，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血吸虫病的规划草案，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现将去冬今春，各地开展血防工作的情况报告于下：

一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发〔七〇〕二号文件的巨大鼓舞下，波澜壮阔的“送瘟神”群众运动，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广大群众反映：毛主席对血防工作的指示从来没有这样深入人心；各级领导从来没有这样重视；群众运动的声势从来没有这样浩大；“送瘟神”的战果从来没有这样显著。

据不完全统计，各省、市、区去冬今春灭螺的面积共七亿多平方米，有的省灭螺面积接近或超过一九五八年全年灭螺面积的总和。各地总共治疗六十多万病人，其中江苏、湖南、湖北和上海四个省、市治疗的人数，超过任何一年治疗人数的总和。不少地区开展了粪管、水管、防护和耕牛血吸虫病的查治工作。

经过去冬今春的连续作战，出现不少防治工作的先进地区像江西的高安、彭泽、瑞昌、湖口、九江、昌都，浙江的嘉善、常山、宁海，上海的嘉定、上海、金山、松江，湖南的湘阴、沅江、岳阳，江苏的吴江、邗江、东台，安徽的宁国、桐城，四川的彭山、广汉，广西的天等、宾阳，云南的楚雄、弥渡。福建的漳浦、霞浦，共有几十个县（市）。有不少县（市），已接近消灭血吸虫病。贵州省全面

开展了普查工作，目前尚未发现钉螺，查出的病人正在治疗中。

科学的研究工作也有一定进展，特别是在挖掘防治血吸虫病的中草药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绩。

不少地区还开展了对丝虫病、钩端螺旋体病、疟疾等疾病的调查和防治工作。

二

去冬今春的防治工作，能够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主要是：

一、狠抓根本，用毛主席的“送瘟神”思想武装群众。

南方十三省、市、区血防会议以来，特别是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发〔七〇〕二号文件下达后，疫区各级领导，把学习、宣传、贯彻和落实毛主席的“送瘟神”思想，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大造革命舆论，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活学活用毛主席“送瘟神”光辉思想的群众运动。各省、市、区都大办学习班，召开讲用会，印刷了大量的毛主席对血防工作的指示，敲锣打鼓的送到贫下中农手里；组织“送瘟神”宣传队，反复宣传毛主席的“送瘟神”思想，使毛主席“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深入人心。各地还组织贫下中农进行回忆对比，开展革命大批判，控诉旧社会和血吸虫病这个“瘟神”给贫下中农带来的灾难，揭发批判刘少奇、魏文伯等一伙“政治瘟神”破坏和干扰血防工作的罪行。通过这些活动，大大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对刘少奇、魏文伯等一伙“政治瘟神”的无比愤恨，推动了血防工作的发展。

二、领导重视，亲自抓紧，树立典型。

各级领导认真学习了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发〔七〇〕二号文件以后，把消灭血吸虫病，提到两条路线斗争观点、备战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的高度来认识，提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度来检查，提到对毛主席忠不忠、对贫下中农爱不爱的高度来衡量，从而自觉地把血防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作为农村斗、批、改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好。许多地区的负责同志亲自到疫区调查研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湖南沅江县血防领导小组负责人，先后步行一百五十余华里，到八个公社宣传和落实毛主席对血防工作的指示，检查和指导防治工作的开展。

在总结这段经验时，许多同志说，领导是个关键。许多先进单位的作法是：

第一把手亲自抓，分管同志具体抓，其他委员结合抓，有关部门配合抓。许多县、社革委会的领导成员，抓典型，树样板，亲临现场，参加战斗，保证了防治运动的顺利进行。

三、大搞群众运动，坚持自力更生。

中发〔七〇〕二号文件下达后，疫区广大群众，坚决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出现了男女老少齐上阵，千军万马“送瘟神”的群众运动，据统计，投入战斗的劳力达三千多万人次。在灭螺战斗中，出现了许多祖孙三代齐参战，父子、夫妇赛先进的动人事例。有些大的灭螺水利工程，集中数万人安营扎寨，吃住在工地上。广大群众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深情，为了消灭血吸虫病，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忘我劳动，日夜奋战。

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示，闻风而动，雷厉风行，积极投入了这一场“送瘟神”群众运动，和当地群众一起参加灭螺，一起查病治病，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这场“送瘟神”群众运动中，各地都贯彻执行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做到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江苏吴江县在一个冬春的灭螺战斗中，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既灭了螺，还扩大了耕地面积，增积了大量肥料。江西彭泽县的太泊湖灭螺水利工程，原计划要国家投资一千五百万元，经过发动群众，除建闸需要的水泥、钢筋外，其余全部自力更生解决。

在治病工作中，许多地方依靠合作医疗，充分发挥医务人员和“赤脚医生”的作用，克服了人力、药品、医疗器械不足的困难，自制器材，以土代洋，大搞中草药，开展了查治病工作，培养了一批不脱产的专业队伍，巩固和发展了合作医疗制度。

四、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和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

在“送瘟神”群众运动中，不少地区还发扬了共产主义风格和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加强了地区之间的联防，开展了部门之间的协作，组织了非疫区群众对疫区的支援。如湘、鄂之间，鄂、皖之间，苏、沪之间，沪、浙之间的毗邻地区，都召开了会议，研究了协同作战的问题。水利、农业、商业、化工、卫生等部门也积极配合血防工作的开展。工人阶级为了解除贫下中农的疾苦，日夜奋战，积极增加生产，保证药品的供应。江西九江地区疫情严重的几个县，在灭螺大会战

中，都组织邻近的非疫区成千上万的群众，自觉地支援疫区重点灭螺水利工程。广大群众说：“病在贫下中农身上，痛在阶级兄弟心上，疫区和非疫区不能分界线！”

三

前一阶段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但运动的发展还不平衡。各省、市、自治区之间，本地区各单位之间，还有不小的差距。有的地方只有一般号召，抓得不深不细。有的地方把血防工作同革命、生产对立起来，看作是斗、批、改以外的事，看作单纯是卫生部门的事。有的地方血防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至今尚未建立。个别地区竟把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发〔七〇〕二号文件，积压了近三个月之久，没有向下传达贯彻。有些地区疫情很轻，消灭病害并不难，因为领导不重视，抓得不紧，至今还未消灭。比如广东省，全省血防工作发展得很好，但是，有一个县，只有半个生产大队有疫情，至今还没有解决，同时，对血吸虫病的防治，着重病人（这是对的），忽视病牛；对丝虫病等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还缺少全面的防治规划。对苍蝇、蚊子等四害的防治，对爱国卫生运动，对计划生育工作，不少地方仍然没有抓紧。

为了进一步全面地贯彻、落实中发〔七〇〕二号文件所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会议一致认为：

（一）要继续加强领导，狠抓根本。各级领导要结合中心工作，统一进行研究、布置、检查和总结。血防工作的群众运动也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思想教育运动，因此，领导班子的成员，首先是第一把手，要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送瘟神”的光辉思想，对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发〔七〇〕二号文件，要深刻领会，坚决照办。要遵照毛主席“一定要抓好典型”的教导，切实改进领导作风，深入疫区，亲自蹲点，总结经验，以点带面，做到层层有典型，事事有样板，开展比学赶帮的社会主义革命竞赛，要继续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好讲用会，进一步用毛主席的“送瘟神”思想武装广大干部、群众，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更广泛更深入地把群众发动起来，大打人民战争。

到会各单位表示决心：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计划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消灭血吸虫病的地区，要切实抓紧，坚决完成。计划在以后几年内消灭的地

区，也要抓紧进行，力争提前实现。已经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地区，要树立除害务尽的思想，坚持反复斗争，做好扫尾、巩固工作，积累如何巩固胜利成果的经验。

(二) 各级领导要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教导，正确处理革命、生产、血防三者之间的关系。要始终坚持以革命统帅生产，统帅血防；要把血防工作作为斗、批、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抓住各个农时季节，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统一规划，妥善安排、穿插进行，做到血防工作一年四季不间断，一鼓作气不停顿；特别要掌握钉螺繁殖的规律，抓住有利时机，安排时间、劳力，组织几次灭螺战役。同时，还要做到突击与经常相结合，群众运动与专业队伍相结合；血防工作要与农业生产互相促进，互相推动。

(三) 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在湖区和芦苇地区进行灭螺时，一定要有全局观点。不能借口芦苇多，难下手，不灭螺；也不能因为灭螺就把芦苇搞光，或者大搞围垦，给人民生产、生活和战备带来新的困难。为了保护芦苇和不影响蓄洪防洪，又能达到消灭钉螺的目的，各级领导和水利部门要采取积极态度，进行调查研究，充分发动群众，寻找适合当地条件的灭螺方法，进行大面积围垦灭螺时，相毗连的地区和水利部门应进行协商，瞻前顾后，周密规划，并经上级批准后，再行施工。对血防需用药品、器械，要努力增加生产，提高产品质量。要加强科学的研究工作，积极研究新的更好的防治方法，对确有疗效的中草药和单方验方，要认真总结推广。对几种主要药品，各地应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尽量做到在省内自产自给，所需的化工原料，应尽先安排。本省确有困难不能解决的，由中央化工、商业、卫生等有关部门统筹安排，并要有一定的储备。应组织力量，积极开展耕牛血吸虫病的治疗工作，做到与人的血吸虫病同期消灭。耕牛的血吸虫病也实行免费治疗。药品、器械的运输，交通运输部门应积极配合，抓紧做好。

(四) 继续开展以除四害为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加强丝虫病、钩端螺旋体病、疟疾和钩虫病等的防治工作。目前尚未开展这方面工作的地区，应按中发〔七〇〕二号文件和中发〔七〇〕三一号文件的指示精神，加强领导，发动群众，大力进行防治。各地区应根据当地情况，加强领导，全面规划，有所侧重。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应以血防为主，把这几种病的防治带动起来；在没有血吸虫病的

地区，则应以防治危害当地人民健康的主要疾病为重点，结合防治其它疾病。要在抓好典型摸清情况的基础上，拟定出切实可行的规划，并积极开展科学的研究工作，打好这场人民战争，力争在较短时间内控制和消灭这些疾病。

到会同志认为，除四害，讲卫生，提倡计划生育，决不是一件小事，它是振奋人民精神，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大事。各地都应当重视起来，每年认真地抓几次，坚决把苍蝇、蚊子等彻底消灭光，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到会同志一致认为当前血防战线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形势大好，振奋人心，纷纷表示要借会议东风，鼓革命干劲，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消灭血吸虫病及其他病害的伟大斗争中，实现毛主席“送瘟神”的光辉思想，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中共中央南方十三省、市、区血防领导小组一九七〇年六月三日

一九七〇年六月十四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贯彻南方十三省、市、区第二次血防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

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第二次血防工作会议结束以后，我们立即进行了传达贯彻。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在第二次血防工作期间，我们利用上海郊区各县革委会负责人列席会议的机会，共同学习了各省、自治区的先进经验，找出了差距，揭露了矛盾，制订了下一阶段的血防工作计划。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教导，在血防工作会议的鼓舞和推动下，各县决心在农忙期间坚持做到“四个不停”（宣传发动不停、查螺灭螺不停、查病治病不停、粪水管理不停），掀起“两个高潮”（六、七月间和九、十月间形成两次血防工作高潮），在今冬明春再掀起一个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的新高潮。嘉定、上海、金山、松江等四个县力争提前在今年内送走“瘟神”。

会议结束以后，各县立即将会议精神传达到了公社，并普遍举办了学习班，大学先进，大找差距，大鼓干劲，有的县抽调较强的干部，充实了血防工作的领导班子。有的县领导干部亲自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与群众商量下一阶段的工作

计划，准备在“三夏”大忙结束后，再进一步广泛深入地传达贯彻第二次血防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发动群众，狠抓查病治病、粪水管理工作。

会议结束以后，我们还召开了十个市区、二十多个有关局，以及驻沪三军负责同志的会议，传达了第二次血防工作会议的精神，要求他们督促分布在郊县的所属单位，积极带头搞好本单位的血防工作，并大力支持所在地区的血防群众运动。要求驻沪三军抽调医务技术力量，支援血防任务较重的几个县。

在传达贯彻第二次血防工作会议精神的过程中，我们回顾和检查了第一次血防工作会议以来的情况。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转发“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下达后，我们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结合生产、兴修水利，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上海郊区各县、社、队举办了六万多期有二百八十多万人参加的学习班，召开了万三千多次大小批判会，报纸、电台和出版部门也积极配合大造声势，大造舆论，使毛主席的“送瘟神”光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为了加强对血防工作的领导，市、县建立了除害灭病领导小组，统管血防、除四害、计划生育等工作，由主要领导同志挂帅，并要求各级党组织、革委会把血防工作作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大事和斗、批、改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

遵照毛主席“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的教导，郊区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使今年的血防工作出现了“男女老少齐上阵，千军万马送瘟神”的生动局面。四个多月来，全郊区出动了二百九十多万人次，采用铲、填、埋等方法，对四千多万平方米的有螺河道，连续开展了两、三次突击灭螺，钉螺密度显著下降，填掉大小有螺河浜四千七百多条。全市一百五十六个血吸虫病流行的公社，已有三十六个公社找不到钉螺，五十个公社接近消灭钉螺。同时，扩大耕地八千九百多亩，积肥八百多万担。许多地区在开展群众性灭螺之后，组织专业队伍，坚持反复查螺灭螺，巩固成绩，扩大战果。群众性灭螺运动的深入开展，深刻地批判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血防战线上的代理人魏文伯所散布的“有土必有螺”、“钉螺灭不光”等反动谬论，更加坚定了贫下中农消灭血吸虫病的信心和决心。

遵照毛主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导，郊区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充分发动群众，主要依靠赤脚医生的力量，因陋就简，设了五百多个治疗点，已经

收治了十一万多病人，占已发现病人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此外，还治疗耕牛一千三百多头。金山县组织了以赤脚医生为主体的近千人的医疗大军，培训了一百六十多名土化验员，在一个多月内，就完成了五十万人次的大便三送、三检的任务。他们还深入社、队设了二百零二个治疗点，治疗了二万二千多个病人，目前，全县只留下三千多个病人。有的十几年从未治疗过的老贫农，也手捧宝书，肩背被头，主动到治疗点要求治疗。他们豪迈地说：“治病为革命，不是为活命，治好血吸虫病，子子孙孙不受害，狠狠打击帝、修、反。”

许多社、队还加强了粪、水管理。他们土法上马，就地取材，用竹头代替钢筋，以“三合土”代替砖头，新造了一千二百多只无害化粪池，还打了三千九百多口水井。嘉定县目前已有一千七百四十二个生产队实行粪便集中管理，占流行血吸虫病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六，做到每队有一、二只无害化粪池，每六、七户人家就有一口水井，基本上解决了粪、水管理问题。

今年以来，广大药厂工人和医药研究人员，坚决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发扬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在防治血吸虫病药物生产和新药研究的工作中，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上海第六制药厂工人同有关单位大搞科研协作，去掉血防片中进口的原料改为细粉剂型，生产成本下降一半，疗效并不降低，年产量从五十吨增加到一百二十吨。中华制药厂工人与卫生、科研人员组成三结合的协作组，深入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开展用“敌百虫”治疗血吸虫病的研究工作，经临床试用一百四十多病例，近期疗效达百分之九十左右，而且具有剂量低，反应小，服用方便，价格便宜的优点，深受贫下中农的欢迎。现正在扩大临床应用。奉贤县用电击治疗了三百多条耕牛，绝大部分疗效良好，正在继续试验。此外，还筛选合成了治疗血吸虫病的两种新化合物，经动物试验也有一定疗效，正在进一步探索研究。

在毛主席“送瘟神”光辉思想的指引下，前阶段上海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发展还不够平衡，问题还不少，任务还很重。我们决心充分发动群众，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进一步加强领导，依靠群众，在已经基本消灭钉螺的地区，抓紧复查，巩固胜利，防止防复；在螺情严重、复杂的社、队，于今冬明春，再集中力量接连打它几次歼灭战。对留下的十六万病人，年内全部治完、治好。今年再建造一万只无害化粪池，挖三万口水井，并逐步健全巩

固粪、水管理的制度。在非疫区，要把丝虫病等防治工作立即抓起来。我们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在两年内基本消灭血吸虫病而努力奋斗。

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示。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七〇年六月十四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〇年十月三十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接见文化组成员时的讲话

江青：

文化组是在一九七零年三月成立的，因为富治同志病了，总理工作很忙，所以以后就没有找文化组开会。

回顾七、八年是很不容易的，在主席、林副主席、总理、康老的支持下，搞出这么一点东西。一九六七年、六八年搞运动很忙，照顾不上了。后来由于杨成武的干扰，在宣传队里派进一些坏人，发现后，我主张一分为二，好的留下来，但他们把人全都换了。一九六九年我们才知道，把好的同志请回来，在总理的支持下，成立了军宣队。从那个时候，我就抓得比较紧。一九六八年、六九年，今年的上半年，我陷得太深了，其它工作就受影响，照顾不上了。

文化组三月成立以来，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原因是大家刚凑在一起，有的同志民主集中制注意不够，个人发号施令。今后在吴德、贤权同志领导下，实行群言堂，要搞民主，当然也要集中。八年来很不容易的，我们搞了这么点东西，主席肯定了我们。出现问题要一分为二，要细致。对缺点错误要分析，正确的意见要接受，不正确的意见其中也有好心人提的。我这么多年是细致的，不细致是站不住的。文艺关键是树立先进的人物，中间人物大量存在，反动是少数，我们用先进人物改造中间人物。我们对反革命的攻击要顶住。

关于搞新的创作和会演的问题

我们的党史知识不足，最好用部分作题材，如《杜鹃山》，现在改为《秋收起义》，面就太大，不小心就出问题，我们还是应该从一个角落去搞，叫《杜鹃山》。《杜鹃山》原来上海的青年演得不错，我带回北京，后来彭真不让我搞，给

了邓拓搞，现在我们可以搞。又如《铁道游击队》要离开枣庄，不要写真人真事，否则就有人出来认帐，也不要作为样板戏。对破坏敌人交通，党有一系列的政策，这个戏的内容就是在铁道线上打游击，名字暂不定。

总理很忙，我也忙，希望文化组靠集体力量搞起来，搞好可以试演。

《红嫂》要另起名，要脱开那个地方，原来作者有问题，你们打报告还叫《红嫂》，你们搞创作不是为了会演，你们得自己组织起来创作，排好，试演。组织几个人提了意见以后再改。

关于各团新的创作，你们另写个报告。

会演，我想得不周到，因为四届人大，地方党代会相继召开，各个单位也有整党建党，大家都很忙，因此，会演是否推迟到后年的六、七月。六、七月北京天气也好，这样地方的东西出来更多了，有些也可移植，不管什么戏，只要是革命戏都拿来。关于会演推迟，请你们再重新打报告。否则你们也累，我们也累。今后我不能象过去那样抓了，以后这些工作文化组要管起来。这次事情你们就发了纪要，中央还没有批准，你们就发那么大范围，这办法不好，要学会办工作，今后不能这样。

文艺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部门，文艺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同志们精神上得要准备长期的斗争，最近敌人对《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都攻击过，阶级斗争在脑子里不要忘掉了，我们自己也要改造。重大问题汇集材料可以，先不要写。《万水千山》是要的，但不能搞宗派的，主席说要写会师，后来又写了杨成武。写大战役都要慎重，原来不是重大的题材，不要用大名字。

过去法语系统的国家要求我们派剧团出去，我们一直没有去。是否拍完电影后，可以派一两个团出去，《红色娘子军》出去可以和《黄河》一起去，演奏点自己的作品，这样乐队也解决了。京剧也要出去一个。团配备强点，不光能演一个戏，另一套班子在家里。创作人员先下去，你们回来后再去生活。

你们的报告要写好，讨论得细致点，有问题，有办法，有的可以提几种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样的报告我们就好批了。外交部、中联部的报告好批。你们要学习。

另外，你们要大胆点，不要怕，犯了错误也不要紧，要负起责任。以后报告统统打到总理那里。我过去，陷得很深，什么都得管，文化组成立了，就好了，

你们要担负起责任来，你们大胆，我们支持，有了错误，我们给你们承担，当然发现了问题，我们也给你们指出。

我们也可以演折子戏，如《刑场斗争》、《打虎上山》舞蹈都可以演。

姚文元：

同意江青同志说的。

张春桥：

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创作人员解放多些，下去，有了剧本就好办了。

搞了几个戏，大方向不能动摇。其它意见可以一分为二。另外，我们确实取得了经验，这些经验是宝贵的，有了这些经验，我们就懂得怎样工作了，还可以培养青年一代。前几年资产阶级司令部控制破坏，江青同志不能不集中精力攻坚，因此，江青同志就要花极大的精力，前一阶段是需要这样做的，现在不同了，我们有了实践经验，又有了队伍，形势很好。再不能象过去那样了，否则，领导同志就吃不消了。现在你们要带队伍去打仗了，靠同志们独立作战。在新的过程中，你们还会犯错误，但不要紧。一种是在错误路线下犯错误，一种是在正确路线下也会犯错误，这不怕。什么叫样板？样板就是按照毛主席的路线、方向搞出来的，我们是讲方向，基本思想，叫毛主席路线的样板，大家根据这个方向继续搞。

会演要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才能搞好，特别这几个样板团都有点新东西时再会演，所以我赞成会演推迟。

江青：

这几个团不要翘尾巴。

这几年还要感谢北京市革委会和谢富治同志。

话剧我们也鼓励，有了话剧电影剧本就好办了，我们可以改编成别的。

杭州负责搞美术的教改，曼恬同志去看看。但不要表态。

我们几个团要小心，我们吃过亏啦！（坏作品问题）团内本身也有破坏因素，要注意。文艺队伍相当复杂啊！过去招生不招劳动人民的子女，这次上海招生，贫下中农可高兴啦，都是贫下中农子弟。过去计划又回到旧的艺术院校了。

于会泳同志住北京，到上海跑跑。

《南海长城》就是写民兵的，《红嫂》就是写军民关系的。《奇袭白虎团》赶快拍电影，武戏这个最好，如果找不到小宋的录音，就叫别人代唱，他演。这个

戏拿出去好，有国际主义意义，不审查了，可以拍。

创作组赶快下去，下去越久越好。

《智取威虎山》电影付了很多学费，北京要总结经验，应该总结失败的地方，世界观的问题，总结要认真，不要回避那些失败的经验教训。样板戏，电影都要认真总结，不总结就会忘的。

最重要的是树立起正面英雄形象，就是不能丑化。发现下边好的创作要推荐，推荐再提高，大家讨论搞哪些。写典型不要写真人真事，主席进城后就提出不要搞真人真事。每个团自己讨论，然后文化组讨论。

《红嫂》有修改基础，以后改编芭蕾舞也有个基础，就是《红嫂》的基础。

明年抽两个团出国。半年搞一个戏少些。内蒙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可以改，改成敌我矛盾的。

姚文元：

在群众中，除注意发现一些大的节目，也要注意发现一些小的节目，歌舞都可以，工农兵业余演出需要这些节目。几个样板团也可以搞些小节目（江青插话：已经有的雏型的东西，不要轻易丢了。）《大渡河》小敦演的，可以搞成折子戏。

张春桥：

一般东西，由文化组负责审查。短片等都可以自己审。发现问题，你们拿不定主意的，向中央提出来解决；重大的政治活动，送中央看；重大的问题主席、林副主席都可以审查。只要没有政治上大问题，文化组审查就发行了。有好的东西你们也推荐给我们，要严格掌握政治标准。不要因为我们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就不敢推荐了。

江青：

过路电影给我们看，当敌情看。

另外，不能将上次“智”、“渡”那种问题重演，要严格政治标准。

你们先组织两三个人。看《红嫂》的原始材料，研究剧本后，指出哪些要增，哪些要减，哪些要改，然后由剧团写出修改提纲，不然，他们乱改。例如《红灯记》将来改不好不拿出来，我们不是乱改，指出那个地方有问题，给他们方向，然后让他们写出提纲，不要给人家一盆凉水，现在这个戏已经不是打补钉的问题，文化组要有人下功夫。改，是在他的基础上，重点场次是什么，这是个工作方法。

你们没有下功夫，吃不下，睡不着。内蒙《草原英雄小姐妹》可以两头弄掉，《大渡河》也可以，《红嫂》从内容到形式都要改好。

(文化部办公厅提供)

一九七一年五月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革命化的必由之路 纪念毛主席发出《五·七指示》五周年》

伟大导师毛主席发出《五·七指示》，已经五周年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主席在给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一封信中指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从事群众工作，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是这样，都要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毛主席教导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毛主席根据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一科学分析，根据国内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我们党制订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光辉的《五·七指示》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途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建设军队、建设国家、改造社会的宏伟纲领。

五年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五·七指示》越来越深入人心。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努力把各个单位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亿万革命群众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发起猛烈的进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巩固。我们的人民精神焕发，朝气蓬勃。我们的建设事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正在经历着极其深刻的伟大变革。

《五·七指示》总结了我军几十年建军经验，要求我军的革命化建设更要有发展。在《五·七指示》指引下，人民解放军把军学、军农、军工、军民分别

兼了起来，积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作用。各行各业兼学军事。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军民团结、军政团结进一步加强了。这对于贯彻人民战争的思想，加强国防，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五·七指示》是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重要文献。毛主席发出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战斗号令，正在变成现实。工人阶级及其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占领教育阵地，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从斗争实践中来的工农兵新学员，跨进了社会主义新型大学。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实行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正在建立。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正在茁壮成长。

《五·七指示》为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指明了方向。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在阶级斗争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特别是在领导上层建筑的斗、批、改中，不断提高政治觉悟，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作用。成千上万的革命干部、知识青年、在遍布各地的“五·七”干校中，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自觉改造世界观，焕发了革命的青春。

今天，在纪念毛主席发出《五·七指示》五周年的時候，我们要认真总结贯彻执行《五·七指示》的丰富经验，深刻理解毛主席这一光辉文献的伟大意义。落实《五·七指示》不是一个部门的事情，不是一部分人的事情，也不是一时的事情，而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事。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要坚定不移地走“五·七”道路，把自己锻炼成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每一个部门都要全面落实《五·七指示》，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这样，我们的党就不会变质，我们的国家就不会变色，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一定胜利。

按照《五·七指示》，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第一位的东西是“学政治”，“批判资产阶级”。农副业生产要搞，有条件的地方，中小型工厂可以办，但都要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要把着眼点放在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上。当前，要根据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伟大教导，开展批修整风。这是一场继续揭露和批判王明、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斗争，是一次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我教育运动。我们要认真读马、列的书，认真读毛主席著作，深刻理解毛

主席是怎样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要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要在学习和批判中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按照《五·七指示》，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要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作为课堂。人的正确思想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在革命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的。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理论和实践统一的观点。离开群众斗争的实践，落实《五·七指示》就成了一句空话。忽视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认为“身在实践中，思想自然红”，也是错误的。只有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积极投身于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才能在思想革命化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

回顾五年来贯彻执行《五·七指示》的历程，重温毛主席这一伟大文献，我们感到无比亲切。“五·七”道路是革命化的必由之路，让我们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五·七指示》的光辉大道继续前进，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一年五月七日，社论）

2009 年 6 月 29 日初稿

2011 年 12 月 29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一册（9）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一章 搞好斗、批、改

第九节 改革旧的规章制度

本节资料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公布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机关精简整编方案

1969年6月28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公布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机关的精简整编方案：

总参谋部原编15个部、局，除合并或精简的部外，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中央调查部与总参谋部情报部合并，中央气象局与总参谋部气象局合并，国家测绘总局与总参谋部测绘局合并，这样，总参谋部共设13个部、厅、局。

总后勤部原编13个部、局，调整后为8个部，1个局，另设6个地区性的物资工厂管理局。

同年11月，又公布了总政治部机关的精简整编方案。

这次调整撤并了装备、动员、财务、军需等职能部门，变更了综合、计划、供应的管理体制。

由于强调减少职能部门，一些必不可少的综合和专业工作被取消或削弱，同时，由于领导班子的多次变动，人员大进大出，机关人员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继续膨胀。

1971年10月以后，中央军委着手整顿军队的组织机构。至1975年，将合并于军队系统的国家机关重新划归政府系统，恢复了总部机关的一些职能部门。但这一工作直到1977年后才陆续完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直接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领导。总部机关分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三总部既是中央军委的参谋和战略意图执行机构，又是掌管全军军事、政治、后勤和技术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其基本

任务是：保障中央军委关于作战和建设的战略决策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实现。1969年6月，中央军委办事组公布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机关精简整编方案。11月，公布总政治部机关精简整编方案。当时总参谋长是黄永胜，总政治部主任是李德生，总后勤部长是邱会作。精简后总参谋部由原编15个部、局减至1厅：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兼）。7部：作战部、情报部、第三部、军务动员部、军训部、防化学部、政治部。5局：机要局、测绘局、外事局、气象局、管理局。总政治部原编13个部、院，精简整编为1室：办公室。5部：组织部、干部部、宣传部、保卫部、群众工作部。总后勤部原13个部、局，精简整编为8个部：司令部、政治部、供应部、卫生部、装备部、军事运输部、企划部、营房部。1局：管理局。另设6个地区性物资工厂管理局。分别是东北、华北、中南、华东、西南、西北物资工厂管理局。这次调整撤并了装备、动员、财务、军需等职能部门，变更了综合、计划、供应等的管理体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次较大的编制体制变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军区（也称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军区是根据战略需要划分的军事区域及与其相应的军队一级组织。军区机关是战略区域内合成军队的最高领导指挥机关，通常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等机构。军区（大军区）的主要职责是：负责辖区内陆、海空军部队的作战指挥和所属部队的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以及领导辖区内的民兵、兵役、动员工作和战场建设。军区下一般辖数个省军区或相当省军区的军区以及一定数量的部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解放军的军区设置和军区领导机关的组织编制曾经过多次调整和改革。到1969年时，全国共有大军区11个，省军区25个，省属军级军区3个，军（兵团）级警备区（卫戍区）6个。他们分别是：（一）沈阳军区，（下辖辽宁省军区、吉林省军区、黑龙江省军区、旅大警备区）。（二）北京军区，下辖河北省军区、山西省军区、内蒙古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三）济南军区，下辖山东省军区、青岛警备区。（四）南京军区，下辖江苏省军区、浙江省军区、安徽省军区、上海警备区。（五）福州军区，下辖福建省军区、江西省军区。（六）广州军区，下辖湖南省军区、广东省军区、广西军区、海南军区、广州警备区。（七）武汉军区，下辖河南省军区、湖北省军区。（八）昆明军区，下辖云南省军区、贵州省军区。（九）成都军区，下辖四川省

军区、西藏军区。（十）兰州军区，下辖陕西省军区、甘肃省军区、宁夏军区、青海省军区。（十一）新疆军区，下辖南疆军区、北疆军区。1969年9月，军区机关组织编制进行了一次较大的调整，撤销和合并了动员、装备、防化、军事检察院、法院、财务部等部门。

军分区是在行政区划的地区（省辖市、自治州、盟）。所设立的军队一级组织。属省军区建制领导，同时又是中国共产党地区（省辖市、自治州、盟）委员会的军事工作部门和地区行政公署的兵役工作机构，受省军区和中共地区（省辖市、自治州、盟）委员会、行政公署的双重领导。军分区设有领导机关，有的还辖有一定数量的部队、分队。负责所在地区的军事工作，主要是民兵、兵役和动员工作，有的还担负边防、海防守备任务。文化大革命期间，军分区未作调整和变动。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总参测绘局与国家测绘总局合并，国家测绘总局合并后撤销的通知

《通知》说：国家测绘总局撤销后，为便于对外交流，在总参测绘局保留国家测绘总局的名称。国家测绘总局原担负的测绘任务，由总参测绘局承担。战备测图任务，纳入统一规划。经济建设测图任务，属国家安排的项目和大三线建设测图，由总参测绘局统一安排；属于省、市、自治区的一般经济建设测图，以省、市、自治区为主组织实施。国家测绘总局及所属单位的资产、设备、资料、房屋等，由军队接管。省、自治区测绘管理处一律下放。交接工作可分批分期进行，于今冬明春完成。地震测量工作，拨归国务院地震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据此，国家测绘总局及所属各分局，各内、外作业队，测绘科学研究所和武汉测绘学院相继撤销。地图出版社归北京市出版办公室领导。此后，各经济建设部门的许多重要测绘工作被迫中断。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民航总局“关于进一步改革民航体制和制度的报告”

决定把国家民航总局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成为空军的组成部分，各项制度按空军执行，各级机构按军队组织序列进行调整，但对外名称不变，仍为国务院直属局。

有关国际航空交通运输业务和外事工作，除由军事系统请求报告外，也可请示国务院有关部门。民航基本建设投资、生产资金、行政事业费和其它经常费用，由民航每年编制预算和计划，按军队系统上报，由国家统一拨给军队。民航所需装备及各种器材物资，统一纳入军队渠道。这是民航在组织体制上受到的一次严重破坏。此后一个时期，不计成本、不讲经济效益、飞“政治航线”等“左”倾思潮泛滥。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等利用这一决定为林彪集团的活动提供了大量物资和经费。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四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总参军事气象局与中央气象局合并问题的通知

《通知》说，为对气象工作实行集中统一领导，使平战结合，既为国防建设服务，又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决定总参谋部军事气象局与中央气象局合并，撤销总参谋部军事气象局，称中央气象局，归总参谋部领导。两局合并后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安排国防和经济建设的气象保障；统一规划和组织落实气象工作的基本建设；组织气象科学技术的研究和人员的培训、补充；办理国际气象业务；策划主要气象仪器、机器设备、器材工作。各省、市自治区以下各级气象部门仍归当地各级革命委员会领导。气象人员培训除学校培训外，不足部分由地方培训。全国性的气象基本计划、经费仍由国家计委归口管理。气象器材由中央气象局统一筹划，军用气象器材由总后勤部储存、保管。物资订购由中央气象局与国家有关部门与总后勤部联系办理。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的决定

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是直属中央军委负责组织、协调全国国防工业的规划、生产和科研的领导机构。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邱会作任组长。同时撤销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简称“国防工办”）。

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的任务是组织领导和协调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机械工业部的生产建设和科研工作。机关中设秘书、规划建设、工程机械、生产、科研和政治处。

随着社会秩序的逐渐稳定，为了加强对国防工业的统一领导，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批准，1973年重新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方强任主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于10月1日正式办公，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即行撤销。

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以国务院为主。国防工办负责对国防工业生产、建设和科研工作统筹规划，全面安排并组织执行。办公室下设规划、基建、生产、科技和协作等局。

一九七〇年一月四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将农垦部直属橡胶垦区下放地方的通知

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决定将农垦部直属橡胶垦区下放地方。云南、福建、广西和广东汕头橡胶垦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海南、湛江橡胶垦区及其所属企业单位和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分别下放给所在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或军区领导。有关垦区的方针政策、长远规划仍由中央有关部门负责。

《通知》指出：橡胶是一项重要的战略物资，大力发展橡胶生产，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极其重要。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援外人员的审查和政治思想工作的通知

1970年2月10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有关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援外人员的审查和政治思想工作的通知》稿。次日，在与康生联名报毛泽东、林彪的信中提出：我国援外人员在国外的表现，一般说来是好的，尤其是与西方等国的专家比较，更显得我方出国人员是能与亚非国家当地人民一样生活、同甘共苦的；但为防止骄傲和松懈，仍以经常注意为好。十五日，经毛泽东批准，《通知》发出。

一九七〇年三月四日，中共中央批发国务院“关于全国棉花生产会议情况的报告”

1970年1月26日至2月14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棉花生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6个集中产棉省、市、自治区，68个产棉专区，263个重点产棉县的代表，共500余人。

会议总结和交流了棉花增产和棉粮双高产的经验，讨论研究了1970年全国棉花生产计划和各项增产措施。提出：1970年生产棉花5250万担，收购棉花4750万担；1975年要超额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棉花播种面积达到8000万亩，总产量达到7200万担。

会议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加强对棉花生产的领导，落实棉花生产和收购的各项政策。在一些老棉区和内地，要适当扩大播种面积；云南、甘肃等地要开辟新棉区。凡是适宜种棉花的产粮区生产队，都要种二三亩棉花，逐步解决絮棉自给问题。

3月4日，中共中央同意并批发了国务院《关于全国棉花生产会议情况的报告》。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关于精简合并各部、委、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6月7日，国务院提出《关于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报告》。6月22日，中共中央同意了这个报告。

中央批语指出：国务院各部、委革命委员会通过党的核心小组加强对各部、委的一元化领导，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重大问题必须经过集体讨论决定。在落实国家计划的工作中，要正确处理中央各部门和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群众的首创精神。各部、委所属各企业、事业单位，除极少数一时不宜下放外，一般都应下放。下放工作在今年内，应逐步地、分期分批地进行完毕。不要什么事情都统得死死的，要坚决反对“条条专政”。

《报告》提出：

一、将各部、委、直属机构由原来的90个精简、合并为27个。

二、各部、委设立必要的层次少、人员精的办事机构。暂定编制为原有的 18%。

三、关于工交、财贸、农林水利等各经济部门的机构精简合并情况为：

1. 国家计划委员会由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务院工交办、全国物委、物资部、地质部、劳动部、国家统计局、中央安办等合并组成。
2. 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由国家建委、建筑工程部、建材部、中央基建政治部合并组成。
3. 冶金工业部即原冶金工业部。
4. 第一机械工业部由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八机械工业部合并组成。
5. 燃料化学工业部由石油部、化学工业部、煤炭部合并组成。
6. 水利电力部即原水利电力部。
7. 交通部由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的邮政部分合并组成。
8. 轻工业部由纺织部、第一、第二轻工业部合并组成。
9. 财政部由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合并组成。
10. 商业部由商业部、粮食部、供销合作总社、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合并组成。

11. 对外贸易部由对外贸易部、国际贸易促进会合并组成。
12. 农林部由农业部、林业部、农垦部、水产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中央农林政治部合并组成。
13. 对外经济联络部即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

关于中共中央批示同意的国务院各部、委党的核心小组及革委会负责人，名单如下：

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余秋里；

国家基本建设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李良汉；

冶金工业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陈绍昆；

一机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李水清；

燃化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尹文；

水电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张文碧；

交通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杨杰；

轻工业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毛洪祥，革委会主任钱之光；
 二机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袁学凯；
 三机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周洪波；
 四机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彭林；
 五机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邱创成；
 六机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黄忠学；
 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韦统泰，革委会正筹备；
 农林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沙风；
 财政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殷成极；
 商业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范子瑜；
 对外贸易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白相国；
 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代组长、革委会代主任姬鹏飞；
 对外经济联络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方毅；
 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李震；
 国务院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丁江，不设革委会；
 中国科学院革委会主任郭沫若，党的核心小组正筹备；
 卫生部党的核心小组、革委会正筹备；
 国务院文化组，科教组不设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委会。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冶金部全国重点钢铁企业座谈会纪要”

1970年5月13日至6月10日，冶金部全国重点钢铁企业座谈会召开。会议经国务院批准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42个重点企业、事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工人代表，共134人。

会议讨论制定1970年和“四五”期间的计划任务。确定：1970年全国产钢1700万吨，力争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到1975年，产钢4000万吨，生产能力达到5000万吨，基本建成内地的钢铁基地，并在各经济区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不同水平和各有特点的钢铁工业体系。

会议提出的主要措施有：

一、继续狠抓经济领域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二、下放企业，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冶金部原有 70 个直属钢铁企业，除两个独立矿山外，全部下放地方管理，实行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已下放和正在下放的有鞍钢、本钢、包钢、太钢、武钢、马钢、湘钢等 27 个企业，其余正在协商下放。

三、加快内地钢铁基地建设，贯彻执行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的方针和自力更生方针。

四、狠抓采矿、选矿、烧结薄弱环节，加快攀枝花、昆明、重庆、水城等钢铁厂的矿山建设，抓紧鞍钢大齐山、本钢歪头山等重点矿山建设，抓选矿过关，烧结机的建设和生产过关等。

五、大力降低物资消耗定额，要求焦必、选矿金属回收率、钢铁料消耗等指标达到历史最好时期的水平。

六、积极支援中小钢铁企业的发展。

七、坚决保证产品质量，尤其是要保证军工产品质量。

八、做好生产能力的平衡工作，中小钢铁企业要做到按地区平衡，形成完整的生产体系。

九、加强企业管理，坚持合理的规章制度，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6 月 26 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冶金部全国重点钢铁企业座谈会纪要》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转发山东关于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山东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九日关于山东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很好，可供你们参考。

中共中央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九日

关于山东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

我们于十月二十日至十一月五日召开了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到会的有省、地（市）、县、社四级和军队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同志，一部分生产大队、厂矿企业的同志，共三千多人。这次会议，学习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关于突出政治，

发展农业的重要指示，传达贯彻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开展了大批判，进行了路线分析，重点讨论了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问题，安排了今冬明春的农村工作。大家反映：“这次会议明确了方向，触及了灵魂，开出了信心，开出了决心，鼓起了干劲。”

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指引下，通过贯彻“九大”精神，落实“批示”、“十条”，我省农业战线形势一派大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深入发展，清队、一打三反、整党建党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有了新的发展。今年的农业生产获得了全面丰收，粮食总产近三百亿斤，棉花总产可达到五百五十万担，都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估计今年全省有十七个县、三百多个公社、一万七千多个大队粮食产量将跨过《纲要》。支农工业也有了发展。但是，由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前两年又有资产阶级政客王效禹的干扰，我们本身也没有把工作做好，学大寨运动不深入、不广泛，省内东粮西调的局面没有完全扭转。建国二十一年，我省农业还没有过关，大家感到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全省人民。一致表示，决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迅速改变山东农村面貌，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通过路线分析，会议着重解决了以下问题：

一、学大寨，必须对大寨有正确的认识。过去我省学大寨运动开展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许多同志长时间只把大寨看做是生产典型，没有把学大寨看成是方向、道路问题。通过学习，提高了觉悟，大家一致指出：“学大寨就是走社会主义大道，不学大寨就是搞歪门邪道”，“反对学大寨，就是走资派”。

二、学大寨，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过去我省学大寨，没有抓住根本，对我省学大寨好的先进典型，没有认真推广他们突出政治抓根本的经验，而多是推广了一些生产技术、管理方法、孤立地追求高产等。结果先进经验推不开，甚至有的单位还学歪了。

三、学大寨，必须狠抓阶级斗争。大家以大量事实说明，不抓阶级斗争，学大寨是一句空话。昌潍地区的安邱县和胶南县在文化大革命中农业生产一上一下的变化，是一个鲜明对照。文化大革命前安邱县粮食亩产量居该地区第三位，胶南县是第十一位，而一九六九年胶南上升为第三位，安邱却降为第十一位。原因

就是安邱县革委会曾在所谓“反逆流”、“反复旧”中破坏严重，资本主义泛滥，两年多的时间，全县水利工程被破坏三分之一，猪减少一半，粮食产量下降百分之二十四。而胶南县革委会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个纲，不断地向阶级敌人发起进攻，革命促进了生产，农林牧副渔全面大发展，一九六九年粮食总产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三。

四、学大寨，必须搞好领导班子革命化。大家通过回顾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进一步认识到“权”的问题解决了，掌权人的世界观问题不解决，不搞革命化，“权”还会丢，“线”还会偏。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前各级干部的精神状态，总的是好的，继续革命的觉悟有很大提高。但是有的干部有“怕”字，干劲不足。“不出头，随大流，当中游”。这次会上，集中解决了是半截子革命还是革命到底，是当促进派还是当促退派的问题。大家一致表示，决心努力带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不断地改造世界观。

五、学大寨，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有的同志深有感触地说：大寨走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而我们是“喊困难、等条件、靠投资”，“腰软、志短、手懒”。事实说明，靠救济、靠支援，越靠志越短，越靠人越懒，越靠越减产。相反的，只要发奋图强、自力更生，短时间内就能面貌巨变。例如烟台地区有十七个县（市），即墨县是个长期的“老落后”，“老十七”。今春以来，这个县男女老少齐上阵，各行各业总动员，奋战八十天，搞了两个大会战：一个水利大会战，扩大水浇地四十多万亩，等于解放后二十年搞的水浇地的两倍；一个农机大会战，生产二十马力柴油机三百台，增加的农用动力相当二十年来发展动力的百分之六十。即墨县的事实和类似事例，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有的同志说：过去“怨上不支持，怨下不听话，怨天不帮忙，怨地不打粮”，现在看“不怨天，不怨地，就怨自己不争气，不怨上，不怨下，就怨自己没听毛主席的话。”

六、学大寨，必须各行各业支援农业。这次会议学习了毛主席“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各个工业部门，都必须坚决地把自己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的教导，大家提高了全党办农业，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转轨不转轨，是路线问题，道路问题。到会的工矿企业的同志一致表示决心首先搞好思想转轨，以更好地为农业服务。

通过路线分析，大家精神振奋，决心以大寨精神学大寨，以昔阳经验赶昔阳。昔阳能办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办到，而且必须办到。会议认真讨论了中共山东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会后，全省将立即抽调大批干部和各行各业人员，深入农村，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农业学大寨”的大宣传、大落实。动员全省人民继续贯彻“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继续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抓紧“一打三反”，搞好以整党建党为重点的斗、批、改运动，对基层领导班子一个一个地进行整顿。今冬明春组织一千多万人上阵，打一场土、肥、水、林大会战，扩大水浇地一千五百万亩，新建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一千万亩，打机井十万眼。努力争取“四五”期间，农业上《纲要》，工业要跃进，基本建成独立作战区经济体系，争取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

以上如有不当请指正。

中共山东省革委核心小组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九日

根据中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各总部，军、兵种党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的核心小组：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方针的指引下，一个生产建设新高潮正在蓬勃兴起。在新的生产高潮中，全国大多数企业、事业单位的安全生产情况是好的。但是，今年以来，特别是下半年以来，有些地方，不断发生重大事故。例如，煤矿冒顶、透水、瓦斯爆炸，车间、仓库失火，火车翻车、撞车，船舶撞碰、沉没，火药爆炸，设备损坏等，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在政治上带来不良影响。这是一个必须引起各级领导十分重视的政治问题。

造成这些事故的原因，有的是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合理的安全生产制度遭到破坏，劳动纪律松弛，各行其是；有的是阶级敌人垂死挣扎，趁机破坏，进行报复。关键的问题是，有些领导干部，怕字当头，不敢抓安全生产；也有些领导干部，骄傲自满，忘乎所以，漫不经心。他们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采取不负责任

的官僚主义态度，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麻痹大意，丧失警惕。特别是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管部门，在事故发生前，既不进行安全生产教育，事故发生后，又不认真检查原因，总结经验，采取有效防范措施，也不向中央作出检查处理的报告，以致事故不断发生。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实施增产节约的同时，必须注意职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事业。”我们一定要以对革命、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教育群众把革命的冲天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群众的干劲越大，越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劳逸结合，加强安全生产，以保证增产节约运动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为此，

中央要求：

一、各级党组织、革命委员会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把安全生产摆在重要日程上。接此通知后，要结合本地区、本单位斗、批、改运动发展情况，对安全生产作一次深入的思想教育和认真的检查，查思想，查纪律，查制度，查领导，总结经验教训，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作出切实有效的规定，坚决贯彻实行。

二、各企业、事业单位及其领导机关，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批判无政府主义倾向，克服忽视安全生产和违反安全制度的现象。要对工人特别是新工人，加强安全生产知识和遵守劳动纪律的教育。安全生产，人人有责。要建立群众性的安全生产组织，定期进行安全大检查，堵塞漏洞，防患未然。对要害部位，更须严加管理和保卫。要把安全生产作为“四好”运动评比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所有企业、事业单位，在斗、批、改中，对原有的行之有效的安全制度和质量检查制度，一定要坚持，不要破掉。需要改变的，也要采取慎重态度。破旧立新，要经过试验。各级领导机关和企业领导人，要认真抓典型，好的表扬，坏的批评，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尽快地把安全生产制度建立和健全起来。

四、严格组织纪律。今后对一切违反安全生产制度，不遵守劳动纪律，工作不负责任，以致造成重大事故，必须分别情况，追究责任，情节严重的以党纪国法论处。

五、对阶级敌人制造的破坏事故，公安部门一定要追查破案。要结合“一打三反”运动，发动和依靠群众，寻根究底，查个水落石出。对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予以打击。

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党的核心小组，各大军区、省军区、各军、各总部、军兵种党委在今年年底以前，将贯彻执行本通知的情况，作一专题报告。

附：国家计委汇编的“一些重大事故的材料”

(本通知发至县、团级和企业、事业单位。附件只发省、军级。)

中共中央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〇年十月五日，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

我们于八月二十五日至十月五日，召开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到会的，有北方十四个省、市、区的省、地、县的代表和先进社、队的贫下中农代表，还有其他省、市、区和解放军各生产建设兵团的代表，共一千二百五十九人。

代表们先到大寨大队和昔阳县参观学习，然后到北京开会。会议学习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有关的重要指示，开展革命大批判，总结和交流了各地学大寨的经验，研究了当前农村工作中的有关政策问题，讨论了第四个五年农业规划的设想和措施。

会议期间，代表们热烈地学习了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学习了林副主席在国庆二十一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央两报一刊国庆社论。一致表示，坚决响应全会的号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继续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一)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正在兴起

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好。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指引下，一个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新高潮正在兴起。

一、斗、批、改的任务正在广大公社、大队一个一个地逐步落实。革命大批判、“一打三反”和整党建党运动继续深入。战备工作大大加强。广大贫下中农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农村中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

二、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有了新发展，不仅涌现了成千上万个大寨式的社队，而且出现了大寨式的县。

三、农业生产连续八年获得了丰收，今年又丰收在望。一九六九年，北京、上海、浙江三个省、市粮食亩产量已经超过《纲要》；北方的十四个省、市、区粮食上《纲要》的县有八十四个；公社有一千二百五十一个；大队有二万六千六百一十三个。今年将有更多的县、社、队超过《纲要》。长期粮食不足的冀、鲁、豫三省，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步做到了粮食自给。这是一件有战略意义的大事。

四、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很快。去冬今春，全国新增高产稳产田三千多万亩，达到四亿五千万亩；其中北方十四个省、市、区新增一千三百多万亩，达到一亿五千万亩。

五、为农业服务的工业，特别是“五小”工业迅速发展。预计，今年全国小钢铁厂的钢产量将达到一百八十万吨，生铁产量将达到三百三十万吨。全国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县有了农业机械修造厂。

现在，我国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更加巩固，粮食和大部分经济作物已经能够初步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会议指出，过去由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目前我国粮食的单产还比较低，抗灾的能力还不强，储备粮还不多，农业机械化的水平还不高。特别是北方十四个省、市、区，人口接近全国的一半，依靠南粮北调的局面还没有完全扭转。这种状况，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要求，同国民经济大发展的要求，同“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我们必须发奋图强，加倍努力，把农业生产促上去，把被刘少奇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二) 农业学大寨

代表们参观了大寨，听取了昔阳县的经验介绍，学习了人民日报《农业学大寨》的社论，思想震动很大，增强了信心，鼓足了干劲，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

首先，明确了学大寨学什么？就是要学习大寨大队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一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一句话，就是要

象大寨党支部那样，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这是大寨经验中根本的东西，第一位的东西。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广大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有了方向，有了干劲，有了办法，就可以人变、地变、产量变，就能够排山倒海。至于大寨在经营管理、生产技术方面的一些具体办法，那是第二位的东西，决不能不顾自己的条件，照抄照搬。

其次，明确了要把大寨经验普遍推开，必须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首先解决社、队领导权和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县的领导班子革命化问题。昔阳的同志说：为什么有的社、队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开展不起来？阻力来自那里？这主要是：有的社、队领导班子里钻进了坏人。有的干部被敌人拉出去了，敌我不分，互相勾结。有的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有的是所谓“老好人”当领导，墙上草，随风倒，对社会主义不热心，让资本主义自由泛滥。还有的党员干部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过不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昔阳的贫下中农说得好，“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学好学不好，关键在领导”。昔阳县就是紧紧抓住了这个关键，对全县四百多个支部一个一个的排队，用了三个冬春，开展革命大批判、清队、整党和“一打三反”，发动群众揭开了社会上和党内阶级斗争的盖子。遵照毛主席的“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教导和“吐故纳新”政策，严格区分两类矛盾，团结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清除了一小撮混入党里和领导班子里的坏人，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干部，选拔了一大批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到领导岗位。由于下了这个硬功夫，各级领导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就在全县范围内普遍推开，三年粮食总产翻了一番，亩产超《纲要》，变成了大寨式的县。会议认为，昔阳的经验是有代表性的，各地应当根据自己的情况学习推广。现在，很多县都有了自己的“大寨”，在学习昔阳经验的时候，都应当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昔阳能办到的，我们为什么办不到？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

大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倡的一面红旗。“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代表们一致认为，学不学大寨，这是农业战线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问题。大家表示决心说：“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同是一个太阳照，同是毛主席领导，大寨能够办得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够办到。”

(三) 深入开展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建国以来，我国农村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始终围绕着走什么道路这个根本问题。刘少奇和他的代理人，长期以来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肆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物质刺激”等一套修正主义黑货，妄图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复辟资本主义。叛徒廖鲁言长期把持农业部，搞独立王国，实行“条条专政”，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扼杀地方和群众的积极性。他猖狂地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群众运动，胡说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横直是不行了。他把旧农业部变成了“技术部”，变成了促退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了这一小撮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但是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还没有肃清。当前必须针对以下的问题，开展革命大批判。

一、肃清“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余毒，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到会同志列举大量事实，指出当前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很尖锐。一小撮阶级敌人篡夺了少数社、队的领导权，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兴风作浪，进行反革命活动。有些社、队，资本主义倾向严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弃农经商，破坏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事实证明，那里资本主义邪气上升，农业生产就下降；那里社会主义正气上升，农业生产就飞跃发展。武家坪大队和大寨地连地，原来是一个高级社。一九五七年以后受坏人挑动闹着分了社，从此走了两条路。武家坪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粮食亩产由三百多斤降到二百多斤，大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亩产由三百斤增加到九百多斤。后来武家坪刹住了资本主义歪风，认真学大寨，三年上了《纲要》，四年过了“黄河”，五年跨过了“长江”。山东曲阜县陈家庄，好人掌权粮食亩产五百斤。修正主义上台，好人下台，从五百斤下到三百斤。群众起来把坏人赶下了台，好人再上台，又从三百斤翻到六百斤。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去年达到一千斤。同志们指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是代表地主富农利益的口号，是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纲领。彻底肃清它的余毒，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是农村政治思想工作长期的基本任务。

二、批判“靠天、靠国家”的依赖思想，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

办农业，是靠贫下中农，自力更生，还是靠天吃饭，依赖国家？这是农业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陕西省绥德县韭园沟公社，过去是“国家出钱，农民种田”的典型。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三年间，国家投资九十六万元，只修梯田二千六百亩，打坝五座。去冬以来，他们发动群众，批判了依赖思想，没花国家一分钱，就修了水平梯田一千四百五十亩，打坝二十多座。

沈阳是一个大工业城市，共有四百二十多万人口，其中市区人口近百分之六十。过去走资派说：“沈阳是搞工业的，不能搞那么多粮食”，造成粮食、蔬菜、肉类长期依赖外省接济。省、市革委会成立后，大打“农业翻身仗”，今年就可以基本上实现口粮和蔬菜自给。

两种方针，两种结果。正如贫下中农说的：“依赖国家，越依越懒越减产；自力更生学大寨，越走路越宽”。这就是结论。

三、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和懦夫懒汉世界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毛主席在一九五五年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中曾经指出：“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延安县就是生动的一例。这里农业长期上不去，二十年来，只修水浇地一万八千亩。今年他们重新学习了毛主席一九四九年给延安人民的复电，批判了领导的右倾保守思想，发扬延安精神，半年多的时间修水浇地一万亩，大寨田三万亩。过去二十年才能做到的事情，现在不是一年就做到了吗？

当前，在新的生产高潮面前，仍然有些领导干部思想落后于形势，因循守旧，满足现状，对新生事物缺乏敏感。他们总是这也做不到，那也办不到，只守旧摊摊，不创新事业。有些人“怕”字当头，无所作为，散布“上游冒险，下游危险，中游保险”的市侩哲学。他们所谓的“保险”，就是保“私”字的险，保“乌纱帽”的险。这种错误思想不批判，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确实很危险。

四、肃清“浮夸风”、“瞎指挥”等形“左”实右的余毒，把冲天干劲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

代表们还列举大量事实，狠批了刘少奇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采用形“左”实右的手法，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罪行；批判了几个走资派在大跃进期间，到处瞎指挥，搞“一平二调”、大刮“浮夸风”，使农业生产力

遭受严重的破坏。他们所搞的那一套，实质上是用国民党的办法对待群众，剥夺农民，破坏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破坏工农联盟。“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代表们谈到，前些时候，有少数地方不顾条件，违反多数群众的意愿，刮过一点任意改变基本核算单位、收自留地的风。面不算大，但波动不小，反映了某些领导干部有点形“左”实右的思想苗头，很有必要提醒各级领导同志充分注意。

代表们根据九届二中全会的指示，分析了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情况。一致认为，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教导，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完成整党建党任务。今冬明春，各地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组织有解放军、革命干部、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到斗、批、改还没有搞好的公社和大队，一个一个支部进行整顿，解决社、队的领导权问题，“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四) 正确执行党的政策

遵照毛主席“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教导，会议讨论了如何正确执行党对农村的各项政策问题。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六十条》，对巩固集体经济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巨大的作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有了新的发展，但是《六十条》中关于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仍然适用，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中央曾经明确规定：“农村人民公社现有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关于自留地制度，一般不要变动”。一九六九年二月人民日报社论再次强调：“对运动中新出现的政策性的问题，特别是牵涉到所有制的问题，要谨慎对待，请示报告。”我们一定要加强党的政策观念，克服某些地方存在着的无组织无纪律的倾向。党的政策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具体体现。只有认真地落实政策，才能排除右的和“左”的干扰。

大家表示，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也要注意到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要对干部讲清楚，那些是党的政策许可做的，那些是不许可做的。要坚决肃清“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余毒，但在保证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要坚决肃清“物质刺激”、“工分挂帅”的余毒，又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既要批判“分光吃尽”的错误倾向，也不要一下子积累

过多，影响社员的当年收入。在服从国家统一计划的前提下，要允许生产队因地制宜种植的灵活性。要提倡社会主义协作，逐步发展公社、大队经济，但切不可重犯穷富拉平的“一平二调”错误。国家举办企事业，或者把企事业下放给生产队交贫下中农管理，都不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劳力、生产资料和其他物资，不得加重社员负担。不要因为动员农民支援国家建设，就过多地从生产队抽调劳动力，影响生产队的生产和建设。目前有些社、队，随意增加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开支，降低社员收入，影响社员积极性，各地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

(五) 加速实现农业发展《纲要》

遵照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会议讨论了第四个五年农业发展规划的设想。

一、奋斗目标，尽快“扭转南粮北调”，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已经实现的地区，要把农业生产推向新的高峰。要加快大三线和北方缺粮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切实抓好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农、林、牧、副、渔五业，要全面安排，有计划地布局。要突出粮食，又要发展多种经营，防止单打一。要重视林业和畜牧业。“十年树木”，大牲畜也要几年才能成长起来，要早抓。

三、下苦工夫，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不改变，产量就无法稳定，农业的被动局面就不能根本扭转。第四个五年，要通过改土和兴修水利，做到每个农业人口有一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丘陵山区，要搞梯田。平原地区，要搞深翻平整，改良土壤。水利建设，要坚持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的方针。治水要与改土、治碱相结合。要积极打井，研究利用地下水源。

四、努力增加肥料。主要是发展养猪。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养猪；合理解决猪饲料，继续执行交售肥猪由国家适当补助饲料粮的政策；社员投肥要合理付酬。增产饲料粉碎机，普遍推广糠化饲料，防治猪瘟。第四个五年，要实现两人一猪，争取做到一人一猪。“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要因地制宜大种绿肥，积极发展化肥。

五、全面实行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积极推广良种，因地制宜合理密植，实行间作套种，积极发展农药，防治病虫害。积极交流和推广新技术。

六、“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不搞农业机械化，光靠手工劳动，就不可能更快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可能改变六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也就不可能腾出劳动力加快工业建设。毛主席提出“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已经过去十五年了。我们要切实抓紧今后十年的工作。第四个五年，争取耕作机械化水平达到可机耕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左右，排灌机械化水平达到百分之六十左右。

农业机械化，应当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因地制宜，适应精耕细作的要求。要土洋并举，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并举，要从原材料搞起，努力发展“五小”工业。要坚持为农业服务的方向。

各省、市、区应立即着手，制定一九七一年和第四个五年农业发展规划。“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

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每年看前冬。各地要切实抓好当前的秋收秋种和今冬明春的农田基本建设。

(六) 加强党的领导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发展农业，必须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都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加强对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领导。特别是地、县两级，要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农村工作上。三线地区和粮食没有过关的地区，更要尽快把农业搞上去。农业不过关，就没有主动权。

发展农业，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事情，不只是农业部门的事情。工交、财贸和其他各个部门应当把支援农业作为自己的光荣任务，积极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

在当前农业建设新高潮面前，一定要当好促进派。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改造世界观，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要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既要有冲天的革命干劲，又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讲求实效，不务虚名。“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生产、生活要同

时抓，劳逸结合，防止片面性。“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遇事同群众商量，不能心血来潮，忘乎所以。

目前，有一些领导干部，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对待革命和生产、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把两者平列起来，或者对立起来。他们不懂得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没有在脑子里扎根。也有些人，不是用革命带动生产，而是用革命代替生产。我们一定要全面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领导农业工作，一定要依靠贫下中农，走群众路线。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是防修反修的重要措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一定要抓好典型”、“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及时总结经验，以点带面。会议要精简，“五多”要反对，那种“浮在会上，抄在纸上，挂在嘴上”的作风，必须坚决改正过来。中央农林部门，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深入基层，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和规划，交流先进经验。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同地方商量，切实给地方以帮助，坚决打倒“条条专政”。

全体代表坚决表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乘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东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国务院一九七〇年十月五日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翻印)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调整民航收费标准的决定
具体调整方案是：

一、将原来不分航程远近每客公里都一样收费的办法，改为递远递减的收费办法。客运票价国际航线不变，国内航线平均降低 28% 左右。专包机收费，在使用单位不利用回程吨位或调机吨位时，减收 30% 的费用。专业飞行收费标准，包括执行放射性测量任务和农林业飞行，也分别不同情况有所降低。

二、各地县、市以上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科处级以上干部和部队营连职以上干部，以及其他因公需要乘坐飞机者，均允许乘坐民航班机，不受过去规定职务和 13 级以上级别的限制。

民航新的收费标准，自 3 月 1 日起实行。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的报告

1971.04.11；中发 [1971] 28 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党的核心小组、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

现将国务院关于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的报告发给你们，望研究执行。在执行中，各地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不要千篇一律，生搬硬套，瞎指挥。认真落实“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要扎实实地去抓，要过细地做工作，力争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有一个全面的大幅度的增长。

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一日

(本件发至公社、大队)

毛主席语录

备战、备荒、为人民。

农业学大寨。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国务院关于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的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

我们于三月三日到三十日，在北京开了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到会的有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一百一十六个地区，二百二十六个县的代表，有七十六个社队的代表，还有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場、糖厂、科研单位的代表，共六百零一人。

会议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最近关于批修整风、反骄破满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了两报一刊编辑部《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的文章，以批修为重点，开展了革命大批判，研究落实“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交流了经验，讨论了有关政策和今后发展生产的问题。

大家一致反映，这次会议开得好，突出了无产阶级政治，受到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受到一次生动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提高了觉悟，统一了认识，明确了方向，鼓舞了干劲。

一、棉油糖生产形势很好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和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指引下，全国革命和生产形势很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掀起了新高潮，农村斗、批、改和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开展，毛主席一九七〇年三月批示“照发”的《国务院关于全国棉花生产会议情况的报告》，进一步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广大贫下中农满怀革命豪情，战天斗地，夺得农业连续第九年的丰收。棉油糖生产也有较大的增长。一九七〇年，全国棉花总产量四千六百多万担，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二。花生、油菜籽、芝麻七千万担，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八。糖料三亿一千六百万担，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六。

一九七〇年棉油糖生产出现了许多鼓舞人心的事迹。一批先进单位继续前进了，作出新的贡献；不少后进社队，一跃跨入了先进行列；一些先进典型的经验逐步推开了，大面积增产的地区越来越多；一些地方战胜长期阴雨等自然灾害，夺得了丰收；许多地方做到粮食同棉油糖齐发展，多贡献。全国亩产皮棉百斤以上的县三十八个，加上亩产八十斤以上的县，共八十八个，比上年增加二十一个。山东、河北、河南花生总产量增长百分之三十到七十。黑龙江、吉林、辽宁大豆总产量增长百分之十八。广东、福建、广西、江西等省区甘蔗获得大面积丰收。

棉油糖生产虽然有了较大的增长，但还不能适应当前国民经济发展和战备的需要。随着工业发展，人民生活提高，出口援外增多，产需之间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有了矛盾怎么办？降低人民消费水平吗？不行；靠进口解决吗？更不行。根本方针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毛主席早在一九三四年就指出，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在努力增产粮食的同时，积极发展棉油糖生产。要坚决执行国家计划，保证棉油糖的种植面积，大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一年国家计划规定的产量指标。力争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棉花亩产上《纲要》，北方八十斤，南方一百斤。缺油省、区实现自给，可以种糖料的省、区做到食糖自给或部分自给。有条件的地区，都要对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二、狠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

二十年来棉油糖生产发展的过程说明，什么时候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革命就前进，农业就发展，棉油糖生产就增长；什么时候毛主席革命路线受到干扰和破坏，革命就受挫折，农业就下降，棉油糖就减产。这是必须牢牢记取的历史经验。

到会同志以最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联系各地实际，揭发批判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等一类骗子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滔天罪行。狠批他们采用右的和形“左”实右的反革命两手，时而主张农村实行所谓全民所有。破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时而又推行“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瓦解集体经济。狠批他们时而鼓吹取消自留地，消灭商品生产，取消等价交换，大刮“共产风”；时而又鼓吹自由市场，自由经营，弃农经商，发展资本主义。狠批他们时而大搞平均主义，取消按劳分配，反对合理的奖励办法；时而又大搞工分挂帅、物质刺激，不搞集体积累，破坏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等等。他们两种手法，一个目的，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大家表示，一定要继续深入揭发批判，肃清他们的余毒。

这次会议介绍的先进典型，也充分说明只有狠抓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狠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不断地同阶级敌人斗，同资本主义倾向斗，同时向那种懦夫懒汉思想、骄傲自满情绪作斗争，才能使棉油糖生产，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向前发展。他们的经验主要是：

（一）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树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观念。河南新乡县有七十个后进大队，长期粮棉产量很低。贫下中农说：“不是人不干，不是地不产，而是阶级敌人在捣乱”。一九六九年以来，他们放手发动群众，打击了阶级敌人，整顿了领导班子。一九七〇年粮食超《纲要》，棉花亩产过百斤。后进队上来了，震动了先进队，促进了中间队，推动了全县农业的更大发展。湖北孝感县胜利大队，一九六六年以来，连续三年高产。一九六九年在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下，有的干部被敌人拉了过去，有的生产队领导权被篡夺，棉花亩产从一百八十六斤跌到九十八斤。一九七〇年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揪出了坏人，调整了领导班子。棉花亩产猛增到二百零四斤。

(二) 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山东昌潍地区，过去十多年棉花亩产徘徊在二三十斤之间。文化大革命以来，批判了“金钱挂帅”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为革命种棉，为战备增产，产量逐年上升。一九七〇年一百零五万亩棉田，平均亩产一百零二斤，成为北方第一个百斤皮棉地区。黑龙江绥化县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胸怀全局，落实国家计划，一九七〇年四十万亩大豆，亩产二百五十一斤。向国家交售粮食三亿斤，大豆七千万斤。

(三) 批判懦夫懒汉思想，树立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雄心壮志。新疆吐鲁番县五星公社，地处天山脚下，风大沙多缺水。他们学大寨人，奋战七年，造林固沙，筑起了“绿色长城”，修起了引水渠道，建成了稳产高产田。一九七〇年粮食亩产四百多斤，棉花九十多斤。葡萄、蚕茧、牲畜也有很大增长。安徽临泉县大破无所作为的“低产有理论”，把后常湾二队艰苦奋斗，一年巨变的先进经验推广到全县。一九七〇年粮食、棉花、油料大增产。这个淮北多灾低产的县，一年之间，面貌大变。

(四) 批判骄傲自满情绪，树立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思想。山东滨县杨柳雪大队成为棉区的一面红旗以后，有些人觉得“干部抓得不坏，社员干得不赖”，“棉过百，粮过千，再要增产难”。党支部抓住这个苗头，批判了“潜力挖尽，增产到顶”思想，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觉悟。革命加拼命，苦干加巧干，在连续多年丰收的基础上，一九七〇年又获得大幅度增产。平均每人向国家交售粮食二百斤，棉花一百八十斤。多年高产的上海南汇县泥城公社，克服自满麻痹思想，积极做好抗灾准备，以“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战胜了连续四十三天的阴雨低温，夺得了又一个好收成。一九七〇年粮食亩产一千三百六十五斤，棉花一百八十三斤，油菜籽三百三十斤。河北正定县，一九六八年粮过《纲要》、棉过百斤，部分干部产生了自满松劲情绪，一九六九年棉花下降到八十三斤。一九七〇年他们总结了经验教训，反骄破满，粮食亩产上升到七百七十三斤，棉花亩产一百一十六斤。

象这样的先进事例各地都有很多。它向大家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地方可以这样做，别的地方就不可以这样做呢？为什么一些地方长期低产上不去，一些地方先进经验推不开，一些地方上去了又掉下来？根本的原因是抓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反映到生产中来。因此，绝不能就生产论生产。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时刻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切不可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三、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代表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认识到农、林、牧、副、渔五业之间，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十二项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毛主席说：“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毛主席这一生动的比喻，教导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处理粮食同棉油糖等经济作物的关系。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须知我国是一个具有六亿五千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粮食抓紧，丝毫不能放松。同时，也必须抓好棉油糖等经济作物。发展棉油糖生产，对支援国家建设，加强战备，保证市场供应，改善人民生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展棉油糖生产，也有利于增加社员收入，扩大社队积累，促进农业机械化，巩固发展集体经济。事实证明，认真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路子就越走越宽，集体经济就越办越兴旺，对国家贡献就越来越大。

现在有些地方“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贯彻得不够好，有阶级敌人的破坏，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干扰，也有思想认识问题。因此，必须把执行这一方针，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必须狠抓阶级斗争，同时切实解决农业生产领导思想上的片面性问题。

粮食和棉油糖能不能全面发展呢？实践证明是可以的。山西大同县萝卜庄大队是一个人少地多的地方。他们合理安排粮食和甜菜等作物的种植面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利用甜菜叶和废丝喂猪，猪多、肥多、粮多、甜菜多。两年来，猪由三十八头增到五百七十六头，粮食产量由三十三万斤增到九十万斤，甜菜由十三万斤增到六十二万斤，向国家交售粮食由五万多斤增到四十二万斤，买了牲畜、拖拉机，打了机井，社员收入增加了，集体经济越来越巩固。

江西南康县崇文大队，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地方，全队三千九百多人。每人只有六分六厘地，过去一年要吃统销粮六十万斤。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实行粮食和经济作物并举。一九七〇年粮食亩产一千三百八十七斤，甘蔗亩产九千九百多斤，粮食自给水平大大提高，每人交售甘蔗近二千斤。

四川剑阁县化林大队，是一个自然条件差的地方。这里山高土薄，过去不种棉花、油菜，粮食也不能自给。几年来他们学大寨人，学大寨的经验，大搞治山改土，精耕细作，一九七〇年粮食亩产九百五十斤，棉花亩产二百零六斤，油菜籽亩产三百八十六斤，大豆亩产四百二十九斤，花生亩产三百四十五斤。缺粮变余粮，各种作物样样高产。

一个社队能够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一个县、一个省、市也能全面发展。湖南安乡县过去有“单打一”思想，片面认为：只要粮食上去了，“对上好交账，对下好说话，生活好安排。”一九七〇年认真落实全国棉花会议精神，粮棉生产统一安排，抗涝抗旱，精心管理，全县粮食亩产达到八百四十八斤，棉花亩产一百零一斤，生猪三十六万五千头，平均每户四头，林业渔业的发展也获得很大成绩。广东省历史上缺粮缺油缺肉。他们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落实政策，做到粮食超《纲要》，经济作物也发展了，近几年每年调出粮食十多亿斤，一九七〇年还调出食油一千万斤，生猪四十五万头，多年来甘蔗一直占全国糖料总产量的一半。水果、蚕茧等都有较大的发展。上海市郊区各县，多年来粮棉超《纲要》，食油高产，全市一千多万人口做到自给。蔬菜、肉鱼、瓜果也有很大的发展。这为大中城市郊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以上事实说明，发展粮食同发展经济作物是相互促进的。有的人只看到棉油糖同粮食争地、争劳力的一面，看不到它们之间互相促进的一面，机械地把粮食和经济作物对立起来。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只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认真执行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八字宪法”，科学种田，提高单产，就能够促进矛盾的转化，就能够在同样的土地面积上，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低产可以高产，高产可以更高产，事在人为。

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一定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经济作物种类很多，它们对土壤、气候、雨量、日照等各有不同的要求。必须根据当地

的自然条件和国家的计划，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不能不顾条件，不问经济效果，千篇一律，瞎指挥。

四、认真落实政策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明确规定了现阶段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政策。毛主席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批示“照发”的《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又重申了这些基本政策原则，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有关棉花生产和收购的政策，在一九七〇三月《国务院关于全国棉花生产会议情况的报告》中，已经作了规定，应当认真落实。

根据以上文件精神和过去的有关规定，对油料、糖料生产和收购的政策，经过到会同志讨论，提出如下意见：

(一) 合理安排油料、糖料集中产区的粮食征购任务和统销指标，坚决保证社员口粮不低于邻近产粮区的标准。

(二) 油料统购，超额完成任务的部分继续实行加价奖励的办法。留油标准由省市区自定，增产多、贡献大的，可以适当多留。

食油继续执行在农村基本上只购不销的政策，油料基本上在产地加工。

(三) 适当提高花生、油菜籽、芝麻、大豆等部分油料、油脂收购价格和糖料收购价格。调价幅度和调价办法，另由国家计委下达。

(四) 大豆面积和产量与粮食分别计算。一年一熟的大豆集中产区，上《纲要》的指标，建议定为二百六十斤。

(五) 大力发展木本油料。木本油料种类很多，不占耕地，大有可为。南方丘陵山区应当注意发展油菜、油桐、乌柏，北方丘陵山区应当注意发展核桃、油树、花椒等木本油料。陕西商雒专区每户种一升核桃。这个经验值得各地研究。

鼓励采集野生油料。利用荒山和闲散土地种植向日葵、蓖麻等油料。

(六) 加强集市管理。凡是国家规定不许上市的物资，一律不准上市。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巩固社会主义阵地。

此外，社员自留棉换购，由一斤皮棉三尺布票，改为五尺布票。

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对有关粮油糖的各项政策，要反复宣传，把政策交给群众，切实贯彻执行。

五、关键在于党的领导

实践证明，要把粮食和棉油糖生产抓上去，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特别是县以上的领导。

遵照毛主席关于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指示，认真进行批修整风，重点是批修。要抓住当前的极好时机，进一步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等一类骗子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要认真读书，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要反骄破满，提倡谦虚谨慎，使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要提倡实事求是，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通过批修整风，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朝气蓬勃、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遵照林副主席“要用革命统帅生产，促进生产，带动生产”的指示，摆正革命和生产、政治和经济、一好和三好的关系。切实纠正当前一些领导干部把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或者平列起来的倾向。我们一定要学习人民解放军，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开展四好运动，全面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要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学不学大寨，同样是棉油糖生产中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问题。学大寨，首先要象昔阳县那样，狠抓基层领导班子。要下硬功夫，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结合“一打三反”和整党建党运动，放手发动群众，分期分批，一个一个支部地去解决，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

一定要抓好典型。这次会议上交流的先进经验，必须大力传播；同时，要总结本地区的先进典型经验，认真推广。要抓两头带中间。只要我们扎实地去抓，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粮食和棉油糖等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就会迅速出现一个更加全面发展的新局面。

各行各业都要大力支援农业。工业、交通、财贸等部门，要把支援农业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要认真落实支援棉油糖生产的措施。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我们要紧紧的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完成党的“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认真贯彻执行“全国计划会议”和“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精神，乘胜前进，夺取粮、棉、油、糖及其他经济作物的更大丰收，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新的贡献。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国 务 院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日

附：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三十三个典型材料提要
(此件只发到省、军级，不再下达。)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关于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的报告》

《报告》决定：对国防工业的管理，实行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国防工厂的管理体制只下到省一级，第四、五机部的工厂全部下放，第三、六机部的工厂部分下放，由大军区国防工业领导小组领导。并确定：

一、国务院各国防工业部主要负责：基建规划和年度计划，编制长期和年度生产和科研计划，组织主要物资供应，组织全国生产协作配套，统一分配产品，统一产品技术标准，有计划地调配技术力量支援新厂建设。

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政治思想领导和干部管理，本大区内建设规划和布局，组织并检查督促生产、科研和基建的实施，组织本大区内国防工厂的生产协作配套，协助省（区）、市组织本大区内民用工厂的军工动员生产。协同国务院各国防工业部组织主要物资的供应。

三、各省（区）、市主要负责：本省（区）、市内国防工厂、工地的党政工作和干部管理，生产、科研和基本建设的实施，组织物资的供应和管理，劳动力的补充和调配，企业财务管理，组织本地区内国防工厂的协作配套。国防工业办公室要协助组织民用工厂的军工动员生产。

四、为了确保战备的需要，国防工厂下放后，工厂的生产方向、产品方案、协作关系一律不变，确需改变或调整时，必须经过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批准。

军工材料、设备、投资要保证用于军工。对于计划外的临时任务，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由主管工厂的部门统一安排，归口下达，避免“多头”。

一九七一年七月八日，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

《报告》提出，1969 年、1970 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高达 26% 左右。为了切实控制人口的盲目增长，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要求在“四·五”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要逐年降低，争取到 1975 年，一般城市降到 10% 左右，农村降到 15% 以下。原来城乡综合增长率低的不应回升。

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措施，主要是大力开展晚婚、计划生育宣传，成立抓计划生育工作的机构，医疗卫生单位和人员做好技术指导，提高节育手术质量，加强避孕药具的研究、生产和供应。

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经费，由省、市、自治区统筹安排。

国务院在转发《报告》时，重申了毛泽东的指示：“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也要有计划生育。”要求除人口稀少的地区外，各级都要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

这一文件是七十年代在全国大力开展计划生育的新起点。《报告》下发后，各省、市、自治区和卫生部门加强了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和各项计划生育措施的落实，使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渐降低。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四日，国务院关于内迁职工家属安置问题的有关规定

《规定》说，1964 年以来，为加快内地建设，全国约有 380 个项目，14.5 万名职工，3.8 万多台设备从沿海迁往内地。但迁建工厂的职工家属，随迁的只有 20—30%，大部分仍留在沿海，长期两地分居，生活上带来许多困难，而且每年探亲，增加国家开支，耽误生产。因此，国家规定：内迁职工的家属都允许随迁，原来吃商品粮的家属可以在内迁企业的所在地落户，原来户口在农村的仍落农村户口，个别确有困难的直系亲属也可以落城镇户口。安排内迁职工家属工作的原则是：原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的固定工，内迁后就近安排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工种不对口可以调整；原在全民所有制单位担任常年性工作的临时工、

合同工，如生产需要、本人符合条件，可由迁出地区转为固定工后内迁；原在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或从事临时性工作的家属，内迁后就近安置在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如果全民所有制企业有招工指标，够条件的可以吸收为固定工；原来没有参加工作和家居农村的家属，可以组织起来办集体性质的小工厂或从事农副业生产和服务性劳动，还可以到农村插队落户；内迁职工的子女，已经上山下乡的不随迁，需要照顾的独生子女等，可以迁入当工人，或同当地知识青年一起统一安排。这些规定，解决了部分内迁职工两地分居问题，但由于内地工作生活条件的限制和其他原因，仍有许多内迁职工的家属不能或不愿随迁。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一日，国务院批准全面调整银行利率

1971年8月11日，国务院批准全面调整银行利率。调整利率的原则是：适当降低利率水平，简化利率种类，取消某些不合理的优待利率。

具体方案是：

一、农业贷款，原来利率比较低的仍维持不变，原来偏高的，适当降低。农副产品预购定金，国营农场和农村社队生产费用贷款，农村社办企业贷款，由4.8%和6%降为3.6%。农村信用社对社队和社员的存款和贷款改按银行利率执行，农村社队存款利率由1.8%降为1.5%，信用社对社队农业贷款和社员贷款，对社办企业贷款，由最高7.2%降为3.6%；信用社对社队生产设备贷款和向银行贷款，由3.9%降为1.8%；信用社在银行转存款，利率由3.9%改为2.7%。

二、国营工商企业存贷款利率，适当调低，存款利率，由1.8%降为1.5%；贷款利率由6%和4.8%降为4.2%。城镇集体经济的存款和贷款与国营企业实行统一的利率。

三、华侨人民币定期储蓄存款利率由年息2.88%到8%改为月息3.3%，略高于国内。华侨或外国人的外币存款，改按国内活期储蓄存款利率办理，大使、领馆的外币存款仍为无息不变。

四、城乡人民定期存款利率，原来存半年以上的为2.7%，一年以上的为3.3%，这次统一为2.7%。调整后，贷款利率降低30%左右，存款利率降低20%左右。调整利率的时间，除国营工商企业自1972年1月1日执行外，其它一律从1971年10月1日起执行。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国务院“关于 1971 年物价调整方案”

《调整方案》说，为了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决定适当提高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价，降低部分支农产品、机械产品的出厂价和销售价。

调价的主要内容是，

一、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油料、油脂平均调高 16. 7%，甘蔗调高 15. 3%，东北菜牛调高 5. 8%，黄连、党参、黄芪、红花等中药材平均提高 12. 3%。

二、工业品的销售价和出厂价：化肥分别降低 9. 7% 和 12. 4%，农药分别降低 15% 和 9. 6%，煤油分别降低 20. 8% 和 21. 6%，柴油分别降低 9. 7% 和 8. 8%。润滑油销售价降低 10. 5%，内燃机、齿轮箱、联合收割机、多级水泵、仪器仪表、工业锅炉、汽车配件的出厂价平均降低 15. 7%。电子工业基础产品的出厂价平均降低 17. 1%，其中地方企业产品降低 18. 8%。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实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通知

从 1965 年开始，连续 6 年实行的粮食征购一定三年的政策，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通知》说，从 1971 年起，粮食征购实行一定五年的政策。各省、市、自治区在这个期间内，对有的社队由于国家投资兴修水利后增产幅度较大，或发现少数社队畸轻畸重的，可经过协商作适当调整。

《通知》还对 1971 年至 1975 年粮食征购基数作了调整。由现行的 726 亿斤调整到 765. 5 亿斤，增加 39. 5 亿斤。各省、市、自治区向下分配任务时，可以在中央确定的征购基数基础上，增加 5% 左右的机动数，用以调剂受灾减免，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省以下各级不得层层加码。为了保证国家建设和增加储备的需要，在丰收的地区，可以通过协商，向社队适当超购一部分粮食。超购的粮食，继续实行加价奖励的办法，超购加价幅度不得高于统购牌价的 30%。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新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划分阶级成分问题的指示

原则同意两个省、区在没有划过阶级成份或过去虽然划过但没有划清的少数民族地区，参照西藏社会主义改造中执行的原则和政策划分阶级成份。

(1979年2月27日，国务院批准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的报告，提出1970年在牧区划定的阶级成份应予推倒，不予承认。)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外贸部、农林部关于发展狩猎生产的报告

《报告》指出：

1950年至1970年，全国收购野生动物皮毛约2.89亿张，还收购了大量的鹿茸、麝香、野禽、野味、羽绒、观赏动物等，对经济建设和援外出口起了重要作用。

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许多地区狩猎生产处于无人管理状态，乱捕滥猎，破坏资源；或者不捕不猎，浪费资源，酿成兽害；猎枪、猎具供应不足。二、有些地区把狩猎生产看成“不务正业”，或者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来批判；有些地区却对“弃农就猎”，盗猎国家珍贵动物不加禁止，狩猎产品自由买卖、投机倒把。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狩猎生产的发展。

《报告》提出几点意见，一、各级商业部门要加强基层收购力量，合理设置收购网点，便于群众交售。二、积极收购国家建设和出口需要的狩猎产品，同时做好狩猎物资的供应工作。三、坚持合理的奖售制度，妥善供应劳保用品、猎犬、饲料粮。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的通知

《通知》指出：这次调整工资，主要是考虑1958年参加工作的二级工已经工作多年，多数已成为生产骨干，有两三个孩子，每月工资在40元左右，生活确有困难。因此，有必要对他们的工资和情况类似人员的工资进行一次调整。

这次调资的范围是，1957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三级工，1960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二级工，1966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一级工和低于一级工的工人，以及与

上述工人工作年限相同，工资等级相似的职工。矿山井下主要生产工人的调整范围，可以分别放宽一级。

调整范围内的工人和工作人员，一般都调高一级。对 1957 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二级工、1960 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一级工和低于一级工的工人，可以调高两级。

在这次调整工资中，调高一级的工资级差在 5 元以上的按现行工资标准执行，级差不够 5 元的增加到 5 元，并对这次调级以后的同一年级人员，也按调高一级人员的工资额发给工资。

此外还规定，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从 1971 年起新招收的人员，实行工分制或供给制，并发给一定的零用费。1966 年以来分配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中工作的中专、技校、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生，工作已满一年以上，可以转正定级。

《通知》说，这次全国调资面为 28% 左右，一年约增加工资基数 11 亿元。不论何时调整，一律从 1971 年 7 月 1 日起增加工资。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国务院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

全国共有临时工、轮换工 900 多万人，其中从事常年性生产的约 650 万人，从事临时性、季节性生产的约 250 万人。

《通知》规定，常年性的生产、工作岗位，应该使用固定工，不得再招用临时工。

现在这种岗位上使用的临时工，凡是生产、工作确实需要，本人政治历史清楚，表现较好，年龄和健康状况又适合于继续工作的，经群众评议，领导批准，可以改为固定工。改为固定工后，工资一般暂不变动，少数人工资过高，群众意见大的，可以适当调整；工资偏低的，按照 1971 年 11 月 30 日国务院发出的调资通知中有关规定调整。上述临时工改为固定工，不包括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的农业临时工。

临时性、季节性的生产、工作岗位，仍须使用临时工。这些临时工在企业工作期间的政治待遇、粮食定量、劳保用品应当和同工种的固定工相同。因工死亡、致残的应按固定工的劳动保险待遇执行。

对于矿山井下的生产工作岗位，从保护工人身体健康出发，可以继续试用轮换工，并应逐步改进。

县办企业的临时工改为固定工，要采取慎重态度，从严掌握，并须经省、市、自治区审查批准。

来源：国发〔1971〕91号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日，国务院关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报告

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英明指示，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八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

会议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农业机械化的一系列英明指示，着重解决要不要农业机械化和怎样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开展了革命大批判，交流了经验，讨论和拟订了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草案）。大家坚决表示，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保证在一九八〇年完成毛主席提出的“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伟大战略任务。

（一）农业机械化的新高潮正在兴起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革命和生产形势越来越好。毛主席一九六六年亲自批示召开的农业机械化湖北现场会议以后，特别是党的“九大”以来，在各级党委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很快，一个群众性的办农业机械化的新高潮正在蓬勃兴起。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有关农业机械化的指示更加深入人心。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深刻体会到，搞农业机械化，是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必由之路，办农业机械化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不断深入，农业连续九年丰收，人民公社多种经营日益发展，公共积累逐年增多，广大社员对农业机械化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全国各地自力更生办农业机械化的先进典型不断涌现。

群众性的农具改革有了新的发展，广大工人和农村中的能工巧匠创制的插秧机、割禾器、脱粒机、点播耧等农机具，正在推广。一支亦工亦农的技术队伍在茁壮成长。

经过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努力，我国钢铁、煤炭、石油等原材料工业大幅度增长，地方小钢铁、小煤矿、小水泥、小化肥、小水电、小机械等“五小”工业得到很快的发展。各行各业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援。一九七〇年和一九六六年相比，农机产品增加三百多种；耕作机械、排灌机械、加工机械、运输机械等机械化半机械化农机具的产量成倍增长。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县，有了农机修造厂。

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的迅速发展，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

但是，我国目前农业机械化的水平还很低，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不强。这种状况，同毛主席对我们的要求，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同广大群众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强烈愿望，都很不适应。到会同志一致表示，今后一定要坚持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加速农业机械化的进程。

（二）坚持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

遵照毛主席关于批修整风和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教导，会议开展了革命大批判。到会同志以大量事实，说明十几年来，在我国农业走什么道路，要不要农业机械化和怎样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我国农业机械化问题，深刻地论述了农业机械化的伟大意义，为我国实现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制订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五年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就充分地、完整地阐明了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又明确指出：“在完成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这是我们党在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坚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路线。

广大贫下中农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的指示，迅速地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在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毛主席一九五九年又及时指出：“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发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

化”的英明指示。单有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而没有机械化，工农联盟是不能巩固的。广大群众，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很快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农具改革运动。为农业服务的“小、土、群”工业迅速发展。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伙，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一贯反对我党实现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他们先是扯起新老修正主义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的破旗，鼓吹“先机械化，后合作化”，大砍合作社，妄图阻挠破坏农业集体化；在全国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他们又大肆散布“人多地少不用机械化”，“精耕细作不能机械化”，竭力反对农业机械化；当群众性的农具改革运动兴起的时候，他们又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叫嚷农具改革要“一天革几个命”，阴谋扼杀农具改革运动；他们利用三年暂时经济困难，大杀大砍农机工业和地方工业；他们还到处推销“国家出钱、农民种田”，“条条专政”和“高度垄断”等黑货，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指出：实现农业机械化“已经过去十年了，这十年我们抓得不大好。”十年抓得不大的根本原因是刘少奇一伙的干扰破坏。国务院主管农业机械化工作的部门，没有很好执行毛主席有关农业机械化的路线、方针、政策，延误了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及其一伙，狠批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农业机械化的一系列英明指示，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出现了大好形势。但是，刘少奇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没有肃清，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要不要农业机械化和怎样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代表们一致认为，现在的主要问题，还是领导落后于群众，落后于形势。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有些同志对毛主席关于农业机械化的一系列英明指示学习不够，理解不深。只认识到实现农业集体化是方向、路线问题，没有认识到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是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一次伟大的革命，是关系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工农联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问题。我们要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不断地提高路线斗争觉悟。

要继续批判“条条专政”，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当前，既要进一步肃清“该放不放”的“条条专政”余毒，又要批判撒手不管的官僚主义，也要防止不从全局出发、不顾整体利益的本位主义倾向。

要批判“专家路线”，要大搞群众运动。少数人办，冷冷清清；大家办，热气腾腾。“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小搞不行，中搞也不行，必须大搞。办农业机械化也必须如此。

要批判单打一的形而上学观点，要坚持工农业并举，“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既要抓好粮食生产，又要抓好多种经营，才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才有利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

要批判坐等条件、依赖外援的懦夫懒汉思想，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半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懦夫懒汉思想不批倒，农业机械化就快不了。

要批判贪大求洋的错误思想，要坚持土洋并举，机械化、半机械化并举的方针。只搞大的、洋的，不搞中小的、土的；只搞机械化，不搞半机械化，不利于动员群众多快好省地发展农业机械化。

要批判重制造、轻维修，重主机、轻配套配件，重数量、轻质量，重使用，轻管理的错误倾向，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四重四轻”使大批农业机械因为失修或配不上套不能发挥作用。有的贫下中农为了修好一台农业机械，跑遍多少个城市还买不到一个配件，他们气愤地说：“黄牛病了可以治，铁牛病了没人治”，“没有机器想机器，有了机器愁修理”。“四重四轻”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是“利润挂帅”、“支农吃亏论”等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必须彻底批判。

要批判“早化晚化，关系不大”的右倾思想。要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积极地、有计划地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

（三）走我国农业机械化自己的道路

我国农业机械化的道路，就是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就是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用革命化领导机械化，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农业和工业同时并举，既搞机械化也搞半机械化。坚持农业机械制造以地方为主，农业机械产

品以中小型为主，农业机械购买以集体经济为主。适应农业“八字宪法”和高产稳产要求，促进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农业。这是一条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搞农业机械化截然不同的道路，是符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要求的道路。各省、市、自治区许多农业机械化的先进单位，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前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积累了很好的经验。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始终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一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他们用革命化领导机械化。现在已基本上实现了碾米、磨面、脱粒、铡草、饲料粉碎的机械化，整地、改土、耕作、运输的部分机械化。由于搞了这些机械化，相当于给全大队增加了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就能够向生产的深度广度进军，不仅农业持续地高产稳产，粮食亩产从二百多斤增加到一千零七十一斤，还发展了副业生产，开展了多种经营，改变了山区面貌。

湖北省新洲县刘集公社，在一九五五年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之后，就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自力更生办机械化。他们针对当地易涝易旱的特点，从发展农田排灌机械入手，逐年增添农业高产稳产最急需的农业机械。他们顶住了刘少奇一伙的种种干扰和破坏。他们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一九六五年就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粮棉连续八年超《纲要》，发展了集体经济，巩固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机械化不仅使他们进一步做到精耕细作，还腾出了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发展副业和社办工业，一九七〇年工、副业收入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公共积累已达三百多万元。贫下中农自豪地说：“农业机械，我们买得起，用得了，管得好”。

河北省遵化县，在贯彻“九大”精神和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狠抓阶级斗争，狠抓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正确处理工业、农业、商业之间的关系，做到分工不分家，工农业互相促进。各行各业拧成一股绳，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狠抓钢、铁、水泥等原材料工业，为加速农业机械化服务，为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服务。他们狠抓粮食生产，又积极开展多种经营，

增加了收入，扩大了积累，为购买机械提供了资金，促进了县社工业的发展。一九七〇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五百零二斤，工业和副业产值达二千六百多万元，都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全体代表到遵化县参观，学习他们“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以粮为纲，多种经营，以副养机，以机促农，以轻促重，以重支农”的经验，看到那里的“穷棒子”精神大放光芒，焊铁壶的黑白铁社用土设备轧钢板，修鞋社搞马车轮胎翻新，只有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变成了欣欣向荣的新农村，一派工农业齐发展的景象，使大家眼界大开，触动很大。

代表们学习了大寨、刘集、遵化和全国各地先进单位的经验，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家能办到的事，我们为什么办不到？这正如毛主席在《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按语中尖锐指出的：“为什么这个地方可以这样做，别的地方就不可以这样做呢？如果说不可以，你们的理由在什么地方呢？我看只有一条理由，就是怕麻烦，或者爽直一点，叫做右倾机会主义。”代表们说，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对我们是极其深刻的教育。大家坚决表示，一定要警惕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定要以“书记动手，全党办社”那样的觉悟和干劲，把农业机械化搞上去。

（四）今后五年和十年的奋斗目标

毛主席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会议研究了今后五年、十年全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规划。十年的奋斗目标，是要在一九八〇年使我国农、林、牧、副、渔的主要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全国农用拖拉机拥有量达到八十万台左右，手扶拖拉机达到一百五十万台左右。排灌动力达到六千万马力左右。平均每亩施化肥八十市斤左右。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宏伟目标。

十年规划，前五年是关键。一九七五年的主要目标是：

耕作机械：要积极发展深翻、改土、播种、中耕、插秧、收割等机具。拖拉机的保有量由一九七〇年的十四万台增加到四十万台左右，手扶拖拉机由九万台增加到五十万台左右。使耕作机械化水平由现在占可机耕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五提高到百分之五十左右。

排灌机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做到每个农业人口有一亩高产稳产田。排灌动力机械，要从一九七〇年的一千七百多万马力发展到三千五百万马力左右，其中，柴油机二千四百万马力，约占百分之七十，电动机一千一百万马力，约占百分之三十。包括自流灌溉和各种小型水利，全国灌溉面积由现在的六亿亩增加到七亿五千万亩。积极搞好平整土地和配套工程，不断提高抗旱抗涝的能力。

化肥和农药：“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化学肥料要由一九七〇年的二千二百多万吨发展到三千二百万吨到三千五百万吨，达到全国平均每亩耕地施化肥四十市斤。还要加快发展高效复合肥料，细菌肥料。同时要特别注意狠抓养猪积肥、农家肥和绿肥。积极发展低毒高效农药、生物农药、除草剂和植物保护机械。大力发展塑料薄膜。

加工机械：粮、棉、油、糖等的加工、脱粒和饲料粉碎，占用劳动力多，制造这些加工机械又比较容易，一九七五年，要在这几方面基本上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运输机械：要着重发展手推胶轮车、畜力大车和内河船只。手推胶轮车由一九七〇年的一千六百万轮发展到四千万轮左右，畜力大车由二百万辆发展到三百万辆左右。积极发展机帆船和增加一部分汽车。

林业机械：努力提高整地造林、幼林抚育的机械化水平。主要林区基本上实现采伐、集材、运输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积极发展以纤维板、纸浆和栲胶等为重点的森林资源综合利用机械。加速林业机械修造厂的建设，充分发挥林业机械的潜力。

牧业机械：要发展打井、提水机械，改造草原，努力做到每个旗、县有打井机械和防疫设备。积极发展牧草收割、饲料粉碎、剪毛、挤奶、乳品加工和运输机械。

渔业机械：要以发展海洋渔业机械为重点，提高捕捞、养殖、冷藏、运输和加工的机械化水平。机动船捕鱼量到一九七五年要比一九七〇年增长一倍。

以上各项，是就全国来说的一个总目标。已经达到或接近这个水平的地区，要向更高的目标努力。由于各省、市、自治区基础不同，情况不同，不可能在同

一时期达到同一水平。各地方先搞什么，后搞什么，应因地制宜，各有侧重，有先有后，不要千篇一律。

第四个五年，从原材料到制造，从制造到维修，从主机到配套配件，大多数省、市、自治区要努力做到启行成套。要特别注意搞好拖拉机的犁、耙、播等农具和拖车的配套，搞好排灌机械的机、泵、管、带的配套和拖拉机、柴油机关键配件的生产供应，还要相应地把储油设备搞起来。初步计算，从所需钢材、购买资金和制造能力来看，农业机械化规划第四个五年的目标，是积极的，留有余地的，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或超过的。

代表们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在实现第四个五年的目标的基础上，再经过五年的努力，我国农村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将成倍的提高，农村集体经济将有更大的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会出现新的飞跃，工农联盟将更加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进一步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将更加强大，为世界革命作出较大贡献。

（五）大力发展地方“五小”工业

发展以钢铁等原材料为主的地方“五小”工业，是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重要物质基础。“没有原料，光搞加工工业，就叫做只搞‘无米之炊’”。不少地方狠抓了“五小”工业，手里有了钢铁，搞农业机械化就有了一些主动权。山东烟台地区过去“手无寸铁”，打把锄头镰刀也得向国家要钢要铁。自从一九六九年办起了“小钢联”以后，已生产出生铁四万七千吨，钢七千吨，钢材四千吨。这些钢铁约有百分之六十用于制造各种农业机械。江西省丰城，湖南省攸县、山西省晋城、吉林省磐石、广东省兴宁等县和河南新乡地区等，在这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到目前为止，全国发现有煤有铁的县六百多个。凡是有煤有铁的地方要积极地、有计划地把小钢铁、小煤矿办起来，促进农业机械化。

发展地方“五小”工业，要根据资源条件，因地制宜，以发展钢、铁、煤等原材料工业为主，从大打矿山之仗搞起；要坚持土法上马，土洋并举，大搞群众运动；没有煤、铁资源的地区，也要因地制宜地发展本地区急需的“五小”工业，面向农村，坚持为农业服务的方向。

国家要对“五小”工业的关键设备和投资，有计划地予以支持。

（六）有关农业机械化的几个政策问题

一、社队搞农业机械化，要处理好集体积累和社员分配的关系。要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在发展生产，保证社员生活逐年有所改善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积累，购置农业机械。

二、在发展农业机械的同时，要注意发展大牲畜，发展半机械化农机具和改良农具，实行“机、马、牛”相结合。决不可因为机械多了，就放松大牲畜的发展。

三、农村用的动力，要综合利用，要以发展柴油机和小水电为主。有水源的地方要优先发展小水电和水轮泵，有煤的地方要积极发展小火电，尽快把占用大电网的用电量降下来。要继续降低柴油机和农用油料的价格，鼓励农村使用柴油机。一九七〇年，柴油机占百分之四十，电动机占百分之六十，一九七五年要改变为柴油机占百分之七十，电动机占百分之三十。一九七五年，农村用电量由小电站提供的，应占二分之一。这样，既有利于备战，又有利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四、农机产品要实行低价薄利政策。农机产品虽经多次降价，但价格仍然偏高。主要农机产品价格，一九七五年比一九七〇年拟平均降低百分之十五左右。国家管理产品由国家统一订价，地方管理产品由省、市、自治区统一订价。企业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自治区规定的统一价格，改变一货多价的现象。对生产农机产品在执行统一价格而暂时发生亏损的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可由财政适当补贴。集体所有制企业发生类似情况，如何解决，由财政部另行拟订具体办法。所有农机企业都要加强管理，降低成本，做到不亏损。

五、农业机械要努力做到重量轻、体积小、成本低、效率高、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坚固耐用，便于综合利用。新的农机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不合格的农机产品一律不准出厂。实行包换、包修、包退的制度。

六、要把农业机械的标准化、通用化、系列化的工作搞好。现在，拖拉机和柴油机的型号太多、太杂，给维修配件和管理造成很大困难，也不利于备战，必须简化机型。全国农用的大中型拖拉机，有七、八种也就可以了，不宜再多。今后定型产品不要轻易改变。现在还在使用但已不再制造的落后产品，要继续供应配件。

(七) 加强对农业机械的管理

农业机械化牵涉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必须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充分发挥各有关部门的作用。省、地、县都要有一个强有力机构，把农业机械制造、维修、供应、使用管理、科学和技术力量的培训等方面的工作切实抓好。

从省、地、县到社、队，大大小小的企业逐渐增多，把这些单位管好，将对社会主义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力地促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管好、用好、修好日益增多的农业机械，是关系到多快好省地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大问题。当前，不少地方连续发生机器设备损坏和触电、翻车等伤亡事故，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很大损失。必须认真对待，加强领导，抓紧教育，采取有效措施，迅速解决好这些问题。

当前农业机械的使用效率一般偏低，每台拖拉机平均应承担的耕地面积，北方应争取达到二千亩左右，南方应争取达到一千亩左右。排灌机械每马力平均担负的排灌面积要争取达到二十亩左右。各省、市、自治区应根据提高使用效率的要求，结合当地不同情况作出具体规定。加强社、队农业机械管理工作，关键在狠抓人的思想革命化。要依靠贫下中农，管好用好农业机械。要有专人负责，要严格执行操作规程。要努力提高作业质量，增加作业项目，降低作业成本。

县、社、队三级修造网，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县农机修造厂，要平战结合，以修为主，又修又造。修造用的钢材，要具体落实，不得挪用。要充分发挥手工业厂、社的作用。要重视小农具和改良农具的生产供应。每年三亿五千万件的小农具要保证，每个劳动力每年平均需用的二至二公斤半的钢材不可少，制造中小农具所需的材料要保证供应。

遵照毛主席关于“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的指示，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一个精干的研究机构。要坚持科学技术人员和工人、贫下中农相结合，坚持科研、制造、使用相结合，坚持为农业生产服务。要深入社队，边劳动，边研究，总结和推广先进技术，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农机具改革和科研工作。要敢于创新，不能墨守成规，要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创造出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农机具。要有计划地培训亦工亦农，社来社去的技术力量，注意发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作用，把现有农业机械院校办好。要认真落实党的团结、

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鼓励他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农业机械化事业做出贡献。

（八）全党要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伟大任务而奋斗

实现农业机械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要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

毛主席提出的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伟大任务，只剩下不到十年时间了，到了必须狠抓的时候了，再也不能耽误了，也有条件办好了。我们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毛主席关于农业机械化一系列的英明指示，大造革命舆论，大搞群众运动。必须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列入各级党委的议事日程。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落实措施，组织各有关部门积极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促进农业的迅速发展。

遵照毛主席关于“各省、市、区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的计划”的指示，要通过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抓好典型，自下而上地从县、社做起，今年年底前后，各省、市、自治区在国家统一计划下，搞好综合平衡，制订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农业机械化规划。

在一九八〇年基本上实现我国农业机械化，时间是紧迫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根本问题是加强党的领导，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为实现毛主席所预见的，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农业机械化的伟大目标而努力奋斗。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国务院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日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

1971. 12. 26；中发〔1971〕82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指引下，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指示，全国农村广泛地开展了批修整风运

动，特别是粉碎了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的反革命阴谋，粉碎了林陈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广大贫下中农、社员群众、革命干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更加提高，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进一步高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今年的农业生产，在战胜了旱、涝、风、虫等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又夺得了第十个丰收年。目前，农村的革命和生产形势大好。

在当前大好形势下，“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认真落实党的有关政策，搞好农村人民公社的分配工作。这对于贯彻执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调动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的意义。

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的分配工作，总的情况是好的。几年来，各地一般都能正确地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积极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壮大了集体经济，增加了社员收入。但是也应该看到，在分配问题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是很激烈的。有的“分光吃尽”；有的集体增产了，社员不增收；有的超支户多，分配不能兑现；有的批判了“工分挂帅”，又出现了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这些都妨碍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落实。

为了进一步搞好农村人民公社的分配工作，必须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切实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正确处理集体积累和社员分配的关系。人民公社应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积累。但也不要一下子积累过多，“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生产发展较快、收入水平较高的社队，经过社员讨论同意，可以适当地多留一些公共积累。

公社、大队一般地不从生产队提取公共积累，如果举办企业、购买农业机械等，在不影响生产队扩大再生产的前提下，经过社员大会讨论同意，也可以从生产队适当提取一部分公共积累。

公积金应该用于扩大再生产，不准用于盖办公室、礼堂、招待所和请客送礼等非生产性的开支。

二、认真搞好粮食分配。中央关于继续实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通知，必须认真贯彻落实。既要保证及时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又要同时安排好社员生活，“绝对不可以购过头粮”。

生产队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留足种子和饲料粮。“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集体的储备粮主要用于备战、备荒，不得轻易动用。必须动用时，要由社员大会讨论决定。

口粮的分配办法，一般可采取基本口粮和按劳动工分分配粮食相结合的办法，也可以实行大多数社员拥护的其它适当办法。不论实行那种办法，都应做到既有利于调动最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又要确实保证烈属、军属、职工家属和困难户能够吃到一般标准的口粮。社员口粮应当分发到户，由社员自己管理。要教育社员勤俭持家，计划用粮。

要合理安排经济作物集中产区的粮食征购任务或统销指标，坚决保证这些地区的社员口粮不低于邻近产粮区的标准。要合理安排林区、牧区、渔区社员的口粮。

三、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搞好劳动计酬，是按劳分配的依据。在社员劳动计酬上，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断提高社员为革命种田的觉悟，不断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当前要注意克服平均主义，应该按照社员的劳动质量和数量，付给合理报酬。

学习大寨劳动管理的办法，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同群众商量，不可硬搬照套。要发动群众认真总结当地好的典型经验，改掉那些限制群众积极性的、繁琐的、不合理的东西，坚持那些为多数群众所欢迎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并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

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轻视妇女的封建思想，必须批判。有些地方，“四类分子”在家的男劳力多，他们利用干部、群众的旧思想，煽动搞男女同工不同酬，剥削贫下中农，应特别引起注意，要及时揭发，坚决斗争。

四、认真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必须十分节省地使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社、队举办集体福利事业，应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许任意增加脱产人员，宣传队、广播员、体育

队等，必须坚持在业余时间进行。赤脚医生要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必要时，经社员讨论，可以误工记工。

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有些大队、生产队干部参加劳动少的情况，必须坚决改变，做到“三不脱离”，其补贴工分不能超过“六十条”的规定。

要精简会议，少开会，开短会。县和县以上各部门召集大队、生产队干部和社员参加会议、办学习班等，应按“六十条”规定发给津贴、伙食费和必需的旅费。公社、大队开会要尽量不占用生产时间。

公社、大队调用生产队的劳力，必须同生产队社员商量。国家各部门要调用生产队的劳力，必须经过各级党委批准，并付给合理报酬。不得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资金、材料和发动群众捐献或摊派，重犯“一平二调”的错误。

国家在农村举办文教、卫生和其他企业、事业，或者把企业、事业下放给生产队交贫下中农管理，其开支应由主管部门负担，不得转嫁给集体和社员。经批准的民办公助学校和民办教师的经费，国家补助的部分各地不得任意挪用。

五、切实解决超支户的问题。目前，有些社队的超支户不少，造成了分配不能兑现，甚至挖空了集体积累，分掉了国家贷款，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群众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必须引起重视，认真对待。造成超支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阶级敌人的煽动和资本主义思想对某些干部的侵蚀。因此，必须狠抓阶级斗争，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要加强社队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教育干部提高觉悟，转变作风，带头偿还欠款。要把各级财务管理工作的机构、队伍和社队财务制度建立和健全起来，做到财务公开，公布帐目，经济民主。

六、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是分配的基础。人民公社在狠抓粮食生产的同时，要合理安排农、林、牧、副、鱼的布局，处理好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的关系，做到纲举目张，互相促进，全面发展。要划清多种经营同“金钱挂帅”的界限，不要把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来批判。

商业部门应该积极组织社队开展多种经营和社员的正当家庭副业，加强产品的收购，正确执行党的价格政策，不得压级压价，以促进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

合理的奖售政策必须继续执行，不要随便变动。

中央希望，各级党委把农村人民公社的分配工作，当作一件大事来抓。要以批修整风为纲，坚持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抓好典型，及时总结经验，切实把今年的决算分配工作抓好。

（此件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出

一九七二年一月三日，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国务院各部门“五·七”干校财务管理和经济核算试行办法》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照发”的中发[1971]22号文件的精神，进一步办好“五·七”干校，经与各部委商量，对“五·七”干校的财务管理和经济核算办法，作如下规定：

（一）干校财务工作，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贯彻执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为培养无产阶级干部队伍和发展干校生产服务。

（二）干校财务工作，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财务计划、决算和重大开支，要经党委（党的核心小组）讨论决定。财务工作要发扬民主，实行群众监督。

（三）加强干校和连队的经济核算。干校实行独立核算，统一计划、采购、销售和计算盈亏。连队有条件的可以进行直接生产成本的核算，办理同校内各单位之间提供物资、机耕、运输、修理、加工等费用的结算，并组织和上交各项收入。连队核算的范围，由各干校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

工业连队（校办工厂），在校党委（党的核心小组）统一领导下，可实行单独核算，在银行开立帐户，核定资金，计算盈亏，向校上交利润。

（四）加强成本管理。要逐步做到开支有标准，用料有定额，消耗有记录。农、林、牧、副、渔和工业、基建等项目的生产费用，可分别进行帐内核算。主要产品的单项成本，可采取统计核算。要定出降低成本的指标和措施。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降低成本、完成计划。

(五) 产品价格和收费标准。对外销售产品，一律按照国家规定的牌价；校内销售的粮、棉、油按照国家的零售价格，肉、蛋、鱼等按照国家的收购价格，蔬菜、瓜果可略低于市场零售价格。机耕、运输、修理、加工的收费，对外按当地国营企业的标准；对内可略高于实际成本。

(六) 健全流动资金管理制度。要严格遵守现金管理制度，设立现金出纳帐，及时记帐，做到帐款相符。

物资采购应根据生产任务和库存情况，事先编制计划，经校党委（党的核心小组）批准后组织采购。产品、材料应建立和健全入库、出库和领拨制度，及时登记产品、材料明细帐，定期盘点，做到帐物相符。规定上交的产品，必须保证上交，不得擅自处理。

牲畜作为流动资金管理。年底存栏的要进行盘点估价。

(七) 健全固定资产管理。房屋、机械设备、工具，器具等，单价在二百元、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的，划为固定资产；单价不足二百元、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下的，其费用分别列入有关支出项目，但要加强管理。属于临时性简易结构的建筑物、农田基本建设，不列作固定资产，按实支数列入基本建设支出。

固定资产管理，可分为房屋建设、机器设备、运输设备和其它固定资产四类。要建立登记制度，及时记载变动情况，做到帐物相符。

校办工厂生产用的固定资产，应根据物品原值和使用年限，计提折旧费，一般一年提取一次。折旧和固定资产变价，留干校作为更新资金。农业生产用的固定资产，是否计提折旧费，由各干校自行确定。固定资产的大、中、小修理费，列入当年生产费用。

(八) “五·七”干校经费供应。根据中发[1971]22号文件关于“逐步做到行政经费自给和干部工资部分自给”的精神，按干校纯收入，扣除必要的扩大再生产费用，其余部分抵拨下年度，“五·七”干校经费，以逐步减少国家拨款。

“五·七”干校经费管理，仍按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央各部门

“五·七”干校财务管理试行办法》执行。

(九) 财务计划和决算。干校应于年度开始前，编制年度财务计划，年终编制决算，由主管部门审核汇总，送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复核后，报财政部核定。

编制计划时，必须充分发动群众。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注意留有余地。年终决算时，要进行经济活动分析，认真总结经验。

(十) 加强财务工作的领导。干校应有一名领导干部负责财务工作，并根据“精兵简政”的原则，配备必要的财会人员。

财会人员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调查研究，依靠群众，当好参谋，从革命全局出发，努力做好自己担负的工作。

(十一) 反对不正之风。要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制止铺张浪费、请客送礼，不准利用干校生产的产品搞特殊化。

(十二) 干校各连队的财务管理和经济核算办法，由各干校参照上述精神，自行规定。

(摘自国务院办公室 1972 年 1 月 3 日“关于国务院各部门‘五·七’干校财务管理和经济核算试行办法”)

一九七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复员干部安排工作后工资待遇问题的通知

《通知》说，1969 年以来军队复员干部安排工作后，可按工龄长短和表现，评定工资等级。

复员干部安排当工人，凡是表现好，军龄加入伍前的工龄，不满 8 年的定二级工；8 年至 15 年的定三级工；15 年至 20 年的定四级工；20 年以上的定五级工。

分配地方当干部的，可以按照上述规定的年限，分别定为国家机关行政 25 级、24 级、23 级、22 级。

复员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安排工作后，一般应参照在地方工作的同届毕业生的工资标准评定工资等级。

对安置回农村的复员干部，优先考虑在企、事业单位安排工作，并参照上述规定评定工资等级。

复员干部工资低于本通知规定的，应予重新评定，高于本规定的，可不降低。今后，对拟退出现役的连以下干部，如地方工作需要也可以办理转业手续。

一九七二年四月，全国清产核资领导小组制定《全国清产核资实施办法（草案）》

遵照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开展清产核资工作的报告》，中提出的要求，结合各地区，各部门一年来开展清产核资试点工作的经验和提出的问题，制定本办法。

（一）意义、目的和要求

开展清产核资工作，是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勤俭建国”方针和扫仓库指示的重要措施。是关系到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加强战备的大事。是深入开展经济领域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以及“工业学大庆”的重要内容。对于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有重要的意义。

清产核资的目的，是要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彻底查清现有财产，充分挖掘物资潜力，加速流动资金周转，大力提高设备利用率，加强企业管理，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办企业路线，贯彻“鞍钢宪法”，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清产核资工作，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政治挂帅。要认真学习，广泛宣传和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扫仓库指示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等一系列伟大方针，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清产核资工作的全过程。

清产核资工作，必须以路线斗争为纲，继续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要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批“积压有理”、“浪费难免”等错误论调和“清仓到顶”、“潜力挖尽”等右倾保守思想，大破本位主义，树立全局观念。彻底肃清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

清产核资工作，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要反复发动群众揭矛盾，反保守，挖潜力。企业领导干部要敢字当头，承担责任，带头革命。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工人经济监督组织的作用，同时也要发挥专业部门的作用。做到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专业管理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清产核资工作，是贯彻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项政治任务，请各地党委和革委会加强领导，保证清产核资的群众运动健康地发展，争取在一九七二年分期分批地完成。

（二）清查财产

一、清查的范围：凡是全民所有制单位的一切国家财产和合作工厂、手工业合作社等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财产，都应当进行清查。主要是清查厂矿企业，交通运输企业，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物资、商业、外贸部门，科研单位和校办工厂。行政事业单位的房产、设备和仪器也要进行清查。农村人民公社、大队及社、队办的企、事业单位的财产是否清查，由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决定。

二、清查的内容：

1. 流动资产，主要清查原材料、在产品、半成品、成品、商品，低值易耗品、包装物料、在途物资、外存物资和代保管物资。

企业代保管的物资（包括过去物资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统一收购的积压物资），这次都应当由代保管单位负责清查，并催促托管单位负责迅速处理。如托管单位已撤销而无人过问的，则应由代保管单位当成自有财产一样，统一处理。

港口、码头、车站对长期积存的无法找到货主的物资，也应彻底清查，并按规定积极进行处理。

2. 固定资产，主要清查各种机械设备、仪器、厂房、仓库和建筑物。帐外的自制设备，用四项费用、科研经费及其他资金修建的简易仓库、零星建筑物，购置的设备、仪器、仪表等，凡是符合固定资产标准的，都应当作为固定资产查清入帐。

3. 债权债务，都要进行彻底清查。过去借出的物资、设备及其他应收款项，要全面清查，及时收回。应付的款项要及时承付。职工个人向行政的借款，要清理归还，确有困难的，可以分期归还。

4. 用基本建设资金购置的材料、设备等以及在建工程，都要由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认真进行清查。

三、清查的要求：

1. 对全部财产要进行全面地、彻底地清查，做到帐物相符，不重不漏，家底清楚。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前清后乱。

2. 要进一步把物资、设备潜力和质量状况彻底搞清楚。

在划分多余积压物资时，应当既要保证计划内生产、建设的需要，又要防止盲目多留物资。由各单位根据具体情况，发动群众讨论确定。物资的合理周转期，各地区、各部门可根据物资供应条件，作出原则规定。

对各种设备要分类排队，进一步查清在用设备的利用率和现有生产能力。做到数量清、质量清，能力清，把设备潜力充分挖掘出来，促进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

对于在建工程，在经过认真清查后，要采取相应措施，狠抓收尾配套，尽快竣工投产，充分发挥投资效果。

3. 要从经济领域里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查清造成积压浪费、帐物不符、家底不清的原因，要检查过去物资、设备和资金管理当中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搞好企业的斗、批、改，加强经营管理创造条件。

4. 清查出来的多余积压物资和设备，要及时上报，要彻底亮家底，反对打埋伏，反对弄虚作假。

（三）多余积压物资的调剂处理

一、多余积压物资，要边清查、边调剂处理，首先用于计划内。调剂的重点，要保证三线、军工和基础工业的需要。要支援农业和轻工、市场的需要。本部门，本单位一时用不上的，要支援其他部门和外单位。大三线地区清出的多余积压物资，要就地调剂利用，一般不要调到一、二线地区。成套的设备，不要拆散。

二、调剂处理多余积压物资，要发挥两个积极性。国务院各部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的多余积压物资中，专用设备（包括备用的主要附属设备），由主管部统一调剂，多余的交地方使用；通用设备和其他物资，由省、市、自治区统一调剂，国务院各部需要在单位之间（包括由部供应物资的下放企业）组织调剂时，要同地方商量解决，地方应积极支持。援外项目多余积压的物资、设备，首先在援外项目之间调剂使用，多余的由外经部及时转国内使用。军工企业和交通部所属企业的多余积压物资，属于国家和主管部分配的，由各部在本系统内统一调剂。军工各部调剂有余的，可由各级国防工办在军工各部所属企业之间组织调剂。地

方如有需要，可与主管部门协商解决，主管部门应积极支持。属于地方分配的物资，由省、市、自治区统一调剂。对上述调剂的物资，一律不应限制出境。

一、二类物资和设备，在省、市、自治区范围内组织调剂后仍有多余的，应积极支援兄弟省、市、自治区的需要，或上报中央各有关主管分配部门，以便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剂。三类物资，企业可以自行调剂处理，市场需要的，商业部门可以选购，或由商业部门代销。

为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防止乱要，各地区、各部门在调剂多余积压物资的时候，对于某些已抵顶企业当年分配指标的物资，要对调出单位保留指标，对调入单位计算指标。

三、多余积压物资的调剂处理，应当树立全局观点，反对本位主义，反对以物易物。要防止积压物资搬家，防止大材小用，防止乱削价，滥用浪费和投机倒把。

四、对于某些长期积压难以调剂的物资，要充分发动群众献计献策，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抓紧进行处理。要批判那种积压物资无法处理的形而上学观点。处理的途径，要立足于本单位、本地区，指定有关部门，组织一定的技术力量，大搞加工改制，修旧利废，综合利用，因材设计，变死物为活物，做到物尽其用。

五、对确已丧失使用价值的物资和设备的报废，必须经由工人、领导干部和专业人员三结合小组审查、监定，按规定的审批程序报上级机关批准。对报废物资的审查处理，既要严格、慎重，又要敢于处理。要将各种金属分别组织回收利用。

（四）核定流动资金定额

一、核资的范围：

1. 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国营工业企业，交通企业，国营商业的三级批发商店、零售商店，外贸企业，商办工业，国营农（牧）场，施工单位，地质勘探单位，文教卫生企业，城市公用企业等，都要核定流动资金定额。

2. 国家物资储备局，物资供销部门，国营商业一、二级批发站，农副产品收购单位，粮食商业，以及商业企业经营的煤炭、石油、化肥、农药等商品，不核定流动资金定额，实行资金计划供应。

3. 行政、事业单位，只清产，不核资。但事业单位（包括科学事业单位和校办工厂），应当核定合理的物资储备定额，对多余积压物资要抓紧积极处理。

二、国营工业企业的核资：

核定流动资金，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每一工厂单位应有相当独立的资金（流动的和固定的），使它可以自己周转，而不致经常因资金困难，妨碍生产”和“勤俭办工厂”的教导，既要保证生产发展，又要节约资金。

1. 核资依据：根据国家下达当年的生产计划和加速资金周转的要求，核定正常生产合理的最低需要的流动资金定额。

2. 核资方法：既要反对烦琐哲学，又要反对无根据的冒估，力求简便易行，有一定的计算根据。一般可以根据当年的生产计划，参照本企业历史先进水平与同行业先进水平，考虑产、供、销情况的变化、国家对节约流动资金的要求和加速资金周转的潜力等情况，核定企业的流动资金定额。其中：储备资金，应按照主要原材料的先进的消耗定额和合理的储备天数核定；生产资金，可根据代表性产品正常的生产周期核定；成品资金，可按均衡销售的要求，计算在库天数加以核定。

3. 资金来源：定额流动资金，除企业现有的自有流动资金和视同自有流动资金外，不足部分，由国家财政拨给。

企业为完成国家计划，在生产中由于季节性，临时性以及超产等原因所需的超定额资金，可向人民银行申请贷款。

企业清出的多余积压物资，应当制定处理计划，采取有效措施，抓紧处理，限期归还银行贷款。

4. 各地区，各部门除核定企业的流动资金定额外，还应当核定全部流动资金（包括企业自有流动资金和从银行借入的资金）全年平均占用的产值资金率，以加强对企业流动资金的管理和考核。

5. 国家计划内新建的企业和老企业较大规模扩建的部分，应当在建成投产时核定流动资金定额。在全部投产以前，边基建边生产所需的生产流动资金，由国家财政酌情预拨。

6. 交通企业的核资，比照工业企业核资办法办理。

三、国营商业企业的核资：

必须贯彻毛主席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和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为工农业生产、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方向。通过核资，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合理储备商品，加速资金周转，保证市场供应。在核资过程中，既要防止盲目地无限扩大库存，用不切实际的大定额多要资金；又要注意防止单纯压缩库存，“泻肚子”、减品种，降低服务质量的错误倾向。

1. 核资依据：国营商业的三级批发商店和零售商店，应根据主管部门下达的当年商品销售计划，核定正常经营合理需要的商品资金定额和非商品资金定额。

2. 核实方法：一般应根据企业的经营范围，当年商品销售任务，货源供应情况和商品供应政策，本着保证供应、勤进快销的原则，确定商品的合理储备期。主要商品可按品种，一般商品可按大类，零星商品可按金额，核定商品资金定额。

3. 资金来源：零售商店的商品定额资金和各级商业企业的非商品定额资金所需的自有资金，由各地区商业部门在系统内现有的自有资金中调剂解决。零售商店的商品定额资金，在调剂解决以前，可向人民银行申请贷款。三级批发商店的商品资金（包括季节性、临时性需要），除自有资金外，可向人民银行申请贷款。

4. 国营商业、粮食部门附属的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比照国营工业企业的核资办法办理。

5. 供销合作社系统所属企业，可以按照原来供销合作系统的办法办理。

四、外贸企业在认真清查库存商品的基础上，根据主管部门下达的进出口计划，核定保证正常经营需要的商品库存定额，作为考核的依据（具体办法由外贸部规定）。资金实行计划供应，除现有的自有资金外，可向人民银行申请贷款。

外贸部门附属的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比照国营工业企业的核资办法办理。

五、国营农（牧）场按现行规定核定流动资金定额。定额资金来源比照工业企业办理。季节性、临时性生产需要的资金，可向人民银行申请贷款。

六、施工单位的自有流动资金，一般按当年建筑安装工作量（个别企业有特殊情况，也可按上年工作量），参照历史先进水平核定定额（包括附属加工企业的流动资金在内）。自有流动资金不足定额部分，由主管部门调剂解决，再有不足，由财政拨给。

施工单位储备主要材料的资金，在基建投资中预拨（一般不超过当年建筑安装工作量的百分之二十五）。超过定额储备材料所需资金，可向建设银行申请贷款。

建设单位要大力动员内部资源，因材设计，积极处理多余积压物资，压缩储备资金。

七、地质勘探单位、文教卫生企业、城市公用企业等，其核资办法，由各地区、各主管部门制定。

八、预算外企业和集体所有制的工业企业，其核资办法参照国营工业企业核资办法办理。其定额资金来源，应在预算外企业的积累和集体企业的公积金内自筹解决。这些企业发生临时性资金周转困难时，可向人民银行申请贷款。

九、国家规定的战略储备物资，按国家计委批准的计划，由国家财政专项拨款。

十、流动资金定额的审批程序：

国务院各部、委直属企业的流动资金定额，由企业报主管部批准。

地方企业（包括已下放的中央企业）的流动资金定额，由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规定具体的审批权限。

（五）核定固定资产需用量

核定固定资产需用量，应当本着大力提高现有设备的利用率，充分挖掘设备潜力，保证生产需要的原则加以核定。

一、核定的依据：根据国家下达的当年生产计划，考虑下年度可能的发展情况或国家规定的生产规模，核定保证正常生产所需的固定资产需用量。

二、核定的重点：国营工业企业，交通企业，施工单位以及科学事业单位的设备和仪器。

三、核定的方法：在查清设备的数量、质量、能力和配套情况的基础上，组织有工人、干部、专业人员参加的三结合小组，深入车间，同广大工人群众共同讨论：那些设备闲置多余，可以调出处理；那些设备安装重复，可以合理撤并；那些设备需要，需要多少。经企业领导平衡后上报，由企业主管部门负责核定。

四、核定的要求：

1. 在核定企业固定资产需用量时，既要防止拿不切实际的大计划多留设备，又要从实际出发，注意留有必要的备用设备，保证生产、建设的需要。

2. 核定给企业使用的固定资产，要不断提高设备利用率，继续挖掘设备潜力。要大搞产品设计革命、技术革新和工艺革命；要改造老设备，提高设备利用系数；要发掘劳动潜力，合理调整劳动组织，增加开工班次；要加强设备维修保养，减少停台时间，增加台时产量；要加强车间之间和企业之间的协作，合理使用关键设备。

（六）财务处理

在这次清产核资工作中发生的财务问题，仍按过去的有关规定分别处理：

一、流动资产的调拨和削价损失：

企业清查出来的多余积压的流动资产，拨给其他单位的，一律作价收款，按物资销售处理。质量完好的，按国家统一规定价格作价。质量残次的，应当按质论价。由于按质论价，调出单位发生的削价损失（包括企业自用的在内），凡是属于生产企业单位的，作为营业外损失处理。凡是属于物资部门、供销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的，冲减国家拨给的有关资金。

商业企业清查出来的库存积压商品，应积极组织交流，进行余缺调剂。少数需要削价并按规定经批准的削价损失，按实际销售数量，列正常经营损益处理。

二、多余固定资产的调拨：

固定资产凡是在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或全民所有制单位与供销合作社之间相互调拨的，可以办理转帐手续，互相增减国家基金；凡是经批准调给手工业合作社和农村社队等集体经济单位的，一律按质论价，收取价款。一次付款有困难的，经过批准可以分期付款。所得的价款，留给调出单位作为更新改造资金使用。

三、固定资产的修理费用：

清查出来的固定资产需要修理的，凡是属于企业单位的，所需修理费用，在大修理基金中解决；不单独提取大修理费用的企业，在生产成本中列支。凡是属于基本建设单位的，所需修理费用，在储备资金或基本建设投资中解决。

四、积压物资的加工改制费用：

清查出来的积压物资，需要加工改制的，所发生的费用，凡是属于企业为生产储备的物资，作为营业外损失处理；凡是属于物资部门、供销企业，基本建设单位和各种专用资金储备的物资，所需费用，在国家拨给的各项有关资金内开支。

五、财产的盘盈、盘亏和报废：

企业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经过这次清查，发现有多于或少于帐面数量（即盘盈、盘亏）以及需要报废的，应当按照各部门、各地区规定的批准程序，报经上级批准后，相应地增减国家拨给的有关资金。

帐外的低值易耗品，如工具等，属于已领用的，可以不再入帐，但要加强实物管理。

施工单位所发生的材料的盘盈、盘亏，经批准后，列入工程成本。

商业企业的商品溢余、短缺和报废，经批准后，作为其他收入或其他支出处理。

报废的固定资产变价收入，留给企业作为更新改造资金使用。

六、固定资产重新估价问题：

固定资产一般不进行重新估价。对于某些固定资产由于经过技术改造，致使现在实际价值与帐面原值相差悬殊的，可以酌情重新估价，相应增加国家基金和固定资产原值。

对于已经提足折旧，而尚能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一般的可不作调整，但数量较大需要调整的，可以根据固定资产尚能使用的年限重估净值，冲减固定资产折旧和增加国家基金。

七、代保管物资变价收入的处理：

企业代保管物资中属于托管单位已撤销，无人过问的代保管物资，企业可以处理，其变价收入，增加国家基金。

企业代保管的已完基建工程的结余零星材料，经企业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移交生产单位负责处理，其变价收入，可作为企业更新改造资金使用。

八、车站、港口、码头无法找到货主的货物的处理：

属于中央主管部门直属的车站、港口、码头处理无法找到货主的货物的变价收入，以“其他收入”科目全部就地解交中央金库；属于地方管理的车站、港口、码头处理无法找到货主的货物的变价收入交地方金库。

九、被挪用的流动资金的处理：

企业流动资金不准挪用。如过去已挪作固定资产更新改造、自制设备、基本建设、职工福利、农副业生产、医药卫生费等开支的，应当进行清理，按其性质，用国家留给企业的固定资产更新资金、国家拨给的基建投资或福利基金归还。企业无力归还的，应报请企业主管部门用集中掌握的固定资产更新资金、基建投资归还。因赊销商品被占用的流动资金，要限期收回。

十、坏帐损失的处理：

企业对于应当收回的其他企业单位的欠款，必须认真清理收回。一次不能收回的，可以分期收回。确实收不回的欠款，报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可作为坏帐损失，列营业外损失处理。

企业由于支援农业，过去借给农村人民公社和“五小”企业的各项设备，要认真清理归还。因生产需要收不回来的，要作价付款。确实无力付款的，经企业主管部门和同级财政部门批准，按特殊问题处理，作为国家对农村人民公社或“五小”企业的投资。今后企业设备确有多余，人民公社和地方“五小”企业有需要的，应当按照规定手续购买或调拨。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借用的，要严格控制，及时归还。

十一、冲减国家基金的审批权限：

凡是需要冲减“国家基金”的资金损失，都应报请上级批准。国务院各部、委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的资金损失，应报送当地革委会审查，提出意见后，由企业报各主管部门批准。地方所属企业需要冲减“国家基金”的资金损失，都应报经主管部门和同级财政部门审查汇总后，报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最后批准。

（七）建立与健全规章制度

各单位都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教导，针对清产核资中发现的问题，建立和健全各种必要的规章制度，改善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防止前清后乱，巩固清产核资成果。

根据清产核资工作的试点经验证明，一个企业单位搞好经营管理，在建立和健全规章制度方面，要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在加强物资管理制度方面，要做到采购有计划，来料要验收，领、退料有手续，消耗有定额和定期清查盘点。采购计划的制订，要实行领导、有关工作人员、

工人经济监督组织代表三结合的审查制度。在物资供应工作中，要改变只“批发”、不“零售”，只管供、不管用，造成物资积压浪费的状况。在有条件的地方要试办由企业主管机构集中储备、统一供应某些关键的专用物资和稀缺物资。

在加强固定资产管理方面，要做到及时登记造册，帐物相符；要建立和健全使用设备的责任制和维修保养制度，做好经常维修保养工作，保证正常运转；要保有必需的备品、备件，努力缩短修理时间，减少停台损失；成套设备不得任意拆件，改作他用；转移、报废，要有严格审批制度。

在加强流动资金管理方面，要做到收支有计划，使用有分析。实行资金归口管理。严格禁止将流动资金挪作基本建设等财政性开支。严格禁止盲目采购和赊销商品。

所有企业，都要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鞍钢宪法”的批示，依靠工人群众，搞好企业管理。建立工人经济监督组织，关心生产，关心收入，监督消耗，监督支出。

建立与健全规章制度，要放手发动群众，“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加强调查研究，经过试验，逐步推广。

（八）组织领导

加强党的领导，是搞好清产核资的关键。请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党委加强领导，把清产核资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由党委的负责同志分工来抓这项工作，结合中心任务，全面规划，妥善安排，做到有布置，有检查。加强政治思想领导，不断地排除各种思想障碍，了解情况，掌握政策，正确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有关规定。

各地区、各部门都要建立和加强清产核资的办事机构，按照精兵简政的原则，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和发挥业务指导作用。各企业、事业单位也要组织相应机构，负责办理这项工作。

企业主管部门和物资供销部门，要在做好正常物资分配工作的同时，积极做好多余积压物资的调剂处理工作。

固定资产需用量的核定，涉及到企业的的产品发展方向，产品定型，生产规模，设备的综合利用和配套以及企业之间的协作等问题，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在各

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由企业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统盘规划，积极做好本系统的固定资产需用量的核定工作。

各级财政、银行部门，要积极协助主管部门和企业单位，做好流动资金定额的核定工作和财务资金管理工作。

各地区、各部门要遵照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抓好典型”的教导，不断总结先进经验，推动工作的开展。

各单位在清产核资结束时，要发动群众，进行验收。具体验收标准，请各省、市、自治区自行规定。

军队系统的清产核资实施办法，请总后勤部制定。

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本办法规定的原则，结合本地区具体情况，另做若干补充规定。

(根据文件原件翻印)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八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恢复建设银行的报告

《报告》说，从 1970 年 5 月建设银行并入人民银行以后，放松了对基建财务和拨款的监督。有时甚至连一些基本情况和拨款数字也反映不上来。为了加强对基本建设财务的管理和监督，国务院决定恢复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省、市、自治区恢复建设银行分行。省以下建设任务比较集中的地点，大中型建设工程所在地，以及国防军工和跨省、跨地区施工的大型建设工地，也设立分行、支行或办事处。各地建设银行实行上级业务部门和地方的双重领导，以地方领导为主的体制。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八日，中央军委关于办好教导队，加速轮训部队基层干部的指示

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办好教导队，加速轮训部队基层干部的指示》。《指示》指出，办好教导队，教育好干部，提高他们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水平和组织指挥能力，是整顿好建设好军队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整军备战的迫切需要。鉴于林彪的破坏给部队造成的恶果，及部队新干部大量增加、技术装备不断发展的新情况，各级党委必须把轮训干部的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切实抓紧对基层干部的培训，认

真办好教导队。要由打过仗的有经验的军、师、团一级的领导干部亲自任教，担任队长、排长、班长，进行传帮带，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指示》要求全军各大单位在两年内把基层干部轮训完。此后到 1973 年底，各大军区轮训干部最多的已达应训干部的 95% 以上。

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关于加强基本建设管理的几项意见

1972. 05. 30；国发[1972]40 号

现将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提出的《关于加强基本建设管理的几项意见》转发给你们试行。试行中的问题和意见，请告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和财政部，以便研究修改和补充。

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关于加强基本建设管理的几项意见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基本建设取得很大成绩。但由于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以及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基本建设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战线有些长，浪费大，制度松弛，贪大求洋的思想比较严重，这不仅影响了国家重点建设的速度，而且影响了农业和轻工市场。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多快好省地进行建设，必须充分调动中央部门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搞好综合平衡，加强基本建设的管理。根据“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精神，现提出以下一些意见：

一、基本建设要加强计划管理。为了协调地发展国民经济，充分发挥人力、物力、财力的作用，所有基本建设都要纳入计划。按照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原则，国家预算内的投资，由国家统一安排。地方用自筹资金安排的基本建设，由地方综合平衡后，纳入省、市、自治区计划，报国家计委。各地区、各部门，一律不准搞计划外工程。

大中型项目(包括用自筹资金安排的项目)都要经过国家批准。小型项目按隶属关系，分别由国务院各主管部门和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批准。具体审批办法，由国务院各主管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自行规定。

城市的改建和扩建，要做好规划，经过批准，纳入国家计划。大中城市的建设规划，报国家批准。小城市的建设规划，由省、市、自治区审定，并报国家计委，国家建委。

援外建设项目要超过审查，纳入国家计划。

基本建设项目的建设内容和所需投资、设备、材料等条件，都要如实反映情况，不许讲假话。

二，用自筹资金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材料和设备必须落实。地方用自筹资金，自筹材料进行当地必需的基本建设，一定要搞好综合平衡。所需资金，要贯彻先收后用的原则，不能挪用流动资金和银行贷款，不能向企业摊派资金，不能向社队平调和用赊销、预付贷款等办法来搞基本建设，企业的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资金，应当首先用于技术措施、技术改造和劳动保护等发挥现有生产能力方面的需要，不得因扩大基本建设，而影响这些必需的开支；所需材料、设备，由各省、市、自治区自力更生解决，不得占用国家计划内建设项目的材料、设备，更不得占用生产维修、支援农业和供应市场的材料。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国家在可能条件下，给以适当支持。

三、必须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坚持必要的基本建设程序，是保证基建工程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建设项目要认真按照以下程序办事：

1. 根据资源条件和国民经济长期计划发展的要求，制订建设项目的计划任务书(有些大中型水利工程，要编制流域规划；新建的工业基地，要有区域规划)。
2. 大中型项目一般应按初步设计(或扩大初步设计)、施工图两个阶段进行设计。设计必须有概算，施工必须有预算。没有编好初步设计和工程概算的建设项目，不能列入年度基本建设计划。
3. 工程完毕，必须进行竣工验收，做出竣工报告和竣工决算。竣工移交的生产能力，不准随意减少。

大中型建设项目的计划任务书和设计文件，应经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国务院各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亲自主持，进行审查。凡已列入国家长期计划的大中型建设项目，其计划任务书不再另批；没有列入长期计划的项目，其计划任务书，在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国务院各主管部门审查的基础上，由国家计委组织审批。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或扩大初步设计)，按隶属关系，由省、市、自

治区革委会和国务院各主管部门组织审查，并报国家建委备案。其中少数大型或特殊性建设项目，由国家建委同有关部门组织审批。

全国基本建设计划，经中央批准下达后，不得擅自扩大建设规模，不得任意变更主要建设内容。必须改变时，需报请国家计委审查同意。

各部门，各地区在计划确定后，如因特殊任务，需要增加投资、项目、材料、设备时，要报国家计委进行综合平衡。

四、认真做好勘察设计工作。要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反对贪大、求洋、求全；坚持工人、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三结合，深入现场，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加强同生产和科学研究所的密切配合。

建设项目的厂址选择，要贯彻执行靠山、近水、扎大营和搞小城镇的方针。既要考虑战备的要求，又要注意经济合理。要根据原料、地质、交通、电力、水源等建设条件，认真调查研究，提出几个方案，以便选择确定。其中，新工业基地和大型建设项目的厂址，需报国家计委和国家建委备案。

建设项目要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但必须是经过试验和在生产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不能把生产厂当作试验厂来建设。设备选型要注意标准化，系列化。

非生产性建设，要发扬延安精神，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不搞高标准建筑。严禁建设楼馆堂所。没有经过批准，不准乱拆房子。

要节约用地，不占良田，少占农田；在可能条件下，要结合施工造田，支援农业。

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要发动群众审查。

五、基本建设项目所需设备，实行成套供应。首先要努力做到按项目成套供应，并逐步做到按经济区组织成套生产，成套供应。生产周期长的大型、专用设备，应按照长期计划实行预安排，使生产和建设更好地衔接起来。工业基础薄弱的地区，由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按计划、按项目成套供应。

成套设备的生产和供应工作，要加强领导，按分级管理的原则，结合生产，建立专职机构。

六、加强施工管理，提高投资效果。基本建设要贯彻执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要根据材料、设备和施工力量的落实情况，分

别轻重缓急，对建设项目进行排队，分期分批建设，以尽快形成生产能力。有些建设项目，材料设备确实落实不下来，建设条件确实不具备的，应当适当推迟，核减投资，以便集中力量，把那些能够完成的项目搞上去。

要切实保证基本建设工程质量，加强质量检查和工程验收。凡是质量不合格的，一律要加固或返修。

施工企业要加强管理，提高技术水平。要努力提高劳动效率，减少非生产人员，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考核指标之一。基本建设施工队伍要统一调度。不准任意动员农村劳动力，以免影响农业生产。在建设的同时，应有步骤地做好生产准备工作。

基本建设要以实物进度和新增生产能力作为检查计划完成情况的标准，要批判光花钱、不讲效果的错误倾向。要进行群众性的检查，总结建设经验，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

七、加强经济核算。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要搞好财务管理，精打细算。要发动群众参加管理，做到消耗有定额，开支按标准、成本有核算，努力降低工程造价。建设银行要协助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做好基建财务工作，严格按照国家计划、财政预算和工程进度拨款。随时检查资金的使用情况，监督资金的合理使用，对计划外工程有权拒绝拨款。

八、积极进行基本建设投资大包干的试点。所说“大包干”，即国家计划规定的建设任务或建设项目，经审查确定以后，将所需投资和相应的材料、设备，交由地方按计划包干建设。这是基本建设计划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要积极组织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

搞好基本建设管理工作，关键在于加强党对基本建设工作的一元化领导。要坚持政治挂帅，充分发动群众，全面地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肃清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不断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多快好省地完成基本建设任务。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翻印)

一九七二年六月五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工资基金管理的通知》

《通知》规定，各地区、各部门在下达职工计划的同时，必须一律下达职工工资总额计划，并抄送人民银行，据以监督支付。各单位的工资总额计划，都要报经上级主管部门和劳动部门核定，并送当地人民银行。凡未经批准超计划招收职工以及违反国家政策和规定增加工资的，银行有权拒绝支付，并向劳动部门和主管部门反映，由劳动部门和主管部门研究处理。

有关工资基金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各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门先行制定。要求既能管得住；又简便易行，避免繁琐复杂。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工资基金管理，由各省、市、自治区根据情况自行规定。

《通知》规定，1972 年的工资总额，暂以 1971 年 12 月份的实际职工总数和工资总额为基数，予以控制。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农村部联合调查组报告的通知

1972 年 3 月 2 日，中共中央指示检查贯彻民族政策情况。根据中央指示，公安部、农林部先组成联合调查组，赴宁夏隆德县调查。经过落实政策，促进了当地的春耕生产。

七月，在周恩来建议下，又以农林部学习小组名义派出 4 个调查组，分赴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调查了解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和当地群众生产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7 月 2 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公安部、农林部联合调查组报告的通知中指出：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极其重要的。中央希望各地对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要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同志，尤应注意。

8 月，周恩来指示农林部派专人赴青海，调查了解青海省的农牧业生产落后的问题。

10 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电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发出通知，派工作组深入基层检查民族政策情况，并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肯定了民族工作的成绩，检查了各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批转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的通知

1972 年 1 月 24 日至 2 月 1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

座谈会是根据周恩来指示召开的，研究了固原地区在执行民族政策方面的问题及平叛扩大化等问题。

座谈会提出，要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要挑选懂得民族政策的同志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要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满腔热情地帮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

7 月 2 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座谈会报告的通知中指出，近几年来，在某些同志中间，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党的民族政策的观念十分单薄，有的甚至发生了严重违反党的民族政策的情况。因此应当对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二日，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关于增加棉花进口的报告”

报告指出，1969 年以来，棉花产量大幅度下降，由 1968 年的 4700 万担下降到 1972 年的 3900 万担。因此每年不得不动用国家库存棉花，使库存纺棉由 1968 年的 4864 万担减少到 1972 年的 3213 万担。1972 年计划生产棉纱 1000 万件，由于棉花原料供应不足，影响了棉花生产。到年底，国家棉布库存量将比年初减少 15 亿米。另一方面，国际市场棉花价格下降，对进口有利。因此，报告建议 1973 年从国外进口 700 万担棉花。

其后，在实际进口中又增加 150 万担。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72. 12. 10；中发[1972] 44 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中央同意《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现在连同商业部的报告一并转发给你们，请你们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粮食形势很好。但是，由于连续十年丰收，许多同志思想麻痹，放松了对粮食工作的领导，放松了节约用粮、勤俭建国的教育，两年来职工人数、粮食销售量大幅度增加，遇到今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征购量略有减少，就出现了挖库存较多的情况。

如果我们不认真注意，采取有力措施，及时加以解决，将会造成较大的被动。因此，各级领导务必加强领导，千万不要粗心大意。

应当指出：当前的粮食问题是在大好形势下出现的。只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以批林整风为纲，抓紧路线教育，纠正不正之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努力增产，厉行节约，粮食工作上出现的这种暂时困难，是不难解决的。因此，工作要抓紧，抓细，不要造成人为的紧张。

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太好，各级领导同志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毛主席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毛主席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中央相信，全党同志一定能够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个文件，发至县、团级，附表发至省、军级。文件的精神可以传达到群众，但不要引用文件中的数字，注意保密。要加强阶级斗争观念，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乘机破坏。对敌人的造谣破坏和投机倒把活动，要坚决予以打击。

你们讨论和执行的情况，请报告中央。

中共中央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

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

主席、中央：

送上商业部“关于当前粮食情况和意见的报告”，请审阅。

据粮食工作会议反映，今年粮食产量可达四千八百一十二斤，比去年实报五千零三亿斤，减产一百九十亿斤。购销相抵之后，将出现一个一百三十六亿斤的“窟窿”，除进口三十亿斤外，需要挖库存一百零六亿斤。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今年农业生产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另一方面是近两年来我们对粮食工作过问得少了，放松了，在连续十年丰收的大好形势下，思想上麻痹了，忘记了主席必须把粮食抓紧的教导。去年是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本应当做到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增加几十亿斤的库存。可是相反，却挖了十四亿斤库存。当时，我们对这一情况有所觉察，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今年问题就更突出了。

粮食上发生的问题，也是国民经济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反映。周总理在今年初就指出，职工人数突破了五千万人，工资支出突破了三百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八百亿斤，这“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对此，我们领会不深，致使“窟窿”越来越大。造成“三个突破”的主要原因，是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职工人数增加过多，仅一九七〇、一九七一两年，就增加职工九百八十三万人，超过计划五百零九万人。今年劳动计划是一百万人，但上半年就被突破了。这种情况，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纠正，今年底职工人数可能突破五千五百万，工资支出将达到三百三十七亿元，粮食销量也将突破九百亿斤。

对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主席、中央早有明确指示，我们研究得不够，解决得不好，见事迟，动手慢，又没有及时向主席、中央反映情况。我们是有责任的。

在粮食会议期间，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之后，立即进行了讨论，先念、登奎同志到会讲了话，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范子瑜、李震、苏静同志也在会上作了检查发言。经过大家认真讨论，一致认为只要全党动手，以批林整风为纲，抓紧路线教育，纠正不正之风，坚决贯彻立足国内、自力更生的方针，做好工作，问题是不难解决的。粮食工作上出现的这种暂时被动情况，也是可以扭转的。

我们认为商业部的报告原则上是可行的。如无不妥，建议中央批转各地执行。

国民经济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拟在一九七三年全国计划会议上，认真检查、研究一次农轻重的关系问题，并提出解决意见。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批示。

国 务 院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附件：商业部报告（附方案表，法制省、军级）

附件：商业部关于当前粮食情况和意见的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

最近，我们开了粮食工作会议。会上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粮食工作的指示，分析了当前粮食形势，检查了工作中的错误，研究了改进的措施。现报告如下：

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粮食形势很好。农业生产获得了连续十年丰收。做到了国内粮食自给，不吃进口粮，初步扭转了南粮北调的局面。一九七一年粮食产量达到了五千亿斤，国家和集体粮食储备都有所增加，国家储备增加到八百三十亿斤，集体储备增加到二百亿斤，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解放军和各级干部艰苦奋斗的结果，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今年，虽然许多地区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在各级党委领导下，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和工业支援农业，经过积极开展抗灾斗争，仍夺得了较好的收成。初步估计，粮食产量可达四千八百一十二亿斤。

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我国粮食的基本情况是，丰年略有节余，平年基本自给，灾年挖点库存。由于今年歉收，加上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个年度的粮食安排，就出现了一个“窟窿”，。根据各地意见，征购七百九十三亿斤，销售八百九十四亿斤，加上军粮等开支三十五亿斤，收支相抵，亏空一百三十六亿斤。除进口弥补三十亿斤外，需要挖库存一百零六亿斤。

二

粮食安排出现“窟窿”的原因，除严重自然灾害影响外，主要是我们在农业连年丰收的大好形势下，忘乎所以，盲目乐观，思想麻痹。去年是个丰收年，本应当做到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可是我们丰收了没有多购，销售又控制不严，结果挖了十四亿斤库存。当时问题就已经暴露出来，但没有引起我们重视。今年年初周总理批评“三个突破”之后，我们仍没有认真调查，也没有和有关部门研究

措施，加以控制。一九七〇和一九七一两年，新增加职工近一千万人，其中超计划增加的有五百多万人；今年计划招收职工一百万人，上半年就被突破了。农村转入城镇的人口也增加很多。一九七一年粮食销量已达到了八百五十五亿斤，如不采取有效措施，一九七二年可能要突破九百亿斤。这样，国家征购就无法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势必增加农民的负担，影响粮食一定五年政策的执行，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

粮食工作没有做好，是我们没有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粮食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忘记了我国是一个七亿多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忘记了粮食还很不宽裕，必须把粮食抓紧。该抓的没抓，该管的没管，该报告的没有报告。国务院领导同志要我们整顿粮食统销，我们行动迟缓，贯彻不力。对一些地方自行提高粮食定量，增加粮食补助，大手大脚、随意支用、虚报冒领等违反统购统销政策的现象，我们没有认真检查和纠正，也没有向中央、国务院报告。我们没有尽到责任。

三

粮食工作上出现的这种暂时被动的情况，只要全党重视，认识一致，做好工作，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解决粮食问题的方针，只能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立足于国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增产节约，精打细算过日子。决不能依靠进口粮食来平衡国内粮食的收支。当然，为了调剂品种，增加储备，进口一部分粮食是必要的。

经与有关部门研究，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 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纠正粮食工作中的不正之风。要认真学习毛主席、中央关于粮食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并坚决贯彻执行。

(二) 进一步贯彻落实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大力发展粮食生产，这是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发扬大寨精神，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尽快把粮食和经济作物搞上去。

(三) 正确执行统购统销政策。认真整顿城镇粮食统销，压缩一切不合理的供应。违反国家规定，任意提高口粮标准的，要坚决纠正。不符合规定的粮食补助和补助标准过高的，要坚决减下来。但对城镇居民和工业、市场用粮的合理需要，不能随意压缩，必须保证供应。

(四) 坚决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的人口。今年新增职工超过国家计划的地区和部门，必须立即停止招工；自行招收的部分，必须及早减下来。走后门进来的，必须退回去。不合规定迁入城镇的，要动员回去。在进行此项工作中，一定要过细地做好工作，防止简单从事。使用临时工，必须纳入国家劳动计划。对农村迁往城镇的人口，要严格控制。户口管理工作，要切实加强，虚报冒领粮食的现象必须杜绝。

(五) 要在绝对不可以购过头粮的原则下，力争在丰收地区多购一点粮食，以丰补歉。要贯彻执行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的原则，不能偏顾一头。要教育社员群众，丰收不忘支援国家，不忘支援灾区，动员社队多卖一些余粮。

(六) 切实安排好农村人民生活。灾区要发动群众，依靠集体，生产自救。国家要保证重灾区必需的粮食供应。农村粮食统销指标要合理分配，逐队逐户把生活安排好。农村不合理的销量，要认真核减。民工人数必须严格控制，过高的粮食补助必须压缩。农村社办企业事业人员，国家不补助粮食。收购农副产品奖售粮食，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扩大范围、提高标准。

(七) 坚持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增加国家和社队储备，备战、备荒、为人民。我们国家大，人口多，每人节省一点或者浪费一点，全国都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要动员城市人民自觉自愿节约粮食，支援灾区。工业用粮，要广泛开展节约代用。

(八) 加强纪律，严格粮食管理制度。要做到“四统一”（统一征购、统一销售、统一调拨、统一库存）。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提高城市定量，不得动用国家粮食库存。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单位以及所属“五·七”干校和农场，应认真执行国家的粮食政策和市场管理的规定，反对铺张浪费、私分送礼和破坏市场管理的行为。违反政策制度动用粮食的，有关部门要严肃处理。粮食部门要模范地执行国家的粮食政策，敢于向一切违反纪律的行为作斗争。

(九) 在城乡人民中，要大力宣传和提倡计划生育。少数民族地区除外。

(十) 加强阶级斗争观念，提高阶级警惕，严防敌人乘机破坏，造谣惑众。对敌人的破坏和投机倒把活动，要坚决给予打击。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是每天要吃饭的，不论办工业、办交通、办教育、搞基本建设，办任何一项事业都离不开粮食。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当忘记这个最简单的千真万确的道理。”我们建议各级党委进一步加强对粮食工作的领导，全党

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一年要抓几次，既抓增产，又抓节约。各级粮食部门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谦虚谨慎，兢兢业业，把粮食工作做得更好。

关于一九七二年度的粮食购销和调拨计划，经过粮食工作会议的讨论，我们提出了一个方案，征购争取完成××斤，销售尽量做到不超过××斤。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指示。

中共商业部核心小组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翻印)

一九七三年，陈永贵在农林部和北京市委举办的报告会上的报告摘要

同志们：

今天下午，农林部和北京市委的同志让我给大会汇报一下昔阳县学大寨的情况和大寨近三年来的情况。

七零年以来，全国农村在批林整风运动推动下，农业学大寨运动更加深入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力量得到进一步发挥，有了很大的变化。今年，我国农业生产全面丰收，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形势大好。全国出现了一批大寨式的县，回答了《人民日报》社论《农业学大寨》提出的“三年行不行”的问题。

昨天我和沙风部长、北京市委的同志们，在北京市郊区中阿公社，顺义县、平谷县等几个县看了一下。跟七零年以前比，北京市有变化，有进步。当然，也不能说一点缺点错误也没有，还是有的。缺点就是有了先进的县、先进的社和先进的队，为什么就不能够由点到面呢？这不光是北京市啦！全国类似这样的省、市还不少嘛。哪一个省、市、县、区和公社都有自己学大寨的先进典型。但是，典型突出，面上的工作还是有差距的，差距还是不小的。我们怎么样通过抓点由点到面呢？这恐怕还是北京市要抓的一个问题，也可以说全国都应该这样做。这就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提的：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我这次跑了不少省、市，不少地方，看了以后想，三年行不行？行。四年、五年怎么样？完全可以。

三年来，大寨和昔阳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昔阳通过文化大革命，从一九六七年开始到现在，全县经过学大寨运动是起了很大变化的。文化大革命之前，大寨的经验不仅在我们全省或者在全国不能够

推开，就是在昔阳也没有很好推开呀，昔阳也还是不学大寨的。文化大革命之前昔阳学不开大寨，那是修正主义路线的过，就是在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错误路线影响下，昔阳不学大寨。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开展了革命大批判，一九六七年在全县就开展了学大寨运动啦！特别是通过批林整风，全县学大寨运动更起劲了，干劲更足了，办法更多了，成绩更突出了。因为在昔阳，批林整风那是要认真抓的。昔阳县开展批林整风运动，首先我们各级领导要摆进去，要联系实际进行批。联系实际，就要联系农村的资本主义势力，来批判错误路线。要认真地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进行批。通过批林整风运动，昔阳农业学大寨运动成绩是比较显著的。有哪些成绩呢？

先说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一年我们的粮食上到了接近两亿四千万斤，跟文化大革命以前相比，翻了两番。文化大革命以前，全县每年的总产量总是七、八千万斤。全县二十万人口，四十万亩耕地，每年的亩产都是二百斤左右，按人平均每年产的粮食是四百斤左右。对国家的贡献也很少。一九六六年对国家的贡献，全县才七百万斤。一九七一年，粮食多产了，对国家的贡献也就多了，就不是七百万斤了，全年卖给国家的余粮是八千万斤，等于一九六六年全县的总产量。如果没有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没有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我们怎么能够拿到那么多粮食呢？所以，广大贫下中农丰收不忘国家，不忘工业的支援。工业对我们的支援也是很大的。在一九六七年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到一九七一年，五年时间，翻了两番，人均产量也是两番，一口人达到了一千二百斤。可是在一九七一年，我们提出卖给国家八千万斤余粮，有的人造舆论，说什么咧？说我们是吹牛。别的能吹牛，卖余粮也是吹牛。意思就是说我们昔阳的大干是吹牛的。卖余粮也能吹牛？那是要往外拿哩！我们到一九七二年五月份，才把这八千万斤粮食上调完。调了以后呢，他们的舆论又变了。不是说昔阳卖余粮是吹牛吗？八千万粮食人家都上调完了，怎么能说是吹牛哇！他们说，那也得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不要看他卖得多，可是一多带来三少。什么少咧？口粮少，种子少，饲料少。一提出这个“一多三少”的问题，引起了大寨和全县的贫下中农的怨恨。这样，就更有利批林了。我们全县卖了八千万斤余粮，每人平均才仅仅卖四百斤，我们人均产量一千二百斤，一口人还有八百斤，怎么能说三少呢？文化大革命以前什么都少，产量也少，口粮也少，对国家的贡献也少，为什么他们不提出少呢？我们执行毛

主席的革命路线，开展了革命大批判，使广大贫下中农提高了路线觉悟，树立了爱国主义思想、集体主义思想，省吃俭用多卖余粮，怎么能说是“一多三少”呢？这件事，在批林整风中，就批了。这样的舆论，与批林整风是背道而驰的。文化大革命前有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那时确实是少。经过文化大革命，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什么都多了，产量多了，卖粮也多了，口粮也多了，储备粮也多了，积累也多了。怎么能说出那么多“少”咧？这是事实，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是昔阳人，也是昔阳的山河，产量老上不去，为什么他们不说少咧？为什么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了革命人民和干部，懂得了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产量成倍增长，倒说成是少哇？所以说，在批林整风当中联系实际，就必须联系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来进行批。你不联系实际，光空喊批林整风怎么行？批林整风是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头等大事。不能批林就是穿靴戴帽，革命大批判就是抄书抄报。不能象那样呀！这是纲，我们不能丢了纲，得抓住纲才行呀！这是一九七一年的情况。

一九七二年我们遇到了一年大旱。一年全县平均的降雨量只有一百零四毫米，还是星星点点地全年统计起来的，有的下个三、两毫米，根本没有起什么作用，这样统计起来是一百零四毫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抓水利，抓水抗旱，整整抓了一年，也还抓出点效果来。过去，全县有三分之一的社队，连人畜吃水也没有解决，更不用说抗旱了。县里抽调了许多汽车、马车和全县的手推车，为这些人畜缺水的社队供水。一天能往返的，自己去解决。一天往返不回去的，由县、社负责解决，经过一九七二年一年的大旱，大抓水利，全县三分之一的社队人畜缺水的问题，全部解决了。现在，大部分已经吃上自来水了，都是通过地下安水管解决的。经过解决人畜吃水问题，这些社队也想办法抓自己的水利问题了。他们打旱井，修水库，抓了不少水利工作。在全县也大办了不少水利工程。根据目前情况来说，全县要再狠抓一下，赶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完了，能解决十万亩水浇地，每人能有半亩水浇地。现在，大概是六万多亩了。我们那里找地下水很困难，主要靠打旱井，修水库，截潜流。钻深井，有些地方钻上二百米，还钻不透石灰岩，再深了，就有个开支问题和设备问题。我们暂时还是要大抓修水库，截潜流，打旱井，来解决水的问题。由于抓了水，今年继续大旱，问题就不大了。今年，继续大旱，继续大干，没有见过的大旱，没有见过的大干，到了今至秋天，

也是没有见过的大丰收。今年是个丰收年，昔阳的产量是超过历史上最高的一年。两年大旱，在太行山顶上能够找到水，再抓两年，每人能有半亩水浇地。如果没有这样的大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水浇地，也不可能解决三分之一的人畜吃水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旱不是坏事，就看你怎么对待。如果有革命干劲，能够抓住大干，就能够大变。如果遇到困难不敢干，那就变不了。广大贫下中农有个深刻的体会：要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没有革命大批判，要不抓党的基本路线，没有批林整风，老实说，我们的水是不会解决那么快的，我们的办法也不会有那样多的。

在水这个方面，这两年抓了抓。土是从一九六七年开始就抓了，就在全县开始抓改土工作，抓平田整地和劈山改河、搬山造田等工作。经过文化大革命，通过革命大批判，昔阳的面貌怎样来改变？大寨在昔阳呀，大寨能办的事，为什么昔阳不能办呢？当时讨论这个问题，大家说不是能变不能变、能办不能办的问题，是路线的问题。只要路线对头了，昔阳的面貌是完全能变的。在一九六七年，全县就开展学大寨的运动啦！大寨人可以搬山造田，昔阳就不能吗？昔阳的条件比大寨更好。大寨一个队能办的事，全县不是更能办吗？因为全县有二十万人，大寨只不过四百口人。大寨没有大河，这大家都知道。大寨不是七沟八梁一面坡吗？这七沟八梁一面坡怎么治理了咧？这一面坡就是过去那材料上说了的，大寨的地在山坡上挂着哩，叫“三跑田”嘛，就是跑水、跑肥、跑土。地块越种越小，土层越种越薄，产量越来越低。这怎么能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呢？那就更谈不上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了，连我们自己的问题也解决不了。要改变大寨那个贫困面貌，你不苦干怎么改变？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就教导我们，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你不鼓足干劲，那怎么办呀？这就是以往我提过的，你舒舒服服能够学好大寨？那是跟石头打交道哩！要没有一个大的干劲，是改变不了贫困面貌的。我们这北方跟南方不同，种庄稼大部是种一季。南方是种好几季，一季不行，还有两季三季。北方它就是这样一个条件呀！当然，可以创造条件，你种两季也能，给种两季创造条件还是完全可以的。我是说当时在大寨那个条件下，怎么治理的。要把这个“三跑田”变成保肥、保水、保土的“三保田”，那不是说一句话就能办了事的。我们劳力又不多，当时机械化也没有。但是，大寨贫下中农不怕苦。

还是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就制定了一个十年造地规划，要彻底改变大寨的贫困面貌，把这一面坡变成水平梯田，那七条河沟变成良田。这个规划，十年确实是完成了。就是苦干了十年，年年苦干，年年增产增收，社员生活年年提高，对国家贡献逐渐增多。大干了十年，这七条河沟成了高产稳产田，那一面坡的“三跑田”成了旱涝保收田。这样，土地变样了，产量当然也要变样。土地变样，产量变样，如果人的思想不变样，还是旧的思想，哪里来的新的干劲，大的干劲，和新的办法？思想也变了，就是物质变精神了。农民还不欢喜那样的好地？还不喜欢高产？还不喜欢增产增收吗？贫下中农是非常喜欢的，只有那些地、富、反、坏不满意。丰收了，增产增收了，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了，贫下中农谁还能不满意呢？不满意的，害怕的是被打倒的地主阶级，他们害怕增产增收，他们害怕我们对国家贡献大，他们害怕集体经济巩固和壮大发展。凡是他们害怕的，都是贫下中农愿意干和不害怕的。这样，大干了十年，大寨的面貌改变了，产量增加了，收入也增多了，对国家贡献逐年也大了。

从一九五三年到现在，这二十年，大寨大队没有因灾减产和减收过，更没有因灾要过国家的供应粮和救济款，一斤供应粮也没吃，一分救济款也没要，始终坚持了自力更生的方针，战胜了一切困难，使一个贫困落后的山村变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点，同志们都应该知道。可是，也还有些人有怀疑呀！你大寨户数又不多，劳力就是那么几个，又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又修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不是坚持自力更生的呀？还是国家给了大量支援咧？国家没有给我们支援。给是给过，一九六三年大寨在遭受毁灭性灾害以后，给过。我们都谢绝了，贫下中农都谢绝了。给粮没有要，钱也没有要，物资也没有要。我们要什么咧？我们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什么就都有了，什么困难也能克服了。国家给粮能吃光，给钱能花了，给物资能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哪一个革命人民能离了呢？谁离开了也不行。我们是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要粮、要钱、要物资。所以说，用不着怀疑大寨，没有过的。周总理在一九六五年指示过我们，也指示过山西省委，不能破坏大寨的自力更生。我们是始终坚持了自力更生成长起来的。如果我们“等、靠、要”，也不会有今天的大寨。现在有一些社队，国家给的多，变化不大；条件很好，发展不快。“等、靠、要”，靠

国家支援起来的那些社队，不一定过得硬。凡是坚持自力更生精神成长起来的社队，不管他遇到多大的困难，总是有办法克服的。我们有这方面的体会。

比如说一九六三年，如果也让国家给救济，或者是贷款，或者是救济粮、款、物资，来战胜困难，大家也不会积累了战胜困难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在一九六三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战胜了那样严重的困难，广大社员得到了锻炼，干部吸取了经验，就是在困难的情况下积累了战胜困难的经验。自然灾害哪年没有呢？以后遇到一般的灾害，那确实不在话下。集体经济优越性很大，它就是能战胜困难，也能战胜灾害。所以，这二十多年来，没有因灾减过产。谁能说农业不稳定呢？不稳定，是怕人的思想不稳定。如果思想要稳定了，有了革命化的思想，不管你有什么灾害，不管你有多大灾害，都是能够战胜的。大寨就是一个例子。反正二十多年来，没有因灾减过产，也没有要过国家的供应粮和救济款，更没有少卖过一斤余粮。

在一九六三年遭到毁灭性灾害以后，加强了田间管理，先治坡，后治窝。受灾以后，你究竟是先修房呀，还是先修地呀？我们抓住了先修地，先恢复土地，先加强田间管理，先抓住粮。这样，在秋后卖的余粮也不少嘛，每一户还平均卖给国家三千斤余粮哩！这就是卖余粮不少，口粮不少，积累不少，三个不少嘛。再说得远一点，就是从一九五三年办社那一年起，直到现在，卖给国家的余粮是一年一年增多的，没有一年因灾少卖一点，没有过的。只要我们思想革命化，用党的基本路线去教育农民和我们的干部，有什么困难？粮食就那么困难？这样，十年规划完成了以后，加上精耕细作，人们精神面貌越来越好，干部办法越来越多。经过这二十来年的苦干，大寨情况是年年有个变化。去年，全县大旱。大寨大队社员有个想法，就是丰年按穷日子安排，丰产丰收了不要分光吃净，也还要按穷日子来安排。省吃俭用，年年如此。去年是一个灾年，灾年多卖粮，卖了四十万斤余粮，大概每人平均接近千斤。为什么去年要多卖余粮呢？去年全县遇到大旱，在收秋前晋中地委给昔阳八百万斤供应粮，遭灾了嘛。县委的同志们考虑，我们既然是学大寨，大寨的贫下中农是越困难办法越多，越困难越要节约。你学大寨精神嘛。

大寨的贫下中农在去年提出每一口人节约七十斤粮食，全县也同样是这样，大寨贫下中农为了减少国家负担，能省吃俭用，我们全县也按大寨那样，就省下

一千四百万斤。地委供应的八百万斤，我们也谢绝了，合起来就是两千二百万斤。这样节约，不仅没有吃国家的供应粮，还卖给国家三千万斤余粮，超过应包任务的百分之二十多。如果要大吃的话，那八百万斤供应粮吃了也不宽裕。这就是说，丰收不忘国家，遭了灾也不能忘记国家，也不能不考虑国家的负担问题。这是在去年大旱之年，通过节约，省吃俭用，多卖余粮。

去年，我们全县还有六个公社颗粒不收。在收秋之前，这六个社的贫下中农压力也很大。特别是坏人，农村被打倒的地主阶级没有睡大觉，一有机会就要进行捣乱。那些地、富、反、坏说什么今年颗粒不收，粮没有，钱没有，怎么办呀？就是煽动劳力外流，水利工程下马，专业队撤销。我们为了占领这个阵地，就要走在敌人破坏之前，掌握阶级斗争的主动权，不能使地、富、反、坏的目的得逞。县委及早就向这六个颗粒不收的社宣布了，到秋天保证每一个人不低于四百六十斤口粮。这一宣布呀！这些社队的贫下中农喊“毛主席万岁”。没有见过这颗粒不收，口粮还不低于四百六。这样，贫下中农也不外流了，阶级敌人也不敢再公开捣乱了，全县的工程呀、专业队呀，都又恢复上马了。为什么这么大面积，全县二十个公社有六个公社颗粒不收，县里就敢向他宣布每人不低于四百六十斤口粮呢？因为我们有余粮，有储备粮。尽管在一九七一年卖了八千万斤余粮。还有相当大部分的余粮哩！社有余粮，队有余粮，社员各户也有余粮。这样，我们就深深体会到藏粮于民的作用了。去年，节约口粮还是因为有余粮，如果没有余粮，也不可能节约那么多口粮。所以说，把富日子当穷日子安排，节约用粮和节约开支，都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这样，就使农村资本主义势力不能抬头，他要抬了头就麻烦了。大寨大队从来没有在外边搞副业的。我们一直是搞农业。你到底是搞农业的，还是搞副业的？以粮为纲嘛，农业是基础嘛。当然，没有在外边搞副业的，投机倒把也就少了。一直是大搞农业，大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寨大队这么多年每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投工占全年总投工数的百分之六十还多，来改变生产条件。可是，有的地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工占的比例很少，很少很少哩。可是反过来，在搞副业。当然，对农业有利的副业是应该搞的，不能不搞。但他不是搞直接有利于农业的副业，而无非是出卖劳力，进城干投机倒把，搞副业的劳力占的比重很大。不是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劳力占的比重大，而是搞投机倒把、搞不正当的副业的劳力占的比重大。这就要反复考虑以粮为纲的问题了。你

到底是以粮为纲呢，还是以钱为纲呢？这个问题，值得大家考虑。不要口头上说的是以粮为纲，实际上想的光是抓现钱。我外出时，了解到有些地方是副业比重大。我们是搞农田基本建设比重大。这两个大也要比较一下哩。

再一个干部参加劳动的“一、二、三”，我不断讲，可是好象越讲有人感到理解不了。干部参加劳动的“一、二、三”，好象是昔阳又给出了一个不好的点子。这何尝是不好的点子呢？昔阳不出这个点子，你自己不应该出这个点子吗？你说基层干部不参加劳动，怎么得了？！有些地方说什么“脱产干部为的是钱，基层干部为的是闲”。再有些地方说，干部参加劳动按照规定办事，不低于一百二十天就行了。你要劳动二百天，还能犯了错误？！有好多事儿不好理解，昔阳县县里的干部一年劳动一百天，公社干部二百天，大队干部三百天。到过昔阳的同志不少，你们去问他们一下，现在不是办不到的问题，而是超不超的问题。我们是检查超过多少，不是检查达不到、不能办的问题。苦干实干，大干流汗，谁去带头苦干？谁去带头流汗？要光让群众去带头流汗，带头苦干，能带起来带不起来？是干部带动群众，还是群众带动干部？这个干部参加劳动问题，有好多糊涂认识哩！我们都是在基层，基层干部不到实践中去，不跟群众同甘共苦，你怎么能领导好生产呢？“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你怎么抓？大寨干部参加劳动讲得多了，还要再讲。我们是有体会的。大寨干部通过参加劳动，体会到只有跟群众一起同甘共苦，才能做好工作，给人民服好务。一九五三年办社的头一年，我们大队没有会计。有一户富农，那倒是高小毕业，可谁敢把财权交给他呀？！还是在贫下中农当中选一个有文化的人好。最后选到了我们现在的大队长，叫贾承让。他在小学只念了三个月，他就是贫下中农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你不选他，谁来干？！他担任会计，一年给他补贴四十个工。他不用整时间，就是空闲时间完成他的业务，整个时间参加劳动。算帐也算不清，算数也算不真，可贫下中农都拥护他哩，叫他是“万笔清”的会计，实际上一笔也清不下来。什么清？大家说是手脚清，不往口袋装，不往家里偷，算清算不清，都在大队放着哩！为什么群众那样拥护他？因为他天天参加劳动，晚上回来把他的工作搞了。参加劳动，自己分下的粮食、钱、物资，除家用还有余。如果他要借那个会计的名，东游西逛，不参加劳动，靠四十个补贴工靠得住？家有困难怎么办？他是掌财权的，你说那大队啥没有，粮食、钱、物质啥都有，缺了啥往家拿啥，那谁还拥护呢？他跟群

众在一起参加劳动，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跟贫下中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干部能体贴群众，群众能体贴干部。也是干部，也是社员。你领导生产不懂生产，也不到生产当中去，你怎么能领导了生产呢？干部不参加劳动就能领导好生产？没有这个经验。只有一条经验，就是参加生产才能领导好生产。这一条很重要哩！

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跟群众同甘共苦，跟群众密切了关系，就有了领导生产的经验，重要的是保持了干部的相对稳定性。现在大寨大队的干部，大多数还是土改时的干部，当然还培养了几批新干部。保持干部的相对稳定性很重要。前些时候开了晋中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会上揭发出有个大队“月月起来换队长，一年换了十二个，年终结算还是没队长”。干部不能相对稳定，怎么能够领导好生产呢？月月换干部还行？一年一换也不行呀！大寨干部相对稳定，他既考虑当前，也考虑长远。主要还是考虑长远。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昔阳全县大队干部劳动都已经超过三百天了，公社干部都超过二百天了，县级干部都超过一百天了。有些人说什么，干部要参加劳动，那俺就当社员吧！何况当干部又费心血，有了错误还要检查，又受批评。他们说脑力劳动不能体力劳动，就是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不能结合。要叫我脑力劳动，又要体力劳动，我就不如光去体力劳动。这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割开了，那怎么能行呀？！那怎么落实毛主席的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指示？比如农村，大伙都在地里劳动，你不到群众当中去，你去哪里调查研究，哪里深入实际？只有参加劳动，我们的思想工作才能做好，别的工作也能做到了，经验也能积累了，干群关系也密切了。这一条经验可以说成功了。

我们原来没有想到，昔阳能变化这样快。一九六七年我们作了一个计划，大约要八、九、十来年，才能够全县跟上大寨。大寨已经十多年了，全县没有十来年，怎么能赶上大寨呢？大寨修建那个新农村，影响到全县，也修开新农村了。所以计划里边有一条：不过“长江”不盖房，就是说没个十来年，粮食是过不了“长江”的。结果，有的队两年过了“长江”，就盖房。后头，我们修改成粮食不过千斤不盖房。结果，又过了两年，有些队千斤也达到了，就又盖房。那就没有办法了，你计划赶不上变化嘛。现在大家去看到的，都是过了千斤关才盖房的。你去昔阳不要看到到处是新农村，回来不抓粮食先抓盖新农村，那就错了。人家是不过千斤不盖房，你是还没有达到千斤就先盖房，那不犯错误？还说这经验是

从大寨学来的。你见大寨哪会儿不抓粮食先抓房？人家是先抓粮后修房。有些地方是不抓粮就修房，反过来说是大寨经验，给大寨施加了那么大的压力。

这几年，不管大寨也好，全县也好，我们是着重为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更重要的是为第五个五年计划打基础的。就是劈山改河，搬山造田。现在全县增加的耕地大约有六、七万亩。大寨大队从一九五三年到现在，年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地还能少了？要少了谁还干呢？就没人干了。地种多了，我们是整好地，往外腾赖地，赖地植了树了，现在每一个人平均八十棵果木树，占了二百六十多亩耕地。这样占地我们也没有减过地。年年往出修好地，年年往出腾坏地，好地种田，坏地造林。没有减过地亩。减了多少造林地？减了多少修建占的地？减了多少河冲地？没有减过，年年加。年年搞土地基本建设，地亩年年减，那还对咧？！那就不是实事求是啦！可是有些地方，年年减地亩，看起来亩产年年增，要看亩产增加的数量可不小哩，今天“长江”呀，明天千斤呀，总产增加的幅度不大。国家投资年年大，机械化程度年年高，水利化发展也不慢，集体经济的发展，人们思想的提高，人口增加的不少，这增人也增劳力呀，怎么地亩越来越少？这就是实事求是？还是里头有什么名堂？还是降低地亩提高亩产显示成绩？大寨，你要看今年亩产增产幅度不大，你看总产量是最高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增加耕地。大寨不是保持住七百亩粮田面积，今年七百五了，明年是八百，每年增加五十，在三年内要连续增加一百五，加上二百六十亩果木树占的地，是四百一十亩。这样就增耕地增总产，不是光看亩产。不仅看增地增总产，而且要看贡献。增产不看贡献，产量增了，贡献没有？要看贡献。我们要扎扎实实的，实事求是的。开展了批林整风嘛，你还不实事求是，虚虚假假就不好了。特别是在十大精神鼓舞下，继续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人们的路线觉悟都提高了，打击了农村的资本主义势力。我们不能再给阶级敌人留有破坏余地。钻空子的余地。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是无孔不入的，我们不让他们抓住我们的辫子，来否定我们的成绩。

大寨大队是为一九八零年做好准备，为长远着想，为长远打基础。一年丰产好办，两年丰产也好办，难办的是高产稳产田，这个高产稳产田很重要。我刚才讲大寨大队二十多年没减产，主要不过是有高产稳产田吧。可是也有些地方只稳不高，或是天时好产就高，天时差了就低。创造高产稳产田以丰补歉，这几年，特别这三年来，好多地方都学会了，你秋减了我就夏补，夏减了我就秋补，你这

种作物减了，我就那种作物补，集体经济确实能办到这一点。这样以丰补歉达到高产稳产，使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有计划地安排，不要忽上忽下的。这忽上忽下，是因为人们思想里忽上忽下，并不是条件或天时造成忽上忽下。大寨所造的高产稳产田，人们叫海绵田。海绵田怎么形成的？主要是土层厚，有机肥料多，不是靠化肥。你若单纯靠化肥，有机肥料跟不上去，种上几年就不是大寨那样的海绵田了，还是我上次说的就成为钢砖田了，那就硬得闹不动了。光说科学种田，不想科学办法，还是守旧习惯势力，过去秸秆作燃料，现在还是秸秆作燃料。不解决这个问题，不管哪里都不行，管你南方北方，哪里都不行。秸秆还田，增加有机肥料，就象人们喝了营养液一样。土地缺少那种营养，化肥连着上几年，也就不能起到作用了。

我们北方虽比南方条件差，但是闹好了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完全能种两茬。你看北方有的地方不是有很大改革吗？小麦移栽，这是一个新的经验，适合北方的条件，不然想多种小麦，再种一茬，大作物又成熟不了，早收要减产，不收又该种。农业季节性很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它和工业不一样。小麦如果能移栽，并且移栽后产量还很高，这就能解决北方种两季的问题，能解决季节不饶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问题，也就是北方的气候条件问题。小麦移栽是一个新的经验、新的创举，这是我学到的一条好经验。这就是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哪里有好经验，我们向哪里学。

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在平田改土，劈山改河，来建造稳产高产田。这个土的工作抓不好，也不能达到高产，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建造稳产高产田，不能天时好了就增产，遇到灾了就减产。昔阳这几年变化全靠劈山改河，向河滩要粮，向山坡要田。我们只要有河有山，就有种不完的田，也有打不完的粮食。我们粮食都在山河里放着呢。要精耕细作，科学种田，因地制宜地抓生产措施。昔阳的措施，一条就是增加耕地，过去乱石滚滚的烂河滩，现在基本上变成良田了，就是我刚才说的增加六、七万亩。昔阳劈山改河的办法很多，比方是几百米宽、上千米宽的大河，我们是两边打坝，水走中间，两边垫土成田。再一种办法，就是在河里旋涵洞，在十米宽、几米宽的河里旋起涵洞来，让水走涵洞，涵洞上垫土造田。石坪大队旋了五千多米的涵洞，造了五百多亩好地。都是亩产千斤粮以上的地。一个大队能增加五百亩地，是向河滩要地要下的。如果都能那样搞，咱

们全国有多少河滩，能增加多少地？贫下中农叫这是“下走水，上种地，打起仗来还是好战备”。那涵洞里几千米、几万米长，该放多少人啊！这样也就落实了毛主席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啦。这不是洞也有了，粮也积了吗！昔阳有个三都公社，旋了一万一千米的涵洞，造地近千亩，把整个一道河给它改了。再一种办法，就是裁弯取直，如果碰到山就在山里挖洞，让河水走这山洞里边，就和火车进隧道一样。办法很多，原来也没有想到有几种办法来劈山改河，就是咱们的专家们也没有办法。什么农业专家、水利专家，他们书本上也没有那么多的办法，也没有河沟旋涵洞，水走涵洞、上种地那种办法。看起来还是群众有，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通过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广大革命人民提高觉悟以后，他那办法很多，那些劈山改河的办法都是他们创造出来的。这样大干几年，我们预计到一九八零年全县留足余地能拿四亿斤粮食。这四个亿，再和一九六六年以前那七、八千万斤相比，翻了几番？恐怕是好几番了吧。不管翻了几番，反正得苦干。不苦干翻不了番。全县拿到四个亿，我们连两亿斤也用不了，这就能给国家交两亿斤粮食，一口人平均差不多就交一千斤。如果全国每一个农业人口能给国家交一千斤余粮，咱们能不能用完呢？我看用不完。所以说我们的粮食都在山河里放着呢！昔阳就是向山河要粮的，靠科学种田，精耕细作来要粮的。向山河要粮，要没有一个大的干劲，怕苦怕累，就是现有地里那粮你也要不出来，怎么能向山河要粮呢？有人说，他那地方条件不好，可是能创造条件啊。我们有一些地方，地展平的，条件很好，可是也没有利用啊。这就要从两条路线上去考虑问题啦。

毛主席教导我们：“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你怎么教育农民呢？物质变精神嘛，你怎么去变？只有大干才能大变。这大干大变不能光挂在嘴上，要真正大干，要象大寨那样，象昔阳那样。我们全国各地这几年出现了那样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去了解调查一下，大家就都清楚了。在大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我们全国要有象昔阳、大寨和全国先进单位那样的干劲，那样去想办法，那样去向山河要粮。昔阳可以搞的，其他地方不能搞？

我再举昔阳几个大队的例子。比方皋落大队，在一九六六年以前总产量就是一百二、三十万斤、年年吃供应粮。这个队是一九六七年学大寨，他们那里是下湿盐碱地，怎么办呢？他们把整个下湿地都开了沟，也在下边旋成了小涵洞，

让水在涵洞里走，到一九七一年全大队总产量从一百三十万斤上升到四百八十万斤，卖余粮二百六十万斤，等于他一九六六年前两年的总产量。你说增产粮食费劲？路线对头了，粮食到处都有，不是那样不好拿的。抓住纲，粮食就上去了。皋落大队今年的产量可能更高一点。其他大队呢？也如此。昔阳四百一十二个大队，队队都是成倍增长的。大寨在文化大革命前全国学不开，挨着大寨也不学，通过文化大革命，全县都学开了，大寨经验都在全县开花了，这就是由点到面了。抓住了路线教育是能够由点到面的。在昔阳，点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主要是抓面上的问题了。有些参观的同志到那里也看过，说是点也是面，看点和看面没有大的区别。现在还不能说一点区别也没有。到一九八零再去看，全县四百一十二个大队队队都能成为大寨式的大队。这几年就是干这件事呢，就是为一九八零年创造条件，到那时粮食留足余地要拿到四个亿，四百一十二个大队队队都是新农村，解决几代同住房的问题。大寨公社二十二个大队基本上新农村化了。可是大寨公社粮食亩产保证千斤，是照大寨的先治坡后治窝的精神来建设新农村。无论如何要防止吹了粮来抓新房，这是要犯错误的。必须抓住粮食这个纲。粮食发展了，其他方面也就上来了。

这几年，我们在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方面，已经奠定了一定的条件，问题是今后粮食上去以后，轻工业怎么发展的问题。我们现在全县仅饲料一项二千万斤。这二千万斤饲料，开个酒厂抽出一千万斤加工，再用这一千万斤加工后的渣子跟饲料粮混合在一起作饲料，减少不了多少营养成分。这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吧。这样，粮食上去了，轻工业不是也就上去了？再一个，我们想再抽他三几百万斤饲料加工。加工什么？加工葡萄糖。渣子用来养细毛羊，靠山吃山，吃山养山。我在四川讲过，看来四川的山很好，川里也是平坦坦的，山上树木成林，绿化得很好，我说你们这里是好条件，川里是粮仓，山里是“银行”。我们这里就不能把山里变成“银行”啦？这样既增加了轻工业品，又能增加点收入嘛。农村还得要增加点收入，年年搞建设，开支很大，你搞水利化、机械化，不靠自力更生，光靠国家支援，这么大一个国家那有那么多东西供给？昔阳发展果木树相当多，能不能搞个罐头厂呢？搞水果罐头、肉类罐头。水库到一九八零年连大带小合在一起大概总有个七八百个。这水库的鱼也可以做罐头。山区要想富，发展农、林、牧，还得加个副。我们不要看在这太行山顶上，它是要变化的。因

此提出太行山顶上变成小江南，不是空喊的，是能变的。我们太行山顶上是由旱田改水田，就是要种相当大的一部分水稻。无霜期虽然很短，但是我们解决了水的问题，在太行山顶上能种出水稻来，产量不低，一季在千斤以上，这已经试验了。为什么要强调种水稻呢？这是因地制宜。我们那里土地肥沃了，肥料增多了，种玉米长得高，一长就是三米多，有的达三、四米高。高山上高秆作物夏天一下雨一倒伏就减产。水稻是一种低秆高产作物，不容易倒伏，适于在山上种。高秆作物减了产由低秆作物往回补，这是以丰补歉的办法。当然这要抓住水，没有水还是不行的。这就是在太行山顶上能种出水稻来，能全面发展。这样就能有利于支援祖国的建设，支援城市，支援工业。你不能光要求工业支援农业，农业也还要支援工业嘛。

最后再讲一点，我们考虑，全县能不能够和大寨一样，二十多年没有因灾减过产，没有因灾吃过国家供应粮，更没有因灾少卖过一斤余粮呢？全县能不能办到？现在基本上做有了。大寨能办到的事，全县完全能办到，今后发展比较有了点把握了，请大家放心。今后我们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认真贯彻十大精神，狠抓批林整风，坚决刹住农村资本主义的妖风，使我们的革命和生产蓬勃向前发展。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发出关于口岸工作的情况和改进意见

意见提出加强和整顿口岸工作的措施：

一、加强口岸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建设。原有口岸涉外人员，适合做口岸涉外工作的，应尽可能归队；口岸工作人员不足的，应尽快配齐，并加强政策教育和业务训练；口岸检查单位不宜层层下放，更不要划归生产、企业部门领导。

二、口岸涉外人员要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检查工作要贯彻执行“内紧外松”、“一视同仁，有所区别”的原则；对于违法、违章以及业务纠纷和海事等问题的处理，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现行的口岸工作的规章、法令等，应尽速组织力量加以研究、审查和修改。

三、采取措施，扩大港口吞吐能力，压缩外轮停港时间；建立健全理货、代理业务和其他服务机构，提高工作质量；为保证航行安全，原则上应向外轮供应我沿海的海图、提供港口资料和外轮避风的港口、锚地。

四、充实口岸工作急需的工具设备，少数国内不能提供的设备，可从国外进口一部分。

五、责成交通、外交、公安等部门组织若干联合检查组，分赴各口岸，进行落实政策和加强工作的检查和帮助。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国务院批转一九七三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

1973. 02. 20；国发 [1973] 22 号

国务院同意 1973 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现转发你们，望研究执行。

各地革命委员会要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抓好体育战线的批林整风，认真搞好斗、批、改。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教导，从儿童抓起，积极发展群众体育运动，同时加强优秀运动队的建设，改变目前运动员队伍青黄不接的状况，迅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使体育运动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75 年将要召开全国运动会，各地要做好准备工作，并以此推动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广泛开展，力争创造一批优异成绩，使体育运动出现一个新的面貌。

附：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摘录）

1973 年 1 月 8 日至 24 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会议分析了体育战线的形势，讨论了 1973 年工作安排。

一、体育战线形势大好

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日益广泛，广大工农兵踊跃参加体育锻炼，增强了体质。各地加强了中、小学体育工作，重视了业余训练，新生力量正在成长。初步调整、充实了优秀运动队，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和训练工作，出现一些好成绩。体育院校、宣传出版、科学研究、场地器材等各项工作，也有加强。

毛主席英明决策，用小球转动了地球。我国体育战线，积极地配合外交斗争，扩大了我国的政治影响。亚乒联盟的成立，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显示了亚洲人民

的团结。在国际体育活动中，贯彻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去年同 79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 230 多起体育交往。这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

但是，体育工作的发展还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突出表现在，当前世界运动技术的发展较快，高水平的青少年选手不断涌现，而我国运动队伍青黄不接的现象比较严重，多数项目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很大，必须迅速改变这种状况。

二、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略）

三、1973 年体育工作安排

遵照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光辉指示，在批林整风的带动下，做好下列各项工作。

（一）进一步开展群众体育活动。“体育是关系六亿人民健康的大事”。“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各级体委必须遵照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切实抓好群众体育工作，广泛、扎实地开展群众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首先要抓好工农兵的体育活动。结合生产劳动，军事训练和爱国卫生运动，根据我国各民族的传统、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坚持业余、自愿、小型、多样的原则，配合有关部门，进一步开展厂矿、企业、机关、解放军中的体育活动，积极地、有步骤地开展农村体育活动。加强对基层活动的领导，组织代表队、锻炼小组，开展广播操、生产操等各种活动，加强技术辅导。

各级体委要密切配合教育部门，做好学校体育工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毛主席关于“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指示，使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上好体育课，安排好课外体育活动，积极试行《体育锻炼标准》，推行儿童广播操，开展小篮、排、足球等活动。开好全国中学生运动会。

（二）大力抓好业余训练工作。首先是加强对青少年、儿童业余训练工作的领导，要全面规划，合理布局。认真办好青少年业余体校，抓紧思想教育，给予必要的物质保证，充实教练员队伍，提高教学质量。各省、市、自治区应办一所重点青少年业余体校，条件好的地方也可适当多办。并充分运用基层代表队、业

余训练点等多种形式，逐步形成层层衔接的业余训练网，为运动队培养后备力量，为基层培养技术骨干。

(三) 迅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迎接第三届全国运动会。要求刷新大部分全国纪录，部分项目达到国际水平。从现在起就要积极准备。各地要订出指标，采取有力措施，力争在一、两年内刷新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纪录，球类等项目的水平要有明显的提高。解放军优秀运动队也要作出应有的贡献。项目的设置，应按照全国一盘棋的精神，确保重点，照顾一般，合理布局。田径是各项运动的基础，各地都应列为重点项目。

优秀运动队要继续调整、充实。教育运动员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赶超世界水平。以革命事业为重，迟恋爱，晚结婚。贯彻“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方针，坚持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进行大运动量训练的原则，“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全年力争达到或超过 280 个训练日，平均每天训练 5 小时以上。要特别苦练基本功，重视身体素质的训练。加强计划性、科学性和系统性，提高训练质量。加强医务监督，注意劳逸结合，搞好生活管理。

运动竞赛要坚持政治挂帅，教育运动队和观众，树立社会主义的新风尚，反对锦标主义。除全国性竞赛外，各省、市、自治区体委还可以安排一部分邀请赛、友谊赛，积极开展基层竞赛活动。逐步建立一套适合我国情况的竞赛制度。修订实施《各项运动全国最高纪录审查及奖励制度》和裁判员等级制度，提高裁判的政治、业务水平。

(四) 积极地有步骤地开展国际体育活动。配合我国外交斗争，认真贯彻执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增进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促进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继续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合作，搞好同亚非拉国家的体育交往，对受苏联影响较大的一些东欧国家，也要尽可能多做工作。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积极而有步骤地开展驱蒋斗争。做好援外工作，省、市、自治区要积极承担国家分配的任务。

举办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和参加三十二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是重要的政治任务，必须加紧准备，切实抓好。

(五) 做好宣传出版工作。加强同新闻、宣传单位的密切合作，充分运用报刊、广播、电视、电影等，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体育路线，交流体育工作经验，普及体育知识。办好《新体育》，争取《体育报》今年夏季复刊。努力出版各种体育图书。

(六) 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体育科学的研究工作，为体育运动的普及和提高服务。办好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建议有条件的单位恢复、设立科研组织。开展群众性的科研活动，充分发挥体育学院和其他大专院校以及优秀运动队的作用。加强体育技术情报工作。

(七) 努力办好体育学院，深入进行教育革命，培养以体育师资为主的专业人才。建议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开设体育系、班，各地还可开办体育学校，运用短训班等形式积极培养中、小学体育师资和体育干部。

(八) 为了适应体育事业的发展，按照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保证必要的体育经费和场地、器材等物质条件。原属体育系统的房屋、设备、场地、器材等，应与有关单位商量，妥善解决。

体育器材的生产供应，按国家计委、轻工业部、商业部。国家体委 1972 年《关于加强体育器材生产供应工作的意见》精神执行。

四、加强党对体育工作的领导

各级体委必须自觉地把体育工作置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加强请示报告，增强全局观念，体育工作的位置一定要摆适当。鉴于国家体委已归国务院领导，各省、市、自治区体委可相应改归革委会领导。建立、健全县以上各级体委，列入各级革委会的编制序列。各级体委要按照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建立和健全领导班子，加强团结。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各项政策。根据需要，尽可能使那些熟悉业务的同志回到体育工作岗位上来。各级领导干部要谦虚谨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抓好典型，总结、推广经验。

各级体委要主动配合解放军、教育、卫生、工会、共青团、妇女等有关方面，共同搞好体育工作。建议有关部门考虑设立体育机构，或有专人负责体育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具体情况，恢复、健全体总分会和重点项目的单项运动会。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对国家计委《坚持统一计划，整顿财经纪律》的指示

〔注：此件是国家计委提供的，原题为《总理对〈十条〉的指示》。《坚持统一计划，整顿财经纪律》即《十条》，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搞了一个初稿。二月二十六日国家计委向总理汇报一九七三年计划时，汇报了十条的主要内容，即：

- (1) 坚持统一计划，搞好综合平衡，主要是中央和省、市、区两级的平衡。反对各行其是。
 - (2) 不许乱上基本建设项目，不许随意扩大建设规模和增加建设内容。
 - (3) 职工总数、工资总额以及物价的控制权属于中央，任何地区、部门和个人无权擅自增加和改变。企业、事业单位的劳动力都要服从中央和省市区的统一调度。
 - (4) 严格执行物资分配计划和订货合同，保证物资调得动，不准随意中断协作关系。申请物资，不准弄虚作假，虚报冒领。
 - (5) 加强资金管理，严禁拖欠、挪用税收和利润，不准用银行贷款和企业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
 - (6) 中央下放的大中型企业，由省、市、区或少数省属市管理，不能再层层下放。
 - (7) 按照“鞍钢宪法”的原则，整顿企业。
 - (8) 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 (9) 加强纪律性，纠正不正之风。对于违反纪律的行为，要给予批评教育。违法乱纪的，要按照党纪国法给予处分和制裁。
 - (10)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各级经济领导机构，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
- 在汇报过程中，总理针对《十条》的内容和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总理说：

六九年以后，经济管理瞎指挥来了。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厂给炸了。林彪一伙直接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七三年。恶果暴露出来了。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挡住。九大以后，林彪一伙破坏计划的材料，搞他一本，大家批判嘛。

生产指标，煤增长最少，电也少啊！生产怎能上去。按比例发展，根本没有比例！

协作区问题怎么提法？是否全搞不行，搞一个是一个。反正到处搞独立体系是不行的。

基本建设战线为什么长？一是部的项目多了，地方再多了，原因就在这里。中央、地方，首先中央收缩一下。中央地方都不许扩大建设规模。中央首先下一些，给地方点余地。

缓建、停建，要慎重。经常检查，全年要抓。鉴于一九七〇年大膨胀，七二年没有抓，鉴于这个教训，全年抓。该停的停，停得不合适的，再建。

基建中的问题，还要说一条，搞起建设来，顺手牵羊，搞非生产性建设。必要的可以搞。如宿舍、商店、学校，要搞。但是很多不是搞这方面。要指出来。

地方五小要整顿，这句说得不够。搞五小也要原料、材料、设备有保证。没有原料也搞，同大厂争原料，变成自由发展了。要讲个范围，搞与农业有利的。整顿的方针要写清楚。农机、小化肥、小钢厂、小煤矿要有的了。小化肥也不要每个县都有。破坏计划的无论如何不要搞。

三个突破，去年我讲了，没有抓。确实没有“王法”了。

不只三个突破，货币也突破了。大跃进时货币流通量没超过一百三十亿，六九年接近一百四十亿，七二年是一百五十亿，今年是一百七十七亿。不是那么舒服的，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我们与他们根本不同，但也不那么舒服。商品有差距，货币回不来。人多了，工资多了，货币流通量一定多了，要研究这个问题。多是一定要多的，现在超过了实际。今年市场平衡有三十亿元的差额，差这么多，票子发多了。

林彪一伙破坏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一百七十七亿票子，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你们管财政、银行的，也不叫。要随时

提醒，这是个寒暑表嘛！湖北大投放，去年四季度预支今年的，安徽、江苏也投放。这样大胆开支的，过去很少的哩！

职工总数突破五千万人，一下子五千五百七十万，你们抓一下。民工好减，五小工人、临时工要动员，现在就要搞。数字写出来。

我怀疑钢那么多，材怎样？前后左右还不衔接，出了钢不能轧材，白消耗了热量。还是十年前的问题，“一前一后”。前后左右总是个大问题，运输也不行，进出口拥挤不堪。这些不建设，光搞大品种不行。

按劳分配的问题，是四个一样嘛！还有干难干易一个样。“不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也不利于控制职工人数的一增加”，说得对！

必要的奖励制度，是可以的。

不敢说老实话，带有普遍性。

（汇报说，十条的内容，我们曾经征求过一些省市区来京同志的意见，很多同志表示赞成，希望中央能发一个文件。）

总理说：文件准备了没有？要回答上面的几个问题。文件要发下去讨论，发给来开计划会议的同志。

一九七三年三月六日，中共中央同意并批转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调整测绘、气象、邮电部门体制问题的请示”

请示说，自 1969 年底，国家测绘总局和中央气象局、电信总局、邮电总局等部门统由军事部门领导之后，对开展业务工作和对外交往带来许多不便利。邮电、电信分开，增加了机构和人员，工作也不便利。为此，各地都要求改变这种体制。建议：将测绘、气象部门分开，国务院和总参分别设立测绘气象机构；邮电部分从交通部划出来，电信与邮政合并，恢复邮电部。地方各级测绘、气象、邮电体制，也做相应调整。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调整测绘部门体制的通知
《通知》指出，为贯彻中央 3 月 6 日《关于调整测绘部门体制问题的批示》，决定保留总参谋部测绘局，国务院重建国家测绘总局，属国务院建制，归国家建委领导，负责管理全国测绘业务，保障国家重点经济建设测图，培养中高级测绘

技术人员，主办测绘援外和国际交往工作。要健全省、自治区测绘机构，重建测绘科学研究所和武汉测绘学院。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调整气象部门体制的通知

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关于调整气象部门体制的通知》。《通知》说，中央已于 3 月 6 日，批准调整气象部门体制。决定中央气象局划归国务院建制，由农林部领导，恢复总参气象局。中央气象局负责统筹规划全国气象建设和业务指导，总参气象局负责统筹规划军内气象工作建设和业务指导，在业务上总参气象局接受中央气象局指导。全国 7 个区域气象中心工程，仍按原计划进行，气象中心建成后，由所在省与中央气象局双重领导。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调整邮电部门体制的通知

1973 年 5 月 23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调整邮电体制问题的通知》。《通知》说，中央已于 3 月 6 日批准恢复邮电部，调整邮电体制。调整的主要内容是：一、邮电部恢复后，撤销电信总局和交通部邮政总局。各省、市、自治区邮政局和电信局合并，恢复邮电管理局。各省、自治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城市和中央直辖市的邮政局一般仍可分设。长途电信局和市内电话局除北京、上海市外应合设为电信局。二、各省、市、自治区邮电管理局，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北京市邮政局、长途电信局和市内电话局，由邮电部和北京市革委会双重领导。原交通部邮政总局和电信局直属的企业（不得转产）、事业单位和邮电院校，原则上应下放地方管理。三、邮电干部和技术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调剂的，由邮电部与有关地方党委协商调动。四、邮电各项计划实行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邮电一级（跨省）干线和通信卫星地面站、国际无线电台的生产、建设、物资、维护以及由全国集中支付的费用，均纳入国家计划。邮电业务收入，除北京市外，均纳入各省、市、自治区财政计划。上述计划管理体制，从 1974 年起执行。关于邮电业务的方针政策、长远规划、国际通讯、邮票印制和发行等项全国统一的邮电业务工作，由邮电部管理。

一九七三年五月三十日，国务院转发外交部关于加强地方旅游机构的请示报告

1973年5月30日，国务院同意并转发外交部《关于加强地方旅游机构的请示报告》。5月24日提出的《报告》说，随着我国对外关系的迅速发展，要求自费来华参观旅行的外宾日益增多，接待任务十分繁重。目前，全国对外开放的城市和地区，绝大多数地方都没有专门接待外国自费旅行者的国际旅行社等机构。即使有，干部和翻译力量也感不足。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建议分别情况逐步恢复和健全地方旅游机构，在各省、市、自治区或所在地方党委和革委会外事部门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对各地国际旅行社的分、支社是业务指导关系。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九日，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在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
李副总理：

听了几个发言，看了几期简报，会开的很好，也很必要，非开不可，开得及不及时，很难讲了，可不可以再早一点开呢？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早有指示，不仅最近讲，多少年前就讲了。总理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也多次讲过，每年开计划会议，总有一条大搞综合利用，消除“三废”危害，现在看来，有没有成绩呢？我看成绩是主要的，不然今天会上发言的几个同志，怎么会写出这样好的文章来？这是经过实践的，是实践中的总结，成功了嘛！当然，这个会上讲的还不多，我和国锋同志商量了一下，是不是可以把这方面的典型经验汇集一下，出一本书。毛主席历来教导，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要实事求是，不要吹牛。

消除污染保护环境，要提高到路线上来看，看你执行什么路线，你要执行资产阶级路线，就置人民健康于不顾。资产阶级有什么群众观点？他们是个人主义观点，党内反动路线的代表刘少奇、林彪一伙，有什么群众观点？没有。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是要关心人民，主席教导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搞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就是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在环境保护方面，我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主要的，要肯定的，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要有科学技术的进步，不能满足于这个现状。满足现状就危险。

应该说，成绩很大，缺点不少，毛病不少，环境保护问题，还没引起大多数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所重视。

你们《关于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情况的报告》中，批判了几种错误观点。一种是，“哪个烟囱不冒烟，哪个工厂不排水、不排渣？”你们批判有这种观点的人，“要么是不了解‘三废’的危害，要么就是对广大人民健康和利益漠不关心，对国家财产的浪费无动于衷。”我看，这些人主要是不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有的是身在其中，并不认识。我就不信，“三废”污染对别人有危害，对他就不危害？主要是不认识。

另一种观点是：“生产还忙不过来，哪有时间搞‘三废’？是的，忙是很忙，但从刚才几个同志的发言来看，搞了“三废”治理的单位，那一个又妨碍了生产呢？刚才有个同志在发言中，批判了把搞“三废”利用说成是“拣芝麻”的观点。这个“芝麻”还不小哩！吉林造纸厂拣的“芝麻”有多大呢？他们每年从制浆“废液”中回收烧碱二万吨，这个数量就不小，还有粗塔罗油、脂肪酸、树脂酸等化学产品。他们每年从“三废”的回收利用中，为国家创造的财富达一千四百余万元。这怎么是拣“芝麻”呢？这明明是“西瓜嘛！”

还有人说：“吃饭总得拉屎，生产总得排污。”吃饭总得拉屎，这话是对的，但拉屎总有个拉屎的办法，总不能到处乱拉嘛！有这种观点的人，就认为“三废”无法避免。

这里有两种观点、两条路线的斗争。应当把它提到路线高度来认识，不要把它简单化了，通过这次会后，我们的认识要大大前进一步。“三废”的危害很大。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松花江的白鱼、长江的鲥鱼、阳澄湖和白洋淀的螃蟹，都减少了。“三废”污染，还影响农田作物减产，生产的稻谷吃不得，吃了，要中毒。刚才有个同志说，牛吃了受“三废”污染的草，嘴都肿了。北京同志反映，因为污染影响，有些年青人头发就发黄发白了。环境问题是个重大问题，全世界都在讨论。今天开这么个大会，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路线上来讲，要造个声势，要把它摆到议事日程上来。

同志们发言讲的很好，很有辩证观点，对工业“三废”，放之则为害，收之则为宝，我们有很多东西，一方面在进口，一方面却在白白浪费掉，作为“三废”放跑了。

这次开这个会，意义很重大，中央很重视。“三废”污染问题，只要领导重视，认真抓，认真解决，也不那么难解决。只要加强领导，认真发动群众，把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真正执行《鞍钢宪法》，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好，刚才一个同志发言中说，真心诚意地依靠群众，而不是假心假意，总可以想出办法来的。

解决的办法，也不是有的同志说的，需要好多好多投资、设备、原材料。只要靠自力更生，当然，也不是一点投资、设备、材料都不要，但只要发动工人群众，至少可以做到少花钱，多办事，而且事情办的很好，反过来看，我们现在浪费的钱不少，各部、各省、各企业都检查一下，看浪费了多少东西，譬如，造楼、堂、馆、所，中央不让搞，但有些人就是要搞，他们还有个理由，搞起来了，作个检查就行了，这要搞点纪律。把这方面的钱节约下来，用在“三废”治理上，可以办不少事情。

过去，计划方面研究过一条方针，生产增长主要靠基本建设呢？还是主要靠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我们认为，主要应当放在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上。当然基本建设也要搞一点，现在有不少工厂还没有达到设计能力。而有许多工厂不但达到了而且增产多少倍。这说明潜力是很大的，对“三废”进行综合利用，是挖掘企业潜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吉林造纸厂一年回收二万吨烧碱，这就很不少了，现在三酸两碱很紧张，分配的时候争得要死，给个五百吨、六百吨就很不错了，你自己那里就有，为什么不去搞呢？另外，全国有好多焦炉，从焦炉气中就放跑了很多好东西，抓好焦炉气的回收利用，就可以得到很多的产品，其中有的产品如苯等我们现在还要进口。

对“三废”综合利用、保护环境的问题，我们要从路线上来认识，批判错误观点，加强党的领导，真心真意地发动群众，而不是假心假意地发动群众。

第二条：新建企业，要把“三废”治理措施安排上，和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否则不准开工，不准投产。要在建设中就把清除“三废”污染问题解决好，不要等建设完了以后再去解决。这要作为基本建设的一条纲领。今后在审查、规划、设计时，要看看你的“三废”问题解决没有，卫生部门、科研机关都会化验，“三废”没有解决的，根本不让搞。

过去搞基本建设，搞什么都有钱，就是不搞“三废”治理措施，只把工厂搞起来，不消除“三废”就影响农业，农民要抗议，“你要完成工业生产任务，我要完成农业生产任务”，“我们要粮食，不要赔偿”。国家建委和省里管基本建设的单位，在审查基本建设项目时，没有“三废”治理的，就不让上。他们可能讲出大堆理由，你不要理他那套。

第三条：讲讲工农联盟，这里有一个工农关系的问题。搞工业的同志，没有农业观点，没有贫下中农观点，没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观点，怎么行？我们有的同志有霸道作风，到一个地方，不惜工本把地一圈。反正我要占这块地方，省、市委有权不允许这样做。省、市委指定给你那块，你就在那里建，不占良田，少占耕地，占地的问题，以前讲过多少次了，有的人就是不管。我给吴德、杨寿山、万里都讲过，碰到这种事就顶，他愿意建就建，不建就拉倒，反正就不准占好地。

同志们发言中提到了跟农民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提得好。上面讲了一个少占地的问题，今后的房子要向高层发展

会议搞了个报告和规定，还要修改修改。总之，要提到路线高度来看。

华国锋同志：

这次会议很重要。先念同志说会议开的很好，很重要。虽然不是很及时，但也正是需要大抓的时候。

我国工农业生产二十多年来有很大发展。工业发展很快。今年钢要达到二千五百万吨，石油五千四百万吨，煤炭、化工及其他工业都取得很大成绩。化肥，今年完成的不错，可以达到二千三百万吨。但这些同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的需要来说，同我们有七亿多、八亿人口来讲，水平还低。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这样，但已经感到在发展工业中，环境污染问题已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北京是首都，已经明显地感到这个问题要认真抓。东方红炼油厂在防治“三废”污染方面做出了成绩，但还需要继续抓，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果不注意，对首都是有影响的。

工业要发展，污染问题要认真解决。从东北的松花江到黄河、长江、珠江、我们几大河流都发现有污染问题，有些江段污染还比较严重。就连宫厅水库也发现了污染。我们的炼油厂还不多，石油产量才五千四百万吨，发展到一亿、二亿、五亿吨时，那不就问题更大了？我看了几个材料，湖南二三四八厂也不算大，才

炼油二百五十万吨，但工厂排出的废液把一万多亩水面的湖泊全污染了，鱼都死了。

废渣问题也很大。刚才株洲的发言，利用废渣是有成绩的。但有的地方煤纤石堆积如山，用皮带运输机往上推，塌下来会砸死人。我们的化工还很不够，三酸、两碱还很缺，苯还进口，但化工污染在一些城市中很严重。我们工业在全国还要有大的发展，但现在已暴露出污染的严重。当然，国外象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污染就很严重。日本国内的湖泊、沿海都严重污染，美国、苏修的问题也很大。消除污染，保护环境问题，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污染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不好解决，看了资料介绍，美国不在国内搞化工，而去苏联搞化工，把污染弄到别的国家去。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自己要发展工业，而且要尽快发展，钢、煤、石油、化工、焦炭等都要搞上去，化纤也要快点搞，所以必须注意防止污染。必须重视综合利用，它既充分利用资源，又减轻环境污染。工业“三废”弃之是害，用之为宝。解决环境污染，要变废为宝，要按主席路线来办，要提到路线高度。这个问题同志们讲了，先念同志也讲了。

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工业，为全中国、全世界人民服务。我们发展工业，是为人民造福，绝不是为了营利。资本主义只是为了利润，修正主义也强调利润原则。我们要加快国民经济建设，造福于人民。我们经营工业的思想、路线，是要为广大人民造福，绝不能单纯为了利润。

办工业必须以业为主，兼营别样。要批判那种“综合利用，不务正业”的说法。首钢，原来安排了副产尿素，但有人只抓钢铁，对生产尿素思想上不重视，结果尿素尿不出来。后来市委做了工作把尿素搞上去了。把废气综合利用起来了，造福人民，这是正业。你把废气排出去，危害自己，危害人民，不讲财富的综合利用，这是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我们工业应该考虑到一业为主，兼营别样，怎样化害为利，变废为宝，要注意综合利用。首钢产化肥，是正业，而且搞得好，是不是这样就影响我们抓主要的东西呢？是不是这样就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了呢？先念同志说，拣的不是“芝麻”，而是国家需要的宝贵财富。吉林造纸厂回收了两万吨烧碱。是很大的一笔财富，那有这样大的“芝麻”。再说，你不拣这个“芝麻”，你工业就办不下去，你放出废水，废气，废渣，危害人民健康破坏农业生产，你就办不下去。刚才说的马钢冶炼厂，试生产才几天，农民就

有意见，不搞综合利用，就办不下去。株州冶炼厂原来不搞废气回收，影响周围农业生产，年年赔款，农民要把它砸掉。

搞综合利用不是副业，是正业；不是“芝麻”，而是“西瓜”，是宝贝。有的单位只考虑本身利润，认为搞“三废”治理要花钱，实际上只要依靠群众，自己动手，投资少，见效快，贡献大。株州市从废渣中回收的产品，价值达二千七百多万元，吉林造纸厂通过综合利用给国家创造一千四百万元的财富。

把问题提到路线高度来认识。一种是认识不到，另一种是错误思想的抵制、干扰。要纠正错误思想，提高觉悟，依靠群众，事情就可以办好。只要真正思想上重视，照毛主席路线办事，就会有大发展。在解决思想问题的同时，国家还要考虑奖励综合利用的政策。对影响综合利用的政策。规章制度要修改。株州冶炼厂未搞废气回收时，每年赔钱。后来别人搞了工厂，用它的废气生产硫酸，冶炼厂却提出用它的废气要给钱。过了一段时期，看见生产出了硫酸，废气还要涨价。水口山矿务局原来把大量废渣倒入湘江，污染湘江，每年向渔民赔款，市里还要罚他。后来别人用它的废渣生产硫酸，他就要一吨废渣卖四百块钱。这是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作怪。当他“三废”造成危害时，他苦苦哀求市里帮他解决问题；但当别人把“三废”综合利用后，他又要作价要钱。这怎么行呢？利用废气、废渣、不能给钱。对开展综合利用、变三废为三宝妨碍的规章制度，要修改。国家的政策应该鼓励，支持变“三废”为三宝。

这次会议，是正在需要认真抓“三废”治理的时候，中央批准召开的。这个万人大会的目的，是要全党、全国引起重视，首先是北京市要做出成绩来。

会后要大力宣传。先念同志建议，把会议上的典型和发言印成书出版。开会以后，要认真传达，认真抓，要求各个城市，所有工业企业要做到家喻户晓。把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干部发动起来。大家动手，来办这件事情。只要认真抓，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工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不带来污染危害，而且综合利用搞得好，工业可以取得更大的成绩。这件事，不但是这一代的事，而且关系到后代，不能叫子孙后代骂我们。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积极工作，争取更大的胜利。

余秋里同志：

李副总理、国锋同志对大会作了很重要的指示。省、市区同志因时间关系，只有几位同志讲了话。希望大家认真讨论。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大事，关系到人民健康的一个大事。主席、中央是历来关心的，总理多次讲话中作了指示。今天先念、国锋同志又参加大会，并作了重要指示，我们要认真讨论，贯彻执行。

会议简报我看了一下。有害物质对环境的污染，能不能改善呢？我们的回答：能改善！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国家有条件改变这个情况。

第一，要抓上层建筑。以批林整风为纲，深入批判林彪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人们有了路线觉悟，这些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的，也是不难解决的。当然也不是那么容易，要有一个斗争过程。就污染谈污染，就技术谈技术，是解决不好的。坚持政治挂帅，这些问题就好解决。

第二，是要依靠群众。不论什么难题，只要跟群众讲清楚，交给群众讨论，没有解决不了的。回避矛盾，不让群众知道，总要吃亏的，总有一天群众要起来反对你。事实证明，那些污染物质，危害人民健康，影响农业，危害人民切身利益，不解决，工厂是办不下去的。有个厂，废气的危害没有解决，稻子扬花季节，不得不停产两个月，不然农民就造反。这个反是造得对的。还有的企业，污染严重，群众砸他玻璃窗，撵他走，不准他生产。

主席教导我们为什么人的问题，我们思想上没有很好解决。国锋同志讲，消除污染，保护环境，要家喻户晓。我们要大宣传、大教育、依靠群众，解决问题，要有一个运动。

第三，关键在于领导。看领导有没有革命精神。如果领导不是知难而进，而是知难而退，没有群众观点，污染问题是解决不了的。领导有革命精神，技术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刚才讲的那些典型，都证明了这一点。

先念同志讲，凡是新建的厂，在设计上都要有“三废”处理和综合利用的项目。这是设计的纲领，我们要把不搞“三废”治理，不搞综合利用的形形色色的藉口，在群众监督之下，统统堵塞掉。

主席讲，共产党就最讲“认真”。领导要认真对待“三废”治理问题。这不但可以保护环境，还可以广泛开辟原料，材料来源。增加品种，保证质量，降低原材料消耗，带来一系列的好处。

第四，“三废”处理问题是科学技术问题，它涉及到各行各业，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要大家动手干，才能解决。“三废”有气体、液体、固体还有放射性物质。这些方面的问题很多，大家要注意，认真研究，只要解决好了，就能为人民造福，变害为利，变废为宝。

解决“三废”污染问题，要在政治统帅下，以路线为纲，具体办法，一是革新工艺，在生产过程中，不产生或少产生有害物质；二是技术革新，改造设备，加强管理，消除跑、冒、滴、漏；三是，对生产中必须排放的“三废”开展综合利用，积极回收处理。

消除“三废”是一件大事情。它关系到人民健康，关系到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关系到城乡，关系到动植物，关系到空气、水源、土壤。

中央批准我们开这个环境保护大会，我们要认真抓好环境保护工作，大张旗鼓地来抓，这方面的好经验很多，希望大家回去后结合讨论，认真推广。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的通知”

1973年9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的通知》。《通知》指出：为了加强对国防工业的统一领导，决定撤销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受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以国务院为主。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对国防工业的生产、建设和科研工作进行统筹规划，全面安排，组织执行。随着国防工业领导体制的变动，第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由军工领导转变为由国务院直接领导。这几个部领导军口各院少数骨干企业，其余的部直属企业和国防工业系统的院校，下放给省、市、自治区管理，实行地方和部队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省、市、自治区设立管理国防工业的机构和管理电子工业的专门机构，撤销各大军区管理国防工业的机构。1974年5月，这项《通知》经过征求意见颁发执行。这次将国防工业划归国务院系统为主领导，是在总结了搞独立的大军工体系的教训后作出的决定。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制止年终突击花钱的通知

《通知》指出。自 1970 年以来，社会集团购买商品额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重不断上升，1970 年为 6.7%，1971 年为 8.2%，1972 年为 9.1%，1973 年继续增加，据有关部门估计，今年将达 100 亿元，比 1966 年至 1970 年间每年平均 55 亿元，上升 80% 以上。《通知》指出，本年不少单位和企业，讲排场，摆阔气，请客送礼、铺张浪费之风有所抬头，非生产性开支和社会集团购买力增加很快。在接近年终时，有的单位怕资金结余上交，又出现了突击花钱，或变相转移资金的苗头。这种情况给市场供应造成了较大的压力，也不利于货币的回笼。1973 年计划年底货币流通量在 1972 年底 151.1 亿元的基础上不再增发票子，但上半年仅回笼 15.6 亿元，三季度已投放 6.8 亿元，这样第四季度只有比上年第四季度减少投放 7 亿元，才能做到不增发票子，这将影响农副产品收购旺季的农副产品收购量。《通知》针对上述情况，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立即进行讨论和检查，要求财政银行部门、商业部门和物资部门，要把好管钱、管物的关，同违反国家财经纪律的行为作斗争，对于违反国家规定的，要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给予纪律处分。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七日，中央军委转发“关于全军恢复和增建 41 所院校的报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有军队院校 125 所，1969 年受林彪大砍院校的影响，院校减少到 43 所，严重影响了干部的培训和部队建设。

为全面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适应军队建设和战备的需要，8 日，中央军委转发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全军院校调整领导小组《关于全军恢复和增建 41 所院校的报告》。

《报告》提出了恢复和增建院校的原则和方案，对学制、校址、定额等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

《报告》转发后，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各军兵种及各有关军区，因地制宜地先后把 41 所院校恢复和建立起来。其中指挥学校（军政干部学校）19 所，医务学校 12 所，专业技术学校 10 所。

到 1975 年，这些院校相继建成，全军院校达到 84 所。

2009 年 7 月 6 日初稿

2011 年 12 月 30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二册（1）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二章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

第一节 一九七〇年的新形势新任务

本节资料

一九七〇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过去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以豪迈的战斗步伐，跨进了伟大的七十年代。

放眼全球，展望未来，我国各族人民心潮澎湃，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

六十年代初期，毛主席曾经高瞻远瞩地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

六十年代的历史，雄辩地证实了毛主席这一伟大的预言。

过去的十年，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十年；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现代修正主义公开论战，激烈搏斗，取得伟大胜利的十年；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蓬勃发展的十年。

在这十年中，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在新的条件下，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一浪高一浪地向前推进。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在斗争中日益发展。资本主义无可挽救地没落下去，社会主义不可阻挡地兴盛起来。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象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英雄的越南人民的铁拳，把美帝国主义打得焦头烂额。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越来越广阔地鼓舞着亚、非、拉地区人民的武装斗争。帝国主义殖民体

系的堤坝，一块一块地塌了下来。漫天的革命烽火已经燃烧到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区。震撼西方的财政金融危机，日益严重、日益深化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经济更加病入膏肓。旧世界风雨飘摇，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在整个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帝国主义的“安定的绿洲”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爬上世界资本主义霸主地位的美帝国主义，没有过多久就从它的顶峰跌落下来。它扩军备战，到处侵略，到处建立军事基地，把一根根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被全世界人民越勒越紧了。自称世界“最富有”的美国，数以千万计的人民越来越贫困和饥饿。美国无产阶级以及广大人民反对垄断资本集团的斗争和美国黑人的抗暴斗争，使美国反动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一任任的白宫主子，找不出一付挽救美帝国主义衰落的灵丹妙药。曾经吹嘘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的华尔街老板们，无可奈何地哀叹美国进入了“困难的年代”。美帝国主义的急剧没落，突出地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走上极其深刻的、新的总危机。现代修正主义的中心——苏修叛徒集团加速走向彻底破产。自以为不可一世的跳梁小丑赫鲁晓夫，曾几何时，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渣滓。他的继承者勃列日涅夫之流，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一年不如一年，陷入了内外交困的重重危机。他们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外侵略扩张，彻底暴露了社会帝国主义的面目，激起了苏联人民和各国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出现，不过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它既不能挽救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覆灭，也不能挽救它自己的灭亡。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归根结底，不过是垂死的新殖民主义的变种而已。

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一片衰微破败的景象相反，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社会主义中国更加巩固，更加繁荣，更加壮大，更加朝气蓬勃。毛主席亲自领导我们党，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展开的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大论战，从思想上、理论上和政治上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更大胜利准备了条件。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梦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开辟了一条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光明大道。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七亿人民中空前大普及。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深远历史影响，正在越来越充分地显

示出来。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成为当代反帝反修的强大的政治力量，成为各国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最可靠的朋友，成为世界革命的希望。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经过六十年代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世界的革命力量壮大了，阶级阵线分明了。世界基本矛盾的新发展，必然要继续引起革命。七十年代，将是人民革命风暴在全世界更大兴起的年代，将是帝国主义在重重矛盾中加速崩溃的年代，将是全世界革命势力同垂死挣扎的反革命势力进行剧烈搏斗的重要的年代。不管美帝、苏修怎样互相勾结、互相争夺势力范围，不管它们施展多少阴谋诡计，发动什么样的侵略战争，都逃脱不了注定灭亡的命运。它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军队，一定能够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一定不会辜负世界人民寄予我们的希望。新的一年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用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推动斗、批、改，检查斗、批、改，戒骄戒躁，更好更快地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当前，斗、批、改的群众运动，正在各条战线深入发展。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正在进一步全面落实。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无产阶级新事物到处出现。我们要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同斗、批、改各项工作结合起来。要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各个基层。要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清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在政治领域中按照党的政策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在经济领域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有步骤地打击资产阶级的腐蚀和破坏。要把教育、科研、文艺、新闻、卫生等领域的革命坚持下去，深入下去，取得新的成果和新的经验。

毛主席在“九大”期间一再指出：“一定要抓好典型。”“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全面规划，分期分批地、

深入细致地、积极而又慎重地做好斗、批、改的各项工作。

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要抓紧整党建党。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建设我们的党，是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是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在整党建党中，自始至终都要把思想整顿放在首位，认真地学习新党章，对党员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认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学说的教育，进行关于领袖、政党、政权、阶级、群众相互关系学说的教育，批判各种右的或极“左”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要正确地做好“吐故纳新”的工作。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以毛主席的指示和新党章的各项规定对照自己，彻底改造世界观。

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发展，一个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正在出现。各级领导要站在群众运动的前面，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指示，使运动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深入地、持久地向前发展。只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革命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国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就能够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要把毛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落实到每一个省、每一个县、每一个基层单位、每一项事业。要注意调查研究经济工作中各项政策性的问题。订计划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

毛主席最近指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毛主席这个伟大指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远见，向全世界人民指出了斗争的方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全世界人民一定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全中国人民一定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我们要从精神上、物质上作好充分准备。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各级领导机关要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进一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化，精兵简政，以适应战备的需要。要巩固和完善各级革命委员会，继续加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要加强军民团结和军政团结。中国人民解放军要继续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继续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在政治上、军事

上都要更进一步提高，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全面落实四好，加强战斗力，随时准备为保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立新功。

同一切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外交关系，这是我们长期以来的一贯政策，但是我们决不能容忍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占我国神圣领土。我们一定要解放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如果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敢于侵犯我国，我们就坚决把他们葬身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革命在发展，人民在前进。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的曙光就在前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零 年一月一日，
元旦社论）

一九七〇年四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沿着“九大”指引的航向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已经一周年了。

“九大”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总结了我党四十八年、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彻底清算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选出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新的中央委员会，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作为全党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九大”对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远影响，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

毛主席在“九大”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毛主席说：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九大”以来的一年，是团结的一年，胜利的一年，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的一年。

一年来，全国人民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思想，深入人心。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出发，把自己的工作同革命的全局紧密联系起来，思想水平更高了，革命干劲更足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坚强地统一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朝气蓬勃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

在“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运动继续有步骤地发展。毛主席提出的斗、批、改各个阶级的任务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正在一个一个地区、一个一个单位地落实。革命大批判在各个领域向纵深发展。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分清了阶级阵线，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伟大的整党建党工作，使党组织更加纯洁、更加巩固、更加朝气蓬勃。数百万干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工农兵结合，深刻地改变着社会面貌。具有无限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到处涌现。在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指引下，我国工农业生产欣欣向荣，一个国民经济的新高涨正在到来。

回顾一年来的战斗历程，把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对毛主席的指示必须坚决照办。林副主席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的党就前进，就胜利。”一年来的斗争再一次证明了这个伟大真理。“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已经成为亿万革命人民的钢铁誓言。对毛主席的指示，照办，就有明确的方向；照办，就有正确的方法；照办，就能团结最广大的群众；照办，就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一句话，对毛主席的指示，照办就是胜利。

对毛主席的指示是不是照办，是有没有无产阶级党性的问题。毛主席的指示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只有站在无产阶级党性的立场上，才能坚决照办。如果掺杂了私心杂念，带着资产阶级派性，舍不掉那个小山头、小团体的利益，就不可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要继续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排除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的干扰，保证毛主席一系列指示全面落实。

在庆祝“九大”一周年的时候，我们要重新学习毛主席在“九大”期间所作的极其重要的讲话，学习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学习新党章。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好好想一想：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等一系列最新指示，是不是认真地、坚决地、不折不扣地照办了；今后应当怎样认真搞好斗、批、改，更好地进一步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认真总结经验，发扬成绩，找出差距，制定措施，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我们要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加强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里对一小撮阶级敌人的专政，把那些隐藏得很深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清除隐患，教育后代。要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思想和一切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批判各种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倾向，进一步提高广大革命群众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通过党的各级组织率领广大革命群众执行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的。所有党员和革命群众都要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领袖、政党、政权、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自觉地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各级党组织都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按照新党章的规定，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势越好，越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引的航向，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〇年四月一日，社论）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
《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

一、列宁主义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

今年四月二十二日，是伟大列宁诞生的一百周年。

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怀着对伟大列宁的最崇高的敬意，来纪念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

列宁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列宁诞生的第二年，一八七一年，爆发了巴黎公社起义，这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第一次尝试。列宁开始革命活动的时候，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在同帝国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特别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的阶段。正如斯大林说的：“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①

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揭露了帝国主义的规律，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决了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问题。②他阐明了无产阶级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思想，并且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中举行了一次总演习。他所领导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从资本主义旧世界到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根本转变，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列宁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给予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贡献，是非常之伟大的。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在同党内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中，继承和捍卫了列宁主义的事业。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统率下，成为打败法西斯侵略的主力，在人类历史上树立了永不磨灭的丰功伟绩。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正是从列宁主义那里找到解放的道路。毛泽东同志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③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一贯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④

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最长期、最激烈、最艰苦、最复杂

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中取得人民革命的胜利。这是十月革命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次最伟大的胜利。

目前，我们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同列宁在世的时候相比，国际形势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证明了列宁的革命学说的正确，证明了列宁主义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

但是历史是有曲折的。正如恩格斯逝世以后产生了伯恩施坦—考茨基的修正主义一样，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又产生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修正主义。

在赫鲁晓夫掌权十一年之后，修正主义内部发生分裂，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赫鲁晓夫，他又经历了五年多的时间，现在在苏联正是由这样一个人主持“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

列宁曾经说过：“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当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领袖一旦逝世以后，他们的敌人便企图窃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⑤ 勃列日涅夫叛徒们对待伟大的列宁就是这样干的。他们在所谓《纪念列宁诞生一百周年提纲》中，竟然明目张胆地歪曲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伟大形象，用他们的修正主义私货来冒充列宁主义。他们伪装“纪念”列宁，实际上是盗用列宁的名义来加紧推行他们的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和社会军国主义。这是对列宁的极大侮辱！

彻底揭露苏修叛徒们对列宁主义的背叛，揭露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本质，指出社会帝国主义同资本帝国主义一样必然覆灭的历史规律，进一步推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这就是我们当前的战斗任务。这也就是我们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的重大意义。

二、无产阶级专政是列宁主义的根本问题

列宁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反复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用暴力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说：“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⑥

列宁还说：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同他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学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作用的最高表现是无产阶级专政”。

^⑦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胜利。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争得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总结了新的革命实践，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个时代”，⑧“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⑨因此，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⑩

今天，在纪念列宁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重新温习列宁的这些光辉思想，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人们知道，苏修叛徒集团恰恰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上背叛了列宁主义，背叛了十月革命。

早在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面目开始暴露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尖锐地指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11）

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反革命政变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什么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会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呢？我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特别是用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观察问题，就能够理解，这主要地是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的一种产物，是苏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取了党政大权的结果，即苏联的资产阶级篡夺了无产阶级政权的结果。同时，它也是国际帝国主义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通过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结果。

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12）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仍然集中在政权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13）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资产阶级虽然被推翻，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依然长期存在。斯大林曾经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这就说明阶级斗争一直在尖锐地进行着，说明一直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苏联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对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还缺乏经验。在这种情况下，隐藏在苏联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抛出恶毒诽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施展种种阴险狡诈的手段，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这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政变，是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变。

勃列日涅夫是赫鲁晓夫反革命政变的同谋者，后来他又取代了赫鲁晓夫。他的上台，实质上是赫鲁晓夫反革命政变的继续。勃列日涅夫就是赫鲁晓夫二世。

毛泽东同志指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14）“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15）

毛泽东同志的英明论断，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实质和社会根源，指出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本质。

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政大权之后，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大大膨胀了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在党、政、军和经济、文化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并且从中形成了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机器和支配整个社会财富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即新型的大资产阶级。((2)(3))

这个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国家政权，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变为走资派所有制，把社会主义经济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他们假借“国家”的名义，肆无忌惮地掠夺国库，采取各种手段，任意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而骄奢淫逸，作威作福。

这个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把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的资产阶级。他们把十月革命的英雄儿女打下去，重新骑在苏联各族人民的头上，建立了自己的反革命小朝廷。因此，他们极端反动，极端仇视人民，极端害怕人民。

这个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同一切反动没落的阶级一样，在其内部充满着种种矛盾。他们为了拼命保住自己窃取的权力，狼狈为奸，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他们的处境越是困难，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就愈演愈烈。

这个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维护其反动统治，在剥削和压迫本国人民的同时，必然要进行疯狂的侵略扩张，加入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行列，推行穷凶极恶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

这个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基础。现在，这个阶级的总代表就是勃列日涅夫。他疯狂地推行并且发展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完成着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就已经开始的从复辟资本主义到社会帝国主义的演变。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全面推广所谓“新经济体制”，把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用法令形式固定下来，加强了官僚垄断寡头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他们横征暴敛，不管人民死活，实行希特勒的“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加速国民经济的军事化，以适应社会帝国主义扩军备战的需要。

苏修叛徒集团的倒行逆施，给社会生产力带来极大的破坏，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工业衰退，农业下降，牲畜减少，通货膨胀，供应紧张，国家市场商品奇缺，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苏修叛徒们不仅挥霍了苏联人民几十年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大量财富，而且低声下气，向当年的战败国西德乞求贷款，甚至出卖国家资源，把日本垄断资本引进西伯利亚。今日的苏联经济已陷于无法解脱的危机之中。作为苏联人民的朋友，我们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于苏修叛徒把列宁主义的故乡糟蹋成这个样子感到无比愤慨，对于苏联广大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全面复辟之下遭受的重重苦难给予深切的同情。

苏修叛徒集团过去说“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苏联“已变为全民国家”了。（16）现在又自打嘴巴，说“全民国家继续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17）“全民国家”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一个类型”。（18）他们还大叫大嚷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纪律”，“加强集中”，等等。又是“全民国家”，又是“无产阶级专政”，把两个根本冲突的概念硬拼凑在一起，无非是

用来欺骗群众，掩盖大资产阶级的专政。他们所说的“党的领导”，就是一小撮社会法西斯寡头对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政治控制。他们所说的“纪律”，就是镇压一切不满于他们统治的人。他们所说的“集中”，就是把政治、经济、军事权力进一步集中到他们这一伙人的手里。一句话，他们打出这些幌子，都是为了加强法西斯专政和准备侵略战争。

处于内外交困的苏修叛徒集团，越来越露骨地依靠反革命暴力来维持其背叛列宁、背叛十月革命的反动统治。今日之苏联，特务密探横行无忌，反动法令层出不穷。革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反革命有赏，叛徒弹冠相庆。许多革命者和无辜的人被关进集中营和所谓“疯人院”。苏修集团甚至出动坦克和装甲车，对人民的反抗进行野蛮镇压。

列宁曾经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象俄国那样，对国内的大多数居民实行这样的压迫”，除俄罗斯人以外的其他民族“被当作异族看待”。（19）“它使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对君主政体积下了深仇大恨”。（20）现在，苏修新沙皇恢复了老沙皇的民族压迫政策，采取歧视、迁徙、分化、监禁等毒辣手段，对各少数民族进行压榨和迫害，把苏联重新变为“各族人民的监狱”。（21）

苏修叛徒集团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实行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们疯狂地摧残和压制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而让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象洪水一样到处泛滥。他们大肆鼓吹军国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把文学艺术作为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工具。

列宁当年痛斥沙皇制度的黑暗统治时，曾经这样写道：警察的专横，野蛮的迫害，道德的败坏，“达到了如何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顽石也将为之长叹”！（22）人们不妨把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同列宁当时痛斥的沙皇制度比较一下吧。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反革命政变，起了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所不能起的作用。正如斯大林所说：“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23）十四国的武装干涉，白匪的叛乱，希特勒几百万军队的进攻，帝国主义的种种破坏和颠覆，封锁和包围，都没有能够攻破的社会主义堡垒，竟被这一小撮叛徒从内部夺取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叛徒，是万恶不赦的历史罪人。

四、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

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叛徒们的时候，曾经指出：他们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24）

苏修叛徒集团也是从修正主义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的。不同的是，第二国际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如考茨基之流，还没有掌握国家政权，只是为本国帝国主义效劳，从掠夺别国人民的超额利润中捞一点油水。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则是依靠他们所篡夺的国家政权，直接去掠夺和奴役别国人民。

历史的经验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一旦为修正主义集团所篡夺，或者象苏联那样变为社会帝国主义；或者象捷克斯洛伐克和蒙古那样沦为附属国或殖民地。现在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的实质，就是把列宁和斯大林缔造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的霸国。

苏修叛徒集团讲的是列宁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干的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勾当。

苏修叛徒集团口头上说对他们的所谓“兄弟国家”实行“国际主义”，实际上是由“华沙条约组织”、“经互会”等一套套枷锁，把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禁锢在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铁丝网里，任意宰割。他们利用霸主地位，推行什么“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和“经济一体化”，强使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适应苏修的需要，变为苏修的销售市场、附属加工厂、果菜园和畜牧场，以进行骇人听闻的超经济剥削。

他们采用最横蛮、最凶恶的手段，对这些国家严加控制，在这些国家驻扎重兵，甚至公然出动几十万军队，把捷克斯洛伐克置于自己的铁蹄践踏之下，用刺刀制造傀儡政权。这一伙叛徒，正象列宁曾经痛斥的老沙皇那样，完全是以“农奴制特权的原则对待邻国”。（25）

苏修叛徒集团口头上说他们对亚、非、拉国家提供“援助”，实际上是在“援助”的幌子下，力图把这个地区的一些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同美帝国主义争夺中间地带。苏修通过军火输出、资本输出和不平等贸易，掠夺它们的资源，干涉它们的内政，并且伺机攫取军事基地。

列宁指出：“财政资本实行殖民政策，除了无数‘旧的’动机以外，又加上了争夺原料产地、强先输出资本、争夺‘势力范围’……以及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等等的动机。”（26）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就是循着这个资本帝国主义的轨道前进的。

苏修叛徒集团口头上说他们“完全支持”各国的革命斗争，实际上他们同世界上一切最反动的势力勾结在一起，破坏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们疯狂咒骂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群众是“极端分子”、“暴徒”，分化和瓦解这些国家的人民运动。他们出钱出枪，直接帮助印尼、印度等国反动派屠杀革命者，处心积虑地扑灭亚、非、拉的人民武装斗争烈火，镇压民族解放运动。他们同美帝国主义一样，充当世界宪兵。

苏修叛徒集团口头上说他们赞成什么“反帝斗争”，有时候也骂几句美国，实际上他们和美帝都是妄图称霸世界的最大的帝国主义。苏修的所谓“反对”美国，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苏修同美帝为了重新瓜分世界，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苏修在德国问题、中东问题、东南亚问题、日本问题、核武器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行为，都是他们同美帝又争夺又勾结的罪证。他们都是推行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牺牲各国人民的利益。苏修和美帝之间有什么妥协，也不过是强盗之间的暂时协议。

列宁指出：“现代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结果。”（27）现代战争“是由帝国主义的本质产生的”。（28）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继承赫鲁晓夫核讹诈的军事战略方针，大力发展火箭核武器，同时加紧扩充常规军备，全面加强陆、海、空三军，在全世界推行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

在战争问题上，过去赫鲁晓夫是鼓吹那一套虚伪的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掩盖真正的扩军备战。现在勃列日涅夫之流改变一些腔调，拼命煽动战争狂热，大叫大嚷当前国际局势“孕育着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29）公然威胁说要“先发制人”，吹嘘他们的什么“战略火箭”“能够消灭任何地方的任何目标”。（30）他们更加疯狂地增加军费，加紧侵略战争的动员和准备，阴谋发动希特勒式的闪电战。

苏修叛徒集团以突然袭击方式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和铁列克提等地区，并对我国进行核威胁，充分暴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和冒险性。同美帝国主义一样，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一小撮寡头已成为准备发动世界战争的又一罪魁。

五、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是地地道道的霸权主义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为了进一步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发展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炮制出一套被称之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法西斯“理论”。现在来看一看“勃列日涅夫主义”究竟是什么货色。

其一，“有限主权论”。勃列日涅夫之流说，保卫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利益”，就是保卫“最高主权”。(31)他们公然宣称，苏修可以决定别国的命运，“包括它的主权的命运在内”。(32)

什么“社会主义利益”！正是你们颠覆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把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推行到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你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利益”，就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利益，就是殖民主义的利益。你们把一个君临一切的“最高主权”强加在别国人民头上，就是说，别国的主权是“有限的”，而你们支配别国的权力是“无限的”。也就是说，你们有权摆布别国，别国无权反对你们；你们有权宰割别国，别国无权抵抗你们。希特勒就狂叫过“有权统治别人”。(33)杜勒斯之流也鼓吹民族主权“已经变成陈腐了的观念”，(34)应该用所谓“联合的主权”代替“一个国家的主权”。(35)可见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不过是疯狂的帝国主义语言的翻版。

其二，“国际专政论”。勃列日涅夫之流宣称，他们有权“以军事援助兄弟国家来消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36)他们说：“列宁预见到”历史的发展“把无产阶级专政从一国的专政变成能够对整个世界政治起决定性影响的国际专政”。(37)

这一伙叛徒完全歪曲了列宁的思想。

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这篇文章中曾经谈到“把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的（即存在于一个国家内的，不能决定全世界政治的）专政转变为国际的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对全世界政治能够起决定影响的无产阶级专政）”。

(38)列宁的原意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宣传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而苏修叛徒集团竟篡改了列宁这段话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公然制造所谓“国际专政论”，作为对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进行军事干涉、军事占领的“理论”根据。你们所说的“国际专政”，就是要把别的国家置于新沙皇的统治和奴役之下。难道你们打起“援助兄弟国家”的幌子，就可以用你们的军事力量去欺凌另一个国家吗？就可以把你们的军队随意开进另一个国家横冲直撞吗？你们打着“联军”旗

号侵入捷克斯洛伐克，这同当年八国联军进攻中国、十四国武装干涉苏联、美帝国主义组织“十六国”侵略朝鲜，有什么两样！

其三，“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勃列日涅夫之流鼓吹“社会主义大家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39）必须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统一行动”。（40）什么“社会主义大家庭”！这不过是以你们为宗主国的殖民帝国的别名罢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论大国或小国，都应该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互相支持和互相援助的原则的基础上。而你们却把别国踩在脚下，使他们从属于你们，依附于你们。你们所说的“统一”，就是把别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统一”到你们那里。你们所说的“不可分割”，就是不许别国摆脱你们的控制和奴役。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要把别国的人民当作你们的奴隶吗？（34）

其四，“国际分工论”。勃列日涅夫之流大大发展了赫鲁晓夫早就鼓吹的这种谬论，不仅象我们在前面说到的，在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推行所谓“国际分工”，而且把它扩展到亚、非、拉国家。他们说：亚、非、拉国家只有同苏修“合作”，才能“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41）“对苏联来说，这种合作还为更广泛地利用国际分工的优越性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从这些国家购买数量日益增多的它们的传统商品——棉花、羊毛、皮料、有色金属精矿、植物油、水果、咖啡、可可豆、茶叶和其他原料以及制成品。”（42）

好一个“传统商品”！可惜这个货单并不全，还应当加上石油、橡胶、肉类、蔬菜、大米、黄麻、蔗糖等等。

在一小撮苏修寡头看来，亚、非、拉国家的人民似乎命里注定要世世代代地为他们提供这些所谓“传统商品”。这是什么“理论”？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早就宣扬要根据每个国家的自然条件规定生产种类，强使亚、非、拉国家变为原料产地，保持落后状态，以便于资本主义工业国进行最方便、最残酷的殖民剥削。苏修集团正是继承了帝国主义的这种殖民政策。他们的“国际分工论”，也就是“苏联工业、亚非拉农业”或者是“苏联工业、亚非拉附属加工厂”。

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同亚、非、拉国家之间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互通有无，互相援助，是为了促进这些国家发展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而一小撮苏修寡头鼓吹的

“国际分工论”，完全是为了对亚、非、拉国家进行渗透、控制和掠夺，扩张他们的势力范围，给这些国家套上苏修殖民主义的新枷锁。

其五，“利益有关论”。勃列日涅夫之流宣扬：“苏联具有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广泛发展的国际联系，对于即使在地理上遥远，但是却涉及到我们的安全和我们朋友的安全的那种事件，也不能消极对待”。（4 3）他们公然叫嚷：“苏联舰队”要“航行在我国安全的利益需要去的一切地方”！（4 4）

难道因为是一个大国，就可以把世界各地都看作是自己的利益所在，向全球伸手扩张吗？难道因为有广泛的国际联系，就可以到处派出自己的炮舰去进行威胁和侵略吗？这种所谓“利益有关论”，是帝国主义的世界侵略政策的典型论调。当年老沙皇对外扩张，就是打着“为了俄国利益”的旗号。美帝国主义也经常这样叫嚣：美国不仅“对自己的安全负有责任，而且对一切自由的国家的安全负有责任”，美国要“在一切必要的地方保卫自由”。（4 5）苏修的腔调同老沙皇和美帝国主义何其相似！

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早已宣告破产的苏修叛徒集团，根本拿不出任何象样的货色，只好从帝国主义那里拣来一堆破烂，加以改头换面，端出来一个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这个“勃列日涅夫主义”，就是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帝国主义，地地道道的霸权主义，赤裸裸的新殖民主义。

六、苏修大帝国的迷梦

一百年前，马克思在揭露沙皇俄国的侵略政策时指出：“它的方法、它的策略、它的手段可能改变，但是这一政策的主旨——世界霸权是不会改变的。”（4 6）沙皇尼古拉一世曾经狂妄地叫嚷：“俄国国旗不论在哪里升起，就不应当再降下来。”（4 7）好几代的沙皇都做过这样的美梦——象恩格斯说的一样建立一个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里亚海到北冰洋的庞大的“斯拉夫帝国”。他们甚至还想把这个大帝国的版图扩大到印度和夏威夷。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4 8）

苏修新沙皇完全继承了老沙皇扩张主义的传统，在自己的脸颊上深深地刻下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烙印。他们正在重温老沙皇未实现的旧梦，而且比老沙皇的侵略野心更大得多。苏修把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作为自己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他们还妄想侵占更多的中国领土，公然抄袭老沙皇对中国的政策，叫嚷中国北部国界“以

长城为标志”。（4 9）他们把手脚伸进东南亚、中东、非洲以至拉丁美洲，把舰队开进地中海、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企图建立一个横跨欧、亚、非、拉的苏修大帝国。

老沙皇的“斯拉夫帝国”早已成为泡影，沙皇统治本身，在一九一七年，早被列宁领导的伟大十月革命消灭了，老沙皇的统治完蛋了。在今天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的时代，新沙皇妄图重新建立一个更大的称霸全世界的大帝国，也只能是一场迷梦。

斯大林说过：“列宁把帝国主义叫做‘垂死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达到极端，达到顶点，接着就是革命的开始。”（5 0）

苏修既然走上帝国主义的老路，它就必然受帝国主义规律的支配，陷入帝国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的冲击之中。

毛泽东同志指出：“美国是只纸老虎，你们不要相信它，一戳就穿了的。修正主义苏联也是纸老虎。”（5 1）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疯狂地进行侵略扩张，必然要走向它的反面，为自己的垮台创造条件。苏修把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当作自己的领地，但是它绝对无法把殖民统治长期强加在这些国家人民的头上，也无法缓和它同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今日的东欧，活象一个火药桶，总有一天要爆发。苏修坦克开进布拉格，绝不表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强大，恰恰是苏修殖民帝国开始崩溃的征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泥腿，已经陷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深潭里面，而不能自拔。

苏修对亚、非、拉地区的扩张和掠夺，把自己置于同亚、非、拉人民相对立的地位。它的摊子铺得那么大，给自己背上了一个大包袱，浑身害了浮肿病。连美国帝国主义的报纸也说：“我们发现俄国人也象我们一样犯了大错误，即使犯的错误不比我们更大。”（5 2）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加入世界帝国主义行列，使帝国主义的矛盾更加尖锐。它们之间为了扩张各自的势力范围，进行激烈的角逐。在世界人民重重包围之中，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只能加速整个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的过程。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本国的统治也是建立在火山口上。列宁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曾经写道：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也许发展得快，也许发展得慢”，“但不管怎样，它是在走向革命”。（5 3）今天苏联国内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同处于被

奴役地位的无产阶级、劳动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正在日益激化。阶级斗争的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迟早要引起革命。

苏联本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盟。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这样的多民族国家联盟才能建立起来并且得到巩固和发展。正如斯大林指出的：苏联“看到了资产阶级国家建立多民族国家的失败经验。它看到了旧奥匈帝国瓦解的经验”。但是，苏维埃多民族国家“能够经得住所有一切考验”，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各族人民在统一的联盟国家体系中真正兄弟合作关系”。（54）现在苏修叛徒集团已经颠覆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以民族压迫代替了民族平等，以资产阶级的“弱肉强食”代替了各民族之间的互助友爱。既然原来那个联盟的无产阶级基础、社会主义基础已经被抛弃了，那末，难道这个新式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庞大的多民族的所谓“联盟”，就不会有象昔日奥匈帝国那样总有一天要宣告瓦解的危机吗？

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绝境，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同美帝国主义一样，大搞火箭核讹诈，乞灵于军事冒险和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然而，战争会使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绝处逢生吗？不，恰恰相反。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帝国主义不但不可能通过战争来挽救它垂死的命运，而只能加速它的灭亡。

毛主席指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55）

毛主席还指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56）

毛主席根据当前国际局势所作的这个伟大指示，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指出了斗争的方向。全世界人民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做好一切准备，随时给予胆敢发动战争的侵略者以坚决的粉碎性的打击！

近几年来，苏修叛徒集团继承老沙皇的故伎，正在半明半暗地支持和策动新的什么“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宣扬所谓“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神圣”，妄图用这种反动思潮来毒害苏联劳动群众和青年一代，诱使苏联人民为一小撮苏修寡头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充当工具。我们恳切地提醒兄弟的苏联人民千万不要上“泛斯拉夫主义”的当。

什么是“泛斯拉夫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露老沙皇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泛斯拉夫主义是圣彼得堡内阁的发明”。（57）恩格斯说：老沙皇利用这种欺诈的手段准备战争，“作为拯救俄国沙皇制度和俄国反动势力的最后一线希望”。因此，“泛斯拉夫主义是我们和俄国人的最凶恶的敌人。”（58）

苏修新沙皇的“泛斯拉夫主义”，同希特勒的“亚利安人至上”一样，是极端反动的种族主义。他们宣扬这类反动思想，完全是为他们所谓的“优等民族”中的一小撮反动统治者对外扩张服务的，而对广大人民只能意味着极大的灾难。

列宁曾经指出：“对‘异族人’的压迫，是一根有两头的棍子。这根棍子一头打击‘异族人’，另一头打击俄罗斯民族。”（59）现在，一小撮苏修寡头正是在什么“泛斯拉夫主义”的烟幕下，一面加紧策划侵略战争，一面向包括俄罗斯民族在内的苏联人民加紧进攻了。

苏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同苏修新沙皇是完全对立的，而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苏修新沙皇如果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那末，按照列宁对待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原则，苏联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就决不会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挑起的非正义战争卖命。他们将继承伟大十月革命英雄儿女的事业，为推翻新沙皇，重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二百年前，一个俄国诗人在颂扬沙皇叶卡德琳娜二世的侵略“战果”时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迈步前进，全世界就是你的”。（60）现在，苏修新沙皇已经骑上了老沙皇的马而“迈步前进”了。他们昏头昏脑地东奔西突，不可制驭，完全忘记了他们的老祖宗就是从这匹马上摔下来，结束了罗曼诺夫王朝的俄罗斯帝国。新沙皇的下场决不会比老沙皇好，他们也一定要从马背上摔下来，摔得粉身碎骨。

七、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为打倒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而斗争

毛泽东同志指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61）

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是有着深厚感情的。在列宁领导的伟大十月革命中，当时在

俄国的中国劳动者曾经同俄国无产阶级并肩战斗。我们两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互相支持，互相援助，结成了亲密的友谊。一小撮苏修寡头丧心病狂地挑拨和破坏中苏两国人民的关系，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苏联人民是受过列宁和斯大林教导的、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伟大人民，绝不会长期容忍新沙皇骑在自己头上。尽管十月革命的成果被苏修叛徒断送，但十月革命的原则是永存的。在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下，人民革命的激流必将冲破修正主义统治的冰层，社会主义的春天一定会回到苏联的大地！

毛泽东同志指出：“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62）

在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高兴地看到，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正在不断地取得胜利。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日益成长壮大。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蓬勃发展。所有受美帝和苏修侵略、控制、干涉、欺负的国家和人民，正在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一个反对美帝和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丧钟敲响了。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武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亿万革命群众相结合，同各国人民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一定能够发挥出无穷无尽的革命威力，把整个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万岁！

伟大的列宁主义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45）

注释

①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六十三页。

②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七十五页。

③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七六页、一四七五页。

④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七日的一次讲话。

⑤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一一七页。

⑥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一七九页。

⑦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一八四页。

⑧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三八页。

⑨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三五页。

⑩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一九二页。

(1 1) 毛主席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1 2) 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1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1 4) 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八月的一次谈话。

(1 5) 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一日的一次谈话。

(1 6) 苏修“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

(1 7) 苏修《纪念列宁诞生一百周年提纲》。

(1 8) 苏修《真理报》，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

(1 9)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八五页。

(2 0) 列宁：《在全俄海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二二页。

(2 1) 列宁：《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九二页。

(2 2) 列宁：《内政评论》。《列宁全集》第五卷，第二五八页。

(2 3)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人民出版社版，第四七一页。

(2 4) 列宁：《论第三国际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四五八页。

(2 5) 列宁：《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八十五页。

(26)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九三页。

(27)列宁：《好战的军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反军国主义的策略》。《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一六六页。

(28)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六八页。

(29)苏修《教师报》，一九七〇年二月五日。

(30)苏修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的文章，见苏修《共产党人》一九六九年第三期。

(31)苏修《国际生活》，一九六八年第十一期。

(32)苏修《红星报》，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四日。

(33)见《纽伦堡审讯案》第二卷。

(34)见美国《外交季刊》一九五七年十月号。

(35)耶塞普：《现代国际法》。

(36)勃列日涅夫在波修“五大”上的讲话。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37)马祖罗夫在莫斯科十月革命节“庆祝会”上的报告。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六日。

(38)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二九二页。

(39)苏修《消息报》，一九六八年七月二日。

(40)一九六九年莫斯科六月黑会《主要文件》。

(41)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黑会上的发言。一九六九年六月七日。

(42)柯西金在苏修“二十三大”上的报告。一九六六年四月五日。

(43)葛罗米柯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六九年七月十日。

(44)苏修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在一九六九年苏联海军节的讲话。

(45)美国前总统约翰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六月三日、六月二十日。

(46)马克思：《一八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二二六页。

(47)涅维尔斯科伊：《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一二四页。

(48)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

卷，第十七页。

- (4 9) 一九六九年《苏联政府六月十三日声明》。
 - (5 0)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六十五页。
 - (5 1) 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日的一次谈话。
 - (5 2)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九七〇年一月五日。
 - (5 3) 列宁：《游行示威开始了》。《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三五七页。
 - (5 4) 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草案》。《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六四九——六五〇页。
 - (5 5) 转引自林彪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5 6) 转引自中央两报一刊一九七〇年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人民日报》一九七〇年一月一日。
 - (5 7)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四九二页。
 - (5 8) 恩格斯：一八八二年二月七日给卡?考茨基的信。《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三六一页。
 - (5 9) 列宁：《民族平等》。《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二三三页。
 - (6 0) 杰尔沙文：《攻占华沙颂》。
 - (6 1) 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 (6 2) 同 (6 1)
- (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二日，社论)

一九七〇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勇敢、勤劳、智慧的伟大人民——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七十年代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来到了。

在这个全世界无产者团结战斗的光辉节日里，我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满怀革命的豪情，热烈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热烈欢呼各国人民反对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

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实现了毛主席提出的“我们也要搞人造

“卫星”的伟大号召。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东方红》乐曲，传遍全球，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一丰硕成果，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伟大智慧的又一光辉结晶。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指出：“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在世界文明的发展史上，我国人民的许多发明，曾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在旧中国的一个长时期中，劳动人民的智慧是被埋没的，被摧残的。只有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空前地发扬光大起来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国人民推翻了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粉碎了国内外反动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种种阴谋，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爆炸了原子弹，爆炸了氢弹。现在，我们的人造地球卫星也上天了。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一定能做到；西方资产阶级做不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做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毛主席的光辉名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相信人民，最充分地估计人民的力量，最重视依靠人民、发挥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毛主席曾多次发出“人民万岁”的伟大声音，给亿万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

一切帝国主义分子、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总是害怕人民，低估人民的力量。四十年代的艾奇逊之流，曾经算定中国人民只有接受“美援”，即沦为美国的殖民地，才能够活下去。六十年代的勃列日涅夫之流，也曾经算定中国只有参加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即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的附庸国，才有出路。历史无情地嘲笑着这些可鄙的算命先生们。中国人民没有他们不是活得更好吗！中国的历史车轮，将继续粉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阻挡和破坏，滚滚向前！

中国人民的无穷智慧和力量，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大放光采。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条战线，在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都制定了一整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工人阶级和亿万人民所掌握，成为改造世界的伟大物质力量。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不但在阶级斗争中充分发挥出来，而且也正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充分发挥出来。

我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焕发出来的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要有足够的估计。看不到这一点，就会犯错误。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的伟大教导，不断地向工人学习，向贫下中农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用毛泽东思想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发挥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人民群众前进。

我们伟大的祖国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前进。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我们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让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把斗、批、改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让我们坚持和落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

让我们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把打倒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〇年五月一日，社论）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
《改造世界观——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八周年》
在伟大的七十年代的第一个红五月，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广大共

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群众，满怀着革命豪情，隆重地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八周年。

二十八年前，在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中诞生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部划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这部文献，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文艺问题的最完备的高度概括，是无产阶级思想文化革命运动的伟大纲领，而且是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世界的政治宣言，是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实现思想革命化的指路明灯。((1)(2))

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光辉思想指引下，今天，亿万工农兵正以主人公的姿态，登上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斗、批、改的政治舞台。实践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光辉成果——革命样板戏，在斗争中不断巩固提高，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一个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运动，正在向前发展。“六厂二校”关于斗、批、改的典型经验，生动地体现了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正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革命大批判运动继续深入。广大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正在思想革命化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二十八年来的革命历史证明：这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才著作，是革命人民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强大武器。

今天，我们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应当好好学习这部著作，沿着这部光辉著作指引的道路，在认真搞好斗、批、改，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深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者，都是客观世界的改造者，都是带领和团结人民群众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战士。现在，我们正从事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事业。这是一场空前广阔、空前深刻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要把这一场斗争搞好，要使这一场斗争取得胜利，我们就必须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地指出：“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为什么人的问题，也是世界观的根本问题，为工农兵还是为剥削阶级，为广大人民还是为个人，这是区别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分界线。《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再强调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感情问题，都是世界观的问题。

改造世界观，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

这个改造世界观的问题，对于共产党员和要求入党的革命者来说，也就是要解决一个思想上入党问题。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尖锐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

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人，头脑里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个人第一主义，争名誉、争地位，闹资产阶级派性、闹独立性，自我吹嘘、相互捧场，轻视劳动、脱离群众，等等。这一切，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

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也必须入党。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改造自己的思想，牢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彻底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事业中发挥先锋战士的作用。

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者，应当如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我们指明了改造世界观的根本途径，这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同工农兵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改造世界观的最强大的武器。这个武器具有阶级性和实践性的特点。我们只有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真正掌握这个武器。

不破不立。要在自己的头脑里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还必须以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武器，持久地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斗私批修，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彻底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这种批判，应当同当前的革命斗争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号召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在各条战线上工作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也都应当按照这一伟大号召去做。目前，广大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

正在通过插队落户、参加“五·七”干校、定期去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和蹲点等各种形式，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不论采取什么形式，我们都要以毛主席这一号召对照一下自己：是有了长期的打算呢还是只有短期的准备？是无条件的呢还是有条件的？是全心全意的呢还是半心半意或者三心二意的？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放下架子，打掉官气、暮气、骄气、娇气，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积极投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坚持参加生产劳动，批判资产阶级，改造世界观。我们要恭恭敬敬地当小学生，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把自己的立足点彻底地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中的共产党员，也必须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和生产劳动，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不断改造世界观。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归根到底，也就是按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改造世界的斗争。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妄图按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我们的党和国家。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还将是长期的。为了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和改造世界，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大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都必须提高改造自己世界观的自觉性，坚决同工农兵相结合，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彻底改造世界观。

（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三日，社论）

一九七〇年五月下旬，吴法宪传达毛主席林付主席指示谈当前形势

今天，根据毛主席、林付主席指示，把当前形势讲一讲。

歼八、轰六的试制很好，你们参加了北京召开的支援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大会，大家光荣地看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在天安门上站了两个小时，看很小的字不戴眼镜，林付主席身体也很好，这是我们全国人

民的最大幸福。

毛主席最近（对我们空军）有重要指示，林付主席也有，将来××同志专门传达。五月廿四日，军委办事组，国防工办，航空工业领导小组把××、××飞机调到北京来，林付主席亲自检阅了飞机表演，听了汇报，还接见了空军，三机部和六院的同志，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鞭策。24 日、25 日晚，对空军和航空工业作了重要指示。林付主席身体非常健康，林付主席还带头呼口号：“毛主席万岁！”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建设英勇善战的空军！”“建立强大的航空工业！”“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搞好思想革命化！”“发挥同志们的积极性、创造性！”这些口号，就是对我们空军、三机部、六院、民航的指示。提出了我们的方针，指出了我们的方向。

黄总长也讲了话，林付主席很高兴。在这方面对空军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林付主席指示：“轰炸机要搞大一点，飞得远一点，加强运输力量。打起仗来，火车、汽车是靠不住的，要靠空中运输，这样可以大大加强机动力量，一个师顶几个师。”林付主席早就指出：“要搞运输机、直升机，要抓生产，生产上不去，就是一句空话。”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已经获得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还在争取解放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现在亚非拉美革命人民都要求我们的援助，巴基斯坦要我们支援，泰国、缅甸要我们支援，阿尔巴尼亚、朝鲜、罗马尼亚要我们支援，还有巴勒斯坦要我们支援，拉丁美洲也要我们支援。太远了，运输不方便，当前主要是援助毛泽东思想，但物资援助也是需要的。

林付主席最近还指示：“我最近对总政同志们说，主要是抓政治革命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军委办事组除了谈这，还要抓机械化，用革命化带动机械化……几千米就要靠机械化了，要加强在原子条件下的战斗力，加强空中机动力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有空降兵，还要扩大，飞机生产要多，要跟上形势需要，空军要支援工厂。”

26 日在南苑机场检阅时，谈到三结合时，林付主席教导我们说：“只有使用的才知道最需要什么，才最有兴趣，最有智慧。”（××飞机在突破音障时，有一个很大的爆炸声，林付主席这时说：“超音速的飞机可以震撼敌人，震得敌人爬不起

来。……”“……不仅要搞空军演习，也要搞空军以外的协同演习，要和陆军、海军搞练习。”“飞机场要建筑点工事，防止敌人袭击空袭。”去年国庆节，林付主席还亲自到机场检查。

苏联侵占捷克就是用空降兵，说是飞机坏了，要在机场降落，空降兵就把机场控制了，捷克就亡国了。

林付主席还指示：“机场要准备复修的材料，敌人炸坏了，马上修复起来。”主席早在 49 年就指出：“要搞洞子机场。”“这就叫你打我时，叫你打不上。”林付主席还指示：“海军也要搞飞机，飞机上可以放导弹，水雷。”最近看了三部日本电影，是宣扬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完全是法西斯化，（其中一部是写第二世界大战时，日本海军大将山本在珍珠港事件中，从日本本土起飞后到前线视察，飞机来到因法（？）被美国飞机半路截住，山本被打死，这个人在珍珠港事件是投反对票的，影片说反对票这个下场，日本军国主义就是要霸占中国、东南亚，在国内又把天皇抬出来，忠于天皇，搞奴化教育。

毛主席最近对国际友人讲话指出：“日本还要第二次失败。”日本正在复活军国主义，这几部电影是反面教材，我们要把它翻译过来，放一放，在报上批判。

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就是靠飞机偷袭，把美军炸得一塌糊涂。林付主席根据毛主席的思想，对空军、三机部、六院、民航这些重要指示是对我们极大的关怀，亲切的教导，我们要坚决贯彻，决心不辜负毛主席、林付主席的关心，××飞机定型了，将来要大量生产，林付主席的指示，是对我们最大的教育，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回答毛主席、林付主席的关怀。

讲讲形势：

毛主席的伟大声明概括了，总理有个形势报告，我没有多少讲的了，讲一点消息。毛主席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就是对当前形势（国际）的高度概括，是全世界革命人民打败美帝及其一切走狗的强大思想武器、精神食粮。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定了世界人民的胜利信心，为全世界人民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同志们认真学习，很好地领会。

毛主席最近指示：“要大家多看《参考消息》，参考消息要多发，要发到工厂、车间、部队、营、连，有正面反面教材可以多了解，多对照，当然要批判地看。”

这个事，主席早有指示：“要多发，要印 500 万份”现在正在办这个事，要看自

己的大报，也要看参考消息，看大报，又看参考消息的同志就有共同的语言。

毛主席声明中指出：“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这是最新指示，概括了当前世界形势。

毛主席早就指示：“美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太长了，它每侵略一个地方，就把一条新的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它已经陷入全世界人民的重重包围之中。

毛主席还指出：“关于世界大战的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林付主席指出：“现在，以世界人民为一方，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另一方，所进行的激烈搏斗的主要战场是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

5.20 毛主席发表的伟大声明，是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最深刻、最精辟、最科学地阐明了当前形势，是七十年代的反帝宣言书，是世界革命的伟大历史文献，全世界正在掀起新的革命高潮，取得更大的胜利，沿着毛主席声明的方向奋勇前进！

毛主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这里有新的精神，要有新的准备，是当前世界形势的根本结论。

声明发表后，全世界在瞬间响起了欢呼声，反应十分强烈，在北京的各国记者，连夜发出内部消息，全世界各大报都转载了，许多国家立即响应，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津巴布韦，刚果（布），阿尔及利亚，南也门，立即发表了声明拥护支持，认为毛主席的声明是为各国人民指明了方向，又发展了马列主义，它使全世界人民信心增强，老挝爱国战线党一个领导人说：“毛主席红太阳的光辉照亮了柬埔寨，柬埔寨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一定能取得胜利的。”

声明发表后，美帝国主义到处猜测，说我们是不是“可能要派志愿军”，尼克松慌忙声明美国要在六月底撤军。“毛主席的声明是对美帝的沉重打击，对苏修也是沉重的打击，苏修最不要脸，一是不表态，很被动，二是封锁，不发表毛主席的声明，苏联人民不知道，我们的同志在苏联把毛主席的声明送给苏联人民，个个都欢欣鼓舞。

讲几点：

(一) 美国出兵柬埔寨，轰炸越南北方，使印度支那人民团结起来，打击美帝国主义。毛主席对西哈努克说：“你是尼克松逼出来的，是尼克松策划朗诺——施里玛达政变把你逼出来的。”

西哈努克：“美帝出兵，我要革命。”

毛主席说：“早几年，我让你学一点马列主义，你不学，那时我让你看两本书，一本是《共产党宣言》，一本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成为科学》，你不看。”

西：“那时，我看不进去，年纪大了。”

主席：“你多大了？”

西：“四十多岁了。”

主席：“还不到五十么！”

西：“现在是非学不可了。”

现在西哈努克每次讲话都引用毛主席语录，并且用得很好，5月21日大会，头天晚上通知他，一万多字的稿子，一个晚上就写出来了，西哈努克这个人，写稿子不用秘书，我们有些同志就不行，还靠拐棍，这次访问越南，在飞机上就自己写稿子，我们的同志也要自己动手。

西哈努克说：“我这个亲王，要从白色变成红色，就是变不成红色，变成粉红色也好。”

西哈努克，这是逼上梁山，美帝教育了他，苏修教育了他，苏修不支持他，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思想影响了他，教育了他。他以前多次访华，毛主席每一次都接见他，和他谈话。西哈努克也反过华，但他一贯反帝，支持越南是真支持，当然也从中捞一把，但反美是一贯的，越南经常有几万人驻在柬埔寨，我们援越物资从柬埔寨过，他们从中捞一点，要 10% 作代价。美帝发动朗诺——施里马达反动改变，反对越南，赶走西哈努克，4月30日又公然出兵柬埔寨，他们这一出兵，事情就好办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就暴露他们是侵略者，是政变的策划者，事实教育了柬埔寨人民，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美国进兵 7 万人，相当于 7 个师，美军有三个旅团 3 万人，其余是越南傀儡军。

他们出动大批飞机在柬埔寨越南边境轰炸，每天能扔一千多吨炸弹。陆上分五路进兵。一路是……夹击，二路……三万人，进攻越南、柬埔寨的后方基地，三路是从南边，企图控制西贡到金边的公路，切断人民军的供应线，四路是沿着湄公

河而上，切断公路，五路是茶胶地区，美国军事顾问到金边，美帝长期以来在柬埔寨豢养了一批走狗——“自由高棉”，反对共产党，反对西哈努克，头子是山玉成，这是一股最反动的势力，有 5 千多人，现在是朗诺政权的主力，完全是美帝训练，美帝装备，柬埔寨的军队是“和平军”，不会打仗，一打起仗来，整连整连整营整营地投降，一打就散，集体缴械。

毛主席对西哈努克说：“柬埔寨现在是革命了！”

西：“过去我要中立，中立不了，美国不允许我中立，我只好倒向一边。”

本来尼克松上台就职宣誓时就讲要退兵，现在不仅不退，反而增兵。仅在越南战场上就战死伤六十万，其中美军就有 23 万，这样引起了国内人民强烈的不满和反对。

他们想打不赢，就在巴黎和谈中捞点东西，但是这个阴谋也破产了，老挝（寮方）去年歼灭敌人二万多人，打到了万象附近，今年又展开了更加猛烈的进攻，恢复了……战略地区。

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各国武装斗争的形势也很好。整个东南亚好象一座要爆发的火山，美帝坐在火山口上，这次策划政变，企图用“亚洲人打亚洲人”把自己拔出来。现在不仅撤不出来，反而要增兵，这就遭到国内人民强烈反对。

毛主席早就讲过：“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民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成语，各国反动派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坏事，归根结底只能促进各国人民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尼克松也就是这样的蠢人，事实完全同他们的愿望相反，西哈努克也站起来革命，美帝的军队来到哪里，哪里的人民就革命。”

毛主席说：“美国人以为紧张局势对他有利，但是他造成的紧张局势走向了反面，动员了世界人民起来反对他”。西哈努克这样说：“我本来是中立的，我总觉得我是中间派。”

西哈努克从莫斯科到北京后，总理对他作工作，毛主席接见他，教育他，他表示“把美帝赶出去，把朗诺——施里玛达打垮后，把政权交高棉无产阶级。”

柬埔寨的共产党很好，武装斗争也很好，一个顶一千。

经过工作，西哈努克这个人坚定了信心，现在他斗志越来越旺，“要打它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坚决地打下去。”（谈话开始时精神状态不好，第一号声明，他

说没有贪污，没有腐化。后来总理说，你不要谈这个问题，而是要谈政治，谈反帝，抓大方向，第二号声明就变了。)

西哈努克在天安门上说：“美国不让我搞中立，我情愿和共产党站在一起，也不同自由世界站在一起，法国不可信，苏联也很坏。”

5月1日在天安门上，毛主席对他说：“你在人民中间的地位是放了一个卫星，不仅在国内，在亚洲人民中，在世界人民中，是放了一个卫星。”

有人对我们支持西哈努克这样一个亲王不理解，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他对主席一直是很尊重的，过去为了标榜自己的中立，有时也讲中国的坏话，但从来不讲主席的坏话，现在，他天天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活学活用，西哈努克对主席说：

“过去你要我学，那时我学不进去，现在我要多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多读你的书。”

主席对他说：“你读我的书干什么？要读马克思的。”

西哈努克一反美，二拥护毛泽东思想，三支持越南，有这三条还不支持吗？

他对主席很尊重，见到主席就喊：“毛主席万岁！”见到总理也喊：“毛主席万岁！”

在天安门上，他用中国话喊了多次“毛主席万岁！”现在他每写一个文件，就送到主席那里：“有什么指示？送到总理那里：“有什么意见？”他说：“胜利后要把政权交给高棉的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

毛主席对他说：“你这个人有功，人民永远信任你的，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西哈努克原来是亲法的，崇拜戴高乐，对苏修也有幻想，现在对苏修恨透了，民族团结政府成立后，就是不见苏修大使，要他们承认，苏修就是不表态，柯西金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不用政府名义，不用政府总理名义，用个人名义。

胡森巴是驻联合国的，支持西哈努克，在联合国呆不下去了，要到北京来，请求苏修驻联合国大使借钱搞飞机票，不答应，后来把衣服家俱都卖了，到了莫斯科后还是没钱，就到苏联外交部要求借钱，还是不答应。后来找到中国大使馆，马上搞到票，到了北京。一见到西哈努克、宾努，就大骂苏修“不是东西”，是叛徒。西哈努克、宾努也表态“是叛徒”，胡森巴很委屈，后来见到总理时还哭了一场。

现在苏修不撤出大使馆，现在金边的大使馆是少数几个，有苏修、匈、波兰、捷克、保加利亚、资本主义国家有：法、英、日本、丹麦、印度等。苏修十分孤立，

他们骂我们是极端分子，支持西哈努克，会引起世界大战。

这次黎笋到莫斯科去，要求苏修支持他们搞三国四方面统一战线，苏修不支持，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不到十天，就有十几个国家承认，这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中国、越南成立时，也没有这样，连古巴、南斯拉夫也承认，苏修不承认，证明他们完全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全世界都骂他，西哈努克讲话中（5. 20）感谢这个国家，那个国家，就是没有苏修，苏修代办在天安门上就站不住，脸通红，很狼狈。

西哈努克在全世界影响很大，这个政府是美国逼出来的，是在北京，是毛主席支持下成立的。

西哈努克 3 月 19 日一到北京，到机场欢迎的法国大使就讲：“我接到蓬皮杜总统的电话，欢迎阁下个人在任何时候到法国去住。”是欢迎个人，不是国家元首了。法国很坏，天天活动，到处游说，要西哈努克到法国去，法国在柬埔寨有很大的工业，怕柬乱了，美国进去，对他们不利，共产党起来了，对他们也是不利，法国在暗地里是支持朗诺——施里玛达的。

西哈努克原想到法国去，现在不去了。

西哈努克的政府不是流亡政府，在国内有武装，武装力量成倍地发展。原来有××人，现在发展到××人，是原来的三倍，三个主要部长，国防、宣传、内政都是共产党，原来西哈努克把他们赶走的。西哈努克说：“我的政府在国内，它不是流亡政府。”

承认这个政府的有……。不支持这个政府的有美、英、法、苏及其走狗。

柬埔寨人民武装战斗力很强，朗诺的军队没有战斗力，山玉成的军队还有一点战斗力，现在金边天天叫危机，惶惶不安，朗诺把自己的家属送到新加坡，施里玛达和西哈努克是兄弟，当过驻日大使，与中央情报局挂上了钩，把自己的家属搬到了日本。

我们现在每天都向柬埔寨（广播），柬埔寨人民听到西哈努克的声音，武装力量天天发展，西哈努克自己也搞不清，到底有多少武装。

西哈努克的三个军区司令，也都到森林中去打游击去了，还是通过外电报导，五月上旬歼敌一万多人，其中美军四个营。击溃了他们十个营，最近又歼灭了他们三个营，湄公河以东全部解放，和越南连成一片，以西也解放了不少地方，农村

几乎全部占领，金边四面被围，公路不通，水路靠美国军舰，美军士气十分低落，写信回家，还有逃跑的，雨季一来还受不了，所以主席说：“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

美国国内有 600 所大学学生罢课，大学生静坐示威，在美国留学的学生包围了自己的大使馆，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公开反对出兵，尼克松讲：“看来只能当一届总统了。”

6 月底，美国陆军可能撤出来，美国空军要继续轰炸。傀儡军不撤出来。越南本来是搞平衡的。搞“社会主义大团结”，在印度支那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上，他是主角，但苏修不支持。

黎笋从莫斯科（回来），要求见毛主席，主席接见了他。他表示：“越南抗法战争没有中国援助是不可能胜利的，现在越南的抗美斗争，没有中国的援助是不可想象的。”还说：“毛主席身体健康，这不仅是中国人民，也是越南人民，全世界人民的幸福。”

毛主席说：“你们取得很大的胜利。”

黎： “我们是靠毛主席的两条指示：一条是坚持斗争，一条是长期斗争。”

毛主席说：“有些和平主义者无非说我们公鸡好斗，世界上那有那么多公鸡，他们自己不也是公鸡吗？我看现在世界上，不仅公鸡好斗，连母鸡也好斗了。”

毛主席还对黎笋同志说：“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这个问题值得考虑，不是世界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惶失措”。

林付主席对西哈努克说：“世界上小国很多，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美国很大，这也大，那也大，一分散就没有力量了。小国同小国联合起来，力量就更大了。尤其有毛主席领导。”

毛主席说：“林彪同志是打仗的。”

毛主席对西哈努克说：“你们现在的革命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两条纲领，一条是反帝，一条是反封建，你们的事业胜利得太快了。慢不好，太快了得不到锻炼。”

美国出兵激起了全世界的反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打着越南国旗，南方共和

旗子，游行示威，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

毛主席指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而是属于人民。”

美国侵朝时纠集了 16 个国家，侵越时纠集了 8 个国家，这次一个也没有纠集起来，连印度也反对，英法、西德都反对出兵，只有日本、印尼、南越、泰国支持，所以毛主席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国很多议员反对出兵，这次反对的浪潮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一个议员用自杀的办法来抗议，他的老婆举行记者招待会，美国股票下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以 5: 11 同意削减外援，200 名议员，对于出兵一事，51 名反对，70 多名支持，70 多名不表态，世界舆论说：“尼克松是在发疯。”柬埔寨发生政变后，我们中央讨论了这件事，说这下子可好了，西哈努克中立搞不成了，把死水打破了，可以使印度支那更好地团结起来，可以支持泰国、缅甸，影响整个东南亚。

毛主席说：“过去讲中国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现在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可靠后方。”

毛主席对西哈努克说：“我们应该援助你们，有一条，不要钱，你们要多少给多少，我们不卖武器，只能赠送。”

原定 5.20 中美大使级会谈，由于美国出兵柬埔寨，到了头一天，我们在华沙的代办到大使馆找到美国的代办，通知他：“（由于）你们的侵柬，我们不谈了，以后什么时候再谈另行商量。”

美国进兵柬埔寨，时间可能长一些，但是越南，老挝人民是有经验的。

（二）二次大战后，美国取代了德意日老帝国主义，建立全球超级大帝国，他的战略目标，就是控制整个亚、非、拉。苏修疯狂推行社会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外实行战争扩张，对蒙古、东欧加深控制。美苏狼狈为奸，相互勾结，反华反人民，他们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毛主席说：“帝国主义在和平时期，无时不在准备战争。”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掠夺。美苏在世界人民中最孤立，他们搞什么同盟条约，搞颠覆，傀儡，都是为控制别国掠夺别国，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是共同的，但他们之间也有矛盾，在争夺中间地带，在核垄断问题上都有矛盾，谁多谁少，谁先谁后，都企图自己实行垄断，在争夺海洋上也有矛盾，在争夺中东石油上也斗争，还有南非的黄金。这两个超级大国对世界人民是不怀好意的。

最近苏修搞了一个全球性的海军演习，显示自己的力量，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苏修到处派出自己的军事顾问，仅派到阿联的就有万把人，阿联的导弹，飞机都是苏修控制的。67 年以色列侵略阿联，一下子就把空军全部搞垮了，天天打败仗，苏修打不过一个二百万人口的以色列，因为他们与美帝有勾结。

总理在访问阿联时就对纳赛尔说：“援助一来，顾问也要来。”纳赛尔想去看看。什么顾问，那有派万把顾问的？就是控制别国军队，就是特务。苏修演习，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打起仗来，他们不行，没有什么战斗力。珍宝岛每天 1000 多架飞机也没有打胜，我们放了几个汽球，他们出动七、八架飞机都打不下去。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没打过仗，一些老的元帅、将军都被搞掉了。

苏修妄图搞一个新沙皇大帝国，在中东十五个国家掠夺不少资源，搞了不少基地。在地中海搞了不少，在 43 个国家搞基地，目标不是对付美帝国主义，一是扩张殖民地，二是镇压人民革命，三是包围我们，搞了五十年社会主义，穷得没有饭吃。向西德、日本贷款，到处买吃的，买日用品，吹嘘自己，钢产量一亿一千万吨，这么多，为什么还要向日本购买铜材？一个普通工人每月只有 60 个卢布收入，养活不了三口人，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成了泡影，既没有土豆，又没有牛肉，侵略捷克，侵略蒙古。在蒙古驻军十万人，蒙古总共有八十万人，把蒙古吃光了，蒙古人民很穷。苏修在香港设了很多机构，什么东西都买。把斯大林的储备黄金卖光了，国内到处是流氓，阿飞，妓女，一千万人失业，集中营里关了 100 万人，这不是社会主义法西斯是什么？苏联人民十分不满，怨声载道。

勃列日涅夫对党政军权都抓，外交发言也讲，成了孤家寡人，比赫鲁晓夫还赫鲁晓夫，鼓吹国际专政论，经济一体化，有限主权论，在经互会还实行货币一体化，压罗马尼亚，但罗就是不听他们的。

现在国际上正开辟一个反美、反苏修的新的历史时期。在毛主席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思想鼓舞下，亚、非、拉武装斗争蓬勃发展，28 个国家搞武装斗争，当然斗争总会有曲折。

苏修支持谁，谁就打败仗，向哪里伸手哪里就打败仗，苏修支持阿联，阿联就吃败仗，巴勒斯坦经常打胜仗，法塔赫万把多人，发展的很好，还有民族解放军，好多游击队，现在都联合起来。泰国、缅甸发展很快，印尼在“九州”事件后，武装斗争也发展起来了，苏门答腊，北加里曼丹都有，另外非洲的葡属几内亚，

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刚果（金）等武装斗争也起来了。

苏修在东边纵容日本发展军国主义，在西边不顾东德反对，不顾波兰利益拉拢西德，和西德谈判搞得火热。这就必然牺牲一部分东德的利益，在亚洲拉印度反华，不反美帝，不敢动。有时也骂几句，也是“小骂大帮忙”。

金日成同志讲：“过去上了苏修的当，吃了亏。”“他们就是要把日本扶植起来打朝鲜，打中国。”朝鲜抓了美国间谍船，苏修让马上放，朝鲜打下了美国间谍飞机，苏修马上打电话让马上放飞行员，金日成说：“真是见你们的鬼！飞行员在什么地方，我还不知道，怎么放啊！”日本进步学生把一架日机押到朝鲜，对这种革命行动，苏修也不支持，说什么是“托洛茨基分子。”

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马列主义者来中国学习，洪都拉斯，危地马拉等国，斗争也发展起来了，美国后院革命烈火烧起来了，他们一定会胜利。

（三）美帝苏修政治经济危机严重，内外交困，走投无路。

毛主席说：“帝国主义的日子也很不妙，内部矛盾重重，脚下随时都会发生地震。”

林付主席也指示：“纸老虎被全世界人民所戳穿……他们越来越走下坡路。”

美国进入新的经济危机，它是靠战争起来发横财，战后又集中了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的二分之一

一，黄金的四分之一。对外贸易的三分之一，通过马歇尔计划向其它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成了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到处镇压人民革命，成了最大的反动堡垒，他们吹嘘：“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但黄金时代是昙花一现，现在他已从霸主地位跌落下来，它现在的债务是一万一千多亿美元，财政收入年年亏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3 个财政年度，有 20 年是赤字，赤字达到 1200 多亿美元，黄金储备只有 210 亿美元。

国内共有 3000 个军事基地，军事开支很大，一个美国兵在国外，费用比在国内大好多倍，原定军官可以带家属，后来不让带了，带不起。

财政赤字，越来越大，二次世界大战后，连续出现 8 次经济危机，最近九个月来，生产停顿，物价上涨，失业人口增多，国内经常有 450 万人失业，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率下降，人民穷困，阶级矛盾尖锐。

阿波罗 12 号发射，一边发射，一边人民群众示威说：“我们没有饭吃。”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断发生，今年发生 1000 次罢工，美国人民已经从非暴力的束缚中

摆脱出来，把矛头越来越指向美国政府的反动政策，前两年发生的近二百万人大游行，青年反战，士兵逃亡，驻日本的军队有七万三千士兵逃跑。

毛主席发表声明，给黑人斗争以很大支持，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不断高涨，黑人斗争浪潮席卷 160 多个城市，华盛顿火光冲天，是 1812 年英国侵略以来所没有过的大火，黑人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青年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美国与其盟国的矛盾日益尖锐。戴高乐时期，美法矛盾十分尖锐，蓬皮杜上台后缓和了些，美在大西洋的指挥权越来越小。去年法国有 14 万人罢工。

毛主席声明也谈到欧洲人民的革命。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革命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总是相互支持的，毛主席指出：“赫鲁晓夫完蛋了，赫鲁晓夫的继承者也不会有好下场。”林付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已是气息奄奄，他们还要作最后挣扎，但反动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

苏修对内法西斯统治，对外扩张侵略。引起国内人民反对，国内 83% 的企业实行了以利润为中心的体制，计划完不成，勃列日涅夫把责任推给柯西金，柯西金是专管经济的。

农业集体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自由市场泛滥，粮食产量停止在沙皇时代水平上，按人口比例，去年粮食产量比 1913 年还要低，市场供应紧张，到澳大利亚买牛肉，一买就是六万吨，到西欧买黄油，一买就是 30 万吨，借口船坏了，到香港去修，修好就装满东西拉回去。

最近又要求日本贷款数十亿美元，他欠捷克 4 亿美元的债务，还伸手要向匈牙利借 4 亿美元，黄金大量外流，把斯大林时代的储备和以后的黄金都卖光了。

勃列日涅夫把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改了，现在说什么要“加强纪律”、“加强专政”、“加强法制”，这些叛徒完全背叛了马列主义，不是说没有阶级斗争吗，还要专政干什么？他们就是要专工人农民的政！广大苏联人民想念毛主席，信仰毛泽东思想，遇到中国同志就托咐转达：“祝毛主席健康长寿！”一个老人说：

“你们的路线是对的，我们这里离马列主义越来越远。”还有一个工人说：“我们苏联是打着列宁旗帜的资本主义。”

修正主义者互相吹捧，过去吹赫鲁晓夫，现在又吹勃列日涅夫，给他出选集，传记。苏修完全选择了华沙条约国的武装大权，要组织国防派遣军到中国边境来，在同罗马尼亚谈判时，公然要罗马尼亚支持他打中国。

1952——1970 年，廿年，苏向蒙古贷款达 50 亿 54 万卢布，相当蒙古牲畜价值的十倍，仅利息就等于蒙古全部羊的价值，蒙古到现在不会生产一两铜，连纽扣也要进口，苏修用高价榨取蒙古，一个汽车轮胎要 40 只大绵羊换，一辆自行车要 4 匹马换，一个小孩玩具要一只羊，苏蒙完全是侵略者和殖民地的关系。

苏修与小修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罗马尼亚不理它，不参加军事演习，苏修与西德谈判造成与东德的矛盾，苏修让小修听他的，在外交上不能独立，只许自己同西德、美国等接触，不许他们单独接触，还让哥穆尔卡攻击马布利希，最近开经互会，斗争很厉害，达不成协议，朝鲜也不满意，说“上了当。”五一节晚上，主席在天安门上同各国大使握手，有的同志说：“那边不要去了，那边有苏修，主席说：“怕什么！”主席同苏修代办握手，并说：“我们两国要睦邻相处，”又同中苏谈判苏方代表团付团长握了手，说：“我们两国要友好相处，要文斗，不要武斗。”还问他：“你们的团长呢？”回答：“回国参加纪念列宁诞辰周年纪念活动去了，五月四日就回来。”主席说：“那么急急忙忙的赶回来做什么？还不是吵架？”

毛主席同波兰代办握手，并要他代问哥穆尔卡好。哥穆尔卡这个人是忘恩负义的，当年赫鲁晓夫要出兵波兰，主席不同意，说：“你赫鲁晓夫这个荷花是好，还要绿叶扶植。”这次黎笋见到哥穆尔卡，哥穆尔卡要黎笋转告毛主席，说他很高兴，“向毛主席问好！”“祝毛主席长寿！”勃列日涅夫把经济责任推给柯西金，说：“党没责任”，内部矛盾重重，有三派，勃列日涅夫、苏斯诺夫是一派，柯西金与波德戈尔内是一派，谢列平是一派，4 月，波德戈尔内决定访日，因总理访朝，突然取消，说“病了”，那一段好多政治局委员都病了，什么“生病”，是政治病，是内部斗争，暂时靠边站了。现在中苏谈判这么长时间了，连个程序还没有达成协议，他们不敢走，因为走了就要承担“破坏谈判的责任，他们新出的地图把黑龙江划到自己的国土上，在纪念列宁一百周年时，在乌里扬洛夫斯基列宁诞生地的一幅地图上，连西伯利亚都是中国的，外国记者都照了象，他们很被动。毛主席说：“中苏论战一万年太久，减去一千年、九百年也行。”现在中苏谈判每周一次，他们只好到处游游逛逛，库兹涅佐夫把老婆孩子都接来了，还给孩子上学，我们当然还要同他们有些贸易，它主要是要农业产品，轻工业品，过去要苹果，用筛子，小一点都不不要，现在大的小的都要，过去买肉规定要多厚的膘，现在什

么样的都要。

(四) 当前世界革命的中心是亚非拉

世界革命正朝着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发展，一个新的革命运动新高潮已经到来。正如林付主席 1962 的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世界革命形势越来越好，越好作好国内的工作，国际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国内问题的解决。”

列宁早就指出：“革命中心要转移。”“中国将来可能比俄国还要先进。”列宁的伟大关于预见是正确的，中国胜利了，苏联倒退了，我们的毛主席把列宁主义的旗帜高高举起，把马列主义发展到第三个里程碑。

我们在团结在毛主席、林付主席周围，把我国建设得更强大。我们卫星上天在世界震动很大，各国都来贺电，对卫星之大，准确性之高很惊奇，是美苏发射第一次时所不能比拟的，我们十次成功，原先估计 16 年，现在估计要运行 20 多年，卫星上天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震动更大，我们完全是没有外国资料，外国专家的情况下自己干出来的。我们卫星的价值外国是很难清楚的，这就是有了洲际导弹，有气象卫星，侦察卫星，所以美帝苏修惶惶不安，这样一来，他们就不那么安全了。

我们不能骄傲，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好，不但为了自己，是为了支持世界革命，支援世界人民。毛主席对黎笋同志说：“美国人派几十万军队到你们那里去，我们中国作个后方还不行？世界上那么多法制（？疑有误）我们偏要作！”

国内毛主席对三件事情很赞赏。一个是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毛主席说：“这个会议开得好，廿年来没开过这么好的会。”“这话过去我都讲过，没有听，现在好了，这次会开得好。”

二件是中央发的三个文件：毛主席说：“一打三反搞的好！要注意政策，防止扩大化，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注意政策，小的只要交待了就行了，能退赔的就赔，退赔实在有困难的可以减免。”

第三件是战备：毛主席说：“半年来，战备搞得好，不但军民要搞好，还要把民防搞好，要把地下道挖通，要储备粮食药品。”

现在我们全国一派大好形势，面临进一步搞好斗、批、改的任务，我们农业已经连续八年丰收，今年争取更大的丰收。

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三机部六院一定要把产品的质量搞好，对同志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毛主席、林付主席负责，没有质量就没有数量，我们的卫星就经过多次检查，最后总理亲自检查，一放就成功。

我们好好学习，坚持毛主席古田会议和 1960 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林总最近指出：“要学习理论，编点新的教材，要有条令，制度，把训练搞好。”

我们要根据毛主席六?六批示，大搞技术革命，尽快地把成功的运用到使用、生产、科研部门。

（1970. 6. 1 三机部传达

一九七〇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共产党员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九周年》

在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中，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前进中，在整党建党运动继续深入地发展的时候，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热烈庆祝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九周年。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培育和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风暴中，经历了反对国内外敌人的长期斗争，取得了武装群众夺取政权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光辉的战斗历程，表明她无愧为工人阶级和全国革命人民的领导核心，无愧为当代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以社会帝国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国际无产阶级的一支突击队。

毛主席教导我们：“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整党建党运动，就是要继续建设和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吐故纳新，把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建设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斗堡垒，把广大党员进一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进分子。

什么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标准？这就是毛主席阐明的、“九大”新党章规定的共产党员必须做到的五条。

第一条，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指导思想问题，政治方向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是靠活学活用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长起来的。新党员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要学，老党员也要学，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更要认真地学，刻苦地学，学了就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是要革命，要搞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活学活用，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敢于同阶级敌人作斗争，敢于同“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作斗争，敢于同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

第二条，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共产党人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就要搞阶级斗争，就要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为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解放全人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些人嘴上也说为人民服务，其实是为了他那个小山头、小团体，为了他自己。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不能进领导班子，更不能当第一把手。

第三条，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并且认真改正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手里。要团结大多数人，要防止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目的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有无产阶级的宽阔胸怀，而不应当气量狭小。要识大体，看大局。要懂得“人是可以改变的。”“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

第四条，有事同群众商量。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这就是说，要搞“群言堂”，不要搞“一言堂”。“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员要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和群众打成一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的干部更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抓好典型，并从三分之一入手，搞好面上的工作。许多事情我们不懂，群众提出来了，就要向他们学习，推广他们的先进经验。

第五条，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共产党员只有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才能锻炼自己，提高自己。毛主席说：“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象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象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共产党员在整党当中和整党以后，都要敞开思想大门，欢迎群众评论。一个人有了错误，肯作自我批评，又请人家批评，改了过来，就是好同志。

共产党员必须做到的这五条，归结起来，一个就是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个就是相信和依靠群众；一个就是正确对待自己。要解决这三个问题，最重要的，是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努力争取从思想上完全入党。只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用共产党员必须做到的五条严格要求自己，才称得起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这样的先进分子越多，我们的党组织就越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就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党的“九大”光辉指引下，我们的党空前地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我们的党在大踏步前进。经过整党建党运动，我们的党必将锻炼得更加强大、更加巩固、更加朝气蓬勃。

让我们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共产党员必须做到的五条，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新党章，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建党学说，用整党建党的伟大成就，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迎接党的五十周年！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〇年七月一日，社论）

一九七〇年八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提高警惕 保卫祖国——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四十三周年》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走过四十三年英勇战斗的路程。今天，全国人民和全军指挥员战斗员满怀革命的

豪情，纪念我们伟大的建军节。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的无产阶级军队，是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际主义的无敌的工农子弟兵。这支伟大的军队，紧紧地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进行了武装夺取政权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斗争，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人民解放军遵照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教导，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尽了自己最大的责任，充分发挥了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作用。毛主席在今年五月二十日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庄严声明中指出：“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毛主席的声明，深刻地分析了国际阶级斗争的形势，极大地鼓舞了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志，指明了我们前进的方向。

当前世界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处在亚洲反美斗争前线的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各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了。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斗争正在胜利前进。在美国国内，革命群众运动的烈火熊熊燃烧。世界人民反美斗争的统一战线不断地扩大和加强。东欧国家人民和其他一些国家人民反对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干涉和控制的斗争有了新的发展。总之，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欧洲、北美和大洋洲，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在蓬勃高涨。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外强中干，他们的内部和他们控制的势力范围，正在分崩离析。不是世界人民怕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怕世界人民。这两个“超级大国”，都正在从膨胀的顶点急剧地衰落下来，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境地，都陷入在全世界人民和本国人民的重重包围之中。

毛主席指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当前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进一步证实了这个真理。

但是，帝国主义绝不会因为失败而丝毫改变它的侵略本性。社会帝国主义也绝不会因为侵略政策的破产而放弃它的扩张欲望。美帝国主义正在继续扩大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继续支持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侵略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美帝扶持下复活了的日本军国主义，也野心勃勃，凶相毕露，成为亚洲的一个危险的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在中东问题上，在复活日本军国主义问题上，社会帝国主义同美帝国主义都是从各自的利益和野心出发，彼此默契，狼狈为奸。这两个“超级大国”，正在互相勾结，互相争夺，妄图重新瓜分世界。他们为了摆脱自己的危机，镇压各国人民革命，争夺世界霸权，都在疯狂地扩军备战，到处伸出自己的侵略魔爪。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世界就不会安宁，就存在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

高举反帝反修革命旗帜的社会主义中国，是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世界、奴役全世界人民的巨大障碍。这两个“超级大国”，为了推行他们侵略别国的计划，处心积虑地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好象蛇要吞掉大象那样，梦想有朝一日能够吞并中国，瓜分中国。美帝国主义仍然霸占着我国的领土台湾，继续武装蒋介石匪帮，加紧策划日本军国主义者、南朝鲜朴正熙傀儡集团、蒋介石匪帮等充当它的侵略工具，不断地对中国、朝鲜和亚洲各国进行军事挑衅。社会帝国主义正在贪得无厌地窥伺着我国的领土。它一天也没有放松进攻中国的准备。它口头上说什么没有威胁中国，但它为什么在靠近我国边界的地区大规模地集结兵力呢？为什么把它的大批军队开进邻近中国的别的国家呢？为什么要那样猖狂地采取军事部署把进攻矛头指向我国呢？可见，社会帝国主义同美帝国主义一样，他们口头上说什么没有威胁中国，不过是为了麻痹我们，为了欺骗它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伟大教导，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做好防御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对付突然袭击的一切准备。要象林副主席所指示的那样，“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这样，我们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看得到，是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和威胁我国，而我国并没有一兵

一卒驻在别人的国土上。我们加强战备，完全是为了防御。如果敌人胆敢窜入我们伟大祖国的任何地方，我们就坚决把敌人消灭在那里，埋葬在那里。

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是我军的根本职能。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要牢记自己肩负的重任，切实做到常备不懈。要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按照古田会议决议和一九六〇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思想革命化。要更加扎实、更有成效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要进一步提高四好连队运动，全面增强部队的战斗力。每个干部战士都要胸怀革命全局，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要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光荣传统，继续做好“三支”“两军”工作，更加密切地联系群众，进一步提高我军指战员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

全国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单位，都要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要认真搞好斗、批、改，警惕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出色地完成工农业生产、国防建设和科学的研究等各条战线的任务。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的指示，加强民兵建设。全国军民都要“拥军爱民”、“拥政爱民”，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军政团结，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成为更加强大的革命的堡垒。

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阔步前进。我们一定要解放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我们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把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美帝国主义必败！社会帝国主义必败！胜利一定属于世界人民！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〇年八月一日，社论）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农业学大寨》

今天本报发表了一篇昔阳县学大寨的调查报告。这个县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短短三年时间，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平均亩产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昔阳，从一个大寨大队发展成为一个大寨式的县，这个变化反映出我国农业生产新的高涨。

大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倡的一面红旗。“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的伟大号召。大寨的道路，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竭力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进行干扰，破坏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推动着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目前，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县县有大寨的生动局面。有许许多多的大队、公社，有不少的县和地区，甚至有的省、市都跨过了《纲要》。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今年又是丰收在望。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形势呵！

为了更快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加强我国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决不能满足于已经出现了成千上万个大寨式的先进大队，满足于部分县、地区和几个省、市跨过了《纲要》，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进一步深入开展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昔阳经验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提供了在一个县的范围，全面学大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以比较快的速度跨《纲要》的范例。

学大寨学什么？这是当前深入开展学大寨群众运动需要首先弄清楚的问题。学大寨，就是要学习大寨大队一贯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一句话，就是要象大寨大队党支部那样，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人。这是大寨经验最根本的一条。

大寨的贫下中农说得好：“千条万条，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是第一条。”他们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始终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结合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学得活，用得好。他们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武装头脑，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主义觉悟，用“老三篇”作为镜子，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他们狠抓阶级斗争，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坚持不懈地同阶级敌人斗，同违背

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种错误倾向斗，同自己头脑中的“私”字斗。

毛主席教导我们：“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广大群众学习了毛泽东思想，掌握了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就具有排山倒海的力量，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有了毛泽东思想，勇敢也有了，积极性也有了，组织纪律性也有了，吃苦的革命精神也有了，创造性也有了，就可以创造出一百个办法、一千个办法、一万个办法。有了毛泽东思想，人的精神面貌变了，土地也就变了，产量也就变了。大寨是这样，昔阳也是这样。学大寨，只要象昔阳那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群众，就一定能迅速改变面貌。

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是大寨经验中第一位的东西。学大寨首先要学这一条。至于经营管理、生产技术方面的一些具体办法，那是第二位的东西，一定要按照各地的实际情况办事。学大寨，不学第一位的东西，只学第二位的东西，不学根本，只学表面，肯定是学不好的。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别人的某些具体做法，还有可能“学歪了”。只有正确地解决学什么的问题，才能排除右的和“左”的干扰，落实毛主席制定的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保证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思想哺育的大寨贫下中农，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指引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他们凭着一颗红心两只手，战天斗地，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建设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国家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是自力更生学大寨，还是靠天、靠地、靠国家，反映着农业生产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早就指出：“全国所有社、队的生产建设，都要象大寨那样，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我们一定要把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方针，在干部和群众中牢牢地扎根。

怎样把大寨经验由点到面迅速推开？这是当前深入开展学大寨群众运动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把大寨经验迅速推开，必须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为什么有的社、队学大寨学得好？就是因为这些地方彻底批判

了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及形“左”实右的一套黑货，坚决反对了资本主义倾向，有力地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深入进行了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和混入党内的坏人，保证了社、队领导权真正掌握在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手中。为什么有的社、队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开展不起来？说来说去，还是因为那里没有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没有形成一个好的领导核心。各地正面和反面的经验都证明，只有始终抓住阶级斗争不放，才是抓住了推广大寨经验的要点。

要把大寨经验迅速推开，就需要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县一级领导班子来一个革命化。昔阳成为大寨式的县，向各县的领导同志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关键在于有一个很大的干劲。要象大寨的贫下中农那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树雄心，立壮志，敢于改天换地。胸无大志，无所作为；守旧摊摊，不创新业；怕苦、怕累、怕困难；屈服于自然界的压力，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必须将这种不正确的世界观改过来。

各级领导要进行扎扎实实、深入细致的工作。要遵照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抓好典型”的教导，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抓好本地区学习大寨的先进样板。以这些先进单位为基点，先抓好三分之一，再及其余。毛主席倡导的这种深入一点，取得经验，推动全般的领导路线，就是我党在全国一切群众工作中早已行之有效的一条著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沿着这条路线认真做下去，就一定能够把大寨经验由点到面迅速推开。

学大寨，把大寨经验由点到面迅速推开，是在农业战线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搞好斗、批、改，落实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战略方针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都要加强对学大寨群众运动的领导。农业战线的同志们，努力呵，用实际行动响应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号召，让大寨之花开遍我们伟大祖国的大地！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三日，社论）

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继续革命，乘胜前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

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航向，胜利前进二十一年了。今天，全国各族人民满怀革命的豪情，热烈庆祝七十年代第一个国庆节，共同祝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主席万寿无疆！

过去的一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深入的一年，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新胜利的一年。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在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深入发展。亿万革命群众抓紧革命大批判，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猛烈地扫除着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广泛地开展了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任务，正在广大的工矿、公社、学校、机关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一个一个地逐步地落实，革命的新事物不断涌现。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促进工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一九七〇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正在胜利实现，从一九六六年開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正在胜利完成。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上锻炼成长。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民兵和全国人民，从思想上、物质上、组织上进一步加强了战备。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兴起，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更加朝气蓬勃。

在毛主席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庄严声明指引下，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的我国人民，进一步加强了同阿尔巴尼亚人民、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朝鲜人民、日本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战斗团结。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团结对敌，把美帝及其走狗，打得焦头烂额。朝鲜人民、日本人民、东南亚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不断高涨。英勇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在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力量支持下，正在同美帝操纵的约旦反动军事当局浴血奋战，坚持反对美帝和以色列侵略者的武装斗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到北美、欧洲、大洋洲，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更大规模地更深入地发展起来，震撼着整个旧世界。

人民的觉悟在斗争的风暴中不断提高。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和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两个超级大国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妄图瓜分世界的丑恶面目越来越暴露，在全世界越来越孤立。国际形势的发展，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个科学论断：“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在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总结了党的“九大”以来取得的成就，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各项任务，提出了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这次会议的公报和各项决定，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正在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决心以实际行动，响应九届二中全会的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继续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各级党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各项工作首位，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毛泽东思想在一个七亿人口的国家中，得到现在的普及，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宝贵的收获。我们应当继续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紧密地结合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认真学，认真用，更好地落实毛主席每一项指示，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哲学著作。要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提高对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及各项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担负着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巨任务，首先是担负着领导广大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任务，更要认真地、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毛主席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指出：“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在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现在，广大共产党员和工农兵群众的学习运动，生气勃勃，热气腾腾。各级领导干部要加紧自己的学习，带领群众前

进，真正把我们伟大的国家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使越来越多的同志，能够更好地按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正确地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加强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做好工作。我们要继续“认真搞好斗、批、改”。要充分认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要看到政治思想战线、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都存在一个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各级领导要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着眼，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群众在斗、批、改中创造的许多好经验，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加以总结、提高，找出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的东西，特别要注意研究各项政策性的问题，抓好典型，以点带面。要把“一打三反”运动抓紧，继续有力地打击一小撮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分子。

我们要继续全面地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要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为纲，把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我们要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无产阶级的方针、政策，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夺取工农业生产的新的胜利，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〇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树立常备不懈的思想。要继续加强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的建设，不断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我们要认真地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强党性教育。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吐故纳新，把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建设成为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把广大党员锻炼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全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进一步加强党对各条战线的一元化领导。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还有许多艰巨的任务在前头，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奋斗。我们要用新的胜利，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要进一步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战斗团结，把反对帝、修、反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社论）

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林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的光辉节日来到了。

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全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红卫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致敬！向全国各族人民致敬！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致敬！向一切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们和海外侨胞致敬！向来自世界各国的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过去的一年，全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团结、胜利的路线指引下，大踏步前进，在各条战线上都不断取得新胜利。政治思想战线、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继续深入。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兴起。农业、工业、商业、文教卫生、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热气腾腾，一片兴旺。我国的国防大大加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

在这个光辉的节日，让我们祝贺全国人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的伟大成就，祝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运动的伟大成就，祝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祝贺人民解放军、广大民兵和全国人民在加强战备、巩固国防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

在国际上，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正在出现。正如毛主席今年五月二十日发表的庄严声明指出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人民革命斗争蓬勃发展，反美统一战线不断加强和扩大。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非常孤立，日子很不好过。我国的国际关系日益发展。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在庆祝七十年代第一个国庆节的时候，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响应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号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继续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我们要继续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密切结合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要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分析事物的矛盾，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我们要继续抓紧革命大批判，扫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把斗、批、改运动进行到底。

我们要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继续推向前进，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〇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并打好第四个五年计划基础而努力奋斗。

我们要认真地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进一步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

我们要继续加强人民解放军和民兵的建设，继续抓紧和加强战备工作，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支持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柬埔寨人民、老挝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坚决支持朝鲜人民、日本人民、东南亚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帝及其伙伴、走狗的斗争，坚决支持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北美和欧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和组织的战斗团结，进一步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战斗团结，把反对帝、修、反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要用各条战线上的新胜利，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全国各族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原载《人民日报》1970年10月2日

研究资料

1969年中国安危系于千钧一发——苏联核袭击计划胎死腹中

• 刘易斯·薛理泰 •

1969年深秋，中国核导弹部队（二炮）进入了全面核战备状态，这在二炮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这次核危机在中国乃至全球安全层面产生了若干后果：北京权力架构的震动，军队指挥、控制系统的重组，对苏联和美国的政策的改变，以及对核威慑和全球稳定产生的广泛影响。

◇ 一条还是两条战线？

1964年伊始，毛泽东明显地表达了他对莫斯科的敌意。中共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的文章。3月31日，中共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第八篇文章。7月14日，又发表了题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的第九篇文章。在这年十月，赫鲁晓夫被苏共领导人罢黜以后不久，中共继续抨击这位前苏联领导人。

◆ 苏联威胁超过美国

通过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披露的内情可知，早在1965年初，他已经下决心清算刘少奇及其追随者了。毛的准备工作在1964年就已经开始了。毛泽东把来自苏联的威胁与出自中共内部的威胁两者联系起来看待，并且越来越怀

疑存在着一个内外勾结的针对他本人的政治大阴谋。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个人成见使得他对莫斯科的怨恨火上加油。有一则故事反映出他对赫鲁晓夫的个人成见之深：一次，毛泽东看到一个贴身卫士剃了光头，就下意识地把卫士的光头同赫鲁晓夫的秃头联系起来，再三问卫士长为什么那名卫士非要剃光头。此后，在他的随扈人员中，剃光头便成了禁忌。

1964年，毛泽东作出了两项重大决定。这两项决定及其贯彻执行预示了中苏国家关系迟早会转变为军事意义上的敌对状态，由此产生的影响赓续十年以上。

其一，防御重点由南移北

毛泽东提出了新的军事战略方针以及改变了防御的重点方向。

长期以来，中央军委遵循的战略方针是“北顶南放”。“北顶”是指从鸭绿江到浙江象山湾的沿海一线要顶住，不让敌人登陆上来；“南放”是指从象山湾直到广西沿海都可以放敌人进来。防御的重点是东北地区。这是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提出的然后获得毛泽东批准的既定的军事战略方针。

除了地域划分以外，“北顶南放”还有一层战略涵义，即北边有苏联老大哥撑腰，可以背靠苏联顶着，然后在南方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来，等待时机成熟，再发动反攻歼灭之。后来随着毛泽东与莫斯科渐行渐远，中苏终于反目成仇，这层战略涵义就很少有人提起了。

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提出新战略方针“应付四面八方”，准备在多个战略方向对付可能入侵之敌，也就是说不知道敌人从哪里来，所以要处处戒备。针对“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是否管用，他说“我看不一定”。他指出，“敌人不一定从南北两翼来，而很可能对我中间突破、割断南北”。

制定军事战略方针，须明确战略方向，随之有的放矢地从事战场建设。历来兵家用兵，兵力部署切忌分散。“备多力分”，为兵家大忌。毛泽东一贯把“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列为十大军事原则的第四条。以毛氏过人的精明，岂有不清楚“处处戒备”，没有突出重点，也就是“处处没有戒备”的道理？然而，当时美国日益介入越南战争，南疆烽火连天，北京同莫斯科的纷争却仍然局限于“打笔墨官司”的阶段。他清楚，眼前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不会接受把苏联列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如果他直白地讲出，必然会引起猜测，节外生枝，干扰他内定的战略部署，所以他不便一下子说明白。

他的意图是通过“吹风”警醒其他领导人，中国的大敌不仅仅是美国和台湾，促使他们把注意力从南边和东南边引开到其他方向，然后再逐步使之倾注于北边的苏联。他提出了新的主张，尽管不同于往常，战略调整却是逐步付诸实施的，这样他的主张便于为其他中共领导人接受。他明白，一旦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改变了，军队防御的重点方向势必随之改变，逐渐专注于北方。一旦解放军兵力部署成型，中共党内高层也只能接受既成事实。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强调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以如此明确的口吻隐喻“中国赫鲁晓夫”可能存在于中南海，自然大大加强了极左的政治氛围，几乎搞得中共高层人人自危。

7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这是他首次正式地向中共领导层提出中国可能同苏联打仗的问题。

毛泽东在同外国友人谈话中，探询苏联军队进攻中国的可能性，透露了他思想深处的心腹大患。他在接待同克里姆林宫有接触渠道的外国访客时，似乎不经意地多次提到这个问题。10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问道：“如果苏联打我们，西安就是前线了。你看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苏联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甚至内蒙古。你看有可能没有可能？”

其二，产业移向西南三线

毛泽东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建设“三线”的运动。

1964年11月,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将要害工业和科研设施从沿海地区迁移到内陆省份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把云南、贵州、四川列为“三线”地区。大规模迁移接踵而来,许多国防工业、科研设施甚至大专院校搬到了三线地区。按照《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的评断,这是“将过去背靠苏联建设的项目进行一次大调整,重新安排国家工业建设的布局”。毛泽东发动“三线”建设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防备有朝一日苏联会对中国实施军事打击。

饶有讽刺意味的是,要害设施迁移到新址,却靠近了美国在东南亚的空军基地,都在美国空军的打击范围之内。这说明,当时毛泽东认为在今后一段期间,中国不需要再担心来自美国的空中打击,尽管他嘴上还在说“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例如中央经济计划部门在拟定“三线”建设规划时,起初把甘肃省酒泉和四川省攀枝花同时列为建设一个新的钢铁联合企业的最优先考虑的厂址,偏向于前者。酒泉镜铁山钢铁厂预计投资人民币十二亿,已经投资两亿多。不过,5月27日,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将之建在攀枝花,因为酒泉还是离苏联太近了。可是攀枝花却相当接近美国在泰国和南越的空军基地。涉及国防工业布局,当时的原则是只要能够远离苏联空军基地就行,哪怕靠近美国空军基地亦无妨。看来毛泽东早已把苏联视为中国未来的头号敌人。

◆ 毛将矛头指向党内

毛泽东开始着手调整他对越南战争的战略评估。据前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筭回忆,当时河内催促中苏组成反对美国在越南进行战争的联合阵线。他与周恩来、彭真等人就此设想举行了会谈,周、彭等人同意了他的建议,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也同意了越方建议。岂料毛泽东予以峻词拒绝,并且认为这是克里姆林宫—中南海合流的一个阴谋。

他担心一旦中苏建立反美联合阵线,大敌当前,中共党内必然会出现加强团结对付外敌的呼声,就会妨碍他在国内大规模整肃党内政治异见者的战略部署。况且,一旦北京同莫斯科建立联盟,彼此紧张关系会随之缓和,势必妨碍他以克里姆林宫—中南海合流的罪名清洗党内“修正主义分子”。

1965年，毛泽东指出“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似乎说明了他也曾经正视过来自两个战略方向的威胁。这个说法好像反映了他从最坏情况着眼的习惯思路，不过，也更有可能是他采用的障眼手法，以促使高官逐步将视线从东边移往北边，因为既然他已经下决心对中共领导层动大手术，就不可能同时挑战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这根本违背了他历来强调的“决不同时用两个拳头打人”的出击手段。

◆ 毛泽东要关门打狗

毛泽东迅即命令军委把防御重点从南方、东南方转移到东北、华北和西北这三个北部地区（三北地区）。军委将工程兵总兵力的三分之二调到三北地区，在当地主要作战方向迅速构筑各种防御工事。他甚至催促工程兵在华北平原上构筑若干“人造山”，在上面修筑炮位和防空火力点，以减煞苏军装甲部队在战争初期的凌厉攻势。

他还嘱咐当时尚存的解放军八位元帅中的六位进行战略研究，认真考虑一下，中国应该如何“在东北打一场反侵略战争”，对付入侵的苏军。1965年11月11日，北京发表一篇题为《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文章，冷峻地指出，在当代，在中共、苏共之间，存在着足够的因素促使它们分裂，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促成它们的联合。

这段期间，毛泽东数次发表了针对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的措辞强硬的言论。可是，根据他把三分之二的工程兵调到三北地区的军事大动作，可见他的“反美”论调只是旨在应付党内的不同观点。

1966年3月，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苏共第23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断然予以否决。他指出，“一个大会为什么一定要到呢？不到就要砍头吗？是否要发贺电，也值得考虑。不发就犯了罪吗？”他承认自己的举动是“挑战策略”，还声称“最后无非是兵临城下”而已。

毛泽东决定“关门打狗”，势在必行。显然，不管北京以什么理由同莫斯科和解，都会削弱他企图采取非常手段在中南海围墙内整肃“修正主义分子”的理由的正当性和行动的可操作性。

◇ 中、苏边境冲突

1966年初，苏联和蒙古新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军加强了驻扎在蒙古前沿的装甲部队和战略火箭部队。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张家口到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560多公里，而中、蒙边界中国一侧地势平缓，便于装甲部队快速行动。苏军的部署证明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面临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的判断的正确性

。

◆ 北京评估苏联威胁

1966年3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时，指出苏联“在外蒙古设立了原子弹、氢弹阵地，运来了原子弹和氢弹，驻扎了两个师”。他着重谈了苏联进攻中国的问题。他说中国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

同年，毛泽东在同解放军几位元帅讨论有关问题时，对苏联军事威胁的估计趋向于更加严重，他预言莫斯科将在两年内进攻中国。次年，军委决定将38军改编为快速反应部队，并且把内蒙古军区的编制从大军区降低为省军区，直接受北京军区指挥，以便北京军区在战时给予有力支持。

正如他预言的那样，苏联果然在1968年8月采取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过这次对付的目标是捷克。苏军入侵捷克以后，北京对苏联入侵中国的可能性的评估立即升级。

◆ 军委决定伏击苏军

1968年底至1969年初，苏军日益频繁地闯入两国发生争议的乌苏里江珍宝岛。军委命令沈阳军区制订一项对再次闯入珍宝岛的苏军实施伏击式的反击战计划。沈阳军区从三个野战军中挑选了三个加强侦察连，两三个月内进行高强度的特种训练。

1969年2月19日，总参和外交部同意了沈阳军区的作战计划。军委在批准这份计划和有关的作战命令时，规定指挥权直接归属军委。反击战有个前提，即苏军再次闯入珍宝岛启衅；如果苏军不闯入珍宝岛启衅，则反击战计划停止执

行。

据情报, 1969年2月, 苏联远东边防军奉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引起中方格外的警惕。军委的上述决定与此不无关系。

作为中国军队加强战备的一项重要措施, 1969年2月, 38军改编为38摩托化军, 全部官兵及装备给养可以由各种机动车辆装载。军部辖三个摩托化师以及军直辖炮兵团、火箭炮团、高炮团各一个。每师辖三个摩托化步兵团和坦克团、炮兵团、高炮团各一个。稍后, 66军也具备了摩托化能力。这两个军可以对闯入中国纵深之地的苏联装甲部队实施有力的反突击。

◆ 军委直接掌控战局

边界冲突前后, 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各自率领一个小组留在设于京西宾馆的北京指挥所随时待命。前者汇报战况并且控制战斗规模, 后者则掌握国际情报并报告国外反应。

这两个小组与军委作战系统的将军们——包括总长、一名主管作战的副总长以及来自总参一部(作战)、二部(情报)、三部(电子侦察、破译)、通信部和机要局的高级军官——紧密合作, 都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这时毛泽东已经授权周恩来对这场战斗涉及的军事、外交层面的事务作出最后决定。

毛泽东经常授权周恩来指挥中国军方的紧急行动, 尽管当时周恩来甚至不是军委的正式成员。如今, “文革”处于关键阶段, 毛泽东委托周恩来处理来自外部世界的新挑战, 另外, 毛授权周处理军事, 也是为了抑制林彪的势力。

冲突被置于军委直接控制下。毛、周对战局及国际反应有着一手资讯。相比之下, 苏共政治局几个主要成员正在国外访问, 被这场冲突搞得不知所措。直到3月6日, 苏共政治局才得以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如何应付由此产生的后果。在战略决策层面, 莫斯科稍逊一筹。

◆ 北京控制冲突规模

1969年3月2日, 在前夜已经潜入珍宝岛上埋伏的解放军对再次闯入珍宝岛的苏军突然发动攻击, 烙伤苏军官兵60多人(据苏联公布数字, 苏军死亡31人), 解放军死伤52人, 并有一人失踪。

苏边防军侦察分队的观察哨距离珍宝岛仅80公尺, 却没有发现解放军已经

上岛埋伏。苏军缺乏夜视装备，无从发现解放军趁黑夜上岛。苏军军官认为，中方选择战机得当。首先，3月1日晚至2日凌晨下雪，遮盖了中国军人行进的痕迹；其次，3月2日是谢肉节，苏联官员邀请苏边防军指挥官去联欢，战地同指挥所联系不畅；最后，时值周末，苏边防军航空兵停飞。

3月15日，中苏边界冲突中最激烈的战斗爆发。中国军队打退了苏军对珍宝岛的三次攻击。苏军死伤140人。临战前，中国军队没有在岛上部署多少人，当苏军坦克、装甲车密集登上岛时，中方即给予猛烈炮轰，结果中方死伤仅39人。

16日夜，毛泽东、林彪开讨论。毛在会上说：“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了。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这番话反映了他欲藉此平息国内派性武斗的想法。针对边境冲突的发展方向，他给予指示：“到此为止，不要打了。”他还指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他用飞机轰炸”，要防备苏联的外科手术式打击摧毁中国核设施。当初苏方为中国安排核设施布局，对此了然于胸。毛自然不能排除苏联轰炸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

◆ 总参截获苏联机密

在3月15日较大规模的冲突之后，克里姆林宫一再试图与中南海联系。一次，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经由连接克里姆林宫和中南海的热线打电话给毛泽东，但是中国接线员拒绝为他接通。

据前中办主任杨尚昆回忆，苏共、中共架设的这条热线将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连接起来，中方终端设在中办。另一条热线把中苏两国外交部连接起来。当初中苏之间设立两条热线，是为了在对付西方军事压力时可以紧急磋商，如今这两条热线反而成为双方互相摸底的一条途径。

3月21日夜，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使用了连接苏中两国外交部的另一条热线打电话给中国外交部，终于同正在值班的一位高官李连庆进行了交谈。柯西金说他希望与周总理谈谈。李连庆记下柯西金谈话的要点，作了汇报。当天半夜，柯西金还授权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紧急地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内容相同的他的信件。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中国应该作好谈判的准备。

就在柯西金打电话的当晚，总参三部已经将截获的柯西金给外交部以及苏联驻华使馆打的两通电话的内容，包括柯西金在电话机旁同身边的苏联翻译的对

话,一概予以录音、翻译,甚至连反映柯西金催促苏联驻华使馆官员速去中国外交部递交信件时的迫不及待的情绪的语助词都翻译了出来。柯西金担心两国冲突扩大的焦急心情跃然纸上。三部写成一份绝密报告,分别送给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

单凭柯西金催促苏联驻华使馆官员尽快同中国外交部取得联络时的急躁情绪,毛泽东就确定部分苏联领导人根本不想扩大冲突。次日黎明,他同意授权外交部通知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苏联应该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提出由两国进行谈判的建议。

◆ 毛说仗打给美国看

“文革”中,毛泽东迈入老年。他在孤独的心态下,对国际问题顾问群隔膜越来越深,反而愿意在身边人面前吐露心声。最早知道毛泽东开始改变大战略观念的居然是他的护士长吴旭君。不少中国学者认为,毛泽东不可能同护士长之类身边人士讨论涉及大战略的问题。事实上,毛泽东晚年思绪时常天马行空,内心不免孤独,他同智囊群逐渐疏远,有时倒是愿意同身边人讨论一些战略问题。这些学者对于毛泽东晚年的决策环境是相当有隔膜了。据熊向晖回忆,毛时常同吴旭君讨论国际时事,比如中国大概在何时可以进入联合国之类的问题等。熊身兼中国高级情报官和外交官之职,自然了解毛晚年的决策内情。

据吴旭君回忆,在珍宝岛冲突以后,毛泽东一边阅读战报,一边自语:“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吴旭君问:“你是指中苏分裂了,美国人高兴吧?”毛回答说:“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显然,在毛心目中,北京的钟摆即将倾向华盛顿。

关于苏联加紧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的报告接踵送至毛泽东的案头,又把这位主席从浮想联翩的遐思拉回到现实世界中来。他批准军委有关将中国进入越南对美国空军作战的高炮部队全部调回中国北方的报告,以应付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的空袭。截至 3 月底,中国空军入越作战的高炮部队全部被调回国;中国陆军入越作战的野战高炮部队也在 4 月被全部调回国。

自 1965 年至 1969 年,中国空军先后有 26 个高炮团、9 个探照灯营、

14个雷达连进入越南作战；陆军先后有37个野战高炮团进入越南作战。这批部队富于实战经验，调回国内必然会加强防空力量。另外，中国将入越作战的全部高炮部队从“反美前线”调回国内以防备苏联空袭的决定，也反映了北京对于来自境外的最现实的军事威胁的认知。

其后，莫斯科继续在苏联和蒙古与中国交界的边境地区加速军事集结，并声称中国北方边界“是以长城为标志的”。苏军又将前战略火箭军副司令调任远东军区司令，这项人事任命发生在这个关键时刻，加上苏军鼓吹“苏联部队的核武器是具有无限度毁灭力量的带核弹头的导弹”，核导弹部队“随时准备”采取行动，以“毁灭性的核反击”来对付中国。北京认为，此类行动是苏联将对中国先发制人地进行核打击的前奏曲。

◆ 林彪派系急剧膨胀

从6月20日到7月4日，军委办事组召开作战会议，出席会议的包括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以及来自三北地区四个大军区（沈阳、北京、兰州和新疆）主管作战的负责人，商谈如何对付苏军入侵。7月2日，林彪出席会议时，指示“酒泉和包头的核燃料厂必须在1970年前搬迁到三线地区”，一度搞得核工业部门人心惶惶。

6月，毛泽东命令军委办事组举行座谈会。他告诉将领们“就是核战争也没有什么可怕。中国地广人多，苏联丢几颗原子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接着说“何况我们也有原子弹”。会上，办事组为国防建设计划“定下了盘子”：1969年战备费用比上年猛增34%，1970年、1971年又各自在上年基础上递增15%和16%。

从6月中旬到7月上旬，总参召开了全军战备通信工作会议，研究如何确保战时通信畅通、通信保密。接着，总参又命令通信兵铺设一个全国地下电缆网。

毛泽东尝试引导华盛顿在中苏冲突中作出偏向中国的姿态。他嘱咐周恩来在本年度杜鲁门决定在台湾海峡部署第七舰队的周年时，要以沉默而不是强烈抗议对待之，不要突出宣传反对美国干涉台湾的活动。

他决定大幅度裁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机构官员，21万名官员从北京被遣

送前往各地五七干校。他还批准由空军、海军及总参、总后等直接接管国防工业口的第二至第七机械工业部以及中央气象局、国家测绘总局。

◆ 全国战备趋于白热

6月30日，高级将领在军委办事组座谈会上要求大大增加军械工业的资金。总后部长邱会作（兼任副总长和政治局委员）表态同意，并主张对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弃之不顾。国家计委官员袁宝华和顾明力劝周恩来不要让别人破坏那条指导方针。周恩来生气地说：“什么有计划按比例！（战争）需要就是计划，打仗就是比例。”

6月，北京命令各省、自治区成立战备领导小组，在各自辖区的战略后方即“小三线地区”制造轻武器，督促战争动员和民防工作。全国战备处于紧急气氛中。

在若干省份，派性武斗妨碍了战备工作。7月23日，毛泽东批准发表中共中央布告，要求山西省两派群众组织解散武斗组织，上缴武器，拆除一切据点。解放军出动小分队，强迫收缴武器弹药，不久派性武斗停息了。中共中央又将这份布告传达到其他省份照办。在边远省份，效果不彰。

夏末，中国战备工作已趋顶点，而强调美国军事威胁的文章却几乎从媒体销声匿迹。7月11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签署的一份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研究报告交给了周恩来，他们在报告中得出了结论：“苏修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帝大。”军委已经把战略使命讲得清清楚楚：“当前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苏修，要把苏修放在第一位，把重点（从对付美帝）转到对付苏修方面来。”毛泽东的战略预言实现了，中国战略防御方向就剩下一条北方战线了。

◇ 军事危机升级

这年，美国修改了对中国的贸易管制条例，启动了缓和中美紧张关系的过程。7月，尼克松总统要求巴基斯坦总统向北京转达他的观念，即“美国不应该参加任何旨在孤立中国的安排”。周恩来注意到了这些信号，不过他没有高估它们的意义。更令人信服的变化迹象直到那年秋天方才到来。

◆ 解放军分队遭全歼

几个月以来，苏联领导人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讲话，指责中国阴谋对苏联发动核突袭。由于他们清楚中国并没有向苏联发动核突袭的能力或意图，中国安全专家得出结论，即莫斯科有意通过这种指责让世人作好苏联要发动核突袭的心理准备。“熊向晖在《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中共党史资料》第 42 辑，1992 年出版，第 65 页。）中表示困惑：为何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相信两国之间的军事摊牌为期不远了，却对莫斯科诉诸这种宣传手段的真正用意掉以轻心。”

8 月，中、苏军队在新疆境内爆发了一场小战斗，双边关系急剧恶化。早在 4 月，毛泽东鉴于苏军上月在珍宝岛同解放军发生的两次冲突中吃了大亏，通过军委办事处警告新疆军区，苏军在两国边界东段吃了亏，可能会想在两国边界西段的冲突中捞回来，务必警惕。

7、8 月份，新疆军区部署在前沿的一个情报站发现苏军在边界对面调动频繁，电讯剧增，判断近期苏军会有异动，于是向军区作战部作了汇报。军区司令龙书金 4 月在北京拜访林彪时，林彪向他交了底，认为中苏不可能爆发大战，所以他没有重视这份情报。8 月 13 日，苏军在新疆境内铁里克提伏击全歼了解放军一支巡逻分队，打死 38 名官兵。数天以后，毛泽东授权军委办事处发布命令，向全体担任负责职务的军官发出警告，违令者将给予严惩。

◆ 莫斯科实施核讹诈

事态发展迫使北京体会到了莫斯科“核讹诈”的巨大压力。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闪烁其辞地宣称，为了“惩罚”中国，将不排除发动核突袭。苏联外交官则轮番地接近美国智库人士，尝试就美国对苏联轰炸中国核设施的反应进行摸底。8 月 27 日，外电报导，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向记者透露，“苏联可能就它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问题，向其东欧共产党同伙进行试探”。9 月 16 日，一位有克格勃背景的苏联记者路易斯在《伦敦晚间新闻》上发出了苏联可能对中国核设施发动核突袭的试探性的警告。

至此，中南海认为，上述警告决不仅仅是虚张声势。8 月 28 日，毛泽东批

准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人民防空全国领导小组，由其设在总参作战部的办公室承办日常工作。全国深挖防空洞的热潮随之而来，说明北京认为苏联对中国的空袭可能迫在眉睫。同日，毛批准公布中共中央命令，号召边疆军民要准备打仗。这项命令措辞严厉，要求立即停止派性武斗。同日，军委命令三北地区所有作战部队处于紧急战备状态，在战略要地和关键部门赶修足以防御核突袭的地下设施。

毛泽东指示总参重新评估苏联究竟有否可能发动突袭。总参在报告中表示，苏联发动突袭的“可能性不很大”。其他高级助理却告诉他，苏联在历史上向来有对敌国发动突袭的前科，苏联在上年入侵捷克就是例证。稍后，他对情势的演变趋向作出了悲观的估计。

◆ 中苏高层机场谋和

9月3日，越南主席胡志明逝世。周恩来飞赴河内吊唁。由于中国备战活动紧迫，周恩来没有在河内过夜，顶着雷雨的气候冒险返国。据前空七军政委焦红光回忆，由于雷雨天气作祟，最终周未能在当晚赶回北京，专机降落在南宁，周在当地下榻。

苏联也为中苏箭在弦上的战备活动感到忧虑，推举柯西金出面同中国人接洽。他向北京转达了苏联对外交谈判的兴趣。他也赴越南出席了胡志明的追悼活动，盼望在河内能遇到周恩来进行交谈，却没有消息，他只能登机返国。在回国途中，他收到北京发出的通知，中方同意在北京机场与他会谈。9月11日，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议室同周恩来展开了为时3小时40分钟的会谈。双方讨论了诸如采取有效措施以避免边界冲突继续发生、两国大使返任以及双方为解决边界纠纷举行谈判等问题。北京机场会谈，对于制止这两个国家滑向一场核大战的深渊，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开端。

中国领导人曾经怀疑柯西金专机上可能运载着苏联特种兵，准备夺占北京机场，就像1968年8月苏联袭击捷克之初发生的情况。当柯西金的专机仍在空中飞行时，军委调动接受过特种训练的几个营保卫北京机场，还挑选了一批会武功的官兵驻守在机场跑道和大楼的周围。最后证明只是一场虚惊而已。

◆ 毛忧虑苏军核突袭

9月16日、18日和22日，政治局相继开会，对机场会谈进行评估。他们对下列现象感到忧虑：为什么周恩来向柯西金提出关于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核突袭的问题，柯西金却不置可否？为什么柯西金的专机在莫斯科机场着陆时，苏联领导人都不去机场迎接？为什么周恩来在9月18日写给柯西金的密信中提出了关于双方承担不使用包括核力量在内的武力进攻对方的义务的建议，苏方却迟迟不回答？这说明苏共政治局并未批准柯西金作出的关于缓和关系的若干承诺。

其他迹象似乎也在证明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核突袭。首先，苏联军方刚任命一位前战略火箭军副司令为远东军区司令。如果考虑到苏军鉴于在今后中苏爆发战争时，苏军要靠战略导弹打头阵，需要先派一位熟悉导弹进攻战略的将军到与中国对峙的远东军区压阵，这项任命就具有特别的意义了。其次，不久前，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指出，苏联战略火箭部队“随时准备立即行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他的话可能是意有所指的。这些迹象与前面提到的路易斯在9月16日发表的特别具有煽动性的文章联系起来，令人不寒而栗：莫斯科确实包藏祸心，“亡我之心不死”。

中国领导人认为，假若苏联企图发动突袭，从军事角度分析，难道还有比中国国庆节或者稍后苏联谈判代表抵达北京时更好的攻击时间吗？

前述四位元帅再次进行研究，写出一篇题为《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报告，在9月17日报送周恩来。他们认为：当前苏联“最大的战略顾虑”就是“它对中、美可能联合的担心”。他们赞成在同苏联举行边界谈判的同时，考虑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以牵制苏联。

◆ 毛认为美国靠不住

毛泽东同意这四位元帅的判断，不过，他对美国是否会直接介入迫使苏联罢手，仍持怀疑态度。他指出，“这个美国，按照过去两次世界大战的规律，它都是要别的国家先打，打个两年后它才动手，它才参战。”

从8月下旬到10月，军委将若干野战军从南方调往三北地区。例如，27军在8月下旬奉命由江苏无锡调至河北张家口附近的宣化、延庆，以增援驻军6

5 军，因为张家口是蒙古至北京之间的唯一的天然屏障，张家口以南就无险可守了。空军又在张家口部署了配备红旗二号地对空导弹的几个防空导弹营，以加强当地空防。10月，军委又将 28 军由福建调往山西，坦克第 9 师、高炮第 67 师分别由江苏、山东调往山西，24 军由河北唐山移防承德、63 军从河北调至山西、69 军从山西太原往北移防大同。

军委采取一系列扩军的非常措施。1969 年，军委新组建了三个陆军军部、18 个步兵师，并且在步兵师的三种建制（甲种大师、乙种中师、丙种小师）中取消了丙种小师，原来的丙种小师都补充了官兵人数，升等为乙种中师，步兵人数增加了 20.9%。军委又将原本附属于步兵师的多数坦克团改编为坦克师或者坦克独立团，以便在华北平原上迎战苏联装甲部队。工程兵部队由 16 个团增至 34 个团，其中多数调往三北地区赶筑地下掩蔽所。

毛泽东仍嫌战备工作不够扎实。9月 17 日，中国各大报刊均在头版刊登庆祝建国 20 周年的 29 条口号，其中第 22 条口号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这条口号不算标点符号，也有 82 个字，已经不成其为口号了，而是向全国发布的紧急指示了。他在这一条口号中强调：全世界人民“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这反映了他对迫在眉睫的中苏核大战的评估。

◇ 全国进入最高战备状态

在整个 9 月乃至 10 月初，对苏军动向的情报分析加强了北京的信念，即苏军正在准备对中国重要目标发动打击。尤其在核导弹危机期间，毛泽东、林彪等人比较相信这些耸人听闻的情报。

◆ 苏联缺乏谈判诚意

9 月 20 日，军委召开由各个军区、军兵种司令和政委参加的全军战备工作会议，再次讨论对付苏军突然袭击的措施。22 日，周恩来对高级将领们说，“准备打仗，这是一个新的战略部署”。随后数日中，会议厅中最常听到的言辞是“苏联袭击即将来临”。

迟至 9 月 26 日，柯西金才对周恩来 9 月 18 日的密信发出回信。他在回信

中建议两国自 10 月 10 日起在北京谈判边界问题。中方认为，他在信中仅闪烁其词地表示“苏方已经指示边防部门保持同中国边防部门的正常关系”，显然从机场会谈时双方达成的谅解的基础上倒退了。中方认为苏方可能在谈判的烟幕下策划一场突然袭击。

9 月 27 日，毛泽东在接见刚出席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的高级将领时说：“不留同志们在北京过国庆节了，大家回去抓紧做好战备工作。”林彪指示与会者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林彪指示总参绘制了一张三北地区要图，挂在他的客厅里。他时而手拿指示棒，在图上指指点点，时而伫立在图前沉思冥想。

◆ 核爆犹如暮鼓晨钟

毛泽东下令在国庆节前进行一次氢弹试验，以显示中国领导人保卫祖国的决心和中国拥有的物质力量。在他心头，苏军可能发动突袭的阴影显得越来越大。他想到了核弹吓人的作用。他重申，“既然核弹是吓人的，自然应该尽早爆炸”，又说“当量也应该大一些”。他向来喜欢豪赌，认为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引爆一颗大氢弹，无异于向莫斯科传递一个信息，倘若逼人太甚，中国不惜闹得个鱼死网破的结局。

9 月 23 日，核武器研究设计院和二机部奉命进行了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六天之后又爆炸了一枚当量达 300 万吨级的氢弹。尤其是后者，犹如暮鼓晨钟，给莫斯科的狂热分子当头浇了一桶凉水。不久，以苏联境内各战略要点为目标的配备氢弹头的中国地对地导弹增加至 50 枚。克里姆林宫中几乎没有人会对此无动于衷。

9 月 29 日，中国外交部“口头通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建议将边界谈判开始的日期从 10 月 10 日推迟到 10 月 20 日。这是为中国的军事调动争取充裕的时间。

9 月 30 日，林彪把军委办事组几位负责人召来开会。他说：“这个仗看来八成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他指着地图说：“敌人从外蒙下来，直下兰州、西安，全国震动。”同日，林彪还命令空军立即将绝大部分军机从北京附近机场疏散到外地机场。他还认为北京市郊的三大水库犹如三大盆水，

高悬在北京上空，一旦苏联击毁了水库的大坝，就会淹没首都。同日晚，他要求北京市尽快把这三个水库的水排泄出去。周恩来认为仅在一天内就把水库的水排泄出去，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同苏联击毁水库大坝的后果相同，何必多此一举呢？所以他出面中止了林彪指示的执行。稍后，在 10 月 18 日晚，即林彪向总参发布紧急指示的当晚，林又嘱咐秘书指示副总长阎仲川采取措施把密云水库的水排泄出去，周恩来再次出面制止。

◆ 林彪骑马，江青开车

毛泽东身边的人士劝他不要在国庆节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他却执意要上城楼。军委办事组采取非常措施，以策万全。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率领来自情报部和作战部的军官们，携带一部无线电台登上城楼，随时接收最新的空防警报。一架直升机停留在天安门城楼后面的空场上，随时准备紧急疏散毛泽东、林彪等人撤往西郊防空设施。

在一片肃杀的备战气氛中，即使在领导层，也难免人心惶惶。他们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采取了必要措施。平时林彪很少步行，连坐汽车的机会也不多。这时，他却在住宅的后院练习骑马，以便在尴尬的情况下骑马逃逸。有人说，林彪这么做，是为了恢复过去在战场上指挥三军的英雄气概，战时可以重返战场。可是，林彪在辽沈战役中，也很少骑马，经常坐汽车。这时林彪年迈，身体健康状况又差，却开始练习骑马，自然是想对不测事件有所准备。

江青则在她位于钓鱼台的住宅院内修建了一座防空洞，总后部长邱会作督率抢建完工。防空洞建成以后，放置了食品和饮水，她还去观看了几次。江青还抓紧时间，学习如何驾驶汽车，以便在“与苏军突击队遭遇时”，在司机、秘书、警卫均被杀伤的情况下，自己也可以驾车逃脱。

10 月，毛泽东为了确保中央统率机关在战时的安全，批准将中央警卫局精简改编为警卫处，在军队序列中升格定为军级单位，并且将警卫处与警卫团合二为一。毛泽东以及其他五名政治局常委的警卫部队实行战时编制，反映出北京领导人的危机感。

◆ 绝密情报导致误判

国庆节过去了，苏军没有打过来。军方认为，苏军终究还是要打过来的，以有备无患为妥。10月5日至7日，林彪赴张家口视察防务。

对于中国外交部建议将边界谈判开始的日期推迟至10月20日的“口头通知”，迟至10月14日，柯西金才发出复信，通知苏联政府谈判代表将在10月20日前抵达北京。这个迟到的答复使得中国领导人关于危机爆发的日期又有了新的看法。

10月中旬，毛泽东收到一份情报，声称苏军将在边界谈判的烟幕下于10月20日大举入侵中国。紧接着，一份触目惊心的情报又自莫斯科发出，断言苏联工程师正在秘密改装那架运送苏联代表团到北京来的专机，使之能够装载配备核弹头的空对地导弹。苏联代表团前来北京是为苏军突袭打烟幕弹的目的似乎不言而喻了。当中国驻东欧某国大使馆从侧面“证实”了苏军发动核突袭的具体日期以后，毛泽东就毋需更多的证明来作出判断了。

他究竟在何时获悉以上三份关键性的情报？中国资料没有提到。林彪在张家口逗留至10月7日，毛不可能在此之前收到这些情报，不然，即使林彪去了张家口，毛也会把他紧急召回北京。毛在10月15日决定前往武汉避难。鉴此，这些情报可能在10月8日至15日期间被凑齐送到他的办公桌上，最紧急的那份情报可能是在14日呈交给他的，因为正是这份情报促使他决定在次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商议应急措施。

◆ 林彪不涉紧急疏散

毛泽东多次说过，“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这时，他的态度变了，授权林彪在10月15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对策，并由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他的指示：“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毛指示，多数中央领导人必须在10月20日以前离开北京。至于应变步骤，政治局赞同毛的决定，毛避居武汉运筹大计，林前往苏州策划军事，周恩来留京主持全面工作，中共中央、军委、国务院核心机构迁往西山地下指挥部维持日常运转。

老干部被疏散离开北京，与数日以后军委前进指挥所发布的“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完全无关。况且，在这个命令发出之前，刘少奇、陶铸以及一批遭受关

押、审查的领导人已经被各专案小组“迁出北京”了。不少老干部被疏散出了北京，阖家吃了苦，怨恨在心，又不敢嗔怪毛泽东，况且对当时的决策流程也不清楚，只能把这口怨气出在林彪身上了。

据当时担任中央警卫局长的汪东兴说，10月16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远赴武汉。起程前，他正在吃饭，江青来了，要服务员拿碗筷，想与毛一起进餐。毛说：“来不及了。我吃了饭就要走。你要吃另外再搞一点吧。”江青碰了一个钉子，很不高兴地走了。毛为了尽快离开北京，都顾不得同妻子一起进餐了。毛泽东毕竟是现实主义者，此刻他浮想联翩，对于即将悬浮在北京上空的核蘑菇云，他是避之唯恐不速的。

同日，林彪夫妇飞离北京经江苏硕放机场转乘汽车赴苏州居处南园。林彪秘书张云生提到林彪在10月17日抵达苏州，不确。据当年主持接待林彪的苏州市革委会外事组负责人黄厥明在《关于林彪及其死党叶群来苏活动情况的揭发》（1974年5月）中指出，林彪在10月16日抵达苏州。

周恩来、黄永胜、江青将留在北京。周受权主持危机处理；黄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而江青则自告奋勇留下，随时为毛提供消息。

◆ 总参前指移往地宫

10月16日，毛泽东授权军委办事组组建战略后备队，由43军、47军、空降15军和若干个坦克师、炮兵师和防空师组成。军委着力提高这支反突击力量的机动性，用来对付苏联入侵作战的“三板斧”（核武器突袭、航空兵和炮兵夹击突袭和坦克集群突袭）。

同日，总长黄永胜会见副总长阎仲川，命令他成立总参前进指挥所（前指），作为军委在战时的作战指挥中心。阎原任广州军区作战部长。1968年，黄从广州军区司令调任总长，次年5月他把阎调到总参，擢升为副总长，主持总参作战系统（由作战部、情报部、技术部、通信部和机要局组成），成为黄的得力助手。

前指大多数军官均来自作战部，并由作战系统其他部门的军官给予充实。10月17日，阎仲川率领前指人员撤往设在京郊西山山脉百望山底下的全国战时指挥中心。前指神经中枢在于这批作战系统的精华。这座地下掩蔽所堪称“地宫”，

甚至经得住核弹爆炸。不足之处在于，当年通风条件不佳，人们在里面稍微待久了，就会觉得气闷。

稍晚，黄永胜率领军委办事组其他负责人来到前指。黄住在位于百望山顶峰的一幢建筑物内，在他居所外侧的会议室则成为前指负责人开会的场所。他们有事没事，经常来此聚会。阎仲川自己住在百望山脚下，黄永胜或其他前指负责人有事召唤，他即刻可以乘坐汽车沿着盘山公路来到黄的居所。

与此同时，国务院、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应变工作班子也开始疏散到它们设在京郊西山象鼻子沟的地下掩蔽所内，党、政两套临战班子开始运转。国务院和中共中央设在百望山底下的“地宫”，与总参前指相距不远，规模之宏大，互为伯仲。

◆ 苏核弹战备未升等

中、苏两国冲突一触即发。总参前指迫切需要准确的军事情报。总参情报部、空军情报部要不断向前指提供最新情况。这些情报机构获悉部署在苏中及苏蒙边境的苏军三个地对地导弹师已经加强了防护措施，误以为这是苏联战略火箭军提高了警戒级别的征兆。

苏联战略火箭军共有四个警戒等级：第一等级是经常性的警戒（P o s t o y a n n a y a）；第二等级是经过加强的警戒（P o v y s h e n n a y a），在这个基础上，导弹部队很快就能进入临战状态。苏联战略火箭军曾经两次进入第二等级的警戒，一次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另一次是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期间；第三等级是处于临战的警戒状态（Voyennaya opasnost），导弹部队被置于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可是尚未处于可以立即发射导弹的状况；第四等级是导弹部队处于可以立即发射导弹的警戒状态（P o l n a y a）。苏联军方从来没有将苏联战略火箭军置于第三、第四两个等级的警戒状态。

苏联战略火箭军的经常性警戒状态包括一种名为“关切”（n a s t o r o z h e n n o s t）的特殊状态。外国情报部门经常误以为这种特殊状态就意味着警戒级别已经提高了。假如导弹部队被置于这种特殊状态中，导弹基地指挥官及其参谋们将停止住在基地外的住所，而是住宿在基地内，但是导弹武器既不移动也不予提高战备状态。中国和西方国家情报部门未能察觉这些细微差别，以

致往往由此认为苏联战略火箭军已经进入全面战备的状态。

关于苏联战略火箭军已经进入全面战备状态的报告引起了中国领导层的惊慌。林彪独子林立果刚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10月17日公布命令）。他在解释为什么苏、中两国几乎同时将其战略导弹部队置于警戒状态时说：“很可能双方都搞不清对方的意图，都担心对方先动手，人为地制造紧张空气。”

◇ 林彪第一号号令之真相

毛泽东、林彪为了暂避假定会入侵中国的苏军的锋芒，已经从北京先行撤退到了武汉和苏州。此时，林彪受权全面处理军委工作，他极度担心那份绝密情报会成为事实（运载苏联谈判代表的专机在10月19日接近北京上空时会向北京发射那枚空对地核导弹），为之梦牵魂绕。他在抵达苏州的第三天，即18日下午五时许，向秘书张云生口授了一份发给总长黄永胜的紧急指示。

◆ 林彪指示防备突袭

这份指示题为《关于加强备战，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主要内容有六条，包括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在北京开始同中方会谈，全军作战单位要做好应付突袭的准备；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重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经常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要置于全面警戒状态，准备随时发射导弹；各级司令部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等。林彪在接受秘书对导弹发射要加以严格约束的建议以后，又强调任何导弹的发射必须获得毛泽东亲自批准。

林彪遵照惯例，吩咐秘书将这份指示先搁置一下，在大约两小时以后再用保密电话传达给总长黄永胜，以避免决策匆忙会产生失误。同时林彪妻子叶群对秘书说，她将亲自向毛泽东汇报这份新指示。据这位秘书说，叶群18日晚确实在电话中向随扈在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口头报告了林彪指示的六条内容，叶群的报告比秘书向黄永胜传达的时间要稍早一些。后来叶群说，当时毛泽东对林彪的指示没有表示意见。

不过，关于稍后总参前指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名义将林彪指示发布给全军这件事，林彪夫妇却是在次日才向毛泽东汇报。问题在于，在前指决定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名义将林彪指示发布给全军的时候，连林彪、黄永胜都不清楚前指会使用这种犯忌的名义。林彪夫妇就此事向毛泽东汇报的次数和具体时间，至今还存疑。

在北京决定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一案时，为了查清林彪夫妇是否在事前向毛泽东汇报过将由总参发出林彪的这份紧急指示，据称由 14 名师级军官组成的一个军事检察小组获准前往中南海毛泽东档案室搜证相关材料时，发现了一份关于林彪夫妇在电话中向汪东兴汇报这件事的书面记录材料。可是，就连为林彪翻案辩护的人士迄今也找不到任何证据，表明林彪是在毛泽东专项指示下，决定向黄永胜传达他的指示，或者林彪在向黄永胜传达他的指示前曾经请求毛泽东予以书面批准。无论如何，由于林彪犯了大忌，已经铸成大错。

当晚八时许，黄永胜接到林彪的指示以后，即在他位于前指山顶的寓所命令副总长阎仲川把该指示用保密电话传达给所有军区。阎仲川回到作战值班室以后，觉得林彪指示中的六条内容分别涉及不同的军事部门，尤其是关于二炮将核导弹置于随时可以发射的待命状态的命令过分敏感，出于保密的需要，决定将这六条内容改写成四条独立的号令，口授给几位参谋分发出去。

阎仲川又认为这四条号令是总参前指成立以来首次发出的号令，于是他决定把它们从一到四编成四条单独的号令。在场的一名作战部副部长建议，将第一号号令命名为《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最终在政治上给所有涉及草拟和发布号令者带来灭顶之灾。

◆ 前指命令发往全军

阎仲川草拟妥当这四条号令以后，嘱咐一名参谋把号令文件呈交给黄永胜签发，可是黄已经吃了安眠药入睡了。此时是晚上九时半。鉴于苏联谈判代表乘坐的专机（亦即所谓“装载空对地核导弹”的那架飞机）已经升空，十几个小时以后将进入中国领空，阎认为再不采取行动，为时太晚了。他命令下属发出了未经黄签署的这四条号令。

在中国军事史上，这四条号令具有特殊地位，因为这是北京首次也是迄今仅

有的一次将其核导弹部队置于全面警戒状态。这个史无前例的号令及其执行的结果势必会影响到最高决策体系对战略核武器的有效控制以及使用这些武器时的效果。第一号号令全文如下：

第一号号令

1969年10月18日21时半 林副主席指示：

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19）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19、20日应特别注意。

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

三、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防止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

四、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40〔毫米〕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座力炮和85〔毫米〕反坦克炮）。

五、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执行情况，迅速报告。

◆ 核弹导弹一级战备

第一号号令主要是发给各大军区和海、空军的。至于第二号号令即林彪指示将二炮置于一级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发射核导弹的命令，阎仲川认为应该将这个号令的内容从第一号号令中排除，单独发布，因为第二号号令在执行以后，内容可能会泄密，让世人受到惊吓。实际上，他倒不用担心泄密，因为它的内容迄未公诸于世。

前指甚至没有将第二号号令抄送其他军事部门和军兵种，因为它的内容高度敏感。前指要求二炮报告执行这条号令的情况，然后由前指转呈军委。

为了全面落实林彪的六条指示，阎仲川还草拟了第三号、第四号两条号令。他指示，向总参情报部、技术部发出第三号号令，要求分别负责军事情报和电子信号监控的这两个部门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搜集情报以及监控电子信号；同时又给总参、总后、总政、各兵种司令部、国防工业办公室和国防科技委员会发送

了第四号号令。第三号、第四号两条号令都对各个部门的战备要求作出了规定。这两条号令远不如第二号号令那么机密，可是具体内容至今尚未面世。

前指首先把这四条号令发给位于北京毛家湾的林彪办公室，将总参是如何落实林彪指示的情况反馈给林彪。当天 21 时 44 分，在向林彪办公室递送这四条号令以后不足 15 分钟，林彪办公室通知前指已经获悉这四条号令。

阎仲川指示将第一号号令稿复印数份，嘱咐他在总参作战部的助手们，包括一位作战部副部长、一位副处长和几名参谋，同时使用四部保密电话传达第一号号令。首先传达给三北地区的四个大军区（北京、沈阳、兰州和新疆军区），然后再传达给其他大军区以及海军、空军和北京卫戍区。毛泽东早已提高了北京卫戍区的规格，置于其个人控制之下，与北京军区级别相同。所以，这条号令直接传达给北京卫戍区，而不用通过北京军区转达。

稍后，他们用保密电话将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号令分别发给二炮（第二号）、总参情报部和技术部（第三号）以及总参、总后、总政、各兵种司令部、国防工业办公室和国防科技委员会（第四号）。

林彪曾经担心苏联就像上年入侵捷克的情况一样，这次又趁其谈判代表团专机在北京东郊机场降落时，出动突击队抢占机场，为大规模机降部队开辟道路。为此，前指还命令北京卫戍区在北京东郊机场附近部署两个营，应付突发事件。

◆ 警戒暴露数大弊端

前指传达四条号令耗时两个多小时。据称，阎仲川自己也不能确信他已经领会了上级指示的全部精神。譬如，黄永胜仅将林彪发出的六条指示口授给他，他应该仔细对照复核林彪指示的抄录件以后，再着手草拟四条号令；况且，他本来还需要经由黄永胜批准签发，才能发出这四条号令。

尤其重要的是，阎仲川不应该听任总参作战部一名副部长在向全军发布号令时，将第一号号令冠之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名义。孔子曰：“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当时，唯有军委主席毛泽东有权调动全国五六百万军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唯有毛泽东才拥有向全军发出“第一号号令”的资格。如果“第一号号令”由林彪发布，置毛泽东于何地呢？这在政治上是相当敏感的。

当时阎鉴于总长黄永胜刚服下安眠药睡觉，恐怕黄被叫醒以后发怒，就擅自

批准发出这四条号令，他就没有考虑到毛泽东获悉前指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名义调动全国数百万军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以后的内心感受。这个行为不但违反了军委对于重要命令的核发程序，而且会导致毛泽东对林彪产生嫉恨。结果，黄永胜、阎仲川都为他们的草率行为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尽管对他们的打击大约在两年以后才开始付诸行动。

◆ 周恩来被蒙在鼓里

各大军区和海军、空军对第一号号令作出有条不紊的反应，位于三北地区的四大军区的表现被视为典范。其他大军区的运转效率也颇高。例如广州军区司令丁盛在 18 日深夜 23 时 15 分接令以后，立即开会传达，迅即将号令传达给辖区各个野战军、广州军区空军和南海舰队，立即执行。同时，丁盛率领军区指挥班子进入地下指挥中心，昼夜督促各部队执行号令。19日凌晨 1 点 40 分，丁盛用保密电话向前指报告了执行情况。

值此期间，最高决策体系的运转颇成问题。例如，毛泽东刚授权周恩来在危机期间主持中央全面工作，无论军委办事组或者前指却根本没有考虑到，必须把这个号令通知给周恩来，更没有想到在事前要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他对这个号令的发布及其内容茫然无知。如今知情者猜测，从最良好的愿望着眼，当时军委办事组可能由于这个号令只涉及军队的动员及行动，并不牵涉各级政府，所以疏忽或者绕过了周恩来。

◆ 绝密命令见诸街头

文革期间独特的政权体制也决定了在第一号号令的执行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弊端。当时，几乎中国所有的军区司令或者政委均在省级行政机构——革委会——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军区司令或者政委在向军区负责人传达第一号号令的同时，也向省级革委会负责人传达了这条号令。地方干部和群众组织头头身居革委会要职，获悉这条号令以后，难免泄露出去。况且，红卫兵和造反派也不可能对大规模军事调动视而不见。

例如，在云南省，群众组织居然把这条号令的一些内容抄录下来，以大字报的形式贴在大街的墙上。接踵而来的自然是有关中苏两国即将开战之类的传言在

民间广泛传播。各级地方政府感到困惑，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汇报关于民间对这条号令的传言。

◆ 毛林之间产生嫌隙

至此，周恩来开始清楚总参前指已经发布第一号号令及其产生的纷扰了。他同随扈在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联系以后，很快明白了前指发布这条号令的程序必然导致潜在的危险，以及毛泽东本人不满意军方此举的态度。

毛泽东确实知道林彪六项指示的内容，但是他在当时也不清楚前指是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形式向全军传达林彪的紧急指示的（前指发布这个号令时，连林彪、黄永胜也不知道这个号令是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形式发布的）。他在阅读汪东兴呈递的关于这条号令的文件以后，对汪说，“烧掉”。汪还不动手，毛索性自己用火柴点火烧掉了这份文件，接着连装这份文件的信封也要点火烧掉，被汪劝阻。当然，毛城府极深，喜怒不形于色，不愿意在汪面前将自己对林彪的不满和怀疑暴露无遗。可是，毛的异常反应毕竟体现出他对林彪及其下属举动极端厌恶。

19日晚，周恩来紧急召见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其他四名成员，试图了解这条号令发布的背景及其前因后果。周恩来冷峻地问道：究竟是何人把林彪的指示命名为《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既然总参前指把林彪的指示命名为第一号号令，那么下次再把谁的指示命名为第二号号令呢？为什么总参居然容许绝密的号令内容出现在街头大字报上呢？不过，他并没有针对林彪紧急指示本身提出质疑。

诚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明白，最危险的敌人是即将闯至北京城下的苏军，而不是林彪派系，何况，目前还需要军方支撑危局，不宜在这件事上挖得过深。尽管如此，毛泽东再也不会充分信任林彪了。

林彪在1971年死于一次空难之后，第一号号令的发布背景和过程就被贴上了“林彪反革命政变的一次预演”的标签。1986年之前，中国官方出版物对此还没有出现过比较客观的评论。1986年，官方出版物承认林彪是在遵循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以后方才发出他的紧急指示的；况且，是作战部一名副部长而不是林彪本人或黄永胜、阎仲川把他的指示称作《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

◇ 第一号号令的实施

当时总参把军事情报递送给林彪的程序比较繁复。总参情报部、技术部把搜集到的情报经过整理以后，报送总参作战部，作战部再报送位于北京毛家湾的林彪办公室，林彪办公室再报送给林彪在苏州的官邸。这样至少费时一两天。

林彪比较依赖于雷达以及侦察机搜集到的情报；而且其子林立果在空军比较有影响力。于是他要求空军情报部直接往苏州报送情报。他还要求总参情报部、技术部把情报直送苏州，而不要通过繁复的中转程序。

◆ 导弹部署摆大乌龙

据林彪一位秘书回忆，当林彪指示总参命令核导弹部队“准备随时发射导弹”时，他是将射程为 2 6 5 0 公里的东风三号中程导弹包括在内的。显然，根据过去来自主管导弹科技工业的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相关报告，他估计这种导弹应该已经在二炮部署了，实际上这种导弹离部署还差 1 8 个月呢。当时二炮只部署了射程为 1 2 5 0 公里的东风二号甲近程导弹，瞄准了苏联远东地区的各个战略目标。

总参立即向林彪报告：迄今二炮仅部署了东风二号甲导弹，还没有部署东风三号导弹。林彪指示对于理解各大国处理核危机的模式是有启迪意义的，因为这反映出它们在面临敌国核打击时往往是诉诸极端手段的。林彪指示也令人体会到中国和其他国家至今可能仍然存在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最高领导人对于其可以支配的最致命武器的了解可能只是有限的。

10月19日，林彪仍然贯注于苏联谈判代表团专机的动向，他一直在担心前述那份绝密情报最终会成为现实，即苏联工程师已经改装了该专机，能够携带空对地核导弹。林彪要空军情报部每隔数分钟就向他报告该专机的新动态。为此，林彪甚至推迟了他的午睡时间，直到苏联谈判代表团成员抵达北京机场并乘车离开机场，他才放下心来。

◆ 毛周恢复掌控军委

苏联谈判代表团抵京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着手削弱林彪的权威。10月2

0 日, 周恩来驱车前往总参前指, 代表毛泽东对军队实行指挥和控制, 介入了军委办事组在危机过程中对军事行动的指挥。他命令总参情报部每天早晨八时前向他书面汇报过去 24 小时发生的情况。

林彪的权力逐渐受到了侵蚀。10月22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布题为《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的文件, 下达全军执行。这份文件指出, 解放军调动团以上部队, 必须上报毛泽东及林彪批准; 在中苏、中印边境地区, 凡是作战行动, 无论规模大小, 均需报中央军委经毛泽东、林彪或者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以后方可付诸实施。

显然, 毛泽东正在对林彪以及总长黄永胜主持下的军委办事组进行削权, 旨在从林彪及其下属手里拿回调动任何团以上部队的权力。林彪再也不能单独发号施令了。

林彪自以为在战争年代中, 他勇于负责, 能自主作出决定, 毛泽东时常予以容忍。他以彼况此, 认为毛不会在总参发布《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这件事上惩罚他。他不清楚, 在战争年代中容许发生类似权宜之计的事情, 在和平时代就未必容许发生。

何况, 正如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回忆录中指出的, 在文革中, 充斥着诡秘莫测的拜占廷宫廷政治。就连整天在毛泽东身边伺候的中央警卫局长汪东兴在政治上失意时, 尚且免不了对亲信发牢骚: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人家抓起来。”与此对照, 既然毛泽东已经怀疑林彪的动机, 林彪岂会有好下场呢?

◆ 风餐露宿部队不满

再回到中苏危机的演变进程。从10月20日起, 中、苏两国代表团在北京开始边界谈判。一周以后, 林彪认为苏联已经失去进攻中国的最佳时机, 战争爆发的危险性消退了, 他开始从他制定的危机应变措施中后退。他对军事情报再也不感兴趣了。

11月12日, 军委在题为《高度加强戒备防止苏修突然袭击》的命令中指出, 中苏边界谈判五十多天毫无进展, 目前三北地区江河封冻, 装甲车辆皆可通过, 是苏联发动突袭的最有利时机, 要求一线部队严加戒备。11月18日, 苏联又在同新疆接壤的地区新建立了中亚军区, 苏军对新疆发动肢解性战争的可能

性日益凸出, 同时中亚军区与远东军区也形成了对中国进行夹击的严峻态势。军委决定在全国所有县份建立民兵独立团、独立营, 以便为野战军提供源源不断的兵力补充。

正如我们在文末将要详细阐述的那样, 其时美国介入中苏纷争, 也对苏联起到了战略性的牵制作用。稍后, 中苏紧张的对峙局面有所缓解。

至此, 全军有近百万人、数千架战机、数百艘舰艇卷入疏散行动。1 2 月月中, 在三北地区实行疏散的部队已经在严寒中餐风宿露了近两个月。若干野战军从南方调至西北, 有的地方饮水中有超过指标甚多的氟, 致使很多指战员患上大脖子病。又如 4 7 军从湖南省调到兰州以北一条山脉驻防, 南方士兵不习惯吃窝窝头、土豆, 长期下来, 搞得精神不振。官兵们认为, 既然战争没有发生, 又有何必要长期在野外遭罪呢? 官兵牢骚与日俱增。

鉴于苏军突袭迄未出现, 各部队以反映指战员的情绪为由, 开始要求军委同意部队返回营区。据林彪秘书回忆, 林彪是同意部队返回营区的。林彪指示秘书打电话通知总长黄永胜: “我看部队可以停止疏散了。”这时, 其妻叶群劝阻丈夫发出这项指示。叶群说, “疏散出去没风险, 过早收回来就有是非。如果现在就把部队收回来, 一旦战争爆发, 这个责任谁来负?”在林彪的政治影响力开始褪色的时候, 其妻的意见显然占了上风。于是, 上百万部队又在野外餐风宿露了几个月。

◇ 美国核武牵制苏联

自从引人注目的柯西金—周恩来机场会谈以后, 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预计, 华盛顿或许会出于对中苏两国关系即将缓和的担忧心情, 对中苏会谈作出反应。他们显然认为这种反应将有利于中国。然而, 数周过去了, 美国并没有及时地作出什么引人注目的反应。正如上面提及, 毛泽东在珍宝岛冲突以后认为, “中苏发生交战了, 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 好做文章了。”然而, 美国对此也迟迟没有作出反应。这确实反映了东西方文化背景在大战略层次上的区别。美国在这年秋季终于作出了有利于中国的反应。

◆ 中苏对峙战略牵制

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曾经指出,就美国同互相对峙的中国和苏联的关系而论,与中国结盟是个稳妥的战略,因为“在两个互相对立的伙伴中,最好是同其中的弱者而不是强者结盟”。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将此观念运用于如何对待稍后发生的中苏核危机。

早在苏联驻美国大使于 8 月 20 日奉命紧急约见基辛格,探询美国对苏中两国发生战争的立场之后,尼克松总统已经表示,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因为中国可以牵制西方最大的敌人苏联。他认为,只要美国坚决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对中国发动核袭击。随后,美国通过各种途径,或者向中国间接警示莫斯科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核袭击的威胁,或者向苏联直接表示反对向中国发动核打击,理由是随之产生的核污染将危及美国驻亚洲的 25 万军队的安全。

随着苏中核对峙日趋升级,核大战一触即发,美国觉得有必要采取更激烈的手段介入两国纷争,否则,不足以遏阻这场迫在眉睫的人类浩劫。于是,美国直接付诸异乎寻常的针对苏联的军事行动,实施军事威慑。

◆ 美核导弹震慑苏联

据中国资料透露,北京几乎很快获悉美军已经发生“异常情况”,也明白华盛顿已经命令亚太地区美军处于“全面戒备状态”。当时北京并不知道,白宫除了命令驻远东美军处于戒备状态以外,还正在秘密地准备将战略空军司令部置于核戒备状态。稍后,尼克松总统授权以业已被苏联破译的一套密码发出命令,将战略空军若干部队置于针对苏联的核戒备状态的“情报”故意泄露给苏联知道。另外,白宫经由权威渠道已经通知苏联驻美国大使,中国的利益与美国有关,如果苏联向中国发动核袭击,美国将参战,向苏联一百余座城市和军事基地实施核打击。截至 10 月中旬,这些信息均已传至克里姆林宫,给那些狂热的苏联领导人洒下一桶凉水。

犹有甚者,10 月 25 日,几乎三分之二的美国主要的战略轰炸机群奉命满载核弹从战略空军司令部机场跑道上紧急起飞。数年前,斯科特·萨甘和杰莱米·苏里在《国际安全》季刊上撰文,论述那段引人注目的历史:“10 月 27 日和 29 日,18 架满载核弹的 B-52 轰炸机在北极极冠上空连续飞行了 18 个小

时。这批轰炸机往北飞行，沿着加拿大海岸以椭圆形的飞行轨迹朝着苏联方向飞，然后返回美国。”这样，美国直接以战略层次的军事行动，向莫斯科明白无误地表明了美国决不容许苏联对中国发动核袭击的立场。

同时，尽管中国军队早已进入了戒备状态，美国却不予置理。显然，美国以核打击力量对苏联施加的军事压力是单方面的，是十分有利于北京的。美国的这个倾向在 11 月变得更加突出了，因为华盛顿告诉中国外交部，美国第七舰队将停止在台湾海峡的例行巡逻。至此，持续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福摩萨巡逻”终于结束了。为此，周恩来欣喜若狂。他马上对毛泽东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美国的大）门了。”毛泽东相信，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牵制苏联的重量级伙伴。

◆ 美中示好危机消弭

为了让美、中关系改善有个好的开端，周恩来下令释放由于从香港驾驶游艇侵犯中国领海而一直被拘留的两名美国人。12月4日，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他认为必须与美国人恢复两国大使级谈判，以便“在边界谈判中对苏修施加一定压力”。他说，这种谈判将“增加苏修疑虑，扩大美苏矛盾”。毛泽东表示同意。

由于美中关系业已改善，北京可以倾注全力对付苏联了，全军作战部队仍然保持着全面戒备。12月20日，周恩来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讲话，首次表露了乐观的情绪：“目前国际形势正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近两个月以后，即 1970 年 2 月 13 日，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美国政府的军事预算主要是用来对付苏联”而不是对付中国的，暗示美国的行动将越来越有利于北京。

◇ 尾声

在冷战期间，美国、苏联先后对中国实施过核威胁。对于美国、苏联针对中国的核威胁，苏联、美国相继在战略上采取了有利于中国的牵制行动，有助于中国避免一场浩劫从天而降，或者至少摆脱了单凭自己挥之不去的一出核讹诈。相对而言，苏联在 1969 年准备对中国发动的核突袭，威胁迫在眉睫，力度也更大，而美国对苏联实施的牵制行动也更为直接、有力。

周恩来以及总参前指负责人还是经常隐藏在京郊地下防核掩蔽所内，日常活动自然受到了限制。从 1969 年 10 月至 1970 年 4 月，毛泽东一直住在武

汉东湖宾馆内的梅岭一号。这是他在武汉住得最久的一次。鉴于一场核危机已经烟消云散，他就离开武汉了。

1970年2月中旬，周恩来终于回到他在中南海的住宅。不久，总参前指负责人也回到他们在总参的办公室。可是，在三北地区野外露营的数十万部队却没有这么幸运，直到1970年4月24日，军委才姗姗来迟地发布了《关于部队疏散的指示》，允许他们回到军营。估计就在这个日期的前后，军委批准二炮各导弹部队恢复经常战备状态。

（作者简介：约翰·刘易斯，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荣誉高级研究员；薛理泰，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

□ 原载《领导者》总第34、35期（2010年6月、8月）

珍宝岛事件真相

• 李丹慧 •

〔编者按：本文为作者演讲稿“珍宝岛事件真相——1960年代的中苏边界关系考察”的后半部分，前半部分为回顾历史，从略。〕

1965、1966年中苏两党关系、两国关系越来越恶化，到1966年1月，苏联和蒙古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互助友好条约。这样苏联就不断地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造成了我们说的百万大军压境，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我们马上就给他戴上一个“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这个时候，中苏边界冲突事件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在次数上，规模和形式上、范围上都发生了变化。次数上增多了，从1964年10月到1969年3月，一共是4160多件，比原来大约增加了一倍半。形式、规模上也有了变化，原来是口头骂、推搡、棍棒式武斗，发展到1968年、69年，苏联边防军出动坦克、装甲车驱赶上争议岛屿的边民，还轧死了中国边民，苏联的边防军向中国巡逻队巡逻的方向点射，这样严重的事件。范围都集中在黑

龙江流域的吴八老岛、乌苏里江流域的七里沁岛、珍宝岛。随着中苏边界事件的不断升级、发展，可以说中国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克制和忍让的过程。1968年周恩来指示，在中苏边界斗争上是要有理、有利、有节，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所以当时沈阳军区把十六野战军调上来，准备在绥芬河地区打击一下苏联。绥芬河是在吉林、黑龙江省交界的地方，为什么选择绥芬河，因为绥芬河是路界，苏联的炮楼、哨所比较大，打它，苏联会疼一点。但是，周恩来指示不能动火器，就是不能开枪。十六军于是成立了棒子队，准备和苏联打。

其实到这时候中苏边界的解决方案还是有三种。第一，最好的方案，双方边防军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然后通过政治手段和平谈判。第二，我们就是搞棍棒式的武斗，不要动火器。第三，就是开枪，不惜发生战争。当时中国国内强烈的反苏氛围，中国方面选择了第三种方案。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提出一个在珍宝岛地区的反干涉方案，计划投入三个连的兵力，部分兵力上岛潜伏。2月19日，总参批准，外交部批准，后来报毛泽东也批准。所以，在珍宝岛事件之前，中国是做好准备了的。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间、地点？时间定在三月是因为四月要召开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中共都是通过代表大会公布大政方针，这也是毛泽东运用非常娴熟的政治策略，就是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枪口一致对外。这样不但可以平息国内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非常混乱的局面，也可以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因为在1969年2月份，毛泽东就安排四位老帅，就是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陈毅讨论国际局势问题，包括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所以就选在3月打击苏联。选择珍宝岛这个地点是因为它是位于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而且在枯水期，这个岛就和中国大陆连在一起。而且是在1964年中苏谈判时，苏联已经同意给中国了，所以在这个岛上反击苏军，苏联不至于为这个岛而拼命。还有就是1947年时，苏军就派人在岛上巡逻了，苏方也比较重视这个岛。如果在这儿打一下，既有一定的安全系数，也能造成一定的影响。再有一个考虑就是为什么选择水界，因为在那儿苏军不好调动机械化部队。当时周恩来说，在西伯利亚地区，苏军就没有建立后勤补给基地，如果要打起来，苏后勤补给就无法跟上，要是选择在新疆，就很难控制冲突规模，就很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战争了。所以就选在了珍宝岛。当然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在1969年6月，勃列日涅夫要组织世界工人党

和共产党代表会议，3月末就要召开筹备会，不排除毛泽东想给他捣乱：让你再去当什么国际共运的领袖。

3月2日，珍宝岛武装冲突爆发，东北还是冰天雪地，我们的士兵都披着白色斗篷，苏联巡逻队过来，看到的都是白茫茫一片，我们跳起来就用匕首刺杀他们。根据当时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的回忆，第一枪也是我们先开的。通过事后苏联向东德通报情况上看，苏军死亡的士兵多是从背后近距离被刺死的。然后在3月15号，发生了规模更大的战斗，这时候苏军已经缓过神来了，把坦克、装甲车都调上来，和中国打。中国当时前线指挥部是设在虎林，前线总指挥是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萧全夫。中国用炮火还击苏军，15日战斗打得很激烈。17日第三次战斗，中国的军队没有上岛，因为在15号，苏联有一辆坦克沉到了乌苏里江，苏军想把坦克给拖回去，所以17号又上岛。中国方面用猛烈的炮火把苏军给赶回去了，坦克被中国给拖回来了，就在中国的军事博物馆展出，作为新沙皇侵略中国的证据。不管怎么说，我们事先做了埋伏，开了第一枪，但这毕竟是在中国境内，是在中国的领土上。这个事件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这个事件之后，双方又进行了哪些较量呢？

当时的苏军完全就被打懵了，3月2日，苏联边防军马上向莫斯科汇报，结果最高领导人全都不在，勃列日涅夫出国，国防部长也出国了。要不然第二次战斗也不会拖延十几天以后。之后，苏联非常愤怒，先是提抗议照会，接着召开记者招待会，组织示威游行，向西方投诉，向东欧国家通报情况。向西德领导人诉说这件事情完全是中国挑起来的，苏联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华约国峰会3月底在莫斯科召开，勃列日涅夫提出来是否采取集体措施制裁中国，但是没有成功，华约其他国家也存在分歧。还有就是进行核威胁。再有就是1969年6月份，世界工人党和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有69个国家参加。勃列日涅夫在这个会议上提出一个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思路，就是要遏制中国在亚洲的扩张。

那么中国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核心的一条就是利用这个事件做文章。先是组织示威游行，在不到10天里组织了4亿多人次的示威游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题目就是《打倒新沙皇》，完全就把苏联和沙皇划到了一起。再有就是中共九大召开，4月1日，林彪做政治报告，这个政治报

告是经毛泽东审批的，提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口号。号召建立统一战线，反对苏联和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谈国际问题时，谈美帝国主义的篇幅很少，因为没落的帝国主义走下坡路了，而谈到苏联时长篇大论，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当时对苏联的防备态度。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说打起来还是放他进来好，让他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九大之前3月15日，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在听珍宝岛事件的汇报时，毛泽东提出，大敌当前，动员一下有利。主张让苏联打进来，占领牡丹江，国际社会就知道了。还说中国和苏联打起来，给美国人出了一个好题目，美国人可以做文章了。接着，中国方面晾着苏联。3月22日，苏联利用中苏之间还有的热线联系，给中国打电话，说苏联的总理要跟周恩来谈话。我们的接线员说，你一个修正主义分子，社会帝国主义者，有什么资格和我们周总理谈话，啪的一下，就把电话给挂了。当然这个接线员受到了周恩来的批评，但当时还是通过外交部通知苏联驻华使馆，我们之间已经发生武装冲突，再通过电话联系已经不适合了，以后如果有什么事就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接下来3月28日，4月中旬，苏联就不断地发照会，发声明，希望赶快进行第二次边界谈判，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中国方面都不加理会。直到4月底，中国才答复，说，你着什么急啊，我们会答复你的，稍安勿躁。拖到5月24日，中国政府才发布了关于边界问题的声明，申明中国政府历来主张通过谈判解决领土争端问题。后续措施又没有了。

莫斯科方面是满腹狐疑，觉得中国是不是在和西方搞政治调情？就很紧张，想，我得给你施加一点压力。一个就是核威胁，通过《真理报》、《消息报》发表文章，宣称苏联核武器如何强大，中国核武器还是处于比较低级阶段。苏联的外交官还与美国进行接触，说我们想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打击，你们是什么态度？当时美国表态不同意。苏联通过西方媒体不断发消息，传达苏联要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了的信息。第二个威胁就是采取军事手段进行报复，1969年8月13日，在中国新疆塔城裕民县铁列克提，苏军出动300多军人，在坦克、装甲车、直升机的护卫下突袭并全歼了中国的一支巡逻小分队，中国是吃了大亏了。苏联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对中国还是奏效了。

怎么奏效了，我们来看一下。中共中央当时对中苏的战争做了一个过高的估计，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个命令，说边疆省份的居民都要进入战备状

态，从那时起中国的战备就进入一个超常规的状态。另外还是想要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局势，9月初同意周恩来和苏联的总理柯西金进行会谈。9月初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去世举行葬礼，柯西金出席葬礼时对中方表示他希望在返回苏联过境中国时和周恩来举行会谈。9月4日，葬礼结束，柯西金返回苏联，当飞机飞至塔吉克首府杜尚别时，苏方收到越南方面转来的消息，说周恩来总理愿意和柯西金在首都机场进行会谈，说以前之所以没有同意，是因为翻译在传达信息上有误。柯西金随即就让飞机飞往伊尔库茨克，由那儿再飞北京。1997年时，我们和俄国学者有个国际学术讨论，参加的有一个库里克，当时就陪同柯西金在飞机上。柯西金一听说这个消息就很高兴，现场就准备要谈的内容。9月11日，周恩来和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举行了一次非常著名的会谈。在这次会谈中，达成双方军人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点临时措施的口头协议。在会谈中，周恩来说，如果你们要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打击的话，那就是战争。可以看出，中国对苏联的核威胁还是十分忌惮的。柯西金还提出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建议，比如贸易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通讯关系，建议恢复正常发展。周恩来说我无权答复，只能回去汇报。

9月11日的机场会谈结束之后，中国方面就从这次会谈看出，苏联不想把事态扩大化，想缓和局势，所以中国方面的态度就发生了微妙变化。机场会谈应该是发布信息的，本来是“中苏双方在友好、坦率的气氛中进行了会谈”，结果中国方面通知苏联说“友好和坦率”不能要，就说中苏两国总理进行了会谈。苏联方面很纳闷儿，当时就问外交部的乔冠华，你们是什么意思？乔冠华耸耸肩膀、指指上面，表示我也不知道，意指这是最高层的意思。苏联也通过这次会谈摸清了一个情况，就是中国对于苏联的核威胁还是很重视的。面对中国态度的反反复复，莫斯科决定再给中国方面施加点儿压力。1969年9月16号，通过一个叫维克托·路易斯的记者在伦敦的《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正在讨论要对中国罗布泊的核设施进行打击并打算在中国国内扶持反毛势力，这两个信息发出来了。而维克托原来是苏联人，实际上是有克格勃的背景，后来跑到西方，西方一直认为他发表的东西就代表苏联官方的态度。这篇文章发表后，9月18日，周恩来就给柯西金写信，信里建议说中苏双方都应该做出不使用武力、包括核武器的承诺。9月26日，柯西金给周恩来回函，说

我们可以签订一个中苏互不侵犯的专项协定。这表明在中苏边界很紧张的时候，苏联明确表态说我是不会和你打的。柯西金表示，机场会谈的四点临时措施虽是口头达成的，还没有书面认定，但是我们的领导人已经指示军队从争议地区撤离，脱离接触，不会再跟中国进行边界上的武装冲突。

那么在这之后，中国方面会做哪些反应？因为苏联已经强烈怀疑中国在向西方献媚了，苏联方面就是想息事宁人。毛泽东这边又做出两种反应：一个是缓和，1969年10月1日，毛泽东接见朝鲜的人大委员长崔庸健说，中苏分裂，美国高兴，我们不愿意和苏联打仗。因为朝鲜和苏联的关系不错，就是通过崔庸健把信息传达给克里姆林宫。还有中国开始同意第二次边界谈判，其后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开始。另外一个反应是，当时毛泽东过高估计了战争形势，认为苏联方面利用谈判来释放烟雾，然后再进攻我们。所以就有了紧急疏散，包括国家领导人疏散，异己分子、牛鬼蛇神的疏散。10月17日，林彪指示：全军进入一级战备。10月18日，总参谋长黄永胜以林副主席1号命令的方式发出了指示，边界地区进入临战状态。所以说，1962年我们把中苏定性为敌我矛盾；1964年在国家安全防御战略中把苏联作为敌人；1969年中苏之间发动战争，毛泽东要调整对美政策了，要联美抗苏了。这是60年代中苏关系发展的第三个关键年份。在珍宝岛事件之后，69年到71年间中国就调整了对美政策。

1969年10月的第二次边界谈判也反应出一个迹象，在谈判过程中，中方的当事人有一个突出的感觉，说每次谈完之后周恩来都不关心这次谈判怎么样，而是问，你们知道美国有什么反应？再到了1973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全国大挖防空洞。

中苏同盟关系在1964年就已经破裂了，到了1969年已是名存实亡了。这就是珍宝岛事件。

（本文根据作者2010年4月10日在三味书屋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如有疏漏，敬请谅解。）

□ 摘自三味书屋博客

2009 年 7 月 13 日初稿

2011 年 12 月 31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二册（2）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二章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

第二节 林彪集团逐渐形成

本节资料

研究资料

《吴法宪回忆录》摘录

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开始分裂

毛泽东常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军委办事组全体成员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以后，江青就开始对军委办事组不断寻机闹事，从而导致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开始分裂。

当时，中央文革碰头会议里明显分为两派，一派是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一派是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至于陈伯达、汪东兴、李德生、温成玉等其他人，则在两派的斗争过程中，或逐渐向两派分化，或保持“中立”。

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以后，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对立逐步明显。主要是江青想通过黄永胜来抓军权，但黄永胜根本不理江青那一套。黄永胜认为，军委办事组只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个人负责，不对中央文革负责。于是江青就认为黄永胜对她不够尊重，认为总参谋长的人选不够理想。相反，黄永胜则认为江青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由于认识上的分歧和立场上的不同，到了五月份就出了事情。

在“文革”期间原来有规定，军委办事组调动一个排以上的兵力执行任务，都要通过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这样的报告上要写一大串名字，要等所有的人都阅读完毕，所有的人都画了圈。兵力调动才能够实施。

1968 年 5 月，毛主席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说：“象这样的报告，只要写上三人（即毛主席、林彪、周恩来）的名字就可以了。写上一连串的名字，既使行动迟缓，又容易泄密。”

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黄永胜和我们当然就这样做了。可这样一来，由于得不到有关部队调动的报告了，江青心中在为不满。一天晚上，她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突然破口大骂：“黄永胜、吴法宪，你们目无中央，无组织、无纪律，搞独立王国，封锁消息。”她还提出，要停止黄永胜和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资格，让我们清理思想，写出检讨。会后，周恩来、康生、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找黄永胜和我谈话，要我们两个人检讨错误，并暂时停止工作。

下来以后，我们把事情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认为，调动部队的报告如何上报，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我们无权作出变更，更不能写检讨。黄永胜也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错，不能写检讨。就这样，彼此之间僵持了半个月之久。我们不作检讨，他们就不让我俩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让我们“靠边站”了半个多月。

正巧，在此之前，中央曾决定由黄永胜作为中国党政代表团的团长，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出访的日期到了，但因黄永胜坚持不作检讨，江青就是不让黄永胜出国访问。由于时间紧迫，而且外交部早已经将代表团的成员通知了阿方，临时换人也来不及了，于是周恩来只好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话了，他说：“江青不对，黄永胜仍然应当出访阿尔巴尼亚。军委办事组没有错，仍然应当正常工作。黄永胜、吴法宪还是碰头会成员，仍然应当照常参加会议。”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意见传给江青，江青没有办法，只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

不过事情并没有完。黄永胜出访前的头一天晚上，周恩来决定由陈伯达到机场送行和迎接。但黄永胜走时，陈伯达没有去送；黄永胜回国时，陈伯达还是没有去接。为此，周恩来追查陈伯达为什么不去。陈伯达说，是江青不让他去，所以他不敢去。可见江青当时霸道到了什么程度！

黄永胜回国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 号”召开会议。在江青没有到会以前，毛泽东对我们说：“你们怕江青，不敢抵抗，你们没有错，而是她错了。我历来对她的方针是，她对的我就采纳，她不对，我就批评。今后你们不

要全听她的，她做得不对，你们要抵抗，要斗争，要批评。”不久，江青到了场，毛泽东就再没有说这件事情了。

在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后，周恩来为调解江青和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矛盾，真是费尽了苦心。有一天晚上，周恩来把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叫到钓鱼台 11 号楼江青的住处去开会。会前，周恩来告诉我们，这次要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一起，开一个团结的会议，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缓和一下气氛。他还特别告诫我们，不论江青说什么，都不要吭声，不要说话。

我们来到江青住所时，周恩来要我们在楼下等候。一会儿，看见江青出来，周恩来赶紧上前去扶着她下楼。见到了我们，江青一边下楼，一边开口骂道：“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身穿的绿军装，头戴的红五星，领子上的红领章，这些都是老娘给你们争来的。你们目无中央、目无组织纪律，不觉得可耻吗？”

江青的脾气很大，一骂就是个把小时，滔滔不绝，姚文元也在那里不断地帮腔。因为有周恩来的嘱咐，只是为了团结，我们就一直站在那里，听江青训斥，一声没吭，忍气吞声，啼笑皆非。当晚 11 点就散会了。

过了三、四个小时，大概是次日的凌晨 3 点左右，我们都躺下休息了，突然之间接到周恩来的电话通知，，要我们立即到钓鱼台 16 号楼开会。我们到达十六号楼时，周恩来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们了。他一个一个地嘱咐我们说：“我已经把刚才会议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责备江青太放肆了，要她立即向我们作出检讨。”之后，他又特别向我们强调说：“江青检讨，你们就不要说什么了。不要再反驳他，听她讲就是了，她说完就散会。”

当时，我们几个人都还好，就是黄永胜因吃了安眠药，脑子糊里糊涂，说话也不清楚，是闭着眼睛由警卫员扶着进的会场，坐在了周恩来的身边。

会议开始以后，江青说：“我近几天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发烧、说胡话，神志不清，错怪了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们，特地向军委办事组和黄永胜同志道歉。请你们不要见怪，今后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一起共事。”

我听了以后，忍不住说：“江青同志的检讨，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江青同志先入为主，偏听偏信，出口伤人，主观、片面地处理问题，值得引起警惕。”汪东兴也接着说：“江青同志好训人，随便骂人，侮辱同志，这是最不好的。江青同志的错误，常委要负责，总理对江青同志太迁就了。”

江青听了我和汪东兴的发言，气得脸色发青，表情很难看。周恩来就立即宣布散会。这件事情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我们与江青等人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大了。江青对我们的不满，林彪看得很清楚。一次林彪对我说：“江青说了，第一步是拿掉杨成武，第二步是拿掉你吴法宪。”

江青为了分化我们，就想方设法拉拢军委办事组的人。她看中了温玉成。还在温玉成刚刚到北京，江青就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当面向毛主席提出，让温玉成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毛泽东当场表示了赞同，并说：“我也有这个意思。”这样，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事情就算通过了。我想这也是江青和毛主席事先商量好的。也就是以后所说的掺沙子。

接着，1968 年 5 月，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温玉成对军委办事组会议，要么就是不参加，要么就是唱对台戏。看到这种情况，我对黄永胜说：“温玉成变了样了！”黄永胜有个秘书叫李必达的，原来是温玉成的秘书。他这个人很有心计，平时对我们说的话都暗中留意，听到我们说江青以及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话，就记下来，集中起来，写成个小“小报告”，说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是“反对江青同志的小集团”。然后，他把这个“小报告”送到温玉成那里，温玉成便转交给江青。之后，江青又将这个“小报告”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完，未作任何批示就转交给了林彪。林彪就又转交给了黄永胜。

黄永胜看了这份“小报告”，十分生气，认为温玉成太绝情，竟然在我们中间使用特务手段，把这样的报告送给江青，险些酿成大祸。于是他和我商量，决定对李必成采取措施，由我派飞机把李必成送到广州去软禁起来。

到了此时李必成仍然不死心，在被送往广州的飞机上，他又悄悄地把一个《毛主席语录》本丢在他的座位底下，上边写了几行字，说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是反江青同志的反革命集团，希望检到这个语录本的人，能把它送给江青同志，并希望江青同志能救救他。飞机到达广州以后，机上的服务员在搞卫生时，检到了这个语录本，回到北京就立即交给了空 34 师师长胡萍，胡萍又交给了我，我马上转给了黄永胜。

在这件事情上，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这一事件到此也就告一段落了。

在我们同江青的矛盾公开化以后，中央文革的一些人也逐渐转向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按说是应当和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站在一起的，

但这时却向我们靠拢。经过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这时只剩下了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五个人，而在这五个人中间，陈伯达经常处于孤立的地位。江青等人对他看不上眼，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书呆子，办不了什么事情，经常对他冷嘲热讽，语带讽刺。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就多次鼓动批判陈伯达，而且动员我们几个也一起参加批判。可是林彪认为，陈伯达还是有理论水平的，过去中央的多次重要文稿，都是出自陈伯达之手。由于林彪不赞成无端地批评陈伯达，我们在江青等人批评陈伯达的会议上，就都不表态。这样一来，陈伯达便与我们的来往多了起来。

汪东兴也是同我们比较接近的一个。至于汪东兴和林彪接近的起因，是因为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经常给予支持。江青对汪东兴向来都极不尊重，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把汪东兴当成了她的出气筒。那个时候，江青对毛泽东经常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干预毛泽东的生活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使用，这使负责毛泽东日常生活的汪东兴夹在江青和毛主席之间，处境十分尴尬。

一次，江青要求调走毛泽东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汪东兴不敢擅自做主。于是，江青便破口大骂，李纳也在一边帮腔。汪东兴实在没有办法了，就跑到林彪那里，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林彪。林彪要汪东兴直接报告毛泽东和江青，就说：“是林彪说的，毛主席用什么人，谁也不能干预，完全由毛主席自己决定，江青不能干预毛主席的生活问题。”汪东兴把这些话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很高兴。正是由于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给予了支持，汪东兴和林彪之间的来往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了难事，就经常来找林彪帮忙。这样，也就基本上与我们站到了一起。

这样一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两个对立的阵营就逐渐分明了。

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

1967 年 11 月 27 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通报说：“关于‘九大’开会的时间，多数同志建议明年秋天国庆节前召开。‘九大’过后接着开‘人大’，把刘少奇罢掉，解决国家主席问题。”

但由于种种原因，原定在 1968 年国庆节以前召开的“九大”，没有开起来。于是，毛泽东提议，先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把刘少奇的问题解决了，并将这个会议作为召开“九大”的预备会议。

1968 年 10 月 13 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极不平常的中央全会，全会应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 195 人，但实际上只到了 59 人。在没有出席的 136 人里面，除了有 10 人去世以外，绝大多数都已经被打倒了。在这种情况下，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和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共 74 人。所以，实际与会人数为 133 人。

在 10 月 13 日的全会开幕式上，周恩来首先宣布了全会的议事日程，一共三项：一、讨论和决定“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及办法；二、讨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进行专案审查，特别是对刘少奇专案的审查工作。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讲了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要搞到底，还是不搞到底？大家议一议。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面前的敌人很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要困难得多。问题是犯了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只好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这场“文化大革命”都要搞到底。什么叫搞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各项任务，都要彻底完成。把这些任务都做完，估计要搞三年时间。也就是说，到明年夏季就估计差不多了。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一共讲了两次话。他的这两次讲话，都没有讲话稿，也没有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讨论。他还是按照自己的老习惯，事前只准备一个提纲，然后在会议上即兴讲演。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他还说，我们国家的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我们一片红就等于欧洲一片红。

他还在讲话中谈到了世界文明史上几次文化革命运动。他认为，第一次是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发展，影响了人类文明上千年。第二次是 14、15 世纪在意大利首先兴起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了资产阶级文明，使欧洲进入了繁荣

时代。但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其伟大的历史意义，要远远超过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产生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

林彪讲话时，毛泽东频频点头，并不断劝林彪休息一下再讲。看来，他欣赏林彪的讲话。

全会讨论了刘少奇专案组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认定，刘少奇在 1925 年、1927 年、1929 年曾三次“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同时，全会还根据康生等人的提议，专门用了几天的时间，又批判了一次“二月逆流”。

最后，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九大”代表产生的意见》、《关于“九大”主要议程的决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一致通过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中共中央还没有开除过任何人的党籍，但是从刘少奇开始，第一次使用了“永远开除党籍”的办法。尽管后来事实证明这一切是错误的，但是当时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反对意见。

全会以后，江青还准备以“美国特务”的罪名，把王光美判处死刑。但毛泽东说：“王光美纵然是特务，也要留活的证据。在延安我就不赞成杀王实味。要刀下留人。”以后，周恩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江青才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打算，使王光美得以幸存下来。

在全会上还批判了“二月逆流”。这一点，我已在前面关于“二月逆流”问题的章节里讲过了。

10 月 31 日全会闭幕。在闭幕式上，毛泽东再一次讲了话。他说：“有些同志对‘二月逆流’这件事情不大了解，经过十多天的时间，就比较了解了。在这个会议上，先由犯过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然后大家对他们有些质问，他们再说明问题。这样经过几次反复，大家就都比较清楚了。这件事情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有意见要说，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有些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在背后议论的。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左、中、右。通通是左派，我就不赞成。‘九大’代表，‘二月

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我看就是个缺点。对于党内的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清理阶级队伍’，要注意一个‘准’字，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对于学术权威，注意不要做得太过分，冯友兰、翦伯赞可能还有某种用处。批是要批的，但保还是要保。对邓（小平），有人说开除党籍，我有一点保留，他和刘（少奇）还是有区别的。”

闭幕式上，还通过了全会的公报。公报宣布：“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次全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康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向毛泽东提出，批判“二月逆流”应当成为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一个内容。毛泽东同意了他的这个意见。

关于“九大”政治报告

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我们立即紧张地投入了“九大”的准备工作。首先是准备“九大”的政治报告。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亲自指定由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会后，林彪便考虑组织他自己办公室的秘书构思报告的初稿。后来毛泽东又认为，这个报告非常重要，要在这个报告里很好地总结出“文化大革命”各方面的经验。所以，他又指定陈伯达来协助报告的起草工作。对此，林彪很高兴。

当陈伯达去请示林彪时，林彪提出了自己看法和意见。根据林彪的这个意见，陈伯达拉了一个提纲，并将政治报告的标题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不久，陈伯达写出了报告的第一部分。在这部分里，陈伯达强调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当这一部分拿到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的时候，被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说成是“唯生产力论”。毛泽东赞成他们的说法，认为陈伯达的这个稿子过分强调生产，没有突出革命，没有阶级斗争，不能用。

这一下就把林彪和陈伯达原来关于“九大”政治报告的共同构思推翻了。周恩来在会议上不敢表态，而黄永胜和我们几个人多半只是听会，总感到人微言轻，

讲话无足轻重，而且没有发言权。反正都是毛泽东说了算。因此，毛泽东就把陈伯达的稿子给推翻了。之后，毛泽东提出，另外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组成起草小组，重新写。

这件事情再加上前面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林彪关于文化革命是文艺复兴的讲话，反映了林彪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作用，理解上有偏差，渐渐的毛主席也考虑到林彪并不是他的思想和路线的理想继承人，实际上坚定地执行他的思想路线的正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只是把我们全都蒙在鼓里了。

大概过了半个月，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写的稿子第一部分出来了，题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在这一部分里，康生等人用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话，来论证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后，就是回顾“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十年来粉碎刘少奇等人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出乎我们的意料，毛泽东看了这一部分认为可用，要他们稍加修改后，提交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

在毛主席主持的讨论会上，大家沉默没有人发言。只有陈伯达提了一点意见，陈伯达说：“还是应当搞生产好，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光搞运动，就象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陈伯达这个话一出口，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非常紧张，怒目而视。毛泽东一听，则勃然大怒，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又何必这样急呢？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要报复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在延安时期，你脚踏两只船，原来说愿意给我当秘书，后来又说愿意给张闻天当秘书。1950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脚踏两只船。你没有报告，也没有经过我的批准，就去见苏联领导。是不是看我这条船快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

毛泽东一讲这番话，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大为高兴，而陈伯达却大为紧张，连林彪和我们几个人也都感到有些恢溜溜的，不吭一声。周恩来也没有说一句话。是啊，一有不同意见，就上纲上线，就翻历史的老账，连几十年以前的事情都兜出来了，谁还敢说什么！

看了大家都不发言，毛泽东最后说：“此稿可用，请继续写第二部分。”说完，就散会了。

当天晚上，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就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动员大家批判陈伯达。为此，他们在事前还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情况，说陈伯达有历史问题，反对过鲁迅的大众文学，曾在天津被捕自首过，是个叛徒等等。但是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在会议上始终是一言不发，因此对陈伯达也就没有批判起来。

不久，报告其它几个部分也都出来了。这几个部分都经过毛泽东的一一修改，并在他亲自主持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顺利通过。

有了上一次陈伯达挨批的教训，几次讨论谁都没有提什么意见。只有一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时，江青提出应当写一段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马上响应，只有陈伯达不赞成，说中央文革小组只是一个办事机构，无功可写，一切都应当归功于毛泽东。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不表态，我们其他人也不吭声。这件事最后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应当写上一段，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连中央文革小组都不写一段，于理不通。”

最后，又在政治报告里补写了一段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

后来在这个“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过程中，林彪始终没有参与一点意见。几次讨论，他都是一言未发，送到他那里去稿子，他也是一字未改，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有动过一个。报告正式发表以前，张春桥曾经想请林彪签个字，但被林彪拒绝了。张春桥不得已，只好从《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里描了一个林彪的签字才算完了事。林彪对于“文革”的态度是越来越消极。

在“九大”即将开始之前，汪东兴突然病倒了，住进了医院。汪东兴与当时是“九大”的筹备组的主要成员，帮助周恩来筹备“九大”，因为毛泽东已将“九大”的具体组织工作，全部委托给了周恩来。汪东兴住院之后，周恩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提出，由于“九大”的准备工作非常繁忙，希望我兼任“九大”秘书处的工作，帮助他处理“九大”的日常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他的提议。以后，我就参加了“九大”前的组织筹备工作和“九大”期间的会务工作，周恩来是秘书长，我是副秘书长，我完全听周恩来的，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召开九大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开幕，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由于当时党的各级组织还没有完全恢

复，代表不是通过选举，而是通过酝酿产生的，以至有个别非党员也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这也是十分特殊的情况。

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讲了话。他说：“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然后，大会选举了主席团，选举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我也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并被任命为大会秘书处副秘书长。大会还通过了会议的三项议程：林彪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接着，大会进行第一项议程，由林彪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由于林彪对整个报告有看法，从没有读过一遍，所以读这个报告的时候，有些地方读得不太通畅，这引起了江青、康生的不满，这是后话。

大会从 4 月 2 日起开始进行分组讨论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

在会议快要进行到大会发言的时候，康生交给我一张名单，要我去布置他们在大会上发言，我请示周恩来。周恩来说：“你就到几个小组去跑一趟吧。”在这几个人中间，第一个就是纪登奎。当时我不认识纪登奎，就通过刘建勋找到了他。事后我才知道，是康生提出要把纪登奎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因此才叫他在大会上发言亮相的。

4 月 14 日，大会举行全体会议。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相继在会上发了言。在周恩来和康生的发言里，除颂扬毛泽东以外，也赞扬了林彪，而且评价相当高。当周恩来在讲话中称颂林彪是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代表”时，林彪突然站起来说：“我没有什么，一切都应当归功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

大会发言以后，全体代表一致表决通过了林彪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这个章程，不仅肯定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高度评价了林彪，说：“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用党章的形式来明确规定接班人，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最后，主持大会的毛泽东讲了话。他在讲话中很高兴地表扬了孙玉国，认为孙玉国 3 月 2 日和 3 月 5 日两次在珍宝岛指挥反击苏军入侵的战斗打得好。

从 1969 年 4 月 15 日起，“九大”进入了第三项议程：酝酿和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这个选举过程，始终充满了斗争。在大会召开之前，关于“九大”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人选安排，其中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市、自治区，以及解放军各占多少，已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等几个人反复协商之后确定下来了。军队方面所占的比例比较高。

军队干部占的比例高，是当时的特殊情况造成的。因为“文革”开始以后，全国各地大乱。为了稳定全国的形势，毛泽东明令军队参加“三支两军”，这才使全国的形势逐渐稳定了下来。以后在全国各地成立的各级“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中，领导职务基本上由军队负责人兼任。国务院各部门的负责人，也是军队干部居多。这样一来，在中央委员和修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中，军队干部也就比较多。

对此，江青、康生他们很有意见。他们主张要多安排一些地方造反派的头头。但是他们的意见没有通过，因为许多造反派头头连共产党员都不是，怎么行呢？所以，他们的意见被否定了。

在选举之前，一次叶群在同我们闲谈时说：“林总讲，现在江青太猖狂了。张春桥、姚文元过去都是榜上无名的小卒，现在的威望都这样高，看来当选中央委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使他们的选票少几张，不能让他们得全票，以杀一杀他们的锐气。”

陈伯达接着说：“张春桥在上海不过是个小瘪三。”黄永胜也说：“张春桥看不起我们，一次在机场公开说我们是大老粗，我当场回敬了他一句，说你在晋察冀不过是一个小记者。”在这以后，我们按照叶群传达的意思作了安排和布置，指定军队有的人在选举时不投江青等人的票。

4 月 23 日下午，大会举行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九大”代表共有 1512 人，正式选举时仅有两人请假，因此当天有 1510 人参加投票。选举结果，毛泽东得了 1510 张的全票，林彪得了 1508 票，周恩来得了 1509 票。据说林彪没有得全票的原因，是他为了显示与毛泽东有一定的距离，与叶群一起投了自己的反对票。不过，我没有问过，也没有听叶群说起过，所以我说不清这是不是事实。

选举结果，江青只得了 1502 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也相应少一些票。江青的选票不仅落后于叶群，也落后于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等。这

一下，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脸色都变了，康生的脸色甚至比江青的还要难看。在大家来到江苏厅休息的时候，江青起哄了，大发雷霆，对我们喊道：“你们的选票比我们的多呀！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威信高，老娘得票比你们少得多，难道你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比我还大吗？”对她的挑衅，我们大家默不作声。

康生这个人向来比较鬼，对选举结果发生了怀疑。于是，他和江青就派中组部的郭玉峰来大会秘书处查选票。他要郭玉峰先查主席台上的选票，再查各个大区的选票，要查清楚究竟是哪个代表团少投了他们的票。

郭玉峰不通过周恩来和我，直接找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说要来查票。王良恩不敢做主，立即报告了我，我又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和我都认为，这种作法是违反党章的。于是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没说话。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但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江青在这些问题上是一直和毛主席通气的，毛主席是真正站在江青身后的人。

“九大”一共选举出中央委员 170 名，候补中央委员 109 人，一共 279 人，其中军队干部约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中央委员会选举以后，并没有按惯例立即召开九届一中全会，而是间隔了几天，主要是“酝酿”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的人选。毛泽东便指定周恩来、康生和黄永胜三个人，到各代表团去征求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人选的意见。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安排，陈伯达不满意了。因为他原来是中央常委，可这次毛泽东却没有指名让他去征求意见；而黄永胜不是中央常委，反而参加了三人小组。显而易见，这个时候的陈伯达已经得不到毛泽东的信任了。

江青呢？也不大满意，但是她又不敢反对，因为她的资历不行。毛泽东在当时当然不会指定她去参加这个三人小组。江青是很想当中央常委的，她看到黄永胜被指名负责这项工作，就认为毛泽东可能要让黄永胜当常委。于是，在黄永胜到中央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想把黄永胜拿掉的江青，马上一反常态地变得对黄永胜非常热情，想让黄永胜提名她为当常委。她找到黄永胜说：“我准备向毛主席提出，让你当中央常委。”

没想到黄永胜却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当这个常委，你千万不要提。我哪方面都不够资格，才能、威信都比较低，无论如何都不行。我现在连这个总长都当

不好，还能当常委吗？我这不是谦虚，实在是干不了，希望你不要向毛主席提出这个意见。谁当常委，毛主席自然会考虑，会作出安排的，我们去过多干扰毛主席不合适。”

江青找黄永胜出面提她当常委的事情不成，就找周恩来，提出要安排邓颖超和蔡畅当政治局委员，想要拉拢周恩来，让周恩来提她当常委。她的建议，又被周恩来拒绝了，使她又碰了个钉子。接着，江青又找叶群，要林彪向毛泽东提出选江青当中央常委。对她的这个建议，林彪仍然拒绝了，说：“一切听毛主席安排。”这样，江青想当常委的活动四处碰壁了。

其实，毛泽东对谁当常委的问题，早有考虑。康生曾向毛泽东提出要安排黄永胜当中央常委。毛泽东说：“我没有意见，你们去安排。但是江青不能当常委。”另外，在一次由毛泽东主持的讨论常委候选人会议上，毛泽东说：“陈伯达不能当常委，他和我不合拍。至于黄永胜当常委，由大家讨论。”但黄永胜还是坚决不干。下来以后，他向林彪和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黄永胜说：“党内老同志多，选我当常委不得人心。”

我和黄永胜相交了几十年，从我对他的了解来看，我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说到这里，不禁想到“九一三事件”以后，一些人说黄永胜“一心想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话。一个“一心想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人，居然放着现成的中央常委都不去当，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在黄永胜表明自己态度以后，林彪和周恩来经过考虑，都同意了他的这个意见。随后，毛泽东也表示同意了。根据周恩来和我们大多数人的意见，毛泽东最后还是同意了陈伯达当常委。

4月28日下午，九届一中全会正式举行。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并提出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的全部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里包括了李先念和叶剑英。李先念很谦虚，当场表态说：“主席，我不能再当选了。”毛泽东说：“行，要把你选上。”

以下是九届一中全会新闻公报公布的选举结果：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叶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朱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纪登奎 李雪峰 李德生 汪东兴

在 25 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军队干部也占了半数以上。原来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成员，除了温玉成以外，全部当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温玉成在军委办事组的时候，由于与江青比较接近，同大家关系就不够融洽，人缘不太好。九届一中全会进行选举的时候，温玉成本来也是候选人之一，但得票比较少，特别是广州军区的一些同志都不选他，致使他落了选。选举结果公布以后，温玉成很不满意，认为江青这个靠山靠不住，便同江青疏远了，转而靠向林彪和我们。江青看到这一情况，便提出要撤掉温玉成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林彪同意了，建议把温玉成调到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林彪的这一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温玉成一家是由我派飞机送到成都的。温玉成走之前，在军委办事组大骂江青，说江青是武则天，是慈禧太后，有了她，中国就不会太平。同时，他还揭发江青对他说过的一些话。后来，他又跑到林彪家里去哭诉。林彪安慰他说：“是江青要把你搞走的，我们不赞成这样做。你到那边好好工作一段时间再说吧。”

在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军委成员时，毛泽东提出，要选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当军委副主席。他这样一说，大家便热烈鼓掌，于是这些人都选上了。所以，在当时的人事安排上，基本上是毛泽东说了算，他点到谁就是谁。

刘伯承等几位老师尽管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仍被选为军委副主席，但以后还是没有参加军委的日常工作。不过，“九大”以后，凡是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几位老师都参加，而且一律坐在前排。毛泽东要接见群众，特别是接见军队干部，都要通知他们，让他们随毛泽东和林彪一起出场。如果当时他们有人在外地，也必定要我派飞机接他们回北京，使他们能参加接见。

另外，在“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上，李富春除了被选为中央委员以外，其他什么也没有选上；而谭震林和邓子恢，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可见对他们几个人，毛主席还是区别对待的。

“九大”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是不存在了。虽然没有明令撤销，但是在中央下发的文件中，中央文革小组的名称已经看不到了。

九大以后，中央政治局会议代替了中央文革碰头会。会议仍然每天晚上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毛主席、林彪一般情况下依然不参加。凡是政治局提出的问题和文件，或者是毛主席交议的事情，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以后，仍然由周恩来签署，上报毛主席和林彪，得到他们批准以后执行。

两派斗争就更加激烈和公开化了

“九大”以后，政治局内部以军委办事组和原中央文革两派斗争就更加激烈和公开化了。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斗争主要是围绕着批判陈伯达和江青等人企图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而进行。

林彪从内心里是看不起江青、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些人的，这一点江青他们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但“九大”以前，他们还不敢把矛头直接对准林彪。但“九大”以后，江青、康生等人对林彪的不满愈来愈深。再加上“九大”以后，不论是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里，还是在中央各部、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中，军队干部已经占了一个相当的比重，林彪的威望越来越高。为了打击军队和林彪的声望，原中央文革的一些人，以江青为首，开始公然把矛头指向了林彪。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公开议论林彪在“九大”上作的政治报告念得不好，结结巴巴的。我们把这一情况告诉林彪以后，林彪表示说：“我从来就不念别人的稿子，我只习惯自己写一个要点，在会议上即席讲话。因为这个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写的，而且经过毛主席的多次修改，我不得不念。但我根本没有念别人稿子的习惯，所以我念得不够好。”后来，当我们向林彪说，张春桥、姚文元到处宣传“九大”政治报告是他们写的，说他们为“九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还说陈伯达的笔杆子已经不行了时，林彪对他们嗤之以鼻。

以后，江青一伙人更加得寸进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们又公开提出要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说林彪的讲话不突出阶级斗争，是贬低了“文化大革命”，从而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林彪。这真是让我们大吃一惊。林彪是可以随便批的吗？这样把林彪放到了一个什么样位置上？真是无法无天！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已经过去半年了，有意见为什么当时不提？再说林彪的讲话，已经对“文化大革命”作了高度的评价，说其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了文艺复兴。江青对这样讲还不满意，这真是吹毛求疵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江青这样做，恐怕还是有人指使。

这时，江青又伙同姚文元，一起批注了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主要是评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问题。江青和姚文元对这篇文章，逐段进行了批驳。他们是想借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名，行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讲话之实。

江青竟然想拉军委办事组的人，来同她一起批判林彪的讲话。一次我去外地检查工作不在北京时，江青到京西宾馆找到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说林彪的讲话是不对的，要进行批判。黄永胜问她：“要批判林彪的什么讲话，是不是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江青说，林彪的那次讲话，事先没有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讨论，也没有经过毛泽东的批准，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只是个人写了几条，脱口而出，必须要加以批判和澄清。

江青这一说，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几个就哼哼哈哈地装糊涂。等江青一走，他们几个人一商量，就赶紧跑到林彪那里去报告林彪。林彪说：“让她去批吧。不过要注意她一下，看她搞什么名堂。”

我一回到北京，黄永胜就告诉我说：“江青可能要找你，如果让你去，你什么话也不要讲，哼哼哈哈地就行了。”我说：“好！”

果然，当天江青就把我找到她的住地。当时江青住在玉泉山，我一到那里，她就开始给我看她的照片，又叫我参观了她给毛泽东准备的房间，然后才开始和我谈批判林彪的问题。按照黄永胜的交待，我不对她的话表示任何态度，也是哼哼哈哈地对付。从江青那里回来，我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黄永胜，黄永胜又报告了林彪。

江青看拉我们军委办事组的人员批判林彪没有得到响应，就又把这件事情提到了政治局里。她和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连提了六、七次，要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和他们的批注，印发到全国县、团一级单位。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借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文章这件事，在全国范围内批判林彪。在这些会议上，康生表示同意，而且认为越快越好，但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李先念、汪东兴及叶群都一致表示反对。我们的意见占多数。

江青的这些活动，每次我们下来以后都报告了林彪。记得林彪曾有一次对我们说：“现在江青在中央是为所欲为，谁拿她也没有办法。”后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又提出要发这个文件。这一次周恩来发了脾气，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懂一点民主集中制，懂得一点集体领导的原则嘛！对这个问题，多数人不赞成，只有你们三、四个人同意，就硬要往下发，这样做行吗？你屡次干扰大家，大家不同意，你非要通过，这是一种分裂党的做法。而且，即使要往下发也要经过毛主席，要经过毛主席同意才可以。”江青当时有点意外，但也一时之间无言以对。这样，他们才暂时放弃了批判林彪的活动。

在我们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几个人的对立和斗争中，我想说一说周恩来。周恩来一直是我所尊敬和信服的人，在我们心目中德高望重。自“文革”开始以后，他一直都在任劳任怨、苦口婆心地顾全大局、支撑大局，处境十分艰难和不易。我感觉到，他和我们在思想感情上、在工作上，以及在反对江青种种干扰等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当时，我们都在辛辛苦苦、实实在在地工作，而江青他们几人却是在不断地找事、发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时常因愤愤不平而同江青等人进行一番争斗，可党性原则强的周恩来，却一直对江青等人的刁难和无理取闹，忍辱负重，没有对他们进行指责和批评。像上面那样的情况可以说是少见的。我们心里时常为他感到难过。

与江青等人关系相比，就我所见到和听到的事情来看，林彪和周恩来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好的。林彪也非常尊重周恩来。这里，我说两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

一件事是发生在“九大”期间，一次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召集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布置“九大”的宣传工作。由于我是大会秘书处的负责人之一，就正好坐在康生和张春桥的身边。开会时，他俩悄悄地对我说，“揪军内一小撮”

的口号，是周恩来批准的，《人民日报》上的社论也是周恩来审阅过的，所以这个口号的出现，周恩来要负责任。

散会以后，我就把这个事情打电话报告了林彪，林彪听了马上要我去他家。我去了以后，他对我说：“胖子，你不要上当！他们的目的，是要怂恿你出来反对周总理。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话对谁都不能再说。‘揪军内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们提出来的，总理即使看过了，也可能是一时的疏忽，不能怪总理。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我身体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针，毛主席正确方针的贯彻和组织实施，全靠周总理。周总理的角色我是干不了的。看来康生还是想当总理的，是有这个心思的，你们要注意。周总理出国的时候，两次由康生任代总理，但是据我看他是干不了这个总理的。”

我说：“我过去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一些问题的利害关系也不大懂得，谢谢林总对我的关心。我一定记住林总的提醒，一定注意很好地协助总理工作。”

后来，我又向叶群建议，把这件事情告诉周恩来。不料叶群对我说：“我已经告诉周总理了。”尽管这样，我还是在合适的时候，再一次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周恩来，想提醒他注意江青、康生等人的活动。听了我的话，周恩来只是笑了笑，什么话都没说。

我非常佩服周恩来的这种气度。他非常有涵养，遇事冷静，沉着大度，绝不会为了什么闲言碎语而受到刺激发怒。在这一点上，他确实值得我好好学习。

另外一件事是发生在“九大”以后。周恩来对林彪也很关心。一次，周恩来要我转告林彪，是不是可以出去走一走，说是出去走走对身体有好处，不要老是住在北戴河或者是苏州不动。我知道林彪的脾气，就有点犹豫，说：“这个话我怕不好说。”周恩来鼓励我说：“你可以去试一试嘛！”以后，我找机会把周恩来的这个意思转告给了林彪。林彪说：“谢谢总理的好意！但是我的身体实在是不行了，现在就连转车也转不了。”以后林彪还是没有出去。不过我看得出来，他对周恩来的好意是真心感谢的。

周恩来的批评并没有使江青有丝毫的收敛，相反，她的个人野心越来越膨胀，我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件事是在 1969 年 5 月 17 日早上，叶群突然通知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四个人，到江青住处去开会。我们到了钓鱼台十一号楼以后，见到江青同姚

文元在闲谈。不一会儿，李德生也来了。李德生来了以后，江青就招呼开会。江青一共召来了六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连她自己，一共有七个政治局委员开会。江青说：“今天随便同大家谈一谈，请大家不要作记录。”我们几个都收起了笔记本，只有李作鹏还是在一边悄悄作记录。可一会儿就被江青发现制止了。

那天，江青一个人从上午 9 点一直说到了 12 点，一气说了三个小时。她主要讲了三个问题。她首先是吹嘘她自己，从自己的家庭出身说起，说她和康生都是山东诸城县的，以后上小学、中学，还在山东大学旁听过。再以后，又参加了革命，从山东到了上海，与左翼文联搞在一起，支持鲁迅的“大众文学”，反对王明的“国防文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到了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在同周恩来一同乘飞机去延安的途中，飞机曾降落在西安，她还去华清池里洗了个澡。

她还对我们说起了毛泽东在延安如何追求她的事情。她说，在未婚以前，毛泽东每天下午都骑着马去找她，亲自和她一同趟过延河水，一起闲游。毛泽东写的文章，都是她帮助进行整理的抄写的。1947 年撤离延安的时候，她是中央直属机关的教导员兼党支部书记，一直跟着毛泽东在陕北打游击。当时，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和毛泽东一起吃派饭。有时汪东兴买鸡给毛泽东改善伙食，但是只给毛泽东一个人吃。由于长期的艰苦生活，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生了李纳以后，就得了一子宫癌。后来毛泽东同苏联商量，请他们派专机来，接她到苏联去治病。她在莫斯科住院以后，做了一次大手术，回国以后就同毛泽东分居一直到现在。

说完自己的事情，江青接着就开始攻击周恩来。她说：“周恩来有行政工作才能和组织才能，这一点我很佩服。但是大的原则问题上他看不清，容易跟着别人走，今天东风来了是东风，明天西风来了是西风。‘文化大革命’中他办错了几件事情，写了检讨，现在还在我的手里。‘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只主持中央常委碰头会，不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后来中央常委碰头会垮了，这才要求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周恩来这个人不能掌舵，不能当一把手。”

批完周恩来，江青又批判起了陈伯达。她说：“陈伯达，小人也，读书不少，但是具体事情一件也办不了。当中央文革小组长，不会领导，没有主张，中央文革碰头会办事全靠我和康生出主意。陈伯达在历史上还有问题，他一贯追随王明，

公开写文章拥护王明的‘国防文学’。在天津的时候，曾经被捕过，还有托派嫌疑。”

江青对康生则半是吹捧，半是批评。她说：“康生同志有远见卓识，办起事来很有魄力。他读书多，有理论水平，看问题看得准，但就是实践经验少，做领导工作不内行。”

在江青一个劲地信口开河过程中，我们几个人都是只听不说。姚文元出来捧场说：“江青同志的话对我们的教育意义很大，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江青同志的马列主义水平高，我们一定要以江青同志为榜样，对照检查自己。”看到我们几个人仍是一言不发，江青只好宣布散会。

从 11 号楼出来，我和黄永胜同乘一辆车回到军委办事组，我们俩在车上就议论开了。对这个会，我们两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都认为，江青今天召开的这个会议不合法，她本身只是一个政治局委员，没有接受任何人的委托，怎么就有这个权力单独召集七个政治局委员开会！显然，这是背着中央常委搞小组织活动，其目的是破坏团结，动员和拉拢我们拥护她来反对周恩来、反对陈伯达，并损害毛泽东的崇高威信。我们认为，她这样做在组织上不合法，弄不好还会把我们也搞到“小组织活动”里去了。这件事情必须报告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

回到军委办事组，我们又同李作鹏、邱会作商量，大家都认为这件事情应当马上报告林彪。

下午，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和我一起到林彪家里，把这个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决定，要黄永胜和我两人立即去见毛泽东，并要叶群亲自打电话到毛泽东那里联系。在叶群去打电话的时候，林彪告诉我们：“在延安，是江青追毛主席。她通过康生，想尽一切办法接近毛主席，经常是毛主席一边写文章，她就在一边打毛衣，一打就是一天。她是拼死拼活去追毛主席，以后才结了婚。”

林彪刚说完，叶群就打完电话回来了。她告诉我们说，毛泽东同意接见，并在家里等着我们，要我们赶快去。

当黄永胜和我赶到毛泽东的住所时，已经快到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时间了。由于我们要去参加会议，我们向毛主席汇报的时间很短。黄永胜对会议的情况还没来得及细说，我也只是向毛主席说了一句一向郁积在我心里的话。我说：“江青同志只准演八个‘样板戏’，对其它的戏一概否定，这样好

吗？”毛泽东回答说：“‘样板戏’没有一个是她自己搞的，都是别人帮助她一起搞出来的。”

说到这里，叶群来了电话说：“开会的时间快到了，是不是先来开会，否则被江青发现就不好了。”毛泽东也说：“情况我都知道了，你们赶快去开会吧，周恩来还在等着你们。”

临走时，毛泽东又对我们说：“你们不要讲到过我这里来告江青的状，如果让她知道了会整你们的。她已经整过你们一次了。我也不告诉她，你们到我这里来过。”说完，毛泽东还嘱咐张玉凤，叫她不要对江青说我们到他这里来过。

我和黄永胜都有些失望，感到毛主席对我们的汇报不感兴趣。我们原来想，江青的这次活动直接侮辱了毛泽东，并且还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另外就是关于陈伯达的问题，我们也感到十分不解，如果早就知道他是叛徒，为什么还要委托他这样高的职位，用他去整天大抓叛徒呢？我们认为，陈伯达的历史，毛泽东应该是清楚的，否则陈伯达绝不会走到现在的地步。唯一的解释就是：江青在造谣。在当时，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早就被打倒了，可毛泽东在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却若无其事，好像江青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错似的。可以说，毛泽东当时的这一态度，完全出乎了我们的意料之外。

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完政治局的会议后，我们又把上午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也许是因为这中间涉及到他自己的问题，不好表态，周恩来在听了我们的报告以后，也是一笑了之了。

然后，我和黄永胜又到了林彪那里，把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的情况报告了林彪。林彪说：“毛主席、周总理知道就行了，让他们去处理吧。”事情就这样又不了了之了。

再有一件事是“九大”以后，由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新华社曾在全国公开发表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只有两个人，前面是毛泽东，后面是江青。发表这张照片的目的，是想表明江青是紧跟毛泽东的。然而，这张照片是假的。新华社的一个记者告诉黄永胜说，这张照片本来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个人的合影，是江青告诉这个记者，要他把林彪和周恩来的影像剪掉，然后把她自己的影像合成为到这张照片上去，于是这就成了公开发表时的样子。

我们得知这一情况后的一天晚上，我正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到江苏厅去开会，黄永胜和叶群突然从后面叫住我。接着，叶群交给我三张照片，并告诉我说，这是江青要那位记者剪贴照片的所有原件。她要我回去把这三张照片复印三份出来，让黄永胜、我与她三人各保存一份复印件。

由于有了上一次向毛泽东汇报的教训，这次我们就没有再向上反映，而是把原件复印一下，留一个证据，也就拉倒了。

林彪的“一号命令”

要说林彪的“一号命令”，不能不说起中苏之间的军事冲突。

从 50 年代末起，中、苏两党的关系开始紧张，从而后来导致中、苏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从 1964 年以后，苏联方面开始是在蒙古，后来直接在远东方面大量部署部队，对中国施行武力威胁。这样一来，原本亲密无间的邻邦发生了边界的纠纷与冲突，特别是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地区，苏联边防军多次对中国边防巡逻部队挑衅。开始，他们只是推推搡搡，后来发展到用棍棒打伤中国边防巡逻人员，抢夺我方人员的枪枝。到了 1968 年下半年，他们的行动就发展到用装甲车碾压我方人员，并开枪射击，打死、打伤我方多人。那一段时间里，军委办事组不断接到下面的这方面报告。每次我们都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给了林彪和周恩来，并请示是不是可以采取措施，以保护我方人员的安全。

这样，由毛泽东和林彪亲自主持，召开了两次有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体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和林彪一致决定：对苏联方面的挑衅要给予坚决回击，并对此作了具体的部署。

根据毛泽东和林彪的指示，我们军委办事组作了认真的研究，决定将具体的组织实施工作，主要交由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和新疆军区去执行。同时，要求解放军三总部、海军、空军以及全国各大军区密切配合，同时作好全面防御的准备。为了执行好毛主席、林彪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我们向沈阳、北京、新疆三个军区发了电报，要求他们加强中苏边界特别是东段边界的边防警戒工作，作好以军事上的斗争配合外交斗争的准备。我们在电报中强调，各边防部队要严格执行“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边界斗争方针，并具体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先出手，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开枪；如对方开枪，我方出

现伤亡的情况下，可以采取自卫措施。但无论采取何种自卫措施，都要严格控制在我方的境内。

在电报里，我们还要求边防部队在政治上有利的情况下，事先作好准备，多设想几种情况，拟订好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联军方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另外我们还强调，边防上的斗争主要是政治、外交斗争，一切要服从政治，服从大局，要严格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接到我们的电话指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亲自抓了这项工作的落实和具体的部署。1969年1月，沈阳军区制订了计划，调集兵力，成立了边防斗争的指挥所，并向军委办事组写了报告。经我们研究，并经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的批准，同意了沈阳军区的这个计划，决定以珍宝岛为中心，开展反击苏军挑衅的边防斗争。

接着，我们以总参的名义向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发出电报，通知他们中央已批准了他们的计划，并要他们注意具体布置多少兵力以及选择好反击的时机，要注意尽量减少损失，保护自己，特别要注意一定要抓证据，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抓俘虏、缴获证据。同时，我们再一次规定，不准先开枪。我们并不想向苏联挑衅，而完全是为了自卫。

1969年3月2日，珍宝岛战斗打响了。很快，陈锡联司令员就打来了电话。他在电话中非常兴奋，告诉我们说战斗取得了胜利，只可惜没有抓到俘虏。

不久，沈阳军区的战斗报告送了上来，我们才进一步了解了情况。当时我们派出的巡逻部队，在珍宝岛上遇到苏联部队的拦截。这一次，苏联方面没有像往常那样只带着木棒，而是全副武装向我们的巡逻人员压了过来。为避免扩大事态。我们的巡逻人员随即向后撤退。这时苏联方面突然摆开战斗队形，想包围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第二支巡逻组赶到了现场。见我们的增援部队来到，苏方的一个上尉指挥苏军突然开枪，一下子打死、打伤我们的边防人员六人。我边防分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开枪还击，一下子就打开了。苏联方面出动了装甲车，射击我方人员，而我们岸上的支援部队，一边开枪拦截，一边登上珍宝岛，营救我已上岛的部队。大概打了一个小时，我共打死打伤苏军60余人，击毁一些装甲车、指挥车和卡车，缴获了一批枪枝弹药。我方共牺牲了17人，重伤11人，轻伤24人。

我们很快将报告送到了毛泽东和林彪那里，毛泽东看完后说：“打得好！”

由于苏联方面这次吃了一些亏，为了挽回面子，他们就开始调兵遣将，调集了大批坦克、装甲车和火炮，准备与我们进行一场大战。这一次，他们不再只是由步兵单独出动，而是让步兵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活动，寻找机会报复中国边防部队。

为了对付苏军的坦克，我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军委办事组指示沈阳军区，调集步兵、炮兵、高炮以及反老坦克部队，在珍宝岛地区集结，分批进入前沿阵地和纵深阵地，并指示一线边防部队，要避免在对我方不利的情况下发生冲突。

到了 3 月 15 日，珍宝岛上又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这天一早，苏联边防部队在十多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又登上了珍宝岛。岛上，我们的步兵一个排利用修筑好的工事与来敌对峙。八点钟，苏军首先开火。他们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守在岛上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我们的部队沉着应战，一直等苏军装甲车离阵地只有几十米的距离时，才突然还击，一下子打掉苏军的两辆装甲车。以后，我们后方的炮兵开火，将苏军步兵压制在岛上的中央。

10 点钟，苏军出动十几辆坦克和装甲车，向岛上的中国部队又一次发起进攻，同时用炮火拦截我们的支援部队。我们的战士同苏联坦克展开激战，击毁苏军坦克和装甲车三辆，击伤两辆。苏军的装备本来就比我们要好，加上我们又是步兵武器对付坦克和装甲车，这个仗是很难打的。我在战后看到参战部队缴获的苏联坦克和装甲车上边，弹痕累累，但是都没有致命伤，不仅步枪、机枪打不进去，就连炮弹也打不进去。个别的弹孔是靠火箭筒在很近的距离内打进去的。我们的战士是非常勇敢的。

到了 12 点，苏军利用火炮猛烈轰击守卫在岛上的中国部队，并对十公里宽，七公里深的地区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炮击。然后，又派了几十辆坦克和装甲车，数百步兵来进攻我守岛部队，我边防队和支援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一直坚持了两个小时。最后在炮兵的支援下，终于打退了苏军的这次进攻。这次战斗一共是九个小时，苏军共投入了 50 多辆坦克、装甲车，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炮击。战斗结果，我们击毁、击伤坦克、装甲车 13 辆，共打死、打伤苏军 140 人。我方牺牲 12 人，伤 27 人。

以后中苏之间虽然又发生了几次冲突，但是都没有前两次战斗的规模大。以后，苏军派人来岛上收尸，我们都没有还击。几次战斗，我们一共打死、打伤苏军 250 余人，击毁、击伤坦克、装甲车 17 辆。

3 月 20 日，经毛泽东、林彪批准，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表彰了参战的全体人员。

在中苏边界的东线珍宝岛地区这几次武装冲突以后，中苏之间除了炮战，没有再发生直接的地面战斗。不过，在东面战斗中吃了亏的苏联人，一直想报复我们。到了 8 月份，在新疆又爆发了中苏之间的边界武装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方面对我们十分恼火，据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当时苏联的最高领导层里，发生了不同的意见。一些人，特别是苏联军方，主张对我们实行空袭，甚至动用核武器，打击我们的核攻击力量。但是也有一些人，主要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总理）柯西金等人主张同我们对话。

但在当时，我们是不可能知道这些情况的。我们所获得的有关情报，特别是总参的有关情报说：苏联可能考虑对中国采取突然袭击。

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紧张，正常的联系都断了。为了与我们取得联系，苏联总理柯西金通过邮电部门打来电话，说要和我们的周恩来总理通话。但是我们的接线员，把他们骂了一顿，说我们和修正主义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把电话挂掉了。这样苏联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和我们直接对话。

到了 9 月份，来了一个机会。柯西金要到河内参加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的葬礼，而周恩来也要参加胡志明的葬礼，所以苏联方面就千方百计同我们联系，想让柯西金在河内同周恩来见面谈一谈。得知这个消息后，周恩来为了避免同柯西金见面，提前到达了河内，并且在柯西金到达河内以前回到了北京。但是后来经过毛主席、林彪、周恩来三人商量，同意让柯西金来同周恩来谈一谈。

苏联接到这个通知时，实际上柯西金已经回到了苏联境内的塔吉克，但为了面子，他们对外宣传仍是柯西金从河内返回莫斯科的途中，在北京停留。周恩来考虑，不让柯西金进北京市，就在北京的首都机场安排同柯西金会谈。

9 月 11 日，柯西金乘飞机到了北京，在机场和周恩来进行了会晤。柯西金对中苏发生的流血冲突表示遗憾，并和周恩来共同商定，近期内就中苏边界问题，举行副外长一级的会谈。

然而，这次两国总理会晤后，中苏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并没有缓和下来。苏联在远东地区继续大量增兵，使中苏边界地区部署的苏军兵力达到 40 个师。这些情况不断地通报到中央，引起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和警惕。在这种情况下，加强战备，绝不是林彪一个人想当然。在这方面，毛主席、林彪、周恩来的意见是一致的，要加强戒备。尤其是对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来说，在如何应对苏联大规模突然袭击的这个问题上，更是肩负着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他不得不格外慎重地考虑一些具体的问题，否则，稍有不慎就将成为千古罪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

当时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就是要尽快完成国家军事防御战略重点的转移。1949 年 10 月建国以来，我们军队最主要的作战方向是在东南，主要的对手是美国和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战略目标是解放台湾。这样，广大的东北、西北地区就成了我们的“大后方”。60 年代以后，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和日益恶化，东北、西北地区就面临着苏联的直接军事威胁，对苏防御也就成为毛泽东和林彪主要考虑的问题。1969 年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发生以后，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解决这个问题主要的责任，当然也就落在林彪的身上。当时他要考虑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如何解决防御问题；二是如何解决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如苏联的问题。对此，林彪提出了如何“三防”和“两打”的问题。“三防”是指“防空袭”、“防突袭”、“防核攻击”；“两打”是指“打坦克”、“打飞机”。根据林彪提出的防御原则，我们作了相应的安排：一、在“防空袭”和“防核攻击”方面，重点是加防空力量，尤其是加强东北、华北、西北这“三北”地区的防空力量。这些地区原来的空、防力量比较薄弱，许多重点目标的防空都是空白。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们陆续把东南沿海地区的地空导弹、高炮部队调往兰州、新疆以及“三北”地区，加强这些地区的防御。另外我们还调整和加强了全国各大城市的防空部署，加紧地空导弹部队的建设和装备，加强预警雷达的建设和调整“三北”地区的航空兵部署。

另外，根据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的指示，在北京、天津、哈尔滨、沈阳、石家庄等全国所有大、中城市中，开展了大规模建设地下人防工事的工作。这些地下人防工事，要达到“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武器”的水平。

这样，一旦发生突袭或核攻击，地面上的人就可以转入地下，减少伤亡。在北京开始修建地铁，既可以解决交通问题，还可以防空袭。

为了保证国家和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维持指挥系统的正常运转，我们还在全国选择建设了几个战略指挥中心。这样，一旦发生突然事变，中央和中央军委能够安全迅速地转移到这些地方去实施指挥。在毛泽东、林彪可能居住的地方，我们还特意修建了可靠的地下工事。

在“防突袭”方面，我们考虑，苏军的机械化部队，特别是他们的坦克和装甲部队，从装备到力量都是世界一流的。他们的突击力量很强，而我国的“三北”地区又大都是平原，几乎是无险可守，这就非常有利于苏军装甲部队的行动。因此，在战略上我们应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以扬长避短。但是现代化的战争，不应当让对方长驱直入，要找一些战略上的支撑点来进行固守，吸引对方的兵力，然后相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出于这个考虑，林彪开始提出，在“三北”地区，特别是在华北地区，要进行人工“造山”的工作，以形成有效的战略防御点。所谓的人工“造山”，就是在选定的地点建筑起若干个“山头”，内部修建坚固的防御工事，每个“山头”之间的炮火可以相互支援，形成火力网。这样的“山头”既可以抗击核攻击，又有充分的弹药和物资储备，可以保持长时间的生存和抵抗能力。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林彪多次出外看地形，并先后选择了天津、保定、石家庄、郑州等地，作为“造山”的试点，以形成对北京防御的支持。以后，他还曾亲自视察过这项工作的开展。

对于华北西面的防御，林彪认为山西一带的地形是可以利用的，于是要亲自去看地形。1969年9月的一天，林彪通知我准备飞机，说他要到张家口一带去看地形。我准备了两架飞机，除了林彪自己乘坐以外，还有一架飞机供警卫部队使用。

那天上午8点，我到了北京西郊机场。不久，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也到了。等到9点，林彪带着叶群来到机场。我们一起登上飞机，向山西飞去。

10月16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了武汉。同一天，林彪到了苏州。10月17日，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的全体成员，也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全部撤离到了北京西山。

周恩来把我们已撤到西郊的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回电话说：“谢谢你们，这样就放了心了。你们这件事办得好，一定要提高警惕。”

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撤离北京的不光是毛泽东、林彪及中央其他领导人，国务院各部门、军队各部的领导也进行了相应的疏散。中央、国务院各单位的疏散工作由周恩来和中央办公厅负责，其它各单位自行负责。这次中央领导人和老干部的疏散工作，从拟定名单到具体安排去的地方，全部都是他和汪东兴及中央办公厅一个一个研究决定，并具体办理的。

由于这次紧急疏散行动，草率进行，以至在对一些老同志的安排上发生了问题，对他们或多或少地造成了一些伤害。例如造成了刘少奇主席病逝在开封，实在是令人遗憾。

至于以后有些报纸、文章把这个账统统算在了林彪的头上，说林彪为了迫害老干部，处心积虑地搞了个“一号命令”，一下子把老干部都轰到了外地，从而造成了刘少奇等人的死亡。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极不负责任的说法。紧急疏散这件事情是党中央、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常委、政治局共同决定的，具体执行的是周恩来和中央办公厅。如果周恩来在世的话，他是不会同意这样说的，许多老同志自己也可以作证。为什么只讲林彪和我们而不讲毛主席和周恩来呢？这是不公平的。应承担这个责任的，绝对不应该是林彪和我们。

从时间顺序上来看，紧急疏散的决定与林彪的“一号命令”没有关系。“一号命令”是在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疏散的决定之后发出的。

林彪 10 月 16 日到了苏州，17 日下午他才找秘书口授了“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六条指示”。这六条指示的主要内容是：

“一、要防备苏联以 10 月 20 日开始谈判作烟幕，实行突然袭击，尤其是 19 日和 20 日应该特别注意；

二、全军各部队特别是“三北”地区的各军区，要立即将坦克、飞机、大炮等重型武器实行紧急疏散，对战备工事、重要目标要采取隐蔽措施；

三、要保证通信联络的畅通；

四、加紧国防工业的生产，特别是要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武器的生产；

五、各军区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六、战略导弹部队要作好发射准备。

林彪口授后，让秘书整理成记录稿。然后，叶群要秘书把记录稿再抄一份，由她自己通过电话传给武汉的汪东兴，请汪东兴立即报告毛泽东，另一份由秘书传给北京的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在传给黄永胜之前，叶群要秘书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以上六条，已经请汪东兴同志报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当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准。”后来，汪东兴给叶群来电话，说毛泽东对林彪的“六条”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黄永胜接到林彪的“六条指示”以后，把阎仲川叫到军委办事组，向他作了传达，阎仲川作了记录。传达时，我、李作鹏、邱会作和李德生都在场。传达完以后，黄永胜告诉阎仲川说：“你去传达吧。”

阎仲川问：“怎么传达呢？”黄永胜说：“先用电话向各大军区首长传达。”

阎仲川回到总参作战值班室以后，同作战部一起拟了一个电话稿。他考虑，这是军委办事组转移到西山以后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从第一号编起，于是就要值班参谋将这个命令编为“第一号号命令”。所以，这个“第一号命令”的名字还是阎仲川给起的。

以后有人说，林彪的“第一号命令”是“反革命政变”的总预演，这不是实事求是的。

第一、当时林彪的地位没有受到威胁，“九大”以后接班人的位置名正言顺，没有必要搞政变。说林彪当时搞政变没有任何证据。

第二、从 1969 年初开始，防范苏联突然袭击的战备问题，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共同决策。毛泽东、周恩来对此有过多次讲话、指示，中央发过多次文件，这都是有案可查的，不能因为林彪一个倒了，就把责任全都推到林彪一个人身上，甚至把本来正确的东西说成是错误。

第三、当时的中苏关系确实错综复杂，以后的多种材料也证实，当时的确存在发生战争的危险。世界上有很多因缺乏及时、有效防备而遭到惨重损失的例子，也有不少因采取了措施，而使战争没有打起来的例子。实事求是地说，建国以来，毛泽东、党中央在战备问题上采取过多次防范措施，是不是事事都料事如神？那也不是。同样，林彪也是人，预防了一次没有打起来的战争，为什么就说他是神经质，说他要搞政变呢？

第四、说许多老同志的疏散，是因为“一号命令”而起，这就更不是事实了。实际上是战备疏散在前，“一号命令”在后。这件事情，只要稍稍一查证，就可以弄明白了。

关于这件事情，以及其它与此类似事情的一些说法，当时是为了稳定局势的需要，有倾向性，对事实有歪曲。但是现在，我们应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对过去的事情加以评价，最起码也要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

关于“两个一切”

1968 年夏天，一次空军党办的王飞和周宇驰向我提出，林立果到空军已经快一年了，他学习努力，工作也很积极，现在他想到下面去转一转，搞一点调查研究，为空军领导收集一点材料，提供一些意见。我说：“这些都很好。他是空军党办的秘书，为空军党委做一点事情，应该放手让他去干，对他也是一个很好地锻炼。能够下去，做一些调查研究，提出建议，也算是一点成绩嘛！”

为了工作方便和林立果的安全，我要王飞他们成立一个调研小组，让他们用这个调研小组的名义下去活动。我给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调查下面部队飞行训练的情况、事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我还特别叮嘱王飞和周宇驰，下去后，一是要注意保密，二是要注意安全，不要出任何问题，否则的话我们就对不起林彪了。

以后，我实在是因为各方面的工作太忙，一直没有具体过问调研小组的情况。这个调研小组到底有多少人，又开展了些什么活动，我并不知道。“九一三事件”以后，有人把调研小组与“小舰队”联系起来，说是我批准成立的这个“小舰队”。实际上，我批准成立的只是一个调研小组，而“小舰队”是林立果他们背着我搞的，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我也是在“九一三事件”以后，才知道有这个“小舰队”的问题。

这里，我还要说一下关于林立果在空军的任职的事情。

1969 年 10 月的一天，叶群对我说：“现在中苏边界的局势紧张，战备工作吃紧，你的工作又太忙，经常直接向‘101’汇报情况也有困难。但是空军又有许多问题，包括作战和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需要经常研究。在科学技术方面也需要不断地改进，航空工业也要逐渐跟上世界先进水平。‘101’的意见，立果除了负担办公室的工作以外，如果他能兼任作战方面的一些工作，就可以从中研究和

学习空军的技术和战术。另外，通过立果对一些问题的汇报，‘101’也可以帮助考虑建设现代化空军的许多问题，对你们也可以有所帮助。”

由于叶群是打着林彪的名义，她提出来这个问题以后，我想应该考虑一下。在叶群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中央已经任命毛远新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讷也已担任《解放军报》的副总编辑。我想，叶群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能与毛远新和李纳的任职有关。这样，我考虑林立果是林彪的儿子，是不是也可以在空军任一个差不多的，但是要比毛远新和李纳级别低一些的职务。

我同空军党委的同志一起作了研究，我说：“林副主席把立果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空军的信任，对空军工作的支持。我们一定要把立果培养好。”经过研究，大家一致同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付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10月17日，由我和政委王辉球共同签署，同时任命刘世英、周宇驰和林立果三个人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并任命林立果兼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

关于任命林立果的问题，我原来一直以为叶群传达的是林彪的意见，一直到1989年4月我见到林立衡，她对我说起，林彪当时根本不知道林立果当作战部副部长的事情，这件事情是叶群和林立果背着林彪一手操纵的。经她这一说，我这才想起来，林彪确实从没有对我直接提到过林立果当作战部副部长，或表示出他知道此事。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内情我就不知道了。

在这之前，空军党委办公室已经改编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王飞被任命为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军办公室主任。这样一来，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就完全被王飞、林立果、刘世英、周宇驰等人所控制了。

林立果出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的任职命令公布以后不久，王飞、周宇驰带着林立果来看我。林立果说：“谢谢吴司令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说：“是你自己的努力，工作水平有很大的进步。你也要感谢党办的同志们，他们费了不少心血。”我说：“今后你可以放手工作了，凡是有关空军建设、科研技术、航空工业，你就可以直接向林副主席汇报，你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可以指挥一切。”这句话一出口，我感到有一点冒失了，但是已经无法收回了。我当时说这话的意思，是因为他可以直接向林彪汇报，可以直接接受林彪的指示，所以就不假思索地冲口出来了这“两个一切”。

这句话以后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我曾经想收回，但是又怕得罪林彪，收回反而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就没有这样做。但是后来说我的这句话就是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见最高法院的判决书），这不是事实。实际上，不仅是林立果，就是我这个空军司令，在空军也不是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对这个问题，我在后面有详细说明。

我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句话，以后把空军闹得天翻地覆。

这句话后来被党办的王飞和周宇驰有意加以利用和扩散，起初是在 1970 年的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林立果和周宇驰他们下去蹲点以后，搞了两个调查报告，提出有关空军建设的十个问题，建议研制垂直起降飞机和短距离起降飞机。这两个报告经毛主席和林彪同意以后，传回到了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对此专门进行了讨论，并指定周宇驰到会作说明，周宇驰在会议上介绍情况时说：“吴司令对林立果评价很高，说林立果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次党委办公会议我没有参加，但是周宇驰说的这番话，事后我知道了。我当时很想出面加以说明或进行制止，但还是因为害怕得罪林彪，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回想起来，当时我是应该出面制止周宇驰等人对我在私下场合说的话，当作指示来任意扩散的。现在看来，他们这样做是别有用心。

尽管我当时对王飞、周宇驰等人的做法非常不满，但由于林立果搞了调查报告以空军党委的名义上报，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我还是很高兴。为了对林立果表示鼓励，我送给了他一块怀表。这块表是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们打淮阴时缴获的战利品。不久叶群就打来电话，很高兴地说：“吴司令，你这样器重林立果！我们立果说，永远是吴司令的小兵。”在这个时候，我哪里能想得到，就是这个林立果，以后竟背着我搞了那么多的事情，还和空军党办的一些人，一起来搞我的材料！

林立果的“讲用报告”

林立果当年还曾经做了一件在空军大有影响的事情，这就是他作的“讲用报告”。1970 年 7 月 31 日，空军政委王辉球召集空军司令部、政治部二级部长以上的干部，在空军办公大楼的七楼会议室开会，听取林立果讲学习毛泽东著作的

体会，即听他作“讲用报告”。这种“讲用报告”是当时全国各地以及部队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一种形式，是当时的一种时髦。林立果用这种方式，想哗众取宠。

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最初曾经在“林办”讲过一次。叶群告诉我，“林办”的人对这个“讲用报告”反映强烈，都认为讲得不错。我说，林立果是空军的干部，既然“林办”的同志反映很好，那就叫林立果在空军的干部会上也讲一次吧。随后，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王辉球。

7月31日那天，我和陈绥圻正好住在西山。这个“讲用报告”开始以后，王辉球才要秘书通知陈绥圻去参加会议。等陈绥圻从西山赶到了空军大院时，林立果的报告已经开始一个小时了。会议中间，周宇驰对陈绥圻说，林立果讲完是不是请她也讲几句。陈绥圻因事前没有准备，就说不讲了。周宇驰又提议：“那就带领大家喊几句口号吧？”陈绥圻不好再推，就让他帮助拟几个口号。

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很长，差不多讲了整整一天。讲完以后，王辉球首先讲话，接着王飞又讲了话，他们两人都对林立果的报告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王飞还利用这次讲话的机会，又宣传了我说的“两个一切”。最后，陈绥圻带领大家喊了十几个口号，会议就结束了。

林立果作“讲用报告”的时候，我不在场，事后调来录音听了一遍。从录音上听，这个报告大致上可以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问题，第二部分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第三部分是中国要强盛的问题。听完以后，我感觉林立果讲话的口气太大，尤其是第三部分，如果由林彪来讲还比较合适。但出自林立果之口，就显得太过了。

过后，我打电话给叶群，跟她说，在林彪和她的培养、教育下，林立果到空军以来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他的这个报告讲得很好，是在空军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叶群听了我的话很高兴，说：“都是吴司令你的培养。今后对立果还要严格要求，让他不要翘尾巴。”

事后我找到王飞，问他为什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到处宣传我说过“两个一切”的问题。王飞解释说，他当时也没有考虑到这样多，他认为，这句话无非是表扬林立果的意思，说林立果水平高，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要他立即在录音上把“两个一切”的那一段删去，不准再扩散。

当时空军正在召开“三代会”（“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林立果在空军机关作报告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大会。代表们出于对林彪的敬仰和信。我起初不想播放这个录音，但是在代表们的一再要求下，我也就同意了。在给“三代会”播放林立果“讲用报告”录音之前，我再一次告诉王辉球，要他一定要把王飞的讲话录音删掉。当陈绥圻得知要放录音之后，也向我要求把她领喊的口号部分删掉，我要她自己去向王辉球反映。结果王辉球把自己和王飞的讲话都删掉了，唯独留下了陈绥圻喊口号的录音，这样一下子就把陈绥圻推到了前面。陈绥圻对此很有意见，但木已成舟，已经没有办法了。

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录音播放以后，代表们反映强烈，纷纷要求印发这个报告。王辉球又把代表们的这个意见反馈给了我。

我不同意印发，对他说：“林立果的报告是好的，但是有些地方还要推敲。这个报告现在不能印发，如果印发了，反而会给林副主席帮倒忙。”

接着，我又就“三代会”代表要求印发林立果“讲用报告”这件事，给叶群打了电话，谈了我的看法。叶群表示完全同意我的意见，说：“不要印发。”但是有空军党办的一些人推波助澜，挡也挡不住。后来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后期，连周恩来都提及此事，我就又严令将此风刹住，但也未完全奏效。这个事情，我在以后的章节有详细论述。

《邱会作回忆录》摘录

“反江青俱乐部”

党的领导人之中夫人作风不好的有之，但像江青这样在全党要霸道的，还是我党有史以来第一个。江青的要霸道在文革中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林总的支持下，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是坚决反对江青的，也就是反对中央文革的，这是保卫人民解放军决定性的斗争，在文革中保卫解放军不被江青插手就是保卫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历史事实完全可以证明：在文化革命中，

军委办事组是反对江青的英雄！反对江青成为我们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康生把我们的活动称之为“反江青俱乐部”。

过去有些事情看不清，现在就逐渐明白了。当毛主席为反修防修搞文化大革命，林总都是支持毛主席的。毛主席搞的是“造反有理”，不怕乱；相信群众，依靠造反派，“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林彪希望文化革命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因此林彪从在上面的中央文革、江青一伙，到下面的造反派，都不感冒。另外，林彪看得清楚，毛主席在文革这个“公事”之外，还有些“私虑”。他要按他的“理想”行事，让人民解放军为其服务时，林总就消极了怠工了。因为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来看，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背离了原来反修防修的宗旨。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现在想起来真是惊心动魄的问题，就是人民解放军要尽力做好工作，从崇敬、爱护毛主席的感情出发，在具体工作中纠偏。斗争的主要形式就是抵制江青的错误，一心一意为主席补台，但客观上、实际上就是抵制了毛主席利用解放军办“私虑”。但江青和毛主席在政治上的“根本”又是一致的，这样在客观上又妨碍了主席的“私虑”，主席内心是不高兴的。遗憾的是我们当时没有认识到，问题十分复杂。黄永胜身为军委办事组的头人，他热爱毛主席，却憎恨江青，挖苦、谩骂江青毫无顾忌，别人提醒他，他却不以为然，再加上汪东兴一个劲的误导（汪总是说毛和江是两回事），黄有一次竟说：“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我们还是毛主席的兵呢！”，自以为和毛主席感情深。殊不知你就是跟毛主席南征北战一辈子，得罪了江青也是面目全非。

1966 年 8 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造反派也就同时出现了。从军队来说，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基本上是“空对空”，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对江青的造反路线的斗争就不同了，这个斗争是“实打实”的，是为了军队不受破坏而斗争的。我们对江青一伙的斗争是坚决的、认真的、积极的，当然这种斗争又是十分复杂的，因为毛主席对造反派是支持的态度。

限制江青为代表的造反势力影响到军队，是斗争的中心问题。对江青和造反派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再加上毛主席和江青的特殊关系，斗争又是复杂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江青除了一个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的头衔之外之外，什么还都不是，但她已经是以党内第三号人物自居了，把总理根本不放在眼里。对这个问题，她在公开场合所占的位置就可以看出一些。凡是有毛主席出场的场

面，江青的位置总是同林彪不相上下，在多数情况下，江青与林彪并肩出场，至少也是跟在林彪之后；凡是周总理领头的场面，江青至少也是同总理并排出场；凡是中央文革单独出场，江青当然就是“霸主”的位置，总是走在前头，后面跟随的人还要同她保持一段距离。当然，这只是表面。关键是在当时的中央碰头会上，江青总想“夺”总理的主位，总理对江青常常又很迁就，因此，在文革中整体的工作环境是很困难的，事情是很难办的。

1970 年 3 月到 4 月间，毛主席在武汉派汪东兴去东北检查战备时，来回都在北京小住。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在汪东兴家长谈过两次，每次谈的时间都在五小时以上，在三座门也长谈过。所谈的内容当时是天南地北的，但中心的是谈毛主席与江青关系问题，据汪东兴说，江青同毛主席的夫妻生活，早在 1964 年就结束了。从汪谈话中，他让我们确信毛主席早和江青在生活上并无特殊关系，当时我们信了，所以抵制江青就无顾虑了。现在看来，上了汪东兴的当，也可能是汪出于对江青的不满，借助我们反对江青；也可能是毛主席授意汪，要我们一顿，欲擒故纵吧。

江青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从他的举动就可以知道她的喜怒。凡进场见人先笑后说话，并同大家一一握手就是心里很高兴的表现。凡进场不说话，也不同大家握手，气冲冲地坐在那里，就是心里很不高兴的表现，对她必须提防，否则谁都可能遭灾。凡是坐下之后噘着嘴，摔茶杯，摔擦手的小手巾，心中就有火了，很快就要骂人了。

1968 年夏的一天晚上，中央碰头会议在钓鱼台 16 楼开会。因为要讨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问题，周总理通知我也去参加会议。我到会场不久，江青来了。她入场的时候，全体的人员包括周恩来、康生在内，都要起立以示迎接。周、江、康为序的座位是固定的。坐下不久，护士给她端来一杯开水和送来一包药。江青随手端起开水喝了一口，水可能热了，她随手把杯子向地下扔去并大声说：“唉呀！不得了了！护士想用开水烫死我！你汪东兴，这样大的事你也不管一下呀！你心里还有没有毛主席呀？”我坐得比远，也被扔茶杯的响声吓了一跳。在此情况下，汪东兴只好出到外间，叫护士给江青重端来了一杯开水。开水送来之后，总理用手在杯上摸了一下，并对江青说：“开水不热，请吃药吧。”江青这下才息怒，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说话了。

1968 年冬，江青病了。大概有些天，除了张春桥、姚文元去看过她之外，其余的人都没有去看她，她的心里很不舒服，要找机会出气。一天，江青对着她的秘书、护士和总医院去为她看病的医生凶狠狠地问：“中央碰头会议的那些人是都病了，还是都死了？！”工作人员都知道他问话的意思。事后，她的护士同我和叶群在电话上说了，叶就要黄、吴去看她。后来，护士同江青说：“黄总长、吴副总长来看江青同志，并问江青同志好！”江青还是凶狠狠地说：“他们现在不用我保护了，有权有势了，还来看我？我才不稀罕！”

江青为了掩盖自己的丑事，1967 年秋天总理和杨成武派人到上海、杭州、南京抓了一批人。江、浙、沪两省一市的公安厅、局长，抓了不少人，连她在 30 年代的保姆也抓起来了，并一律用飞机运送到北京关进了秦城监狱。

江青不仅抓了自己的仇人，也提出要为别人抓人。一次，总理、杨成武、吴法宪和我在场，江青对叶群说：“傅连暲在 50 年代初，不是害过林副主席吗？现在，为什么不报仇！”叶群笑了笑回答说：“傅连暲还好，就是教林副主席养身之道，现在他（林）自己都会查药典了。”江青认为叶群不识抬举，立即说：“把傅连暲抓起来，待后再处理。”大家都不吭声，江青就火了，这时总理说这件事我来办。也就过了一天卫戍区来了几个人，给我看了总理的条子：“把傅连暲交给来人，周恩来。”我看了条子之后知道总理并不是指名叫我办的，我就给总后副参谋长陈庞打了电话，陈庞带着他们到了香山傅的住处，翻墙进去把傅连暲带走了，并关进了秦城。

江青的劣迹是很多的，黄永胜抵制江青是坚决的。黄的这种坚决有坚持原则的一面，也有不知毛、江深层次关系的一面；而总理常常对江青是“顾全大局”的，这种“顾全大局”有总理相忍为安的一面，也有他知道毛、江深层次关系的一面。江青闹事常常搞得大家不得安宁，有一次江青为军委办事组的事对总理发了火，总理深更半夜就把黄永胜、吴法宪叫去。黄永胜的安眠药正在起作用，为了给黄提提神，总理给他倒了一杯咖啡，黄没拿住，撒了总理一腿，总理忙说：“没事，没事。”（事后黄永胜在办事组说起这事，还为总理的处境而难过）。总理接着说了江青发脾气的事，并说：“我明天带上你们几个去看江青同志，任他发火，你们一句话也不要说。”第二天，总理带上黄、吴、李、邱去看江青，到了江青

的住处，等了很久江青才傲里傲气地从楼上往下走，总理赶忙上去扶江青，其实江青哪里需要扶嘛！我们都看不过去。

反江青的两个不同时期

军委办事组抵制江青是有个发展过程的。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杨成武时期；黄永胜时期。这两个时期，杨成武时期，合作是主要的。在黄永胜时期，毛主席对江青的任何动向，汪东兴会立即传到叶群那里去，叶又转手传到黄永胜、吴法宪那里去；林彪对江青的任何动向，叶群会立即传到汪东兴、黄永胜、吴法宪那里去。汪东兴、叶群、黄永胜、吴法宪四个人，是运转这种动向的中心人物。以前说过，杨成武是林总最亲信的人物之一，1965年12月上海会议后他实际上成为林总的接班人了。林总的任何活动，杨成武都是了如指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对林总、江青之间的关系也是一句不说，一字不漏的。从文化革命开始，到杨成武下台，我和李作鹏、张秀川同杨成武的关系算是最亲近的了，但对林总和江青之间的“关系”，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的。

从1968年3月黄永胜上台之初，他同杨成武的政策基本上是一样的，关于林总、江青之间的关系也是滴水不漏的。黄、吴、李、邱都是同一个桌子办公的，黄、吴两个人挨着坐在一起，他们要是有什么事，总是交头接耳，或者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商量。有时干脆要李、邱离开。究竟是什么事要这样办，我们二人同他们三人相互之间，大体上是“心照不宣”的，江青的事还是范围越小越好。因此之故，我们之间也就不会发生什么工作上的“误会”。

八届十二中全会正在进行的时候，有一次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会议楼第三会议室开会，黄、吴先到了，并兴高采烈地在说：“……他们不止是一个宗派，是一个帮会，是上海帮。”我们听到黄、吴正在说话，我把李作鹏拉了一下就向外走。黄即说：“你们两个坐下，不要走。今天可以同你们谈点你们听不到的话。”黄永胜接着说：“林总提出了反江青宗派主义。这个问题今后会向你们说清楚的。”从此以后，关于林总、江青之间的关系，黄、吴对我们的态度确实有些变了。首先是对一些重大问题，黄、吴对李、邱就会透露一些了，其次，对李、邱

有关的问题，他们也会分别同我们“个别谈话”。提醒我们不要撞到江青的枪口上。

九大之后、黄、吴、李、邱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了，可以同桌共议了。关于林总、江青之间的问题，我们四人之间无话不说了，我们四个人的关系起了质的变化。黄说：“过去有些事没有同你们说，有过去的情况。现在就会一切都同你们说的，毫无保留了。不仅如此，过去没有同你们说过的事，也会同你们说的，补上这一课。因为事情都有一个发展过程，过去的事不同你们说清楚，就不能为你们了解今天。我们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出了什么事，我们一个也跑不了的。你们怕不怕？要是怕也可以退出。”说完他自己笑了起来。

黄、吴关于林总和江青之间的问题，确实同我和李作鹏“补了一课”，而且是内容非常丰富的一课。在九大期间，有一天，黄、吴、李、邱四人在京西宾馆大楼八层东边大房间从晚上 8 时谈到第二天早上 6 时，一共谈了十个小时，我们是边谈边议的！

我们对江青一伙的问题确实谈得很多的。如有重要问题，不管是三更半夜，只要一叫，就会风雨无阻地聚集在一起的。我们自己也开玩笑说：“我们这样经常谈论别人（指江青）的长短，若是她知道了，非得把我们五马分尸不可！”

为了好谈论问题，我们为上海帮几个人都编了“代号”。康生叫“8 楼”（住钓鱼台 8 号楼）或“两撇”（八字胡之意）；江青叫“11 楼”（住钓鱼台 11 号楼）；张春桥“眼镜”；姚文元叫“小的”。这样，我们打电话和见面都使用代号，有时只要打个手势就行了。例如，嘴巴上摸一下就是指康生，伸出两个手指（11）就是指江青。

黄、吴、李、邱同康、江、张、姚之间，好像很自然地成了“人以群分”。我们之间，如果不是有意同他们凑合凑合的话，那么，无论休息、走路、吃饭、政治局开会坐位置等等都分得清清楚楚。真是“楚河汉界”了。

黄、吴、李、邱每人都有一本反上海帮的老账。从数量上来说，我的账最多。这是因为江青支持二医大整我和调“红纵”来对我搞武斗，我实在太伤心了！因此，我就装着一付“老憨”的样子，什么都敢说。江青就向叶群说过：“邱会作这个人，为什么那样不讲礼貌！”

在反对江青的问题上，林彪的支持是一条，但最重要的是总理心中的支持和其他老同志心中的支持。在当时的政治局中，总理，黄、吴、李、邱，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等等都是一派，只有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是一伙。其他不参加政治局办公的人，如朱德、叶帅、董老、刘帅，在大的问题上，和大家也是一致的。在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中，总理看得清，但他怕主席、不敢得罪江青，他总以过去有账，怕主席挖伤疤；黄、吴、李、邱都是红小鬼出身，一直在军队工作，没有历史问题，政治上一身清，又是“双一”（一军团、一方面军），毛主席、林彪、总理都信任我们，所以我们敢顶碰江青。

尤其是我们反江青对总理领导的蔑视，反对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对讨论重要问题的破坏。总理是非常智慧的人，他事事心知肚明，总理又是十分顾全大局的人。总理虽然不敢出面冒犯江青，但在后面支持我们，有时在会上还故意“和稀泥”。只要是总理和了稀泥，会后他会我们说明，并教育我们有些非原则的事，不要搞得太冲突。譬如，大会堂有一个提供冰激凌的地方，每次开会休息时，吴法宪和姚文元都去抢这个地方，吴法宪虽胖，速度远比姚文元快，我们抢到了这个地方，江青、张春桥他们就不去了，然后我们几个再过去，其他同志也过去吃冰激凌；如果姚文元抢到这个地方，也只有江青、张春桥过去，其他人都不过去，起来伸伸懒腰就原地休息。

这个“反”不简单呀，是拥护毛主席，反对江青，庐山会议之前汪东兴和我们又是一致的。这样就扼制了江青一伙不少对中央正常工作的扰乱。九大以后，有一段形势不错，就是通过抵制江青一伙，扼制了毛主席在文革中的路线，被江青一伙的搬弄的往更“左”得方向发展、蔓延。

我反对抵制江青的事例，还记得一些，例举如下若干条：

1、同邱国光的谈话。1968年7月间，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邱国光调任中央卫生部军管小组组长。到任之前，黄永胜和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直截了当地向邱国光说了不要上江青的当，主要谈了两点。一是，不要他插手北京医院“三一〇”专案。我同他说，北京医院的专案是江青亲自设立的，任何人不能插手。别人要是插了手，自己就会被变为专案对象的，你要是插了手也会变转为专案对象的。二是，中央卫生部的文化革命，不要陷入派性。北京的派性就像你们广州的“广交会”一样的，你只要不注意，别人就会同你做交易的。我说了之后，黄永胜还

接着说了：“你们一家子（都姓邱）说的问题要特别注意，又要特别保密。如果传出去了，其后果是难以设想的。

2、不投江青的票。选举前的一天，办事组的在京西宾馆开会，黄永胜在会上专门讲了毛主席强调要自主选举，不要受制于他人，散会时他自言自语地说：“我是不会投 11 楼的票。”黄永胜胆子好大，因为温玉成、刘贤权等也在场，甚至记录的秘书也在。选举中委员时，我没有投江青的票，但我是自主选举的。选举之后，江青少了若干张票，叶群则少的不多。这个问题，对一般人来说，简直不是问题，对江青则是大得了不起的问题。在唱票时，江青听到她自己少了票立即退席了，这个结果是出乎江青预料之外的。张春桥气势凶凶地提出要查选票，他说：“江青少了若干张票，不是‘小’代表不投票，而是‘大’代表搞的，这不是得票多少的问题，是政治斗争。”毛主席知道后，可能嫌江青他们太嚣张，主席说：“你们要违背刚刚通过的党章，你们就去查，我是不参加你们的大合唱的。”这样这场风波才平息下去，但双方结成大仇。

3、劝丁盛不投江青的票。九届一中全会就要开会之时，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的外面，我同丁盛一边喝水，一边闲谈。我说：“等一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如果候选人名单上有江青的名字，就不要投她的票。她是一个反军派，也是反对林副主席的健将！”丁盛回答我说：“江青是这样一个人啊！谁反对林副主席，反对解放军，我们不答应！谁还投她的票？！”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时，江青一伙都少了好几张票，这对他们来说，是十分意外，没有想到的问题。

4、拒绝为江青选调护士。1970 年秋，汪东兴当着江青的面，要我为她选换一个护士。汪东兴说：“江青同志现在的护士，是我们俩人共同在总后系统选的。她快要生孩子，请你还是在总后系统选换一个为好。”我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你自己直接找曹根慧（301 医院副院长）办吧，我再不造孽了（指江青对护士太厉害了）！”江青听到我说话之后，她睁大两只眼瞪着我，一时没有说出话来。正在这时，叶群插上话来了。她说：“为江青选调护士的事，由我来办。”这样江青的火才没有发出来。

5、拒绝陪江青上井冈山。1971 年 7 月，江青自言自语地说：“我准备上井冈山去接受历史教育，要有一个适当的人陪我一起去。”接着，江青对着我说：“吴法宪陪我去过海南岛，李作鹏陪我去过一次青岛，下次上井冈山该你陪我去

了。”我调侃地拒绝说：“我没有上过井冈山。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我脱了开裆裤子还不久呢。”江青外出，为什么一定要解放军的高级干部陪同？我认为这也是她恶霸作风的一种表现。首先她认为自己是毛主席夫人，外出应当受到特殊的保护。其次，她认为自己是中央的“要人”，解放军有保护自己的责任。第三，她认为只有解放军、公安、卫生部门保驾护航外出，才够出风头的。总之，毛主席、林总、周总理能够享受的待遇，江青都要争着享受。

6、拒绝为江青的样板团做演出服。江青有意把她的样板团打扮打扮，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此事非找我就不能解决问题。江青对着我说：“你们部队的毛料子的确良很好，适宜做演出服。样板团的演出服需要解决。”江青有意没有把话说完，她的意思是让我主动提出来。但我是不说那句话，她当场就感到有点难受。当时，总理正在会场上吃饭，他知道我不会主动为江青办事的。总理怕江青为此事发我脾气，就一边吃饭一边说：“样板团演出服，由我来同邱会作同志商量。”江青听到总理的话，就面上带有笑容地说：“我们大家都要学习总理办事的精神。”

7、拒绝管电影、电视工业。从 1968 年起，我是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统管国防工业。几年来国防工业管得不错，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表扬我。当时的电影、电视工业厂子虽然不多，但问题很多，总理也正在考虑“两电”工业划归国防工业系统管理，并征求我的意见。我对总理说：“总理交代我办的事，除了执行之外我不会有任何考虑的。我不想管‘两电’不是怕工作多，就怕吃冤枉！”总理同意了我的意见。江青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她直截了当地同我说：“电影电视工业由你来管，要用很大的力量来办好这一工作，这是很重要的工作。”我毫不含糊地回答说：“国防工业就够我管的了，我管不了电影电视工业。”江青立即向我大发脾气说：“国防工业的厂数以百计，你都管得了，就管不了电影电视几个工厂，真是岂有此理！”黄永胜看到我不好下台了，他插话说：“电影电视工业怎么样管，要由总理来考虑决定，因为还有与国务院各部门的关系问题。”周总理接着说：“对！由我召集一次专门会议研究一下，再决定管理办法。”江青听到黄永胜和总理的话之后，没有再发火了，但撅着一个嘴巴，一句话也不说了。我也坐在那里不吭气就是了。

8、要丁盛防范江青。1971 年 5 月间, 我陪同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黎笋去广州参观访问时, 我同丁盛说: “江青最近接连来过广州两次, 从她的嘴里可以听到她对广州很感兴趣, 对你这个司令也很感兴趣。她还会来的, 她可能给你什么好处, 可最终会是你的灾难, 你要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 否则就要吃亏、上当的。”我接着还说了: “江青这个人是靠不住的, 她要是用你的时候, 把你捧到九宵还嫌低, 她要是不用你, 则把你打到十八层地狱还嫌浅呢。”我最后还说了: “防范她的办法很多, 不要单独接近她, 不要向她请示汇报什么问题。”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 我不了解江青, 没有个别接触过她, 因为她是毛主席的夫人, 我对她敬而远之。在文革中, 看她那样飞扬跋扈, 我不理解; 他乱点老干部的名, 我开始厌恶她, 后来我知道她整我之后, 我就开始反对她。我是不怕江青的, 敢于对她顶撞。我认为江青不过是一只镀了金的纸老虎, 没有什么可怕的! 黄、吴、李、邱反江青是众所周知的, 这方面的事例多得很, 我是无法回忆全面的。

对江青一伙的问题, 无论在我们几个人(黄、吴、李、邱)之内, 或是在更大的范围之内, 行动是统一的。例如前面提到的许多问题就是这样的。当然, 这个问题更多的事例是在九大之后。1971 年“九一三”之后, 张春桥就说过: “过去中央政治局开会, 有大会也有小会, 大会常常搞不过小会。”他所说的就是我们抵制某些问题的统一行动。张春桥又说: “过去在福建厅(政治局会场)开会, 每次开会吴法宪至少要打三次电话。”林彪、江青之间,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就存在矛盾。这种矛盾, 随着形势的进展, 一直在斗争, 并且逐渐尖锐化了。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 他们之间的矛盾明朗化了, 九大之后就尖锐化了, 九届二中全会在特定的条件下, 斗争的结果是林彪失败了, 江青胜利了。这就是林彪、江青之间的真正历史。

话又说回来, 江青遭人恨是事实, 但江青的问题主要还是思想意识和思想品质问题, 这里面有江青的责任, 这是主要的; 也有毛主席的迁就, 这也是不能忽视的。但总起来说, 军委办事组和江青一伙的斗争仍是党内问题, 和公审搞的是两回事。公审是通过搞江青否定文革, 搞臭毛主席罢了。

1972 年 2 月间, 中央专案组李震、郭玉峰、吴忠在对我审查时, 就指出了我们反对江青的三个问题: (一)“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问题就是反对江青, 反

对江青就是反对党；（二）你们反对江青是经常的，可以说达到了无事不反的程度了；（三）九大时有组织地减少江青的选票在党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对他们说的，我除了没有同意“反对江青就是反对党”之外，其余的我都同意了。

李必达事件

李必达事件是发生在九届一中全会将要举行的时候，但事件起始在九大的准备过程中。

李必达是黄永胜从广州军区带到北京来的秘书之一，李是个大学生，在文化革命前参军到 41 军，各方面表现还不错。他所在的团领导是黄永胜的老秘书，经推荐及保卫部门审查后，调到军区不久就当了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初到黄办任秘书，干得不错，黄永胜夫妇都很满意。项辉方对李必达也很关爱，曾几次亲自出马为他找对象。

文革中有一句话倒是很对的，那就是说文革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李必达的灵魂也被腐蚀烂了。李必达家境贫寒，甚至家里因贫寒把他卖掉。在文革中，李必达名利熏心，想当出人头地的风云人物，干惊天动地的大事，捞取政治资本。

黄永胜无疑是拥护毛主席的，但他理解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毛主席和中央的领导下有序进行。文革一乱，那么多老干部受冲击，黄永胜看不惯，1967 年初在京西宾馆开会，他当着江青的面就说：“江青同志要听毛主席的话！”那时他们就结下了仇。黄到中央以后，和江青同桌办公了，他对江青就了解更多了，江青那种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狗仗人势的劲头，她对总理那种放肆的样子，实在让人难忍。黄毕竟是秋收起义的老资格，他敢于和江青斗争，总理也乐得他和江青斗，因为江青对党的正常工作干扰太大了。黄除了抵制江青，和她斗争，背后也骂她“武则天”，“慈禧”，“恶霸”，“对老干部草菅人命”等等。李必达偶尔黄永胜骂江青的一言半语，开始感到吃惊和好奇，后来竟发展到偷听黄永胜与总理，与叶群等人电话的地步，他认为黄永胜这些说出去要杀头的话，总会派上用场。果不其然，他的恶作剧终于发生了。

当时，中央安排黄永胜在北京针织总厂蹲点，黄派李必达在厂里盯守，但他常跑出去办私事，不能忠于职守。同时，李必达因工作中的其他错误受到批评，他不能正确对待，以至发展到了说是鬼迷心窍也成，说是鬼使神差也成的地步，他竟然想当大英雄，终于决定铤而走险，把他平时听到的黄永胜、叶群等人及军委办事组对江青的坏话和不恭，以及把偷听到黄永胜在军委首长之间的电话内容记下来，向江青告状，想扳倒黄永胜。

李必达告黄永胜骂江青的信，写了至少有两三封，他甚至利用职务之便，严重违反军纪，假借黄永胜办公室的名义，盖上“黄永胜同志处”（即黄办）的公章，从总参谋部机要局发出一封给江青的信，随后又通过电话查问，确知他的信已经发出才放下心来。盖上“黄永胜同志处”发文件、信件，是要由保密员马元刚登记才能以机要通信发出。李必达私走机要通信的行为，不论从过去看，从现在看，都是极其严重的违反党纪国法的犯罪行为。

李必达在信中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人经常恶毒地攻击江青同志，他们是一个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的反革命集团！”黄永胜是谁？是我军的总参谋长；叶群是谁？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副主席的夫人。写这样的信，问题显然是很严重的。

还有一封信是通过温玉成转的。李必达从北京针织总厂跑到温玉成那里向温玉成做了汇报，并把信交给了温。李耍赖说，温不答应他就不走。温虽然收下信，但并没有如李必达的愿，李必达太卑鄙太龌龊了，温玉成经过考虑把李必达的一封信转到了叶群手上，因为叶群是林副统帅的夫人。温玉成这样处理，这是李必达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大概是 4 月 25、26 日，凌晨 3 时多，黄永胜有事找李必达，派人到针织总厂没找到，说两天没来了；又到京西宾馆找，偶而发现了他的问题。李必达的房子，在未烧尽的纸灰里发现了一张烧残的纸片，上面写着：“敬爱的江青同志，我是黄永胜的秘书……”这样简单的两行字，完全可以说明问题。黄大吃一惊，马上派了几路人马找李必达，终于在住京西宾馆的总后九大代表王瑞华（他的未婚妻）的房间内找到了。但李究竟写了什么具体东西，送到哪里去了，则拒不交代，他把希望寄托在江青身上。

由于李的未婚妻是总后 301 医院的，想从她嘴里了解一些情况，于是黄把我叫去了。我到了京西宾馆会议楼一层东厅，黄、吴、叶坐在那里，有些木纳，一句话也不说。还是叶群开始同我说话，她说：“黄总长的后院起火了！”接着叶群就同我说了事情的前后经过。我听后也有些紧张，毕竟搞到了江青头上。叶群急切地说：“你这个一精明人，提点解决的办法吧！”我回答说：“大家一起想，刀山火海也要过呀！”此时，黄也精神起来了，我们就一起谈起了解决的办法。

在小的信封上横写的字是：“送钓鱼台十一楼交江青同志亲收。下面写的是黄永胜同志处。黄永胜一看就是李必达的字。江青用了一个比较大的信封并写上：即送主席亲阅。江青”（这是竖写的）。毛主席用铅笔在“主席”二字上划了一个圈，一个箭头划向江青的名字，并在江青二字的上面写了一个“退”字，是退回江青之意。我们看了一下之后，一句话没有说，也没有什么表情，但心中高兴！在这里得到了三点证明：一是，李必达写的材料毛主席看过了；二是，江青承认了材料是骂人的材料；三是主席没有写为江青做主的话。江青收到退回来的信之后，没有看到毛主席有任何批示。

毛主席对此事的态度黄、吴、叶也不知道，三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但大家分析，信肯定不只写了一封，灾难绝没有过去。我说：“根据李必达的态度，不是很快可以把问题搞个水落石出的，目前应做三件事：1、找小王（瑞华）谈话，看看是否能找到材料的底稿；2、要立即向总理报告，以防被动。此外还要考虑‘闯’江青一下。”

黄永胜说：其他的都好办，唯有闯江青难办？

叶群说：这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从江青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个大概来。现在就要给江青那里发一个电话记录稿过去，内容就写：“10 时整，黄总长要向江青同志汇报一些情况。”他们同意了，电话记录立即发出去了。

10 点多一点，江青向黄永胜直接来了一个电话。她开口就说：“你要来抄我的家吗？”只说了一句，电话就挂了。

根据江青在电话上的态度可以得出如下的判断：李必达给江青写的信，已经送到了江青的手中。但信的内容是无法知道的。这时黄、吴、叶就更忧虑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大祸将要临头了。

我们几个共同商量：1、要找小王谈话，看李是否在她家存有什么东西（李同王的母亲很熟悉）；2、立即把李必达看管起来；3、今天就要去向总理汇报。

9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刚结束，黄永胜对警卫参谋李学金说：“我命令你把李必达抓起来！”抓了李必达即派飞机把他送到广州军区关押。事后，黄办的人到北京针织总厂收拾李必达的东西，在纸篓里搜到李必达给江青、张春桥写信的碎纸片。

我亲自找小王谈过话，所得情况非常重要。她说李必达直接同江青写了材料，其内容都是黄总长、吴副总长、叶主任骂江青的一些具体记录。材料有20多页，材料写好后，李亲自送走的。她不知道材料是否有存底。随后，我和一名工作人员带着王到她家去一无所得。

“五一”节后的一个晚上，约9点多钟，我去向总理汇报了李必达的事。总理听了我所讲的情况之后，说了两点：1、江青曾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她说“我可能要遭到暗害！”只说了这一句，她就把电话放下了。我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我想到了是同你们（指军委办事组）有什么争论；2、对李必达暂可以这样处理，我知道就行了，现在还不必写报告。

此后，黄、吴、叶、邱又在京西宾馆大楼八层东边大房间里共商对李必达事件的处理。

大家认为，第一，对情况已经基本上搞清楚了。李必达向江青直接写了材料，所写内容就是有关我们反江青的问题。

第二，江青收到材料之后，估计会送给毛主席一阅的。主席会表什么态，现在还不知道。但军委办事组反对江青，毛主席是早就知道一些的。

第三，周总理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很好的。

九届一中全会之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政治局开会之前，江青怒气冲冲、自言自语地说：“有些人天天骂我，打电话都在骂我，他们对我恨之入骨。现在‘九大’开过了，我看会骂的更厉害的！”她说了一顿之后，就从自己的皮包里拿出一封信，摆在总理面前的茶几上，并说：“信的内容，现在不能看。”总理拿着大、小信封看了一下，仍然放在桌子上，一句话也没有说，也没有看江青一眼，继续看文件。

江青回到自己座位上又说：“大家都去看一看吧，以便我不得好死以后，也多一个见证人嘛。”她说完话，把小手巾往桌子上一摔，这是她在心中有气的时候惯用的做法。黄、吴、叶、李、邱和大家一样，都去看了一下，在小的信封上横写的字是：“送钓鱼台十一楼交江青同志亲收。下面写的是黄永胜同志处。黄永胜一看就是李必达的字。江青用了一个比较大的信封并写上：即送主席亲阅。江青”（这是竖写的）。毛主席用铅笔在“主席”二字上划了一个圈，一个箭头划向江青的名字，并在江青二字的上面写了一个“退”字，是退回江青之意。我们看了一下之后，一句话没有说，也没有什么表情，但心中高兴！在这里得到了三点证明：一是，李必达写的材料毛主席看过了；二是，江青承认了材料是骂人的材料；三是主席没有写为江青做主的话。江青收到退回来的信之后，没有看到毛主席有任何批示。

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黄永胜留下吴、叶、邱一起向总理谈了李必达的问题。总理说：“事情的发生与处理我都知道了。你们有意见，我也是知道的，但随便议论是不好的。今后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李必达的品质太坏了，一个小小的秘书，竟想借江青之手搞倒总参谋长！而且用的手段是偷听，这属于严重违反工作纪律和秘书的职责。当秘书是受首长信任的，利用首长的信任干陷害首长的事，这真是天理不容。李必达想出大彩，“造反精神”太强了，李必达是因为造反、投机害了自己的。对李必达要处理是没有什么非议的，这种人任何时候也是被唾弃的一类。办事组用飞机把李必达押送回广州军区，但他心不死，在飞机上，他在《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写了“谁拾到语录本，请交中央文革转江青同志救我”几个字，故意把《语录》丢在飞机上，幻想乘务人员收到后会交给江青。乘务人员的确在打扫卫生时拾到了，最后交给了吴法宪转到办事组。事后，我要 301 医院把王瑞华送到军医大学学习了。这样既离开了北京，又没有伤害王本人，我认为对王的处理是正确的。

反江青并不等于反毛主席，我看当时主席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主席心里肯定也不高兴。后来主席就不这么看了，他把反江青反张春桥和反对文化革命连在一起，也和反对毛主席连在一起了。

《李作鹏回忆录》摘录

但在当时极左路线的环境和影响下，以及怕犯复辟、复旧错误的思想顾虑，海军仍有一批冤、假、错案，没有得到及时纠正。主要是与中央已决定的重大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如罗瑞卿问题、贺龙问题等。

此外，我们还着手处理海军层层站队问题。层层站队也就是搞多中心的一种表现，它不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进行站队，而是以拥护或反对某人或某几个人的领导为标准，进行站队。由于上行下效及站队要具体化的错误思想指导，似乎中央有正确和错误路线的代表，有“两个司令部”的“搏斗”，各级无例外地都应有这种现象。这样形成各级都有不同观点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和错误路线的代表，各级都有“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两种错误观点，长时间相互对立，相互摩擦，争吵不休。由政治思想上的错误，发展到组织上的错误。其恶果，既破坏了上下左右各方面的团结，又严重地影响了部队稳定和革命化、战斗化的建设；既发展了资产阶级派性，又掩护了某些人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

海军层层站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

文革初期，毛泽东、林彪和中央军委、全军文革，首先肯定海军李、王、张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同时又肯定苏振华是“彭、黄漏网分子”，是“刘、邓司令部的人”，是应该打倒的对象。这样中央和军委就在海军党委内部确定了两个界限分明的阵营，这是形成层层站队的主要根源。当时各舰队、各院校的主要领导干部，有的“压制了群众运动”，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有的平时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有错误，脱离群众，引起群众不满；有的是过去反对李、王、张，拥护苏振华的，政治风向一转，他们就受到冲击，说话无人听，指挥机关处于半瘫痪或瘫痪状况。

为了与中央和军委保持一致及稳定部队，坚持战备的需要，海军党委支持和解放了各舰队大多数受冲击的干部站出来工作，以各种不同方式进行表态，保护他们。而这批干部又希望以支持海军党委和李、王、张提高自己的领导威信，取得群众信任，这就是在中央确定的大背景下，海军内部上上下下互相支持、互相依靠而形成层层站队的主要原因。

其次是海军部队和院校主要分散在沿海各省市，并担负当地的“三支两军”任务，海军部队不同观点的形成又与所在地各大军区、各省市群众不同观点相联系的。例如旅大地区，一种观点是支持海军党委和李、王、张，不支持沈阳军区和旅大警备区。另一种观点反之。山东地区一种观点是支持海军党委和李、王、张，不支持王效禹（省革委会主任）和杨保华（青岛革委会主任），另一种观点反之。沿海其他地区，皆有类似情况。总之，海军部队及院校基本上是以支持海军党委和李、王、张或反对海军党委和李、王、张的两种相反观点，划线站队。

总之，由于层层站队，又人为的“制造”了一批犯站队错误的领导干部。

我们对于这种错误，自 1968 年就开始纠正：第一、强调要以拥护或反对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为标准进行站队，而以某级党委或某几个领导人为标准站队是错误的；第二、立即停止突出李、王、张的宣传，明确指出这样做不是真正支持李、王、张，而是“帮倒忙”；第三、将地方派性陷得很深的部队进行互相调防，使之与地方造反派的派性脱勾。例如，威海水警区与旅顺水警区，青岛水警区与海洋岛水警区，沙埕水警区与长涂水警区，互相调防。各航空兵师也进行互相调防；第四、强调正面引导，坚持正面教育，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要求各部队，对地方运动不参与、不支持、不表态，减少地方运动对部队的影响。

对于层层站队这种顽疾，虽采取上述措施，收到一些效果，但没有根本解决问题，一直拖延到 1971 年批陈整风，才引起大家严肃认真地来解决这个问题。海军党委带头作自我批评，并得到毛主席的表扬。

1968 年 6 月 28 日，海军召开第二次四好连队代表会议，主要目的是坚持基层部队的正面教育，表扬四好连队建设搞的比较好的单位，宣传他们的先进经验，引导指战员将精力转到四好连队建设方面来，以增强部队稳定性，削弱或分散派性思想对基层部队的渗透。我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进行重新动员。

海军党委在会议期间作出了《关于树立四好连队标兵，普及四好连队先进经验的决定》。决定树立南海舰队快艇第 11 支队 11 大队 3 中队、南海舰队航空兵高射炮兵第 8 团 6 连、东海舰队航空兵第 4 师 10 团 2 大队、北海舰队潜艇第 12 支队 125 艇等十四个单位为海军四好连队标兵。

林彪知道海军召开四好连队代表会议，也及时作了指示。其大意是：总的讲，军队不抓基层不行，抓基层不抓四好不行。政治不能松，其他也不能松。政治思想好与其他三好不能并列，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中心，用毛泽东思想挂帅。但抓好了政治思想工作，不等于把其他都抓好了。三八作风、军事训练、生活管理也要抓。如果基层搞不好，政治觉悟不高，那就会漏洞百出，堵不胜堵，就不可能搞好三支两军工作……

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等，于 8 月 11 日下午，接见了出席四好连队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大会于 8 月 13 日结束。

从 1968 年秋季开始，我和王宏坤、张秀川之间在对海军机关、部队如何进一步稳定和解放干部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意见。当时由于我在军委办事组工作很忙，顾及海军的事情确实少了一些，除了重大问题参与研究决定外，一般的事情基本就交由萧（劲光）、王（宏坤）、吴（瑞林）和张（秀川）等常委成员集体研究办理了。这期间，发生了三件我意想不到的事情：

其一、“海政文办整风”。海政文革办公室整风这件事，张秀川曾向我报告过，我也同意。因为整风的初衷是统一思想，解决海军政治部中，在落实干部政策、加快解放干部、清理阶级队伍等问题上存在的不同意见，争取通过整风，达成文革办公室成员思想上的一致。

但在整风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这本来也是正常的。身为海军副政委的张秀川作为主管海军政治部的领导，本应在两种意见中进行协调，化解矛盾。但他却支持一派意见，反对另一派意见。非逼着海政文办主任、海政保卫部部长萧云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撤消萧云文办主任职务。张秀川事先并没有告诉我，整风的目的是要撤换谁，把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搞的复杂化，我当然不能同意，并要求海政立即停止所谓的整风。

其二、王剑魂事件。王剑魂是海政文化部部长。1968 年秋的一天晚上，王、张两人到京西宾馆找我说：“王剑魂现在表现不好，群众意见很大，要求批判他。”并征求我的意见，可不可以批判？我答复是：“可以批判，但要按人民内部矛盾批评教育。”我又强调：“要团结大多数。王剑魂，我也不说他很好，也不说他很坏，批评教育可以，打倒不同意。”但他们回去后，并没有按照我的意见办。在两天的时间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办公楼内外。

当时海军机关大字报刚刚收起不久，墙壁也刷洗干净了，现在又闹得满楼风雨，乱七八糟。

一天凌晨，我由京西宾馆办公完后回海军大院，路经海军机关办公大楼，发现墙上和地上又有大量的大标语和大字报，我就停车进楼观看。大字报的数量如此之多，大字报的内容充满了敌我矛盾的语句，还有什么“砸烂王 xx 狗头”之类的恶语，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在场的人说是根据李、王、张的指示，要运用大字报大批狠批，不低头认罪就不罢休。我看了之后很生气，对在场的人说：“我没有指示要搞大字报围攻，要搞突然袭击，要搞大批狠批，要砸烂狗头。”

王剑魂既不是什么大的当权派，也不是什么反动学术权威，更没有严重问题和错误，为什么如此兴师动众，闹得机关大院不得安宁呢？醉翁之意不在酒。原来王是个老老实实的文人，懂一点古文诗词，有时我请他到我家中给我解释唐诗宋词，不过如此而已。王、张大概以为我在海政安设了什么对他们不利的“据点”和“钉子”，非要把它彻底“拔掉”不行。我当即决定停止批斗。

其三、“青岛潜士校事件”。1969 年 1 月，青岛杨葆华反军派开始策划冲击我北海舰队潜艇士兵学校。这所学校不同于海军的其他院校，它是我潜艇士兵的训练基地，从文革开始就是正面教育单位，不开展“四大”。

地方反军派的动向，北海舰队及时报告了海军文革办，海军文革办又及时报告了主管领导张秀川。但张既不向海军党委常委报告，也不向舰队布置对应的措施。几天后，杨葆华的反军派大规模冲击潜士校，造成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之后，反军派又冲击并一度占领了舰队指挥机关，不得已，舰队指挥机关只好搬到东海饭店（舰队第一招待所）办公数日。事后，舰队对海军的意见很大。

这个事件，不仅惊动了海军，也惊动了军委办事组。因为从 1968 年下半年开始，除局部地区外，地方造反派大规模冲击军事设施并发生流血事件已比较少了。张秀川在这个事情上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我回海军召开了常委会议，批评了张不负责任的态度。

潜士校事件后，中央决定由北海舰队领导出任青岛市“核心组组长”职务，青岛的形势才趋于稳定。

记得早在 1965 年，张秀川就对我有某些意见，或是误解。起因是干部的任用问题。当时负责海军干部工作的杜义德副政委，在一次常委讨论干部问题时，悄悄

向我提出，是否将张秀川提为副政委。我当时考虑，张秀川到海军后的工作是积极的，但海军老资格很多，张秀川刚到海军才三年，另外部队干部任职，确有要看资历的情况，还是慎重些好。因此我提出，请杜了解一下各大军区是否有“三八”式干部任大军区副职的先例，待了解后再议为好。做为常委成员之一，我仅仅是个人的建议，提还是不提也不是我说了算的。但事后，杜义德却将我的想法和建议私下里告诉了张秀川，张对我的意见极为不满，他曾当面指责我：“把我提为副政委你为什么不同意？你是唯德、才论对，还是唯资格论对？”虽然张秀川对我的指责是毫无道理的，但杜义德违反组织纪律，挑拨是非，破坏团结的做法更是非常错误的。

李、王、张在工作中的不同意见公开化了，不久林彪也知道了，找我和萧劲光、王宏坤、张秀川等人谈话，指出海军工作刚有起色，应继续搞好工作，加强团结，不要受人挑拨，要互相支持。但没有具体批评谁是谁非。谈完后，我当场表了态，承认在海军领导中，对海军的某些工作中存在意见不一致的现象，并从海军主要负责人的角度承担了自己责任。其他人没有讲话。

结束谈话后，我们几个人在京西宾馆开通气会议，但毫无结果。事后，林彪又指示我，把工作重点放在海军，并决定把张秀川调出海军。

1968 年国庆前夕，毛主席提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三项：一是刘少奇专案审查问题；二是批判“二月逆流”问题；三是讨论和决定修改党章，讨论和决定“九大”代表产生的方案，并研究准备召开“九大”问题。

当时，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大部分被打倒了，出席十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还不到全数的一半。中央决定，中央碰头会议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各大军区、中央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也列席参加会议。10 月 10 日左右，参加会议人员到齐后，中央发下一份会议小组划分、编组名单。其中指定我和潘複生为第一小组召集人。我们这个小组有黑龙江、浙江、云南、宁夏等省负责人及中央国家机关参加会议的部分人员，包括李富春、胡耀邦等。会议以看文件、小组讨论为主，各小组讨论情况通过会议简报进行交流。

10 月 13 日全会开幕。这次会议的大概情况是：

一、关于刘少奇专案审查问题。会议之前，每人发了一袋关于刘少奇问题有关材料和一份中央决定（草案）。在《关于刘少奇罪行审查报告》的结论中称：“经

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在我们组的讨论中，大家一致同意中央决定（草案），同意加在刘少奇头上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同意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同意永远开除党籍。我当然也是毫无例外地同意（会上，我没有表决权）。

在大会上，我没有听到包括老一辈革命家在内的任何人，对中央决定（草案）提出反对意见。因此制造了党内有史以来的最大冤案。

二、批判“二月逆流”问题。为了批判“二月逆流”，中央划分小组时，就把所谓“二月逆流”参加者分散在各组内，分别批判。

江青参加我们这个小组会议，她和谢富治在小组发言时，指名道姓的批判了几位副总理和几位老帅，把他们批判的很厉害，上纲上线很高。

按中央会前的安排，我们这个小组主要批判的对象是李富春。在批判之前，我就向富春同志打招呼说：“关于‘二月逆流’问题，你要很好做个检讨，争取主动。”富春同志说，他已准备作检讨。同时我也作了一些准备，按中央会前确定的统一口径，准备发言批判。

富春同志检讨得不错，我改变了主意，没有按会前中央的要求，再做批评发言。

胡耀邦同志也作了深刻检讨，大家没有提出批评意见。

在江青、谢富治小组发言后，我也不可回避地，违心地念了一篇事先准备好的批判“二月逆流”的发言稿，东拉西扯地批判了一番。我在准备发言稿时，思想上就明确了发言内容的原则：只按中央定的调子大原则地讲，既不上纲上线，也不用过火的语言，更不指名道姓专批某人。

当时会上，就有人说我的发言是“明批暗保”。记得会议期间，陈毅曾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对我们的帮助，听了这么多人的批评，就数你对我不错，没有任何失实之处，另外你对我的人身也采取了保护，和那些对共产党有仇恨的人是不同的。”

当时在小组会上，江青除了批判“二月逆流”外，还讲了刘少奇等人的其他问题。每次发言后都要我亲自帮她整出一个记录稿，然后亲自送到钓鱼台她的家里去。

她一方面要我在那里坐等，另一方面自己修改记录稿，待修改好了，再找康生、张春桥等来帮她审定。她每念完一段就问：“康老，行不行？”再念一段又问：“康老，行不行？”康生当然很认真负责的，哪一段可以，哪一段或哪一句要修改，怎样改法，都提得很具体。有时也问张春桥有什么意见，但张春桥提得不多，偶尔也讲几句，待定稿后再由我转送会议秘书组印发。

经过几次为江青送审稿，给我的印象是，江青的政治靠山除毛泽东外就是康生。我多次听到江青宣传康生“善断”。

三、讨论党章修改问题。大家意见最集中、最强烈的，是对毛主席和林彪的评价，要求调子要高，篇幅要长，内容要充分。我当然也不反对。

10月26日，林彪有一篇讲话。其中他说，自古以来有四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第一次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影响世界二千年；第二次是资产阶级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的大革命，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而第四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革命，不仅是七亿人民的大革命，也影响到全世界。

我当时对这个讲话不仅拥护赞成，而且亲自原原本本地向之后召开的海军三届四次扩大会议进行了传达。

毛主席在会议期间讲话再次强调：“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又说，“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杂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因此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一是要注意政策。”又说，“我们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们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于10月31日闭幕。11月7日，海军党委召开了三届四次扩大会议。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由我传达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并听

了毛泽东、林彪在全会上讲话录音；二是提出海军出席“九大”代表的协商名单和决定“九大”后召开海军第四届党代表大会。

会议提出的海军出席“九大”代表的协商名单，共十八人。他们是：萧劲光、李作鹏、王宏坤、吴瑞林、张秀川、段德彰、刘浩天、易耀彩、李长如、武毅、张逸民、王天保、舒积成、王瑞昌、陈运和、杨保贵、董其采（女）、张凤彩（女）。

1969 年 3 月初，冰河开冻之前，中苏边界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

珍宝岛位于我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内，在乌苏里江中心线靠近我岸一边，历来属于我国领土。但苏联方面长期认为，中苏边境线应以乌苏里江我岸一边为界，企图霸占珍宝岛及周边地区。

中、苏关系恶化后，特别是美国大规模侵略越南北方，战火不断升级后，苏军在我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地区边境及其远东地区加紧军事部署，陈兵百万。对我三北地区的边境安全构成威胁。

自 1968 年下半年开始，苏军在珍宝岛及周边地区多次向我方挑衅，其边防武装部队经常侵犯我国领土，我边防部队保持克制的态度，多次向苏军发出警告，但苏军依靠着机械化装备和大口径武器，对我方警告置之不理，并首先使用武力，打死、打伤我边防部队多人。

当时，沈阳军区就不断地将珍宝岛地区的双方冲突情况报告军委办事组。办事组及时将情况和对情况处理的意见与建议报告毛主席和林彪。

珍宝岛地区双方冲突的形势日益加剧，中央曾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对应策略。中央的基本精神是：第一、根据苏军的挑衅，要求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及新疆军区加强三北地区边境的警戒，三北地区的东段为重点；第二、做好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的两手准备，既准备打，也准备谈；第三、将珍宝岛作为边防斗争的重点。要“有理、有利、有节”，绝不首先打第一枪。等等。

军委办事组和总参谋部作战部门根据中央的指示，具体负责三北地区和珍宝岛地区的军事部署，并将各军区制定的作战计划报毛主席、林彪批准。

3 月 2 日，苏军边防武装巡逻部队又进到珍宝岛附近封冻的河面上，恰与我边防武装巡逻部队相遇。我再三向其提出警告，令其退出，结果不但无效，苏军反而向我首先开枪，并向我发起进攻。我巡逻部队被迫开枪还击，我另一支巡逻部队也立即上岛参加战斗。一举将苏军巡逻队六十余人大部歼灭，我方也有伤亡。

当天，珍宝岛武装冲突的情况就报到办事组，并报告了毛主席和林彪。毛主席和林彪齐口称赞说：“打得好！”

我外交部照会苏联大使馆，对“3月2日，苏军边防军入侵我珍宝岛地区，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多人，制造了一次极为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北京、上海等城市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和声讨大会，抗议苏联入侵我国领土。

苏军恼羞成怒，不甘失败。根据情报显示，苏军正抓紧大规模调集兵力和重型武器，准备发动新的进攻。与此同时，我们也指示沈阳军区，迅速调集兵力和反坦克武器装备，以对付苏军的进攻。

3月15日到17日的三天时间里，苏军在大炮、坦克、装甲运兵车的支援下，连续向我珍宝岛发起猖狂进攻，并多次越过边境线，冲上珍宝岛。我军也迅速调集兵力和火炮，进行自卫反击。我猛烈的炮火首先将苏军的坦克、装甲车压制在岛上，我守岛部队的轻、重武器在近距离射击，大量歼灭苏军有生力量。最终将苏军驱逐出珍宝岛。战斗中，我军击毁、击伤苏军坦克、装甲车十余辆，缴获62型新式坦克一辆及其他武器，打死、打伤苏军百余人。

3月15日，我外交部再次照会苏驻华大使馆，对苏军入侵我领土，再次提出强烈抗议。《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了《打倒新沙皇》的社论。

3月21日，苏联总理柯西金提出，要同我国领导人通电话。3月22日，我国政府用备忘录答复他们，说明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苏联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3月29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一方面仍坚持其侵略立场，一方面表示愿意恢复“协商”。

4月以后，封冻的乌苏里江面开化了，珍宝岛战斗中在我方一侧被击毁的苏军坦克和装甲车沉入了江底。为了获取苏军入侵的罪证，也为了研究苏军的技术装备，办事组向中央报告，建议将苏军坦克打捞上来，中央批准了办事组的报告。

办事组将打捞任务交给海军执行，海军司令部将此任务交给北海舰队旅顺基地完成。旅顺基地派出打捞小分队，在沉入位置不明、打捞条件差、敌前作业和当时水温还很低的不利情况下，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顺利完成任务。后来，打捞起来的苏军坦克被送到军事博物馆展览。

同年 7 月，苏军又在我新疆边境地区不断挑起事端，侵占我领土，打伤我边民，并在铁列克奇地区开枪袭击我边防巡逻队。

中苏关系达到空前紧张程度，随时有爆发更大规模战争的危险。

9 月，经毛主席批准，军委办事组召开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会议对苏军的战争准备和可能对我发动的突然袭击，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认真准备。同时决定我军从华东、中南等地调动数个军的兵力，加强三北防卫。其中为防止苏军从外蒙古的军事基地，沿内蒙二连至河北张家口一线发动突然袭击，直接威胁北京安全，故在河北、山西两省的北部及张家口地区、承德地区、大同地区部署了相当数量的兵力和重型武器。

后来我获悉的情报材料证明，在珍宝岛地区发生的中苏边界冲突，曾使莫斯科受到极大震动。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曾主张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以彻底消除中国的威胁。但苏共中央政治局赞成格列奇科核打击的人不占多数，认为这样做就意味着世界大战，苏联会陷于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比美国在越南的处境将更坏。因此采取了不扩大战争的态度。

不久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机场举行会谈，周总理对双方边境问题未解决之前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维持边界现状；第二、防止武装冲突；第三、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

记得在我尚未参加军委办事组工作之前，曾有一天晚上，在钓鱼台 16 号楼参加中央碰头会议。在周总理谈有关工作时，江青不知为什么（据说是北京哪个红卫兵组织搜集了大量江青的历史材料，正偷送到西山某地进行整理）发疯似的又哭又闹，没头没脑地骂总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骂得总理低头不语。

也就在这次会议上，她生气地自言自语说：“有人说我是武则天，武则天有什么不好？我要是成了武则天，那些人不要想好日子过。”又自言自语说：“有人说我不懂军事，我怎么不懂军事？我跟毛主席几十年，跟毛主席学战略战术，难道还不如你们？”

她发疯似的又哭又闹，骂够了就去睡觉。乘这个空子总理领导我们继续研究工作问题。一会儿她睡醒了就又跑来胡闹。总理见此情况，会议实在无法继续下去，因而宣布散会。

我在乘车回家途中，反复回想开会时的情景，感到江青真是狂妄嚣张，令人气愤讨厌。为什么参加会议的中央常委们对江青的胡闹不予批评、制止？难道中央高级领导层的政治生活是这种状况？我真是很不理解，心中总觉得不是滋味，江青真是一匹害群之马！

新军委办事组成立后不久，有一天，江青通知军委办事组成员，到钓鱼台 11 号楼她的住处集合（钓鱼台宾馆小楼很多，她可以今天住这楼，明天住那楼）。人到齐后，她说要带我们到林彪那里去受领林彪的接见和指示。黄永胜当即说：“林副主席刚刚见了办事组全体成员，对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我们将按林副主席的指示，做好工作。”江青听后先是一愣，之后谈了些无关紧要的事，她碰了软钉子，不再提带我们去林彪那里的事了。

这是一种什么关系？当时，立即引起我们几个人的反感和愤怒！难道军委办事组是在中央文革领导之下？是在你江青领导之下？我们要见林彪还要你江青带领？你江青既不是军委主席或副主席，又没有正式军职，也不是党中央什么领导人，仅仅是一个普通党员，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军队文革的顾问。你有什么资格直接领导军委办事组？你有什么资格在军委办事组面前说三道四？

据说毛主席曾说过：“中央文革等于以前的中央书记处。”可是中央文革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如果等于原中央书记处，也轮不上你江青在军委办事组面前指手画脚。

江青和中央文革一伙伸手抓军权的野心早就有了。

1967 年初，军队文革改组时，她已是军队文革顾问。加上解放军报社，被江青女儿萧力掌握，八一电影制片厂被江青的样板戏控制。江青还要求部队的三支两军问题要先经过她来决定和批准，然后再由她报告毛泽东和林彪。但江青并不满足，得寸进尺，野心越来越大，现在她又想夺取军队指挥大权，要把军委办事组控制在她的直接领导之下，把林彪、周总理及其他军委副主席架空。

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认为，军委办事组是在党的主席、军委主席、副主席和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毛主席、林彪和周总理是军委办事组的直接上级和领导。军委办事组与中央文革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与江青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

我们军委办事组对江青和中央文革一伙伸手抓军队指挥权的野心早有警觉，并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

黄永胜出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后，除参加中央碰头会，并接受、执行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及其他军委副主席的指示外，根本不到江青那个庙里去烧香磕头，引得江青大骂黄永胜“目无中央文革”，“无组织，无纪律”。黄永胜到北京工作不久，江青就散布“总长选错了”。

江青向毛主席提出谢富治、温玉成参加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也向毛主席和林彪建议让李天佑、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江青要霸占八一电影制片厂只搞样板戏，不能搞其他题材的军事影片，黄永胜坚决不同意。中央碰头会议经常讨论样板戏，黄永胜很反感，不愿参加会议，即使参加也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中央文革一伙人极力吹捧江青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样板戏是“文艺革命的里程碑”，黄永胜就说：“文化革命的旗手是毛主席”，“什么样板？样板就是绝对化，就是没有发展了嘛。”

黄永胜批评军报不要以支持不支持萧力划线站队，江青则大骂黄永胜和我在军报“搞复辟，保护走资派”，并到毛主席那里告黄永胜的状。造船工业形势大好，江青就说“生产压制革命”。

1968 年夏，军委办事组向毛主席报告，建议凡涉及到部队战备、调动等重大问题的军委文件，主送毛主席、林彪和周总理三人审批后即执行，其目的是传阅军委文件的人数太多既容易失密，又容易误事，不利部队隐蔽、快速的行动。主席批准：“同意”。但江青又骂黄永胜对她“封锁消息”，“不请示，不报告”。并提出停止军委办事组组长、副组长参加中央碰头会，检讨错误。黄永胜说：“我没错，不检讨！”江青则说“黄永胜不检讨，就不能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谁给她那么大的权力？简直要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了。

1968 年秋，中央决定黄永胜率党政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江青又利用这次出访发难，在中央碰头会议上大发洋脾气，指着鼻子对黄永胜进行批判。江青声嘶力竭地怒骂黄永胜说：“国民党搞党国，你们搞军国，你们搞军队领导一切，你们搞军阀专政。你们戴五星军帽，穿红旗领章军衣，不受党的领导，不觉得耻辱吗？”并生气地把发给她的解放军服装全部退还给黄永胜。江青还提出中央应改

变决定，不能让黄永胜率团去阿尔巴尼亚访问的无理要求。经周总理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指示“按照原决定不变”。这样又引起江青的不满，进行消极对抗和捣乱。

为了缓和矛盾，周总理曾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我和邱会作去见江青。事先，总理特别嘱咐我们：“要团结，要求大同存小异”，又说：“不论江青同志说什么，你们都不要说话”。

我们在楼下客厅里站着等，江青由楼上缓缓下来，一见到我们，就边下楼边大骂不止，又是什么“国民党搞党国，你们搞军国……”。

黄永胜对江青说：“代表团后天走，一是来向江青同志请示，二是来告别。”

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你们走我不送，你们回来我不接。”

黄永胜访阿回京后，阿使馆设宴感谢，应该出席的人员全出席了，唯独江青不出席。这样就不能发表新闻消息。经总理向阿使馆解释，并请他们过几天再次设宴补救。可是第二次设宴，江青仍不出席，仍不能发表新闻消息。

一匹害群之马，弄得总理左右为难，非常被动。总理只好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令江青做检讨。

江青并不糊涂，她知道军队的重要，知道军队的作用，随着地位的提高，她妄图控制军队的野心也越来越大，实际上江青是妄想在军队中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军委常务副主席，妄想把林彪也架空。她企图夺取军队的指挥大权，就必须千方百计控制军委办事组，江青的阴谋诡计在屡屡遭到军委办事组的强烈抵制和反对而失败后，便集中力量打击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大骂黄永胜，大骂军委办事组搞“军国主义”，“不要党的领导”，甚至提出总参谋长的人选“不合适”。

“九大”之后，江青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更加专横跋扈，目空一切了。她不仅没有按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指示办，而是加紧了分裂新一届党中央的阴谋活动。有两件事情突出表现了她的险恶用心。

其一，煽动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讲话。“九大”之前，江青还不敢把攻击的矛头直指林彪，而是集中力量打击军委办事组。

“九大”刚开完不久，有一天，江青到京西宾馆办事组的驻地，名曰“找办事组的人谈谈话”，实际只找了黄永胜、我和邱会作（吴法宪当时不在家）。

闲谈一阵后，江青突然话题一转说：“林副主席在十二中全会的讲话，是即席讲话，只有个讲话提纲，讲话内容事先也没有与中央碰头会通气，我们都不清楚。”又说：“有些话讲的不妥嘛，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怎么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提并论呢？那是资产阶级文化革命嘛。”

我们都没有说话，但我们都立即警觉的感到，江青的讲话是针对林彪的。

江青走后，黄永胜与我和邱会作议论，江青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与我们讲？江青的胆子也太大了，竟敢批判林彪的讲话。我们感到事情重大，决定立即到林彪那里去报告。

听完了我们报告的情况，林彪说：“让她去说吧，看她搞什么鬼。”

其二，1969年5月17日上午，江青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我和邱会作，在钓鱼台11号楼她的住处开会。我们到时，见江青正在和姚文元说话，随后李德生也来了。李德生到后，江青宣布开会，她要大家不要记录，美其名曰“随便和你们谈谈”。

江青首先谈了她的家庭状况和她的出身，以及参加工作的经历，还谈了在延安与毛主席结婚的前前后后。并说她当前的奋斗目标是搞二十部样板戏。

之后，她开始逐个评论“九大”当选的三个中央常委。

她说：“陈伯达是书呆子，不会办事，没有主张，经常讲错话，我们都给他‘擦屁股’。整个中央文革的担子都压在我身上。”又说：“陈伯达是组长，连文革小组会议也不召开，他是刘少奇圈子里的人。”又说：“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是唯生产力论的。”

她评价康生说：“康老有理论水平，同修正主义作斗争很坚决，是有功的，但他的实际工作经验很少。”

她又谈到总理说：“周总理有行政领导能力，勤勤恳恳，但他掌握大方向、大原则不行，看的不准，决心不大。在中央只能做些具体工作……。”接着又说：“这与他在历史上走机会主义路线有关，历史上他就是东风来了拥护东风，西风来了拥护西风。跟着王明跑，苏区损失很大……”等等。

江青滔滔不绝的讲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有讲完的意思。我们军委办事组的人谁也没有讲话。当时我环视了一下参加会的人，姚文元在江青讲话时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吴法宪、邱会作、李德生低头不语，只有黄永胜一副极不耐烦的样子。

不等江青说完，黄永胜突然插话说：“江青同志，我们还有重要的会议，向江青同志请假。”说完起身就走。吴法宪、邱会作和我也跟着出了会客室。

回到办事组，我们在一起议论刚才的会。黄永胜不禁提出疑问：这是一个什么会议？一个政治局委员召集另六个政治局委员，开会议论三个中央政治局常委，这种会议正常不正常？合法不合法？是不是背着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另搞一个小圈子？江青为什么这样做？她有没有资格这样做？

议来议去，我们大家一致认为这里面有问题。

黄永胜说：“上车，我们一起到毛家湾去向林副主席报告。”

在毛家湾，林彪听了黄永胜汇报江青的言谈之后，很生气地骂了一句：“无名小卒，野心不小，想凌驾于三个中央常委之上。黄永胜、吴法宪你们两人到毛主席那里去，据实向主席报告。”

随后，黄永胜、吴法宪到了中南海毛主席住处。听黄永胜后来对我说，毛主席听了报告之后说：“你们不要叫她知道到我这里来过，我也不告诉她。不然你们要挨整的呀。”

可是以后从江青的口气里我们知道毛主席告诉了江青。江青又记下我们一笔黑账。

1969年4月1日，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正式开幕，出席代表1512人，代表全国2200万党员。大会议事日程为：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讨论通过党的章程，选举新一届党的中央委员会。

毛主席在开幕时讲了话，他说：“我们希望这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之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林彪在大会做的政治报告，中心思想是阐述“文化大革命”问题。

这个政治报告的初稿，中央开始指定由陈伯达负责组织班子起草，林彪和周总理均主张既要抓文化大革命，又要抓生产和备战。初稿写好后，送毛主席和中央碰头会议成员审查。毛主席看了后很不高兴，召集会议对陈伯达进行了批评，并将其起草的初稿内容全部推翻。

毛主席全部推翻政治报告的初稿，是因为陈伯达起草的，以《为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为题目的政治报告的基本精神，是偏重发展生产和加强备战，没有更多的强调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没有更多的

强调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因此被中央文革一伙人指责是“唯生产力论”。

毛主席当然也不能同意这样的政治报告，并指出：“八大政治报告中所犯的错误，只讲发展生产，不讲阶级斗争，现在又想重复。”并批判是“伯恩斯坦主义”，甚至联系陈伯达陪同毛主席在莫斯科会谈时发生的“船未沉老鼠先逃”的错误，一并批判。

之后，毛主席指定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负责重新起草，限期交卷。张春桥等人起草的这个稿子，通篇是对文化大革命发生、发展、影响、作用、目的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论述。毛主席认为可行，中央讨论时通过。

但林彪态度沉默。对张春桥等人重新起草的政治报告在送审时，采取一言不发，一字不改的态度。在向大会做报告时，林彪像和尚念经，照本宣科，缺乏热情，结结巴巴的念了两个多小时。

对待两个不同版本政治报告截然不同的态度，反映了毛主席和林彪对待文化大革命“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不同认识和理解，虽然当时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没有做出什么反映，但我相信林彪对待政治报告的态度，毛泽东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九一三事件后，特别是我出狱后，我一直在苦苦的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到林彪靠不住了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心与林彪“分手”呢？根据当时我在中央工作的所见所闻，虽然至今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我认为，毛、林对“九大”政治报告不同的态度，肯定是重大的转折之一。可惜当年我们都已被“九大”新党章中明确林彪是“接班人”所蒙蔽。

开幕式后，从 4 月 2 日起，开始分组讨论政治报告和党章。4 月 10 日大会通过政治报告和党章。在新通过的党章中明确向全党宣布：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之后，又分组讨论和选举中央委员问题。候选人名单是由主席团汇集各代表团的意见提出的，再交各代表协商确定，然后进行一次无记名投票预选。

当时出席会议代表的思想中，存在一个疑难问题，就是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如何看待那些“犯过错误”，受过“批判”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例如朱德、陈

云、李富春、陈毅、邓子恢、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人，选不选他们为中央委员？有不少年轻的和造反起家的代表有可能不投他们的票。

毛主席提出了两条意见：“第一要投他们的票，保证选上。第二票数不要求太多，有三分之二就可以了。”

经过预选结果，证明可以达到这两个要求，然后方在大会正式无记名投票选举。选出中央委员 170 人，候补中央委员 109 人。其中八届老中央委员不到三分之一。

在讨论选举过程中，有一天，黄永胜在军委办事组办公时自言自语地说：“我是不投 11 楼票的（江青当时住钓鱼台 11 楼，此即指江青）。”这话显然是在表明黄的态度和暗示其他人也不要投江青的票。我们几个人都把这句话听进去了，都没有投江青的票。

果然大会报告选举结果时，江青少了几票。当时江青的脸色就非常难看，如坐针毡（江青是想得全票的）。

选举散会后，康生为此在毛主席那里提出要进行追查，看谁不投江青的票。毛主席当即驳斥说：“那还追查得？你若追查，就要犯政治原则错误。”这样康生才不敢乱来胡闹。

大会完成预定议程，于 4 月 24 日闭幕。

2009 年 7 月 20 日初稿

2012 年 2 月 24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二册（3）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二章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

第三节 围绕修改宪法的斗争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零年四月十一日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的电话稿节录(林彪秘书于运深手记)

影印件原文

(1970. 4. 11 日晚 11: 30)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吴法宪的亲笔交代影印件原文

(一)一九七零年四月中旬和下旬，主席两次告诫林彪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之后，五月中旬有一次我见林彪时，我问他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他说：他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

(二)七零年七月，叶群曾向我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那里摆？

(三)七零年八月初叶群打电话对我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

(四) 七零年八月廿一日在庐山，黄昏前叶群邀吴、李、邱去游仙人洞。叶群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我根据林彪、叶群的交代，八月廿三、廿四、廿五日先后同王秉璋、王维国、陈励耘等人讲过坚持设国家主席问题，对其中有些人还讲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那里摆。

吴 法 宪

一九七一年十月廿一日

二、研究资料

汪东兴著《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摘录

一、林彪急于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毛主席说过：“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贊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历史伟人，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最伟大的功绩，是成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总结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中，总结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验和理论，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主席以他无与伦比的革命胆略，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和不同历史时期的转折关头，同形形色色的错误倾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智慧，都贡献给了中国革命。

1965 年 8 月 5 日，毛泽东主席在与某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中说：“《新民主主义论》是一九四〇年写的。我参加共产党，打了十三年仗，在这十三年之前还有六年，一共十九年的时间，才认识到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要采取什么政治纲领、文化纲领。花了十九年的时间，你看，多困难！认识客观事物是多么困难。”

毛泽东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指明中国武装夺取政权，只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胜利的道路。在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以他的远见卓识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成功地完成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确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的经济文化取得了巨大发展。1966年3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某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中说：“我这个人哪！是开除过党籍的（这是当时误传，实际上是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未开除党籍。当了民主人士。没办法，他们就叫我当师长。井冈山时期，支部会也不能参加，我是前敌委员会的政治委员，都被辞掉了。可谓孤立了吧！十年内战中间，三次赶出红军，有十几次我的意见不能通过，只剩下我一家。我是政治局委员，他们送我的绰号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世界观上，说是‘狭隘的经验主义者’。在我们党内，长期整我。陈独秀整我，瞿秋白整我，李立三整我，王明整我最惨。陈独秀整我‘左’，十年内战又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丝毫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正如毛主席所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对林彪反党集团的形成、发展，以及他们所进行的反党阴谋活动，毛泽东主席也是有这样一个认识过程的。有时，他为了不伤害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也做过一些违心的事。

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林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林彪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利用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无与伦比的历史功绩，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极力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随着林彪地位的上升，他的野心也急剧膨胀起来。凡是在他看来反对他的人，妨碍他夺取最高权力的人，他和他的同伙采取诬陷、迫害的手法想方设法除掉。林彪为了夺权，组织人为他搜集了古今中外大量政变资料，进行潜心研究。他从中得出一个结论：“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夺权问题讲了这样一段话：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

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1967 年 1 月，林彪这样说夺权：“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林彪认为军权是权中最重要的权，他在军中各军兵种安插同党，培植亲信。他说：“要学习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军权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毛主席对林彪的举动很是反感。

1966 年 7 月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毛主席这样写道：“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

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1969 年 4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从这次会议选出的党的中央领导班子组成不难看出：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利用这次会议达到自己的目的。毛泽东主席坚持要党的领导班子老中青三结合，其中要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参加。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这次大会确定林彪为“接班人”，写进了“九大”的党章。

1969 年 10 月 17 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黄永胜等人于 18 日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10 月 19 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

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

周总理惊诧他说：“烧了？”

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

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

“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内容有这样几点：一是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二是组织战时指挥部，进入临战状态；三是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四是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随时报告。

他想试探一下凌驾于毛主席之上下命令，看毛主席的反应。

看得出来，毛主席对林彪的这个号令很反感，但当时不便说什么，特别是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林彪的不是。

1969年初，为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林彪一伙和江青一伙之间的矛盾逐渐表面化。

开始，经毛主席同意，“九大”政治报告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起草。

1969年2月下旬，林彪召集他们三人商量起草报告的事，决定由陈伯达先动笔起草。

陈伯达不愿意同张春桥、姚文元合作。但他自己又迟迟拿不出政治报告的全稿，拿出来讨论的几部分，张春桥、姚文元看后批评说：陈伯达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毛主席对陈伯达起草的初稿有过批示，陈伯达没有告诉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江青便以“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理由，同陈伯达大闹了一场。眼看“九大”开会的日期快到了，毛主席就叫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外起草政治报告。毛主席把他们几个都找来，讲了有关政治报告的基本思路和框架。还大致讲了讲每段要写些什么。根据毛主席讲的这些，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很快便拿出了初稿。康生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初稿的过程中，借口生病，不参加讨论，当张春桥和姚文元把初稿拿出来后，他给林彪打电话说：“我最近生了病，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政治报告，这个稿子的份量是不够的。但是

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

这个时候，陈伯达也在赶写政治报告的草稿不久也拿出了全稿。两个稿子排风清样送给了毛主席和林彪。毛主席认为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大体可用。但要作较大的修改。并对如何修改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而陈伯达起草的那个稿子便被搁置一旁了。

因为政治报告起草迟了，“九大”推迟了一个星期才开会。当时代表都被通知来到了北京，只好先组织他们参观。在报告起草的过程中，林彪对这两个稿子都没有看，只是叫秘书念了毛主席修改的一些段落和加写的内容。由于林彪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满，在“九大”上，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

“九大”开过后，毛主席要着手解决政府工作、修改宪法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林彪认为这是争夺更多权力的好机会，在讨论修改宪法时，林彪就抓住“天才”问题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大做文章，在修改宪法时，宪法的序言中必然提到毛主席，这就涉及到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原来，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中有这么一段话，即：“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初稿中，都写上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送给毛主席审阅时，毛主席都把它们划掉了。这个情况，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知道，林彪、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也知道。可是，在讨论宪法的序言时，陈伯达、吴法宪等人却支持要把这三个副词再写上。在 1970 年 8 月 13 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坚持要加上三个副词，康生、张春桥则反对。陈伯达、吴法宪便借此制造事端，说有人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是蓄意贬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讨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林彪一伙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要在宪法上写上设国家主席一节。这显然是有他们自己的打算的。

1969 年 10 月 17 日，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第二天，吴法宪把林立果、王飞、周宇驰召集在一起，祝贺林立果“荣升”。吴法宪对他们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王飞、周宇驰又先后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和机关里作了传达。这样，吴法宪便把空军的调动、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

1970 年 3 月初，毛主席接到周总理的信和附来的一份宪法修改草案提要。信中谈到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当时，我们陪着毛主席正在武汉视察，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3 月 7 日，毛主席要我马上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在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一节，坚决表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8 日，我回到北京，向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说：“你向政治局的同志们传达一下吧。”当晚，在周总理主持下，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会议讨论后，大家都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说：“照毛主席的意见办，我们开始进行修改宪法的工作。”这次政治局会议，林彪又没有到会，叶群到了。会上，周总理还特地说了一句：就委托叶群向林彪转达毛主席的意见，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然而，住在苏州的林彪，却在 3 月 9 日让叶群对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3 月 16 日，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给毛主席。毛主席阅批了这个请示，再次明确批了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3 月 17 日至 20 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主席 3 月 8 日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在此期间，林彪却让他的秘书给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主席则让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

4 月 11 日夜间 11 点 30 分，林彪在苏州让他的秘书于运深给中央政治局值班的同志挂电话，传达他的二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

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4月 12 日，毛主席看到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的意见的报告，立即批示：“我不能在作此事，此议不妥。”

4月下旬，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

毛主席借《三国演义》中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作孙权。”

1970 年 7 月下旬，政治局会议在讨论起草纪念“八一”建军节社论时围绕稿子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引起了一场争论。陈伯达主张恢复过去一贯的提法，即“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张春桥则主张不改回去。会上争论不休。

当时，我陪毛主席住在杭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毛主席的眼睛患了白内障，视力模糊。周总理就把会议争论情况写了封信给我，要我转报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听我念了信后，要我代他划圈后退回去。我觉得难办。考虑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就要到上海接见外宾，所以我没有圈回去，把信带在身边了。毛主席、周总理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第一批外宾后，周总理、黄永胜都问我那个报告毛主席圈阅了没有，我说你们去问毛主席。当时，毛主席正点燃一支香烟在抽，对着我说：“怎么搞的？”意思是说你怎么没有把信圈回去。我说：“这样大的事，我不敢圈。两种意见，您到底赞成哪一种？”毛主席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毛主席说完后，我下楼从皮包里拿出信来，当着周总理、黄永胜的面，按照毛主席的意思作了圈阅，但还是让我删去了”毛主席和”四个字，恢复过去提法，给他们了。后来，毛主席还多次说过，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缔造者也不只是我一个，还有许多人。

在庐山会议前，我提前去庐山看毛主席要住的房子。到了庐山一看，在安排毛主席要住的房屋上边正轰轰地炸石头，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程世清事先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

我问程世清：“这是在搞什么？”

程世清说：“在修飞机场。”

我不解地问：“怎么能在里修飞机场？”

程世清说：“这块地方大，飞机降落比较安全。”

我又问他：“你们在这里修机场，是经过哪里批准的？”

程世清说：“是军委批准的。”

我说：“你是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程世清想了一下回答：“命令是前天收到的。”

我又到现场去看了一下。飞机场已经修了大部分了，快修好了。

我说：“这个机场就在毛主席住房的上面，这样会影响毛主席休息和办公的”

程世清说：“那怎么办？”

我当时没答复他，也没有做声。我回到杭州，就把修机场的事向毛主席报告了。

毛主席问我：“谁下的命令呀？”

我说：“不知道。”

毛主席说：“你打电话问问总理，他知道不知道。”

我打电话问周总理，周总理说：“我也不知道。”

我说：“这可就麻烦了，你也不知道？”

周总理说：“我问一下。”

周总理问了黄永胜。黄永胜答复周总理说，他知道有这么回事，因为当时有些老

同志要去庐山开会，坐汽车不行，坐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

周总理问，你这么决定报告了中央吗？黄永胜说，他报告了林副主席。然后，周总理打电话告诉我说，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对我也没说什么，只是点了一下头。

据吴法宪 1971 年 10 月 21 日交代说：1970 年 5 月中旬，有一次我见到林彪时，问他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他说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要写上设国家主席。7 月，叶群又向吴法宪当面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很明显，这是示意林彪想当国家主席。

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主席得知仍有些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时，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吴法宪还交代：8月初，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彪的意见还是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里提议写上这一章。8月27日，叶群义私下对吴法宪等人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

8月13日下午。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发生争吵。因为张春桥提出在宪法序言部分，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二个副词删去，吴法宪当场尖锐地提出：“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在会议中间，吴法宪又秘密地打电话给黄永胜，通报会议上的情况，进行密商。小组会议散后，陈伯达又邀吴法宪到他家里，陈、吴密商后，黄永胜、吴法宪向当时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打了长途电话，报告了情况。叶群告诉吴法宪说：林彪很高兴，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8月13日晚和14日下午，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和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关于“天才”和“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作者注）方面的语录。

在林彪的指挥下，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多次密商，积极策划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难。陈伯达搜集了关于“天才”的材料。找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作为依据。林彪布置人给他起草关于宪法问题的讲话提纲；同时又布置林立果组织空军党委办公室的一些人，给他起草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

8月20日，林彪、陈伯达、叶群等人带着他们准备好的材料上了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

8月25日，庐山开会期间，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和各组组长会议上，再次严肃地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主席还转过脸来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去当！”

毛主席意识到林彪有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的野心。

《吴法宪回忆录》摘录

毛泽东关于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指示

1970 年 3 月上旬的一天，汪东兴受毛主席的委托，从外地回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的意见。当时，毛泽东正住在杭州。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听取毛泽东的指示。汪东兴在会上传达说：“毛主席提出政治局研究一下，文革时间长了，要考虑恢复政府机构，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一是通过人大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验；二是成立和恢复各级政府；三是要研究发展经济和战备问题；主要是这三点意见”他还传达说，毛泽东指示，关于宪法问题，要政治局研究成立修改宪法的起草小组。另外，还要准备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战备工作报告”，这几件事要立即着手做。

最后，汪东兴还特别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汪东兴传达完毛泽东的意见，当天没有讨论，会议就结束了。

会后，汪东兴找到叶群，想到毛家湾去向林彪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但因为林彪已经按照平常的习惯，在晚上 8 点钟服用安眠药睡觉了，所以汪东兴没有去成，只好请叶群代为转达。

毛家湾去不成，汪东兴就请叶群、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到他家里坐一坐。于是，我们一行从中南海的新华门进去，一直到了靠水边的小楼，汪东兴的家。我们下了车，随后一起在客厅里闲谈了一会儿，接着话题就转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这时，汪东兴又对我们说，毛泽东曾经说过，“要设国家主席的话，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这个话，我们听了都感到很高兴，认为这是毛泽东对林彪特别的信任与关怀。当时汪东兴也很兴奋，因为“九大”以来他同我们一直是搞在一起的。

那天晚上，汪东兴很高兴，一定要请我们吃饭。吃什么呢？是红薯。因为那里已经到了 3 月份，红薯已经很少了，但是他家里保存有。我们边吃边谈，一直到深夜才各自回家。

3 月 13 日晚 9 点，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研究如贯彻毛泽东关于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指示精神。这次会议，除林彪以外，都参加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首先成立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小组，由周恩来牵头，成员由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负责四届人大的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接着研究修改宪法的问题，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小组，由康生任组长，其他成员由陈伯达、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共六人组成。这个方案很顺利地通过了，并准备报告毛主席批准。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留待宪法修改小组去研究。

很快，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方案。于是，宪法修改小组就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找了一个会议室，开始了工作。康生组织了一个秘书班子，并确定一个叫李鑫的同志负责。我们每天下午 3 点到晚上 8 点开会工作。

小组的第一件事，就是首先研究 1954 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因为这个宪法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制定的，曾广泛听取了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所以要大家先研究这个宪法。然后还要研究苏联、朝鲜、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各国的宪法，任务是相当艰巨的。这些宪法有的几十条，有的上百条，还有的只有三条。另外，我们研究了辛亥革命以来孙中山制定的《五权宪法》，以及袁世凯制定的宪法等。前后两个多月的时间，大家传阅这些宪法，然后集体讨论。

在新宪法修改草案的问题上，我们首先是研究要写几章，搞多少条，在序言、总纲、公民的权力和义务、国家机构、国务院等章节该如何写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小组里经常有不同意见，有争论。有的主张写一百多条，有的主张写几十条；有的主张设国家主席，有的主张不设，议论不一。康生主张不设国家主席，只设人大常委会主任。

经过反复讨论，最后我们终于统一了几点意见，修改的原则是宜简不宜繁，而且毛泽东制定的宪法原则，基本上都要继承下来。至于写几章、写多少条款等具体问题，写起来再看。

在要不要设立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我想着重说一说林彪的意见和态度。

1970 年 5 月 17 日下午，因林彪准备带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去向毛泽东汇报军委工作，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四个人就先到林彪住处汇报工作。我们向林彪说起，军委办事组已派吴法宪和李作鹏参加了宪法修改小组的工作。我们还说起，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是设，一个是不设，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

林彪当即表示：“我不当这个主席，这个不妥。应该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才是名正言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国家主席、国家的元首，只有毛主席来当，别人都不合适。但是毛主席的年纪大了，当国家主席要出国访问，别的国家元首来还要回访，毛主席出国有困难，可以设副主席，副主席可以出国对其他国家进行访问。我也不适合当这个副主席，我的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活动，不能出国访问。要设国家主席还是毛主席来当。”

林彪当面对我们表示的这个意见，口气非常肯定。我至今仍然认为，林彪的意见比较中肯。他的这一番话，是出自内心的，也比较合乎情理。像以后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林彪急于当国家主席，急于抢班夺权，急于分裂党，反对九大路线”，我感到实在是牵强附会，缺乏根据。我有几点理由：

第一、当时国家主席的位置是一个虚职，当时国家代主席的职务是由董必武同志担任的，而董必武同志连中央常委都不是。党和国家的权力是集中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手里。在九大，林彪当选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这是最实际的权力。而且在党的九大章程中和宪法草案中已明确规定了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林彪根本没有必要去争这个国家主席。

第二、当国家主席是个出头露面的事情，而林彪对搞出头露面的外事活动是很少感兴趣的。这从他建国以后极少参加外事活动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再说他的身体不好，也没有条件参加各种外事活动。

第三、刘少奇是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被打倒的，这是前车之鉴。林彪是个聪明人，看到了这一点以后，他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了同毛泽东的适当距离。这一点，有很多事例都可以证明。

因此，我认为林彪不存在“急于抢当国家主席”的想法。林彪的一个警卫参谋，李文普，写了一篇文章说：从来没有听说过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这样的话，因为林彪最讨厌参加接见外宾的外事活动。（见李文普文章，林彪事件与我。编者注）我感到这个说法是真实可信的，这也反映了林彪的性格。说林彪急于抢当这个国家主席，这种说法是违背林彪处世哲学的，也是没有根据的。林彪在我们面前从来未表示过想当这个国家主席，给我的感觉，他个人当不当这个国家主席是无所谓的。但他认为，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自己的元首。林彪曾经郑重向中央表示：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他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职务，另选一位国家副主席。有人说不想当国家副主席就是想当国家主席，坚持设国家主席就是想当国家主席，这是什么逻辑嘛！如果说叶群、林立果有些想法是可能的，但是说叶群、林立果就等于林彪，应该不是这么一回事。另外退一步说，想不想当国家主席，这不是犯罪的标准，如果说想当国家主席就是“篡党夺权”，那么“篡党夺权”的人就太多了嘛！

由于我们军委办事组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九大”以来就分成两派，这个问题，也反映到宪法修改小组里来了。从一些小的问题开始，就逐渐形成了两派，陈伯达、李作鹏和我是一边；康生、张春桥是另一边。在讨论问题时，大家都是放开讲话的，就时常有些争论之词，有些争论还非常激烈。如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坚持了林彪的意见：国家主席还是要设，由毛泽东来当国家主席，考虑到毛泽东不便出国访问，可以设国家副主席，总之要设国家主席；康生和张春桥则不同意

设国家主席，而且人大也不设委员长，只设人大常委会主任。在设不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顶牛了。为了缓和矛盾，康生曾提出在宪法上写上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当时，林彪和叶群住在北戴河，事后我把这种情况通过电话反映给叶群，叶群回电话说，林彪很赞成你和李作鹏的意见。要说服他们同意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元首，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说，各国宪法都有总统、主席等领袖人物为国家元首。我国开国以来，毛主席就是我们国家主席，后来有刘少奇主席。现在取消不好，引起世界人民怀疑。叶群在电话中对宪法写上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表示高兴。

以后叶群在北戴河对宪法修改工作很关心，常来电话询问讨论的情况，并告诉我们林彪的意见：要在国家的指导思想一条上加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人大常委会中设主任不设委员长，林彪认为不妥。这一点康生是最不满意的。

尽管当时组里矛盾很大，但工作还是照常进行。宪法草案基本上是依据康生的意见起草的，我们一条一条地讨论研究，包括条款、文字、标点都进行具体的推敲，但在有些问题上各不相让。这个草案一共是六章，即：（一）、总纲；（二）、公民的基本权力和义务；（三）、国家机构；（四）、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五）、民族自治和自治机关；（六）、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这个宪法草案的总纲里，也依据“九大”通过的党章，写上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句话。另外，宪法草案还规定，包括全国人大在内的各级人大常委会，都只设主任，不设委员长。

1970 年 8 月 14 日下午，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南海怀仁堂继续开会。这天到会的有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和我。李作鹏因为被周恩来派到青岛去处理问题去了，没来开会。纪登奎不知什么原因也没有来。会议进行过程中，陈伯达出去打了几个电话，长时间不在会场。所以，这一天实际上只有康生、张春桥和我在那里开会。

这次会议上发生了异常激烈的争论。在讨论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康生又提出不设，而我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最后争论不下。康生说：“那就各自保留意见吧，以后提交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就这样放下了。当讨论到国家机构的问题时，我说国务院的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但康生和张春桥一起反对我，他们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其实当时他们的意见应该是对的，可张春桥当时说的几句话引起了我的反感。他的第一句话是：“有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都挂。”我想这是完全是冲着我来的。没想到他接着又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当时我认为，张春桥的话是冲着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来的。我就说：“张春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指谁说的？请你解释清楚。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句话过分了吧，你这是在讽刺林

副主席吧？你张春桥这里不写毛泽东思想，那里不写毛泽东思想，倒是你捍卫马列主义了，可是你的文章哪一篇里不写毛泽东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说赫鲁晓夫何时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

我这话一说，张春桥一下就急了，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我追问他：“毛主席在哪里说过？我怎么没有听到过？”张春桥一时说不上来。当时我们都很激动，我又说：“你今天吹这样的风是干什么？用意何在？中央政治局的人刮此风，刮到下面就会愈刮愈大。今后中央怎样解释？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你们不赞成，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你也反对，你们不准称天才，你想借口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我坚决反对你这种谬论。”这时康生也很不冷静说：“好、好，在国务院的前面加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就是了。”我说：“我是个人的意见，写不写由你们决定，因为我是宪法修改小组的成员，有权提出个人意见。”康生说：“对、对、对，写上、写上。”以后他们两人再讲话，我都不吭声，索性连话也不说了。

看来，张春桥的话不简单，文化革命中央文革几个文人，他们说打倒谁，就打倒谁，打倒了那么多的老同志，现在又公开把矛头指向了林彪，我心中真是气愤不过。林副主席有什么错，难道又要打倒吗？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经过几十年战争和政治斗争的考验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是你张春桥之流能啃得动的吗？！打倒林彪，靠你张春桥能打仗和支撑国家吗？现在想起来，给张春桥扣上“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的这顶帽子，也有点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但当时我在很多事情上对张春桥不满，积怨甚深，也就借题发挥，这样吵了一通。我和康生、张春桥在这次会议争吵的情况，李鑫都作了记录。

陈伯达打完电话回来后，我告诉他刚刚发生的情况。我说：“老夫子，你这个人，讨论宪法三心二意，你跑到哪里去了？”陈伯达这时立即对我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写上”。这样，陈伯达就公开同我站在了一起。

吃完晚饭，继续讨论其它问题，只有康生和张春桥说话，我一个人气鼓鼓地一言不发，陈伯达也不说话。就这样，宪法修改小组完成了最后一次讨论，准备将“宪法修改草案”提交政治局讨论研究。

散会以后，我和陈伯达走在一起。我对他说：“今天张春桥实在没有道理，口口声声赫鲁晓夫，这明明是反对毛主席，讽刺林副主席嘛！”陈伯达说：“走，

先到我家去。”我跟着陈伯达到他家后，他对我说：“今天的事情不简单，你应该向林副主席反映一下，周总理和黄总长那里也反映一下。”

我按照陈伯达的意见，首先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当时周恩来还没有睡觉，我把会议的情况以及发生的问题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我说：“关于国务院的指导思想，他们不同意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周恩来说：“我支持你，你批评得好。国务院的指导思想应该加上毛泽东思想，这是应该写上的。”我又告诉总理：“张春桥说，毛主席说过，赫鲁晓夫也是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周恩来问：“他是这样说的吗？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从来没有听到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周恩来还告诉我：“三个副词不是林彪提供的，而是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邓小平总书记想出来的。我认为邓小平提出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三个副词是很英明的。”他还说：“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这件事情我赞成。”

好了，总理的意见有了，我就更有底了。这件事情我是第一个报告周恩来的，因为当时我们和周恩来关系一直是很融洽，也是很亲密的。接着，我又打电话给黄永胜。黄永胜当然是全力支持我的，他还提出让李作鹏立即从青岛赶回来支持我，不然的话，我和陈伯达在宪法修改小组里比较孤立。黄永胜表示：“这两条意见，一是设国家主席，二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一定要坚持。”当时还想和林彪、叶群通个话，但是夜已经很深了，所以电话没有打。

第二天下午，我才和叶群通了电话。我把会议上的争论情况告诉了她，并要她转报林彪。不到一小时，叶群的电话来了。她说：“林彪同志说，吴法宪的意见是对的，要坚持这两条（即以毛泽东思想为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坚持设国家主席）。对康生和张春桥驳得好，抓住了他们的尾巴。”

有了林彪的态度，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又都支持我，而且李作鹏、邱会作更不会有问题，于是我就打电话和黄永胜商量下一步如何在政治局会议上与江青、康生等人进行斗争。我们设定，为了防止在政治局讨论时再发生争论，要准备一些材料来驳斥他们。这时，李作鹏也赶了回来。我和陈伯达、李作鹏各自查了些书和文件，准备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再同他们斗一斗。

8月15日晚上，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讨论为九届二中全会所准备的几个文件。我们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叶群还专门从北戴河打来电话，

要我们抓住张春桥、康生前一天的话同他们在这个会上斗一斗，因为他们公开影射林彪是赫鲁晓夫，引起了林彪的不满。当时，我们都预料会上会有一场冲突。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首先是审议宪法草案。一条一条地念，一条一条地讨论和通过。结果很是出乎我们的预料，设立国家主席和“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都写上去了，康生和张春桥一句话都没有讲，没有发生任何争论，风平浪静，三、四个小时就把文件都通过了。15 日的会议就这样过去了。

会议结束以后，我们打电话到北戴河，把会议的情况告诉了林彪和叶群。林彪听完后说：“那就算了吧。但是庐山会议还会有问题，还会提出意见来。”

8月16日，政治局再次开会，研究九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还是由周恩来主持。会议首先确定了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一是审议宪法修改草案；二是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和中央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最后，周恩来说：“已经请示了毛主席，在讨论宪法期间中央、国务院、军委留下黄永胜、纪登奎在北京看家，后阶段讨论军委报告黄永胜、纪登奎上山，吴法宪、李先念回北京看家。到了8月17日，黄永胜提出意见来了，请示周总理，说最好能让他上庐山，北京有什么事情留李德生在家就行了。周恩来说：”毛主席已经决定了，不好再改，你还是留下来吧。“这样九届二中全会前期黄永胜就没有参加。

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林立果：《在空直机关干部会上的讲用报告》

刚才讲我学得好，实际上，我做得很差，距离大家所期望的、所要求的、所讲的，还差得很远，没有那么好。我今天是向首长们、向大家汇报自己的一点学习情况，“抛砖引玉”，不是什么报告。我来到空军（部队）以后，空军首长和大家，在工作上、学习上，各方面关心我、帮助我，给我提供了最好的工作条件。我和空军有深厚的感情、和大家有深厚的感情。组织上和同志们要我讲一讲学习的情况，

我本来不想讲，因为自己学得不好，再三推辞。但大家很诚恳，再三要求，只好讲一讲。很多问题没有把握，很不牢靠，可能有错误。因为都是自己人，所以想到什么就讲什么，这对我也是一次锻炼。今天主要汇报一下学习毛主席思想和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些体会。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

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搞调查研究。这不仅是工作方法，也是一个学习方法。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深入群众，和群众心连心。毛主席思想就是从群众中来，从实践中集中上来加以提高的。所以我们到群众中、到实践中调查研究，就可以更好地学到主席思想，更好地领会主席思想，正如毛主席教导的：“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通过调查研究，就可以防止“三脱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劳动，做到“三结合”：结合群众、结合实际、结合劳动。

我搞调查研究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一部分是现实的，就是部队、工厂、学校、农村还有些科研单位；一部分是历史，翻一些历史资料，研究一些历史上的专题，像日俄战争、第二次大战、苏军进军东北等；还有一个就是专题研究一些外国资料，例如阿以战争、印尼政变、苏修侵捷等等国际上的大事；以及同国外回来的同志作调查，与 X X 作战和见习回来的同志座谈。工作就是这么几个方面。总之，是以毛主席思想为指针，调查古今中外的一些问题，重点是现实的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学习毛主席思想，促进自己的思想革命化、科学化，建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的最近一个时期着重调查研究了这样几个问题：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中国一定要强盛；学习毛泽东思想；关于空军作战方面的几个具体问题；最后汇报一下关于调查研究的一些方法和体会。下面我逐个汇报。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出，多提宝贵意见，像老师批改小学生的卷子一样，该打 X 的地方就打 X，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

现在讲第一个问题，关于政治和经济的问题。

最近我跑了一些单位，发现有些人对政治和经济、政治和业务、政治和军事、经济和军事的关系搞得不太清楚，在实际工作中处理不好。例如：工厂有人说“政治是软指标，生产是硬指标。”也有人讲“抓政治保险，抓生产危险。”单纯抓政治，丢掉生产，在部队中也有这种情况。有的讲“抓政治保险，抓军事危险。”也有人说“政治看不见，军事来体现。”政治和军事、政治和经济、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不管那个行业、那个部门，实际上是一个问题，一个道理。毛泽东思想

是普遍真理，各行各业，主席思想的原理都是通用的、共同的，这就叫做“隔行不隔理”。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的人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不敢抓军事，不敢抓业务，形“左”实右。关于这个问题，林副主席在张家口有一次讲话，从那时以后，这个问题在部队有了相当程度的解决，对扭转这个形势用很大。这点我们在下头调查的时候，部队的同志都有这个反映。他们说，这个问题不抓的话，主席“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就落实不了。但是，现在有的地方也有另一种倾向，有的又倒转过来了，又把突出政治忽略了、减轻了。也有少数单位战略训练抓得还不够。这两种情况都有。总之发展是不平衡。我们跑了地方的一些工厂，这个问题更普遍一点。看来，怎么正确认识和对待政治和经济、政治和军事、政治和业务，政治和各行各业的关系的问题，是有普遍意义的。今天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这个题目，实际上也包括了政治和其它业务的关系。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毛主席著作，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有以下一些看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文化大革命，主席思想深入人心，精神力量正在转化为物质力量，全国各地经济技术方面的大跃进高潮正在酝酿、正在形成、正在兴起，这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的形势是大好的，整个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是大好的，这一点必须肯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下面主要是这两方面来讲讲我对它们的相互关系的认识。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需要建立在现代经济技术的基础上，所以说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列宁曾经说过：“历史演进得如此奇特，到一九一八年竟产生了社会主义的两半，互相毗邻着，正如国际帝国主义蛋壳中两个未来的鸡雏一样，德国和俄国在一九一八年再明显不过地体现了实际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等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当时德国生产比较发达，有了经济的条件，但它没有政治条件。俄国经过了十月革命，有了政治条件，有了无产阶级政权，但它的经济比起德国来还落后很多，没有经济条件。列宁还讲，如果这两个条件结合在一个国家就好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困难就少了。所以说社会主义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政治条件，一个是经济条件，缺一不可。而政治条件是最主要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主要搞政治，但是经济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社会主义不仅在政治上要比资本主义先进，比它优越，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在经济上、在技术上，也应当比资本主义先进，比它优越，这一点我们将来也能做到。所以，我们对待经济问题，要从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高度、要从政治的高度、要从支援世界革命的高度来看待。离开了政治、离开了革命，单纯就经济谈经济，那就会变成经济主义、修正主义，最后政治也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政治了。在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有这么几种作法、这么几种倾向。一种是只要经济不要政治；另一种是空谈政治不要经济，这是极“左”的，形左实右的。实际上他不要经济，也就破坏了无产阶级政治。比如有的单位不生产，尽空谈，实际上给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损失。这种极“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是对革命不负责任。光要经济不要政治不对；空谈政治不要经济也不对。还有一种就是要政治又要经济，不分主次，平起平坐，轮流突出的，这是折衷主义，实质上还是否定无产阶级政治。用主席思想的观点来看，我们应该要哪一种做法呢？我们是既要政治又要经济，以政治为主，以政治统帅经济，用抓革命来促生产。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和经济统一、政治和技术统一，这是毫无疑问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主席又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与业务、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政治总是第一，政治是统帅，政治总是头，政治总是率领军事、率领业务、率领技术的。”又说：“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们要根据主席的这些教导来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政治，从根本上讲就是搞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搞经济发展生产，首先要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解决生产资料和生产出来的东西归谁所有的问题，解决为谁生产的问题。所以，要想发展生产首先要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而单纯发展生产，不搞政治，解决不了生产关系问题。只有解决了政治，只要取得了政权，才能解决生产关系，才能夺取生产资料，才能实现劳动人民的所有制。在旧社会里，我们工人阶级是生产阶级，又是无产阶级，生产者所以无产就是因为它无权。无产阶级如果取得了政权成为有权阶级，就有了一切，就成为国家的主人。如果无产阶级不抓政治，不把政治夺到手，那就永远无产，永远不能翻身，是奴隶，是被掠夺者。即使有了政权，如果只抓生产不抓政权，那也会把政权丢掉，还要吃二遍苦，无产阶级还要变成被掠夺者。

为什么呢？因为你光抓经济，不抓政权，人家抓到政权，你生产的东西再多也是人家的。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所以说，政权是总权，是一切政治和经济的所有权。任何一个掌权的阶级都把政权和巩固政权当作头等大事，都经历过激烈斗争。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不能只抓经济，如果只搞经济不搞政治，那就变成工联主义，政治没有拿到手，所有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解决不了，那就像叫化子一样只能向剥削阶级、资产阶级乞讨。所以光提经济要求，不提政治要求，经济上的要求也得不到保证。相反，我们把政权拿到手了，把政权牢牢掌握在我们手里了，什么东西都可以从资产阶级，从剥削阶级手里夺回来。所以我们取得政权以后，也不能只搞经济建设，不抓政治，否则，我们就要陷入经济主义。总而言之，无论是取得政权以前，还是取得政权以后，无产阶级都不能只搞经济不搞政治的单纯搞经济，不能改变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这一点在取得政权以前是这样的，取得政权以后也是这样的，否则无产阶级取得的东西还会丧失，苏修就是一个例子，经济建设成果再多，由于政权丢了，无产阶级经济地位又下降了，又变成被剥削者了。所以政治对经济来比，是占首位的，是主要的，是根本。正如前面讲的那段话我们不能用单纯的经济眼光搞经济，光看多少利润，多少钱，苏修不是光搞利润吗？刘少奇也搞利润挂帅的，我们无产阶级不能听这一套，要钱不要政权，要钱不要革命，要钱不要政权，就等于要钱不要命，政权要是丢了的话，不知多少人要人头落地，所有的经济成果也就白搭。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两条路线的斗争，经济路线要靠政权来贯彻，没有政权，再好的经济路线也得不到保证，得不到贯彻。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主从关系，是第一位和第二位的关系，不是有无关系，不能把主次关系理解为有无关系。有些极“左”的人，经济生产一点也不抓，这种倾向也不对，不能只要政治，不要经济，更不能只要经济不要政治，两者缺一不可，少了哪一个都不行，正如第一和第二、上和下、高和低、东和西、南和北等等，这些都是两方面相比较而存在，少了那两方面都是相比较而不在的，否定了一方面也等于否定了另一方面。没有低也没有高，比如我们这七楼会议室够高了吧，但是我们这个高是和底下那个低比较起来标高，可是和上面的天花板比还低哩。第一和第二也是比较来的，没有第一，也没有第二，也等于否定了第一。两个人赛跑，我们可以说我是第一，如果就一个人跑，那个第一

是不存在的。政治和经济，是主和次的关系，否定了主，也等于否定了次；否定了次，也就否定了主。我们如果否定了政治，不搞政治，那么我们一个经济成果搞不出来，就是搞出来也会丢光了。

这些年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不仅首先集中精力抓了政治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解决政权问题，同时也很注意经济领域里的斗争。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所以政治和经济缺一不可，政治和经济是互相联系，互相发生作用的，互相影响，互相推动的，但是政治是首要的，是核心的。为了发展经济，必须首先进行政治上的革命，像我们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例证，首先有政治上的大的发展，才推动了经济上的发展。当然，在革命过程中，生产可能暂时的局部受到一些损失，要付代价，要交点学费，但是归根结底，只有革命才能决定经济的方向，只有革命才能为经济发展扫清道路，提供新的强大的动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历史上几次政治大革命以后就出现过几次产业上大革命，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是紧密相联的，它推动了资产阶级产业革命。我们国家的几次政治大革命，也推动了生产力大发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出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在我们调查研究过程中，走了一些工厂和农村，看到全国各地开始掀起了经济技术大发展的高潮，这是我们政治思想革命的必然结果。例如，XX飞机发动机厂有个生产班组，文化大革命前百分之八十的活都是靠手工，老是完不成任务。由于文化大革命，主席思想把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现在百分之八十的活实现了机械化、半机械化，有的提高工效五十倍，有的三天完成了全年计划，工人们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攻下了十五万伏电子束焊机，现在已经正式投入生产。这种尖端设备，只有美帝才有，苏修也只有十万伏的。国内有两个研究所，过去花了三年的时间，到现在还没有投入生产。又如，XX第一机床厂，原来设计能力年产机床二千四百台，经过文化大革命，大破修正主义的路线，干部、职工一起劳动，大搞技术革新，结果去年提前完成了七千七百五十台，此生产能力比原来翻了二翻多。XX造船厂，是个百年老厂，文化大革命前多少年总共才造了两艘万吨轮，文化大革命还不到一年，就造了两艘万吨轮，而且这个速度越来越快，现在造“岳

阳号”万吨轮的时候，只用了一九六零年造“东风号”的四分之一的劳动力。现在七天干的活，就相当于过去一个月的工作量。

在生产发展方面，也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毛主席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鞍钢宪法”、农业“八字宪法”，主要是强调政治挂帅，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强调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现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走捷径，多快好省地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条就是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搞“生产第一”、“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专家治厂”、“一长制”、“爬行主义”，搞少慢差费，搞资本主义复辟。两条路线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XX飞机制造厂，过去弯制导管，用苏修的落后工艺，要经过五道工序，工人们称之为“金木水火土”法，劳动强度很大，生产效率低。后来工厂又用了三千多元的外汇，向美国买了一台弯管机，好看不好用，只能弯制一种管子。文化大革命以后，工人批判了“洋奴哲学”，批判了“洋货万能论”，自己制造了土设备，不仅可以弯各种规格的管子，而且提高工效三至五倍。XX化工厂，过去他们生产烧碱，剩余的大量氢气都浪费了，白白放掉了。去年年底，他们经过三十七天苦战，结果试产了一炉二十多公斤的晶硅，今年预计可以年产十二吨多，只用了投资九十万元。相反，XX单晶硅厂是花了很多钱从日本把设备买来，一年多建成了，投资三千多万元，年产只有四吨多。这是两条路线很明显的对比，按照主席路线三十七天就搞成了，而买洋设备，按刘少奇那一套的话，贪大求洋，用了三千多万元，而且产量很低。所以刘少奇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给我们的建设带来的损失很大。还可以举出很多靠主席路线发展生产的例子，例如：浙江有一个公社的生产队长，为了改变北煤南调的状况，他带领二十几个社员办起了“五·七”煤井，他们挖煤没有灯，生产队的一个老太太卖了八个鸡蛋，买了煤油灯；挖煤没有水鞋，他们就光着脚挖，把挖出来的第一吨煤换来的 20 多块钱，买了几十斤废旧的雨鞋，把它补起来用，到今年二月，这个煤矿已经生产出二百多吨煤，虽然数量不大，但从生产队来讲，能搞到这个水平就很不简单了，说明主席思想武装了群众，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就可以发挥出不可想像的威力。衡量社会主义企业（也包括农业），我们体会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经济标准。要以政治标准为主，但是经济标准也是不能少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

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主席这个话有普遍意义，不仅对文艺领域适用，对其它业务部门也都适用。

政治标准，就是按毛主席思想办企业，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办企业，用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办企业，这是政治标准。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一切思想都是社会主义的，一切企业也都是社会主义的。例如，有个军工厂，按理说它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但是这个企业里的反革命活动相当猖狂，厂里人参加的反动组织有十三个，发生反动标语的五十八起，破坏生产、呼喊反动口号的多起；还有偷听敌台广播达十年之久的；有个坏分子在文化大革命里打着“造反”的旗号，毒打工人、解放军、革命干部；还有一小撮阶级敌人大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蚀工人；有的把成吨的铜都偷跑了；有的甚至贩卖小孩！有的盗窃集团贪污公款一万七千多元。像这样的企业能叫社会主义吗？它虽然挂着社会主义招牌，但实际上不是社会主义的。又如，一个石油厂，阶级敌人与地方投机集团内外勾结，大量套购盗窃国家的石油产品。该厂 1969 年多进了十三万吨原油，但是生产出来的汽油、煤油、柴油等却比 1966 年少了二十三万吨，仅此一项国家就损失了一亿多元。该厂附近的一个生产大队的采购员，为了打进这个厂，花了两千多元行贿，买通各个关口，窃走了成品油三百多吨，价值六百多万元。这些例子证明了主席所讲的，过去有些地方的所有制问题并没有解决。事实证明，制度的形式不能决定一切，只有政治，只有主席思想，才能决定一切。从形式上看，虽然是社会主义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但如果不用主席思想来办，不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来办，而是用资产阶级思想来办，实际上还等于是资本主义企业。我们通过调查认识了这么一个问题：过去苏修老讲，你们说我们变修了，我们所有制没有改变，我们的社会制度没有改变，我们工厂都是全民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怎么会是资本主义的呢？其实苏修所讲的“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一块招牌、一个外壳，实质上已经变为资本主义。这种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企业，实际上不但剥削工人，而且还剥削国家。例如，XX 有个金属结构厂，就是借着军工生产大发“战备财”，该厂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总共生产了三十套军桥，全部不合格，而他们在军工生产的旗号下，一年来却安装了二十多台新设备，动用军工生产资金二百多万元，钢材七百多吨，木材二千一百立方米，水泥二千五百吨，

修了办公室、宿舍、厂房等十多项建筑，并且还虚报冒领二千三百人的副食品。这虽然是个别的，但说明他们实际上是借军事生产吃军队的军费，剥削军队，剥削国家。这个例子说明，如果不用主席思想办企业，没有无产阶级政治，企业是办不好的，在企业管理上，就会浪费自己的心痛，浪费国家的、浪费社会主义的、浪费人民的再多也不心痛，也不眨眼。

所以主席思想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根本。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要靠毛主席思想，我们不能像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那样，修正主义靠物质刺激，资本主义靠所谓“饥饿的锁链”，不干就解雇你，就没钱吃饭，饿肚子。我们不能靠那一套，我们社会主义制度靠主席思想，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农民也是一样，如果不用主席思想武装，也会有这种情况，为自己干就有积极性，为国家干就没有积极性。种自留地他的积极性就大一些，给集体干他的积极性就小一些，如果用主席思想武装起来，他们就会爱护国家爱护集体，就会大量涌现好人好事。所以，无论什么都是靠主席思想，要想发展经济，就要靠主席思想把劳动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样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发展。否则，反正都是社会主义，反正都是大家的，抱着“吃大锅饭”的思想，这样就不会有责任心、积极性，就会一心搞个人的事了，就会坏人坏事成堆。据说XX有个工厂生产航空火箭的弹壳，其中有一道工序，很简单，就是电镀一下，可是文化大革命前自己不搞这道工序，而是把弹壳从XX运到沈阳去搞，弹壳电镀好了以后，再运回XX，来回包装、运输，费时间、费钱，又费劳动力，同时也符合战备要求，光运费用来修电镀车间也用不完。但这样的事直到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人管，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主席思想，浪费多少他不心疼，他没有这个责任心，反正干不干他每月照样拿钱。所以没有政治也就没有经济了。当然这个话全面的说是没有无产阶级政治，就没有无产阶级经济。

所以说，不用毛主席思想统帅，不用突出政治的办法，不用发展政治的办法，来发展经济，即使是社会主义企业也会变质，因为掌握企业的人的思想不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就会变成资产阶级的思想；掌握企业的人的思想变了，他们就会利用掌握在他们手里的权，把全民所有制变成他私人的所有制，或者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按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要解决所有制的问题、生产关系同经济基础的问题，首先要靠政治来解决，靠革命来解决，解决了政

治才能解决它们。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思想武装了群众，调动了群众，使亿万群众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解放，这种对于群众思想大解放，也就是对于生产力的大解放，因为群众是生产力中最重要最活跃的、最革命的因素，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世间的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生产力里主要是人，人又主要靠主席思想。所以讲四个第一，强调人的因素。在战斗力上是四个第一，在生产力上也是四个第一，也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第一，思想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群众在主席思想的发动下，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了，就会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智慧，就可以创造出资本主义企业所不可能有的奇迹，创造出文化大革命前修正主义路线所不可能有的奇迹。

上次看雷达兵团的小雷达时，听说那个雷达原来是想给一个大厂搞，而大厂不敢承担。后来交给咱空军的一个修理厂，不论技术力量还是其它条件，都比大厂差的多了，但他们依靠主席思想，从战备需要出发，打破迷信，解放思想，找了几个小厂协作，结果造出来了。过去的雷达天线很大，要用大汽车拉，现在七、八个战士扛起来就能走，而且这种小雷达探测距离比原来的大雷达还远。又如情报部 X X 通信卫星接收站，开始有人认为搞不出来，由于用主席思想发动群众，在很差的条件下，很快就搞成了。地方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现在有一定普遍性的就是小厂办大事，尤其是小厂大办电子业。上海有一个原来生产手电筒电珠的街道工厂，现在造出了电子计算机和彩色电视信号发生器。一个生产无线电木壳的小厂，生产出了晶体管。天津汉沽区一个做铁壶、铁桶的小厂，也生产出了晶体管的成套设备。黑龙江肇东县有个孵小鸡作坊，生产出了一千瓦的广播机和超小型电台。还有个例子，我们看电子工业展览时听来的，过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法国进口了大功率的发射机，向全世界传播毛泽东思想。但是，有一个关键零件——高压硅整流管烧坏了，使广播中断。法帝国主义卖机器，不卖零件，故意卡我们。后来被陶然亭高压电器厂知道了，这是个小厂，设备很简陋，任务也很繁重，但是他们用主席思想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他们认识到这是为了使全世界都能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就毅然决然地承担了这项任务，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连夜突击了高压硅整流管，质量超过了法国。所以，用主席思想来抓生产。来推动生产，用突出政治来发展生产，生产力就会威力无穷。群众说：“过

去干部只抓生产，生产没人管；现在干部抓政治，生产人人管。”意思是过去干部只抓生产，不抓政治，不依靠广大群众，不用主席思想把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结果是“干部抓生产，生产没人管。”现在呢？干部首先抓主席思想，抓突出政治，用政治来统帅生产，用主席思想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大家知道了生产的意义，人人都为革命而生产，为中国革命和支援世界革命而生产，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同帝、修、反抢时间，结果是“干部抓政治，生产人人管”了。

我们突出政治，靠政治来推动生产，实际上就是突出用主席思想武装起来的群众作用，就是用主席思想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干部一个人抓生产，你能抓得了多少？主要靠群众抓。各行各业都一样的，群众有天然的理性。用主席思想把群众动员起来，群众就有无限的创造性，就有最丰富的智慧，最强大的力量。靠群众管理生产，群众办法就多了，点子就多了。所以，突出政治和群众路线是一致的。我们在北京看了一个厂子，是一个造电话机、造电子计算器的厂子，是空军的同志在那里军管，过去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群众实行管、卡、压。有个车间生产一种螺丝，按过去的规程，其中有一道工序，叫“打毛刺”，机器一下子生产出来的螺丝很多，生产几小时那机器就得停，很多人用手工的办法去“打毛刺”，因此该厂很大一部分劳动力都集中到“打毛刺”上，有时一去就是一、二百人，通过文化大革命，主席思想解放群众思想，工厂各部门之间打破了神秘化，打破了管、卡、压，需不需要“打毛刺”的问题，工人们自己起来作了个调查，发现了不打毛刺的螺丝比打了毛刺的螺丝还好用。干过机械师的同志都知道，螺丝就怕打滑，你把它磨得越光，它不是越打滑吗？这个“打毛刺”完全是无效劳动，有的还是“反效劳动”，有的是在数学上等于“负”号，做得越多，质量越低，搞的工序越多，质量越低，当然这是极个别的例子。

群众掌握了主席思想，真是不得了，例如 X X 4 2 0 厂有个生产发动机挂圈的车间，过去是车床加工，既浪费材料，生产效力又慢，现在改用冲床加工，二小时完成了一年的任务。该厂有个标准车间，他们放手发动群众，以无切屑为目标对车间工艺全面技术改造，采取冷、热、冲压、精铸、精锻等方法代替机械加工提高工效十倍、百倍，一个月完成了全年计划。天津 1 0 5 厂，自行设计热固性全自动化塑料注射成型车床，塑料压制全部自动化，八十秒可以压成八个电门

的壳子，提高工效几十倍。没有改革前，是在四十五吨的压型机上压，人工操作十分钟压一个，现在提高到十秒钟压一个。用主席思想把群众积极性、创造性发挥起来，这本身就是无穷无尽的生产力。文化大革命以来，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贯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用主席思想发动群众，三机部三十七个厂子，一年多来实现了技术革新一万六千多项。目前在生产战线上出现的大协作，是一个新事物，是用主席思想发动群众搞生产的好形式，从根本上来讲是发挥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大会战、大协作，不仅可以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还可以充分调动设备的利用率互通有无，互相取长补短。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企业也好，工厂也好，研究院也好，一搞大会战都可以调动，群策群力，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集中力量形成一个一个拳头，各个击破。这一次突破这个问题，下一次突破那个问题，一个一个问题解决，一口一口吃掉，这实际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军事斗争中总结出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运用到三大革命斗争中来。主席思想是普遍规律，是用之四海而皆准的，对各行各业都适用，运用于军事可行，运用于生产也行。

为什么说大会战是发挥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呢？和资本主义比一比，和修正主义比一比，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我们各个企业是用主席思想武装起来的，可以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可以合在一起搞大会战，突破我们生产发展中的某一个关键，或者一个技术难关。例如 XX814 卫星接收站，美帝搞起来要花好几年，我们搞大会战集中了全国的力量，两个月就突击出来了，填补了我们的空白。许多技术疑点，大家一集中力量很快就突破了。可是在资本主义是不可能搞真正的大会战，因为他们互相竞争，互相勾心斗角，都是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使别的企业垮掉，一家搞一套研究机构，有什么新技术，彼此之间互相保密，互相封锁，互相垄断。因此他们不会搞什么会战。即使说能“会战”，那也是互相狗咬狗，互相倾轧，互相破坏，互相捣乱。各企业、各公司、各垄断组织之间互相打内战，他们的“会战”实际上是内战。修正主义也是这样搞利润挂帅，利润挂了帅，你怎么能调得动他？他的第一指标是利润，不是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我们无产阶级事业。他是怎样赚怎样干，认为参加会战赚不了钱，他就不干了。所以，只有我们社会主义企业才能搞大会战，而这种大会战又正是发挥我们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新的形式。当前，要准备打仗，我们首要的是要作好精

神准备，同时也作好物资准备。物资准备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牵扯到经济问题。下面我汇报一下自己对军事经济关系方面的一点学习心得。军事工作和经济工作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相辅相成的，但是这两者都是从属于政治的，都是为政治服务的。我们谈这个问题，不是突出军事，也不是突出经济，是在突出政治的前提下，谈战备和生产的关系，军事和经济的关系。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战争不但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又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更没有国家的富强。”毛主席还说：“增加经济建设费用，使经济建设有更大更快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国防建设也就能得到更大进步。”又说：“你真想要原子弹吗？你就要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就要多搞经济建设。”恩格斯说：“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本身又是以一般的生产为基础的，所以也就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不仅整个战争，而且连“军队的作战方法”也依赖于经济条件。列宁也说：“没有极其认真的经济上的准备就要进行现代的战争，反对先进的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事情。”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林副主席最近指示，我们军队司令部的工作首先抓两条，头一条是革命化，第二条是机械化，要以革命化带机械化。越是现代战争，越是技术军种，对现代经济的关系越密切。例如在二次大战中，苏联生产了十五万架飞机，十一万辆坦克，九十万门炮；美国生产了二十九万架飞机，八万辆坦克，三十六万门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军队装备发动机的数量，平均每个士兵约为三分之一匹马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各国军队的给养费约占军费总数的 80% 以上，军械费不超过 15%，现在恰恰相反，主要是军械费，给养费只是小部分。我们空军要大发展，在飞机数量、质量上要赶超苏修、美帝，三机部、六院、民航，我们大家都在为这个共同的目的贡献力量。总起来讲，经济是军事的基础，军事为政治服务，归根到底也是为经济服务的。比如我们打仗的目的是为了保卫无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军事对经济是有一定的依赖关系的。但是，军事不仅依赖经济，它还推动经济，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或者说经济对军事起一定的推动作用，反过来军事对经济、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起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冶炼、机械、电子、原子、火箭等等，都是在军事斗争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许多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都是首先应用于军事斗争。两

次世界大战也都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所以，为了战胜美帝、苏修，我们也要发展经济、发展生产，我们也要搞技术革新。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我们不仅实现了政治和思想的大跃进，也一定能够实现经济上的和科学上的大跃进。

我汇报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一定要强盛。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现在世界上美、英、法、苏这些所谓大国，它们都在没落下去，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只有我们中国是最有前途的，我们的国家正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我们的国家正在强盛，今后还要更强盛。我们国家一定要强盛是有基础的，因为我们具备了强盛的内外条件。前面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政治和经济，与这个问题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的政治和经济都是要大发展的，这种大发展也必然带来我们整个国家的大发展、国家的强盛。

我们国家的强盛的首要条件，就是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这既是最强大的精神力量，又能转化为最强大的物质力量。几十年中国革命的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毛主席和毛主席思想是我们事业、我们国家兴旺的最根本的条件，是起最根本作用的条件。再一条就是毛主席思想统帅的伟大的七亿人民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再用现代的机器和现代武器装备起来，增强我们的生产力和战斗力，那就必将无敌于天下。再一条，我们有世界上最先进最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再有，经过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思想更深入人心，无产阶级政权更巩固了，我们党更强了，我们军队更强了，经济基础更强了，上层建筑也更强了，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更加强盛的新的动力。上面所说的是内部条件。除了内因之外，还有外因，就是世界人心所向。世界革命需要我们强盛，世界革命支援中国强盛，世界人民各处闹革命，这对我们也是一种支援，这是外因。内因、外因，主要是内因。这些基本条件决定了我们必然强盛。还有哪些基本条件？大家还可以考虑。下面我想讲一点历史事实。我们从调查研究历史事实中，看到的一个奇怪的，好象很巧合的现象，没有把握。这个现象，就是从总得规律来讲，事物的发展总是由低级到高级，螺旋式上升；或者按哲学上的话讲，波浪式前进；或者讲是否定之否定，但每一次否定，它总是要前进一步，而不是回到原来的地方。 象人类社会，最初是公有制社会，后来就变为私有

制了，将来又变成为高级的公有制社会。这是一个循环，但是这个循环不是停止在原地的循环，它是逐步上升的，就像我们上楼梯一样，一圈一圈往上转，转一圈就上一级。还有人类最初是无阶级社会，后来变成有阶级社会，将来变成高级的无阶级社会。每经过一次循环，就上升一级。我们从一些资料看到人类的历史，最初东方是人类文化的摇篮，最先进部分是东方。如中国最先进入封建社会。当然，我们也不是以地理概念来划分历史的，亚洲，也有那么一点非洲，埃及它就是靠在非洲那一点。总起来讲，世界地理上最初东方是世界比较先进的，后来先进的中心转移到欧洲，由东向西转，比如英国，那个时候很先进，它进入资本主义了，其他国家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还没有搞资本主义革命，美国还是它的殖民地，后来这个先进文化中心又转到美洲，因为美国搞了独立战争，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它发达起来了，现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又没落了，我们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最先进的部分又转移到亚洲，转移到中国。我们从这里头体会到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过去亚洲先进，中国先进，跟现在的将来的中国先进不是一回事了，有了质的变化，过去的先进是文化发展，先进入封建社会，现在的先进，我们是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比过去那个先进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列宁在一九一九就发现了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由英国向法国，然后向德国，然后向俄国，然后逐步东移的历史趋势，特别重要的是他指出了两点：第一，这种领导权，当时并不是掌握在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而是掌握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无产阶级手里，当时十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已经转移到了俄国。第二，列宁认为这种领导权，还必然会从俄国手中转移到别的地方。列宁还写过一篇文章，叫《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并说：“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列宁所讲的这些风暴是指亚洲革命的风暴盛行，本来亚洲是落后的，欧洲是资产阶级革命比较先进的，但是现在亚洲风暴盛行，“反转来影响”欧洲。列宁是外国人，他都认为中心要转移，亚洲要先进，东方要强盛，中国要强盛，世界正处在亚洲革命反转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所以可以预计，中国必然是这个新时代的伟大强国。各个历史时代都有过强国，林副主席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讲到历史上的几个强国，西班牙、英国、美帝（国）。西班牙是封建主义时代的强国，英国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强国，美国是

帝国主义时代的强国。但是从长远观点看来，这些强国，都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已经崩溃了，像西班牙已经崩溃；有的正在崩溃，像英国已经崩溃得差不多了，美国正在崩溃。所以说，将来真正强大的是我们中国。不要看现在我们的钢比人家少，有些技术比人家落后，工业比人家落后，农业比人家落后，总之，经济比人家落后吧！我们不要光看到这些没有人家富，还没有完全摆脱一穷二白。实际上，历史上强国都不是天生的。

西班牙，曾被阿拉伯人统治了将近八百年，直到一四九二年才统一和独立，但是不到五十年就征服了整个中南美洲，它的领土扩大到包括现在的德意志、意大利、荷兰、卢森堡等国，比它的本土大二十倍。当时西班牙拥有一千多艘商船，垄断了欧美间的贸易，成为海上霸王。英国，在十七世纪中叶，资产阶级革命以前，还是很小的封建农业国，全国人口只有五百五十万，大部分住在农村。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扫除了封建关系的束缚，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很快就发展起来了，到十八世纪中叶起，英国首先开始了产业革命，当时有代表性的是蒸汽机，各工业部门陆续开始采用机器生产，到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变成了号称“世界第一强国”，不仅工业生产占世界第一位，号称“世界工厂”，而且垄断了国际市场。它的殖民地布满世界五大洲，总面积相当于英国本土的七十五位，被称为“太阳不落”的国家。美国，最初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前，美国这块地方还算是原始社会阶段，大部分人依靠狩猎、捕鱼和采集野果为生，很落后。到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西班牙、法国、荷兰、英国殖民者相继侵入，到十八世纪中叶还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国家，大部分地方都是英国殖民地。一七七五年至一七八三年，经过北美独立战争以后，才摆脱了英国的统治和奴役，建立了美国。但是，当时经济发展水平还远远落后于欧洲，最大的城市费城才二万三千多人，纽约也只有一万五千人。十九世纪上半期，美国开始产生革命，到一八六〇年工业生产跃居世界第四位，到一八九四年，美国的工业已经超过英、法、德，变成世界第一位。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经济的发展到顶点。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美国工业产量占资本主义工业产量的五分之三。现在它们每况愈下，由强变弱，而我们中国是后来居上。只有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才后来居上。所谓强国，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时期内，在某些方面的强大。我们对强国要作阶级分析。过去、现在世界上的强国有两种：一种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强国，

它们是依靠对内剥削和对外掠夺起家的，尽管它们当初统一国家，搞资产阶级革命。历史上曾起过那么一点进步作用，但是它本质上是剥削阶级的，是反动的，是很不稳固的，其进步性是很短暂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强盛的内外条件必然走向反面，变强的条件被变弱的条件所代替，最终它们总要崩溃，总要被人民，被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起来把它们推翻。所以说，它们变强不仅是缓慢的，而且从质上讲是很不稳固的，是不能持久的，从长远的观点看，这种强国是没有前途的，这是一种强国。另一种强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国。例如，我们中国就是这样的强国。我们是依靠广大人民，为了人民，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得到本国人民的拥护，得到世界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变强是历史规律决定的，是本质条件决定的，从我们无产阶级来说，我们的进步性是根本的、永远的、革命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先进、最革命、最富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基础最巩固，和剥削阶级专政的强国相比，我们变强不仅是迅速的，而且是能够持久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的百年，有的几十年，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很快的，但跟我们比起来，我们比他们要快得多。而且我们变强，必然会大大地超过古今一切强国，他们那种资产阶级的强国是短暂的革命，短暂的先进。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彻底的，他们一旦搞成了就变成反革命了。我们无产阶级和它们完全相反，总是不断革命，继续革命，彻底革命，并且只要我们坚持主席思想，坚持革命，我们的强盛就可以持之以恒，我们经过一系列政治大革命，现在我国强盛的内外条件已经形成，且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国防的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很快就会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在世界范围内发挥巨大的作用。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历史的辩证法，从来都是新生事物战胜腐朽事物，革命阶级战胜反动阶级。根据历史辩证法，不仅中国的强盛是必然的，而且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胜利也是必然的。这种历史的必然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的。总是新生的代替腐朽的，先进的代替落后的，这样的历史才能发展。这一点，不但人类历史上是这样，自然界也是这样，从低级到高级。地球原来是个火球，逐渐地发展变化，慢慢地有了空气，有了水，以后又有了低级生物、低级动物和高级动物。事物总是在不断地发展着。我们要战胜帝、修、反，而且能战胜帝、修、反，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国或者前进，或

者倒退，或者超过美帝、苏修，或者落后，或者战胜帝、修、反，或者被帝、修、反所战胜，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完全对立的两种前途，我们与帝、修、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们不超过它们，不战胜它们，它们就要战胜我们，就要超过和吃掉我们，因为它们实行的是弱肉强食的法则。我们一定要富国强兵，这样才能战胜帝、修、反，我们要按照刘少奇那一套搞，就会变成一个富而不强，大而弱的社会殖民地，成为被他们瓜分的对象。所以我们贯彻毛主席世界革命的路线，排除右的和极“左”的干扰，要继续批判“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投降主义，也要批判各种极“左”的和形“左”实右的东西。要正确对待帝、修、反内部的各派势力；资产阶级当权派和在野派，小资产阶级的各种政治势力；各种民族主义势力，等等。要看到美帝、苏修互相勾结的一面，也要看到它们互相争夺的一面，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美帝、苏修。世界大变，形势大好，按照毛主席的路线，我们的重点是亚、非、拉第三世界的工作，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掌握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五一”以来，主席接见了很多亚、非、拉第三世界的当权派，还有法国的贝当古，这都是为了扩大我们的反帝、反修统一战线，对朝鲜、越南，我们也要看到他们和美帝、苏修矛盾斗争的一面，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只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才能理解毛主席关于世界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例如对西哈努克的争取，支持他反美，对修正主义的分化，利用小修和苏修的矛盾，等等。主席的这个思想把全世界所有的反帝、反修的力量，把一切革命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可以联合的力量，可以利用的力量，都调动起来。有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领导，同帝、修、反作斗争，世界革命是一定可以成功的。

当前，世界斗争很激烈，各种政治势力很复杂。要承认这个差别，讲究策略。我们既不搞刘少奇的“三和一少”的投降主义，也不搞王、关、戚那一套形“左”实右破坏统一战线的东西。“清一色”的思想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主席早就批判过那种主张，“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的幼稚和关门主义，面对美帝、苏修和我们发动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更要加强反帝、反修的统一战线。列宁曾经写过一个文章，叫《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其中讲到为完成任务，要组织、利用各种力量，其中包括“暂时的同盟者，有觉悟的朋友”。

友和不自觉的助手”。像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他们和我们有多少共同语言？他就是同苏修有点矛盾，它们不自觉地帮了我们的忙，是不自觉的“助手”。在某一个问题上或者在某一个时期，它们和我们暂时的同盟，是不自觉的。有自觉的自然更好，不自觉的也能帮助我们。马克思也讲过：“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的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让魔鬼领着你走。”关键在于我们搞反帝反修统一战线，领导权必须在我们手里头，而不是像王明那样，把领导权交出去，让它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主席的策略思想一贯是集中优势力量各个击破敌人。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仗要一个一个的打，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以一当十，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以十当一。主席这些思想，都是有普遍意义的，不仅运用于军事斗争领域，同样可以运用到生产斗争，运用到外交斗争，运用到世界革命斗争。只要我们认真学习，坚决照办，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使中国迅速强盛起来，是我们国家的需要，也是世界革命的需要，是爱国主义的任务，也是国际主义的任务。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是爱国主义者。”按照主席阶级分析的观点，抽象的超阶级的爱国主义是不存在的。爱国主义分两种：一种是剥削阶级的爱国主义，是要人民受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由于这种国家只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所以是狭隘的爱国主义，甚至是反动的爱国主义的。另一种爱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爱国主义。是要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爱我们无产阶级的利益，广大群众的利益。主席讲有两种爱国主义，我理解就是两种爱阶级的主义，我们既是爱国主义者，又是国际主义者。我们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我们的强大，就是世界革命根据地强大，就可以更有力地支援世界革命，所以我们这样爱国主义也是一致的。我们这种国际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放大了的爱国主义，是爱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爱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爱世界各国的革命人民的主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的必须强盛，使我们联想到我们空军建设。要胸怀全局，立足本职。我们要胸怀中国革命的全局，胸怀我国要变成世界上强国的全局，来考虑我们空军的建设，空军的工作。中国必须强盛，我们空军必须大发展，中国的强盛，为空军大发展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这个条件是多方面的，有政治条件、物质条件，但是最主要的是毛泽东思想，是政治条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空军也只有大发展了，强大了，才能和中国的强大相适应，这是属于必要性。中国的强盛为空军的大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这属于可能性。我和大家一样，坚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的人民空军一定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革命化的空军。这样我们才能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作出应有的贡献，也是我们空军为我国的强大尽了一份义务。我们所说的强大，不仅是从质量上讲的。质量上我们已经是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而且还要看数量。我们要在质量上、数量上全面地成为世界强大的空军，这样才能够和我们七、八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强的、最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相称。根据我的体会，联系到空军的工作，我觉得应该胸怀强大的中国这样一个全局，在这样一个基点上来考虑空军的发展和建设。为了我们祖国的强大，为了我们空军的强大，我愿意作一个新战士，作一个小学生，和大家一起干，尽到我自己小学生、新战士这一份微薄的力量，为建设强大的空军，添一块砖，添一块瓦。添不了砖，添不了瓦，就添一段电线，添一点土，反正尽我自己的最大力量，和大家一起干（长时间热烈鼓掌）。我来空军时间虽然不长，但我对空军有的感情，我在空军干定了（长时间热烈鼓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空军是紧跟主席、主席思想、主席革命路线的。我愿意在空军这样一个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和大家一起干，一起战斗！为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人民空军，贡献我的一切力量！

第三个问题，学习毛泽东思想。

现在毛泽东思想这样深入人心，这样在全国、全世界人民中广泛普及，这在马列主义史和人类思想史上也是划时代的发展，是过去从来没有的。这说明了主席思想本身的英明伟大，说明了主席思想最正确地反映了客观规律，反映了真理，最能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最能够吸引群众，最能够深

入人心。也就是说，首先是主席思想本身极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有了划时代的大发展，才能够有划时代的普及。林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发动了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群众运动，到现在十年了。十年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不断提高，不断前进。十年里头，我们同刘、邓司令部进行了反复的激烈的斗争。这里也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坚持发动群众，学习毛主席思想；另一条是刘、邓路线，他们干扰、阻挠、破坏、封锁，不让群众学习毛主席思想，这是对主席思想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截然相反的两种做法。斗争的结果，还是学习毛主席思想的群众运动占了上风，胜利了。

但是，回顾过去十年的历史，我们看到一点，就是学习毛主席思想的群众运动几起几落（当然这个“落”也不是完全没有了），有时候高涨一些，有时候由于刘、邓或彭、罗、陆、杨的破坏、阻挠，受到一些干扰，而学习主席思想运动的几起几落，也就影响了各项工作的几起几落。什么时候学习主席思想群众运动开展得好，各项工作也就搞得好；什么时候学习主席思想的运动受到冲击，各项工作也就下落。比如说一九六〇年，林副主席提出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首先在空军开展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部队冲破了阻力，学习主席思想的群众运动不断发展。这里在调查中听到基层同志的看法，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四年这一段，学习运动不断上升，各项工作就越来越有生气。由于学习主席思想群众运动的上升，四好运动也开始上升，各个单位的四好连队都是比较多的。一九六四年，在大比武的冲击下，学习运动就有些下落，随着各项工作也有下落，四好运动也有下落。一九六五年，林副主席又提出突出政治，部队又走上突出政治的轨道。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又重新上升，部队的各项工作也开始上升。四好运动也开始上升。逐渐又超过大比武冲击以前的最高水平。主席提出全国学习解放军。学习解放军，首先的，主要的是学习解放军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这样就在全国把学习主席思想的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了。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林副主席又提出要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提高到新的阶段。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解放军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准备，下面也有这个反映。要是不经过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一段，我们部队的政治水平就会差一大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完成这样复杂艰巨的政治任务，是很难想象的。比如三支两军，主要是毛泽东思想，而自己就首先要有毛泽东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部队

所以能够稳定，能够成为一个长城，也首先是因为有主席思想，这个思想长城，才建立了物质的长城，建立了政权的基础，才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擎天柱。如果按彭德怀、罗瑞卿那个搞法的话，那我们军队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绝不会有今天的政治地位，我军之所以有今天，不靠别的，最主要的就是靠毛泽东思想。十年来的历史证明，那一个时期主席思想学得好，那一个时期各项工作搞得好的；那一个部门主席思想学得好，那一个部门的工作就做得好。正像解放军学习主席思想领了先，各项工作就领了先，成了全国学习的榜样。反之，那一个时期主席思想学得差一点，那一个时期的工作就要差一点，那一部门主席的思想学得稍差一点，那一个部门的工作也就差一点。可以说，学习主席思想群众运动的水平是衡量各个时期工作，衡量各个部门工作的标准。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学习主席思想的大考验、大普及，主席思想学得好的，文化大革命就搞得好；主席思想学得差一点，文化大革命中出问题就多一点。部队里几个过去大比武搞单纯军事观点的所谓“尖子连队”，在文化大革命中思想就乱一点。因为没有过主席思想就没有政治方向，就统一不了大家的思想，出问题就多。现在，广大工农兵群众学习主席思想的自觉性更高了，他们为改造世界观而学而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学而用，为支援世界革命而学而用。广大群众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毛泽东思想在群众思想中扎下了根子。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中，要懂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好处和不学的坏处。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群众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亿万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学习毛泽东思想。

群众在学习实践中发展和创造了很多好的学习形式，比如天天读、讲用会、机关的半日制、学习班、学习小组、搞大批判，学习最新指示，从阶级斗争教育起步，在路线斗争教育中提高等等。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深入到各个领域，各行各业。改变群众的面貌，出现了很多奇迹。空军 X X 医院用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创造了奇迹。最近三年多来，治好了三百九十五名精神病患者。其中六十名没有打一次针，没有吃一次药，恢复了健康。病人高兴地说，毛泽东思想是打开精神病枷锁的钥匙。资产阶级治疗精神病靠三件宝，吃药、通电、捆绑。例如电休克，用 80 到 120 伏的电压在病人头部通过，使病人全身抽动，皮肤发紫，口吐白沫，昏死过去，然后再用人工呼吸的办法，使他苏醒过来。病人看到这种可怕的情景，有的跪倒求饶，有的跳墙逃跑，甚至有的卧轨自杀。X X 医院

的同志们说：“精神病是精神因素引起的，因此要靠毛泽东思想这个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来摧毁。”他们对几百名精神病人发病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大多数精神病人发病的主要原因是心胸狭窄，对一些问题思虑过度，以致精神失常，他们除了用少量药物配合外，主要是运用主席思想解开病人的思想疙瘩。有一个病人躁狂，暴跳，乱砸玻璃，但是一给她念毛主席语录时，她就停下来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又犯病。从这里他们发现这种病人的特点是忘得快，后来他们经过调查，发现她原来是工人家庭出身的，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得不到满足，因此得了精神病。于是抓住不发病的点滴时间，同她学习主席著作，让她忆苦思甜，斗私批修，经过三个多月，恢复了健康，病人出院时，热泪盈眶地对着主席像说：“资产阶级思想给我套上了无形的精神枷锁，一直折磨我几年，是毛泽东思想冲刷了我灵魂上的污泥浊水，使我这个病人又获得解放。”她出院二年多，完全没有再犯病。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思想无比强大的威力。总起来讲，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形势大好，成绩很大，十年来不断提高、发展，这是主流；但是也看到一些支流方向的现象。例如，有的人在阶级斗争激烈时，学习主席思想要求迫切，这当然是对的，但平时就差一点。

有的认为，站对了一阵子，就可以吃上一辈子，说：想过去还可以，看现在过得去。望将来差不离，想来想去没问题。有的认真自己成份好，学习就可以松一点，不懂得成份好不能自发产生毛泽东思想。有的认为是领导上“要我学”，而不是“我要学”。学习不主动，不刻苦，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有的强调工学矛盾，甚至以工作代替学习。如挖防空洞的时候，有的领导不是靠毛主席思想把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而是说“挖防空洞就是最好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说什么“心往洞上想，计往洞上献，劲往洞上使，钱往洞上花，人往洞里钻”（笑声）。群众批评说：“洞挖通了，思想挖空了，作风挖松了，政治也冲了，最后战备也空了。”群众并不是否定战备，挖防空洞也是好事情，但战士对这种不是用主席思想来推动战备的做法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如果用战备来代替毛主席思想，战备也是会空的。可见怎样认识对待毛主席思想的问题，始终是个头等重大的问题。虽然经过文化大革命，但有的并未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代表的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扫除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障碍，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今后还要继续把学习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不断推向前进。毛主席

思想不是一般的马列主义，而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列主义，是全面发展的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主席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的马列主义，要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新的发展，不能认为毛主席思想还是停留在过去那个水平。实际上不仅马列主义是不断发展的，主席的思想也是不断发展的。主席最善于发现新生事物，总是不断地总结国际、国内的最新的经验，不断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指示。文化大革命中，主席就有很多最新指示。一九六七年九月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发现许多新事物，作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指示，之后又亲自掌握八个典型。文化大革命就是遵照主席的不断指示，根据主席的战略部署，一步一步取得胜利的，中国整个革命都是在毛泽东指引下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思想不仅是我们最宝贵的国宝，也是世界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认真学习，代代相传。

主席的英明领导是我国革命胜利的各种因素中的决定因素，是各种条件下最有决定作用的条件。有些国家，比如印度，人民很穷苦，受压迫很深，革命的客观条件很好。非洲有些国家也是这样，但是由于没有无产阶级的英明领袖，无产阶级至今仍然一无所有，没有取得革命的胜利，没有掌握政权。所以说，马列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政权、群众这几个关系中，领袖是核心，决定政党、政权性质的，不是叫什么名称，而是以什么思想为指导，实行什么路线、什么政策，什么样的领袖来领导。比如苏联，过去列宁、斯大林领导就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是无产阶级政党。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篡夺领导后，他们搞的是修正主义，法西斯的一套，变成了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权。正如毛主席教导的：“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质。”毛主席思想来源于群众，但是不同于一般的群众思想，主席思想总结了历史的和现实的群众的实践，但主席思想高于历史，高于现实，高于群众，高于实践。群众中可以自发地产生革命的情绪，革命要求，革命的感情，革命的思想，但这都不等于是自发地产生毛泽东思想。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地感觉它。”群众中往往是感性的东西较多，感性的东西当然很重要，必不可少的，但是它是属于自发性的，属于认识的“自在”阶段，是不稳固的。理性觉悟才是上升的更自觉的东西，属于认识的“自为”阶段。感性的东西只有提高到理性，才能够得到加深和巩固。群众里头一些感性

的东西，虽然也很重要，但是还要提高，要靠主席思想来提高，使之上升到理性认识。比如，有的人对主席有朴素的感情，这个认识当然很重要，这是第一步，是基础。但是只停留在“报恩”上，还是远远不够的，是不巩固的，还必须不断地通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提高阶级觉悟。从理性上认识到，只有跟着毛主席走，革命才能成功，才能够取得彻底胜利，人类才能解放。只有这样的认识才深刻，忠于主席的信念才越自觉，越坚定，越巩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只有通过活学活用主席思想，从继续革命的高度，从领袖、政党、政权、群众的关系上来认识领袖的作用。才能真正认识到主席的伟大，才能真正自觉地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不然的话，不向群众灌输毛泽东思想，不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光是靠群众自发，就可能走上无政府主义、多中心主义、宗派主义、经济主义的邪路。灌输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全国的思想，促进了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了全国人民的革命团结，是文化大革命最主要的任务和最主要的成果。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工农兵群众中的大批新生力量加入到我们党的队伍、干部的队伍，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才能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培养成为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

对待主席思想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学习主席思想也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理论联系实际，活学活用，学用一致；再一种就是理论脱离实际，学而不用。我们要前者，不要后者。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毛主席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学习这种最革命科学的思想，学习这种最科学的思想，就要用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要从理论基础到实际，从实际到理论。在革命的过程中，革命的思想，革命的理论总是带头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没有革命的理论运动，就没有革命的实践运动。没有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就不会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革命实践。毛主席历来非常重视革命理论的巨大力量，三十多年以前，就号召我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并指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

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现在我们要努力学习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这方面来个学习竞赛。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又讲：“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就是要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靠主席思想来发动，主席思想掌握了群众，就会对历史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大的优点，就是充分发挥了群众的伟大作用，也最充分地体现了革命领袖的伟大作用。建设社会主义离不开群众的觉悟，积极性、创造性，离不开群众的精神力量，而群众的精神，要靠主席思想来发动。这里举个例子，随军的家属，过去一般人是看不起的，但是他们一旦掌握了主席思想，这个也是很惊人的。高炮二师的干部家属组织起来，搞了个小工厂，造出了 40 火箭筒的发射管，并且还有创造。革命的精神力量对于历史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反革命的精神力量对历史有很大的阻碍作用，历来的统治阶级都十分重视精神力量。中国封建社会延续几千年，和封建主义思想根深蒂固有很大关系。我们的社会主义要想千秋万代不变色，就要靠毛泽东思想。有了毛泽东思想，就“一有百有”；丢了毛泽东思想，就“一丢百丢”。掌握毛泽东思想和我们的政权巩固息息相关，如果广大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任何人想要反对毛主席思想，想搞资本主义复辟，都会马上被群众识破，不能得逞。无产阶级政权要靠人来掌握，人要靠主席思想掌握。所以我们有了主席思想，有了用主席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我们的政权才能巩固，才能是铁打江山。斯大林虽然曾经提出过：“全部问题在于保持政权，巩固政权”的口号，但是他没有使马列主义和群众普遍地相结合，没有使苏联的人民群众普遍地掌握马列主义，结果政权还是被篡夺。而我们广大工农兵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可以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就有了巩固的一切。对一个领导班子来说，如果不用主席思想掌权，也就丧失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上失权，是使我们的政权和平演变的最大危险。政权要靠人来掌握的，而掌握政权的人如果没有主席思想，政权就会改变颜色。所以说，主席思想是我们无产阶级政权的灵魂。

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还要进一步掌握各个领域里的领导权，在政治、军事、

经济、意识形态、科学技术各个领域里，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用毛泽东思想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各种业务观、学术观，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学习主席思想，我觉得当前一个主要内容是学习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我们要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最首要的是要好好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用主席的思想建立我们的无产阶级的继续革命的观点，建立我们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观，建立革命的社会主义观。这对我国，对世界革命，都有重大意义。因为竞赛怎么搞社会主义，怎么把社会主义进行到底，是当前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一个共同性的重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从社会主义诞生的时候就开始有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世界上流行着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比如：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就是在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创立了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现在，社会主义更加成为时代的潮流。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更多了，如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南修的所谓“不结盟”的社会主义，意修的所谓“结构改革”的社会主义。此外，还有印度的社会主义等。刘少奇的社会主义，更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我们要能够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中辨别真假，防止“鱼目混珠”。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当前国际共运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斯大林虽然搞了社会主义，但是还不彻底，搞社会主义就要搞政治，搞阶级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因为没有政权，社会主义就是一句空话。没有政权的社会主义，是“乌托邦”，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搞社会主义这个当代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从理论上、实践上作了最科学、最正确的解决。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贡献，这是我们当前学习主席思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将近一百年了，但是空间怎么搞社会主义并没有解决，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样板。只有我们伟大祖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次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也是一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搞社会主义的大辩论，一个大提高，也是关于社会主义认识的革命。我们学习主席思想，就要学习主席对

马列主义的最新贡献，对马列主义的最新发展。根据我的体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是我们当前学习的一个重点。

下面讲第四个问题，就是空军作战方面的问题。

我们空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在强大的陆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为了和我们国家的强大相适应，我们的空军要建设成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这种强大，包括两方面：首要的就是革命化，毛泽东思想化；再一个，就是要现代化。我们要建设最强大的空军，也就是要建成最革命化、最现代化的空军。以革命化来带动其他。这样我们空军才能有最强大的战斗力。中国要强盛，空军要大发展。这个大发展，首先是学习主席思想运动的大发展，突出政治的大发展。首先有了学习毛主席思想的大发展，然后才有其他的大发展，才能带动其他的大发展。我们空军的人员要发展，飞机要发展，但首先是我们学习主席著作群众运动要更进一步地大发展。用毛主席思想把广大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以后，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大发展。所以，首先是要用学习毛主席思想群众运动的大发展，来促进、带动其他各项业务的大发展，就是说，首先是精神力量的大发展，然后才是物质力量的大发展。空军建设，首先是政治建设，用政治建设来带动其他各项建设。下面就结合我的本职工作，讲一讲对作战方面的几个具体问题，调查研究的体会。作战是我的本职工作，胸怀全局，还要立足本职工作。工作都是大家做的，我只是讲讲向大家学习的一点心得体会。学习，首先要解决学习态度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有意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遵照主席的教导，是近这两三年，根据国内外的一些事情、事物，我联想到空在未来战争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一些调查和研究。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调查研究和学习主席思想的方法，讲两点不成体会的体会。

(一) 把搞好思想革命化和思想科学化结合起来，建立革命的、科学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

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学习主席的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我体会必须抓好两个方面：一是思想革命化，一是思想科学化。毛主席早在几十年前，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篇著名的文章里就教导我们说：“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思想化，就是要“斗私批修”，破私立公，解决公和私的矛盾，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矛盾，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这是改造主观世界的核心。思想科学化，就是要提高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按照主席的思想，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全面地、深刻地认识各种事物，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这“两化”中，首先是要搞好自身的思想革命化，就是解决为那个阶级服务的问题。这是首要的，是基础，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只有革命化，才能够真正科学化。没有革命化，科学化也是空谈。因为革命本身就是最大的科学，就是最大的社会科学，历史唯物主义。革命化不好，私心很重，那就会心胸狭窄，鼠目寸光，计较个人小事，不关心国家大事，对一些问题的观察，就会有个人的偏见，个人的倾向性。就会干扰自己的认识能力，妨碍认识真理，有时候甚至有意无意地隐瞒真理，歪曲真理，颠倒是非。比如，有的人由于个人的问题没有得到满足，就无端怀疑组织不信任，不重用自己，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组织。又如，有的领导干部从个人好恶出发，跟他好的他就觉得好，跟他不好的他就觉得不好，因而不能正确地评价和使用干部。再如，文化大革命中，有的人从资产阶级的派性出发，实际上也就是从私字出发，对领导干部，对群众组织，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往往就不能实事求是，就不能得出科学结论。只有一心为公，才能把自己和全国、全党、全军联系起来，才能胸怀全局，关心整体，对问题的观察才能看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看得全面一些。有私心就有偏见，这只是一方面，从另一方面讲，偏见又不完全来自私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的主要是阶级立场问题，私心杂念造成的，有的主要是由于认识上的主观性、表面性、片面性造成的，有私心固然有偏见，但没有私心也不等于就没有偏见，这里还有一个能不能按照事物本来面目，真实地认识客观事物的问题。比如，组织飞行训练，有的部队总想多飞，提高战斗力，主观愿望是好的，这种积极态度也是对的，但是由于对飞行的客观条件（如气象、器材、飞行员的思想、身体等等），没有正确的认

识，盲目蛮干，结果发生事故，造成损失。由于认识的错误，造成工作错误，是经常发生。因此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也容易被人们原谅。这是一种现象掩盖另一种现象，即好的愿望的和好的态度，掩盖着不好的、不正确的思想认识和效果。当然，有时也有相反的现象，本来是动机上和态度上的错误，他往认识上推，以认识上的错误掩盖态度上的错误。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把动机和效果统一起来。”从效果上来讲，革命化和科学化搞不好，这两者都会给革命带来危害。当然革命化搞不好带来的危害更大。所以我们不能躺在“辛辛苦苦”和“好的愿望”上面睡大觉。思想革命化和思想科学化，是互相影响的。思想革命化是根本。只有真正思想革命化，才能真正思想科学化。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因此最大公无私，有最彻底的精神，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才能够真正客观地、科学地认识和对待各种事物，才能认识和拥护真理。思想革命化是首要的。但科学化也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思想革命能够促进思想科学化，并不能代替思想革命化。没有科学的态度的方法，也不能算是完全的革命化。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教导我们说：“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要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成功。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作党性不完全。”列宁也说过：“只有用人类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宝藏来丰富自己头脑时，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因此，作为领导机关的一个工作人员，活学活用主席思想，既要斗私批修，破私立公，促进思想革命化，又要不断地克服主观性、表面性、片面性，提高认识能力，做到对于各种事物的认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促进思想科学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只有向着思想革命化、思想科学化这两个方面去努力，才能促进世界观的全面、彻底的转变，才能建立起革命的、科学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二) 把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结合起来，反复进行调查研究和实践。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调查、研究、实践，这是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也是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对领导机关来讲，主要是抓好两头，上跟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下靠广大群众，面向基层。搞好调查研究，既是紧跟上头的重要方法之一，更是抓好下头的主要方面。调查研究，是以主席思想为指针。这是最重要的，是方向性的问题。主席对调查研究从原则到方法都有一系列的教导，这里我只谈学习主席这方面教导的一点体会。调查研究，还要占有大量的材料，广泛接触群众，面向基层，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调查的方法多种多样，如开调查会，个别谈话，看文件，查资料等等。开调查会的范围要恰当，人不一定太多。有时人多了，反而调查的东西少了。因为人多了，相互间生疏，不便讲话。要多开小型调查会。另外，可分别找不同级别的，一次调查会都同级的一起开，往往效果好一些。比如开连一级的，就不要营的干部参加，因为领导在跟前，一定是领导先讲，轮不到他，再就是受拘束，不敢放开讲。

调查研究，首先是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占有材料。因为材料是直接反映客观的，是第一性的东西，是认识事物的第一步。没有材料，没有对于客观事物的感性认识，就没有理性的东西，领导机关就无从切合实际地指导部队的工作。方法固然重要，但要搞好调查研究，首先要解决态度问题。必须放下架子，满腔热情，平易近人，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如果摆架子，耍威风，官气凌人，群众心里很反感。就不会开口，或者开口不开心，不交心。表面应付几句，不把真实情况讲出来。这种调查不到真实情况的调查，就是调查的最大失败。开调查会不能堵塞言路。主席教导我们：“即使错误的话也要让人家把话讲完。”何况很可能自己是错误的，而群众是正确的。所以开调查会，首先，对群众要抱正确的态度，要用同群众在政治上平等，使群众思想解放。为了让群众更好地开口谈问题，要从个别到一般，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由近到远，先从群众喜闻乐见的问题谈起，尽量用打开言路的题目和问题，而不要用堵塞言路的话题，否则使群众发言感到为难。这样，群众才不仅乐于开口，而且愿意交心，把情况毫无保留的倾腹相告。这样，我们就可以从群众那里得到很多材料。但是，占有材料还不是目的。它是方法，是手段。我们的目的是研究材料，认识事物，发现真理，指导实践，材料是丰富

的、生动的，但它又是比较原始的，个性的，我们要从中找出共性的东西。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感觉只能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能解决本质问题。”所以我们不是为了解情况而了解情况，为占有材料而占有材料，要把材料和道理结合起来，把调查和研究结合起来，把个性和共性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才能找出一般的规律，才能用来指导实践。比如到一个连队去作调查，对连队的干部、战士的思想、技术、身体、家庭情况都弄得很清楚，占有了大量的材料。但如果就此止步，不作研究，尽管占有了大量的材料，对这个连队的主流和支流，成绩和缺点，问题到底在那里，应该抓什么等等，仍然得不到正确的结论。占有材料不容易，提炼问题更不容易。我的体会，不能从感性到感性，就事论事。而要从感性到理性，就事论事，以理带事。这个“理”就是用主席思想来观察事物。我的体会，一个是要抓“新”字，一个是要抓“点子”。抓“新”字，就是要解决思想，抓新生事物，抓地平线上刚冒出来的东西，抓处于萌芽状态的新苗头。当然这个“新”，也不是把它绝对化，不能认为抓“新”就是丢掉“旧”。这个“新”，不是脱离“旧”，而是从“旧”中去找“新”。对一些常见的事，常见的道理，老生常谈，不能熟视无睹，见惯不惊。要看到旧中有新，注意抓旧事物中的新因素、新动向、新发展和新情况下的新运用，抓一种倾向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要抓“新”，必须思想解放。思想的解放，是一种很重要的解放，思想解放了，就会敢想、敢干，别人走过的路我们能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我们也敢于走。思想解放，也会带来物质的解放。例如，发展垂直起降战斗机，就可以把飞机从机场跑道的限制下解放出来。又如，用常规雷达探测导弹，把垂直起落（降）战斗机移植到军舰上等等，这都是一种物质的武器的解放。再就是要抓到点子上。这个“点子”就是矛盾的焦点，就是主要环节，关键，核心问题。也可以说是一触即发，一捅就响的那个地方，是能够影响全局的关键性、带普通性的问题。比如关于搞垂直起落（降）战斗机问题，矛盾的焦点

不是在天上，因为飞机在空中机动性大，而是在跑道上，飞机离了跑道就不行。搞垂直起落（降）战斗机，飞机就解放了，主要矛盾就解决了。又比如射击，不扣扳机，就不响，扣到扳机就到点子上了，扳机就是矛盾的焦点。又如开电灯，要打开开关，牵牛要牵牛鼻子，打鼓要打到鼓点上，等等，这都是关键所在。抓到了点子上，就能触发矛盾，解决矛盾，推动事物的发展，抓不到点子上，就不能触发矛盾，就不能在事物内部矛盾深处爆发革命，就不能促进事物的转化。抓到点子上，就会事半功倍；抓不到点子上，往往就会事倍功半，甚至事倍功零，无效劳动。有了点子，对于事情的落实起很大作用，没有点子，落实起来就困难。点子是怎么出来的呢？根据我的体会，有些是从群众中调查来的，有些是调查以后，从分析事物的矛盾中研究出来的。总之，要接触群众，接触实践，无论如何不能闭门造车，不能闭门造点子。不符合实际情况，主观主义造出来的点子，是歪点子，起不了好作用的。群众中蕴藏着大量的智慧，等待领导上发掘。但是群众中蕴藏的智慧和点子，不一定都是直接地反映出来。有的从正面，有的是从侧面，甚至有的从反面给人以启发。如有的调查会中的几百句话，我们可能一句也用不上。但有时群众发言中的一句话，却可以启发我们作出几百句的文章来。所以说，调查研究的成果和群众反映的实际情况，又一样又不一样，又相同又不相同，又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这就要求对从群众中调查来的材料，进行思想加工，而不是机械的加工。要进行提炼和联想，而不是机械地照搬，照镜子一样只看表面性。从根本上讲，我们调查研究的目的，是要指导实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第一个飞跃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第二个飞跃，才能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调查研究的结果，要靠群众的实践来检验，也要靠群众的实践来落实，这样才能把精神力量变成物质力量，“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比如雷达探测导弹，研制垂直起落（降）战斗机，天线小型化，都是依靠群众的力量，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调查、研究和实践是一个不断反复，不断深化和不断提高的过程，要不断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到群众中去，交给群众去检验，去实践，去实践。如此反复循环，把毛主席关于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的教导，贯彻到调查、研究和实践的全过程。

今天,我向首长和同志们汇报得很不全面,很不深刻。今天我本来准备汇报两个小时,没有想到来了个“马拉松”,就像小学生进考场,超过时间,交不了卷。耽误了大家很多时间。这么多人的时间加起来,我还也还不清。大家比我学得好,有很多宝贵的经验,我总觉得有点像“班门弄斧”。今后要更好地向首长和同志们学习,永远做大家的小学生。

2009 年 7 月 27 日初稿

2012 年 2 月 24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二册（4）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二章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

第四节 林彪搞突袭 毛泽东反潮流

本节资料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上的讲话

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我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这几个月来，主席对于这个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这个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必要，很合时宜。在这次国内外大好的形势下开这个人代会和提出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反帝反修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会有深远的影响。

这次全会的三个题目，即宪法问题，计划问题，战备问题，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间的三件大事。我同意恩来同志刚才所讲的关于这次会议的议程的安排。

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可以说这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条反映出我国革命经验中间最根本的经验。

毛主席，大家所知道的，是我们党、军队、国家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毛主席的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因素总是多种的，不会是平均的，必然有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客观的条件当然很重要，但是很多国家也有很好

的革命形势，但无很好的领导，就不能成功。我们是既有这种客观条件，又有这种正确的领导。这种正确领导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使得我们成为胜利的国家，成为胜利以后继续前进的国家，继续革命的国家，而不是中途停顿的国家。没有被世界上修正主义的逆流所同流合污，成为中流砥柱，这是很不容易的。挡住这一个逆流，很不容易。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地位是斗争中间形成的，是几十年的斗争中间形成的，是在党内两条路线的较量中间比较出来的。所以，这个领导地位，在国内、国外除少数极端反动分子以外也都承认。中国革命半个世纪的历史都证明，只有毛主席代表了最正确的方向，代表历史发展的要求，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什么陈独秀哪，什么李立三哪，瞿秋白哪，王明哪，刘少奇哪，中间还有个张国焘，还有什么张闻天这些，照着他们的领导走下去就只会把革命引向失败，就会要造成革命的重大损失。我们是很幸运的，在各个严重的历史关头，靠着毛主席扭转了这种形势，使它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转败为胜。这是大量的、长时期的、重大的、铁一般的事事实证明了的。差不多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工作是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在过去，有的时候是巩固的，但有的时候是不巩固的，有些时候很不巩固，而有些时候是被排斥的。凡是碰到毛主席的思想不能贯彻的时候，就使革命受到挫折、失败；得到贯彻的时候，就蓬勃地发展。可以说，这已是我们看惯了的事情，例子是不胜列举的。而这些经验，我们同志们必须记住，必须把关于这方面的迷迷糊糊的思想变成自觉的思想。特别是年老同志，必须把这些思想向下传播，传下去，讲清楚。使年青的同志们知道来之不易。就是：胜利绝非偶然。不是那么简单的、自流的，就可以成功的；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革命也可以失败的。很多国家，象欧洲那些国家，都进行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但没有成功，损失很大。力量很大的，都失败了嘛，有很好的客观形势，也都失败了。很好的形势没有搞起来，或者搞起来失败了。

我们革命胜利以后的二十年，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期以来，继续和更加证明毛主席思想的伟大作用。我的看法是这样子，老实讲，不管什么地方，不管什么部门，什么单位，毛主席的威信高的地方，对毛主席著作肯学、肯用的地方，人的精神面貌就改变。跟之而来的，就是物质的这种力量发生巨大的变化。不是小小的变化，而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原来认为做不到的事情，能做到

了。这就是毛主席的革命的精神和实际的精神，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毛主席的具体政策，具体指示，具体做法，一旦深入群众的时候，一旦群众领会的时候，那就是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发生变化。主观世界的变化引起客观世界的变化。各个地方，各个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是可能不太一样的，这也是很自然的，一切事物总是不平衡的，总是有差别的。敌人当然是反对了，不消说的了，就是党内也是不平还衡的。我虽然不能经常到基层去跑，但是我也有我的办法，就是派人下去问，下去调查研究。所碰见都是这么一种情况，凡是工作搞得好的，不是别的原因，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运用毛主席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斗私批修，提高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同时开展阶级斗争，狠批资产阶级思想，走资派的思想，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思想，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和他在各个领域里面的思想，以及各种具体政策，这一切对动员群众，都起极其重要的作用。我觉得“老三篇”还是很起作用的。

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几十年了，他对各种问题都接触了，都做了深刻的调查研究，都有重要指示。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几十年前写的东西，我们都觉得是比我们现在的水平高。世界上是有创造的，不但是社会科学的发展方面，是有创造的，自然科学方面，你看那个时期没有创造？毛主席的学说就是科学，解放人类的科学，解放无产阶级的科学。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是有创造的。他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然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新的发展。怎么能够说没有发展？

没有发展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说事物是不发展的，思想也是不发展的，只要旧的就行了，这是过去古老的思想，是不正确的思想。在历史上有很多人常常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看法，想把思想的发展停下来，认为是已经完成。在自然研究方面，社会历史研究方面，都有这种人不承认发展。可是事物总是在发展。这个地球原来就是一团火，然后慢慢地又有空气又有水，然后慢慢地有低级的生物，然后慢慢地有动物和高级动物，进入人类社会有低级的社会，高级的社会。现在我们是处在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全面崩溃的时代。同一百年前的马克思时代相比，我们这个时代是前进了很多。比列宁所处的时代也前进很多了。我们所遇到的重大事变跟当时他们所遇到的重大事变相比也多得多，大

得多，快得多。如何能说是没有发展呢？毛主席不是都是回答了这些问题吗？不是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回答了这些问题吗？毛主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现在的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相合。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东西来。毛主席的著作中间所发挥的，所具体化的，所增加的新东西，你们翻开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他们没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那个客观条件，不能对于现在的新问题做出预先的答复和解决。所以，不能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

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的，可变化的，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原则，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的。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需要慎重。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上层一些同志的一股风吹下去，就可能把下面的事情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情。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敢于这样勇敢地向敌人进攻，发动革命，狠狠地打击那些叛徒、反革命分子、走资派和各种阶级敌人，很广泛地动员工农兵群众，同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和革命魄力，他的马列主义的最高水平，历史的广阔眼界，是分不开的。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个党、国家、军队，今天能够在国内取得这种地位，在国际上取得这样崇高的威望，同毛主席领导几十年来的斗争，是分不开的。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第二点，就是宪法里面突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也是体现了毛主席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陈伯达整理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

一、恩格斯称马克思为天才

恩格斯称赞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一书为：“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卡·马克思著：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中，《弗·恩格斯为本书德文第三版作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 221 页

二、列宁称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才

1、“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象是在亲自听取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769 页

2、“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378 页

3、“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382 页

4、列宁在《预言》一文中，在引用了恩格斯谈到未来世界大战时所说的一段话后，赞扬恩格斯：“这真是多么天才的预见！”《列宁选集》第三卷第 593 页

5、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422 页

三、毛主席称马、恩、列、斯为天才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 264 页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的发言

〔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简报。中央档案馆提供。〕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

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

下面我想讲一下关于天才的问题。

林副主席经常说，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是当代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

这里我引林副主席以下三段话：

林副主席说：“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林副主席说：“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伟大的天才。”

林副主席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是多年的话了。林副主席这些话已发表了多年。但是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

如果大家不忘记的话，我想大家会记得，林副主席这些话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是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中全会公报上就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是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公报，但是竟有人说这些话是一个讽刺。这样的人要否定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吴法宪同志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了全国人民，很快就识破这种虚伪、阴谋诡计，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的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

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

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消。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列宁说：“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按照列宁的说法，否认天才，就是否认领袖，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我听了林副主席的讲话，发表这样一点意见。还有其它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说。说的不对，请大家批评。

注：此件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汪东兴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的发言

〔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简报。中央档案馆提供〕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的讲话。林副主席的讲话是很重要的，对这次会议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光辉榜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学得好，用得好。在关键的时刻，林副主席的态度是正确的。这种态度代表着我们的心意，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意。我很受感动，坚决向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并且努力紧跟。

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也同意。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容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林副主席昨天讲话中说，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是几十年斗争中形成的，是在党内两条路线较量中比较出来的。这个领导地位，除极端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

林副主席还说，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毛主席的领导，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各种因素中的决定因素。我还记得林副主席早就说过，没有毛主席，也没有我们自己。林副主席特别强调说，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

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一条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最重要的一条。这一条是我国革命经验中最根本的经验。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这些精辟、透彻的阐述。

另有一点建议，根据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有的说不当国家主席可以减少些事务，如接见外宾等，事实上凡到中国来访问的外宾，绝大多数主席都接见了，到中国来的外宾，主席不接见他就不走。主席的接见，影响是巨大的。

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可以识破这些坏蛋。（伯达同志：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的跳起来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把刘少奇篡夺去的权夺回来了，这个权如果再被坏蛋夺走，我们是不甘心的。我们的权一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

注：此件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吴法宪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西南组的发言

〔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简报。中央档案馆提供。〕

昨天晚上政治局会议决定要讨论和学习林副主席的报告。报告中讲到，毛主席领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宪法中的灵魂。虽然听了一遍，今天上午又听了两遍录音，但我对林副主席的重要报告，还没有完全领会。我认为，林副主席的报告是最重要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领导，对毛主席发展马列主义，都作了最高度的概括。对我们教育最大。而且这个讲话是在重要的时刻讲的，讲话针对性很强。指出特别是在中央工作的同志要深思，老同志要把毛泽东思想传下去，要带着全党和全国人民，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为了捍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

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我们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

修改宪法的过程，也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过程。确实是这样。对宪法中到底怎么写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是有不同意见的，写什么不写什么，写多写少，在认识上都是有不同意见的。开始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怎么写，有人就提出不要“突出”。在全国人民讨论后，有人还不同意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说是在序言中有了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就可以了。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写进宪法，这是全国三十二个单位一致的意见，如不写，会产生什么影响？昨天康生同志讲的群众愿望不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了吗？我们说，全国哪项工作，只要离开了毛主席的思想就要失败，就要垮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这伙人就是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是他们犯的一条最大的罪行。

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竟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这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就肯定下来的，林副主席《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了的，怎么能不写？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关于这个问题，宪法是本来没有写，是讨论中题外的问题，可是有人却借这个机会进行贬低。

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现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全党全国人民一致公认。如果这股风吹下去，这怎么得了？所以，林副主席特别强调，在中央工作的老同志要冷静的想一想，对我自己教育很大，值得我们深思。

（曹铁欧同志插话：向大家介绍一个情况，我们同外宾接触时，发现不少把毛主席的《老三篇》印成小册子装在口袋里。世界革命人民对毛泽东思想早非常热爱的。）

我们现在在墙壁上挂语录，这是为了便于学、便于用。举个例子，我们有一次在大会堂讨论修改宪法，从下午三时一直讨论到第二天凌晨一时，对于人民这个问题如何表达，想不出办法，就是后来看了墙壁上毛主席的一条语录：“人民，只

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受到启发，于是就成了现在宪法中的一段话，“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我国各族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历史事实，是几十年革命斗争所证明了的。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

（念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天才的语录，因念的比较快，未记下，略）。

大家听了这些语录，怎么能说没有天才呢？怎么能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是个讽刺”呢？毛主席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等各个领域都发展了马列主义，社会科学方面发展了，自然科学方面也发展了，都发展了。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一切，就没有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对这个问题，一种是迷迷糊糊，是认识问题。但是也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就是要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要象八三四一部队那样，坚持三个原则，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教育，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斗争。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我的水平很低，学习毛泽尔思想很差。但我有决心，忠心耿耿地、老老实实地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永远传下去。

我们要在新宪法中突出毛主席，突出毛泽东思想，使新宪法成为全国人民争取新的胜利的战斗纲领。

我过去在工作中，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我有决心改正。决心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要经常地进行自我批评，不断地改造世界观，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捍卫毛主席，永远捍卫毛泽东思想。

注：此件是中共档案馆提供的。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华北组二十四日上、下午讨论了林副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出席了下午的小组会，都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另有简报）。

刘锡昌、郑维山、郭玉峰、聂元梓、刘子厚、马福全、钱学森、邝任农、吴涛、吴忠、尤太忠、彭绍辉等十二位同志发了言。陈毅同志也发了言。

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用得好，在每个关键时刻，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最好、最正确，这种态度，代表了我们的心愿，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代表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愿。使我们很感动，很激动，很触动，是个极大的督促，极大的鞭策，极大的教育。大家表示要坚决按照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刘子厚同志说，学习林副主席讲话，使自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感到更亲。过去学习毛主席思想就是学得不好，就是有迷迷糊糊的思想，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今后自己要警惕，一定要努力学好毛泽东思想，改造好自己的世界观。

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为了反击这种反革命阴谋活动，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大家认为，不能让妄图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主席的阴谋得逞，不能把减少毛主席接待外宾的

事务工作作为借口，实际上现在绝大多数外宾，毛主席都接见，几乎到中国的外宾是毛主席不见不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不是一样在接见外宾吗！

马福全同志说：我们河北省广大群众在讨论宪法时，一致认为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只有林副主席，才能百分之百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我代表河北省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要求宪法上写上。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

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在讲到高级干部读马、列的几本书时，毛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末，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间呢？自己没有看过。”

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时，毛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在讲到党内外团结时，毛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开幕，于九月六日胜利闭幕。

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一百五十五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人，共二百五十五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根据会议的议程，进行了热烈讨论。

九届二中全会认为：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的指引下，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贯彻执行了“九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全国人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继续深入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运动，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和经验。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运动，正在深入进行。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猛烈地扫除着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激发了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和生产。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连续获得了八年丰收，今年也丰收在望。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发展的速度很快。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蓬勃展开。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标志着科学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全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整个经济战线形势很好。在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庄严号召下，为了防御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民兵和全国人民，从思想上、物质上、组织上，进一步加强了战备。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兴起。

全会认为：毛泽东主席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庄严声明，是我国人民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进行反帝斗争的伟大纲领。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几个月来，国际形势的发展，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个科学论断。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不断获得新胜利。朝鲜人民、日本人民、东南亚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怒火，正在熊熊燃烧。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不怕威胁，不受欺骗，继续坚持英勇的武装斗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到北美、欧洲、大洋洲，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蓬蓬勃勃发展。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和组织，在反对以美国

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不断取得巨大成绩。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内外交困，在世界上日益孤立，陷入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包围之中。与此相反，我国的国际关系日益发展。在坚持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不断取得新胜利。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全会认为，在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全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

全会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全会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全会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继续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要继续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密切结合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要继续“认真搞好斗、批、改”，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把政治思想战线、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要把“一打三反”运动抓紧，继续有力地打击一小撮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分子。

要继续全面地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〇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为继续抓紧和加强战备工作，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要认真地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进一步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

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获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经过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党达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我们必须继续加强这种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全会号召全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以及一切爱国人士，用新的胜利，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全会号召全国人民，用实际行动，进一步加强同阿尔巴尼亚人民、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朝鲜人民、日本人民、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战斗团结，进一步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战斗团结，把反对帝、修、反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来源：原载《人民日报》1970年9月10日

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总纲

第二章 国家机构

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节 国务院

第三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

第四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五节 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第三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 国旗、国徽、首都

序言

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人民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时代。

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二十年来，中国人民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继续前进，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祖国，是一个伟大的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我们有充分的信心，有必要的条件，在战胜国内外敌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过程中，在逐步地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斗争过程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一切困难，把我国建设成为更加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领导我们胜利前进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创造我们历史的动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国各族人民。

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国各族人民要在毛泽东主席为首、林彪副主席为副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在国内，我们要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加强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在国际，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

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条 毛泽东主席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是全国全军的最高统帅彪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是全国全军的副统帅，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原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监督和依照法律的规定随时撤换自己选出的代表。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在城镇街道组织，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统一安排下，从事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同时，要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

第六条 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

矿藏、水流，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

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

第七条 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

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一般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

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牧区社员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

第八条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可侵犯。国家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公共利益。

第九条 国家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国家保护公民的劳动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

第十条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国家实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在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逐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 and 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第十一条 一切国家机关和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工农和一切劳动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机关工作人员都必须参加集体劳动。

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实行精简的原则，它的领导机构，都必须实行军、干、群和老、中、青的革命三结合。

第十二条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科学的研究都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第十三条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第十四条 国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

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

第十五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是各族人民的武装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支战斗队，同时又是工作队，又是生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任务，是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防御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颠覆和侵略。

第二章 国家机构

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十六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军队和华侨选出的代表组成。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特邀若干爱国人士参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在特殊情况下，任期可以延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提前或者延期。

第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是，修改宪法，制定法律，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任免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的组成人员，批准国民经济计划、国家的预算和决算，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

第十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它的职权是，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解释法律，制定法令，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接受外国使节，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罢免。

第二节 国务院

第十九条 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国务院由总理，副总理若干人，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等人员组成。

第二十条 国务院的职权是：根据宪法、法律和法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议和命令；统一领导各部，各委员会和全国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工作；制定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管理国家行政事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三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

第二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地区、市、县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农村人民公社、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两年。

第二十二条 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同时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分别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罢免。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都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二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在本地区内，保证法律、法令的执行，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地方各级的积极性，领导地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审查和批准地方的预算和决算，维护革命秩序，保障公民权利。

第四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二十四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是民族自治地方，它的自治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和革命委员会。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除行使宪法第二章第三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外，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

各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充分保障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积极支持各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第五节 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第二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设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任免。

检察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

检察和审理案件，都必须实行群众路线。对于重大的反革命刑事案件，要发动群众讨论和批判。

第三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六条 公民最基本的权力和义务是，拥护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每一个公民的最高职责。依照法律服兵役是公民的光荣义务。

第二十七条 年满十八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外。

公民有劳动的权利，有受教育的权利。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妇女在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国家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

第二十八条 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

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不受逮捕。

第二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任何由于拥护正义事业、参加革命运动，进行科学工作而受到迫害的外国人给以居留的权利。

第四章 国旗、国徽、首都

第三十条 国旗是五星红旗；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通知及附件

1970.09.12；中发〔1970〕56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中央军委：

现将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基本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转发给各厂矿、公社、军队、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组织的基层领导机构，广泛地组织人民群众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是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继续和发展。一九五四年宪法，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保卫祖国的斗争中，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在国内外大好的革命形势下，伟大领袖毛主席于一九七〇年三月提出了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提出了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工农兵广大群众半年多的反复讨论提出来的，是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产物。中央政治局从三月开始进行修改宪法的准备。七月十二日，成立了以毛主席为主任、林副主席为副主任的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起草委员会详细研究了全国工农兵和人民群众对一九五四年宪法的修改意见，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并于八月二十三日提交九届二中全会审查。九月六日，全会基本通过了这个宪法修改草案，并决定动员全国人民进行讨论和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是以毛主席的国家学说的伟大理论和实践为指导思想制定的。这个宪法修改草案，对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领导地位，对于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对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对于社会

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于人民群众和人民军队的巨大作用，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它力求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便于群众学习和运用。在全国人民讨论修改和四届人大通过之后，它将成为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夺取新胜利的战斗纲领。

讨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做好这件工作关键在于领导。希望各级负责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结合学习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向群众宣讲宪法修改草案，发动群众积极提出修改意见。请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中央军委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于九月底报告中央。

中共中央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二日

1. 陈伯达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华北组制造的五大谎言

（陈伯达亲笔修改过的他的发言原稿节录）

影印件原文

但是，竟然有个别的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林彪同志说，这次修改的宪法里面规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里最重要的一条，这反映了我国革命中最根本的经验。我完全同意林彪同志这个根本的观点。但是，同志们要懂得，加进这一条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注：据记录，陈伯达在发言中还说过：“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吴法宪同志说得很对；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但是这种妄图，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起来、已经站起来的伟大中国人民，很能够识破他们，揭穿他们的各种虚伪。

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以后，有的人居然怀疑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公报，这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

多么猖狂呀，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象跳舞一样高兴。（注：这一段话，是陈伯达在会上的插话）

2. 叶群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南组煽风点火

(叶群的发言记录节录, 这是中南组的记录员记的)

影印件原文

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引林副主席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 坚决不收回, 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3. 吴法宪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西南组散布的谎言

(吴法宪的发言记录节录, 这是西南组的记录员记的)

影印件原文

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 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 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一种是迷迷糊糊, 是认识问题。但是也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4. 李作鹏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南组散布的谎言

(李作鹏的发言记录节录, 这是中南组的两个记录员记的)

影印件原文

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口(绩)的, 党章也肯定了的, 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 是什么风? 是反马列主义的风, 是反毛主席的风, 是反林副主席的风, 这股风不能往下吹, 有的人想往下吹。

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 林副主席直接指挥”, 他都反对, 说不符合历史。

5. 邱会作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西北组散布的谎言

(邱会作的发言记录节录, 这是西北组的两个记录员记的)

影印件原文

一、对毛泽东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说仍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现在也要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九大后二中全会后（上）又提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有人不同意，不然为什么又提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动摇的，不能有形形色色的谬论，不能利用主席的谦虚来反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关系到建设一个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

6. 黄永胜炮制向党进攻的发言稿的罪行

（军委办公厅第一秘书处原第二处长宋城的亲笔交代）

影印件原文

1970 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叛徒林彪 8 月 23 日在全会上作了向党进攻的讲话之后，反革命分子吴法宪打长途电话给在北京的反革命分子黄永胜，传达林彪的黑指示，叫黄永胜写一个发言稿，对林彪在全会上的讲话表态。黄永胜于 8 月 24 日或 25 日下午从北京打电话给我，叫我组织人写。黄永胜并向我交代了起草发言稿的内容，其要点是：（1）拥护林彪的讲话；（2）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人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指出这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3）长期以来，我们党内有许多情况不正常等。并交代写好以后，用电话传回北京。我照黄永胜的授意，起草了发言稿，并将发言稿用电话报给了黄永胜。所以，黄永胜虽还未上山，但他已作了发言准备。后来，因为揪出了大坏蛋陈伯达，黄永胜原准备的发言，才没有拿出去。黄永胜这个发言稿，电话传到北京的一份，我听黄永胜的秘书吴玉琪讲，黄永胜已烧掉。在庐山的一份草稿，我烧了。

宋 城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

三、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地下阴谋活动

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进行了一系列地下阴谋活动。在林彪发表反党讲话前后，他们四出活动，多方串连，组织力量，部署进攻。在毛主席刹住了林彪反党集团煽起的反革命妖风，拨正了全会的航向以后，他们密谋策划，订立攻守同盟，竭力掩盖他们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行。同时，进一步加强反革命勾结，伺机向党反扑。下面是林彪反党集团进行地下阴谋活动的部份罪证。

1. 李作鹏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四日晚给叶群的亲笔信

叶群同志

今天简报看了一下，是比较抽象的接触了问题，没有更多实质性问题。似可以发请您再过目。至于我们两人发言的书面材料，可以整理，但在简报上不挂号为机动，你意如何？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作了煽风点火，向党进攻的发言。当晚，李作鹏写了这封信给叶群，密商向党进攻的反革命策略。信中所谓他们两人的发言“在简报上不挂号为机动”，就是因为他们搞阴谋诡计，心里有鬼，要躲在幕后看一看形势，等待时机，以求一逞。这是林彪反党集团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向党进攻的一个铁证。

李作鹏的这封信，是从林彪住地查获的。

2. 叶群私自收回的她在中南组的发言记录和叶群、黄永胜炮制的假证明

假证明原件影印件原文

叶主任：

您好。

您派人问到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您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上发言记录稿的事，现将当时情况汇报如下：当天是我和曾江同志（曾思玉同志的秘书）担任记录，因您的发言讲得快，我们记不下，记了一些也不全、不准确。为了整理简报，我们即将您的发言记录（两分），从记录本上取下来，面呈您审阅。

中南组记录 郭士兴

一九七一年二月一日

军委办公厅原秘书郭士兴的揭发交代影印件原文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叶群于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南组会议上发言，向党猖狂进攻。以后，叶群指使宋城要我和另一个记录员从记录本上撕下她的发言记录，由宋城交给叶群，一直未退回。

一九七一年一月卅日晚上，黄永胜的秘书通知我到京西宾馆，我去后，叶群也在那里，叶说：“总理查问我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在那里。”接着她要我为她收回记录写个假证明。明明是她私自收回去的记录，却要我写成是我们为整简报“当场”送给她的。这次明明是黄、叶当面要我写的，却要我写成是叶群“打电话问到的”。我写后，落款时间是“一九七一年一月卅一日”。黄永胜看后，说“要用当时的时间、口气、纸、铅笔写”。叶群马上说：“还是总长想得周到。”并要我把从她带来的记录原稿上裁下半页纸，重写，落款时间改成“一九七零年八月廿四日下午”。

第二天，叶群又电话告我，说“我想了想，证明记录的事还是要用现在的时间好。”并说：“不要在证明里写是我给你打的电话，就写是我派人问你的。”接着，黄永胜的秘书又通知我到京西宾馆去，黄说：“你按叶主任讲的再改写。”我又改写一遍，落款时间改为“一九七一年二月一日”。黄看后，亲自封好送给叶群。

在他们的指使下，我为他们写了假证明，丧失了党的原则，犯了严重的错误。

郭士兴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二日

注：假证明原件，是从林彪、叶群外逃时准备带走的文件中缴获的。

3. 陈伯达给林彪出谋划策的电话记录稿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九日，正当九届二中全会揭发和批判陈伯达的时候，陈伯达打电话给林彪，要林彪私自修补林彪的反党讲话录音，把毛主席讲的会议方针，

“最好想办法在录音里面加上去”，借以掩盖林彪分裂党的罪行。林彪电话答复：“谢谢伯达同志的关心”。

下面的电话记录稿，是林彪的秘书于运深手记的，是从林彪驻地查获的。缪秘书，即陈伯达的秘书缪俊胜。

影印件原文

伯达同志处缪秘书电话

1970.8.29日晚8:05

伯达同志说：“林副主席讲话很好。表达了主席思想。不过，那里面有有没有讲到主席多次强调这样的原话：‘是开一个团结的会议，还是分裂的会议，是开一个胜利的会议，还是失败的会议。’我记不清楚了。如果还没有讲到，最好想办法在录音里面加上去。不晓得这个意见对不对。”

4. 林立果亲笔写的与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的密谈要点

林彪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的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林彪派林立果同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进行密谈。从林立果亲笔写的这个密谈要点中，可以看出林彪反党集团对庐山会议这一场斗争的估计和他们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狼子野心。

林立果写的这个密谈要点，是从林立果的住房中查获的。文中的“陈”，是指陈伯达。“吴”，是指吴法宪。“老总们”，是指黄、吴、李、邱。“歼7”是江腾蛟的代号。“W”是王维国的代号。“C”是陈励耘的代号。

影印件原文

与歼7、W、C讲

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演习，拉练，双方的阵容都亮了相，陈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

这些老总们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还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5. 吴法宪的亲笔交代

吴法宪的亲笔交代影印件原文

(一) 七零年八月十三日下午，我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诬蔑“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等等以后，在会议中间我打电话报告了黄永胜，黄即打电话报告了林彪、叶群。散会后陈伯达约我同去他家里，陈伯达鼓吹我今天的话讲得好“敢于斗争”并要我把情况报告林彪。我回到家里又打电话报告了林彪，过了一回叶群回电话说：林彪很高兴，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二) 八月十三日晚和十四日下午，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关于天才方面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准备在八月十四日晚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定稿时，支持吴法宪向党发动进攻。八月十四日黄永胜给李作鹏打电话说：吴法宪现在很孤立，要李作鹏回来参加宪法小组工作会议，支持吴法宪。叶群在北戴河也准备了大批天才语录卡片带上庐山。庐山会议初期，中央决定黄永胜在北京看家，黄永胜在政治局会议上几次提出，要上庐山参加会议，坚持不愿留在北京看家，并且违抗中央规定，擅自军委办事组会上提出要邱会作、阎仲川留在北京看家。以后总理对黄永胜进行了严肃批评，黄永胜才勉强同意留在北京

(注：此事总理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指示要黄永胜留在北京)。黄还布置办事组秘书宋城把准备好的天才语录带上庐山。

(三) 林彪八月二十三日下午讲话后，晚上叶群要我告诉李作鹏、邱会作：要我们在各组发言，如果你们不发言，林彪讲话就没有根据了；林彪讲话也没有点名，因此发言不要指名；布置我们串连空军、海军、总后一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在会上发言等等。

(四) 八月二十三日晚政治局会议上，我提出改变会议的三项议程，先讨论林彪的讲话。散会后林彪派他的儿子林立果同我讲：林彪表扬你，林彪说：你又“立了一功”。

(五) 总理、康生同志于八月二十六、二十七两日连续同吴、李、邱谈话，要我作检讨，我于二十八日晚报告了林彪，林彪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林彪说：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六) 八月二十六日以后，叶群不断打电话安慰我：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七) 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六日晚以黃永胜宿舍为活动中心，每天晚上和中午叶群、吴、李、邱都到黃永胜那里去开黑会，交换各组的会议情报。

(八) 八月三十一日，叶群和黃永胜召集吴、李、邱布置统一口径，强调山下山上没有联系，原来准备上庐山开神仙会，来庐山游玩照相的。在小组会上发言不要牵涉林彪、黃永胜，吴、李、邱之间只讲自己，也互不涉及。

(九) 九月七日黃、吴、李、邱同乘一个飞机回北京，在飞机上开黑会议论，①黃永胜说：坚持山下山上没有联系，原来没有想到，这是突然出现的情况。②强调八月十三日吴法宪电话报告引起起来的问题。③黃永胜不准备作什么检讨。李、邱是否作检讨要看情况发展。吴作检讨只讲自己不涉及别人，主动承担责任，李、邱也不抱怨。④无论如何都不要涉及林彪、叶群、黃永胜，这是大前提。⑤回京以后总理、康生同志和政治局找我们谈话时事先要统一口径。⑥黃、李、邱都警告安慰我不要多说话，“言多必失”，要沉住气。

(十) 七零年国庆节后大约十月六日或七日下午，林彪找我去谈过一次话，主要内容如下：①要我去向毛主席承认错误作所谓检讨，(这是第一次叫我作检讨)，要说明庐山犯错误是出于突然的，在山下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和联系，就是我八月十三日反映的情况没有核实，林彪听了之后有气，所以在庐山就讲了话。我当时领会他这段话的意思无论如何不要牵涉到林彪、叶群、黃永胜，要说明山下山上无联系，会前无准备，来欺骗毛主席。②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受骗。③这次庐山犯错误第一是陈伯达，其次是你，如果因为你这次犯错误把你撤下来，暂时靠边站，也不能乱说乱道，以后会有机会替你说话，不要因为你一个人犯错误就倒一大片。

吴 法 宪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

6. 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林立果在庐山一次密谋后的合影

叶、吴、李、邱等在庐山接触十分频繁，经常在一起秘密策划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这是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夕，八月二十一日的一次密谋后，在庐山仙人洞合影留念。

注：右起：林立果、叶群、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

7. 林彪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失败后，在九江机场飞机上的合影
一九七零年九月七日，林彪、黄、吴、李、邱下山到九江机场，由叶群导演，在
飞机上合影留念，表示他们要进一步加强反革命勾结，伺机反扑。
注：右起：邱会作、黄永胜、林彪、吴法宪、李作鹏

二、研究资料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下卷）摘录
(1980 年 8 月 20 日至 9 月 8 日)

汪东兴著《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摘录

二、林彪想当国家主席

从 1970 年春天开始，林彪指使人编写《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企图全面篡改党的历史，吹捧林彪，为其反党夺权制造舆论。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阴谋利用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之机，妄图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野心。

(一)

1970 年 8 月 18 日下午 2 时，我随毛主席乘专列从杭州出发去江西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19 日到达九江市。我们在九江市下火车后，换乘汽车于当天下午上了庐山。

8 月 19 日、20 日、21 日，毛主席在庐山看书和休息。

我从 19 日上庐山后，就投入到九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去了。

8 月 22 日下午 2 时，在庐山三所毛主席的办公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出席了会议。我列席这次会议，并作记录。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和确定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九届二中全会原定有两项议程：一、讨论和修改将要在四届全国人大提出的新宪法草案；二、讨论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建议增加一项内容，即谈一谈

当时的形势。毛主席说：“除了讨论修改宪法、计划问题外，还应该加个形势问题。据我所知，大家有兴趣的问题是形势问题。”

康生说：“修改宪法问题搞了很久，宪法委员会也开过第一次会了。全国人民正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

毛主席说：“宪法修改草案可以发给大家看。但是大家有兴趣的还是形势问题。”

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同意毛主席的建议，并提议由毛主席讲形势问题。

毛主席说：“我主持会议，由总理讲形势吧，修改宪法问题由康生讲。”

康生推辞说：“修改宪法问题也由总理一道讲吧。”

毛主席看了康生一眼，然后说：“那你们两个人去商量解决好了！”

周总理接着谈计划问题。他说：“自今年开了计划会议后，收效较快。五个月以来，全国有一定的生产效率，地方上的积极性大了。”

毛主席说：“原来这个下放（指中央把管理经济、管理企业的部分权力及财权、物权、投资权下放给地方。——作者注），讲是讲了。但是他们（指地方——作者注）没有摸到下放的底，交代不那么清楚，这次计划会议解决了。”

周总理接着说：“各省、市、自治区不仅仅是农业有了生气，有了发展；而且现在看起来工业形势也好。今年的计划完成的情况和原来预计的差不多，虽然‘文革’的头两年有一点下降。”周总理是说 1970 年全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基本上达到了“三五”计划的原定指标。

毛主席说：“解放以后，统一了全国，出了个南粮北调、北煤南运的问题。解放以前，也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不知道。不晓得蒋介石统治的时候，煤要不要南运？粮呢，要不要北运？看来，要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南方找到很多煤矿，北方粮食也逐步自给了。”

周总理说：“人民生活确实是改善了。这种形势，主要是靠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泽东思想传播了，生产和经验也就传播了。”

康生接着说：“哪里的毛主席思想深入了，哪里的工作、生产一定就好了。规律完全有这样的。”

毛主席听了摇摇手，表示不赞成这种说法。毛主席说：“看我们是依靠谁的问题了。有的人依靠专家治厂。工业这方面，我看要依靠专家、科学家，甚至洋专家，除这之外，也还要依靠工人。”毛主席的意思是说，工业上既要依靠专家，包括洋专家，也要依靠工人阶级。

林彪跟着说：“主要是调动全国亿万人民的积极性。”

陈伯达也随声附和说：“我到下边看了一下，形势很好。群众积极性很高，干劲也很大，连中学生都自办工厂。”

谈完经济问题，常委们又议论政治问题。

周总理提出说：“还有党代会的问题。”

康生说：“恐怕有些县、市。甚至有的省、市要开党代会。”

毛主席说：“党代会不仅要从下到上开。有的还要用从上到下的办法开。”

康生说：“这两个办法都可以用。”

周总理分析说：“等到明年九大召开两周年的时候。各省、市、自治区开成党代表大会。我看基本上是可能的。”

毛主席问：“整党，各个地方不是早都开始了吗？这个‘吐故’吐得怎么样呀？大概吐得不多吧？对蒋南翔这样的人留下来好。”

周总理回答说：“现在挂起来的较多。”

康生补充说：“我说‘挂故’多。”（1968 年毛泽东主席就整党问题讲过要“吐故纳新”。“挂故”是指当时要“处理”的党员干部被“挂”（搁置）起来。——作者注）

毛主席说：“你们讲挂起来的多，我看吐得也不少了，还是要以教育为主。”

周总理说：“有的人长期挂起来呀？我认为还是下去劳动接触群众比较好。”

毛主席认为会议讨论得差不多了，就说：“今天把大会的议程定下来了。会就开到这里吧！”

8月 22 日晚 8 时，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各大区召集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的安排的讨论意见。

周总理在传达中，还介绍了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情况。他说有些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比“文革”初期有所下降。这时。江青打断周总理的话，说农业生产没

有下降。周总理说：我讲的是工业。当周总理谈到解决南粮北调、北煤南运问题时，康生插话说：日本侵华时，南北交通中断了，那时南粮北调、北煤南运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我们还不知道。

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把常委会讨论的情况讲完后，让我作了补充。

1970 年 8 月 23 日下午 3 时，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

开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礼堂的小会议室集合。毛主席问周总理和康生：“你们谁先讲啊？”

毛主席刚说完这句话，林彪突然说：“我要讲点意见。”

林彪提出要讲话后，周总理、康生说：“那好吧，你先讲。”

林彪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在常委会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时，林彪并没有说这个问题。

毛主席看了看林彪，说：“你们三人讲吧！”

这时，开会的铃声响了。常委们进入会场并在台上就座。毛主席主持开会。周总理宣布全会议程，林彪首先讲话。

林彪一开头说：“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这几个月来，主席对于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有必要，很合时宜。在国内、国外大好形势下开人代会和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有深远影响的。”

林彪在讲完开场白之后，逐渐转入正题。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我们有今天的胜利，决定的因素就是毛主席。”

林彪还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外除极端的反革

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的工作是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他强调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林彪翻来复去地讲他的这些观点，讲了一个半小时。他显然是有准备的。他讲话时，讲台上放着一个稿子。林彪的讲话，既没有讲形势，也没有讲其他新的问题。虽然台下有热烈的掌声，但我看到坐在台上的毛主席听得越来越不耐烦，明显地表现出不高兴。周总理、康生也表现出着急的神态。

陈伯达则听得很认真。

林彪讲完后已经 4 点半了。毛主席对周总理、康生说：“你们讲吧！”语气中流露出不悦的情绪。

周总理见此情况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康生也说：“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了。”

毛主席宣布散会。

这天晚上，周总理主持召开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召集人会议，安排会议各组分别讨论宪法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却在会上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很重要，提出要很好学习，要求再播放他的讲话录音，大家附和了。周总理只好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 24 日上午会议代表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下午讨论林彪的讲话。

8 月 24 日上午 8 时，除毛主席、林彪之外，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全体人员在庐山礼堂开大会，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会议由我主持，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参加了。录音播放了两遍，11 时半才散会。

在播放录音的过程中，有人提议将林彪的讲话稿印发给大家，到会的人都鼓掌，表示支持。周总理要我去请示毛主席。

散会后，我报告毛主席了。毛主席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毛主席还嘱咐说：讲话稿要由林彪审定后发。

我将毛主席的指示立即用电话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说：“你抓紧办理，先印出清样，送常委审阅。”

我让王良恩去林彪处取讲话稿，他没有拿来，25 日又去拿，还是没有拿来。

24 日上午散会时，陈伯达在礼堂门口塞给我一份材料，他对我说：“这份材料请打印 5 份。”

我问：“你是要发给常委吗？”

他说：“是。”

我一看要打印的材料是几条语录。我考虑常委看完后，可能要发给政治局委员，就交代会议秘书处打印 20 份。

陈伯达打印的几条语录如下：

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

一、恩格斯称马克思为天才

恩格斯称赞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一书为：“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卡·马克思著《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中弗·恩格斯为本书德文第三版作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 221 页

二、列宁称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才

1. “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象是在亲自听取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769 页

2. “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378 页

3. “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382 页

4. 列宁在《预言》一文中，在引用了恩格斯谈到未来世界大战时所说的一段话后，赞扬恩格斯：“这真是多么天才的预见！”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 593 页

5. “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人’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422 页

三、毛主席称马、恩、列、斯为天才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 264 页

8月 24 日下午，各组讨论林彪的讲话。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组带头发言。他们在同一时间，引用同样的语录，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统一口径，大肆煽动。

下午 3 点钟，陈伯达到华北组参加讨论。他到会场时，有一位同志正在发言。主持人打断了这位同志的发言，请陈伯达先讲。陈伯达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思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他在插话中还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

当时我也参加华北组的讨论。陈伯达讲的一口福建话，别人听不懂，能听懂的同志替他作翻译。他讲到“欢喜得跳起来了”时。还动手动脚地比划着。

叶群在中南组发言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下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写的《再版前言》。……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接着，他念了毛主席、林彪以及马、恩、列、斯有关天才的语录）。大家听听这些语录，怎么能说没有天才呢？……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李作鹏在中南组发言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

邱会作在西北组发言说：“对毛主席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黄永胜那时虽然留在北京，但他也准备好了与他们一样内容的书面发言稿。

陈伯达在华北组煽动性的发言，使不明真相的人都激动起来。陈伯达讲完后，其他一些同志纷纷发言表态，都建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节，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我在会上也发了言。我当时没有识破陈伯达的阴谋，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还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

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当时，我的情绪也比较激动，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

本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一职的一系列指示，我是很清楚的，有的指示还是我传达的。但是，我当时没有看出林彪、陈伯达等人积极主张设国家主席的险恶用心。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我一听陈伯达的发言就激动起来，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的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24日晚上，各组的发言情况汇总反映上来了。我一看，有几个人在发言中已经引用了陈伯达交给我要求印发给常委的语录。我马上打电话把这个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并且请示说陈伯达要打印的语录还没有发，怎么办。

周总理在电话中说：这个语录不能发，封存吧。我马上将陈伯达提供的打印语录的原稿和已印刷出来的20份语录全部封存了。

24日以后，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林彪，表态支持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受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各个小组的煽动性的发言的影响，上当受骗了。

8月25日上午，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印出来了。这个简报反映陈伯达讲话的内容不多，却把别人发言的内容与我发言的内容混在一起，以我的名义大量刊登了出来。这个简报印前没有给我看。这个简报印发后，显然产生了极不良的影响。

这天吃中午饭时，毛主席叫人通知我去，我赶紧吃完饭就去了。

毛主席问我：“看到六号简报了吗？”

我说：“刚看到。”我是在来的路上才看到的。

毛主席说：“他们(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作者注)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

毛主席接着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

我说：“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欢喜得跳

起来，我很气愤。”

毛主席严肃地说：“那就让他们去高兴吧！”

我说：“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大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我还拿群众的意见作辩解。

毛主席严厉地说：“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

听了毛主席的这些话，我当时非常难受，感到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和信任。谈完话，时间已到下午 2 时了，毛主席要我马上通知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委员 3 时到牯岭毛主席办公处开会。我通知了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和康生，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是由中央办公厅负责通知的。

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来后，毛主席分别同他们谈了话。

毛主席还与许世友谈了几句话。当时，毛主席在院子里，许世友来了毛主席与他握手时说：“你看，我这个手凉不凉？”

许世友说：“凉。”

毛主席说：“你们让我多活几年多好啊！还让我当主席呀？”

毛主席与政治局常委商谈后，对来开会的政治局委员们宣布说：“刚才，政治局常委商量，认为小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决定收回六号简报。”

当晚，周总理主持召开各大组召集人的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

8 月 26 日，各组传达关于暂停开小组会的决定。

这时，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邱会作在西北组，都开始收回有他们发言的记录稿，已经写成的简报稿子也不让送了。叶群私自跑到简报组，撕毁了她在中南组发言的记录。邱会作也要回记录，剪去了他发言的那部分内容。迟上庐山的黄永胜，见“形势”不妙，也销毁了他事先准备的发言稿。这些情况由各小组反映上来后，我报告了毛主席、周总理。

毛主席笑着说：“何必当初呢！当初那么积极，那么勇敢，争着发言。今天又何必着急往回收呢！”

毛主席和我谈话后，我认识到自己犯错误了，就考虑写检查报告。周总理也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你争取第一个检查吧。8 月 27 日，我写好了第一份书面检查。检

讨了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做法、言论是“我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也违反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我的内心极感沉痛。”并表示要“接受这次教训，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提高觉悟，坚决执行毛主席在‘九大’提出的方针——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我感到第一次的检查还不深刻，认识也是初步的。当时我对许多现象的本质问题都还没有认识清楚。毛主席看过我的书面检讨后，说这个检讨书可以发到全会上。我还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在华北组讨论会上做了一次口头检查，内容和书面检讨的差不多。我的检讨书，经周总理批阅修改后印发了。

(三)

8月26日到30日的五天，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找人谈话。各小组暂停开会后，宣布大家分头看文件、修改宪法，还安排了游庐山、看电影和看戏。8月26日和27日，周总理、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并要吴法宪作检讨。

吴法宪很紧张，于8月28日晚上偷偷报告了林彪。林彪不仅没让吴法宪收敛，反而鼓动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叶群还几次打电话安抚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8月31日，毛主席针对林彪等人的活动情况，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这篇重要文献在印发给参加全会的同志前，毛主席还给林彪看过。毛主席在文中写道：

这个材料(指《我的一点意见》所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作者注)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

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

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

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中，严厉批判陈伯达。彻底揭穿了陈伯达搞政治欺骗和阴谋行径的真实面目，这实际上也是对林彪一伙的致命打击。

9月1日，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毛主席在会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检查。当时毛主席点了陈伯达的名字。要他做检查。毛主席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开会、听他们的检查。

9月2日，林彪召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开会。我也参加了。此时毛主席让我参加这个会有个目的：一是了解一些情况，因为他们这些人是不会把情况全部如实地汇报给毛主席的；二是我在华北组也发了言，也要接受批评、受教育。

会议开始时，林彪说：“今天，找你们开个会。你们在会上为什么要同一个时间发言，为什么都引用了同样的语录。你们要坦白，要交代。”

林彪讲完后，到会的人都不发言。有的翻材料，有的喝水。过了一段时间。林彪又说：“嘿，为什么没有人发言？”这时，我发了言，批判了陈伯达。我指出，

华北组的讨论就是陈伯达放炮后搞乱的。林彪听了，表情很尴尬。我发言后。其他一些人七嘴八舌地讲了一些。会议很快就散了。

散会后，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情况。我讲完林彪召集开会的情况后，毛主席哈哈大笑，问我会还开不开：我说：林彪打了个招呼，说再开会就通知，不通知就不去了。

9月3日，林彪又开了一次会，没有通知我去参加。直到九届二中全会散了，也没有通知我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毛主席知道后说：“不要你了。说明你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

9月2日以后。各小组就开始集中批判陈伯达。在华北组，我按毛主席的指示作了检讨以后就请假了，没有再去参加会议。

9月4日，毛主席找林彪谈话。

9月5日上午，毛主席找陈伯达谈话。下午。毛主席和周总理及康生谈了如何结束会议等问题。

9月6日，全会基本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通过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建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9月6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在闭幕会议上，毛主席对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

毛主席在讲到高级干部要读马、列的几本书的问题时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指陈伯达——作者注）就搬出什么第三版（指陈伯达编印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收了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三版所作的序言中的话。一作者注）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增加对唯物论、辩证法的了解。……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的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毛主席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时，批评林彪一伙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

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毛主席在强调搞好党内外团结的问题时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些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周总理、康生在闭幕会上也讲了话。会上，中央还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的决定。

9月7日，林彪、叶群下庐山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九江机场送他们。在叶群导演下这些人还在一起照了集体像。这实际上是表示他们的团伙要抱得更紧密。

林彪走后，黄永胜等人也很快离开了庐山。

9月8日，各省、大军区的负责人都走了。

9月9日上午，周总理、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走了。

这次全会后期，我主要是抓了对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和会议的收尾工作。

散会后，全会服务人员要求毛主席接见，同毛主席合影。9月9日下午2时，毛主席接见了为全会服务的会务人员。因为那天下雨，安排在庐山礼堂接见。后来雨停了，就改在室外，用夹道欢送的形式接见。照完像后，我们就同毛主席一起下了庐山。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林彪集团的失败而告终。但是林彪一伙并不甘心这次失败。

《吴法宪回忆录》摘录

第十三章 九届二中全会

一、汪东兴传回的声音

1970 年 3 月上旬的一天，汪东兴受毛主席的委托，从外地回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的意见。当时，毛泽东正住在杭州。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听取毛泽东的指示。汪东兴在会上传达说：“毛主席提出政治局研究一下，文革时间长了，要考虑恢复政府机构，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一是通过人大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验；二是成立和恢复各级政府；三是要研究发展经济和战备问题；主要是这三点意见”他还传达说，毛泽东指示，关于宪法问题，要政治局研究成立修改宪法的起草小组。另外，还要准备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战备工作报告”，这几件事要立即着手做。

最后，汪东兴还特别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汪东兴传达完毛泽东的意见，当天没有讨论，会议就结束了。

会后，汪东兴找到叶群，想到毛家湾去向林彪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但因为林彪已经按照平常的习惯，在晚上 8 点钟服用安眠药睡觉了，所以汪东兴没有去成，只好请叶群代为转达。

毛家湾去不成，汪东兴就请叶群、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到他家里坐一坐。于是，我们一行从中南海的新华门进去，一直到了靠水边的小楼，汪东兴的家。我们下了车，随后一起在客厅里闲谈了一会儿，接着话题就转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这时，汪东兴又对我们说，毛泽东曾经说过，“要设国家主席的话，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这个话，我们听了都感到很高兴，认为这是毛泽

东对林彪特别的信任与关怀。当时汪东兴也很兴奋，因为“九大”以来他同我们一直是搞在一起的。

那天晚上，汪东兴很高兴，一定要请我们吃饭。吃什么呢？是红薯。因为那里已经到了3月份，红薯已经很少了，但是他家里保存有。我们边吃边谈，一直到深夜才各自回家。

二、宪法修改小组

3月13日晚9点，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研究如贯彻毛泽东关于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指示精神。这次会议，除林彪以外，都参加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首先成立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小组，由周恩来牵头，成员由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负责四届人大的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接着研究修改宪法的问题，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小组，由康生任组长，其他成员由陈伯达、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共六人组成。这个方案很顺利地通过了，并准备报告毛主席批准。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留待宪法修改小组去研究。

很快，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方案。于是，宪法修改小组就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找了一个会议室，开始了工作。康生组织了一个秘书班子，并确定一个叫李鑫的同志负责。我们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8点开会工作。

小组的第一件事，就是首先研究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因为这个宪法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制定的，曾广泛听取了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所以要大家先研究这个宪法。然后还要研究苏联、朝鲜、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各国的宪法，任务是相当艰巨的。这些宪法有的几十条，有的上百条，还有的只有三条。另外，我们研究了辛亥革命以来孙中山制定的《五权宪法》，以及袁世凯制定的宪法等。前后两个多月的时间，大家传阅这些宪法，然后集体讨论。

在新宪法修改草案的问题上，我们首先是研究要写几章，搞多少条，在序言、总纲、公民的权力和义务、国家机构、国务院等章节该如何写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小组里经常有不同意见，有争论。有的主张写一百多条，有的主张写几十

条；有的主张设国家主席，有的主张不设，议论不一。康生主张不设国家主席，只设人大常委会主任。

经过反复讨论，最后我们终于统一了几点意见，修改的原则是宜简不宜繁，而且毛泽东制定的宪法原则，基本上都要继承下来。至于写几章、写多少条款等具体问题，写起来再看。

三、林彪的意见

在要不要设立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我想着重说一说林彪的意见和态度。

1970 年 5 月 17 日下午，因林彪准备带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去向毛泽东汇报军委工作，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四个人就先到林彪住处汇报工作。我们向林彪说起，军委办事组已派吴法宪和李作鹏参加了宪法修改小组的工作。我们还说起，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是设，一个是不设，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

林彪当即表示：“我不当这个主席，这个不妥。应该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才是名正言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国家主席、国家的元首，只有毛主席来当，别人都不合适。但是毛主席的年纪大了，当国家主席要出国访问，别的国家元首来还要回访，毛主席出国有困难，可以设副主席，副主席可以出国对其他国家进行访问。我也不适合当这个副主席，我的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活动，不能出国访问。要设国家主席还是毛主席来当。”

林彪当面对我们表示的这个意见，口气非常肯定。我至今仍然认为，林彪的意见比较中肯。他的这一番话，是出自内心的，也比较合乎情理。像以后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林彪急于当国家主席，急于抢班夺权，急于分裂党，反对九大路线”，我感到实在是牵强附会，缺乏根据。我有几点理由：

第一、当时国家主席的位置是一个虚职，当时国家代主席的职务是由董必武同志担任的，而董必武同志连中央常委都不是。党和国家的权力是集中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手里。在九大，林彪当选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这是最实际的权力。而且在党的九大章程中和宪法草案中已明确规定了林彪是毛主席

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林彪根本没有必要去争这个国家主席。

第二、当国家主席是个出头露面的事情，而林彪对搞出头露面的外事活动是很少感兴趣的。这从他建国以后极少参加外事活动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再说他的身体不好，也没有条件参加各种外事活动。

第三、刘少奇是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被打倒的，这是前车之鉴。林彪是个聪明人，看到了这一点以后，他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了同毛泽东的适当距离。这一点，有很多事例都可以证明。

因此，我认为林彪不存在“急于抢当国家主席”的想法。林彪的一个警卫参谋，李文普，写了一篇文章说：从来没有听说过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这样的话，因为林彪最讨厌参加接见外宾的外事活动。（见李文普文章，林彪事件与我。编者注）我感到这个说法是真实可信的，这也反映了林彪的性格。说林彪急于抢当这个国家主席，这种说法是违背林彪处世哲学的，也是没有根据的。林彪在我们面前从来未表示过想当这个国家主席，给我的感觉，他个人当不当这个国家主席是无所谓的。但他认为，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自己的元首。林彪曾经郑重向中央表示：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他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职务，另选一位国家副主席。有人说不想当国家副主席就是想当国家主席，坚持设国家主席就是想当国家主席，这是什么逻辑嘛！如果们叶群、林立果有些想法是可能的，但是说叶群、林立果就等于林彪，应该不是这么一回事。另外退一步说，想不想当国家主席，这不是犯罪的标准，如果说想当国家主席就是“篡党夺权”，那么“篡党夺权”的人就太多了嘛！

四、宪法修改小组发生了冲突

由于我们军委办事组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九大”以来就分成两派，这个问题，也反映到宪法修改小组里来了。从一些小的问题开始，就逐渐形成了两派，陈伯达、李作鹏和我是一边；康生、张春桥是另一边。在讨论问题时，大家都是放开讲话的，就时常有些争论之词，有些争论还非常激烈。如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坚持了林彪的意见：国家主席还是要设，由毛

毛泽东来当国家主席，考虑到毛泽东不便出国访问，可以设国家副主席，总之要设国家主席；康生和张春桥则不同意

设国家主席，而且人大也不设委员长，只设人大常委会主任。在设不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顶牛了。为了缓和矛盾，康生曾提出在宪法上写上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当时，林彪和叶群住在北戴河，事后我把这种情况通过电话反映给叶群，叶群回话说，林彪很赞成你和李作鹏的意见。要说服他们同意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元首，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说，各国宪法都有总统、主席等领袖人物为国家元首。我国开国以来，毛主席就是我们国家主席，后来有刘少奇主席。现在取消不好，引起世界人民怀疑。叶群在电话中对宪法写上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表示高兴。

以后叶群在北戴河对宪法修改工作很关心，常来电话询问讨论的情况，并告诉我们林彪的意见：要在国家的指导思想一条上加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人大常委会中设主任不设委员长，林彪认为不妥。这一点康生是最不满意的。

尽管当时组里矛盾很大，但工作还是照常进行。宪法草案基本上是依据康生的意见起草的，我们一条一条地讨论研究，包括条款、文字、标点都进行具体的推敲，但在有些问题上各不相让。这个草案一共是六章，即：（一）、总纲；（二）、公民的基本权力和义务；（三）、国家机构；（四）、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五）、民族自治和自治机关；（六）、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这个宪法草案的总纲里，也依据“九大”通过的党章，写上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句话。另外，宪法草案还规定，包括全国人大在内的各级人大常委会，都只设主任，不设委员长。

1970 年 8 月 14 日下午，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南海怀仁堂继续开会。这天到会的有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和我。李作鹏因为被周恩来派到青岛去处理问题去了，没来开会。纪登奎不知什么原因也没有来。会议进行过程中，陈伯达出去打了几个电话，长时间不在会场。所以，这一天实际上只有康生、张春桥和我在那里开会。

这次会议上发生了异常激烈的争论。在讨论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康生又提出不设，而我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最后争论不下。康生说：“那就各自保

留意见吧，以后提交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就这样放下了。当讨论到国家机构的问题时，我说国务院的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但康生和张春桥一起反对我，他们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其实当时他们的意见应该是对的，可张春桥当时说的几句话引起了我的反感。他的第一句话是：“有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都挂。”我想这是完全是冲着我来的。没想到他接着又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当时我认为，张春桥的话是冲着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来的。我就说：“张春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指谁说的？请你解释清楚。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句话过分了吧，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张春桥这里不写毛泽东思想，那里不写毛泽东思想，倒是你捍卫马列主义了，可是你的文章哪一篇里不写毛泽东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说赫鲁晓夫何时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

我这话一说，张春桥一下就急了，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我追问他：“毛主席在哪里说过？我怎么没有听到过？”张春桥一时说不上来。当时我们都很激动，我又说：“你今天吹这样的风是干什么？用意何在？中央政治局的人刮此风，刮到下面就会愈刮愈大。今后中央怎样解释？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你们不赞成，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你也反对，你们不准称天才，你想借口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我坚决反对你这种谬论。”这时康生也很不冷静说：“好、好，在国务院的前面加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就是了。”我说：“我是个人的意见，写不写由你们决定，因为我是宪法修改小组的成员，有权提出个人意见。”康生说：“对、对、对，写上、写上。”以后他们两人再讲话，我都不吭声，索性连话也不说了。

看来，张春桥的话不简单，文化革命中央文革几个文人，他们说打倒谁，就打倒谁，打倒了那么多的老同志，现在又公开把矛头指向了林彪，我心中真是气愤不过。林副主席有什么错，难道又要打倒吗？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经过几十年战争和政治斗争的考验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是你张春桥之流能啃得动的吗？！打倒林彪，靠你张春桥能打仗和支撑国家吗？现在想起来，给张春桥扣上“用毛主席

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的这顶帽子，也有点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但当时我在很多事情上对张春桥不满，积怨甚深，也就借题发挥，这样吵了一通。我和康生、张春桥在这次会议争吵的情况，李鑫都作了记录。

陈伯达打完电话回来后，我告诉他刚刚发生的情况。我说：“老夫子，你这个人，讨论宪法三心二意，你跑到哪里去了？”陈伯达这时立即对我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写上”。这样，陈伯达就公开同我站在了一起。

吃完晚饭，继续讨论其它问题，只有康生和张春桥说话，我一个人气鼓鼓地一言不发，陈伯达也不说话。就这样，宪法修改小组完成了最后一次讨论，准备将“宪法修改草案”提交政治局讨论研究。

散会以后，我和陈伯达走在一起。我对他说：“今天张春桥实在没有道理，口口声声赫鲁晓夫，这明明是反对毛主席，讽刺林副主席嘛！”陈伯达说：“走，先到我家去。”我跟着陈伯达到他家后，他对我说：“今天的事情不简单，你应该向林副主席反映一下，周总理和黄总长那里也反映一下。”

我按照陈伯达的意见，首先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当时周恩来还没有睡觉，我把会议的情况以及发生的问题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我说：“关于国务院的指导思想，他们不同意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周恩来说：“我支持你，你批评得好。国务院的指导思想应该加上毛泽东思想，这是应该写上的。”我又告诉总理：“张春桥说，毛主席说过，赫鲁晓夫也是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周恩来问：“他是这样说的吗？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从来没有听到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周恩来还告诉我：“三个副词不是林彪提供的，而是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邓小平总书记想出来的。我认为邓小平提出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三个副词是很英明的。”他还说：“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这件事情我赞成。”

好了，总理的意见有了，我就更有底了。这件事情我是第一个报告周恩来的，因为当时我们和周恩来关系一直是很融洽，也是很亲密的。接着，我又打电话给黄永胜。黄永胜当然是全力支持我的，他还提出让李作鹏立即从青岛赶回来支持我，不然的话，我和陈伯达在宪法修改小组里比较孤立。黄永胜表示：“这两条意见，一是设国家主席，二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一定要坚持。”当时还想和林彪、叶群通个话，但是夜已经很深了，所以电话没有打。

第二天下午，我才和叶群通了电话。我把会议上的争论情况告诉了她，并要她转报林彪。不到一小时，叶群的电话来了。她说：“林彪同志说，吴法宪的意见是对的，要坚持这两条（即以毛泽东思想为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坚持设国家主席）。对康生和张春桥驳得好，抓住了他们的尾巴。”

有了林彪的这个态度，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又都支持我，而且李作鹏、邱会作更不会有问题，于是我就打电话和黄永胜商量下一步如何在政治局会议上与江青、康生等人进行斗争。我们设定，为了防止在政治局讨论时再发生争论，要准备一些材料来驳斥他们。这时，李作鹏也赶了回来。我和陈伯达、李作鹏各自查了些书和文件，准备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再同他们斗一斗。

8月15日晚上，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讨论为九届二中全会所准备的几个文件。我们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叶群还专门从北戴河打来电话，要我们抓住张春桥、康生前一天的话同他们在这个会上斗一斗，因为他们公开影射林彪是赫鲁晓夫，引起了林彪的不满。当时，我们都预料会上会有一场冲突。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首先是审议宪法草案。一条一条地念，一条一条地讨论和通过。结果很是出乎我们的预料，设立国家主席和“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都写上去了，康生和张春桥一句话都没有讲，没有发生任何争论，风平浪静，三、四个小时就把文件都通过了。15日的会议就这样过去了。

会议结束以后，我们打电话到北戴河，把会议的情况告诉了林彪和叶群。林彪听完后说：“那就算了吧。但是庐山会议还会有问题，还会提出意见来。”

8月16日，政治局再次开会，研究九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还是由周恩来主持。会议首先确定了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一是审议宪法修改草案；二是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和中央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最后，周恩来说：“已经请示了毛主席，在讨论宪法期间中央、国务院、军委留下黄永胜、纪登奎在北京看家，后阶段讨论军委报告黄永胜、纪登奎上山，吴法宪、李先念回北京看家。到了8月17日，黄永胜提出意见来了，请示周总理，说最好能让他上庐山，北京有什么事情留李德生在家就行了。周恩来说：”毛主席已经决定了，不好再改，你还是留下来吧。“这样九届二中全会前期黄永胜就没有参加。

五、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

1970 年 8 月 18 日, 周恩来和我一起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 研究如何运送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上庐山开会。我提出, 用南北分开的形式来运送会议代表。长江以北的会议代表,

先用飞机送到安庆, 然后用直升飞机飞过长江到九江机场落地, 再用汽车送上庐山。我主要是考虑九江机场的跑道短, 大型飞机不能降落, 所以才想了这样一个过渡的办法。南方各省的会议代表, 则可以直飞南昌机场, 然后从南昌乘汽车上庐山。这样南北分开, 34 师的专机全部调用, 可以在两天以内, 将全会 255 名代表从全国各地全部送到庐山。另外, 我还提出, 为了绝对保证安全, 特别是绝对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 还应该要布置防空, 防止北面的苏联和南面台湾国民党空军的骚扰。周恩来同意我的意见, 并要我去具体落实。他说飞机的事情他就不过问了, 由我全权负责就行。最后, 他还特别向我交待, 要我次日与江青一起乘飞机上庐山。

那些年里, 只要是江青坐飞机是一定要我陪同, 把我就当成她的人质。这个问题林彪早就跟我说过, 他说, 江青对他说过, 坐飞机一定要吴法宪来陪, 一个是防止摔飞机, 一个是防止跑台湾, 有吴法宪在飞机上就安全。周恩来当然也知道江青的这个意思, 所以每次他都安排我同江青一起走。这个我心里明白。

我回到空军司令部后, 用全部精力来安排布置飞行计划。在这样短的时间里, 要完成这样一个重要的运输任务, 责任是很重大的, 我不敢掉以轻心, 尤其是在“文革”那样混乱的情况下, 更不能出一点差错。这一任务, 也是对空军战备工作的一个检验。除了留下几架直升飞机准备运送人员和食品外, 我决定将空 34 师的大型飞机全部调用, 并且在安庆机场设一个指挥所, 派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前往安庆机场进行直接的指挥调度。

这天晚上, 周恩来打电话给我, 要我第二天把两个文件, “宪法修改草案”和中央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带到庐山, 交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还在南昌, 他嘱咐, 等毛泽东到了庐山后, 要尽快交给他。

8 月 19 日这一天, 北京的天气不好, 下着毛毛细雨。我 8 点钟以前赶到了机场, 不久江青也赶到了。江青到了, 但周恩来要我给毛泽东带的文件还没有送到。江青听到这事心里生疑, 问我: “为什么这两个文件叫你带而不叫我带呢? ”我只好含糊其词。

我们等了一会儿，文件还没有送来。江青急了，叫我打电话去催一催。我只好打电话问了一下周恩来的秘书，回答说：马上就到。

我就安排装运江青汽车的飞机先起飞。江青每次外出，都要我们先派飞机把她的汽车和下飞机用的梯子送过去。不然的话，她觉得下飞机和乘车都不方便。又等了一会儿，文件终于送来了，于是我赶紧请江青上了飞机。飞机起飞后，江青喜欢打扑克，就拉了自己的秘书和护士，又叫上了我，四个人一路打扑克。

飞机到了安庆时，天气转好了。我又陪同江青从安庆乘直升飞机到九江，并在九江机场见到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杨栋梁。杨栋梁告诉我，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正从南昌开过来。我要杨栋梁先安排江青上庐山，而我在九江机场留了下来，一是准备把周恩来委托我带的两个文件交给毛泽东，二是要接一下从北京和各省来的人，同时布置一下飞机调度和防空的问题。

中午，杨栋梁带我到九江宾馆吃了饭，然后一起去车站接毛泽东。大约 1 点钟，毛泽东的专列开过来了。当时，毛泽东外出都是两列火车，前面一列是警卫部队，后面一列才是他的座车。

专列到站后，我见到汪东兴，他说毛泽东正在休息。这样，我不便打扰，就把两个文件交给了汪东兴，请他转交给毛泽东。然后，我回到九江机场去继续接人，由程世清和杨栋梁陪毛泽东上庐山。

我刚回到机场，江青就派了警卫团的两个干部来找我，说是上庐山时，看见一路上都是哨兵，一百米一个，太多了，要撤掉。我就打电话给杨栋梁，把江青的意见告诉给了他。他听了以后感到很为难，说：“主席要上庐山，撤掉不行哪！”我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想办法把哨兵撤到隐蔽的地方去，让上山的人看不见就是了。江青的意见，不办不好哪。”杨栋梁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就说：“马上照办。”

晚上快 9 点时，当天应到的飞机全部到达了安庆和南昌，我才算是松了一口气。趁着当时天还没有全黑，我便乘车往山上去。没想到，车刚走到半山腰上，上面下来了一辆吉普车，是江西省一个电业公司上庐山修理电灯的，和我的车对撞，差一点把我的座车掀到沟里去了，卧车的门都碰坏了。当时真是好险哪！一边是深沟，一边是峭壁，好在没有人受伤，车还可以用。就这样，我们勉强上了山。到山上以后我找到程世清，把我们在途中撞车的情况告诉了他。我要他不要

追究撞车人的责任，但是要很好安排一下，千万不要再发生类似问题了。不久，我又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询问我的情况，我说：“好在没有人受伤。”周恩来嘱咐道：“要告诉程世清，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这是第一次上庐山，来到山上一看，庐山上还真不愧是毛泽东所说的，“无限风光在险峰”，风景很好。山上的房子都是依山势而建，因而不太集中。在水库边上，专门给毛泽东修了一所房子，离我们住的地方有二、三里。江青住的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原来住过的别墅，周恩来和邓颖超住的是过去马歇尔住过的房子，林彪和叶群住在一个院子里。林彪住在这个院子里的一排平房内，叶群则住在一幢小楼里。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几个人的住处被安排在一起，陈伯达的住处也与我们比较靠近。

在我们住处的另一边，是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帅。当时，除了叶剑英以外，其他三位老帅都已经到了。那天晚上，我抽空去一一拜访了他们。老帅们都很高兴，辞别时，他们都把我一直送到了门口。

8月20日，我约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程世清是东道主，我管飞机。我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说起，前一天他陪同毛泽东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讲：“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我想汪东兴传的话，就是主席的意思吧。这一下，我感到心里更有底了。

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过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说，这句话是叶群亲自对我讲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这是一个多年的冤案，我要在这里更正一下。这里当然我有一定的责任，但历史就是历史。当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对我审查时，专案组为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证据，千方百计地诱导我，非要我把这句话安到叶群的身上。我开始拒绝了，后来迫于他们施加的种种巨大压力，就顺从他们，说了违心的话。但我在当时写的材料上，对一些被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怕时间一长，自己也忘了。如果现在还能找到我当时写的材料，就会看到，我当时特地在这句话下面做了记号。

关于这个问题，我后来看到一篇“程世清访谈录”，其中写到，“1970年8月19日，我和吴法宪一起到九江车站，迎接毛主席的专列，送毛主席上庐山，由于当时毛主席已经休息了，我们没有见到毛主席，我们和汪东兴交谈了一会，吴法宪有事先走了，汪东兴特别对我提到，这次开会，要支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汪东兴把尽地主之宜的江西省军区政委文道宏安排和他住在一起。文道宏告诉我，21日晚上，汪东兴给吴法宪打电话说：‘邱、李两个老总都到了，你要抓紧给他们通气，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汪东兴对当时在场的文道宏说：‘你告诉程世清同志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明天委员都到齐了，叫他（程）告诉江西的同志们，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主席说不当国家主席，是主席的谦虚嘛，那不是真的。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程世清访谈录）这里还要提到的是林彪警卫参谋李文普的文章，李文普证实说，从来没有听到叶群说过，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那里摆这样的话。（李文普文章“林彪事件与我”）这也算是另一个佐证吧。

车到九江以后，我和程世清就分开了。这一天，我在机场先接了林彪、叶群，后来又接了朱德、李富春、陈伯达、康生、叶剑英等许多从北京来参加会议的人。下午4点，周恩来、邓颖超也到了。周恩来要我和他一起上山，我说飞机还没有到齐，请他先走。于是，周恩来就先走了。

六、开个神仙会

晚，我上了庐山。我刚刚进到自己的房间，就碰到叶群约了李作鹏、邱会作一起来找我。叶群说：“你们从来没有上过庐山，去看看‘仙人洞’吧。毛主席给江青的诗，‘无限风光在险峰’，就是说的这里，不信去看看。”

“仙人洞”离我们住的地方大约两里路。我们乘车走了一段，然后下车沿小路走上去，原来仙人洞是一个悬崖绝壁下的天然石洞，洞前面还有一个井，井里还有水。我们在“仙人洞”前面一起合影留念。这张照片，以后就变成了他们所说“反党结盟”的所谓“证据”。

在游览“仙人洞”时，叶群对我们说：“这次来庐山开的是‘神仙会’，没有什么事情。你们都忙了大半年，就在这里避避暑，放松一下。林彪同志也不准备讲话了。如果能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和军委的报告，下面就是四届人大了。到那时，你们就可以散散心，玩一玩了。至于他们几个（指康生、张春桥等人），也可能提，也可能不提，到时候再说吧。”我们转了一圈之后也就各自分手回去了。

人都到齐了，可是 8 月 21 日和 22 日两天都没有开会。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大概是因为常委们还没有开会，而开会的时间要由毛泽东来定。我想，正好用这个时间去看看山上部队的同志们。

当时，空军在庐山上修了一个直升机场，这是汪东兴布置的，他说山上山下都应当有直升机场，整个会议的物资和人员都应当用直升机来接送。为此，我们空军的人，由副参谋长胡萍带领的机组和地勤保障人员，都驻在山上。8 月 21 日上午，我先到直升机场去看望了胡萍他们，然后又爬到山顶上的雷达站，去看望了长年驻守在那里的指战员。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下午回来后，才知道陈伯达来找过我。我赶紧来到陈伯达住的地方，他告诉我，下午常委在毛泽东那里开了会，决定 8 月 23 日开大会。我简单寒暄一下就告辞了。

接着，我又去看了周恩来，向他汇报接送全部代表和布置防空的情况。我还建议，在九届二中全会开会期间，不管是空军还是民航的飞机，都不准从庐山上空通过，以防止出事。周恩来说：“你这个意见很好，所有飞机调动的事情，由你全权负责。”我当即表示：“一定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请总理放心。”

回到我住的地方，我立即叫秘书打电话，找上海空 4 军的王维国和南京军区空 5 军的陈厉耘，向他们布置了会议期间的防空问题。另外，还布置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做好战备防空工作，防止台湾国民党军的飞机来侦察和骚扰。最后我问了一下王维国，上海方面对张春桥有什么反映？王维国告诉我，张春桥在上海只宣传江青，不宣传林彪。我对他说，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

做完这一切工作，我又去看望了林彪。在林彪的住处，我见到了林立果。叶群看我有点意外，便对我解释说：“孩子没来过庐山，上山来看看。”我当时对这件

事根本没放在心上，因为林彪的儿子到处跑跑，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接着叶群又对我说：“这次开会还带来了一些书，如果他们还要争论，就到我这里来找语录。”她还告诉我：“明天上午开大会，林总就不准备讲话了。”我在林彪那里坐了一会儿，就回去了。

七、全会开幕 林彪讲话

1970 年 8 月 23 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的礼堂里隆重开幕，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个常委的位置摆在主席台上，我们其他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全都坐在台下。当毛泽东步入会场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开幕式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当他宣布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时，全场又一次响起热烈掌声。接着，周恩来宣布会议的议程，一是讨论“宪法修改草案”，二是讨论国家计委的“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和中央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他还宣布，会议前半段讨论“宪法修改草案”和“国民经济计划报告”时，黄永胜、纪登奎在北京看家；会议后阶段讨论“军委报告”时，黄、纪上山，我和李先念回北京看家。

周恩来宣布完会议议程，康生便开始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康生对我们起草的“宪法修改草案”，一条一条地作了解释和说明。康生讲完后，我以为这天的会议便结束了，没想到主持会议的毛泽东突然宣布：“请林彪同志讲话。”

毛泽东这一宣布，我们都感到比较意外，因为叶群会前曾明确告诉过我们林彪不讲话的。

林彪接着就讲开了。他首先谈了对“宪法修改草案”的看法。说对这个草案看了几遍，总的感觉很好，概括地说是“简要明了，条理清楚”。他说，他研究了一下觉得这个“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了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是确立了毛泽东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这样一个地位，同时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尤其写上了整个国家机关工作的指导方针是毛泽东思想。他认为，这一个特点非常重要，他很高兴。第二个特点是宪法草案的条款、章节都写得很明确，第三个特点是文字写得很顺畅，第四个特点是宪法草案里写上了关于民主

方面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将这些写进了宪法，这是“文化革命”创造出来的民主的一种很好的形式……。我记得一共讲了五点。

另外林彪还讲到了天才的问题。林彪说：“关于‘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个问题，我有一点看法。人有没有天才呢？我认为是有天才的，马克思讲了天才，列宁也讲了天才。”接下来他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人是有天才的。然后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延安的‘七大’就提出来了的。当然，毛主席的天才是在革命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的。现在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好像天才论不对。这如果是下面个别人这样说还情有可原，但如果是中央的人讲的，就会影响到全国，会引起混乱。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已经提出来很多年了，这个问题是不能动摇的。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尤其是中央的同志刮这个风是不好的，要引起波动，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妥。”

林彪那天的讲话时间比较长，大约有一个半小时左右。他讲完之后，大家热烈鼓掌，场面非常热烈。

林彪讲完话，毛泽东就宣布散会。此时不光我们几个人很兴奋，陈毅、叶剑英、陈锡联、许世友等许多人也高兴地上去和林彪握手，称赞他讲得好。尤其是许世友，对林彪的态度最为热烈。许世友对张春桥从来都没有什么好感，曾多次对我说：“别看张春桥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但是他什么都不懂，一个兵也调不动。”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他们走了以后，我们还都留在礼堂内议论。大家兴致都很高，只有张春桥等几个人的情绪不太正常。张春桥这个人是很高傲的，一向都看不起我们，平时很少主动同我们搭话。这时他的态度也变了，主动过来问我有没有记录林彪的讲话，并说我记录得比他好。这真是笑话！

下午，我们见到叶群，问起林彪讲话的事。从叶群那里知道，在会前常委们休息时，毛泽东说由他主持会议，要周恩来宣布会议的议程，康生作修改宪法的报告。接着，他又问林彪讲不讲话。林彪说：“想讲几句，主席看可以不可以。”林彪接着说：“有一个问题，想请示一下主席，就是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发生了争论，最近听到吴法宪同志讲，8月13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反

对提天才，不同意写国家机关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公开反对，自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全党所通过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评价。还说连赫鲁晓夫也是天才地，创造性发展了马列主义，说三个副词是一种讽刺。”林彪把 8 月 14 日的情况大体讲了一遍。这时周恩来也点了点头，表示他知道这回事。毛主席表示：“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毛主席又问林彪准备怎么讲，林说：“想讲两点，一是关于宪法修改草案，感到这个不错。第二是讲一讲天才问题。”毛主席还说：“这个张春桥的后台一定是江青，一定是她搞的”。叶群还告诉我们，林彪当时对毛泽东只点了张春桥的名，没有点康生的名，这一是因为康生在场，另一个则是因为毛泽东很器重康生。这就是林彪在开幕式上突然发表讲话的缘由。这个讲话的大体内容，毛泽东事先是知道的，而且也是表态同意了的。

八、改变全会的三项议程

8 月 23 日下午，叶群又叫我、李作鹏和邱会作到她那里去，说要商量一下林彪讲话以后的事情。叶群提出：“第一、我们几个都要准备支持林彪的讲话。第二、批评时不要点名，尤其不要点康生的名。康生是常委，如果我们涉及到康生，毛泽东不会同意的。另外，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也一律不点名。第三、坚持在宪法上设国家主席。第四、向陈伯达要一份关于天才的”语录“，争取从理论上说明问题。第五、我们几个都在各个小组会议上带头发言。

那天晚上，周恩来主持了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外，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也参加了。按照惯例，毛泽东和林彪没有到会。

会议首先进行了九届二中全会的编组工作，决定一共分为六组，按地区划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分别编入各组中。叶群、李作鹏被编入中南组，邱会作被编入西北组，我则被编入了西南组。

编组问题决定以后，我首先提出：“是不是可以先讨论一下林副主席的讲话。”我刚说完，陈锡联马上第一个起来响应，说：“好哇，要讨论讨论！”紧

接着，汪东兴、许世友、曾思玉、李作鹏、邱会作等很多人都纷纷表示同意。汪东兴还特别提出要重新听一下林彪讲话的录音，大家的情绪更高了。这时周恩来也显得很高兴说：“这个意见好，就按你们的意见办，我负责向毛主席报告。”周恩来还提出：“是否放两遍录音，大家反映一遍听不懂，为了便于讨论，明天上午在礼堂再放两遍录音，后天再讨论，这样一共是两天。”

这一下子，康生和张春桥很紧张了。尤其是张春桥竟然给旁边的邱会作敞开烟了。这样政治局全体通过了周恩来的安排。这样一来，就一下改变了全会原来的三项议程，改为了首先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九、称“天才”的几条语录

1970 年 8 月 24 日上午，会议组织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全体与会人员，在庐山礼堂里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一连放了两遍，连老帅们都到了。

听完录音，叶群又找到我和李作鹏、邱会作，要我们跟空军、海军、总后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通个气，要大家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但注意不要点名，因为毛泽东表态说“不要点名”。她还专门算了一下各大组差不多都有我们的人，只有华东组和东北组没有，于是就要我们几个去跟这两个组通通气。

叶群又告诉我们，她上庐山前翻了几本书，准备了一些马克思、列宁论天才的“语录”，叫我们需要的时候到她那里找。

回来以后，我想了一想，作些什么准备呢？过去书读得少，现在要想从书里找一点马列论天才的“语录”，一时还真的想不起来。想来想去，只好去找陈伯达，他是“老夫子”，读的书多嘛！晚上，我来到陈伯达的住处，发现他吊儿郎当地根本没有搞什么“语录”。我催促他说：“你陈老马列主义水平高，能不能搞几条‘语录’，我们在会议上发言也好有个依据。”我这一说，陈伯达马上就积极了起来。当时他从北京带了三个专门搞理论的人上庐山，这时就要他们几个现找。

从陈伯达那里回来，我也开始到处找“语录”，结果找到林彪几条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话。我让秘书把林彪的这几句话，送到大会秘书处去打印一下。

不久，陈伯达给我打来电话，说他的“语录”搞出来了。接着，他用电话一条一条地给我传了过来，我一条一条地记。然后，我把这些“语录”整理了一下，又问他该叫什么名字。他说：“就叫‘马、恩、列论天才的语录’吧”快到中午时，叶群带了林立果来到我的住处。林立果见到我就说：“爸爸说你吴司令立了大功。”我明白，他是指我前一天晚上提议讨论林彪讲话这件事。叶群紧接着说：“我向林彪同志说了，是你吴胖子先提出来的，大家都赞成。林彪同志听了后很高兴。”

我把陈伯达搞的“语录”拿给叶群看。叶群说：“很好，最好能给我一份。”汪东兴听说了，还把陈伯达搞的这些“语录”拿到中央办公厅打印了几十份，给我送来了几份。然后，我把打印好的材料给了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各一份。刘贤权听说了这事，也来找我要了一份去。这样，不少人的手里都有了陈伯达搞的这份“马、恩、列论天才的语录”。

十、华北组起哄

8月24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始小组讨论。我参加西南组的讨论，这一组由张国华、梁兴初和谭甫仁三人主持。参加这一组讨论的，还有朱德、聂荣臻和李先念等。朱德等人坐在前排，我们都坐在后面。

开始时，发言的同志只是一般地谈谈，我是第四个发言的。我在发言中首先表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林副主席关于天才方面问题的论述非常全面，既讲了毛主席是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和建设新中国方面的伟大天才，又说明了毛主席的天才，是在革命和战争的艰苦实践中锻炼出来的。”

说到这里，我念了一条陈伯达搞出来的马克思关于论天才的“语录”，说明否认天才的存在是错误的。接下来我又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批评了一些人所散布的反对天才论的言论，是因为在这次讨论修改宪法过程中，有人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个说法是个讽刺。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想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想推翻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对此，我们绝不能迷迷糊糊的，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

另外我还提到有人反对学“老三篇”。（“老三篇”即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文革”期间人们把这三篇文章统统称为“老三篇”。编者注）这个时候康生的老婆曹轶欧插了话，问：“是谁反对‘学老三篇’？”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她明知道我说的是康生，却还要明知故问。由于叶群事前打过招呼，不能点任何人的名，尤其是不能点康生的名，我含糊其词地说：“确有其人哪。”她马上表态说：“反对‘老三篇’是错误的。”我说：“这个风不可刮，我们中央全会对毛泽东思想应当是坚定不移的，要起示范作用。”我讲完了，全组热烈鼓掌。这时我心里却在想：是不是有点讲过了？

在小组会中间休息时，有很多人向我打听是谁在反对“天才论”和学“老三篇”。我不好说，只悄悄告诉了张国华和梁兴初，这个人是张春桥，并告诉他们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后来李先念也来问我，我也告诉他。他听说是张春桥，就说：“噢，是这个家伙！我还蒙在鼓里。”以后大家继承发言，都是拥护林彪的讲话，但是再没有人提到别的情况。朱德和聂荣臻、李先念都没有发言。下午小组会开得也是一般，比较平静。

晚饭前，林彪叫我到他住的地方去一下。我去了以后，林彪告诉我：“毛主席讲了，什么人也不要点名，尤其不要点康生。康生是常委，一端出来，打击面太大，毛主席肯定不赞成。一定要记住，不点名。你也不要讲有人反对学‘老三篇’。”

我说：“我在会上已经说了。我说了以后，曹轶欧很紧张，表示反对学‘老三篇’是错误的。”林彪说：“你回去和李、邱商量一下，不要点康生的名。”

从林彪那里出来，又见到了叶群。她要我对李作鹏和邱会作说一说，要我们同空军、海军、总后的中央委员通个气，不要点康生和张春桥的名，因为毛泽东打过招呼，一定要注意，但是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可以坚持。

傍晚，我到空军的几个中央委员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王秉璋和曾国华的住处，向他们转告叶群的意见，要他们带头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晚上我们一起凑情况，才知道当天下午华北组“起哄了”。首先是陈伯达发言，他把我的话搬出来说：“吴法宪同志说得好，要警惕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然后是汪东兴发言。他的发言是下午所有发言人中调

子最高的，他明白告诉大家，一定要坚持设国家主席，要拥护毛泽东出来当国家主席，否定毛主席的伟大天才是极其错误的。由于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的话是代表毛泽东的意思，以至后来人们纷纷起来响应。接着，陈毅元帅也发了言。性格直爽的陈毅说：“我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天才确实有，我赞成，毛主席就是天才，我是坚定不移的相信天才的，谁反对天才我就反对他。”陈老总的讲话也得到了大家热烈的鼓掌欢迎。

他们几个人讲完话，华北组就热闹起来了。大家纷纷发言，指责那些反对“天才论”的人，而且要追查这些人究竟是谁？

在其它的几个组里，西北组邱会作的发言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连康生都赞扬说：“邱会作同志马列主义学得好。”他还表示完全同意邱会作的讲话。华东组也比较热闹。王洪文带头拥护林彪的讲话，他显然还不知道这是对关张春桥来的。王洪文还发言批判杨成武，说杨成武反对“天才论”。总之，在六个小组里，大家都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也提出了要追查是什么人反对天才论，张春桥在会上显得很沉闷，心情很紧张。

会议的情绪在周恩来的身上也有体现。这天晚上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和我们有说有笑，但是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表情冷淡，对江青他还是表面应付。

虽然对全会的绝大多数人来讲，是不了解情况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知道或意识到，我们所指是什么。在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眼里，特别是在那些老同志的眼里，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是没有什么地位和威信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两个只是“文人”，写写文章，没有什么战功、政绩。他们是靠了江青起家的，在“文革”中一步登天，到了这样高的位置上，大家心里是不服气的。另外，对于“文化大革命”，大家嘴上不好讲，但是对于中央文革的几个人，支持、利用一帮造反派，迫害老同志，打击一大片，制造混乱，破坏生产，大家是有很大怨气的，也是很头痛的。

所以，当很多人，特别是一些老同志，察觉到了我们的矛头是指向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就都活跃了起来，纷纷参加对康生等人的声讨和谴责，借机出口怨气。以后毛主席说我们“几个人欺骗了二百多中央委员”，其实，别说我们根本没有欺骗他们，就是想欺骗他们，在座的有相当一批老同志，个个身经百战，

独当一面，哪一个是好欺骗的？只不过当时大家心里都有一种的情绪，对中央文革一帮人心里都有气。没有这样一个基础，这个火是点不起来的。因此，许多人发言都提出了追查人的问题，不过是借题发挥，出出气。就像韩先楚同志说的：“这两天真是痛快！”杨得志后来在回忆录里也说，看到张春桥在小组会上的狼狈样，他感觉到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痛快！

8月25日一早，大会秘书处就发来了全会的“六号简报”，反映了华北组讨论的情况。华北组的简报说：大家热烈地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语重心长，非常好，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大家听了陈伯达同志、汪东兴同志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我们党内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还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是野心家、阴谋家，是反动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大家衷心赞成在宪法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恢复设立国家主席的有关内容。

“六号简报”可以说是所有简报中最热闹的一份，其中陈伯达和汪东兴的发言，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份量。

接着，秘书又拿来了我所参加的西南组的简报，大家的发言也是一致拥护林彪的讲话，拥护设国家主席，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另外把我的讲话也登出来了，我想还是等等看的为好，所以叫秘书把简报扣住了。

十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求救

刊登各小组讨论情况的简报下来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看过以后就不是一般的紧张了。25日上午汪东兴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事前没有经过联系，突然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毛主席没有见江青，对她说：“你走。”江青走后，毛主席单独见了张、姚两人。两个人在那里抱着毛主席的大腿哭，把毛主席的裤子都弄湿了。他们说：现在各组都在揪人，连华东组也要揪人了，而且要追查后台。主席对他们两个说了些什么，他不知道，但他已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叶群，叶群叫他给我打电话，要我沉住气。

接到汪东兴的电话以后，我心里有一点疑虑，但转过来一想，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是不会支持张春桥的。这样一想，心里就坦然了。

1970 年 8 月 25 日上午，各小组继续讨论。这天讨论的情况比较平静，没有那样像 24 日那样热闹了。许多小组都已经一致通过了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我所在的西南组也没有再讨论，就一致通过了这个意见。这样一来，这一天的全会又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

午休后，我去参加西南组下午的会议，没有见到小组长、四川省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张国华。我问副组长、云南省委书记谭甫仁，他回答说是到毛泽东那里开会去了。这一下我觉得有点奇怪了，通常都是毛主席先召集政治局会议，怎么这次直接召集各小组长会议呢？而且我们一点都没有听说这件事。这里面，肯定是什么问题了。

十二、休会两天，换换空气

下午 4 点多钟，张国华回来了。回来以后，他立即在小组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他说：“毛主席在下午 2 点召集了中央常委和各大组组长会议，决定停止讨论和学习林副主席的讲话，同时也要停止批判。现在会议已经发展到要揪人的地步了，有人写信要把反对‘天才论’的人揪出来下放，说这样的人不能在中央工作。这个空气太热了，要冷下来。因此毛主席决定，休会两天，换换空气。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也不要提了，毛主席说他不当国家主席，林彪同志也不当国家主席。天才的问题也不准再提了。这两天把会议的情况搞清楚，然后再开会。”

这真是风云突变！我当时在心里想：这个张春桥真有办法，到毛主席那里去一哭，就把毛主席哭过来了。现在情况完全变了，但是什么情况还不清楚。带着这样一种心情，吃过晚饭，我急忙到了林彪的住处，想了解一些情况。叶群对我说：“林彪同志到毛主席那里开会去了，会议可能要休息几天，不要紧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情况，你们没有来过庐山，可以到外面去玩一玩，散散心嘛。”叶群说的这些话，是在安慰我还是真的不在乎，我不知道，总之她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时间不长，林彪回来了。他一坐下就对我说：“毛主席态度变了，不高兴了。他批评了陈伯达，说陈伯达在华北组跳出来，起哄要揪人了。还说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的事情都不要提了。就是这个情况，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要紧张。”

这个事情，林彪对我说得很简单，看来他也很沉得住气，但我的心里还是感到不安了。

晚上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各组的汇报。在这个会上，康生他们又神气十足起来，气势跟前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毛泽东变过来了，站到他们一边去了。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又一次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休会两天，换换空气。”

十三、首当其冲的陈伯达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8月26日、27日，全会休息两天。这两天里，说是“换换空气”，其实是充满了一片紧张的气氛。毛泽东整天召集常委和各大组长开会，反而把我们政治局委员排除在外。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

在这两天里，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帮人也活跃起来，他们拼命地做工作拉人，这两天都是他们在活动。而我们一下子沉默了，一天天无所事事，不了解情况，也不好去打听，只有去找叶群问问。而叶群却一再跟我们说：“没有什么事情。你们在家不如出去玩玩，散散心。”

可我们哪里有这份心情呢？后来，叶群真的来约我们一起去上山逛一逛。在山上，我们正巧遇到了陈伯达，由于大家的心情都不好，谁也没有说什么，只是打了个招呼而已。

8月27日上午，陈伯达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要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到他那里去一下。我们到了他的住处，见到他的心情很坏。他告诉我们：“这次找你们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你们几个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不要互相打电话，也不要写信了。”他的话音里充满了凄凉。我们很惊讶地问：“情况有这么严重吗？”陈伯达说：“毛主席批评我们有一个‘军事俱乐部’，并且要我到康生、江青那里去承认错误，结果康生、江青他们把我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骂了一个晚上还嫌不够。他们说我是叛徒，是叛变中央文革，出卖江青、康生、张春桥；

说我投靠军委办事组，把林副主席绑在我陈伯达的战车上，勾结军队想杀害他们；说我可耻等等，什么话都骂尽了。”

听到这些话，我们心里都很气愤，什么“叛变”、“杀害”，话说得太过分了嘛！但同时，我们的心里也感到很沉重，因为我们当时都感到，这样的事情可能很快就会轮到我们的头上。

陈伯达还说：“毛主席批评了我，说我自以为懂得理论，鼓吹‘天才论’，在华北组起哄。毛主席说我欺骗了你们，你们把我的语录都烧掉吧。另外，毛主席还点了汪东兴、陈毅、邝任农的名，你们也要注意。”

陈伯达的这番话，使我们更加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陈伯达这个人胆子小，毛泽东一批评，再加上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跟着整了他一个晚上，这就弄得他非常紧张，也很害怕。我们就对他说：“不要怕，我们有难同当！”同时我们心里也愤愤不平。

从陈伯达那里出来，我们又到了林彪的住处，把陈伯达说的话告诉了他。林彪说：“毛主席是批评了陈伯达。”除此之外，他什么都没有说。

十四、追查

8月26日下午，周恩来打电话来说，他和康生要找我、李作鹏、邱会作谈话。我们来到周恩来的住处，康生已经在座，汪东兴也在那里。这次谈话，主要是追查我们在小组会议上发言的事情。康生一开始就气势汹汹地说：“汪东兴在华北组点火，陈伯达跳起来批判，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说‘站起来斗争’。”他还总结了四句话：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康生真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周恩来只问了会议的情况，没有加任何评论。听到康生讲这些话，他也一声不吭。我们说：“康生同志，你下这个结论未免太早了点吧？”

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吃过晚饭，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前往林彪的住处，想向他汇报一下下午周恩来、康生找我们谈话的事。林彪正好从毛泽东那里开会回来。他告诉我们：“一是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不要再提了。这次毛主席说国家只设人大常委会主任，不设国家主席。主席还说，‘我不当这个国家主席，

我劝你林彪也不要当’。”就这样，在毛主席的强大压力下，林彪不得不改变了态度，把“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意见，都放弃了。

关于下午周恩来和康生追查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也告诉了林彪，说：“这次把汪东兴也一起拉进去了。”林彪没有说什么，只是听，最后说了一句：“让他们去讲吧，总要有事实根据吧。”

8月27日早上，林立果来找我，交给我一本“九大”的党章，说是林彪要他来送给我的，并告诉我，林彪要我看一看。早在“九大”上通过的党章中，关于毛泽东思想前面的三个“副词”，就已经不见了。我翻开党章一看，果然如此。

这天上午，周恩来和康生继续找我们谈话。去谈话时，我带上了这本党章。这天上午，我们又被追查了三个小时。康生一上来就要我们交代“军事俱乐部”的事，说：“你们要交待，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怎样形成的？你们长时间串通一气，还有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我说：“康老，你是中央常委，陈毅是中央委员，他什么时候成了‘反革命分子’，你说话太随便了吧。说陈毅和我们串通一气，你康老有什么根据吗？他在华北组发言说了什么，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成了我们‘军事俱乐部’的人呢？再说我们是军委办事组，这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军事俱乐部’，8月14日讨论宪法的会议你康老也是在场的嘛。这个争论你是当事人，怎么是我造谣呢？”我说得有一点激动，听到这时，周恩来忙说：“康老的话说错了。”当时康生说陈毅是“反革命分子”这个话我一直没告诉陈毅。后来，整个会议一直把陈毅元帅算到我们“军事俱乐部”里，叫作批判“二陈”（陈伯达、陈毅）——真是冤枉！

这时，邱会作也说：“你康老在西北组讨论的时候，赞成我讲的话，还表扬我说我马列主义学得好。这个话你忘了吗？”听了这话康生脸都红了，忙说：“我并没有说你说的都对嘛！”这样，康生的气焰才稍稍收敛了一点。见到这样，周恩来赶紧说：“我们只是把情况弄清楚，大家都冷静些，现在不评论是非。”

我把“九大”党章拿出来，把写着“党内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的那一页翻给周恩来看。然后我问周恩来：“‘九大’党章中的‘三个副词’为何删掉了？”

这一问把周恩来给问住了，他说，这“三个副词”实际上不是林彪提出来的，而是“八大”由邓小平提出来的，但是“九大”党章上为何删掉了这“三个副

词”，要查一查。这个问题康生也搞不清楚。后来周恩来指示要办公厅的同志去查，结果发现是毛主席审阅党章时，自己圈掉的。

十五、周恩来要我写检讨

1970 年 8 月 28 日，我刚刚起床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叫我马上到他那里去一趟。周恩来找我，是要我写一个检讨。他说：“你是办事组副组长，组长没有来，你们组里出了事情，你应该主动承担一点责任。还是写个检讨，把问题说清楚就算了。”他还告诉我：“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统帅’承担责任。你明白，问题是‘副统帅’的讲话引起的。要保护‘副帅’，不然的话又要攻到‘副帅’的头上去了”。

周恩来的讲话把林彪称作“副帅”这个我明白，一是不好点名，二是要我为林彪开脱一下，周讲的很中肯，我感到是一片好心。于是我当即表示：“我一定要写这个检讨。但是怎么写，我觉得有点难。我想是不是检讨这样一条，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是我提出来要讨论的，这样做干扰了大会的方向。”

周恩来听了说：“好哇！你也应当替我担一点责任。不然的话，是我主持会议，好像是我提出来要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的。这事是你提出来的，然后大家同意的。”我说：“我回去考虑一下，尽快写出一个检讨，先请总理审阅。”周恩来还问我：“你们搞‘语录’了吗？”我回答说：“是我向陈伯达要的。他给我找了几条‘语录’，我打印了几份，给了李作鹏、邱会作各一份。”

周恩来接着就要我把陈伯达搞的“语录”拿一份给他。我回去后，马上叫秘书找了一份“语录”送给了周恩来。后来周恩来又把这份“语录”送到了毛泽东那里。下午，周恩来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再次强调作检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副帅”，把事情平息下来。我表示：“请总理放心，一定按照总理的意见办。”

我想了一下，觉得这样的事情还是应该请示林彪。晚饭后，我到了林彪那里，林彪就对我说：“昨晚，是康生的意思，约周总理到我这里来了，说汇报你们几个的情况。康生说，这次庐山会议的主犯有三个，一是陈伯达，二是吴法宪，三是汪东兴，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还有陈毅跳出来。我对他说，我不同意这个意见，这个问题根据不充分嘛！说吴法宪造谣，8 月 14 日的

争论你也在场，怎么是造谣呢？吴法宪这个人我了解，从一军团到四野，跟了我几十年，从来没有听他造过谣。再说陈毅和吴法宪、汪东兴他们也没有联系。说到这里，周总理解释说，陈毅是跟着陈伯达来的，发言表示同意陈伯达的意见。我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后来周总理看到气氛不好，就对康生说，我们走吧，副主席要睡觉了。这样他们才走了。”

林彪说完，我才向他报告说：“周总理要我写个检讨，主要的意思是为‘副帅’承担一点责任，错了我负责。”林彪听完马上说：“你不要写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我解释说“总理的意思是要保护你。”林彪说：“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我看得出，林彪对我写检讨是不高兴的。

林彪还对我说：“我们这些人，行武出身，打仗懂一点，搞武的行，搞文的不行，搞文的搞不过他们。这次不该讲话。”我理解，林彪这话的意思是，我们这些人打了几十年仗，搞政治不行，没有心计，人家一讲就当真了，结果上当了，在政治上我们搞不过张春桥那些人。以后有人说：林彪这个话是想搞武装政变。当时会议还丝毫没有涉及到林彪，他是副主席，副统帅，接班人的地位也还没有任何动摇，有什么必要搞武装政变呢？林彪当时讲话不是这个意思。

第二天（8月29日）晚上，林彪专门又告诉我：“毛主席和我谈了话，说对张春桥这个人还要看两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时候我交班给你。”

在当时，我很清楚林彪不愿意我写检讨，可又觉得也不好违背周恩来的好意。前思后想，我感到这个检讨还是要写。于是，我利用晚上的时间拉了一个提纲，一共是两条，一、讨论林彪的报告是我提出来的，干扰了大会的议程；二、我对林彪的讲话理解上有偏差，有错误。拿着这个提纲，我又和李作鹏、邱会作商量了个把小时。他们俩都说，言多必失，简单一点为好。这样，我的这个检讨，一共只写了几百个字。

十六、黄永胜上山

这时，黄永胜也上了山。根据会前的安排，这次全会从8月20日起，黄永胜一直留在北京看家。不过，我们在山上天天和他联系，他是办事组的组长，我

是副组长，应当向他汇报情况。另外，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也经常同他保持着联系。

林彪 8 月 23 日的讲话内容，我用电话传给了他，当时黄永胜很高兴，并要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交代军委办事组的秘书宋诚代写一个书面发言稿，表示完全拥护林彪的讲话。写好以后，由宋诚直接用电话念给他听，并由他作了若干的修改。改好后，他就让发出去，我说最好再等一等。果然到了 25 日情况大变。到了 27 日的晚上，黄永胜来电话催我，要我尽快把他的书面发言发出去。我说：“可是不能再发了，情况全变了。”接着我把情况大致告诉了黄永胜，但是电话上又不敢多讲。他听得不明不白，就很着急，一再让我讲详细一点，并且很奇怪地问：“怎么两天就全变了呢？”我说：“电话里不保险，等你上山再说吧。”

27 日晚，我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因为按照原来的计划，我是会议后期回北京换黄永胜上山的。周恩来说：“这个事情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两个小时，周恩来打电话来说：“主席说，吴法宪不回北京，同时要黄永胜立即上山，李德生回北京看家。”这样，我也就有了思想准备，看来是要倒霉了。

29 日下午，黄永胜坐飞机来到庐山。他这次来庐山，具体的事情都是周恩来一手安排的，不叫我管了。黄永胜一上山，连林彪都没有见面，就被拉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得知这个消息，我和李作鹏、邱会作，在商量完我的检讨以后，就三个人一起到黄永胜住的地方去等他。我们猜想，这个谈话很可能与我们关系重大，因此我们都很想早一点知道毛泽东找黄永胜谈话的内容。当时我就想，这下好了，冷落我们，拉黄永胜了！

我们几个都到黄永胜住处一直等到下半夜，他才从毛主席那里回来。可他一回来，又先到林彪那里去了。我们只好继续耐心地等，一直等到了 8 月 30 日的凌晨 4 点钟，才等到黄永胜回来。看到黄永胜，我们都很着急地想知道毛泽东跟他谈的情况。结果还好，因为他不在山上，毛泽东没有批评黄永胜本人。但他对我们说，毛泽东说：“你一个组长不在，你的副组长和副总长就在这里起哄……。”毛泽东还说：“一方面军的干部不如四方面军的干部好，四方面军的干部比较谨慎，一方面军的人骄傲自大。”看得出来，有些话黄永胜没有对我们讲，可能是怕我们听了思想上有顾虑，我们也不便多问。

过了一会儿，叶群也来了。我们又一起商量了几条原则：一是各自检讨，互不涉及；二是山上山下没有联系，检讨不牵涉林彪、黄永胜；三是不揭发陈伯达和汪东兴，以便保护他们。我说：“现在周总理要我作检讨。我是副组长，由我来作检讨承担责任，以保护林副主席。”大家一致同意了我的意见。

8月30日上午，我把这个检讨亲自交给了周恩来。他看过以后很高兴，说：“这样就行了。主要是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在理解上有错误，这个提法好！”

后来，林立果来到我这里，对我说：“爸爸的意见，不要你作检讨。他的意思是，有问题要检讨，也要由他来检讨，你没有责任。”我再一次作了解释，说是周恩来要我作的检讨，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林彪。这个时候，林立果不高兴了。以后他跟人说：“吴法宪不如陈伯达，陈伯达根本不作检讨，但是吴法宪检讨了三次。”

我听到了这个话也不很满意，心想：我这样做是尊重周恩来总理的意见，是为了保护“副帅”。这样的大事，你一个小孩子怎么能出来横加干涉！

十七、《我的一点意见》

我的检讨写好以后，由周恩来送到康生那里以后，康生借机打击报复，批了一大通，说什么“吴法宪的检讨不像话”、“不接触思想实际”等等。具体我记不清了。这样我只好写第二次检讨。又加了几句话：“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没有学好马列主义，没有很好地了解情况……。”

结果这个检讨又一次被康生批回来。我又写了第三次检讨，康生还说不行，周恩来说：“人家已经写了三次了。”看到周恩来出来说话了，康生只好说：“那好，就算了吧。”这样我的检讨才算通过。由周恩来、康生两人签名印发给全会，而且要在政治局会议上再通过一下。

1970年8月31日上午，周恩来打电话叫我到他那里去，又谈起我检讨的事情。他把毛主席写的《我的一点意见》拿给我看。这个材料我记得不全，大意是：“这个语录是陈伯达搞的，欺骗了不少的人，我和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30多年，从来没有配合过，两次上庐山，第一次他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可好了，采用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我的话是形容这位理论家（可不是野心家）的心的广大而已。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我和林彪同志共同认为，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还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是英雄们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的，我们不能和陈伯达的谎言和诡辩站在一起。”

看了《我的一点意见》，我心里就在想：陈伯达完了！但是我又感到想不通，感到不好理解。陈伯达这个人，我认识多年了。他为人胆小，处理问题不果断，甚至有些懦弱，不过处事谨慎，书生气十足，是个标准的文人。“文革”开始后，他虽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但在中央文革小组，基本上是康生、江青说了算。陈伯达在组里没有什么威信。

据我所知，陈伯达从 1939 年就开始给毛泽东当秘书，30 多年来一直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帮毛泽东写文章，为此他在延安就当了中央委员。解放后，在毛泽东“四大秘书”的班子里，陈伯达是头一个。

毛主席自己也忘了，他两次出访苏联都是陈伯达陪同的。在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斗争中，毛主席也是几次借助于陈伯达，“四清”中的《二十三条》、“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等，都是毛主席委托陈伯达搞的。毛主席还亲自点名陈伯达任中央文革组长，而正是这个中央文革后来在党内代替了中央常委办公会。是毛主席把权力交给了陈伯达，陈伯达也是为毛主席立了“大功”的。

但现在，一有了不同的意见，一有了“错误”，就说人家“30 年没有很好地合作”。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把陈伯达一直留在身边，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呢？这是怎么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见，就算总账，算老账，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让人心寒哪！

另外，说到这次庐山会议，毛泽东说的那些“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炸平庐山”等等，实际上都是不同意见的争论，而这些意见都是公开的。我们与张春桥的争论，是 8 月 13 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争论的继续，这些情况周恩来都是知道的。再说，林彪的讲话事先请示过毛主席，毛主席也是点过头的嘛！毛主席说不要点名，我们就没有点名。这怎么是“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呢？

还有，这次明明是林彪讲的“天才论”，陈伯达明明只是拥护林彪的发言，而毛主席明明是批判“天才论”，却又说：“我和林彪同志一致认为。”怎么是一致呢？这个“一致”是毛主席强加给林彪的。我心里想，毛主席的点子真多，这个话的意思是拉林彪打陈伯达，看来这次陈伯达是个牺牲品，可能还不至于搞我们。这样，我觉得心里有了一点底。

在我看了这个材料之后，周恩来又对我说：“原来，毛主席还要把你搞的‘语录’和陈伯达的一起批，是我亲自对主席说，这个材料是吴法宪写的，这样毛主席才把你的材料拿掉了。所以你还是要检讨，要保护‘副帅’。”

十八、“陈伯达的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来”

1970年8月31日下午3时，林彪在他的住处召集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和汪东兴开会。对我们说：“下午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指示，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要我和你们先打招呼，和陈伯达划清界限。毛主席说，要我先找你们开一个会议批判、揭发陈伯达。”

大约过了半小时，陈伯达来了。林彪主持会议，要我们批判陈伯达。我们和陈伯达的关系不错，在这件事情上批他，一时转不过弯子来。大家都不发言，会议冷了场。

最后还是陈伯达自己讲开了，说：“我犯了错误，连累了你们，不该给你们搞‘语录’，搞‘语录’是欺骗了你们。”我说：“‘语录’是我向你要的。我们看马列的书少，所以要你来帮忙。”陈伯达说：“你们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我们几个都说：“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经常的嘛。”结果，大家说来说去就是这几句话，批不起来。本来也没有什么可批的，因为在许多问题上我们同陈伯达的意见都一致。会议的气氛很沉闷，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我心里想，主席说“陈伯达威信太高了，所以要把他拿下来”，这是什么理由嘛！其实陈伯达的威信一点都不高。在中央文革里，他就像受气的“小媳妇”，康生、江青都是随便骂他、讽刺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后来才逐渐向林彪和我们靠拢。为了这个，毛泽东在“九大”前就指责他是“本性不会改变，本质不会改变”。看来，毛泽东主要是不高兴陈伯达同我们搞在一起。现在，林彪只有

按毛泽东的指示办，把陈伯达甩出去救我们。实际上，这样也根本救不了我们，反而让毛泽东分而治之了。这样的教训简直是太多了！

当天晚上，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破例由林彪来主持，周恩来、康生和在庐山上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各大组组长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都参加了。

大家到齐后，林彪宣布开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陈伯达的错误。康生首先发言。他揭发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自称是理论家，实际上是政治骗子。他搞分裂活动，这次庐山会议是他第一个跳出来，分裂党中央、搞宗派活动，参加‘军事俱乐部’，欺骗工农干部。把我们几个人也拉上了。总之有很多吓人的帽子，只差“现行反革命”了。

康生发完言，就是我作检讨。我先念完检讨后，表示要与陈伯达划清界限。但关于“语录”的问题，我说明是我向陈伯达要的，错误在我，不能由陈伯达负责。

我说完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发言。这个时候他们可神气了，讲话都是手舞足蹈，把陈伯达骂得一塌糊涂，说陈伯达背叛中央文革，挑拨离间、造谣哪……。一个比一个厉害，上纲上线。各省市的人很少有发言的，只有王洪文等少数几个人跟着张春桥一起表态。

会议进行中，我看见周恩来给林彪递过一个条子，条子上写了什么我不知道。后来林彪告诉我，周恩来的这个条子是要他表扬一下张春桥。周恩来是一片好心，因为张春桥在这个会上的发言只批判了陈伯达，没有涉及到我和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但是林彪没有采纳周恩来的意见，一句话都没有讲。林彪对张春桥是很有数的。会议一直开了四个小时，到午夜才告结束，把陈伯达斗了一顿。

从那以后，陈伯达就被关起来了。他就被关在庐山的一所房子里，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的人看着他，失去了自由。我和陈伯达这一别就是 11 年，一直到了 1981 年邓小平审判我们的时候，我才在法庭上见过他一次。陈伯达已于 1989 年世了。

十九、周恩来坐镇西南组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全会就开始批判陈伯达。9月1日上午，我去参加西南组的会议，这一下气氛完全不同了。小组会说是批判陈伯达，结果批起我来了。为了监督对我的批判，康生还亲自来到了西南组。

小组会开始后，他的老婆曹轶欧可是来了情绪，说：“怪不得你吴法宪身为政治局委员，在会议上讲那样的话。造谣欺骗大家，你不以为可耻吗？”我当时真是忍了又忍，心想：反正这是在党的会议上，就由她去说吧。

接着，曹轶欧又标榜起了康生和她自己。她说：“陈伯达是跟着王明的，康生同志和我是反对王明的。建国以后我们曾给毛主席写过信，提出要批判王明。我们在莫斯科就反对王明。”这时有人出来拍马屁了，说：“曹大姐，你应该向毛主席再写个报告呀。”

曹轶欧说完，云南省委副书记周某和外贸部部长李某等都跟着来指责我。对这些，我也是硬着头皮听着，不吭声。

散会以后，我给叶群打了一个电话，说：“现在西南组不是批判陈伯达，而是批判吴法宪了。”叶群对我说：“你沉住气，我报告周总理。”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给我打来电话，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把西南的情况说了说，他考虑了一下，说：“下午我来”。

下午周恩来亲自到西南组坐镇来了，康生就不到会了。会议开始后，周恩来听了一段，就说：“你们这样批判就不对头了，我们讲要批判陈伯达，没有讲要批判吴法宪。‘语录’是从陈伯达那里来的，还是要批判陈伯达。”周恩来这样一插话，会议的气氛就又变了。我很感谢周总理当时对我的保护。

西南组还有朱德、聂荣臻两位老帅和李先念等几位老同志，他们始终都没有发言，不但没有批我，连陈伯达也没有批。我当时心里很佩服这些老同志，他们不仅斗争经验丰富，城府也很深。

其它小组的会议，也是一样，除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以外，大多数的人因为不了解情况，只是听听而已，大都没有发言。

二十、九月一日的常委会和公报

陈伯达的问题批了两天，后来就没有什么进展了，本来也没有什么可批的。9月2日晚，毛泽东通知开中央常委会。林彪开完会回到住处，要叶群通知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到黄永胜的住处碰头。我们见到了叶群，她告诉我们，毛主席提议陈伯达不再批了，准备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毛泽东还提出，6日全会闭幕，散会回家。这次是康生打着大家的旗号，提出说：“大家的意见，要把庐山的问题搞清楚，不搞个水落石出，就不下山。”这时毛主席发火了，说：“要开会你康生去开吧，我是不开了。”在这种情况下，康生不吭声了。毛主席还是决定，6日全会结束，发公报。这样毛主席给了康生一记闷棍，因为康生很狂。这次会上，除了毛主席就是他了，林彪、周恩来都没有讲话。

9月4日上午，周恩来见到我说：“考虑起草全会的公报，我的意见是请张春桥、姚文元，你们那边由叶群、李作鹏参加一下，你就不用参加了。”自从“九大”我被周恩来提名为大会副秘书长以来，有关会议公报的事情我一直都参与，但这一次他让我“靠边站”了。周恩来对我很客气，生怕我有什么思想包袱，其实我早已对此有了思想准备，我马上就表示：“我参加也不好。”这样，周恩来搞了一个调和，让我们双方各派两个人来参加公报的起草。

9月4日晚，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中央军委的“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由黄永胜作了说明，然后讨论了三个小时。当时大家都被陈伯达的问题搞得很紧张，所以对这两个报告，谁也没有什么心思讨论，也就很快通过了。

接着，周恩来又提出了公报起草的人选问题。大家都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意见，由张春桥、姚文元、叶群、李作鹏四个人组成公报起草小组。其实，公报都是张春桥、姚文元的意见，叶群和李作鹏只是听，表示同意就是了。这一次公报都是些冠冕堂皇之词，对庐山会议的斗争，只字未提。

9月5日开大会，黄永胜代表中央军委作“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李先念代表国务院作“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9月6日上午，继续开大会，就以下几个问题作出决议：

- 1、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

- 2、通过了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
- 3、通过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和 1970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 4、通过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9月6日下午3时，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议由毛主席主持，首先通过了全会公报。接着，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照着吹呀！你没有读过就会上那些‘黑秀才’的当。当然，也有些是‘红秀才’哟。”这时，我想，那些“红秀才”，就是指张春桥、姚文元他们了。毛主席接着说：“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几本什么哲学史、欧洲史。人家是哪一本、第几个版本都说了，自己没有看过就上当。”

毛泽东还说：“有人想炸平庐山。我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总而言之，无非是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就是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最后，毛泽东又讲到了团结。他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同志的同意。总是团结好一些，人多一点好嘛！我们党内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现在还要闹，你有啥办法？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净，就舒服了？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还是有要闹的。总之，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好办。”

接着是康生讲话。康生以胜利者自居，神气十足地大讲了一通学习马列主义的重要性。他大概一共讲了四点：一、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定要学好，不能只学几条“语录”；二、学习马列主义，要注意联系实际；三、要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学好毛泽东思想；四、要系统的学习，不要各取所需。总之，康生的这些话，是在不点名地批判我们。

在闭幕会上还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与全会的开幕式不同，闭幕式的气氛很紧张，到会的人没有几个面带笑容。

二十一、林彪要我们见江青

全会闭幕的当天晚上，林彪带着叶群去了江青那里。这次我们打了大败仗，对林彪来说，这是包括战争时期以来的第一次。林彪去江青那里是要缓和一下气氛。江青要林彪注意保重身体，林彪也告诉江青：这次不回北京，要直接去北戴河养身体……。这些都是表面应付，实际上林彪和江青关系早已破裂了。回来以后林彪又要叶群带着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到江青那里去。这次来庐山后，我们还是第一次进江青的门。江青住的是庐山上最好的房子，原来是蒋介石住过的。这座别墅前面的阶梯较高，上去比较吃力，何况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感到有些灰溜溜的。

进门后，江青板起一副面孔来同我们握手，一见面前就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所以犯了错误。”

当时我心想：江青真是狂，不过我没有说话。我们在来之前统一了思想，这次来只听不说。叶群还特意嘱咐我们不要说话，所以，我们只是听江青一个人训话。后来，江青又追问我们：“你们向主席告过我什么状？”这话我一听就明白了，肯定是说上次她在钓鱼台找我们谈话以后，我们到毛泽东那里告她的那件事。这件事情，除了毛主席本人外，别人是不会传这个话的。一方面毛主席要我们一定不要告诉江青，另一方面自己又向江青通风报信，我真的不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一下我们只有装聋作哑，一言不发。

江青又说：“你们不听老娘的话，吃亏了吧！要是早听我的话，就不会犯错误了。”在江青说这话的时候，我看黄永胜和李作鹏两个人虽然没说一句话，可眼睛都鼓起来了。为了缓和一下空气，我说：“我这次犯了错误，对不起江青同志。”

我作了检讨，大家作哑巴，就是江青一个人说话：“你们今后要接受教训。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你们也许还要检讨。今后要多同我联系，怎么样？”我还想说几句，但黄永胜拉着我，不让我说。这样，我们没有人表态，待了半个小时，就出来了。

回去的路上，黄永胜对我说：“这个时候你还说什么，反正以后够我们受的了，还不知道要检讨多少回呢？”李作鹏也说：“从此以后没有完，一直到打倒为止。”这话让李作鹏说中了。

这天晚上，我们一起回到黃永胜的住处。这时，各省、市和各大军区的同志来看黃总长。但是对我、李从鹏和邱会作就不同了，连过去比较熟悉的一些同志，也不敢来看我们了。大家表面比较客气，但是思想上都比较紧张。

二十二、下山

1970年9月6日晚上，我想到下山的飞机还没有安排，就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周恩来说：“请把胡萍叫来，我直接安排。”我说：“胡萍只是一个副参谋长，最好还是由王辉球、邝任农他们负责一下，他们两个你也熟悉。把他们两个留在庐山，替你安排，把曾国华放在九江机场指挥。”周恩来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打完电话，我就把王辉球、邝任农、曾国华找来，一起布置了用飞机疏散下山人员的问题。我要他们对这一事情各负其责，一切听从周恩来的安排。然后，他们三人就分散到九江和南昌机场指挥。

下山的时候和上山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上山的时候是周恩来放手全权由我来安排的。但是下山的事，周恩来不叫我插手了。由于这次庐山上的情况，我感到周恩来已经和我疏远了。

9月7日，根据周恩来的安排，黃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同乘一架飞机回北京。那一天，恰巧林彪和叶群走在我们的前面，前来送行的还有程世清，他是东道主。我们上了林彪的飞机，当时林彪和叶群的情绪都很好，由叶群安排我们和林彪一起照了相，叶群还开了几句玩笑，所以照片上大家都是面带笑容。以后见到有关材料说我们这张照片是“要进一步加强反革命勾结伺机反扑。”

送走了林彪、叶群，我们又和程世清一起合影留念告别。在飞机上，我们几个人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在庐山，我们经历了一次残酷的斗争。我从8月17日上庐山到9月7日下山，一共是18天。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最难过，最倒霉的18天，整天忙于挨斗，忙于被追查。

我这个人有一点迷信，我发牢骚说：“第一天上山就撞了车，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上山时一下撞死，摔死的好。”庐山这个地方上不得。1959年在庐山整掉了彭德怀、黃克诚；这一次又整掉了陈伯达，我们也挨了整，下一次还不知道

轮到谁。我在庐山上作了三次检讨，还是没有过关。我想了想，这几天真像是一场梦，怎么会发生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九大”前后，我们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人的矛盾逐渐的公开化了，在一系列的事情上，如在稳定军队的问题上；发展全国经济的问题上；文艺政策的问题……，毛主席都公开的批评了江青，而站在我们一边。尤其是汪东兴多次传来毛主席的话，都是支持我们的嘛！汪东兴还再三的对我们说：“他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是不代表毛主席的。”

再就是关于设国家主席，那还不是毛主席自己说的，他要我们讨论一下是否设国家主席，还说要设国家主席也是林彪同志当。当时在我的思想上，还是想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身体不好，不一定当得了国家主席。这件事，要不是毛主席的意见，我们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再说，除了华北组的讨论和那个简报外，其它小组的情况还是比较正常的嘛！这比起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判斗争李富春、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几个老帅和副总理的情况差远了。那次会议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是指着鼻子，面对面的骂这几个老帅和副总理的，足足斗了一个星期。对此，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也没有说过一句“过火”的话。而这次我们不点名地批一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就不得了了，捅了马蜂窝了。我心里真是不明白，毛主席怎么会一屁股坐到江青、康生、张春桥一边去了？

黄永胜他们几个都安慰我说：“不要再检讨了，再检讨也是一样。”我说：“我检讨只涉及自己，和你们没有联系。毛主席说了，犯了错误允许改嘛。”他们说：“看着吧，这件事情没有完。”我提出了几个原则：一、坚持山上山下没有联系，强调问题是我 8 月 14 日的电话报告引起的，由我主动承担现任；二、我的检讨，只讲自己，不涉及别人；三、黄不作检讨，李作鹏、邱会作是否作检讨看情况定；四、我、李作鹏、邱会作也不相互埋怨。总之无论如何不要涉及林彪、叶群，也不要涉及到黄永胜，这是大前提。”临下飞机前，他们三人又一次劝我说：“不要多说话，言多必有失，要沉住气。”

想起解放前，自己打了几十年的仗，解放后在空军也工作了十几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翻船，我深深地后悔自己不该到中央来，如果我仍然在空军工作的

话也不会有如此的遭遇。我想还是林彪说得对，我们这些“丘八”不懂政治，斗不过他们。

一直到 1989 年，也就是庐山九届二中全会 19 年后，我才有机会看到中央在“九一三事件”后给我们定性的文件，说是我们进行地下活动，制造谣言，欺骗同志，向党发动了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进攻，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其性质是一次未遂的反革命政变。这个结论未免太“高抬”我们了。我想这些应该是康生、江青、张春桥给我们下的“结论”。

到了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对我们的说法又改变了，说这次庐山会议是林彪、我们和康生、江青一伙相互勾结的“狗咬狗”的斗争。这样，到目前为止，对庐山会议下结论都是为了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都未能客观地反映真实情况。

实实在在地说，我们的动机既不是反党，也不反毛主席，更不是反对“九大”路线，我们当时的矛头是对着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的。林彪一再说过，对康生不能点名，所以我们只是想轰一轰张春桥、姚文元而已。所谓“天才论”，“设国家主席”之争也是对着张春桥、姚文元来的，而决不是对着毛主席的。

我个人的感觉，林彪当时对毛主席是没有“二心”的。不过林彪看不起江青、康生，更不用说张春桥、姚文元了。这不仅仅是林彪，我们同江青、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个人之间也有许多恩怨。在对待“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当时中央政治局里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严重分歧。从“九大”前后开始，在对待稳定全国和军队秩序的问题上；在继续“抓革命”还是“促生产”的问题上；在对待文化艺术中是“样板戏”一统天下还是“百花齐放”问题上；对待老干部和造反派的问题上等等，分歧日益公开和加剧。

而这一切，当时周恩来和汪东兴他们是十分清楚的。一切大小问题我们都是及时向周恩来汇报，而他也是一再表示赞成和支持我们的。因为周恩来掌握全盘工作，许多问题上无法和康生、江青合作，因而经常借重和依赖于我们去开展工作。因此，我们当时和周恩来之间的配合是十分默契的。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公开支持了我们而批评了江青。还有汪东兴不断地给我们打气吹风，我们都以为这是毛主席的声音，一些表面上的假

象造成了我们的一种错觉。这正是我们政治上的幼稚的表现。当然这里也有个人恩怨，因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九大”以后就逐渐地把矛头指向了林彪，但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坚决站在林彪一边的，这也是在庐山上爆发激烈斗争的一个焦点。

我们当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竟然会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边。

现在想起来，毛泽东在庐山上搞我们，这里面也是“事出有因”的。“九大”以前，由于“文革”的冲击，所有的地方政权基本上瘫痪了。毛泽东决定军队以“三支二军”的形式，接管了各级地方政权。毛泽东靠军队稳定了全国秩序，从而使军队在国家事务中起了一种特殊重要的作用。这种情况是当时客观条件造成的。当时如果没有军队的介入，很难设想国家将是一种怎样的情况。因此，在“九大”中央委员会中，军队干部占了一大半，当时的政治局共 25 人，军队干部占 14 人。军队的势力越来越大，林彪个人的威望也越来越高。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林彪一番讲话，整个全会一哄而起，连毛泽东都说这是“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毛主席几次说：“陈伯达的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来。”现在想起来，不是陈伯达而是林彪的威信太高了。毛主席看到林彪和我们对江青及“文革”日益增长的对立情绪，感到不安。据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曾多次向毛主席进言说：军队现在的势力太大了，这样下去是一个威胁……。这些因素是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拨乱反正”，决心把林彪和我们逐步“铲除”的原因。下山以后毛主席步步紧逼也是由此而来。现在看来，毛主席本来就站在江青他们一边，是要坚决地保卫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们同江青等人在庐山上的斗争，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泽东是决不会放过我们的。

当然，我们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会认识到的。当时我们都认为，我们这些人，大老粗，没有政治生活的经验，所以这次上了当，翻了船。这也就是李作鹏在飞机上说的：“我们这些人太不适应中央的政治生活了！”

《邱会作回忆录》

第三十二章 庐山战火

不设国家主席目的就是不给林彪留位子

早在 1968 年 3 月“杨余傅事件”发生以后，汪东兴就和我们走近了，过去他还摆点“高高在上”的小架子，九大以后他就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了。我说的站在一起，是指对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伙而言的。

1970 年 3 月 8 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由周总理主持，其主要内容是听取汪东兴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汪是专程从武汉（主席当时在武汉）赶回来的。汪说：“毛主席考虑要开四届人大了，请总理和政治局的同志们研究一下，九大召开一年了，斗批改正在进行，有些政府机构可以考虑边整改边恢复。主席还说，战备问题也要研究一下。……”

接着汪东兴还是说主席的指示：“召开人大就有一个修改宪法的问题，可以成立一个修改宪法的小组。这里必然涉及到国家主席的问题，国家主席要不要，我的意见是不要。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我是不当这个国家主席的，那么谁来当呢，只有林彪同志来当。”主席要改变国家体制，而且是和全世界都不同的国家体制，这么大的事先没有和林彪、周总理商量，更没有让政治局拿出几个方案，供他决断。

我清楚地记得，在汪东兴说“不设国家主席”的时候，总理有点愕然，他抬头看了一下汪；当汪说到“只有林彪同志来当”的时候，总理看上去有些欣慰的样子。我当时的认识是：主席对林彪这个接班人很关心，很周到。其实，我的想法和主席的打算相差十万八千里。散会时，汪还真有些余兴未尽的样子，对着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我说：“走走走，时间还早，到我那里再坐坐。”我们都欣然同意了。

在汪东兴家里，大家开始也是扯乱谈。后来，吴法宪又请汪去核实刚才在会上讲的“要设国家主席，毛不当，要林彪来当”的话，汪东兴很认真地又重复了一遍，听后大家都很高兴。我们要起身走时，汪说：“不要着急，搞点东西来吃。”不一会，工作人员端上两盘子红薯，吴胖子和叶群吃了，我没有吃。我说：“我一看见红薯胃里就反酸水，给我们吃碗面条也好。”汪说：“你尝尝就知道了，甜得很。”

3月8号的政治局会议以后，立即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小组负责修改宪法，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一个小组负责组织会议的工作，由总理、黄永胜、张春桥、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由总理抓总。因为我当时主管援越、援阿（尔巴尼亚）、援罗（马尼亚）的具体工作，任务很重，两个小组的工作我都没有参加。

3月中旬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问题，主要是确定参加会议的人员，同时也讨论了修改宪法工作小组请示的几个问题。讨论的都是一般性的问题，比如新的宪法要比1954年的宪法大大压缩，要短。并且要求修改宪法工作小组月底要拿出草稿来。会上没有讨论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更没有要讨论谁当国家主席。

林彪知道了毛主席的意见后，立即表示：我认为国家主席还是要设，并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让秘书给毛主席那里打了电话，但主席并没有正面表态，只让秘书打电话问候林彪。4月11日，由林彪口述，秘书记录后向政治局提出了他的三条意见：“1、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2、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问题都不大。3、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职务。”

3月8日，汪东兴传达的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政治局一致同意了，这种同意是拥护毛主席的惯性，大家并没有深想。现在林彪的意见来了，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唸了，大家又都同意林彪设国家主席并由主席来担任的意见，包括江青在内。我现在都认为，林彪的意见是正确的、中肯的，是维护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的，也是对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不妥想法敢于提出自己不同意见的，在“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不是毛、林之间有什么分歧，而是毛和大家的意见相左，林和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现在想看来，林彪很快就提出自己的意见，是他知道毛提出让他当国家主席未必是真心，就像开九大时主席让林当大会主席团主席是一个样的，林考虑问题是深思熟虑的，他不愿让主席牵着鼻子走，更何况林的身体根本当不了国家主席。

主席很快就对林的建议（政治局同意林彪意见的报告）作了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是设国家主席这个体制不妥呢，还是让他当国家主席的建议不妥，主席自己也没讲清楚。

叶群告诉我们，林提出三条意见后，大概是 4 月 25 号，主席在路过苏州时，林和叶还到专列上去看了主席，让主席住下，并给主席腾出了林住的南园宾馆的房子，主席说不住了。他们交谈得很好，主席还对林说起黄、吴、李、邱，并大加赞扬说：我就是信任这几个跟我南征北战的红小鬼。那天正好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叶群让主席听了人造卫星上的《东方红》乐曲录音，毛主席很高兴。他们之间没有再提起有关国家主席的事。既然毛不同意林的意见，当面却不说。

可是，时隔不久，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他不当国家主席，主席还讲了一个典故，大意是：三国时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想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主席讲完以后大家都笑了，我当时的理解，一是主席很谦虚，二是主席虽然又上了一线，但他还是不想当国家主席，不想当国家主席的原因是不愿管具体事务，愿意多考虑重大问题，具体工作由林彪和总理担起来，一个当国家主席，一个当总理。现在想起来，我的意见真是幼稚可笑。其实主席讲的这个典故，还是说他不当国家主席，并没有说不设国家主席。我清楚地记得，主席虽然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但后来主席也说过，叫董老当，叫陈永贵当，叫工农兵当等等。不设怎么当呢？！总之，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主席的态度也是多次反复的。

5 月中旬，军委办事组去向林彪汇报工作，当扯到国家主席问题时，林彪说得非常中肯，他说：“国家主席还是要设的，但只能主席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没有国家元首是不成的，名不正，言不顺嘛。”我们提到毛主席的意思是林彪可以当国家主席时，林彪立即说：“这种话你们不能在我这里说！我不能当这个主席，你们以后也不要再提，还是我们的毛主席来当。我身体不好，出个门都要下好大的决心，如设副主席我也不能当。”

当时我们几个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根本没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事，虽然，此期间主席也提出过不设国家主席，他也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但我们并没有认识到主席的心思，汪东兴 3 月 8 号的话给我们印象很深，谁当国家主席也没感到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毛主席当很正常，毛主席不当也没少了什么；毛主席不当，由

林彪来当也很正常，也没觉得林多了什么，因此主席怎么说都认为是他的谦虚。林彪则不然，主席的心思林彪很快就明白了，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主要是不想让林彪当，不设国家主席目的就是不给林彪留位子。

总理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是费了苦心的。7月上旬，总理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了主席的指示，主要是准备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事。会后中央发出《通知》，在7月17日到22日在北京召开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在会议期间，主席说过“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不要因人设事。”因此总理也说：“可以考虑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怕言之有误，他还是反复强调新宪法主要是突出“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全军的最高统帅”，这等于政治局的意见又被否定了，又顺从了主席个人的意见。总理的心真累。

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看得最清楚，他只提了一次建议，以后再也没有发表意见。关于建议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几次都是来自下面，如3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如在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如7月中旬的宪法修改小组全体会议。我认为总理和康生也看清了，但他们为了国家体制不要搞得太扭曲，因此在庐山，8月22日的常委会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还是又一次提出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陈伯达讲后，林彪只是附和他们，并没有发表具体意见。可以看出，后来扣在我们头上的“设国家主席是反动的政治纲领”，这个“政治纲领”，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林彪四个常委都拥护。

毛主席在会上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主席最后的结论，还是不当国家主席，对不设国家主席没有定论，不过主席不愿意要国家主席，谁还敢要。林彪并没有出来劝几个常委来维护主席的意见，因此主席早就不高兴了。即便是这样，在当晚传达常委会精神的时候，总理仍没有传达主席不同意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康生是更能揣摩主席的，但他在开幕式上，又

提设国家主席，并建议毛主席当主席，他竟然还说：“如果毛主席不当，请林彪当国家主席。”

林彪同意设国家主席，全国基层同意设国家主席，几个常委都同意设国家主席，全党全国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从国家体制去考虑，建议设国家主席。只有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虽然他说是为改变国家体制，实际上主席的目的就是不想让林彪当。也许毛主席把“国家主席问题”和接班人问题连在一起去考虑了。毛主席从七大开始就考虑接班人，立了刘少奇，几年后毛主席就对刘不满，因高岗问题，刘少奇躲过一劫，文革重新算账，给刘戴了“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死于非命；林彪跟随毛主席几十年，九大刚立为接班人，只一年工夫，主席又不放心，又不满意。其实，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主席立林为接班人，林彪不想当，打了报告，主席硬是让他当。林不会觊觎国家主席这个虚职，去抢一张空头支票干什么？！如果国家主席是有实权的职务，毛主席是绝对不会放过的。可是，毛主席在1971年8月南巡时却说，“有人看我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九一三”以后，主席又说，“设国家主席是他们的政治纲领”，这就是毛主席不实事求是了。至于“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这句话本来是汪东兴说的，这本是一句很普通的话，但为了“说明”林彪有野心，就去搞吴法宪，结果吴胖子被迫把“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说成是叶群说的了。吴法宪乱说一顿，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也给林、叶栽了赃。“九一三”之后，毛主席就是利用吴的这句假话，发出多个中央文件。庐山会议本来是几乎全体的中央委员对江青一伙的不满，由此引发出对文革的不满。结果毛主席却说成林彪有野心，想当国家主席，黄、吴、李、邱和军队干部就是为了林彪的野心，才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其实，我们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几乎没提国家主席。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根本没有提“国家主席”，毛主席对我们的“政治纲领”都不批判，不是没有批到点子上吗！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我们军委办事组的黄、吴、叶、李、邱几个人都做了检讨。在我们的检讨中，根本没有检讨“设国家主席”问题。试想，如果“设国家主席”是我们的“政治纲领”，我们不针对自己的政治纲领来写检讨，能行吗？！主席那里能过关吗？对于我们的检讨，主席批示“很好”，有了批示，都过了关，主席还接见了我们并风趣地谈了话。“九一三”之后，毛主席说我们是“反党集团”，“称天才”是

我们的“理论纲领”，“设国家主席”是我们的“政治纲领”，都不是实事求是的。

关于国家主席问题，过去是以主席的错误为正确的标杆，现在国家主席早恢复了，杨尚昆、李先念几任国家主席都当了，但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他们还是误导人们去想：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提议设，因此林反对毛主席，林错了，甚至是有野心。为什么不反过来想，毛为了不让林当国家主席，竟提出不设，破坏国家原有的体制，也不让林当。其实，林并不想要国家主席这个虚职，但林希望维护国家体制。

主席通过江青拉我们

九大以后，黄、吴、李、邱进了政治局，并参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总理从爱护、关心、教育我们出发，和我们讲了几次什么是“中央政治”以及属于“中央政治”范围里的问题。

什么是“中央政治”？总理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

我们听后都笑了起来，本以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东西，怎么“中央政治”就是这么一句普通的话。我起先对总理的话理解不深，后来有所理解，还是不够深，等到“九一三”被打倒以后，我才真正认识到，总理说得太高明，太深刻了。简单明了恰到好处。六七年我被抢救出来回到西山时，一次叶帅对我说：“总理是个很顾全大局，又很能抓住问题的关键，他说：‘叶参座，委曲求全不是贬义词。关键是把军队院校的人劝回去，把军队在搞乱了，我的工作就更难了。’”

总理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

我们对江青的蔑视，总理看得很清楚，他内心是支持我们的，但他也非常清楚，这样下去也是不行的，因此他用“中央政治”这个说法来教育我们。总理的诚心诚意和大局观念，使我们也大有领悟。一、对江青的态度不是对她个人如何如何，而是和主席连在一起。二、主席不是很反对江青，我们没看清，受汪东兴误导很大。三、不能感情用事，而没有城府。

我们这些人从心眼里认为林总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因为毛主席和林总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是非常亲密的，林总为毛主席打江山，战功显赫，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毛主席向林总“起事”时，我们就搞不清毛主席是什么用意，也尽量往好的方面去想，毛主席的确是一个大政治家，他说出来的的话，向左向右都可以理解，而且主席每次说完也在等着看，对他有利则前进，否则就当成说了点幽默，所以毛主席九大以后说了很多对林总的话，我们并不是看得很重，直到庐山会议才如梦初醒（或半醒）。诸如毛主席说“四个伟大讨嫌”，去掉“三个副词”，去掉大会堂的语录，“缔造的不能指挥呀”，等等。我们没有往毛主席和林总之间有隙处想，反而认为是毛主席谦虚。我们没有真正懂得中央政治，在中央的政治斗争中是幼稚的。当然，毛主席和江青的真实关系我们也没有看清楚。

后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以及会后主席一系列的言行，使我对中央政治越来越懂得多一些了，但是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懂也没有用了。

从 1969 年底以来，江青找黄、吴、李和我谈了几次话，前几次谈话都是骂陈伯达的，而且把陈伯达骂得一无是处。我们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说：“她这个人，叫你去如果不去麻烦更大。你们去只带着耳朵就是了。”

1970 年 5 月 17 日，江青又叫我们去钓鱼台 11 楼，这次可大不一样了，江青主要是攻击总理。这次去，除了黄、吴、李和我之外，还有谢富治、李德生、姚文元。江青上来就说：“总理也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好人，有两次大的路线错误，一次是把苏区的百分之九十搞没了；第二次是喊蒋介石万岁，一切经过蒋介石，跟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另外，解放后还有一个马鞍形，就是经济建设的‘两高一下’。”江青就这样说了一串一串的事情。

当时，黄永胜越听越激动，他突然对江青说：“总理辛辛苦苦领导我们工作，你怎么这样说他？！我们对过去的问题不了解。”黄永胜说完就提着皮包往外走，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搞得江青愕然。我和李作鹏坐得靠后一点，我们当然是支持黄永胜的，我们也附议了黄的话，也就站起来走了。吴法宪坐得靠前一点，他也站起来嘟囔地说：“叫我们来就是搞这个？！”说完也站起来走了。

黄永胜走到门口，江青就向黄永胜大声说：“哎，还有明天《解放军报》的事！”黄没有理她。

有关《解放军报》的事是这样的，郭沫若给江青写了一首颂扬样板戏的诗，准备明天在《解放军报》发表，李德生把校样都拿来了。这时李德生也急了，他说：“黄总长，不行呀，还有明天《解放军报》的问题。”黄永胜说：“你是总政主任，这个问题你决定，你自己处理。”

我们出来以后到了毛家湾，向林总作了汇报。林总很生气，他说：“江青攻击过中央常委的大多数，今天是直接攻击总理，这个事情你们应当向毛主席报告清楚。”

这时吴法宪就给汪东兴打了电话，说有紧急事情要向毛主席汇报，并简单向汪说了一下，汪一听是对着江青的，立即去报告主席，主席同意了，并叫马上来。本来是黄、吴、李、邱一起去，叶群说都去不好，不要兴师动众，最后林总说黄、吴一起去。黄、吴走了以后，我和李作鹏、叶群到三座门去等。

不久，黄、吴就回到三座门来了。黄永胜传达了毛主席对他们说的几句话，当黄永胜向主席汇报了江青攻击总理的事情后，毛主席说的第一句话是：“一个政治局委员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一些问题是不可以的。”第二句话是：“你们知道江青也是一霸。”第三句话是：“你们今天同我说的这些问题，不要叫江青知道，我也不跟她说。他要是知道了，你们就不好混了。”这几句就是毛主席的原话，黄永胜的热脸蛋贴到主席的凉屁股上，主席对江青攻击总理不以为然。现在想起来，总理告诫的中央政治，我们还没有入门。

这时我提了一个建议说：“你们两个应当去找总理说说这个问题。如果总理先知道了，咱们还没说，总理会伤心的。”黄永胜认为我说得对，但他考虑了一下说：“老邱还是你去，我不是不想去，你们想想，我刚从主席那里出来，又去找总理有些不妥。”大家都认为黄说得对。黄有点中央政治了。

大概 7 点多钟，我就到了中南海西花厅总理的家里，我把整个过程都向总理说了。总理对江青的话、主席的话都不吃惊，但听我的话时很激动，眼眶都是湿润的，总理拉着我的手连说了两句：“老同志就是老同志！”接着总理又说：“老同志是能够理解大事的！”我望着总理慈祥的面孔和疲惫的双眼心里也是很激动的。

不久，李先念跑来找总理，总理还有事，我就没有和总理一起去大会堂开会，我先走了。

过去我总是把这件事孤立地看，并总以为是江青目中无人，口出狂言。现在看来，这件事主席事前可能是知道的，否则江青没有这么大的胆量。另外，这也是主席通过江青在拉我们，主席希望我们按照他的意图来进行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主席不是没有拉动我们，而是我们脑子里根本没有这根弦。

吴法宪与张春桥的争论

我看到过汪东兴写的一本书，叫做《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主要是讲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直到“九一三”这段时间的事情，可以说汪嘴里吐出来的东西，在关键的问题上都是假话。其实，毛、林交恶造成的悲剧，汪东兴是要负重要责任的；在当时恶劣、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总理、黄永胜、李先念和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也包括汪东兴在内，这些当时在台上工作的同志与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那些人的斗争，很多是在原则问题上不可调和的斗争，这些斗争在思想基础上，和所谓的“二月逆流”是一个样子的，那就是：拥护毛主席，不理解文革，厌恶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这些中央文革的家伙。而且这些斗争和矛盾，很多缘由都和汪东兴有直接关系，汪东兴不能实事求是地讲清事情的本来面目，口口声声是维护毛主席，实际上是由假话保护他自己。

1970 年 8 月 13 日，在讨论宪法的时候，吴法宪与张春桥确有争论，而且争论得很厉害，吴法宪在办事组讲得清清楚楚。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叶群、李作鹏和我都坚决支持吴法宪，林彪也支持他。

张春桥在会上提出，把宪法讨论稿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等词句删掉。张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连赫鲁晓夫都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吴法宪一听就火了，张春桥那个傲慢和阴阳怪气的劲头实在可憎，吴坚决反对张春桥。他告诉张春桥“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同时，吴认为三个副词是冲着林彪来的，张春桥和吴法宪都动了气。

陈伯达也是修改宪法小组的，他表示支持吴法宪。陈是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者，修改宪法本应由他牵头，但主席没让他干，而让康生、张春桥主办。因为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时候，他起草的稿子提出发展生产的意见（林彪支持了陈的

意见），没有突出继续革命的思想，毛主席没有用陈伯达的稿子，此后毛主席就更冷落陈，而对康生、张春桥表示青睐。

会后，吴法宪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周听后对吴法宪的意见表示支持，周总理明确地说：他从来没有听毛主席说过“赫鲁晓夫天才、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一个讽刺”的话。周总理还说他同意设国家主席。

周总理关于同意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不止和我们说过一次。有一次汪东兴也在，总理说主席当国家主席是肯定的，副帅当国家副主席也是肯定的。但主席不愿意参加一般的国务活动，副帅身体不好，也不能多参加活动，那可以设几个副主席，出国访问也好，接待人家的国家元首也好，都由副主席来出席。汪东兴说：总理想得很周到，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那么难解决，主席愿意见外宾，主要的来宾主席也都见了，主席见外宾都很高兴。我们也认为总理和汪东兴说得很好。

关于这次会上的争论，吴法宪也报告了叶群，叶群很快就传回了林彪的话：吴胖子说得好，他立了功，抓住了张春桥的尾巴。当然，张春桥会后立即报告了江青，江青又详报了毛主席。

两天之后，8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对宪法修改草案最后定稿。会前，军委办事组特别召回了在外地检查工作的李作鹏，以加强战斗力量。叶群没有参加会议，她从北戴河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等人，让他们准备好，在会上跟张春桥斗。周总理估计会上要争斗起来，他也做了思想准备。周恩来是支持林彪，支持军委办事组，支持吴法宪的。周总理的思想是，这些评价是正确的，写就写上嘛，张春桥又在人为添乱。周恩来最讨厌人为添乱，使正常工作难以进行。

周总理在会上是很小心的，他拿着宪法草案，一条一条地念，念一条讨论通过一条，念下面一条时，总理总是提醒大家“听好啊！”但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当总理念到“设国家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时，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在会上一言不发，根本没有争起来，他们表示同意，总理似乎感到有些奇怪，他很恭敬地问江青，“江青同志的意见呢？”没想到从来是颐指气使的江青，竟很和气地说，“大家讨论”。这样带有“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些词句的宪法修改草案被顺利通过了。

周恩来如释重负，终于松了一口气。

林彪知道会议的情况后却紧抽了一口气，林彪太了解毛泽东了，会议出现这样的结果，肯定有人点拨张春桥、江青等人。他认为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会有更大的斗争。

历史证明，这次会议的结果，是毛泽东主席以虚掩实的战术所致，他搞不清林彪在想什么？毛说不设国家主席，林主张设；毛说他不当国家主席，林推举毛当；连同 1970 年 7 月下旬讨论“八一”建军节社论时的争论，这是第一次毛主席和林彪把不同意见放在了大家面前。再加上大家对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中央文革一班人的怨气，毛泽东不能没有更深的考虑……谁对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利呢？谁对捍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有利呢？毛主席对张春桥表示青睐。林彪也一直想抓住机会给文革降温。虽然，林是被毛主席拖进文革的，但林毕竟在文革初期说了拥护毛、拥护文革的话，现在文革搞成这个样子，林是不愿意的。降温关键在于削弱中央文革的“极左”路线，这样才有条件给文革降温，党内有了思想基础，林就好在适当的时机建议毛泽东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但是，在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虽然认识到了这场斗争，并没有把握好怎么斗争，他为了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垮台了，这是大家和林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毛主席却抓住这次机会，削弱了林彪，也彻底改变了林彪的命运。

高高兴兴上山

1970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6 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省庐山举行，故称庐山会议。1959 年也有一次庐山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罢了彭德怀元帅的官，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定为反党集团。这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也是一次出奇的会议，引起了党内一场重大斗争，并导致后来重写党内历史。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成为毛泽东的死敌；“接班人”成为“叛徒卖国贼”；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浴血奋战、一身枪伤的林彪成了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首领。我的冤案，也是从这次会议开始的。

这次会议所要审议的几个报告，在会前都形成了文件，并经中央政治局审定通过了。会议无非是要举手通过这几个要审议的文件，因此，大家称这次会议是“盖橡皮图章”的会议，还有人说是“读书休息”的会议。会议期间能有休息的

机会，我内心很高兴，文革以来，工作十分繁忙，精神紧张，又十分劳累，一直得不到休息。

在会前的半个月左右，我就知道毛主席的决定，全会在庐山举行。对此，心里很高兴，只待会期的到来！但临要上庐山的前三天，即 8 月 18 日，黄永胜通知我说：“周总理决定，全会初期你带阎仲川留守北京。纪登奎也留在北京。待全会讨论 1971 年国民经济计划时，由李作鹏下山来换你上山。”对周总理的决定，我没有什么意见。这一决定，到 20 日又变了。毛主席是 8 月 19 日到庐山的，林彪和周总理是 20 号到的，毛主席听了总理的汇报后指示说：“邱会作不留北京，黄永胜留守北京。”

我对这个变化感到很高兴！

我同李作鹏及军委办事组的工作人员，于 8 月 21 日一起上庐山了。在盛暑的夏季，北京虽然不很热，但也并不舒服。经过六小时的航程就可到达江西庐山这样的避暑胜地，自然心中很高兴！同时，我也知道，在参加会议期间，不会有繁重的工作，有时间可以游玩游玩庐山了。我虽然去过两次庐山，但并不熟悉，这次大概可以了解庐山的“真面目”了。因此，从北京出发时，心里什么想法也没有，身上什么负担也没有，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北京。

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留京“看家”了，吴法宪 8 月 19 日已陪江青上山，办事组剩下的主要成员就是李作鹏和我两个人。江青外出，总要找个军队的负责人陪着，搞不清她是什么意思，总理每次都给我们做工作，让我们把这个“任务”完成好。

早饭后，我从家里从容地到达北京西郊机场，李作鹏也几乎同时到达。由于九江机场停不了大飞机，我们乘坐的专机是伊尔 18 型大飞机，由北京先到达安庆机场，由安庆换乘安 24 小飞机。到九江之后，换乘汽车上山。在安庆、九江我们都受到了当地部队的热情接待。当时的军委办事组在军队的威信很高，我们出门，愁的是部队同志迎接的礼遇太高了！

在九江机场看到吴法宪，他不是来迎接我们的，他是陪江青上庐山后，又回到九江机场指挥空中运输的。参加全会的各路人马都是乘飞机来的，他今天亲自来指挥，吴这个人对工作一向是很负责任的。

在九江，我和李作鹏分乘汽车上山。军委办事组成员（李德生住在国务院的住区）和叶、陈、聂、徐四个元帅住在福州军区疗养院，我们住得很近，相距最多不过百米，来了以后，我和李作鹏就一一看望了四位老帅，他们都很高兴。在叶帅那里坐的时间稍长一点，他说他也刚到，对我们的拜访，叶帅很高兴。他特别说到：“1967 年我们出了点问题（指“二月逆流”），我有事给杨成武打电话，他不接，说病了，可晚上看电视他在接见外宾，这个人，变得真快。”

我们在山上住下之后，各方面都感到很舒适，江西省军区，省革委会对招待工作组织得很好。军委办事组的人除了黄永胜、李德生之外，都是江西人。我们看到家乡的工作做得很好，心里很高兴！

晚上无事，我和李作鹏来到吴法宪的住处吹牛皮，吴说：“差点见不到你们了。”我们忙问是怎么回事？吴说：“翻了车。”吴站着边说边比试。他接着说：“主席是 8 月 19 日乘专列到达九江的，我和程世清等人前去迎接，当日主席即换乘汽车上了庐山。汪东兴是随从毛主席到的，当他见到我和程二人后，只做了简单寒暄，就很高兴地说：‘在讨论宪法时，要提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呢？’（意即林的位置已在周总理之前了，再担任副总理，显然不合适了。）”

我们三人吹了一会，就一起散步去看林总。我们是九点以后才去的。因为林总早休息了，就没有去打扰，叶群接待了我们。这次是礼节性拜访，我们在那里闲谈到次日一时左右回来的。

叶群同我们一起，在一个不大的客厅里谈起来了。她说：我们 20 日从北戴河来，比你们早一天到。从准备好的文件来看，这次会议是没有什么重要工作要做的。我们大家都要好好休息一下，要利用这个好机会，看一下庐山怎样？我可以当个导游。我们当场还约好了，第二天下午 4 点一起游仙人洞。

临走时，在叶群的会客室里，叶、吴、李、邱挤在一个长沙发上，照了一张相。

政治局常委会

8 月 22 日上午休息，没有办什么事，也没有什么人来走动。由于没有事，昨晚本想睡早一点，但没有这种福气，睡不着，22 日这天比在北京起得还早。

午休之后，吴、李和我一起出动游玩仙人洞。我们到了仙人洞就同叶群会合在一起了，照了几张像。我们去游仙人洞的时间晚了一些，到达的时候就暮色来临了。本来准备多照几张相片，但光线不够用了，叶、吴、李和我只在仙人洞合照了几张相片。（这张相片，后来也成为罪证）

大家在仙人洞休息了一会儿，招待我们的人，还上了庐山的云雾茶。我们坐下之后，很自然就谈起中央文革这些人来了，这都是我们的习惯了。这次谈的主要吴法宪做了“女皇副官”，即他陪江青上庐山的一些笑话。

我们说：“吴胖子真有福气，已经做了女皇副官，不知道是否加了赏金。”

叶群笑着说：“你们不要把胖子气死了。他也是没有办法呀！”

我们说：对这样的人（指江青）就是要口是心非。如表面上对她不好，是要挨骂的，划不来；装着对她恭恭敬敬的，她会说你好话。江青不是很喜欢吴胖子吗？

吴法宪说：“我当空军司令倒了霉！”

大家哄笑一阵就算完了。天黑了，虽然游兴未尽，也只好回家了。

8月22日，毛主席在他的住处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林、周、陈伯达、康生出席了会议。会议的目的，主要是毛主席和各常委碰碰头，并确认一下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在政治局常委会中，还专门讨论了有关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是本次常委会最重要的内容。“…

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之首、国家主席。”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是毛主席自己提出来的，各省、市、自治区领导班子都是按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实现了党的省委书记都兼任省革委会主任的一元化领导，党的主席兼任国家主席也是一元化的领导吧。毛绝对没想到在全会还没有召开，四个常委的就一致提议设国家主席，与林副主席的提议是一致的。因此他刚一上山，就气鼓鼓的了。尤其是他甚为倚重的康生，也主张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主席在会上说：“……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国家主席”。毛泽东还警告说：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失败的会。毛讲话的弦外之音就是，你们不听我的意见就是破坏党的团结。后来毛泽东还说过：“关于国家主席，这个不要再提了。如果在继续这

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我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可是，为什么不设“国家主席”，毛一直没有讲，一直没有给大家最高指示和“谆谆教导”。

晚上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主要是总理、陈伯达、康生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精神。我记得总理只是说了会议怎样开的问题，并没有说什么大的问题。会议的议程早已定了，会上当然不用再说这个问题，总理在晚上的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传达常委会上，主席和四常委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的态度。但是可以看出，后来扣在我们头上的“设国家主席是反动的政治纲领”，而这个“政治纲领”，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林彪四个常委都拥护，绝大多数中央委员也拥护。

总理说：“今天下午，在主席那里开了常委会。确定全会明天下午 3 点开幕。主席同林副主席说，他以前说过的那些问题（没有点明什么问题。后来汪东兴补充发言时给点出来了），这次好好说一下，这次中央全会除议程之外，应当谈点实质的问题。明天下午 3 点是开幕式，会议从 24 日开始，主要是小组会。我们大家都要参加小组会议，身体不好的，还是以休息为主，其他人也不要放弃这次休息的好机会。”

吴、李和我同时提出：“我们最希望总理能休息一下。”

总理讲完后，对汪东兴说：“你来做补充。”

汪东兴接着发了言，他说：“我首先声明，我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列席了中央常委会。主席在会上谈的问题，我做点补充传达。主席说：‘九大以后，有的人在后面搞了一些活动，这些都是见不得人的事。那些事也搞到总理和伯达同志头上去了（指 5 月 17 日，江青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话的事）。这些事，在中央全会上应当讲清楚，这对党的团结是有利的。’主席还说：‘最好再讲讲形势，套路的话人家不爱听。’并且对林副主席、周总理说：你们谁来讲一讲？’总理立即谦让的推举：‘请林副主席来讲吧。’主席又说：‘可以把问题讲的宽一点。’”

汪东兴平时还是一个挺严谨的人，今天的确比较随意，也许他有意找机会抨击江青，出江青的洋相。他在补充中说的内容，总理都没有讲到，汪东兴竟然敢“补充”出来。当时康生就很生气，胡子翘得老高。散会后，康生走过汪东兴身边时说：“革命这么多年，还是个警卫员的水平。”我看当时汪东兴样子，有些

不以为然。后来，陈伯达下台之后，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以乱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指责了汪东兴。

汪东兴这个人过去黄、吴、李都不了解他。我跟他打交道较多，不过都是些具体事务，对他也不很了解，我认为这个人的主要特点有两个：一是装腔作势；二是肚子里事不少。至于他的办事能力，康生说他只是个“警卫员的水平”，当然有点挖苦人，汪还是有能力的。

晚上政治局会议散得很早，这在北京是没有过的。我回宿舍后，没有什么事可干，也没有什么地方可走。吴法宪房子人来人往，我不愿去。李作鹏因身体不好在输液，不便讲话。我信步走到聂老总房子里去了。他住的地方离我约 20 米远，我把刚才政治局会议的情况都同聂帅说了，他很高兴。九大以后，我仍然上叶、聂两帅的门，他们两人对我的做法都很满意。他们说：“我们现在都是闲人，你主动来同我们唠叨唠叨很好。”叶帅有时还主动叫我去“闲谈”。实话说，因为“二月逆流”的原因，我并不大情愿，但一般地我仍然照办了。

庐山会议就人数来说，是个小型会议。到会的人数，连工作人员在内也不过三、四百人。会议的主要分工是：会务工作，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招待工作，由江西省军区，省革命委员会负责；安全警卫工作，空中运输等，由军委办事处负责。庐山周围的外部警卫工作，由江西省军区一个独立师担任；庐山内部的警卫工作，由中央警卫团担任。另外，由空军在庐山开设一个防空指挥所，并准备两架直升飞机，以备必要时专用。除此以外，庐山及其周围没有任何部队。

开幕式上林彪的讲话

据陈伯达讲，8月22日晚，他到了林彪住处，他非常希望林能在会上讲话。陈认为九大以后，“无休止的运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发展，我们国家长期处在这样的无政府状态下是极为不利的，会承受不起。陈认为，造成这种局面，在主席那里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康生和张春桥，江青不能碰，碰碰张春桥是可以的。林彪没有对陈伯达表态。林只说，如果要讲，明天开会前向主席报告一下。实际上，我认为陈伯达还是把林彪说动了。事前，吴法宪向林报告了他与张春桥在修改宪法问题上的争论，也是促使林要讲话的原因。

8月23日下午3时，全会在小礼堂开幕。但常委们一直没有出来，大约等了40分钟，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才走出来在台上就座。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坐在台下前排。

全会由毛主席主持。主席宣布：“我们的二中全会，现在开幕！”然后，毛主席左看右看地看了一下林彪、周恩来，之后即说：“请林彪同志讲话。”

林总对毛主席笑笑地说：“好，我说几句。”

毛主席又接着说了一句：“现在，请林彪同志讲话。”

林彪的讲话，不到两个小时。平心而论，林彪的话讲得很一般，问题也不是讲得很清楚，但事后产生这么大的反响，真是意料之外。他讲话的内容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宪法修改稿的特点；第二个问题是宪法修改草案体现了毛主席的国家学说；第三个问题是宪法修改草案体现了毛主席倡导的群众路线。林总对宪法修改稿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他说：“全会这次的三个题目，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间的三件大事。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特点，一个是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这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最重要的一条。这条反映出我国革命经验中间最根本的经验。

“毛主席的这种领导的地位是在几十年的斗争中间形成的，是在党内两条路线的较量中间来比较出来的。所以，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中国革命，半个世纪的历史都证明，只有毛主席代表了最正确的方向，代表历史发展的要求，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是大量的铁一般地证明了的事情。可以说我们的工作的前进或后退，是胜利或者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对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是不巩固。……凡是碰到毛主席的思想不能贯彻的时候，就使革命受到挫折、失败；得到贯彻的时候，就蓬勃地发展。我们同志们必须记住，必须把这种迷迷糊糊的思想，变成自觉的思想。必须，特别是年老的这些同志，要把这些思想向下传播，传下去。……

“胜利以后这20年，特别是在文化革命以来，继续和更加证明毛主席思想的作用。我的看法是这样子，不管什么地方，不管什么部门，毛主席的威信比较高一点的地方，对于毛主席著作比较肯学一点，人的精神面貌就改变，跟之而来

的就是物质的强大变化。原来认为做不到的事情，能做到了。这就是毛主席的这种革命的精神，具体的政策、具体的指示，一旦深入群众的时候，一旦群众领会的时候，那就是排山倒海的力量。主观世界的变化引起客观世界的变化。

林彪说：“你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老三篇不起大作用呀？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起作用。另外还有其它的政策思想，以及哲学思想，这些都起作用。几十年嘛！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我们这些人都是参加革命嘛，毛主席几十年写的东西。我们现在水平高，是有创造的。……毛主席个人的这种天分、学问、经验来创造出新的东西来。而毛主席这些著作中间所发挥的地方，所增加的新的东西，你们翻开马列著作中间他不可能有的。这也很自然的，他没有那个客观嘛。因此，不能对于新的问题作出预先的答复和解决。所以不能说是没有发展，这还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的原则的，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在我们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情。”

林彪说：“第二点，就是突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也是体现了毛主席的国家学说这种发展。没有一个宪法，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政权不是阶级性的。如果真正到了没有阶级的时候，就没有国家了，也没有政权了，也没有党了，也没有宪法。那么有宪法，有政权，有党，有国家，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是阶级不可调和的表现，不是阶级相互妥协的表现。不是什么联合政府，总是一个阶级压迫一个阶级，总是阶级对阶级专政。……我们这个宪法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体现了阶级性，是阶级专政。

林彪讲第三点时说：“这次宪法，还有一点，就是突出了群众的路线，集中了群众的智慧。主席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历来如此。大家是知道的，到处街上都有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是一句言简意深，概括了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之一。所以，主席一再地强调把这个宪法交给人民讨论呀，修改呀，这都是相信工农兵和教育工农兵的一种表现。反复征求群众的意见，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宪法是他们提了意见的，成为他们自己的东西，这个是有很大的好处。主席要求宪法简单扼要、通俗易懂，使群众容易掌握，

这也是考虑群众的需要。从 106 条压缩到 30 条，1 万多字压缩到 4000 多字，这都是适合群众需要的。这次我们的草案经过我们这里全会讨论了以后，还要经过群众再去讨论和人大讨论。所以这次宪法可能成为全国人民夺取一个新的胜利的一个战斗的纲领。”

林彪的讲话没有稿子，一口气能讲这样长的话，是不容易的。我听过很多林总讲话，他基本上不用稿子。

林彪结束的话声刚落，全场爆以热烈地掌声。坐在主席台下第一排的许世友、陈锡联竟跑上前去和林彪握手，表示支持和敬意。这时叶帅和陈老总也起身和林彪握手，林为了表示尊重，蹲在台子上和两个老帅说了几句话。

毛主席对林彪的讲话听得很认真。

林彪讲话之后，康生讲了修改宪法的问题，尤其讲了对设国家主席的态度。康生在发言中表示对林的讲话“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康生指出，在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

汪东兴在他的书里说周总理和康生听着林彪的讲话“表现出着急的神态”，你说汪东兴是不是说谎，康生比谁的调子都高，他着急个屁。

接着，周总理讲了开会的问题。因为时间晚了，总理讲话比较短，他说，关于《国民经济年度计划》已印发了材料，就不具体讲了。总理也对林彪的讲话表示拥护。

会议结束后，毛主席一边站起来，一边说了两个字：“散会”

其实，我认为林彪的讲话比较一般，话讲得也含含糊糊，但林彪讲完话以后受欢迎的情况并不一般，好像有一种“势”，毛主席看到此景，肯定心里别有滋味。

山上的热闹

今天开会的座位，张春桥坐在我的左边，我们紧挨着。林总评论宪法时，他总是张开口，无声笑着，一个字也没有记录。当林总讲到“我们同志们必须记住，必须把这种迷迷糊糊的思想，变成自觉的思想”时，张春桥有些敏感，立即紧张

起来。他越听越不是滋味，沉默起来，拼命做记录。林总讲完话之后，他掏出香烟，自己没有抽，第一支先给了我，他的手都有点发抖，拿着烟对我说：“老邱抽烟”。这是我们认识以来，他第一次递给我香烟，我有点好笑。这虽是小小的举动，但也可以看出张春桥当时的心理状态是“做贼心虚”。我和张春桥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六七年一月，他支持上海二医大“红纵”，造我的反，我对张春桥是憎恨的。

会场的台上有个后门，由台上回我们的住处比出大门近多了。散会时，大家陆续退场，吴法宪、叶群、李作鹏、汪东兴和我不约而同地走在最后面，并往主席台的后门方向走，陈伯达在台上等着没走。此时，我们后面的几个人，有的已经上台去了，我还在阶梯上，汪东兴就讲开了，他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会前林彪报告毛主席要求讲话的情况，及林彪报告后主席说不要点名的情况，这时，叶群忙提醒大家“会上发言不要点名啊，林总讲话里指的是陆定一式的人物，是不点名的点名。”叶群还讲：“林总说主席是伟大的天才，毛主席的革命实践太丰富了，主席比马克思、列宁还懂的多。我就是坚持天才的观点。”

其实，“不点名的点名”我们听得懂，林总讲话是指张春桥的。当然，叶群、汪东兴一开始就是唱主角的，他们通报这些消息并非多余，他们一讲，起到了联络感情的作用。临走前，叶群又提醒大家：“会上发言不要点名啊”。林总的讲话，是批评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的人，我们是完全拥护的，但这次林总讲话，我们事先一点都不知道，我和李作鹏担心的是陈伯达、吴法宪、叶群三人把林总“推”上台的。如果真如此，是没有不坏事的。我又想，林总是一个非常缜密的人，他的讲话一定得到了主席的同意和支持才讲的。我和李作鹏一同走在回去的路上，李问：“老邱怎么样呀？（指林总的讲话）”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李：“是呀！事先连个招呼也不打！”

晚饭后 8 时许，我同北京黄永胜打了一个电话。我拿起话筒就问：“山上的热闹，你知道了吗？”

黄说：“刚才，吴胖子来过电话了，知道山上的大好事，不需要再说了，真高兴啊！晚上还多吃了一碗饭。”

我们在电话上谈笑了一阵，就挂电话了。

晚上 9 时许，召开政治局会议。今天会场的空气与往常不一样了。张春桥、姚文元坐在后面了，不是同往常一样总是坐在前面，并要同周总理并排坐下；江青和康生虽然坐在前面，但江青也总是吊着一张脸不说话；康生翘着小胡子，不断地抽烟。陈伯达、吴法宪并没有什么具体事，他们却在会场上走动。两种不同心情的人，表现出两种情绪，显得格外分明。我与李作鹏同往常一样，其余的人情绪略有不同，但不是很明显。

今天的会议，主要是研究明天开小组会的问题，没有别的议程。吴法宪提出：“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各小组应当好好学习讨论。”李德生、许世友、陈锡联等人随声附议。总理说：“这个意见很好，请汪东兴同志报告主席。”我想，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也在情理之中。

汪东兴接着提出：“各组反映，对林副主席的讲话，不少地方没有听清楚，他的口音重，要求重放录音。”总理同样简单地对汪东兴说：“此事，也请报告主席。”

总理对着张春桥说：“宪法草稿，有关国家主席的章节，要准备一下，备用。”

张春桥急忙回答说：“现成的，现成的。已经准备好了，请总理放心。”

今天的政治局会议没有更多的内容，自然散得很早。

散会后，我和李作鹏示意吴法宪到叶群那里了解一下情况。吴回来后，对我们说：叶群讲，林总本来在开幕式上不准备讲长话，开会前，主席和林总交谈了很久，林总向主席反映一些问题，主要是我（吴）和张春桥吵架的事，主席说：“张春桥的后台是江青。”主席对林总说可以在会上讲一讲，但不要点名。

然后，吴法宪又说请“老夫子”（陈伯达）到他的住处来闲谈。不久，陈到了吴的住处。我们听陈、吴谈话，主要是陈谈的，一直谈到 24 日凌晨 3 时才散伙。

从陈伯达谈话的内容、口气来说，陈伯达对张春桥不仅是贬低，简直是到了鄙视的地步。可见他对张春桥的仇恨是很深的。

陈伯达说，张春桥是个无名小卒，没有什么本事，写文章也不行。自己不行，还好表现自己。如果他写了一篇什么东西，总怕别人不知道，到处瞎吹一通。张春桥写的东西都是在上海请人搞的，在上海那个地方搞文字吃饭的人有的是。陈伯达说，1967 年，上海‘一月风暴’都是北京直接指挥的，安亭事件发生后，

是他派张春桥去处理的，连张春桥在上海的讲话都是他在北京写好，用电话传过去的。群众起来了，张春桥当时并不敢去，是他写了几条要张去宣布的，并由上海警备区派部队保护张春桥才去了。然后上海召开一个群众大会，张春桥也是不敢出去见群众的，又没有什么主张，还是他同张春桥同志直接打电话告诉他的办法（似乎也说告诉了几条），结果大会开成了，夺权成功了。张春桥还吹什么他创造了‘上海革命’，这是贪天之功为已有。陈还说：“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张春桥吹的那样好。是在毛主席同意的情况下，把张春桥的对立面镇压下去的。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是花了很大代价的。中央支持，又允许镇压，哪有搞不好之理！”另外，陈伯达还谈了张春桥参加“九大”修改党章就到处吹嘘自己，我写的文章很多，我从来都不说。

此外，陈伯达还讲了张春桥的许多坏话，有的我就记不起来了。

我们大家在一起听陈伯达讲到 24 日早上 3 时，吃了夜餐。

我回到宿舍之后，刘秘书同我说：“张池明政委、张令彬副部长，今天下午来看部长了。”我即想到要给他们回个电话，否则，他们会有意见的。但说什么呢？我稍微想了一下，就向他们回电话说：“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可能还要组织听录音，这样便于小组会上发言。”这是个极其一般的电话，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是搞什么“阴谋”，只是想到给他们一点可以谈的“内情”，但后来追个不停，大家都知道，“两张”在政治斗争中，是起不到多大作用的。

整个庐山都狂热起来

24 日上午 9 时许，在庐山小礼堂听林总讲话的录音，毛主席昨天晚上就同意听林彪讲话录音。除毛主席、林总之外，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全部到场了，元帅们也来了。江青这个向来“自由自在”活动的人也来了，坐在第一排中央。从她的行动就可看出林总讲话对江青的震动有多么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即使出轿子抬也是抬不来她的。录音放了一遍以后，总理说再放一遍。中央委员们听了林彪三次讲话（上午听了两遍录音），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大家仅从听录音这件事，就知道要发言表态和怎么表态了。于是大家纷纷在小组会上发言，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汪东兴和陈伯达在华北组都发了言，尤

其是汪东兴的发言牵动了整个全会，汪东兴在发言中提出揪人是发言的要害之处。随着汪东兴和陈伯达的发言及随后出的华北组的六号简报，从 8 月 24 日到 25 日下午 5 时，整个庐山都狂热起来了。这是毛、林、周都没有想到的。

听完录音之后，叶群在昨天同样的地点，向同样的人说：“昨天晚上，总理交代张春桥，在宪法草稿中准备好国家主席的章节，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我们要向总理学习！”

散会时，我看陈伯达塞给汪东兴几页纸，说是搞了几条马列《语录》，打出来请常委审查，可是，下午我去开会前，刘秘书已经交给我这份《语录》，我就带在身上去开小组会了。

我下午去参加西北组的小组会。

开会前，吴法宪打来电话说：“姓汪的来电话说，他已经发言了，叫我们快发言，也叫空军、海军、总后及其他军队同志发言。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今天发言表示你自己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明天发言就算随大流了，今天发言很重要。要尽快发言。”

我说：“姓汪的都指挥到我们头上了。”

吴说：“人家也是好心嘛！《语录》你拿到了吧，这是汪主任亲自给我的，让军委办事组‘近水楼台先得月’，先睹为快了。”

我说：“对对对，知道了。”

西北组的简况（24 日下午）。24 日下午，在西北小组会上，我是第四个发言。我记得在西北组，洗恒汉、张达志、康生、邓颖超、董必武、粟裕、张秀川、李瑞山都发了言。

我的发言主要是三个内容：一是，热烈拥护林副主席在全会上的讲话。二是，严厉谴责反毛主席的人。我指出，在九大之后的中央委员会内部还有人反毛主席，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要提高警惕。三是，宣读了陈伯达搞的马列论天才的《语录》。

我发言的具体内容并不很多，时间也不长。我的发言主要是讲对毛泽东思想态度问题。我说“林副主席说过‘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说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取得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个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

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为什么在这次会上林副主席又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有人不同意，不然为什么又提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动摇的，不能有形形色色的谬论，不能利用主席的谦虚来反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问题。”

小组会上对我的发言，反响不很大。大家对我的发言有三点评论。第一，认为我是知情人，对我的发言十分重视，即使一句半句也是有用的。第二，认为我也是文革初期被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毒打的重要受害者。他们说：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解放军是三位一体的。他们这样反，当然也就把矛头指向军队了。邱会作同志也是被反的一个。第三，认为我的发言，内容虽然不多，但讲得实在，没有“哗众取宠”之意。大家对我宣读的论天才《语录》不特别感兴趣，但一致提议要将《语录》印出来。

我发言之后，康生、董必武、粟裕、邓颖超等都做了发言。

康生说：“我同意邱副总长（他叫我的职务）的发言，他用的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态度。这是很好的态度，对问题应当有研究的精神！我看他马列主义学得比较好。”他还说：学习毛主席著作有三种人，一种是学习好、用得好，林副主席是榜样；一种是学习还可以，但用不好，我就属于这种人；一种是不好好学习的，这种人不是个别人，但也不是多数人。康生在西北组的发言中，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

董必武说：“我很熟悉邱会作同志，他从年青时期就爱学习，他的文化不是老师专门教的，主要是自己努力学来的，他今天的发言还是学习的精神，很好！”董老也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

邓颖超说：“我同邱会作同志长征就在一起，他是一个很使人喜爱的干部。很多同志就很喜爱他。他刚才的发言，是很能启发人的。”邓颖超在发言中也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她还义愤填膺地说：“谁反对林副主席，我们就打倒谁！”邓颖超还争功似的说：“我们现在都说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你们知道吗？‘亲密战友’这样的称呼是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第一个提出来的。”

大家差不多都发了言后，由邓颖超、粟裕牵头集体通过了拥护林副主席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希望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彪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意见。邓颖

超说：“我们都发言了。现在我们再用全组通过的办法，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这样我们小组的态度就更加鲜明了。”邓提议后，立即一致通过，我因知道一点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情况，调子不是很高。全组通过之后，粟裕还对我说：“邱副总长！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你好象是弃权了。怎麽样？不会有两本账吧！”我忙说：“我完全同意大家的意见，我是不会脱离群众的。”

兰州军区政委洗恒汉同志是西北组的召集人，会上没有机会发言。“风云突变”之后，大家在检讨时，洗恒汉同志还坦诚地展示了他灵魂深处的思想，他说：“我是在小组会上没有机会发言，如果我发言，和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晚饭后，政治局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我在会场的电话室门口与总理相遇，总理笑着对我说：“你下午很有力量！”“你怎么知道？”我问。

“跟你一组的人（指邓颖超）同我说的。她还问我说，邱的发言，很显然是话中还有话的，话并没有说完，是怎么一回事？我叫她独立思考。”我说：“我的发言，还只是一个开头，我准备清算造反派对我的摧残！”

总理说：“不要心血来潮，要考虑成熟再说。”

我说：“这次林总的讲话，我事先确实不知道。因此没有向总理汇报，我要有什么打算，肯定会事先向总理报告，并得到总理的指示！”

总理说：“这次发生的问题，我知道你是不知道的。这点，我不会有任何怀疑的！现在事情才开始。”

我说：“我一定听总理的话！”

晚上，我继续去参加小组会。会议还没有开始之前，张秀川同我咬耳朵说：陆定一式人物就是指张春桥吧？我回答说：“独立思考！”张碰了我的钉子。事后我感到对不起他，小组会正式开始时，我用纸烟盒子给张写了一个条子。大意是：“你指对人了，但不能点名，可以表示愤怒！”张看到我的条子后表示满意。

小组会的中间，我在厕所里碰到曹里怀。我问他发言没有？并鼓励他对林总的讲话要赶快表态。曹回答说：“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一定会表示自己的态度！”

从上述情况来看，我在小组会上是比较活跃的。造反派把我整得太惨了，我对他们的后台中央文革是不满的，这也是我能够活跃起来的思想基础。我是坚决反对造反派的，这点是众所周知的。但对林彪的讲话，我确实是不知原委的。在

会前，连林彪要在全会上讲话，我也是不知道的。至于林总同江青的斗争，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我知道的不多。

8月24日，陈伯达、汪东兴到华北组参加讨论。陈伯达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认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

汪东兴在陈伯达发言之后也发言了。汪东兴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还说“根据中央办公厅和8341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8341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在会上，汪东兴很严肃地说：“我们再也不要糊里糊涂的。这里面问题严重呢。我们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是他对问题发觉得早，又一次出来捍卫主席，不然问题可就严重了。”

当有人问汪东兴：“你说有人反对主席当主席，这样讲，主席知道吗？”

汪东兴说：“当然知道，就是不让点名。我一说你们就明白了：现在是笔杆子压枪杆子，可厉害着呢！”

汪东兴发言后，从华北组出来就碰到了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王秉璋，汪说：“王主任，要抓紧发言哟，我已经发过言了。我们就是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表明我们的态度。”

晚上，萧劲光同志来了个电话，他说：“你那里怎么样？”

我对萧劲光的电话有点奇怪，心想怎么问到我这来了。萧劲光是我的老上级，关系一直很好，不久前在上海我们还一起陪主席接见罗马尼亚外宾。我随便回答说：“马马虎虎。”

他不满意地说：“什么叫马马虎虎？今天汪东兴来到我这个组，大讲了一通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我记得以前不是传达过不设国家主席吗？现在他又主张设，这是怎么回事？汪东兴口气很大，他说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能糊涂。我可真糊涂了。”

我不太愿意回答他的问题，我就说：“你问李瞎子（李作鹏）就行了。”

萧说：“问他问得出来我还找你！？”

我看他有些动气，就立即说：“两种说法都有，就看自己的阶级感情了。常委都说设，主席没有同意。主席是太谦虚了。”

过去，汪东兴给我们通气，一般是给吴法宪打电话，由吴转告我们。可 24 日晚上，汪东兴逐个给吴、李和我打电话，询问我们发言的情况，汪很亢奋。汪东兴的发言是全会发言的重中之重！他提出“建议设国家主席”，并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笔杆子压枪杆子”，总之他提出揪人。这刺痛了毛主席的心，后面毛主席的做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大会秘书处印发了各个小组的简报，华北组的简报（8月 24 日小组讨论的情况），编为大会的第六号简报提前印发了。简报写到：“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的、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批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在东北组，陈锡联、曾绍山、周恩来、尉风英、李素文、汪家道发言。在东北组的发言中，周恩来总理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天才”的观点。周恩来 说：“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毛主席

叫我们不要总强调三个里程碑，但客观上就是这样。”周恩来还就党的历史发展经验说：“要勿忘过去，警惕现在，教育后代，要夹着尾巴做人，知错就改，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此前（7月18日），关于修改宪法，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言，提出修改后的宪法要“突出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党是全国的核心力量”，“毛主席是全国武装部队的统帅，林副主席是副统帅。”在开幕式前22日的常委会上周总理同其他三个常委再次提出要设国家主席。

在华东组，许世友、杜平、韩先楚、杨得志、王震、陈云、方毅、程世清、周赤萍、陈励耘、韦祖珍、彭冲、王洪文、王秀珍发言。在华东组的发言中，许世友义愤填膺地抨击了张春桥：“造反、造反，你们造谁的反？党和国家都被你们搞乱了！……”。陈励耘在发言中指责中央文革迫害老干部，反对解放军。陈还没讲完，许世友又插话说：“老陈，你讲的对！我同意你的意见”。连江青、张春桥的亲信王洪文、王秀珍等人也在会上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坚持天才的观点。王洪文说：“林副主席讲话非常重要，给我们敲了警钟，不承认天才，就是不承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华东组发言非常热烈，几乎人人抢着发言。抢不上话筒的人就站起来喊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到谁！”“谁反对毛主席决没有好下场！”要求“揪出来示众”，“斗倒批臭”，“千刀万剐！”……张春桥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低头抽烟，一声不吭，都不敢抬头看一下是谁在发言，谁在喊口号。

在中南组，刘兴元、丁盛、叶群、叶剑英、李作鹏、孔石泉、任思忠、曾思玉、刘丰、华国锋、李震、于桑发言。叶群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得多，懂得得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李作鹏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人想往下吹。”公安部长李震和副部长于桑为了争先发言，争先对林彪的发言表忠心，竟然抢起话筒来。

在西南组，张国华、梁兴初、周兴、蓝亦农、张錚秀、陈康发言。吴法宪参加了西南组的讨论，吴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

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老资格的中委，除了陈毅外，发言不是很激动，但也都表了态。

聂荣臻说：“古人说大奸似忠，反对毛主席的人就是属于这种人。革命的人是不会反对毛主席的，有时不慎重，说错了句把话的情况是有的。”

陈云说：“林副主席是号召我们起来战斗！这种战斗是一定要参加的。我身体不好，不能上前线，在后方做点服务工作是可以的，也是应当做的。”

李先念说：“我是戴了‘二月逆流’帽子的。我不翻案，但我一定听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挥，积极参加战斗。”

陈毅说：“谁反对毛主席就同他斗！我虽然身体患重病，也要手扶肚子站起来同他们斗争。九大之后，我是被打在阴沟里的，现在我必须爬出来，跟着林副主席一起战斗。”

在 8 月 24 日那天的下午开始，庐山的战火确实是烧得很旺盛的，实际上是对中央文革实行了讨伐！在二中全会上，并不只是陈伯达、汪东兴、吴、叶、李和我等反对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中央文革的要员，而是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共同的思想和行动。大多数人对中央文革是痛恨的！今天有林总带头反对中央文革，绝大多数人都感到由衷的高兴！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整人太多，他们是众矢之的，真有“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势！尤其是汪东兴和陈伯达的表现，使毛主席不能接受。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人，是在毛主席身前身后办事的人；陈伯达是党内理论家，是“最能准确表达毛泽东思想”的人，他们都是毛的人。他们却站在林彪一边，带头发江青、张春桥的难，发中央文革的难，毛主席是不会答应的。

第三十三章 风云突变

晴天霹雳

会议正在进行时，8月25日下午5时突然发生了变化。会议由“盖橡皮图章”变为“盖冤案图章”了。后来，竟捏造事实说，什么庐山会议期间出现了一个“反党集团”，林彪搞了什么未遂的“阴谋政变”。我亦被列入该集团成员之一。但我参加了什么政变？过去十几年不知道，现在仍然不知道。因为这是捏造出来的，除了捏造者本人知道之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

汪东兴还说：“现在是笔杆子压枪杆子，可厉害着呢！……我们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要不是他对问题发觉得早，又一次出来捍卫主席，问题可就严重了。”大家都明白了，“不点名”点的是谁了。汪东兴的话实在是太露骨太有分量了。

25日下午，我继续去参加小组会。临走时，秘书对我说：“皮包里，放有华北组的简报，到会场上可以先看一下。”

到了会场之后，我就把包里的华北组简报拿出来了。我边看，内心边发笑。华北组的简报写得实在好！他们的小组会，真是“炮火连天”。原来反对中央文革的竟大有人在，这是我过去所不十分知道的。

这时，各小组的发言已经远远超出讨论林彪的讲话，整个会议已经形成一种势，即反对江青这些人，甚至不满文化大革命的“势”，情绪相当大，这种“势”触痛了毛主席。虽然在大家的心目中有一个共识：毛主席搞文革是继续革命，只因为江青一伙的破坏，对老干部无情打击，才使众多老干部遭殃，文革才乱成这个样子。但主席深知，事情搞到江青一伙头上，就会搞到文化革命头上，主席是不会答应的。事实证明这种看法也大错而特错了，因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是主席的方针，江青是执行主席方针的。

我准备提议，在小组会宣读华北组的简报。但我抬头一看，康生没有来，小组召集人洗恒汉也没有来。我立即想到，毛主席那里是不是开什么会？因此，我多了一个心，到了嘴边的话又收了回来。“祸从口出”的谚语，这次对我真起了作用。

各小组的讨论情况，毛主席肯定是知道的。当时，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三个大军区司令员也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了信，坚决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许世友还直接了当地点了张春桥的名，并提议要把他们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三年。尤

其是华北组的六号简报，火药味十足，并以汪东兴的讲话为主。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时间早于许世友等人，他在发言中，不仅坚决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而且提出要揪人。汪东兴还说：“现在是笔杆子压枪杆子，可厉害着呢！……我们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要不是他对问题发觉得早，又一次出来捍卫主席，问题可就严重了。”大家都明白了，“不点名”点的是谁了。汪东兴的话实在是太露骨太有分量了。

8月25日下午3时，毛主席在山上的住处召开了中央常委会（各组有一个召集人列席会议）。会上毛主席决定，收回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的简报），各小组停止开会。毛主席召开的这次会议，是庐山会议的转折点，矛头指向江青张春桥一伙的熊熊战火开始开始被毛主席熄灭。

8月25日下午5时，西北小组的召集人冼恒汉，参加了中央常委会回来说：“毛主席决定小组会暂停，以后怎么开会，待通知。”各组都宣布暂停开小组会。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大家都不清楚。这对全会的绝大多数人是一瓢凉水，浇得大家昏头转向；可中央文革这些人兴奋极了！参加会议的人在林总讲话之后的情绪和停止开小组会时的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前一种情绪，多数人兴高采烈，中央文革的几个人惶恐不安，忧虑重重；后一种情绪，多数人垂头丧气，中央文革少数几个人兴高采烈。

我从西北小组会场回来后，对庐山会议30多个小时（24日下午4时起）以来，发生两次突然变化完全想不通。我同李作鹏商量，必须再次严肃问一下吴胖子，问他究竟知不知道林总要在开幕式上讲话。如果他知道林总在开幕式上讲话，又不同我们打个招呼就可能有什么新的内幕，那样，叶群、汪东兴、吴法宪他们就是一伙了，我们就不是林总最信任的人了，汪东兴在会上讲话那么露骨，究竟原因何在？如果吴真的不知道，就是过去斗争的继续。

晚上，我们一起到吴法宪住处去了。对上述问题，我们直截了当地问了吴法宪，他有点莫名其妙。吴法宪说：“我真不知道林总在开幕式上提出张春桥的问题。如果我知道，以前不跟你们说，现在再不讲实话就不行了吧。要是我知道林总要反张春桥不跟你们说，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你们应该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我可以给你们立个字据，连我的人格、老婆孩子都列入担保之内。”他说得很诚恳。

我们认为吴法宪的话是诚实的，我们相信了他的话，也就放心了。然后，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回忆准备开二中全会以来的一些主要问题。

我们经过仔细回忆，想起的主要问题就是：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关于在宪法上写毛主席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问题，关于搞天才论的语录等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即使有错误也是思想认识问题，完全不是什么政治问题。经过回忆之后，我们自己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事，也没有担心的必要！

我们一致认为，当前还看不出毛主席对林总的讲话采取什么态度，可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我们担心的是，今后江青、康生、张春桥这些人，在中央政治局会更神气，甚至可能从九大以后的政治局集体办公退步到中央文革时期那样的程度；这些人不懂又爱管，把该办的事搞得一塌糊涂，总理又那么“顾全大局”。如果庐山这样转向的话，林总讲话权威性会不如过去，甚至有针对江青的话也会不便说出来，我们对这个问题要充分的认识，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江青不把总理放在眼里，今后也不会把林总放在眼里，对我们就更不在话下了。

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我们当时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这时，汪东兴、叶群前后来电话。

汪东兴这个人，九大以后经常给办事组打电话，有机会就往办事组跑，跟叶群就更紧密了。上了庐山以后，他天天给吴法宪打电话，甚至一天不止一次，一般情况下由吴再转告我们。

汪东兴说：“看到全会上各组的气氛，他们真害怕了。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乘江青的汽车闯进了毛主席的住处。江青并不知道下午 3 时中央开常委会，她是带着张、姚去向毛主席告状的。江青进毛主席的门时，卫兵挡了她的车。江青说：我自己的家里也不许进去吗？卫兵、江青正在争议时，张耀祠出来了，这时江青才进去的。江青向毛主席说：我带春桥、文元来见你一面。他们快死了，真正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人你要保呀，他们表面上是对着春桥和我，实际上是对着你来的，现在各个小组都有刘少奇的阴魂。”

汪东兴接着幸灾乐祸地说：“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个家伙，见到主席立即跪在面前，一人抱着主席一条大腿痛哭，这两个家伙把主席的裤子都哭湿了。毛主席对他们说：‘对开会的事，中央就要开常委会讨论了。’”

汪东兴还胸有成竹地说：“我看开会也是主席让大家给他们一条生路。”

汪东兴还专门说：“主席已采取措施，今后我们暂停电话联系，你们之间也少打电话，有话当面说。”

汪东兴还说：“许世友来开会时，主席说：‘我不能当国家主席，你为什么一定要我担任国家主席。我的手都是冰冷的（伸出手去给许摸），我每天能睡着觉的时间很少。我不能担任国家主席那个职务。国家主席由老年人、年轻人担任都可以。你许世友也可以，你许世友担任国家主席就足足有余。’许世友说：‘我听毛主席的话，我再不提议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了。’主席笑着说：有希望！只要对你许世友的工作做通了，其余的人就没有不通的。”

但是，毛泽东听进了江青告状和求援的话，听信了江青的话！主席是反对“天才论”的，还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评陈伯达。毛主席还说过不当国家主席。

“九一三”以后，专案组从吴法宪嘴里压出了“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的假话，毛主席又把“设国家主席”杜撰为我们反党的政治纲领，“天才论”是我们的理论纲领，事情越搞越假，越搞越乱。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主席真正的心病在哪里呢？一个是林彪因不满中央文革在会上不指名地点了张春桥，那么多人拥护林彪的讲话，林在会上的威信，使毛主席难以接受；另一个就是除造反派的中央委员外都反对文化大革命，会上提出揪人揪张春桥。主席很自然会把反对张春桥和反对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和毛泽东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主席后来不是讲过，他一生干过两件大事，文化大革命就是其中一件。因此，反对文化大革命，对主席来说是一件要命的大事。这样，林彪在大会上不点名地点了张春桥一事，就显得严重了。

接着，叶群也来了电话，她说：下午 3 时，林总去开常委会。她想到林总去开常委会，必须追上林总去叮嘱几句。叶群在毛主席住所门口不远的地方追上了林彪的车。叶群向林总说：“今天，如果有什么很麻烦的事，一定要保汪东兴！”叶群驱车赶林总时几乎翻了车，但她赶上了林总，对发生过的惊险也就不在意了。不过，叶群下车下得急，一下车腿一软就坐了一个“屁股蹲”，受了伤，以后几天开会，她都垫个小游泳圈在屁股下面。

25 日晚上，政治局开会，扩大到各小组的召集人，会议由总理主持，这时江青、康生、张春桥他们那种不可一世的劲头又来了，因为主席的决心还不知道，尤其是主席对林彪的态度还不知道，总理看到他们那个样子也不高兴。我当时就

隐隐感觉到，主席的屁股可能坐到江青那边了，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主席在山上和下山后的一切都是对着林彪来的。总理在会上说：“会议的日程做一些调整，根据主席的指示，休会两天，大家休息休息，很多人还没有来过庐山，可以去游一游，换换空气。”

散会以后，吴法宪要到林总那去，我们劝他不要去，他还是坚持要去，为了等消息方便，我们就坐在吴胖子住处等，不久他就回来了，吴说：“我去时林总刚从主席那里回来，主席召集开常委会，各大组的负责人也到了，林总说主席对会议不高兴，说陈伯达在华北组起哄，并说以后不要再提天才了，国家主席他不当。林总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我回到住处，总理给我来了电话，他同我说：“主席说庐山问题还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但发生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就有一定的严重性。这就是说，在陈伯达身上发生的一般的问题，也必须严肃对待。你没有什么大事，但要化被动为主动，因为你究竟有没有大事，不是你自己定得了的。”总理的话，都说到这种程度，我仍然没感到自己会有什么事，只是我感到陈伯达可能要倒霉了，可是为什么要搞到陈伯达头上，我真是搞不清楚。

缺 2 页

陈伯达说：“康生指责我把林副主席绑上了战车，甘愿当叛徒，投靠了军委办事组，我准备你陈伯达杀我的头！”

临走时，陈伯达向吴法宪宣布：“我犯了错误，从此中断电话联系！”

这几句话，把当时发生的问题的性质都点明了。例如：“军事俱乐部”一词，是上次庐山会议反彭德怀的用语，康生的话是再明显不过了，我们问题的性质和彭德怀是一样的。

我们三人都认为，问题一下就严重了。就决定到林彪那里去一下，准备走时，吴说给叶群打个电话，陈伯达听见后像吓丢了魂似的，恳求吴胖子千万不要在他那里打电话，我们就离开陈的住处。吴说我们就直接去林彪的住处，如林不肯见就回来，李说如果不见，那问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到了林彪的住处，叶群依旧很热情，说：“快来，快来。”林彪也亲自出来了，我们把陈伯达的话讲了一遍，

林彪还是很镇静，好像对这些是是非非的话有反感，林总只说了一句：“那是讲陈伯达。”

对于毛主席同陈伯达的谈话，我又专门打电话向总理汇报。他听到后也非常吃惊，他认为主席把问题搞严重了。

周总理真是不辞辛苦，立即找吴、李和我谈话，总理说：“话的分量是相当严重的，要超过‘二月逆流’，但主席是对陈伯达说的，与对你们说，是有区别的。要是有什么需要你们注意的，我会向你们打招呼的。但你们讲话要慎重，别人竖着耳朵听你们讲话，搞不好要影响林副主席。”

我们对总理都存有感激之心。因为在最高层搞这些名堂，我们的确一窍不通。不管怎么样，从陈伯达这次谈话起，我们才真正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对我震动很大！从此，我就比较认真考虑问题了。我考虑来考虑去，脑子里“翻箱倒柜”，各方面的问题都认真想过了，在庐山除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外，大家对林彪讲话的态度都是一样的，开始也包括康生在内。因此，不是谁有错误的问题，而是主席说谁有错误的问题。我认为不管庐山的问题有多大，对我们都是“提起千斤重，放下无四两”。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毛主席“提起”还是“放下”的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毛主席把我们和汪东兴分开，把我们和全体中央委员分开，把我们孤立起来，其实也就是把林彪孤立起来，再扣上几顶帽子，进行打击。

林彪的态度

总理宣布暂时休会以后，林在等主席表态，也没有主动要求去见主席，因为不知道谈什么，也不知道错在哪里？主席反而天天找人谈话，主席还想了一个方法，叫林彪给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开会，说我们犯了错误，都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把问题谈通了，问题也就解决了。

林彪是不愿意出面开这个会的，他认为主席不够诚恳，但主席发了话，林也只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从 8 月 28 日开始，林彪就召集陈伯达等六人，在他的住处开过三次会。每次会 9 时开始，11 时结束，每次会约两小时。第一次会议开始时，林总说：“毛主席要我同各位谈谈，做点思想工作，我们的会要开两三次，每次会的情况，请汪东兴向主席口头报告，我就不另写书面报告了。”林

总当面批评了陈伯达：“你的书生气太重了，考虑的太多。主席批评我能不能再看张春桥两年，主席说得对。我们部队的干部要和地方干部搞好团结。就是这些嘛。”对于让林主持这样的会，后来林彪说主席在“要”他，他也只有应付差事。

到会的人都说了话，说的内容都是有关团结的问题。当时，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还没有印发出来，所以大家都没有批判天才论的问题。大家的话都说明白了，都是属于表态的话，实质性的话一句也没有。这种会是纯粹做样子的。

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林彪有些调侃地说（我从没有见到过林彪开玩笑，林说话向来认认真真）：“你们说说，是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你们为什么在同一时间，讲了同样的话？”三天的会，林彪没有多讲一句话。

叶群对我们说林总的态度是：“不改变自己的观点，不干扰毛主席对问题的处理。”从此他基本上都是这个态度。叶群还说：“林总说，吴法宪提出检讨，这是他的权利。如果他要问我（林），我就说检讨是因为有错误，你吴法宪没有错，你检讨什么？！”从我们比较知道内情的人来说，林彪在庐山的确没有单独进行过任何活动。他的心情总是坦然的。他说过：“一个人搞鬼还是没有搞鬼，自己说的不算数，要别人说的才算数。我不出门，不说话，不找人谈话，就没有什么顾虑，也不给别人制造紧张局势的话柄。”在庐山，吴、李和我等人，除了在公开的场合同林彪见面说过话之外，基本上都没有单独同林总讲过话。

事后我想了一下，林总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好象是军事上的“火力袭击”。林总的“火力袭击”的目的，不是对准整个中央文革，而是对准他们的干将——张春桥。这一仗如果成功了，对中央文革以后的文章就好做了。但林总的火力袭击还没有完，战斗就宣告失败了。

林总在庐山反对中央文革是未遂政变吗？这完全是鬼话。那么林总为什么失败了？毛主席支持江青，支持中央文革是林总失败的根本原因。林总的命运就抓在毛主席手里。

毛主席支持张春桥，是为了江青吗？这也不全对。其实，毛主席支持张春桥，这是关系到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路线问题，也关系到文化革命中搞造反的一批干部。上海是文化大革命搞得比较好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又是从文化大革命产生出来的代表人物，这就是说，如果张春桥被打倒了，就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文化大革命产生出来的一批人的问题。林总不是文化大

革命的积极领导者和既得利益者，除了在毛主席决定后，他对打倒贺龙在九大说过几句话之外，在文化革命中没有欠下什么需要还的账。

吴法宪检讨

8月28日上午，总理给我来电话说：“我已通知吴法宪写个检讨，这样争取主动，主席对于肯做检讨的人，一般是原谅的。我看吴法宪的精神有些紧张，恐怕他写不好，你和李作鹏都去帮他起草一个稿子，拿给我看看。”我说：“我马上照办。不过这里面有个问题，吴法宪写检讨一事，是否要报告林副主席？吴一检讨，势必影响到叶群，也就等于影响到林副主席。”总理说：“你考虑得周到。但检讨还是要写的，不然主席那里不好交待，两边都要兼顾到。关键是检讨怎么个写法，所以我才叫你和李作鹏去嘛。”

我给吴法宪打了一个电话，讲明情况，吴表示感谢，说自己先搞。吴的思想压力大，自己搞不深透，秘书搞，吴又不满意，主要是怎么说林，拿不定主意。晚上我和李作鹏到了吴的住处，共同商量检讨稿怎么写，大家商量了一个框架，吴当时精力消耗太大，有些力不从心，我就执笔给他写了一个稿子，吴认可了，又拿给李去看（李身体不好，先回去休息了）。吴法宪向总理交了卷后，总理又把我们三个人叫去亲自谈、亲自动笔修改后才定稿的。总理还说：“你们几个人政治上一直都很顺利嘛，要经得起挫折。”吴的检讨稿很简单，一是说对林的讲话，自己理解上有偏差，因此在发言中有错误，自己发言中的错误自己承担。总理说：“这个提法好，要自己承担，保护副帅（指林彪。这是总理的专用语）”。一是说讨论林彪的讲话是吴提出来的，吴说他的提议干扰了大会的议程。这个提法就等于替总理开脱了，因为此事江青抓住不放，讨论林彪的讲话和听录音毕竟是总理同意的。总理对这一条特别满意。

总理这个人，对人还是很诚恳的，而且精力特别充沛，对大局的事，对有利于团结的事，他都会尽力去做，他对党内的团结有美好的愿望，从不好胜。比如说，叶群25日下车时坐了个“屁股蹲”，开会时很不方便，他想请假，总理说：“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请假，不然别人会有很多想法。”叶群听了总理的话，开会

时搞个小救生圈垫在屁股下面。当然，只要主席的态度已明确，对总理来说，上面那些就不算数了，他是无条件听毛主席的，总理知道主席是太好胜了。

当时，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江青、康生、张春桥他们，把前一段在北京讨论宪法时，做记录的人（也是这次会议会务组的）找来写了一个材料，说“在宪法修改小组的讨论会上，吴法宪和张春桥确有争论，但这个争论，不是原则上的争论，而是文字上的争论”，这个材料是他们为张春桥找退路的。25 日以后，形势变了，江青、康生、张春桥他们又把这个材料，捅到主席那里去了，并大肆宣扬说吴法宪造谣说假话。吴法宪当时已经“溃不成军”了，他没有和我们商量竟承认自己说了假话。这件事引起了林总、周总理的极大注意，我和李作鹏对吴则极为不满。林总在吴困难的时候，真是帮他，林认为吴法宪不会说假话，并为他专门说了一段话。林总还叫把他的话传出去。

林总说：“吴法宪没有说假话的问题。吴跟我几十年，我就没有听过他说过假话，也没有听别人说过吴法宪是一个说假话的人。吴法宪对毛主席、对党都是忠诚老实的，是不会说假话的人。”

林总还说：“在宪法小组，对运用毛泽东思想编写宪法，确实有过争论，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我们决不能说，提出不同的意见就是说假话。这样就不是以理服人。”

同时，总理在东北小组也做了文章。虽然，总理没有像林总那样直截了当地说：“吴法宪是不会说假话的人。”但说的话是很有分量的。总理说：“吴法宪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对争论的不同意见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说假话。”懂得内幕的人，对总理的话是完全理解的。吴法宪说假话风波到此就平息下去了。、

黄永胜上山

8月29日上午，李作鹏和我在吴宿舍闲谈，叶群也来了，叶群说她拾到了三个“险球”。这三个“险球”是指周总理转给叶群的三封信，并附有条子说：“此件存你处不必再呈、转了。”

信是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写给毛主席、林总、周总理的（转去的还有其他省、市中央委员的信）。信的

内容是打击张春桥的。许世友提出，要把张春桥下放农村改造三年。杨得志、浙江的南萍、熊应堂提出要公开批判张春桥，韩先楚原来没有写信，听许世友一讲，他立即响应，他说：“我也给这个鳝鱼眼（指张春桥）补一枪。”叶群对我们说：“与此事不搭杠的老同志，我一定要保他们。”

这样的信不转到毛主席那里去，不去火上加油，只有周总理能够做到，同时也只有总理能够把事情向着好的方向解决处理。

晚上，李和我建议吴求见毛主席。吴立即向毛主席秘书打了电话。不久，秘书回了电话说：“主席说，现在不要谈话，以后主席会找你谈话的。主席交代了三条；一，不要紧张，二，要犯得起错误；三，我们要以孔夫子打牌‘和为贵’的办法处理问题。”

8月30日，黄永胜到庐山，李德生回到北京值班。黄永胜一上山就被叫到毛主席住处，我们一直在吴法宪的住处等他。黄从主席那里出来，又去看林彪，半夜了黄才回来，而且是和叶群一起来的。黄只简单地讲了一下毛主席和他谈话的情况，有些情况尤其是主席拉他和批评吴法宪的话没有多讲。

黄永胜说毛主席估计山上的情况他已经知道一些，因此谈话一开始主席就问：“到庐山来紧张吗？”

黄永胜：“我刚到，就来主席这里。”

毛主席：“搞突然袭击，还那样厉害！张春桥手无寸铁，你们搞他干什么？”

黄永胜一听说的是张春桥，也直言回答道：“张春桥不得人心，我们确实有些意见。他特别倚重江青同志，我认为有些事是给主席脸上抹黑。政治局实际上是不团结的，张春桥起的作用不好。总理一直在努力做工作，担子很重，很吃力。过去，没有向主席报告清楚，我应当负责！”

毛主席：“你当然要负责，你是一个头。张春桥拍江青的马屁有什么用？”

黄永胜说：“江青自以为有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张牌嘛！她总认为自己主牌多，又有大王，她总认为自己会赢。”

毛泽东：“大王出过了，小王就当家了。你是和我一起搞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嘛！人不多喽。为什么连你都不向我报告江青的情况？”

黄永胜是个政治上挺成熟的人，究竟毛主席怎么看江青，他还没摸透，因此他没有顺着毛的思路往下说，黄说：“我们不想干扰主席。”

毛泽东：“你们能不能让我看张春桥三年？”

黄永胜：“我是在主席领导下参加秋收起义的。几十年来的枪林弹雨，艰苦岁月，我都是跟毛主席的，我都是拥护主席的。但中央文革的一些为人为事，我不能同意。造反派到处冲击，到处夺权，到处打、砸、抢，我不同意。造反派上面有人，问题最难办。”

毛泽东：“你也不赞成文化大革命？”

黄永胜：“我坚决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我不同意的是打、砸、抢。”

毛主席说：“现在问题都解决了，不把问题带下山去。今后主要是学习、提高认识问题。大家都执行九大路线，团结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

黄永胜：“我听主席的话，在主席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搞好团结！”

不过，黄永胜的态度，也决定了事后毛对林彪，黄、吴、李、邱的取舍。毛当时已经很清楚了：要林彪、黄、吴、李、邱，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保不住，他们骨子里都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要保住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必须拿掉林彪！有没有以后的“九一三事件”都是一样。

黄永胜到庐山之初，因为毛主席同他谈了话，开始他有点“局外人”的态度，他不主动向别人打听情况，别人同他说话，他也不太感兴趣。同时他负担也并不重，因为毛主席已经说了，“问题已经解决了”。我观察到这一情况之后，除了有事之外就很少到他那里去了。只是 30 日晚上，黄、吴、叶、李和我在一起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叶群把庐山问题，向黄做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并从林副主席对庐山问题的态度说起。

黄永胜与总理的联系比较多，受总理的教育和点拨比较多。黄对庐山的问题了解多一些了，也渐渐找我们谈话，并且在对待中央文革一帮人的态度上，黄比我们还坚决，对维护大局，他和总理作了不少工作。黄强调：一个是保护副帅；一个是叫吴法宪在检讨时只说自己，不要扯别人；一个是要保护陈伯达和汪东兴，问到自己头上就实事求是地说。黄强调说，老夫子（陈伯达）也是手无寸铁；一个是强调山上山下没有联系，在庐山我们和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不承认我们是一伙；一个是和张春桥有斗争而且是原则性的斗争，批评张春桥没有错，不是只有我们几个人对张春桥有意见，政治局很多人对张春桥都有意见。我现在想起这

些往事，仍然认为黄永胜的思想水平是高的，人品是很可贵的，如果他被毛主席拉过去，问题就复杂了，毛主席就可能提前把林彪端出来。

《我的一点意见》、

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这个文件是 8 月 31 日下发的，政治局进行了学习讨论。

《我的一点意见》是毛主席看到华北小组的简报而写的。在原稿上，除了关于搞语录的问题，还有陈伯达、吴法宪的名字。后来，周总理说：“语录是陈伯达搞的。”毛主席又把吴法宪的名字删去。

《我的一点意见》，我记得文字并不长，主要内容有：对庐山发生的问题，提高到“炸平庐山”的说法。在天才论的问题上，讽刺了陈伯达，保护了林彪。文中关于天才论的问题，有一句“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一致认为……”整篇文章，初读起来好像学术味还是相当浓的。但细细一看，就是对陈伯达的宣判书了。

在政治局讨论《我的一点意见》时，江、康、张、姚高兴得不得了，姚文元说：“毛泽东思想是无价之宝，可以战胜一切牛鬼蛇神，也可以战胜权威人士（暗指林彪），我们要很好学习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

张春桥说：“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伟大的马列主义的又一光辉文献。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打倒了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同样，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也一定是战无不胜的。我们要以批判‘天才论’为中心，学习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建议文元能连夜写出个大纲来”。

吴、李和我除了表态拥护之外，一句话也没有说。姚文元带着讽刺口吻说了一句：“不表态也是一种态度！”我也说了一句：“表态也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态度！”周总理怕吵起来，就用其他的话把问题引开了。

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对《我的一点意见》如获至宝！江、康、张、姚召集华东地区的造反派中央委员，如王洪文、王秀珍、徐景贤等十余人，在张春桥的住处举行了庆祝会，光茅台酒就喝了几瓶。

小组会恢复后，姚文元在他所在的东北组发言，讲了几小时，主要是批判天才论。消息传了出去后，其他小组造反派出身的中央委员也不守纪律，竟然脱离自己的小组，都跑到东北组去听姚文元发言了，中央文革在造反派中的威望是不可低估的。

毛主席派张春桥到华北组，有人请他批判天才论。他只说了两句话：“唯心主义大师是冯友兰（北大教授），党内的蹩脚理论家是陈伯达。只有他们两个人，才有资格讲天才论的问题。”除此之外，他还擅自参加了各个小组的会议。他的举动没有别的，就是要大家看看，“副统帅亲自上阵也没有把我张春桥打倒。还有什么人可以把我打倒吗？”周恩来知道会场被他们搞乱了，非常生气。他告诉张春桥：“回到华东组去。”张对总理不屑一顾。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哈哈大笑。

江青的表演就更使人恶心了！她每天上午都到一个小组（不固定）的会场上去了。她到西北组的时候，一进门就笑起来，表示非常高兴的样子。坐下之后，她说：“我来晚了，是有原因的。我要协助毛主席处理会务的许多问题之后，才能出门。我是来看看大家的。毛主席睡觉很好！”

我在小组会上也做了简短的发言。我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说了自己学习差、理论水平低，识别不了真假马克思主义，今后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爱护党的团结。我的话音一落，康生就对着我面带冷笑地讲话了：“善于观察时势的人，应当多说一点嘛。上一次在小组会上，不是说得很好吗？”

“把时间留给理论家康老用。听说，康老已经准备了长篇发言稿。”我是以平常的态度回敬康生的。

大家对我们俩个人的几句对话，报以哄堂大笑。

康生在西北组除了把我讽刺了一顿之外，还以“反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为题讲了大约两小时。

会议的最后几天

9月1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各省市、大军区负责人出席了会，会议主要内容是：吴法宪、陈伯达做检讨，会议由林彪主持。林彪能主持会议也是我没想到的，我以为他会称病，但他却来主持了会议。

陈伯达发言时，张春桥做“翻译”，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对他们来说，却是一件大喜事。他们在展示：“你陈伯达打不倒我们，你今天怎样了？”

9月2日，继续昨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伯达、吴法宪检讨后，还有几个人发了言。

张春桥发言，除了尽情谩骂陈伯达之外，还说了：“以吴法宪为戒，努力学习努力工作。”

林彪在会议结束时，对陈伯达说了两句话。他说：“陈伯达是人不象人，鬼不象鬼。对这样的人应当与之彻底划清界限……”

会议至此，“庐山战火”就暂时平息了。会议转为全会原来的议题了。

9月3日，总理回北京了，会议似乎没有人管，各小组名为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实际上都在乱扯谈，大部分人拿着审议文件当闭口道士。

9月4日，总理回来了。主席在他的住处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上主席说不要搞得太紧，会议再延长两天，然后对到会的陈伯达说：“闭幕式你就不要参加了，你如果参加，别人会把你从主席台上撵下来。”主席说完话，陈伯达当时非常窘迫，他低着头坐在那里不动，这时总理走过去，给陈伯达咬了咬耳朵，陈伯达站起来怏怏不乐地退出会场了。陈走了以后，主席又接着说：“陈伯达的历史我和康老最清楚。我在这里向中央揭发陈伯达，陈伯达是个托派、叛徒……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陈伯达有变节行为，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国民党特务，一贯追随王明反共……”。主席还说：“对陈伯达还要看一看，可以给他当个中央委员。”

毛泽东的讲话，大家听了很不是滋味。过去，陈伯达号称马列主义理论家，在毛主席身边工作30多年，周恩来也说过：“伯达同志最能准确地表达毛泽东思想”。前几天，陈伯达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现在怎么又是“托派”，又是“变节”，又是“叛徒”，又是“反共”，有错误可以检讨嘛。怎么一得罪，就搞成这个样子？张春桥也是叛徒，为什么一字不提！？林彪揪张春桥就是分裂党，毛

主席揪陈伯达就是团结胜利的大会？大会讨论林彪的讲话就是改变大会的议事日程，大会学习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不也是改变大会议事日程嘛。听了毛讲完话后，人人面面相觑。不过主席讲到：“对陈伯达还要看一看，可以给他当个中央委员”时，叶帅突然发言。他说：“我看陈伯达的事不能这样就完了！？”毛主席听进了叶帅的话，遂决定对陈伯达审查，并由叶帅具体负责。

主席在九届二全会上，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神气，表现得淋漓至尽。毛主席已经站在党和国家之上了。这是毛泽东主席晚年所犯错误根本原因之所在。

最后总理又征求大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1970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的意见，这个时候大家哪有心思讨论这些，都说没有意见就散会了。

9月5日，讨论通过了《关于加强战备的报告》。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议由林副主席主持。

这是毛主席特意要林总主持会议的。毛主席说：“你要不主持会议，大家会有很多想法的。”

会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70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关于加强战备的工作报告》。会上也通过了全会的公报。

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他在讲话中，暗指陈伯达是黑秀才，大家上了黑秀才的当。暗指张春桥是红秀才，在会上公开给张春桥撑腰打气。接着主席说：“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是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事实上，谁也没说过“代表人民的标志就是要当国家主席”，大家提议设国家主席的目的，是为了健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

但在闭幕式结束前，周恩来讲话时说他代表毛泽东主席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全会闭幕了，服务员在打扫会场的卫生时，竟然从地上拾到“打倒张春桥——几个中央委员”的条子。周恩来看到条子后，非常感慨。我想主席看到条子后，一定也非常吃惊。

9月6日晚，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简短会议，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庐山的问题不下山，传达会议精神要控制范围。回到北京后，政治局举行一次学习生活会，各自做自我批评。‘孔夫子打拳，和为贵’。”康生则提出：“庐山的问题并没完，要追查到底，落实到人头，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周恩来只说了一句“应照主席指示办。”就散会了。

与会者陆续下山了。

9月7日，林彪下山了。周恩来去看望林彪，两人紧握双手，面面相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我下到九江机场向林彪送别，在飞机上大家合影留念。林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照常吃饭，照常睡觉，照常工作，最多是个彭德怀第二。你们有事情多向周总理请示报告。”从此以后林彪就很少和我们联系了。

周总理9月9日上午下山。

毛泽东9月9日下午下山，毛泽东走在所有中央委员之后。

9月6日晚，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叫黄、吴、李和我也去看望一下江青。吴说，他们可能不愿意去。叶群说去做做样子嘛。黄、吴、李和我几个到了江青住处，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江青才从楼下来，而且穿着睡衣，我们几个真窝火。江青象女皇一样，边走边说：“我向来是反对陈伯达的，你们又不是不知道。现在舒服了吧，过去你们不听我的话，犯了错误，今后听主席的话就是了。主席和我对你们的态度还是和过去一样的。你们主要是上了陈伯达的当。”从江青家出来，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戏子，戏子！真他妈窝囊。”

毛泽东内心苦涩

我认为毛主席内心是苦涩的，主席对高级干部的情况，心里都清清楚楚，文革中应不应该打倒这么多老干部，他心里最清楚。“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团结不同意见的人，甚至反对过自己的人一道工作”，这是毛主席经常教导的，可是，在文革中这些他都不要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否要用“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方法解决党内问题？党内搞这么大一场革命，是不是

应该由江青掌重权来做领导文革的工作？主席心里都清清楚楚。现在，他又以否定林彪的正确意见为代价，以否定四个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正确意见为代价，以否定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为代价，以否定 200 多个中央委员的正确意见为代价，换取了江青、张春桥的“安全”，这种代价也未免太大了。为了一个造反派张春桥（林彪称之为小记者），竟然打击了跟随他一生，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一身战功、一身枪伤的林彪，究竟是为了什么？

林彪讲“天才”是不是就是说毛泽东是生而知之，主席心里很清楚。林彪讲天才是对毛主席的歌颂和称道，是崇敬！在大家都在说刘少奇好话的时候，毛主席多么希望有人赞扬他，希望“要一点个人崇拜”。林彪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并且举起来以后，他又说“讨嫌”，令人无所适从，只有认为主席是谦虚，而且是伟大的谦虚。毛主席在庐山把“天才”和唯心论的先验论搞在一起，纯粹就是为政治服务了，有意把水搅浑了。

究竟国家主席有多重的份量，毛泽东清楚，林彪也清楚。如果国家主席是一个要职，在毛主席退居二线的时候，是决不会把这个职务让给刘少奇的。林彪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很清楚，他这个人一天保持健康地生活，正常地饮食起居都很困难，哪有精神去考虑非分的事。他非常清楚，虽然给他戴上了“接班人”的帽子，就他的身体状况来说，也是接不上班的，林彪对国家主席这样的虚职，根本就不感兴趣。

庐山会议的实质问题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林总为了扼制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这些中央文革的人在九大以后，仍然坚持搞极“左”的一套，就以张春桥为突破口，向中央文革实行了火力袭击，林彪是反中央文革的英雄。从 8 月 23 日下午 5 时，在 20 多小时之内，庐山烧起了熊熊烈火！出席二中全会绝大多数的人，都兴高采烈，沉浸在欢乐之中。但好景不长，毛主席于 25 日下午 5 时就把战火扑灭了。出席会议的绝大多数人，从兴高采烈变为脸无喜色了。主席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用“杀鸡给猴看”的办法，牺牲了陈伯达，暂时扑灭了战火。

九大以后，形势好多了，如果能够开一个比较成功的四届人大，情况就会更好一些。没想到毛主席又提出在四届人大上不设国家主席的主张，毛主席不顾国家体制，一个人说了算，大家又为因人废事而忙乎。林提出设国家主席，并要毛

当国家主席，正是“克己复礼”的建议，毛主席不但没有采纳，反而给林彪扣上“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的大帽子。

其实，毛泽东主席在文革的问题上，在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问题上“有病态”，他才造出了不设国家主席的“理论”。召开四届人大，必定要涉及到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必定要涉及到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必定要涉及到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必定要涉及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等。可刘少奇 1969 年 11 月已经死了，朱德委员长不能在人代会上当家，副委员长、副总理多数已打倒，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找都找不到了……我看毛主席想开一个马马虎虎的人大，不要开一个认认真真的人大，不然上面这些问题不好交待。这就是毛主席的苦衷，设不设国家主席根本不是问题的实质。

毛主席还有一个苦衷，就是文革的问题。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讲张春桥的话是含含糊糊的，并没有什么更重的味道，而且也没有点名。所以听林彪讲话的录音，讨论林彪的讲话，毛主席都同意了，总理也非常积极，而且总理、康生还整理了林彪的讲话。主席没有想到的是在讨论林彪讲话的时候，对张春桥形成的讨伐，实际上就是对江青掌控的中央文革的讨伐。而且，几乎全体中央委员都拥护林彪的讲话，几乎是一呼百应。这种号召力毛主席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江青说得对，表面上是对着张春桥来的，实际上是对着江青来的，也就等于是对着文化大革命来的。正如毛主席后来所讲，搞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否定了文革基本上等于否定了他。

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打击的是林彪和我们。从道理上讲这是不对的，从政治打击来说毛主席是早有考虑的。在小组会上，我们只是念了马列称天才的《语录》，拥护了林彪在开幕式上称毛主席是天才的讲话，拥护天才的观点，这既无什么大错，也不比别人调子高。为什么我们同意称天才，一个是林彪在开幕式上讲他“坚持天才的观点”，一个是“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林彪讲的，张春桥反对，我们是反对张春桥的。在小组会上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我们只是一般的提及。

从庐山会议上各小组的发言来看，汪东兴、许世友、陈伯达等人是最积极的，汪东兴、许世友提出了“揪人”。毛主席为什么要翻脸，就是因为“揪人”！揪谁呢？揪张春桥。毛主席认为对着张春桥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对着文化革命来

的。在庐山汪东兴、许世友、陈伯达等人跳得最高，毛主席为什么却搞黃、吳、李、邱呢？因为毛主席不是按谁跳的高打分的，而是按人划圈子。毛主席借“天才问题”和“设国家主席问题”为由头，把林彪和黃、吳、李、邱划在一个圈子里，先扣上帽子然后进行消弱和打击。这种削弱和打击不是在庐山偶然形成的，而是九大以后毛主席对林彪就不感冒了，他是要找机会削弱和打击林彪的，在庐山正是机会。

汪东兴与华北组六号简报

我跟汪东兴的关系一直都是工作关系，平时接触也不多。1968 年“楊余傅事件”以后，汪东兴和军委办事组的来往越来越密切，九大以后汪东兴就主动向军委办事组靠拢，经常和我们一起吹牛皮，有关主席和江青的关系，都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吳法宪经常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主席和江青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汪东兴和江青关系不好，他每次都说：“完全是两回事！”其实，主席和江青关系很深，毛泽东从来就没有真正批评过江青，更没有想过要打倒江青。留心历史的人就会发现，毛泽东每次讲批判江青的“坏话”，都未必是动真格的，“二月逆流”如此，林彪如此，后来对邓小平也如此。

汪的目的是想让我们冲在前面和江青斗。

汪还多次以透露毛，江之间隐私的第一手材料来巴结黃、吳、李和我。有一次，汪东兴从东北出差回来，还没有休息，就把黃、吳、李和我请到汪东兴家里来“吹牛”、“侃大山”，一侃就侃到第二天天亮。汪东兴说：江青做了妇科手术后就很少和主席在一起，后来就根本不在一起了。江青经常气主席，主席几次外出都是掉着眼泪离开北京的。不过主席也有不方便之处，其实是有短处，所以江青有些要求、有些提议，主席有些是反对的，有些也只好默认了。比如，江青要反田汉、周扬、夏衍、阳翰笙四条汉子，这本是江青的私心，但主席还是同意了。江青又在主席面前提出要批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席未置可否。汪东兴说：如果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批车尔尼雪夫斯基，你们不要表态。汪东兴说：张春桥最不是东西，他认为巴结上江青就能接近毛主席。上海“一月风暴”是主席、总理、伯达他们指挥的，张春桥既滑头胆子又小。张想在上海搞什么卫

星中心，主席没有同意。汪东兴还说，稳定全国的局势就靠军队了，你们几位老总是重任在肩啊！九大以后，不怎么提中央文革了，这个江青、张春桥，就是念念不忘中央文革……如果张春桥靠边站了，江青也很难有什么搞头。

汪东兴在庐山的表现是怎样的呢？

1、开幕式后他就告诉吴、叶、李和我以及陈伯达，主席说对张春桥“可以讲，但不要点名”。这样，使大家增强了对张春桥、江青一伙斗争的决心。

2、为陈伯达印马列称天才的语录，陈叫他印五份给常委做参考，汪自行印了 20 份，首先发给了吴、叶、李和我，并沾沾自喜地说：“近水楼台先得月。”

3、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是全会调门最高的。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在华北组的会上，汪东兴很严肃地说：“我们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他对问题发觉得早，挺身而出捍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不然问题可就严重了，我们再也不能糊里糊涂的了。”汪东兴的话等于告诉大家，有人在反对毛主席，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不是泛泛地在讲有人反对毛主席，而是有所指的，挑动大家起来斗争。当有人问汪东兴，有人反对毛主席当主席，这个情况毛主席知道吗？汪东兴说：“当然知道，不过主席不让点名。我一说你们就明白了：现在是笔杆子压枪杆子，压得很厉害呀！”汪东兴说是不点名，实际上已经等于点了名，大家都知道“笔杆子”指什么，指谁！中央全会就那么二百多人，汪的讲话很快大家都知道了，难怪毛主席说华北组的简报是反革命的简报，把大家都煽动起来了。

4、汪东兴开会前，就给吴法宪打电话，叫吴、李和我发言，还叫吴、李和我鼓动各自所在单位的中委发言，汪还强调说：“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今天发言是旗帜鲜明，明天就是随大流了。”二十四日晚上，汪东兴还亲自给我和李作鹏打了电话，汪几乎逢熟人便如此鼓动。

5、抢先出华北组简报。

6、“风云突变”以后，汪东兴欺上瞒下，推卸责任，陷害别人，对陈伯达尤甚。

汪东兴的表现真正是“汪东兴一声炮响，给全会送来了假毛泽东思想”。真正起到了轰动效应！！也把大家害得很苦。凭良心说，庐山会议，汪东兴、叶群

关系最密切，在会上态度最积极，调子最高。吴、李和我及部队的同志，如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等调子也高，但与叶群、汪东兴相比有差距。是主席自己没搞清问题，上了汪东兴的当，把事情搞乱了。主席在处理庐山问题时，把吴、李和我装进去，把汪东兴拉出来，名义上把矛头指向陈伯达，实际上指向林彪。结果把最大的起哄者汪东兴给“漏”掉了，汪东兴和叶群的关系也没有搞清楚，叶群和林彪的关系也没搞正确。

这里也要指出，六号简报被毛主席扣上反革命简报的帽子，可是反革命的帽子没有给汪东兴戴上，汪东兴敢做不敢当，不但推卸责任，还陷害别人。关于六号简报，毛主席也在帮汪东兴贼喊捉贼。

我放出来以后，1989 年到北京，我的一个知己来看我，他说听吴旭君同志说：王良恩被逼死后，汪东兴去给毛主席报告，汪离开时，主席指着汪的背影说：“这家伙又要了人家一条人命！”

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为什么那样积极，把我们引入“泥潭”。究竟是毛主席授意的，还是汪自己所为，我就百思不解了。也就是说，没有“设国家主席”，没有林彪坚持“天才的观点”，没有陈伯达搞得“称天才的语录”，毛主席就不拿掉林彪了！？

陈晓农著：《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摘录

观，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只不过是不同的“天才观”的反映。

2009 年 8 月 2 日初稿

2012 年 2 月 24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三册（1）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三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三章 批陈整风

第一节 一九七一年的新形势新任务

本节资料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农业新丰收》

春耕大忙季节快要到了。

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农村形势越来越好，十分鼓舞人心。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出现新的高潮。越来越多的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认真学习和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农业战线的斗、批、改不断深入。农业生产连续九年丰收，去年粮食产量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去冬今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很大成绩。现在，南方就要插秧，北方正在备耕，广大农村到处是抓革命，促生产的热气腾腾景象。

今年，是我国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农业丰收了，工业发展的速度就快了，我们在各项经济工作中的主动权就更多了。这是一条经过实践证明的客观规律。我们要认真搞好农业生产，绝不能因为连年丰收就掉以轻心。形势越是大好，头脑越要清醒。应该看到，我国农业生产的水平还是不高的，还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我们要不断努力，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农业进一步适应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需要。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努力搞好春耕生产，争取今年成为农业生产第十个连续丰收年。

思想和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问题。二十多年来农业发展走过的道路，九年来农业生产的连续丰收，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就巩固，生产就发展；违背毛泽东思想，

脱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资本主义势力就抬头，生产就停滞，甚至下降。这个历史经验，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我们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为纲，结合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继续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不断巩固和发展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农业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大寨是按照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样板，大寨的经验指出了我国广大农民继续革命的方向。为什么大寨和许多大寨式的先进单位能够战胜各种困难，迅速改变面貌？最根本的一条，是他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他们始终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有一股很大的干劲，同时注意从实际出发，总结经验，敢于同各种错误倾向进行斗争。我们只有提高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才能深刻理解大寨的经验，真正把大寨经验学到手。

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具体体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要坚决落实党的政策。毛主席亲自制订的党的各项农村政策，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关系到巩固工农联盟，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要坚持现阶段人民公社一般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要根据毛主席关于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指示，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要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搞好科学种田。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要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我们要继续认真抓好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各级领导同志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加强调查研究，遇事同群众商量，踏踏实实地做好工作。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

发展农业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事情。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一定要保证农业生产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动力，特别在当前大忙季节，更要注意把劳动力集中使用到春耕生产上。要落实工业、商业支援农业的各项措施，当前特别要

做好农业机具的修配和供应工作。各行各业都要把支援农业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切切实实地为春耕生产服务。

贫下中农和社员同志们，农村干部同志们，国营农场职工同志们，下放干部和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同志们，让我们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取得比去年更大的成绩。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一年二月十八日，社论）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

一、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今年三月十八日，是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纪念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感情，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一道，热烈庆祝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的节日”。①

一百年前，法国巴黎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举行了英勇的武装起义，创立了巴黎公社。这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巴黎公社废除了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军队和警察，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把枪杆子掌握在工人阶级的手里。

巴黎公社打破了资产阶级奴役人民的官僚机构，创建了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政策，组织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国家的管理。

巴黎公社的英雄们在创立和捍卫无产阶级政权的战斗中，表现了非凡的革命首创精神、冲天的革命积极性和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为世世代代的革命人民所敬仰。在刽子手梯也尔勾结俾斯麦实行的军事进攻和血腥镇压下，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历史功勋是不可磨灭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②

当巴黎硝烟弥漫，战斗仍在进行的时候，马克思就指出：“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③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的实践所总结的革命原则是什么呢？

概括起来说，就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④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和“打碎”⑤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⑥

马克思在阐明这个原则时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⑦无产阶级只有依靠革命的武装，才能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进而实现自己的全部历史使命。

马克思还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⑧

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后所说的那样）的思想”。⑨坚持用革命暴力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还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反复斗争的焦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反复斗争的焦点。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到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恰恰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上，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一百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不可战胜的。

巴黎公社起义四十六年以后，俄国无产阶级在伟大列宁的领导下，通过武装起义，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时代。列宁曾经说过：在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道路上，巴黎公社“走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走了第二步”。⑩

巴黎公社起义七十八年以后，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毛主席开辟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率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在中国实现了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

专政。接着，毛主席又率领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沿着社会主义的大道胜利前进。

一个世纪以来，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互相支援，互相鼓舞，把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不断地向前推进，取得了极其辉煌的胜利。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①①巴黎公社的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更高的阶段上获得广阔的开展。整个世界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纪念巴黎公社十周年的时候，曾经满怀革命的激情向欧洲工人阶级说：“旧世界的当权者们认为已经彻底消灭的公社，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生命力，所以我们可以和你们一起高呼：公社万岁！”①②今天，巴黎公社举起的革命火炬在全世界熊熊燃烧，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末日已经为期不远。在这样的时候，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更可以信心百倍地高呼：公社万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

我们纪念巴黎公社，就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吸取历史的经验，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同全世界人民团结在一起，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二、革命人民掌握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

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了掌握革命武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

列宁在论述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经引证了恩格斯的一个重要论断，这就是：法国每次革命以后工人总是拥有武装，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列宁认为，恩格斯这个总结，“正好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也是国家问题的实质（被压迫阶级有没有武装？）”。①③

巴黎公社是在武装的革命同武装的反革命激烈搏斗中诞生的。巴黎公社的七十二天，是武装起义、武装斗争、武装自卫的七十二天。最使资产阶级反动派闻风丧胆的，正是巴黎无产阶级掌握了枪杆子。而巴黎公社所犯的一个致命错误，恰恰是对反革命过于宽大，没有立即向凡尔赛进军，给了梯也尔喘息之机，使他能够

重新纠集反动军队，向革命的巴黎猛扑过来。正如恩格斯所说：“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①④

毛泽东同志用简洁的语言概括了武装斗争和人民军队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①⑤的著名论断，并且指出：“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①⑥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须坚持这个普遍原则，把它运用于本国的具体实际。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取得政权，取得革命胜利的，都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在广泛发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人民的武装，进行人民战争，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反复斗争，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俄国革命是这样，中国革命是这样，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等国的革命，都是这样，没有一个例外。

反之，无产阶级政党由于不搞革命武装或者放弃革命武装而使革命遭到挫折，则是有严重教训的：有的因为不去掌握枪杆子，当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发动突然袭击和反革命镇压时束手无策，使千百万革命群众人头落地；有的在革命人民已经拿起武器，人民武装已有相当发展的情况下，为了到资产阶级政府去做官，或者上了反动派的当，把人民武装交了出去，使革命成果白白断送。

近百年来，许多共产党参加选举，参加议会，但是没有一个党是用这样的方法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即使共产党在议会中取得了多数，即使参加了政府，也不等于改变了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更不等于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反动统治阶级可以宣布选举无效，解散议会，或者直截了当地使用暴力，把共产党一脚踢开。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进行群众工作，不搞武装斗争，热衷于议会选举，那就只能麻痹群众，腐蚀自己。资产阶级通过议会选举收买共产党，使它变成修正主义的党、资产阶级的党，这样的历史事实难道还少吗？

无产阶级要用枪杆子来夺取政权，也要用枪杆子来保卫政权。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因素中的主要因素。有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就可以对付国内外阶级斗争中出现的任何复杂局面，保卫住无产阶级的江山。((1)(2))

当代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伟大同盟军。民族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两个不同阶段、不同性质的革命。但是，要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同样要准备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武装较量。对于被压迫民族来说，掌握枪杆子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越来越频繁地采用军事干涉、武装颠覆、组织雇佣军入侵等手段，来镇压正在争取独立和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和人民。据不完全统计，二十五年来，美帝国主义策划和发动的武装干涉和武装侵略，达五十多次。至于它所策动的武装颠覆，更是不可胜计。因此，一切被压迫民族要取得解放，要保卫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要有效地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和颠覆，必须有自己所掌握的反帝武装，随时准备用革命战争来反对侵略战争。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亚、非、拉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反侵略反颠覆斗争，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毛主席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庄严声明中指出：“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①⑦

正如林彪同志所说：“人民战争是对付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有效的法宝。”①⑧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都将从没有武器到拿起武器，从不会打仗到学会打仗。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终将葬身在被它们自己点燃起来的人民战争的烈火之中。

三、革命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

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必须依靠千百万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列宁说：“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①⑨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给我们树立了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光辉典范。

巴黎公社成立前，一八七〇年秋天，马克思曾经指出法国工人起义的条件没有成熟。但是，当一八七一年三月，巴黎无产阶级以冲天的革命气概举行起义的时候，他立即以参加者的姿态，坚决支持和帮助这次无产阶级革命。尽管马克思看到公社所犯的错误，预见到公社将遭到失败，但是他仍然把这次革命看成是法国工人阶级最光荣的业绩。因为他在这次运动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②⑩马克思当时在给路·库格曼的信中满腔热情地赞扬说：“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②⑪列宁认为，马克思的这封信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机会主义者的天渊之别，他号召“每个识字的俄国工人都把这封信当作座右铭”。②⑫

同马克思主义者相反，一切机会主义者、新老修正主义者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也就必然极端害怕和仇视人民群众，讥笑、咒骂和破坏革命群众运动。当俄国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武装起义失败的时候，普列汉诺夫站在一旁指责群众“本来是用不着拿起武器的”。列宁愤怒地批判了普列汉诺夫这种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贵族老爷态度，痛斥他是臭名昭彰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叛徒。列宁指出，没有一九〇五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胜利。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一九五九年在痛斥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诬蔑和反对革命群众运动的谬论的时候，向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们尖锐地指出：

“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②⑬毛主席用这个历史经验深刻地教育了我们全党，要求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以马克思和列宁为榜样，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②⑭各国人民打倒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吼声，震撼全球。帝国主义的战略后方，已经变成了反帝斗争的前线。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发展，推动了世界规模的反美斗争新高潮。反对两

个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声势越来越大。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迅猛发展。朝鲜、日本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日益高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在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战斗中继续前进。北美、欧洲、大洋洲爆发了空前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美国工人、学生、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日益觉醒，掀起了反对尼克松政府反动统治和侵略政策的革命风暴。在美帝的“后院”拉丁美洲，长期压抑在人民心中的反美怒火迸发出来，出现了为保卫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而联合斗争的新局面。东欧一些国家人民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方兴未艾。在一向比较沉寂的地区，也响起了革命的春雷。所有这些斗争，彼此呼应，互相激荡，汇合成为强大的世界人民革命运动的洪流。在当前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面前，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一切革命政党和革命者都要作出自己的抉择。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一切革命者要热情支持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坚决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头，领导群众前进。

无产阶级政党和一切革命者，都“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②⑤一定要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善于发现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从群众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投身到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才能得到锻炼和成长。正确的纲领、路线，也只有在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才能产生和发展起来，并得到检验和贯彻执行。

革命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好的，总是适合社会发展的。在群众运动中，会有各种思潮的影响，各种派别的出现，各种人物的参加。这是很自然的。世界上没有什么纯而又纯的事物。广大群众经过斗争的实践，经过反复的比较，终究会识别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终究会抛弃修正主义和一切错误的东西，接受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真理。无产阶级政党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长期的、艰苦的、耐心的工作，不断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引导群众运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要求不断增强革命力量内部的团结，粉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的分裂和破坏阴谋。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

切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人们，总是要革命的。为了战胜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不包括敌人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艰巨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②⑥在夺取政权的时候，要依靠群众，搞群众运动；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同样要依靠群众，搞群众运动，在一切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②⑦

四、要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明确地提出：“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②⑧这是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消灭阶级这一最终目的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巴黎公社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地位，还没有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党。而在巴黎公社中占优势的布朗基主义和蒲鲁东主义，则不可能把无产阶级革命引向胜利。

历史的经验证明，有了大好的革命形势，有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还必须有无产阶级的坚强领导核心，即要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②⑨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取得革命的胜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许多国家出现过革命形势。但是，由于第二国际的大多数政党堕落成为修正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党，因而根本谈不上引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只有俄国，在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得到了成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在中国，由于有了毛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革命取得了胜利；其他一些国家，也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相继

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或者坚持了长期的革命斗争。而有些国家，则由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在党内占了上风，使革命遭到失败。

当前，世界革命出现空前大好的局面。客观形势迫切需要有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坚强领导，需要建设一个同修正主义路线彻底决裂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广大群众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党。

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要能够担负起领导革命的任务，根本的问题，就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订和执行一条适合本国情况的正确路线。路线对了，力量弱小可以发展壮大，没有武装可以建立武装，没有政权可以取得政权。路线错了，革命就会受到挫折，已经得到的成果也会丧失。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反复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③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③①

毛泽东同志给日本工人朋友们的重要题词，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根本原则，指出：“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③②

无产阶级政党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社会的阶级关系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具体地分析本国的现状、历史和本国革命的特点，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国际经验是要学习的，但不能机械照搬，而要结合本国的实际，创造自己的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够把革命引向胜利，对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无产阶级政党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群众，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③③的领导方法，使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变为群众的行动。同时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人民的利益坚持正确的、改正错误的，从斗争的实践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再来指导斗争的实践。毛泽东同志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③④无产阶级政党要保证自己政治路线

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就必须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2)(3))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从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同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为了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不断向前推进，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革命人民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继续批判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

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在社会上长期处于统治地位。不论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还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不论共产党是处于合法地位，还是处于非法地位；不论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还是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资产阶级总是要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力图从思想上影响、腐蚀和“溶化”共产党。如果不同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进行坚决的斗争，那么无产阶级政党就不可能保持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就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只有拿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武器，坚持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才能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力，取得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

五、现代修正主义是巴黎公社革命原则的叛徒

当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隆重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的时候，苏修叛徒集团居然粉墨登场，侈谈什么“忠于巴黎公社的原则”，③⑤把自己打扮成巴黎公社的继承者，真是不知羞耻到了极点。

苏修叛徒们有什么资格来谈论巴黎公社呢？正是你们这一伙，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列宁所缔造的、斯大林所捍卫的苏维埃国家改变了颜色。你们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实行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这是对巴黎公社革命原则的最大背叛。

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都企图用“全民国家”这个幌子来掩盖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过去，赫鲁晓夫说，苏联已经“变成为全民的国家”了。③⑥现在，勃列日涅夫之流又说，他们的国家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全民国家”，③⑦他们实行的是“苏维埃民主”。这统统是骗人的鬼话。

苏维埃，是俄国无产阶级的伟大创造，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是一个光荣的名称。但是，苏维埃这个名称，同共产党这个名称一样，布尔什维克可以用，孟什维克也可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用，修正主义者也可以用。问题不决定于名称，而决定于实质；不决定于形式，而决定于内容。今天的苏联，苏维埃的名称没有变，国家的名称没有变，但阶级内容完全变了。被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领导权的苏维埃国家，已经不是无产阶级镇压资产阶级的工具，而是复辟了的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苏修叛徒们把苏联变成了一小撮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乐园，千百万劳动人民的监狱，这就是他们的所谓“苏维埃社会主义全民国家”和“苏维埃民主”的全部内容。根本不是什么“全民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直接继续”，③⑧而是勃列日涅夫路线是赫鲁晓夫路线的“直接继续”，这就是今天勃列日涅夫之流所以要死抱住“全民国家”这个口号的实质所在。

苏修叛徒集团对巴黎公社革命原则的背叛，还集中表现在他们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勃列日涅夫之流叫嚷：“无产阶级的领袖要在斗争的每个阶段把暴力压缩到最低限度”，“采取更加温和的强制形式”；“武装斗争、国内战争会引起大规模牺牲和人民群众的痛苦，引起破坏生产力，毁灭优秀革命干部”。这伙叛徒为了给他们的“和平过渡”谬论制造借口，竟然任意歪曲历史，宣扬什么巴黎公社“起初”“几乎是完全不流血的革命”。③⑨

巴黎公社的革命，始终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生死搏斗，是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暴力斗争。巴黎公社起义前，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巴黎人民就举行过两次武装起义，都遭到反动派的血腥镇压。而在巴黎公社起义后的战斗中，又有几万工人和劳动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怎么能够把这次革命说成什么“起初”“几乎是完全不流血的革命”呢？马克思曾经指出：“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④⑩现在，苏修叛徒集团却公然跳出来充当替刽子手祷告的教士，这是对巴黎公社英烈们的极大污辱！

苏修叛徒们为反革命暴力百般辩护，对革命暴力却切齿咒骂。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暴力统治下，劳动人民每天每日、每时每刻都在遭受无穷的痛苦和大量的死

亡。被压迫人民进行暴力革命，正是为了结束吃人的制度，使人民摆脱奴役和剥削。苏修叛徒们竟然给革命的武装、革命的战争加上了那么多的罪名，什么造成“人民痛苦”呀，“毁灭干部”呀，“破坏生产力”呀，等等，等等。按照苏修叛徒的这种逻辑，岂不是等于说，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压迫人民、屠杀人民成了天经地义，而革命人民拿起武器，奋起反抗，反倒是罪大恶极了吗？

苏修叛徒们要各国人民把革命暴力“压缩到最低限度”，而他们自己却把反革命暴力不断地膨胀到最高限度。勃列日涅夫之流，不顾苏联人民的死活，大搞军国主义和军备竞赛，花了那么多的卢布，造了那么多的飞机、大炮、军舰、导弹、核武器。他们就是用这个庞大的暴力机器，对内压迫广大人民，对外维护新沙皇的殖民统治，并力图把一些国家置于它的控制之下。他们就是用这个暴力机器，作为同美帝国主义讨价还价，推行强权政治，划分势力范围的本钱。

苏修叛徒们要革命人民对反革命采取所谓“温和的强制形式”，而他们自己却采取最野蛮、最残暴的手段对付革命人民。

试问：

你们出动大批武装军警，镇压国内各族人民，这难道算是“温和”的形式吗？

你们在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驻扎重兵，对这些国家严加控制，甚至把坦克开进布拉格，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军事占领，这难道算是“温和”的形式吗？

你们到处进行军事扩张，对别的国家进行种种阴险的颠覆活动，这也算是一种“温和”的形式吗？

苏修叛徒们的所作所为充分说明，他们不仅反对暴力革命，而且用暴力来反对革命。他们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实际上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④①

还有一个日本的宫本修正主义集团，也在那里起劲地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必须百分之百地”走议会道路。④②他们挖空心思，说什么“暴力”一词在字典上是“粗暴的”、“无法无天的”意思，人民不能进行这样的革命。④③又说，有人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感到“惶恐不安”，这个词的译法“很不贴切”，今后要“真正准确地进行翻译”。④④宫本集团为了维护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暴力，反对日本人民起来革命，居然乞灵于字典，玩弄字义的考据。这表明现代修正主义的精神堕落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④⑤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号代表赫鲁晓夫，早已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追随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诺沃提尼、哥穆尔卡，也一个接着一个倒了台。可以肯定，凡是违背历史的规律，背叛巴黎公社革命原则，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都决不会有好下场。

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争取更大的胜利

巴黎公社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十月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证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束，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走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当十月革命的故乡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还灵不灵，十月革命还灵不灵，无产阶级专政还灵不灵，一时似乎成了问题。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兴高采烈，得意忘形起来。他们想：既然苏联可以“和平演变”，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岂不是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推翻吗？但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

毛主席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伟大的新贡献，给我们开辟了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胜利航道。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亿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越来越深刻地结合起来，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伟大的力量。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斗争的中心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他们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总是要在共产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因此，无产阶级不仅要警惕象梯也尔和俾斯麦那样的敌人用武力推翻革命的政权，而且特别要警惕象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那样的野心家、阴谋家从内部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

阶级除了要进行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要让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个最锐利的武器为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所掌握，使他们能够识别什么是正确的路线，什么是错误的路线，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以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毛主席指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④⑥

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从来是国际性的。因此，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就必须实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④⑦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④⑧的伟大口号。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要支持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要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同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息息相关，联成一气的。我们从来把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自己的斗争，看作是对中国人民的援助。我们要向各国革命人民学习，坚决支持他们的斗争，履行我们应尽的义务。我们要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进一步加强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的战斗团结，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战斗团结，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马克思在一百年前曾经指出：“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然将遍立于全世界。”④⑨马克思的这个伟大预言，正在越来越成为光辉的现实。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宣布：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的最后灭亡，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解放，都是不可避免的！今天，巴黎公社诗人欧仁·鲍狄埃写的《国际歌》，已经响彻全球。“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让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在世界人民革命的大

风暴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⑤⑩

注释：

① 恩格斯：《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给法国工人的贺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三一页。

② 马克思：《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六十一页。

③ 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六七七页。

④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三五五页。

⑤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三六〇页。

马克思：《给路·库格曼的信》（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第二版，第二一五

⑥ 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四六八页。

⑦ 同⑥

⑧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三五八页。

⑨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八九页。

⑩ 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四四三页。

①①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六〇页。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致斯拉夫人在伦敦举行的巴黎公社纪念大会主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七一页。

①③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三六页。

①④ 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三四四页。

①⑤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三五页。

①⑥ 同①⑤

①⑦ 毛泽东：《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

①⑧ 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九六五年九月三日）。

①⑨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一五二页。

②⑩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〇一页。

②① 马克思：《给路·库格曼的信》（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第二版，第二一五页。

②② 列宁：《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一〇一页。

②③ 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批语（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毛主席在这个批语中所引的列宁的话见：《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八六页；《十月革命四周年

②④ 同①⑦

②⑤ 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九三六页。

②⑥ 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四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

②⑦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〇九七页。

②⑧ 马克思、恩格斯：《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一六五页。

②⑨ 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六〇页。

③⑩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七九五页。

③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③② 毛主席给日本工人朋友们的重要题词（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③③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九〇一页。

③④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九四页。

③⑤ 苏修《共产党人》杂志一九七一年第二期文章：《巴黎公社与当代现实》。

③⑥ 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八日在苏修“二十二大”上关于“苏共纲领”的报告。

③⑦ 勃列日涅夫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一日在“纪念”列宁诞生一百周年大会上的报告。

③⑧ 苏修《真理报》一九七〇年六月七日文章：《全民国家与民主》。

③⑨ 费·康斯坦丁诺夫等主编的反华黑书，苏联“思想”出版社一九七〇年八月出版，第一一九——一二〇页。

④⑩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三八四页。

④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八九二年德文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七三页。

④② 野坂参三的一次谈话。一九七一年一月三日《赤旗报》

④③ 藏原惟人在日修“纪念”列宁诞生一百周年报告会上的讲话。一九七〇年四月二日《赤旗报》。

④④ 宫本显治在日修京都府委员会召开的一次集会上的讲话。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日《赤旗报》。

④⑤ 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

④⑥ 转引自林彪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④⑦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五十八页。

④⑧ 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四一二页。

④⑨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五八七页。

⑤⑩ 同④⑦

（附图 [图] 这是巴黎公社的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法兰西共和国巴黎公社第九团第一一七营”。）

(附图〔图〕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巴黎公社宣告成立时，广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和“公社万岁！”的口号声(画))

(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社论)

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全世界无产者团结战斗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来到了。中国人民满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感情，向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战斗的敬礼！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新高潮继续向前发展。国际反美统一战线正在不断扩大。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辉煌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北美、欧洲、大洋洲的革命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此呼彼应。朝鲜人民、日本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声势越来越大。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克服重重阻力，在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战斗中继续前进。许多长期受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欺负的中、小国家，纷纷挺起腰杆反抗两个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在美国国内，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尼克松政府侵略政策、战争政策和种族歧视的斗争空前高涨。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他们好象坐在火山口上，日子很不好过。

我国人民同世界革命人民在反对帝、修、反的斗争中并肩前进。我们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兄弟友谊日益巩固。我们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战斗团结日益加强。我们同全世界人民的友好联系也日益增进。我国的国际关系不断发展。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面对着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大好革命形势，在庆祝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节日的时候，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进一步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一天起，就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伟大口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列宁又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伟大口号，并且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群众“共同发动革命进攻，世界帝国主义就一定会灭亡”。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证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可战胜的旗帜。 ((1)(2))

毛主席一向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用“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思想，教育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并且反复指出我们要联合不包括敌人在内的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同占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团结在一起。在取得全国胜利以后，毛主席强调指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毛主席还教导我们：“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也就是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思想，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因此，我们要把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自觉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要内容。

我们党和政府一贯坚持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政策。我们过去这样做，今后仍然坚持这样做。这不仅符合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人民在自己的长期革命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来都是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无论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前，还是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中国人民都得到各国人民的支援。世界各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解放了的中国人民，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念念不忘世界上一切正在为争取自己的解放和保卫

自己的独立自由而斗争的人民。如果忘记，那就是背叛。我们对各国人民的支援，是自己应尽的光荣的国际职责。

毛主席指出：“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我们坚决反对自以为高人一等、可以骑在别人头上称王称霸的所谓“超级大国”，而主张大国小国一律平等，互相尊重。我们一向认为，各国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各国朋友们到中国的友好访问，是对中国人民的支持和鼓舞，而且是我们向各国人民学习的良好机会。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虚心地学习各国人民的长处，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们的宝贵经验。这样，我们就可以同各国人民更好地互相支持，共同前进。在大好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更加刻苦地学习，更加努力地工作，把我们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得更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党在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担负的艰巨任务，迫切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批判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所贩卖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以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我们要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一年国民经济计划，继续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我们要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的新胜利，迎接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

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实现毛主席提出的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为支援世界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社论）

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革命化的必由之路 纪念毛主席发出〈五·七指示〉五周年》

伟大导师毛主席发出《五·七指示》，已经五周年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主席在给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一封信中指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从事群众工作，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是这样，都要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毛主席教导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毛主席根据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一科学分析，根据国内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我们党制订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光辉的《五·七指示》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途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建设军队、建设国家、改造社会的宏伟纲领。

五年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五·七指示》越来越深入人心。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努力把各个单位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亿万革命群众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

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发起猛烈的进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巩固。我们的人民精神焕发，朝气蓬勃。我们的建设事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正在经历着极其深刻的伟大变革。

《五·七指示》总结了我军几十年建军经验，要求我军的革命化建设更要有所发展。在《五·七指示》指引下，人民解放军把军学、军农、军工、军民分别兼了起来，积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作用。各行各业兼学军事。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军民团结、军政团结进一步加强了。这对于贯彻人民战争的思想，加强国防，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五·七指示》是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重要文献。毛主席发出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战斗号令，正在变成现实。工人阶级及其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占领教育阵地，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从斗争实践中来的工农兵新学员，跨进了社会主义新型大学。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实行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正在建立。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正在茁壮成长。

《五·七指示》为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指明了方向。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在阶级斗争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特别是在领导上层建筑的斗、批、改中，不断提高政治觉悟，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作用。成千上万的革命干部、知识青年、在遍布各地的“五·七”干校中，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自觉改造世界观，焕发了革命的青春。

今天，在纪念毛主席发出《五·七指示》五周年的時候，我们要认真总结贯彻执行《五·七指示》的丰富经验，深刻理解毛主席这一光辉文献的伟大意义。落实《五·七指示》不是一个部门的事情，不是一部分人的事情，也不是一时的事情，而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事。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要坚定不移地走“五·七”道路，把自己锻炼成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每一个部门都要全面落实《五·七指示》，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这样，我们的党就不会变质，我们的国家就不会变色，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一定胜利。

按照《五·七指示》，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第一位的东西是“学政治”，“批判资产阶级”。农副业生产要搞，有条件的地方，中小型工厂可以办，但都

要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要把着眼点放在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上。当前，要根据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伟大教导，开展批修整风。这是一场继续揭露和批判王明、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斗争，是一次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我教育运动。我们要认真读马、列的书，认真读毛主席著作，深刻理解毛主席是怎样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要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要在学习和批判中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按照《五·七指示》，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要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作为课堂。人的正确思想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在革命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的。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理论和实践统一的观点。离开群众斗争的实践，落实《五·七指示》就成了一句空话。忽视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认为“身在实践中，思想自然红”，也是错误的。只有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积极投身于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才能在思想革命化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

回顾五年来贯彻执行《五·七指示》的历程，重温毛主席这一伟大文献，我们感到无比亲切。“五·七”道路是革命化的必由之路，让我们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五·七指示》的光辉大道继续前进，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一年五月七

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工业学大庆》
大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倡的一面红旗。

“工业学大庆”，是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的伟大号召。

几年来，毛主席的号召极大地鼓舞了我国工人阶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越来越深刻地改变了我国的工业面貌。今年，在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时候，许多地方的党代表大会提出进一步开展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一个以大庆为榜样，抓革命、促生产的群众运动的新高潮正在蓬勃发展。这对于推动工业

战线的斗、批、改，加快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大庆，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榜样。大庆的道路，是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展工业的道路。

发展工业走什么道路，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面临的新课题。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存在着马克思主义路线和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列宁的观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而一切机会主义者都拜倒在资产阶级脚下，否定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作用。这个斗争，是唯物历史观和反动的唯心历史观的斗争，是用革命化领导机械化，还是用机械化取消革命化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要建设社会主义，还是要复辟资本主义。

毛主席总结了国内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著名的“鞍钢宪法”的批示等光辉著作中，系统地提出了发展工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号召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在毛主席光辉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工人阶级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推动工业建设不断高速度地发展。

大庆油田会战，就是在一九六〇年我国经济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迎着帝修反掀起的反华恶浪，迎着刘少奇一伙在工业上刮起的下马黑风，打上去的。英雄的大庆工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头顶蓝天，脚踩荒原，不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讽刺打击，蔑视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的条条框框，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建起了我国第一流的大油田，甩掉了西方资产阶级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贫油国家”的帽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庆工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以出色的成就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庆油田的开发和建设，充分体现了“鞍钢宪法”的精神，是我国工业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实践。

学大庆，就要象大庆那样，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两论起家，以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为指针，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解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的各种问题。

学大庆，就要象大庆那样，大学解放军，把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军委对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指示，当作对自己的指示，把古田会议决议和一九六〇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建军方向，当成自己的建设方向，实行政治建厂，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开展四好运动。

学大庆，就要象大庆那样，坚持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技术革新和勤俭建国的原则，全面体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多快好省的要求。

学大庆，就要象大庆那样，坚定地走毛主席《五·七指示》的道路，以工为主，兼学军事、政治、文化，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在同大庆条件类似的地方，要建设“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社会主义新型工矿区。

总之，学大庆，就要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样，才能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工业建设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思想和路线问题。思想对了，路线对了，我们在发展工业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都会得到正确的解决。为什么大庆油田的建设发展这么快？为什么有些企业的生产长期徘徊，停滞不前？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个马列主义多些，能够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个马列主义甚少，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差。这个历史的经验，我们要牢牢记取。要看到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还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辩证统一论，还是反动的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还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在这些根本问题上，还要经历长时期的斗争。谁要是对这场斗争掉以轻心，就会犯极大的错误。

几年来，学大庆群众运动的发展充分证明，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阶级斗争的规律总是这样，我们做出一点成绩，就会有人不高兴，我们的成绩越大，他们越是要骂街。大庆出了油，出了经验，出了一支革命化的队伍，狠狠地刺痛了刘少

奇一伙。他们千方百计要砍倒大庆这面红旗，或者否定大庆经验中最根本的东西，或者把大庆的一些具体经验偷换成为资产阶级的货色。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又从形“左”实右的方面破坏大庆。我们有些同志，多年来不读马、列，对阶级敌人变换各种手法向我们发起的进攻，丧失了批判能力，受了骗，上了当。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开展批修整风。要认真总结经验，坚持调查研究。辨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提高了，才能把大庆经验真正学到手。

大庆的经验充满高度革命精神，没有一个革命化的密切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是学不好的。王进喜同志，是大庆工人阶级的模范人物，也是大庆领导班子的优秀代表。他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铁人”，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雄，当了中央委员不骄不躁，一面工作，一面劳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王进喜同志是毛主席表彰过的那种老实人，是发扬大庆油田“三老”“四严”等革命作风的榜样。各级领导班子的成员都要向王进喜同志学习。要有更高的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更大的革命干劲。那种安于现状的中游思想和因循守旧的庸人哲学，必须彻底抛弃。要遵照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抓好典型”的教导，抓好本地区学大庆的先进样板，以点带面，领导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踏踏实实地、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不要生搬硬套，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一有成绩就翘尾巴。这样，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才是头脑冷静的促进派。

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正在全国兴起，大庆的工人，解放军“三支”、“两军”人员，革命干部，革命技术人员，革命家属和青年同志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加强团结，艰苦奋斗，保持大庆光荣传统，发扬大庆革命精神，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全国工业战线的同志们，让我们以大庆为榜样，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胜利前进吧！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日，社论）

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

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已经整整五十年了。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七十多年的英勇斗争。但是，这些斗争，包括洪秀全、孙中山领导的大规模的革命运动，都失败了。感谢伟大的列宁，他领导的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正象毛主席所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成员，几个共产主义小组。但是，这是新生力量，而新生力量本质上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飞机大炮也好，白色恐怖、特务横行也好，叛徒、内奸的阴谋破坏也好，都没有能够把中国共产党消灭掉。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斗争，已经成为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已经改造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一个政党的成功或失败，决定于路线是否正确。路线不正确，即便夺取了政权，还会丧失政权。路线正确，没有政权也会取得政权。但是，正确路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同错误路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林彪同志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王明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红军的路线，战胜了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联盟，经过长期斗争，又粉碎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党正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特别是在战胜了对党危害最大的陈独秀、王明、刘少奇这三个叛徒集团的斗争中，巩固、发展、壮大起来的。”正是毛主

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引导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曲折的革命道路上，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从小到大，从失败到胜利，直到取得今天这样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的時候，我们全党的任务，就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贯彻执行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路线，完成“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二中全会确定的各项战斗任务。当前，特别需要在全党开展批修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和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这是党的事业继续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

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谁否认它，或者口头上承认，实际上否认，谁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究竟在中国怎样才能实现这个任务呢？列宁根据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向东方各民族的共产主义者指出：你们必须看到你们那里的特点，你们必须根据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列宁强调说，这是“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显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不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谈不到夺取政权，就谈不到革命的胜利。

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等问题，作了正确的回答。毛主席指出：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前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

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主席指出：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设起来的共产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主要武器。中国革命正是按照这条道路发展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这样四个历史阶段。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前后二十八年，才解决了武装夺取政权这个问题。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的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这个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毛主席在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了具体分析。明确地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又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毛主席特别重视发动农民和武装农民的问题，指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又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样，就解决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既反对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只要国民党、不要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又反对了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不要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

当时担任中国共产总书记的陈独秀，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派。他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甚至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他认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只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只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他叫嚷中国无产阶级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不能成为领导阶级，污蔑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他根本拒绝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放弃了对农民、对城市小资产阶级、对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在统一战线中，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工农群众起来了，他唯恐吓坏了资产阶级。陈独秀及其追随者刘少奇竟然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将武装交给国民党。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

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的时候，广大群众手无寸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后来，陈独秀坚持托洛茨基反动立场，认为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建立，表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无产阶级只能去搞合法的议会斗争，等待将来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以后，再去搞所谓社会主义革命，这也就是取消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蒋介石的屠杀所吓倒。蒋介石、汪精卫、陈独秀这些反面教员，使我们懂得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懂得了“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为了挽救革命，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举行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正确的方面是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错误的方面是没有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群众，建立根据地，而是城市中心，依赖外援。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撤消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八七”会议以后，毛主席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一九二八年四月，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来到井冈山。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农红军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对中央红色根据地的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广西、广东、四川、陕西等地的游击战争都先后有了发展。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经验，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著作，从理论上阐明了在中国武装夺取政权不能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而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毛主席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当我们党同国民党分裂，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后，很快又出现了一九二七年底至一九二八年初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个时期，虽然出现过陈独秀取消主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以及其他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的倾向，但是，主要是这三次“左”倾机

会主义路线，特别是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危害极大，教训极深。

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王明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却又说什么中央“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认为“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实际上推行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王明如同其他“左”倾机会主义者一样，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根本不懂。他们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他们不懂得工人，不懂得农民，不懂得打仗，不懂得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他们对中国的阶级关系根本不调查，不研究，鼓吹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他们实行许多“左”的政策，“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在军事路线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转化为拼命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路线上，实行宗派主义，夺了毛主席的权。对不同意他们错误路线的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以太上皇的姿态，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到处推行他的错误路线。结果，使我们党的力量，在红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在白区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使红军被迫转移，进行长征。

两条路线，两种结果，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全党。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军队建立了军队，没有革命根据地开辟了革命根据地。按照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却丢掉了革命根据地，使工农红军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经过革命实践的反复检验，证明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王明“以我为核心”，自封“百分之百”正确，原来是个假马克思主义者。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这是流了多少鲜血，付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呵！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遵义会议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红军一方面军组成了北上抗日支队，进军陕北，鼓舞了全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接着，我们党又粉碎了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路线。一九三六

年十月，二、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同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这时候，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不足三万人。我们党的力量，数量上暂时减少了，但是由于路线正确，质量上却比过去更强大了。

从一九三七年起，我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胜利地实现了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但是，民族矛盾的上升，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第二次建立，象潮水一样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反映在党内，就是我们党同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抗日战争初期，叛徒王明从极“左”跳到极右。王明借口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完全取消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质上是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不敢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作坚决斗争，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放手发展革命军队，不敢在日寇占领区扩大抗日根据地，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这样，王明又回到了一九二七年陈独秀“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错误路线上去了。这个时期，刘少奇从白区跑到革命根据地。他表面上反对王明路线，拥护毛主席正确路线，把自己吹嘘成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而把他的真实面目掩盖起来。实际上，他早已是叛徒、内奸、工贼，他在白区推行的完全是一条错误路线。他抛出的黑《修养》，根本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如何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不谈武装夺取政权，而要共产党员离开伟大的革命实践去学习什么孔孟之道，去搞什么唯心主义的“修养”，宣扬的也是一条投降主义路线。这个时期出现的所谓“国防文学”、“国防哲学”，实际上就是卖国文学、投降哲学。它是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也是刘少奇白区工作错误路线的产物。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作了系统的彻底的批判。毛主席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针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告诫全党：“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毛主席重新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但是，王明抗拒毛主席的路线，继续推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在报告和结论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问题，驳斥了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规定了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武装斗争的路线和政策。全会通过了毛主席的报告和结论。后复地教育全党，统一战线“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由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经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由于彻底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又纠正了在同国民党作斗争时出现的“左”的倾向，坚持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正确方针，在对反共顽固派斗争时，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我们党战胜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紧紧地掌握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克服困难，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发展壮大了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和各个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同志从党创立的初期就非常重视党的思想建设。毛主席写的古田会议决议和《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对全党的思想教育起了巨大的作用。四十年代初期，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党中央抓住了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这个极好的时机，开展了全党整风运动。毛主席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整风文献，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主席指出：“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全党通过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揭露各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分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分清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非无产阶级思想，收获很大。在整风中，实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全党干部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

一九四五年四月，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毛主席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决定了党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党的“七大”是一个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鼓舞了全国亿万人民愚公移山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我们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发展到一百万人，解放区已经扩大到一亿人口。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空前强大。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国内外的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念念不忘消灭共产党的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决心发动反革命内战。我们敢不敢斗争，敢不敢胜利？“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是摆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这时，刘少奇抛出了所谓“中国已经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刘少奇鼓吹“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要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形式。”“我们党的全部工作要实行改组。”刘少奇要我们党把军队和革命根据地交给蒋介石，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去当官，同美蒋反动派“合作建国”。这条路线，是陈独秀、王明路线的继续，是美共叛徒白劳德修正主义路线在中国的呼应。毛主席坚决地反对了刘少奇的投降主义路线。毛主席尖锐地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毛主席又指出，“‘针锋相对’，要看形势。”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这是针锋相对。他们要谈判，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根据当时的形势，毛主席部署了击破蒋军进犯的作战准备，又亲自到重庆谈判，揭穿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针对当时流行的恐美病，毛主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揭穿了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质。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后，毛主席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失时机地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率领全国人民以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毛主席规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我们党在这个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规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

方针；并且按照全国革命进展的不同情况，规定了土地改革、整党建党、整军建军等一系列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党发布了适合全国农民愿望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纠正了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去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右倾错误，又纠正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在土改、整党中，侵犯中农、侵犯工商业、“搬石头”、搞扎根串连、“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等等形“左”实右的路线。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区人民和蒋介石统治区广大人民的支援下，消灭了美帝国主义武装的八百万蒋匪军，解放了除台湾省和若干海上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埋葬了蒋家王朝，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毛主席早在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全国解放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矛盾的焦点，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明确地指明了我们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二十八年的英勇奋斗，只是朝着最终目的地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不是革命的结束，而是第二步的开始。

我们辽阔的国土是逐步解放的。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我们党依靠自己的军队，一边打仗，一边发动群众，同广大人民在一起，坚决地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和政策，摧毁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人民政权，没收了占现代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全部官僚资本，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我们又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在三年的时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五三年，在进行“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以后，毛主席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和我们的实践，

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使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是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步骤。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坚定的，又是逐步前进的。对农业，经过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代购代销到公私合营，给予估产定息，实行赎买政策。有些害急性病的人，觉得这种办法不过瘾，过渡的时间太长了，最好一个早上就能解决问题。这种“左”的倾向经过教育较快地克服了。

社会主义革命是埋葬资本主义的斗争，受到全国劳动人民的欢呼，也遭到刘少奇一伙的猖狂破坏。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等人结成了反党联盟，妄图分裂中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阴谋被党中央及时地粉碎了。刘少奇一贯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早在一九四九年，他就背着中央，违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到处鼓吹“剥削有功”论。五十年代初，他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口号。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就是“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势力，就是不搞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及时地批判了这个口号，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纲领性质的错误。毛主席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等一系列光辉著作，批判了刘少奇一伙大砍合作社的右倾错误，批判了他们所谓“先机械化，后合作化”和发展富农经济的谬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贫农、下中农实现合作化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只经过一年多时间，全国五亿农民兴高采烈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由于无产阶级占领了广大农村阵地，工人农民两头一夹攻，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逼得他们不得不接受改造。一九五六年，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对手工业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大变动中，工农业生产不但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得到发展，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

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面临着一个新问题。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还有没有阶级、阶级矛盾和

阶级斗争？中国革命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刘少奇一伙的答案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伯恩施坦、考茨基的“唯生产力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这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说要等到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以后无产阶级才能夺取政权；在社会主义改造到来的时候，他们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们又搬出这一套，不准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照他们的说法，解决了所有制问题，阶级斗争就熄灭了，不需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了，只要抓生产就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太“先进”了，不适合中国今天的需要，应当退回去，应当发展资本主义。刘少奇一伙还背着毛主席，把这些黑货塞进了“八大”的决议，妄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强加给全党。

毛主席当时就指出“八大”决议中刘少奇一伙塞进的这些话是错误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不久，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地回答了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毛主席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毛主席指出：“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因此，“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

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毛主席用战无不胜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彻底地驳斥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谬论，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了我们党。

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发展，不断地用新的事实证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列宁故乡复辟资本主义这一严重事件的出现，极其深刻地教育我们：单有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彻底的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不巩固的。人们只要看一看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的历史，就会明白：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一下子就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当然要比历史上那些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要更加激烈，更加曲折。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利用苏联和全世界无产阶级没有精神准备，复辟了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坏事，但是，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它教育了苏联人民，教育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资产阶级在苏联的复辟只是一个暂时现象。苏联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一定会战胜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继续走列宁、斯大林开辟的十月革命的道路，社会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胜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是中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一场大搏斗。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辩论的问题，主要是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是否应当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这场大辩论，使广大群众分清了敌我，分清了是非，孤立了资产阶级右派，驳斥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谬论，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是毛主席总结了我们党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总结了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总结了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批判了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的。这条总路线，突出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强调

了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新发展。这条总路线，确定了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加速建设内地工业，工业、农业并举，轻重工业并举，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等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我国人民在农村中创造了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全国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一片热气腾腾的大跃进局面。这是党的总路线的伟大胜利。

在革命和建设迅速前进的大好形势下，刘少奇一伙改变了手法。他们先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反对毛主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正确论断，否定价值法则、否定商品生产，破坏革命群众运动。毛主席及时地批判了他们的错误，保护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采取具体措施，把群众运动引导到正确的轨道。到了一九五九年八月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跳了出来，又从右的方面恶毒地攻击党的总路线，疯狂地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革命群众运动。接着，刘少奇也不断地从右的方面攻击党的总路线。他们一伙极力夸大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叛徒集团撕合同、撤专家造成的暂时的经济困难，否认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党的总路线能够而且已经开始战胜了困难，他们公开地提出并推行“三自一包”（发展自由市场、扩大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和“三和一少”（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支援要少）的对内对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已经不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而是打着白旗反红旗了。

刘少奇叛徒集团的猖狂，并不表示他们有力量，而只能说明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入，使他们惊慌失措。历史经验证明，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和党内机会主义者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政治斗争的性质，而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相互呼应的。刘少奇一伙，以为美帝、苏修、印度反动派猖狂反华，是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好时机。事实恰恰相反。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是从来不怕困难的。帝、修、反的封锁、禁运、武装侵略、内部颠覆，都无损于中国人民一根毫毛，反而激发我们以冲天的革命干劲，坚持独立自主，坚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改造社会。被孤立的不是中国人民，而是帝、修、反，包括他们的走狗刘少奇一伙。

一九六二年九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是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发动了新的进攻。

毛主席在这次全会上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并且总结了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更加完整地提出了现在已经写进我们党章的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还指出：“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十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著名论文，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林彪同志主持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广泛发展。((3)(4))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我们党向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这些被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长期控制的意识形态领域发动了进攻，使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开始登上了文艺舞台。同时，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刘少奇叛徒集团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对无产阶级进行猖狂反扑，反对毛主席明确指出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方针，以形“左”实右的手段，打击广大干部和群众，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公开地攻击毛主席倡导的对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已经“过时”了，反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反对文艺革命，反对批判资产阶级。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主席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刘少奇一伙在一九六六年抛出“二月提纲”相对抗。斗争的反复进一步暴露了刘少奇是国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代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号召全党要警惕“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根据这个《通知》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在党的十一中全会上主持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正式揭开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盖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到来了。

毛主席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有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也可以叫作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对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很多同志开始是很不理解的。当着广大群众

起来了，又分成两派，甚至发生武斗，一时似乎天下大乱。有人问：刘少奇这一小撮人篡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部分权力，毛主席下命令罢他们的官就是了，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办法？实践证明，罢官的办法用过多次，但是，不能解决问题。这次革命不单是为了罢几个人的官，而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刘少奇不但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有一条为他的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我们不少单位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农群众手里。只有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才能够清除出刘少奇叛徒集团，才能使亿万群众受到阶级斗争的锻炼，受到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取得把一小撮走资派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重新夺回来的经验。所谓乱，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他们打着各种旗号进行破坏捣乱。但是，他们只能暂时地欺骗一些人。广大群众带着《毛主席语录》参加辩论，逐步地学会了识别好人和坏人，识别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学会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这样，全国变成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广大群众在大风大浪里学到了他们平时学不到的东西。所以，这种乱，终究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三支两军”（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支援工业，支援农业，军事管制，军政训练），为人民立了新功。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从创立的那天起，就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有四十多年的群众工作经验。因此，他们能够很快地同群众打成一片，能够推动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得到较快的发展，并且使我们的军队得到了新的锻炼。在阶级斗争风暴中诞生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军、干、群和老、中、青两个三结合。整顿后的各级党委的成员，不但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中年和青年一代。这就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创造了有利条件，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更加朝气勃勃。正象毛主席所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一九六九年四月，在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新的中央委员会。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系统地阐述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

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因此，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我们这篇文章就不再详细论述。

“九大”以来，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发展，证明了“九大”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和二中全会所确定的任务和方针也是完全正确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各条战线斗、批、改的任务，特别是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进行斗、批、改的任务还很艰巨。从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还需要我们长期奋斗。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我们全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坚决贯彻执行“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二中全会所确定的各项战斗任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争取更大的胜利。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回顾我们党半个世纪以来走过的战斗历程，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违背了毛主席的路线，我们党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我们党就前进，就胜利。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最完整的总结。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同志总结我党历史经验时说：“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在毛主席所总结的我党的历史经验中，那一些是今天应当特别引起全党注意和学习的呢？

（一）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

党的历史告诉我们：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总是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坚持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对敌、友、我三方面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对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正确地提出党的路线和政策，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胜利前进。而陈独秀、王明、刘少奇以及其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以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为其思想特征的。他们都曾从右的和“左”的方面，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反对和歪曲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进行调查研究和阶级分析，反对理论同实践的统一。他们也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装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面孔，但是，这是为了吓唬和欺骗工农干部和天真烂漫的青年，而他们自己从来也不想照马克思主义办事，从来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他们的言论和行动便必然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广大人民的要求、同正确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要求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处于相对立的地位，也就必然要在革命实践中遭到破产。我们有一些同志在一段时期内所以不能辨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从主观原因来说，也是因为或者不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或者虽然也读一点，但是不能够用毛泽东同志无数次强调的这个根本思想原则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这个历史经验非常深刻，一切新老共产党员都要牢牢记住。

当前，我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正在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认真读马、恩、列、斯的书，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认真学习我党五十年来的历史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干部的学习运动同广大群众的学习运动相结合，已经并将继续产生积极效果，我们应当长期坚持下去。在看书学习中，必须坚持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要带着问题学，带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的问题，带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问题看书学习。这就是要把读书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结合起来，把学习历史经验同现实斗争结合起来，把批判历史上的机会主义同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结合起来。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领导全党从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到批判刘少奇叛徒集团，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毛主席领导全党对以苏修

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辩论，更是对全党进行了极其深刻极其生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原则斗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是当代疯狂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是全世界反华、反共、反人民的急先锋。继续揭露和批判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并且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是我们党应尽的国际主义责任。我们全党同志要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批判国内外的现代修正主义结合起来，在斗争中学会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真正弄通马克思主义。

(二) 必须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加强党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使党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去战胜敌人的根本保证。

对于极少数混在党内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叛徒、特务，对于里通外国的内奸，必须彻底揭露。坏人总是伪装自己，搞阴谋，耍两面派。但是，他们既然要干坏事，就不能不暴露。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隐藏党内几十年终于被揭露出来，王明终于逃到外国当了“百分之百”的汉奸特务，就是例子。

对于党内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则必须采取另一种方针，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毛主席解释这个方针时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再一次强调了这个方针，指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毛泽东同志这个处理党内矛盾的正确方针，既区别于右倾机会主义否认矛盾、不分是非的“党内和平论”，又区别于“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论。我们要学习在各种不同历史条件下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使我们党进一步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

(三) 必须力戒骄傲。对于一个取得伟大胜利的党，一个掌握了政权并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党，一个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担负着国际主义伟大义务的党，这点特别重要。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一九三〇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四) 要两点论，不要一点论。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必须充分地看到和抓紧主流方面，同时逐一解决非主流方面的问题。既要看到事物的正面，又要看到事物的反面。要看到已经出现的问题，也要估计到我们还没有察觉而可能出现的问题。

在民主革命时期，当我们党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联合成为主要倾向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注意反对了“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的倾向。当我们党同资产阶级的联合破裂，革命转变到武装斗争为主时，毛泽东同志注意反对了“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的倾向。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毛主席预见到：“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毛主席号召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每当我们对资产阶级发动进攻并取得胜利成为主要倾向时，毛主席总是重申一系列无产阶级政策，提醒我们要谨慎，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防止和克服违反政策的“左”的倾向。而当资产阶级向我们发起进攻，或我们党在前进中遇到暂时困难，或集中力量纠正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时，毛主席总是提醒我们要坚定，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区别主流和支流，不要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提防公开的、暗藏的敌人的破坏和反扑，反对和克服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右的倾向。当某种倾向已经形成对党的事业造成危害的历史关头，毛主席总是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为我们稳稳地把住了航向。

(五) 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基本路线。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正是因为我们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或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强调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把坚持群众路线作为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把是否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当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毛主席尖锐地批驳了陈独秀、王明、刘少奇这类假马克思主义者诬蔑和镇压人民群众的反动观点，也不断地批判和纠正了党内的各种脱离群众的倾向。毛主席反复教导说：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员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党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的情况下，更要注重深入群众，关心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遇事同群众商量。要办好五·七干校。要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要防止重犯脱离群众的错误。同那种口称“小小老百姓”实则大大野心家的人物相反，真心实意地向群众学习，并用毛泽东思想坚持不懈地教育群众，克服错误倾向，提高人民的觉悟。

毛主席历来关心我国各民族的团结。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发展各民族在革命和建设祖国的斗争中结成的兄弟关系，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六) 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党章明确规定：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我们要在党内外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

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党是一个战斗的党，没有集中，没有纪律，没有统一意志，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但是，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此，毛泽东同志历来反对一言堂，提倡群言堂。反对说假话，提倡说真话。把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当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之一。我们要发扬我们党的传统的民主作风，经常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但是，我们的民主，无论军队或地方，都是为着巩固集中、加强纪律和提高战斗力，而不是相反。各级党委都要建立和健全党委制，加强一元化领导，防止分散主义，防止多中心即无中心，要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七) 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指挥的无产阶级军队。“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毛主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战胜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破坏，发展壮大了我们自己的军队，成为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只要有阶级存在，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世界就不得安宁。今天，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这两个超级大国，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实行霸权政治，妄图瓜分世界。日本军国主义也妄图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因此，我们决不可忽视他们侵略和颠覆我们祖国的危险。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们一天也不要忘记准备打仗，一定要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不但需要强大的陆军，而且需要强大的空军和海军。我们不但需要强大的正规军，还需要大办民兵。这样，任何帝国主义胆敢侵犯我国，都会被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八)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毛主席一直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排除“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正确处理本国革命和支援世界革命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五十年的奋斗中，始终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支持，得到各个友好国家和友好团体的支持，得到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和兄弟组织的支持。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同他们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我们永远感谢他们，

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毛主席教导我们：“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不但同阿尔巴尼亚、越南、老挝、柬埔寨、朝鲜人民，同亚、非、拉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同全世界各国人民其中包括美国、苏联、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完全一致的。今天，正如毛主席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声明中所指出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一方面领导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把本国的革命和建设搞好，一方面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同各国人民在一起，为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而斗争，为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政治而斗争，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斗争。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我们的革命和建设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今天我们还是一个比较穷、比较落后的国家。我们对世界革命的贡献还很少。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但是，就是再过几十年，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后，我们也决不可以有傲慢的大国沙文主义、大党沙文主义国家以后，我们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我们应当学习各国革命人民的长处，永远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成千成万的烈士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们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不论还有多少艰难困苦，都不能阻止我们前进。

我们正处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同半个世纪以前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时候相比，全世界的革命形势空前大好。帝、修、反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社论)

一九七一年八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纪念八一建军节》

伟大领袖毛主席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风浪中成长壮大，胜利前进，到今天已经走过了四十四年的光辉历程。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强大武器。它一诞生，就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人民面前。它来自人民，紧紧地依靠人民，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进行了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经过艰苦、曲折的道路，打出了人民的江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二十二年中，这支军队发扬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优良传统，同全国人民一起，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粉碎了帝、修、反的侵略和颠覆阴谋，夺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把祖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解放军之所以是战无不胜的，是因为它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它以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它严格遵循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原则，把自己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党指向那里就奔向那里，毛主席怎么说就怎么做。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把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统一起来，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有自觉的纪律，有高度的革命警惕和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有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它是一支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的队伍。它有强有力的革命政治工作，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历史完全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革命新时代。世界在变，变得越来越对革命有利，对反革命不利。毛主席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的庄严声明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正在奔腾向前。亚洲十几亿人民在造反。非洲在沸腾。拉丁美洲也闹起来了。美国人民燃起了革命运动的熊熊烈火。北美、欧洲和大洋洲人民的革命斗争在蓬勃发展。世界人民的觉悟，比较十年前、五年前都大大提高了。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和壮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越来越广泛地为世界革命人民所认识、掌握和运用。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军事侵略和政治欺骗从反面教育了人民，使人民看清了它们的狰狞面目和虚弱本质。各国人民在斗争实践中逐步破除了对美帝国主义的迷信，敢碰、敢顶、敢斗，敢于拿起武器，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发动的侵略战争。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树立了弱国打败强国、小国打败大国的光辉榜样。各国人民的战斗团结迅速增强，国际反美统一战线继续扩大。美苏两霸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加紧向广大的中间地带扩张它们的侵略势力，妄图重新瓜分世界，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群起而攻之。中、小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超级大国霸权政治的趋势日益加强。人民要革命，民族要解放，国家要独立，已经成为挡不住的历史潮流。

同当年大英帝国的星辰陨落下去一样，现在，美帝国主义的星辰正在陨落。美帝称霸全球的狂妄计划遭到破产，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到处碰壁。它在世界上的阵地大大缩小，跟它走的人越来越少，反对它的人越来越多。美国国内，政治上一片混乱，经济上一团糟，社会上很不安宁。美国政府日益失去人民的信任。社会帝国主义也是如同坐在火山口上，日子很不好过。它国内矛盾重重，怨声载道。它在世界上到处伸手，它搞的什么“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那一套，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越来越暴露出它的扩张和侵略的本性。 ((1)(3))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国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革命团结更加增强，同亚、非、拉许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美国人民的友好往来迅速扩大。我国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帝国主义封锁、孤立我国的政策彻底失败了。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我国的国际威望日益提高。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这个大好的国际形势，是当代世界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是全世界人民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长期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结果，是全世界所有受到两个超级大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共同斗争的结果。

毛主席说：“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他们必然要采取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的种种手段，来挽救自己的灭亡。”帝国主义决不会因为失败而改变侵略本性。帝国主义有时不得不变换策略，玩弄各种阴险狡猾的手段，归根结底，还是为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服务的。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口头上天天喊裁军，实际上天天搞扩军。它们一方面继续进行核讹诈，另一方面又在积极准备打大规模的常规战争。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一天，世界就不会安宁。

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际大事，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五一·二〇”声明和关于国际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述，学习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学习我们党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历史经验，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乘胜前进。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教导，牢固树立常备不懈的思想，做好防御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准备。形势越好，越应当谨慎，要防止麻痹大意，注意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全军指战员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要加强战备思想教育，认真落实各项战备工作。要继续加强革命化战斗化建设，扎扎实实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抓好军事训练，全面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要继续做好三支两军工作。要大办民兵，使民兵成为加强国防建设和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强大力量。搞好战备，是执行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长期的任务。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颠覆和侵略的威胁，我们就一天也不能忘记加强战备，一天也不能忘记巩固国防。我们进行战备，完全是为了防御。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我们一贯的严正立场。

台湾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人干预。我们坚决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或类似的荒唐主张。我们坚决反对所谓的“台湾独立运动”，坚决反对所谓“台湾归属未定”的谬论。美国必须把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我们相信，台湾的爱国同胞是不会允许任何外国侵略势力把台湾从中国领土分割出去的。

中国人民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永远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我国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是坚定不移的，这就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我们过去是这样做的，今后也仍然坚持这样做。我们坚决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只要是进行革命，我们就支持。我们坚决支持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反对帝、修、反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英雄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美国侵略军及其仆从军必须无条件地从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全部撤走。美国的武装力量必须从朝鲜南部、从日本、从亚洲和一切它所侵占的地方撤出去。我们坚决支持英雄的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正义斗争。中国人民坚决同日本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一道进行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我们坚决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斗争。坚决支持非洲各国人民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侵略、颠覆、干涉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坚决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帝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坚决支持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二百海里领海权的斗争。坚决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坚决支持美国人民反对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战争政策和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北美、欧洲、大洋洲各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斗争。坚决支持一切受两个超级大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的正义斗争。

当前，全国人民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指引下，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我们要更加刻苦地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批修整风，学习党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搞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要发扬继续革命的精神，把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深入进行下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全国军民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拥政爱民，拥军爱民，增强军政、

军民团结，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坚决实现党的“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二中全会所确定的各项战斗任务，争取更大的胜利！

（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一年八月一日，社论）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我们党在朝气蓬勃地前进》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相继隆重地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这对于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更好地继续完成党的“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保证。这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党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们对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和新党委的建立，表示热烈的祝贺！希望各级党委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率领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一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整党运动。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整党建党作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指引我们不断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经过整党建党运动，我们的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更加朝气蓬勃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道上奋勇前进，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

一九六七年，最初几个省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建立了。这时，党组织的整顿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按照什么标准整顿和建设我们的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问题。毛主席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是我们整党建党的政治方向。全党坚持这个方向，不断肃清黑《修养》、黑“六论”的修正主义余毒，同各种降低党的水平、模糊党的性质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时，毛主席把整党列为整个斗、批、改伟大战略部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毛主席指出：“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毛主席这一光辉指示，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规律，从理论上武装了广大党员，更加自觉地运用党内矛盾的辩证法，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正确地进行吐故纳新的工作。

毛主席还指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各地党组织遵照毛主席这一极其重要的指示，反对关门主义倾向，坚持群众路线，实行开门整党，把每一个支部的整顿和建设，每一个党员的教育和审查，都置于广大群众的帮助和监督之下。这种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的方法，保证了党的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的质量，更加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九大”团结、胜利路线指引下，各地认真学习新党章，整党建党运动全面展开。九届一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告诫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谈到新选进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基层同志时，毛主席说：“要注意，要他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毛主席在胜利的形势下再一次给全党敲了警钟。我们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提出“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等一系列指示。全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深入开展批修整风，学习马列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反骄破满，把某些作风不正之处转入正规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日益深入人心。带着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加强调查研究，收到很大的成效。党的思想建设、特别是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正在提到一个新的水平。

毛主席这一系列指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进一步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建设党的问题。回顾整党建党运动的发展，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坚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

质，坚持党内矛盾的辩证法，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才能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进一步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武装起来的革命党。

这次整党运动，是一次极为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广大党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到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提高了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一小撮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被消除出党。广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中涌现出来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参加了党的行列。各级党的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既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又有中年和青年一代的优秀党员，还有来自工农和基层干部中的新生力量。我们的党提高了质量，扩大了队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加富有战斗力。

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还有缺点，这个事实也要肯定。”不要以为经过这次整党，建立了新党委，党内就没有矛盾，就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了。党内两条路线的对立和斗争，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是长期存在的。我们要按照新党章的要求，把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当作一项长期任务，经常抓、反复抓、认真抓好，使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更好地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核心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各级新党委建立了，要切实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新党章规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权力机关，人民解放军，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这是毛主席多次强调党的重大组织原则问题。每个党员、每个部门都要增强党的观念，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不能搞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党委要充分发挥革委会的作用，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加强党对整顿建团工作的领导，加强党对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等革命群众组织的整顿和领导。各地要认真研究和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的经验。要按照新党章对基层党组织的五项要求，继续抓好基层党组织的整顿和建设

工作，进一步加强党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联系。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目标：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真正落实到每一个基层。

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新党委成立后，一个首要的问题，仍然是用什么思想作指导，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真正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划清真假马列主义的界限，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永远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对自己要“一分为二”，敢于坚持真理，纠正错误。要发扬党的传统优良作风，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认真执行和研究党的政策，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自觉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不断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各级党委要搞“群言堂”，反对“一言堂”。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要继续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加强党的团结。主要领导干部要有无产阶级的宽阔胸怀，“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要发挥革命老干部的骨干作用，热情培养新生力量，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更好更快地成长起来。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要“一看二帮”，允许他们改正错误，鼓励他们将功补过。一切新老干部，都要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坚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当前，国内外的形势越来越好。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党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进一步加强了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团体，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战斗团结。全党同志要充分认识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更加努力地工作和学习。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我们的党将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建设得更加伟大、更加光荣、更加正确。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七日，社论）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的经验》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指示，全党逐步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运动，收到显著效果，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揭发和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各级新党委普遍建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正在深入发展。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沿着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不断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号召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一年多来，全党根据毛主席的建党路线，做了大量的工作。当前国内、国际形势都很好。为了更好地完成我们党所担负的光荣任务，各级党委要认真总结经验，以继续加强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

加强党的领导，主要应当注意那些问题呢？

要增强党的观念。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各级党委要根据党的路线和政策，对各方面的工作实行一元化的领导，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目标，努力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自己更好地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核心作用。毛主席把党的建设作为中国革命的三个主要法宝之一，把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作为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最重要的政治标准之一。每个党员，每个革命者，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都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各级党委成员，尤其要增强党的观念，要把自己置于党委之内，而不能摆在党委之外，更不能摆在党委之上。

要继续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毛主席多次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政策是路线的具体体现。加强党的领导，根本问题

是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总是变换各种手法，妄图用机会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代替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用资产阶级纲领代替党的无产阶级纲领，从而用资产阶级性质篡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达到取消党的领导，破坏中国革命的罪恶目的。这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必然反映。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指引着我们党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不断巩固、壮大。帝国主义也好，社会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恰恰相反，每一次正确路线战胜了错误路线，都沉重地打击了国内外敌人，带来了革命事业的更大的胜利，使我们党更加坚强，更加团结，更加兴旺。这是历史的结论。

要增强党的团结。毛主席历来强调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历来都把党的团结作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不能胜利。如果不是“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不能巩固和发展。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在组织上必然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这个历史的教训不少。陈独秀的家长作风，瞿秋白的惩办主义，李立三的一言堂，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都给党的团结和统一造成很大的危害。毛主席在同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只有执行这个方针，才能教育干部，增强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暗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是极少数。犯了路线错误的好人，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绝大多数也是可以回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

要光明正大。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全党同志，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这是党的作风问题，是党性问题。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要搞分裂活动，就一定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关于培养接班人的著名谈话中就曾指出：“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

的问题。”我党历史上那些坚持机会主义路线、玩弄阴谋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里通外国分子，最终都逃脱不了身败名裂，自取灭亡的下场。

要加强纪律性。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毛主席在总结我们党同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时指出：“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我们要牢牢记住这个历史经验，坚决执行党章规定的党的统一纪律，坚决执行毛主席亲自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学好、唱好《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我们党内历次路线斗争，归根到底，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人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上当受骗呢？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认真看书学习，分不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路线，什么是机会主义路线。这个教训极其深刻。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继续坚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自觉改造世界观，把学习和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不断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历次路线斗争从正面和反面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领导，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生命线。让我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一日，社论）

2009 年 8 月 17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9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三册（2）

第三篇 粉碎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

第三章 开展批陈整风

第二节 几员大将的检讨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〇年十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向全党发出认真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号召。全国各报刊最近发表了不少工农兵学哲学的好文章。这些文章，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用通俗的语言，讲亲身的经验，给政治思想战线带来了新气象，推动着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的群众运动继续前进。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号召：“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工农兵直接掌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毛主席的号召变成了实际行动，使党的“九大”以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收获。

马克思主义要求哲学同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相结合。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一个阶级性，一个实践性，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是少数人的哲学，不是书斋哲学，而是广大群众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实际的哲学。这就决定了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非学哲学不可，也一定能够学好用好。

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和彻底的革命性，是最正确的、最革命的认识论。“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就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精神武器。这种哲学，只有当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积极参加革命实践，而不是脱离革命实践的时候，才能真正掌握它，运用它。我们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就是为了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一定要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呢？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政权的性质，取决于掌权的人执行什么样的路线。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归根结底，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毛主席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理论基础。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是一切“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我们只有认真学习和运用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改造世界观，才能明辨是非，分清那是真马克思主义，那是假马克思主义，才能去掉盲目性，提高自觉性，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抵制各种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错误倾向，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真正落实到每个基层。

有的同志认为，自己虽然没有读过哲学，有些事是做得对的，实际上合乎辩证唯物论，没有特别学习哲学的必要。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毛主席指出：“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把朴素的感性认识，提到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高度。只有这样，才能洞察运动的远大前途，正确分析复杂的发展过程，去掉片面性，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不致迷失方向。

有的同志认为，哲学是深奥难懂的，一般入学不了。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大量事实，已经证明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哲学是从社会实践中概括出来的，直接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工农兵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广大革命干部也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这是学好哲学的有利条件。只要我们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密切结合实际，而不是从概念到概念，死啃名词，是完全可以学好用好的。

要把毛主席哲学著作学好用好，需要采取认真的态度。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辩证唯物论是一门科学，要学好用好，学得彻底，用得纯熟，解决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的问题，是不容易的，非用气力不可。但是，只要认真，是一定可以学到手的。

毛主席哲学思想的基本精神是革命的、批判的，只有同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才能学得深，学得透。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哲学界的代理人杨献珍，害怕工农兵和广大干部掌握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识破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千方百计地抹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散布“哲学神秘论”，破坏工农兵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群众运动。我们要继续批判“哲学神秘论”，为哲学的解放进一步扫清道路。我们要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哲学基础，即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使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根。

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的群众运动持久地深入地发展下去，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各级党组织要把这项工作当作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来抓，当前特别是要抓好各级领导班子自身的学习，使全党的理论水平提高一步，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〇年十月三十日，社论）

二、研究资料

汪东兴著《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摘录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开展批修整风运动，毛主席提出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特别是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同时，毛主席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和“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要求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和认识。

9月9日我们下庐山后，毛主席的专列先到长沙，毛主席与华国锋同志在车上谈了话。

专列停在支线休息，于15日到武昌。

在去武昌的路上，毛主席亲切地问我：“你在想什么？”

我说：“我在想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

毛主席高兴地说：“这好嘛！”

我说：“在山上开会，忙于会务，没有时间想自己的问题。现在有空闲时间了，可以好好地理理自己的思想了。”

毛主席对我的态度比较满意。他说：“这样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的心是好心。”

9月15日，专列抵达武昌。送毛主席到东湖宾馆住下。安顿好后，我就考虑根据自己的新的认识，再写一份检查。到了晚上，我的检查写好了，呈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已经点了陈伯达的名，对陈伯达的错误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所以，我对自己错误的性质的认识又提高了一些。在这次的检查中，我也批判了陈伯达。

现将我第二次书面检讨的主要内容抄录如下：

主席：

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除了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的两次检查和一次书面检讨外，最近经主席多次谈话，对我进行严格的批评和亲切的教育。每次谈话对我启发很大，教育很深，我越想越难受，总觉得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受误会的同志，我真是辜负了主席的信任和教育。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是有罪的，我应牢记这次教训，努力改正错误。

我完全拥护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英明指示。在这指示以前，我没有识破陈伯达。他的手段特别阴险、恶毒，利用九届二中全会搞突然袭击，造谣和诡辩，欺骗不少同志。他打着论天才的旗号，其实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要夺毛主席的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次把陈伯达揪出来，使党更加团结，更加纯洁，更加巩固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前三天被陈伯达利用欺骗有三件事：（一）在华北组他突然的又是有计划的发言，利用我的无能，而心情非常激动，又不加分析，更不顾自己

的身份，就起来发言，结果当了陈伯达坏人的炮手。(二)我怀疑陈伯达事先看过修改过华北组的简报，他利用简报来扩大到各组煽动欺骗人。我建议中央派人追查陈伯达，事先是否看过修改过这期简报，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而且简报内容中他的很少，我的很多。我看有阴谋，有鬼。

(三)陈伯达利用听林副主席录音报告时，把论天才的语录交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现在看来是陈伯达的阴谋诡计，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

由于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存在着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思想，有主观片面性，遇事易激动，缺乏冷静的考虑分析问题，再加上文化理论水平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警惕坏人破坏中央团结不够，平常学用毛泽东思想不好。因此，遇到陈伯达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反而受他蒙蔽利用了。

这次我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的错误，对我触动很大，教育很深，我应很好的接受这次教训。今后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特别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通过学习提高认识，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在实际工作中，努力锻炼自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切实改造世界观。上述认识是否妥当，请指示。

敬礼！

汪东兴

年 9 月 15 日

毛主席看过我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后，表示满意，在我写给他的信上面用铅笔作了批示：“此件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在第一页信纸的左右空白处又写道：“陈(即陈伯达——作者注)案另是一个问题，应弄清楚。”

9 月 16 日上午 10 点半，毛丰席让吴旭君(毛主席的护士长——作者注)通知我去谈话。

这次谈话一直谈到了 11 点 50 分。

毛主席说：“你写的信我看过了，信中对问题的认识很好，接受教训。我看有些同志还不通，上了当，还不通？现在不通，慢慢总要通嘛！有些同志自己不懂马列主义，自己都没有看过马列主义这一方面的书，发言时又要引用。我看还是要

进行教育，还是要 250 多人(指中委、候补中委——作者注)中指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30 多本太多，可在 30 本书内选些章节出来。此事请总理、康老办。我还可以提选一些。不读马列主义怎么行呢？不行的。结果就被陈伯达摆弄了。”在谈到军委办事组时，毛主席说：“我们军委办事组内有几位同志也上当了。发言时，一个口径，用一样的语录，连林彪也受他们的骗。据说他要写信给我，叶群和他们(指黄永胜等人——作者注)不让写。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度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

在谈到陈伯达的问题时，毛主席说：“我们的任务是对付帝、修、反。而陈伯达不管帝、修、反。我写了一份七百字的意见，给陈看时，他马上说他与苏修无关系。我又不是问他这事，他急着声明这个问题。”

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六号简报时，毛主席说：“六号简报要抓紧核实，你怀疑陈伯达看过、改过，应找会议主持同志，还有王良恩同志和记录印发的人。为什么不经你看过，发出最早最快？由总理、康生和你一起查实为好。要他们不要再加上陈伯达的当了，有错误就改正。”

毛主席一面抽着烟，不时地呷口茶，一面和我慢慢地谈着。

他问我：“你说他们(指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作者注)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会议前期，黄永胜留在北京，但他准备了书面发言稿——作者注)，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你清不清楚？”

我摇了摇头，说：“我不清楚。”

毛主席接着说：“你跟我出来了，他们在北京是否在陈伯达处商量过？”

我又摇了摇头，说：“不清楚。”

毛主席若有所思地说：“谁知陈伯达住在何处有何活动？谁能知道？陈伯达案另办。与你们好人犯错误不同。”

毛主席说：“我在简报上看到，皮定均同志在发言中说，怀疑他们都在 24 日下午发言，是统一部署的。”

毛主席还要我找曾思玉单独谈一下，征求一下他有什么看法。

在谈话中，毛主席提出要我先回北京。

他说：“你先回去，让总理和康生召集会议，把你给我的信给他们看，传达我对你的信的批示及我今天谈话的内容，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

毛主席还说：“你这封信可以启发他们，让他们也可以写或找我来谈。”

出于对毛主席安全的考虑，我说：“我的意见，我们还是一起回北京。我的那封信可以叫通讯员先带回去。”

但是，毛主席还是坚持要我乘送文件来的飞机先回北京。他说：“早一天回去，让他们早一点觉悟也好嘛。”

这样，我只好准备第二天早上先飞回北京去了。

16日下午，我去找当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聊了两个小时，他还陪我吃了晚饭。谈起庐山会议，曾思玉同志说：“当时我是一盆浆糊，弄不清楚。”

我笑着问：“现在你还是一盆浆糊？”

他说：“开始我脑子是一盆浆糊，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后，通过学习，慢慢地了解了。”

我诚恳地说：“庐山会议上我也犯了错误。”

他说：“中南组也是紧张的，说有人要推翻毛主席，打倒毛主席，有人要夺毛主席的权。叶群发言就是这样讲的，她还说毛主席是天才没有错。”

我讲自己的看法：“毛主席的天才是从实际中学的，是靠看书学习，天才不完全是先天的，天才主要是后天的。我们过去认识不清，现在才有所认识。”

曾思玉说：“那几个副词，我也是同意的。毛主席在‘九大’报告中把它去掉了，我未听进去，总觉得这是毛主席的谦虚。”

我和曾思玉谈话中，相互交换了一些思想认识。

晚饭后，我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已经休息了，我就没有打扰他。午夜 12 点钟吃过夜餐后，我上床休息。到了凌晨 4 点钟左右，护士长吴旭君来敲我的门，我正要起身开门，吴旭君说不用开了。她从门缝塞进来一张纸条，并且告诉我说：“你不要起来了，看一看条子就行了。”我捡起条子见上面写着：“主席讲，你不要走了，一齐走。”这样，我就又回到床上睡觉。

不久，我陪同毛主席一起回北京。当专列走到石家庄时，我将曾思玉同我谈话的情况报告了毛主席。我对毛主席说，曾思玉是老实人，他的态度是好的，有什么谈什么，只是水平与我差不多，我想曾思玉慢慢会通的。

毛主席听后“嗯”了一声。没有说什么。

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继续做黄、吴、叶、李、邱等人的工作，并将我于 9 月 15 日写给他的信和他的批示在政治局作了传达。

吴法宪看到我的书面检讨和毛主席的批示后，于 9 月 29 日第一次写出了书面检讨。在这份检讨中，吴法宪承认“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并带着“最沉痛的心情向主席检讨认错”。

可是，他在检讨中把自己说成是“上了大坏蛋陈伯达的当”，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

我把吴法宪的这份检讨书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后，在 10 月 14 日作了批示：“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主席还在吴法宪的检讨书上写了许多批语。

吴法宪在检讨书中讲到他在庄严的二中全会上，在关系全局性的原则问题上，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毛主席在这段文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又在旁边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在吴的检讨书中讲他自己的发言“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极不慎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段话的下边，毛主席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着：“这些话似乎不真实。”

在吴法宪谈到陈伯达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这句话的下边，毛主席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

吴法宪交代 8 月 23 日晚 12 点前后，陈伯达来找他和李作鹏、邱会作，谈到过关于“天才”方面的问题。毛主席在这段话下边也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当毛主席看到吴的检讨书写到“他(指陈伯达——作者注)还说，主席也批评了你们，我们问他主席批评了什么，他不肯说。……说话神态异常，说时支支吾吾”时，毛主席在旁边批示：“无非是想再骗你们一次，企图挽救他自己。”

吴法宪的检讨书中揭发 8 月 27 日晚上 12 点以后，陈伯达来问他讲没讲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毛主席在“伟大谦虚”四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吴法宪提到陈伯达 8 月 27 日晚上核对上面那句话时，看到陈的发言稿上有“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一句话，吴法宪认为这是“造谣”。毛主席在“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这九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

当毛主席看到吴的检讨书中写道“……他只参加过两次会，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怎么能这样做，并且告诉秘书不要答复他”这句话时，在旁边批道：“这样对。”

10 月 12 日，叶群也向毛主席交出了第一次书面检讨。承认“我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中央和到会同志，……心情是沉重的”。说毛主席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她的谆谆教导，使她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育。

但叶的检讨书中把她的问题说成是上了陈伯达的当，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

10 月 15 日，毛主席看了叶群的检讨，并作了批示：“此件已阅。”并在装检讨书的信封上批示：“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后退中办存。”

叶群在检讨书中说，她“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主席在“路线性”三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一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叶群在检讨书中谈到她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反映情况的电话。而她没有注意核实情况时，毛主席在旁边写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叶群在检讨书中引用毛主席讲过的话“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主席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并在旁边批道：“这是马克思的话，我不过复述一遍而已。”

叶群在讲到林彪要写信给毛主席，她出来劝阻，结果帮了倒忙时，引了毛主席过去讲过的话“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毛主席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叶群在检讨书中写道，九届二中全会上她接到军委办事组寄给她一份论天才的语录。毛主席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

叶群说自己“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论天才的语录，这就间接地上了陈伯达的当。毛主席在“不加分析地”五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

叶群还说什么她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不够有力。毛主席在旁边写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回去同他斗争？”

叶群在检讨书中还对陈伯达提出了一些疑问。毛主席在旁边写道：“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

叶群表示要按毛主席的教导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毛主席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

在叶群的检讨书末尾，毛主席写道：“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毛主席这些批语清楚地表明，对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所犯的错误，都还是采取批评、教育、挽救的方针的。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后，为了继续解决这次会议上的问题，给林彪等人改正错误的机会，争取和挽救他们，党中央和毛主席倡导开展学习和批判运动。

这年 10 月，毛主席对贵州省关于“三支两军”问题的报告作了批示，提出要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11 月 6 日，党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传达了毛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要挤出时间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的指示，建议各单位干部读六本马、恩、列著作和五本毛泽东著作，即：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吴法宪回忆录》摘录

第十四章 庐山会议没有完

一、继续审查

1970 年 9 月 7 日上午，我们乘坐的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李德生前来接我们。这里我说一句话：无论是在军委办事组时期，还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李德生同我们的关系一直都相处不错。这也可能是造成了他在 1975 年因被江青等人告状而被迫辞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的原因。

下了飞机以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随即离开机场，返回到他们的住所，我则留在机场，准备迎接从庐山回来的飞机。下午周恩来与康生乘坐的同一架专机回到北京。我看到，他们两人显得很亲热。“九大”以后，凡是周恩来外出，都是由康生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即被称为“康代总理”。然而，很少见到周恩来他们如此亲热。我当时内心想：周总理很值得我们学习，善于“看风使舵”。

早在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就给我们打过招呼，下山以后要继续找我们谈话。果然，9 月 9 日晚上，周恩来和康生就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谈话，继续追查庐山会议的问题。

周恩来一开始让我先谈。于是我就又把 8 月 14 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争吵以来的事情，一一说了一遍。然后我说：“我在庐山会议上作了三次检讨，如果需

要的话我可以继续检讨。我在庐山说的话有错误，错了就检讨，但是我们没有什么非组织活动。”

听了我这话，康生鼓着眼睛盯着我说：“你们事先就有活动。庐山下有活动，庐山上有活动，下了庐山还有活动。”周恩来也说：“你在 8 月 14 日晚上的活动我就不清楚。”我回答说：“那天晚上我是第一个给你打电话的，当时我在陈伯达家里。我把情况都向你汇报了，你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还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话，而且你也表示赞成设国家主席，赞成国务院的指导思想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我这一说，周恩来很不高兴，同时也很紧张。这时康生插话说：“吴法宪，你说毛主席伟大谦虚，这句话不对。毛主席不是谦谦君子，毛主席有的地方要求很严格。”康生讲话的态度比周恩来凶得多。

接着就是李作鹏讲。李作鹏说得很简单，他说：“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清楚，我在青岛接到黄总长打来的电话，说宪法修改小组发生了争论，要我回来支持吴法宪。我回来以后就没有争论了。”

邱会作也说：“听吴法宪说有争论，但具体情况不清楚。”

黄永胜则说：“这件事我是十四号晚上听吴法宪打电话说的，当然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之后，我又打电话通知了李作鹏。我没有搞什么活动。”

那天晚上一共谈了四个小时，由于我们四个人的口径一致，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来。

9 月 12 日晚，周恩来和康生又在人民大会堂继续找我们谈话。周恩来说：“上次我和康生找你们谈话的情况，已经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批评了你们，说你们军委办事组搞宗派，你们一统天下。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要交代你们之间的活动，在庐山会议前有什么活动，会上有什么活动，会下有什么活动。”

周恩来说了以后，大家都不吭声，周恩来就点了黄永胜的名，说：“永胜同志，请你先谈。”

黄永胜说：“经过回忆，我知道的情况很少。庐山会议前我没有参加宪法的修改，我只是听吴法宪说到会议上的争论。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我同法宪同志的意见是一样的。上庐山前，我准备的发言材料只是军事工作报告，别的工作我没有参

与。庐山会议的情况，我上山以后听叶群告诉了我一些，吴、李、邱在庐山上的情况我不清楚。不过，他们在庐山上的事情我要负责任。”

康生插话问：“你负什么责任？”

黄永胜回答说：“我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从组织上说我有责任。”

康生说：“我就不信你没有参加。”

黄永胜也很不客气地说：“那就请你们追查嘛！”

这个时候，谈话的气氛有些紧张了。我就对周恩来说：“上次谈话，我已经把在庐山上的情况实事求是、原原本本地都说了。8月14日的争论，我当时就向你总理、黄总长、叶主任都汇报了，这个你清楚，这都是公开的，不是什么秘密活动。”

我说到这里，周恩来脸色沉了下来。他说：“你们不要激动，我只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你们都是政治局委员，毛主席的话我不能不向你们传达。你们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实事求是嘛。”

李作鹏说：“在庐山会议上，我在中南组没有什么发言，叶群也没有说什么。我们在中南组没有放什么‘毒’，也没有起哄。”

邱会作也说：“我同你康老在一个组里，你知道我讲了什么。我赞成设国家主席，拥护‘天才论’，还念了语录。你当时还说，邱会作同志善于学习，并且号召西北组的同志向我学习，怎么过了几天你就反了过来，说我邱会作怎么不对，你怎么这样两个态度？”

康生一听就火了：“你念了语录很好，但是你说的错话我没有同意吧？”这样，他们两个人就争论了起来。

周恩来最后说：“你们现在都是政治局委员，现在没有向你们提出什么意见，有什么问题可以再讲。毛主席的意思还是保护你们的，你们要接受教训，今后要注意团结合作，搞好办事组的工作。”

两次谈话，都没有什么结果，事情就这样搁了起来。

二、林彪要见毛主席

国庆节前夕，林彪和叶群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毛泽东约林彪去谈了一次话。从中南海回到家里，林彪打电话叫我到他那里去一下。

我到了林彪的住处。林彪见面对我说：“毛主席谈到了庐山的问题，我说，我选吴司令当空军司令，是因为吴法宪是刘亚楼的徒弟，吴法宪的作风是向刘亚楼学的，和刘亚楼一样，拼命干，所以我选他当空军司令。毛主席向我问起曹里怀，我说，曹里怀这个人我了解，从延安到东北我都了解他，工作稀稀拉拉，没有干劲，办事不认真。我认为空军的工作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他们是搞得不错的，所以我把空军立作标兵。”

从林彪的话中我听得出来，他的意思很明显，毛泽东在考虑把我拿掉另找人选。林彪则是在尽力保我。

林彪接着又说：“过去在庐山我不赞成你作检讨，但是我现在赞成你到毛主席那里去说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争论的情况再向毛主席谈一谈。今后空军的情况，要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请示，不要只是向我说，应该让毛主席了解你的工作。你不来，我是不会怪你的。”

我当即表示，回去立即就给毛泽东打电话请求接见。回到家里，我马上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请求见一见毛泽东。过了一会儿，徐业夫打来电话说：“主席的意见，国庆节前太忙，以后再说吧。”

我原以为，这件事林彪和毛泽东已经说好，没想到一打电话毛泽东却不见，又让我碰了一个大钉子。等到国庆节以后我又两次请求见毛泽东，他还是说不见。这样，我前后三次请求见毛泽东，都被拒绝了。当时我还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过去在空军有什么事情请示毛主席，总有一个答复。这次在庐山犯了“错误”，从此坐上了冷板凳，我心里清楚地感觉到，大概毛主席已决心把我赶出中央了。

20 年后我看到有关文件，毛泽东 1971 年 8 月中旬在南巡时讲话说，黄、吴、李、邱在庐山上分裂党，犯了错误，但是他还是要挽救我们。毛泽东还说，我们几个在庐山会议以后根本不去找他，但是他还是要找我们。这就很不符合事实了，明明我三次求见都被拒绝了，还要说我们坚持错误，不去找他！

被毛泽东三次拒绝后，我把这个情况打电话告诉了林彪。林彪听了后，说：“那就没有办法了。”我说，我准备再写个检讨。这次林彪同意了。

三、检讨过不了关

我回到军委办事组，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说起此事。我说：“我准备再写一个检讨。”

他们三个都不同意我写。

黄永胜说：“你不要写。你犯了错误，我们大家都不怪你，我们都要负责任。你不要那么紧张，检讨什么？”

邱会作也说：“我是不写检讨。”

李作鹏说得更直爽：“再检讨也还是没个完。在庐山已经检讨了两次，你再写一次，将来就还有十次，够你检讨的。”

我说：“不是我愿意检讨，看来没有办法。”

接下来，我不用秘书，自己用了两天的时间，写了一个 2000 多字的检讨，送上去。一个多星期就批下来了。我当时心里想，不管批得好批得坏，总算是有了一个回音。哪知道一看吓了一大跳。我记得主要有这么几条：

第一条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中央委员，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

第二条不只是批我了：“军委办事组各同志，（除了李德生以外）忘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是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第三条是批我说的“毛主席伟大谦虚”：“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会议上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对这些批示，我想了很久都没有想通。什么叫光明正大？当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在中央全会上公开讲的，怎么就不是光明正大。我在庐山上的讲话哪一句是假话呢？那都是白纸黑字有证有据的嘛！说我们“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中央委员都是那么好骗的吗？人家就没有自己的是非观点吗？说：“有党以来，没有见过”。怎么没有呀？不说陈独秀、张国焘这些以前的事，就说第一次庐山会议或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斗争，哪次不比这次厉害

得多！一个人站错了队，反正是“错也是错，对也是错”。看来，这次庐山会议得罪了他老人家，我是死活过不了关了。

我把毛泽东的批示拿给军委办事组的其他人看，黄永胜看完若无其事，李作鹏则说：“我说没有完吧，果然如此。”

以后，黄永胜和我一起把这个批示报告给了叶群，因为毛泽东在我的检讨书上还写了“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他的意思是要叶群、李作鹏和邱会作他们也检讨。

这样，他们也不得不考虑写一个检讨。当时叶群的意见是要军委办事组的宋诚来帮她写这个检讨。叶群这个人很精，她考虑到“林办”的秘书们还都不知道庐山上发生的事情，她怕扩散。这样又由我们找来宋诚帮助，由叶群亲自布置，写了一个检讨送上去。

这一下，毛泽东很快就又批了，而且批得比我的更厉害。毛泽东批示的头一句就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接着他说叶群“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他还说“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

当叶群说：“‘天才’方面的语录时，毛泽东批示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最后，毛泽东又把我们都捎上去了，说：“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拿到毛泽东对叶群检讨的批示，我让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他们比较一下。他们都说，毛泽东对叶群批得更厉害，而且批叶群，直接关系到了林彪，只不过给林彪一个面子，没有点名。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粉碎“四人帮”以后，都说毛泽东对江青早有觉察，并且有严厉的批评和斗争。而江青在被“公审”时扬言：“都说毛主席对我有批评，你们拿出来，我看看。”实际上，这个证据谁也拿不出来。毛泽东的权威在我们党内是一言九鼎，不论是刘少奇还是彭德怀，打倒与否，都是一句话的事情。如果当时他对江青有一个哪怕像对叶群这样的批示，江青也

不至于到那样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关键是毛泽东对江青究竟是袒护还是“批评和斗争”。

接着就轮到黄永胜了。这时，毛泽东已经不再像在庐山那样，一下飞机就拉去彻夜长谈，拼命地拉黄永胜了。他看看实在拉不过来，也就批开了。11月13日，黄永胜陪同外宾去见毛泽东。接见完毕，毛泽东让外宾先走，把黄永胜留下，就批评黄永胜说：“庐山会议发难，你黄永胜是个头。你们办事组一统天下，我要打破你们的一统天下。我现在要谢富治、纪登奎参加你们办事组。”因为我们黄、吴、李、邱四个人都是红一方面军和四野的干部，所以毛泽东把我们叫作“一统天下”。李德生、谢富治是四方面军的干部，所以把他们掺进来，用毛主席的话说：这叫作“掺沙子”。毛主席希望他们进来以后同我们来斗。但是李德生、谢富治对我们没有什么恶意，大家都是实实在在地工作，所以同我们相处很好，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随后，毛泽东又自己决定，把他在庐山会议期间写的《一点意见》，转发到全国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批判陈伯达，批判“军事俱乐部”，同时也进一步批判我们。这样毛主席一手在全国发动了“批陈（伯达）整风”运动。

2009年8月10日初稿

2012年1月1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三册（3）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三章 批陈整风

第三节 陈伯达反党问题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

1970.11.16；中发〔1970〕62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一）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二）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一部分党的高级干部中口头传达过陈伯达反党的问题。为了教育干部，让较多的同志了解这个问题，中央决定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向党的地区级核心小组成员、部队师级党委委员和同级党员负责干部以及中央各专案组人员宣读和传达。传达内容主要以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为准。

（三）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献，对于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在这个文件中，毛主席揭露了陈伯达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驳斥了他的谣言和诡辩，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号召全党同志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同陈伯达划清界限，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各单位要组织听传达的同志认真学习和讨论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文件，结合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和党中央一九七〇年59号学习通知

所规定的著作，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四) 各单位应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传达陈伯达反党的问题。

陈伯达历史复杂，是一个可疑分子。中央正在审查他的问题。各单位在传达时，要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进行检举和揭发，并请你们将揭发材料妥送中央。

(五) 对陈伯达的问题，外间有一些猜测，敌人也在探听消息。传达时请你们注意保密。有关文件不准翻印、抄传、听传达的同志不准记录、不准传播。

各地传达情况和反映，望及时报告中央。

附一：《我的一点意见》（略）

附二：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指示天才的几段语录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三十八军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报告上的批语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议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三十八军党委“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

1970.12.16；中发〔1970〕76号

1970年12月10日，中共陆军第三十八军委员会写了《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送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共中央。

报告说：“陈伯达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

妄图乱军、夺权。”“陈伯达在处理保定问题中，大搞分裂，挑动武斗，镇压群众，破坏大联合、三结合。”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华北会议召开。

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会议。

揭发批判陈伯达。

涉及到李雪峰、郑维山。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摘录

根据现在揭发和调查的可靠材料，证明：

1、陈伯达的反动历史。

陈伯达出身于所谓“四代书香”门第的破落封建官僚家庭。他先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充当过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少校秘书，后钻入共产党，留学苏联，有托派重大嫌疑。他回国不久，即被捕叛变，后为刘少奇恢复他党的关系，一直埋藏在党内三十四年。

2、陈伯达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他回国叛变后，宣传叛徒哲学，鼓吹“国防文学”和“国防哲学”，为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大造舆论。他反对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理论和实践。他同刘少奇一道，在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实现后，提出了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谬论。在毛主席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引下，亿万群众掀起大跃进高潮时，他形“左”实右地否定价值法则，否定货币作用，主张农村人民公社实行所谓全民所有，为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制造了反马列主义的“理论”根据。他支持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他第一次庐山会议参与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第二次庐山会议私自下山，不知干什么去了。

他积极帮助刘少奇整理和修改黑修养，在《红旗》重新发表。他竭力吹捧“桃园经验”，并提出要刘少奇管四清和农业，帮助刘少奇篡夺权力。

3、陈伯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

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大派工作组，忠实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在中央文革名为组长，实则反对中央文革，背着中央文革搞坏事。他打着红旗反红旗，中央文革碰头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种措施，他常常或明或暗地进行破坏和反对。他是肖华、杨、余、傅、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是反党乱军的罪魁祸首。他是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支持武斗的指挥者。

他一贯反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同毛主席唱反调。他一贯反对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他主编的《红旗》不登姚文元同志主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奉彭真之命，私编《毛主席语录》，与林副主席主编的《毛主席语录》唱对台戏。他借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而对毛主席和中央肯定的“九大”政治报告草稿又诬蔑为伯恩斯坦主义的文件。

他在编辑毛选《五卷试选》期间，对毛主席的文章肆意篡改。后来，又对康生同志奉林副主席（毛选编委主任）之命主编《毛选五卷》送审本进行怠工破坏，并组织了一个地下黑班子，私自整理毛主席的著作，与毛选编委会相对抗。

他背着中央搞了一个秘密班子，专门研究中央政治局历次的宪法修改稿，伺机向党进攻。他反对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最后，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突然袭击，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4、陈伯达投靠王明、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

他在组织上初期投靠过王明，后来长时期投靠刘少奇。他在延安要求离开张闻天到毛主席那里工作，又害怕得罪张，主席批评他是“脚踏两只船”。他随毛主席访苏，违背毛主席的嘱咐，私自离开代表团，进行个人活动。他对彭德怀、高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陶铸、胡乔木、周扬、杨献珍等反党分子都很亲。他包庇大批坏人，招降纳叛。

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了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的太上皇。他把自己领导的部门搞成独立王国，任何中央同志都不容过问。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

1971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材料分为 4 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陈伯达的反动历史”。主要内容有：“家庭出身和入党前的个人历史”，“和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关系”，“被捕叛变”，“失掉党的关系问题”，“托派问题”，“在天津工作时的错误和叛徒、特务、工贼刘少奇为陈翻案的问题”，“写反共文章”，“里通外国嫌疑”。

第二部分为“投靠和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主要内容有：“追随王明，鼓吹‘国防文学’和‘国防哲学’”，“一贯投靠和追随刘少奇，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秀才和头面人物”。

第三部分为“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主要内容有：“大派工作组，又把自己装扮成反工作组的英雄”，“陈伯达是萧华、杨、余、傅、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几次突出的反党阴谋活动”，“陈伯达借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机会，炮制了一个继承刘贼唯生产力论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分裂党的黑纲领”，“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的阴谋活动”。

第四部分为“投靠王明、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
 1971 年 2 月 19 日，周恩来就结束全国计划会议一事致信毛泽东，汇报近日工作安排，毛在信上批示：“都同意。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根据毛泽东批示精神，周恩来于 2 月 20 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2 月 21 日，《通知》下发。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的指示

1971. 02. 23；中发〔1971〕18 号

照发

毛泽东

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或党的核心小组，中央机关、中央军委、国务院主要负责同志：

在二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邀集各地来京参加国家计划会议的各大军区党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主要负责同志到会的会议上，首先宣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会议的指示：

“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

宣读后，到会的各地主要负责同志表示了坚决拥护，认真执行毛主席的英明指示。为使各地和中央各领导单位在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能对毛主席的极其重要的指示有深刻的理解，并联系到庐山会议上反党分子陈伯达的阴谋活动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特将毛主席的指示全文，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和执行。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关于批发《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的通知及附件材料

1972.07.02；中发 [1972] 25 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和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证，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 [1972] 3 号文件的精神，组织传达、阅读和讨论。

陈伯达到延安以后直至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反革命罪行，还在继续审查中。有关陈伯达罪行的揭发材料，望各地继续报送中央。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

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发动的反革命政变，首先揭露了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陈伯达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驳斥了他的谣言和诡辩，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的会议上，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经过全党批陈整风运动的揭发和批判，经过陈伯达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取得了陈伯达反革命罪行的大量物证、人证、旁证。一九七一年三月，毛主席指出：“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一、陈伯达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

陈伯达出身于“四代书香”门第的破落封建官僚家庭。他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期间，他一贯站在国民党右派立场，进行反共反革命的罪恶活动。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陈伯达在受漳厦护军使臧致平、当地警察厅长杨遂等操纵的厦门通俗教育社担任编辑工作。一九二五年春，在厦门，陈伯达经国民党右派黄振家介绍，参加国民党。同年，与黄振家、梁龙光等组织国民党反共团体“孙文主义学会”。

一九二五年九月，陈伯达在《洪水》杂志第一卷上发表《努力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的反共文章，辱骂共产党“是走入迷路的糊涂虫”，“盲目胡言，自送死地”。他叫嚣要把这种“妖怪”“一扫而空”，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三月，陈伯达策划和指点国民党右派，对中共广东党、团区委派到厦门招收农民讲习所学员并帮助当地党、团发展组织的特派员，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围攻，质问我党特派员“来厦门有何任务、企图和阴谋”，诬蔑“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已失败”，诬蔑中国共产党是“卢布党”。

一九二六年夏秋之交，在广州中山大学，陈伯达和黄振家等“孙文主义学会”派反共分子，拥护国民党极右派邹鲁等召集的“西山会议”，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叫嚷“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肆意毁骂“共产党居心不测”，“苏俄包藏祸心”，反对和破坏共产党组织的进步学生团体，辱骂共产党员“都是领苏联津贴的‘卢布客’”，“可鄙”。一九二六年秋至一九二七年四月，陈伯达先任国民党汕头市党部秘书，接着投靠国民党军阀张贞，任少校秘书，并兼任何应钦办的东路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他为张贞起草反动文告，进行反共宣传，从事反共活动。

二、陈伯达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参加托派组织，回国后继续进行托派反共活动

一九二七年陈伯达混入党内不久，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二八年，他同万志凌等人一起，从事托派反共活动。陈伯达读了万志凌传给他的攻击斯大林和联共党的托派文件，听了万志凌散布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托派理论和诽谤斯大林、吹捧托洛茨基的反革命言论，他都完全同意。一九二九年四、五月间，经中山大学托派领导机构五人小组成员万志凌介绍，陈伯达参加了托派组织，接受万志凌的领导。陈伯达利用同乡、同学的关系，秘密组织阅读托派文件和托派书籍，暗中操纵程小孩（即程先奇）、郑洪涛等人进行托派反共活动，为托派组织筹集活动经费。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清党时，万志凌等一些托派分子被苏维埃政府逮捕。陈伯达攻击说：“这简直是恐怖政策”，“斯大林是独裁专制”。他暗中活动，告诉其他托派分子注意隐蔽，“不要往前冲了”。托派分子万志凌等被判处流放时，陈伯达唆使一些人反对流放，要求将万志凌等人

送回国内。万志凌流放临行前，陈伯达还特意送他五十个卢布，表示对托派的忠诚。

一九三〇年陈伯达回国后，继续进行托派反共活动。一九三三年，他参与了托派头目张慕陶分裂中共抗日同盟军前敌委员会的阴谋活动。一九三四年，陈伯达同托派头目杜畏之狼狈为奸，为张慕陶托派反共活动出谋划策。杜畏之主张，张慕陶等人既然政治路线与中国共产党不同，就应另外成立一个党。陈伯达则主张：“路线虽有分歧，但这伙人不应脱离共产党，只应成为党内一派，以自己的主张影响党，在党内夺取领导权。”

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陈伯达同杜畏之的意见一致，都是只要城市，不要农村，只要工人，不要农民，对农村武装斗争不抱什么希望。这是中国托派在三十年代的基本主张。陈伯达一九三四年向党组织提出的《怎样组织与怎样斗争》的意见书中，还企图用这种观点来改造党，妄图否定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他在意见书中说：“苏区各地革命的深入，与白区革命运动的开展是目前中国苏维埃红军胜利的保障，然而这还不是绝对的保障，绝对保障还是要依赖于几个中心城市以至于全国的革命胜利”。

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看法，陈伯达完全同意苏联托派头子拉狄克和中国托陈取消派陈独秀等人关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阶段的观点。一九三五年五月，他在《殷周社会略考》一文中说，“无论是从地下的发掘，或古代遗下最可靠的文书，我们还没有发现出中国曾由氏族社会转化为奴隶社会之历史的存在。”中国是“空白奴隶社会的阶段，而径由氏族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的”。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陈伯达发表了许多文章，大肆宣扬这种托派思想，否认马克思揭示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三、陈伯达一九三一年在天津被捕叛变，成了特务

一九三一年四月八日，陈伯达在天津英租界集贤里被捕。在敌人审讯时，陈伯达供认了组织关系，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在省里搞宣传工作”；供出了“集贤里是共产党河北省委机关”，同案人“全是共产党员，有的担任组织工作，有的搞通讯工作，有的担任缮写、印刷或者帮助别人搞工作”；供出了许兰芝、陈源

道、刘一鸥、史连甲等人的组织身份和组织活动；供出了曾在莫斯科学习过的同案人的真实姓名。敌人在复审其他人时，证明陈伯达的供词属实。

一九三一年九月，陈伯达转押北平草炭子监狱。在狱中，他向敌人写反共呈文，说他并不赞成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他在狱中写信给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叔父张达卿，向张贞求救。张贞出款两千元，由王雨亭、陈文总出面到北平活动，经邹中复的父亲邹斌山（东北军少将）的关系，陈伯达写了“改过书”，办了自首手续，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出狱。陈伯达出卖组织，出卖同志，是一个可耻的叛徒。

陈伯达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他出狱后，继续与国民党军阀张贞、美蒋特务陈文总、河北省国民党党部特务室主任林光耀等保持联系，从事反共活动。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正当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入华北的时候，陈伯达抛出《论谭嗣同》一书，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有功”的反动理论，鼓吹甲午战争后“联日”“是具有相当进步的意义的”，赤裸裸地宣扬卖国主义。

一九三四年，陈伯达鼓吹合法主义，取消革命斗争，强调华北并未沦亡，反对党提出的武装抗日的主张。

一九三六年九月，陈伯达发表《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的反共文章，站在王明，刘少奇一边，支持周扬等“四条汉子”炮制的“国防文学”的反动口号，反对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陈伯达在文中说：“我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不可驳倒的。就是那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人，也不能否认这口号的正确性。‘国防文学’——这是联合战线的口号。”他还攻击“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不是联合阵线的口号”。同时，陈伯达同章乃器等人一起，推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在《读书生活》第四卷第九期搞了一个“国防总动员特辑”。在这个特辑中，他抛出《哲学的国防动员》的文章，提出了反共卖国，同大资产阶级搞“合二而一”的“国防哲学”，并提出了所谓“新启蒙运动的建议”。自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三七年夏，陈伯达连续发表了十篇文章，从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出发，为“新启蒙运动”提出一套适应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需要的政治纲领，企图把当时的一切文化运动纳入国民党反动派的轨道。

一九三八年六月，陈伯达抛出了《三民主义概论》这个反共纲领。在这本黑书中，他抹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同旧三民主义的原则区别，抹杀共产主义同三民主义的原则区别，狂热地宣扬蒋介石那一套反动的三民主义，吹捧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他宣扬三民主义不仅要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和中古制度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而且将来更要转变到社会主义去。他这本黑书的要害，就是妄图用三民主义来对抗和代替共产主义，溶化和取消共产党。在这本黑书中，陈伯达明目张胆地篡改和捏造历史，对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举行了十年“剿共”战争，血腥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独夫民贼蒋介石和大汉奸汪精卫，奴颜婢膝地、恬不知耻地极尽歌颂吹捧的能事。他摘引了蒋介石、汪精卫的言论之后，接着吹捧说：“正是因为当时主要的国民党领袖，是这样不为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诡计所动摇，这样坚决地继续中山先生和仲恺先生的精神和政策，结果才把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的革命广州挽救过来，终于能够排除万难，克服大敌，转危为安，使革命势力得以继续发展和扩大。如果不是这样，那末，真要如古人所说的‘汉之为汉，未可知也’了。”他在书中鼓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路线，妄图取消边区，统一于国民党反动政府。

一九三八年，陈伯达把这本黑书托王明带到重庆出版，向国民党献媚。一九四六年，陈伯达配合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在这本黑书中，特别加进鼓吹“和平过渡”的反动内容，再版抛出。

四、陈伯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同苏方人员秘密来往，进行阴谋活动

一九四九年冬至一九五〇年初，毛主席访问苏联，陈伯达随行。当时，中苏会谈一度遇到苏方制造的困难和障碍。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陈伯达竟然采取“老鼠搬家”的罪恶行动，背着毛主席，同苏方秘密来往。他接受苏方的邀请，同苏方人员密谈。他出席观看丑化和污蔑中国革命的芭蕾舞剧《红罂粟花》，并同该剧的编导座谈。他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答应苏方的要求，让历史上犯过严重政治错误并同苏联特务机关有密切关系的陈昌浩回国。他为了向苏方表明他反对毛主席在中苏会谈中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竟然不同毛主席住在一起，

而搬到驻苏使馆去住。他在莫斯科会谈期间，行踪诡秘，同苏方搞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回国后，陈伯达继续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同苏方人员罗申、尤金、费德林等人秘密来往。对苏方人员尤金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陈伯达不仅没有任何抵制，而且充当了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应声虫。

五、陈伯达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一贯坚持修正主义，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四次路线斗争中，陈伯达都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子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勾结在一起，反对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解放初期，陈伯达参与了高饶反党联盟分裂党，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积极帮助高岗修改《荣誉是属于谁的？》一文，为高岗捞取政治资本。他给高岗通风报信。高岗为篡党夺权准备的材料，给陈伯达看过，得到陈伯达的支持。

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陈伯达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参与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彭德怀抛出向党进攻的信件。当天晚上，陈伯达当众向彭德怀说：“彭老总，你的信写得很好，我们都支持你。”他同彭德怀紧密配合，恶毒攻击党的总路线，疯狂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支持彭德怀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活动。

陈伯达长期为刘少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出谋划策。他同刘少奇一道，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对和破坏农业合作化。他反对和破坏毛主席领导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反对资产阶级的历次大斗争。他伙同刘少奇炮制了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谬论，背着毛主席，把这个修正主义的黑货塞进了“八大”决议，妄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强加给全党。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他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反对毛主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在现阶段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正确论断，否定价值法则、商品生产和货币作用。接着，他又从极右的方面反对党的总路线。一九六一年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他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下山，大肆搜集反对总路线的黑“材料”，炮制和推行修正

主义路线。他到处叫嚷要发展个体经济，搞单干，妄图从组织上瓦解人民公社。他又大肆鼓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妄图瓦解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在一九六二年党的七千人干部大会期间，他参与起草刘少奇的黑报告，竭力夸大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叛徒集团反华造成的暂时的经济困难，猖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同刘少奇一道，公开提出和推行“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路线。他积极帮助刘少奇整理和修改黑《修养》，并在《红旗》杂志上重新发表。在四清运动中，他是刘少奇推行形“左”实右的路线、贩卖反革命“桃园经验”的主要帮凶。他公然提出要刘少奇管“四清”和农业，反对毛主席对我党统一集中的领导，帮助刘少奇篡党夺权。

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陈伯达就投靠林彪，同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勾结在一起，采取种种恶劣手段，拉山头，搞宗派，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林彪、陈伯达一伙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长期进行地下秘密活动，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提出许多形“左”实右的反动口号，挑动干部，欺骗群众，煽动极“左”思潮，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疯狂反对党中央，反对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破坏我国的对外关系。林彪、陈伯达是反党乱军，挑动武斗的罪魁祸首，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是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在我党内的代理人，许多鬼事情的根子就在这里。

林彪反党集团经过长期的密谋策划，在一九七〇年八月的庐山会议上向党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进攻，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他们突然袭击，煽风点火，破坏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事日程，背叛“九大”路线，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陈伯达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实现两条反党纲领，私拟了“设国家主席”的宪法条文，炮制了“称天才”的材料，修改了林彪八月二十三日的反党讲话，制造和散布了五大谎言。大量事实证明，陈伯达是这次反革命政变的主犯之一。

陈伯达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的政治骗子。长期以来，他竭力伪装自己，采取造谣和诡辩的手法，欺骗党，欺骗群众。现在，经过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揭发，专案组

的调查，证实陈伯达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

陈伯达到延安以后直至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反革命罪行，还在继续审查中。现将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证附上，请中央审查。

中央专案组

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

中发〔1972〕25号文件附件：

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证
一九七二年七月

目 录

一、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期间，一贯站在国民党右派立场，进行反共反革命的罪恶活动

- | | |
|---|------|
| (1) 陈伯达一九二五年在《洪水》杂志第一卷上发表的《努力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的反共文章（节录） | (1) |
| (2) 陈剑垣的证明材料..... | (2) |
| (3) 罗明的证明材料..... | (4) |
| (4) 许曼的证明材料..... | (6) |
| (5) 杨文生的证明材料..... | (8) |
| (6) 李黎洲的证明材料（节录） | (10) |

二、陈伯达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参加托派组织，回国后继续进行托派反共活动

- | | |
|---|------|
| (1) 陈伯达一九三四年写给河北省委的《怎样组织与怎样斗争》的意见书（节录） | (11) |
| (2) 陈伯达一九三五年五月在《太白》半月刊上发表的宣扬托派思想的文章《殷周社会略考》（节录） | (12) |
| (3) 一九三五年二月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破坏我党地下机关所得的关于陈伯达托派问题的材料..... | 13) |

(4) 托派分子万志凌的交代.....	(14)
(5) 陆玉的交代.....	(17)
(6) 黎琴南的交代.....	(19)
(7) 于苏的揭发.....	(21)
(8) 帅孟奇的交代.....	(23)
(9) 鲁也参的揭发.....	(24)
(10) 潘树人的交代.....	(25)
(11) 托派头目杜畏之的亲笔供词•.....	(26)
三、陈伯达一九三一年在天津被捕叛变，成了特务	
(1) 伪天津市公安局特务总队主任解方的亲笔供词.....	(31)
(2) 特务总队帮审侯天铎的亲笔供词.....	(34)
(3) 特务总队侦缉士陈新亚的亲笔供词.....	(37)
(4)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三日伪天津市公安局 破坏我地下党组织的“请奖表”（节录）.....	(39)
(5) 同案人刘宁一的交代.....	(40)
(6) 一九三一年九月天津《大公报》和北平《世界日报》 关于陈伯达等人被押解北平的报导.....	(44)
(7) 郁中复的证明.....	(45)
(8) 一九三二年远锐写给河北省委的意见书（节录）.....	(47)
四、陈伯达出狱之后，写了一系列文章，积极进行反共宣传	
(1) 陈伯达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写的鼓吹卖国 主义的《论谭嗣同》（节录）.....	(49)
(2) 陈伯达一九三六年在《国防文学论战》上 发表的反共文章（节录）.....	(50)
(3) 陈伯达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鼓吹“国防 哲学”和所谓“新启蒙运动”的反共文章.....	(51)
(4) 陈伯达一九三八年抛出的反共纲领《三民主义概论》.....	(52)

一、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期间，一贯站在国民党右派立场，进行反共反革命的罪恶活动

(1) 陈伯达一九二五年在《洪水》杂志第一卷上发表的《努力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的反共文章（节录）

“现在国中思想界的妖怪，概括言之有三种：一便是亡清余孽，一便是帝国主义及军阀的走狗，一便是走入迷路的糊涂虫。亡清余孽的势力已经薄弱，最不<>足置虑的，便是军阀及帝国主义的走狗與走入迷路的糊涂虫。前则诡计百出，扰乱是非，后则盲目胡言，自送死地。我们如果要努力国民革命，这两种妖怪都该把他一扫而空。

凡是努力国民革命的，都该立在这较为适合国情的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

陈伯达写的反共文章的全文和《洪水》杂志第一卷合订本上的勘误表〔略〕

注：<1>陈伯达在文中说的“走入迷路的糊涂虫”，就是指中国共产党。他所说的“盲目胡言，自送死地”，要把这种“妖怪”“一扫而空”，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2>文中<>处“最不足”，《洪水》杂志已在第一卷合订本 90 页更正为“最足”。

(2) 陈剑垣的证明材料

影印件原文

陈尚友参加孙文主义学会的情况

一九六七年我在福州秦望山家里，谈论旧友梁龙光情况时，秦说梁龙光、黃振家、陈尚友大约在一九二五年在厦门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成立时曾发表过宣言，这宣言是陈尚友主稿的，秦还说一九二六年张余生任国民党汕头市党部委员时，陈尚友任过党部秘书。

一九二六年我和许曼、陈尚友都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当时该校学生左右两派斗争很激烈，校长邹鲁系国民党右派（即西山会议派），这时陈尚友和福建右派骨干学生黄振家（邹鲁得意门生）等拥护邹鲁，反对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打击左派学生，因此我们左派学生称陈尚友为右倾分子。

陈 剑 垣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一日

注：①陈剑垣一九二六年在广州“中大”读书时，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现在福建。②陈尚友即陈伯达。③据陈伯达交代，黄振家是他一九二五年参加国民党的介绍人。已死。④秦望山已死，梁龙光、张余生现在海外。

（3）罗明的证明材料

影印件原文

揭发陈尚友的反共活动

我于一九二五年在广东大学开始认识陈尚友，他与国民党右派学生黄振家、梁龙光、刘鞠民等混在一起，政治思想言论很反动，有一次，陈尚友与厦门籍学生数人，找我谈话，指责我是共产党员，他们谈话是恶毒攻击共产党和左派，由此可知陈尚友是国民党右派。

一九二六年一月，中共广东党团区委派我到厦门招收农民讲习所学员并帮助当地党团发展组织，三月中旬，陈尚友策划和组织六、七名国民党右派在春生堂对我进行攻击和恫吓，有准备有计划的对我进行恶意围攻。他们第一质问我来厦门有何任务、企图和阴谋；第二质问我是不是“庐布”党，有何政治主张；第三，质问我为何还不回广州？质问我懂不懂俄国是什么国家？他们污蔑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已失败，污蔑中国共产党是“庐布”党，恶意煽动中小资本家反苏反共反对革命。还胡说美国和菲律宾很民主很好等等。陈尚友在辩论激烈时，从中插几次话，指点他们向我围攻。

罗明（罗善培）

一九七一年六月五日

注： 罗明当时是中共广东党、团区委派往厦门地区的特派员，现在广州。广东大学即中山大学。

(4) 许曼的证明材料

影印件原文

陈尚友在广州中山大学的反共活动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十月，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二五年七、八月间，在“中大”参加 CP。

一九二六年陈尚友也在“中大”学习。当时校长邹鲁是国民党极右分子，“西山会议”派。陈尚友和黄振家（邹鲁的得意门生）、付仁山等右派学生，拥护邹鲁等召集的“西山会议”，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说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居心不测，企图消灭国民党”、“苏俄包藏祸心”，等等。我们看出陈尚友的思想反动，都不愿和他多接触。有一天“中大”的“孙文主义学会”学生和“中大”CP 为一件什么事情，双方打起架了，“孙文主义学会”派的人被打输。陈尚友来到我们的宿舍，谈话中谈到这件事，他就破口大骂，说我们都是“领苏俄津贴的‘卢布客’、‘可鄙’”。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

许 曼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日

注：①许曼当时是中共党员，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中大”，因参加托派被开除党籍，现在福建。②付仁山已死。③“CP”即共产党的英文缩写。

(5) 杨文生的证明材料

影印件原文

陈尚友反对左派学生的活动

一九二六年，我从永春到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时，陈尚友也在那里。他与永春籍右派学生的头头黄振家很要好。黄叫他做什么事，他都照做。他还在闽南学生中骂共产党员是“卢布客”。

一九二六年间在广州中山大学里，许曼（许世忠）、杨世宁和我，为着要组织一些左派的闽籍学生，在假期回乡做些宣传、组织青年、工、农群众的工作，发起组织了一个《福建革命青年团》，并出版了一种刊物，名叫《朝阳》。陈尚友曾来我们的出版所吵闹，说我们不能用“福建”二字，胡说我们不能代表全福建的学生。可见他是一个国民党的右派。

杨文生（杨邦彦）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日

注：杨文生一九二六年参加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在莫斯科“中大”学习，曾因参加托派被开除党籍，现在福建。

（6）李黎洲的证明材料（节录）

影印件原文

陈尚友在张贞部队任职的一些情况

我和陈尚友是一九二七年初在福州认识的，当时我在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任筹备委员，陈尚友在张贞所统率的独立第四师师部任秘书，兼任东路军在福州所设的军事干部学校政治教官，少校军衔（或中校）。他在这个军事干部学校任教官时，除自己教课外，对校内课程安排还负有相当责任。

李黎洲

1971. 6. 11.

注：①张贞是国民党反动军队独立第四师的师长。陈伯达在该师师部任秘书时，月薪白洋一百六十元。陈曾为张贞起草反动文告，颇得张贞赏识。②东路军的军事干部学校系反动军阀何应钦所办。③李黎洲一九五八年因与美蒋特务勾联，被我政府逮捕，判刑八年，现在福建。

二、陈伯达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参加托派组织，回国后继续进行托派反共活动

(1) 陈伯达一九三四年写给河北省委的《怎样组织与怎样斗争》的意见书（节录）

影印件原文

六、结尾

苏区各地革命的深入，与白区革命运动的开展是目前中国苏维埃红军胜利的保障，然而这还不是绝对的保障，绝对保障还是要依赖于几个中心城市以至于全国的军命胜利，所以摆在我面前的责任是异常艰难，繁重，曲折而苦痛的，小心翼翼的日常地去考察一切革命工作的错误与正确，弱点和优点，以改进工作以推动工作前进，则更容易成为我们的责任。

职 陈尚友 九日成

十月七日抄。

注：陈伯达在“意见书”中，公然宣扬只要城市，不要农村，只要工人，不要农民的托派观点，妄图否定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陈伯达的这个意见书原件，现存中央档案馆。

(2) 陈伯达一九三五年五月在《太白》半月刊上发表的宣扬托派思想的文章《殷周社会略考》（节录）

[略]

注：陈伯达在这篇反动文章中，宣扬苏联托派头子拉狄克和中国托陈取消派陈独秀等人关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阶段的托派思想，否认马克思揭示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除此文外，他还在《春秋战国社会略考》、《研究中国社会史方法论的几个先决问题》、《中国社会停滞状态的基础》等文章中，继续宣扬这种托派思想，顽固地坚持他的托派立场。

(3) 一九三五年二月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破坏我党地下机关所得的关于陈伯达托派问题的材料

影印件译文

233、陈尚友（巴里诺夫--BORINOFF），福建人，教授的儿子，1924 年是国民党员，1927 年入党，同年 10 月派往莫斯科，因与托派有关系而受到警告，党决定：应去次要的部门工作（已送回中国）。

封面译文

巡捕房

政治科

报告

中国共产党上海中央局之发现

（1935 年 2 月 19、20 和 21 日的警察行动）

政治和保安科 上海，1935 年 4 月 8 日

科长帮办 巡捕房副监督

R•约勃士 政治科科长

R•沙赫利

巡捕房监督

P•加衣勃勒

(4) 托派分子万志凌的交代

影印件原文

陈伯达参加托派组织的问题

一九二七年九月，我去莫斯科学习。同路的约二百人中有陈尚友（即陈伯达）。十一月进校，我和他同在一年级的第二班。二八年，东大中国部并入中大，其中有我在国内认识的王文元，他给我看了一些反对斯大林和联共党的托派文件，并动员我参加了托派组织。我阅读过程中，把这些文件也给陈尚友看了。当然，那时在校内传阅托派文件很危险，如果不是我们比较接近和互相了解、对校内的派别斗争的观点相同，如果没有在他看后不会向组织报告的把握，当然我是不敢给他看的。给他看的目的，就是叫他同意托派的观点，并在这个基础上参加托派组织。在他看了这些文件后，他没有提出过与托派观点相反的意见，从初先的默认到最后的完全同意。

我把王文元向我宣传的观点也向陈尚友讲了。这些观点是：在一个国家内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联共党内派别斗争情况；宣扬托洛茨基的“功勋”；并对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斯大林肆意歪曲等等。陈尚友听了也完全同意。二九年四、五月间我参加了托派，曾是五人小组成员。这时我征求了陈尚友参加托派的意见，虽然他表示要挤出时间读书，但仍坚决表示愿意参加托派。此后我将此事告诉了五人小组，并由我和他联系。二九年暑假前，托派组织为筹集活动经费，在内部进行捐款，陈尚友也拿出了二、三个卢布，由我收取后交给五人小组。三〇年二月我被捕，九月于流放前回校过夜，在走廊上遇见陈尚友，他赠送我五十卢布表示同情。五六年我回国后，听于苏说陈伯达就是陈尚友，我曾给他写了一信，争取他的帮助，但未得复。关于我发展陈尚友参加托派的事，在国外曾对于苏、潘树人、鲁也参谈过；五六年回国后在于苏家又对他们三人重说过。关于这件事，陆玉也知道。

万志凌

七一、九、八

注：万志凌一九二九年是莫斯科“中大”托派五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一九三〇年万志凌在苏联被逮捕流放，一九五六年被释放回国。现在农林部“五·七”干校。

(5) 陆玉的交代

影印件原文

关于陈尚友托派问题的交代

1927—1930 年我在莫斯科中大（中共劳大）学习期间，曾和万志凌、陈尚友一起进行过托派活动。1931 年回国后，我又在上海托派中央工作。现将陈尚友在莫斯科中大的托派罪行交代如下：

我在莫斯科中大时，和万志凌是夫妻。陈尚友是万志凌的同班要好的同学，彼此无话不谈。有一次，我们一起谈话，陈尚友和万志凌曾诽谤“斯大林是官僚主义”。还有一次，万志凌用托洛斯基的反动理论，谈到一个国家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陈尚友表示完全同意万志凌的看法。

1929 年 5 月，万志凌参加托派后，为了拉我加入托派，曾将托派秘密传阅的攻击斯大林的文件给我看过。我看文件时间万，陈尚友是否看过？万说，给他看过。并告诉我说“陈尚友的看法和我们一样。”在万志凌的灌输和影响下，陈尚友和我都接受了托派的观点和主张，成为托派分子。那时，万志凌、陈尚友和我是有托派组织关系的，万是个小头目。

万志凌被捕前，予感到形势不好，曾在学校俱乐部门口对陈尚友和我说，今后我们互相联系要注意一些，不要一见面就凑在一起。嘱咐我们，有事由他告知我或陈尚友，然后我和陈再联系，要吸取广西派的经验，隐蔽一些。

万志凌被捕后，陈尚友曾对我说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能把犯思想错误的学生随便逮捕呢？这简直是恐怖政策！他还诬蔑斯大林是独裁专制。他还告诉我说“一切活动，目前暂时停止了。要隐蔽些。”

1930 年底，陈尚友回国前夕，又找过我，说没有钱，我给了他五个卢布。

陆玉（原名胡佩文）

1971. 9. 9

注：陆玉，托派分子万志凌前妻，现在广西。

(6) 黎琴南的交代

影印件原文

我所知陈尚友的一些托派情况

一九二九年三月我到莫斯科“中共劳大”（前身是“中山大学”）学习，曾参加过托派组织，先后和陈尚友有过接触，了解他的一些情况，交代于下：

一九二九年九月间学校举行党员大会时，陈尚友等托派分子暗中鼓动我班的程“小孩”（真名已忘记了）、郑洪涛等各班新生尽先涌入会场，占据前排座位，控制会场，陈等一伙在楼上鼓噪助威，进行操纵。

新生入学后，陈尚友即利用同乡关系与指导读书等办法，对我班两个福建学生程“小孩”和郑洪涛施加影响，将他所收藏的托洛斯基全集及拉狄克的“中国史”等书给程、郑阅读，逐步将其拉入托派。暑假期间，学校要把托派骨干分子万志凌等人送往西伯利亚时，陈唆使程、郑等人力主新生各班出面阻止。清党开始后，陈尚友见势不妙，指示程、郑等注意隐蔽，程并把这事转告我，要我“不要再往前冲了！”

黎琴南

1971 年 9 月 4 日

注：黎琴南原名黎晴岚，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中大”学习时，曾因托派罪被捕，一九三一年回国。一九五二年因托派罪被捕，一九五七年释放，现在湖南。

(7) 于苏〔原字为左“更”右“生”，音 SU，为“苏”的异体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揭发陈伯达的托派问题

一九四六年十月我从劳改营释放后，在沃尔古塔曾有个时期与万志凌同住一个房间，有一次万讲他老婆也是反对派，是他介绍她参加的。万讲：我是暴露了，可是秘密三人小组其他二人就没有被暴露，这两个人，一个是我的老婆，另一个是陈伯达。我被暴露后，陈对我说过，已暴露的人就无法了，没有暴露的人，以后再不能暴露，陈讲他回国后是不会暴露的。

在万志凌回国后，大约在一九五六年，我到万志凌家，当谈到陈伯达时，我问万是不是你讲的那个三人小组的陈伯达，万讲是。我又问是不是写“四大家族”那本书的陈伯达，万讲就是他。在万志凌党籍未解决前，我曾建议万给陈伯达写封信，我对万讲，陈是你三人小组的成员，他是了解你的，他定会帮忙的，万同意了我的意见。给陈写了信，以后我问过万数次，万讲陈未给他回信也未找过他。陈的托派问题鲁也参、潘树人也知道。在文化大革命前陈伯达的托派问题我曾向帅孟奇等人谈过。文化大革命中，我又向原林业部军管会王云主任等同志谈过陈的托派问题。

于 苏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

注：于苏一九三三年去苏联学习，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与万志凌一起在苏联沃尔古塔流放，一九五五年回国。现在农林部“五·七”干校。

(8) 帅孟奇的交代

影印件原文

1958年，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时，曾找于苏谈过话，于苏向我反映，陈伯达在苏联学习期间，参加了托派。谈话间，有人进来，没有再谈下去。后来，我没有继续追问此事。也没有向组织上反映。

帅孟奇

1971 年 3 月 23 日

注：帅孟奇原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9) 鲁也参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关于万志凌对我讲过陈尚友在“中大”是托派的问题

一九四八年夏天某日在中亚细亚塔什干城郊区杨革佑儿镇，在我和万志凌的闲谈中，万曾对我说：“在依凡诺夫自由充军时一个别名叫‘小孩子’（万当时说过此人的真名，我现在记不起来了）跳伏尔加河自杀了。”同时万志凌说：“‘小孩子’是陈尚友的同乡。”于是我问：“陈尚友是谁？”万说：“陈尚友回国去了，我和他是同班，他是班上托派小组织的成员，我是班上托派小组组长。”关于“小孩子”、陈尚友我都不相识，因此，详细情节没细问。

鲁也参

一九七一、八、十三

注：鲁也参一九四八年曾和万志凌同在苏联塔什干城杨革佑儿镇流放，一九五五年回国。现在北京。

(10) 潘树人的交代

影印件原文

关于我所了解的陈伯达的托派问题

我于 1928 年在苏联莫斯科中共劳大留学期间，曾加入过该校托派组织，因此曾被捕，流放到沃尔枯达。在那里我认识了于苏，遇着了过去相识的托派分子傅学礼，万志凌。1955 年我回国后，又和于苏，万志凌住在一起，彼此常见面。因

此先后听到他们给我讲过一些有关陈伯达在苏联留学期间也参加过托派的问题，现在根据我的回忆揭发如下：

1. 我记得在 1953 年，我住在苏联沃尔枯达城热电站街 10 号时，以前莫斯科中共劳大的托派分子傅学礼来我家串门，曾对我谈到毛主席一九四九年来苏联访问时率领的代表团中有陈伯达，并且说陈也是莫斯科中共劳大的托派。
2. 约在 1956 年下半年，我在万志凌家，听万说，他因为党籍问题，曾去信找陈伯达证明，陈不但未予答复，连万原信也不退回。万谈及此事，颇为难堪。我当时问万：“陈伯达怎么会知道你，不知道你又如何能证明你？”万说：“他如何不知道，我们在莫斯科中共劳大时，是一个托派三人小组，我们互相无话不谈。”我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于苏。万并且说他一定向中央反映。
3. 1968 年春节期间，我去看望于苏，在闲谈文化大革命运动时于苏在谈起赵毅敏、安子文等人被揪了出来之后，又对我说，陈伯达也有问题，说陈过去是个托派。

潘树人

1971 年 7 月 30 号

注：潘树人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与万志凌一起在苏联沃尔古塔流放，一九五五年回国。一九七一年十月在北京病死。

(11) 托派头目杜畏之的亲笔供词

影印件原文

关于陈尚友的托派活动

陈尚友和我的关系。陈尚友一九二七年在莫斯科学习时，我在他们班上作翻译，我和他是比较接近的。二人时常在一处交谈，观点一致。我一九二八年从莫斯科回国，一九三〇年被开除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参加托派。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托派遭受大破坏，我十二月逃往北京，继续传播托派思想，进行托派活动，勾结反动军阀孙殿英，搞反革命军事投机，勾结共产党叛徒张慕陶，搞反党

活动。对于我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托派分子，凡是站在共产党方面的人都不同我来往，肯和我来往的，只有叛党分子和脱党分子。陈尚友从一九三三到一九三四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曾三次和我会见。第一次是一九三三年春在北京前门外“泉漳会馆”他的住处。陈告诉我，他一九三一年被捕，是国民党反动派一个师长张贞把他保释出来的。他正在写《论谭嗣同》。我把我被开除党籍，参加托派等情况告诉了他。第二次见面是一九三四年二月，在北京景山西街我的家中。这次见面，陈尚友在我家吃了一顿饭。陈对我大加吹捧，说我的哲学论文写得很好，《自然辩证法》那本书译得很好等等。第三次见面是一九三四年四月在天津一个旅馆中。当时，我以孙殿英代表的身份到天津参加张慕陶所搞的军事投机活动。张慕陶告诉我，陈尚友在天津，并将陈的住处告诉我，叫我去同陈谈谈。这一次我同陈尚友主要是谈，张慕陶这一伙人怎么办？我认为，张慕陶这伙人，既然政治路线和中国共产党不同，就应当搞独立组织，另外成立一个党。陈尚友认为，路线虽有分歧，但这伙人不应脱离共产党，只应成为党内一派，以自己的主张影响党，在党内夺取领导权。据我记忆，这次见面时，陈尚友又谈到他的《论谭嗣同》，并提出请我为他这本书写一篇序。一九三五年陈尚友还对吴承仕吹捧我，说我对哲学很有研究，懂得辩证法，介绍吴到我家看我。以上这些事实就足以说明，陈尚友和我同属于中国托派这一流派。

关于陈尚友和张慕陶的关系。张慕陶也是一个托派，陈尚友就是“张慕陶派”中的一分子。一九三四年四月张慕陶曾向我吹嘘，他手下有一帮人，主要是在张家口“抗日同盟军”政治部工作过的那些人，陈尚友就是其中之一。张慕陶多次对我说：“王通（即陈尚友）学问很好，理论很好”。张是把陈尚友看作他的理论助手，当时我也是这样看待陈尚友的。我在北京的住处是张慕陶告诉陈尚友的。一九三四年四月陈尚友到天津，是张慕陶邀去的。我在天津和陈尚友见面谈话，也是张慕陶安排的。张慕陶进行反党活动时那一套所谓“理论”，一部分是我提供的，一部分就是陈尚友提供的。一九三五年秋张慕陶在太原搞小组织时，自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派”，显然就是按照陈尚友的主张办事的。

从陈尚友关于中国革命策略问题的观点来看，他也是一个托派。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陈尚友同我谈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时，他的意见大体和我一致。我们都强调城市工作和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而忽视农村工作，对农村武装斗争是

不抱什么希望的。在抗日问题上，也看不到广大农民群众的作用。总括起来是，只要城市，不要农村，只要工人，不要农民。这是托派的要害，是中国托派在三十年代的基本主张。

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看法，陈尚友也同托派一致。例如，我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这一阶段，也不承认中国有“亚细亚式的社会”，陈尚友所发表的文章就完全支持我的意见。

托派罪犯杜畏之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注：杜畏之，又名杜沧白。杜于一九二八年由苏联回国，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参加托陈取消派，是这个反动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因托派罪被捕，现在押。

三、陈伯达一九三一年在天津被捕叛变，成了特务

（1）伪天津市公安局特务总队主任解方的亲笔供词

影印件原文

关于王通被捕叛变问题

一九三一年三月至一九三五年六月，我在伪天津市公安局先任特务总队主任，后任特务总队长。

一九三一年四月间，天津市伪国民党部侦察到河北省委设在英租界墙子河外集贤里省委机关的地址，要求公安局协助逮捕。公安局与特务第五队侦察到河北省委设在法租界“西北贸易公司”的机关，同时照会英、法租界动手，逮捕了省委书记许兰芝、组织部长陈源道、秘书长刘善（？）鸥、王通、史连甲等卅余人。在总队审讯时，他们都供认了自己的组织身份、活动内容并互相认证了别人的组织关系和组织活动。

从英租界引渡到特务队以后拖了一个时间，我问帮审侯天铎为什么这些天还没有审完？侯说：这案子人多，其中还有些南蛮子，口音难懂，如王通这个人是个“熊包”，一问就供，可是他是个南方人，说话又文诌诌的，我听不出来就让他写，这样就费了时间啦。我模糊地记得侯天铎还说据市党部、特一队去英租界照会逮捕的人说，王通胆很小，在现场一被捕就“筛糠”了。

总队初审完毕，由帮审侯天铎起草给公安局长的报告并附上每个人的供词。我在供词中看到王通供认了组织关系；供认是共产党员，省委机关成员，主要是在文化教育界活动，常写文章在党刊和公开刊物上登载。我模糊地记得他还供认办过刊物，什么名称记不得了。王通还供出了许兰芝、陈源道，刘善（？）鸥、史连甲等人的组织身份和组织活动等情况。

在侯天铎起草的报告中，除了概述办案的根据、逮捕的人数、初审的过程以外，最后写明从每人供词特别是经过许兰芝、陈源道、刘善（？）鸥、王通，史连甲等重要人员相互印证的情况来看，此案情节确凿，可以成立。等语。

由特务总队将呈文、供词送到公安局司法科复审以后，将陈源道、刘善（？）鸥、王通、史连甲等卅余人送交北平军分会军法处了。

解 方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一日

注：①解方又名解如川，一九三一年四月任伪天津市公安局特务总队主任，是逮捕、审讯陈伯达一案的敌特主要负责人，现在押。②王通是陈伯达被捕后的化名。③许兰芝，陈源道已死，史连甲即刘宁一，刘善鸥应为刘一鸥即刘亚雄。

（2）特务总队帮审侯天铎的亲笔供词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三一年我覆讯河北省委案子的情况

1931 年 4 月间，我在伪天津市公安局侦缉总队当帮审时，有一天伪侦缉一队陈新亚对我说：我们队长徐树铭前几天带人照会英工部局由该局协助，在英租界集

贤里办了一个很重要的案子。把共产党河北省委机关，给破坏了，捕了十几个人（数目记不准确）寄押在伪公安局拘留所，已由徐树铭讯问过了，由我录的供，等我整理好供词，就要送到总队。过了几天，他把案子送到总队，总队长解如川阅后，交给我覆讯。我就到一队去覆讯，由陈新亚录供，由组长张璧臣侦缉士阎子峰等分别把人带到，其中有个叫王通的年约 30 上下岁，南方口音，说话有时听不太清，那省的人，我记不清了。问他时，他没有反供，回答的很顺利。他说：集贤里是共产党河北省委机关。他承认是共产党员，在省里搞宣传工作。我问他其他人情况时，他说：他们全是共产党员，有的担任组织工作，有的搞通讯工作，有的担任缮写印刷，或者帮助别人搞工作。他说的人名，我现在记不得了。我覆讯其他人时证明了王通所说的是实话。

我把这个案子覆讯完了，即报告了总队长解如川，他叫我办公事，送伪公安局司法科，我就办好送案文连同原供送司法科了。

后来侦缉一队，汇报请奖时，由我汇总送到司法科，此案得奖数百元。

侯 天 锋

1971 年 2 月 17 日

注：①侯天锋现住北京市，由群众监管。②徐树铭已被镇压。③张璧臣、阎子峰已死。④侦缉总队即特务总队。

(3) 特务总队侦缉士陈新亚的亲笔供词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三一年在英租界破获共产党的情况：

我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五年在伪天津市公安局侦缉队当侦缉士负责录供办稿工作，还有时参加捕人和审讯。于一九三一年四月由一队队长徐树铭照会英工部局带领队员在英租界办理一个共产党案件。办案前三天已派人化装在集贤里附近寻视。捕获十二三人为了继续捕人侦缉队留人卧底后陆续又捕五人所捕的人由工部局引渡到伪公安局押在拘留所。

在一队时由徐树铭和一队队附高松林审讯，我记录。我记得经过审讯他们全承认是共产党员和担任的工作。有的供认作宣传工作，有的供认作组织工作，有的供认作联络工作，还有的供认在工厂作罢工工作。其中有一个姓王的年在二十岁以上，南方口音，特征中等身量，体瘦，元脸，在审讯中承认是共产党员担负宣传工作，他还供出别的人身份和担任的工作，还有姓张的女的年在十八九岁南方口音，特征身材不高，白胖，元脸，承认是共产党员和联络工作。

这起案件在审讯过程中我曾向总队法官侯天铎讲过案件情况。关于这起案件经过整理讯词、拟稿、缮写呈文、校对、盖章送到总队了。

押犯陈新亚

1971 年 2 月 20 日

注：①陈新亚笔供中所说的姓王的，据他所提供的面貌、特征及担任的工作，即是指的王通。②陈新亚现在天津市。

(4)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三日伪天津市公安局破坏我地下党组织的“请奖表”（节录）

[表略]

注：①表中划△处即是陈伯达等人被捕一案。②表中张任秋即蒲秋潮，已死。张系我党当时河北临时省委招待处负责人。③英租界集贤里当时是河北临时省委招待处。一九三一年四月八日陈伯达与张任秋等一起在此处被捕。④表中证实，敌人对此案十分重视，奖金最高，达四〇〇元。

(5) 同案人刘宁一的交代

影印件原文

关于王通 1931 年在天津被捕中的问题

河北临时省委机关 1931 年 4 月 8 日在天津英租界集贤里被破坏，我们同时被捕的有许兰芝、陈沅（源）道、刘亚雄、蒲秋潮、郑淑梓、李德标、胡大富、刘明弗、吴光华、王通、和我。共十五个人。从英租界巡捕房送到天津伪公安局，经过两次审讯，于九月初送北平张学良伪副司令部。

王通被捕后，一直是表现消沉，特别是在伪看守所中多次向我表示，他身体不行了，无论如何替他想想办法营救他出去。

我们到天津伪公安局不久，在过第一堂时许兰芝就叛变了。在过第二堂时吴光华第一个受审，敌人韩连会张凯运指明后，他承认了是共产党员，是保定交通，第二个是我受审，说我是调来作交通的，我也承认了是共产党员，是调来作交通的。第三个是王通受审，王通回来后，向陈沅（源）道说，许兰芝已经叛变，当面对质，无法抗拒，全部承认了。那就是承认了自己共产党的身分、党的职务和来历，还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同案人的情况。敌人和许兰芝是知道他是从苏联回来的，他又留苏的人当中第一个受审的，在他受审之后，除王通外，其他的人都被敌人改掉了假名字恢复了莫斯科时的名字，这些名字只有王通知道，许兰芝是不会知道的。

在王通受审回来之后，和陈沅（源）道大肆宣扬在许兰芝对证下只好承认。于是全案突破。因此说明王通在敌人面前乖乖投降全部交械了。

我曾看到陈沅（源）道在受审回来后，连出去两次写东西。我问他写什么？他说，写“口供”，他还说，“从苏联回来的人和省委负责人都要写。”我们同案中从苏联回来的有，陈沅（源）道、刘亚雄、蒲秋潮，郑淑梓、刘明弗，胡大富、王通七个人。我问他写什么内容？他说，“写什么时候入党，为什么入党，对共产主义的认识等问题”。实际上是按照敌人的要求写材料或自首书之类的东西。

刘 宁 一

1971. 3. 9

(6) 一九三一年九月天津《大公报》和北平《世界日报》关于陈伯达等人被押解北平的报导

”大批共党解平

周金铭等四十四名
行营已交军法庭审讯
.....”

注：周金铭即张晔。根据张晔交代，陈伯达是和他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初，一同从伪天津公安局押解北平行营军法处的。张晔现在山东省青岛市。

(7) 郁中复的证明

影印件原文

关于营救王通出狱的情况

一九三一年十月间，我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到山西汾阳旧西北军官学校工作。不久，陈君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赶到汾阳叫我设法营救党的负责同志。他说：党的负责同志王通由苏联回国后在天津被捕，现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一定要设法营救出来。当时我们研究，我父亲郁斌山在北平是东北军的高级军官，由他出面作保有营救出来可能。于是，我给我父亲拍了一个电报。内容是：我的同学又系挚友王通因共产党嫌疑被捕，现押在北平草岚子陆军监狱，务乞设法营救出来。以后接到我父亲来信说，他亲自到监狱把王通保出来了。

一九五四年外贸部审干我受审查时，将营救王通的事情写上了。为了准备组织查问，我向我父亲做了较为详细地了解营救王通的情况。他告诉我：他接到电报后，到监狱找的典狱长，典狱长认为他是高级军官同意保释。并向他说：王通是留俄学生，是共产党，误入歧途能有认识还是有远大前程的。又说：犯人出狱要办个手续，典狱长先到牢房叫王通写的改过书，他在保人的名单上签名盖章。办完这些手续后，他就把王通领出监狱了。

郁 中 复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

注：①邹中复现在外贸部“五·七”干校。②陈君文又名陈文总，是陈伯达的结拜兄弟。一九二七年加入共产党，后投敌叛变，曾充当蒋匪第一军参谋长，解放后逃往香港。③邹斌山一九三二年是张学良的少将部副，已死。

(8) 一九三二年远锐写给河北省委的意见书（节录）

影印件原文

远锐致河北省委的意见书

在这里附带说到一个问题即在我们没有证据时绝对的不承认，有证据而不能推掉时，应该就轻避重的承认一点而有计划的开脱一些重要人。我们在公安局的口号一方面是“打死不承认”另一个是“有人对堂才承认”，所以第一堂除徐（许）兰芝外都能执行打死不承认（我们差不多到公安局一月后才过堂），而当第二堂（又二十多天后），因为有人证明，就差不多全体的并完全的承认了。我想这也是值得我们记住的一个教训，在没有证据的人虽然有人对堂依然有可能坚持不承认或只承认很轻的一小部分，所以“有人对堂才承认”是一个错误的口号，所以有些人在公安局的口供，差不多把自己全部的经过都（写）上了，真可以当传记读的！

远 锐

九月六日

注：这是远锐一九三二年九月六日写给河北省委的意见书，原件存中央档案馆。远锐在“意见书”中说：“有些人在公安局的口供，差不多把自己全部的经过都（写）上了，真可以当传记读的！”这个意见书也证实，陈伯达被捕后，投降了敌人，叛变了革命。

四、陈伯达出狱之后，写了一系列文章，积极进行反共宣传

陈伯达叛变出狱以后，积极进行反共宣传。除前面已经揭露的宣扬托派思想的文章外，陈伯达还写了一系列文章，鼓吹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一九三三年十二月，陈伯达在《论谭嗣同》一书中，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有功”的反动理论，赤裸裸地宣扬卖国主义。一九三六年九月，他在《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一文中，支持周扬一伙炮制的“国防文学”的反动口号，反对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一九三六年九月，他在《哲学的国防动员》的文章中，抛出了反共卖国、同大资产阶级搞“合二而一”的“国防哲学”，同时，适应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倡议和鼓吹所谓“新启蒙运动”。一九三八年六月，他抛出了《三民主义概论》这个反共纲领，狂热地吹捧蒋介石、汪精卫，妄图用三民主义来对抗和代替共产主义，溶化和取消共产党。

(1) 陈伯达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写的鼓吹卖国主义的《论谭嗣同》（节录）

[影印件略]

注：陈伯达在《论谭嗣同》这本黑书中，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有功”的反动理论，胡说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从顽固死寂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正当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入华北的时候，陈伯达推销托洛茨基匪帮的“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反革命主张，鼓吹甲午战争后“联日”“是具有相当进步的意义的”，赤裸裸地宣扬卖国主义。

(2) 陈伯达一九三六年在《国防文学论战》上发表的反共文章（节录）

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

陈伯达

文学界两个口号的问题，现在应该休战了。争论当然是不可免的，但争论这样长持下去，吃亏的只是自己，得到便宜的是敌人。我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

号是不可驳倒的。就是那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人，也不能否认这口号的正确性。“国防文学”——这是联合战线的口号。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是左翼作家在“国防文学”下的自己的立场，显然地，这个口号，不是联合阵线的口号。

注：陈伯达写的这篇反共文章，站在王明、刘少奇一边，支持周扬等“四条汉子”炮制的“国防文学”的反动口号，反对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3) 陈伯达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鼓吹“国防哲学”和所谓“新启蒙运动”的反共文章

[文章及书的照片略]

注：一九三六年，正当全国人民更大规模地起来为抗日救亡而斗争的时候，陈伯达为适应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积极推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倡议在全国发动一个所谓“新启蒙运动”，同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相对抗。

一九三六年九月，陈伯达同章乃器等人一起，在《读书生活》第四卷第九期搞了一个“国防总动员特辑”。在这个特辑中，他抛出了《哲学的国防动员》的文章，提出反共卖国、同大资产阶级搞“合二而一”的“国防哲学”，并提出了所谓“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从一九三六年九月到一九三七年夏，陈伯达连续发表了《论新启蒙运动》、《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等十篇文章，为“新启蒙运动”提出一套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纲领。

陈伯达说：新启蒙运动是“继续并扩大戊戌辛亥和五四的启蒙运动”，“其内容总括来说，就是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新启蒙运动所表现的方式，是思想的大解放。”“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是要把四万万同胞从复古独断，迷信，盲从的愚昧精神生活中唤醒起来”。他鼓吹“新启蒙运动结合的标志，乃是保卫祖国，开发民智。”

他说：“我们哲学的任务，就是在于为保卫祖国而服务。”他还说：“在文学上，在一切艺术范围内，应该强调‘人的文学’，‘国民文学’，‘通俗文学’，‘为人生而艺术’的口号。用这些口号把一切开明的文学家，艺术家团结起来。”他呼吁国民党当局帮助他们的这个“新启蒙运动”，并且力图把当时的一切文化运动纳入国民党反动派的轨道。

(4) 陈伯达一九三八年抛出的反共纲领《三民主义概论》

[书照片略]

注：一九三八年六月，陈伯达抛出了《三民主义概论》这个反共纲领。

他在这本黑书中，抹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同旧三民主义的原则区别，抹杀共产主义同三民主义的原则区别，妄图用三民主义来对抗和代替共产主义，溶化和取消共产党。

他在这本黑书中，明目张胆地篡改和捏造历史，对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举行了十年“剿共”战争，血腥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独夫民贼蒋介石和大汉奸汪精卫，奴颜婢膝地、恬不知耻地极尽歌颂吹捧的能事。他在摘引了蒋介石、汪精卫的言论之后接着吹捧说：“正是因为当时主要的国民党领袖，是这样不为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诡计所动摇，这样坚决地继续中山先生和仲恺先生的精神和政策，结果才把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的革命广州挽救过来，终于能够排除万难，克服大敌，转危为安，使革命势力得以继续发展和扩大。如果不是这样，那末，真要如古人所说的‘汉之为汉，未可知也’了。”他长篇累牍地引用蒋介石、汪精卫的话，大肆捧场，竭力美化他们，为他们涂脂抹粉。他在这本黑书中，还鼓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路线。

一九三八年六月，陈伯达将这本黑书，托王明带到重庆出版，向国民党献媚。一九四六年八月，陈伯达配合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将“和平过渡”的反动谬论塞进《三民主义概论》，并将这本黑书再版抛了出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二、研究资料

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摘录

2009 年 8 月 24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31 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三册（4）

第三篇 粉碎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

第三章 开展批陈整风

第四节 召开华北会议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战备野营拉练总结报告上的批语

林彪同志：

此件可阅，我看很好。请你和黄永胜同志商量一下，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

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全国野营拉练的通知

1970年11月24日，毛泽东作出提倡野营拉练的批示。他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上批道：“林彪同志：此件可阅，我看很好。请你和黄永胜同志商量一下，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在报告的最后一页，毛泽东批示：“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12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军迅速掀起冬季长途野营训练的热潮，从12月到次年3月，普遍拉练两个月。按照这一部署，拉练的第一阶段侧重进行阶级教育、光荣传统教育和演练行军宿营、侦察警戒、

生活管理、做群众工作等；第二阶段可搞一些急行军、夜行军，侧重练指挥、练通信联络、练战斗技术、练诸兵种的协同动作和后勤保障。《通知》要求担任机动作战任务、守备任务、施工基建和生产任务的部队及海、空军地面部队，军队院校和大军区以上机关都要根据各自情况组织拉练。此后至 1971 年 9 月，解放军 540 个师以上机关，43 所院校，90% 以上的野战部队都进行了野营训练。通过训练，练思想，练作风，练指挥，练战术技术，练走练打，全面锻炼了部队；同时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密切了军民关系。野营训练也暴露出军队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不搞军事训练而造成的许多问题。12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大、中城市（包括省、地直属市）学校的野营拉练，可在寒假或暑假期间分期分批进行，大学每批一个月，中学和小学五、六年级学生，每批 20 天到 30 天。”此后的三四年内，全国大、中城市的学校都按照这一指示，师生每年分期分批进行野营训练一二次。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三十八军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报告上的批语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议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九日，毛主席在周恩来同志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

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

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

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周恩来同志“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

1970. 12. 19；中发〔1970〕77号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姚文元同志给主席的报告

主席：

上海准备一月上旬(大约一月三日或四日)在“一月革命”四周年时开党代会，已有同志来京汇报。春桥同志和其他同志都要我回去一下。我想在三十日或明年一月一日回去半个月左右，已向政治局报告过。这两天准备把几件紧迫的事办掉(如“红旗”付印等)。您是否同意，请批示。

这次回去，仍想抓一下大批判问题。自己最近除学习中央指定的经典著作外，还很粗浅地读了一点历史和自然科学，想逐步改进自己知识贫乏的状况。把《史记》同《汉书》、《后汉书》相比较，觉得前者在观点及文字上均高出后者不少。赫胥黎为达尔文主义奋斗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比严译《天演论》好看多了，由于倾注全力证明人的老祖宗是猿，曾引起神学家们的狂叫怒骂。他用的方法是解剖学的比较方法，一当进入人类历史领域，就显得论据不足了。他不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不了解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觉的能动性以及这种能动性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对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这个问题，他只回答了一半。此书在普及达尔文学说上有特殊的功劳。一种新的进步的学说要普及，不经过这种剧烈的批判，大约是不可能的。翻看了一点《五灯会元》，才知道宗教的唯心主义的虚妄是怎样用诡辩和折衷主义来装点门面的，这从反面教育自己辩证法的重要。另外还读了一些孙中山的东西。也看了一些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东西。逐步形成这样一个概念：从刘少奇的黑《修养》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一直到他在“八大”的报告和决议，有一条同主席无产阶级世界观相对抗的黑线贯串着，即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这可能是刘少奇反动世界观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的许多文章、“报告”中，都有抽象的即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提法和论点。这是同国民党反动观点一致的。从这里，可以直接引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及极“左”、形“左”实右的路线，可以直接引出复辟资本主义

义、为地富反坏右等剥削阶级服务的修正主义理论，同主席历来倡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根本观点相对抗；在认识论上，则必然同时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反对进行社会的调查研究和革命实践，同毛泽东思想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这个根本观点相对抗。从国际上看，苏修叛徒们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也是建立在所谓“人道主义”“人性论”之上的。批判的文章，在这个问题上仍未批透。想认真搞一点材料及文章。此外，关于陈伯达，也要整理一些此人反动世界观的文字材料，揭发材料中这一部分很少。还想整理一点思想史的材料，以执行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中“继续研究”的任务。别的事可能办不多了。可否，请予指示。致
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

姚文元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晨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对姚文元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报告的批语

都同意。你的学习进程较好较快，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林彪对姚文元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报告的批示
完全同意主席对文元同志报告的批示。全体中央委员和高中级干部认真照主席的指示学习，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极为重要。

林彪

十二月三十日

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

军委、总政治部：

经过学习贯彻伟大统帅毛主席“军队要谨慎”的指示，林副主席“现在更要特别注意谦虚谨慎”的指示和中央首长关于克服骄傲自满情绪的讲话以及解放军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社论，许多同志说：“我们再也不能麻木不仁了”。各单位通过举办干部学习班、召开各种会议、四好总评等活动，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军区“三代会”又进一步作了贯彻，并结合学习沈阳军区党委《关于克服骄傲自满问题的报告》。通过大谈在战争年代骄傲掉人头，文化大革命中骄傲吃苦头的教训，把骄傲自满上升到路线上来认识，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看待自己，在灵魂深处挖骄傲自满的根子，深深地感到：“毛主席的指示无比英明正确，是对我军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革命路上不反骄，早晚都要摔大跤”。

我们在贯彻毛主席指示中，主要抓了以下问题：

一是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如有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比较好地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或历史上有战功，工作有成绩，就自以为“一贯正确”，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豆腐渣”，针对这些问题，许多单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一分为二”的教导，批判“一贯正确”的形而上学思想，摆自己的成长史。有的说：在战争年代虽然打过仗，流过血，但也不是每一仗都符合毛主席的要求。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虽然没有受过处分，但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他在军内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篡夺党、政、军大权的阴谋看得不清、或跟着办了错事。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做出了一些成绩，但对毛主席在各个阶段的伟大战略部署，并非都是自觉地紧跟、坚决照办的。通过这一回忆，使自以为“一贯正确”的同志深受教育。认识到：“一贯正确”的本身已经是不正确了，它从根本上违背了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法。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目的是为了争功。表现是个“骄”字，实质是个“官”字，根子是个“私”字。二十六军党委先后两次集中团以上干部学一分为二，查骄傲自满，破“一贯正确”，决心把骄傲自满搞得臭臭的，让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头脑中树得牢牢的。

二是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念。针对有的同志总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好摆官架子。动辄批评训斥，大小事都要他说了算的问题。用毛主席“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决不允许摆架子”的指示武装干部的头脑，引导大家从谈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入手，看官气十足的危害。有的单位列举了有的老干部不注意思想改造，“眼睛长在头顶上，尾巴翘在天上”，背离毛

主席的革命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变成了走资派的事例，说：有了官气，就会发展骄气，丢掉革命朝气；就会由革命的动力转化为革命的阻力，由依靠群众转化为脱离群众，由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转化为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迟早总会被淘汰”。

三是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有的同志总认为自己“战争年代经过‘火线’锻炼，文化大革命经过‘路线’考验，就凭这些资本，也可以再过半辈子”。因此，学习不刻苦，作风不深入，工作无创造，靠吃“老本”过日子。在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中较普遍地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学习毛主席关于“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立新功，立新劳”的教导，进行小整风，展开思想交锋，在灵魂深处搞斗、批、改，自觉的放下“战功”与“新功”的两个包袱。二〇三师副师长杨育才，在抗美援朝的战斗中，荣获战斗英雄称号。曾产生过有“资本”的念头。学习中，他深有体会的说：成绩、进步、荣誉，只能说明过去，不能代替将来。职务提升了，不见得思想觉悟就提高了；资格老了，不是革命到头了；荣誉多了，不是为人民服务到顶了。要不断地改造世界观，在紧跟毛主席进行新的万里长征中，为人民立新功。许多同志批判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半截子革命思想，决心在有限的年龄里，用无限的精力（毛主席批注：改为充沛的精力较好，因为人的精力并不是无限的）加倍为人民立新功。目前，在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克服骄傲自满问题上，发展还很不平衡，取得的效果也不一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求各级党委，把克服骄傲自满情绪，作为搞好领导班子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在学习元旦社论中，集中一段时间，组织领导干部反复学习毛主席、林副主席有关论述，发动群众，开门整风。同时，通过新年、春节和野营拉练的机会，在全区部队进行一次以反对骄傲自满、虚心向地方学习为主要内容的拥政爱民教育。对三支两军人员普遍进行一次整训，反骄破满。“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努力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以上报告，不当之处请指示。

济南军区政治部

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

一九七一年一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贯彻毛主席对姚文元同志报告的批示的通知

1971.01.06；中发[1971]2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通知

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各大军区、省军区党委，各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伟大导师毛主席对姚文元同志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报告的批示，极为重要，是我党思想建设的最根本问题。现将主席、林副主席批示和姚文元同志报告印发给你们，望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全国高、中级在职干部认真照主席的指示学习，以期不负主席的要求和希望。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一年一月六日

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发出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关于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学习贯彻毛泽东“军队要谨慎”指示情况报告的批语

林、周、康三同志：

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你们看一下，是否可以转发全军。如同意，请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除军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林彪批示

完全同意，希望按主席批示认真落实。

林彪

八日

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军委总政治部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一月八日重要批示的通知

1971. 01. 11；中发〔1971〕3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一月八日重要批示的通知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作了极为重要的批示，并指出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这一批示对于加强我党、我军思想、作风建设，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多年来，军队和地方以及中央机关没有从反对居功骄傲这一方面进行整风。有些干部存在着居功自持，骄傲自满，军阀主义，自以为是，一言堂，讲假话，不走正道等歪风邪气，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这对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妨碍极大。

我们军队、地方和中央机关，都要以毛主席的批示为纲，利用当前极好时机，开展一场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读几本书，密切联系实际，开门整风，学习济南军区报告的三破三立，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弄通思想，提高觉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将毛主席、林副主席批示和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转发给你们，望认真学习。

希望你们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批示中，适时地向中央写出这样的报告。

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

军委总政治部

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一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一、会议情况

这次华北会议是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两次极为重要批示，从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共四百四十九位同志。遵照毛主席指示，一月九日起，中央军委座谈会的一百四十三位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学习了毛主席、林副主席最近批示的七个重要文件，听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发言，进一步揭发批判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叛变罪行，揭发批判了李雪峰、郑维山等同志的严重错误。

二、对会议的估价

(一)会议通过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更加认清了他的反党罪行，进一步同他划清了界限。

根据现在揭发和调查的可靠材料，证明：

1、陈伯达的反动历史。

陈伯达出身于所谓“四代书香”门第的破落封建官僚家庭。他先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充当过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少校秘书，后钻入共产党，留学苏联，有托派重大嫌疑。他回国不久，即被捕叛变，后为刘少奇恢复他党的关系，一直埋藏在党内三十四年。

2、陈伯达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他回国叛变后，宣传叛徒哲学，鼓吹“国防文学”和“国防哲学”，为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大造舆论。他反对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理论和实践。他同刘少奇一道，在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实现后，提出了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谬论。在毛主席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引下，亿万群众掀起大跃进高潮时，他形“左”实右地否定价值法则，否定货币作用，主张农村人民公社实行所谓全民所有，为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制造了反马列主义的“理论”根据。他支持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他第一次庐山会议参与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第二次庐山会议私自下山，不知干什么去了。

他积极帮助刘少奇整理和修改黑修养，在《红旗》重新发表。他竭力吹捧“桃园经验”，并提出要刘少奇管四清和农业，帮助刘少奇篡夺权力。

3、陈伯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

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大派工作组，忠实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在中央文革名为组长，实则反对中央文革，背着中央文革搞坏事。他打着红旗反红旗，中央文革碰头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种措施，他常常或明或暗地进行破坏和反对。他是肖华、杨、余、傅、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是反党乱军的罪魁祸首。他是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支持武斗的指挥者。

他一贯反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同毛主席唱反调。他一贯反对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他主编的《红旗》不登姚文元同志主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奉彭真之命，私编《毛主席语录》，与林副主席主编的《毛主席语录》唱对台戏。他借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而对毛主席和中央肯定的“九大”政治报告草稿又诬蔑为伯恩斯坦主义的文件。

他在编辑毛选《五卷试选》期间，对毛主席的文章肆意篡改。后来，又对康生同志奉林副主席（毛选编委主任）之命主编《毛选五卷》送审本进行怠工破坏，并组织了一个地下黑班子，私自整理毛主席的著作，与毛选编委会相对抗。

他背着中央搞了一个秘密班子，专门研究中央政治局历次的宪法修改稿，伺机向党进攻。他反对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最后，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突然袭击，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4、陈伯达投靠王明、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

他在组织上初期投靠过王明，后来长时期投靠刘少奇。他在延安要求离开张闻天到毛主席那里工作，又害怕得罪张，主席批评他是“脚踏两只船”。他随毛主席访苏，违背毛主席的嘱咐，私自离开代表团，进行个人活动。他对彭德怀、高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陶铸、胡乔木、周扬、杨献珍等反党分子都很亲。他包庇大批坏人，招降纳叛。

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了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的太上皇。他把自己领导的部门搞成独立王国，任何中央同志都不容过问。

(二)会议通过对李雪峰、郑维山等同志的揭发批判，对于毛主席提出的“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为何林副主席“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为何北京军区和河北省两次传达都是那样不集中开会，草率了事等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从思想上初步肃清陈伯达的流毒。

会议开展了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开得很严肃，大家对李雪峰、郑维山等同志的揭发批判，基本上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既很尖锐，也很中肯。

(三)会议贯彻“批陈整风”的精神，使大家受到了一次生动、深刻的路线教育，提高了觉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更好地团结起来了。我们相信，这次会议将对全党全军起重大作用。

三、李雪峰、郑维山同志的错误和中央的决定

(一)李雪峰、郑维山同志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反对党的“九大”路线，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伯达在华北各地乱跑乱说，到处联络人，进行反党的舆论和组织准备。李雪峰、郑维山背着中央，同陈伯达勾结在一起，把他捧为太上皇，扩大他的影响。

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搞突然袭击，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李雪峰积极配合，郑维山表态支持。李雪峰有布置地抢先出简报，大造反党舆论，发出了向党进攻的檄文。李还煽动几位工农同志发言，指名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事后又推卸责任，嫁祸于人。陈伯达被揭发后，李还背着中央，为陈伯达打掩护。

九届二中全会后，李雪峰、郑维山违背中央指示，对陈伯达的反党问题不认真开会传达，不讨论，不揭发，不批判，仍然站在陈伯达一边。毛主席路过石家庄当面对李雪峰作了重要指示，李还是执迷不悟，存心抗拒，既不揭发陈伯达，也不交代自己的错误，更未向党的核心小组传达。

李雪峰、郑维山紧跟陈伯达在庐山搞反党活动，决不是偶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就追随刘少奇、陈伯达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天津支持坏人(江枫、胡昭衡、王亢之、方纪、李树夫等)夺权，在保定地区先取缔“八一红卫兵”，捉了几百人，后撕毁大联合协议，支一军压一军，支一派压一派，搞明抢

暗发枪支，使武斗升级，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干扰和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二)李雪峰、郑维山一贯地闹宗派、拉山头，搞独立王国，在组织上犯了严重错误。

李雪峰、郑维山追随陈伯达、杨成武，打击和陷害三十八军。李雪峰对中央不满，在刘少奇倒后，只听陈伯达的话，他在河北省把革委会的权力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排斥对自己有意见的人，甚至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同志。在杨成武被揭发批判之后，郑维山坚持错误，继续搞山头主义，排挤外来部队，任人唯亲。他还在北京军区大搞以他为首的反动的多中心论，以是否拥护他为标准划线、排队。他们都打击反对过自己的人，破坏了军队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和上下之间的团结。

(三)李雪峰和郑维山，一个是家长制的“一言堂”，一个是军阀主义，作风严重不正，这是封建资产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

李雪峰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做官当老爷，唯我独尊，一个人说了算，动辄骂人训人。

郑维山飞扬跋扈，称王称霸，竟然下令开枪镇压群众，伸手向中央要开枪权、扫荡权。他对同级以家长自居，对下级蛮横霸道。

他们经常说假话，欺上瞒下。他们同陈伯达、杨成武串通一气，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编造假情况，诬告三十八军在保定支持保守组织。李雪峰、郑维山追随陈伯达点名摧垮保定的一派群众组织，却又向中央说“促进了两派的革命大联合”。

(四)李雪峰、郑维山的错误是有历史性的。

郑维山过去紧跟杨成武搞山头主义、独立王国，这次又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站在错误路线一边。李雪峰过去紧跟刘、邓，同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坏人混在一起，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紧跟刘、邓、陶。主席挽救了他。他不但不改，这次又跟着陈伯达跑了。他和陈伯达在思想上有共同性，有个人野心。李雪峰还在庐山会议上搞了准备翻案、算账的材料，这次会议上又派人回去销赃灭证，在背后捣鬼。他对有的同志的揭发批判很反感，甚至反咬一口。这种态度如不转变过来，那是很危险的。

(五)根据会议中李雪峰、郑维山的检查和大家的揭发批判以及表现出来的情绪，中央认为李、郑两同志继续留在北京军区和河北省担任原来的领导工作是有困难的，因此，中央决定：将李、郑两同志调离原职，继续进行检查学习，接受群众教育，待有成效后，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

我们希望李雪峰、郑维山同志与陈伯达彻底决裂，划清界限，向党交心，改正错误，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六)中央决定：李德生同志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同志任第一政委，纪登奎同志任第二政委；谢富治同志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同志任第二书记，纪登奎同志任第三书记。刘子厚同志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郑三生同志任第一副主任兼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曾美同志任第二政委；刘子厚同志任河北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郑三生同志任第一副组长。尤太忠同志任内蒙前指司令员。

四、今后意见

这次华北会议结束后，在北京军区师以上的党委，在华北各省、市、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要按照中央既定的部署，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开展“批陈整风”，彻底肃清陈伯达的流毒，纠正李雪峰、郑维山同志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的影响。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们提出以下意见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七个重要文件和九届二中全会公报，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马列著作，掌握思想武器，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提高路线觉悟。

(二)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指引下，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的重要指示，通过“批陈整风”，进一步加强全党全军的团结，加强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加强全体革命人民的团结。

(三)要通过“批陈整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华北地区和其他地区一样，目前的形势也是很好的。北京军区各部队的广大指战员，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是做出了贡献的。华北地区过去的许多重大问题，是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解决的，不能否定党中央决定的问题。我们要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其中包括正确对待群众组织的政策，进一步巩固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认真搞好斗、批、改。如果有人借

“批陈整风”的机会重拉队伍，另立山头，破坏当前的革命大好形势，那是不允许的。

(四)要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政策。对于犯有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愿意改正，我们都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北京军区、河北省革委会和天津市革委会有些干部，过去受了陈伯达假马克思主义的欺骗和蒙蔽，跟着李雪峰，郑维山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只要他们能够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决裂，同李雪峰、郑维山同志的严重错误划清界限，应该仍然信任他们。

在这次斗争中坚持了正确路线的同志，要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中央[1971]3号文件，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

(五)各级党的组织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原则，维护党的一元化的集体领导，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

(六)要坚决纠正某些干部居功自恃，骄傲自满，搞军阀主义、一言堂，讲假话，不走正道走邪道，搞对内的大国沙文主义等歪风邪气，使某些作风不正之处转入正规化，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作风。

二、研究资料

汪东兴著《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摘录

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后，为了继续解决这次会议上的问题，给林彪等人改正错误的机会，争取和挽救他们，党中央和毛主席倡导开展学习和批判运动。

这年 10 月，毛主席对贵州省关于“三支两军”问题的报告作了批示，提出要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11 月 6 日，党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传达了毛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要挤出时间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的指示，建议各单位干部读六本马、恩、列著作和五本毛泽东著作，即：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矛盾

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1月16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央作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指示提出了解陈伯达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要进行检举和揭发，将揭发材料妥送中央，并号召全党全军立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12月16日，毛主席对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作了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12月18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说：“什么‘四个伟大’（指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作者注），讨嫌！”

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主席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的，‘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四个伟大”是林彪提出来的。毛主席的上述讲话显然是批评林彪。“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几次表示过对“四个伟大”提法的态度。我记得毛主席1967年2月3日会见卡博、巴卢库时，就说过：“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还有一次，可能是1968年元旦前夕，要发表一篇元旦社论。社论的草稿上提了“四个伟大”，毛主席不同意，他让我拿着社论的清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删掉。我问毛主席，“四个伟大”您就不留一个？主席想了想说，那就留下一个吧！我又问留下哪一个。毛主席说，我是当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

其实导师就是教师，不过比教师高明一点。我到钓鱼台找了陈伯达、姚文元，让他们按毛主席的意见圈掉了。

12月19日，毛主席对周总理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

提出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黄永胜、李作鹏应同李德生、纪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12月22日至翌年1月26日，召开了华北会议，对陈伯达进行揭发批判。

华北会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参加了，我也去了。

去参加会议前，我请示毛主席：“我要不要发言？”

毛主席说：“你现在是明白人了，为什么不发言？”

我说：“我先写一个东西给您看一看，不要又搞错了。”

毛主席说：“不用写了。根据我与你几次谈话的情况，我看你的思想已经通了。你讲吧，讲错了，回来我们再商量，再批判嘛！”说到这里，毛主席哈哈大笑起来。

1971年1月8日，毛主席对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作了指示：“林、周、康三同志：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你们看一下，是否可以转发全军。如同意，请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除军队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1971年1月9日，中央军委召开一百四十三人参加的批陈整风座谈会。

黄永胜等人既不真正批判陈伯达，又不作自我检查。毛主席对黄等人的态度不满。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月26日，中央发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

在华北会议结束前（指1970年12月22日至1971年1月下旬召开的华北会议——作者注），毛主席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措施，即1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

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在这个命令宣布之前，毛主席曾找李德生同志谈过话。

吴法宪《回忆录》摘录

2009 年 8 月 31 日初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三册（5）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三章 批陈整风

第五节 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中央工作会议）

第三部分 本节资料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运动重点在批陈的批语都同意。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1971. 02. 25；中发[1971]6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发出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文批示：

“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只在十八页上去掉一个词，以便突出马列。十七页上已有了这个词，也就够了。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黄永胜 3 月 21 日的书面检讨上作了如下批示：

“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只在黄的第二页上有一个注语，请各同志注意。”

黄永胜书面检讨的第二页上有段话“过去我对反党分子陈伯达这个人有迷信，被他所谓‘天才理论家’、文化大革命‘有功’、‘小小老百姓’等假象所迷惑。”

毛主席对这段话批注：“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日，毛主席对刘子厚在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检查作了批示，指出：

“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 3 月 19 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毛主席还在刘的检查的最后一页批示：“这还只是申明。下文如何，要看行动。”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关于黄、吴、叶、李、邱的自我批评的批语

周恩来同志：

吴法宪、叶群二同志重写过的自我批评，我已看过，可以了。请连同黄、李、邱三同志的自我批评，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李德生报告上的批语

这样就好。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我历来认为，同志之间有隔阂，有问题，应当耐心商量，多做谈心工作，不宜急躁，也不应久拖不决。工作不顺利，有中央帮助，总会解决。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日，中共中央转发陈锡联同志在沈阳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和辽宁省县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1971.05.10；中发[1971]36号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一日)军区党委四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从二月十五日开始，到今天开了二十五天；辽宁省县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从二月二十四日开始，到今天开了十六天。参加这两个会的同志共四千一百多人。

这两个会，都是批陈整风的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这篇光辉文献和毛主席、林副主席最近批示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遵照毛主席关于“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会议着重揭露、批判了陈伯达的反党夺权罪行，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

到会同志一致认为，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当陈伯达这个反党分子跳出来兴风作浪的时候，立即拨正了全会的航向，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夺权阴谋，把这个反党分子揭露出来，消除了党内一大隐患，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会议热烈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一致表示坚决紧跟、坚决照办。

到会同志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以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斗姿态，用毛泽东思想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对陈伯达三十多年来一贯反对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和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进行了深入的揭发和批判。通过揭发、批判，剥掉了他的画皮，戳穿了他的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面目：陈伯达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一个隐藏在党内三十多年的国民党反共分子、无耻叛徒、国民党特务、托派分子，老反革命；根本不是什么“一贯紧跟毛主席”，而是个一贯追随王明、刘少奇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一个凶恶的阶级敌人；根本不是什么“理论家”，而是一个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政治骗子，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秀才”，是帝、修、反的忠实代言人；根本不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功臣”，而是反党乱军，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根本不是他自称的“小小的老百姓”、“小小的小学生”，而是个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政治骗子。

他是肖华、杨、余、傅、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同志们认清了陈伯达的反革命本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同他划清了界限。在批陈过程中，同志们遵照毛主席关于“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的教导，对陈伯达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进行了专题批判。大家反复学习和领会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的光辉论述，更加看穿了陈伯达鼓吹“天才第一”这个唯心论的先验论的反动本质和政治阴谋，进一步懂得了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在批判中，重点批判了陈伯达的唯心主义先验论。陈伯达为实现其政治野心，竭力贩卖反动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彻底暴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大家说，陈伯达那么起劲地“称天才”，就是否定人们的社会实践，妄图否定伟大领袖毛主席半个世纪以来的伟大革命斗争实践。他用谣言和诡辩制造混乱，破坏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妄图分裂我们党，达到他阴谋篡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在批判中，大家还狠批了陈伯达“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谬论，大家说，陈伯达把自己打扮成创造历史的“英雄”，就是他历史唯心主义的大暴露，其罪恶目的是为他反党夺权服务。通过批判，大家认清了陈伯达的所谓“理论”，始终贯穿着一条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我们一定要识破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决“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这两个会，在批陈的基础上，进行了整风。到会同志对军区党委常委和辽宁省党委常委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批评和意见。军区党委常委和省委常委一起开了交心会，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军区党委常委还要在军区的会议上进行检查。会后，军区和省委都要继续深入进行批陈整风。下面，我根据军区党委常委、辽宁省委常委研究的意见，着重讲两个问题：

一、在同反党分子陈伯达的斗争中，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

1、要认清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会上，有些同志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每当党内出现一次大的斗争，象这次出现陈伯达反党事件，在开始时，有些同志感到突然？有的同志甚至有一种天真的想法，希望党内不出这类事。经过学习、批判，大家认识到，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认识不清，阶级斗争观念不强，特别是对毛主席提出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理解不深，没有在自己头脑中深深扎根。

毛主席早在一九六二年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一九六四年，当贺龙、罗瑞卿搞大比武的时候，毛主席又指出：“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反复学习毛主席这些教导，我们就可以认清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就会出现象王明、刘少奇、陈伯达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政治骗子。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要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观点来理解这个问题。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一切阴谋家、野心家进行反党活动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陈伯达就是这种惯用反革命两面手法的最阴险、最狡猾的阶级敌人。他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疯狂反对毛主席；他标榜自己懂得马克思，用谣言和诡辩阉割和反对马克思主义；他大讲特讲什么社会主义“规律”，为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制造理论根据；他利用中央文革小组长的名义，把自己打扮成“英雄”，干尽了反对中央文革、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现实的阶级斗争就是这样的尖锐、复杂，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一定要把眼睛擦亮，不仅要“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还必须“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要牢记毛主席提出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千万不要忘

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始终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防止象陈伯达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2、要深刻认识路线问题的重要，提高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权重要，还是路线重要？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要深刻认识。路线问题是决定一切的问题，有了正确的路线，就有了一切，路线错了，就丧失一切。路线对了，没有政权可以夺取政权；路线错了，有了政权还会丢权。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苏联是列宁亲手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反党篡权上台以后，搞了一套修正主义路线，使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复辟了资本主义。我们有的基层单位，比如象鞍山眼前山矿政权得而复失的教训也证明了这一点。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我们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党正是由于有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才能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战胜陈独秀、王明、刘少奇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阴谋集团，粉碎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排除右的和“左”的干扰，夺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就胜利，就前进，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就受挫折，就失败。这个历史经验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忘记了就意味着背叛。

同志们从陈伯达的反党罪恶活动中，更加清楚地看到，一切反党分子向党进攻，总是要从右的或从“左”的两个方面来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我自己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不深，甚至理解错了，就不能抵制和排除阶级敌人的干扰和破坏，而且在执行中还会“左”右摇摆，甚至迷失方向。在这方面，我们也是有过不少教训的。比如，彭德怀搞“正规化”，照搬苏联那一套，我们做没做？做了的！刘少奇的黑“修养”出来，我们学没学？把它当“教材”了嘛！贺龙、罗瑞卿搞大比武，我们也是搞了的。杨成武抛出“大树特树”，我们也是跟着喊了的。这说明我们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特别是对毛主席提出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学习的不好，理解得不深，执行得不自觉。

要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要不断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决不能满足于朴素的阶级感情。要坚决按照林副主席的要求，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要努力提高辨别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能力。“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符合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坚决支持；违背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批评、帮助；反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坚决斗争。要不忘过去，警惕现在，教育后代，认真搞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特别要搞好党的基本路线和“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教育。对路线问题，一定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天也不能忘记。正象有的同志说的，决不能“来以前不知道，听到后吓一跳，学习后有提高，过一段又忘掉。”

3、要坚决纠正不正之风，使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

在这次会上，许多同志都谈到，要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就要有一个好的思想作风。作风不正，总是容易被阶级敌人所利用，成为他们进行反党阴谋活动的缺口。李雪峰、郑维山同志所以犯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思想作风严重不正。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家长制的“一言堂”，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做官当老爷，唯我独尊；一个是军阀主义，飞扬跋扈，称王称霸。他们经常说假话，欺上瞒下。他们不走正道走邪道，和陈伯达臭味相投，陈伯达找地盘，李、郑找靠山。这样，他们就必然搞到一起。思想作风一定要正。思想作风不正的人，党性不纯的人，搞歪门邪道的人，就容易被陈伯达这样的坏人所挑动所利用。这里，我提出一个严肃问题，如果陈伯达到东北来乱跑乱说，我们能不能识破，会不会上当，会不会受骗，会不会也要抬他当“太上皇”？我想，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不提高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不克服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等歪风邪气，不提高革命警惕，也是很危险的。

毛主席指出：“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在反对骄傲自满的问题上，我们军区近几年来，联系三支两军、部队建设等方面出现的问题，先后抓过几次；省革委会成立以来，通过路线分析、思想“爬坡”，也抓过几次。但由于我们认识不高，抓的不狠，没有把反对骄傲自满提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改

造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问题仍然没有很好解决。中央三号文件所指出的问题，在我们军区和辽宁省都还程度不同地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

从军区来看，主要是有两个包袱，满足现状，自以为工作做得还不错，似乎还能“过得去”。有些同志自以为打仗有功，支左有功，盲目骄傲自满，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和群众，只想当革命动力，不想当革命对象，老虎屁股摸不得。有的固步自封，上级指示装不进，先进经验学不进，群众意见听不进，靠“老本”过日子，认为“老本”不多可以吃一阵子，水平不高可以用一阵子，理论不高可以凑合一阵子。有的在工作中看成绩多，看问题少，讲成绩总觉得没说够，讲缺点总觉得过了头。有的骄横跋扈，独断专行，把个人置于党委集体领导之上，个人说了算。有的搞军阀主义，训人整人，骂人打人，耍威风，逞霸道，甚至利用职权，欺人压人。有的滋长了资产阶级庸俗作风，拉拉扯扯，吹吹捧捧，原则不坚持，错误不斗争。有的当官做老爷，贪图享受，铺张浪费，搞特殊化，甚至贪污腐化，违法乱纪。有的讲假话，报喜不报忧，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有的存在着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在外事活动中不谦虚，不礼貌，在宣传上有强加于人的现象，对内以大压小，总要高人一头。这些问题，有的发生在我们领导身上，有的虽然发生在下面，但责任还在我们领导，首先是我自己要负责任。

从辽宁省来说，对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也必须注意防止和克服。我们现在担心的是，有些同志不能正确对待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有个“三高、一早、一好”的说法（即去年粮食总产量、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历史最高记录，财政总收入达到了较高水平，省委成立得较早，革命生产形势比较好）。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要求同志们正确对待工作中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当工作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更要头脑清醒，正视存在的问题，克服薄弱环节。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就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继续革命的障碍。我们一定要警惕这一点，千万不能头脑发胀，忘乎所以。

毛主席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几十年来为我党培育的宝贵的革命传统。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三大作风，抵制和克服各种不正之风，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

4、要坚持斗私批修，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为什么有的人在政治上犯了那样严重的错误，正象同志们说的，就是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带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搞阶级斗争，就会分不清敌我；带着私心和资产阶级派性掌权，就会使革命政权改变性质；个人主义发展到严重的时候，就会搞歪门邪道，闹宗派，拉山头，破坏党的团结，甚至走上反党道路。

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要紧跟毛主席革命一辈子，不犯或少犯错误，就必须“斗私，批修”，破私立公，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

5、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增强党的团结。

我们讲的一元化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做到“五个统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坚定不移地、不折不扣地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制度。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就要在集中指导下充分发扬民主，又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就要反对独断专行，压制批评，搞一言堂的恶劣作风；就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挥集体领导作用，不能把个人置于党委之上；就要加强组织纪律观念，加强请示报告；特别重要的是重视调查研究，遇事不能想当然，不能主观臆断，不了解情况就乱讲乱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辽宁在建立省委之前，搞思想、路线“爬坡”的时候，总结了一条经验：凡是经过调查研究，由集体讨论决定的问题，错误就比较少；凡是仓促，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由个人决定的问题，就容易出错。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善于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毛主席指出：“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辽宁省搞了一个“一把火烧两头”，发动群众，采用“四大”的形式来搞。一头，烧清领导班子思想上的路线是非问题，一头，烧牛鬼蛇神。事实证明，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把领导班子烧

垮嘛！而是使各级领导班子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更好地发挥了对敌斗争战斗指挥部的作用。

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党的团结，就要认真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干革命就要讲阶级，讲路线，不能搞人性论，不能搞折衷主义。有不同的意见，要拿到桌子面上来，不要当面不说，背后乱说，更不要怕引起争论。原则性的争论，不仅不会妨碍党的团结，反而有利于革命，有利于加强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当然，在揭露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要坚持“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不要无限上纲。

6、要认真看书学习，提高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指出：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在对姚文元同志报告的批示上，毛主席又要求中央委员和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正如林副主席所指出的：“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极为重要。”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坚决照办。

经过这次批陈斗争，使我们进一步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许多同志说得好，单纯的工作经验代替不了毛泽东思想，埋头苦干代替不了革命的理论，朴素的阶级感情代替不了路线觉悟。工作忙忙碌碌，学习马马虎虎，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重要时刻就会迷迷糊糊。假马克思主义者最爱吓唬那些不爱学习的人。不爱学习的人，也最容易上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当。一旦上当受骗，轻者给人家当“叭喇筒子”，重者会给人家当“打手”。这是很值得我们严重警惕的。

我们一定要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挤时间“认真看书学习”，而不能强调工作忙，没时间，不去认真学习。强调工作忙，没时间，实际上是不想学习的借口。要长期坚持。而不能学一阵子；要真正弄通，而不能一知半解；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而不能理论和实践脱节。要刻苦地学习马、列的书，学习毛主席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把学习和开展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真正从思想上、理论上，分清什么是正确的路线，什么

是错误的路线，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尽快地改变我们理论水平不高的状况，这样才能更好地、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总之，我们应吸取的教训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就是：任何时候都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不要忘记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不要忘记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这样，我们才能永远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二、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问题

批陈整风，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做好一切工作的纲，是今年的中心任务。搞好批陈整风运动，对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加强政治建军和部队的思想作风建设，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们同陈伯达的斗争，是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是同刘少奇斗争的继续，是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严重斗争。我们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在批陈整风运动中，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以批陈为重点，首先把“批陈”搞好。要按照中央的部署，以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这篇光辉文献为武器，继续深入揭发、批判反党分子陈伯达的滔天罪行，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剥掉他的画皮，肃清他的流毒，同他彻底划清界限。并要从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真正打一次“防疫针”。

批陈整风运动，重点是把批陈搞好，在搞好批陈的同时，也要把整风搞好。下面，就沈阳军区和辽宁省如何深入搞好整风的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1、我们军队的同志，要特别注意反复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关于“军队要谨慎”的重要指示，认真搞好整风。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我们军队非常关心、非常爱护。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对军队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指出：“军队要谨慎”。

毛主席在看了贵州省军区关于三支两军工作的报告后，又批示：“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在对北京卫戍区野营训练总结报告的批示上，强调要“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指出“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毛主席又对三十八军党委《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作了重要批示，召开了华北会议。林副主席并批示：“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希望全军在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更好地团结起来。”

去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周总理关于召开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上，毛主席又批示：“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指出：“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 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 风邪气有所改正。”

今年一月八日，毛主席对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又作了极为重要的批示。指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最近，毛主席又指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

毛主席、林副主席为什么对军队这样关心，为什么特别强调军队要谨慎？我们领会：

一是我们军队，现在一方面担负着保卫祖国，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战斗任务；另一方面还担负着三支两军任务，要同地方同志一道，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好。我们必须认识到，军队地位变了，任务重了，责任大了，工作的面更宽了，遇到的事情更多了，接触的人更广了。因此要求我们要特别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尊重地方同志，虚心向地方同志学习，主动搞好团结。如果我们不懂装懂，自以为是，瞎指挥，骄傲自满，脱离群众，那就很危险。

二是我们军队确实有两个包袱，有各种不正之风。毛主席指出：“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我们部队有着光荣的历史，爱护历史荣誉是对的，但决不能把它当成包袱，骄傲起来。在胜利的形势下，更需要谦虚谨慎，正象同志们所说，“胜利的军队最容易骄傲，胜利的形势最需要整风”。我们必须通过整风，放下包袱，去掉不良作风，保持谦虚谨慎。如果我们对此认识不足，抓的不好，就会落后于形

势，就会犯错误，就会对建军不利，对建政不利，对继续革命不利，对个人思想革命化不利。

三是我们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诸因素中的主要因素。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切阴谋家、野心家要反党篡权，总是首先要抓军权。高岗、彭德怀是这样，刘少奇、罗瑞卿是这样，陈伯达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军队的同志必须十分谨慎。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坚决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使我们的军队在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指挥下，成为一支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民军队。这支军队，永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永远要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坚决完成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赋予的光荣任务。

2、我们辽宁省的同志，要深刻领会毛主席对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所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把批陈整风搞好。

辽宁省前一段搞思想“爬坡”、路线分析，搞了一年多，这是对的，是有成绩的。它为这次整风创造了条件，但它决不能代替这次整风。这次批陈整风运动，根据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有了新的丰富内容和更高的要求。而我们搞的思想路线“爬坡”，虽然在路线、方针、政策方面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按照这次整风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对于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我们有些“老大难”单位，难就难在领导班子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团结不好，还有不正之风。因此，我们绝不能满足于过去的思想“爬坡”和路线分析，一定要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一系列指示和中央文件的要求，跟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这次批陈整风运动搞好。

我们要防止和克服对整风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有的同志认为，“上半年烧，下半年爬，年终来个大检查。”有的同志认为，“反骄到顶”，“无骄可反”。有的同志说，“就是有点骄傲，也是光荣的缺点、红色的包袱”，甚至认为，“有骄无害”、“骄傲有理”。这些都是开展整风运动的思想障碍，必须加以克服。

在批陈整风中，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和军队代表同志，要自我革命，自觉革命，带头革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跟上，靠下，化自己”。通过整风，把我们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大大提高一步。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批陈整风运动为纲，带动各项工作，“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继续完成党的“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让毛主席放心，让林副主席放心，让党中央放心。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日发出

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五日翻印

共翻印三，二〇〇份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的翻印件打印）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转发周兴同志的发言

1971. 05. 12; 中发[1971]37 号

中央：

在昆明军区和云南省“批陈整风”干部会议开始的时候（三月四日），我作了一个发言。现整理送上，请审阅。有错误的地方，请批评指示。

周兴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日

在昆明军区和云南省“批陈整风”干部会议上的发言

（周兴，一九七一年三月四日）

我们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重要指示。毛主席强调指出：“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打好批陈这一仗。这几天，在学习文件中，有的同志提出来：不了解这场斗争的历史背景和斗争的过程，要求我介绍一些情况和谈一点学习文件的体会。由于我学习得不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低，有些自己还没有学懂，要我来讲，肯定讲不好，

甚至会讲错。现在，只是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和粗浅的认识给同志们谈一谈，供学习时参考。

我想讲四个问题：

（一）关于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一些情况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和主持召开的，是在党的“九大”路线不断取得胜利，国际上反对美帝及其一切走狗的斗争进入新高潮，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高潮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次会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其伟大、极其深远的意义。

这次会议于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开始，九月六日结束，共开了十五天。

会议开始以前，八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作了重要指示，规定了这次会议的方针，强调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八月二十三日，会议正式开幕。毛主席主持会议。总理宣布了二中全会的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战备问题。

在开幕会上，林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林副主席说，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都是毛主席亲自提出的，亲自领导的。林副主席着重讲了新宪法草案的特点，对新宪法草案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新宪法草案肯定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作用；突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突出了群众路线，可能成为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更大胜利的新的战斗纲领。

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康生同志也讲了话。他讲了毛主席对修改宪法的历次指示和修改宪法的过程，对林副主席的讲话作了补充，对全国人民提出的修改宪法意见采纳情况作了说明。

二十四日，开始分组讨论宪法问题。会议开得很顺利，气氛很好。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按捺不住他的反党野心，迫不及待地跳出来，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在二十四日华北组的小组会议上，陈伯达作了一个发言。他大肆造谣，胡说什么：新宪法是他经过长期斗争的结果；说什么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反对称毛主席是天才；说什么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案，等等。同时，采取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手法，断章取义，故意歪曲，抛出了一个题目叫做“恩

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煽风点火，欺骗大家，制造混乱。

接着，陈伯达又通过原河北省革委会主任李雪峰和原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在华北组蒙蔽几个工农同志发言攻击中央某些负责同志，质问宪法起草委员会。然后，又抛出华北组综合简报，诬蔑中央某些负责同志是什么“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要“千刀万剐”等等，到处扩散，严重地破坏了全会的航向。陈伯达的发言和材料，欺骗了不少的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低，世界观改造得不好，对陈伯达的阴谋没有识别出来，尤其是对那个称天才的材料，不以为错，反以为对，一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很气愤，结果受了骗，上了当。陈伯达这样一搞，使全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干扰。有几天闹得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那个时候，陈伯达的反动气焰是很嚣张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到庐山这一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首先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明察秋毫，识破了陈伯达的阴谋。全会立即停止开会，收回简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并责令陈伯达检讨。陈在检讨中狡猾抵赖。并继续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欺骗一些同志，企图掩盖他的反党罪行。

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陈伯达对党的猖狂进攻，拨正了全会的航向。就象四年前毛主席写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那样，又一次在紧要关头，带领我们绕过了暗礁，开辟了胜利航程。这篇光辉著作，一针见血地击中了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的要害，从理论上彻底揭穿了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揭穿了陈伯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反动本质，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献，对于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发出以后，真象大白。到会同志对陈伯达的反党活动气愤万分，纷纷起来揭发、批判和控诉他的罪行。当时初步揭发的材料，概括起来是：三大罪状、五大谎言。

三大罪状：一是陈伯达要夺权，夺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权，夺党的权。他表面上是反对中央某些负责同志，实际上是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归根结底是要夺权。二是他打着马列主义的招牌，欺骗新的中央委员，企图分裂中央，这是很大的罪恶。三是他同“二月逆流”的个别人合起来，恶毒地反对毛主席。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各方面进一步揭发出陈伯达的大量反革命罪行。这个问题，后面还要专门讲。

五大谎言，需要一个一个地驳。在没有讲这五大谎言以前，先说一下关于国家主席问题。因为这个问题闹得最凶。陈伯达的种种谎言和诡辩，都几乎是围绕着这个问题的。

大家知道，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九年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并且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声明。这次修改宪法过程中，毛主席又六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也不当国家主席。主席这些指示，陈伯达明知道，但他又别有用心地提出这个问题，在华北组恶毒地说：“反革命分子听说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手舞足蹈。”别人听不懂他的话，他还站起来手舞足蹈地表演了一番。陈伯达这句话是极端反动的。他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一个大阴谋，说穿了，是他自己想当国家主席。毛主席很气愤地说：你把庐山炸平，我也不当主席。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考虑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这样站得更高，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更为有利。很显然，陈伯达是借题发挥，别有用心。

现在讲一讲陈伯达的五大谎言：

第一、陈伯达说：在宪法问题上，他进行了长期斗争，现在的宪法修改草案是他斗争的结果。这真是无耻，不害羞。修改宪法从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开始，经过半年的时间。要他参加，他先是装病，后来又去华北乱跑，只在八月份参加了两次会议，也没有争论。他在华北组宪法修改稿中提出：“在奋斗目标上写上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的宪法，是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国家宪法，不是党章，因此不能写上共产主义。要在社会主义宪法上写上实现共产主义，完全是形“左”实右的。他的那个共产主义是假共产主义。他还提出过不写所有制的那个“尾巴”。主席不同意。主席说，不要那个尾巴，又要杀猪、砍树。特别恶毒的是，在陈伯达修改的稿子中，不提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明明是他反对毛

泽东思想，而他却反咬一口，说现在的宪法修改草案是他斗争的结果，这完全是撒谎！

第二、陈伯达说：有人反对提毛主席是天才。这一手很迷惑人。这是陈伯达故意陷害人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有三个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修改党章时写上了，主席看后勾掉了。当时，同志们不通。康老、春桥、文元同志报告了主席，总理又主持把这三个副词填上，而且还作了文字说明，主席看后又勾掉了。后来，康老向主席报告说，十一中全会通过了的，不写不好吧？主席说，代表大会，可以修改以前的任何文件。这些情况，陈伯达是知道的。党章没有写，“九大”报告也没有写。可是，他却捏造事实，说有人反对写毛主席是天才，借以陷害别人，抬高自己，其居心多么险毒！

第三、陈伯达说：有人要翻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案。这也是造谣。他借口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写了“天才”，说宪法上不写就是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案。那么，“九大”没有写，你陈伯达是否要翻“九大”的案呢？！中央负责同志说，到底是“九大”重要，还是十一中全会重要？从党的组织原则来讲。代表大会高于全会。陈伯达制造这种谎言，是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第四、陈伯达说，有人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是绝对办不到的。”这也是谎言。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也是文学家。毛主席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不怕孤立到最后一个人。毛主席常讲，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讲毛主席高度的原则性，而把毛主席说成是谦谦“君子”，本身就是贬低毛主席。陈伯达造这种谣也是别有用心的。

第五、陈伯达说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翻历史的案。这更是谎言。他企图用这顶帽子陷害中央某些负责同志，分裂中央，以达到他夺权的阴谋。

从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凶恶的敌人，是埋藏在我们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这次会议把他揪出来，消除了隐患，教育了全党，团结了同志，避免了分裂，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二）关于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

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一文，我也还在学习。现在，谈一点体会，和大家共同学习。错误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中央一九七〇年六十二号文件指出：“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献，对于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在这个文件中，毛主席揭露了陈伯达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驳斥了他的谎言和诡辩，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号召全党同志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同陈伯达划清界限，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我们这次会议，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文件。这个文件，是我们“批陈整风”的一个纲，是批判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最锐利的武器。

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针对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抛出的那个材料——《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写的。陈伯达在那个材料中，歪曲地引用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的语录，采取断章取义，截头去尾的恶劣手法，欺骗同志，煽风点火，为他的罪恶目的服务。

毛主席指出，陈伯达的这个材料，“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大家知道，马克思关于认识论的论著非常丰富，“号称懂得马克思”的陈伯达应当是知道的，但是，他竟然没有引一句马克思的话，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毛主席说：“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恩格斯的这句话，是他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一书写的第三版序言中讲的。恩格斯写这个序言的时候，马克思的这部书已出版三十三年了，马克思也已去世。恩格斯在序言中说：“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马克思为什么能写出这样一部著作呢？恩格斯在序言中作了明确的说明。他说，一、马克思对法国的历史有深刻的研究；二、马克思对法国每一次阶级斗争，对当时历史的一切细节都作了研究；三、在研究当时历史时，搜集了大量的材料。这就说明，如果没有对历史的研究，没有对阶级斗争经验的研究，没有搜集大量的材料，马克思的这一部天才的著作是不可能写出来的。所以，天才不是先天的。陈伯达断章取义，只引了这么一句，是为了骗人，有意制造混乱。

这部书是马克思早年的著作，是马克思才三十四岁时写的。毛主席说，这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

毛主席说：“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指的是陈伯达的材料中引的列宁的五句话：

第一句话，是列宁为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写的序言中讲的。库格曼是德国的一个外科兼妇科医生，开始是马克思的朋友，后来反对马克思的学说，和马克思的关系破裂了。列宁的这句话是：“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象是在亲自听取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这里说的，主要是指马克思对蒲鲁东派的评论。当然还有对其他机会主义者的评论。这些评论，是马克思同蒲鲁东等机会主义派别进行斗争中产生的，不是主观的、凭空想出来的。蒲鲁东派就象陈伯达这种人，在革命高潮的时候，投机到革命中来。但是，他们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不在无产阶级组织中做艰苦的革命工作，马克思叫这些人是资产阶级“锋芒毕露的”知识分子。陈伯达为了吓唬人，引来引去，正好引来批判了他自己。

陈伯达引用列宁的第二、第三句话，是从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书中找出来的。列宁说：“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是从那里来的呢？是从阶级斗争的实践和科学的研究的实践中来的，而决不是凭天才的想象就能得来的。列宁在这本书中很清楚地指出：“全部官家的和自由派的科学都这样或那样地为雇佣奴隶制辩护，而马克思主义则对这个奴隶制宣布了无情的战争。”列宁还说过，马克思的学说，“在其生命的途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毛主席也说：“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可见，马克思的学说，是从阶级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也是在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的基础上，在大量的科学的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陈伯达不按列宁的原意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是别有用心的。

陈伯达引用列宁的第四句话，是从列宁《预言》一文中找出来的。列宁这篇文章谈到恩格斯一八八七年对未来世界大战的预见。恩格斯预见到，未来的世界大战必然带来人民生活的极端贫困，阶级矛盾的激化，无产阶级的革命和胜利是不可

避免的。列宁在谈到恩格斯的这个预见后说：“这真是多么天才的预见！”恩格斯为什么能作出这样的预见呢？列宁在文章中清楚地回答说：“是因为恩格斯作了极其确切的阶级分析”。可见，恩格斯的预见，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而是从阶级斗争的实践和阶级分析中得出的科学结论。在这里，陈伯达同样完全歪曲了列宁的原意。

陈伯达引用列宁的第五句话，是列宁在《怎么办？》中说的。《怎么办？》是一九〇二年列宁为反对当时俄国的经济派而写的一部著作。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赞美当时存在的组织涣散、小组习气和手工业方式，认为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是搞经济斗争，不是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根本不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集中的革命组织。列宁深刻地说明，为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并且指出，这样的党，要由两部分来组成，一部分是人数不多的，经常进行工作的基干领导工作人员，主要是职业革命者，一部分是为数甚多的党员群众。不能没有领袖，不能把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列宁说：“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陈伯达孤立地引了列宁这一句话，完全是为他分裂党、篡夺党的领导权服务。我们的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早已产生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毛主席还英明地规定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陈伯达一贯疯狂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党中央，还无耻地把自己说成是够条件的“领袖”，这充分暴露了陈伯达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中，对陈伯达的这一罪恶阴谋作了极其深刻的、一针见血的揭露和批判。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毛主席说：“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这是讽刺陈伯达的，同时又是对陈伯达的反党本质的最深刻地批判。陈伯达用两块石头打人，一块是野心家，一块是阴谋家，他想搬起这两块大石头打别人的脚，结果没有打着别人，而打了他自己的脚，把他自己这个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彻底暴露了。

毛主席引了一句古诗：“杞国无事忧天倾”。这是李白在一首题目叫《梁甫吟》的诗中的一个诗句，讲的是一个“杞人忧天”的故事。杞，就是春秋时的杞国，现在的河南杞县。故事是说，杞国有个人，怕天掉下来，怕地塌下去，愁的不吃饭。后来有人给他解释，他就高兴了。毛主席引这句诗，是说陈伯达要夺主席的权，夺林副主席的权，夺党的权，完全是痴心妄想，是根本办不到的。我们无产阶级的天下是乱不了的，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是照样转动的。毛主席引这个故事，是对陈伯达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鄙视，是对我们极大的鼓舞。

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中说：“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在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最后关于我的话”，指的是陈伯达的反党材料中最后引用毛主席《实践论》中的那一段话。陈伯达在引用时，别有用心地把毛主席“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这句很重要的话删去了。由此可以看出，陈伯达打着马列主义的招牌反对马列主义，引用主席的话反对毛主席，是打着“红旗”反红旗。陈伯达歪曲引用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的话，完全是为了欺骗人，制造混乱，以达到他篡党、夺权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揭露和批判陈伯达的“材料”之后，从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高度，极其深刻地揭露了陈伯达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实质，指明了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反党分子陈伯达的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毛主席说：“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谎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

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下面，我再谈谈对这一段话的几点粗浅理解。

“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在历史上长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主席对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做了最精辟最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述，毛主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林副主席高度评价了毛主席这个光辉思想，说：“这句话是很经典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最概括的最精华的语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在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同时，也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在革命胜利发展中具有伟大的决定作用。因为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是群众利益和意志的集中体现者，是群众的灵魂和代表，能集中群众的意志，率领群众去创造历史，促进历史的发展；而无产阶级的领袖，都是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历史上的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起着阻挠、推迟历史发展的反动作用。因此，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错误的。但是历史唯心主义认为历史是个别杰出人物的愿望和意志的结果，群众是消极被动的因素，只能盲目地跟着“英雄”，这显然是反动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群众落后论”就是这样。他们吹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而反对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所贩卖的正是这类历史唯心主义的货色。

“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人的认识、知识是从那里来的？从来就有先天论和后天论之争。在哲学史上，所谓先天，就是先于经验，先于事实，认为先天的论断是以空洞的想象为基础，而不是依据经验和实践产生的。所谓后天，和先天相反，意思是后于经验，来自经验，来自事实。辩证唯物主义根本否认任何不以感性经验和实践为基础的认识。中国自古以来，也有这个争论。孟子说，“道性善”。《三字经》上说：“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主张先天的。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等等，也认为是人的思想是先天的是生下来就有的。荀子是主张后天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光辉哲学著作中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

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毛主席在这里深刻地精辟地指明了哲学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指出人的知识不是先天的，不是头脑里固有的，而是后天的，来源于实践的。毛主席教导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离开社会实践，“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反党分子陈伯达鼓吹“天才”，根本不提主要是社会实践，甚至把社会实践一刀砍去，显然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是十分反动的。

“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这是讲的认识论问题。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从来就有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一种是唯物主义，一种是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是可以认识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先有物质，后有精神。物质决定精神，精神是物质的反映。唯心主义则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精神的，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先有精神，后有物质，精神决定物质，物质是精神的表现。

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也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开始是古代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后来是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唯物主义；到马克思、恩格斯才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它不仅是唯物的，而且是辩证的，不仅承认物质是精神的起源，而且承认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就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有很大发展。伟大领袖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认识论。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反映论，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是先验论。反映论认为，人的思想是在我们之外的、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客观世界的反映。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这就是讲的反映论。认识只能来源于社会实践，任何人也不能例外。毛主席说：“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

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与此相反，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是先验论。“先验”这个词，是康德哲学中使用的名词。意思是说，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是先于经验的，是“先验”的，自然界的规律等等，不是自然界本身的东西，而是人的认识加于自然界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论，都是先验论的，都是认为精神决定物质。陈伯达所宣扬的，就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似乎只要有了天才什么都可以想出来，根本不需要经过社会实践。这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论背道而驰的，是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中，明确地指出了英雄创造历史与奴隶们创造历史，先天与后天，先验论与反映论的根本对立，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毛主席号召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明确的认识，高度的自觉，一定要同陈伯达划清界限，肃清其影响。当前，在我们一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领导高明论”、“一贯正确论”、“骄傲有资本论”等错误思想都是违背主席教导的，如不克服，就会自觉不自觉地上假马克思主义的当，就不能和陈伯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划清界限，迟早要摔大跤。

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中说：“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这也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毛主席在《实践论》这一光辉著作中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又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都认为事情并不是已经研究完结，还要继续研究。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更应坚决响应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号召，更加千百倍努力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更加刻苦地、扎实地深入实践，研究客观事物。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清醒，不自觉，甚至骄傲自满，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认为自己已经不需要再学习，不需要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那就完全违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谆谆教导。

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中号召我们：“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一教导，真是语重心长，意义深远。毛主席在党的“九大”就提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要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团结、“胜利的路线，就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就必须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执行什么路线。我们只有真正有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才能真正地执行团结、胜利的路线，才能不上假马克思主义的当，才不会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犯错误、摔大跤。

（三）关于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各地、各军揭发了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大量的材料，中央对他进行了专案审查。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两次极为重要的批示（即中央一九七〇年七十六、七十七号文件），从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起召开了华北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批判了李雪峰、郑维山同志的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这次会议对于我们教育很大，对于全党、全军的革命化建设将起重大作用。我们完全拥护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多次重要批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批示，完全拥护经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周总理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也完全拥护中央对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主要干部任免的决定。

半年多来，各方面揭发的和专案小组调查出来的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真是惊心动魄！同志们从周总理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和中央八号文件——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就可以看清楚了。他的主要罪行，中央概括了四个方面，具体事实很多。我觉得这些铁的罪证恰好揭穿了陈伯达这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分子的真面目。

陈伯达不是经常吹嘘他是“老革命”吗？！其实，是个“老反革命”。他出身于“四代书香”的封建官僚家庭。本人早就是国民党反共分子，发表过反共文章，当过国民党汕头市党部秘书和国民党军阀张贞部队的少校秘书，当过何应钦办的福州军官学校政治教官。混入党内后，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出卖了组织，当了可耻的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干尽了反革命勾当。所以，陈伯达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货真价实的老牌反革命。

陈伯达不是经常吹嘘他经过几十年的革命考验吗？其实，几十年来，他紧紧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早在一九三四年，他在天津编《实话报》期间，就是铁夫路线的应声虫。一九三六年，陈伯达又追随王明，鼓吹“国防文学”和“国防哲学”，主张阶级合作，贩卖王明的投降主义黑货，反对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实质上是反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民族民主革命和武装斗争。在社会主义时期，他和刘少奇一道，在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实现后，提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同毛主席提出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伟大理论相对抗，实质是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企图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当中，陈伯达开始以形“左”实右的面目出现，否定价值法则，否定货币作用，主张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全民所有制，为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制造反马列主义的“理论”根据。后来又摇身一变，同刘少奇、彭德怀一起，从极右方面反对三面红旗，主张单干和开放自由市场，并在庐山参与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在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大刮复辟资本主义妖风的时候，积极帮助刘少奇整理和修改黑修养，在《红旗》上重新发表的是陈伯达。在一九六四年刘少奇破坏“四清”运动的时候，竭力吹捧“桃园经验”，并主张发到全国的，也是陈伯达。在第二次庐山会议的时候，私自下山，到唐山去贩卖“工业七十条”，同毛主席的“鞍钢宪法”唱对台戏的，也是陈伯达。这次是第三次庐山会议，公开跳出来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还是陈伯达。几十年来的事实证明，陈伯达所谓经过革命考验，完全是骗人的。正如毛主席说的：“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就是对陈伯达三十多年来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论。

陈伯达不是经常吹嘘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大有功”吗？！其实，剥开画皮来看，他恰恰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他表面上是中央文革组长，实则反对中央文革，背着中央文革搞坏事。他是肖华、杨、余、傅、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就是他搞的，其目的是反党乱军，阴谋篡权。这个问题，在我们云南也深受其害。当然，这不能怪群众，群众没有什么责任，要把这个账记在陈伯达、王力和云南的赵健民、张力雄、朱

家璧等一小撮阶级敌人身上。陈伯达还大搞资产阶级派性，支一军，压一军，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是武斗的支持者和指挥者。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以来，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背着中央搞阴谋活动。例如，林副主席主持编了《毛主席语录》，陈伯达悄悄地又编了一本，同林副主席唱对台戏。起草“九大”报告时，他搞了一个宣扬唯生产力论的稿子。中央没有采纳陈伯达这个稿子，他就心怀不满，疯狂地攻击和诬蔑毛主席和中央肯定的林副主席的“九大”报告草稿是伯恩斯坦主义的文件。林副主席委托康老主编《毛选五卷》送审本，陈伯达在背后又组织了一个黑班子，私自整理毛主席的著作，把重要的地方砍了十多万字，与毛选编委会相对抗。中央指定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新宪法，陈伯达又背着中央搞了一个秘密班子，另搞一套。甚至连中央指定《人民日报》写一篇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他也私下另写一篇，同中央抗衡。特别令人气愤的是，他到处搜集中央负责同志的所谓材料，企图进行政治陷害，分裂中央，达到他篡党夺权的目的。种种事实证明：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是什么“大大有功”，而是罪大恶极。我们要把他这张画皮揭下来。

陈伯达不是还经常吹嘘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吗？！其实，是个“大大野心家”。他在组织上投靠王明、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他早就是刘少奇的黑班底。他同彭德怀、高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陶铸、胡乔木。周扬、杨献珍等反党分子都很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包庇大批坏人，对王、关、戚等加以重用，网罗党羽。进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可是，陈伯达却在华北各地乱跑乱说，到处联络人，进行反党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而李雪峰、郑维山既同陈伯达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又有个人野心，想找个向上爬的后台，所以，就同陈伯达勾结在一起，把他捧为太上皇。同志们从李雪峰、郑维山两人的检讨中可以看出：陈伯达和他们是如何互相利用，勾结起来干坏事的。陈伯达招降纳叛的目的，还是为了一个“权”字。连他的老婆都说他“官口很大，想当一、二号人物。”可见，“小小老百姓”是假的，“大大野心家”是真的。

关于陈伯达的罪恶事实还有很多很多，同志们可以看材料，我们还要进一步揭发。总之，陈伯达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他完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式的人物。如果不把他揪出来，后患无穷。所以，我们同陈伯达的斗争，是一

场极为严重的两条路线斗争，是文化大革命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共产党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这场斗争，是关系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大事，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关系到我们党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大事，任何低估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重要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充分认识这次“批陈”的重大意义。我们相信，通过这场斗争，一定会把反党分子陈伯达批倒批臭，一定会大大加强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一定会大大提高我们的路线斗争觉悟，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促进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四）关于学习问题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对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的学习问题，作了多次极为重要的指示。从这些指示中可以看出，学习问题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批陈整风”运动能否搞好的决定关键，是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根本问题。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指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区别真假马、列主义。毛主席还说：一个共产党人，特别是一个担负着高级职务的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克思主义怎么行呢？主席提出：要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提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还说：过去开过一个书单子，叫学马、列的书，是我叫搞的。不过，三十本多了。不要光读我的，马、列的书也要读一点。（主席的这些话，都是大意，不是原话，大家不要引用。）根据主席的指示，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号召全党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在九届二中全会结束那天，康生同志在会上专门讲了学习问题。他提出要认真读书，加深对主席思想的理解，防止上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当。康生同志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各省、市的负责同志要把它看成是一件十分重要十分重要的事情。他还指出，现在的情况是，底下的工人、农民、解放

军连队的同志学得很好，我们的高级干部也注意学习了，但是比起下面干部的学习，就落在后面了。康生同志还指出，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刘少奇、杨献珍他们借口学习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说毛主席的著作是文件，是时事政策，不是经典著作。这种反动言论，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已经揭露批判了，今后还要进一步彻底批判；另一种倾向是，只读毛主席的著作，不读或者不赞成读马列主义的书籍，甚至认为学习马列主义的著作，就是不赞成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或者有人提倡学习马列主义的著作，就认为是反对毛主席的。这是一种很错误的东西。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多年以来，有的人不赞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康生同志解释说：我们现在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毛主席如何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好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更好地了解毛主席怎样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怎么知道毛主席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呢？继承了什么呢？怎么知道毛主席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呢？更不要说知道主席怎样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了。这种倾向同前一种倾向是对立着的，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想法，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割裂开，这是错误的。康生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他说，我们有些高级领导干部，从政治上看没有多大问题，或者表面上还执行中央的决议，但在世界观问题上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甚至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那就没有改造好。有些老干部在紧急关头，对毛主席的路线发生动摇，甚至于反对，归根结底是世界观没有改造，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所以，主席提倡学习，很重要。这是康老讲话的大意。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去年十一月六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在这个通知中再次传达了毛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指示。并且强调指出：“要进一步提高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的自觉性。”“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担负着比过去更加重大的责任，如何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理论水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问题。只有读一些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才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加深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认识，自觉地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

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并规定党的高级干部要学习马、恩、列的六本书和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

去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央六十二号文件，就是《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中，又强调指出：要认真学习和讨论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这个重要文献，还要结合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和党中央一九七〇年五十九号文件中所规定的著作，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姚文元同志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报告了他的学习情况和体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姚文元同志的这个报告作了极为重要的批示。批示中说：

“你的学习进程较好较快，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一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林副主席也作了重要批示，说“完全同意主席对文元同志报告的批示。全体中央委员和高中级干部认真照主席的指示学习，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极为重要”。中央把主席、林副主席的重要批示和姚文元同志的报告，作为今年的二号文件，发到各省、各军。

姚文元同志在报告中，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说：“最近除学习中央指定的经典著作外，还很粗浅地读了一点历史和自然科学，想逐步改进自己知识贫乏的状况”。可见姚文元同志确实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刻苦地进行学习，除学习经典著作以外，还学历史，学自然科学，还看了一些反面的东西。如他在报告中说：“也看了一些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东西。逐步形成这样一个概念：从刘少奇的黑《修养》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一直到他在‘八大’的报告和决议，有一条同主席无产阶级世界观相对抗的黑线贯穿，即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这可能是刘少奇反动世界观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的许多文章、‘报告’中，都有抽象的即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提法和论点。这是同国民党反动观点一致的。”姚文元同志在这里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这个人性论，就是不讲阶级分析，不讲阶级斗争，否定人的阶级性，这是地主、资产阶级用来欺骗麻痹人民的谬论，也是一切新老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正如姚文元同志说：“从这里，可以直接引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及极‘左’、形‘左’实右的路线，可以直接引出复辟资本主义、为地富反坏右等剥削阶级服

务的修正主义理论，同毛主席历来倡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根本观点相对抗；在认识论上，则必然同时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反对进行社会的调查研究和革命实践，同毛泽东思想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这个根本观点相对抗。”还说：“从国际上看，苏修叛徒们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也是建立在所谓‘人道主义’‘人性论’之上的”。我们在“批陈”的过程中，也要狠批陈伯达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要通过对人性论的批判，更好地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

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中央两报一刊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学习问题的社论、评论和文章。今年第二期《红旗》杂志关于“认真读书，努力改造世界观”的短评，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这篇文章特别强调指出：高中级干部认真读书，努力改造世界观，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是我们党思想建设的最根本的问题；坚持认真读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问题，也就是能不能按照“九大”通过的党章来建设我们党的重大问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理论、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自觉地改造世界观的运动，就是毛主席历来所倡导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深刻地阐述了认真读书，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

以上所引的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关于高中级干部的学习问题的一系列指示充分说明：高中级干部的学习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关系到用什么样的思想来建设我们的党的问题；是关系到能不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保证党不变质、国不变色、人不变修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能否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问题。从当前来讲，这也是能否搞好“批陈整风”的关键。我们必须很好领会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这一系列的指示，认真提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现在，有些高中级干部，包括我自己在内，学习的自觉性还不高。总是满足于朴素的阶级感情；满足于局部的工作经验；满足于辛辛苦苦、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以干代学，不认真读书，即便读了一点，也是一知半解，有时甚至不懂装懂。所以，在关键时刻就分辨不清真假马列主义，就受骗上当，被假马克思主义所俘虏。这样下去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一定要通过这次“批陈整

风”运动，把我们的学习认真地、扎扎实实地搞起来，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把学习和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认真改造世界观，大大提高我们的路线斗争觉悟，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使我们的思想和工作都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这样才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今天我要讲的问题，已经讲完了。我再重复地声明一下，这里说的许多情况，没有正式文件，完全是凭记忆，可能有不够准确的地方；对有些问题的解释，是我个人的理解，也可能有错误的地方，欢迎大家提出批评。

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二日发出

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五日翻印

共翻印三，二〇〇份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的翻印件打印)

二、研究资料

《周恩来年谱》摘录

(1971 年 3 月 23 日至 1971 年 5 月 1 日)

《汪东兴回忆录》摘录

2 月 19 日，毛主席在关于开始批陈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说：“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会议前期，批陈不痛不痒。”

2 月 20 日，军委办事组根据毛主席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的问题，写了一个检讨报告。毛主席在这个检讨报告上又批示说：“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毛主席在这个检讨报告上还批示：“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毛主席对黄永胜等人不做自我检查，不认真批陈是抓住不放的。

与此同时，毛主席又强调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认真学好马列著作。

3月 15 日，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文批示：“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只在十八页上去掉一个词，以便突出马列。十七页上已有了这个词，也就够了。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等迟迟不肯承认错误。不肯作自我批评，直到 1971 年 3 月才交出书面检讨。尽管如此，毛主席对他们承认错误作出检讨的行动，仍采取了欢迎的态度。

毛主席看了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的检讨后，于 3 月 24 日在黄永胜 3 月 21 日的书面检讨上作了如下批示：“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只在黄的第二页上有一个注语，请各同志注意。”

黄永胜书面检讨的第二页上有段话“过去我对反党分子陈伯达这个人有迷信，被他所谓‘天才理论家’、文化大革命‘有功’、‘小小老百姓’等假象所迷惑。”

毛主席对这段话批注：“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3 月 30 日，毛主席又对刘子厚在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检查作了批示，指出：“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 3 月 19 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毛主席还在刘的检查的最后一页批示：“这还只是申明。下文如何，要看行动。”

4 月 15 日至 29 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

参加会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 99 人。29 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在汇报会上作了总结。

4 月 18 日，我在这个汇报会的华北组小组会议上又作了第三次检查。

我把当时检讨的内容抄录如下：

我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全会期间和全会以后，经过主席多次谈话，对我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和亲切的教育，每次谈话对我的启发都很大，教育都很深。回京以后，又带着自己的问题，进一步学习了主席的光辉文献《我的一点意见》，学习了马、列和主席的几本著作。遵照主席“在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我同中央办公厅和警卫局、警卫团的同志们一起揭发批判了反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罪行。同时，也在会上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由于主席的教育，政治局同志的帮助，使我进一步认清了陈伯达的反革命本质，进一步认识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主持下，会议开得很顺利，气氛很好。但是，会议刚开了一天，陈伯达在他的反革命野心的驱使下，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以伪装的面目出现，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着红旗反红旗，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妄图实现他反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主席很快识破了陈伯达的反革命面目，适时地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这篇光辉文献，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

在这次全会上，把陈伯达这个大坏蛋揪了出来，教育了全党。切结了同志，避免了分裂，消除了隐患。这是伟大导师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针见血地击中了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陈伯达的要害，从理论上彻底揭穿了陈伯达的谎言和诡辩，揭穿了陈伯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反动本质，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对于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我坚决拥护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和主席一系列的重要批示，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一切决定，坚决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在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没有发表以前，我没有识破他是一个大坏蛋，上了他的当。受了他的骗。当了他的炮手，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深感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受误会的同志。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信任和教育，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内心极感沉痛。我的错误是：

(一)在华北组听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煽动性发言，我没有考虑分析，没有调查核实材料，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心情非常激动地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把不应该上纲上线的问题上了纲、上了线，使会议气氛紧张，不利团结，影响会议顺利地进行，当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炮手。

(二)我听到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煽动说，有人不要毛泽东思想，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手舞足蹈，我没有识破他的阴谋，凭着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一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就火冒三丈，被他煽动起来了，错误地提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章。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是主席的意见，我是知道的。早在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主席要我从外地回京向政治局的同志转达了主席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家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可是当我听到反革命分子陈柏达的煽动性的发言。就把主席的指示忘得一千二净。在这关键时刻，我没有冷静思考。没有坚持原则。没有考虑到主席日日夜夜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操劳。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听毛主席的话，违反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是十分错误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三)反革命分子陈伯达利用“第六号简报”来煽动、欺骗参加全会的同志，妄图分裂党，破坏“九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路线。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简报内容中陈伯达的很少。我的很多，事先又不给我看，这是一个阴谋，我上了当。被他利用了。

(四)反革命分子陈伯达利用听录音报告的机会，把关于论“天才”的语录交给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这个语录打印后，放在我那里，没有使用，在陈伯达阴谋诡计被识破后这个语录已封存。现在看来，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

我犯错误的主要原因：

(1)对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恶意造谣，没有调查核实。没有分析判断。对在哲学上的欺骗和诡辩，自己不懂，也没有向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请教，主席教导：“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方法来”而我违反了主席的这个教导，结果情况不明，决心很大，方法不对。犯了严重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上陷入极大的盲目性。主观主义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一种表

观。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毛主席指示：“这和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过去对主观主义的危害性认识很不够，今后必须下决心“打倒主观主义”。

(2)过去没有“认真看书学习”，对马、列和毛主席的书读得很少，而且有些没有读懂。因此，思想和理论水平很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警惕坏人破坏中央的团结不够，特别是遇到像陈伯达这样手段很阴险、很毒辣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他，反而受了他的蒙蔽，被他利用了。

(3)存在着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今后，我要很好地接受教训，带着问题认真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克服骄傲自满，争取较快地改正错误。真正做到在大风大浪中不迷失方向。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坚决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在毛泽东思想和“九大”路线的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汪东兴

1971 年 4 月 18 日

我的第二次检讨书送给毛主席看后，毛主席对我说：“你的几份检讨有阶段性，火候掌握得好，庐山会议后，大家到现在还跟不上气候，看来你跟上了。”

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领导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同时，还采取了许多措施。一是接连批发了许多文件和指示，毛主席把这个办法叫作“甩石头”；二是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当时被林彪、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控制的中央中委办事组，毛主席把这个办法叫作“掺沙子”；还有就是在前面提到的在华北会议结束前改组北京军区，毛主席说这个办法是“挖墙脚”。

《吴法宪回忆录》摘录

2009 年 9 月 7 日初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四册（1）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四章 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活动

第一节 制定反革命计划

一、文献资料

“571 工程”纪要

（一九七一、三月二十二——二十四）

[*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用铅笔编了页码。原本页码编到第二十四页，但缺第八页。从原本记载的情况看，第七页已记完一个问题，第九页是另起一个问题，文意是连贯的。文中划【】者，是原本中删去的句、段。明显的错别字，改在（ ）内。]

（一）可能性

（二）必要性

（三）基本条件

（四）时机

（五）力量

（六）口号和纲领

（七）实施要点

（八）政策和策略

（九）保密和纪律

可能性

9•2 后 [据李伟信交代，是指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

军队受压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

众叛亲离

(1) 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

(2) 夺权正在进行。

(3) 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4)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5) 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6) 他们“故计〔伎〕重演”。

(7) 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8) 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9) 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

在中国未来这场政治革命中，我们“舰队”〔舰队〕、“联合舰队”是林彪一伙组织的

反革命别动队的代号〕采取什么态度？

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军舰队头上。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

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

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

割据局面

必要性、必然性

B——52 [据参与反革命政变的案犯交代，是林彪一伙反革命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代称。] 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

对我们不放心。

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

在政治上后发制人，

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

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

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

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基本条件

有利条件：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

危机四伏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

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威〕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

从自然条件上讲

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退。

困难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群众对 B——52 的个人迷信很深

由于 B——52 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B—52 身（深）居简出，行动神秘鬼〔诡〕窄〔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时 机

故我双方骑虎难下

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

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B—52 在我手中，敌主力舰〔指我党中央负责同志〕均在我手心之中。

属于自投罗网式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先斩〔局部〕爪牙，〔先和 B—52〕既成事实，〔逼〕迫 B—52 就范，

逼宫形式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 [一种武器的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王、陈、江〔指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下同。〕掌握的四、五军〔骨干力量〕

九师，十八师

二十一坦克团

民航

三十四师

借用力量：

国内：

二十军

三十八军

[黄] 军委办事组

国防科委

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福州、新江、西安

【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 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借苏力量（指）制国内外【其它】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林彪一伙要把我国置于苏修核武器的“保护伞”之下，也就是要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
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的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 B52 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 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实施要点

三个阶段

第一、准备阶段

(1) 计划

(2) 力量

指挥班子

江、王、陈

两套警卫处

公开的李松亭 [王维国安插的上海市警卫处处长]

秘密的

上海小组 [林彪一伙通过王维国建立的反革命特务组织] 负责

新华一村

教导队 [林彪一伙通过王维国组织的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 其中绝大多数是

受欺骗和蒙蔽的战士。新华一邮是教导队的驻地。]

四、五军部队训练 (地面训练)

南空直属师工作

(十师)

周建平负责

争取二十军

(江、王、陈)

——【扩大舰队】

——【加速根据地建设】

【京 沪 杭 蜀 穗】

(3) 物质准备

武器

领

自造

通讯器材 【(包括 01 工程) [指林立果为搞反革命政变专门设计制造的一种收发报机车辆]

掌握他们仓库地点、主要军械库

(4) 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

搜集

分析

上报

第二阶段

实施阶段

【奇袭式】

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

一个先斩后联。

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这是林彪一伙对张春桥同志的造谣污蔑和陷害] 。

总的两条：

一是奇袭。

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第三阶段

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

(1) 军事上 [首先] 固守 [阵地]

尽力坚守上海

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

把上海与外界联系卡断。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固守浙江、江西

掌握空降、空运

(2) 政治上【采取】进攻

上面摊牌

掌握舆论工具

开展政治攻势

(3) 组织上扩大

迅速扩军

四方串联

政策和策略

打着 B—52 旗号打击 B—52 力量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解放大多数

集中打击 B—52 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打着 B—52 旗号来打击 B—52 力量】

【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

保护（团结）一大片

【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批，各个击破。

【他们一批】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们这样做，不】****【他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

今天甜言蜜〔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押〕的关压（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 B—52 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出于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

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于〔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

对过去 B—52 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

保 密、纪 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江田岛是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这个学校以日本军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训练学生。所谓“江田岛”精神，就是法西斯武士道精神。〕

【不成功便成仁】蒋介石对他的部属进行法西斯教育的反革命训词。〕

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附件三：

李伟信笔供

（注：李伟信，林彪死党，直接参与研究制定反革命政变纲领《“571 工程”纪要》的成员之一。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同周宇驰、于新野一道乘直升飞机外逃，

叛国投敌。被迫降落时，驾驶员中队长陈修文烈士与叛徒周宇驰夺枪搏斗，被杀害。迫降后，周、于自杀，李伟信被我俘获）

一九七一年二月份，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跟野心家林彪、反革命分子叶群一起到苏州，以后，林立果又到杭州。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和于新野从杭州到上海。当天晚上，林立果在他卧室里对于新野和我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他要立即把周宇驰从北京叫来商量，同时叫于新野暂不回北京，主要处理这件事。林立果接着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是英国飞机名称，反革命分子林立果等人称呼反革命分子叶群的代号）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注意荫蔽、安全”。

反革命分子周宇驰三月二十日到上海。当天晚上，林立果、周宇驰两人密谈，后把于新野叫去。第二天，开始他们三人商量，后来叫我也去了。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说：“目前从各地区实力来看，‘首长’（指野心家林彪）讲话，还是有一定作用，这件事与‘首长’（林彪）谈过，‘首长’（林彪）叫先搞个计划”。

这次主要谈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研究了形势。

主要谈了三方面：

（1）在全国范围内，“首长”（指野心家林彪）的权力势力，目前是占绝对优势，是一边倒的，是最好的时机，但是可能逐渐削弱。（2）张春桥（他们指所谓文人力量）正在发展。因为九大以后，全国局势基本稳定，在和平时期，文人方面的工作和力量，势必要发展。（3）从事物发展规律来说，好到一定程度，就要向相反方向转化，交叉发展规律，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还恶毒的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主席一贯是这样，一会儿用这边力量，一会儿用那边力量，用这样的办法玩弄平衡。目前的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

（二）研究了野心家林彪的接班问题，说有三种情况：

(1) “首长”（指野心家林彪）和平过渡的接班。反革命分子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甚至可能更短。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林彪）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当然和平过渡的办法最好。

(2) “首长”（指野心家林彪）被人抢班（被赶下台）。反革命分子周宇驰认为一下不可能，最起码三年以后。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认为，很难说，主席威信高，他要叫谁倒还不是一句话。反革命分子于新野说：那“首长”（林彪）是主席自己树起来的。反革命分子林立果恶毒的说：刘少奇不也是他立的。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觉得野心家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因此，他积极疯狂的策划反革命政变。接着谈了上海文汇报三月十六日发表的文章，林立果认为，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既然有来头，就应该看成是信号，是舆论准备。

(3) “首长”（指野心家林彪）提前抢班，可有两个办法：1、把张春桥等这一伙搞掉，保持“首长”（指野心家林彪）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认为张春桥同志要代替林彪的可能最大）。2、直接陷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但是他们又考虑主席影响威信这样大，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反革命分子周宇驰还非常险恶地说，当然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如：把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把汪东兴、张春桥叫去，把他们搞掉，就说他们与王、关、戚有关系，谋害主席，或者找几个犯人替死。到那个时候，反正“首长”（林彪）掌权，事后处理，“首长”（林彪）是可以出来说话的。但是这样干，“首长”（林彪）在政治上要付出很大代价。

（三）研究了办法：

争取和平过渡，但是作好武装起义准备。目前先做两件事，（1）写个计划：（2）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

计划：一开始研究代号，想了好久，最后林立果自己定，就叫“571”工程计划，即“武装起义”的谐音。计划目的和内容，林立果说，让上海小组带着教导队先把张、姚干掉，可由王维国请张、姚来，或叫警卫处处长李松亭带领去张春桥家（那时林立果问我张家是否是你们警卫处管，我说不知道。林立果叫我打听一下，

我记得好象问过警卫处处长李松亭，李说张家是我们管，我们派人警卫和送日常用品，我将情况告诉了林立果。我为他们反革命计划进行了反革命活动）。林立果又说，干掉张、姚后，让王维国、陈励耘，必要时抽南京空军一部分力量，控制上海局势，然后串连全国力量，发表支持声明，逼中央表态支持。假如许世友出兵干涉，由王维国他们保卫上海，形成对峙的局面，再和平谈判。最坏的打算，是上山打游击，先往浙江方向。林立果还说，这些问题，这次去杭州与陈励耘商量了一下。我看这个计划，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于新野来写。计划分几个部分我记不清，好象有实施准备、方案，以后打算等。

教导队：以培养基层干部为名，建立教导队。要精干、保密。一百人左右，住在上海新华一村。教导队的干部很重要，要选好。光靠教导队的干部还不行，上海小组要去抓。小组里以袭著显、蒋国璋为主，小组每一至二人还要抓空四军所属的一个部队，每个人在他抓的那个部队，都要挂个职务。另外要给教导队多配些汽车和枪，增加机动能力。可以叫王维国自己造枪。军事上要多学几手，政治上培养对“首长”（林彪）“副部长”（林立果）的感情。

林立果还说，“571 计划和教导队的事，目前只限“舰队”、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知道，有些情况可以告诉上海小组。

以上是林立果三月份在上海的反革命活动。现在另外交待和揭发几个问题。

一、“571 计划写成后，我没有见过，但是于新野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曾夸耀自己说：林立果把计划及一本于新野最近摘录的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例，都还留在北戴河“首长”（林彪）“主任”（叶群）那里。

二、于新野一九七一年七、八月在广州时对我说：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林立果当时比较紧张，对会议估计三种可能：（1）一般谈一下，（2）整到军委办事组，（3）整到“首长”（林彪）。后来估计（1）、（2）可能大。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黄、吴、邱、李、叶都检讨了，而且是主席批准要他们检讨，“主任”（叶群）非常紧张，当时要搞“571”，并和黄永胜也商量了，黄永胜他们也同意。

三、刘沛丰一九七一年八月在北戴河，有次对我说，前几天，天天四、五点钟睡觉，吃不消。我问干什么，刘说：叶群天天找林立果，研究“571”，把舰队一些人员的代号也全部要去了。

李伟信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三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二、研究资料

《汪东兴回忆录》摘录

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遭到挫败的林彪一伙并不改弦易辙，反而在会后很快开始了谋害毛主席、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直到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我才知道：早在 1979 年 10 月，以林立果为首组成了“联合舰队”，叶群还为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人名代号，“联合舰队”是林彪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

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记载：

“一九七一年二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以及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从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 工程’纪要》。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上先发制人’，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注：一种导弹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并阴谋‘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林立果根据《‘571 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集江腾蛟、王维国、七三五〇部队政治委员陈励耘和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秘密开会，指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一九七一年三月，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一九七一年四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在制定《“571 工程”纪要》的过程中,林立果明确地说:“办法是搞掉 B—52(诬蔑毛主席的代称——作者注)实行武装起义”,“我看就叫‘571’,‘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他们认为:“和国外‘571 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571’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所有的这些,毛主席当时都不知道,也根本不可能知道。林彪一伙的阴谋行动的目标就是要“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571 工程”纪要》——作者注)。

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摘录

《五七一一纪要是如何出笼的》

2009 年 9 月 14 日初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四册（2）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四章 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活动

第二节 实施反革命政变

研究资料

《汪东兴回忆录》摘录

在毛主席南巡期间，林彪一伙千方百计想了解毛主席的行踪，探听毛主席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的内容。9月5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听到毛主席在长沙谈话内容的传达后，立即密报给林立果。9月6日，武汉部队政委刘丰不顾毛主席的叮嘱，把毛主席在武汉谈话的内容告诉了陪外宾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李作鹏当天回到北京即告诉了黄永胜。当晚，黄永胜又将毛主席谈话的内容密报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接到顾同舟、刘丰的密报后，感到自己暴露无遗了，决意对在旅途中的毛主席采取谋害行动。

9月7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

9月8日，林彪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这样一来，危险便立刻向毛主席逼近。当时毛主席在杭州停留，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毛主席住在杭州，无异于进入了虎穴。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已经识破了林彪的阴谋。这次南巡，毛主席从北京到杭州的沿途，在同一些当地负责人的谈话中又了解到叶群、林立果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些情况。

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毛主席根据前后所

了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况，感到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测行为，于是他当机立断，及时采取措施，对付林彪一伙的阴谋。他首先把我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我问毛主席，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是转到上海。我还建议。也可以转向绍兴，即转向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观察动静。

毛主席同意转向绍兴，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当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的那个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凭着他多年高度的警觉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思想上、行动上已作了各种防范准备。我从毛主席住地出来，马上就打电话找当时负责毛主席在杭州的警卫工作的陈励耘。陈励耘的秘书接的电话。他接到电话后，马上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说：“陈政委有事，您有什么事情请跟我讲。”

我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吗？”

秘书肯定地回答说：“能”。

我说：“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陈政委。”

紧接着我就找到张耀祠说：“赶快去找专列的同志讲清楚，火车马上开走。”

当时天气太热，我还要求在专列转到新的停车地点后，给毛主席的主车和餐车上搭个棚子，起到防晒作用。张耀祠马上落实了。这些情况，我都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这么办，并说这个办法好。

毛主席的专列于 9 日凌晨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

10 日中午，毛主席叫我去。对我说：“走啊！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

我说：“主席，不通知他们不行。”

毛主席问：“为什么呀？”

我说：“不通知不行，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的时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

毛主席又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

我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

毛主席考虑了我的建议。他问：“那怎么办？”

我说：“您看，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

我刚说到这里，毛主席打断我的话说：“还有一个，就是空五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

我回答说：“马上就通知他。”

南萍等人被请来以后，毛主席在自己休息的房间里又同他们谈了一次话。当毛主席见到白宗善，同他握手时，问：“你为什么不来看我！”陈励耘连忙解释说：“他那天在值班。”

这次谈话，毛主席讲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军队干部的团结问题，战备问题。谈话中，毛主席还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直到走麦城失败。毛主席在谈话中，再一次批评了林彪、黄永胜。他还针对领导人闹不团结的情况，讲了一个故事，寓意深长。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战例。他说，齐国和鲁国打仗，我是帮齐国，还是帮鲁国呢？鲁国小，人少，但团结的好。齐国向鲁国进攻，鲁国利用矛盾，结果把齐国打败了。在谈话的时候，我就布置专列做开车的准备。毛主席同他们谈了半个小时。谈完后，我请他们到我的房间里休息。

我回到毛主席那里，请示说：“到上海后车停在哪里？”

毛主席说：“停在上海郊外虹桥机场专用线，顾家花园就不进去了。”

我说：“上海那边要通知，是不是通知王洪文？”

毛主席说：“是。这个电话由你们打。”

当时，陈励耘在我的房子里，我就只好在毛主席那里给王洪文打了一个电话。

专列 10 日 13 点 40 分由绍兴返回，14 点 50 分抵达杭州站。在离开杭州去上海的时候，我们没有通知其他的人送，而陈励耘却来了。陈励耘到了车站后，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他心里有鬼，当时神情很不自然。

他跟我握手时问我：“车开后，要不要打电话通知上海？”

我说：“你打电话给王洪文或者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以后我了解，陈励耘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后来，据陈励耘交代：8 日晚上他有事，就是因为于新野到了杭州。于新野是 8 日先坐飞机到上海，然后赶到杭州找陈励耘布置任务的。但于新野有一些疑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追问陈励耘毛主席到底在杭州讲了些什么话，陈就把毛主

席同他们谈话的内容做了报告。当时，于新野告诉陈励耘，要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谋害毛主席。据我们后来了解到的情况，陈励耘在接待于新野的房子里挂着一张毛主席像，陈励耘一看到毛主席像就发愁。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发动武装政变、杀害毛主席的手段之残忍，是骇人听闻的。从后来“联合舰队”成员的供述和我们调查得到的材料看，他们准备谋害毛主席的办法有八种之多：

第一种办法，如果毛主席的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专用线上，就由负责南线指挥的江腾蛟指挥炸专用线旁边飞机场的油库，或者让油库燃烧。据王维国交代，这时就由王维国以救火的名义带着“教导队”冲上火车，趁混乱的时候，先把汪东兴杀死，然后杀害或绑架毛主席。

第二种办法，是准备在第一种办法失败后采用的，就是在毛主席的专列通过硕放铁路桥时，炸掉铁路桥和专列，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然后他们再宣布是坏人搞的。硕放桥在苏州到无锡之间，他们已经到那里看了地形，连炸药怎么安放，都测量和设计好了。

第三种办法，如果硕放炸桥不成，就用火焰喷射器在路上打火车。周宇驰讲，火焰喷射器可以烧透几寸厚的钢板。朝火车喷射，很快就会车毁人亡。王维国、周宇驰等人也到铁路沿线看过地形。他们准备从外地调来火焰喷射器部队，由于我们行动提前，这支部队没有来得及调来。

第四种办法，是用四〇火箭筒和一百毫米高射炮平射打毛主席乘坐的火车。四〇火箭筒是打坦克的，高射炮是打飞机的，这两种武器的穿透力都很强，对付火车不成问题。

第五种办法，是由王维国利用毛主席接见的机会，开枪杀害毛主席。

第六种办法，是利用中央开会的机会，对毛主席下毒手

第七种办法，是策划用飞机上的机关炮、警卫营的步枪、机关枪打毛主席乘坐的专列，把车打停以后，欺骗战士说上火车去抓凶手，看着哪个活着就把他干掉。

第八种办法，是要陈励耘在杭州用改装的伊尔—10 飞机来轰炸毛主席的专列，由陈励耘负责在飞机上装炸弹。据陈励耘后来供述：于新野找他布置任务时，他曾提出杭州没有可靠的飞行员，于新野答应回去向领导汇报，派一个飞行员来。

他们准备派谁呢？派鲁珉。鲁珉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部长。陈励耘说：“那就派鲁珉。那就干！”

陈励耘还说，用飞机轰炸专列的办法是可靠的。9月9日，于新野在上海当着王维国的面说：“我们这次用飞机轰炸，除飞机上有的武器外，还要再加配高射机关枪，这个机关枪可以扫射火车上跑下来的人。”

从这几种办法可以看出，林彪一伙谋害毛主席的手段是何等阴险毒辣！当于新野同王维国一起策划时，王维国又提出，如果毛主席到上海下车住在顾家花园怎么办？于新野说，他看了地形，如果毛主席住在顾家花园，可以把王维国的“教导队”带上去，在毛主席住地附近埋伏好，用机枪把前后路堵死，先把警卫部队消灭，再冲进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王维国还向于新野表态说：“首长（指林彪）的命令，我一定执行。”于新野、王维国都认为，在上海动手，地形比杭州要好，对他们更有利。9日下午，于新野从上海坐飞机回北京前，王维国同他一起又看过一次地形，他们决定就在上海谋害毛主席。

于新野飞回北京，就到西郊机场向林立果作了汇报。林立果在西郊机场的平房和西郊机场旁边的空军学院里都有办公室，那里是他的据点。林立果马上将谋害毛主席的阴谋活动的进展情况报告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

这时，林立果和周宇驰对江腾蛟说：北线由王飞指挥，南线由你指挥，你要赶快回南方去，王飞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副参谋长，是“联合舰队”的骨干成员。他们计划在北线实施的行动，是要把在京的周总理、朱德、叶帅、聂帅、徐帅、刘帅等人都害死，也包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飞等人。把钓鱼台、中南海的地形都看了。周总理当时就住在中南海里。

他们打算用坦克冲中南海。王飞说，北京上空是禁飞的，用坦克可以把中南海的墙撞开。在他们密谋的过程中，还有人提议可否用导弹车拉着导弹打中南海。他们说来说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案。

林彪知道搞政变的行动已经全面展开了，他有带兵的经验，怕单靠“联合舰队”这几个人没有把握，怕他们经验不够。林彪要指挥一个大“舰队”。他通过叶群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调动起来了。那几天，他们的电话联系十分频繁，常常是两三部电话机同时讲话，一讲就是半个小时、1个小时。据调查：9月10日，黄永胜同时群通电话5次。其中有两次通话时间竟分别达90分钟和

135 分钟。同日，林彪还给黄永胜写信，信上说：“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他仍称毛主席为“B—52”。叶群在给吴法宪电话中问：B—52 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吴法宪向她报告了毛主席在杭州同陈励耘等人谈话的内容。

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做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杭州我们不能再呆下去了，便转往上海。由于我们行动非常快，使得陈励耘和王维国等人措手不及。10 日 15 点 35 分，我们从杭州发车，18 点 10 分就到了上海。这次随毛主席外出，我带上中央警卫团干部 100 人，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专列一到上海，我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部队全撤到外围去了，在毛主席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部队，以防不测。在离我们的专列 150 米远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我们的火车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10 日晚上，毛主席同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王洪文见面，但没有谈几句话。王洪文住在车下的房子里，他还要我也搬到车下来住。我因为考虑专列的安全就谢绝了。

第二天上午，许世友来了。

毛主席与许世友、王洪文和我，谈了两个小时的话。毛主席说：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有些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嘛。毛主席又说：要争取主动，有了错误，不认识，不改正，在那里顶着不好，这会加深错误，包袱越背越重，甩掉包袱，轻装上阵，人就舒服了。他还指出：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团结，在搞分裂。

许世友表示，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谈到中午，毛主席说：“吃中午饭啦！今天，我就不请你们在车上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

许世友热情地说：“汪主任，你也去。”

我说：“我不去了，谢谢。”

毛主席当着他们的面对我说：“汪主任，你把他们送走以后，再回来一下。”

我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王维国也来了。他一直在休息室里等着毛主席召见。

我送走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等人后，马上回到车上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问：“他们走了没有？”

我说：“走了。”

毛主席马上说：“我们走。你立即发前卫车。”

我说：“不通知他们了吧？”

毛主席说：“不通知。谁都不通知。”

我们执行毛主席的命令，立即发了前卫车。13 点 12 分，我们的车也走了。

专列开动时，车站的警卫人员马上报告了在锦江饭店吃饭的王洪文。

王洪文小声告诉许世友说：“毛主席的车走了。”

许世友很惊讶地说：“哎呀！怎么走了？”

王洪文对许世友说：“既然走了，我们还是吃饭吧。”

王洪文、许世友、王维国等人吃了两个多小时的中午饭。吃完饭已经是下午了。

许世友便乘一架伊尔—14 飞机赶回南京，然后到车站接我们。

我们专列 18 点 35 分抵达南京站，停车 15 分钟。许世友在南京站迎接，

毛主席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

我下车见了许世友，跟他说：“毛主席昨天晚上没睡，现在休息了。毛主席还说，到这里就不下车了。”

许世友说：“好！”他接着问我：“路上要不要我打电话？”

我说：“不用了，我们打过了。”

许世友又问：“蚌埠停不停？”

我说：“还没最后定。一般的情况，这个站是要停的，但主席没定。”

专列从南京开出后，到蚌埠车站是 21 点 45 分，停车 5 分钟。12 日零点 10 分到徐州，停车 10 分钟。到兖州时是 2 点 45 分，没有停车。到济南时是 5 点，停车 50 分钟。在济南车站，我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到丰台站，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专列到德州时是 7 点 40 分。停车 20 分钟。11 点 15 分到天津西站，停车 15 分钟。

12 日中午 13 点 10 分，专列抵达丰台站停车。毛主席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和我谈了话，一直讲到下午 3 点多钟才结束。

过去，毛主席从来没有白天到北京站下车的，这次是个例外。15 点 36 分，专列由丰台站开出，16 点 5 分到北京站。毛主席下火车后坐汽车回到了中南海。从杭州动身到这时，毛主席已经 3 天没有休息好。到了中南海，我对毛主席说：“您睡吧。”

毛主席关心地对我说：“你也睡一睡吧。”

我说：“我也回去睡一睡。”

回来后，我打电话给周总理。周总理还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感到诧异。他问：“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

我回答周总理说：“计划改了。”我还说，电话上不好细说，以后当面汇报。

这时，林立果等人正在加紧策划和实施谋害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阴谋①，突然接到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的电话，报告毛主席的专列已经离开上海。这帮家伙被吓坏了，林立果连声说：“糟糕！糟糕！”

当林立果又探听到毛主席确实于 9 月 12 日下午回到中南海的消息后，深感谋害毛主席的阴谋已经破产，他在惊恐之余，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说情况紧急，两个小时以后飞往北戴河，并说，他走后北京由周宇驰指挥。林立果还对周宇驰等人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要立即转移，赶紧研究一个转移的行动计划。

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摘录

林彪手令

周宇驰会见江腾蛟

西郊机场秘密据点

2009 年 9 月 23 日初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五册（1）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五章 毛泽东外地巡视

第一节 毛泽东巡视武昌

本节资料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武昌与刘丰、刘建勋、王新、汪东兴的谈话》
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经过五十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
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

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81个人搞了个“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这个组织没搞多久，垮台了。以后变为托派了。其中有个叫刘仁静的，这个人比我年龄小，现在住在北京，他从莫斯科跑到土耳其去见了托洛茨基。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分裂党，也没有得逞。他还在武汉当教授吗？他是浏阳人，我的老乡。他用的名字很多，也叫罗敷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党，是犯了路线错误。

毛又说：六届五中全会，是在江西瑞金开的，他们都到了中央苏区了。我是政治局委员，不让我参加会，让我当苏维埃主席，不让我在军队工作，让我去做群众工作。

毛说：国民党军队向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这次反“围剿”是周总理指挥的。
毛接着说：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王明错误的路线。王明夺权四年之久。上海的中央移到中央苏区去了，陆续跑过去了。先是周恩来，然后是博古、
张闻天、王稼祥他们去的。到中央苏区，李维汉去得早，他那时是组织局长。然后是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部的懋功会合以后，张国焘搞政变，
成立伪中央。

全国胜利以后，高、饶就想夺权，搞反党联盟，没有夺成。

毛把话题转到九届二中全会，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

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

（在座的人纷纷检讨自己犯了错误。）

毛接着说：你们就是太急了，问题不在你们。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毛说：什么“天才的”，我不是天才，读六年孔夫子，读七年资本家的洋学堂，我到二十五岁那一年，正是一九一八年开始读马列主义。

（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的时候）毛说：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毛说：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也可能救不过来。

毛接着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

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

毛对刘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开九十九人的会不行，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听说连总参二部部长这一级的人都还不知道，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军区、省军区常委要研究一下。暂时不忙，待提中央讨论后定。

毛还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

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

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只有两个文件，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我口述，别人记录的，最后还是经过我自己修改印发的。其中一个就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毛继续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

毛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

毛接着说：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的人、三十岁以上的人。

二、研究资料

汪东兴著《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摘录

1971年 8月 15日，我们陪着毛主席乘专列从北京出发，16日抵达湖北武昌。被称为长江三大“火盆”之一的武汉三镇。当时天气炎热。

16日在武昌车站，毛主席找了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和我谈话。

17日，毛主席又找了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还有刘丰和我继续谈话。

谈话开始时，毛主席先亲切地问刘丰有关湖北、河南的情况。

刘丰汇报说，湖北、河南的情况不错，人心比较稳定。毛主席听后感到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

毛主席严肃地说：笼统地这样说也可以。要细想起来，这样说是应付差事。在你们这里，有些地方还在动，有些地方没有动。有些地方的意见是不少的。

毛主席的话锋一转，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

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接着说：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经过五十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

接着，毛主席回顾了党的历史和党内路线斗争。他说：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81个人搞了个“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这个组织没搞多久，垮台了。以后变为托派了。其中有个叫刘仁静的，这个人比我年龄小，现在住在北京，他从莫斯科跑到土耳其去见了托洛茨基。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分裂党。也没有得逞。他还在武汉当教授吗？他是浏阳人，我的老乡。他用的名字很多，也叫罗敷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党，是犯了路线错误。

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还提到井冈山时期的一些事情。

1929年 6月 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10月初在福建上杭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当时毛主席被迫离开了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会议上当选为前委书记。8月，陈毅去上海，向中共中央作汇报工作。8月 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临时会议，专门听取了陈毅有关红四军情况的报告。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个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事部长，她听了汇报后对陈毅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毛泽东呢？应该拥护他，他在根据地搞的是对的。

陈毅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信是经周恩来审阅同意后发出的(即“九月来信”——作者注)。信中肯定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正确主张，明确指示“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陈毅回根据地传达了中央的意见，带回了那封信(该信全文刊载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卷，第 473—490页。——作者注)。同年12月28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古田又召开了第九次党代会。

会议开了三天，重点是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最后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这样，便扭转了毛泽东遭排挤的局面。

毛主席曾经对我说，陈毅敢于改正错误，敢把中央的意见原原本本地传达，陈毅同志是个襟怀坦白的人，错误是有，但是个好同志。

红四军第七次、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是很重大的事情。当时，我在赣东北方志敏

领导的部队里工作，对这两次会的情况也不清楚。为此事我问过毛主席。毛主席说他对这两次会议的详细情况也不太清楚。但对那一段往事，毛主席有很深的印象。

毛主席对我们说：陈毅当时到了上海，本来是告状的，但周恩来做了好事，批评陈毅不对，犯了极端民主化的错误，还是要我“复辟”。中央要我“复辟”，我就“复辟”了。

毛主席接着说：然后是纠正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然后是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会上发表《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他是公开论战。在莫斯科是搞宗派。

毛主席又说：六届五中全会，是在江西瑞金开的，他们都到了中央苏区了。我是政治局委员，不让我参加会，让我当苏维埃主席（1931年11月27日，毛泽东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原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因红一方面军改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而被撤销。——作者注），不让我在军队工作，让我去做群众工作。

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那么长的时间，毛主席回忆往事，讲党的历史和他的经历，说心里话，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

毛主席说：国民党军队向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这次反“围剿”是周总理指挥的。

关于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情况，叶剑英同志曾对我说过，这次反“围剿”的胜利，是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和军事方针才取得的。叶剑英当时跟随毛主席一道走的，知道得很清楚。在宁都会议上把毛主席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撤掉了（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全体会议，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会后，中共临时中央将毛泽东调回后方，并且再一次撤销了毛泽东在1932年8月8日重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这一职务。——作者注），由周恩来接着指挥红军反“围剿”。

毛主席接着说：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王明错误的路线。

王明夺权四年之久。上海的中央移到中央苏区去了，陆续跑过去了。先是周恩来，然后是博古、张闻天、王稼祥他们去的。到中央苏区，李维汉去得早。

他那时是组织局长。然后是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部的懋功会合

以后，张国焘搞政变，成立伪中央。

毛主席后来谈到张国焘时还多次说过，张国焘要是不跑的话，还要给他一个政治局委员当。

毛主席继续说：全国胜利以后，高、饶就想夺权，搞反党联盟，没有夺成。

讲了党的历史。毛主席又把话题转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他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

在座的同志，都检讨自己犯了错误。

毛主席接着说：你们就是太急了，问题不在你们。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大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主席说：什么“天才的”，我不是天才，读六年孔夫子，读七年资本家的洋学堂，我到二十五岁那一年，正是一九一八年开始读马列主义。

毛主席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的时候说：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改了没有？没有改。

毛主席说：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也可能救不过来。有了错误就要改，如汪东兴同志，分别几次在七千多人的面前，讲他自己的错误，他接触最广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团，七千多人的单位，这怕什么呢？他不怕。

毛主席在这里举出我检讨的例子，是要说服那些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毛主席接着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同志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

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

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

那时，毛主席是主张彭德怀管军委工作的。

毛主席接着又说：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

毛主席对刘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开九十九人的会（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九十九人。——作者注）不行，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听说连总参二部部长这一级的人都还不知道（指九届二中全会林彪一伙人的问题。——作者注），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军区、省军区常委要研究一下。暂时不忙，待提中央讨论后定。

毛主席还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

当时有人回答毛主席说：黄永胜那里早就不是了。后来了解这个回答的情况是假的，实际上黄永胜的老婆项辉芳当时还在当黄永胜办公室的主任。

毛主席强调说：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只有两个文件，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我口述，别人记录的，最后还是经过我自己修改印发的。其中一个就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现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作者注）。

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正打胡宗南，很紧张，毛主席疲劳过度，手抖得厉害，拿不住笔，《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就是由毛主席口述，由别人记录的，后来毛主席亲自修改完稿。

毛主席讲完了庐山会议各方面问题后，继续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

毛主席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

毛主席接着说：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的、三十岁以上的人。

最后。毛主席说：今天就这样吧。你们四位，明天、后天讨论一下。

毛主席同刘建勋、王新、刘丰和我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内容非常丰富，几个同志第一次听来真如倾盆大雨一般。足够我们去消化、琢磨的。在武昌期间，毛主席想同华国锋谈话，我就打电话把华国锋从北京请来了。

8月25日晚，毛主席在武昌同华国锋同志谈话。我也参加了。

谈话开始时。毛主席问华国锋：你来了。你们现在忙什么？

华回答说：我刚到国务院，着手了解工农业生产的情况。我向毛主席作个汇报。毛主席有点严肃，说：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毛主席对华又简要叙述了党的历史，他说：中国也怪，中国党没有分裂。陈独秀81个人组织“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转为托派。有个刘仁静，他见过托洛茨基，此人比我年龄小，现住北京。罗章龙另立中央，没有成功。此人现在湖北当教授。是浏阳人，现叫罗敦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是犯路线错误。王明搞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召开了两次中央全会，即第四次、第五次全会（指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作者注）。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推翻了王明的领导，张闻天负总责，实际上张闻天当召集人，我管事。正式管事是遵义后十年，一九四五年五月“七大”（1945年5月，七届一中全会举行。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作者注），才当选主席。出了两本书，《两条路线斗争》、《六大以来》，他们才解除武装。张国焘在长征路上，自立中央，也没有搞成。高、饶

想夺权，没有夺成。有人说三年灾害是我搞的，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后来北戴河会议，讲了形势、阶级、矛盾才好转了。

毛主席接着说：我批发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座谈会的纪要，在中央的批语中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不加怕各大军区马虎过去。

毛主席继续说：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一中、一师七年是读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到马列主义。

毛主席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六号简报时说：这个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这是我个人认为。将来党中央还要讨论。

毛主席接着对华国锋说：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不给李德生同志发，他们几位是井冈山山头一方面军的。一次当着他们的面，我说李德生你好蠢呀，不是一个山头的，宝贝如何能给你呢？会上念的称天才的语录，事先也没有谈过，也不知是哪本书、哪一页的，是说假话嘛。

在讲到解决九届二中全会出现的问题的措施时。毛主席说：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看到三十八军的报告很高兴，当即批了。把二十四军、二十一军、三十八军整得厉害，特别是把三十八军整得苦。还批了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文件和刘子厚的检讨等文件，这是打石头。改组北京军区是挖墙脚。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他们没有插进来。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少，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毛主席还说：路线要搞正，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以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汪东兴同志他管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团七千多人的范围，他分几次在一干多人中讲了自己犯的错误。犯错误愿意改正就好。

最后，毛主席对华国锋说：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

还是几个原则。三个办法，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些话不能听，一句话顶一万句，能相信吗？有的连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实际有的不算数，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哩。

毛主席准备由武昌转移到湖南长沙。27日上午 9时，我和华国锋飞往长沙，落实毛主席的住宿安排等问题。这时华国锋同志刚调京，仍然兼任湖南省委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

27日下午 2时，刘丰到毛主席的住处看望毛主席，毛主席同他进行了第二次谈话。

谈话开始时，毛主席问刘丰：怎么样？

刘丰回答说：这几天我想得比较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也犯了错误，起了哄。干扰了主席。去年主席谈了以后，我心情很沉重。

刘丰讲的去年毛主席同他的谈话，是指九届二中全会结束毛主席从庐山回北京路过武汉时，同他谈的一次话。当时刘丰的态度不明朗。毛主席这次在武昌同他谈话，叮嘱他不要告诉别人，可是9月6日，他就告诉了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

毛主席对刘丰说：你沉重什么？问题不在你。问题在北京。

毛主席又问：方铭同志什么病？

方铭当时是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毛主席问方铭的情况。刘丰没有回答。

毛主席又再次向刘丰谈到党内的路线斗争，点明了陈伯达也是反党阴谋集团的人。

毛主席总括说：我们党五十年，十次分裂，都没有分裂了。刘丰接着毛主席的话说：有主席领导，有主席思想，解放军也是分裂不了的。请主席放心。

谈到军队、毛主席说：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

刘丰插话说：主席还是管的。

毛主席说：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

在同刘丰的谈话中。毛主席很快又把话题转回到九届二中全会问题上。

他说：又是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人犯错误，他们想搞我的山头。四方面军的同志。从张国焘事件后，比较谨慎一点了。

毛主席再次讲到九届二中全会后采取的措施时，他说：我的方法是打石头、挖墙

脚、掺沙子。在庐山，五天时间我写了七百字，打了这样一块石头。以后批了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把三十八军整得那样苦。还批了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刘子厚同志的检查。

毛主席谈到解放军的问题时说：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郑维山能指挥解放军？华北八个军，就有五个军反对他们。天津的六十六军就不听他们的嘛！他们要把那几个坏人塞进天津市，六十六军就反对嘛！就是那二个军，还有军长、政委，师长、政委、团长、政委，会听他们的吗？

毛主席谈到掺沙子的办法，说：李先念这个人，比较正派，比较好。我要李先念同志也参加军委办事组，考虑再增加一些人，掺沙子。是不是其他军区也参加些人。

刘丰在中央苏区时是五军团的人，五军团是由宁都起义的部队改编成的。毛主席向刘丰问了五军团的情况后说：季振同（河北沧州人。1931年12月14日与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部起义，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他任总指挥，1934年夏被错杀。——作者注），我同周恩来讲了几次，这个人不应该杀。赵博生、董振堂这两个人也不错。

毛主席接着说：我七老八十了。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团结，不要搞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党的方针是允许改正错误的。如某些同志，我们还是信任的。

毛主席讲到这里，再次向刘丰谈起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他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他们在庐山不是一天半，而是三天。

毛主席又说：我讲的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有时一句顶一句，有时连半句也顶不了，顶个屁！他们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们才是天才。陈伯达才是天才。

毛主席的这些话，在几次谈话中反复说过，但一次比一次说得更多一些，更明朗一点。细细体会。还是略有不同的。

毛主席这次对刘丰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毛主席还很生气地说：他们要捂住。总参二部部长都不知道。怕要开二百来人的

会议(来解决)。

这里说的总参二部部长不知道，是因为当时毛主席接到总参三部部长给他写的信，信中谈到过这个情况。

毛主席还对刘丰讲到他不赞成老婆当秘书、当办公室主任的问题。对一些负责人向林彪请示问题时要经过叶群这类事很不高兴。

谈话结束时，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为《国际歌》，列宁在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时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一百年了！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

毛主席问刘丰看到过新印的《国际歌》歌词没有。刘丰说他没有看到。毛主席叫张玉凤去拿。张玉凤说印的歌词和材料都已装箱上车了。毛主席说，到火车上再给他。刘丰问毛主席：翻印一些下发，可不可以？

毛主席点头表示同意。

随后，刘丰等人送毛主席到车站上车。刘丰扶毛主席坐下后，张玉凤拿来《国际歌》歌词。毛主席要张玉凤、吴旭君唱。毛主席同刘丰也跟着一起唱。唱一段，毛主席讲解一段，还讲解了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的文章。

毛主席说：究竟是英雄创造世界，还是奴隶们创造世界？我是历来主张奴隶们创造世界的。

毛主席还说：《国际歌》就是讲要团结，讲全世界无产阶级要团结。

唱完《国际歌》后，毛主席又与刘丰等人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

毛主席对刘丰动感情地说：是呀！你看，就是要步调一致嘛！不一致还行呀？

毛主席这时带头唱《国际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是非同寻常的。

2009年9月9初稿

2012年4月25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五册（2）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五章 毛泽东外地巡视

第二节 毛泽东巡视长沙

本节资料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长沙与华国锋、卜占亚、汪东兴的谈话
 你们对民主党派的问题要研究研究，看还要不要？一个是要认识一下。还有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有人说不要了，也不给利息了。我说不行。有的小资本家不要利息，大的资本家是不愿意的。应该拿一点利息。

民主党派还要存在。有的地方说不要了，不要太急了，急不得。你们湖南有个人叫周世钊是个名人，是我的老同学。五一节周世钊来了，上了天安门。我问他民主党派还要不要，这个人算是个老实人，他说民主党派里也有现行反革命分子，有些历史上有一点反革命行为。这是对个人讲的。对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没有搞翻案，他们也没有发指示。作为民主党派来说，还是可以存在的。但作为民主党派内部某个人来说，有的人是有问题的，少数人问题很严重。他们中间也有左派，也有中派，也有右派。不要笼统地说民主人士都好或都不好。

毛接着说：有些民主人士挨了斗，挨了批，有的拖了一两年了，问题也没有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到了共产主义，斗争的性质可能有变化，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但是那个时候文化水平高了，犯解决。不仅民主人士没有解决，什么“五一六”啊，他们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啊，有的是挂起来了嘛。应该把民主党派的牌子都挂起来，因为我们国家在搞文化大革命中间，有的还不正规，把民主党派搞掉了，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拖”字解决不了问题，存在的问题在他们挂起牌子以后，可以再了解、再调查、再处理嘛。

(毛讲完这段话，带着几人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不光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它的要求去做。你们找几本《国际歌》看看，《国际歌》里边什么都有了。你们明天就把《国际歌》念一念，议一议，谈一谈。不要每一句都搞对照，找目前最需要的要求去做。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里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活动。这次不做结论，也是分裂行动了。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错误的人觉悟比较快，能及时认识改正。对犯错误的人，不管他怎么样，不要杀人。搞斗、批、改，也要搞得温和一些。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沙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的谈话

毛对刘兴元、丁盛说：韦国清同志，我比较熟悉。你们两位，我不怎么熟悉。

毛问韦国清：韦拔群和你都姓韦，是不是一家子呀？

韦说：是五服以外的，不是五服之内的。韦拔群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接受过主席的教育。

毛说：不能说他向我学习了什么。名义上，我是先生，他是学生，实际上，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要做先生，先要当学生。广西的事，他比我知道得多。可惜这位同志已经牺牲了，我对他很怀念。

毛又说：彭湃是广东海丰县人，家里是个大地主。他在海丰地方工作时，有一次几万群众朝拜观音菩萨，有人问他去不去参加，他说去参加。这样做是对的。他参加朝拜后，就对农民说，观音菩萨靠不住，还得靠自己才行。于是，就拿起了棍棍棒棒闹革命。他这个人善于鼓动，不善于搞组织工作。搞群众工作不怎么扎实，搞得不怎么好，后来牺牲了。他发动群众时，曾经拿自己家里的钱发给农民来搞群众运动。

(毛把话题转到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毛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五十多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

毛谈起井冈山时期的斗争，说：当时，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

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以后，又说中央委员也撤了。不知道怎么传到了井冈山，说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于是，有人就不服气，要向中央写报告。我说不要写，开除有么事要紧。我既然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代表了。但他们说可以当师长。到后来又说我可以当党代表。那时，我们只有两个团，一个是秋收起义军编成的三十一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以后，成立四军了，朱德同志当军长，陈毅同志当政治部主任，我当党代表。在闽西开会，叫我下台。后来有人又叫我上台，我就上台了。再有就是李立三搞了那么一阵子。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夺了权，搞了四年。中央五中全会，我是政治局委员，说是不让我参加会。1935年1月，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和我主持的，这就是遵义会议，张闻天作报告。我是好比一个菩萨，被放在尿缸里，沉过几下，臭得很。这次会议以后，我管事了。前面讲的这五次，我都无能为力，他们不听我的。

毛接着说：以后出了个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乘势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的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哪里还有根据地，后来怎么能搞到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的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又逃跑了。他是很害怕胡宗南的，后来又跑到西安胡宗南那里去了。张国焘如果不跑，要给他当政治局委员，你们信不信？

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引起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

毛强调说：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

批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整三十八军实在是恶劣，对自己的队伍怎么能那个样子的整法。整二十四军、整三十一军、整六十九军、整三十八军，为什么要整？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毛问刘兴元、丁盛、韦国清：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样看法？

又说：犯了错误，就做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煤炭烧坑。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七个人都是要出国留学的，到法国搞勤工俭学的。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开始看马列主义的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毛转向韦国清，说：我看你这个人太文了一些。打奠边府的时候，你是坚决主张打的。开头他们不听你的，你很厉害，他们就听了。

韦说：我是根据主席的指示办的。

毛问韦说：你们那个民族（指壮族），人口增加了一些吗？得有四五千万人了吧。可以编几十个师。南方几个省能打仗的，第一是广西，第二是广东，第三是湖南，你（指汪东兴）那个省（即江西）算第四。

（刘兴元做工作汇报）毛听完后说：陈独秀那个人是不讲民主的。今天我听你讲了十分钟，陈独秀办不到，他不听。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他不同意，后来说同意啦。我说，那就请你通知招生吧。我开始招生的名额当中，他说农民比例太大，工人比例太小，不行。其实那时农民四万万人口，工人只有二百万，应该多培养农运干部。不过陈独秀也有个长处，就是不爱财。他穿的衣服倒是干干净净的，办公桌上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

（讲到延安整风时）毛说：延安整风时，提出来要编书。后来叫王首道负责编书，编出来后，不行。改由胡乔木编，这个人有点知识，他收集和研究了那么多的文件，编了两大本，印出来让大家讨论。通过学习，这才把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

（讲到打锦州，毛兴奋地说）我听说打锦州的时候，部队住在苹果园里面，不摘苹果吃。我就说，我们的部队有希望。

毛又说：到了北京时，就有人提出，要给部队增加军饷，说资本家吃大米、馒头，我们的部队吃酸菜，生活太苦了。增加军饷才能和资本家比。我说我们的军队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为什么要增加军饷呢？提这个意见的人，是代表吃酸菜阶级的人说话的。

毛强调：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要犯错误。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上也要谨慎。军队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的那些语录，李德生同志就有意见。我说李德生这个人好蠢，你不是那个山头的人，别人的山头可以给你呀？好的宝贝怎么会给你呢？

毛沉思一会，把谈话转向“天才论”，说：《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你们看，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你们都讨论了吗？《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歌，你们要注意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毛接着说：要认真读书。罗瑞卿当参谋总长的时候，让他和陈伯达商量，搞个读书目录，搞出来了三十本书。我看可以。以后又提出来说这样会妨碍学语录，把学理论的事停下来了。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也是有办法的，可以请先生帮。

你们（指广州军区）写的三支两军的文件，我看了，一些问题解决得不算彻底，但还可以。我在中央的批语上加了四个字：“认真研究”，就是要引起大家重视。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

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地方党委定的事，要拿到部队党委来讨论，这不进颠倒了吗？地方没有成立党委以前可以，地方已经有党委了，就不能那样办了。

毛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长沙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和汪东兴的谈话

（当谈到林彪一伙人的问题时）毛说：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在谈到党的状况时）毛说：我们党有二千多万人，坏人不过是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呢，叫做“吐故纳新”。还要挂起来一点，不过不多了，清理和挂起来的，就算百分之三。党内还有落后的分子，或者比较而言的。这些问题几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才能做结论。因为现在不打仗，没有陈独秀。那个时候是天天打仗，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形势，很快就表现出来了。陈独秀他们81个人跑出去了，发表了声明。八七会议前，采取南昌暴动的政策是对的，南昌暴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后来是路线上犯了错误，但是取得了经验也是好的。城市不那么搞了，靠外援靠不住的，还得靠自己。没有兵怎么样办？靠发动群众，还有俘虏兵嘛，他们也是群众，因为他们是国民党抓兵抓来的。我们把他们俘虏过来，就是把他们从敌人那里分裂出来。

毛又说：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注意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都很重要。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样做工作呢？要很好地抓住重点，学习和讨论，不借鉴历史和政策，怎么行呢？当然现在你们还不能向战士们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啦。

庐山会议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样快，我们也不懂。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三天，从开始的那一天，他们就搞起来了。

如果你们有理，你可以坚持，为什么那股妖风刮了三天就不刮了呢？为什么要收得那样快呢？各大组组长都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说要收回简报。

总而言之，将来要把简报发给大家看。大家评论，是革命的，是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不要受群众落后议论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包括你们在内。不然的话，为什么被人家一股台风一卷，就把你们卷进去了。

毛说：军队历来就是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谁有道理听谁的。我历来就没有什么意见的，我的意见都是下边来的，下边是供应站。陈伯达给我几条语录，三十八军给了我一个报告，汪东兴那个自我检查，济南军区的反骄破满的报告，刘子厚也给了我一点材料。我有什么东西呀？我是向他们学的，然后我就打石头。

我看今后你们也应该这样。你们有什么学问呢？我不清楚。无非是找工人、农民开上两个会，然后总结一下。有些人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伟大呀！英明领导啊！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

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1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

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

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参考消息》，太少。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我看《参考资料》可以多印一点，看的人多一点。如果有的人不看，由他们去。

（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时）毛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

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

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一千三百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

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个人的会议总理作的总结了，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它是不大好的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的吧。后来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以后，又赶快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

我们的高级干部不成熟。那次庐山会议也不过是二百几十个人，我本人也是二百几十个人中间的一个，还有一些高级干部，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中央委员，卜占亚他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华国锋同志，你满脑子的农业，当然，你也讲了农业路线问题，可是光有你的农业也不够，还要考虑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做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的吹一吹风。

（谈到各地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毛说：过去，积代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北京开的有缺点。首先是总参谋部召开的那个积代会，他讲“大树特树”，别人一句也不能讲。听说他那里有一个护士，说了一句不赞成的话，他们就不饶她。“大树特树”，不妥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后来，国防科委开的积代会也不好。国防科委开积代会，有人还打电报祝贺，其实这是造声势，找一班人拥护自己。

毛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17岁就当兵，原是叶挺部队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个团没

有赶上南昌起义，在江西修水参加了秋收暴动，然后上了井冈山。

现在南方干部比较少了，高高在上了，稀稀拉拉了。北方干部多起来了，我很高兴，但是不要翘尾巴。总的来说，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这也没有关系。毛特地嘱咐说：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这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其实人家都知道了，什么“小小老百姓”啊！“小小老百姓”是谁呢？河北人都知道。总之，就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大好吧。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的，或者三个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方法就是三板斧，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陈伯达这个“小小的老百姓”，他搞挑拨离间，他的话也不讲完。我们现在在下边，也不公开批评，批陈整风我们还叫批修整风。我们党是有纪律的。庐山这场斗争，还没有听到外国人说什么，华北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后来他们又开了三个月的会，可是没有发现外国人说什么。总而言之，无论干部、战士，全国党员有二千多万，讲百分之三的话，稍微大了一点吧？现在我希望你们试试看，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要那么长篇大论的报告。

毛看了看表，说：今天我要走了，我这一路都要谈下去。

（韦国清说：主席的谈话，对我们教育很大。）

毛：又是英明了吧，从来没有听说过吧。九十九个人的会议，已经刚讲了吧。马克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要看行动。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地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人们说：盖棺论定。我说有的人盖棺也不能论定。斯大林不是盖棺论定了吗？没有论定。

斯大林搞雅尔塔协定，他们要瓜分世界，把中国的蒙古划出去，把新疆、东北划给苏联的势力范围，别国不能去；把日本划给美国的势力范围，你们知道不知道呀？

（毛接着谈起中苏关系）在朝鲜打仗时，两国关系比较好一些。《中苏友好互助

同盟条约》和雅尔塔协定是两种不同的问题。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内部争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容许第三国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十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国籍，怎么办？他们答不出来。还有他们不许我们夺取政权，联共党始终是反对的，有电报还在。

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曾给我们党来电报，说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

如果说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可以，民族怎么能灭亡呢？所谓民族，就是讲人嘛，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我是顶了他们的。我们党内也有相当的人当时不想夺取政权，也不讲夺取政权。

毛又说：我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贊成分裂。苏联形成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我们党分裂的基础是有的，特别是王明的那一次。

（在座的有人问毛：对高岗、饶漱石，苏联是不是拉了他们一下？）

毛：拉是拉了他们一下。

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过去张国焘搞分裂，把共产党的武装对立起来，但没有搞成。

毛最后说：很有希望。还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起来。

（当谈到林彪一伙人的问题时）毛说：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在谈到党的状况时）毛说：我们党有二千多万人，坏人不过是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呢，叫做“吐故纳新”。还要挂起来一点，不过不多了，清理和挂起来的，就算百分之三。党内还有落后的分子，或者比较而言的。这些问题几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才能做结论。因为现在不打仗，没有陈独秀。那个时候是天天打仗，

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形势，很快就表现出来了。陈独秀他们81个人跑出去了，发表了声明。八七会议前，采取南昌暴动的政策是对的，南昌暴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后来是路线上犯了错误，但是取得了经验也是好的。城市不那么搞了，靠外援靠不住的，还得靠自己。没有兵怎么样办？靠发动群众，还有俘虏兵嘛，他们也是群众，因为他们是国民党抓兵抓来的。我们把他们俘虏过来，就是把他们从敌人那里分裂出来。

毛又说：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注意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都很重要。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样做工作呢？要很好地抓住重点，学习和讨论，不借鉴历史和政策，怎么行呢？当然现在你们还不能向战士们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啦。

庐山会议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样快，我们也不懂。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三天，从开始的那一天，他们就搞起来了。

如果你们有理，你可以坚持，为什么那股妖风刮了三天就不刮了呢？为什么要收得那样快呢？各大组组长都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说要收回简报。

总而言之，将来要把简报发给大家看。大家评论，是革命的，是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不要受群众落后议论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包括你们在内。不然的话，为什么被人家一股台风一卷，就把你们卷进去了。

毛说：军队历来就是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谁有道理听谁的。我历来就没有什么意见的，我的意见都是下边来的，下边是供应站。陈伯达给我几条语录，三十八军给了我一个报告，汪东兴那个自我检查，济南军区的反骄破满的报告，刘子厚也给了我一点材料。我有什么东西呀？我是向他们学的，然后我就打石头。

我看今后你们也应该这样。你们有什么学问呢？我不清楚。无非是找工人、农民开上两个会，然后总结一下。有些人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伟大呀！英明领导啊！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

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1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

你们

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

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参考消息》，太少。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我看《参考资料》可以多印一点，看的人多一点。如果有的人不看，由他们去。

(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时)毛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

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一千三百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

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个人的会议总理作的总结了，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它是不大好的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的吧。后来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以后，又赶快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

我们的高级干部不成熟。那次庐山会议也不过是二百几十个人，我本人也是二百几十个人中间的一个，还有一些高级干部，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中央委员，卜占亚他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华国锋同志，你满脑子的农业，当然，你也讲了农业路线问题，可是光有你的农业也不够，还要考虑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做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的吹一吹风。

(谈到各地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毛说：过去，积代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北京开的有缺点。首先是总参谋部召开的那个积代会，他讲“大树特树”，别人一句也不能讲。听说他那里有一个护士，说了一句不赞成的话，他们就不饶她。“大树特树”，不妥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后来，国防科委开的积代会也不好。国防科委开积代会，有人还打电报祝贺，其实这是造声势，找一班人拥护自己。

(毛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17岁就当兵，原是叶挺部队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在江西修水参加了秋收暴动，然后上了井冈山。

现在南方干部比较少了，高高在上了，稀稀拉拉了。北方干部多起来了，我很高兴，但是不要翘尾巴。总的来说，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这也没有关系。毛特地嘱咐说：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这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其实人家都知道了，什么“小小老百姓”啊！“小小老百姓”是谁呢？河北人都知道。总之，就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大好吧。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的，或者三个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方法就是三板斧，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陈伯达这个“小小的老百姓”，他搞挑拨离间，他的话也不讲完。我们现在在下边，也不公开批评，批陈整风我们还叫批修整风。我们党是有纪律的。庐山这场斗争，还没有听到外国人说什么，华北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后来他们又开了三个月的会，可是没有发现外国人说什么。总而言之，无论干部、战士，全国党员有二千多万，讲百分之三的话，稍微大了一点吧？现在我希望你们试试看，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要那么长篇大论的报告。

毛看了看表，说：今天我要走了，我这一路都要谈下去。

(韦国清说：主席的谈话，对我们教育很大。)

毛：又是英明了吧，从来没有听说过吧。九十九个人的会议，已经刚讲了吧。马克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要看行动。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地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人们说：盖棺论定。我说有的人盖棺也不能论定。斯大林不是盖棺论定了吗？没有论定。

斯大林搞雅尔塔协定，他们要瓜分世界，把中国的蒙古划出去，把新疆、东北划给苏联的势力范围，别国不能去；把日本划给美国的势力范围，你们知道不知道呀？

(毛接着谈起中苏关系) 在朝鲜打仗时，两国关系比较好一些。《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雅尔塔协定是两种不同的问题。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内部争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容许第三国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十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国籍，怎么办？他们答不出来。还有他们不许我们夺取政权，联共党始终是反对的，有电报还在。

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曾给我们党来电报，说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

如果说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可以，民族怎么能灭亡呢？所谓民族，就是讲人嘛，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我是顶了他们的。我们党内也有相当的人当时不想夺取政权，也不讲夺取政权。

毛又说：我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贊成分裂。苏联形成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我们党分裂的基础是有的，特别是王明的那一次。

(在座的有人问毛：对高岗、饶漱石，苏联是不是拉了他们一下？)

毛：拉是拉了他们一下。

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过去张国焘搞分裂，把共产党的武装对立起来，但没有搞成。

毛最后说：很有希望。还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起来。

二、研究资料

汪东兴著《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摘录

毛主席的专列 8月 27日夜间抵达湖南长沙。到达长沙的当晚，毛主席同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我也参加了。

卜占亚当时是湖南省军区的政委，毛主席对他不太熟悉。谈话开始时，毛主席先问了卜占亚的简历。然后毛主席又问我是否向刘兴元、丁盛、华国锋、韦国清传达了他前几次的谈话内容，我说传达了。毛主席说他明天要找他们谈话。

毛主席接着对华国锋、卜占亚又谈起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中。他说：中国党有十次要分裂，没有分裂成。

毛主席扳着手指算着，讲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等人的几次路线错误。

他说：当时，传说开除了我的党籍(指井冈山斗争时期——作者注)。不是党员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可以当师长。我们一个师有两个团，一个是农民起义的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团。南昌起义是正确的，但不上井冈山，想依靠外援，后来又打回湘南，我带了一个团到湘南去接他们。到了桂东沙田，我讲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逐步发展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回我们没有接到朱德、陈毅他们，但接到了萧克。回到井冈山时，说朱德他们已到了宁冈。我们在宁冈会师。他们又说我可以当党代表，又让我当上了党代表。王明他们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夺中央的权四年之久，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提出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革命胜利。他们讲不断革命，托洛茨基也讲不断革命，马克思也讲过要不断革命。我们讲不断革命是有阶段的，我们首先进行了民主革命，而后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叫作不断革命论。李立三、王明他们提出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然后就是全国胜利。可是我们进行了几十年的民主革命，1949年才到了北京，还没有宣布我们胜利了。当时我们只是说这是第一步，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来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赎买政策实际上是我们和资本家的关系问题。资本家他们要进行生产，没有原料，我们供给他们原料，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归我们国家收买。比如你要织布，你没有棉花，不准许资本家自己到处去买棉花，我们供给你棉花，你织出来的布也不准自己随便卖，

要由国家收买。当时我们提出来的口号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我们这样做了几年。全国解放的时候，官僚资本占 80%，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另外还有一些小企业主。怕他们干什么？过了几年，他们还不是敲锣打鼓欢迎公私合营了嘛？其实他们是表面拥护，心里是假的，假的也好嘛。

毛主席接着说：你们对民主党派的问题要研究研究，看还要不要？一个是要认识一下。还有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有人说不要了，也不给利息了。我说不行。有的小资本家不要利息，大的资本家是不愿意的。应该拿一点利息。

毛主席历来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很讲政策的，是反对对他们采取过火的行动的。

毛主席肯定地说：民主党派还要存在。有的地方说不要了，不要太急了，急不得。你们湖南有个人叫周世钊，是个名人，是我的老同学。五一节周世钊来了，上了天安门。我问他民主党派还要不要，这个人算是个老实人，他说民主党派里也有现行反革命分子，有些历史上有一点反革命行为。这是对个人讲的。对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没有搞翻案，他们也没有发指示。作为民主党派来说，还是可以存在的。但作为民主党派内部某个人来说，有的人是有问题的，少数人问题很严重。他们中间也有左派。也有中派，也有右派。不要笼统地说民主人士都好或都不好。

毛主席接着说：有些民主人士挨了斗，挨了批，有的拖了一两年了，问题也没有解决。不仅民主人士没有解决，什么“五一六”啊，他们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啊，有的是挂起来了嘛。应该把民主党派的牌子都挂起来，因为我们国家在搞文化大革命中间，有的还不正规，把民主党派搞掉了，有什么好处呢？一

个“拖”字解决不了问题，存在的问题在他们挂起牌子以后，可以再了解、再调查、再处理嘛。

毛主席讲完这段话之后，又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并带着我们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唱完歌后，毛主席说：你们不光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它的要求去做。你们找几本《国际歌》看看，《国际歌》里边什么都有了。你们明天就把《国际歌》念一念，议一议，谈一谈。不要每一句都搞对照，找目前最需要的要求去做。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里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活动。这次不做结论，也是分裂行动了。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

的斗争就是了。到了共产主义，斗争的性质可能有变化，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但是那个时候文化水平高了，犯错误的人觉悟比较快，能及时认识改正。对犯错误的人，不管他怎么样，不要杀人。搞斗、批、改，也要搞得温和一些。

这时，毛主席表扬我在中南海的工作中正确地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他说：他的办法好，凡是骂过他的，他都用了。毛主席指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中直机要干校的同志在怀仁堂、府右街贴了我很多大字报，揭发我的一些问题，我天天去看一看。毛主席知道后对我说：你这个人行。不怕丢脸。我坦然地说：我不怕。我丢脸不会丢一辈子呀，认识错误就不丢脸了。

我常想，人的脸该丢的就要丢，人家给你提意见了，对的。你就要接受、改正。我在机要干校上千名同志的会上讲，对党中央、毛主席，你们不能反，对我汪东兴，你们可以反。你们反对了，我接受；反错了，不要紧，今天我们一笔勾销，我们之间没有帐，我不会记帐。机要干校的同志听完以后都鼓掌了。

毛主席接着说：我这个人不大着急。在井冈山的时候，不是听说他们要把我开除党籍吗？我想你开除我的党籍，我也不着急，开除就开除吧！后来，他们说我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党代表了，叫我当师长。在闽西的时候，把我下放了。我想下放就下放。你下放我，我就做群众工作嘛。开除我的党籍，有的同志想不通，要报告中央。我给他们说，开除党籍就开除嘛，还报告中央干什么。在湘赣边区一本油印的小册子上，我看到他们讲为什么要开除我的党籍。原因是说我讲了一句错话，叫做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毛主席讲到这里时，专列上的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毛主席叫吴旭君、张玉凤来，一起唱这首歌。当我们唱到三大纪律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时，毛主席说：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

毛主席风趣地说：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

我们唱过三大纪律的第二、第三条时，毛主席说：这两条问题不大。

当唱到八项注意的第一条“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时，毛主席说：停！等一等，这一条也很重要，对待群众是不能耍骄傲，特别是我们的高级干部。我批示的济南军区的那个报告上说了：“把自己看成一朵花，把别人看成

豆腐渣”。你带部队，你当过排长、连长，如果传到你的村里去，就了不得了。那时的情况的确是这样的。如果一个村子里出了一个排长、连长，确实“不得了”，全村的人都要去看你，去拜访你的。1951年，我回江西老家去看望我的父母亲。我父亲问我在中央当什么官，我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父亲听了很高兴，认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一定当了很大的官。我对父亲说，我是给毛主席当马夫的，您就说当马夫的人回来了，或者说当兵的人回来了。我父亲不相信，问我是不是当了连长了，我说我没有当过连长，也没有当过排长。父亲很奇怪，又问我：那你现在当的官比连长、排长还小吗？我说还小一点，也就算个班长之类的吧。他还是不信，问我当班长的人为什么出去还坐汽车？我说这是工作需要。当时在我父亲的脑子里，当个连长就是很大的官了。

毛主席接着说：到了村里边，你就不得了啦。特别是当了营长，更不得了啦。我们说话要和气，不要要骄傲。

当我们唱到“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第二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时，毛主席说：这两条问题都不太大。好像现在还有这个习惯。

当唱到第五条“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时，毛主席说：等一等，这条问题大。当了班长、排长、连长，不得了啦。听说还有骂人的，甚至有打人的。听说不是有人把连长打死了吗？这就是和打人、骂人，教育不妥有很大关系嘛？我们讲要遵守纪律，一定要有自觉性。

毛主席又讲到部队的教育和练兵问题。他说：过去我们部队里搞军事训练、制式教练。从单兵教练、排教练、连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的军队成了“文化”的军队了。

毛主席接着谈到在军队开展的“三好”运动。他说：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你在那里搞什么所谓“超天才”（指有人吹捧林立果为“超天才”——作者注）。有人说我是天才。我只读了六年土学堂，七年洋学堂，我算什么天才呢？青年人，哪有那么多天才呢？青年人有个脾气，我批示的济南军区报告上说“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是豆腐渣”。对这个问题老人、中年人也得

注意。

我们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完后，毛主席要求我们把最后一句“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重唱一遍。

重新唱完这句后，毛主席说：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这样我们多好呀！特别是第一条，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要做到步调一致，经常商量商量，统一思想，这样才能步调一致嘛。还有一条，不要骄傲，就是不要骄傲自满，有军阀作风的一定要坚决克服掉。

毛主席这次谈话很耐心，他再三向我们进行党的路线教育，进行党性、纪律、修养教育。

8月 28日晚上 9时，毛主席找了广东的刘兴元、丁盛，广西的韦国清和我谈话。毛主席对刘兴元、丁盛不很熟悉。在谈话开始时，分别问了他们的简历，还问了一些有关部队的情况。毛主席谈家常式地提问和了解情况之后，开始了正式谈话，这样使刘兴元、丁盛等人不致在他面前太拘束。

毛主席对刘兴元、丁盛说：韦国清同志，我比较熟悉。你们两位，我不怎么熟悉。

毛主席问韦国清：韦拔群和你都姓韦，是不是一家子呀？

韦国清回答说：是五服以外的，不是五服之内的。韦拔群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接受过主席的教育。他回广西开展群众工作带回几本书，就在东兰县办起了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主席说：不能说他向我学习了什么。名义上，我是先生，他是学生，实际上，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要做先生，先要当学生。广西的事，他比我知道得多。可惜这位同志已经牺牲了，我对他很怀念。

毛主席又说：彭湃是广东海丰县人，家里是个大地主。他在海丰地方工作时，有一次几万群众朝拜观音菩萨，有人问他去不去参加，他说去参加。这样做是对的。他参加朝拜后，就对农民说，观音菩萨靠不住，还得靠自己才行。于是，就拿起了棍棒闹革命。他这个人善于鼓动，不善于搞组织工作。搞群众工作不怎么扎实，搞得不怎么好，后来牺牲了。他发动群众时，曾经拿自己家里的钱发给农

民来搞群众运动。

接着，毛主席又把话题转到党的历史上的几次路线斗争上来。

毛主席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五十多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

毛主席在讲到陈独秀组织“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时，又提到了刘仁静、彭述之的名字。

毛主席谈起井冈山时期的斗争，说：当时，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以后，又说中央委员也撤了。不知道怎么传到了井冈山，说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于是，有人就不服气，要向中央写报告。我说不要写，开除有么事要紧。我既然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他们说可以当师长。到后来又说我可以当党代表。那时，我们只有两个团，一个是秋收起义军编成的三十一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以后，成立四军了，朱德同志当军长，陈毅同志当政治部主任，我当党代表。在闽西开会，叫我下台。后来有人又叫我上台，我就上台了。再有就是李立三搞了那么一阵子。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夺了权，搞了四年。中央五中全会，我是政治局委员，说是不让我参加会。

1935年 1月，开政治局扩大会，张闻天、王稼祥和我主持的，这就是遵义会议。张闻天作报告。我是好比一个菩萨，被放在尿缸里，沉过几下，臭得很。这次会议以后，我管事了。前面讲的这五次，我都无能为力，他们不听我的。

毛主席接着说：以后出了个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乘势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的参谋长（1935年 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7月 21日中央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作者注），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毛主席说：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哪里还有根据地，

后来怎么能搞到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的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又逃跑了。他是很害怕胡宗南的，后来又跑到西安胡宗南那里去了。张国焘如果不跑，要给他当政治局委员，你们信不信？

毛主席说：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作者注）。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引起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

毛主席对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人强调说：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整三十八军实在是恶劣，对自己的队伍怎么能那个样子的整法。整二十四军、整三十一军、整六十九军、整三十八军，为什么要整？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毛主席问他们：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样看法？

毛主席接着说：犯了错误，就做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煤炭烧炕。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七个人都是要出国留学的，到法国搞勤工俭学的。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开始看马列主义的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讲完党的历史上所发生的路线斗争之后，毛主席转向韦国清。他表扬韦国清，说：我看你这个人太文了一些。打奠边府的时候，你是坚决主张打的。开头他们不听你的，你很厉害，他们就听了。

韦国清说：我是根据主席的指示办的。

毛主席问韦国清说：你们那个民族（指壮族——作者注），人口增加了一些吗？得

有四五千万人了吧。可以编几十个师。南方几个省能打仗的，第一是广西，第二是广东，第三是湖南，你(指汪东兴)那个省(即江西——作者注)算第四。

讲到这里，刘兴元汇报了工作情况。毛主席听完汇报，说：陈独秀那个人是不讲民主的。今天我听你讲了十分钟，陈独秀办不到，他不听。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他不同意，后来说同意啦。我说，那就请你通知招生吧。我开始招生的名额当中，他说农民比例太大，工人比例太小，不行。其实那时农民四万万人口，工人只有二百万，应该多培养农运干部。不过陈独秀也有个长处，就是不爱财。他穿的衣服倒都是干干净净的，办公桌上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

接着，丁盛向毛主席汇报说，在延安整风中学过两本书，对他帮助很大，后来还参加过“七大”。

毛主席听后说：你参加过“七大”，了不起呀！你们(指刘兴元、韦国清、汪东兴——作者注)有没有参加呀？汪回答毛主席说：我参加了。我是“七大”的候补代表。

毛主席随即谈到要学习理论，讲到延安整风学习的事。他说：延安整风时，提出来要编书。后来叫王首道负责编书，编出来后，不行。改由胡乔木编，这个人有点知识，他收集和研究了那么多的文件，编了两大本，印出来，让大家讨论。通过学习，这才把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

毛主席转向丁盛问：你打过些什么仗？

丁盛回答说：打过锦州。

毛主席说：打锦州时，有一个部队把蒋介石的增援部队挡住了，打得好。

讲到打锦州，毛主席想起一个动人的故事，他兴奋地说：我听说打锦州的时候，部队住在苹果园里面，不摘苹果吃。我就说：我们的部队有希望。

毛主席接着说：到了北京时，就有人提出要给部队增加军饷，说资本家吃大米、馒头，我们的部队吃酸菜，生活太苦了。增加军饷才能和资本家比。我说我们的军队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为什么要增加军饷呢？提这个意见的人，是代表吃酸菜阶级的人说话的。

毛主席跟着强调：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要犯错误。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

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上也要谨慎。军队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的那些语录，李德生同志就有意见。我说李德生这个人好蠢，你不是那个山头的人，别人的山头可以给你呀？好的宝贝怎么会给你呢？

说到这里，毛主席沉思一会，把谈话内容转向“天才论”。他说：《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你们看，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即《我的一点意见》——作者注），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你们都讨论了吗？《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歌，你们要注意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接着丁盛汇报他的战斗经历。当讲到冀东暴动的情况时，毛主席说：邓华这个人，跟着别人犯过错误，我对这个人寄予希望。杨勇被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钟赤兵这个人被敌人打掉了一条腿，是在娄山关被打掉的，你们不要歧视他。他是打娄山关负伤的。当时我看见一副担架抬着伤员，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钟赤兵，当团政委。这个人似乎可以到你们广州军区，科委有人歧视他。

毛主席接着讲学习问题。他说：要认真读书。罗瑞卿当参谋总长的时候，让他和陈伯达商量，搞个读书目录，搞出来了三十本书。我看可以。以后又提出来说这样会妨碍学语录，把学理论的事停下来了。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也是有办法的，可以请先生帮。边境作战时，有一个部队从生产的地方拉出来，上前线打仗，并且打得很好。我觉得我们的军队很有希望。

当丁盛讲到他自己参军的时间和在红四军工作的情况，毛主席笑着对他说：你可不能摆老资格，不要搞宗派哟。

毛主席又指着刘兴元说：你也要注意。

毛主席接着说：韦国清，你虽是红七军的，可也编到三军团了。你们几个人都是我这个山头的啊，可要注意！

毛主席说：你们（指广州军区——作者注）写的三支两军的文件，我看了。一些问题解决得不算彻底，但还可以。我在中央的批语上加了四个字：“认真研究”，就是要引起大家重视。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指林立果——作者注）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地方党委定的事，要拿到部队党委来讨论，这不是颠倒了吗？地方没有成立党委以前可以，地方已经有党委了，就不能那样办了。

毛主席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

今天就讲到这里。

8月 28日，毛主席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和我谈话后，为了领会毛主席谈话的精神，我们座谈讨论了一次。

8月 29日。我将这次座谈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边听我的汇报边插话。边交谈。

当我汇报到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在座谈会上检讨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所犯的错误时，毛主席说：现在看来，是马列主义没有学好。

毛主席问我：你对丁盛、刘兴元了解不了解？

我说：不了解。只是在开会时有点来往，平常没有联系。通电话也是因为有事要办，没有深谈过。这一次他们谈得深一点，摆了摆思想问题。

毛主席又问：你们知道不知道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回答说：主要是学习问题。

毛主席说：对呀。我经常提到这个学习问题。大家在这方面口头上是同意的，但在实际中看法就不统一了。你看，这一次在庐山会议上，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自己又不看马列主义的书，陈伯达搞的那一套就相信了，而且照着念，照着引用。

毛主席对我说：你在会上没有念这个语录。

我又讲了庐山会议上陈伯达要我打印称天才语录的事，毛主席听我讲完后说：这个没事。你是办公厅主任，你不是有意要打印陈伯达搞的语录。他是常委，他要你打印一些东西也是可以的，以后也没有用上。总理让封存起来，你就封存了，没有扩散。这是对的。

毛主席接着说：你发言被人利用，这是事实。在湖北检讨以后，我对你比较放心了。你没有什么问题。

毛主席多次这样说，为我“解脱”。

我说：我还是有错误。

毛主席说：当然，你发了言嘛。

毛主席关心地对我说：行政工作、组织工作，你是有一些办法的。你也是爱读书的，马列主义还是要学。我是关心你的。你去党校读了一年，你说你觉得用马列主义联系实际不够。我按你的要求把你下放了三年。结果。现在看来，要学好马列主义是不容易的，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你在政治方面运用马列主义要加强，光读马列主义的书还是不够的，还要读点历史，读点经济学，读点小说，读点哲学史。

毛主席讲完这段话后，为了强调学习历史、学会运用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对我讲了一段三国时期诸葛亮巧用空城计的故事。他说：司马懿这个人，怀疑心很重，诸葛亮没有兵力守城，赵子龙一时又赶不回来，城内空虚，结果诸葛亮就对他用了空城计。空城计的故事，能启迪人具体运用战略战术。

毛主席接着说：《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这都是文学作品，很重要的，是反映政治性的小说，体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相结合的完美，写得很好，语言也很生动活泼。

毛主席还嘱咐我把这些话向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人传达，另有机会时向政治局传达。

毛主席当时还考问我，要我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我回答说：三个来源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毛主席见我很快回答出来了，表示满意。

毛主席又对我说：《共产党宣言》这一篇文章写得好。那个时候。马克思、恩格

斯写《共产党宣言》时比你年纪小。只有三十岁左右。你看人家！

毛主席鼓励我刻苦学习，不断上进。

毛主席说：在党里为人也好，在社会上为人也好，个人为人处事也好，都要以团结为重，要辩证地看人，两点论地看人，变化性地看人。一分为二是辩证的嘛，二点论也是辩证的嘛。

针对我为人做事过于“认真”，毛主席说：为人不可太认真了，水至清则无鱼（《汉书·东方朔传》：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作者注）；不看书不懂文学，不做工作不懂事。你干事太认真。这样的话就好比水太清了，鱼就无法生存了。毛主席对我了解得很透彻，有时他甚至笑我：我有时说笑话，你也当真，也当做指示吗？我说：我不，我区别得开，但我会认真对待您说的话。

其实毛主席是最认真的人。我对他讲的话，交办的事，丝毫不敢怠慢。在转战陕北时，他要求太严格了。有一次，贺老总送给我们一些腊鱼、腊肉。有一天吃饭时，我让炊事员做了一些给毛主席吃。当时，我和周副主席、彭德怀在另一个食堂的桌子上吃饭，我们也有腊鱼、腊肉。刚开饭，毛主席就叫我过去，他狠批了我一顿。我回来后告诉了周副主席、彭德怀，说毛主席批评吃鱼吃肉了。彭德怀听我一说完，马上就说：是呀，吃得这么好，像个土豪一样。土豪有时也吃不上呀。

这时他们已经吃完饭。周副主席说：你刚才吃饭前怎么不讲，你应该有先知先觉，在毛主席批评前说出来。现在我们都吃完了，腊鱼、腊肉很好吃，我们还嫌不够呢。

周副主席让我赶紧把饭吃完，并说还给我留着两块肉哩。当时，我吃肉时，那个难受的滋味，就别提了。

毛主席围绕为人做事对我说的那些话，对我的教育，直到现在，我还牢牢地记住它、实践它。

8月 30日，毛主席在离开长沙去南昌的前夕，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我也参加了。

谈话一开始，毛主席就问大家：你们谈了两天了吧，怎么样？

我们各人简要地汇报了两天中学习讨论主席指示的情况。

听完大家谈过以后，毛主席针对林彪一伙人的问题发表意见说：现在不要作结论，

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作者注)，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作者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接着毛主席谈到党的状况和党的历史问题。他说：全党人多，我们党有二千多万人，坏人不过是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呢，叫做“吐故纳新”。还要挂起来一点，不过不多了，清理和挂起来的，就算百分之三。党内还有落后的分子，或者比较而言的。这些问题几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才能做结论。因为现在不打仗，没有陈独秀。那个时候(指民主革命时期——作者注)是天天打仗，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形势，很快就表现出来了。陈独秀他们 81个人跑出去了，发表了声明。八七会议前，采取南昌暴动的政策是对的，南昌暴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后来是路线上犯了错误，但是取得了经验也是好的。城市不那么搞了，靠外援靠不住的，还得靠自己。没有兵怎么样办？靠发动群众，还有俘虏兵嘛，他们也是群众。因为他们是国民党抓兵抓来的。

我们把他们俘虏过来，就是把他们从敌人那里分裂出来。

毛主席再一次提出：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注意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都很重要。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样做工作呢？要很好地抓住重点，学习和讨论，不借鉴历史和政策，怎么行呢？当然现在你们还不能向战士们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啦。

毛主席又说：庐山会议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样快，我们也不懂。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二天，从开始的那一天，他们就搞起来了。

毛主席这样说，显然指的是林彪。因为会议开始那天林彪讲话和他讲话的内容，事先都没有报告党中央、毛主席。

毛主席接着谈到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的问题：如果你们有理，你可以坚持，为什么那股妖风刮了三天就不利了呢？为什么要收得那样快呢？各大组组长

都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说要收回简报。你们的组长是谁呀？

在座的他们几个同志讲，我们中南组的召集人是曾思玉。曾当时是武汉军区的司令员。

毛主席说：总而言之，将来要把简报发给大家看。大家评论，是革命的，是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不要受群众落后议论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包括你们在内。不然的话，为什么被人家一股台风一卷，就把你们卷进去了。

毛主席说：军队历来就是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谁有道理听谁的。我历来就没有什么意见的，我的意见都是下边来的，下边是供应站。陈伯达给我几条语录，三十八军给了我一个报告，汪东兴那个自我检查，济南军区的反骄破满的报告，刘子厚也给了我一点材料。我有什么东西呀？我是向他们学的，然后我就打石头。

毛主席说：我看今后你们也应该这样。你们有什么学问呢？我不清楚。无非是找工人、农民开上两个会，然后总结一下。有些人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伟大呀！英明领导啊！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

毛主席接着说：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 1 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指毛主席讲的这些话——作者注）。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

谈到这里，毛主席指着刘兴元问：你会写文章吗？

刘兴元说：不会。

毛主席指着丁盛说：你呢？

丁盛说：文盲。主席的书还可以看得懂，外国的书看不懂。

毛主席说：那怎么样办啊？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参考消息》，太少。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我看《参

考资料》可以多印一点，看的人多一点。如果有的人不看，由他们去。

毛主席回过头来又谈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他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给你们通气了没有？我们回答说：没有。

毛主席说：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一千三百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

毛主席讲到这里，看了我一眼。我补充了一句，说：我一共做了三次检查。

毛主席接着说：少数人说汪东兴下不了台了，但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其中包括我的护士长、服务员、护士都说好。

那时，毛主席对我的情况是做了调查的。他曾经问他身边的服务人员：汪东兴怎么样了？他还抓不抓我这里的工作了？我看他每天还到这里来呀。服务人员报告

毛主席说：汪主任他一方面检讨，另一方面对您这里的工作从来没有放松，还是同以前一样。对我们也一样，该办的事还在办。

毛主席望着刘兴元说：我看你这个人比较爽快，说话不那么吞吞吐吐。

刘兴元回答：我有急躁粗暴的毛病。

毛主席说：我这个人也急，要改。军人搞惯了，就是急。急不好。战士才不管你呢。对战士管得要合理，要有理，就是合乎事实，讲道理。你们听了我这一吹，又是什么英明伟大呀，又是英明领导呀，又是很多都是新东西呀，没听见过呀！

讲到这里，毛主席转眼看了看大家。

韦国清接上话头说：我们听了很受教育。

毛主席笑着说：看，你又来这一套了吧。

毛主席专门向大家讲了他的谈话与在北京召开的九十九人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谈的有所不同，他说：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个人的会议总理作的总结了，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它是不好的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的吧。后来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

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忙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

毛主席说：我们的高级干部不成熟。那次庐山会议也不过是二百几十个人，我本人也是二百几十个人中间的一个，还有一些高级干部。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中央委员，卜占亚他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华国锋同志，你满脑子的农业，当然，你也讲了农业路线问题，可是光有你的农业也不够，还要考虑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做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的吹一吹风。

在谈到当时各地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问题时，

毛主席说：过去，积代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北京开的有缺点。首先是总参谋部召开的那个积代会，他讲“大树特树”，别人一句也不能讲。听说他那里有一个护士，说了一句不赞成的话，他们就不饶她。“大树特树”，不妥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后来，据杨成武同志讲：受到毛主席批评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那一篇文章，是总参政治部组织人写的，陈伯达与中央文革小组叫署上杨成武的名字。杨成武说这篇文章他没有看，那时他正和我陪毛主席巡视南方。

毛主席接着说：后来，国防科委开的积代会也不好。国防科委开积代会，有人还打电报祝贺，其实这是造声势，找一班人拥护自己。

毛主席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毛主席是说在军委办事组的主要成员中，真正从井冈山下来的只有黄永胜一个人。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不是，他们是在瑞金以后参加革命的。真正跟毛主席在井冈山的，只有黄永胜。

毛主席说：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17岁就当兵，原是叶挺部队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在江西修水参加了秋收暴动，然后上的井冈山。

毛主席说：现在南方干部比较少了，高高在上了，稀稀拉拉了。北方干部多起来了，我很高兴，但是不要翘尾巴……总的来说，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这

也没有关系。

毛主席特地嘱咐说：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这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其实人家都知道了，什么“小小老百姓”啊！“小小老百姓”是谁呢？河北人都知道。总之，就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的，或者三个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当时，毛主席确实是打算回到北京以后，再找林彪他们谈谈的。

毛主席接着说：方法就是三板斧，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陈伯达这个“小小的老百姓”，他搞挑拨离间，他的话也不讲完。我们现在在下边，也不公开批评，批陈整风我们还叫批修整风。我们党是有纪律的。庐山这场斗争，还没有听到外国人说什么，华北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后来他们又开了三个月的会，可是没有发现外国人说什么。总而言之，无论干部、战士，全国党员有二千多万，讲百分之三的话，稍微大了一点吧？（这时大家插话说：百分之三大了一些，吐故纳新只有百分之一左右，包括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二。）现在我希望你们试试看，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要那么长篇大论的报告。

讲到这里，毛主席看了看桌子上的表，说：今天我要走了，我这一路都要谈下去。韦国清又表示：主席的谈话，对我们教育很大。

毛主席说：又是英明了吧，从来没有听说过吧。九十九个人的会议，已经刚讲了吧。马克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要看行动。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地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人们说：盖棺论定。我说有的人盖棺也不能论定。斯大林不是盖棺论定了吗？没有论定。

这时，毛主席又引伸地谈到斯大林的问题。毛主席说：斯大林搞雅尔塔协定（指 1945 年 2 月 4 日至 11 日，苏、英、美三国政府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会议。——作者注），他们要瓜分世界，把中国的蒙古（指当时的外蒙古——

作者注)划出去，把新疆、东北划给苏联的势力范围，别国不能去；把日本划给美国的势力范围，你们知道不知道呀？

毛主席接着谈起中苏关系，他说：在朝鲜打仗时，两国关系比较好一些。《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雅尔塔协定是两种不同的问题。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内部争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容许第三国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十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国籍，怎么办？

他们答不出来。还有他们不许我们夺取政权，苏联共党始终是反对的，有电报还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曾给我们党来电报，说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

毛主席针对这个问题说：如果说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可以，民族怎么能灭亡呢？所谓民族，就是讲人嘛，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我是顶了他们的。我们党内也有相当的人当时不想夺取政权，也不讲夺取政权。

毛主席再三说：我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苏联形成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我们党分裂的基础是有的，特别是王明的那一次。

在座的有人问毛主席：对高岗、饶漱石，苏联是不是拉了他们一下。

毛主席说：拉是拉了他们一下。

毛主席讲到高岗的问题，使我想起了我陪同毛主席出访的一件事。在莫斯科时，毛主席曾当面问过我：听说过有告洋状的吗？知不知道告洋状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了想回答说：告洋状就是把中国的事情向外国人讲。

毛主席点点头说：是这个意思。

显然毛主席当时是指高岗等人告洋状。

毛主席说：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过去张国焘搞分裂，把共产党的武装对立起来，但没有搞成。

在结束这次谈话时，毛主席鼓励大家：很有希望。还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起来。

2012年5月3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五册（3）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五章 毛泽东外地巡视

第三节 毛泽东巡视南昌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南昌与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汪东兴的谈话

（毛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

（毛对许世友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陈独秀搞分裂，有81个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头一名是陈独秀，第二名是彭述之，第三名就是刘仁静。他们还发表了文告。

毛接着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周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南昌起义后，由于在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地区与敌人作战，结果损失很大，最后余部又被迫返回到江西、湖南一带。

南昌起义以后，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想依靠外国人、朱德同志当时到了桂东地区，他有一个同学、朋友，姓范，叫范石生，关系不错，搞到一起，范送了他一点枪、钱、衣。

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长征时，同我们一起的右路纵队，有四

军、三十军，这两个军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他们当时把枪丢给干部团的学生，我还是要他们把枪带上，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张国焘有命令嘛。他们不愿意回去，我们也欢迎。当时不能帮忙，军队不能帮忙，都拿着枪啊。张国焘打电报让他们回去，他们也愿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许世友都是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后来还是回去了。

毛对许世友等人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后来你们不是和我们又会合在一起了嘛。

二、研究资料

汪东兴著《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摘录

8月 31日，毛主席决定去南昌。当天上午 10点多钟，我们就把专列准备好了。

12点半，我送毛主席到长沙火车站，火车不到下午 1 点钟就开走了。

我送走毛主席后，又回到住地，把文件等东西收拾好，然后就去吃中午饭。

下午 1 点半钟，我坐的飞机起飞了，到南昌是2点钟。

毛主席在湖南时，已经要我通知许世友和韩先楚到南昌谈话。我到南昌后，又用我坐的飞机把许世友从南京接来，韩先楚坐福州军区的飞机由福州到南昌。

许世友、韩先楚是下午 5点钟左右先后抵达南昌的。他们到了以后，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他们和江西的程世清一共三个人传达了毛主席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我是以提纲的方式传达的，重复的内容只讲一遍。传达从下午5点半开始，到7点半结束，共传达了两个小时。

8月 31日晚 9点，毛主席抵达了南昌。我们一起到专列停车处去接毛主席。

专列停好后，我们上了车。毛主席在车上与我们谈了几句。毛主席说：车既然停好了，许世友也刚来不久，那就干脆到住地去谈吧。

我们送毛主席到住地，安顿下来。晚上10点多钟，毛主席就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我开始了在南昌的第一次谈话。

毛主席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

毛主席对许世友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

许世友赶紧说，伪中央没有他，有陈昌浩等人。

毛主席听许世友说到陈昌浩等人时，摆了摆手，表示他没有问许世友这些，不希望许世友讲下去。其实，张国焘搞的伪中央的名单，中央早就知道了。

毛主席接着说：陈独秀搞分裂，有 81个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

头一名是陈独秀，第二名是彭述之，第三名就是刘仁静。他们还发表了文告（指 1929年 12月 10日，陈独秀等 81人公开发表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作者注）。

毛主席接着又谈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问程世清说：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

程世清赶忙对毛主席说：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

毛主席又问许世友说：许世友同志啊！你与上海、浙江的关系有些紧张、有些问题呀？

许世友马上回答毛主席说：我与上海的关系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一直是保我的，一直是为我说话的，并且有我的大字报时，他还派人去覆盖。

毛主席说：覆盖不对。不应该覆盖嘛，让人家去看嘛。有什么关系呢？

许世友说：我与王洪文的关系也比较好。

在当时的条件下，许世友讲这些话也是可以理解的。

毛主席对许世友说：你这个许世友呀，应该高抬贵手，刀下留人。

毛主席说过“刀下留人”的话后，许世友紧张了，他有些怕了。他说：哎哟，我和浙江南萍的关系请中央派人来调查。

毛主席说：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没有责任呀？那样搞武斗，南萍有责任，但是都是南萍的责任吗？

毛主席转向韩先楚问道：你是湖北人吧？

韩先楚回答说：我是湖北人。

毛主席说：湖北的人我认识得很多，也可以说是不少吧。有个李求实是湖北人，

有项英是湖北人，有黄富生，有施洋，有董必武，还有恽代英，这些都是我们党的名人嘛。这些都是湖北佬。

韩先楚只是笑，没有说话。

毛主席兴奋地说：湖北出人才呀！

毛主席接着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周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

毛主席接着指出：南昌起义后，由于在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地区与敌人作战，结果损失很大，最后余部又被迫返回到江西、湖南一带。毛主席又说南昌起义以后，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想依靠外国人。朱德同志当时到了桂东地区，他有一个同学、朋友，姓范，叫范石生（范石生是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将领。朱德同志早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至交。——作者注），关系不错，搞到一起，范送了他一点枪、钱、衣。

毛主席再次说：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毛主席说：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长征时，同我们一起的右路纵队，有四军、二十军，这两个军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他们当时把枪丢给干部团的学生，我还是要他们把枪带上，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张国焘有命令嘛。他们不愿意回去，我们也欢迎。当时不能帮忙，军队不能帮忙，都拿着枪啊。张国焘打电报让他们回去，他们也愿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许世友都是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后来还是回去了。

毛主席对许世友等人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后来你们不是和我们又会合在一起了嘛（韩先楚、程世清随红二十五军长征，没有卷入张国焘分裂活动。——作者注）。

毛主席谈的这些话，显然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在座的几位司令员当时都掌握着军队，并且有的是四方面军的人。全党要团结，不要搞分裂。毛主席是希望、并且提醒他们注意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这时许世友转换了话题。他对毛主席说：主席呀，有“五一六”分子怎么办呀？

毛主席说：怎么又谈到“五一六”啦？

许世友说：“五一六”在南京相当厉害。文凤来是“五一六”分子，这个人到上海，要毒害毛主席。

毛主席问许世友说：毒害我的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呀？

许世友回答不出来。

毛主席说：这件事，你们要查清楚，不必作结论。

接着，毛主席问许世友：你们南京军区不是有一个有名的王、林、鲍吗？还有别的人？他们都是造反派吗？

毛主席是指除了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王必成当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当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鲍先志当时任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作者注）之外，还有一些干部，难道他们都是造反派。

许世友说：他们都是造杜平的反。

毛主席反问许世友：他们为什么不造你的反？

许世友回答说：不。他们不造我的反。

毛主席对许世友说：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

最后，毛主席又提出了学习的问题。毛主席说：现在有个口号，叫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要加一条。人民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后来。中央的文件和社论把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公布了。

这是毛主席在南昌的第一次谈话，大约谈了 1个半小时左右。毛主席谈完后。时间已到夜间零点。毛主席要我组织许世友他们座谈一下。

9月1日，毛主席休息。这天下午，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了座谈。

当天下午给毛主席检查身体，发现体温升高了，38度多。他患了感冒，晚上卧床休息。

9月 2日上午 8点钟，毛主席就起床了。毛主席问我：我们要走了，怎么办？

我说：您看呢？

毛主席说：还是见他们一下吧。

我马上就通知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来。可是怎么也找不着他们。

我想这可糟糕了。

找了半个小时，才知道他们打猎去了。我马上派人把他们喊了回来。

毛主席这一次与他们见面谈话的时间不长，比较简单。

毛主席对他们说：今天我要走了，汪东兴同志向你们传达的我在路上谈话的情况，你们也谈了谈。你们昨天座谈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意见没有？

韩先楚先发言。他说：我在座谈会上说，要听毛主席的。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大家都起了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做自我批评，请主席放心。

许世友请示毛主席说：主席，您到浙江找不找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许世友提问毛主席的是不是要解决他与南萍闹矛盾的问题。

毛主席不准备解决这个问题，便说：不谈这个问题。到浙江不谈这个问题啦！

许世友问毛主席说：我回去吗？

毛主席说：你回南京去吧。下午我也走了。

大家再也没有说什么。

9月 2日上午的这次谈话，连寒暄、握手的时间在内，40分钟就结束了。我们和毛主席吃完中午饭后，便离开了南昌。

从南昌到杭州，专列走了近 13个小时。毛主席在车上一直休息，抵达杭州的时间是9月3日的零点。

《吴法宪回忆录》摘录

2009年9月9初稿

2012年5月2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五册（4）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五章 毛泽东外地巡视

第四节 毛泽东巡视杭州

本节资料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毛泽东在杭州与南萍、熊应堂、陈励耘、汪东兴的谈话
毛说：那份简报（指九届二中全会六号简报）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
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

毛又说：庐山乱了三天，实际一天半，后来停下，逛庐山，到现在一年了。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阻止了。

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在谈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时）毛说：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

毛再次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搞山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又说：我没有同你们讲过路线问题，过去见面，吹的都是些鸡毛蒜皮，无非是同南京的关系的事，谁知后边还有一个庐山会议。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

听话要分析，不要听小道的话，不要尽听，人家一吹就听了，受蒙蔽了，不了解

情况。所以要调查研究，听话要分析。

(毛再次讲到他对“天才”提法和“伟大”提法的态度)，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挂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谈到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毛说：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都搞不清楚。你们要学习马、列的书。现在学六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学几本。

(最后毛又谈到军队问题)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谈及北京军区的情况)毛说：除了他们外，主要是北京军区，他们先整了二十四军，又整了三十一军、六十九军，最后整了三十八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二十一军调到陕西时，胡炜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六十六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

毛再一次说：对林要保。

(同时，又批林的讲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谈话快结束时，毛又提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

二、研究资料

《汪东兴回忆录》摘录

9月 3日零点，专列抵达杭州后，在笕桥专用线上停放。毛主席在车上找南萍、熊应堂、陈励耘和我一起谈了话。当时，南萍任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熊应堂任省军区司令员，陈励耘任空五军政委。这次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开始谈话时，毛主席问南萍：你们省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南萍主要汇报了浙江天旱与抗旱的情况。

毛主席听后说：天不帮忙噢！

毛主席很快把话题扯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上。他问南萍、陈励耘他们：庐山会议你们有什么错，听说吴法宪找你们谈了，他搞的那一套，说不是有八个人嘛？

毛主席看着陈励耘，又问道：其中有你一个，还有上海的那个王什么（指王维国——作者注），还有福建的那个叫什么？是不是就是那几个人。你们空军就八个中央委员嘛？

陈励耘听了立即紧张起来，慌忙解释：在庐山。吴法宪找我布置空中警戒时，阴一句，阳一句。这个人说话不算数的。

毛主席听后顺着说：是啊，说话不准确！

接着陈励耘又说：上山前都不知道他们这些事。

毛主席说：噢，上山前你不知道。空军有，海军有没有？他们是不是内部有通知呀？

陈励耘望着毛主席发怔，未作回答。

毛主席回过来谈九届二中全会六号简报的实质，把问题点得很透。他说：那份简报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

在座的人听了都没做声。毛主席接着谈如何正确对待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错误的人的问题。他明确地说：我看前途有两个，一个是改，一个是改不了。他们可能改，有的不一定能改。你们是受骗、受蒙蔽。对犯错误的，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比如说，我当班长，你们三个都是兵，我总是那么凶，抓着你们辫子

不放，那么行吗？

毛主席这些话，显然带有开导的意思。

但是陈励耘继续掩饰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不了解情况，跟着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毛主席看了陈励耘一眼，接过他的话题说：要搞唯物论，不要搞唯心论。

接下去，毛主席继续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他说：庐山乱了三天，实际一天半，后来停下，逛庐山，到现在一年了。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指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作者注），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

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阻止了。

毛主席所说林彪打电话、写信的情况是这样的：九届二中全会前，林彪曾经有两次想要打电话、写信给毛主席，但是都被叶群和黄永胜阻止了。

毛主席继续说：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毛主席进一步谈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他说：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

毛主席说的“三个副词”，就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经常在文件上写的“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

在“九大”党章草案中也曾经提到过“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在修改时被毛主席圈掉了。1970年 8月 13日宪法工作小组会上和 8月 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坚持要在宪法草案表述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句子中加上三个副词，为此他与康生、张春桥发生激烈争论。

根据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和会后发生的问题，毛主席再一次向在座的同志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搞山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进一步要求大家：要学习列宁为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 25周年撰写的那篇文章。列宁讲，唱《国际歌》走到哪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朋友。大家要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国际歌》歌词中讲“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

耐尔一定要实现”，这就是强调讲团结嘛！学马克思主义就要讲团结，没有讲分裂的！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首先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一条即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对人要和气，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搞军阀作风。其他的也还有点问题，比如不打人、骂人，不调戏妇女，但在军队中问题不大。

毛主席说：我没有同你们讲过路线问题，过去见面，吹的都是些鸡毛蒜皮。无非是同南京的关系的事，谁知后边还有一个庐山会议。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毛主席接下去说：听话要分析，不要听小道的话，不要尽听，人家一吹就听了，受蒙蔽了，不了解情况。所以要调查研究，听话要分析。

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还讲到他对“天才”提法和“伟大”提法的一贯的态度，他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挂像（指毛主席像——作者注），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本来，称颂毛主席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曾多次表示不赞成，我记得可能是1968年的一个重要节日的一篇社论，提了这“四个伟大”，毛主席要我拿着社论的稿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把它们划掉。去之前，我问毛主席：四个伟大全删掉，不留一个？

毛主席想了想说：那就留下一个吧。

我又问毛主席留下哪一个。毛主席说：我是当过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其实导师就是教师，不过比教师高明一点。

这样，我就去钓鱼台，传达毛主席的意思，要陈伯达他们圈掉了除“伟大导师”外的“三个伟大”。（这篇社论，可能是指 1968年元旦社论。元旦社论的提法是：“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全国亿万军民怀着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1976年毛主席逝世时使用的提法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作者注）

毛主席还谈到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他说：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都搞不清楚。你们要学习马、列的书。现在学六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学几本。

最后毛主席又谈到军队问题，他说：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作者注），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毛主席接着谈及北京军区的情况。毛主席说：除了他们外，主要是北京军区，他们先整了二十四军，又整了二十一军、六十一九军，最后整了三十八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二十一军调到陕西时，胡炜（二十一军政委、军长，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作者注）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六十六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

这次谈话中，毛主席还问浙江舟山的武斗问题。

毛主席问南萍：舟山还武斗不武斗啊？

南萍回答说现在不武斗了，但群众组织中派性还很强，政策还不够落实，最后地区会议开得比较好。

毛主席说：舟山主要是中级、上级的问题。有些问题，你们也支持了一下。

这里讲到的“中级、上级”，我理解是指省里、大军区或更上一级。当时，对舟山的问题，许世友和南萍就谈不到一起，叶群也坐飞机去舟山调解过，好像总参谋部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也去过，都没有解决问题。

毛主席再一次说：对林要保。

同时，毛主席又批判林的讲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谈话快结束时，毛主席又提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

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

最后，毛主席说：今天谈到这里。有些在别的地方谈的，请汪东兴同志再同你们谈谈。

9月 4日、5日，我向南萍等人传达了毛主席南巡路上前几次谈话的内容。并座谈了一次，还对过一次笔记。

在杭州期间，毛主席已经察觉和了解到林彪一伙进行阴谋活动的部分新的情况。9月 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

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

毛主席根据前后所了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况，感到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测行为，于是他当机立断，及时采取措施，对付林彪一伙的阴谋。他首先把我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

我问毛主席，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是转到上海。我还建议。也可以转向绍兴，即转向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观察动静。毛主席同意转向绍兴，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当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的那个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凭着多年高度的警觉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思想上、行动上已作了各种防范准备。

我从毛主席住地出来，马上就打电话找当时负责毛主席在杭州的警卫工作的陈励耘。陈励耘的秘书接的电话。他接到电话后，马上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说：“陈政委有事，您有什么事情请跟我讲。”

我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吗？”

秘书肯定地回答说：“能”。

我说：“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陈政委。”

紧接着我就找到张耀祠说：“赶快去找专列的同志讲清楚，火车马上开走。”当时

天气太热，我还要求在专列转到新的停车地点后，给毛主席的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棚子，起到防晒作用。张耀祠马上落实了。

这些情况，我都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这么办，并说这个办法好。

毛主席的专列于9日凌晨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

10日中午，毛主席叫我去。对我说：“走啊！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

我说：“主席，不通知他们不行。”

毛主席问：“为什么呀？”

我说：“不通知不行，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的时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

毛主席又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

我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

毛主席考虑了我的建议。他问：“那怎么办？”

我说：“您看，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

我刚说到这里，毛主席打断我的话说：“还有一个，就是空五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

我回答说：“马上就通知他。”

南萍等人被请来以后，毛主席在自己休息的房间里又同他们谈了一次话。当毛主席见到白宗善，同他握手时，问：“你为什么不来看我！”陈励耘连忙解释说：“他那天在值班。”

在谈话的时候，我就布置专列做开车的准备。毛主席同他们谈了半个小时。谈完后，我请他们到我的房间里休息。

我回到毛主席那里，请示说：“到上海后车停在哪里？”

毛主席说：“停在上海郊外虹桥机场专用线，顾家花园就不进去了。”

我说：“上海那边要通知，是不是通知王洪文？”

毛主席说：“是。这个电话由你们打。”

当时，陈励耘在我的房子里，我就只好在毛主席那里给王洪文打了一个电话。

专列 10日 13点 40分由绍兴返回，14点 50分抵达杭州站。在离开杭州去上海的

时候，我们没有通知其他的人送，而陈励耘却来了。陈励耘到了车站后，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他心里有鬼，当时神情很不自然。

他跟我握手时问我：“车开后，要不要打电话通知上海？”

我说：“你打电话给王洪文或者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以后我了解，陈励耘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后来，据陈励耘交代：8日晚上他有事，就是因为于新野到了杭州。于新野是8日先坐飞机到上海，然后赶到杭州找陈励耘布置任务的。但于新野有一些疑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追问陈励耘毛主席到底在杭州讲了些什么话，陈就把毛主席同他们谈话的内容做了报告。当时，于新野告诉陈励耘，要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谋害毛主席。据我们后来了解到的情况，陈励耘在接待于新野的房子里挂着一张毛主席像，陈励耘一看到毛主席像就发愁。

9月 10日，毛主席决定离开杭州，让我中午通知南萍、陈励耘他们。下午2时半，他们来向毛主席道别，毛主席又同他们谈了一次话。参加谈话的人有南萍、熊应堂、白宗善及陈励耘。我也参加了。

毛主席同白宗善握手时，问道：你白宗善为什么不来看我？

白宗善当时任空五军军长，毛主席对他很熟悉。

陈励耘慌忙接口说：他那天在值班。

握过手，毛主席首先对他们讲了一个寓意深长的故事。他说：齐国和鲁国打仗，我是帮齐国，还是帮鲁国呢？鲁国小，人少，但团结得好。齐国向鲁国进攻，鲁国利用矛盾，结果把齐国打败了。

这意思是讲大家要搞好团结，不要分裂，否则革命事业要失败。

毛主席接着说：听汪东兴同志说，你们批陈整风搞了两次，搞得还可以嘛，还不错。汪东兴同你们谈了一次，座谈了一次，对庐山会议认识深了些，学《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办了。

毛主席再次向他们谈到我们党历史上的路线斗争问题。他说：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两万五千人，当时中央苏区八万，只剩八千。那时张国焘搞分裂，不愿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后来，对四方面军回来的同志斗得凶，检讨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都通不过，过分了。当时到我这里

告状的都是四方面军的人，一方面军的一个也没有。四方面军就灰溜溜了，一方面军就翘尾巴了。

毛主席带着警示的口气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到后来走麦城失败。当然，那时没有反骄破满啦。我找黄永胜他们谈了话，东兴也参加了，当面批评了黄。黄永胜不会不摇鹅毛扇子吧！他一字不提林彪。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首先把我的书面检查批给黄永胜他们看，想启发他们。但黄永胜等人觉得只要有林彪在，就可以掩盖、保护他们，于是顶着，不承认有什么错误。毛主席同黄永胜等人谈话，他们都闭口不讲林彪的问题。

毛主席有针对性地对在座的人说：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内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这次汪东兴同志不是沾了个边嘛！

我当时插话，说我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

毛主席问：你们谁参加过“七战七捷”（1946年7月13日至8月31日华中野战军在粟裕司令员、谭震林政治委员的指挥下，连续进行了7次战斗作战45天，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又5个交通警察大队，共5.3万余人，通称“七战七捷”。——作者注）呀？

陈励耘说他参加过。

毛主席不信，说：我看不见得吧！你那时当什么官呀？

陈励耘回答说：当过副主任、主任、副政委。

毛主席在这里问解放战争初期的苏中地区的“七战七捷”，是为进一步谈干部问题。他讲到“七战七捷”的指挥员之一就是谭震林，在建国以后至1952年就在浙江当省委书记。

毛主席随后又谈到陈毅同志。他说：陈毅打仗，有个好处，还能听听其他人的话。打孟良崮，他南边听粟裕的，北边听许世友的。

在谈到北京军区时，毛主席说：北京军区队伍多，有几个军，还有炮兵、工程兵，装甲兵也多。他们整这个军、那个军。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

这时参加谈话的几个人都说：毛主席到各地谈话，是造革命的舆论是完全可以的。

毛主席表示同意大家的说法。说：陈伯达搞的是反革命游说，我搞不同。

毛主席虽然同许世友讲过，到浙江不谈他与南萍的矛盾，但为了搞团结，还是谈到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毛主席说：你们和南京的关系，我说了两年，还没有解决。我这边也讲，那边也讲。给你们讲的都可以公开讲。少数人可以讲，多数人也可以讲。你们同许世友同志不要针锋相对。对他说不服，对你们也说不服，这主要由我负责。

毛主席问南萍：南京开会你们去不去？我同许世友同志在江西谈过次，这次还要谈。

南萍说：我们没有听主席的话。今后按许司令的指示办。

毛主席说：那也不对。错了的也执行吗？许世友同志是可以交朋友的，有时还可抓住他的主要问题，把道理说清楚。他还是可以交朋友的。你们空军受不受许的指挥啊？

南萍等人答复说：受他的指挥，听的。

毛主席听了点点头，表示这样做好。

毛主席又说：国民党不能打仗，日本比它厉害，开始可几个军打他个军或一个师。打仗没有什么，就是“集中兵力”四个字。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颇难。

最后，毛主席说：把我的像到处挂，我已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这样了。“万岁”，英文翻译为 LongLive，是“长寿”的意思，对年青人可喊对年纪大的就不要喊了。

2009年9月9初稿

2012年5月4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五册（5）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五章 毛泽东外地巡视

第五节 毛泽东巡视上海

本节资料

研究资料

《汪东兴回忆录》摘录

10日 15点 35分，我们从杭州发车，18点 10分就到了上海。这次随毛主席外出，我带上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人，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专列一到上海，我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部队全撤到外围去了，在毛主席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部队，以防不测。在离我们的专列150米远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我们的火车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

10日晚上，毛主席同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王洪文见面，但没有谈几句话。王洪文住在车下的房子里，他还要我也搬到车下来住。我因为考虑专列的安全就谢绝了。第二天上午，许世友来了。

毛主席与许世友、王洪文和我，谈了两个小时的话。毛主席说：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有些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嘛。毛主席又说：要争取主动，有了错误，不认识，不改正，在那里顶着不好，这会加深错误，包袱越背越重，甩掉包袱，轻装上阵，人就舒服了。他还指出：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团结，在搞分裂。

许世友表示，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谈到中午，毛主席说：“吃中午饭啦！今天，我就不请你们在车上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

许世友热情地说：“汪主任，你也去。”

我说：“我不去了，谢谢。”

毛主席当着他们的面对我说：“汪主任，你把他们送走以后，再回来一下。”

我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王维国也来了。他一直在休息室里等着毛主席召见。

我送走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等人后，马上回到车上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问：“他们走了没有？”

我说：“走了。”

毛主席马上说：“我们走。你立即发前卫车。”

我说：“不通知他们了吧？”

毛主席说：“不通知。谁都不通知。”

我们执行毛主席的命令，立即发了前卫车。13点 12分，我们的车也走了。

专列开动时，车站的警卫人员马上报告了在锦江饭店吃饭的王洪文。

王洪文小声告诉许世友说：“毛主席的车走了。”

许世友很惊讶地说：“哎呀！怎么走了？”

王洪文对许世友说：“既然走了，我们还是吃饭吧。”

王洪文、许世友、王维国等人吃了两个多小时的中午饭。吃完饭已经是下午了。

许世友便乘一架伊尔—14飞机赶回南京，然后到车站接我们。

我们专列18点35分抵达南京站，停车15分钟。许世友在南京站迎接，

毛主席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

我下车见了许世友，跟他说：“毛主席昨天晚上没睡，现在休息了。毛主席还说，到这里就不下车了。”

许世友说：“好！”他接着问我：“路上要不要我打电话？”

我说：“不用了，我们打过了。”

许世友又问：“蚌埠停不停？”

我说：“还没最后定。一般的情况，这个站是要停的，但主席没定。”

专列从南京开出后，到蚌埠车站是 21点 45分，停车 5分钟。12日零点 10分到徐州，停车 10分钟。到兖州时是 2点 45分，没有停车。到济南时是 5 点，停车 50分钟。在济南车站，我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到丰台站，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专列到德州时是7点40分。停车20分钟。11点15分到天津西站，停车15分钟。

9月 10日下午 4点，毛主席乘坐专列匆匆由杭州出发，走了 5个多小时，晚10点前抵达上海。

在杭州动身前，我把毛主席就要到上海的事打电话告诉了王洪文，叫他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王洪文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

专列到达上海，停到靠飞机场的支线上。我立即下车去接许世友和王洪文。我下车后只见到了王洪文，就问他许世友来了没有。王洪文说许世友还没有来，并问我路上怎么样等问题。

我引王洪文到车厢里见毛主席。毛主席问王洪文说：东兴同志打电话给你，要你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怎么没有见他来呀？

王洪文回答说：电话我打了，南京说他可能下乡了。正在设法同他联系。

毛主席与王洪文聊了几句，就说：等许世友来了一起谈。

王洪文随即下车了，我去部署、检查警卫情况，他再去住处打电话找许世友。

毛主席一直等到 11日的上午 10点钟，许世友方才来。毛主席马上开始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谈了1个多小时。毛主席这一次谈得很简要，一个原因是毛主席等得太久了，另一个原因是与许世友在南昌已经谈过话了。

这次的谈话，我只作了简要的记录。

毛主席问许世友说：许世友，你下乡啦，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

许世友回答说：我看农场去了，看大别山附近的军垦农场去了。

毛主席说：去那么远了呀。

许世友说：坐吉普车去的。

毛主席批评许世友说：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

许世友感到毛主席批评得对，内疚地说：真对不起。我想主席还会在杭州住几天的，然后才能到我这里。我昨天夜里 12点多钟才回到南京的，先休息了一下，就没有打电话到上海。

许世友接着汇报说：今年农业可能会大丰收。军垦农场也不错，庄稼长势很好，丰收在望。

毛主席说：那好嘛！你去看看农业也好嘛。

许世友接着说：军队的情绪很好。军队里比较稳定，乱哄哄的情况也过去了。我带着那些造反派去游过苏北。

毛主席问：是不是都是支持你的那一派？

许世友说：我把两派都带上了。

毛主席再次给许世友打招呼：不能把领导机关搞乱了，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我在江西就同你讲了，要“高抬贵手”。

许世友说：不会，我正在做他们的工作。

毛主席说：那好！

王洪文这时说了一句话：许司令，毛主席等你快15个小时了。

毛主席马上打断王洪文的话说：不要这样，不要紧嘛。

毛主席的意思是说许世友下乡去了，不在家，不是故意不来的。

毛主席缓和了一下气氛说：这段时间我们也休息了一下。接着又说：不要提了，我们还是谈正事。

毛主席回到谈话的主题上来，他说：对庐山会议你们想得如何呀？是不是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是不是都解决了呀？

毛主席问了几个问题之后说：我认为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对有些问题还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而且耐心地等待嘛。

毛主席这样说的意思是希望在等待的过程中，犯错误的人自己应该争取主动认识检查所犯的错误。

毛主席接着说：认识一点就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犯了错误，也不认识，也不去想办法认识，在那里顶着，这个不好，可能不仅会使错误不能被认识出来，而且会加深的，甚至把错误当作包袱的。犯错误的包袱，常常是越背越重，这个不好。要把这个包袱甩掉，轻装上阵，那样人就会觉得舒服了。不然总是背着沉重的包袱，你不甩开，那怎么会好受呢？

许世友诚恳地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毛主席问他：我有什么指示呀？

许世友说：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点意见》。

毛主席说：那个不是在后头吗？是你们犯了错误后，我想了五天才写的。你们是

什么时候讲的，是24、25、26(指 8月 24日、25日、26日——作者注)三天嘛！

许世友坚定地回答说：这个指示我拥护，我就是按您的意见办的。

毛主席说：不见得吧，我那个意见你学了没有？我那个意见上说，什么叫唯心论，什么叫唯物论，你讲一讲，我听听！

许世友当时哈哈地笑了。

毛主席对许世友说：你不是说执行我的指示吗？我要你们学习。你们又不动。人家要搞那个论“天才”，找了几条称“天才”的语录，你找到了吗？

王洪文看许世友没有讲什么，就开始向毛主席汇报。他说：上海的五六位中委和革委会的主任和副主任，针对庐山会议出现的问题座谈了一次。

毛主席问：你们座谈了一些什么呀？

王洪文说：突出的是讨论了林彪的讲话。当时我们心里就嘀咕。

毛主席说：你们嘀咕什么呀？人家是副主席讲话呀。

王洪文说：他是副主席讲话，但当时我们都很少发言。

毛主席问道：那你们不是也都听了吗？你不是也听了录音嘛！那时你们华东、上海就一个拥护的字都没有说呀？

王洪文回答说：有。那个时候不拥护也不好。这次我们座谈时，也讲了一些意见，但有的人在庐山会议上没有发挥。当时庐山会议上，就是安排要讨论的，我们华东组除了林彪的一帮人抢着发言外，我们也发了言，我也讲了几句。事后，听说林彪讲话是中央常委同意他讲的，特别是论“天才”的语录也以为是中央搞的。

毛主席说：谁说这个论“天才”的语录是中央搞的呀？当时我们发了语录没有呀？

哪一个文件上说发了语录呀？哪一个文件上写有这几条语录呀？

“天才”的语录是林彪一伙人内部搞的，别人都没有看过。因此，毛主席不同意王洪文对语录的看法。

王洪文接着说：六号简报，我们一看到就火了。

毛主席问：你为什么一看到就火了呢？

王洪文说：简报里有一些话有问题。设国家主席问题，在北京讨论宪法时有争论，而且争论得很厉害。当时有人提议设国家主席，有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毛主席的意见，可是他们不听，还要坚持他们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毛主席问王洪文说：那你对简报的性质有什么看法？

王洪文说：这个简报是有错误的，是错误的简报。当时我们几个人到了主席那里谈过了。

实际上，对简报问题的意见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到毛主席那里讲的，王洪文没有去。

毛主席说：这个简报现在还没有做结论，这个结论将来由中央来做。我认为是反革命简报，起码如你讲的是有错误的简报。为什么有错误的简报要在这个时候发呢？为什么有的同志发了言，登简报，又不光让本人看呢？

毛主席接着说：听了你们的意见，六号简报是错误的，是有人捣鬼，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团结，是搞分裂。我讲话一句顶一万句？在这个问题上，我看连一句也不顶。不是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是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毛主席再一次把林彪一伙人的问题的实质点透彻了。

毛主席讲完这些后，对许世友、王洪文又讲了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谈到 11点多钟，毛主席说：我今天不留你们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你们都去。

我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空四军第一政委的王维国脸红脖子粗地站在车门口等着。王洪文把他拉上车来，与毛主席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

毛主席对王维国很冷淡，连话都没有讲。王维国就同他们一起走了。

送走他们后，我回到车上。毛主席立即对我说：我们走！

王洪文陪许世友等人吃饭时，接到飞机场保卫人员打去的电话，报告说毛主席的专列在12点半钟就开走了。王洪文把此事告诉了许世友。

许世友吃完饭后，于 3点多钟乘他原来至上海的飞机赶回南京，在南京站接我们。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在南京站停了 15分钟，毛主席没有见南京的同志，只有我下车见了许世友。

此后，我们的专列不停留地一直向北京开。在济南站，毛主席叫我打电话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车站等我们，说要同他们谈话。

当时李德生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纪登奎任北京军区第三政委，吴忠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2009年9月9初稿

2012年5月5日修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五册（6）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五章 毛泽东外地巡视

第六节 毛泽东回到北京

本节资料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丰台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汪东兴的谈话

（毛先问李德生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李谈了阿党对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态度和意见）

毛说：他们是左派，我们是右派。

怕美帝从亚洲撤出来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要我们把美帝拖住。他们（指美国）只有两亿人口，经不起伤亡嘛，所以他们要撤军。撤军，不一定就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

（接着，毛又谈起党的历次路线斗争），毛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和枪也可能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什么是纲？你们会打渔吗？纲就是串鱼网的那根绳子，目就是鱼网上面的一个个眼，你们讲的那个目，三天也讲不完。我今天是讲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开头是陈独秀，“八·七”会议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81人签名的“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说我们是坏人，红军是破坏分子，以后他们就搞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后头就是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的，李立三神气起来，搞了三个月，那时总理还未回来。李立三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李立三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李倒台是在三中全会。王明倒台是在遵义会议。

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把总理封为调和主义，出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

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我们党五十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给分裂了的。

(毛谈了历史上有人多次搞分裂，但都未成功，然后说：) 再就是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着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个目的嘛！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那个文章，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五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要批评，做好了工作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犯错误的人，允许改正错误。但发声明是容易的，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问题在于是不是实践他的声明，改正错误。这些人最没有勇气，收场那么快。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是三天。为什么那股妖风，只刮三天就不刮了，你有理为什么收回？说明他们空虚。我是哪里有石头抓起来就打，在庐山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是一块石头，济南军区三破三立的报告也是一块石头，三十八军的报告是一块大石头。以后又有刘子厚的检讨，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会根本不批陈，我加了批语，这也是甩石头。

(毛对李德生说) 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你向他们要，一连说三次：“你的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

进城以后，我很少抓军队工作，管军队工作的，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实际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三任参谋总长罗瑞卿不大听他的。以后是杨成武、黄永胜。

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不怎么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

（毛对着汪东兴说）他沾了一点边，在一千多人的会议上作了几次检讨。

（汪说：正式地做检讨是三次。）

（毛在谈到汪东兴在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做检讨时说）只有七千兵，连婆娘、娃娃都算上，他也没有倒呀，你把心里话说出来，倒不了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说这次汪东兴下不了台了，但是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五个人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承认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但是，他们的检讨里面是吞吞吐吐，因而使人怀疑他们能否改好。

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要掺沙子才行。李先念同志过去也是搞军队打仗的嘛，可参加军委办事组，以后还要从各大军区调一些人来参加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北京军区也要从各军调一些人，把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华北会议派了李德生、纪登奎同志到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我的办法就是打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毛问）陈伯达算不算一次路线？

（纪登奎回答说：算！）

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

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月至九月，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
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
不要搞阴谋诡计。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贊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八十一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贊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

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又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

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再就是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的斗争。

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的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以改，一个是可以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组六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毛说，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

广州军区写的那个三支两军的文件，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语上，我添了“认真研究”四个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练中有制式教练的科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

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毛说，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

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毛说，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毛说，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

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二、研究资料

《汪东兴回忆录》摘录

9月 12日 13点 10分，毛主席的专列驶抵丰台。车停好后，毛主席在车厢里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谈话，一直谈到下午3点多钟。这次谈话，我也参加了。

毛主席先问李德生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李德生谈了阿劳动党对我国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态度和意见。

听完李德生的汇报，毛主席说：他们是左派，我们是右派。

那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比较“左”，他们认为我们和帝国主义来往，我们是右了。

毛主席说：怕美帝从亚洲撤出来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要我们把美帝拖住。他们（指美国——作者注）只有两亿人口，经不起伤亡嘛，所以他们要撤军。撤军，不一定就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

毛主席的意思是说美国撤军后，不一定会对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增加压力。美国在侵越战争期间，投入50多万军队，死亡也不少。越南是属于热带地区的国家，美军对环境不适应，越南人又运用了游击战术，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关于阿尔巴尼亚，那时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还比较好。当时曾经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来形容这种关系。“文化大革命”中，曾用毛泽东的名义发过一个电报，称他们是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即 1966年 10月 25日，《毛泽东同志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其中说：“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作者注）。那个电报的内容，当时毛主席不知道。他知道后说：阿尔巴尼亚怎么成了明灯呢？它各方面都不行。工业、农业生产都不好，中央的领导人也不团结，他们是极左的。

当时毛主席对阿尔巴尼亚问题的看法是心中有数的。

接着，毛主席谈他要谈的主要问题。他还是从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讲起。他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和枪也可能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什么是纲？你们会打渔吗？纲就是串鱼网的那根绳子，目就是鱼网上面的一个个眼，你们讲的那个目，三天也讲不完。我今天是讲纲。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开头是陈独秀，“八·七”会议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81人签名的“列宁主义左翼反

对派”，说我们是坏人，红军是破坏分子，以后他们就搞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后头就是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的，李立三神气起来，搞了三个月，那时总理还未回来。李立三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毛主席继续说：李立三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李倒台是在三中全会。

王明倒台是在遵义会议。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把总理封为调和主义，出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

毛主席说：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我们党五十年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给分裂了的。

毛主席谈了党的历史上有人多次搞分裂，但都未把党分裂成。他接着说：再就是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着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个目的嘛！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那个文章，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五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毛主席说：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毛主席接着说：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要批评，做好了工作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犯错误的人，允许改正错误。但发声明是容易的，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问题在于是不是实践他的声明，改正错误。这些人最没有勇气，收场那么快。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是三天。为什么那股妖风，只刮三天就不刮了，你有理为什么收

回？说明他们空虚。我是哪里有石头抓起来就打，在庐山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是一块石头，济南军区三破三立的报告也是一块石头，三十八军的报告是一块大石头。以后又有刘子厚的检讨，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会根本不批陈，我加了批语，这也是甩石头。

谈到这里。毛主席对李德生说：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指论“天才”的语录——作者注），你向他们要，一连说三次：“你的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

毛主席接着说：进城以后，我很少抓军队工作，管军队工作的，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实际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三任参谋总长罗瑞卿不大听他的。以后是杨成武、黄永胜。

毛主席提到黄永胜时说：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不怎么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

毛主席又对着我说：他沾了一点边，在一千多人的会议上作了几次检讨。

我补充说：正式地做检讨是三次。

毛主席说到我在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做检讨时说：只有七千兵，连婆娘、娃娃都算上，他也没有倒呀！你把心里话说出来，倒不了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说这次汪东兴下不了台了（意思说检查过不了关——作者注），但是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五个人（指黄、吴、叶、李、邱——作者注）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承认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但是，他们的检讨里面是吞吞吐吐，因而使人怀疑他们能否改好。

这几位大将的检讨，均非出于自愿，是毛主席要我以他的名义，一个一个地催着他们把检讨书交来的。毛主席在他们每个人的检讨书上都写有批语，特别是对叶群的检讨书批语最多。毛主席说他们的检讨吞吞吐吐，是因为他们在检讨中回避了很多问题，特别是实质性的问题，所以毛主席就怀疑他们能否改好了。

毛主席接着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要掺沙子才行。李先念同志过去也是搞军队打仗的嘛，可参加军委办事组，以后还要从各大军区调一些人来参加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北京军区也要从各军调一些人，把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华北会议派了李德生、纪登奎同志到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我的办法就是打石头、掺

沙子、挖墙脚。

毛主席问在座的同志：陈伯达算不算一次路线？

纪登奎回答说：算！

毛主席说：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

毛主席接着强调：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批评林彪不讲三要三不要的原则。

毛主席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2009年9月9初稿

2012年5月6日修改